文化百科丛书

大宋王朝



王新龙 编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文化百科丛书

大宋王朝

王新龙 编著



大宋王朝 ①

大宋王朝 ②

大宋王朝 ③

大宋王朝 ④

前言

大宋王朝，武运国势萎弱不振，但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政治军事与经济文化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貌似不和谐地并存于一体，从而引出历代读史者迥然不同的评价，褒贬毁誉，在在有之。

千年前的宋朝已成历史，然而宋朝的名人贤哲、才子墨客、市井生活、工艺珍玩，却依然鲜明的留存于今天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中。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相当繁荣的朝代。然而两宋政权却在北方民族的攻掠下，渐次衰亡。个中原因相当复杂，历代学者众说纷纭，民间传说和小说、戏曲也颇多宋人故事。

本丛书立足大宋，介绍了五代战乱的终结、中央集权的强化、右文抑武的家法、首内虚外的战略、穷则思变的改革以及皇帝的荒唐、官僚的争斗等重大事件或现象；同时，从经济、文化、科技等不同的层面重新审视两宋，试图全方位地向读者展示大宋历史的始末。

第一章

宋朝的宫廷赵匡胤陈桥兵变大宋王朝创建于公元960年的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而成为宋太祖，这一基本史实并不存在疑点。而令人不解的是此次政变过程中，有关史籍的一些细节方面描述充满着矛盾，主要围绕赵匡胤是完全被动接受黄袍加身，还是其集团进行的一次早有预谋和准备的政变?有关的史料与素材矛盾百出，使这一事件的进程变得扑朔迷离。

赵匡胤像五代末，显德七年(960)的正月初一，后周朝廷接到镇、定二州的军情急报，说北汉勾结契丹，大军声势甚盛，南下侵入边境，形势十分危急。宰相范质、王溥等商讨后奏准太后，立即派检校太尉、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诸将领兵出征。大将慕容延钊简选精锐，率前军先行启程。赵匡胤调集各路人马，领大军也即将北征。初三，军队驻扎于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诸将聚谋，以为主上幼弱，我们出死力破敌，有谁知道?也为国家着想，不如立太尉为天子，然后北征也不晚。乃找匡胤之弟、时任供奉官都知的赵光义和掌书记赵普商议。光义以为：哥哥忠赤，不会同意。赵普认为：外寇压境，大敌当前，应先御敌，战归再议。而众将坚持，说：“若太尉不受命，六军难以向前。”此时，赵匡胤却醉酒卧营不省，众有拥立之意的将士便环立待旦。次日黎明，军营四周呐喊声起，震动原野。光义与赵普入营告知，而诸将士也直叩寝帐之门，高呼：“诸将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赵匡胤惊起披衣，未及应酬，便被扶到议事厅，有人把皇帝的黄袍加披到他身上，众人都罗拜庭下，口称万岁。匡胤要推辞，众人不答应，并相与扶匡胤上马，拥逼南行。赵匡胤在马上说：“你等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那就必须听从我的命令，不然我就不做这个皇帝。”众将下马回答：“惟命是从。”然后赵匡胤严肃颁布了有关入京以后士兵秋毫无犯的约法，并令众立誓，这才率军返回开封城，遂取代后周政权，创建了大宋王朝。

上述故事情节，主要意译自宋代最具权威的史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其他重要史料记载也所差不多。从其具体过程考察，此次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似乎是一次偶发事件，是遵循五代将士拥立主帅的旧

例行事，赵氏集团事先并不知情，赵匡胤完全是被动接受众将的请求，不得已才同意做皇帝。然而从其他相关史料分析，却使人感到其描述是大有疑问的，黄袍加身应是一次有预谋有准备的政变，所谓“黄袍不是寻常物，谁信军中偶得之”(岳蒙泉《绿雪亭杂言》)。

赵匡胤出身将门，22岁时投到后汉枢密使郭威帐下效力，因战功卓著，30岁就升至殿前都指挥使。他以拜把子兄弟的方式，团聚了一批生死与共的高级将领铁哥儿们，号称“义社十兄弟”，开始发展自己的势力。显德六年(959)，33岁的赵匡胤升任殿前都点检，执掌碟军最精锐部队。六月，周世宗去世，恭帝即位，时才7岁，太后也年轻少谋，孤儿寡妇无能力执政，几位宰相也较懦弱。而这时在京城的禁军两司将领，除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外，基本上都是赵匡胤的结义兄弟或好友。可以说一场政变在如此成熟的条件下已开始酝酿，问题只在于找一个怎样的契机发动而已。

据司马光《涑水纪闻》记载：“及将北征，京师喧言，出师之日将策点检为天子。故富室或挈家远避于外州，独宫中未之知也。”《续资治通鉴长编》也说：“时都下欢言，将以出军之日策点检为天子，士民恐怖，争为逃匿之计，惟内庭晏然不知。”说明此事，早在政变之前已于京城一带传得沸沸扬扬，且能断定政变将发生于“出师之日”，此绝非普通民众所能猜测和指定的。所谓只有“宫中未之知”，应指宫廷中后周皇帝的孤儿寡妇还被蒙在鼓里。不能判定的是：这些传言是赵氏集团为政变故意所做的舆论准备，还是有一定地位的人在有关征兆的预见中所做的推测?大军在开拔途中，一个号称谙知天文的军校苗训，也指点了当时“日下复有一日”的天象，是即将改朝换代的“天命”。这一宣传与京城传闻相配合，使人有故意做舆论准备之感觉。

此传闻在京城造成民众如此的恐慌，应该说绝大部分人都会听说，那么宰相范质、王溥等大臣是否知晓呢?如果知晓，他们仍派赵匡胤率军出征，是否与赵氏集团同谋呢?不过从后来事态的发展来看，范质与王溥似乎又不知情。据有关记载，兵变消息传到京师，范质受到太后的谕责，退出朝门，握住王溥的手道：“仓促遣将，竟致此变，这都是我们的过失，为之奈何?”王溥听了发愣而无法回答，忽口中呼出呻吟声来，原来范质握手之指甲已掐入他的手腕，几乎出血。赵匡胤入城后，还对

范质等人“呜咽流涕，具言拥逼之状……(范)质不知所措，乃与(王)溥等降阶受命”(《宋史·范质传》)。等到赵匡胤诣崇元殿行禅代礼之时，召文武百官就例，班定礼仪程序之时，独缺周帝禅位制书，这时翰林学士承旨陶谷出诸袖中，进曰：“制书成矣。”遂完成此禅位之礼，使赵匡胤登上皇帝宝座。其中，像翰林学士之类的官员已早有准备，而宰相范质等居然一点也不知情，似乎又很难说得过去。

《宋史·杜太后传》载，杜后得知其子赵匡胤黄袍加身后，脱口说道：“吾儿索有大志，今果然。”依然谈笑自若，没有任何惊诧之表情。《涑水纪闻》也载，杜后说：“吾儿生平奇异，人皆言当极贵，又何忧也。”据说，匡胤年轻时，杜氏劝他好好读书，匡胤奋然回答：“治世用文，乱世用武，现世事扰乱，愿习武艺，安邦定国。”杜氏笑道：“儿能继承祖业，便算幸事，还想什么大功名哩。”匡胤道：“唐太宗也不过一将门之子，后造成帝业，儿想与他一样干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母亲以为如何?”杜氏怒道：“不要信口胡说，世上说大话的人，后来往往没用，还是读书去罢!”而这时，连年老的母亲都变得如此胸有成竹，遇事不惊，说明赵氏集团对这事的准备已相当充分。所以后人以诗讥讽道：“阿母素知儿有志，外人反道帝无心。”

一些宋人笔记记载，赵匡胤早年曾到高辛庙算卦，占卜功名前程，据说自小校以上至节度使，一一掷之，卦皆不应，最后唯剩“天子”时，一掷而得此卦。这事真伪已无法考定，然而从其为当时广为流传的轶闻而言，也或是赵氏集团所作的舆论准备，至少说明赵匡胤自己早已对此事有所谋划。而政变发生之际，赵光义和赵普马上派快骑入京，通知其死党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和殿前都虞侯王审琦，让他们在京城做好改朝换代的接应准备。有意思的是，此时赵匡胤居然醉酒卧营不省，而使将士们环立等待，直到次日黎明。这一情节是真实的，还是故意做作，抑或后人编造?也令人颇感困惑。

大军返回京城，城门早在石守信诸将的控制之下，不但入城顺利，整个京城也没有因此发生大的动乱。时正早朝，副都指挥使韩通闻讯，还没来得及集结军队应变，就被入城的殿前司勇将王彦升追杀，并诛灭其全家。这是后周将相中惟一的罹难者，他还没来得及组织起反抗，就被迅速剿灭，如没有事先布置安排，怎么会如此周全。当然，事后还要

演饰一番，将韩通以礼葬之，并嘉其临难不苟，赠中书令之职。有意思的是，后来宋太祖幸开宝寺，见壁上供有韩通的画像，立即令涂去，应是内心有愧吧。

尤其令人不解的是：本因边境军情告急，这才令赵匡胤率军北征，为何黄袍加身后便率军回京，而不用去抵御强敌了呢?有所谓“千秋疑案陈桥驿，一着黄袍便罢兵”(查初白《敬业堂集》)。一般认为，镇、定二州是在谎报军事，以配合此次政变。这样，镇、定二州节度使也理应是赵氏集团的成员了。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镇、定二州军情并没有谎报，《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契丹国志》诸重要史籍都有相关军情记载。而二州节度使郭崇和孙行友，据《宋史》两人的传记所载，宋初，郭“崇追感周室恩遇，时复泣下”。监军密奏：“崇有异心，宜谨备之。”同时，孙“行友不自安，累表乞解官归山，诏不允。建隆二年，乃徙其帑廪，召集丁壮，缮治兵甲，欲还狼山以自固。”被人告密，令举族迁赴都城，审问后削夺官爵，勒归私第，并严惩其部下。可见，两人不可能属于赵氏集团成员。那么，为什么北汉与契丹入寇之军队没有长驱南下，确实令人不解。其后，郭崇曾来报：“契丹与北汉军皆遁。”为什么会自动撤退呢?难道是其趁后周“主少国乱”之机起兵入侵，得知政变后“宋立国安”，就自动退兵了吗?

五代诸帝多由军队拥立，如唐废帝李从珂、唐明宗李嗣源、周太祖郭威等，它是唐代藩镇割据后军人擅废立之权而留下的遗风，自然为儒家正统思想所不齿。所以在宋代官方文献中，都把陈桥兵变说成赵匡胤事先完全不知内情，以洗刷其篡夺王位的千古骂名，由是在有关文献中遮遮掩掩，弄得历史记载矛盾百出，整个过程疑团丛生。再如邵伯温在《闻见录》中引证王禹偁的《建隆遗事》，认为赵光义压根儿就没参与陈桥兵变，那时，他正留在开封城里陪母亲杜氏。而有的史书(《太祖实录》新版)却说，陈桥兵变后军队入城，秋毫无犯，是光义叩马而谏，才有太祖约法立誓之举。这里是乘机烘托宋太宗的高大形象，亦可见官方在有关文献记载中所做的手脚。实际上，赵匡胤后来的开国措施结束了五代动荡和中原分裂的政局，拉开了经济与文化都颇为繁荣的宋代序幕，是有功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人们对其如何取得政权的细枝末节已不太在意了。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杯酒释兵权”是北宋初年著名的历史事件，说的是宋太祖陈桥兵变夺取天下后，又对那些作为开国功臣的高级将领们产生猜忌，担心兵变夺权的故事重现，于是导演了一出用酒宴解除众将兵权的活剧。千余年来，人们一直将它作为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在各种相关的历史书籍中重复着。然而近来有学者指出，这幕有声有色的历史剧，很可能出自宋代文人的杜撰和演绎，而不是真实的历史事件。果真如此吗?

建隆二年(961)七月，也就是在陈桥兵变创建宋朝的第二年。宋太祖召宰相赵普问道：“天下自唐末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就换了十个姓，战事频繁，苍生涂炭，这是为什么呢?我想从此停止战争，为国家长久考虑，应该怎么做?”赵普回答：“陛下能考虑到这些，真天下人民之福也。唐末以来，兵战不息，国家不安，其原因不是别的，而是武将兵权太重，君弱而臣强。今天要治好此患，没有别的奇巧办法，惟有夺其权力，收其精兵，控其财政，天下自然就安定了。”话还未说完，太祖插言：“卿不用再说，我已明白了。”

杯酒释兵权一天晚朝结束，宋太祖在宫中摆下丰盛的酒宴，请来石守信、王审琦等一班禁军宿将。饮至酒酣耳热之时，太祖屏去左右侍从，对这些故友勋臣说：“我没有你们的帮助，就没有今天，你们的功劳非常之大。但做天子也太艰难了，倒不如当节度使来得快活。我现在是长年累月不敢安枕而睡呵!”守信等人忙问：“这是何故呢?”太祖说：“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呢，天子这个位置，谁不想坐坐呢?”守信等人一听，连忙惶恐地起身叩头道：“陛下何出此言，如今天命已定，谁敢再有异心?”太祖说：“不对吧，你们虽然没有异心，你们麾下的将士如果要贪图富贵怎么办?一旦把黄袍加在你身上，你想不干，恐怕也办不到吧。”众将这时已一身冷汗，知道受到猜忌，弄不好就有杀身之祸，于是一边流泪，一边叩首，连声祈求：“臣等愚钝，望陛下哀怜，指条生路。”太祖坦然开导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所以企求富贵者，不过多积攒些金银，自个好好享乐，也让子孙不再贫穷。你们何不放弃兵权，选择好的田宅买下来，为子孙置下永久的产业；再多买些歌儿舞女，每天饮酒作乐，以终天年。我还可以与你们结成儿女亲家，共享富贵。这样，君臣之间，都无猜疑，上下相安，不是很好吗!”众将听罢，都一再感谢太祖为臣下想得如此周全。

第二天，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司都指挥使王审琦、殿前司副都点检高怀德、侍卫亲军都虞侯张令铎等都上疏称病，求解兵权。宋太祖一概允准，皆以散官就第，并给以丰厚的赏赐，然后派他们出镇地方为节度使，使禁军中资深的将帅都先后离开军队，只剩下几个职位较低、资历浅薄，且才干平庸的将领，皇权比较容易驾驭。太祖还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分别许配给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又让弟弟赵光义做了张令铎的乘龙快婿。宋太祖就是这样用酒宴解除了高级将领们的兵权，又用赏赐金钱和联姻手段消弭了他们的离心倾向，从而解决了宋代巩固政权统治中的一大难题。

上述故事主要取自司马光的《涑水记闻》，后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也作了详细记载，此外，宋人王辟之、邵伯温、陈均等也在其著作中记录了这件事。这样，人们就把它作为宋初一件重要的历史事件，认为宋太祖此举，非常成功地消弭了五代以来武将左右政权的祸患，为加强宋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开辟了道路。几乎所有相关的历史书中，都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个故事，史学界也很少有人怀疑。直到20世纪90年代，顾吉辰先生在排比和考证史料的过程中，对这一生动又带有戏剧性的历史故事提出了质疑。

宋人首先有与这事相关的记载，是宋真宗时的宰相丁谓所写的《谈录》。丁谓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天，宰相赵普对太祖说："石守信、王审琦等人不能再让他们领兵了。"太祖问："难道这二人会要造反吗?"赵普回答："这二人肯定不会造反。我仔细考察过他们的才能，担心的是他们不能制服下属。如果发生其属下将官要造反的话，他们也会身不由己的。"太祖又问道："这二人受国家如此重用和恩惠，难道会有负于我?"赵普从容回答："只怕就如陛下，怎么也负于周世宗呢?"太祖顿时大悟，就听从了赵普的提议。

这段记载说明，解除众将的兵权是宰相赵普的建议，且提出了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太祖是在被说服后，才按照赵普的建议而着手进行解除兵权这件事的计划。其中没有戏剧性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发生，而赵普所起的作用是关键性的。

到宋仁宗时，宰相王曾的《笔录》中，就出现了"杯酒释兵权"故事

的雏形。不过，王曾是这样描述的：相国赵普屡以为言，宋太祖于是不得已召来石守信等宫中酒宴，谈到过去彼此亲密无间的快乐往事，就乘机明白告之："我与诸位，兄弟相称，义同骨肉，哪里有什么芥蒂?但是言官们进说不已，我也不得不有所考虑。以今天的情况讲，不如各位自选风水宝地，出守外藩，世袭官爵，而租赋所入，也足以自奉，这样悠哉游哉地安度晚年，不亦乐乎?我后宫中有几个女儿，当与诸位的公子攀亲，以示君臣无间。诸位看如何？"守信等都心领神会，叩首称谢。由是，石、高、王、魏诸人各归藩镇，俱蒙皇亲婚约。后二十多年，仍贵裔显赫。前人称后汉光武能保全功臣，也不过如此吧。

这段记载说明，仁宗时首次出现"杯酒释兵权"之故事，但其情节较为简略，没有后来那样充满着戏剧性的内容。直到宋神宗时，司马光的《涑水记闻》才出现了上述如此生动详尽，且充满着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就是说距离当事人的时代愈远，记载反而更生动详细。南宋初，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有关记载，他在注中如此说明："此事最大，而《正史》、《实录》皆略之，甚可惜也，今追书。按司马光《记闻》云守信等皆以散官就第，误矣。王曾《笔录》皆得其实，今从之。文辞则多取《记闻》，稍增益以丁谓《谈录》。"就是说其基本上摘抄了司马光的《涑水记闻》，然而又对照王曾的《笔录》和丁谓的《谈录》有所增益和订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杯酒释兵权"这样一件大事，居然在当时官方的文书(如《国史》、《实录》、《会要》之类)中都基本没有记录。元末，根据《太祖实录》、《三朝国史》编成的《宋史·太祖纪》，对此事也居然不着点墨。为什么如此一件国政大事，《国史》、《实录》会惜墨如金呢?此信息说明什么问题?

首先，宋人王辟之、邵伯温、陈均等著作中相关记录，或录自王曾的《笔录》，或参考司马光的《涑水记闻》，或抄摘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后元人编的正史《宋史》中的《石守信传》中的相关记载，也应来自李焘的《长编》。就是说，"杯酒释兵权"之故事主要来源于宋人笔记《谈录》、《笔录》和《涑水记闻》，而不是官方正式文书记载。

其次，"杯酒释兵权"故事之出现与记载，在北宋中后期，似乎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再从简到详的过程，同时各说之间增益补充、人为渲

染，最终演绎出一个有声有色的戏剧化故事。可以说其故事约在宋真宗、仁宗时期出现，到神宗、哲宗年间完成，以司马光《涑水记闻》中的记载作为标志。北宋末、南宋初，王辟之、李焘等人又行摘抄，有的还擅自增添一些情节。总之，这时人们对此历史事件已没有怀疑。

再次，“杯酒释兵权”这件事究竟发生在哪一年?说它发生于建隆二年(961)七月，主要是依据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就是说此前诸书都没有具体的时间记录，直到南宋李焘才将它安排到这一时间段中。而这一年的六月初二，太祖母亲杜太后病逝。这样，六月初到七月初，按照当时的惯例，应是国丧时期，朝廷上下是不准宴饮作乐的。赵匡胤这样一个孝子是不可能违反这个礼仪，而在此间设宴招待诸将。有的史籍记载，此事是发生在赵普担任宰相之后，而建隆二年时，赵普还只是一名幕僚，第一次拜相要到干德二年(964)。可见，此事发生的年代，由于《国史》、《实录》的缺载而很成问题。

最后，对于此故事在宋代如此演绎的原委。顾吉辰先生指出，“杯酒释兵权”的后果，虽然中央集中了兵权，防止了武将的颠覆，改变了五代以来“国擅于将，将擅于兵”的状况，但它在调整军事机构时采用“兵将分离”、“强干弱枝”诸做法上，使调兵者与统兵者之间，将帅和士兵之间，彼此钳制而游离，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弊端，导致对外战争中许多重大战役失败，影响着宋王朝整个的历史进程。一些有见识的大臣对宋太祖有关的军事改革不满，这种情绪伴随着宋王朝由盛转衰，由强至弱，由统一到偏安的历史进程而日益强烈，从而导致“杯酒释兵权”之故事越来越详细，越来越戏剧化，最后完成此经过歪曲加工的历史故事。

所以，可以说丁谓《谈录》的记载较为符合历史事实，即宋太祖是在赵普的提醒下，在北宋初期对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罢免了有关军职，目的是担心兵变的重演。整个事件主要通过太祖与赵普之间的对话展示出来，而王曾的《笔录》、司马光的《涑水记闻》等有关酒宴的记载大都是后人杜撰的。

那么，这个对宋代政治军事历程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杯酒释兵权”之故事，难道真是宋代文人或官员演绎和杜撰出来的吗?王曾是位忠直刚

正的官员，一生两拜参知政事，两次出任宰相，还任过枢密使，可谓出帅入相，遍历二府，对宋代高层军政史必知之甚详。真宗迷信天书时，他有所规谏；仁宗即位，刘太后听政时，他身为宰相，却裁抑太后姻亲，被罢知青州。颇有正气感的王曾，有什么必要对前朝政事进行造假呢?尤其是司马光作为一个非常严谨的史学家，其写《资治通鉴》时是如此一字不苟，对史实都做过严格的一番审核工作，难道写此“杯酒释兵权”之宋初重大历史事件，会只在王曾《笔录》的基础上，没有多少根据地增加这么多的新内容和戏剧性的情节吗?

由是，有学者提出反驳意见：一是王曾(978～1038)虽比丁谓(966～1037)晚生十一年，但他的《笔录》成书却早于《谈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丁晋公谈录》一卷，不着撰人姓名，皆述丁谓所谈当代故事。晁公武《读书志》以其出于洪州潘延之家，疑即延之所作。延之，谓甥也。今观所记谓事，皆溢美，而叙澶渊之盟事，归之于天象，一字不及寇准。又载准挟嫌私改冯拯转官文字事，皆颠倒是非，有乖公论。即未必延之所作，其出于谓之余党，更无疑义也。”可见所谓丁谓的《谈录》，其实并非丁氏亲撰，有可能是其外甥或余党对丁氏谈话的追述，其成书要晚于王曾的《笔录》，所以不应以晚出的《谈录》来否定早出的《笔录》中的相关内容。再从丁谓的履历和人品两方面而言，我们虽不应以人废言，但《谈录》的史料价值决不会在《笔录》之上，这一点前人也早有定评，如《四库提要》。

二是皇太后的丧期问题。《宋史·礼志》载：“建隆二年六月二日，皇太后杜氏崩……准故事，合随皇帝以日易月之制，二十五日释服。”所谓“以日易月”，即以一天等于一月丧期，三年丧即为二十四天。所以到二十五日即可脱去丧服，当然此后还有“葬安陵”、“附太庙”诸事，整个丧期要到十一月才告结束，而不是“六月初到七月初”。然而，在严格意义的丧期内，即前24天，要禁止作乐、宴饮；脱去丧服后，除特别隆重的国宴以外，已不禁止一般的宴饮和娱乐。如《宋会要辑稿·礼》中就有当年“七月十九日……宴群臣于广政殿”的记载，所以像“杯酒释兵权”那样的君臣叙旧私宴，又有何不可呢?

由此，说“杯酒释兵权”经历了一个从简到详的发展过程，也许是可以成立的，或者对说某些细节的夸张和渲染，是肯定存在的。但说它经

历了一个从无(《谈录》中无)到有(《笔录》中有)的编造过程，则是不能成立的。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没有必要纠缠于那个酒酣耳热的小说性传闻故事，即尽可以忽略“杯酒”之细节，而关注“释兵权”之本质。太祖收兵权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朝内罢去典领禁兵的宿将，二是朝外罢去拥兵自重的藩镇。由此，“释兵权”作为宋初建国的一件大事，不但存在，而且确为当时一项重要的国策。收众将兵权后逐渐形成了宋代猜忌和抑制武将的所谓祖宗家法，因而北宋一代，武将以保身全名为大幸，太宗以后几无名将，确实影响了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在其后与西夏、女真、蒙古诸外族的较量中，在面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凌厉攻势前，宋军在军事上绝无优势可言，与此也不无关系。但不能以此来全面否定宋初太祖削夺兵权、改革兵制的必要性，因为这是当时稳固统治所必需的一项措施。尤其是它较好地解决了皇帝与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问题，选择了一种较为理性和文明的方式，将双方可能激化的矛盾化解在一种较为宽缓、平和的气氛之中，当有利于国家的政治生活向着相对宽松和平稳的方向发展。其对宋代军事方面产生的不利影响，似乎更应该追究其继任者，没有进一步完善太祖着手的兵制改革，反而在加强专制集权的过程中更增加了其中的弊端。所以认为一些有见识的大臣会将宋代军事上的积弱，都一股脑儿责怪于宋太祖建国初期“释兵权”这项改革措施之上，从而演绎和杜撰出这个戏剧性的传闻故事，看来也是很难成立的。

宋廷优待士大夫一位开国皇帝在太庙里立下誓碑，命令子孙为皇帝者，要优待前朝宗室之后裔，且不得滥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之人，否则天必讨灭之。反映出这位统治者胸怀之宽厚，执政之仁慈，这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中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宋太祖会做这件事吗?如果太祖没有做过，那么又是谁精心编造了这个“太祖誓碑”的故事呢?

据宋叶梦得《避暑漫抄》记载，宋太祖于建隆三年(962)曾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平时门钥封闭甚严，誓碑用销金黄幔遮蔽，任何人不得入观。规定太庙之门于四季祭奠和新皇帝即位时方可打开，皇帝谒庙礼毕，必须进入夹室恭读碑上的誓词。届时只有一名不识字的小黄门跟随，其余人员皆远立于庭中，不敢窥视。皇帝行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然后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都不知所誓何事。

北宋各代皇帝皆如此相承行事，按时礼谒，恭读在心，没有泄漏。直到北宋末的靖康之变，宋廷罹难，京城被劫，太庙中祭器都被金人席卷而去，大门洞开，人们方得一睹此碑尊颜。誓碑高约七八尺，阔四尺余，上刻誓词三条：一为“柴氏(后周宗室)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二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宋史·曹勋传》载，靖康末(1126)，北宋为金所灭，武义大夫曹勋随徽宗北迁，被扣留在金国的日子里，徽宗嘱托曹勋日后若有可能回南方，让他转告高宗说：“艺祖(宋太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也载：徽宗“又言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一也有相同记载。

首先，宋太祖的为人应与此誓碑的内容真实性有很大关系。太祖虽出身行武，却酷爱读书。他随周世宗打淮南时，有人揭发他私载货物达数车之多，检查下来，主要是书籍数千卷，这应是他比较重视读书人及文官的原因之一。当然宋代重文抑武的主要目的是出于对武将防范的需要，他曾对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人民深受其害。我让选干练的儒臣百余人，分治大藩，即便都是贪浊，也抵不上一个武将。”因为文臣不会很大地危及政权，而对其宽大仁厚可收买人心，这实在是他能进一步巩固统治的英明之处。同时，太祖在平定南方各政权的过程中，坚持不杀降王，如平定后蜀，召其国君孟昶入京，有大臣密奏，请擒杀其君臣，以防生变。太祖批道：“汝好雀儿肚肠!”清赵翼《廿二史札记》有“宋初降王子弟布满中外”记载此事颇详，这在历代开国皇帝中是少见的。宰相赵普好几次在太祖面前说起以前不善待自己的人，意欲加害。太祖却回答：“倘若在凡俗尘世都能认出日后的天子宰相，那人人都去寻找了。”其后，赵普再也不敢在太祖面前提起类似话题。还据说，太祖即位之初，见一宫嫔抱一小儿，经问知是周世宗之子。太祖问左右大臣如何处置，赵普等主张处死，潘仁美在旁独不语。太祖说：“即人之位，杀人之子，朕不忍为。”潘仁美才说：“我与陛下曾同为周世宗之臣，劝陛下杀之，是负世宗；劝陛下不杀，陛下必定怀疑我。”太祖当即判给潘仁美为养子，后不再过问。宋太祖似乎可谓宽厚之君主，其豁达和自信，往往高人一筹。

其次，还应考察太祖誓碑的内容与宋代所执行国策之间的关系，从中也能透露出有关情况的可靠性如何。赵翼《廿二史札记》有“宋待周后之厚”谈到，宋太祖登极，迁周恭帝母子于西京，易号郑王，造周六庙于西京，命周宗正以时祭享。并派官员祭拜周太祖、周世宗之陵。建隆三年(962)，迁郑王至房州。开宝六年(973)，郑王过世，此距禅位已14年，而宋太祖仍素服发哀，辍朝十日，谥号恭帝，葬周世宗陵之侧，曰顺陵。宋仁宗时，诏取柴氏谱系，于诸房中推最长者一人，岁时奉周祀。寻录周世宗从孙柴元亨为三班奉职，又诏每郊祀录周世宗子孙一人。至和四年(1057)，遂封柴泳为崇义公，给田十顷，奉周室祀，子可袭封，并给西京周庙祭享器服。宋神宗时，又录周世宗从曾孙柴思恭等为三班奉职。宋徽宗时，诏柴氏后已封崇义公，再官恭帝后为宣教郎，监周陵庙，世为三恪。南宋时，高宗、理宗诸朝也时有封柴氏袭崇义公之爵。可见，柴氏之受封赏几与宋朝相始终，宋廷如此优待亡国之后裔，这在其他朝代是少有可比的。

一般认为，宋太祖及其后继者，确实比较严格地遵守着不杀大臣和言官这条誓言，对臣下较为宽容，和各朝相比，诛杀很少。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曾由衷地赞叹道：“祖宗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范仲淹年谱》)。由此，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上述誓碑的记载深信不疑。对个别皇帝屠戮大臣之事，往往以违背“祖宗誓约”之语评论之。还有学者认为，北宋出现的冗官现象，也与誓碑规定的优待士大夫政策有关。

1986年，学者杜文玉发表《太祖誓碑质疑》一文，经过详尽考证后认为，关于“誓碑”之事纯属子虚乌有，是根本不存在的。首先，叶梦得的有关记载证据不足。靖康之变时，他不在京城，誓碑之内容并非他亲眼所见。建炎元年(1127)七月，曹勋自金国返回南京，数月后叶梦得才调任京官，他应该是从曹勋处得到这个相关消息，再加上社会传闻，遂撰成上述故事。其余诸书中，《挥麈后录》成书最早，其在记录誓碑内容后，进一步指出：“太祖誓言得之曹勋，云从徽宗在燕山面喻云，尔勋南归奏知思陵(宋高宗)。”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记载应来自此书，《宋史》编纂时则参详《系年要录》。可以说，凡关于此事的记载，莫不在曹勋南归之后，此前竟无一点蛛丝马迹。如果说北宋百余年誓碑内容由于保密严格而没被泄漏，那么靖康之变后太庙“门皆洞开，人得纵

观”，此事的消息来源就不应只是单方面的。然而事实正相反，曹勋南归为此消息的惟一来源，而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太祖本纪》等重要史料及相关文人笔记中都毫无踪影。

再从史实方面看，誓碑规定优待柴氏子孙。太祖刚即位，就把周恭帝母子迁往西京洛阳，洛阳经五代战乱时已残破萧条。而在立碑那年更是将其母子由洛阳迁往房州，房州位于今湖北房县，地处大巴山区，不但远离东京开封，且偏僻荒凉人烟稀少。到开宝六年，周恭帝柴宗训正值二十岁之青春年华，就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太祖要子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理应身体力行。然而查阅《宋史·太祖本纪》、《续资治通鉴长编》等的记载，其在位十几年中并不少杀大臣，总计有八十八人之多。其中，谋反罪二十二人，坐赃罪二十五人，失职罪三十三人，其他八人，上至枢密直学士、殿前都虞侯、州刺史，下至监察御史、县令等，皆有被杀者，太祖是北宋诸帝中杀臣子最多者。

另外，誓碑的收藏方式也过于奇特，这种能平抑舆论、安定人心而有利于巩固统治的誓约内容完全可以公开，以显示统治者的仁德宽厚，达到收买人心的效果，让士大夫们感恩戴德，忠心维护赵氏的江山，这样的好事何必隐藏得如此神秘?宋徽宗北迁金国，备受蹂躏和屈辱之后。却还牢牢记得誓碑中不杀大臣和言事官的内容，千方百计地要人转告远在千里之外的高宗，这也实在有点违背常理。

高宗如真的通过曹勋了解此事，就应该遵守祖宗遗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建炎元年七月，腰斩右谏议大夫宋齐愈；八月，杀太学生陈东和上书人欧阳澈。建炎三年四月，斩中军统制吴湛；七月，杀御营军官范琼。绍兴年间，共诛杀大臣十人，最丧心病狂的，莫过于杀害岳飞父子之案。如此大开杀戒，哪里谈得上半点祖宗“誓约”的约束。那么，此事是如何作伪的呢?杜文玉推测，当时国家残破，人心浮动，为了改变这种离心离德的紊乱局面，获取士大夫们的拥戴，高宗出于此笼络人心的政治需要，协同曹勋特别构思杜撰了这一故事。其冠以祖宗遗命的外衣，宣传赵氏的深恩厚泽，以进一步迷惑士大夫。最后，高宗确实通过这一手段，拉拢到主和派、主战派众大臣，取得大批士大夫的拥戴，初

步稳定了局势。

也有学者反对将其全盘否定，认为誓碑的有无虽然没有更多的史料可以证明，但也没有完全否定的依据。宋廷礼遇后周宗室后裔应大致不差。北宋优待士大夫，不轻易诛杀大臣也是事实。太祖在位时主要因谋反和贪污受贿罪处死过一批官吏，这是开国初期整顿吏治所必需的。《宋史·太祖本纪》记载当时严加惩治贪官污吏，赞他："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宋初严惩赃吏"条也谓："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赃吏最严。盖宋祖亲见五代时贪吏恣横，民不聊生，故御极以后，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浊乱之源也。"

宋代重文抑武，以文臣驾驭武将的国策是毋庸怀疑的，这就反映出其存在重用且优待文臣的一些祖宗家法，并被历朝皇帝所认真执行。上引范仲淹在庆历年间的言论，《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就应如何处置一大臣之事而起，范仲淹主张免死而宽宥之，富弼不同意，所以范质问道："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侯延庆《退斋笔录》载，在神宗陕西用兵失利，准备斩一漕臣之时，宰相蔡确说："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宋史·吕大防传》也载，哲宗朝，宰相吕大防说："自三代以后，惟本朝百二十年中外无事，盖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请举其略……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惟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此宽仁之法也。"此外，《长编》卷四九五，大臣曾布有类似言论；《宋史·章悖传》，宋哲宗也有类似说法。这一祖宗家法，一方面激发着文臣士大夫的爱国热忱，一方面也使一些掌权的文臣无所顾忌，有的甚至横行不法。当国家和君主利益受到威胁及损害时，统治者是可以将家法放在一边而开杀戒，因为家法"不杀"不等于绝对不能杀，然而诛杀大臣确实不是北宋统治国策的主流。因此，即使没有太祖誓碑。与碑文类似的祖宗家法的有关誓约，看来还是存在的。

以上面分析而言，不同意见的双方都能拿出一定的理由，但又都没有确凿的证据。对待宋代政治史上这件举足轻重的大事，只有取审慎的态度，做进一步的研究。

宋初皇位的继承宋初太祖去世，为什么不是其成年的儿子继位，而

是由弟弟太宗继统大业?是否其母亲杜太后有临终遗嘱?这遗嘱是书面的盟约，还是只有口头形式?甚或是宰相赵普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完全假造的故事?这一系列疑问，确实已很难搞清楚。

据《宋史·杜太后传》和《续资治通鉴》诸书的记载，建隆二年(961)，杜太后病重，宋太祖服侍药饵不离左右。太后自知已病入膏肓，召宰相赵普入宫接受宋太祖遗命。太后先问匡胤：“你登上皇位已一年有余，可清楚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太祖呜咽抽泣着不能言对，太后坚持要儿子回答，匡胤随口答道：“儿臣之所以能得天下，完全是依赖祖上和母后的积德余庆。”太后摇摇头，认真地说：“不对，这实在是由于周世宗让幼儿做皇帝、主宰天下，使群心不附之缘故啊。倘若周朝有年长之君主，天下哪里会轮到你的手中。”太祖点头称是，太后又语重心长地嘱咐道：“你百岁之后，当传位给弟弟光义。四海之广，亿万之众，国有年长之君主乃社稷之福，你当牢记。”太祖泣不成声地回答：“一定听从母后的教诲。”太后回头看着赵普说：“你当同记我的话，不可违反。”接着，太后要赵普于榻前记下此遗嘱，作为给子孙的约誓书，赵普在纸尾签上“臣普书”三字，太祖手封其书，收藏于金匮之中，命可靠宫人谨密掌管。这就是历史上称之为“金匮之盟”的故事。

在此后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很少有人怀疑宋初“金匮之盟”的真实性，将其作为宋初皇位继统出现兄终弟及故事的依据。直到清代，古文学家恽敬对它提出怀疑，认为此盟约内容是虚饰之说。近代学者进一步对它进行仔细分析，许多人认为此故事是由于当时朝廷政治斗争需要而假造的。

张荫麟《宋太宗继统考实》一文对此事分析得最为透彻，指出“金匮之盟”存在五大不可解释的破绽：一、杜太后死时，太祖才三十五岁，其子德昭十一岁，太后怎能预知太祖死时，德昭仍是儿童?事实上，太祖去世时，德昭已二十六岁，完全成年。二、太祖既然坦荡无私地谨遵母命，又何必将盟约深藏封固?至少太宗即位之初，就应有人提出或公布盟约内容，以正太宗继统之名，然而却无人提及此事，其缘由如何解释?三、要直至五年之后的太平兴国六年(981)，才由已罢相多年的赵普密奏朝廷，太宗发金匮得誓书，这才将其盟约公之于世。赵普既是参与盟约之人，太祖在世时不敢泄露尚可理解，为什么在太宗即位后还要蹉

跎多年，不马上疏奏和宣布盟约的内容，而坐失尽快讨得太宗欢心的良机呢?四、从史源上考证，太宗时修的《太祖实录》，没有记载“金匮之盟”之事，直到真宗咸平二年(999)重修的《太祖实录》才加进此事，记载中且说盟约时太宗也在场。这更是自相矛盾的说法，因为太宗如果预闻，那在其登位之初就应实时公布，何须五年后等赵普上书，发之金匮?五、“金匮之盟”可谓王室密约；藏之金匮，命可靠宫人谨密掌管，当是朝廷秘密文件；后来赵普上书又是密奏。为什么此事需如此的保密?理由可能只有一个：即与此秘密相关者有四人，其中太后与太祖都已死无对证，惟剩下知情者太宗与赵普，两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其事，而其他人根本不知道“金匮之盟”的真相。这些疑点已充分说明，“金匮之盟”故事是伪造的，出现的时间应在太平兴国六年。

那么，作伪的人是谁呢?许多学者都认为，从种种迹象分析，作伪者主要为赵普。宰相赵普识见过人，眷恋权力，又贪利好财，利用权势展建宅居，常常干些受贿营利的勾当，时还庇护违法谋利的属下官吏。在太祖后期，有人上告赵普及其属下许多不法之事，太祖震怒，欲拟旨严办，在太子太师王溥等的营救下，方得免除重惩，其属下官吏送御史台治罪，赵普被贬官，以同平章事出任河阳三城节度使。太宗即位之初，赵普上表请求入京参加太祖入陵葬仪，太宗准他回京，顺势罢其使相和地方之职，改授太子太保这一虚衔。因为赵普于太祖在位时曾阻挠太宗继统而受到冷遇，居京数年，郁郁不得志，尝够了失去权势后的世态炎凉。且在新任宰相卢多逊的排挤打击下，身家性命都岌岌可危。这时，卢多逊与皇弟赵廷美相交甚密，引起太宗猜忌，想借赵普这位元老重臣，打击政敌，巩固皇位。

太宗便召见了赵普，赵普看准时机，当即表示“愿备枢轴，以察奸变”。退朝以后，赵普立即上了份密奏，打出“金匮之盟”这张王牌，使太宗的继承皇位得到名正言顺的依据。果然很快又受到太宗的召见，太宗甚至当面道歉说：“人谁无过，朕不到五十，已尽知四十九年非。”接着就日后皇位继承问题试探赵普，赵普回答说：“自夏禹至今，只有传子的公例，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邪!”一语正中太宗下怀，连连颔首，两人又密谈许久。于是，赵普次日就恢复了相位，且兼领侍中和拜梁国公，这是宋初德高望重宰相的加衔。这样，太宗与赵普为了各自的目标走到一起，“金匮之盟”便是两人政治勾结的产物，是一件伪造的政治赝

品。至此，经过这样逻辑的分析，似乎已拨开了疑云谜雾，窥见了历史的真相。

其实，问题并不这样简单。如果说这一事情是彻头彻尾的伪造，那么为什么太祖始终不立自己儿子为皇储?其长子与第三子早夭。次子德昭已二十六岁，第四子德芳也已十八岁，不闻其兄弟有失德之处，都可以做皇帝。而太祖一开始就让弟弟光义担任最有权势的开封府尹，听其网罗大批幕僚，主持京师政务达十三年，后又进封光义为晋王。位居宰相之上。五代时期，亲王尹京隐然已有继位人的地位，进封晋王更是确认其皇储的地位，如后周世宗即位前就是晋王兼开封尹。而太宗即位后，也让弟弟赵廷美为开封尹兼中书令，封齐王，后改秦王，表明沿用太祖时皇弟尹京的旧制，廷美也基本获得准皇储的地位。宋初这一贯的做法，不会无缘无故发生吧。

同时，赵普曾在这问题上提醒过太祖，且有过阻止赵光义继统的蛛丝马迹，从而得罪了太宗。如太宗曾对赵普说：“朕几欲诛卿!”何事使太宗如此不能释怀呢?据《丁晋公谈录》载，太宗继位后不久，曾漏出过一句话：“倘若还是赵普在中书，朕也不得此位!”赵普在其罢相后的奏章里也谈到：“外人谓臣轻议皇弟开封尹，皇弟忠孝全德，岂有间然。”这肯定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但为了将来的身家性命考虑，赵普不得不作此说明。后来赵普投向太宗怀抱，取得太宗信任后曾坦言：“先帝若听臣言，则今日不睹圣明矣。”所以赵普死后，太宗还耿耿于怀地声明：“赵普一向与朕有不足，众人所知。”可见，赵普曾在皇位继承人问题上给过太祖许多忠告，但太祖终不听。且赵普罢相才一个月，就进封光义为晋王，位屠宰相之上，光义隐然已定为皇储。太祖为何如此听不进赵普之忠言呢?

有学者从五代诸帝在位时间最长不过十年，平均在位不到四年的历史出发，认为杜太后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因此太后临死时有可能提出兄终弟及以保持长君在位的口头遗言。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太祖迟迟不立皇储了，因为立弟弟光义有些不太情愿，而立亲生儿子又有违母训，实在左右为难。上面我们提出的“金匮之盟”故事的疑点，其实主要可以否定这盟约书面成文誓约的不存在，所以太宗即位初年无人提及，赵普也因为本来是站在反对太宗即位的立场上，所以一时不便提及此事，也

没有多少根据。而等到五年之后，太宗想拉拢赵普时，这才献上此宝玉，当然是经过了再次的人工雕凿。

上述分析，其关键还在杜太后有无口头遗嘱方面，倘若真有口头遗嘱，还存在其遗嘱是“独传约”还是“三传约”的区别问题。所谓“独传约”，即命太祖传位给太宗；而所谓“三传约”，即要求太祖传位给太宗，再由太宗传之廷美，廷美再传给太祖之子德昭。以杜太后的立场比较两者，应该说“三传约”的可能性大。然而太平兴国六年赵普重新炮制时，当然不能用“三传约”，而只能改成“独传约”。因为倘若用前者，那无异是在宣传赵廷美是当然的皇位继承人，这简直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造假者不会如此愚蠢。而“独传约”则突出太宗，为太宗即位赢得合法依据，也为赵普树立了“顾命大臣”的高大形象。在逼死廷美后，太宗一系独传天下的局面就无可动摇了。

那么，最终杜太后的口头遗嘱是如何的内容呢?还是找不到有关的文字档案作佐证，仍带有相当的猜测成分，谜底的完全揭开恐怕已不太可能。

第二章

宋太宗弑兄夺位宋太祖五十岁时突然暴死，第二天其弟赵光义便于灵柩前即位。宋太宗是否弑兄夺位?前一天晚上“斧声烛影”的情况，古籍记载中也只是语气隐隐约约，文辞闪闪烁烁，给人留下遐想的天地，给历史留下千古之谜。

据文莹《续湘山野录》记载：开宝九年(976)十月十九日晚，天空晴朗，星斗明灿，太祖在太清阁散步赏景，颇觉心旷神怡。忽然阴霾四起，天气陡变，雪雹骤降。急传宫人开端门，召弟弟晋王赵光义入宫。光义到后，兄弟两人在大内酌酒对饮，命宦官、宫嫔都退下。宫人们只能在稍远处伺候，只见大内烛影下，光义时或离席，好像是谦让退避的样子。饮罢，漏鼓已敲三更，殿外积雪数寸。只见太祖手持柱斧戳雪击地，看着光义说：“好做，好做!”说完就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当晚，光义也留宿宫内。次日早晨将五更时分，宫人在寂静无声中发现，太祖已经驾崩。

司马光《涑水纪闻》诸书记载：当晚四更时分，太祖晏驾。宫人马上报知宋皇后，皇后命内侍都知王继恩立即召四子秦王赵德芳进宫。而王继恩以为太祖一直打算传位给弟弟光义，竟不去宣德芳，而径赴开封府召光义入宫。继恩来到开封府门前，只见长于医术的左押衙程玄德坐在门口，便上前问其缘故。德玄说：“二更时分，有人叫门说晋王有事召见，出门却不见人影。如是者先后三次，我恐怕晋王真有病，所以赶来。”继恩告以宫中之事，两人共同入见光义。光义听后大惊，犹豫不敢入宫，声称要与家人商议。一旁继恩催促道：“时间一长，将为他人所有了。”一句话点醒光义，三人便踏着大雪，步行入宫。

赵光义到达宫门，继恩让光义在直庐等待，自己好去通报。德玄说：“等待什么?直接进去!”三人遂俱入大内。宋皇后听到继恩的声音，便问：“德芳来了吗?”继恩答：“晋王到了。”皇后见到光义，不禁愕然失色，等缓过神来只得怅然说道：“我们母子的性命都交给官家了。”(官家是宋时宗室大臣对皇帝的昵称。)光义也边落泪边回答：“共保富贵，别

怕别怕。”第二天，光义即皇帝位，是为宋太宗。

一种意见认为，宋太宗是弑兄夺位。以《续湘山野录》所载，太祖就是在斧声烛影中突然死去，当晚光义又留宿于宫中，以便在次日抢班夺位。是时，光义虽隐然被视为皇位继承人，但太祖诸子也都已成年，都可名正言顺地即位，太祖之所以迟迟不宣布皇储人选，应仍在思想矛盾之中。同时，太祖与光义兄弟间也时有矛盾产生，如在对待北汉、契丹的政策上，是和平收买还是武力征伐，兄弟间存在着严重分歧。太祖曾一度考虑迁都洛阳，原因之一就是试图摆脱光义在开封府业已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势力范围。更何况历史上皇位兄终弟及者毕竟属不太正常，太祖随时可能改变想法，就是说对赵光义来讲，能否继承皇位还存在不小的变量。那么，如何抢班夺位?自然就成为光义当时最需苦苦思索的问题。而“斧声烛影”的当晚，应该说是一次极好的机会。

据《烬余录》记载，“斧声烛影”为突发性事件，存在具体生动的偶发起因。后蜀花蕊夫人费氏在亡国后被召入后宫，成为太祖宠姬，而光义垂涎其美色已久。这晚，太宗趁太祖酒酣入睡之时，就乘机调戏花蕊夫人，太祖朦胧间发觉而怒斥之。太祖手持柱斧愤慨击地，并看着光义说：“好做，好做!”就是怒斥道：“你做的好事!”太宗自知无法取得兄长的宽宥，也早有抢班夺位的预谋在胸，所以乘此机会下了毒手。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如果为太祖开列一张开宝九年的活动日程表，就可发现他当时精力非常充沛，频繁出巡各地，幸西京(洛阳)，次巩县，拜安陵……而且于其时，史书从未有太祖生病、大臣问疾的记载，身体应该是健康的。故太祖暴卒，显然不是因为生病。有人推测太祖是饮酒过度而猝死，但太祖一向以为“沉湎于酒，何以为人”，其饮酒还是有节制的。如果说此次因酒致死，其时与光义共饮，太祖贪杯猝死而光义安然无恙，这也太蹊跷，或可说明光义在其中做有手脚。因为太宗的确精于此道，南唐后主李煜就是被酒里下药而毒死；后蜀降王孟昶也因此而暴卒；吴越国主钱俶是在生日那天，太宗遣使赐宴，当晚就暴死。所以很有可能是太祖发现了酒中有问题，才连声对光义大呼：“你做的好事!”

此外，太宗及其亲信是预知其政变登基之时日的。据《宋史·马韶

传》，马韶私习星象天文之学，与光义亲信程德玄友善，开宝九年十月十九日来见德玄。说：“明日乃晋王利见之辰。”德玄连忙报告光义，光义下令把马韶看管起来。即位后才将他放出，很快授以司天监主簿之职，这说明程德玄也完全预知即将发生的政变。尤其可疑的是：程德玄是医官，《涑水记闻》卷一载：“德玄后：勾班行，性贪，故官不甚达，然太宗亦优容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说：“程德玄攀附至近列，上颇信任之，众多趋其门。”一个医官会受到太宗的如此宠遇，很可能是其用有关医术帮助赵光义取得帝位。或者说“斧声烛影”当晚的酒毒由他配制，所以他急于知晓结果，到开封府门口彻夜长坐，实是在等候宫中的消息。而太监王继恩居然敢冒死违抗皇后的旨令，不宣召赵德芳，径赴开封府找赵光义，也说明两人或早有约定。当赵光义犹豫不决时，王继恩更是直言不讳地提醒道：“时间一长，将为他人所有。”都透露出太宗幕僚集团的事先默契。

最后，从宋皇后的言行中也可推见太宗继位出自强取。皇后得知太祖暴卒，令太监召儿子赵德芳进宫，而不宣赵光义，表明太祖至死都没有确定光义是皇位继承人，由于是猝死，也不会有传位的遗诏。所以皇后想召儿子进宫即位，是很正常的举动。哪知被光义抢先一步，以其在开封的势力而言，皇后母子根本不是对手，所以一见光义便大惊失色，下意识地感觉到自己母子的性命堪忧，惊恐之余只能说：“我们母子的性命都交给官家了。”实际上只能认输，以求一条生路。如果赵光义是正常即位，皇后没有必要如此反映。

另一种意见认为，宋太祖的死与光义无关。以《涑水纪闻》所载为据，光义是回到开封府，由太监王继恩报告消息，再步行入宫。就是说太祖暴死时，光义不在寝殿。而兄弟对饮时，太祖对光义所说：“好做”，意为“好好做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就改成“好为之”。从医学角度看，太祖身材矮胖，宋末元初画家钱选所摹南宋宫廷藏画《蹴鞠图》中的赵匡胤像就是如此，加上他嗜酒如命，去世的那天晚上，饮酒睡下后，鼻息如雷霆，这应该是脑溢血发病前的典型症状。也有人认为，太祖死于家族遗传的躁狂忧郁症。所以《续湘山野录》所载“斧声烛影”之故事，实是不经之谈。

有人误解史书中所说的“柱斧”，以为“斧声烛影”就是赵光义在烛影下

用利斧噼死太祖。这是不可置信的，柱斧一为武士所用，一为文房用具。文房用具的柱斧也称玉斧，以水晶或玉石为材料，“斧声烛影”中的柱斧显然只能是文具，大内寝宫中不可能放有利斧这样的杀人凶器，况且光义也无需做得如此露骨。

总之，在这一疑案中，太宗存在许多难解的疑点，有些细节也许永远将是历史之谜。太宗继位后，也有一些蛛丝马迹很耐人寻味。如太宗是十月二十一日即位的，十二月二十二日就宣布改元太平兴国元年。一般来说，子继父位，或弟承兄业，出于对前任皇帝的承认和尊重，当年是不改元的，更何况已近年底。太宗这么急于改元，急到还有几天都等不及的程度，后人估计是出于逆取皇位的心虚理亏而干出的傻事。还有太宗登基没几天就局促下令：全国禁止传习天文星象、阴阳卜相诸书，有私习者斩首；并通知各地官府，迅速将全国原本已知的天文相术之士全部送京甄别。十二月，太宗又下令对各地送到的三百多名天文相术之士于甄别后，把其中六十余人留在司天监任职，其余近三百人以“矫言祸福，诳耀流俗”的罪名，全部发配到沙门岛。太宗如此迫不及待地处置这些术士和严禁私习有关书籍，显然想禁止有关不利的舆论和流言的产生与传播，这是否为其心虚的表露呢?

太平兴国四年(978)，太宗亲自率军灭了北汉，又乘胜北上攻辽。这次北征由于轻敌被辽兵打得大败，全线溃退，太宗在混战中腿上中箭而仓皇奔逃。军中一时不见主帅，大臣疑太宗或已蒙难，诸将遂谋立太祖之子德昭继位。未成事实，太宗很快返回军中，闻知经过，心中愤懑异常。归朝后，德昭请太宗论功行赏，主要是对剪除北汉的有功之臣。太宗不待侄儿言毕，就怒目斥责道：“战败回来论什么功?等你为帝时，再行赏也不晚。”德昭回宫后竟然拔剑自刎而亡。德昭为什么如此想不开，估计一定受到什么威逼，然而史载已将其中隐情抹去。只载，太宗闻讯，抱着尸体大哭道：“痴儿，何至此邪!”既掩饰自己的威逼。又推卸有关的责任。两年后，其弟德芳也不明不白地病殁。太祖过世才四五年时间，他的两个青春年华的儿子就双双辞世。看来，当年宋皇后之担忧，完全应验了。甚至在宋皇后去世时，太宗也不按皇后的礼仪治丧。这种种迹象，难道都是偶然的吗?

最让人深感蹊跷的是，事隔一百五十多年之后，赵光义的后代，南

宋高宗赵构的唯一幼子早夭，而高宗也就此丧失生育能力，就是说没有儿子继承皇位了，那怎么办呢?绍兴年间，官员中暗暗谈论着天下战乱，二帝北虏，实为冥报的传说，早有的“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的说法也更为流传，有的官员甚至上言，希望高宗遴选太祖诸孙有贤德者立为皇储。这时隆佑太后“尝感异梦，密为高宗言之，高宗大悟”。在诸臣的请求下，高宗说：“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孙不得享之，遭时多艰，零落可悯。朕若不法仁宗，为天下计，何以慰在天之灵。”(《宋史·孝宗纪》)于是，赵构终于找到了赵匡胤的七世孙赵伯琮，后把皇位传给了他。这是否为上天感知，而强迫太宗的子孙赵构以实际行动作一些弥补呢?

宋太宗的为人宋太宗是宋朝第二个皇帝，他即位时，中原尚未统一，政权还刚草创。他“性嗜学”，酷爱读书，讲究文德致治，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却又多疑褊狭，刚愎自用，更是手段狠毒，喜欢女色。那么他是怎样的一位皇帝?其历史作用又该如何评价呢?

《宋史·太宗本纪》载，赵光义自幼喜欢读书，“性嗜学”。其父赵弘殷总兵淮南时，每攻破州县，必到处搜求古书，给光义学习。由于刻苦钻研，且坚持不懈，所以“工文业，多艺能”，热衷诗文，挚爱书法，耽迷围棋。据说在战事频乱的年代，他领兵作战，也常利用闲暇时间，在军帐中秉烛夜读，书籍、书袋成为他的随身之宝。他从书中学到丰富的知识和学问，了解古今帝王成败的故事，吸取治国平天下的经验教训。

称帝后，实行抑武尚文的统治政策，任用大量文官主持政务。曾说：“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尤为重视发展文化事业，而卓有成就。五代时期，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只有小屋数十间，且湫隘卑痹，仅蔽风雨，周庐徼道，朝夕喧杂。太平兴国二年(977)，太宗视察三馆后，看着左右大臣说：“这些小屋如何蓄天下之图籍，待天下之贤俊?”即日下诏有司，另辟开阔地区营造新三馆，其栋宇之制，太宗亲为规划，然后令中使监督工徒，昼夜兼作。建筑期间，太宗还两次临幸，察看工程进度。第二年完工，三馆宏伟壮丽，甚至甲于内庭。太宗赐总名为“崇文院”，图书分贮数廊，东廊为昭文书库，南廊为集贤书库，西廊分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书库。凡六库书籍，正副本八万余卷。其后又在崇文院中新建秘阁，用来收藏三馆的珍本图

书和大内的古画墨宝。

太宗时期，命人编辑了三大类书：《太平御览》一千卷，《文苑英华》一千卷，《太平广记》五百卷。太宗还组织学者校勘典籍，主要是历代重要的正史、字书和医书。如命国子监重行校刊九经，开雕前四史及《说文解字》诸书，后又命集《神医普救方》一千卷，《太平圣惠方》一百卷，《雍熙广韵》一百卷，《太平寰宇记》二百卷等。太平兴国九年(984)，太宗命令三馆将现存藏书与唐代《开元四部书目》进行核对，将图书阙目公布中外，凡献书三百卷以上者，酌情授官或另行安排。至道元年(995)，又派人专程到江南、两浙诸地购募图书。这类要求民间献书及购募书籍的措施，太宗一朝并不少见，所得图书也均藏於崇文院内，崇文院及其馆阁实际上成为宋代培养高级人才的场所。

崇文院西序留有便门，以便太宗光临。太宗在新院建成后，的确常到院中看书，并常召大臣到院浏览藏书。他请国子博士为自己与中央大员讲解《周易》，听后龙颜大悦，说："足为鉴戒"。他对《太平御览》情有独钟，决心每日读三卷，一年内通读一遍。于是令史馆每日进呈三卷，不论寒暑，持之以恒，终于按时读完，于是将是书原定名《太平总类》改为《太平御览》。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太宗自称每天退朝后"不废观书"，不论政事多么繁忙，都能坚持读一点书，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来说，能做到这点真不容易。太宗还力劝武将读书，命左右取《军戒》三篇，对枢密使王显说："今掌枢密，无暇读书，读此可免面墙。"在他的影响下，不仅文臣向学，武将也读起书来。

太宗读书范围颇广，各种学派的书籍都曾涉猎，且对书中的观点略作评论。如读《阴符经》时，批点道："这是一部诡诈奇巧之书，不足为训。"在读《道德经》时，又感慨道："书谓'不善者，吾亦善之'，是说修身治国者应该有所包容，否则如何治理好天下呢?"他还勤于写作，常与朝中群臣进行诗文唱和，以为乐事。如平定北汉后，他作《平晋诗》令群臣唱和。有一年游览雪景，又作《雪诗》令随从唱和。曾把自己的诗文编为《御制诗文》四十一卷。《宋史·艺文志》中著录有他的《太宗御集》一百二十卷。

太宗对于书法的历史、笔法、字学等方面，也都虚心向史家请教，

使自己的书法达到较高的造诣。他不但精通草、行、篆、籀诸体，且风格自成一家，被后人列入宋代著名书法家的行列中。淳化三年(992)，他把唐太宗、唐玄宗、王羲之、王献之、柳公权、颜真卿等名家精品编成《淳化阁法帖》，成为中国最古老的书法宝帖，流传后世。

太宗还是个围棋高手，在黑白世界里，照样运筹帷幄，纵横驰骋，显示出较为卓越的才华。据说，当时著名的国手杨希紫、蒋元吉等人都曾败在他手中。当然和皇帝下棋，谁敢操输赢之权，不过太宗时常能与国手过招，也足见其棋艺不差。一些大臣见太宗与人对弈绞尽脑汁，不知疲劳，就劝他注意身体。太宗则说："朕不是不知道，只不过想借此躲避六宫的诱惑，众爱卿不必多言。"似乎有不喜女色之意。

从以上事迹看，赵光义就像是一个十足的书生。然而考察其为人，宋太宗绝非善类，可以说是一位令人侧目的奸雄。

首先是多疑褊狭。经过十余年的处心积虑，太宗终于登上皇帝宝座。也许深知权力角逐的阴险狡诈，即位后用主要精力防范内变。曾坦言："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长编》卷三二)其所谓"内患"，指朝廷内部危及皇权的变乱，这话充分反映出太宗整天忧心忡忡，主要是考虑如何确保皇位的稳固。在这一心理支配下，太宗养成多疑褊狭的心术，所以其施政事必躬亲，大权独揽，且任人惟亲。如他在开封府尹任上就广招幕僚、军校，有学者考出至少有六十六人，即位后更是信用幕府亲随，由此探事者横行。还有太宗一朝，相不久任，更换频繁。太宗在位二十二年，共享九人为相，一般多在两年左右。不但席不暇暖地换相，还用各种办法削夺中书事权。他口头上提倡黄老无为之学，实际上采用法家专制一套。所以有学者认为，太宗是宋代君主专制独裁有关体制的创始者。

其次是手段狠毒。本书中已叙述了"斧声烛影"太宗弑兄夺位的故事，"王室冤狱"是讲太宗之弟谋篡的罪名加以迫害，还有逼死侄子，不敬嫂子诸事。《默记》记载，南唐国主李煜是被太宗以牵机药毒死。据《烬余录》甲编，后蜀国主孟昶和吴越国主钱俶也都是太宗在酒中下毒而致死的。此酒毒也犹如太宗之心毒。

再者是刚愎自用。太宗两次攻辽战役，都以大败告终，其实都是他刚愎自用的结果。第一次在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军用五个月时间讨平北汉后，实已师老饷乏，不宜再打新的战役。何况这时辽国在景宗的统治下，经过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国力大有进展，政治也算清明，勇将不少，边境稳固。而太宗偏要乘胜扩大战果，率军北上，围攻辽南京(今北京)半月不下。辽国援军南下，与宋军在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激战，结果宋军全线崩溃，太宗中箭仓皇奔逃，被辽军追杀三十里，使宋军精锐元气大伤。第二次雍熙北征，本书“杨业之死”中有详尽描述，由于太宗的刚愎自用，此战输得更惨。至此，宋朝君臣将士中普遍产生恐辽心理，彻底放弃以武力收复燕云的梦想，对辽只能采取一味保守的战略防御态势。不久，在辽国的进攻下，只能订立澶渊之盟，背上沉重的岁币包袱。

还有好色。《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太宗淳化四年(993)，有官员乞放宫女三百，太宗对执政说：“宫中无此数。”执政为讨好太宗，请以狂妄罪名惩处该官员，太宗释而不问。然而到至道三年(997)，太宗刚去世，真宗即位不久，就对辅臣说：“宫中嫔御颇多，幽闭可悯，朕已令择给事岁深者放出之。”事隔不过四年，两个皇帝的说法就大相径庭，既然嫔御甚多，那宫女之多自然不在话下。为什么太宗不愿释放宫女，还要扯谎?《默记》载，光义在开封府尹任上时，看中一个十几岁的青州女子，派人强行窃买，此事太祖都颇为恼怒。又载南唐后主的小周后每次入宫则被太宗留数日之事，宋人画有《熙陵(即太宗)幸小周后图》。还载有太宗将李煜宠信的宫人乔氏纳入宫中诸事。《烬余录》载有太宗灭北汉而尽收其王室嫔妃之事，还有太宗与后蜀花蕊夫人的风流韵事等。均可证太宗实为好色之徒，且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尤其令人发指的是，邓之诚《骨董琐记》卷四《宋官妓营妓》考证出：“宋太宗灭北汉，夺其妇女随营，是为营妓之始。”宋太宗居然是军队配备随营妓女的始作俑者，这又可见在宋太宗眼中妇女地位之卑贱。

宋代是在太宗手上完成统一大业，经济与文化事业均有较大发展，皇权统治也基本稳固，然而对外族的军事行动屡败，农民起义时有爆发，积贫积弱之形势已萌芽……有学者认为，在宋初历史上，太宗朝实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太宗终不能臻于治，给宋后世带来很大后患。总之，其历史作用甚为微妙，其人品也确实令人难以定论。

宋初政事堂刻石真伪查考宋初史事，太祖、太宗朝无南方人拜相当国者。宋人提出“政事堂刻石”之事，说太祖曾亲笔书写“南人不得坐吾此堂”之语，刻石于朝廷政事堂，以告子孙。此事是历史事实，抑或是传闻蠡测，抑或是后人杜撰，难以分辨。

景德三年(1006)，宋真宗欲拜王钦若为相。王钦若为临江军新余(今江西新余)人，也就是说是南方人。淳化间进士及第，后钦若一路升迁，咸平四年(1001)已为参知政事(副相)。景德初，契丹军大举南下，他密请真宗南往金陵(今江苏南京)，躲避北方战事，为寇准所叱责而止。出判天雄军(治今河北大名东)，闭门待敌，束手无策。次年还朝，与寇准不合而去职，判尚书都省，领修《册府元龟》，功揽于己而咎归于人。不久又升大学士，以尚书左丞知枢密院事。其为人奸邪险伪，若拜他为相，国事前境很难设想。由是，宰相王旦上谏道：“王钦若遭逢陛下，恩遇已隆，今留之枢密，已属高位。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虽古称立贤无方，然须贤士乃可。臣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议也。”说明不愿以王钦若为相者，乃朝廷众官员的公议。宋真宗只得作罢。等到王旦去世，王钦若才得任相，其愤愤不平道：“为这王老头，迟我十年做宰相。”

以上故事中“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一语，出自《宋史·王旦传》，应该说王旦此语说得如此铿锵有力，宋真宗表面上也只得听从。其实。王钦若自景德三年再次入枢，一直都位居执政，虽没有宰相的名分，真宗对他言听计从，作用远在宰相之上。然而就因此语而晚得宰相名分，那么此语为北宋初期之国事惯例，还是太祖、太宗朝立下的祖宗家法?

据宋人笔记《道山清话》记载，宋太祖曾提出过“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为相”的家法，并亲笔书写“南人不得坐吾此堂”之言，刻石于禁中政事堂，以告子孙。到宋真宗时，先有王钦若为相，后又以苏州长洲(今属江苏苏州)人丁谓为相，据说该刻石被吏辈移至他处。宋神宗时，有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王安石为相，又有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章惇为相，其时该刻石已不知去向。

查考宋初史事，太祖、太宗朝的确无南方人为相，因而“政事堂刻

石”之事，似乎无可怀疑，至少事出有因。但查遍《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等重要史籍，却未见对这重大事件著录一字，原因何在呢？

近代学者张荫麟认为，“政事堂刻石”之说虽言之凿凿，却实不可信。就以上述王旦上谏之事为例，其中存在的问题是：一、如有“政事堂刻石”存在，王旦为何不直接引以为据，而要说：“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只是摆出有关的历史事实。二、宋真宗在王旦死后仍用王钦若为相，如有刻石在，他不怕违背祖宗之法?而宋初确无南方人为相，不是由于太祖定下了歧视南方人的国策，而是因为在太祖初期，国境未逾江南，其所需笼络的先朝重臣和所信托的心腹幕僚，有任宰相资格者，其中确无南方人。其后逐渐收复南土，南方人入朝者大都为南国降臣，自无取冠朝列之理。到第三朝皇帝宋真宗时，开国已三十多年，随着南方综合实力的加强，南方人科举入仕的比重和在中枢机构的比重，都与时俱进。此时，以科第起家而当宰相之任的南方人，开始逐渐产生。而北方人因久居的政治特权地位发生动摇，对南方人难免侧目，真宗朝歧视南方人的事例甚多，加上首位拜相的南方人王钦若确实为人奸邪，后来拜相的丁谓也是一个小人，都为朝中正直官员所侧目。到宋神宗时，北方人的地位逐渐落于南方人之后，王安石为相，其变法又存在许多弊端，而变法派以南人为主体是不争的事实，由是招致很多官员的不满，为了表示对南方人的歧视，尤其是为了反对王安石变法，才有人杜撰了“政事堂刻石”之说，欲从根本上否定王安石当政的合法性，所以刻石之说是不可信的。

上述观点虽说得颇合逻辑，但也仍是一种推测，并没有拿出十分可信的证据来直接推翻《道山清话》中有关“政事堂刻石”的记载。所以宋初太祖是否制作过这块“刻石”，仍是个没有解开的谜。

宋真宗泰山封禅宋真宗即位之初，尚能广开言路，锐意进取，勤政治国，社会经济有所发展，出现了成平年间的小康局面。但与辽订立“澶渊之盟”后，以纳岁币求苟安，施政方针也日益保守，且崇道信佛，劳民伤财。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一国君臣有如一群患有臆想症的精神病人，共同演绎了几场“天书”、“封禅”之类的迷信闹剧。其中一些神秘细节的具体操作过程，将永远是宫廷历史之谜。

澶渊之盟后，宋真宗赵恒心情一直不好。原来想到世人对其父宋太宗皇位合法性问题的非议，及对自己替代兄长继承皇位问题的种种看法。心里就一肚子的不高兴。此时资政殿大学士王钦若又告诉他：“城下之盟，《春秋》所耻。陛下以万乘之尊而与辽国立城下之盟，难道还有比这更可耻的吗!”真是旧患未除，又添新耻，真宗心里就像吃了一只苍蝇，说不出来的窝囊和憋气，心病不轻。

王钦若揣摩到皇帝的心事，也为了迎合真宗好大喜功的心理，提出：“只有封禅泰山，才能镇抚四海，夸示外邦。”真宗听了果然心动。而后，王钦若又告诉真宗：“自古都是先有‘天端’，帝王才行封禅之举，那么怎么求得‘天端’呢?难道伏羲时真有所谓河图洛书吗?不过是圣人以神道设教罢了。天端虽非人力所为，但只要皇上深信而崇奉，以明示天下，则与天降祥端无异。”真宗又去问秘阁直学士杜稿：“河图洛书是怎么回事?”杜稿随口回答：“就是所谓‘龙马负图出于河、神龟负书出于洛’，其实都是古来即有的圣人设神道为教而已。”真宗听了，心领神会，决定施行。

真宗感到需要先将以宰相王旦为首的一批官员买通，让他们也心悦诚服地加入到这一剧情的演员行列中，那戏才会演得逼真。王钦若去转达了真宗的有关“圣意”，王旦半信半疑地勉强表示顺从。不久，真宗召群臣欢宴，提出不分君臣而以主宾就座，知枢密院事陈尧叟、权三司使丁谓，及王旦、杜稿等大臣不敢，真宗说：“今天只想和爱卿们乐乐，就不要讲君臣大礼了。”喝到高兴当口，真宗命侍者给每人一个红包，打开一看，都是大颗珍珠。真宗请大家继续喝酒，说等会还有赏赐，席终果然还有良金重宝之赐。尤其是特赐给王旦御酒一樽，嘱咐回家与妻儿共享。王旦回府打开一看，见樽中都是亮晃晃的大颗明珠，联系到前些天王钦若传达的“圣意”，顿然有所领悟。

景德五年(1008)正月初三的早朝上，内侍来报说宫城左承天门南角发现像书卷一样的黄帛有两丈多长，黄帛上隐约有字。真宗便向群臣讲了一个天方夜谭式的故事：“去年十一月某日夜里，有神人来告，谓来月在正殿建道场一个月，将降下《大中祥符》天书三卷。朕自十二月朔日已在正殿设了道场，恐内外起疑，所以未曾宣布。今日之帛书想必是天书下降了。”王旦带领群臣马上称贺，随后真宗率领众人来到左承天门，

焚香望拜，让内侍上城楼取下“天书”，由真宗跪受。“天书”上写：“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其中“付于恒”，当然是指真宗赵恒，可见真宗即位是天命所归，且可“传世七百”，永葆宋祚。真宗大喜，把“天书”收藏于金匮之中，然后大宴群臣，令改元为“大中祥符”，“大中”有万事适中之意，“祥符”就是“天端”。接着大赦罪犯，官员普加薪俸，京城放假五天，公费欢宴庆祝。并遣使祭告天地、宗庙、宫观，群臣也纷纷上表称贺，一场闹剧拉开序幕。

大中祥符元年三月，兖州知州率千余人赴京上表，称天降祥符，万民称颂，请圣上封禅泰山，以报天地。真宗命朝臣讨论此事，众臣以为封禅泰山是帝王将自己统治天下的功德昭告天地的大礼，秦皇汉武都举行过这一大典，大宋创建以来，国泰民安，丰衣足食，天下大治，完全有必要举行这一大典。四月，又有“天书”降于宫中功德阁，进一步表明了天意。宰相王旦率领文武百官、外来使臣、僧道耆寿等各界代表二万四千余人伏阙上表，请求真宗封禅。这样规模大代表广的上请，竟达五次之多。这班老臣也的确配合默契。

真宗遂决定当年十月赴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曾问权三司使(财政大臣)丁谓经费有无问题?丁谓回答：“大计有余。”这更坚定了真宗过封禅瘾的决心。六月的一次朝会上，真宗又继续演绎着上回那个故事说：“去年那位神人又托梦告知，将有‘天书’降于泰山。”果然，王钦若上奏说，泰山下有礼泉涌出，泉旁的亭中有“天书”下降。于是群臣再纷纷上表称贺，乞加尊号“崇文广武仪天尊宝应章感圣明仁孝皇帝”，真宗拜受。至此，封禅的舆论准备，可谓相当完满。其他准备工作也正风风火火地进行着，如令匠人们专门制造了奉迎“天书”使用的“玉辂”。

十月初四，以玉辂载天书为前导，赵恒在庞大的仪卫扈从下居中，文武百官紧随其后，封禅队伍浩浩荡荡向泰山进发了。大队人马走了十七天，才从京城来到泰山脚下。仪仗、士卒遍列山野，两步一人，数步一旗，从山下一直排到山顶，其气势着实宏大。十月二十三日清晨，赵恒在斋戒三天后，头戴通天冠，身穿绛纱袍，乘金辂，备法驾，在众臣簇拥下，登上南天门，来到岱顶神庙。次日，举行隆重而繁琐的仪式，封祭昊天上帝及五方诸神，礼毕下山。再以同样隆重的仪式，在杜首山祭地祇神。最后登上朝觐坛，接受百官、外使和众僧的朝贺，上下传

呼“万岁”，振动山谷。然后大赦天下，文武官员进秩，赐天下大酺三日，各地举行公费宴庆。

这里顺便提一下泰山中天门之下，海拔八百米的“回马岭”，这里山重水复，峰回路转，景色优美。传说宋真宗到泰山封禅，骑马上山，至此坡路高峻陡峭，马不能行，只得在此回马。现有石坊一座，额刻“回马岭”三字。可是从历史记录来看，宋真宗并不是骑马上山的，而是坐山轿上的山。泰山岱庙的《宋真宗封祀坛颂碑》记述：“上乃乘轻舆，陟绝巘，跻日观，出天门。”即乘坐山轿，攀盘道石阶而上。而这“回马岭”，据说唐代就有此名。有人认为应是唐玄宗封禅泰山的回马之处，也有人认为应是汉光武帝登封泰山的回马之处，不知哪个推断的可信度较大？

十一月，真宗的大队人马还拐到曲阜谒拜了孔庙，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命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然后参观了孔府，游览了孔林，赐钱三百万。以封禅礼成，诏改干封县为“奉符县”。真宗还作《庆东封礼成诗》，令诸臣唱和，最后盛宴群臣。回到京城开封，诏定“天书”下降京城之日为“天庆节”，“天书”降于泰山日为“天贶节”，命文臣将其封禅泰山之行编成《大中祥符封禅记》一书。封禅大典前后历时五十七天，此后天下争言符瑞，群臣也争上表章，竞献赞颂之词，举国如痴如醉。

在其后的日子里，各地不断有符瑞吉兆像卫星一样放出来。如陕州报告说：“黄河自清”了，解州又发生“池盐不种自生”的奇迹，河中府百姓居然在中条山苍龙谷发现了黄金护封的仙书《灵宝真文》……真宗都深信不疑。大中祥符三年(1010)六月，河中府士人、父老、僧道一千二百人恳请真宗到汾阴祭祀后土，其后又有文武官员和各界代表三万余人到京请愿，要求真宗亲祀汾阴后土祠。真宗这时对制造大排场以抬高声望的做法似乎已经上瘾，决定明年春天亲祭汾阴地神。

大中祥符四年(1011)正月二十三日，赵恒又率众启程，西祀后土的队伍仍以“天书”为前导，经洛阳，出潼关，沿黄河北上，直趋汾阴(今山西万荣县西南)。历时二十一天才到山西宝鼎奉柢宫，以封禅泰山的隆重礼仪祭祀后土地祇。完成后，真宗又过黄河，折道向西，来到华山，补上拜谒祭祀西岳庙的礼仪。归途中，又在洛阳停留了二十多天，再去巩县(今属河南)拜祭祖宗三陵(太祖之父的永安陵、太祖永昌陵、太宗永熙

陵)。直到四月初才回到京城，前后闹腾了近七十天，这趟“西祀”比“东封”耗费更大。准备工作就做了年余，修行宫、治道路、征民夫、役兵卒、贡钱物，动辄上万人，几十万钱帛。一些正直的朝臣上书劝谏，真宗根本听不进去。回来后，又是加官进俸，又是派使臣分赴五岳，为诸岳册封帝号，仍忙得不亦乐乎。

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月的一天，真宗又忍不住演绎上回的故事，还说那位神仙托梦，传达天帝的旨意：“令先祖赵玄朗授你天书。”不久，这位先祖果然托梦告诫真宗：“要善为抚育苍生。”真宗认下这位子虚乌有的先祖后，马上出台了一连串举措：一是命天下为圣祖避讳；二是为圣祖上尊号，并配上一位圣母；三是在京城建造景灵宫，供奉圣祖和太祖、太宗像，其规模仅次于太庙；四是在京城最大的道教宫观大殿里供奉玉皇和圣祖的塑像；五是下令天下州县天庆观增建圣祖殿，官员上任和离职都必须拜谒；六是命宗正寺修订皇室家谱，增入圣祖事迹。由是真宗带头撰写《圣祖降临记》，王钦若的《圣祖事迹》、盛度的《圣祖天源录》等也纷纷出笼。

大中祥符六年(1013)六月，老子故里亳州的官吏和父老三千多人进京请愿，强烈要求真宗亲谒亳州太清官，拜祭老子。数天之中，群臣们也凑热闹，再次吁请。于是，真宗下诏，明年春天驾幸亳州，加老子“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尊号，命丁谓判亳州，筹措相关事宜。几个月后，丁谓又称瑞兆频生，从亳州献上灵芝三万七千枝，真宗另辟一殿展览这些灵芝。次年正月，仍以“天书”为前导，真宗率众又浩浩荡荡地开赴亳州(今安徽亳县)，在太清宫拜谒老子后，一个月后才回开封。

半年过后，真宗又想出崇道的点子，宣布天帝的尊号为“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玉皇大天帝”。大中祥符八年(1015)正月初一，在隆重的礼仪中，真宗在玉清宫向天帝正式奉上尊号，参加这一仪式的除文武百官外，还有少数民族领袖、宗教界僧道代表和外国使者等。同时命令天下官员和百姓都须在家中设案焚香，向玉皇大帝致敬，地方官要派人检查，民间“玉皇大帝”的称呼也始于此。天禧元年(1017)正月初一，真宗又到玉清宫向玉皇大天帝献上宝册和龙服。全国各地也同日分设罗天大醮，以供民众僧道烧香跪拜。这样，将全国都卷入这一敬拜“玉皇大帝”的狂热迷信活动之中。

为了把以“天书”为中心的崇道活动搞得场面壮观，从大中祥符元年开始，真宗就在京城和全国大兴土木，营建宫观。其中最大的玉清昭应富有二千六百多座殿宇建筑，役使数万工匠夜以继日，用了七年多时间才竣工，并动用了全国最好的建筑物资，其宏大豪华之规模，超过秦之阿房和汉之建章。次年，真宗又命令全国各州县都必须建天庆观，供奉三清玉皇，总数在千所以上。真宗还在寿丘(今山东曲阜境内)建景灵宫，有一千三百二十多座建筑，以供奉圣祖赵玄朗，又造太极观供奉圣祖母。由于曲阜太远，真宗不便亲致礼拜，就在京城也分别建造景灵宫和太极观。

干兴元年(1022)，真宗去世，“天书”也随葬入陵，总算结束了长达15年的荒唐闹剧。真宗晚年已完全沉浸在这出自导自演的荒诞戏剧中，满口胡话，神魂颠倒。当然还有大量的必不可少的配角，才能把这场戏演得如此生动鲜活。其中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彭年和刘承规五位配角最为重要，他们相互勾结，行踪诡秘，号称“五鬼”，将朝政搞得乌烟瘴气。然而各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同，王钦若为人奸巧，智数过人，胆大妄为，又懂道教，这出戏由他首创建议，作用最大。丁谓狡黠机敏，开始主要是推波助澜，后来居上累官宰相，成为真宗末年政治中举足轻重的角色。林特工于算计，善于逢迎附和，接任三司使，主管封祀和营造的财政大计，几乎把太祖、太宗朝的家底积蓄都挥霍殆尽。刘承规是宦官，官居皇城使，当时伪造“天书”，多由皇城司奏报，或兼负责道具的制作。陈彭年擅长礼法，颇有学问，为东封西祀参订仪制，历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天禧大礼，为天书仪卫副使，负责闹剧场景的设计。宰相王旦名为正直，以美珠一樽，竟箝其口，且屡次力请封禅，冒称众意，利令智昏到如此程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僧道、耆寿、外臣乃至大量士人、百姓都参与了进来，搞得举国如痴如醉，进入迷狂状态。

那么，是什么魔力能动员起全国这么多的各阶层人士，最后完成这令后人深感可笑又可悲的荒诞闹剧呢?其中有多少人在不同程度的参与作假?多少人明知“天书”等符瑞吉兆有假，却依然崇信有加，痴狂不已?为什么此类文化现象有如此之感劭而在中国历史上能常演不衰?

宋仁宗生母之谜演绎宋代宫廷故事的元代杂剧《抱妆盒》和包公戏

《狸猫换太子》等剧目，都是讲述宋仁宗母亲、宋真宗的李宸妃如何遭到刘皇后的陷害，仁宗也差点险遭不测的传奇故事，其遭遇之坎坷，情节之跌宕，令人扼腕。为什么民间对宋代宫廷的这段故事如此津津乐道呢?其历史的真相又是如何的呢?

第三章

元代杂剧《抱妆盒》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宋真宗的李宸妃生了一子，刘皇后十分忌妒。便令宫人寇承御假传圣旨，说皇帝要见儿子，诓出婴儿勒死，再抛尸河中。寇宫人有怜悯之心，但不知如何救这孩子。正好此时，真宗派太监陈琳怀抱妆盒到园中采摘新果，送与御弟楚王祝寿，在金水桥巧遇寇宫人。寇宫人请陈琳帮助，陈琳便将婴儿放入妆盒，带出宫来拜见楚王，细禀此事，楚王将孩子收养家中。十年后的一天，楚王带此子谒见皇兄，刘皇后见宋仁宗此子声容举止都酷似李宸妃，心生疑窦。回宫后拷问寇宫人，寇宫人不甘屈辱，当即头撞石阶而亡。数年后，楚王将此子身世婉转告之真宗，真宗将他立为太子，由刘皇后收养。五年后，真宗驾崩，仁宗继位。仁宗怀疑自己身世，亲自查审此事，陈琳这才和盘托出。此时李宸妃早已过世，可怜母子生前没能相认，仁宗下旨尊母亲为纯圣皇太后。刘太后逆天悖理，手段残忍，应严加惩办。但仁宗考虑到先帝的尊严，刘太后年岁已老，也算有养育之恩，姑且容之，奉养如旧。加赐封赏楚王与陈琳，并重建寇宫人之墓，封为忠烈夫人。

包公戏《狸猫换太子》讲述的相关故事却如此演绎：开封府尹包拯外出巡视，一天在路上，突然被一阵怪风吹落了帽子。包公感到这风来得蹊跷，就随飞滚的帽子追去，来到一座破窑前。窑中住着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妇人，衣衫破旧，面容憔悴，行动中却隐隐透出一些宫廷风范。包公上前问候，并报出姓名。老妇人得知来者是当朝铁面无私的“包青天”时，不由得泪流满面，喊出一声“包卿，可要为奴家伸冤啊!”这声叫得包公大惊失色，这“包卿”岂是普通人可随便叫得的?仔细询问后得知，老妇人实为当今天子宋仁宗的亲生母亲，宋真宗的李宸妃。因为给真宗生下皇子，却被生不出儿子的刘皇后调包夺走。刘皇后勾结太监郭槐，买通接生婆，用剥去皮的狸猫换出皇子，诬李宸妃生下怪胎妖孽，打入冷宫加以陷害，要将李宸妃治罪。多亏宫人冒死相救，宸妃才得以逃出深宫，隐名埋姓，流浪颠簸至今。包公开始半信半疑，老妇人取出当年真宗留给她的玉佩，包公见是宫中之物，才知老妇人所言不假，可怜她身为国母，却母子不能相认。于是包公将老妇人带回京城，设计使仁宗认

母，并惩办了此案的郭槐等恶人。

上述两个故事虽然都是讲述仁宗生母的悲凉遭遇，而情节却相距甚远。其实二者都为后人虚构，与历史真相存在较大差距。那么后人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演绎这段宫廷故事呢?它应该不会完全是捕风捉影吧?有关的历史真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先说刘皇后，原为真宗的德妃。真宗的原配是潘仁美的女儿，即位前已去世。即位后所立的郭皇后，也在景德四年(1007)病故。其后，中宫虚位多年。在众多的嫔妃中，真宗属意的是刘德妃。德妃名刘娥，太原(今山西)人，后徙益州华阳(今四川成都)，出身低贱，却生得玲珑秀眉，擅长播弄鼓乐。十来岁就嫁给当地匠人龚美。雍熙初年，夫妻来京城谋生，龚美因为贫寒准备叫刘娥改嫁。此时，真宗为襄王，很想娶一个有才艺的川妹子为妾，经襄王府给事张耆的张罗，刘娥就这样进了襄王府。这时她年才十五，风华正茂，大受宠爱。太宗知道此事，嫌其出身卑贱，令将刘娥逐出王府。真宗实在舍不得，就暗中让她寄居在张耆家。十余年后，真宗即位才将她接回宫中，立为美人，重得宠幸，她在后宫的地位也升得很快，大中祥符初已为德妃。当真宗打算立刘德妃为后时，大臣们以其出身为由而激烈反对，但真宗力排众议，终于在大中祥符五年(1012)将德妃立为皇后。

刘皇后虽出身低贱，入宫后却也好学，逐渐通晓史书，加上生性警敏，关心朝廷与宫闱有关要事。真宗也常退朝后在其宫中批阅封奏，便询问一些政事，她都能妥善应答，其政治才干颇受真宗倚重。天禧四年(1020)春，真宗一度病重，朝政就多由皇后决断。真宗驾崩，仁宗即位才十三岁，刘氏为太后而垂帘听政。改元天圣，“天圣”拆字即为“二人圣”，指皇帝与太后二人当政。由于仁宗年少，实由刘太后一人当政，长达十一个年头，成为宋代第一位临朝的母后。

刘太后听政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听从大臣王曾和吕夷简等人的建议，把“天书”随同真宗一起葬入永定陵，下令禁止兴建宫观，有力地遏制了大中祥符以来弥漫朝野的迷信狂热。既借用过奸相丁谓，也很快免去其权位，贬为崖州(今海南)司户参军，实为流放。接着，在全面把握朝政期间，时也从谏如流，颇有建树。如创设谏院，完善科举，兴

办州学，澄清吏治，重视水利，连中国古代最早的纸币——交子，也是在她的批准下得以发行。当然也存在贬逐寇准、李迪等较为正直大臣，及稍有倚用宦官、放纵外戚等的过失。不过大体而言，史官对其治绩一般持基本肯定的评说：“内外肃然，纪纲具举，朝政无大阙失。”

再说仁宗母亲李宸妃，她开始只是刘德妃宫中的侍儿，即一位平常的宫女。由于生得还较端正庄重，且肤色明丽，言语不多，真宗一时高兴，让她侍寝而怀上了孕。生下仁宗后，封崇阳县君，又生一女(后早夭)，方进为才人，不久迁婉仪。刘德妃为皇后，因无子，便把襁褓中的仁宗夺为己子，并让杨淑妃抚育，而李婉仪从此就失去了亲自抚育儿子的资格。仁宗从小就叫刘皇后为大娘娘，叫杨淑妃为小娘娘，“母子”感情融洽，而不知自己还有生母在宫中。李氏因为地位低下，不能论理，默然杂处在先朝宫嫔之中。直到仁宗少年即位，由于还是刘太后掌权，李氏也不敢有一点母以子贵的表现。人们都畏惧刘太后，也没有人敢对仁宗说出事情真相。而刘太后却让李氏去为真宗守陵，用隔绝其亲生母子的手段，来确保自己权力地位的稳固。同时，太后也派人访得李婉仪失散多年的兄弟李用和，给这个原本衣食无靠的小工匠当上三班奉职，做得也不算太绝情。

明道元年(1032)，李氏病重，方得进位宸妃，不久去世，享年四十六岁。可悲的是，宸妃贵为一国君主之母，并与仁宗同住一宫廷中，却生前不能与儿子相认相聚。刘太后打算用一般宫人的礼仪在宫外治丧，宰相吕夷简上奏建议丧礼应从厚。太后怕在座的仁宗听出破绽，急忙引皇帝走开，然后单独回到帘下，责问吕夷简：“一宫人死，你提出厚葬，是要想离间我们母子关系吗?”吕夷简从容回答：“太后若不想到刘氏族人，就算臣没说；若为刘氏后人着想的话，则丧事宜从厚。”一句话提醒了刘太后：日后万一仁宗得知自己的身世，痛感生母生前死后都没有得到应得的待遇，一定会怨恨自己，就会迁怒于刘氏后人。于是就问该如何厚葬?吕夷简请下诏以一品之礼安葬于洪福院。同时，吕夷简还密令经办人员，要以皇太后的服饰装敛，且要用高档的水银宝棺。

明道二年，刘太后病卒。宋仁宗号泣忧伤，悲痛过度，茶饭不思。章惠太后(即杨淑妃)劝道：“她非帝母，帝自有生母。”燕王诸人也告知仁宗：“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宸妃死于非命。”在一番询问后，仁宗方知自

己的身世，号恸顿止，不视朝累日，下哀痛之诏自责，尊生母为皇太后，谥号章懿。又亲临母亲所殡之洪福院祭告，同时派兵包围了刘氏府第。然后亲自哭着开棺验视，见生母穿着皇太后的冠服，在水银的养护下肤色如生，没有毒杀的痕迹，才感叹传言之妄，下诏将母亲棺椁陪葬真宗永定陵。于是撤去刘府围兵，又到刘太后灵前焚香泣告，对刘氏仍然恩礼有加。为了弥补对亲生母亲的愧疚之情，仁宗对李氏家族的恩宠益厚，一再提升母亲弟弟李用和的官职，拜为彰信军节度使、检校侍中，还将福康公主下嫁李用和的儿子李玮。

上述历史真相中，刘太后应该说是一位还算不错的垂帘听政者，她掌权的天圣、明道年间，基本恢复了真宗早年咸平、景德间的小康发展势头，也为仁宗的庆历盛世奠定了基础。史传曰："虽政出宫闱，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她的政治才干决不在其夫真宗和其子仁宗之下，临朝时的个人品德也并无大的阙失。虽说刘太后未必不想效法武则天，但宋代限制后宫干政的家法颇为森严，众臣的监督谏阻也算有力，使刘太后只得明确表态不做有负祖宗的事情。晚年，太后召见曾反对她预政的大臣李迪，问道："我今日保护天子与大宋江山至此，你以为如何?"李迪表示心悦诚服。

当然，在对待李宸妃的问题上，刘皇后有自己的私心和不当行为，但这也与当时的后宫制度有关，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她不得不这样做。同时，她也并没有使出如其他朝代一些后宫之间的残忍手段，应该说对李氏并没有完全绝情，仍还有一点天良，故使李氏得以善终，且还提携了李氏家人。这与民间小说戏剧中刻画的刘皇后，一个有着阴狠毒辣之心肠与手段的皇后形象相去甚远。说到这里，仁宗生母的谜团已清晰解开。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民间社会对这样一位还算清明的刘皇后形象要进行如此的歪曲?把一位实有功于宋朝统治的太后描绘成一个丧尽天良、恶毒卑劣的刽子手?

郭皇后暴卒的细节宋仁宗即位之初所立的郭皇后，实是太后强加于少年皇帝的婚姻，所以久不得宠，却又骄纵泼辣。一次后妃之间的争风吃醋，失手打了皇帝，闹出廢后风波。宰臣与宦官的推波助澜，使郭后终被废黜，出居道教宫观。问题是，仁宗后有悔意，打算召郭氏回宫，这时郭氏突然暴卒。是被人暗害而死，还是上天无情?留下永久之谜。

宋仁宗的婚姻一直很不顺心，主要是由于刘太后在其中强行贯彻自己的意志。开始为仁宗挑选皇后时，蜀人王蒙正的女儿姿色冠世，入京备选，仁宗一见倾心，刘太后见了却认为此女过于妖艳，恐对少主不利，就将她改配给自己的侄子刘从德。眼看绝代佳人成为他人之妇，仁宗久久不能释怀，然也无可奈何花落去。在准备正式立后之时，仁宗属意于张美人，但刘太后又坚持立平庐军节度使郭崇的孙女，胳膊扭不过大腿，仁宗只能顺从母意。天圣二年(1024)，郭氏立为皇后。

宋仁宗仁宗对母亲硬塞给他的皇后并不喜欢，而郭皇后却仰仗着太后的偏心而非常骄纵，使仁宗难得亲近其他嫔妃，仁宗早就憋了一肚子的气。不久，刘从德去世，仁宗内批封王氏为遂国夫人，允许她出入宫禁，因朝臣竭力反对而作罢。从中也可看到，由于郭皇后始终没有博得仁宗的欢心，所以仁宗总把旧情放在心上。

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去世。宰相吕夷简手疏八事，劝帝重整朝纲，语真情切。仁宗与吕夷简商议重建宰执班子，意在逐渐消除太后的影响，创建自己的权力班底，准备把原为太后亲信的执政夏竦、张耆和晏殊等都罢政出朝。退朝后，仁宗随口与郭皇后说到这件事，郭氏却说："难道吕夷简独独就不依附太后吗?他不过为人机巧善变罢了。"仁宗听了，想想似乎颇有道理，就决定把吕夷简的相位也给罢了。第二天早朝，宣读了皇帝的诏令，除上述诸相被依次免职外，末后吕夷简也罢为武胜军节度使，出判陈州。吕夷简大为惊骇，也大惑不解，这样被出乎意料地罢相，不知是何事忤旨而遭此遣，就托入内都知(宦官)阎文应打听，才知底里，遂对郭皇后怀恨在心。

宋仁宗复召李迪、王随等人执政，还用旧相张士逊，他曾是仁宗在东宫时的老师，所以颇得信任，但张很快就坐事罢相，出判许州。半年后，仁宗感到新班底并不是十分满意，还是有点思念吕夷简，所以又召他为相。

后宫中，仁宗比较宠爱尚美人和杨美人，而郭皇后却不时与她们争风吃醋。一次，郭后与尚氏同在仁宗前侍谈，没说几句，又起口角。尚氏恃宠不肯相让，并当着仁宗的面讥刺郭后，郭后气愤之极就跳起来打尚氏的面颊。仁宗看不过去，起座拦阻，不料郭后已经出手，而尚氏闪

过一旁，一巴掌正打在仁宗颈脖之上，指尖锐利，掐成两道血痕。一怒之下，仁宗决定废黜郭后，遂找宰执近臣商量。宦官阎文应给仁宗出主意，让仁宗将颈脖上的伤痕给执政大臣们看，以取得他们对廢后的支持，仁宗也照着做了。

宰相吕夷简对前不久因郭后一句话而被罢相一事，一直耿耿于怀。这次正是报复的机会，怎肯轻易放过。由是他不但赞同廢后，以为“皇后如此失礼，不足母仪天下”，还提出两条强有力的理由：一是皇后在位九年，却无子嗣，二是汉唐故事中，光武帝素称明主，其皇后郭氏只是怨怼就被废黜，何况陛下被伤颈脖。说得仁宗遂下决心，下诏废郭后，封为净妃、玉京冲妙仙师，赐名清悟，居于长乐宫。

廢后诏书公布后，引起朝臣们的轩然大波。主要是御史中丞孔道辅率领范仲淹等十余名谏官、御史，向皇帝上了很多道奏折，认为皇后没有大过，不应轻率废黜，请求重新审视此事。吕夷简指示有关部门，不得接受台谏官的章奏，所以反对廢后的奏疏无法上达仁宗手中。于是御史们准备进殿面奏，要求仁宗接见。然而吕夷简与阎文应等早有布置，殿门紧闭不开。孔道辅等只得拍打门环，大呼：“皇后被废大事，奈何不听台谏入言?”仁宗便令宰相去向台谏官当面说明情况。

吕夷简只得硬着头皮至中书与台谏官们商谈。孔道辅、范仲淹等台谏官指斥夷简道：“大臣服事帝后，就像儿子服事父母，父母不和，只可劝解，奈何顺父出母呢?”夷简答：“后伤帝颈，失礼太甚。且廢后亦汉、唐故事，何妨援行。”道辅厉声说：“此乃汉、唐失德事，如何引为法制?”辩论中，双方唇枪舌剑各不相让，最后吕夷简只得同意他们明天直接向皇帝进谏，然后拂袖而去。

吕夷简回去对仁宗讲述了台谏官请对的要求，认为实非朝政太平之幸事，要仁宗早做准备。第二天清晨，台谏官们早早上朝，准备与皇帝、宰相当廷辩论。不料，仁宗先下了即日起不许台谏请对的诏书，同时对为首的台谏官员进行了处分：孔道辅、范仲淹出知地方州郡，其他台谏官员分别给予罚金处分。在皇帝与宰相的联手打压下，这场廢后风波得以平息，台谏官的进谏未能见效。

景祐元年(1034)，被废的郭后又出居瑶华宫。而尚、杨二美人越发得宠，一有机会就缠着仁宗，几乎每晚都共同陪侍上寝。为此，仁宗搞得圣体疲乏，或累日吃不下饭，不久一场大病，数天不省人事，内外忧惧。朝臣们私下议论，认为主要是二美人侍寝过于殷勤之故，杨太后(即真宗时的杨淑妃)与内侍阎文应轮流劝说仁宗，黜逐二美人以保重龙体，仁宗无可奈何之下只得点头同意，阎文应便把二美人用车送出后宫。次日传出诏旨：尚美人出为道士，杨美人出为尼姑(一说别宅安置)。九月，立大将曹彬的孙女为皇后。

仁宗身体康复后，一天游览御花园，见到郭后原来乘过的轿子，触景生情，黯然泪下，颇有悔意，作《庆金枝》词一首，派内侍给郭后送去。郭后见词也觉伤心，答和一词，凄怆哀婉，动人情怀。仁宗看后颇为感触，又派人告之有重召郭后回宫之意。郭氏一想到被废时的情景，顿感万分屈辱，表示若再受召回宫，必得百官立班受册方可。吕夷简、阎文应听到此消息，大为吃惊，两人在仁宗面前说过郭后的许多坏话，担心郭后回宫将对自己不利。恰好郭氏得病，仁宗派阎文应带太医前去诊治，几天后，郭氏暴卒。

郭后的暴卒，当时就引起不少传言。有人怀疑是吕夷简、阎文应所害，认为二人力主廢后，与郭后已势不两立，而仁宗欲郭后回宫复位，这必定造成二人心理上的恐慌，从而采取措施将郭后害死。还有消息说，阎文应在带太医诊治郭后的过程中，故意用药引发其病，使其病体加重而亡；或说是阎文应乘机进毒，致郭氏暴亡。甚至有人传言，郭后在病体加重，但尚未断气之时，阎文应就向仁宗报告郭氏病亡的消息，然后急忙用棺木收斂。当时有谏官王尧臣等人对此反常现象提出疑问，要求重新察验郭后的病历起居记录，但仁宗不同意，最后只得不了了之。

史载，仁宗得知郭氏病亡，“深悼之，追复皇后”，却不加谥号，也不行附庙之礼，仍葬于佛舍而已，这一做法也是够奇怪的。联系前面仁宗并不深究郭氏暴卒的原因诸事，也让人看不懂。就是说，郭后究竟在仁宗心目中是个什么地位，其实也是一个谜。

后来，范仲淹回朝任天章阁待制，他虽提不出什么过硬的证据，但

始终认为郭后之死应与宦官阎文应有关，阎带医就治郭氏小疾，几天后暴卒，起码有失职之咎，于是上书弹劾，阎文应终于被贬逐岭南，死在路上。吕夷简对此事颇感不快，就递过话来：“待制乃是侍从之任，不是口舌之任。”言外之意让他闭嘴。范仲淹却反击道：“向皇帝进言，正是侍从所应做的!”范仲淹虽对吕夷简也有看法，但拿不出任何有关凭据，后在揭发吕夷简存在结党营私诸行为的斗争中，又被贬出朝廷，出知饶州。

总之，前面怀疑吕夷简、阎文应加害郭后的种种说法，应该说都只是社会传言，而没有多少真凭实据，因此郭氏之死留下一个永久的疑问。

北宋亡国北宋王朝经历了一百六十余年的发展，不管从人口、疆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都可谓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国。尤其是其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昌盛，在中国历史上也可算一个巅峰时期。然而，东北地区刚刚崛起的金国，只用了一年时间，就用铁骑摧毁了这个庞然大物，其原因何在呢?

北宋王朝经历了一百四十年的稳定发展，到宋徽宗即位，或可说进入了一个“太平极盛之世”。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的叙写，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描绘，我们都可看到北宋都城汴京的繁荣景象。从人口方面说，宋徽宗初年，户数已超过两千万，一些学者估计人口已过一亿，在农业社会中，人口是衡量国家强弱的主要尺度，而一亿人口，还有近百万的兵力，这在当时的世界上，绝对是首屈一指的大国。从疆域方面看，自崇宁以来，随着对西夏战争的节节胜利，“斥大土宇，靡有宁岁”，直到宣和元年(1119)，宋军在统安城战败，方被迫与西夏休兵。后又攻辽，从金军手中讨得燕云诸州，增置燕山府及云中府路；宋徽宗对这时国家的富盛，也颇自鸣得意，时时粉刷太平，好大喜功。词臣奉命进诗：“四海熙熙万物和，太平廊庙只赓歌。”

然而就是这个看上去庞然富强的宋王朝，这个拥有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宋帝国，在与东北刚刚崛起的小国——金国的较量中，仅一年多的时间，这座外观金碧辉煌的大厦竟然轰然倒塌，京城陷落，二帝及大批人员被掳，万民涂炭，其憷目惊心的惨状，实在惨不

忍述。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貌似富强的帝国会如此不堪一击?为什么这个上亿人口的宋王朝会如此迅速地被金兵的铁骑所摧毁?尤其是这摧毁仅仅用了两国军队交锋后的一年时间，这到底是金兵有这么大威力，还是宋王朝自取辱败呢?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北宋最后的两个皇帝，及其周围人们在北宋王朝最后的日子里的各色精彩表演，或能对这个问题有所领悟。

宋徽宗是历代帝王中屈指可数的天才艺术家，他在音乐、绘画、书法、棋艺、诗词等方面确有不俗的才华，如在书法上独创瘦金体，他的花鸟画精致逼真，他懂音乐，词也填得不错。然而处置军国大事的昏聩，生活奢侈腐化的程度，手下奸臣贪官的数量，也都和历代昏君有一拼。他指挥着规模空前的宫殿、后苑等的建造，穷侈极丽，设立造作局、应奉局，开运“花石纲”，挥霍民脂民膏，用之如泥沙而不惜。他酷嗜女色，五、七日必御一处女，即授名号或进阶，退位时出宫女六千余人，总数盖以万计。甚至还不满足，专设行幸局，毫无顾忌地微行于妓馆酒肆，追声逐色，寻花问柳。其纵情于声色犬马，竭天下以自奉，浩大的宫廷开支，完全由人民的血汗在供养。

同时，宋徽宗口头上也自诩“永惟继志之重，深念守文之艰”。很快沿袭哲宗“绍述”神宗的变法方针，进一步惩罚反变法派，采取了财政、教育诸方面的新政，如继续方田均税，重视农田水利，进行盐法、茶法改革，奖励开发矿业，还有学校科举改革。加重赋税，崇奉道教等。其一系列新政呈现着复杂的情况，不能说其中没有合理的、有积极意义的成分，但大多是搜括民脂民膏的内容。而崇奉道教就更是荒唐可笑，自封“教主道君皇帝”，一大批自吹道术高明的道士被徽宗尊为上宾，玩着自欺欺人的把戏。

宋徽宗周围的一帮宠臣，人们号称“六贼”：有宰臣蔡京、王黼、朱和宦官童贯、梁师成、李彦。人称蔡京为公相，童贯为媪相，梁师成为隐相。其实，当时的奸佞决不止上述六人，再如宦官杨戬、兰从熙、谭稹等，官员李邦彦、高俅、蔡京诸子蔡攸等及孟昌龄、孟扬、孟揆父子等，这些人窃据要津，援引亲故，广结党羽。如蔡京之子六人、孙四人同时为执政、从官，其他奸臣同样效仿，一时乳臭童稚，目不知书，而

官已列禁从者比比皆是。于是招权纳贿，货赂公行，尤其是对民众的各色残酷掠夺，有关史料俯十皆是。

不要以为这些奸佞都是草包，其中一些人也是才子。如蔡京就是大书法家，进士及第，文章也写得漂亮，首倡“丰亨豫大”之说，鼓吹太平盛世，徽宗朝曾四度为相，长达十七年之久。其弟蔡卞与京同年进士及第，王安石招为女婿而从安石学，官中书舍人兼国史修撰时，“文饰奸伪，尽改所修实录、正史”，二任宰执之官。蔡京诸子也颇有文采，如蔡僚着有《国史后补》、《北征纪实》、《西清诗话》、《铁围山丛谈》等。王黼《宋史》本传称其：“为人美风姿，目睛如金，有口辩，才疏隽而寡学术，然多智善佞。”

尽管官场上一片乌烟瘴气，宋徽宗仍在标榜要惩治腐败，针对官员的受贿作弊，朝廷也处分了一批官员。如河北路转运副使李昌孺、河北监司贺希仲、滁州知州唐恪、提点江东路铸钱王阐等官员，都因贪墨而遭贬黜。然而，其体制中没有多少权力制衡机制，尤其是对最高当局，基本上没有监督能力。从而其体制腐败的根子就在皇帝本人，他其实就是最大的受贿者，其周围一大批高级贪污犯更备受皇帝的青睐，恩赏有加。

面对隐伏危机的表面盛世，也有一些正直的官员和太学生，起而痛陈时弊。如官员李纲上疏，被贬谪某县税务。太学生朱梦说屡次上书，被贬官池州。太学生雍孝闻力诋蔡京家族，被流放而死于海南。甚至有人上奏历数蔡京、童贯诸奸臣之罪，“中外大骇”，而宋徽宗却对此类忠言完全置若罔闻。

燕人马植由童贯荐引，献联金灭辽之策，宣和二年(1120)入金谈判，缔海上之盟。宣和四年(1122)，金人约宋攻辽。在长期作战中，陕西军成为宋军精锐，然而在童贯率领下两次进攻辽都燕京，都被打得一败涂地。金军乘势拿下燕京，这时也看清了大宋王朝外强中干的实质。金军在向宋横敲一笔军费后，将古城洗劫一空，留下几座残破不堪的空城给宋。而宋朝君臣却还在自我陶醉，为收复燕云诸州，“功臣”们一一加官晋爵，徽宗还命人撰写《复燕云碑》来歌功颂德，似乎太祖、太宗未竟的事业，真的由他来完成了。所以，在金兵进攻之前，大宋王朝始

终给人们一个盛世富强的印象。

宣和七年(1125)十月，金太宗下诏伐宋，兵分两路：一路攻太原，一路攻燕京，然后会师开封。领枢密院事童贯在河东听到金军南侵的情报，竟以赴京汇报为名丢下军队，逃之夭夭。十二月，燕京宋军投降，不过金兵在山西太原、河北保州一带还是遭到宋军的殊死抵抗。此时，徽宗才感到事态的严重，被迫下诏罪己，承认种种弊政，并于二十三日匆忙传位于钦宗，不负责任地把一副烂摊子撂给儿子。应该说此次金军初攻南方，宋军尚有抵抗能力，而徽宗却已吓得仓皇南逃，蔡攸、童贯、高俅等也随同而去。

靖康元年(1126)年初，宋钦宗见父王南逃，也想逃往陕西，在李纲的一再苦谏下，这才打消去意。命李纲为尚书右丞、亲征行营使，负责东京防务。金军打到东京城下，宋军防守严密，金兵死伤累累而不能得手，只得遣使入城议和。钦宗求之不得，在宰相李邦彦的力主下，答应割地赔款的苛刻条件，派兄弟亲王为人质赴金营，并派官员向民间勒索准备和议的金银。后各地勤王兵陆续抵京，名将种师道也率军到来，其将姚平仲立功心切，说动钦宗偷劫金营，李纲也不反对。然而劫营失败，姚弃军亡命。金军向钦宗追究责任，钦宗恐金症再次发作，罢免了李纲和种师道，遣使谢罪，准备交割北方三镇。可见，钦宗面对险恶的局势毫无应对能力，只是来回摇摆于投降和冒险之间。

消息传出，群情激愤。二月五日，太学生陈东率千余学生伏阙上书，军民不期而至者数万，要求罢免议和奸臣，复用李纲、种师道，反对割地乞和。群众把登闻鼓抬到东华门外，擂得震天价响，并围攻和诟骂主和奸臣李邦彦等。开封府派兵围住学生，指责学生胁迫中央。学生反驳道："以忠义要求朝廷，不比你们以奸邪要挟天子强吗!"陈东挺身于斧钺之间，凛然无惧。钦宗自知大义有亏，众怒难犯，只得宣布李纲、种师道复职，并让李纲出面安抚学生，这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金帅得知宋廷主战派占了上风，外围勤王兵又在不断增加，自己久攻开封不下，怕处于不利境地，在得到钦宗同意割让三镇的诏书，并带着勒索来的金银，引兵北去。开封被围近四十天，到二月中旬终于解围。

四月三日，徽宗一千人悠然自得地返回京城，似乎只是做了一次江南旅行。这时要求惩办众奸臣的呼声弥漫于朝野，去年年底，陈东就率数百名太学生伏阙上书，要求朝廷严惩“六贼”，钦宗于是将“六贼”流放和赐死。然而其以为危机已过，把名将种师道罢职赋闲，后在其他官员的要求下，才让种师道出为河东河北宣抚使。师道建议集中兵力扼守黄河以北军事要塞，阻遏金军的再次南侵，朝廷置之不理。

六月，钦宗将李纲排挤出朝，去太原指挥军事。由于前线武将直接听命于皇帝，李纲指挥不动，只得提出辞职。钦宗居然以“专主战议，丧师费财”之罪名，将李纲贬官流放，安置夔州(今重庆奉节)。另一方面，钦宗以为和议可恃，不思备战，且压制抗金舆论。同时，钦宗与徽宗父子之间在权力问题上又勾心斗角，也根本无心备战。

八月，金兵再分两路南下。九月攻克太原，十月攻陷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十一月，金兵安然渡过黄河，并遣使到东京，提出两国割河为界。钦宗满口答应，还急派官员前往交割。闰十一月初，两路金兵会师东京。开始大规模攻城。钦宗这才想起已被流放的李纲，驿召他进京主持防务(然而李纲还在途中，东京就已陷落了)。这时开封还有禁军、勤王兵与民兵近二十万，如合理调配，至少可抵挡一段时间。而钦宗偏偏相信道士郭京的妖术，所谓只须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即可扫荡金兵。二十五日，郭京驱兵迎敌，谁知一触即溃，金兵乘机攻入城门。次日，钦宗遣使金营乞和，金帅提出割地和人质等条件。钦宗又亲往金营为质，献上降表，受尽凌辱，才被放回。

金帅已摸透徽、钦二帝的心理，不立即俘虏他们，而是先让他们下令收缴城内的武器、马匹，剥夺宋人的反抗能力；而后又让他们下令官府为金军搜括民间所有的金银财物和妇女。钦宗回来后，即下令搜括计金一千万锭，银二千万锭，帛一千万匹，牲畜七千余匹及妇女一千五百名，弄得城内翻江倒海，搜财抢人，根刷殆遍，民不聊生。靖康二年(1127)正月十日，将钦宗与亲王、大臣等再召到金营囚禁。二月六日，令钦宗跪听金帝诏书，宣布徽、钦二帝废为庶人，另立他人为王。而后下令剥去钦宗帝服，礼部侍郎李若水抱帝大骂，被毒打砍死。次日，徽宗与皇族也押到金营，徽宗哀求能留广南一小郡奉祀祖宗，遭到拒绝。十一日，百官不得已推举张邦昌为帝。三月七日，金帅为张邦昌行册命

礼，张一再痛哭，表示不忍叛立，然已身不由己。

四月一日，金军押着大批俘虏和战利品启程北撤，俘虏包括二帝、皇后、妃嫔、太子、亲王、公主、宗室、外戚、宰执和其他官员、伎艺、工匠、娼优等各色人群，共计十余万人。金银、马匹、丝帛、车辂、法物、礼器、文物、图书等战利品，不可胜计。而此时的开封城也已被战火焚毁，形同废墟。昔日繁华、富裕、昌盛的大宋王朝，只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基本被摧毁。它毁于猖獗一时的金兵铁骑，更毁于这两个卑劣低能的皇帝。他们在压迫摧残自己的民众方面，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在抵抗外族的侵暴面前，又显得如此的懦弱无能和卑鄙无耻。当然，那些奸臣也难逃助纣为虐的谴责。那么，何为主要因素呢?

这使我们想到：为什么面对如此卑鄙、昏聩的君主之统治，人民根本就无可奈何?人民几乎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力，只有听从命运的安排：来一个所谓的“好”皇帝，便以为是人民的大救星，感谢帝王恩赐的太平盛世；遇到昏君暴主，也只有痛苦的承受，同时许多人仍在高歌皇恩浩荡。最多只有少数人在作一些无谓的上书痛陈之类的抗争。这就是中国传统君主专制体制的运作特色，这个体制有时也的确能构造起外表相当金碧辉煌的大厦，然而它绝不是创建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之上，其质地是极其脆弱的。约一百五十年后，蒙古铁骑也只用了年余时间，就从北方誓如破竹般地南下，攻克南宋都城临安。皇帝与后宫、众臣数千人被俘北迁，靖康之难一幕又逼真地重演，元政权很快就取代了宋王朝。通过上述的实例分析，我们领悟到这座大厦突然就会轰然倒塌的主要原因了吗?

真假公主柔福帝姬是徽宗的女儿，曾随父被金兵北掳。三年后，她居然从北方逃了回来，受到宋高宗的优遇。但十二年后，又被高宗母亲韦太后指为假冒帝姬而被处死。不过，民间却认为是韦太后为个人隐私而杀害帝姬。不知何者是历史事实。

柔福帝姬一般来说，皇帝的女儿被称为公主。北宋政和三年(1113)，宰臣蔡京建议，可仿照周代“王姬”的称号，宋廷公主一律改称“帝姬”美名，这一制度维持了十多年。这样，宋徽宗有三十四个女儿，也就是有三十四帝姬，柔福帝姬约在其中排位二十。靖康之难，这

三十四帝姬，除十四人早夭外，其余二十人都随父亲徽宗、哥哥钦宗及赵氏宗室一起，被北掳金国，成为离乡背井的亡国奴。

在被金兵北掳的成千上万的俘虏中，嫔妃妇女的结局是最悲惨的，不说道途中大批受虐死亡，到达金国后更是倍遭蹂躏。如《靖康稗史笺证》诸书载，金主“宴诸将，令宫嫔等易露台歌女表里衣装，杂坐侑酒，郑、徐、吕三妇抗命，斩以徇”。“烈女张氏、陆氏、曹氏抗二太子意，刺以铁竿，肆帐前，流血三日”。“妇女千人赐禁近，犹肉袒”。大批妇女被送入洗衣院，金酋将官们可随意掠娶洗衣院的女俘，其在某种意义上实为军营妓院。不能忍受肆意糟蹋而自尽者，也不在少数。

《鹤林玉露》载，南宋建炎四年(1130)，有一女子来到宫廷，自称是柔福帝姬，经千辛万苦终于从金国逃了回来。宋高宗下诏，遣老宫人去察验，觉得这女子的相貌确实颇像柔福帝姬，便再问以宫禁旧事，也能答出个大概。惟一值得怀疑的是这女子的一双脚似乎长大了许多，这女子不胜悲苦地解释道：“金人驱逐我们就像赶牛羊一样，曾光脚走了万里路，哪里还能保持原样呢?”高宗觉得言之有理，尤其是该女子还能直呼高宗的小名，便不再怀疑。下诏让她入宫，授予福国长公主的称号。不久，又让她下嫁永州防御使高世荣，赐予嫁妆一万八千缗。此后，高宗仍对她宠渥有加，先后赏赐近四十八万缗财物。

《四朝闻见录》载，绍兴十二年(1142)，高宗生母显仁韦太后被金国放归，见到儿子悲喜交加，拉着高宗的衣袖垂泪不止。突然，她停止哭泣，对高宗说：“你被金人笑话呢，说你错买了颜子，柔福早已死了。”当年东京有条颜家巷，制作和买卖的器物都以次充好，以假充真，极不坚实不耐用，所以人们称假货为“颜子”。《鹤林玉露》也载，韦太后回来说：“柔福死沙漠久矣。”高宗闻言大惊，便下令将柔福帝姬交诏狱审讯。审理的结果，帝姬原来是一女巫。该女巫曾经遇到一个流落民间的宫女，宫女说她的容貌与柔福帝姬十分相像，便告诉她许多北宋宫中的秘事，教她如何冒名顶替。于是她假称柔福，来宫中享受了十几年的荣华富贵。此案以柔福认罪伏诛告终。

《宋史·公主传》是说，有名开封尼姑叫李静善，有人说她容貌像柔福帝姬，她便自称帝姬，由蕲州兵马钤辖韩世清送至宫中。最后被韦太

后识破，送法寺惩治后处死。另有一名宦官从金国北还，又说柔福帝姬在五国城，曾嫁给徐还，死于绍兴十一年(1141)。后其骨灰南还，朝廷以礼葬之，追封和国长公主。

然而，民间却流传着另一种说法。如《随园随笔》引《琐碎录》言：“柔福实为公主，韦太后恶其言在虏事，故亟命诛之。”就是说，柔福帝姬知道一些韦太后在金国受辱之事，如她被金将完颜宗贤所占有，并生有二子等，这些事确实非常令太后难堪，怕人泄露，便强指帝姬为伪。就连高宗也煞费苦心地把母亲被俘时年龄从三十八岁增高到四十八岁，就是为了让世人相信：年已五旬的老妇绝不可能会有那号事的。同时，高宗实奉母命杀人，容不得柔福辩解，终使柔福死于非命。当然，这一说法也没有什么真凭实据，且死无对证，所以柔福帝姬的真伪，只有上帝知道了。

第四章

宋高宗禅位宋太祖在斧声烛影中不明不白地死去，当时天下就传言“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一百余年后的南宋高宗果然绝后，且其近亲后裔大都已被金兵掳去，只得“广选艺祖之后宗子”。最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高宗居然在身体还相当强健的五十六岁盛年，主动让位给太祖之后的孝宗，这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绝对是罕见的。

靖康之难，金军押解了二帝及宋宫“妻孥三千余人，宗室男妇四千余人。贵戚男妇五千余人，诸色目三千余人，教坊三千余人”等北还，其中就包括赵构康王府的三位有名位的妻妾和五个女儿，其正妻邢氏已有身孕，结果在北迁的路上“以坠马损胎”。惟有妾潘氏也已妊娠，因无名位，住在开封自己家中，独得躲过这一劫，后回到赵构身边。赵构即位一个多月之时，即建炎元年(1127)六月，其子赵旉降生，潘氏也晋立为贤妃。

建炎三年(1129)，武将苗傅和刘正彦在杭州发动兵变，逼迫高宗逊位，立他的三岁幼子为帝。后韩世忠统兵历时一个月平定了叛乱，处苗、刘以磔刑。然而此事变最严重的后果是：赵构在此次事变中受惊吓而从此阳痿，才二十三岁就丧失了生育能力。不久，三岁太子也受惊吓而离开人世。在潘贤妃妊娠期间，正值金军破开封府前后，她成天提心吊胆，生活艰难，故所生之子先天不足，体弱多病。据说七月间一天，赵旉患病时，恰好有一宫女，不慎踢翻了一只鼎，“仆地有声，太子即惊搐不止”。高宗大怒，“命斩宫人于庑下”，然而仅过片刻，赵旉就停止了呼吸。两件事发生于同年，如此巧合，莫非天意。

而这时，年近六十的隆祐皇太后孟氏，突然“尝感异梦”，梦见太祖赵匡胤说：“只有把皇位传给我的子孙，国势才能有一线转机。”太后自二十四岁时被宋哲宗废黜，长期过着痛苦的幽居生活，不过也由此而没有被金兵北掳，也算不幸中的大幸，此时看到宋廷所遭劫难也时有所思，于是“密为高宗言之，高宗大悟”。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高宗也知道自己恐无希望有子嗣了，不如顺水

推舟，便说：“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孙不得享之，遭时多艰，零落可悯。朕若不法仁宗，为天下计，何以慰在天之灵。”(《宋史·孝宗纪》)于是同意“广选艺祖之后宗子”比自己低一辈者。

选太祖后裔比赵构低一辈者，就是在其“伯”字辈的宗室子弟中访求。据说太祖后裔香火还特别旺盛，其“伯”字辈约有一千六百余人，当然朝廷只从七岁以下儿童中遴选。最后选出儿童十人，再让高宗逐一审看。据说，一次审看两人，某次一瘦一胖两个孩子出场，让高宗仔细端详，突然有一只猫走过来，胖的为童心驱使，踢了猫一脚，高宗以为，胖孩“如此轻狂，怎能担当社稷重任”。于是把胖孩淘汰，而那位瘦的，就是后来的宋孝宗赵伯琮。最后，高宗选了两个孩子：赵伯琮和赵伯玖，时为绍兴二年(1132)。

两个孩子来到妃嫔面前，张婕妤用手一招，赵伯琮便向她的怀里扑去，高宗便命张婕妤养育伯琮，命吴才人养育伯玖。伯琮后赐名赵瑗，伯玖后赐名赵璩。赵瑗天资聪颖，博闻强记，异于常人，颇受赵构钟爱，还亲自教之读书。绍兴五年(1135)，封赵瑗为保庆军节度使、建国公，入资善堂上学，并诏：“建国公禄比皇子”。然而，高宗却不正式立赵瑗为皇太子，原因是对自己能否恢复生育能力，仍抱有一定的希冀，就是说心里还是不太情愿由这个太祖的后裔入继大统。绍兴八年(1138)，又封赵璩为节度使、吴国公，使两个孩子处于平列的地位。由此，高宗表明自己尚无立储之意，诸大臣提出不同意见，尤其左相赵鼎竭力反对，据理力争，高宗只得收回成命。然而到第二年，依然封赵璩为保大军节度使、崇国公，“赴资善堂听读，禄赐如建国公例”。

此时，右相秦桧进谗言道：“赵鼎欲立皇子，是谓陛下终无子也。宜待亲子，乃立。”此话说到高宗心里。后秦桧独相十八年，是赵瑗成长中最为艰难的岁月，时或与奸相产生嫌隙。直到秦桧病死，总算扫除了立皇储的一大障碍，高宗对自己的生育能力也已不抱希望。这时，赵瑗为普安郡王，赵璩为恩平郡王，两人都已长大成人，且才能不相上下，高宗一时踌躇不决，不知立谁为皇储。

最后灵机一动，决定用女色进行试探。他给两人各赐靓丽宫女十名，过一段时间后再将二十名宫女招回，进行身体检查。赵瑗听从老师

史浩谨慎对待的劝告，不近女色，所以其宫女依然是处女，后“完璧归赵”。而赵璩则采尽了秀色，十名宫女都已不是处女了。高宗并未将此事公布，但心中已有定数。此事载于周密《齐东野语·高宗立储》之中，令人不解的是：高宗本人就是一个荒淫好色之徒，他怎么会在这方面严格要求子嗣呢?其所用方法，以当时的科技条件能进行比较准确的鉴别吗?周密的记载会不会想立奇而作假呢?或只是采之于无法考据的道听途说?

绍兴三十年(1160)，高宗下诏：“以瑗为皇子，仍改赐名玮”，进封建王。任命赵璩为判大宗正事，置司于绍兴府，并改称皇侄。至此，拖延了近三十年的立诸问题，终于在宋高宗五十四岁时得到解决，时赵瑗已三十四岁。高宗教导皇子说：“须是读书，便知古今治乱，便不受人瞒。”实是要赵玮学习做帝王的机谋权术。

绍兴三十二年(1162)五月，大臣草拟立皇太子手诏进献，高宗下诏说：“朕以不德，躬履艰难，荷天地祖宗垂祐之休，获安大位三十有六年，忧劳万几，宵旰靡惮。属时多故，未能雍容释负，退养寿康。今边鄙粗宁，可遂初志。而皇子玮毓德允成，神器有托，朕心庶几焉，可立为皇太子。”又赐名昚，宋廷举办了一系列立皇太子的典礼。六月，高宗又出御笔说：“思欲释去重负，以介寿臧，蔽自朕心，亟决大计”。“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退处德寿宫，皇后称太上皇后。一应军国事，并听嗣君处分。朕以澹泊为心，颐神养志，岂不乐哉!”随后在紫宸殿行内禅之礼。皇太子先不肯接受，退到大殿一侧，经赵构再三勉谕，大臣一番苦劝，太子方才答应，接受了皇帝的宝座。

可见高宗的逊位完全出于自愿，无一丝一毫勉强的成分。年初，高宗曾带太子“扈跸”建康府(今江苏南京)，时值天寒，雨雪不止，父子骑马而行，“雨湿朝服，略不少顾”，而随从大臣中，反而多有乘轿者。五十六岁的高宗能骑马而行，说明其身体还相当强健。退位后，高宗至高寿八十一岁才去世，也足以说明当时的身体状况。在身体还相当健康，又处于五十多岁的中年，且国事平稳的情况下，国家最高统治者自动退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少有的现象。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宋高宗主动退位呢?

有人会说，其父宋徽宗还是在四十四岁时就禅位于钦宗了。那是什

么时候?那时金军重兵压境，国家危在旦夕，徽宗这才被迫撂担子。而高宗退位时南宋正当“边事寝宁”，去年金海陵王率军南侵，最后不但采石一战大败而退，且为部将所杀，金国政局动荡，而这时南宋正好可过略为安稳的日子。有人或说，乾隆也在晚年禅位于嘉庆。那时乾隆已多大年纪?八十五岁，这一年纪退位在某种程度上说，已是十分不得已。而宋高宗才五十六岁，且身体强健，确实令人有些不可思议。

王曾瑜《荒淫无道宋高宗》中说：“他固然贪恋皇帝的尊荣，却又苦于国事之‘忧勤’，故在逊位诏中还是说了一些实话。他愿意以太上皇的地位继续享受皇帝的尊荣。却又免于国事的‘忧勤’。他认为在‘边事寝宁’的形势下，正是自己‘释去重负’之机。”或者说，赵构做皇帝已做得身倦神疲，想罢脱这国事操劳之苦，而过太上皇的清闲日子，所以就把这副担子扔给了皇太子赵昚。

这样的解释似乎颇合情理，也符合赵构自己的说法。但是太上皇并没有如其禅位时宣称的那样，从此不问朝政，在深宫颐养天年，而是一到关键时刻，就会多方掣肘，出面干涉。如新任命的宰执必须到他那儿“入谢”，面听“圣训”，尤其在与金战、和问题及恢复大计方面，太上皇更是寸步不让，说明他对权力还是有些不舍。尤其是做皇帝真是如此“忧勤”辛苦，主动退位就犹如“释去重负”吗?那为什么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绝少有皇帝做出如此举动呢?要知道“皇帝”在中国是个什么概念?那就是别人都是奴才，只有他才是主子，整个“天下”都是属于他的。在一定意义上他可以为所欲为，可以驾驭任何人、任何财物。所以上述退位即可“释去重负”的解释，总让人觉得有点勉强，不怎么到位，然而又找不到更确当的原因。

“不孝”宋光宗退位的宋孝宗驾崩，作为儿子的当朝皇帝宋光宗，不仅在其父病重时不事探侍，甚至不肯主持父丧，这一绝对有悖于传统人伦礼制的罕见现象，就发生于南宋中期的皇帝家族之中。其原因人们众说纷纭，让后人猜测不透。

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六十三岁的宋孝宗禅位给四十三岁的儿子赵惇，是为宋光宗，又诏立光宗元妃李氏为皇后。孝宗于是为太上皇，养老于重华宫。光宗为表示对父王的尊敬和孝心，下诏“五日一朝重华

宫”，后又改为一月四朝。次年宋光宗改元“绍熙”，光宗初政就暴露出一些有违明君之德的嗜好，如对优伶歌舞乐此不疲，还饮宴无度等。开始两年，父子关系还较为正常，然而自绍熙二年(1191)十一月，光宗发病以后，光宗与孝宗之间的父子关系，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绍熙三年(1192)前后，我们还可时常看到“帝朝重华宫”，就是光宗去看望其父王宋孝宗的有关记载。问题似乎出在绍熙四年的九月，“重明节，百官上寿。侍从、两省请帝朝重华宫，不听。”此后即不断有大臣上疏，请帝朝重华宫，但都往往没有结果。如十月“秘书省官请朝重华宫，疏三上，不听。”后有二百多名太学生上书，“请朝重华，皆不报”。而后“帝将朝重华宫，复以疾不果”。直到十一月，“帝朝重华宫，都人大悦”。但好景不长，到绍熙五年(1194)的四月，光宗又旧病复发，不再朝重华宫。

尤其是五月，太上皇孝宗病危，宰相留正等请光宗去重华宫侍疾，光宗还是不同意，留正等“乃泣而出”。起居舍人彭龟年叩首苦谏，额血渍红了龙墀，也没能感动光宗。此后众大臣不断有人上书恳请或当面叩头请光宗朝重华宫，然都不果。丞相等甚至以罢职为手段力请，但一切努力都见效甚微，最后光宗只同意让皇子嘉王赵扩诣重华宫问疾。孝宗一直不见儿子侍疾，或显凄然不快，这时见孙子来问疾，才颇感安慰。孝宗弥留之际，丞相和众臣及皇子嘉王都泣请光宗去见父王最后一面，光宗还是不听。

六月，太上皇宋孝宗驾崩。而他的儿子、当朝天子宋光宗不仅在其父王病重时未去问候探视，此时也居然借口有病，不肯主持父丧，只下诏：“俟疾愈，过宫行礼。”大臣留正、赵汝愚率群臣拉住光宗泣谏，衣裾为裂也无济于事，以致连老皇帝的国丧都无法正常进行。朝臣们都手足无措，人心浮动，政局动荡。最后其祭奠大礼只得由年已八十的太皇太后(宋高宗后)代行主持，这在古代社会中是极为罕见的反常现象。

皇帝父子如此不和，使满朝文武为之不安，认为于社稷不利，于人伦有悖，一时朝野议论纷纷。宰相留正在一次上殿时扭伤了脚脖子，迷信自己流年不利，是不祥之兆，又面对如此棘手的政局，心里发慌，便称病辞职，很快逃回老家。知枢密院事赵汝愚根据众大臣要求立太子的

奏章，及光宗自己也有“历事岁久，念欲退闲”的御批，便主张光宗马上退闲，禅位给太子。在有关官员的建议下，赵汝愚遂请外戚官员韩侂胄助一臂之力。韩为太皇太后吴氏妹妹之子，便通过太监向太后转达了诸大臣的建议。经过劝说，太皇太后终于同意禅位之事。经过周密布置，在太后的主持下，光宗缺席的情况中，勉强禅位给太子赵扩，是为宋宁宗，而光宗被尊为太上皇。

那么，光宗为什么不肯探视重病的父亲，甚至不肯主持父丧，做出这等违背传统礼制的事来呢?为什么大伙又急匆匆要光宗退位，而立其皇子嘉王赵扩呢?要知道，光宗此时才四十八岁，正是能做一番事业的壮年，且其在位也仅仅六年。据有关史籍记载，原因也颇为纷杂，大致有如下几种：

一、光宗患有精神病。据《宋史·光宗本纪》诸书载，光宗的李皇后生性妒忌残忍，而光宗的嫔妃却越来越多。绍熙二年(1191)十一月，因黄贵妃有宠，李后无法容忍，便乘光宗离宫祭天的机会将黄妃杀害，再派人到祭天斋宫报告黄妃暴病以卒的消息。当时，光宗正在圜丘举行合祭天地的礼仪，一听此噩耗，光宗只是哭泣。事也凑巧，次日清晨祭天时发生火灾，差点把光宗烧伤。又突然风雨大作，礼坛黄烛尽灭，不能成祭天之礼而罢。诸多变故交织在一起，光宗内心深受打击，以为获罪于天，震惧而感疾，“噤不知人，张口呓言”(《朝野遣记》)，从此神经失常，后宫暗称之为“风(疯)皇”。主要表现是“帝自是不视朝”，一个月后才“始对辅臣于内殿”。第二年，还常常“帝有疾，不视朝”，三月份时，“帝疾稍愈，始御延和殿听政”。不过已经常目光呆滞，精神恍惚，时好时坏。其理智清醒时，还想做个明君，然而犯混的时候并不会少。主要是史籍对此事语焉不详，大臣也往往讳莫如深，所以光宗真正的病情，后人不得而知。

二、光宗惧内受制于李后。《宋史·光宗本纪》载，绍熙四年九月，光宗首次不朝重华宫过后的几天，在众臣的劝说下，“帝将朝重华宫，皇后止帝，中书舍人陈傅良引裾力谏，不听。”《齐东野语》也载，光宗将朝父王，百官班立以候，当光宗刚走出御屏，李后拉住皇帝的胳膊说：“天冷，官家再喝一杯酒。”百官侍卫都大惊失色。陈傅良马上趋前拉住龙袍大襟，请帝毋再入宫，并随上至御屏后。李后叱责道：“这里是

什么地方，你难道不要脑袋了吗!”傅良只得出来，遂大恸于殿下，李后派人责问：“此行为算是何礼?”傅良回答：“子谏父不听，则号泣随之。”李后更怒，遂传旨回宫。李后居然能够阻止光宗，不让他去看望父母，亦可见这位皇后的蛮横专权，那么李皇后为什么如此嫉恨公公呢?

《齐东野语》诸书载，李氏出身将门，天姿悍妒，飞扬跋扈，为太子妃时就容不得太子身边的宫女，一再到孝宗面前告状，孝宗让她学点后妃之德，并警告她：“如再争吵，宁可废掉你。”做皇后时更专擅朝政，骄奢淫逸，任人惟亲，政事腐败。且不敬婆婆谢太后，太后教训之，李后反而说：“我与皇帝是结发夫妻”。言外之意是说太后与孝宗不是结发夫妻，而是嫔妃册立的，太后告之孝宗，孝宗听了也大怒，屡加训斥，声称若不思悔改，有失皇后风范，定将废之。《朝野遣记》载，宋孝宗听说儿子得病，便亲临大内抚视，见光宗已神志不清，嘴中喃喃自语，不由十分担忧，且怒斥李皇后道：“皇上为社稷之重，你不好好照顾，使他发病如此。万一不能恢复，当族灭你李氏。”可见，李后与公公的矛盾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暗中与公公已势不两立。好几次，光宗准备去见父母，都被李后阻拦。可知光宗软弱多病，不能自主决事，往往听从李后之意。

三、光宗与孝宗父子有隙。《西湖志余》载，光宗在做太子的时候，年已过四十，很想父王早些内禅皇位，又难于当面说出口。便数次给太后提暗示，太后有些搞不懂，旁边有人就帮太子说：“是想娘娘帮太子去与皇帝说说。”太后这才听懂。一天，孝宗来东宫，太后从容说：“官家是否可传位与太子，自己也好早点休息取乐了。”孝宗却说：“我早就想这样做了，但太子年纪尚小，又没有经历，所以还不能传位给他。”太后也不能勉强，就对光宗把事情说了。光宗很不高兴，说：“我的头发都已白了，还拿我当小孩子。而当年爷爷早就传位给他了。”又过了几年，光宗才终于坐上皇帝宝座。

一天，光宗找太上皇要求立皇子嘉王赵扩为太子，不料孝宗对他说：“当初按例应立你二哥，因你英武像我，才越位立你。如今你二哥的儿子还在。”事情是这样的：光宗的大哥早夭，而孝宗这时立三儿子光宗，使二儿子郁郁病死，孝宗对二儿子怀有嫌疚心理，同时孝宗觉得嘉王“不慧”，而二儿子之子早慧，所以有意想改立。光宗在情理上不能反

驳父亲，内心却是老大的怨怼，父子关系出现无法弥合的裂痕。李后更是大为不满，不断在光宗面前进谗言，所以光宗对父王一直心有芥蒂。

四、有宦官从中挑拨其父子关系。《四朝闻见录》载，光宗即位，对近习宦官没有好感，一天甚至大发脾气，要取其中狡猾者的首级。太监们哭诉到孝宗那里，孝宗下旨："吾儿息怒。"光宗虽奉父旨，但心里更不快，意欲他日尽诛此辈。由是，宦官们面面相惧，商量如何离间三宫。不久，光宗发病，孝宗担忧，派人到处找秘方良药，得草泽大药丸一颗，据称可药到病除。孝宗想宣旨赐药，又怕李后可能会从中作梗，不许光宗服一间草药，便想等儿子来重华宫看望时，再当面让儿子服药。某宦官得知此事，便想阻止光宗吃药，便与李后说："太上皇只等皇帝过去，便会赐一种草药。"李后派人去打听，重华宫果然准备了大药丸。便拉着儿子嘉王找光宗哭诉，挑唆说："太上皇打算废掉你，给你准备了一丸药，好让你侄子早点即位。"使光宗相信其父准备了有毒的药丸，要他当场服下，所以再也不肯朝重华宫了。由是，光宗始终也没吃得此良药，病也没好，主要是为这些宦官和李后所误。

各种不同原因的说法，错综复杂的矛盾交织在一起，让人们无所适从。不过，其中光宗有病和李后跋扈或是主要原因，但光宗到底病到如何状态，李后又专权到什么程度，人们依然知之不详。宋朝的名臣包公为长嫂扼养宋代清官包拯由长嫂抚养长大的故事，在一些戏曲和民间不断流传。这不是历史事实，因为包拯是独子，然而包拯的次子确实由长嫂抚养长大，故事还相当感人。那么，包公的家庭情况到底有何秘密？其故事又是如何进行父子间演绎转换的呢？

包拯字希仁，是宋代杰出的政治家，祖籍庐州合肥(今属安徽)。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二十九岁时考中进士甲科，出知建昌、天水县，历任监察御史、工部员外郎、知谏院、河北转运使，在知开封府任上最为出名，迁御史中丞，拜三司使，官至枢密副使。一生秉性刚毅，处事严明，坚持惩恶扶善，深得百姓好评。

吉剧《包公陪情》和京剧《赤桑镇》等戏剧的内容，都描写说包公自小双亲早逝，由长嫂抚养长大，所以对嫂子的感情十分深厚，待嫂若母，或称嫂娘。又描述他的侄子包勉，进士及第，却为官奸猾，且贪赃

凌弱，罪恶累累。包公秉公执法，大义灭亲，铡了嫂娘的亲骨肉。事后，包公回家向嫂娘赔罪，嫂娘痛失亲子，责怪包拯不顾亲情，忘了当年的养育之恩，激愤中举剑欲砍包拯。包拯晓以大义，讲述了被害百姓的苦难，其一片忠心终于打动了嫂娘。嫂弟间捐弃私愤，和睦如初。

几百年来，民间一直流传着包公由长嫂抚养长大而待嫂如母的故事。然而，查遍有关史籍和论着，却找不到相关的记载。相反，有关传记资料表明，包拯其实是独子。其父包令仪，字肃之，曾进士及第，授朝散大夫，任尚书虞部员外郎，外放过地方官。后退居乡里，不再出仕，这位忠厚长者一生只有包拯一个儿子。包拯没有兄长，更何谈嫂子。《宋史·包拯传》载，包拯“举进士，除大理评事，出知建昌县，以父母皆老，辞不就。得监和州税，父母又不欲行，拯即解官归养。”就因为是独子，所以解官归养双老。“后数年，亲继亡，拯庐墓终丧，犹徘徊不忍去，里中父老数来劝勉，久之赴调。”可见其与父母感情笃厚，而没有什么嫂娘。那么包公由长嫂养大的故事难道完全是空穴来风?

经过有关史料的考察，包公的长媳崔氏实有前述故事中那位长嫂的风范。《宋史·包拯传》载：“初，有子名德，娶崔氏，通判潭州，卒，崔守死不更嫁。拯尝出其媵，在父母家生子，崔密抚其母，使谨视之。繶死后，取媵子归，名曰绶。”再查有关资料显示，包拯四十六岁时，长子包德二十余岁就病故，长媳崔氏守寡。包拯六十岁时，把一位已经怀孕的媵妾孙氏遣送回家，崔氏对她暗中妥善照顾，不久生一男孩，崔氏把他接回家中，即包拯的次子包绶。合肥包拯墓碑铭刻有：“子繶，太常寺太祝，先公卒。绶，五岁儿也。”可见，包拯在嘉祐七年(1062)病逝时六十四岁，而次子包绶才五岁。

包拯墓附葬区内其长子包繶与长媳崔氏的合葬墓碑铭，有这样一段记载：“(包拯)晚得幼子绶，其母出，节妇慈养之为己子”，“当姑夫人捐馆舍时，绶犹孩童，节妇迎师教导之，以至成人，为择取良妇。绶事节妇如母，复立族子永年，为祝史嗣”。在次子包绶与次媳文氏的合葬墓碑铭中也记载说：“公有寡嫂崔氏，素以节义闻，公以母礼事之。”这些记载都告诉我们，包拯的长媳崔氏把包公媵妾所生之子即年幼的包绶领回家中，精心抚育，请师教导，为择良妇，犹如自己儿子。包绶与寡嫂的感情也很深厚，就像母子一样。

再查《庐州府志》等资料，“节妇”崔氏的事迹的确颇为感人。崔氏嫁到包府第二年，其丈夫就得暴病去世了。才二十一岁的崔氏生下一遗腹子，名文辅。包拯见媳妇如此年轻，意思让她改嫁，并使左右去劝劝媳妇。崔氏哭着对包拯说：“公公为天下名臣，媳妇能在家干些粗活，服侍公婆，已很满足了。我生为包妇，死为包鬼，誓不改嫁。”不幸，其子文辅养到五岁时夭亡，从此崔氏就一心侍奉公婆。后来探得公公媵妾有子，便暗中妥善照顾，后抱回精心抚养。包拯病逝时，次子包绶才五岁，婆婆也已年老多病，寡居多年的崔氏就完全担负起对弟弟包绶的养育之责任。

崔氏的母亲吕氏闻听包拯去世，就从家乡湖北赶来包家，欲劝女儿改嫁。崔氏说：“倘若要改嫁，也不会等到今天了。”吕氏说：“丧夫守子，子死你守谁呢?如今公公也去世了，应该改嫁了。”崔氏答道：“过去没有改嫁，并不单单是为了儿子。如今公公去世了，婆婆年老体弱，又有小叔年幼如儿，其门户待我而立，难道忍心离去吗!”吕氏听了很不高兴，甚至以死相威胁。崔氏哭着说：“母亲远地而来，义不当使母独自回归，儿可陪同回荆州。倘再以不义相迫，必自绝而以尸还包氏。”母女俩回家乡后，吕氏见女儿决心已定，只能将女儿再送还包家，崔氏以守节终。此事后来还惊动了朝廷，追封崔氏为永嘉郡君，由苏轼亲撰旌表，褒奖其门闾。

这一感人的故事中，埋藏着一个耐人寻味的谜：就是包拯六十岁的时候，为什么要把其怀孕的媵妾孙氏遣送回家?当时包拯的长子已过世十余年，年将老而膝下无子，是非常寂寞和苦恼的事，所以此时应是包家盼子心切之际，而其媵妾这时能怀孕应非常值得庆幸，包家应该非常高兴才对。而这时包拯却将其遣送回家，实际上是不承认这个儿子。同时，孙氏生子后，据说包拯仍十分歧视，且在与皇帝的交谈中还声称：“臣年六十，且无子”(《宋史·包拯传》原为“臣年七十”)，也是不认这个儿子的铁证。此外，崔氏是偷偷打听到孙氏生子，且暗中加以照顾，估计是包拯去世后，才力排众议把这个弟弟接到家中抚育。这样，人们或有权利怀疑包绶是否是包拯的亲子?否则就很难理解以公正严明著称的包拯的这一行为。

剩下的另一个谜是：包拯长媳崔氏与小叔包绶的故事，怎么会演变

成包拯由长嫂抚养长大的故事?就是说这一子冠父戴的情况是如何发生的?

有学者认为，可能与包氏家族墓碑的记载有关。包拯的墓碑其称呼是：“宋枢密副使包孝肃公拯之墓”；长子包德与崔氏合葬墓碑的称呼是：“宋奉义郎潭州通判包公繶德节妇永嘉郡君崔氏之墓”；次子包绶与文氏合葬墓碑的称呼是：“宋朝奉义郎潭州通判包公繶蓬莱县君文氏之墓”。“公”是古代对男子的一种尊称，“包公”则是人们对宋代清官包拯的专称，然而上述包氏父子墓碑上都称“包公”，人们一般只知道清官包拯，所以后人有可能将这几位“包公”的事纠缠在一起，都加在清官包拯的头上，以讹传讹，由此产生出包拯由长嫂抚养长大的故事。这样的解释，也只能是一种猜测。

包公的墓地包公墓葬，史籍记载有两处：安徽合肥和河南巩县。二说均有可靠的史料依据，和地方上的实际墓冢。如今合肥的包拯墓葬经过考古发掘，已得到专家的确认，那么巩县宋陵中的那个墓冢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据南宋淮南西路安抚司干办公事林至撰写的《庆元重修孝肃包公墓记》，包公墓在安徽合肥市，“合肥，公之乡里也，中更兵火，子孙流离，故宅废为民居，独庙祀存焉。今去城十五里，所谓东原村者，公之墓也”。包公葬后的百余年间，经历了战火和荒顿的岁月，到庆元年间，地方官曾加以重修。另外，《大明一统志》、《合肥县志》和《包氏家谱》等文献，也都清楚记载，包公墓在安徽合肥。

然而据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修的《巩县志》明确记载，包拯墓位于县西宋陵之中。清代顺治以后各朝的《河南府志》皆承旧说。到实地考察，包公墓坐落在河南巩县宋真宗永定陵和宋仁宗永昭陵之间，离真宗刘、杨二后陵只半公里，是一座高约五米的墓冢，封土扁圆，直径有十余米，墓前尚有望柱一坐，石虎两个，石羊一个，均为北宋风格。规模上看，确是座北宋高级官员的墓葬。如今墓前还立有清代石碑一通，高二米，正中楷书“宋丞相包孝肃墓”。冢大碑高，气象威严。

1973年，因合肥钢厂扩建的需要，对合肥市东郊大兴乡双圩村的包

拯及其家族墓地进行了全面清理和发掘。历时四个月，发掘出包拯的一号墓，实为迁葬墓，墓中有一具基本完整的男性骨架，据鉴定年龄在四十岁以上，与包公情况大致相符。出土的墓志石铭有三千多字，由当时的枢密副使吴奎撰写，确凿记述了包拯的生平，说他策论国事能高瞻远瞩，主张“薄赋敛、宽力役、救灾患”，加强市场管理，增益国库收入。以大义为重，不惧贪官豪强，敢于查办权贵。重视调查研究，执法如山，自身廉洁清白，不谋私利，颇得民众的尊敬和赞扬。称他“其声烈表暴天下之耳目。虽外夷亦服其重名。朝廷士大夫达于远方学者，皆不以其官称，呼之为‘公’。”可知包拯生前已被人们尊称“包公”。

包公墓还有包拯长子包德与崔氏的夫妇合葬二号墓；长孙包永年的三号墓，他是崔氏的继子；包拯次子包绶夫妇合葬的四号墓。及南宋以来一直被人当作包公墓膜拜的五号墓，实为包拯妻室董氏之墓。南宋庆元五年(1199)重修时，把包拯之妻董氏的五号墓当作包公墓，供人长期祭奠，因此民间流传着“包拯墓是假的”之说法。最后，根据当地老人追忆的祖辈传言，在墓地的最北端，意外地发掘出包公原葬的六号墓，还存有石板和东西残墓壁，其中的陪葬木俑“十二时神”，是确定包拯墓的重要物证。墓地已在南宋初年被金兵所破坏，棺骨迁至一号墓重葬，原墓废为耕地。

此外还有一个疑冢，就是在墓地中轴线的西南部，有较大的封土堆，高约四米，底径十米，布局均称，整个外形要大于包拯夫妇的迁葬墓。从这个封土堆的地表往下深挖，都是一色的生土，没有坑位，可知是个典型的“疑冢”。令人感兴趣的是：包公墓为什么要设此“疑冢”?它是什么时候修建的?

总之，在一块墓地上，出现包拯的原葬墓、迁葬墓、以假乱真的五号墓及张冠李戴之疑冢，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这在相关墓址的考古发掘上也是罕见的，为什么包公墓要建得如此神秘呢?也不免有一些混乱。当然，包氏族墓中出土的珍贵文物，为研究宋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也为史学界补充和修正有关史实，进一步研究有关问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如今合肥墓地从各方面考察，都已能够确认是包拯之墓。其大型石

室墓的规格，似乎超出了《宋史·礼志》的有关规定，也足见墓主生前受到朝廷的特别恩宠。其出土的洋洋千言的墓志，也同样毫无疑问地诉说着此地包公墓的由来。尤其是包拯遗骨三十五块，专家鉴定已予以确认，并移葬于合肥新建的包公陵墓。至此，似乎千年的包公墓址之谜已经解开，包公墓应在安徽合肥市的东郊。

但是，巩县的包公墓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它修于何时?为什么要建这个墓?它与合肥的包公墓是否有什么关系?尤其是里面到底埋葬着什么?这一连串的疑问，还是难以回答。据说此墓已经被盗过，盗墓贼说墓中没有砖石、棺骨，也没有盗到什么东西，这可信吗?从最早明嘉靖三十四年修的《巩县志》记载来看，至少明代中叶巩县宋陵就已存在这个包公墓，到如今也至少经历了四五百年，但元、明两代的有关史籍对此均无说明。由于合肥包公墓园考古发掘中仍出现一些较为混乱的情况，所以至今还有学者坚持包公真正的墓地是陪葬宋皇陵的巩县包公墓。

如果说此墓确为宋代陪葬大臣所建，也有一些问题弄不清楚。巩县的包公墓离宋仁宗的永昭陵远，而离宋真宗的永定陵近，有的史书说是“陪葬真宗陵”。但是，包公的全部政治活动却都在宋仁宗时代，为什么要他陪葬宋真宗呢?这基本违反了中国帝陵中大臣陪葬的一般规则。于是有学者推测，包公墓中埋葬的，可能是另一位陪葬真宗的大臣，由于年月长久，原大臣的名字被遗忘了，就附会于包拯。也有学者指出，包拯死于开封，到最后定葬，中间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漫长时间，猜想可能当时要求陪葬帝陵而安放于巩县一段日子，最终仍迁葬合肥，但在巩县留下一个衣冠冢。人们出于对包拯的敬意，不忍心废弃，并进一步修缮，使之符合包公的身份，从而使包公出现两个墓，并让人真假难辨。

巩县包公墓的真相究竟如何?只有等待考古的实地发掘，才能给我们一个确实的答案。

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是宋代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连列宁也盛赞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然而其变法的社会作用到底如何?是对人民有利的进步事业，还是给人民带来灾难的倒退?其从变法当时直到今天，非但没有定论，且有关学者的评价，往往大相径庭，或

全面肯定，或基本否定。问题是这些迥然不同的观点都能毫不费力地找到足够的证据，洋洋洒洒地写成论着，让人看后无所适从，真可谓中国古代社会重大事件中一直无法猜透的谜。

宋神宗刚即位，就有大臣向他奏报：仁宗朝宋夏战争以来，徵调财力，动用国库，百年之积，惟存空簿。其实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三冗”：冗官、冗兵、冗费。庞大的官僚机构和不断扩大的军队，还有就是每年必须向辽、夏支付的岁币。庆历之后，每年的财政赤字在三百万贯左右，到治平年间，扩大到一千五百余万贯。王安石当年在度支判官任上，就向仁宗上过要进行变法的万言书，没有引起朝廷的重视。王安石在做地方官的日子里，其名声得到不断提升，天下舆论大有“安石不起，奈百姓何”的企盼。

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相)，希望他能重新调整国家有关的统治政策，拿出一些实实在在的措施，辅佐自己完成富国强兵的伟业。很快，朝廷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主持变法的机构，由王安石领导，筹划和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法规和政策，揭开了这场变法的大幕。然而随着变法的扩大和深入，不同意见的争论也日趋激烈，新旧党派的斗争也日趋白热化。有关新法的社会作用到底如何，各种意见众说纷纭。以下就一些重要新法的内容和人们的不同评估，略作介绍。

一是均输法，熙宁二年七月颁行。目的在调整各地物资的供求关系，避免不必要的发运以节省国家开支，减少“支移”、“折变”诸税种以减轻农民负担，稳定物货价格和打击不法商贩。具体办法是：朝廷拨出一定数量的钱粮作为发运司周转经费，发运司则根据各地物资的实际情况，按“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机动购办相关物资。

肯定派认为，此法改变了各地物资供求关系紊乱的局面，节省了发运司的大量运费，减少了运输中物资的损耗，并相对减轻了农民“折变”税种的负担，平稳物价的同时也限制了大商人的投机操作。此后，楚、泗等州仓库经常储积的粮米不下数千万石，每年运到京城的粮食亦有六百多万石，使京城物资供应得到满足。

否定派认为，这一新法对官府发运司的工作可能会有所改善，但对人民“支移”、“折变”诸税种负担是否有所减轻，则很难说清楚，有时甚至还会加重。如在颁布该法一年后，朝廷按照王安石等人的建议，要求将东南三分之一的漕运米，约二百万石米变易为二百万缗钱，并下令发运司在诸路米贵处折变为钱，这自然加重了有关地区民户的“折变”负担，并造成当地“钱荒”，使得米价一路飙升，如江南西路去年米价每斗约四十五文，今年却增至九十文以上，人民的负担显然增加一倍以上。它到底给国家节省了多少乱运物资的开支?为农民减轻了多少负担?恐怕效果甚微，所以均输法在实行两年后就无声无息地匿迹了。

二是青苗法，也称常平法，熙宁二年九月颁行。目的在缓和佃农或自耕农在青黄不接和天灾人祸之时遭受高利贷盘剥后的贫困化趋势，抑制豪民的高利贷经营。具体办法是：由官府将地方常平仓中的钱粮贷给贫困农户，秋收后连本带百分之二三十的利息随同二税一起缴还。因为官府仓库中也有各种损耗，所以需收取二分至三分的利息。由于是一年二次贷款，所以实际收取的利息率达四分至六分。同时规定“不愿请者，不得抑配”。然而事实上，各地在执行此法时，大都按户等高低强行抑配借贷数额。

肯定派认为，此法压制了豪民高利贷的盘剥，尤其是在灾年，减少了农民贫困破产而被豪强兼并的情况，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青苗钱的抑配，主要是针对乡村上户，其使豪强兼并之家也付出一定的利息，而对乡村下户为害甚小。年息为百分之四十的青苗钱，比之百分之一百到三百的民间高利贷，是相对较低的，一般农民愿意借贷，所以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青苗法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官府也由此获得一定的利息收入。

否定派认为，问题在官府把持的青苗借贷其目的主要在多收息钱，所以在实际操作时会产生种种的弊端。如有的地方名为二分之息，实收八分之息。有的地方“吏缘为奸至倍息”，如陕西诸地贷陈米一石，秋后须还一石八斗七升。各地因人因时而各不相同，但大大高于二三分，即年利高于四分至六分息的情况，应该是相当普遍的。由此，官府发放的青苗钱又比豪民的高利贷好多少呢?这样，许多贫民下户借贷青苗钱，也无异于饮鸩止渴，更何况很多地区是采取按户等派给的方式在发放，

就是说官府事实上在利用高利贷对民间进行搜括。此法后演变为一种赋税，叫青苗钱，持续征收到北宋末年。其中到底在多少程度上抑制了豪民的高利贷盘剥?很难有一个较为准确的估计，但官府从中获得大利，是无须赘论的。单以熙宁六年(1073)为例，青苗利息就达二百九十二万贯，为数可观。青苗法颁行令上所谓：“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的说法，绝对是一种欺骗。

三是农田水利法，也称农田利害条约，熙宁二年十一月颁行。目的在兴修水利，开垦农田，提高农业生产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具体办法是：各地对需要修建的水利工程，各阶层的人都能向官府提出实施办法和建议。经官府调查商议，确实可行者，绘制成图，呈报上级官府批准。小者州县自行解决，私人也能出钱兴建，大者奏报朝廷，官府集资施工。凡提出合理建议或出钱募工兴建者，官府都给予奖励。

肯定派认为，此法令积极推动了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包括湖陂塘库的兴建，河道的疏浚(如汴水、漳河、蔡水等颇有成效)，水田和淤田面积的扩大，荒地的开垦等，几年中共兴修“水利田”一万多处，灌溉农田数千万亩，许多地区都由此在凶年减轻了灾情。如漳河的疏浚，使周围诸县二三十年来的水灾得以免除，数千顷土地获得丰收。这一事实体现出人民的创造性智慧及其辛勤劳动的成果，且丰裕了民财，无疑值得肯定。

否定派认为，这一新法的实行，单从数字统计上看，似乎成果累累。但其中有相当的虚假成分，有些工程实际在仁宗、英宗时期就已完成；有些工程实为劳民伤财之举；有些工程显然就是地方官在虚报业绩。熙宁七年，就有臣僚上奏，认为其“颇有不实，互相隐蔽”，主张进行察验，对其不实之人“重置于法，以戒欺罔”，但朝廷在这方面并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其中多少确实是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工程，多少是劳民伤财的虚假工程?也只能是一个无法说清的谜。如疏浚黄河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用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而没有什么成效，不久就河道大决，水分二派，灾情严重。许多荒地水田的开辟，还破坏了当地的生态平衡，如在一些地方围湖造田，“古陂废，堰多为侧近冒耕”，使有关湖泊几乎消失，给后代埋下生态隐患。

四是免役法，也称募役法或雇役法，自熙宁二年开始讨论试行，到熙宁四年十月才正式颁行。目的是免除乡村主户轮流负担的差役，如主管官物供给和运输的衙前，课督赋税的里正、户长、乡书手，还有耆长、弓手、壮丁、承符等州县职役，其职责如有缺失，要承担赔偿责任，重役户往往倾家荡产，最为扰民。具体办法是：乡村主户按户等缴纳免役钱，原不需服役的官户、坊郭户、未成丁户、单丁户、女户、寺观户等也按户等半数出助役钱。为防灾年役钱征收困难，另加征二成，称免役宽剩钱。然后募人充役，给以雇值。

肯定派认为，此法用交货币的办法代替了大部分差役，从而使劳役制进一步缩小范围，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一般按户等高低和产业多少缴纳役钱的做法，也使拥有大量田产的豪强大户必须多负担一些，是抑制豪强兼并的一个重要手段。农村下户不出役钱，这在开封府界内诸县执行较好，其他州县执行不利，但认为所有下户都出役钱，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总的来说，它对一般中等农户是很有利的，国家也获得一定利益，除有关事务通过雇役完成外，其役钱的剩余部分也成为国库中一笔重大收入。

否定派认为，按理说差役主要是乡村上户的事，现改为收钱雇役，是不应向乡村下户(四、五等户)征收免役钱的。王安石发布的第一道免役令也是明确规定四、五等户不纳钱。可是在向全国推行时，第二道免役令中就已确定乡村下户须纳役钱。此后又根据家中的产业或税收多少摊派免役钱，下户不得免除而被普遍增加了役钱的负担。甚至在有些地区，第一、二等户依仗权势，输免役钱少于第四、五等户。同时。免役钱的征收与支出，剩余率几达百分之三十以上，就是说官府每年在其中可得三百余万贯的净收入。此外，所谓“免役宽剩钱”的征收也为数不小，如熙宁年间，成都府路达六七百万贯之巨。尤其是实行保甲法后，既征免役钱，又令保丁服有关差役，双倍盘剥，无耻之极(详保甲法)。以后，免役钱成为常赋，一直持续到南宋末年，且数额不少，成为两税之外的乡村重要赋税之一。

五是保甲法，熙宁三年十月颁行。目的是兵民合一，既省养兵之费，又能防范乱民暴动。具体办法是：相邻十家为一小保，设保长；十小保为一大保，设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设都副保正各一人。每户

两丁抽一，称为保丁，组织起来训练武艺，巡查值夜“除盗”，维护地方治安。后隶兵部，听从枢密院指挥，集中训练，成为民兵组织。同时，保内有人犯法，知情不报，伍保连坐，严加治罪。

肯定派认为，此法实行后，对地方治安起到很好的作用，“盗贼”比过去十减七八；国家军力也有所增强，全部保甲民兵总数达六百九十余万人，主要是沿边地区组成义勇军，以“团教法”进行训练，也有数十万之众，成为禁军的重要辅助力量，有的还代替巡检司兵士巡逻。它有利于对禁军的整顿和减裁，节省国家军费开支，也增加了国防力量，所以此法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

否定派认为，实行保甲法后，官府干脆取消耆长、户长、壮丁等差役，用保甲法中之保丁变相服役。此种做法，就连宋神宗都感到说不过去，曾谓：“已令出钱免役，又却令保丁催税，失信于百姓。”然而王安石却强辩道：保丁“催税不过二十余家，于人无所苦。”事实上，保丁多由乡村下户充当，从上户那里往往催不到税，以至破产填赔，卖鬻子女。后来哲宗恢复免役法时，不得不改由上户充当的保长催税。由是，乡村主户既出免役钱，又服差役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南宋末年。另外，所谓“兵农合一”，这部分恢复征兵的做法，更使老百姓加重了负担。甚至有些地区，保甲为盗，百十成群，反而使地方不安。尤其是伍保连坐，实用严酷手段加强对民众的控制，是非常反动的。

六是市易法，熙宁五年三月颁行。目的是抑制富商对市场的垄断和对物价的操纵，改由官府垄断市场，平衡物价。经商取利，国库增收。具体办法是：在京城设立都市易司，各州、县大都设立市易务，形成全国市易官商经营体系，朝廷拨给本钱，平价收购商品，在垄断货源的条件下经商取利，包括贸迁物货、长途贩易、抵当业、地区茶、盐的专卖、边境蕃汉贸易，也向商人发放贷款或赊贷货物，收取年息二分的利息。

肯定派认为，市易法抑制兼并，打击了大商人垄断资本，平物价，通有无，有利于中小商人的经营，使得市场进一步繁荣。市易务的经营也获得大量赢利，增加了国库的收入。所以其立法宗旨是进步的，此法的实施过程虽有弊病，也有一定成效。

否定派认为，市易务利用权势垄断市场，套购倒卖，左右物价，苛征息钱、税钱，违法抑配，敲诈勒索，使用五花八门的超经济强制手段，严重阻碍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是不折不扣的倒行逆施。市易务不但自己经营混乱，贪污腐败，毫无成果，同时还妨碍了国家其他方面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转，如使得商税大亏、房廊日空、市舶司亏损等。尤其是市易务公开“夺商之利，一切归于公上而专之”，就连中小商人向市易务赊贷钱货也无异于饮鸩止渴，使大批商人都因负债而破产，“兼并之家以至自来开店停客之人，并牙人又皆失职”，沉重打击民间工商业，加剧了社会矛盾和王朝的衰败。

七是免行法，熙宁六年八月颁行。宋代宫廷、官府所需物资，大都通过科配制度向有关行业强行摊派，只象征性地支付部分钱款，甚或白拿，行户们苦于应付，其称为“当行”。这年，开封肉行派代表向官府提议缴纳一定数额的免行钱，便不再向官府供应肉，即免除相关的当行摊派。其他行业也纷纷效仿，提出纳钱免役的办法。市易务同意了这一做法，制定了所谓的“免行条贯”，规定各行业可根据其收入，大体上将行户分为三等，每月缴纳免行钱后免除行户对官府的供应。

肯定派认为，原来每年行人为供官不给，常遭到官府的迫害。以免行钱代替当行，将商行从为官府“当行”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显然在商业经营中缩小了国家劳役制的范围，这变革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否定派认为，表面上看，好像行户通过交纳免行钱就摆脱了官府的科索之苦，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把官府的非法勒索给合法化了，因为官府的科索摊派本来就是一种非法掠夺。此法实行后，官府又贪得无厌，普收广征，且层层加码，就连贫寒小户也不放过，致使王安石都认为：“当立法限定钱数，不许更增。”可见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后来糠米行等又提出：“乞不纳钱，依旧祗应”。就是说交了免行钱，也并不比科索好多少，那还不如不交了。而官府更是变本加厉地掠夺，造成“米行有当旬头曹斌者，经须索糯米五百石不能供至自雉经死”的惨剧。北宋后期至南宋前期，往往是收了免行钱，而官府科索依旧，免行钱遂成为一种杂税。甚至金兵入侵中原都以“不签汝为军，不取汝免行钱”为口号，足见免行钱已为害到何种程度。可以说，在工商业者没有取得任何人身基本权利的条件下，此类向统治者交钱免役的乞求，常常并不能得到多少

实际效果。

八是方田均税法，熙宁五年八月颁行。目的是通过丈量耕地，清查出隐瞒的田亩与偷漏的税收。以全国耕地数而言，真宗时达五百二十余万顷，到仁宗后期竟只有二百二十余万顷，就是说各地至少隐瞒田亩达三百余万顷，其所偷漏的税收数目就相当可观。具体办法是:在每年农闲时丈量所有耕地，各县以千步见方为一丈量单位，登记造册，丈量完毕后，揭以示民，按土质定为五等，均定税额高低。

肯定派认为，此法推行于开封、京东、河北、陕西、河东五路，共清丈出二百四十八万余顷的耕地，约占全国征税田亩的百分之五十四，元丰五年全国耕地数为四百六十余万顷。有力打击了隐田漏税的豪强地主，也使“贫弱地薄而税重”的不合理现象得到一定的纠正，使负担有所均平。并准许民户使用山林陂塘而不加税，鼓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国家田税的正常征收。

否定派认为，此法只限于宋朝北部一些地区，并没有在全国铺开，在这部分地区就能清丈出二百四十八万余顷耕地，是难以令人凭信的。依靠封建官僚机构是不可能医治地主与农民赋税不均之痼疾的，在丈量过程中不法官吏和豪强地主往往徇私舞弊。如“每方差大甲头二人，以本土上户充”，清查地主的瞒田隐税，却令地主自己负责，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讽刺。法令规定官员不得乘机增税，它恰好说明增税的势不可免。一些记载表明。不少地区将原所免税项目重新加入旧籍，以增税额。甚至一些地区乘机增加两税的情况也层出不穷，结果反而使阶级矛盾尖锐化。总之，量地均税的初衷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

九是保马法，熙宁五年五月颁行。目的是通过民间养马，改变朝廷牧马监养马少，占地多，花费大的局面；以给军队输送更多的战马。因为与契丹、西夏作战的主要是骑兵，而战马是关键所在。具体办法是：在开封府界和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其义勇保甲凡自愿养马者，每户一匹(有物力养马二匹者听)，由官府配给或给钱自买。开封府界保马户免去原纳束草，并补贴钱数，其他五路保马户免去每年折变和沿纳等杂税。三等户以上养马户十户为一保，马死独自赔偿；四五等户养马户十户为一社，马死同社诸户共同按马价之半赔偿。

肯定派认为，此法节省了官府的开支，“募民牧养，(岁)可省杂费八万多缗”。同时也降低了战马的死亡率，又可训练保甲骑战武艺，一举数得。主要是这一养马办法，可给军队提供更多的战马，适应了当时迫切的军事需要，是值得肯定的。

否定派认为，此法的基本精神是：罢废牧马监，赋牧地与民而敛租课，散国马于编户而责养殖。将牧地出租，收取高额地租，受害的是一般乡村下户和客户。将官马分配给民户饲养，按当时官府的估算，“官养一马，岁为钱二十七千，民间养马才免折变缘纳钱十四千四百”，只及官养马费用的一半，自然大大加重民户的负担，所以往往强行抑配。马死，民户要赔；生马驹，却须上缴。保甲有马，平时也可习骑战，袭逐盗贼。官府可谓一举数得，而民户则被加重了剥削。

十是学校科举改革。熙宁四年二月，颁行科举新法，考试取消诗赋等内容，改为考儒家经义和时务策论。十月颁行三舍法，由州县考选入学的太学生分为三等，初入学者为外舍生，经考试合格者为内舍生，限二百人，再经考试，选一百人为上舍生，上舍生考试分三等，上等者可以不经科举直接授官。太学增设直讲十员，每两人主讲一经。又令诸州置学，赐予学田，考核学官，掀起办学热潮，史称“熙宁兴学”。熙宁八年二月，颁行《三经新义》，作为学生的必读教材，取士的惟一标准。

肯定派认为，旧有的科举取士办法使人闭门学作诗赋，而不讲求治理国家之大计，已不能满足统治者的要求。这一改革纠正过去科举和教育中的弊端，选拔一些通经术、明时务的人才为其统治服务，其中大力吸收变法的支持者，有利于变法的开展。整顿学校教育亦是整顿官僚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时也促进了当时的教育办学的发展，太学之外，还创建了武学、律学和医学，以适应国家对各方面人才的需求。

否定派认为，从封建王朝取士的角度看，科举考试用儒家经义自然胜于用诗赋。但如果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看，这一改变并不能说是进步。苏轼当时就指出，自唐朝以来，以诗赋考试而取得人才很多，没有废除的必要，“专取策论而罢诗赋”和“罢经生朴学、不用墨帖而考大义”的做法，较过去的害处更大。自宋以降，经学取士，遂成统治者加强思想文化统治，厉行君主专制的重要法宝，而王安石正是始作俑者。此后，

统治者承袭其衣钵，用功名利禄为诱饵，将千百万士人的聪明才智，禁锢于儒学的牢笼之中。王安石与其子王雱合撰的《三经新义》，视其他儒学流派为异端，实行王学思想的垄断，学生要入仕为官只能做《三经新义》的应声虫，实乃进一步禁锢思想的反动措施。

最后是对变法历史作用的整体评价。

肯定派认为，变法对宋代国家财政方面的整顿是有利的，扩大了税收来源，朝廷中央与地方州县的库藏丰盈，从根本上扭转了国家财政困难的局面。教育与选拔制度的改革，网罗了一批支持变法的人才，相应扩大了封建统治的基础。军事方面的改革，有效地加强了西北边防，又镇压了各地农民的暴动，巩固了专制主义的封建王朝的统治。可以说，变法基本达到了它“富国强兵”的目的，是给大宋王朝注射了一强心针。

否定派认为，变法加强了对贫民下户的搜括和镇压，破坏了私营商业经济的原有成果，在文化教育方面也更为走向专制。如果说农田水利法在一定程度上起过多少作用，也只是其变法的次要方面。总之，富国有术，但强兵无方。由于军政腐败，其将兵法又何尝能训练出什么强兵锐士，当时的宋夏战争，宋军是失败多于小胜，其军事能力没有出现由弱变强的转变。而此富国之术也无非是采用超经济强制手段的一种掠夺，而且是竭泽而渔式的掠夺。增税的结果，也使农民起义高涨，甚至连保丁们也纷纷起来反抗。最后，变法由蔡京诸奸臣继续执行，只是加速了北宋王朝的亡国行程。

有学者深刻指出：这次改革主要是一种应对危机的政治冲动，而不是一种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改革几乎没有触及政治领域，主要局限在经济、军事和教育方面，而经济领域更是其重中之重。变法的真正兴奋点是富国，绝不是富民，其成效是国家财政明显好转，但这主要是加重赋税和大力搜括的结果，并不是依靠发展生产所取得的成果，所以其富国是创建在穷民的基础之上。随着统治集团的日益腐败，这样的变法只能走向失败。

人们对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作出如此截然相反的判定，真让人有些目瞪口呆。当然也有一些折中分论的评价，但也并不能解决多少问

题。那么，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作用其事实到底如何呢?看来任何人想做一个盖棺论定的评判，都是不自量力的，它确实已成为一个历久弥新的史家难题，一个难以解开的历史之谜。

第五章

王安石为人之谜既然王安石做的事情如此难下定论，那么他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可以说，对王安石的为人，包括其政治生活、思想作风、社会交游、个性特征、生活情趣等方面，人们同样众说纷纭，个人形象相当复杂，褒贬毁誉参半，难以准确评判。

《墨客挥犀》说，王安石“性酷嗜书，虽寝食间，手不释卷”。《宋史·王安石传》说：“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可以说，王安石是一位颇有天赋的读书人，其嗜书之痴，运笔之神，令人慨叹。“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并胸有大志，决心不做俗儒，学以致用，要在政治上干出一番事业来。

二十二岁考中进士，签书淮南判官。数年后任鄞县知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似也颇有政绩，迁知常州，改江南东路提点刑狱，又调三司度支判官。上仁宗皇帝万言《言事书》，直指朝政弊端，提出一些初步的改良方案，表现出一个朝廷官员的责任心。

王安石不迩声色，慷慨钱财。《邵氏闻见录》载有这样一件事：王安石官知制诰，吴夫人为他买了一妾。安石见了，问道：“你是干什么的?”其妾回答：“夫人要我来服侍大人左右。”安石又问：“你从何处来?”妾说：“我丈夫原是一低级军官，在运输粮草的过程中，船翻粮沉，家资全给没收还不够赔偿，就把我给卖了以作抵偿。”安石听了颇为动容，就问：“夫人用多少钱买了你?”答：“九十万。”安石把夫人叫来，令将此女送回，使其夫妇如初，还送给一些钱财，让其渡过难关。

王安石做宰相后，仍清廉朴实，生活简约。《独醒杂志》记载了一个颇为生动的故事：王安石任宰相的时候，其儿女亲家萧氏至京要来参谒，安石约其来府吃饭。第二天，萧氏整装盛服而往，以为相府必然盛宴招待。入府坐定，“果蔬皆不具，其人已心怪之”。日过午，萧氏已觉饥饿，但并没有开饭的迹象，又不敢离去。过了好一会，才上了胡饼两

枚，猪肉四片，酒一杯。很快供饭，也只加一道菜羹而已。萧氏平时在家吃得不错，面对如此简单菜席，“不复下箸，唯啖胡饼中间少许，留其四傍，公顾取自食之，其人愧甚而退。人言公在相位，自奉类不过如此。”

王安石淡泊名利，晚年生活更是恬淡安然。《东轩笔录》载：“王荆公再罢政，以使相判金陵。到任，即纳节让同平章事，恳请赐允，改左仆射。未几，又求宫观，累表得会灵观使。筑第于南门外七里，去蒋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驴，从数僮游诸山寺。欲入城，则乘小舫，泛潮沟以行，盖未尝乘马与肩舆也。所居之地，四无人家，其宅仅蔽风雨，又不设垣墙，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劝筑垣墙，辄不答。”

南宋开始，王安石变法遭到彻底否定，其新学也遭到批判。理学家朱熹虽然对王安石变法持否定态度，但对王安石的为人与志向仍称赞有加：“安石行己立朝之大节，在当世为如何，而其始见神宗也，直以汉文帝、唐太宗之不足法者为言，复以诸葛亮、魏元成之不足为者自任，此其志识之卓然，又皆秦汉以来诸儒所未闻者，而岂一时诸贤之所及哉。”陆象山对王安石的人品操守也给予高度赞扬：“英特迈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

《宋史·王安石传》论曰：“朱熹尝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此天下之公言也。”

这一“公言”评判，在其后的几百年中成为后世所遵奉的圭臬。其中的逻辑：有如此高洁品行之人，却做出了如此害人乱世之事。实在让人无法理谕，难道真会如此矛盾吗?当然，朱熹等人也指出过王安石性格上的一些弱点：“其为人，质虽清介而器本偏侠，志虽高远而学实凡近。”还有就是王安石平素生活不拘小节，衣着不整，不修边幅和性格强拗等方面小事，这些也还是不能自圆其说。

清代至近代以来，许多学者为王安石变法翻案。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一些史学家根据列宁的定论，对王安石变法作了完全肯定的论述。这样，似乎王安石从道德人品到做事效果，都是比较完美的一个封建官僚的典型。真是如此吗？

首先在变法过程中，有些事就颇令人怀疑王安石之品行。如一天，神宗说起民间颇苦新法之事，王安石不以为然地说："老百姓连祁寒暑雨都要怨嗟的，不必顾恤!"神宗不满道："不能让老百姓连祁寒暑雨的怨嗟都没有吗?"安石老大不高兴，居然称病不出视政。熙宁七年，大旱引发饥荒，而各种征敛新法依然逼迫着灾民变卖田产，流离失所的灾民只能扶老携幼地向开封等城市逃荒乞生。监开封安上门的郑侠便把民众饥寒交迫的现状绘成画卷《流民图》，写了论时政得失的上疏，由于正常途径遭到梗阻，于是假称紧急公文，用马递的方式送上朝廷。神宗看了长吁短叹。夜不能寐，交给安石看后，新党以擅发马递的罪名处郑侠以杖刑。作为执政大臣，如此不顾百姓之死活，能说其品行高洁吗？

所以在当时，就有人认为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欺世盗名。熙宁二年六月，御史中丞吕诲上章弹劾参知政事王安石，指斥其有十方面的奸邪：倨傲不恭，慢上无礼；见利忘义，好名欲进；自取师氏之尊，不识上下之仪；自居政府，用情罔公；常怀忿隙，徇私报怨；卖弄威福，怙势招权；妄言圣衷，专威害政；任性专权，凌轹同列；离间宗族，勾结朋奸；商榷财利，动摇天下。《宋史·吕诲传》说："诲性纯厚，家居力学，不妄与人交。""诲三居言责，皆以弹奏大臣而去，一时推其鲠直。"去世时，"海内闻者痛惜之"。这样的"鲠直"大臣首先向王安石的人品操守发难，或能反映一些问题。

《邵氏闻见录》引申发挥了上述事件的一些背景故事：一天早朝，翰林学士司马光与吕诲相遇而同行，司马光问："今日上殿将奏言何事?"吕诲举起奏章说："我将弹劾参知政事。"司马光愕然道："王安石素有学行，朝廷正喜于得人，奈何弹劾之?"吕诲回答："你也这么说啊，其实王安石虽有时名，好执偏见，不通人情，轻信奸邪，喜人佞己。听他说话好像很有道理，而施于用就会出乱子。他若在一般的侍从官位置，或也可以忍容；若作为宰辅大臣，天下必受其祸!"司马光说："未见王安石有什么不善之行迹，这样论奏恐怕不妥。"吕诲答："皇上新即位，年

富力强，朝夕与之谋议国家大事者，二三执政耳。执政苟非其人，则败政亡国啊!此乃腹心之疾，惟恐治不及时，难道可以缓后吗?”不久，官员中有传阅吕诲之奏章者，多以为说得太过。王安石变法开始，新法专务聚敛，天下骚然，台谏官奏议不能有所改变，于是有人遂叹服吕诲可谓知人。司马光最后也被迫退出朝廷，闲居洛阳。每想起此事，慨然叹曰：“吕诲有先见之明，我不及也。”

《邵氏闻见录》又载：“神宗天资节俭，因得老宫人言，祖宗时，妃嫔、公主，月俸至微，叹其不可及。王安石独曰：‘陛下果能理财，虽以天下自奉可也。帝始有意主青苗、助役之法矣。安石之术类如此，故吕诲中丞弹章曰：‘外示朴野，中怀狡诈。’”其中，王安石劝神宗理财的这句话“虽以天下自奉可也”，完全把“天下”作为皇上的私产，皇上处理自己的私产，自然可以为所欲为了。

还有苏洵的《辨奸论》，更是将王安石比作历史上欺世盗名的奸臣王衍、卢杞。认为王安石“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实是个“阴贼险狠”之人，性情乖张，不近人情，大奸似忠，其人品之恶劣，可集历史上众奸臣之大成，断言一旦王安石当政，天下“将被其祸”。似乎苏洵比吕诲更早看清王安石之真面目，清朝有人考证，断言此文乃邵伯温伪作，近人又有论其非伪者。此谜，本书另章有叙。

此外，《宋史·王安石传》载，安石“擢进士上第，签书淮南判官。旧制，秩满许献文求试馆职，安石独否……寻召试馆职，不就。(欧阳)修荐为谏官，以祖母年高辞。”“俄直集贤院。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辞之累日。阁门吏赍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随而拜之，则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还之；上章至八九，乃受。”其中的一些表演，已非一般人和常理所能解释，似乎有故意做秀的痕迹。苏轼在当时的奏议中，已一针见血地说：“昔王安石在仁宗、英宗朝，矫诈百端，妄窃大名，或以为可用”(《论周穜擅议配享札子》)。鲜于优更直指其“沽激要君”，即与皇帝讨价还价(《宋史·鲜于优传》)。数为当时口碑颇佳的贤能之臣。“于是吕公着、韩维，安石借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缜，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宋史·王安石

传》)。还有曾公亮、范纯仁、吕诲、杨绘、刘琦、刘敛、刘恕、刘挚和苏轼、苏辙兄弟等。总之，御史、谏官论列变法非是而被罢官贬黜者，不计其数，其中也有许多正直敢言者。

而王安石信任重用者，许多都是奸臣小人。如邓绾为人鲜廉寡耻，趋附新党就为升官发财，其乡人笑骂他，他却声称："笑骂由他，好官我自为之。"官员王岩叟曾列举其变法派集团中的小人：曾布"强悍而险刻"，邓绾"善柔而阴谗"，薛向"剥下附上"，韩绛"苛佞"，李定"藏奸包慝"，蔡确"狂诞轻狡"，章惇"阿谀辩巧"，程昉(宦官)"暴横凶忍，荼毒一方"，吕惠卿"奸邪之才，又冠其党"。还有练亨甫、吕嘉问等，不一而足。安石引荐这些人担任要职，支持其有关活动，乃至主持变法的重要方面。以致许多人都认为，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主要就是"排斥君子，任用小人，败坏政纲"的结果。以后大奸臣蔡京(其弟弟蔡卞还是王安石的女婿)一伙，从总的政治倾向上看，仍属于变法派，其继承着王安石变法的敛财路线，直到北宋亡国。

如何解释上述现象呢?如果说王安石是"君子"，那为什么要与这么多"小人"为伍?如果说其变法是一件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好事，那为什么主要是依靠一些"奸臣小人"在操作呢?总之，王安石是"君子"还是"小人"，你能分辨吗?

《辨奸论》是谁写的在宋代攻击王安石个人品行方面的文论，影响最大的，就数苏洵的这篇《辨奸论》。然而到清代，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是时人伪作，信者不少。到"文革"尊法批儒运动中，王安石变为法家，该文的"伪作"观点便成定论。"文革"结束，这一问题才又被提起重新讨论，真、伪二派观点针锋相对。你想参与评判吗?

宋仁宗嘉祐后期，王安石由三司度支判官迁知制诰，其在官场上的声誉日隆。当时只任秘书省试校书郎的苏洵，却在极为冲动愤慨的情绪下写就《辨奸论》，文章为士大夫不能"辨奸"而发。而其所说之"大奸"，就指王安石。全文围绕着"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展开讨论，先提出晋、唐时两位奸人：王衍、卢杞，作为开场白，希望人们冷静地观察，然后能见微而知着，终不使坏人逞奸，以维护社会之正道。

让我们来读一段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它不点名地影射王安石：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伯)夷、(叔)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语言，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夷狄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未形之恶，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当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之患，必然无疑者。

苏洵在其中谈了三个问题：一是指责王安石为人表里不一，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自比颜孟复出，实际上“阴贼险狠与人异趣”。二是认为王安石做人不近人情，面垢不洗，衣垢不浣，“囚首丧面而谈诗书”，而“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三是指出王安石恶未形而名盖世，这样治君贤相会“举而用之”，从而必为天下之患害。文章最后表示，希望自己的话不要应验。其言不中，人们仅仅以为他的话说过了头；其言不幸而中，他虽然“获知言之名”，“天下将被其祸”。

文章问世后，张方平的《文安先生墓表》，苏轼的《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朱熹的《五朝名臣言行录》等书，包括苏洵的《嘉祐集》，都载其全文或摘录。此外，方勺的《泊宅编》，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叶梦得的《石林避暑录话》等，也均记载有苏洵写此文的有关情况，颇为可信，没人怀疑。

然而到了清代，李绂的《穆堂初稿·书(辨奸论)后》提出质疑，认为张方平的《墓表》与苏轼的《谢书》，包括《邵氏闻见录》中的这篇文章，都是邵伯温为攻击王安石变法而创作的“赝品”。他以这样的逻辑进行论证：马贵与《经籍考》列苏洵《嘉祐集》为十五卷，而世传所刻多至二十卷，书名也不同，有的又增附录二卷，意必有他人赝作阑人其中。近访得明嘉靖壬申年太原守张镗翻刻巡案御史澧南王公家藏本，确为十五卷，其中独无所谓《辨奸论》之文，可证此文为邵伯温伪作。

有学者指出，上述论证是不可信的。欧阳修《苏允明墓志铭》就说：苏洵“有《文集》二十卷。”曾巩《苏允明哀词》也说：“明允所为

《文集》有二十卷行于世。”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还是说：“所著《文集》二十卷”。可见苏洵最早的文集就已为二十集，后来有人编的十五卷本，定有不少遗漏。其实，除十五卷本以外各种版本，包括南宋绍兴年间刊刻的十六卷本等，都收有《辨奸论》。

李绂还以为，《辨奸论》一文始见于《邵氏闻见录》，该书编于绍兴二年。到绍兴十七年，婺州州学教授沈斐编苏洵文集，才载有张方平的《墓表》和苏轼的《谢书》。由此认定“三文皆赝作”，“疑《墓表》与《辨奸》皆邵氏于事后补作也”。尤其是《墓表》中有如此表述：“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其命相制曰……”李绂驳论道。荆公命相制辞在熙宁二年(1069)，而苏洵卒于治平三年(1066)，“皆非其所及闻也”。

有学者指出，北宋时张方平《乐全集》卷三十九所载《墓表》中就已引用了《辨奸论》全文。而《墓表》中“其命相制”四字“显有鲁鱼之讹”，因为它与上下文不合。一是时间不合，上下文内容都是载嘉祐元年之事，二是所引“其命相制”词开头语，与现存王安石命相制词显然不同。苏轼的《谢书》见《东坡集》卷二十九。此文集是苏轼亲手编定，在苏东坡生前就已行于世。所以认为《辨奸论》首见于《邵氏闻见录》是说不通的。

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也旁征博引，详加考证地断定《辨奸论》是伪作。最早记载苏洵作此文的方勺《泊宅编》谓，嘉祐元年某天，欧阳修在翰苑请客，宴罢客去，独苏洵少留。洵问欧公：“刚才囚首丧面者何人?”公答：“就是王安石，你不闻他的大名吗?”洵说：“我看此人若得志立朝，异时必乱天下，明主亦为其诳惑。欧公为何与他交友?”苏洵退而作《辨奸论》行于世。当时安石方作馆职，而苏洵犹布衣。蔡上翔辨说：士大夫一起吃饭，居然终席不交一言。饭后才问主人，同坐者为谁?既不交一言，应为首次见面，退而作《辨奸》，对此人能追索既往，又逆推将来，怎么会知道得如此之详?对刚认识的人，怎么会攻击其丑恶到如此极端的程度呢?

现代学者也有认为，王安石刚到京任职，苏洵与其接触不多，怎么会一见面就咬定王安石是坏人，并预见到若干年后天下将“被其祸”呢?王

安石当时已名重天下，苏洵为什么会一反众议，一眼就看出王安石是“大奸臣”呢？

有学者指出，张方平在《文安先生墓表》中说：“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先生独不往，作《辨奸论》一篇。”安石母死于嘉祐八年(1063)，《辨奸论》即作于这一年。而文中的基本观点，苏洵早在嘉祐元年以前就已雏形，且向欧阳修表露过。如张方平也记：“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欧阳修亦已善之，劝先生与之游，而安石亦愿交于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这正是后来写《辨奸论》所要阐述的主要看法。人们在交往中，主人请客同桌吃饭，其中有某人不熟，主人又忘了介绍，散席后才向主人打听，这也是完全可能的事，没有什么不合情理之处。

再比较一下苏氏父子与王安石这一时期的有关著述，我们也可发现两者的政治主张有很大的不同，矛盾也由此进一步加深。如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书》中认为，天下“患在不知法度”，“患在治财无道耳”。而苏洵《上皇帝书》却说：“法不足以制天下”，同时“赋敛之不轻，民之不聊生”，而财政拮据是“费出之无节”造成的。苏洵上书，名震京师，而王安石“独不嘉之”。其他作诗相诋之类事，不一而足，可见其交恶，由来已久。到嘉祐六年，王安石与苏轼兄弟之矛盾也露出端倪，如苏轼应制科试所作的《进策》，就有明显反驳王安石观点的一些看法。所以王安石对苏轼兄弟的文章也大为不满，曾对人说：苏轼的制策“全类战国文章，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邵博《闻见后录》)。特别是对苏辙，因其极言治政之得失，得罪了某些权贵，把苏辙置于“下等”，任他为商州军事推官。而王安石作为知制诰，甚至不肯撰词，结果苏辙未能赴任。可见，在嘉祐末年，苏洵作《辨奸论》之际，苏、王交恶几乎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同时，苏洵写《辨奸论》也并非“一反众议”，当时对王安石称颂有加者不少，其名声确实颇盛，然而抱反感的士大夫也有一些。如张方平就不满意王安石凡事“皆欲纷更”。鲜于侁也曾对人说：“是人若用，必坏乱天下。”李师中说得更清楚：“今鄞县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乱天下，必斯人也。”(俱见《宋史》本传)这和苏洵的观点已经没有多少差别，且还要早于《辨奸论》若干年。

蔡上翔还说：“《辨奸》为一人私书，初传于世，亦诡秘莫测。”现代学者也有认为，苏洵既然肯定王安石一旦立朝执政，必为天下之大患，那为什么不把自己的看法公之于同道，以期防患于未然，而偏偏秘而不宣，待自己死后许多年，王安石变法已成事实，才由别人将该文传布出来呢?所以其流传情况也相当可疑。

有学者指出，从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有关此文的流传经过记载考察，《辨奸论》的流传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写出后密献张方平，而不以示欧阳修，知道的人不多。此时苏洵地位低下，王安石名声日隆，两者无法抗衡，所以是处在“秘而不宣”的状况。二是元丰至北宋末年，张方平将它载入《墓表》，同意苏洵的预言。此时王安石虽然罢相，但神宗、哲宗、徽宗都支持新法，而苏轼兄弟都因反对变法而接连被入狱、贬谪，甚至远流岭南，朝廷禁毁三苏文集，处境相当艰难，基本上没有机会张扬《辨奸论》。三是南宋初年，当时舆论倾向多把北宋之亡归罪于王安石变法，苏氏父子得到表彰，这时《辨奸论》才可能得到广泛流传。所以说该文的流传情况合情合理，并不“诡秘莫测”。

20世纪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权威中，邓广铭先生始终认为《辨奸论》是伪作，他在《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修订本)中明确指出：《邵氏闻见录》“尤其卑鄙恶劣的则是假冒苏洵之名炮制了一篇《辨奸论》”，“邵伯温还假冒张方平之名而炮制了一篇苏洵的《墓表》。把《辨奸论》全文录入。”这一权威的结论可信吗?

王雱的智力与为人王雱(1044～1076)，字符泽，王安石之子。据说他是王安石变法时的得力助手，曾参与新法的策划和制定，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也起过不容忽视的作用。然而，时人对其为人与智力及有关方面的描述和评价或睿智神奇。或尖刻贬损，或骇人听闻，令人大惑不解。

《宋史·王安石传》后附有王雱的简传，说他“性敏甚，未冠，已著书数万言”。十三岁的时候，听到军人谈论西北边境之事，曾说：“此地应采用安抚的办法去保有。如果让西夏得到此地，则敌强而边患不止矣。”后朝廷派王韶开熙河，安石也力主同意其策略，就是听了儿子的这番话。其描写，简直就是一神童。王安石也曾题诗：“斯文实有奇，天岂

偶生材。”盛赞其儿子的才华。

治平四年(1067)举进士，授旌德县尉。“作策三十余篇，极论天下事”，可以说对当时社会作了相当的研究，才能如此驰骋笔端。“又作《老子训传》及《佛书义解》，亦数万言”，看来对道家、佛学都有相当的造诣。王安石欲扩大其影响而引起朝廷的重用，就将儿子所作策文及注《道德经》镂版鬻于市，说明其学问还有一定的市场效应。皇上召见，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之职。乃至学校科举新法改革时，《三经新义》中二经《诗义》与《书义》，受诏撰写，又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书成，迁龙图阁直学士，以病辞不拜”。可见其对儒家经典也是熟能生巧，而可另辟新义。三十岁不到，已俨然一学问大家。

不过，《宋史》其《传》还说他“为人慓悍阴刻，无所顾忌”，“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主要是“安石更张政事，雱实导之。常称商鞅为豪杰之士，言不诛异议者法不行。”《邵氏闻见录》也说：王雱“心险恶，凡荆公所为不近人情者皆雾所教”。二书都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执政，设置三司条例司为新法主持机构，任用太子中允程颢为僚属。一天盛暑，安石与程颢在家中对坐议事，王雱赤着脚，披头散发，手中拿着妇人的冠帽走了出来。问父亲道：“你们在谈些什么?”王安石说：“因为新法数次受到人为的阻挠，正与程君商量呢。”王雱以一种极为轻慢的姿势坐下，然后大大咧咧地嚷道：“砍韩琦、富弼的头于市，则新法就可实行了。”安石马上说：“我儿说得不对。”程颢正色道：“正与你爸讨论国家大事，子弟不应干预。请退下。”王雱才怏怏不乐地走了。

这里，王雱是个狂妄自大，不知礼仪的公子哥儿，根本不像是个饱读硕学之青年。李绂《穆堂初稿·书邵氏闻见录后》辩诬道，元泽以治平四年登进士第，明年即熙宁元年授旌德县尉，远宦江南。所以安石与程颢在熙宁二年议新法时，元泽并未在京。要到熙宁四年，召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元泽然后才入京，而这时程颢因为政见不合离京外任已年余了，所以不可能发生王雾听安石与程颢议政之事。同时，程颢是熙宁二年八月任条例司官，次年五月已外放为地方官，任此官始于深秋而讫于初夏，中间并无盛暑之日。因此上面描述元泽赤脚披发之盛夏情形，也显属捏造。再者，韩琦、富弼年辈都在荆公之前，且曾为宰执，

是时德高望重，绝非程颢可比。程颢长元泽仅九岁，第进士也只早十年，且时为安石官属。而王雱敢对韩琦、富弼大喊“斩首”，却被程颢正色一斥，便即避去，这于情理也实在说不通吧。可见此故事不但是明显伪造，且是邵氏所录中“最骇人听观者”。

此外，魏泰《东轩笔录》记载了王家的一段生活琐事：王雱娶同郡庞氏女为妻，年余生有一子，王雱以此子相貌不像自己，怀疑不是自己亲生，就千方百计想杀害他，最后此子竟被惊吓而死。王雱与其妻也就日日争吵。安石知道是儿子有病，而媳妇并无过错，如果就这样让其夫妇离异，恐其媳妇要背黑锅而担恶名，就另外选择了一夫家，把她改嫁了出去。这时，工部员外郎侯叔献去世，侯乃安石学生，关系甚好。侯的妻子魏氏，为人泼辣，且在侯死后不守妇道，轻薄招摇。荆公便上奏朝廷，把魏氏逐出侯门而归本家。京城有谚语说：“王太祝生前嫁妇，侯工部死后休妻。”

魏泰是当时变法派官员曾布的妻弟，章惇也数次对他称赞有加，同时与王安石本人的关系也不错，甚至可以说是王雱的朋友。《玉壶清话》就载有，元泽病中，魏泰去探访的事情。如果说邵伯温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要在自己的书中对其造伪诬毁，那么魏泰似乎没有什么理由要如此中伤自己的朋友。何况，与王安石同朝为官的孔平仲，其所著《孔氏谈苑》中也载有相同的故事情节，直指王雱“不慧”，说他虽娶妻，却不能过正常的家庭生活，王安石怜惜其无辜的媳妇，所以另择人嫁之，而王雱处之泰然。并录有相同的谚语，说明此谚语确实曾一度在京城流传。此外，《墨客挥犀》、《闻见杂录》诸宋人笔记也都记载了略为相同的故事，看来不像在集体造假。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离奇的事呢?王雱有什么病呢?《东轩笔录》说：“王荆公之次子雱。素有心疾……荆公知其失心”。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也称：“王荆公之子滂，少有心疾。”古人所谓“心疾”，往往指其脑子有毛病，所以或称：“失心”、“不慧”。如果说王雱的脑子有病，怎么会有如此众多的著述?有的还是受诏撰著的。怎么又能胜任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天章阁待制兼侍讲诸职呢?如何又能参与新法的制定和推行呢?有学者认为，史称元泽未冠就著书数万言，不像是脑子有病。如果说是不能过正常的家庭生活，或应是病痿。“不然，人即失心，亦无遽嫁

其妇之理，荆公虽执拗，当不至是。”可惜，王雱的著作多已散佚，仅《南华真经新传》传世，其才学到底如何，也已无法考实。

近人余嘉锡博采群书，认真考辨，得出王安石有二子，后人弟冠兄戴，以至搞错的结论。他从《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查得，王雱“先病疡，后病疽，不治而死”，所以其并非死于“心疾”。又在《宋会要辑稿》等史籍中找到王勇曾有一子一女，及其妻在政和初卒于夫家的记载，证实王雱的家庭生活正常，不存在生前嫁妇的怪事。再从《名臣碑传琬琰集》中得知，王安石应有二子：王雱与王旁。于是断言：患“心疾”者为弟弟王旁，生前嫁妇当然也是王旁。而雱与旁二字，形声相近，后人只知有雾而不知有旁，刻书者、校书者凡见王“旁”尽妄改为王“雱”，以致弟冠兄戴。所以《渑水燕谈录》中：“王荆公之子滂，少有心疾。”其“滂”即“旁”。而《东轩笔录》中应是“王荆公之次子旁，素有心疾。”此说颇具说服力，如无其他有关史料的再发现，可说此谜得到一定程度的破解。

不过，王雱枉担近千年有“心疾”的虚名或可摆脱了，但他与王安石变法之间的关系，仍然扑朔迷离。有学者指出：王雱治平末、熙宁初就远宦江南，而在熙宁二、三年王安石变法最关键的开创阶段，他几乎是无法参与的。所以在吕诲等人弹劾王安石变法的奏章中，未尝有一言论及其子。等到熙宁四、五年，王雱回到京城，变法已次第尽行且初具规模。所以有人以为王安石变法中许多内容，其子都参与策划和制定的说法应是有问题的。其后，王安石也不是什么都听其子谋划，如变法后期，王安石与吕惠卿不和丽公开相倾，王雱组织官员弹劾攻击吕惠卿，并夹上有关文书私自送到审案部门。昌惠卿得到情报，向神宗告状，说安石“违命矫令，罔上欺君”。“帝以示安石，安石谢无有，归以问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愤恚，疽发背死”。(《宋史·王安石传》)其矛盾错综复杂，王雱在其父的变法中的作用封底处于一个怎样的地位?为什么后来一些反对变法者往往要将有些恶名加在王雱的身上?仍然说不清楚。或者说，王雱的为人还是一个谜。

秦桧回归南宋秦桧先作为北宋官员，曾随二帝一起被掳至金国。然而仅仅四年之后。他突然神秘莫测地回到了南宋，且是“全家得还”。秦桧归宋到底是自行逃归还是金人纵归，也就是说秦桧是否为金人的奸

细?对于这一问题，八百多年来一直众说纷纭，未有定论。

秦桧，字会之，江宁(今江苏南京)人。政和五年(1115)进士，历任太学学正、左司谏、御史中丞。靖康之难，全家随二帝、众官员被掳至金国。从二帝秦桧像至金燕山、上京、韩州诸地，闻康王即位，代宋徽宗修书，请求和议。桧又厚贿金人，以此获得金人的欢心，为完颜昌所信用。建炎四年(1130)，随金兵南征，金攻破楚州(今江苏淮安)。十月，秦桧携带家眷，自金人占领区楚州孙村进入涟水军(今江苏涟水)宋军水寨，回到南宋。秦桧归宋，究竟是自行逃归抑或金人纵归，这是判断秦桧是否为金人奸细的关键所在。

宋人对秦桧南归有两种迥然不同的说法，一为逃归，一为纵归。

先看逃归说。据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和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靖康之难，秦桧因不愿立张邦昌而遭拘北去，其妻王氏、小奴砚童、小婢兴儿、御史卫司翁顺同行。至金，金主将秦桧赐其弟完颜昌，为任用(主管秘书之类)之职。建炎四年，完颜昌率金兵南征，以秦桧同行。秦桧担心夫人王氏不能随行，便假装至燕山府留下王氏，自己独行。王氏故意喧闹道：“我嫁到你秦家时，有嫁妆二十万贯赀财，家翁欲使我与汝同甘苦，共度一生。今大金国以你为任用要从金军南行，而弃我于此地吗?”王氏叫骂不休，反复哭诉。果然有人传话告于完颜昌，金人便只得批准秦桧夫妇及砚童、兴儿、翁顺都得同行。金兵攻破楚州后，完颜昌任秦桧为参谋军事、随军转运使。金兵多去抢夺财物，兵营空虚，秦桧便乘机说动梢工孙静，以催督淮阳海州钱粮为名，与妻王氏。兴儿、砚童、翁顾及亲信高益恭等人夺舟而去。至宋涟水界，被宋将丁祀水寨的巡逻兵捕获，把他作为奸细而进行拷问凌辱。秦桧急忙告之：“我御史中丞秦桧也。”可士兵不认识他，秦桧大叫：“这儿有士人吗?”恰巧有个卖酒秀才王安道在附近，便被唤来辨认。这王安道其实并不认识秦桧，却长揖道：“中丞辛苦了。”兵众信以为真，也就将秦桧放行。在王安道等人的陪同下，一行人总算到达行在，后孙静、安道等都得授官。

秦桧的《北征纪实》也有自己的一番描述，主要是从楚州出逃过程的某些细节。说他在楚州时原打算深夜骑马出逃，但看到金兵四面都有

埋伏，难从陆路出走，决定从水路逃跑，再访能操舟行船之人，“遂定计于食顷之间”，乘机夺船而走。当夜行舟六十里，次日到达丁家寨，拜访将军丁祀，丁推辞有病不见。第三天丁祀派副将刘靖等人以酒招待，刘靖没安好心，欲谋财害命，秦桧识破阴谋，席上面责刘靖，刘靖不敢下手，秦桧方得脱身。他又亲自到丁祀军营，丁仍拒绝接见，秦只好返回舟中，从海上发舟赶赴行在。

上述解释，当时就有不少士人提出质疑，指出下列疑点：秦桧与众官员一同被拘，掳至金庭，为何惟独秦桧能逃归?金军令秦桧从军办事，为防其逃跑，必留其妻子为人质，怎么可能让他们夫妇同行呢?甚至还有小奴、小婢、侍卫也一同逃归，简直让人不可思议。从楚州南逃，也有千里之遥，途中要跋山涉水，难道金国毫无防禁之设?刘靖既欲图财害命，说明秦桧必有可观的随身之物，这哪会是“定计于食顷之间”的仓猝出逃呢?再有，如丁祀果真在当时关键时刻拒绝接见秦桧，那么秦桧得势后必定会加以报复。但事实却是，秦桧为相，丁祀即得提升，且官运亨通，权倾一时。秦桧有如此胸怀吗?这一连串的疑点，让人们怀疑其南逃脱险经历的可信度。

在逃归说中，陆游《老学庵笔记》中的记载却颇为另类。说秦桧在山东计划南逃时，船只都已备好，惟独怕金营中有人告发，所以仍犹豫不决。适遇一个略有交情的金人，便将自己的想法告之。金人说：“何不找监军商量一下?”秦桧说不敢。金人说：“不然，我国人一旦许诺你，就会担起有关责任，虽因此死都没有什么遗憾的。若你逃而被抓获，即使想宽恕你，也不敢了。”秦桧便听其言，找监军商量。监军说：“中丞果然想南归吗?我们契丹人亦有逃归者，但回去后更受怀疑。怎么知道你南归后，宋人会认为你忠呢?你若果真想走，不必顾虑到我。”秦桧喜出望外，赶紧道谢说：“公若允许，也不必问我南归后的祸福。”于是，监军同意秦桧南归。

不知陆游这段记载的来路，有学者以为“无非是得之道听途说”，因为《老学庵笔记》成书较晚，当时秦桧已死四十年，所以绝非作者的亲历。其内容所载，也有颇令人困惑之处：就是那个金军的监军怎么那样富有人情味，居然同意秦桧南逃，甚至还愿意承担有关责任，这与古代战争环境所规定的文化氛围似乎也不太协调。但也有学者认为，《老学

庵笔记》的创作态度严肃而认真，史料价值较高，可信程度较大。尤其陆游是南宋著名的抗战派人物，政见与秦桧截然对立，若可知秦桧真是金人纵归的奸细，于情于理，陆游都决不至于为其护短。当时要想揭露秦桧的种种丑恶罪行，已经无所顾忌，根本没有必要为其掩饰什么。可见，陆游的这条史料是值得重视的，然而这条史料又仅为“孤证”，并不能说明多少问题。

再看纵归说。首先是朱胜非在《秀水闲居录》中的记载，它是指认秦桧为金人纵归的最早出处。其说秦桧随金人北去，为金人达兰郎君所任用。金骑渡江，秦桧同来，回到楚州，金人遣舟送归。秦桧为王仲山女婿，有产业在济南，金人在那里取了一千缗钱作为秦桧南行离别的赠礼。秦桧南归之初，自言杀金人之监己者，夺舟来归。但全家同舟，甚至奴婢也一起得回，人们都知道其不是逃归也。此说对后人影响很大，《林泉野记》等书的记载，基本上就是沿袭此说。史学家李心传为“胪采异同”，也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小注中对这段话加以收录。

其实这段话中疑点不少：如楚州距济南有上千里之遥，金人何必非从那里取王仲山之钱以为赠礼呢?有宋铜钱，一缗重五斤，千缗就是五千斤，秦桧长途跋涉去南宋，能带这么重的东西吗?更何况是称言逃归，这样不是露出马脚了吗?如果说这“千缗”并非铜钱，而是指金银的价值，那朱胜非又从哪里得而知之?秦桧《北征纪实》及上述逃归记载材料中，并无“自言杀金人之监己者，夺舟来归”之语，要知道秦桧随金军南征，既有人监视，像秦桧这么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哪有这么容易就可将监视之人杀死而逃走呢?所以此说不知朱胜非从何而得来?本书既如此不利于秦桧，在朱胜非生前就颇难流传，反之就很难说没有后人的附益之辞，如末句“人皆知其非逃归也”，在朱胜非有生之年，朝野不会有此共识，当为后人推测之词。

所以有学者认为，《秀水闲居录》的这段记载不可信。朱胜非为南宋初大臣，早年曾追随黄潜善，诋毁李纲，排斥赵鼎，为时论所轻。他与秦桧的积怨也颇深，秦桧首次罢相，就由吕颐浩联合朱胜非、黄龟年等人排挤弹劾所致。及秦桧复相，就对朱实施报复，朱被罢官居湖州八年而卒。《秀水闲居录》就撰成于他晚年退居秀水的日子里，其间朱胜非对秦桧已恨得咬牙切齿，不能排除朱因嫉恨而报复的可能性。从另一

角度看，如果朱胜非真的掌握了秦桧为金人纵归的确凿证据，此事关系到南宋政权的安危，更是他再次扳倒政敌秦桧、邀功请赏的极好机会，他怎么会仅仅写于私记而不向朝廷报告呢?所以这段记载，可能来自于道听途说，也可能是个人的臆测，恐怕是攻讦的成分多于事实。

其次是无名氏的《中兴姓氏录》记载，说秦桧在大金国时，为徽宗作书上粘罕，以结和议。粘罕喜之，赐钱万贯、绢万匹。建炎四年，大金军攻楚州，乃使秦桧乘船舰全家厚载而还，使结和议为内助。秦桧至涟水军贼丁祀寨，诸将猜度说：“两军相拒，岂有全家厚载逃归者?必大金使来阴坏朝廷，宜速追之，以绝后患。”贼军参议王安道、机宜冯由义力保护之，说：“此人是朝廷大臣御史中丞，万一事平，朝廷追究起来，我军将被加罪，最好还是送之朝廷。”丁祀便令安道、由义送到镇江府。秦桧见大将刘光世，首言讲和为便，光世送之朝廷。

这段话的疑点也颇多：此时是宋急欲求和，而金往往拒绝之。秦桧为已成俘虏的宋徽宗上书粘罕，“以结和议”，粘罕怎么会高兴得赐他巨额钱、绢呢?金人如派秦桧作奸细，为何要使其“乘船舰全家厚载而还”，如此招摇，这不是自暴身份吗?秦桧至涟水军，尚未查实身份，诸将就要追杀这位原朝廷大臣，于情理也不太相合。秦桧南归并未经镇江府，何以能见到大将刘光世?为什么秦桧在这时要说一番“讲和为便”的话呢?文中称南宋军队为“贼”，而称金国为“大金”，用词之颠倒乖异，其作者也令人生疑。

再次是署名金通直郎秘书省著作骑都尉张师颜的《南迁录》。其记载说：根据金国史，天会八年(1130)冬，金诸大臣考虑南宋君臣正在竭力复仇，要想办法制止它，而形势的发展看来难于使它自行屈服。鲁王说：“惟有派个宋臣先归，对其君臣示以威胁，使他们顺从和议，而我方假装不从，然后勉强同意，事情或可以定。”忠献王说：“此事在我心里已考虑三年了，只有秦桧可用。秦桧初来，说赵氏得人心，必将有人继承其业；说张邦昌不为人所悦服，虽立又何济于事?不及半年，其言皆验。我颇喜欢这人，放在军中，试以办事，能委曲顺从，问或也语以形势利害，始终言南自南、北自北。若纵之归国，宋人喜慷慨说事，秦桧必能得志，也只有此人能助我金国。”等到忠献王掌得权位时，其计划开始执行。

《南迁录》主要记载金宣宗贞祐元年(1213)金南迁汴京事迹，成书时间较《老学庵笔记》更晚。作者张师颜，不详其人。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认为，此书为宋人杜撰以雪忿之词，俱假造事实以佐证之，其间有明显牵强附会者，而岁月时间又皆抵牾不合，更证其伪造妄作。清《四库全书总目》也指出：通观全书，“舛错谬妄，不可胜举，赵与时《宾退录》、陈振孙《书录解题》皆断其伪”。如上述所谓鲁王、忠献王云云，纯系宋人口吻，与金朝国史语言毫无相似之处。书之伪作，可成定议，所言秦桧事，当然不足信。

最后还有一件事，其真伪与否也与秦桧是否为“奸细”大有关系，这就是所谓：“兀术遗桧书”。据说在绍兴十年(1140)，岳飞取得颍昌大捷之后，金将兀术曾有一书寄给秦桧。岳珂所编《鄂王行实编年》载：“查龠曾谓人曰……”金人谓桧曰：‘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桧于是杀先臣以为信。”岳珂还说，岳飞颍昌大捷“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并在另一外说，夏金吾即兀术之婿。这条记载及相关材料别无旁证，因而引起后世的争议。

有学者认为，此条史料为“孤证”，向以资料丰富著称的《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史籍，可谓网罗荟萃，然都不载此事。与查龠同对代的胡铨等人，都是坚决的反秦派，一贯竭力声讨秦桧的卖国行径，可是都没有提到过秦桧有这桩内外勾结、卖国求荣的事情。所以很可能是岳珂的杜撰，因惟恐犯“指责乘舆”的大罪，便把罪名加在秦桧头上，以此解释秦桧要害死岳飞的背景原因，也为其祖昭雪提出最有力的证据。同时，《金佗粹编》卷十六所录《王贵颍昌捷奏》中，未见有金将叫夏金吾者，连《金史》中也没有“上将军夏金吾”其人。退一步说，即使金国有夏金吾其人，也不可能是兀术的女婿，因为女真习俗禁止与外族通婚，贵族尤其这样。另外，如果杀岳飞是宋金和约的先决条件的话，那么绍兴和约的达成应在岳飞死后，而实际上和约产生在岳飞被害前一个多月。而和约缔结前，秦桧曾经把屠刀指向韩世忠，这不是与金人的要求相左了吗?还指出：高宗与秦桧尽管求和心切，如果认为他们相信只要杀害了岳飞，就能保证狡诈凶恶的金人会接受和议，似乎将他们两人看得过分天真了一些。总之，这条材料为“孤证”，并不可信。

也有学者反对简单否定此事。由于秦桧父子当权时肆意篡改历史，而使当时有关岳飞的记载残缺不全，漏洞百出，其中不乏荒诞离奇、面目全非之处，所以不能苛求岳珂《金佗粹编》有关的错讹和疏略，也不宜对缺少旁证的史料一概否定。宋朝的奏捷，常常不用金军将领的全部官衔和真实姓名，而往往用习惯简称。如“龙虎大王”在战报中屡见不鲜，却无姓无名，后人只得根据其他史料推断为“突合速”。其他如“翟将军”、“镇国大王”等都不见于《金史》，但并不能否定此人的存在，“夏金吾”也属此类情况。还有，女真并无与外族通婚的禁令，其金主嫔妃中不乏外族人。金世宗曾下诏安排契丹人与女真人杂居，男婚女聘，渐趋融合。最后，和约达成协议到全部履行，中间应有一个时间过程。绍兴和议一个月后杀害岳飞，是完全可以作为其协议的一部分。宋高宗下决心杀岳飞，可以是向金表示和议诚意的一个重要行动。当然，也没有“兀术遗桧书”的确凿证据。

尽管秦桧南归后的所作所为，确实很像一个金国打入南宋内部的奸细，但人们也确实拿不出一条确凿的证据来加以证实。秦桧死后的一百余年间，人们对他十分痛恨，对他的南归，尤其是“全家得还”，觉得甚为可疑，但依然无一人能够提供出确凿的史料来证明秦桧就是金人纵归的奸细。若没有更新的史料发现，这个谜难以解开。

第六章

权臣韩侂胄的为人南宋权臣韩侂胄，在宋宁宗时期主持了两件大事：庆元党禁和开禧北伐。如何评价这两件事，或者说如何评价韩侂胄这个人，自南宋以来就有不同看法，至今史学家们的分歧还是很大。因为这问题确实令人费解。

韩侂胄(1152～1207)字节夫，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北宋名臣韩琦曾孙，父亲韩诚娶高宗皇后吴氏的妹妹，官至宝宁军承宣使。以父任入官，淳熙末，以汝州防御使知阁门事。光宗以疾不执父丧，中外舆论汹汹，赵汝愚议定策立太子。因韩与太皇太后吴氏的关系，赵汝愚遂请韩侂胄助一臂之力。韩便通过熟人太监向太后转达了诸大臣的建议。后在太后的主持下，太子赵扩即位，是为宋宁宗。

扭转国事危机，韩与赵谈及论功请封之事，自以为起码能得个节度使之类的封疆大臣的职位。不料，赵汝愚说："我是宗室，你是外戚，不应论功求赏。"于是韩只迁宜州观察使兼枢密都承旨，韩感到非常失望，遂与赵汝愚有隙。而宁宗皇后韩氏，又是韩侂胄的侄孙女，韩一身兼两重国戚，更持有定国策立新君之功，在朝中的权力渐增。宁宗年轻幼稚，对这位国丈爷也就很迁就，韩逐渐在朝中培植党羽，主要是安插亲信于台谏。

朱熹奏劾其奸，韩怒而使戏子峨冠阔袖扮成朱熹讲学模样，使宁宗感到迂阔好笑，将朱熹罢职奉祠，贬出政坛。吏部侍郎彭龟年请留朱熹而逐侂胄，被出为地方官，而韩进保宁军承宣使。赵汝愚为相，两人貌合神离，怨仇益深。韩与言官谋，奏劾汝愚谋危社稷，以宗室居相位，将不利国家。庆元元年(1195)，赵汝愚罢相，出知福州。一些官员见状，上疏苦言汝愚之忠，罢相不当，俱遭到降黜。六名太学生也联名上书，指斥言官枉害大臣，尽遭流放，人称"庆元六君子"。

韩侂胄拜保宁军节度使，其党羽斥朱熹理学为伪学，搜罗朝野，将赵汝愚、留正、周必大、朱熹、彭龟年等一批官员，统统列入"伪学逆党"的名籍中，网尽有关名士，共59人，一并坐罪，或贬黜，或流放，

兴“庆元党禁”。后赵汝愚暴卒于贬地，朱熹在福建故土离世。而韩侂胄拜少傅，迁少师，封平原郡王，进太傅、太师，一路飙升，成为权臣。嘉泰初，有人提醒韩，再不开党禁，将来不免有报复之祸。遂解伪学党禁，追复赵汝愚、朱熹职名，留正、周必大等先后复秩还政，一大批健在者复官自便。

开禧元年(1205)，韩除平章军国事，序班丞相之上，三省印并纳其第，权倾朝野。用进士毛自知策，以苏师旦等为心腹，谋开边自固，恢复中原。其间，罗致了一些名士，如薛叔似、叶适等，起废显用辛弃疾等抗战派官员。又追封岳飞为鄂王，夺秦桧王爵，改谥谬丑，这一举动大得人心。并输家财二十万以助军用。

开禧二年四月，拉开北伐战幕，兴兵分东、中、西三路攻金。初战泗州小胜，后因所用非人，措置失当，中路先败，东路又遭宿州之役惨败，而西路副帅吴曦叛变投敌，为忠义之士所杀，北伐失利。遂遣使请和，因金人要索甚苛，复锐意用兵。礼部侍郎史弥远与杨皇后密谋，命人将韩骗至玉津园杀害，函首送金廷乞和，终签嘉定和议。

韩侂胄死后，人们多以奸臣论之，尤其是以理学为宗的士人们。如在宋人笔记中，其事迹也大多以讥嘲、贬斥的口吻加以描述。如韩曾褒岳(飞)贬秦(桧)，然而岳飞的孙子岳珂，却在其笔记《程史》中讽刺韩侂胄兄弟，鞭挞其权倾一时，已有“霍氏之祸萌于骖乘”之迹象。元初《宋史·韩侂胄传》，极为鄙夷他的为人和任政，说他如何权欲熏心，从一得势就“时时乘间窃弄威福”，常常背着皇上，私下处理政务，却又谎称御笔批出。言路皆安排亲党，残酷打击异己，迫害道学。为巩固地位和盗取功名，不自量力，轻率北伐。最后战事惨败，祸国殃民而自取其戮。这一观点遂为正统史家所沿袭。

不过，也有为韩抱屈者。南宋末周密《齐东野语·诛韩本末》首先提出异议，说韩侂胄“身陨之后，众恶归焉；然其间是非，亦未尽然”。许多有关韩的丑事恶事，“亦皆不得志抱私仇者撰造丑诋，所谓僭逆之类，悉无其实。李心传蜀人，去天万里，轻信纪闻，疏舛固宜。而一朝信史，乃不择是否而尽取之，何哉?”可见有些史载也不可轻信。近代史学家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卷四也认为：韩侂胄“操弄威福，有废立之

渐，无不臣之心，其所行事，亦善恶互见，不尽如宋史所诋”。如“尽以奸臣目之，不免门户道学之见”。

韩侂胄一生主要做了两件事：庆元党禁和开禧北伐。如何评价这两件事，也就是评价韩侂胄为臣为人的关键所在。恰恰在这两件事上，人们也各执己见，或截然对立。

有学者认为，庆元党禁的发动者使党争以道学之争的面貌出现，对政敌所主张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在歪曲丑化的前提下借政权力量予以全面声讨与彻底扫荡，而声讨与扫荡的正是士大夫长久以来借以安身立命的东西。于是，一切是非都颠倒了，人们毁方为圆，变真为佞，其弊不可胜言。同时，韩氏借此走上权臣之路，专断朝政。(《细说宋朝》)

也有学者认为，庆元党禁使“道学的虚伪、欺骗的本质被揭穿，孔、孟、程、朱的门徒，无地自容，是理所当然的”。(《中国通史》第五册)理学后成为一统天下之官学，它严重束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空间，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对它进行些揭露，不无益处。当然这类对理学的打击，也只是统治者内部的党争而已，斗争过于残酷。

否定开禧北伐者，如虞云国《细说宋朝》认为发动者纯属政治投机和军事冒险，不认真衡量敌我的力量对比。“南宋自个儿未有振起之形，却要去打‘宇内小康’的金朝，其结局不言而喻”。所以，其是在专制独裁政体之下，以民族或统一的名义，贸然将国家拖人一场“不度事势”的战争，给人民带来更大的灾难。郦家驹也认为，把金章宗时的形势估计为乱亡之势指日可待是缺乏根据的，韩发动的北伐是对辛弃疾的曲解，不但用人不当，错误估计形势，而且是为巩固自己权位的一种政治投机，不见得是坚定的抗战派。

而周密《齐东野语·诛韩本末》说：“寿皇(宋孝宗)雄心远虑，无日不在中原，侂胄习闻其说，且值金虏寖微，于是患失之心生，立功之念起矣。”是说开禧北伐乃继承孝宗皇帝恢复中原之遗志。当时抗战派人士也深受鼓舞，如辛弃疾嘉泰末入朝，在分析金朝的国内形势后，力言“金国必乱必亡”，要求宋廷委付大臣备战北伐。北伐初胜时，辛弃疾还作词赞

颂韩侂胄。陆游也对韩侂胄北伐寄予很大希望，八十二岁了还作诗言志："中原蝗旱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诏。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似乎还想上战场，从这位老人身上能折射出当时民众的振奋精神。韩侂胄被害，嘉定和议后，陆游又写了一首《读史》："萧相守关成汉业，穆之一死宋班师。赫连拓跋非难取，天意从来未易知。"诗人借古讽今，认为由于韩侂胄之死，才导致宋军抗金的失败，反对史弥远的投降。

由此肯定开禧北伐者，认为北伐动机不纯说不能成立，北伐代表了人民的愿望和国家的统一，对一个大官僚追求这样的"功利"，我们不必苛求其"动机不纯"。当时金政权正处于由盛转衰的过程中，蒙古、西夏北方诸族的一连串反抗斗争，还有旱荒等灾害，使其统治有一定危机，而南宋有一定的潜在实力，国内也较稳定，北伐条件是基本具备的。这时发动北伐战争是正义的，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而失败了，但不能全盘否定。"军事惨败"说也值得怀疑，其失败主要是政治上指挥的失误和史弥远集团的妥协投降所致，所以史弥远一伙的求和投降才是北伐失败的罪魁祸首。

蔡美彪等着《中国通史》第五册《宋史》相关章节概括评论道："韩侂胄执政前后十三年，反道学，贬秦桧，发动北伐战争，虽然由于用人不当，遭到叛徒和投降派的破坏而失败，但在政治上、思想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岳飞因抗金得胜而被谋害。韩侂胄因出兵失败而被暗杀。他们都是因为坚持抗敌遭受迫害而牺牲。但由于韩侂胄大力反朱熹，长期遭到孔、孟、程、朱门徒的咒骂。元代儒生修《宋史》，特立《道学传》崇程朱，又立《奸臣传》不列入史弥远，反而将韩侂胄与秦桧并列，辱骂他是'奸恶'。这段被歪曲了的历史，应该恢复其本来面目了。"

虞云国《细说宋朝》对韩持基本否定观点，前已略述，分析得也相当透彻。但又指出："韩侂胄是权臣。却不是奸臣与逆臣，《宋史》将他列入《奸臣传》，显然有失公正。"正如郦家驹也认为把韩侂胄与秦桧并列为奸臣确实不公平，应作重新评价。其实从上述分析的各种情况而言，如何评价韩侂胄的历史功过，确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绝非是一个"权臣"概念所能包含的。

朱熹是哪里人朱熹的祖辈为江西婺源人，不但祖坟在婺源，而且皇帝下诏朱熹故乡婺源为阙里，还诏旨在婺源兴建朱熹祠庙。然而朱熹父亲带着祖父较早就移居了福建，朱熹不但出生在福建，且一生大部分岁月都在福建度过。你说朱熹的籍贯在哪里呢?

朱熹字符晦，后改为仲晦，别号晦庵，六十岁后称晦翁、晚号遁翁，又号云谷老人、沧州病叟、遁翁、紫阳等。在古代社会中，出名的文人有众多别号，并不稀奇。奇怪的是，朱熹著述文章，往往采用不同的籍贯，作为署名时的定语：如邹县朱熹、吴郡朱熹、丹阳朱熹、平陵朱熹、新安朱熹、婺源朱熹、紫阳朱熹……这一现象使人们产生疑问：朱熹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籍贯?尤其是邹县、吴郡、丹阳、平陵等地，宋时早已撤置，朱熹为什么将这些地方作为自己的籍贯呢?

这要从朱熹的先祖说起，答案只能在其祖上不断改变的迁徙地中找到。据考索，朱熹的始祖邾子所居邾国，就位于山东南部的邹县，“沂”通“熹”，所以朱熹时会署名“空同道士邹诉”，“邹诉”即“邹县朱熹”。到战国末年，邾灭而迁沛，沛地属徐州，朱熹的先人移居江苏徐州一带。后汉时又迁回山东北部的青州，然后再南迁过江至吴郡(今江苏苏州)、丹阳(位今安徽马鞍山东南的当涂县境内)等地，东晋时朱氏再迁平陵县(今江苏溧阳县西北)，唐时再迁至徽州黄墩，隋唐时或称新安郡。上述朱氏先祖的迁徙情况，主要得之于族谱的记载，而族谱中采于传说、自行附会之处俯十皆是，许多地方是不可靠的。而朱熹将其作为籍贯别号，可见其怀祖思想之浓烈。

朱熹之宗族真有史实可考的家谱，是从唐末开始。其远祖朱古寮当时在歙州刺史陶雅手下为将，率兵戍守婺源，遂在此安家，当地的紫阳山颇有风光，遂成为地方的一个标志。朱氏在这里生活到第八代，就是朱熹的父亲朱松，进士出身，北宋宣和年间授建州政和县尉，正逢睦州方腊起义，危及家乡，便携全家寓居政和(今属福建)，其父朱森(朱熹祖父)随子赴闽，后病死也葬于政和县。朱松调任剑州尤溪(今属福建)县尉，家又迁居尤溪，建炎四年(1130)，朱熹就诞生于此地。

朱松后又当过秘书省正字、校书郎、著作郎、度支员外郎诸职，性情刚直，不久辞官，退隐尤溪城外毓秀峰下。绍兴七年(1137)，移居建

州建瓯(今属福建)。绍兴十三年(1143)，朱松过世，托孤于朋友、右朝议大夫刘子羽，刘在其家乡崇安(今福建武夷山)的五夫里盖房，安置朱熹母子，生活颇为安逸。绍兴十七年(1147)，朱熹在建州(今福建南平)参加贡举考试，说明朱家早已取得当地的户籍。

朱松虽携眷长期寓居福建，但作为“婺源著姓”，在婺源老家仍有一定的产业，且还不时怀念故乡。朱松在福建做官，曾以“紫阳”之名刻其印章，以念故土。朱熹后在崇安寓居时，“在五夫里之潭溪，晦翁筑室于此，匾曰：紫阳书堂”(《崇安县志》)。据《朱子年谱》载，朱熹曾两次回婺源老家：第一次是绍兴二十年(1150)春，朱熹二十一岁，回老家省墓。第二次是淳熙三年(1176)春，朱熹四十七岁，也是回去修整祖墓。说明朱熹与老家婺源一直保持着联系。

然而，朱熹一生七十一岁，有五十多年生活在福建武夷山及其周围的闽北地区，其中在尤溪约八年，在建瓯约七年，在崇安(今武夷山)一带生活了约三十余年，而外出为官或活动的时间合计才十三年多。晚年根据父亲的遗嘱，移家定居于建阳县(今属福建)的考亭，约生活了五六年时间，其实此地离武夷山也很近，世称“朱考亭”，死后葬于建阳塘石里之大林谷。后人称朱子学派也或作“考亭学派”。

从上述情况看，作为“婺源著姓”的朱家，从唐朝末年到北宋末年，在徽州婺源生活了二百余年，那么，朱熹的籍贯应该是“徽州婺源人”，《宋史》本传也如是记载。南宋度宗曾下诏朱熹故乡婺源为阙里。元代又诏旨在婺源兴建朱熹祠庙。清代已形成如此观念：婺源之有朱子，犹如邹县之有孟子，曲阜之有孔子。所以婺源是朱熹的籍贯，应无疑问。问题是徽州处于浙江、安徽、江西的三省交界处，清康熙年间此地属安徽省，有人据此以为朱熹是安徽籍。民国时期，婺源划归江西，故也有人以为朱熹应为江西籍。

最麻烦的是，有人提出朱熹应为福建籍，理由是朱熹出生时，其祖父、父亲两代人已移居福建。朱熹不但出生在福建，且一生大多数时间也在福建度过。就以古代户籍制度而言，有正籍、寄籍、占籍之分，祖父、父亲及本人三代都居于当地，立有户籍，即为“正籍”，正籍就意味着取得了当地籍贯的法定资格。其十八岁时在建州参加贡举考试，便是

最好的佐证。然而，朱熹出生在尤溪、户籍科举在建州，一生主要的读书写作生涯在崇安渡过，晚年及葬在考亭，其中哪一个算其区域籍贯呢?

从上述情况来看，要确定朱熹的籍贯是不容易的。问题是中国在确定一个人的籍贯方面所使用的标准还颇模糊，一遇上像朱熹这样较为复杂的人物就无能为力了。

“朱、唐交奏”案大理学家朱熹与学者型官员唐仲友在南宋中期突然交奏起讼，彼此攻讦，大有不共戴天的味道。朝野舆论顿时哗然，人们纷纷猜测，其原因何在呢?在分析了各种因素之后，还是理不出个所以然来。

南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发生了一桩轰动朝野的弹劾公案，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朱熹，连续上了六道奏章，按劾台州知州唐仲友不法之事，措辞激烈，举证繁杂。唐仲友也不甘示弱，驰奏辩白，并反过来指责朱熹弄虚作假，执法违法。朝野上下顿时舆论哗然，士大夫们议论纷纷，或尊朱抑唐，或褒唐贬朱，毁誉相半，莫衷一是。

宋孝宗接到朱熹的弹劾状和唐仲友的声辩疏，互相揭发的都是一些当时士大夫中司空见惯的“不法行为”，如私狎官妓、私役工匠、经商谋利等，一时也难以判别是非，只得问宰相王淮，王淮只轻描淡写地评论道：“只是秀才争闲气罢了。”最后，朝廷只得“两平其事”，没有加罪于唐仲友，只是撤销了对唐的江南西路提点刑狱的任命而已。

唐仲友，字与政，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颇有才华，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历任建康府学教授、秘书省正字、知信州、知台州。曾上万言书论时政，做学问方面偏重儒家经制，代表作是《帝王经世图谱》十六卷、《六经解》一百五十卷，还有《孝经解》、《九经发题》等，大都已失传，不过说明唐仲友也是一位进士出身的学者型官员，学者称说斋先生。朱熹是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著作等身，时已为理学大家。那么，两位饱学之士，为何彼此攻讦，发动这场公案呢?

朱熹在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任上才一年，就一连奏劾了好几个贪官污吏。如奏劾绍兴府差指使密克勤偷盗赈济的官米四千余石，弹劾隐

瞒灾情、谎报政绩、横征赋税的衢州守臣李峄，奏劾元差监酒库张大声、孙孜等人检放不实，还弹劾了依仗权势兼并土地、赈粜济米时减克升斗的县尉朱熙绩，又奏劾知江山县王执中、知宁海县王辟纲等渎职……作为监司，就应该监察各地方官吏的行政行为，这是朱熹的职责，所以朱熹同样弹劾知台州唐仲友的不法之事，这也应在情理之中。况且朱熹经过周密的调查和紧张的审讯，掌握了唐仲友在台州大量不法行为的证据，案件牵连到数百人。根据当时朱熹和唐仲友的地位和处境，朱熹不可能凭空捏造唐仲友的罪行，就是说，朱熹的六道奏章中所说的罪状大都是事实。所以，它为什么不可以是正常的官场行政行为呢?

可能因为朱、唐二人都为学界名人，名人交讼，且又连上数道奏章，引起人们的格外关注，由是各种猜测纷纷出笼。一般以为，朱、唐矛盾，主要是由两人学术见解的分歧而引起的。在理学方面，唐仲友的许多观点与朱熹相左，有的还针锋相对。唐仲友与宰相王淮是同乡，还有姻亲关系。王淮曾擢迁郑丙为吏部尚书、陈贾为监察御史，使两人协力攻击朱熹的道学，开庆元伪学党禁之先声。唐仲友与郑丙等的关系也都不错，也曾跟着王淮反对道学，自然与朱熹产生嫌隙。

还有人以为先是吕祖谦曾与唐仲友同书会时有龃龉，而朱熹总是袒护吕祖谦，而故意抑制唐仲友，因此两人埋下了不和的种子。其实，当时士人之间的学术见解有分歧是正常现象，如陈亮与朱熹友善，然论学则冰炭不相容，两人曾进行过多次“王霸义利之辩”。朱熹与陆九渊、吕祖谦之间，也都曾用书信往来或讨论会的形式，进行过激烈的学术争论，但互相间相处还是一如既往。所以，朱、唐间发展到两人在政治上互相攻击，乃至你死我活的尖锐程度，想必还应有其他相关的一些原因。

周密《齐东野语·朱唐交奏本末》认为，是唐仲友平时恃才傲物，轻侮朱熹，而陈亮颇为朱熹所推重，与唐仲友却时有矛盾。有一次，陈亮游历台州，看中一名官妓，就嘱托唐仲友为其赎脱官籍，以便自己能与之相好，唐答应了。唐仲友在一次集会上遇到这个妓女，就说：“你果真想跟从陈官人吗?”妓女被问得不知如何回答，唐却接着说：“那你就要做好忍饥受冻的准备才行。”此妓听了若有所悟，显得非常怨愤。自此，陈

亮再去此妓女家时，再也看不到从前她那曲意奉承的样子了。陈亮知道被唐仲友所玩弄、出卖，便去见朱熹。恰巧朱熹任两浙东路监司，问起："近日小唐又在说什么坏话了?"陈亮乘机挑唆道："唐仲友说你连字都不识，如何当监司?"朱熹听了，心中不快，一时新恨旧账一起涌上，借口部内有冤狱，要求再次巡查。朱熹到达台州时，唐仲友偏偏又出迎怠慢，朱熹就更相信陈亮的话了。于是马上收缴了唐的官印，交付给随从官员，开始搜集唐在台州为官时的种种越轨和不法行为，写成奏状向朝廷告发。

其中主要是说陈亮在其中挑唆。陈亮，字同甫(或同父)，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饱读史书兵法，下笔数千言立就，政论气势纵横，词作才气豪迈，还喜谈边塞攻略之事，学者称龙川先生。几次诣阙上书，极论时事，反对和议，力主抗金。遭人嫉恨或被人诬告，几度入狱。然而出狱后，志气益励。绍熙四年(1193)，中进士第一，授签书建康府判字公事，未行而卒。为人脾性豪放，他会做出上述偏狭小家之举吗?同时，朱熹也会为唐仲友"连字都不识，如何当监司?"一句类似玩笑话。就恨得咬牙切齿吗?近代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断言："宋人小说多不足信……所记朱、唐公案，恐亦未足信也。"

然而有学者指出，陈亮挑唆一说还是有蛛丝马迹可寻。陈亮在淳熙十年写给朱熹的一封信中透露："去年之举，'震'九四之象也……至于人之加诸于我者，常出于虑之所不及，虽圣人犹不能不致察。奸狡小人虽资其手足之力，犹惧其有所附托，况更亲而用之乎!物论皆以为其平时乡曲之冤一皆报尽，秘书(指朱熹)岂为此辈所使哉!为其阴相附托而不知耳。亮平生不曾会说人是非，唐与正乃见疑相谮，是真足当田光之死矣!"话中一方面反驳"物论"所说朱熹把唐仲友平时造就的"乡曲之冤"全部报尽，指出朱熹是不会受唐的"乡曲"指使的。一方面也极力为自己辩护，表白"至于人之加诸于我者"，"亮平生不曾会说人是非"。由此判断，唐仲友确曾怀疑是陈亮从中挑唆。那么，到底陈亮是否在其中有所挑唆?又对唐仲友加以何等不实之词?而促使朱熹最终采取这极端手段，我们还是不得而知。

朱熹的思想价值朱熹完成的理学思想体系，对中华民族产生了长久的、深刻的影响。然而人们对于它的历史作用的评价，在不同的历史时

期却大相径庭，其波动幅度之大，真可谓一个捧上九天，一个打入地狱。其中，各类学者采各自完全不同的说法，其观点也或有天壤之别，这在学术界实在是非常少见的。

朱熹受业于父亲朱松及胡宪、李侗诸师，得程颢、程颐之传，兼采周敦颐、张载诸人的学说。以儒家的政治伦理观为中心，糅合佛、道思想，把自然、社会、人生等方面问题融为一体，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完成了一个对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影响巨大的理学思想体系。主要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伊洛渊源录》、《资治通鉴纲目》、《名臣言行录》、《书集传》、《诗集传》、《楚辞集注》、《周易本义》等，后人为其编纂了《朱子语类》、《朱子遗书》、《朱文公文集》、《朱子全书》等。可称成就斐然。

绍兴十八年(1148)，朱熹十九岁登进士第，后授同安县主簿。乾道时为枢密院编修，至淳熙中，年近五十才迁知南康军，改提举浙东茶盐公事。光宗时，历知漳州、秘阁修撰、知潭州等职。《林下偶谈》载：“晦翁帅潭，一日赵丞相密报：‘已立嘉王(宁宗)为今上，当首以经筵召公。’晦翁藏袖内，竟入狱取大囚十八人立斩之。才毕，而登极赦至。”或可见其为官作风。宁宗即位，朱熹六十五岁，除涣章阁待制兼侍讲，给皇帝进讲《大学》。但只做了四十六天侍讲，就被免职。时朱熹见权臣韩侂胄结党把持朝政，便直言上疏，指斥韩侂胄任意进退大臣，紊乱朝纲。韩大怒，遂把朱熹看作眼中钉。

绍熙五年(1194)十月的一天，宁宗召倡优们进宫演戏，韩侂胄特别安排，让戏子峨冠阔袖，扮成朱熹讲学模样，并把朱熹倡导的性理之学擅改为诙谐迂阔的空淡，让宁宗感到轻浮好笑。韩便向宁宗说道：“朱熹所讲道学实是伪学，毫无用处，此人不可再用。”当时一些文人在诗词、文章里也时或斥责其道学的空谈性理、无用误国。宁宗本来就不太喜欢这个古板的教书老头，便正好下诏解除了朱熹的侍讲官职。朱熹只得带着提举宫观的闲职，回到福建崇安，在家乡召徒讲学，从此被逐出政坛。

庆元二年(1196)，朱熹在家讲学，听到朝中一些大臣无辜被害，上章力辞其闲虚职名，以表愤慨。而权臣见辞章，又奏劾朱熹十大罪状，

下旨削去朱熹职名。学生蔡元定等也被指责佐熹为妖，编管道州(今湖南道县)。这十大罪状中，虽有许多诬蔑不实之词，但在用一些事实揭露其道学的虚伪方面也不无价值，如揭发讥讽朱熹“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谓其修身可乎?”“据范染祖业之山，以广其居而反加罪其身”等。朱熹在《落秘阁修撰依前官谢表》中也承认：“私故人之财，而纳其尼女，规学官之地，而改为僧坊。”不久，朝廷又加以“伪学逆党”的罪名，进行大肆迫害。朱熹作为“伪学”之首，被官员学人们纷纷横加指责和攻击，所有著述被查封，甚至有人上书乞斩朱熹。其门徒有的进山隐居，不敢露面；有的易衣冠，狎游市肆，以示与“伪学”划清界限。朱熹晚年就在如此寂寞惨淡的境遇中，遭受煎熬。

庆元六年(1200)，朱熹在悲愤交织中病卒，享年七十一岁。官府的罪名约束和严密监视，使其众学生不敢前来奔丧吊唁，葬礼十分凄凉。这位一生为封建统治呕心沥血的思想家，结果却被统治者列为“伪学之师”而含恨离开人世。他的有关“理学”的思想体系全被作为“伪学”，受到禁锢和排斥，朝廷还立《伪学逆党籍》，株连所及，有记载的就有五六十人。

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朱熹“理学”思想的理论价值愈来愈被统治者所赏识，也愈来愈被推崇。朱熹死后第九年，朝廷就诏赐朱熹遗表恩泽，“谥曰文”，称“朱文公”。次年，追赠朱熹为中大夫、宝谟阁学士。嘉定五年(1212)，把朱熹《论语·孟子集注》列入字学。到宋理宗时，皇帝进一步认识到“理学”有补于治道，遂特赠朱熹为太师，追封信国公，按祭祀孟子的礼仪来祭祀朱熹。宋度宗进一步下诏朱熹故乡婺源为阙里，“赐(朱)文公阙里于婺源”，已有把朱熹抬高到孔子相当地位的味道了。

元代时，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复科举。这样，朱熹理学的官方统治地位渐次确立。后又下诏在婺源兴建朱熹祠庙，命其五世孙朱勋管理，受历代统治者的朝拜。到至正二十二年(1362)，改封朱熹为“齐国公”，追谥朱松为“献靖公”，又改封“粤国公”。明代太祖、成祖都极尊崇朱学，不但继续以其为官学，规定《四书五经》、《性理》、《通鉴纲目》、《名臣奏议》等为读书和科举的范围，且下令天下学宫，祭祀朱熹，朱熹后裔可世袭爵禄，朱熹几乎取得与孔子同等的地

位。清康熙令编《朱子全书》，且亲为作《序》，直把朱熹喻孔子，预言“朱子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康熙五十一年(1712)谕旨，朱熹的牌位从孔庙东庑先贤之列移至大成殿“十哲之次”，配享先圣，其统治地位已无可动摇。

朱熹被抬入孔庙，理学被捧为官方御用哲学，甚至许吐司人把程朱理学诸籍与衣食完全等同起来。有学者认为，朱熹独能兼孔、颜、曾、孟之长。有人说：“天不生孔子，三代以上如长夜；天不生朱子，三代以下如长夜。”朱熹有这样一句话：“非徒有望于今日，而又将有望于后来也。”(《戊申封事》)这句话是应验了。

然而近代以来，人们也愈来愈感到以朱熹为旗帜的宋明理学已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其思想核心观念严重阻碍社会进步。朱熹理学中“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就是把“三纲五常”看成天经地义、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理”，而把一切不合“三纲五常”的思想行为都视作“人欲”，是大逆不道的，务必革尽除绝。为了加强君主统治这个“天理”，必须消除一切对社会不满，反对统治者的意识和言论，因为这些都是“人欲”。统治者便可从一本书、一首诗、一篇文章、甚至一个字中罗织罪名，残害具有所谓“异端”思想的人。明、清两代如此惨烈的文字狱，就是在这个理论下，名正言顺地杀人，迫害无辜的生命。统治者将自己崇奉的思想捧为“天理”，然后不择手段残酷迫害“异端”，逐渐成为根深蒂固的体制传统，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最大的文化基因障碍。

同时理学又大力提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用封建礼教杀人，其中受害最深、最烈的就是妇女。在朱熹祖籍的安徽，据《休宁县志》载，在“灭人欲”观念的引导下，明代“节妇”、“烈妇”就有四百余人，清道光间女子“不幸夫亡，动以身殉，经者、刃者、鸠者、绝粒者，数数见焉”，“处子或未嫁而自杀、竟不嫁以终身”者达二千余人。朱熹老家婺源，“节烈”、“节妇”、“节孝”等牌坊有百余处，南宋至清光绪四年，有关妇女达七千余人。在朱熹长期生活的福建，据《福建通志》载，就闽南十二县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未婚妻守节、夫亡殉节的，就有近千人，其中受朱熹影响最深的同安、晋江、尤溪三县受害最甚，如晋江城郭的旌表贞节牌坊，几乎触目皆是。施可斋《闽杂记》说：“福州旧俗，以家有烈女贞妇为荣，愚民遂有搭台死节之事。女有不愿，家人或诟骂辱

之，甚至有鞭挞使从者。”

清代戴震就说：“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朱熹所谓的“天理”，其实就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它较之以刑罚杀人更具欺骗性。再如“福建漳州女子皆小足，朱文公守漳时，立法令之缠足极小，使不良于行，藉革其淫俗，故成为今日之现象也。”(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清末谭嗣同批判道：“世俗小儒，以天理为善，以人欲为恶，不知无人欲，尚安得有天理!吾故悲夫世之妄生分别也，天理善也，人欲也善也。”现代学者蔡尚思说：“程朱派理学家最不讲理，最无良心，阳儒阴法。以理责人，甚于以礼责人；以理杀人，甚于以法杀人。”(《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

“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维逻辑，与自由、民主、人权的人类普世价值观完全背道而驰。在此思想束缚下，人们也不会有任何创造力，只会在无上权威的君主面前，培育起根深蒂固的奴隶性。这一“理学”思想发展了原儒家学说中的糟粕，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君主专制统治体制的理论基础，它统治了整个思想文化领域，是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指导原则，成为巩固君主专制统治秩序的强大的精神支柱。新文化运动时，陈独秀、鲁迅诸人深恶痛绝的国民劣根性，其实就是由宋明理学为思想基础的奴性，鲁迅还专门写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深刻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与其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矛头针对的是孔家店，还不如说人们要摧毁的其实是朱家理学体系。它实为中华民族几百年以来愚昧落后的主要原因之所在，如果中国人民在思想上不破除对这一理论的迷信。不打破这理学中所谓“天理”的窠臼，将不可能走向现代社会。

不过到了现代，又有许多学者对朱熹的学术成就作出基本肯定的评说。如肯定他撰写、编次、注释、校刊了不少著作和典籍，为保存和发展祖国文化起了重要作用。他创建书院，聚徒讲学，总结教育经验，在中国教育史上作出重要贡献。他还对自然科学作过比较广泛的研究和探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甚至说他的理学思想体系也是适应了巩固中央集权君主统治体制的要求，也起到了一些进步作用。

尤其是钱穆在《朱子新学案》中，对朱熹作出如此高的评价："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朱子崛起南宋，不仅能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并亦可谓其乃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此两人，先后矗立，皆能汇纳群流，归之一趋。自有朱子，而后孔子以下儒学，乃重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直迄于今。"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也说："朱熹，或称朱子，是一位精思、明辨、博学、多产的哲学家。光是他的语录就有一百四十卷。到了朱熹，程朱学派或理学的系统才达到顶峰……他的渊博的学识，使他成为著名的学者；他的精深的思想，使他成为第一流哲学家。尔后数百年中，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独占统治地位，绝不是偶然的。"

然而，国内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朱熹的彻底否定和大力批判，其疯狂程度是一般人难以想像的。我们只要浏览报刊上的几个标题，就会瞠目结舌。如"彻底批判朱熹的天理论"，"剥去朱熹伪科学的画皮"，"可恶的朱熹"，"戳穿朱熹的画皮"，"从神道碑看朱熹的丑恶嘴脸"，"朱熹丑史"，"朱熹《中庸章句》的反动实质"，"朱熹《四书集注》反动思想体系的批判"，"朱熹在漳州地区的罪行"，"朱熹在浙江的罪恶活动"，"撕破朱熹在湖南的反动嘴脸"，"朱熹在崇安的罪恶活动调查"……

朱熹是一位古代的大思想家。如今在大学和社会科学院中，研究朱熹的学者不少。尤其是武夷山作为文化与自然双重世界遗产，其文化方面主要就是以朱熹为首的闽学所留下的许多历史遗迹。学人们还成立了"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准备对朱熹理学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索，我们期待它能取得可喜成果。宋朝的战争史杨业北征的兵败杨业是宋代抗辽名将，杨家将的第一代英雄"杨老令公"，千百年来，其事迹广为流传。他原为北汉大将，降宋后任右领军卫大将军、代州刺史，长期镇宋太宗守边关，屡立战功，在抗辽战场上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太平兴国五年(980)，契丹大军寇雁门关，他临危不惧，率麾下数百骑出战，大破十万辽师，杀其驸马侍中萧咄李，威震塞外，号"杨无敌"。此后，契丹望而生畏，每见杨业军旗即退兵而去。然而在雍熙北征中，杨业兵败罹难，其具体结局究竟如何?谁又是造成此难的罪魁祸首?民间与史载众说纷纭，史家也意见不一。

雍熙三年(986)，经过长期准备，宋太宗决定再次发动大规模的伐辽战争，史称雍熙北征。当时辽圣宗即位不久，才十余岁一个娃娃，其母萧太后当政，宠幸用事，宋太宗认为其“主幼国疑”，正是攻击它的大好时机。北伐军分兵三路：曹彬、米信率东路军出雄州(今河北雄县)，张大声势向幽州(今北京，时为辽国南京)进发，牵制辽军主力；田重进率中路军由定州(今河北定县)进发，攻飞孤口(今河北涞源)；潘仁美、杨业率西路军出雁门关(今山西代县北)，攻取关外诸州。然后，中路军与西路军会合，挥师东进，从北面与东路军夹攻幽州，与辽军决战。

一开始，三路大军进展都很顺利。东路军一度攻占了涿州(今属河北)、歧沟关(在今河北涿州西南)等地。西路军更是战果累累，收复了朔州(今山西朔县)、寰州(今山西朔县东北)、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兵锋直指桑干河。中路军也攻克了飞孤口、灵丘(今属山西)、蔚州(今山西蔚县)，与西路军遥相呼应。辽军主帅耶律休哥仍坚守南京，避免与宋军正面交锋，同时派轻骑深入敌后，截断其粮草军需。

东路军终因粮草不济而后退，五月在歧沟关旋遭辽军主力围困迎击，惨败而奔逃，一路如惊弓之鸟，丢盔弃甲，死者过半，溃不成军。由于东路军失利，终致宋军进攻计划流产。当时，中、西两路军位置突出，辽国以耶律斜轸为山西路兵马统帅，领兵十余万向两路宋军逼近。辽军先攻陷中路军所占的蔚州，潘仁美带兵应援又告失败，辽军乘胜攻下西路军所占的寰州。宋太宗明白已失去战争主动权，只得令诸路宋军后撤。但给西路军一个任务，即在放弃四州地盘时，要掩护当地居民迁往内地。这时，中路军已安全撤回定州，西路军为掩护居民后撤而孤悬敌后，便成为辽军集中优势兵力主要追杀的目标。

七月，时西路军的应、寰二州已失守，辽军以十万人马盘踞寰州，军力强大而集中，宋军要撤出四州百姓已十分困难。西路军副帅杨业认为，辽军势盛，不可正面迎战，可佯攻应州避开敌军主力，出大石路(今山西应县西南)引出寰州辽军，并派人通知云、朔守将配合，趁机将民众撤离到石碣谷，再派数千强弩手扼守谷口，用骑兵在中路声援，迷惑和打击敌人，就能完成预定的任务。监军王优不同意，坚持出雁门关进兵寰州正面迎敌。杨业指出此举必败，王侁讥刺道：“杨将军素号无敌，如今领精兵数万，面对强敌却逗挠不前，莫非别有用意?”这时，主帅潘仁

美在旁不置可否。杨业气愤道："我并不怕死，主要是此去必定不利，不愿让士兵们白白送命。我原是北汉降将，天子不杀而授以兵柄，理应拼死疆场，只是想多立战功，以报效主恩。现在监军责我避敌，我只好挺身向前，先诸君而死了。"临行，杨业还抱败中能侥幸撤离之打算，恳请潘仁美派弓箭手扼守雁门关以西的陈家谷口，再派步兵从两翼接应，以期届时能挡住辽军的追击，救出后撤的宋军。

杨业挥泪出征，引兵南出朔州三十里。耶律斜轸见杨业军到，诱退至狼牙村，待宋军进村，辽军伏兵从四处杀出。宋军虽奋勇杀敌，终寡不敌众。溃败而撤。从中午苦战到傍晚，杨业且战且退，最后率领仅存的百余名将士冲出重围，赶到陈家谷口约定地点，只见谷口空无一人。杨业抚胸大哭，身上时已负伤数十处，为了使其他将士有可能退回中原，便令部下说："你们都有父母妻子，与我一起死不值得，可分散突围还报天子。"将士们感动得流泪，却没有一人愿意离去，仍然跟着杨业死战，又手刃敌兵数百人，最后全部殉国，写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篇章。

杨业血战到最后时刻，其具体结局究竟如何?民间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杨业身负重伤，自知壮志难酬，绝望之中，一头碰死于李陵碑上。这一说法于史无征，实为民间歌颂杨业的抗辽事业，而逐渐编造出来的。最后被元曲采用，进行提炼和渲染，如《昊天塔孟良盗骨殖》杂剧的剧情，就是杨业最后撞李陵碑而死，被番兵将尸骨焚烧，把骨殖放在昊天塔内，派兵看守，最后由孟良与杨景将骨殖盗回。这一结局颇为壮烈，所以广为流传，但实不可信。

《宋史·杨业传》载，杨业"身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犹手刃数十百人。马重伤不能进，遂为契丹所擒……乃不食，三日死"。宋人记载，辗转抄袭，大体一致。我们再看《辽史》的记载，《圣宗本纪》中这样描写：杨业"中流矢，堕马被擒，疮发，不食三日死"。《耶律奚低传》载"继业败于朔州之南，匿深林中，奚低望袍影而射，继业堕马"被擒。可见其实际情况是，杨业最后被辽军俘获，宁死不屈，绝食三日而死。

只有《辽史·耶律斜轸传》说："继业为流矢所中，被擒。斜轸责曰：'汝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今日何面目相见!'继业但称死罪而已……

既擒，三日死。”其中“但称死罪而已”似有乞降于辽之嫌疑。然而后面的“三日死”，就是说杨业绝食三日而死，足以说明这“乞降说”是不能成立的。同时，杨业宁死不屈、为国尽节的精神也同样感动着辽国的军民，最能表明辽方同样对杨业怀有崇敬之情的事，是至迟于宋仁宗中期，辽国在自己境内的古北口(今北京密云县境)为杨业修建了杨无敌庙。杨业死于山西朔县，何以庙却在密云之古北口?厉鹗《辽史十遗》卷十四谓：杨业“无敌忠义感动敌境，又何论古北口之非陈家谷也”。

神宗时刘敞与苏颂、哲宗时苏辙等人奉使契丹路过古北口时，都曾凭吊过此庙，且留下感人诗篇。刘敞《杨无敌庙》诗云：

西流不返日滔滔，陇上犹歌七尺刀。

恸哭应知贾谊意，世人生死等鸿毛。

苏颂《和仲巽过古北口杨无敌庙》诗云：

汉家飞将领熊罴，死战燕山护我师。

威信仇方名不灭，至今遗俗奉遗祠。

苏辙《奉使契丹二十八首》云：

行祠寂寞寄关门，野草犹如避血痕。

一败可怜非战罪，大刚嗟独畏人言。

驰驱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

我欲比君周子隐，诛彤聊足慰忠魂。

诗中对杨业的壮烈殉国极表惋惜，对迫害英雄的奸贼更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宋史·杨业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和《东都事略》诸史籍都记载，老将军在被俘临死前曾叹息道：“主上待我甚厚，期望我讨贼抗敌以

捍边，不料反为奸臣嫉恨，逼迫我率军赶赴死路，致使王师败绩，有何面目求活耶!”那么，谁是迫害杨业的奸臣?谁是造成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

有人认为罪魁是王优。很明显，在杨业主张避开敌人锋芒，采用声东击西转移敌军主力，趁机掩护民众撤退的战略时，王优威逼杨业率军正面拒敌，导致宋军遭受伏击而溃退。后欲争战功，领兵离开陈谷口，沿马邑川行进。听说杨业战败，干脆引兵撤退，不按约定率军在谷口接应，致使杨业身陷重围，孤立无援，战败殉国。

也有为王优辩护者，认为北伐前王优和杨业既无交情，也不存芥蒂，王优没有陷害杨业的动机。王优为后周枢密使王朴之子，入宋以后，曾从征江南和太原，征服河西也有战功。雍熙北伐作为西路军的监军，王优可能有些求胜心切，于是以为杨业畏懦不前，或可能以“逗挠不战”诸语激怒杨业，以求与辽军决战。况且王优也无通敌之嫌，故充其量也只是指挥有误，并非故意迫害杨业。

有人认为潘仁美难逃此责，尤其是民间传说的杨家将故事中，都把他作为人人痛恨的奸臣。潘仁美为赵宋勋臣，杨业只是个北汉降将，由此不完全信任杨业。尽管杨业战功累累，却屡遭他的嫉毁，多次抹杀杨业的功劳。《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一说，杨业在边境领兵抗辽很有威望，“主将戍边者多嫉之，或潜上谤书，斥言其短”。此“主将”应指潘仁美。雍熙北伐初期，潘仁美又把战初攻克四州之功归为己有，根据《辽史》有关记载，只有云州是潘仁美率军攻下，其余三州都为杨业战功，但在宋人有关记载中却都是潘仁美的功劳。最后身为西路军主帅，王优应为他的下属，明知王优之策不妥，却不加可否，听之任之，实为默许。当杨业进军遭到辽军伏击时，更屯兵不援，甚至也没按事先约定在陈谷口伏兵接应，潘、王背信弃义地撤军先跑，实是将杨业置诸死地。《宋史·潘仁美传》亦记有潘“美好乘怒杀人”之脾性。潘仁美妒功忌能，完全有故意陷害的可能。

也有为潘仁美辩护者，认为宋代监军之权大于主帅，王优坚持要杨业出兵，潘仁美无权违抗。其实，潘仁美是个老成持重、屡立战功的骁将，与杨业共事七年，齐心协力，配合不可为不默契，他何必要在战场

上陷害杨业呢?同时，潘仁美性格也较宽厚，如太祖初建宋时，入宫得周世宗子，赵普等大臣主张杀之，潘仁美不语，后言：“杀之有负世宗。”太祖便赐予为侄，潘仁美欣然领回家作养子。有如此心胸之人，为何要害共同浴血作战的同事呢？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杨业兵败罪在宋太宗。当时辽国萧太后当政，重用其宠爱的大臣韩德让，这二人协掌朝政称得上是黄金拍档，所以这一时期实为辽国历史上最为安稳发展的年代。就边境防务而言，辽国以耶律休哥为燕京留守，他不仅是一代名将，也是一位有眼光的政治家。萧太后允许他“便宜行事”，总领南面行政军务，期间史称“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不知是宋朝边境情报系统有问题，还是宋太宗对辽国国情的估计完全错误。所以雍熙北伐完全是一次军事冒险行动，太宗急于雪耻第一次伐辽的失败，草率用兵。

太宗的临战指挥也颇为荒谬。这次他没有亲征，而是用阵图遥控指挥。太宗的韬略远不及乃兄太祖，却自以为是军事天才，对武将的猜忌防范之心又十分强烈，为了做到“将从中御”(即武将出征在外仍需听从朝廷的命令)，就预先设计好阵图交给出征的将帅，令他们不折不扣地执行。要知道，战争形势瞬息万变，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及时进行信息反馈，然后再要求中央给予适当的命令调整，其阵图指挥的荒谬性可以想见。太宗与真宗两朝阵图指挥最为盛行，而这两朝也是对辽作战一败再败的年代。

此次三路军的战略，一方面战线拉得过长，力量过于分散，一方面各路军离开较远，不能及时地进行有效的配合作战。尤其是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不是迅速指示军队撤到有利位置，而是为了挽回战败的面子，要求将不能守住的地盘上的居民也要共同撤回，这不但对在战时迁徙的民众是灾难性的，同时必然会减缓军队撤退的进度，给敌人有利的进攻机遇。所以宋太宗最后要求西路军在这样的形势下出击以掩护民众撤回之命令，实在是要求军队执行一项充满危险的军事行动，杨业的兵败兆始于此。

杨业与部下全部壮烈牺牲的消息传来。北宋朝野无不为之叹息愤慨。太宗赠杨业太尉、大同节度使，赐其家布帛千匹，粟千硕，赠官诸

子。然后将王优除名，发配金州，而潘仁美“降三官”，所降的只是检校太师等虚衔。

此外，杨业原名“重贵”，因在北汉刘崇手下为官，赐姓名“刘继业”。降宋之后，太宗让他复姓杨氏，名“业”。有的史载或称“杨继业”。杨业殉国的日期基本可以考实。据《辽史·圣宗本纪》记载：“统和四年(986)七月丙子(七月初九)，枢密使斜轸奏：复朔州，擒宋将杨继业。”以“不食三日而死”算，约为雍熙三年(986)七月十二日前后。然而有关杨业的生年，史籍中却没有确切记载，造成史界说法不一。《续资治通鉴长编》说他“幼事北汉”，《宋史·杨业传》和《东都事略》说他“弱冠事刘崇”。“幼事”约指少年，《礼记》：“二十日弱冠”。据《旧五代史·刘崇传》考察，刘知远是在天福七年(942)派其弟刘崇为麟州刺史，而此时杨业的家在麟州，估计就在这时投奔刘崇麾下。就是说公元942年时，杨业约十五至二十岁，也就是生于922至927年之间。而据山西代县杨氏族谱记载，说他享年五十九岁，就是生于公元928年。也有学者认为，杨业事刘崇应在其父杨信事后汉任麟州刺史时，也就是公元947至950年间，这样杨业应生于935年左右。然而这些说法都未被学界所公认，莫辨其是。那么，杨业在什么年纪殉国的?它也是一个谜。

畲太君的家世关于杨家将的传说，北宋仁宗时期已经在民间流传开了。皇祐三年(1051)，北宋文豪欧阳修就曾称赞杨业、杨延昭“父子皆为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欧阳永叔集》卷二十九《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大约从这时开始，杨家将的传奇故事在人们的传说中日益丰富，同时也产生许多谜团。杨业之妻畲太君，就是一个不见于正史的传奇人物，她的姓氏、身世、事迹令学界疑惑不解。

第七章

据小说戏曲及有些地方志描述，畲太君出身将门，性情敏慧，善于骑射，作战勇敢，曾帮助杨业立过军功。杨业兵败殉国之际，潘仁美、王优畏罪而欲掩盖事实，甚至捏造出杨业逞能，孤军深入，导致兵败身亡的谎言，蒙蔽宋太宗。杨六郎从战场回来，告之母亲实情，畲太君毫无畏惧地上书告御状，力辩丈夫苦战获死之由，终使宋太宗了解实情，处分了王、潘诸奸臣。太宗下诏褒恤，有谓："群帅败约，援兵不前，独以孤军，陷于沙漠，寡不敌众，力战殉国。"如果不是畲太君挺身敢告御状，甚至有的剧本还写畲太君大闹朝堂，得到一些正直大臣的帮助，则很可能杨老令公要屈死敌国，那些奸臣也会逍遥法外。

杨业殉国后，畲太君在家中训练子女、婢仆习武，组成杨门女将，时刻准备效力于国家。据说其武艺和战斗力要超过朝廷所统辖的正规禁军，后来，果然产生了杨排风英勇杀敌，穆桂英挂帅，十二寡妇西征等感人故事。原来深居闺阁的柔弱女子，在杨家能训练成为驰骋疆场的战将，且出现这样一个女将团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畲太君的将门豪迈风范从中可见一斑。

然而上述事迹乃至畲太君为杨业之妻等基本史实，都不见于宋代正史，或宋代文人的有关笔记。其相关内容最早见于元代杂剧，如《昊天塔孟良盗骨殖》杂剧的剧情中，杨六郎自道："母亲畲太君。"《谢金吾诈拆清风府》杂剧中也有"老身畲太君的便是"等台词。到清代方志和文人笔记中，开始出现杨业娶折德扆之女的说法。如乾隆《保德州志》(今山西保德县)卷八载：畲太君墓在州南四十里折窝村。《北宋纪说》日，杨业娶府州(今陕西府谷县)畲氏，称太君。其父折德康为麟州刺史，又迁火山军节度使，杨业为代州刺史，距离都不远，故两家缔姻。其他，如乾隆时毕沅的《关中金石记·折武恭公克行神道碑》、乾嘉时康基田的《晋乘搜略》、光绪时《岢岚州志》等也有类似记载。《晋乘搜略》还说："岢岚州掘地得石，拭视为杨氏墓碣，载折太君事。"晚清李慈铭《荀学斋日记》甚至谓："折窝村有大中祥符三年折太君碑。"不知是否真有此事。反正这些墓碣现都已不知下落，所以我们无法了解畲太君更

多的事迹。

折德扆在《宋史》中有传。畲家原为云中(或称云州，今山西大同)大户，约五代动乱中迁居府州(陕西府谷县)。从五代后唐时起，太君祖父畲从远为府州刺史。从远抵抗辽兵有功，兼领朔州刺史、振武军节度使。后汉时，置永安军于府州，从远为节度使，又迁武胜节度使。太君父畲德康，后周时为府州防御使，屡挫北汉军的进攻，升永安军节度使。显德六年(959)，周恭帝即位，德康自检校太尉加官太傅。入宋以后，仍任永安军节度使，曾率军破北汉诸城。干德二年(964)去世，享年四十八岁。有子畲御勋、畲御卿，应为畲太君的兄弟。先后袭爵知府州。畲御卿还率军征战北汉与辽、西夏，战功累累，淳化五年(994)授永安军节度使，次年，牺牲在抵抗辽军的战场上，时年三十八岁。其子惟正、惟昌、惟忠，先后袭知府州事，乃为畲太君的侄子辈。直到北宋后期，其后代畲克行袭位，守边三十年，善抚士卒，在抗击西夏战役中功勋卓著，谥武恭公。今陕西府谷孤山堡南有折克行墓，勒有《畲武恭公克行神道碑》。可见，畲氏为世代将门之家，世守府州。

光绪刊《山西通志》卷五十六，对杨畲婚事提出质疑，说："按德扆守府州，屡败北汉兵，宋干德中卒，而业是时则为北汉将也。存以备考。"不妨认真考察一下：畲德扆于干祐三年(950)为后汉的府州团练使，时年三十四岁。如有女儿的话，约十六岁左右，亦可出嫁了。杨业这时二十岁出头，也在后汉刘崇部下为军官。如这时两家攀亲，可谓门当户对，没有什么可疑的。山西临县有七星庙，传说是杨业与太君喜结良缘之地，晋剧《七星庙》还用戏剧形式演绎此事。至北汉和后周对立，畲德康归后周而杨业跟北汉，岳父女婿分属两国，那是后来的事，也属不得已。

近代学者常征、余嘉锡、聂崇歧等人以大量的地方志资料进行考证，最后同意畲太君即折太君之记载，畲、折二音相近，西北有些地区"折"音如"蛇"，与"畲"差不多，所以畲、折一音之转而致误。虽然许多人赞同此说，但仍有人怀疑，因为《宋史》折德扆传中，仍不见其嫁女与杨业之记载，上述《山西通志》之质疑也颇有道理，一是两家门当户对的时间相当短促，二是届时三十四岁的折德康是否已有十六岁以上的女儿，三是两家如已结姻，岳父女婿又很快分属两国的情况也难以自圆

其说。总之，由于正统史籍记载阙如，而主要靠清代地方志及一些文人笔记保留下一些北宋畲太君的痕迹，其可信度如何，确难判断。

杨延昭排行与称呼杨家将中除杨老令公外，就数其子杨延昭的名声最为如雷贯耳了。他智勇善战，在边防二十余年，军功卓著。史书载，契丹军屡为其败，“惮之而目为杨六郎”。今天晋西北宁武关周围各县，也遗存有好几处“杨六郎寨”，这些都是杨延昭生前率军活动的区域。据学者考证，延昭并非杨业的第六子，那么“杨六郎”的称呼是怎么产生的?是辽方还是宋方先有此称呼?其真实含义杨延昭又是什么?

杨延昭本名延朗，年幼时沉默寡言，喜为军阵之类游戏。杨业尝言：“此儿最像我。”成年即入军伍，跟从父亲征战，史载杨业生前，“每征行，必以从”。太平兴国中，补供奉官。雍熙北征，杨业率军攻打应州和朔州，延昭担任先锋，在朔州城下冲杀时，被流矢射中手臂，却愈战愈勇，杀敌无数。战后，授崇仪副使，出知景州。又迁崇仪使，知定远军。

咸平二年(999)冬，延昭任保州缘边都巡检使，驻兵遂城。辽军在萧太后的统领下，长驱直入，宋军节节败退，遂城被围。敌人集中优势兵力，急攻数日，城小兵寡，众心危惧。延昭悉集城中壮丁，发给武器装备，登城顽强抵抗。会一夜寒流降温，延昭令士兵汲水灌到城墙之上，清晨该城变为冰城，城墙坚固熘滑，辽兵无法攀登，只得撤退而去。延昭乘机尾随出击，截获很多武器铠甲。以功拜莫州刺史。宋真宗高兴地说：“延昭为名将之后，治兵守边有父风，真应该称赞啊!”

景德元年(1004)，契丹主与萧太后指挥二十万人马，大举南伐。宋廷没有坚决抵抗的勇气，最后与之签订澶渊之盟。这时，朝廷也只给杨延昭统帅刚满万人之军队，但延昭并不气馁，提出建议：敌顿澶渊，离境千里，虽人数多，且为骑兵，但人马疲乏，只需令诸军扼守要路，伏击掩杀，便可歼其大部，幽、易数州也可乘时袭取。可惜一味屈辱求和的宋真宗，并不理会这一建议，还特别下诏，令前线诸将按兵不动，使辽兵从容退回，且在途中再次掠劫。延昭只得率领部属单独行动，“抵辽境，破古城，俘获甚众”。真宗得知后，马上派人到前方监视延昭的行动，不许继续打下去。

此后，朝廷不断下令，明白警告杨延昭，他的官任是维持保州境内治安，不准越出边境与契丹发生冲突。不久官徙高阳关副都部署，戍守屯所，边境安然。延昭所得奉赐悉犒军，与部下同甘苦，身先士卒，号令严明。在边防二十余年，契丹忌惮之，称他为杨六郎。大中祥符七年(1014)，延昭过世，享年57岁。没过多少年，杨家将的故事开始流传，延昭的智勇善战又被进一步传奇化，特别是其“杨六郎”的称呼，几乎家喻户晓。

杨业应有七个儿子，或者说杨延昭兄弟七人。《续资治通鉴长编》谓杨业殁后，太宗“录其子供奉官延朗等五人及贵子二人”，共为七人。《宋史·杨业传》说杨业与其子杨延玉殁于陈家谷之役后，“朝廷录其子延朗为崇仪副使，次子殿直延浦、延训并为供奉官，延环、延贵、延彬并为殿直”，也为七子，问题在于其兄弟的排行。按照中国古代严格的宗法制度所形成的规范，朝廷赠官必须服从长幼有序的原则，既然《长编》与《宋史》都将诸子的顺序以延朗“领衔”，那他分明应为长子。惟一的问题是牺牲的杨延玉，他与延朗，孰为老大，史书中没有交待。因为有可能老大牺牲后，由老二领衔。延朗即延昭，或称杨六郎，他在兄弟七人中并不排行老六，是可以肯定的。

宋末元初徐大焯着《烬余录》则说，契丹“犯寰，(杨)业出战，死之。长子渊平随殉，次子延浦、三子延训，字供奉；四子延环、初名延朗、五子延贵，并官殿直，六子延昭，从征朔州，功加保州刺史。真宗时，与七子延彬，初名延嗣者，屡有功，并授团训使。”余嘉锡《杨家将故事考信录》认为，上述“所载诸子次第，乃颇有据。史称延浦为次子，则延玉必为长子，延昭为六郎，则排行必第六，故其次序如此。民间之流传亦有不诬者，此类是也。”徐大焯把延朗、延昭判为二人，将延玉改为渊平，并未标明出自何处，而余嘉锡先生竟笃信不疑，殊使人不解。

《宋史·杨延昭传》开头就说：“延昭本名延朗，后改焉。”《东都事略·杨业传》也曾明白交代：“延朗下一字犯圣祖名，改延昭。”宋真宗时，迷信道教，尊道士赵玄朗为“圣祖”。大中祥符五年(1012)下诏：“圣祖名上日玄，下日朗，不得斥犯”。此年十一月，改地名朗州为鼎州(《长编》卷七十九)。就是说，杨延朗在五十五岁时不得已才改的名。这一点就足以否定徐大焯《烬余录》中所谓的延朗兄弟之排行。而其他

元代杂剧和明代小说演义之类，也都将延昭、延朗分为二人，往往把延昭、延朗分别排为老四和老六，也是不可信的。

那么，杨延昭为什么被称为“杨六郎”呢?一般认为，这是延昭在杨氏宗法大家族中的排行，即在同一先祖的同辈兄弟中的排行。据史书记载，杨业有弟弟杨重勋，为麟州刺史。有学者指出，杨业之长子与其叔父之子一起排行的话，一般也不会排行老六。如据欧阳修的《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所载，重勋有子杨光康，系延昭之堂弟，所以在家族的大排数中，延昭也不居老六。当然，杨业是否还有其他兄弟、堂兄弟，我们不得而知。

《晋乘搜略》说延昭“小字(乳名)六郎”，恐怕也只是猜测之词。

《长编》、《宋史》、《隆平集》、《东都事略》等书说杨延昭是被契丹人称为杨六郎，有学者认为这可能与契丹风俗有关。或说古代往往以天上星宿比拟世间大人物，如唐代大臣狄仁杰，被誉为“北斗以南，一人而已”。契丹称宋为“南国”、“南朝”，就有可能赞许杨延昭为“南斗”，而当时“南斗六星”已为习惯语，久之“六星”或昵称“六郎”，这样“杨六郎”的称呼就出现了，这和称杨业为“杨无敌”是同一意思。此说也谈不上有什么可靠的依据，又是一种主观蠡测而已。

穆桂英与杨宗保杨家将中穆桂英之形象，也可说是家喻户晓。她不但貌美端庄，且武艺高强，曾挂帅率领宋军抗辽，保家卫国，是杨家将中之巾帼英雄。其夫杨宗保也是少年英雄，其武艺韬略更胜其父辈，指挥宋军，大破辽兵天门阵，给契丹以致命打击。然而，正史中却没有这一对夫妇的名字，宋人笔记中也没有其夫妇相关的事迹，她们是否为小说戏曲中虚构的人物，还是历史上真有其人?

小说戏曲中，穆桂英是穆羽的女儿。穆羽字洪举，河南人氏，做过汝州兵马统制。穆桂英从小在父亲的传授和熏陶下练习武艺，练得一手百发百中之箭，舞得一口威武有力之刀。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占据山东穆柯寨，为一寨之主。杨宗保率宋军抵抗辽兵，为了破辽军的天门阵，必须用“降龙木”做斧把的大斧，而这“降龙木”只有穆柯寨中生长有两株。穆桂英不同意借用此木，杨宗保便率孟良、焦赞诸将攻打穆柯寨。宗保

在战穆桂英时，桂英卖个破绽拍马而走，宗保以为得胜便乘势追赶，不防被她用箭射中坐骑，翻身落马，被押回山寨。穆桂英倾慕宗保的英武刚强，亲解其缚，主动求爱，两人即日成婚。于是，穆桂英带上“降龙木”大斧，帮助杨家将大破辽兵的天门阵，取得抗战的胜利。

小说戏曲中，说杨延昭之子名宗保，宗保之子为文广，与正史不同。《宋史·杨延昭传》、《隆平集》等史籍，明明说延昭之子是杨文广，而没有杨宗保其人。如《隆平集》载：“诏录其子传永、德政、文广有差”，杨文广或是延昭的第三子。而明初宋濂的《杨氏家传》则说，延朗(即延昭)之子名充广，充广之子名贵迁，贵迁有三子，曰光震、光荣、光明。光震有子五人，曰文广、文真、文锡、文贵、文宣。按此说，文广为延昭的玄孙，中间隔了好几代，不知其所本。而文广与其曾祖充广，同用一个“广”字，这也是不太可能的，估计这家谱有伪造的嫌疑。总之，都不见杨宗保其人，应是小说家的虚构了。只有《烬余录》说：“延昭子宗保，官同州观察”，大概是沿袭宋元话本的说法。

小说戏曲在述说杨宗保攻打天门阵后的活动，有“兵征西夏”诸事，这和杨文广的事迹颇接近。《宋史·杨文广传》载：宋神宗熙宁初，杨文广任兴州防御使，在秦凤副都总管韩琦属下，筑城抵御西夏军马，在西夏军退却时，文广遣军追袭，斩获甚众，得诏书褒谕，曾长期领兵抗击西夏。后迁官定州路副都总管、步军都虞侯。熙宁七年(1074)，辽人来争河东地界，双方在代州开会协议。文广献出阵图，并提出袭取幽燕的战策。就在这年的十一月去世，朝廷“赠同州观察使”，这又与《烬余录》所说的杨宗保的官位同。有学者以为，杨宗保就是杨文广的影子，小说家将一人拆成父子两人，以增加杨家将故事的传奇色彩。

也有学者认为，既然杨延昭有三子，宗保有可能与文广是兄弟。《欧阳文忠公集·镇潼军节度观察留后李公墓志铭》云：其墓主“女四人，长适皇侄右屯卫大将军、吉州团练使、建安郡公宗保”。是说宋仁宗有宗室族弟赵宗保，恰与杨宗保同时，或因与皇家宗室同名，于是将杨宗保改为杨充广，或为杨传永。是否有此可能，不得而知。

最近更有一种令人瞠目的说法。是说前些年在洛阳新安县五头乡潼沟村出土一块北宋杨老令公的停灵碑，碑文有这样的记述：“北宋朝杨令

公之丘陵也，有女孙杨宗保感祖之义，居庐于此，遂人道而为观焉。”于是，有人相信此碑所记，认为杨宗保是杨业的孙女，杨延昭的女儿(见《人民日报》1985年7月报道)。就是说杨宗保实有其人，但是位女性。那么，难道是后人把这位女性杜撰成一员威风凛凛的大将?其实，北宋时人们记事不可能出现“北宋朝”这样的名称，就是说这碑记绝不会是出自北宋时人的笔迹，至少是数百年后有人所作的一个追记，那又有多少可信度呢?

穆桂英的姓名与事迹，不见于宋人的有关史籍。但在雁门关南北地区，至今还流传着关于她的遗事传说，及与其事迹相关的一些地名。如山西繁峙县北三十里有穆桂英山；县西南有“木阁村”，据说“木阁”原是“穆柯”的转音。浑源县城南也有穆柯寨。并有穆桂英攻打浑源的传说。这些地方，正是宋辽边界的交错区域，当年许多战争在这一带展开。小说戏曲中的“山东穆柯寨”，如系指恒山或雁门山之东，就和这些地区颇为接近。

乾隆《保德州志》卷二载：“延昭子文广，娶慕容氏，善战。今州南慕塔村，尤其故地云。”该部方志中，断断续续地记述着杨家将事迹，往往与正史比较接近，而很少元明小说戏曲的影响，比较真实可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这段记载，是杨文广娶慕容氏为妻，“慕容”二音相拼，也就是“穆”音。“慕容”氏转为“穆”氏，正如“折太君”转为“畲太君”。慕容氏为西北边地的鲜卑族姓，骑马“善战”也正是穆桂英的形象。杨家将长期在西北地区守边，其子孙中有娶鲜卑族女子也并不奇怪。由此，穆桂英或为杨文广的妻子，原姓“慕容”，为鲜卑族人。

宋濂的《杨氏家传》载，杨充广持节广西时，娶穆族女子为妻。穆族居桂、贵、湘交界地区，或称木族，其酋长自称木天王，以有田禾的山谷名柯，酋长居于有田禾的寨子名穆柯寨。查《宋史·杨文广传》，文广早年曾官任广西钤辖，知宜、邕二州。这样的话，穆桂英也有可能是广西穆族或木族，有一些小说中就称“木桂英”。总之，在没有更直接的史料佐证之前，上述种种说法都只能是一种推测。

杨家将八贤王的轶事宋元以来，以杨家将为题材的小说、戏剧，百花纷呈，争奇斗妍。而在这些传奇故事中，总有一位相貌堂堂、正气凛

然、仗义执言的八贤王，他机智地周旋于皇帝与杨家将之间，往往在皇帝偏袒奸臣的危急时刻能挺身而出，助杨家将一臂之力，帮杨家将摆脱困境，或将奸臣绳之以法。在《潘杨讼》、《寇准背靴》、《辕门斩子》等传统剧目中，八贤王虽只是一个配角，但起的作用却并不小。杨家将的故事是有一定历史依据的，那么，这位八贤王是否有历史依据？他是哪一个历史人物的化身呢？

在小说戏曲中，八贤王首先在宋太宗率军进攻太原时，献上反间计，然后派使者说降了杨业。就是说杨家将由北汉降宋，八贤王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七年后，杨业为奸臣所害，殉国疆场，畲太君或杨延昭到朝廷告御状，要求惩办罪魁，不料奸臣反咬一口，幸亏八贤王在旁相助，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将罪魁祸首绳之以法。后杨延昭为将，属下小校治事犯法，宋真宗在奸臣挑拨下要严办延昭，八贤王及时赶到，以延昭军功请朝廷从轻发落，终得真宗允准。不久边事告急，八贤王请得赦令，杨六郎重披战袍，招集兵将北上抗辽。最后，六郎率军大获全胜，班师回朝，并捉得奸臣，又在八王协助下，将奸臣正法。杨延昭病殁于宋真宗的大中祥符年间，八贤王时也旧疾复发，病重归天。

许多戏曲小说中，将八贤王的名字记为赵德芳。赵德芳为宋太祖的小儿子，《宋史·宗室传》载，赵德芳为太祖第四子，曾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诸职。太平兴国六年(981)病故，才二十三岁。这时，杨业归宋只有两年时间，杨延昭也才二十四岁，只是供奉官，随父从军。如果硬要将赵德芳与杨家将扯上关系，那最多在太宗进攻北汉时，说是他曾献过反间计以逼降杨业。当然，这也只能是于史无证的猜测。更让人不解的是，宋太宗曾追封德芳歧王，后改楚王，北宋末徽宗又改封秦王，此“八贤王”之称呼几乎与赵德芳毫无关系，那为什么戏曲小说中要说赵德芳是八贤王呢？

有人认为，八贤王或许是赵德芳的哥哥赵德昭的化身。《宋史·宗室传》等史籍载，赵德昭是宋太祖的第二子，由于其兄早夭，所以他曾被认为是皇位继承人。他聪明英武，喜愠不形于色，颇得太祖的信任，曾“赐金简一柄，如不法之属得专诛戮”。官任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诸职。太宗抢班即位后，虽封他为武功郡王，位列宰相之上，但内心对这位大侄子存有戒心，总是找机会进行排斥。太平兴国四年(979)出

征幽州时，因战败而太宗失踪，有人提出立德昭为帝。太宗得知后更为不满，因小事就与德昭发脾气，德昭一气之下，自刎而亡。时杨业刚刚归顺宋朝，德昭应该不会与杨家将发生过什么关系。不过，人们对这位失去皇位又死于非命的皇子颇感同情，就让他化为公正无私的八贤王，其有“如不法之属得专诛戮”的特权，正好用来上惩昏君、下打奸臣。问题是：赵德昭生前为武功郡王，死后曾追封魏王，后又改封燕王，如果以德昭为朝中公正力量的化身，那么为什么要用“八贤王”这个非常不恰当的称呼呢？

也有人认为八贤王当指宋太宗第八子，属元字辈的王族人物，如明代小说《北宋志传》中的“八王”。史载，宋太宗有九子，其第八子赵元俨确有“八大王”的称号。宋人笔记《谐史》中称他“生而颖悟，广颡丰颐，凛不可犯，名闻外夷，小儿夜啼，其家必惊之曰：‘八大王来也。’”太宗非常溺爱，每朝会宴集，多侍奉左右。真宗即位，封曹国公，进封广陵郡王、荣王。坐侍婢纵火，烧延宫中，降封端王，出居故驸马都尉石保吉府第。每见真宗，痛自引过，帝悯怜之，寻封彭王，进太保。仁宗即位，拜太尉、任尚书令兼中书令，屡封定王、镇王、孟王、荆王。平生寡嗜欲，惟喜欢读书，好为文章词句，颇善二王书法。问题是翻遍宋代史籍，都找不到这八大王与杨家将有关系的记载。

赵元俨生于雍熙二年(985)，病亡于庆历四年(1044)，享年六十岁。太宗攻取北汉之际，元俨还没出生，杨业殉国之时，他出生才一年，只是个婴儿，怎么可能助杨家一臂之力，以对付奸臣呢?他在杨延昭身后三十年病殁，比杨延昭要小二十七岁，就是和杨文广一个辈分，这无论如何也不符合小说戏曲中八贤王的形象。史载，仁宗少年即位，章献太后临朝，元俨自以为德高望重，恐为太后所忌，便深自沉晦，阖门不出，不预朝谒，以绝人事。这种做法似乎也不太像八贤王正气凛然、刚毅直言的性格。可以说，这八大王的生平与八贤王的故事相距甚远，也不会是杨家将故事中八贤王的原型。那么他的一些事迹，对构造八贤王这样一个传说中的人物是否有影响?也不得而知。

京剧传统剧目《贺后骂殿》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贺后为宋太祖之皇后，因太祖死因不明，命长子赵德昭上殿质问，反遭太宗痛斥，德昭撞殿柱而亡。贺后又携次子德芳上殿，痛骂赵光义不仁。太宗只得向嫂

嫂谢罪，赐其尚方宝剑，加封德芳为“八贤王”，贺后母子这才含泪而去。这大概是赵德芳封“八贤王”的由来，人们出于对其孤儿寡母的同情，便将赵德芳虚构为朝中正直力量的化身。以后又有《八大王开诏救忠臣》诸剧，将赵德芳与杨家将抗辽事业联系起来，留传民间，成为当时民族感情的一种寄托。总之，杨家将故事中的“八贤王”，他的出现增加了朝廷权力斗争的戏剧性冲突，满足了人们崇敬忠臣、惩处权奸的心理要求，完全符合中国王权主义的文化传统。然而在历史上我们找不到一个可以与之事迹、生平相对应、吻合的人物，八贤王是由朝廷宗室的一些轶闻，加上民众的有关情感渲染，再经过剧作家和小说家的艺术加工，融合而成的一个虚构人物。

宋朝大将曹彬曹彬是宋初名将，两宋其实名将不少，然而，独曹彬久负盛名，声誉最高。有宋一代，曹彬被誉为“勋业最隆、功冠群雄”的“本朝第一良将”，极为引人注目。后世对他也推崇有加，盛名一直不衰。那么，这位名声显赫的大将，究竟有哪些了不起的战绩军功，值得人们如此推崇呢?近有学者在考察了曹彬的生平战绩后，认为他在军事方面其实非常平庸，实乃庸将负盛名，这是怎么回事?原因又何在呢?

曹彬字国华，是真定灵寿(今属河北)人。父亲曹芸，为成德军节度都知兵马使，可谓出身将门。据说他周岁时，父母以百玩之具布放床席之上，观其所取，他左手拿起武器戈，右手取祭祀用的俎豆，一会儿又抓住一官印，对其他东西看都不看，人们颇觉惊异。

后汉干祐时为成德军牙将，后周时补供奉官，迁河中都监。出为晋州兵马都监。入宋，迁客省使，以战功改左神武将军，俄兼枢密承旨。在太祖、太宗朝，他披坚执锐，平后蜀、攻太原、伐江南、征北汉、战契丹，南征北战，为北宋的统一立下汗马功劳，深得君主宠信，官至枢密使、检校太尉、忠武军节度使、加同平章事。

咸平二年(999)卒，享年六十九，赠中书令，追封济阳郡王，谥武惠，是宋代第一位死后全国举哀的武臣。且赠其妻高氏韩国夫人，官其亲族、门客、亲校十余人，并与名相赵普一起配享太祖庙庭。可谓生荣死崇，地位显赫。

欧阳修《归田录》赞道："曹武惠王彬。国朝名将，勋业之盛，无与为比。"李攸《宋朝事实》、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和李宗锷《曹彬行状》，都称颂曹彬："保功名，守法度，近代良将，称为第一。"罗大经《鹤林玉露》说："汉惟一赵充国，唐惟一王忠嗣，本朝惟一曹彬，有三代将帅气象。"宋人有关称誉，不胜枚举。后世也对他推崇有加，盛名不衰。

20世纪80年代，学者张其凡在认真考察了曹彬生平及其战绩之后，认为他在军事方面其实非常平庸，实乃庸将而负盛名，并对宋代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剖析。

纵观曹彬一生，他所参加的军事活动主要有四次：

第一次是干德二年(964)十一月至次年正月的平定后蜀之战。曹彬以枢密承旨为都监，随刘光义军进蜀。在曹彬的严禁约束之下，这支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受到褒奖。然而在平定后蜀，留驻成都的日子里，诸将争功而竞相掳掠，民众还是大受侵扰。战后有谓"清廉畏谨，不负陛下任使者，惟曹彬一人耳。"于是受朝廷特赏，升为宣徽南院使，跻身大将之列。但此战他并非统帅，且后蜀政治腐败，已不堪一击，没有经历激烈战斗，更未见曹彬有什么奇计巧谋。总之，这次战役决无可夸口的战绩使他得以称为名将。

第二次是开宝七年(974)正月至次年十一月的平定江南之役。这次曹彬身为统帅，率军沿长江东下。包围其首府金陵(今南京)之时，曹彬称病，诸将来问候，又提出破城日不妄杀一人，以约束将士，禁止掳掠，众将许诺，使富庶的江南及首府金陵免遭战争洗劫。班师之时，曹彬船中只有图籍和衣衾而已，这一功勋为人称颂不已。献俘开封，官升枢密使。平定江南是曹彬一生最得意之战，然而此战是以强对弱，在南唐国势日颓之时，曹彬率十万大军，却打了一年多才把江南平定，尤其是围困首府金陵近十个月，才得以攻破。可以说治军不严，姑息太过，致使战争旷日持久，劳民伤财，主帅难辞其咎。

第三次是太平兴国四年(979)正月至五月的平定北汉之役。宋初，曹彬曾经在他将麾下几次率军与北汉作战，取得过一些小胜。开宝二年

(969)随太祖进攻太原，战败而回。此次是随太宗出征，虽然攻灭了北汉，但曹彬在其中并没有指挥战斗，自然也没有什么谋略和战绩可言。接着太宗乘胜北伐，结果与辽军高梁河一战，大败而回。

第四次是雍熙三年(986)正月至七月的北征攻辽战役。此战，曹彬统率约二十万人马为东路主力军，出雄州(今河北雄县)向辽南京(幽州，今北京)进发。开局颇为顺利，曹彬率军很快攻占了歧沟关(今河北)和涿州(今属河北)等地。三月与辽军相持在涿水以北，十余天后，终因粮草不济，只得放弃前所攻占之地，退回雄州以便就粮。太宗得知消息后，认为指挥失策，令他与东路军副帅米信的军队集结，养精蓄锐，等待战机。此时，中、西路军捷报频传，东路军为了争回北征主力的面子，再度向涿州进发。因辽军以轻骑不断偷袭，曹彬命军队排成方阵行进，一边行军。一边在两边挖掘壕堑，以防敌骑侵袭。然而此举，使将士们疲惫不堪，从雄州到涿州百余里路，竟走了二十多天。大军到达涿州，发现辽国大军已埋伏于涿州东北，曹彬连忙决定撤退，而辽军精锐开始了全力追击。

五月，宋、辽主力激战于歧沟关。宋军逐渐被辽军包围，宋军只得以粮车环绕自卫，实成关门打狗之势。曹彬、米信趁夜色率部突围，渡拒马河时，遭到辽军袭击，溺死者不可胜计。曹彬率军溃退至易州(今河北易县)，驻营沙河。听说追兵又至，宋军如惊弓之鸟，争过沙河，又死者过半，河水为之不流。残余宋军向高阳(今属河北)溃逃，又被辽军追上，一阵砍杀，死者数万，丢弃的兵甲高如山丘。至此，宋军主力伤亡惨重。损失十余万之众，导致全线崩溃，雍熙北征以惨败告终。这次战败使宋朝北部边防极大削弱，辽军乘胜南下，河朔震动。时议认为，北征输得如此惨烈，主要是将帅疏于韬略，指挥无方所致，其中曹彬之无能最为明显，不堪为帅，实为庸将。

总之，曹彬作为大将，既无指挥才能。也无神机韬略，更无出色战绩，往往指挥无方，应敌无谋，最多是一个谨小慎微、奉守军法、有仁人之心的庸将。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庸将得负盛名呢?其一，曹彬为人值得称道。廉洁俭朴，在其他将帅聚敛成风之时，他却身居陋宅，未尝修广，

衣着素袍，安于俭德。出使吴越，不受馈赠。后不得不收，却上交朝廷。居朝俸入，常接济族人，非常难得。宽厚谦恭，心胸较为宽广，喜愠不形于色，对同僚和下属都能友好相处，遇小吏亦以礼，接人待物和气，不言人过，不记人嫌，不以富贵骄人，唯以谦恭自处，还常助人于危难之中。读书好学，每次出征，往往带大批书籍回来，勤奋求知，学识益广，能与朝士清谈终日，鸿儒硕士也常叹不如。这些人品与涵养，是他获得盛名的重要基础。

其二，曹彬后裔在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四朝一直地位显赫。其女儿为真宗嫔妃，其孙女被选为仁宗皇后，英宗时为皇太后，神宗即位，又尊为太皇太后。其长子，官至河阳节度使，同平章事。其他任节度使、宰执，乃至封王者有多人，其家族名望于北宋时一直隆盛。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士大夫自然多行称誉，在当时官修史书中，更是不吝褒奖。曹彬名声之鹊起，且久负盛誉之情况，可以想见。

其三，朝廷的推崇。宋朝皇帝的御将之道是不求其善战，必求其忠诚，以巩固赵氏江山。对能征善战、多有才干的将帅反而常常猜忌、防范，以尽力减除对最高统治者的威胁。由是，崇文抑武、压低武将的地位，用将但求忠诚循谨，不求有勇有谋，这些都成为大宋王朝的祖传家法。而曹彬为将忠实驯良，谨小慎微，这正是统治者最看中的优点，抬其为宋代第一良将，作为武臣的表率，完全符合最高当局的意愿。所以曹彬这样的庸将得以久负盛名，正是反映了时代的风尚，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我们看到，宋代真正可以称为名将的北宋狄青，遭猜忌而死；南宋岳飞遭构陷被害；南宋余玠，遭怀疑暴卒……名将都几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这是宋代统治者容不得善战名将的铁证。其结果，必然导致军政之不修，兵势之不振，武力之积弱，而屡战屡败，宋室由一统江山，至南宋偏安一隅，最后被蒙古军铲灭，这也叫自食其果吧。

上述主要是张其凡先生的一家之言，却也言之有据，论之成理。不过曹彬之久负盛名，主要还是在赞扬他严肃军纪，不滥杀无辜方面，尤其是江南一役，使城市与民众免遭战争洗劫之功，无论如何还是值得称誉的。从这方面讲，他也有良将的成分，不是吗?

第八章

名将康保裔的结局康保裔是宋初名将，战功卓著。《宋史·忠义传》说他于成平年间在与辽军决战中以身殉国，此事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诸史中均言之凿凿。然而《宋史·路振传》却说他于成平中被契丹军俘获，《辽史·圣宗纪》中也有辽军擒俘康保裔的记载。总之，有关记载矛盾百出，不知孰是。

康保裔为河南洛阳人，谨厚好礼，善于骑射，飞弋引矢，百发百中。父亲康再遇，后周时任龙捷指挥使，随赵匡胤出征而战殁。保裔在后周为将也屡立战功，后继父官职，在石守信麾下，率军破泽州、攻广阳。宋太祖开宝年间，从众将于石岭关败契丹军，迁龙卫指挥使，领登州刺史。太宗端拱初(988)，徙定州、天雄军驻泊部署，又迁高阳关副都部署，加侍卫马军都虞侯，领凉州观察使。身经百战，身披七十多处创伤。真宗即位，委以要职，任并代都部署，徙知天雄军，后复任高阳关都部署，为边关大将。

咸平三年(1000)，契丹兵大举南下，与宋军诸将战于河间一带。诸将向高阳关求援，康保裔挑选精锐部队，前往会战。康保裔率军到达前线，天色已暮，便与诸将约定次日清晨合师与敌决战。契丹连夜调兵遣将，布下重重包围。天色渐明，探子来报敌军步阵严密，人数众多，而友军并没有到达。左右见形势不利，都劝康保裔易甲换装，带部分人员飞马突围。保裔却坚决予以拒绝：“临难不求苟免，今天是我战死之日矣。”于是决意死战。一连两天的厮杀，双方伤亡惨重，土地都被战马践踏得陷深二尺。宋军救兵不至，终寡不敌众，弹尽矢绝，康保裔战死疆场。

消息传来，朝廷为之震惊，两天不行朝会，以示哀荣。真宗下诏：追赠侍中，赐白金五千两，恩加诸子官职，遣使慰问其八十四岁的老母亲，封为陈国太夫人，追封其妻为河东郡夫人。由于康保裔的忠勇精神和为国捐躯的感人事迹，史官们将他列于《宋史·忠义传》的卷首。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王称《东都事略》、陆游《老学庵笔记》等史籍

笔记对此事也有详尽描述，究其史源，应都出自《真宗实录》。

然而，《辽史·圣宗纪》载："与宋军战，擒其将康昭(保)裔，获兵杖器甲无算。"如果说《辽史》有可能站在敌对的立场上，在战事的叙述中故意贬低宋军歪曲史实的话，那么，《宋史·路振传》亦载："咸平中，契丹犯高阳关，执大将康保裔，略河朔而去。天子幸魏，特遣将王荣以五千骑追之。"这里不但说康保裔被契丹俘获，且真宗也知道此事，并曾派军队去追击。《宋史》中自己的一事二说，就足以使人产生疑问：康保裔究竟是战死疆场，还是被敌所俘?对此问题锲而不舍的学者，又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发现"康被擒，王师未有胜捷"等记载，似乎进一步找到了康保裔是被敌人俘获的蛛丝马迹。

《宋史·夏守赟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康保裔与贼战，没，部曲畏诛，声言保裔降贼，密诏(夏)守赟往察之。守斌变服入营中，廉问得状，还奏称旨。诏恤保裔家。"其中"部曲畏诛"很值得玩味：如果按上述记载，说康保裔挑选精锐去会战，由于寡不敌众，战场上殉国的话，那么没有挑选上的"部曲"为什么要"畏诛"呢?康保裔战死不应该由留在高阳关的"部曲"承担责任，这是很明显的。另一方面，康保裔如果降敌，反倒与这些部曲会有一定牵连，因为主将降敌，其部曲也会受到一定的猜疑。这样，"部曲畏诛，声言保裔降贼"，就非常奇怪了：这些部曲为什么给自己下索套。

《续资治通鉴长编》"考异"中有一段记载或能令人找到一些思考的线索："夏守斌传云：守斌还，言保裔因送客，猝与敌遇，援兵不至，遂死。奏称旨，诏恤保裔家。"就是说，康保裔只是偶然出关送客遇敌而战死。其中"援兵不至"，那就是高阳关中部曲们的责任了，主将在关外遇敌，部众居然不出援救。如果说是保裔投敌而去，那么这些部曲自然就没有责任，他们不跟主人投敌，似乎对大宋还是有功之臣。前引《宋史·路振传》说："成平中，契丹犯高阳关"，也与此事背景暗中相合。

这样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就是说连康保裔是如何失踪的都存在两种说法：是在河间战场，还是在高阳关外送客?此后才是战死。还是投敌?在事情还如此不确切的情况下，朝廷对待此丧事为何会这样隆重?其一连串的赠官与赏赐，难道都建筑在捕风捉影之上吗?

有学者指出，宋在对辽战争中节节败退，丧权辱国，是宋真宗及其大臣们感到十分丢脸的事，为了掩盖宋军惨痛的败绩，摆脱大将投敌的难堪，朝廷便竭力把康保裔装扮成忠义之士，再对有关战事忠勇壮烈之场景进行加工与渲染，以掩人耳目，实是打肿脸充胖子。以致造成有关之记载矛盾百出，扑朔迷离。

宋以后的史家也注意到了这些疑点，如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就认定是康保裔投敌。当然，这一认定也由于缺乏足够的史证而显得有点勉强，所以并没有引起史学界的重视。宋初名将康保裔的结局，到底是怎么回事?看来只有等待新的史料的发现。

南宋将相张浚张浚是南宋初年一位主战派大臣，几度执政，几次率大军与金决战，兼为将相，权倾一时，颇为显赫。然而八百多年以来，人们对他的评价，却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褒之者誉之为抗战派英雄；贬之者斥之为害国之狗熊。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张浚(1097～1164)字德远，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出生于一个世代仕宦之家，政和八年(1118)，二十二岁时进士及第，历褒城令、太常寺主簿诸职。建炎元年(1127)，赴行在南京，除枢密院编修官，擢殿中侍御史。建炎三年(1129)，杭州发生苗刘之变，张浚以御营使司参赞军事同节制诸路军马驻守平江，遂联络吕颐浩、韩世忠诸路军马起兵勤王，一月后平叛，高宗复辟，有功而除知枢密院事，成为执政大臣。

张浚力主抗金，建议经营川陕，以保东南，遂出任川陕宣抚处置使。建炎四年九月，合陕西五路兵马四十万人，与金兵会战于富平，诸路兵皆失利，关陕失陷。此后三年，退守四川，擢吴蚧为大将，每战辄胜，赵开为转运使，善于理财，刘子羽为上宾，颇有才略。人谓张浚知人善任，得保全蜀。绍兴四年(1134)，遭御史弹劾而罢职奉祠。九月，伪齐入寇，十一月，复除知枢密院事。绍兴五年，除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命岳飞进讨洞庭杨幺义军。绍兴六年，伪齐人寇，张浚督张俊、刘光世、杨沂中诸将击退之。绍兴七年，张浚“总中外之政”，部署淮西军不当，大将郦琼率四万人马叛降伪齐，张引咎辞职。

此后，秦桧执政，被排斥在外二十五年，或知州郡，或为贬黜。因坚持抗金立场，不附和议，其名愈高，“四方之士，莫不倾心，健将悍卒见之者必咨嗟太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一)。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兵大举南侵，朝廷复召张浚，及浚至而敌兵已破。官判建康府兼行宫留守，老当益壮。孝宗即位，有恢复志，除浚少傅、江淮东西路宣抚使，封魏国公。隆兴元年(1163)，擢张浚为枢密使，督师八万北伐。终因将领不和，符离之战失利。次年四月，张浚由是解职，朝廷遂作求和之议。八月，去世。

肯定褒扬者，如宋高宗曾将张浚誉之为东晋之王导，多次谈到“张浚爱君爱国，出于诚心”。宋孝宗对张浚也“倚之如长城”，曾说：“今朝廷所恃惟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朱熹评论张浚在平定苗、刘之乱诸事件中的表现时赞赏道：“自靖康后，纪纲不振，王室陵夷。公首倡大义，率诸将诛傅、正彦，乘舆返正，复论琼罪，而后国法立，人心服。自武夫悍卒，小儿灶妇，深山穷谷，裔夷绝域，皆闯公名，盎然归仰，忠义之感。实自此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五上)杨万里《诚斋文集》更是对张浚赞不绝口：“身兼文武全才，心传圣贤之绝学”，“出将入相，捐躯许国”，“忠义勋名，中兴第一”。

《宋史·张浚传》同样赞不绝口，认为富平之战虽败，但张浚知人善任，得保全蜀，以形势牵制东南，大大减轻了东线金军对南宋朝廷的压力，江淮得以平安。并载金将粘罕临终时话：“自吾入中国，未尝有敢撄吾锋者，独张枢密与我抗。我在，犹不能取蜀；我死，尔曹宜绝意，但务自保而已。”后“浚去国几二十载，天下士无贤不肖，莫不倾心慕之……金人惮浚，每使至，必问浚安在，惟恐其复用”。绍兴末，“时浚起废复用，风采隐然，军民皆倚以为重”。把张浚描绘为一个深得人望也颇有功绩的抗战派大臣。

现代一些学者的论着中，也时把张浚与岳飞并称为“抗金英雄”，或称为当时“朝野上下热烈拥护”的“抗战派的代表”等。

否定贬抑者，如当时太学生就说张浚“有中兴之心，无中兴之才”，“侈言诞计，专权误国”(《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在数次战败后，

宋高宗也稍有醒悟道："朕宁亡国，不用张浚。"隆兴北伐前夕，曾告诫孝宗："毋信张浚虚名，将来必误大计。"(《齐东野语》)后果不出其所料。元人揭徯斯甚至说："宋之不能中兴，由张浚之逐李纲，杀曲端，引秦桧，杀岳飞也。"(王士稹《池北偶谈》卷九《李忠定公》)史学家王鸣盛《蛾术篇》卷六十，说张浚"无分毫之功，有邱山之过"。那么这又如何理解呢？

现代学者杨德泉指出，张浚于建炎中为御史时，亲附投降派宰臣汪伯彦、黄潜善，首劾抗战派宰臣李纲，纲在位七十五日被劾罢相，浚犹论劾不已。建炎初，李纲入朝，首正张邦昌僭逆之罪，斩宋齐愈等从逆之臣，中外鼓舞。汪、黄却百般阻挠，而张浚首劾李纲"以私意杀侍从，典刑不当，有伤新政，不可居相位"，还论李纲"杜绝言路，独擅朝政"等十数事，于是李纲遂罢相奉祠。而张浚犹抨击不已，诬称靖康之祸，二帝被掳，皆李纲之罪，甚至直指为"国贼"(《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于是李纲落职，责鄂州居住。所以史学家王鸣盛不平道："人知沮纲而逐之者汪、黄也，而浚实沮抑之。史以汪人奸臣传，而曲誉浚，乌得为公论乎!"(《蛾术编》卷六十)此后。汪、黄把持朝政，培植私党，国事日非，广大军民无不切齿痛愤，而身居言职的张浚，对汪、黄误国之罪却"缄口不言"。原来，其御史之官乃黄潜善所提拔，后张居相位，仍不忘其恩。

同时，张浚奏劾李纲时所论救者，多为伪臣叛党，所攻击者，如陈东、胡珵等抗战派人物，无一幸免。王鸣盛指出："陈东力言汪、黄不可任，李纲不可去，东竟坐诛，东之死，浚有力焉。"(《蛾术编》)陈东既死，张浚又奏劾秘书省正字胡理曾笔削东书，"意欲使布衣草莱之士，挟天子进退大臣之权"。于是胡理罢官，编管梧州。

曲端是南宋初年一位文武双全的爱国将领，他长于兵略，治军严明，屡与敌角，威名远播，最后却被张浚以"谋反"罪处死，实为南宋初年仅次于岳飞的一大冤案，激起军民的纷纷叛变，致使陕西五路全部落入金人之手。张浚初入陕，曾拜曲端为威武大将军，曲端反对张浚进攻战略，即被收缴兵柄。当曲端直言张浚此战必败时，又被怀疑有"反心"。后果如曲端所料，富平一战大败，此时参谋王庶提出曲端写有"反诗"指斥皇上："不向关中兴事业，却来江上泛渔舟"，张浚便入其罪名，将曲端捕进监狱，随即用火刑迫害致死，年仅四十一岁。其后，张浚还

不敢向朝廷报告处死曲端的实情，也编造不出其“谋反”的证据。明人马贯感慨道：张浚之杀曲端，“此何异于秦桧之死岳飞乎!岳飞之见杀，百世之下，虽妇人亦知怜其冤。若曲端之见杀，及浚之屡败，史册事俱难掩，而中不无掩饰，故不谓其杀戮忠良，败坏国事，而反谓其能雪仇复土，谬归以中兴之功。后世儒臣不加详察，误入帝王之祠，享我祖宗俎豆，即古帝王与忠良之心必羞与之列矣!”(《野获编补遗》卷二)

秦桧之投降倡和，千载唾骂，其奸谋之所以得逞，除与宋高宗之投降政策不谋而合外，与张浚之称赞引荐也不无关系。秦桧第一次罢相后，高宗曾将其罪状揭榜朝堂，表示永不复用。但绍兴六年(1136)时，张浚为了排挤赵鼎，乃引荐秦桧为行宫留守，权赴尚书、枢密院参决庶事而召至行在，后又授秦桧枢密使。“而桧为枢密使，无所建明，惟奉张浚而已。”于是赵鼎被挤出朝廷，张浚与秦桧共同执政，最后张浚因淮西军叛而罢相，秦桧遂得以重新执掌大权，南宋进入最为黑暗的历史时代。

绍兴七年(1137)，张浚为相，部署江淮诸路兵马准备北伐，与诸将协商。刘光世请守，韩世忠请进兵，“惟岳飞以为不可用兵，浚再三问之，飞坚执不可之说，浚以飞为玩寇，议不协而罢。”(《三朝北盟会编》)后张浚又与岳飞讨论淮西军诸将问题，岳飞指出诸将都不合适，又引张浚恼恨。(后淮西军叛，说明岳飞有先见之明。)高宗先命岳飞尽统淮西诸军以图中原，后出尔反尔又收回成命，岳飞遂乞解兵权，奔丧归庐山。张浚勃然大怒，“累陈岳飞积虑专在并兵，奏牍求去，意在要君”(《宋史·高宗纪》)。所以，首先给岳飞加此“并兵”、“要君”数端罪名者，张浚也。而后秦桧诬陷岳飞诸罪，实操张浚故技而已。数年后，岳飞冤狱成，韩世忠之辈犹能责问秦桧，而张浚于岳飞之死却不置一词。

张浚一生主要指挥了宋金之间三次大战役：即富平、淮西、符离三次大溃败。富平之战前，许多将领与官员都反对此战，张浚却一意孤行，集陕西诸路四十万人马，与敌决战，激战只半日，诸军皆溃，致使关陕全失，而金人缴获堆积如山。此战是宋金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兵团决战，败得也最惨，说明张浚基本不懂军事，断送了关陕形势之地，中原永无恢复之期，而南宋偏安一隅之局基本形成。《南宋书·高宗纪》谓：“此后而议恢复，亦萎人之望起矣!倚秦桧以偷安，固势所必然。”所

谓减轻东线金军压力以保全江淮之说，实微乎其微，东南抗金主要靠岳飞、韩世忠等军的积极抵敌。

淮西之役，宋军还没开战就已败北，大将郦琼率所部精兵四万余人叛降刘豫，创造宋金战争史上又一次可耻记录。初，张浚谋北伐，淮西军帅刘光世持守论，而兵部尚书吕祉每有平戎之志，张浚遂欲罢刘光世兵柄，而以吕祉节制淮西诸军，以刘的部将王德为都统制，郦琼副之，郦琼出身流寇，与王德有积隙。许多官员提出此人事安排非常危险，岳飞还明确告之："德与琼素不相下，一旦使握之在上，势所必争。吕尚书虽通才，然书生不习军事，恐不足以服之。"(《齐东野语》)而张浚依然一意孤行，等看出事故端倪，密谋夺郦琼兵权并处其死刑，然而消息走漏，郦琼抢先叛变投敌，最终导致如此不堪之败局。

隆兴北伐，张浚为枢密使，集江淮兵八万，号称二十万，分两路挺进。以李显忠为淮东招抚使，率军出定远；邵宏渊为副使，率军出盱眙。李显忠是陕西骁将，全家遭金军杀害，抗敌坚定，五月先克灵壁，而邵宏渊却久攻虹县不下，还是显忠派灵壁降卒前去劝降，虹县守将才放弃抵抗。后李显忠率军又克宿州，进入巷战，邵军才投入战斗。攻下重镇宿州，孝宗闻报深受鼓舞，升李显忠为招讨使，邵宏渊副之。邵耻居李之下，向张浚表示拒绝接受李的节制，张浚居然迁就了邵的要求，使邵更有恃无恐。其后两将又在赏赐问题上发生矛盾，士兵一经挑唆，人心浮动。李显忠部很快遭到金军反击，邵宏渊却按兵不动，谓众曰："当此盛夏，摇扇于清凉，且犹不堪，况烈日中披甲苦战乎?"军心遂摇，无复斗志。"显忠、宏渊大军并丁夫等十三万众，一夕大溃，器甲资粮，委弃殆尽，士卒皆奋空拳掉臂南奔，蹂践饥困而死者，不可胜计，二将逃窜，莫知所在。"此战也使"国家平日所积兵财，扫地无余"。(《齐东野语》)

宿州旧郡名符离，故史称"符离之溃"。此战中张浚为帅，非但不知用将，且指挥部远离前线而不达军情，人或以为是情况不利时能率先奔逃。如清人昭裢在作了有关考证之后说："今考其出师颠末，富平之败，魏公方在邠州；淮西之失，公方在行在；符离之溃，公方在泗州，皆去行间数百千里，安得使士卒奋勇而能保其不败哉?"(《啸亭杂录》)

南宋之不振，高宗秦桧一味屈膝投降，自然是罪魁祸首。但张浚三战三败，实从另一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明朝人马贯说："宋高宗之不能中兴者，岂特坏于秦桧之主和，张浚之为将，有累中兴者多矣!"(《野获编补遗》卷二)由此亦可推论，张浚一生倡言恢复，坚持抗战，实际无此能力，往往空富误国。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谓，张浚"平居好大言，以忠义自许，轻用福斯，为侥幸之举，故苏云卿料其无成"。

所以一些持基本肯定论者，就常以张浚"才智不足"、"志广才疏"为辞，替张浚开脱。如朱熹说："张魏公材力虽不逮，而忠义之心，虽妇人孺子亦皆知之。"后高宗问张浚：秦桧可否继任相位?他答："今与共事，始知其暗。"应该说对秦桧的本质似有所认识。现代学者虞云国的《细说宋朝》作如此评价："张浚是南宋前期主战派重要代表，但从富平之战与隆兴北伐看来，他在军事上的全局决策是并不成功的，其中固然有当时当地宋军素质与双方力量对比等客观原因，但其志大才疏而急于求成的个人因素，也是无可讳言的。王夫之批评他'志大而量不弘，气胜而用不密'，可谓知人之论……总之，他一生坚持抗金，虽受秦桧迫害而不改初衷，终究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

但持基本否定论者，却以为张浚的根本问题并非才智的长短，而是"心术"不正。即愚蠢固执而不纳善言，心胸狭窄而又刚愎自用。如确"有中兴之心"而"无中兴之才"，那也可大量荐用一些忠义才能之士，但张浚却是一个专权自恣、以高明自许，不仅不用人才，反而疑忌和扼杀人才的人。如"富平之役，李纲尚在，浚忌之而不能用；淮西之举，岳飞在营，浚恶之听其归而不能留；符离之战，虞允文远在川陕，浚虽闻其贤而不能举以自副。"(《野获编补遗》卷二)这一点，连为张浚作《行状》的朱熹也不否认："张魏公不与人共事，有自为之意。"自己没有才能，又不能用人，那其所谓抗战，无非"欺世盗名"而已。

从上述分析来看，张浚一生似乎过失累累，劣迹斑斑，恶果昭昭，在抗金斗争中实无功勋而为害甚大。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对他赞赏肯定呢?

金兵与"拐子马"

金兵的王牌部队“拐子马”，究竟是怎样的兵种?历来以为就是“连环马”，其实骑兵打仗，马怎么能连环呢?乾隆皇帝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所以现代专家只能重新寻找解释，最后大致定义为：左右翼骑兵。结果只是这么简单平常的一个军事术语，你相信吗?

绍兴十年(1140)，岳飞由鄂州(今湖北武汉)率军北上，抗击金兀术统帅的南侵金军，七月在郾城(今属河南)遭遇金兵精锐的围攻。岳飞先命岳云率军迎敌，打垮敌骑的数次冲锋，大将杨再兴突入敌阵，杀敌近百，自己也中数十枪，但仍英勇奋战。金兀术见先头部队没有占到便宜，就命最为骁勇的拐子马，铁浮图投入战斗。岳飞令步兵上阵，手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之类兵器，专噼马足。岳飞也亲率诸骑突出阵前，诸将挽住战马，说：“相公为国重臣，安危所系，不能轻敌!”岳飞马鞭一挥，说：“非尔所知。”就跃马驰于敌阵之前，左右开弓，敌骑应声倒地，箭无虚发。将士们见到统帅亲临战场杀敌，士气倍增，杀得敌骑人仰马翻，金兵尸横遍野。到天色昏暗之时，金军已一败涂地，狼狈溃逃。

郾城之战是宋军空前的大捷，宋廷也不得不在奖谕中作出极高评价。在平原旷野之中，能战胜金军最精锐的骑兵，尤其是打败了金兵神勇的“拐子马”、“铁浮图”，这确实令人鼓舞。那么，这“铁浮图”、“拐子马”到底是怎样的兵种呢?

据岳飞孙子岳珂所编《鄂王行实编年》载：“兀术有劲军，皆重铠，贯以韦索，凡三人为联，号拐子马，又号铁浮图，堵墙而进，官军不能当，所至屡胜。”“韦索”就是皮绳，三匹战骑为联，又全披重铠，应即连环马，或者说是“身穿铁甲的连环骑兵”，其整队冲锋时，就如一堵墙在前进那样，势不可挡。此说一出，官私史书及通俗小说无不沿用，“拐子马”就是“连环马”的定义，也不胫而走。人们在描写此场战斗时，都按岳珂的说法，岳飞命步兵以麻扎刀入阵，无须仰视，只管低头砍马足。拐子马既相联，一马被砍跌倒，其他二马也都不能行进，或相继倒下，坐以待毙。在岳家军的奋战下，拐子马被成片砍倒，僵尸堆积如山丘。金兀术悲痛地大哭：“自起兵发来，皆靠它取胜，如今完了。”岳珂最后的结论是：“拐子马由是遂废。”

此后，章颖《南渡四将传》、元人《宋史·岳飞传》和明、清时《宋史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及《说岳精忠全传》之类小说，都照抄岳珂的蓝本，或按此说行文，没有任何怀疑。直到十八世纪后期，清乾隆帝令其臣僚编纂《御批通鉴辑览》时，才察觉到此说根本不合使用骑兵的军事常识，遂写了一条“御批”，指出：

北人使马，惟以控纵便捷为主。若三马联络，马力既有参差，势必此前彼却；而三人相连，或勇怯不齐，勇者且为怯者所累，此理之易明者。拐子马之说，《金史》本纪、兵志及兀术等传皆不载，唯见于《宋史》岳飞传、刘锜传，本不足为确据。况兀术战阵素娴，必知得进则进，得退则退之道，岂肯羁绊己马以受制于人?此或彼时列队齐进，所向披靡，宋人见其势不可当，遂从而妄加之名目耳。

乾隆的这段批驳，可谓切中要害，颇有说服力，但依然没能解释何为“拐子马”，只是说，可能当时宋人看到金军骑兵“列队齐进，所向披靡”，遂以为是“拐子马”。

宋史专家邓广铭《有关“拐子马”的诸问题的考释》对此做了详尽考证。认为“拐子马”一词首次出现在绍兴十年(1140)五月的顺昌战役中，出自被金人强征入伍的河北汉人之口，其以为金军中有战斗力者，“止是两拐子马”。所以此词应是汉族语言而非女真语，北宋时人们的习惯用语中有“拐子”一词。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和《武经总要》中有“东西拐子马”之称，是指“大阵之左右翼”。如《东京梦华录》和《三朝北盟会要》中有“拐子城”一词，是指拱卫城门的两道各成直角的对立垣壁。这样，“拐子”就是“侧翼”之意，“两拐子”就指左右两翼，而“两拐子马”或“东西拐子马”就是左右翼骑兵。

“铁浮图”是指重铠全装的金军铁骑，主要指金兀术的侍卫军等，又号“铁塔兵”，主要指其用铁盔甲防御严密，马背上还铺毡枕，它与“拐子马”是两个概念。最早对“铁浮图”作出错误解释的是顺昌战役时的顺昌府通判汪若海，他写了一个《札子》送呈朝廷，称金军的“铁浮图”：“三人为伍，以皮带相连”；而对金军拐子马的解释是对的：“以铁骑为左右翼，号拐子马”。而到岳珂编写《鄂王行实编年》时，便把两者合一了，以此便以讹传讹。

那么，为什么南宋岳珂等人对“拐子马”的含义已毫不知情了呢?邓老的解释是：“在北宋灭亡之后，这一语词竟跟随着中原和华北地区而一同沦陷，它虽还保存在中原和两河地区居民的口语当中，却不曾被南渡的军民人等带往南方。”或者说，它原是北方人的用语，南方人完全听不懂，如果说南宋初期还有一些北方移民南下，略懂一些北方的风俗，而到南宋中期以后，人们已茫然不知“拐子马”为何物了。

此外，岳珂的《鄂王行实编年》中还认为，金人自起兵以来，凡有拐子马参战都战无不胜，至岳飞才识破其弱点，用步兵砍其马足，大破其阵，从此拐子马便退出历史舞台。这些说法也不符合历史事实，郾城大战前的大仪镇战役和顺昌战役，岳家军并没有参加，宋军都采用了砍“拐子马”马足的战术，取得不错战果，尤其是顺昌大捷，金人“震惧丧魄”。而郾城大战二十余年之后，史籍中仍有金兵使用“拐子马”的记载。

说了半天，“拐子马”就是左右两翼骑兵。这么简单的答案，为什么古人居然会误解和附会了几百年?作为一个习惯用语，为什么知道的人这样少?使用的时间也这样的短?尤其令人不解的是：既然“拐子马”仅指左右两翼骑兵，那么只要是古代大规模战役，正面阵地以骑兵为主力，就有配置左右两翼骑兵以协同作战的需要，中国古代自战国开始，至清朝后期，都经常采取这一常用的骑兵战阵，为什么史书上单单称金军的两翼骑兵为“拐子马”呢?上述的这个简单解释可信吗?

十二道金牌的由来民族英雄岳飞和岳家军抗击金兵的事迹可谓家喻户晓，其中岳飞被宋高宗十二道金牌逼迫班师回朝的故事，也最令人扼腕痛惜，真是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哪!不过，这十二道金牌是怎么回事知道吗?它的历史真实性又如何呢?

绍兴十年(1140)七月，岳飞率领岳家军挺进中原，经过艰苦卓绝的鏖战，大败猖狂南侵的金兀术大军，接连取得郾城、颖昌大捷，破“拐子马”，可谓扫荡金兵，势如破竹，前锋已抵开封南郊的朱仙镇。收复北宋东京(即河南开封)已指日可待，战局发展鼓舞人心，南宋抗金战场面临从未有过的大好时机。岳飞兴奋地准备乘胜北伐，渡过黄河，“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然而在七月二十日前后，一天之内，岳飞却接连收到十二道金字牌递发的班师诏。这十二道诏旨措辞严峻，不容争辩地立

召岳飞班师回朝。

此时，岳飞悲愤填膺，肝胆欲裂，眼看恢复中原的绝好时机白白丧失，他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灰心和绝望，他不禁仰首长叹，顿足捶胸，东向再拜曰：“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所得州郡，一朝全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班师回朝之日，百姓遮道恸哭：“我们戴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打败金兵，如今官军退师，金兵再打回来，我辈哪还有活路?”岳飞也悲泣不已，取朝廷诏旨示之说：“我不得擅留。”此际，哭声震野，人心绝望，只得看着官军南退，部分民众跟着官军一同南撤。

所谓“金牌”，并非用黄金制造，它只是宋代邮驿传递制度的一种形式。宋代邮传一般分步递、马递、急脚递三等：步递要求日行二百里，马递要求日行三百里，急脚递要求日行四百里。宋神宗时期增设了金字牌递，或称金字牌急脚递，主要传递紧急诏旨和军事方面的特急件，要求日行五百里，为当时最快的马递邮传。金字牌用长尺余的木牌，涂上红漆，刻上“御前文字”数字，涂上金黄颜色，十分耀眼。遇到特急的机密军务，皇帝亲自发出金牌诏旨，连中书枢密院也不得预闻。传递时要求不分昼夜，鸣铃奔传，前铺闻铃，兵卒出铺等候，就道交接，不得入铺，以免耽搁。人们形容：“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

事实上，纸面规定的日行四五百里的速度往往是达不到的，这是由于道路条件和战争环境等方面原因造成的。如上述临安到郾城之间大约有两千里路程，如按规定要求，金字牌递日行五百里，需要四天时间，但实际行程需十天以上。用金字牌递有关诏令和军事情报，一个来回，约需二十天以上。也就是说，都城临安的皇帝与前线郾城的岳飞，通一次信息就需二十余天的时间。

据有关史料推测，岳飞在郾城之战前夕，约七月五日给朝廷上一奏报，报告了军队的战况，说明“此正是陛下中兴之时，乃金贼灭亡之日”，“伏望速降指挥，令诸路之兵火急并进”。奏报过后十余天，朝廷无一兵一卒进援的消息。熬过了郾城、颍昌两场恶战之后，约十八日前后，却迎来了一道班师诏。就是说，高宗在七月八日前后，约正值郾城大战之际，发出了第一道班师诏。岳飞不愿舍弃大好的胜利进军形势，

写了一封言词激切的奏章，反对就此班师回朝，一再告知朝廷“时不再来，机难轻失”。然而，只隔了两三天，就在一天之内收到高宗命令班师回朝的十二道金牌。

这里就产生这样几个疑问：高宗并没有收到岳飞十八日的奏章，也就是在没有收到任何反馈信息的情况下，为什么要连发十二道金字牌递诏令?加上第一道班师诏，就是接连颁发了十三道班师诏令。皇帝用金字牌递发诏令，已说明其命令非常紧急。一天之内连发十二道，估计其诏令内容不会有大的变动，那么如此频繁地发出同一道诏令有意义吗?岳飞生前在各地所收到的诏令御札，大都收录进岳珂后来所编的《金佗粹编》之中，其中虽也说岳飞“一日而奉金书字牌十有二”，但就是独独不见这十二道金牌的内容。连发十二道诏旨，为何连一道都没有保存下来呢?

有学者指出，在朝廷向岳飞发出令其班师回朝的金字牌诏旨的前后，抗金战场的形势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就是这次对金军南侵的抗击，多路人马与敌人处于胶着状态，而岳家军一路血战北进，已有孤军深入的态势。这时，朝廷又令张俊、杨沂中、王德诸部从前线后撤，使得岳家军孤军更突出在中原战场之上。在郾城、颍昌诸次战役之中，岳家军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也承受了最大的牺牲，实已很难独力支撑这一中线战局。或者可以说如不班师，岳家军便处于有可能被围丧师的危险境地。如邓广铭《岳飞传》指出的，岳家军已陷入孤军无援的境地，将“成为金军并力合击的惟一对象，如再奋力前进击敌，那就等于自行跳入赵构、秦桧所设下的陷阱”。所以这时只需一道金字牌急递诏令，岳飞只能听令回撤。否则，岳飞不但是违抗朝命，还有可能被金军围困而得不到任何友军的援助，前景是惨淡的。

所以，高宗应该是没有必要连发这十二道金牌。从另一方面讲，这几乎一个小时就要发一道相同诏旨的局面出现，只是说明在外的将领是如何的不听诏令，似乎也有损大宋皇帝的尊严和威信，深通权术的宋高宗会这样做吗?何况，宋代应该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这样，就让人们有些怀疑：历史上是否真有过连续递发这十二道金牌的军令诏旨?这个让岳飞饮恨悲叹、壮志难酬的十二道金牌，有可能是历史学家或小说家的杜撰，以增添岳家军班师回朝的悲壮气氛。你怎么看这一问题呢?

韩世忠墓址在哪里南宋名将韩世忠的墓一直在苏州灵岩山，不知为什么民国以来学者们对其提出质疑，有人认为应在湖州菁山，并进行了实地考察及详尽的论证。也有学者依然坚持苏州说，同样着文进行了充分的反驳。在缺乏考古明证的前提下，问题的定论似乎还有些困难。

韩世忠像南宋爱国将领韩世忠(1089～1151)，字良臣，延安(今属陕西)人，一说绥德(今属陕西)人。他出身贫苦，十八岁从军，平西夏扰边，剿方腊起义，平苗刘之变，屡建战功，建炎三年(1129)，授武胜军节度使，御营左军都统制。次年春，以水师八千阻拦金兵十万渡江，与金兀术军相持于黄天荡(今江苏南京附近)四十余天，此役扫灭了金兵的嚣张气焰，颇为后世传诵。此后，在与金军的对峙中，时有捷报传来。如绍兴四年(1134)，大破金兵于大仪镇(今江苏扬州西北)，时论以此役为中兴武功第一。统三万兵，扼守淮河达七、八年之久，使敌人望而却步，与岳飞同为“中兴名将”。反对议和，力图恢复，终不得遂其志，反而遭到猜忌。绍兴十一年(1141)，与岳飞、张俊同时解除兵权。曾为岳飞冤狱叫屈，面诘秦桧：“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自此辞去官位，杜门谢客，不再言兵，常纵游西湖，怡养天年。六十三岁辞世，葬于苏州灵岩山。

苏州灵岩山西麓的韩墓，前面矗立着一座很有气势的“蕲王万字碑”。这是淳熙四年(1177)，宋孝宗追封韩世忠为蕲王时所树立，孝宗还亲题碑额“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十个大字。同时，命赵雄为墓碑撰文，令周必大书丹，二人都为当时俊才，官至相位，不论文或字都属上乘。特别是记述韩世忠生平的这篇碑文，有约一万四千字，恢宏的文章令人感慨，虽不免有宣扬“愚忠”的一面，但主要篇幅还是着力于抗金恢复，将韩蕲王的英武忠烈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据测，墓碑宽近九尺，连同龟趺底座在内高达三丈余。如此高大的雄碑，加上有万余字的碑文，这在国内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人称天下之冠。加上周围地势开阔，其墓的气度的确不凡。

据有关记载，明弘治和清道光年间都对韩墓进行过修整。1939年6月，飓风吹倒了墓碑，碎了十余块。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当地灵岩寺主持妙真等僧人请工扶正，由于难复其原，只得分两段并做一排胶固。1949年之后，又对其进行修整加固，列为江苏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今

天的外表仍颇壮观。数百年来，谒韩墓者不知凡几，其中不少诗人名士借碑抒情，留下许多感人的诗作悼文。如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曾在1928年至灵岩山拜谒韩墓。后作诗云：“不读蕲王万字碑，功名盖世复何为。”

然而，在民国初年，就有人对此墓是否为韩世忠真墓提出怀疑，认为充其量只是一座衣冠冢，韩世忠的遗骨并不在其中。由此，争论遂起，因证据不足，成为悬案。

20世纪80年代初，有学者进行了实地考察，并查阅了有关历史资料，赵鸣、培坤、金康《韩世忠墓址考辨》提出真的韩世忠墓应在浙江湖州市西南金鸡山之东麓的青山坞。其论据为：一是明《万历湖州府志》有“蕲王韩世忠墓菁山”的记载。菁山是山名，也是古集镇名，后改“青山”。因此坐落在青山坞的韩墓与文献记载相合。二是民众的口碑材料，当地老农称菁山墓为“王墓”、“元帅墓”，还说墓主“官大得很，同岳飞一起打过仗”。附近有一桥，名“韩家桥”，当地老农说，据传是韩府守墓家丁所造，而守墓家丁的后代，一直在这里生活到清同治年间。三是墓址气势非凡，金鸡山突兀于墓之西北，山嵴绵延一公里，呈龟龙状。韩墓所在地即为“龙首”右侧，居高临下，极目远眺，气吞山河。按“文左武右”，韩世忠为武将，葬之右侧，礼仪得当，也符合其蕲王之身份。四是墓的规格、形制，背高十米，直径二十五米，有坟祠痕迹。墓前一坪台，曾设有龟驮的墓碑、华表、牌楼、界碑和祭奠用的石桌、石凳等，现还存有石人、石马、石羊各二，排场不小。再前面是一片开阔地，呈斜坡形，有明显的坟城迹象，是个顶边宽四十米，底边宽一百六十米，两边各长一百四十米的梯形坟城。总之，其墓阙之宏伟，气势之浩大，非“王”莫属。

再看苏州灵岩山韩墓，有许多不合情理之处。一是碑高三丈，宋代任何一个皇帝的墓碑都未达到过三丈，韩世忠的墓制规格怎么能僭越犯上?所以，此墓碑必定是明清时所造。二是韩世忠卒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到孝宗追封蕲王，这一时期，苏州、镇江、扬州一带一直是宋金争夺的区域，韩墓不会葬于这战乱频仍的地方。相反，湖州地区是韩氏统兵后期的辖区，韩家在这里有相当基础，归葬于此较为合适。三是灵岩山地形较露，山不成龟龙之势，不是王墓的理想之地，远不及群山环抱的湖州菁山。四是有关韩世忠葬在灵岩山的记载文字甚少，只有清

同治《苏州府志》一条史料。而菁山韩墓却有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其中最早的是南宋《嘉泰吴兴志》，其编纂时间距韩世忠离世仅五十余年，可信度不言而喻。可以推测，由于韩世忠率军队在苏州一带驻屯多年，坚持抗金，奋勇杀敌，有关战役及其夫妇的轶事也在民间广为流传，这里的人民忘不了这位抗金英雄，为了永久的纪念，所以修筑了灵岩山韩墓。

但也有学者提出商榷，张志新、姚勤德《也谈韩世忠的墓址问题》指出，南宋嘉泰《吴兴志》不仅版本差，且也没有关于韩世忠墓的任何记载。又查明嘉靖《吴兴掌故集》、清乾隆《湖州府志》、同治《湖州府志》、光绪《吴兴记》、光绪《乌程县志》等，均未见有载韩世忠墓的任何材料。所谓湖州菁山韩墓“有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其中最早的是南宋《嘉泰吴兴志》”的说法，是缺乏依据的。

那么，为什么明万历《湖州府志》会有蕲王韩世忠墓在菁山的记载呢?在查阅了诸多吴兴的地方志乘后，初步推断是：万历《湖州府志》将清河郡王张俊之墓误载为蕲王韩世忠墓了。理由是：一、张俊与韩、岳同为南宋大将，还曾助秦桧陷害过岳飞，事迹昭昭，且同封为“王”。二、张俊之墓确在菁山，《吴兴掌故集》、乾隆《湖州府志》诸书都有载。三、万历《湖州府志》恰恰未载张俊墓，所谓民众口碑材料称菁山墓为“王墓”、“元帅墓”，还说墓主“官大得很，同岳飞一起打过仗”等也都与张俊的身份相符，可见其误载的可能性很大。而明确说这是“韩世忠墓”的，也许只是少数人的误传。

最主要的还有墓葬的规模问题。宋代是比较讲究礼仪的，诸臣丧葬都需按《礼院例册》的有关规定进行，如：“诸一品、二品丧……诸葬不得以石为棺椁及石室”。《宋会要》也载：“勋戚大臣薨卒……坟所有石羊虎、望柱各二，三品以上加石人二。”干德年间规定，一品礼“墓方园九十步，坟高一丈八尺，明器九十事，石作六事。”(《宋史》卷一百二十二卷)菁山大墓既发现了石椁，墓上还设有石人、石马、石羊和众多的石制品，可见此墓的形制与宋代的礼例不符。华表、牌坊、石人、石马、石羊等的配列情况，在明清墓上较为多见，因此很可能是明清墓，而不是宋墓，就是说既不是韩世忠墓，也不是张浚墓。

至于所谓苏州灵岩山韩墓诸不合情理之处，并不能成立。一其墓碑由宋孝宗敕命所建，还亲笔题有碑额。实测碑高有五米三五，龟座高一米七，额高一米二，总高八米二五。与明代徐达墓神道碑差不多。问题是宋皇陵碑的高度，未能找到有关资料。但据有关情况估计不会比韩墓碑小，说韩世忠墓僭越制度，缺乏根据。二说苏州为当时的战乱地区是不对的。建炎四年(1130)，金军在抗金力量的打击下开始北退。绍兴四年(1134)，南宋诸路大军均有战绩，绍兴和议后疆域基本保持在淮河、秦岭一带。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亮大举南侵，也没有越过长江。三灵岩山成不成"龙"势，并没有一致的标准，不能在今天的交通条件下去判断。如《灵岩山志》对其山的形势就倍加称颂，明黄习远《韩蕲王墓诗》就称灵岩山有"龙脉"。四记载灵岩山韩墓的文字不少，如明洪武《苏州府志》、正德《姑苏志》、《吴邑志》、《吴中灵岩山志》、清《江南通志》等记载都非常详尽，有清以来，几乎没有一部苏州、吴县的地方志不载韩墓在灵岩山的。

韩墓神道碑碑体过高而龟趺显得较小，这与明清时代龟大碑矮，比较稳健的风格不同。碑文基本均已风化，字迹漫磨殆尽，说明碑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风吹日晒，与明清诸墓文字清晰的碑体又不同。韩墓神道碑之边饰云纹比较古雅；碑额之夔龙显得短拙而简洁，雄浑而有力，与明清时代盘曲多鳞，细长夭矫的风格不同。所有这些都构成了韩墓碑不同于明清碑刻的显著特点。可以说，韩墓碑流传的序，有明显的宋代风格，《宋史·韩世忠传》又本之于碑文，可见其碑不可能是伪作。

最后，韩世忠为什么要葬在苏州?其直接原因就是碑文中所说："敕葬于此"。即是宋高宗敕命将他葬在苏州灵岩山的。其间接原因，应与韩世忠领军长期居住苏州有关，韩府曾设置于苏州城内。那么其是不是衣冠冢呢?据《宋史》记载，韩世忠大葬时，"赐朝服，貂蝉冠，水银，龙脑以敛"。"敕命徐伸护其事，吴、长洲两县令奔走供役"等。韩墓不可能是衣冠冢，当时也没有建衣冠冢的制度。更不可能像某些学者推测的那样，为防备金人的其他人的破坏，而去建造这样一座巍伟的假墓。

学者的辩论转了一圈，还是回到了苏州灵岩山韩墓，这次辩论是否真的搞清了韩世忠墓址，似乎仍有待进一步作考古的判断。

大宋王朝的全面解读宋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什么样的地位有宋一朝，自公元960年至1279年，历时凡三百二十年，国祚之长，秦代以后，仅次于汉(四百零九年)，超过了唐、元、明、清，约占封建社会历史的七分之一。其间，由于金国之南侵，宋朝又有了北宋(960～1126)和南宋(1127～1276)之分。前者以东京(今河南开封)为国都，后者以临安(今浙江杭州)为京城，所以，人们一般称宋为两宋。

宋朝并不是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在其存续的三百多年间，北、西部先后有契丹族创建的辽国、党项族创建的西夏、女真族创建的金国以及后来蒙古族创建的元朝等政权，与之对峙共存。辽、金统治者常称宋为“南朝”，而宋则往往称辽、金为“北朝”。所以，从整个中国发展的历史来看，这是一个南北相互抗争、对峙和各兄弟民族互相影响、融合的时代。元人修撰这一时期的历史时，将宋、辽、金三史并列，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在许多旧史家的笔下，宋朝是一个糟糕透顶的朝代，往往与秦朝并称，曰“孤秦陋宋”，并与“炎汉盛唐”形成鲜明的对比。宋之所以被称为“陋宋”，主要因为它军事上的孱弱无力及政治上的因循守旧。

宋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这是开国皇帝消极吸取了从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这二百零五年间藩镇割据、国家分裂的历史教训的必然结果。在军事方面，为了彻底改变“方镇大重，君弱臣强”的状况，宋太祖于建国之初，首先将禁军的统兵权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又通过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枢密院掌握了调兵权，同时还用文臣取代武将以为藩镇，并下令将各州的强兵升为禁军，使地方厢兵徒有虚名。宋朝皇帝又常常对司要职的武将频频调动，造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识兵，兵不识将”的尴尬局面，极大地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除了建国之初统一了一些汉族割据政权外，宋朝的军事始终处于孱弱状态，不仅燕、云十六州未能收复，而且外患频仍，辽、西夏、金和蒙元相继骚扰、蚕食、吞并宋地，最终导致宋朝的覆灭。

在政治方面，为了分散大臣的权力，中央实行的是政事堂(中书)与枢密院对掌大权的“二府”制，宰相是行政首脑，枢密使是军事长官，而地位仅次于二府宰执的三司使则是财政方面的负责人。与此同时，中央

又设有御史台和谏院，控制言论，弹劾大臣，最后的裁决权也归于皇帝。在地方上，各路设有漕司、宪司、仓司、帅司四个机构，其中前三司负有监察州、县官员的职责，通称为“监司”。州设知州，又设可以直接向皇帝奏事的通判，使之互相监视、牵制。但是由于宋代官职名实分离、叠床架屋，导致了滥官充斥、工作效率低下的庞大的冗官体制。至于对外政策，由于开国之君全力防止内部政变，加上燕、云收复战的失利，所以在宋初实际上已形成“守内虚外”的指导思想，其后更是一直被奉为“祖宗之法”，对于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侵扰，基本上都是采取守势。宋代虽然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在政治上还是比较开明的，士大夫也以敢说话而闻名于史。守内政策的奉行使得宋朝自始至终没有出现汉、唐那样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及边将、外戚或宦官专权的内乱。

与军事上的孱弱和政治上的因循相反，宋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和文化昌盛，这是宋朝的优势所在。国内的政治统一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而守内政策进一步优化了这个环境提供的有利条件。农业、手工业、国内商业、对外贸易均取得了长足发展。

宋代政府用租佃制代替了人身依附关系很强的部曲佃客制，大大提高了佃农的积极性。宋政府又鼓励农户开垦荒田，并注重农田水利的兴修，使耕地面积得以扩大，既增加了粮食产量，又增加了政府的田赋收入。

宋代的手工业规模也日渐扩大，分工更为细密，纺织、矿冶、造船业、造纸业、制盐业等都相当发达，还出现了一些专业性的著名城镇，如以产瓷器闻名的景德镇、以雕版印刷著名的建阳(今福建建阳)等。

宋代商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朝的十多个发展到了四十多个，甚至出现了百万户的城市汴京(今河南开封)。汴京作为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还出现了“瓦子(歌舞场所)”，内有“勾栏”、酒肆、茶楼等娱乐场所，热闹非常。留传至今的著名宋画——张择端所绘的《清明上河图》，就是从一个局部反映了当时汴京城的繁华景象。由于商业经济的繁荣，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宋代出现，代替了铁钱在市场上的流通。

宋代的对外贸易较唐朝更为繁荣，北宋时就在广州、泉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杭州等地设立了市舶司，专门管理对外贸易，检查进出口船舶，并征收商税。当时的对外贸易以海上贸易为主，由海路与中国通商的除阿拉伯诸国外，还有日本、朝鲜、南洋群岛和印度各国。

宋代的文化也极为昌盛，著名的史学家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二编》中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的确如此，宋朝的科举使得大量读书人得以进入社会上层，在言论相对自由和文化事业相对发达的条件下，他们讲学论道，著书立说，热心于文化事业，促进了宋代文化的勃兴。

哲学上，不仅涌现出范仲淹、欧阳修、周敦颐、王安石、李觏(gòu)、二程、朱熹、陆九渊、叶适等大家，还涌现出濂学、洛学、荆公新学、闽学等流派。

文学上，则有可与唐诗比肩的宋词。谈及散文，人们熟知的唐宋八大家宋代就占了六家，而宋诗也别具特色，具有含义理、重意念的特征。作为我国古代最早的白话小说的"话本"，也在宋朝现身。

此外，宋代的史学也非常发达。官修史书有政府组织专门机构修撰的起居注、日历、实录、会要、国史等，私家著述的质量也非常之高，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郑樵的《通志》等，而袁枢的"纪事本末体"则开创了史书的新体裁。

宋代科学技术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其中三项——活字印刷、指南针、火药都在此时出现即为明证。另外，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了十一世纪我国在科学技术上的巨大成果，在世界科学史上亦具很高地位，被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宋代在整个中国历史上起着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中央集权制在借鉴前朝经验的基础上得到高度强化，同时也给元、明、清的统治者提供了模板。而它在文化上的兴盛可说是整个封建王朝中最为突出的。只有军事可说是最软弱的，没有一个王朝在如此强大的经济文化背景下竟然出现这样一种几乎乏善可陈的军事状况。

陈桥驿"黄袍加身"是怎么回事陈桥驿"黄袍加身"说的是宋太祖赵匡胤代周的陈桥兵变，这得从赵匡胤在后周末年慢慢发迹，最终掌握重要军权说起。

赵匡胤出身将门，家境优裕，从少年时代就独自走南闯北。后汉干佑元年(948)，他投到枢密使郭威帐下当一名普通士兵，开始其戎马生涯。郭威创建后周，赵匡胤受到郭威养子柴荣的赏识。显德元年(954)，后周世宗柴荣即位不久，赵匡胤因战功卓著，两年后就升至殿前都指挥使。显德六年(959)，世宗在北征契丹的途中，忽然从地中得一木牌，上书"点检做"，联系京师流传的"点检做天子"的谣言，世宗有些坐卧难安。回朝后，世宗身染重疾，开始安排后事。为防军事政变，他罢免了名位较高的后周太祖女婿张永德的殿前都点检一职，而代之以名位较低的赵匡胤。

此时的赵匡胤周围已聚集了一批高级将领，有他以拜把子的方式聚集的一批生死与共的号称"义社十兄弟"的铁哥们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韩重赟(yūn)等，又有不少身为禁军将领的好友如慕容延钊、韩令坤、高怀德等。此外，还有弟弟赵光义和亲信赵普等。

世宗死后，恭帝尚幼，赵匡胤军权在握，时机已经成熟。显德七年(960)春天，边境报称北汉勾结契丹联合进攻边境，后周宰相范质匆忙派赵匡胤率禁军北上御敌。一个号称通晓天相的军校苗训对人说起"日下复有一日"的异象。正月初三晚上，大军抵达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临时驻扎。将士们聚集在一起讨论说："如今主上幼弱，我们拼死御敌，有谁知道?不如先拥立点检做天子，然后再北征也不迟。"于是，都押衙李处耘把将士意图报告给匡胤之弟赵光义和掌书记赵普，两人十分赞同。他们一面派人连夜赶赴汴京，向石守信、王审琦密报，以做内应，一面组织将士，加强守卫。次日黎明，众将士集结在赵匡胤的帐外，赵光义和赵普直闯进去。此时的赵匡胤酒醉才醒，睡眼惺忪地被请出来与大家相见。将校们大呼："众将士无主，甘愿立太尉为天子。"还未等他答话，已有人把黄色的龙袍披在了他的身上。赵匡胤说："你们贪图富贵立我，必须听我的命令。不然，我不能做你们的主子。"众将士一齐下马，答道："唯命是听!"于是，他颁布入京后的纪律，率大军返回汴京。

城门早已在石守信的控制之下，大军顺利进城。时早朝未散，后周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闻变，想逃回家中召集人马进行抵抗，被军校王彦升紧追不舍，韩通全家遇害。宰相范质、王溥等被军士挟持来见赵匡胤，他们不得已跪地礼拜。当日，行禅让大礼，正愁没有禅让书，原后周翰林承旨陶穀(gǔ)从袖中拿出事先拟好的禅位诏。赵匡胤完成了禅让大礼，登上皇帝宝座，改国号宋，是为宋太祖。

第九章

宋太祖为什么“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

建隆三年(962)二月的一天，宋太祖赵匡胤对侍臣说：“朕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怎么样?”左右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其实，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五代时期，发动兵变篡夺皇位的，不是在外拥有重兵的藩镇节度使，就是一些在中央典领禁军的宿将。而宋太祖自己就是以殿前都点检这一武将的身份发动兵变取代后周的，他当然越发明白这一点。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宋太祖定下了重文轻武的家法。建隆三年(962)，他在太庙寝殿的夹室里立了一块誓碑，其中有一条誓词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疏言事人”。有一次他对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人民深受其害。朕欲选干练的儒臣百余人分治大藩，即便都贪浊，也比不上一个武人。”所以，在宋太祖看来，任用文士可能产生的危害远不及武人来得大，更不会像武人那样危及政权的根本。

宋太祖虽然出身武将，却酷爱读书。他随后周世宗攻打淮南时，有人告发他私载货物达数车之多，一检查，发现只有书籍数千卷。世宗说：“你做将帅，应该致力于坚甲利兵，要这么多书干什么?”赵匡胤答道：“臣承蒙陛下用为将帅，常怕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所以弄来很多书看，只是为了学知识、广见闻、增智虑罢了。”他曾作过一首咏日诗：

欲出未出光辣达，千山万山如火发。

须臾走向天上来，赶却残星赶却月。

字里行间充满了霸王之气。

太祖之所以说出“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的话来，不过是想告诫武臣们不要一门心思放在用兵上。太祖的一句话让近臣们惶惑不已，殊不知，这不过是太祖对武臣心存疑虑的外在表现。

宋王朝是怎样吞并荆、湘的宋朝创建时，政局与五代时相同，同时存在着很多割据政权，其中有表示臣附的南唐、吴越、泉漳、荆南、湖南，还有称帝的后蜀、南汉、北汉，即使不算上北方的辽·西北党项李氏、回鹘和西南的大理政权，光是汉族聚居地区，就有九国并存。宋初统治者在巩固政权的同时，继续进行着后周世宗没有完成的统一事业。

建隆三年(962)，湖南武平军(今湖南常德)节度使周行逢病死，他十一岁的儿子周保权继任。周行逢病危的时候，召集将校，把儿子周保权托付给他们说："我属下那些凶狠不听话的人，已经被我杀得差不多了，如今只剩下一个张文表。我一死，张文表一定会叛乱夺权。希望大家好好辅佐我的儿子，不要丢掉疆土。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就带着全族人归附朝廷，千万别落入虎口啊。"

周行逢死后，张文表果然据衡州(今湖南衡阳)叛乱，并进攻潭州(今湖南长沙)。潭州知留后廖简一直就没有把张文表放在心上，毫无防备。张文表兵临城下时，他正和宾客们饮酒作乐。探子来报说张文表已率兵前来，廖简却笑着对宾客说："张文表不过是个黄口小儿，他来了我就立刻把他拿下。咱们接着喝，不必理他。"等张文表攻进府中，廖简已经醉得拉不开弓了，于是被张文表杀死，座中十余名宾客也没有一个幸免的。

占据潭州后，张文表向朗州进发，准备尽灭周氏。周保权慌了，修书上报朝廷，请求宋太祖派兵支持。这对宋太祖来说，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干德元年(963)正月，宋太祖以应湖南周保权请求的名义，起用老将慕容延钊率军南下，讨伐湖南叛将张文表，出兵的时候，授权慕容延钊以借道南征的名义，在途经江陵时先灭荆南。

二月初，宋军到达荆门(今属湖北)，荆南节度使高继冲派叔父、掌书记高保寅前往招待宋军并打探消息。当夜，慕容延钊在欢宴高保寅之际，派数千骑兵偷袭江陵。高继冲闻讯惊慌出迎，宋军迅速占领江陵，高继冲被迫投降，荆南成为被宋朝消灭的第一个割据政权，宋朝得到了三州十七县。

宋军吞并荆南后，日夜兼程向南进发。二月中旬，宋军先锋丁德裕

到了朗州城下。这时张文表已经被消灭，而宋军还继续进兵不止，周保权的牙将张从富等人担心朗州不保，相互联络坚守。张从富等人不仅将丁德裕拒于城门之外，还把桥梁全部拆除，沉掉船只，砍了好多树堵塞道路，摆出一副死守的架势。丁德裕因未受命攻城而退兵等候朝廷命令。三月，慕容延钊率兵到了朗州。城中军民惊慌出逃，宋军进入朗州。周保权年幼，弃城逃走时，被他手下的大将王瑞劫持，藏匿在长江三角洲南岸的寺庙中，最终被宋军擒获。赵匡胤对他不予追究，赐给他衣服、金带、鞍马、银钱，任命他为右千牛卫上将军，让他在京城居住。湖南成为被宋朝消灭的第二个割据政权，宋朝得到了十四州一监六十六县。

宋王朝是怎样收取后蜀的宋军迅速消灭了荆南、湖南，使西蜀后主孟昶十分惊恐，他企图与北汉联合攻宋。

西蜀皇帝孟昶的父亲孟知祥本是后唐时期剑南、西川节度使，后自立为帝，孟知祥死后，孟昶即位，当时只有十六岁，由权臣赵季良、张知业等人执政。几年以后，孟昶找理由杀了这两人，开始亲政。契丹灭后晋之际，后晋秦州节度使何建、风州防御使石奉頵带着城池来投降，孟昶势力有所扩大，便有些骄傲起来。他任用王昭远、伊审征、韩保正、赵崇韬等分掌机要，总管内外兵权。他的母亲李氏劝他说：“我曾经见过后唐庄宗及你父亲打仗的情形，当时他们任命的将领都是有着赫赫战功的，所以兵士们才敬畏心服。现在你任命的王昭远，出身微贱，只不过从你小时一直在你身边罢了。至于韩保正等人，都是一些世家子弟，从来也不懂得用兵之事，一旦边疆告急，这些人怎么能领兵御敌呢?”但是孟昶不听李氏的劝告。

宋干德二年(964)十月，后蜀派往北汉的密使赵彦韬向宋告密，把孟昶写给部下刘钧的信献给赵匡胤，赵匡胤知道孟昶有进犯宋朝的意思，大喜。十一月，赵匡胤便以此为借口，命令忠武军节度使王全斌率主力南下，刘光义率偏师沿长江西上，征讨孟昶。孟昶急派王昭远、赵崇韬等统军北上迎敌。十二月末，王全斌军连续攻占兴州(今陕西略阳)、西县(今勉县西)、三泉(今宁强)，俘虏蜀主将韩保正、李进，进至嘉川(今四川广元)。蜀军烧掉了栈道，退保葭萌(今昭化南)。宋军一面分兵修复栈道，一面派小股部队出敌背后，与主力合击蜀军，蜀军连连退却，最

后退守剑门(今剑阁北)。

次年(965)正月初，宋军王全斌又以小部队由小路出剑门后，与宋军主力夹击剑门。孟昶见势大惊，急忙用金帛招募兵丁，并派自己的儿子蜀太子孟玄喆做统领前往救援。但孟玄喆素不习武，部将也都是庸碌无能之辈。孟玄喆离开成都时还携带大群姬妾、大批乐器及伶人，仍然每天从早到晚饮宴游戏，不理军机大事。而此时宋军已攻占剑门，俘虏了蜀军副统帅赵崇韬，并随即攻占剑州(今剑阁)，俘虏蜀军统帅王昭远。孟玄喆此时刚刚抵达绵州(今绵阳)，闻讯大惊，随即逃回成都，所过之处将村舍、粮仓焚烧一空。孟昶自知大势已去，派人请降，说：“我朝中内外亲人二百余口，还有老母亲年近七十，我请求能奉养老母，并让列祖列宗及蜀中百姓免于灾祸。”正月初九日，宋军于魏城(今绵阳东北)受降，宋得四十五州一百九十八县，割据一方的西蜀孟氏王朝至此灭亡。孟昶五月到开封，受封为秦国公，六月中旬就病死了。

全师雄兵变是怎么回事干德三年(965)正月宋朝灭蜀后，降宋的后蜀士兵备受歧视，每人十贯钱的治装费竟然也被无理克扣，加上平蜀的将士居功自恃，不仅私自打开府库，侵吞金银财宝，还掠人子女，抢夺百姓钱物，使得后蜀军民怨愤，人人思乱。就在同年的二月间，后蜀将士赴京到达绵州(今四川绵阳)，发现守城的宋军不过百余人，其余都是降宋的蜀军，于是便抢夺库存武器叛乱。碰巧原后蜀文州(今甘肃文县)刺史全师雄也正携带家属赴京途经绵州，由于他曾担任过后蜀将领，在军中有相当高的威信，遂被乱军推举为主帅。

全师雄率军叛乱后，王全斌派朱光绪率军前往招抚，但朱光绪搜捕得全师雄家属后，不仅将其财产纳为己有，还纳其爱女为妾，将其他人全部杀死，全师雄遂绝了归降之念。

在进攻绵阳失利后，全师雄迅速转攻彭州(今四川彭县)，并一再击败宋军，占领绵州。两川州县纷纷起兵响应，起义的军队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全师雄自称“兴蜀大王”，还委派官吏。这年七月，全师雄连续在新繁(今新都西)、郫县(今属四川)被宋军击败，退到灌口寨(今都江堰)。干德四年(966)六月，宋军攻占灌口，全师雄退守保金堂(今金堂西)。同年秋天，全师雄病死，谢行本继续领导兵变部队并退往铜川(今

中堂西南)，但是此后不久，就被宋军将领康延泽所破，这次反宋的兵变终于失败。

干德五年(967)初，宋太祖将激起兵变的主要将领王全斌、王仁赡、崔彦进等全部召回京城，他们虽然取得了攻灭后蜀的首功，后又平定了全师雄兵变，但还是被剥夺军权，降职闲居。

宋王朝是怎样平定南唐的南唐原是南方割据势力中比较强大的一个。显德四年(957)，后周世宗取其淮南十四州，使南唐顿成惊弓之鸟。宋朝创建后，南唐随即表示臣附。南唐中主李琛因为都城金陵(今江苏南京)隔江就是宋朝国境，遂于宋太祖建隆二年(961)二月，迁都南昌(今属江西)。六月，李璟死于南昌，他二十五岁的儿子李煜在金陵即位，仍以金陵为都城，这就是南唐后主，史称李后主。

李煜李后主(937～978)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文学艺术家，工书善画，精通音律，诗词文赋无所不通，词成就尤其突出。他的词作清倩流丽(亡国后的词则风格深沉凝重)，清人王鹏运在《半塘老人遗稿》中甚至称誉他说：“以谓词中之帝，当之无愧色。”然而李煜作为皇帝却庸儒无能，他对宋朝谨修臣节，曾两次遣使致函南汉劝其臣附，竭力想保持割据政局。宋朝平定南汉以后，李后主害怕宋军继而攻打南唐，当年不仅加倍进贡，还改国号为江南，进一步表示为宋朝属国以求保持割据现状。然而宋太祖消灭割据势力的决心并没有因此动摇，反而加紧了攻打南唐的准备。

宋太祖开宝七年(974)九月，赵匡胤下诏，要南唐后主李煜前来京师归降，李煜因害怕被扣留而称病不赴。十月，赵匡胤以曹彬、潘仁美为帅，自江陵顺流而下进攻南唐，水陆并进。宋军连续攻克池州(今安徽贵池)、铜陵、芜湖(今皆属安徽)，到了金陵西南的重要渡口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西南)。在此之前，有一个叫樊若水的江南进士，因不受南唐重用，为了寻觅投靠宋朝的资本，在采石矶附近以钓鱼为名，往返于两岸，用丝绳精确地测量出了江面的宽度，并向宋朝提出了造船建浮桥以渡宋军的大胆建议，被宋太祖采纳。在造桥过程中，南唐君臣认为长江自古无桥，讥笑宋军是在做儿戏，根本不加重视。十一月中旬，宋军在采石矶建成浮桥，宋军主力得以渡江长驱南下，南唐国都金陵被宋军包

围。

直至此时，李煜才大为着急。他派大臣徐铉到开封，恳求赵匡胤缓师。赵匡胤按剑厉声大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吓得徐铉惶恐而退。

开宝八年(975)初，宋军进攻金陵，再次击败城外的守军。李煜派兵逆流而上想夺取采石浮桥，被宋军击败。李煜又命镇守湖口(今属江西)的朱令赟统兵十万东下金陵抗击宋军。九月，朱令赞率舰、筏顺江大举东下，进至皖口(今安徽安庆西)，被宋军击败而俘。金陵自春至冬，被困近一年，屡战屡败，粮尽援绝。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宋军攻占金陵，李后主肉袒出降，南唐灭亡，宋得十九州三军一百零八县。宋太祖任命李后主为右千牛卫上将军，辱封“违命侯”。太宗即位后，去违命侯，封陇西郡公。据王铚《默记》记载，因李煜做的“小楼昨夜又东风”、“一江春水向东流”等词句满含哀怨之情，使宋太宗衔恨在心。太平兴国三年(978)七月七日李煜生日宴饮，宋太宗密遣其弟赵廷美进牵机药，李煜被毒，次日死于赐第，时年四十二岁。

宋王朝是怎样消灭北汉的北汉长期割据山西中部和北部，是一个小国。它最害怕中原出现一个强盛的王朝，因此，总是不遗余力地破坏宋的统一。宋朝创建后，北汉投靠辽国继续与宋朝为敌，小规模战争时有发生，宋军虽然胜多败少，但是并没有多大进展。宋太祖在建国之初一直致力于消灭南方政权。开宝元年(968)七月，北汉皇帝刘钧死了，他的养子刘继恩即位。这个时候，宋朝已经消灭了荆南、湖南、后蜀三个南方割据政权，宋太祖认为刘钧新死，这是一个攻打北汉的极佳机会。八月，任命李继勋、党进为正副统帅进攻北汉。正当宋军进入北汉境内时，北汉发生内乱，刘继恩被杀，刘钧养子刘继元即位。十一月，辽军救援北汉，宋军被迫退回宋境。开宝二年(969)、开宝九年(976)，宋太祖赵匡胤又曾两次率大军亲征，但第一次因夏雨连绵、疫病流行不得不班师回朝，第二次则因赵匡胤病故中途罢兵，所以两次都未能剿灭刘继元。

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三年(978)迫使陈洪进“纳士”、吴越“归地”以后，决心消灭北汉。太平兴国四年(979)正月，宋太宗赵炅任命潘仁美为主

帅，另派郭进扼守石岭关(今山西忻县南)，切断辽军的救援之路。四月，宋军围攻太原城。刘继元外援无望，粮道断绝。从春天围到夏天，宋军昼夜攻城，赵炅亲临城下督战，将士们勇气倍增，几万士兵轮番向城上射箭，每轮放箭都多达数百万枝。从被捕的俘虏口中得知，刘继元用十钱一枝的价格从百姓手中买箭，已经买了数百万只。赵炅笑着说："此为我蓄之!"

五月，北汉的部将纷纷出城投降，太宗又"下诏劝降，刘继元无可奈何，只好奉表请降。宋朝终于消灭了最后一个汉族割据政权，得十州一军四十一县。宋太宗赐给刘继元金带、银器等物品，授官检校太师、右卫上将军，加封彭城郡公，以环卫官居京师。北汉从此灭亡。刘继元于雍熙三年(986)十二月任保康军(房州，今湖北房县)节度使，淳化二年(991)十二月去世。

"杯酒释兵权"是怎么回事宋太祖赵匡胤在宋朝统治稳定之后，马上开始实行收兵权的措施。首先是收回那些地位与自己相近的高级将领的兵权。建隆二年(961，即赵匡胤即位的第二年)春末，首先免除慕容延钊的殿前都点检，同时还免去了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的军职，令两人都出任节度使。这样，宋去掉了殿前都点检这个重要的禁军职位，由皇帝直接掌握禁军。

七月，赵匡胤又对自己的亲信和开国元勋下手。据说在一个秋天的傍晚，宋太祖赵匡胤布置了丰盛的筵席，召集开国功臣、指挥禁军的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侯张令铎、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步军都指挥使赵彦徽等高级将领宴饮。酒过三巡，赵匡胤令左右退下，显出一副推心置腹的样子，对在座的将领们说："我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可是，这个皇帝很难当，远不如做节度使快活。我现在长年累月不敢睡上一个安稳觉啊!"石守信等人感到很奇怪，急问："这是怎么回事呀?"赵匡胤回答说："这不难明白，皇帝这个位置，谁不想坐坐呢?"石守信等听了这话，连忙离座叩头："陛下何出此言!如今大局已定，谁还敢怀有二心哪!"赵匡胤接着说："你们的忠心我一点也不怀疑。但是，人生在世，谁不贪想富贵荣华?如果有一天也有人把黄袍披在你的身上，你就是不干，也由不得你了!"在座的将领们都吓得满头大汗，他们知道受到猜忌，一边叩首，一

边流泪，连连谢罪，请求赵匡胤指明一条出路。于是，赵匡胤开导道："人生短暂，犹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不如多积攒钱财，多购置几处房产以留给子孙后代，自己过着儿孙绕膝、歌舞宴饮的日子颐养天年。这样，咱们君臣之间没有猜忌戒备，上下相安，岂不很好?"见赵匡胤交待得如此明白具体，第二天，石守信等人就上疏称病，请求解除他们的兵权。赵匡胤一一应允，仅保留每人的节度使官衔，但并不赴任，不过是有名无实的散官。从此，殿前副都点检一职也取消了，而总领禁军的权力牢牢地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

宋太祖、宋太宗是怎样加强皇权的首先，集中兵权。宋太祖赵匡胤本身便是因为掌握了后周的兵权，最后才得了天下，因此，他深知兵权的重要性。他不仅于建隆二年(961)免除了殿前都点检等最高军职，同年七月又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解除了石守信等宿将的兵权。干德四年(966)，赵匡胤又命令各地选送精兵编入朝廷的禁军，地方遗留的老弱军人编为厢军，从而削弱地方节度使的兵权。中央朝廷的禁军由皇帝直接掌握，并指派文臣代替地方的武将。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兵权都牢牢地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

其次，集中行政权。在中央，实行政事堂(中书)与枢密院"对掌大权"的二府制。宰相(包括侍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行政首脑(另设参知政事为副相以分宰相之权)，枢密使是军事长官，而地位仅次于二府宰执的三司使(被称为计相)掌握财政。这样，使政、军、财三权分立，相互制约。而对于地方上的府州，则由文官任州郡长官，且不得兼任多职，并另设可向皇帝直接奏事的通判以抑制知府、知州的职权。宋太宗还削弱节度使的权利。太平兴国二年(977)，他命令节度使属下的支郡全部收归朝廷，节度使只领一府或一州。以后，更将其留在京城，使节度使终成宗室、将相大臣的虚衔。至道三年(997)，宋太宗将全国划分为十五路，各路设转运使，后又设提点刑狱，除负责转运财物、审理刑狱外，还负责监察地方官员，称为监司。

再次，集中财权。中央由三司使掌管全国财政，号称"计相"；又通过转运使、通判、主簿等把各级财政统一起来。干德二年(964)，宋太祖命令各地财政收入除留下日常经费外，全部运送到朝廷。

最后，完善科举制度。严格科考制度，举人必须经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使科举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直接效忠于皇帝，还增加了录取名额。宋太宗在位二十二年中，科举得官的学子就有近一万人。

宋太祖、宋太宗采取的上述措施，在北宋创建初期，对于防止藩镇割据，巩固国家统一，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让他们预想不到的是，它也带来了军事力量削弱、官僚机构臃肿等副作用，埋下“积贫积弱”的祸根。

为什么说宋太祖是一个“创业垂统之君”

宋太祖赵匡胤，行伍出身。在五代十国这样一个乱世之中，他从一个普通的士兵，登上九五之尊的皇帝宝座，亲眼目睹了后晋、后汉、后周的灭亡过程。借鉴活生生的历史经验登上皇位后，一边对有功的军官们升官晋爵，安稳军心，另一方面，礼遇后周的皇帝、大臣，收拢民心。赵匡胤做事非常有魄力，后周节度使李筠、李重进叛乱，他都亲自率兵出征并一举平定，使后周许多节度使闻名生畏，全都俯首听令。等国家稍微稳定之后，赵匡胤又开始实行收兵权的措施，收回了慕容延钊、石守信等宿将、亲信的兵权。

兵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了，不用再担心“陈桥兵变”的事件重演了，赵匡胤便开始实行他统一全国的宏伟目标。从干德元年(963)起，到开宝八年(976)十一月，赵匡胤用了十四年的时间，先后扫平了荆南、湖南，夺取了后蜀，消灭了南汉，吞并了南唐。只有北汉，赵匡胤虽然两次亲征，但都无功而返。他的弟弟赵炅即位后，继续他的事业，消灭北汉，使泉漳纳土，吴越归地，使宋朝初步实现了统一。

赵匡胤喜欢自然行事，不喜欢装模作样。刚当上皇帝那会儿，还很喜欢微服私访。有大臣劝谏叫他不要轻易出去，他满不在乎地说：“要想当上皇帝，自然有天命。以前周世宗看到将领中有方脸大耳的就把人家给杀了，而我却天天陪在他身边，也没把我怎样嘛!”

赵匡胤还很节俭，宫里的帘子，全部都是青布做的，常穿的衣服也是洗了又洗的。攻破后蜀时，他看到孟昶用的便盆都用珠宝装饰，一把就打碎了，说：“你这个东西都用珠宝装饰，也不知你该用什么样的容器

盛饭了。这样行事，不亡国还等什么呢?”魏国长公主衣饰翠羽，太祖不让她穿，对她说：“你做公主的一穿，宫闱亲戚争相仿效，京城翠羽的价钱就会上涨。小民逐利，捕捉伤生，便都由你而起。你生长富贵，怎能造此恶业之端呢?”

宋太祖赵匡胤不仅创建了宋朝，还于开国初收回了节度使的兵权，初步统一了国家，重法处置了贪赃枉法的贪官，就是州郡的长官也是他亲自委派，甚至诏令都一一过目。他重视农业，兴办教育，慎罚轻敛，使人民休养生息，国家安定太平。所以，赵匡胤在位虽然只有十七年时间，却是整个宋朝三百年基业的根基，是子孙后代的典范。他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基本统一了南方，并为统一全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是强化了中央集权，彻底消灭了中唐以来造成地方割据的动乱因素。宋代以后再没有出现分裂割据局面，宋太祖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高梁河之战是怎么回事据《宋史纪事本末》卷十三“契丹和战”记载，宋朝创建后就一直和辽(即契丹)通好。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讨伐北汉，辽朝遣使来问：“你们以什么名义讨伐北汉呢?”太宗回答说：“他们违背圣命，理当问罪。你们如果不支持他们，我们的和约就照旧，反之，就只有一战了。”但是，为了对抗宋朝，辽还是派了军队援助北汉。

事实上，自建国之日起，宋朝就认定辽国是宋在北方边境上的威胁。在宋太祖、宋太宗的心中，夺取后晋时割让给辽的燕、云十六州才能算是完成了统一大业。照宋太祖的意思，本想储备巨额资金向辽赎买，如果辽不同意就以这笔开支作为讨伐辽的军费，武力夺取燕、云等州。为此，宋太祖曾在经济上做了多年的准备。但是，宋太祖的宏伟战略没来得及实施就死了。宋太宗继续着太祖未竟的事业。太平兴国四年(979)五月，宋太宗灭北汉后，就想乘胜直取燕、云，众将都认为将士已经疲累，粮饷也不充足，不宜再行。唯独崔翰说：“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取之易。”宋太宗亦决意继续出兵。六月，宋军从太原直接进入燕京外围，辽的东易州(今河北涿州西南)刺史刘宇、涿州(今属河北)判官刘厚德等先后以城求降。七月初，宋军进至燕京(今北京)城南，后又四面把燕京包围了起来。

正在这时，辽景宗派大将耶律休哥率军赶到。宋辽两军在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展开大战。辽军耶律沙部战败退却，宋军乘胜追击，却遭到辽军耶律斜轸、耶律休哥二部的左右夹击，而耶律沙部又率部反击，宋军大败，全线溃退，死者万余人。宋太宗自己也在中箭后随乱军往南逃，辽军穷追不舍，太宗因伤势过重不能骑马，直到涿州才乘上驴车幸免于难。辽军乘胜追击，到了满城、火山军等地反被宋军击败。这次攻辽战争才告一段落。

岐沟关之战是怎么回事雍熙三年(986)，宋太宗听信雄州(今属河北)知州贺令图等的进言，认为辽国皇帝辽圣宗年幼(年仅十二)，承天太后(即萧太后)专权，宠臣韩德让掌权，内部不稳，是攻辽的好时机。本来宋太宗准备御驾亲征，但高梁河之战的狼狈逃跑记忆犹新，于是采纳大臣建议，命曹彬、崔彦进为统帅率东路军出高阳关，持重缓进，等待中、西路军到达后会攻燕京；又以田重进为主将率中路军出飞狐口(今河北涞源北)，攻山后(今太行山西北)诸州；西路以潘仁美为主将，杨业为副将，出雁门关(今山西代县北)东进，然后一齐会师燕京。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宋朝的三路军节节胜利，中路军完成预定任务，攻占了灵丘(今属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等山后要地，西路军也很快攻下寰州(今朔州东)、朔州(今属山西)、云州(今大同)、应州(今应县)等地，东路军则攻占了新城(今新城东)、固安(今属河北)、涿州等地。

然而东路军却并没有按预定计划缓进，而是在粮食转运困难的情况下，迅速进军，占领涿州，又以粮乏退回雄州。但东路军听到中、西路军胜利的消息后，急于争功，重又攻至涿州。时至五月，天气炎热，人困马乏，粮食又快没了，只好再次退兵。恰在这时，辽援军耶律抹支部赶到，与留守燕京的耶律休哥会合，趁机攻击从涿州南退的宋军，在岐沟关(今涿县西南)北追及宋军。宋军环粮车以自卫，大败后乘夜渡过巨马河(今河北南拒马河)。因宋军主力仓皇南逃，岐沟关城中只剩几万运粮军民，辽军不知虚实，因而未加强攻就退兵了，数万运粮军士与民夫得以顺利退回宋境。此战实际上主要是辽军追击溃退的宋军，并未发生重大战斗，史称“岐沟关之战”。

东路军的溃败影响到整个战局，于是，宋太宗命令各路撤军。结果

中路军田重进全军而返，西路主力也已撤回，宋太宗又命令潘仁美、杨业保护云、应、朔、寰四州的百姓南撤。而此时辽的十万大军已向西勐攻，并攻下蔚州、寰州，给掩护百姓南撤的宋军以严重的威胁。宋西路军统帅潘仁美、监军王侁不听从副帅杨业的合理建议，迫令杨业在不利的形势下，前往朔州接应南撤的居民，杨业要求潘仁美在陈家谷口设下伏兵。等到杨业与辽军激战于朔州南，为辽军伏兵袭击，按预定战略退回陈家谷口时，潘仁美等却已违约率军逃走。杨业终于全军覆没，自己也在身负重伤后，为辽军所俘，绝食三日而死。西部战事也告结束。杨业子杨延昭(延朗)、孙杨文广后亦是抗辽名将，后世将杨家三代抗辽事迹，演绎为“杨家将”故事，流传至今。

宋朝收复燕、云的战争再次大败，且损失惨重，宋太宗从此放弃攻辽，改而采取防御战略。

后来，辽军为了报复，又挥师南下，宋辽两军发生了多次战争，辽虽然小占优势，但得失大体相当。辽国深感连年战争，劳民伤财，于是也长期采用休民息兵的政策，宋辽边境因而得以相安数年。

为什么说宋太宗是一位贤君宋太宗即位后，立即实行完成统一大业的计划，继续实施消灭割据的政策。南唐灭亡之后，清源军(泉州)节度使陈洪进因与吴越素来不和，颇不自安，便在太平兴国二年(977)亲自入朝。太宗对他礼数优厚，但过了大半年也不放他回去。敏感的陈洪进意识到宋朝消灭割据的决心，便主动上表献上泉、漳十四县，史称泉、漳纳土。吴越的钱俶在太祖时颇受优遇，太平兴国三年(978)，钱俶再次入朝，恰逢陈洪进被迫纳土，他迫不得已上表献上了吴越国的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

太平兴国四年，南方的割据局面彻底结束，宋太宗决心消灭北汉，他御驾亲征，于五月消灭了最后一个汉族割据政权。接着，太宗决定乘灭北汉的余威，夺回后晋时割让给辽的燕、云地区。然而由于师老饷乏，加上战术上的失策，在决定性的战役高梁河之战中，宋军大败。雍熙三年(986)，经过长期准备的伐辽战争也以失败告终。从此，宋太宗把战略进攻改为战略防守，对辽采取守势。

太宗虽然使陈洪进、钱俶相继纳土，并消灭了北汉，但在收复燕云的战争中却一再失利，所以他把精力转移到内政上来。措施之一，就是大开科举之门，据统计，太宗朝一共开科八次，共取进士一千四百七十八人。太宗朝不仅取士多，而且提升也快，进士出身是最受优待的，如吕蒙正和张齐贤，在登科七年后就已位至执政，十二年后吕蒙正则担任宰相之职，无怪乎宋人有“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指宰相府)”的说法。他又开始用文臣统兵，以文制武。宿将曹翰作了一首《退将诗》，中有两句云：“曾因国难披金甲，耻为家贫卖宝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武臣地位日渐下降的事实。太宗还命人遍访图书，组织人员校勘，又编修大书昭示太平。被清人称为宋朝四大书的《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和《册府元龟》，前三部都是在太宗朝修成的。

宋太宗以仁慈节俭为宝，穿的衣服常常是洗了再洗的旧衣。他毁坏那些珍奇精巧的器物，辞却女色宴乐之献，也不喜欢出去守猎游玩。他注重农事，极力表彰敢于直言的大臣。据说有一次在宫廷宴会上，太宗早年担任开封府尹时的旧僚贾琰及判官窦偁都在座。贾琰花言巧语，极尽献媚取宠之能事。听着听着，窦偁再也忍不住了，拍案而起，指着贾琰说：“如此巧言令色，你不觉得羞耻吗?”一时间举座愕然，太宗只好宣布宴会结束。之后，窦偁被一再提升，直至参知政事。太宗对他说：“朕所以提升窦卿，乃因为当年窦卿敢于以公正之心当面指责贾琰的虚伪。朕是在表彰正直的大臣。”

史官评价宋太宗时说：“故帝之功，炳焕史牒，号称贤君。”考之太宗的所作所为，如此评价，不为溢美。

王小波起义是怎么回事淳化四年(993)，四川大旱，官府却依然“赋敛急迫”，逼得广大农民失业，没有办法生存。宋朝政府又在那里设置“博买务”，垄断布帛贸易，贱价强行收购农民的布帛细绢。后来，又把茶叶也列入了专卖，使茶农和茶贩都面临破产和失业。

王小波原是永康军青城县(今都江堰市南)的茶农。淳化四年二月，王小波聚集失业茶农、破产农民等一百多人发动起义。他对起义的农民说：“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因为这正好说出了农民们的心里话，

所以，附近的农民纷纷响应，起义军很快发展到一万多人。王小波率领起义军随即攻下青城县城，挥军南下，同月又攻下彭山(今属四川)，杀死了县令齐元振，因他平日贪赃枉法，爱钱如命，愤怒的农民甚至剖开他的肚子，塞进他搜刮来的钱财。一时间民心大快，参加起义的人数日益增多。

同年十二月，王小波率起义军从彭山北上，勐攻成都西南的交通重镇江原(今崇庆西南)，与西川宋军主力展开了大战。当时宋西川都巡检使张圮正驻守江原，王小波率众奋战，冲锋在前，不幸中箭。但他不顾个人安危，仍然指挥战斗，打败了宋军，并杀死张圮，取得了川西大战的胜利。可是王小波终因伤势过重而死。王小波死后，起义军推举他的妻弟李顺为首领继续进行斗争。

李顺起义的战绩及结局如何起义军在李顺的领导下又接连攻下蜀州、邛州，杀死了知州桑佃绅、监军王亮等官吏十余人。李顺军又先后攻占永康(今四川崇州西北)、双流、新津等地，分兵驻守。在进攻成都失利后，起义军转而攻占汉州、彭州。

淳化五年(994)正月十六日，李顺起义军占领成都，创建大蜀政权，李顺称蜀王，建元应运。并发行了“应运通宝”、“应运元宝”新钱币，还实践了“均贫富”的口号，没收富人的财产分散给贫民。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起义军每占领一地，召集当地的“乡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财粟，据其生齿足用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此时起义队伍已经扩展到十几万人。以后，大蜀军四出扩大战果，所向无敌，一时间北到剑门关(今剑阁北)，东到巫峡(今重庆、湖北接界处)，全部都在农民政权的控制之下。

淳化五年正月下旬，宋太宗得知川西的严峻形势，立即命心腹宦官王继恩率兵入川镇压。二月初，宋军还未入川，起义军攻占成都并创建政权的消息再次传到开封，宋太宗大为震惊，加派兵力，分北路和东路攻蜀。

起义军在宋的大军入川前，曾派杨广率军北攻剑门以便占领川北的门户，但因人少力单，未能攻下。相反，却用了二十万大军，花费八十

多天时间，围攻梓州这样一个没有多大战略意义的城市，最终没有攻下，反被宋军击溃。宋军于是顺利入川，直扑成都城下。五月六日，宋军攻占成都，李顺被俘，十余万大蜀军大多战死，被斩首者达三万。起义军余部又推举张余为首领，继续进行斗争，转战云南、川东。至道二年(996)二月，张余在嘉州(今四川乐山)兵败牺牲，其他残部也相继为官府招降或消灭。李顺起义最终失败。

澶渊之盟是怎么回事咸平二年(999)冬，辽承天太后、圣宗亲率大军南下大举攻宋。宋名将杨延昭(杨业之子)被围困于遂城(今河北徐水西北)，杨延昭命令士兵乘夜色把水浇在城墙外侧，第二天水冻成冰，辽军无法靠近，未能攻城，于次年正月退兵。但，从此以后，辽军每年派兵南下入侵。

景德元年(1004)，辽承天太后、圣宗又以收复被后周世宗占领的关南地区为名发动大规模战争。北方州县告急的文书一夕数次传至开封，宋廷朝野大为震惊。真宗平时常夸海口说，如果辽军来犯，他一定率兵亲征，可此时他却有些胆怯。参政知事王钦若请真宗南逃金陵(今江苏南京)去避难，枢密院的副长官陈尧叟又让他到四川去躲风，只有宰相寇准陈明利害关系力请真宗立即亲征，鼓舞士气，打退辽军的进攻。真宗虽然同意亲征，却求和心切，还没离开京城，就派曹利用和辽将王继忠议和。十一月间，宋真宗才从京城开封北上，却一路顾望不前，行军迟缓，前进不到二百里到达韦城(今滑县东南)时又想南逃金陵。在寇准和禁军统帅高琼多次催促下，才渡过黄河，于十一月到达澶州(今河南濮阳)北城。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记载，当真宗的黄龙旗插上澶州北城时，宋军欢呼，“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

在此之前，辽军已进至澶州城下，主将萧挞览被宋军射死，而宋朝重兵驻守的定州(今河北定县)也威胁着辽军的后方。这时，宋朝的百万大军已至澶州近处，辽军顿感孤军深入，犯了兵家大忌，于是也想议和退兵。十二月，双方订立盟约，规定宋朝每年给辽朝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称为“岁币”。澶州的郡名为澶渊，所以这次盟约被称为“澶渊之盟”。从此，宋辽和平相处直至北宋末年。

为什么说宋真宗时“一国君臣如病狂”般崇道宋真宗澶渊之盟的结

果，令宋真宗和寇准都自我感觉良好。真宗庆幸自己“亲征”的英明和“花钱消灾”政策的正确，对寇准也敬重有加。这让王钦若很是嫉妒。据《宋史纪事本末》记载，一天，真宗目送寇准退朝，王钦若在一旁问道：“澶渊之役陛下为什么不以为羞耻，反认为寇准有功于社稷呢?”真宗吃惊地问：“这话怎么讲?”王钦若说：“城下之盟，春秋所耻。陛下以万乘之尊而为城下之盟，还有比这更可耻的吗?”真宗听了很不高兴。王钦若又接着说：“陛下听说过赌博吗?钱快输光时，赌徒总是孤注一掷。而您当时就是寇准的孤注，够险的。”真宗的自尊心一下子扫除一空，对寇准的敬意和眷宠也日渐消退，加上之前寇准用人不拘一格，也招来其他同僚的不满，而寇准自己在澶渊之盟后也颇有居功自得的架势，让真宗老大不快。景德三年(1006)，寇准被罢去相位，出知陕州(今河南陕县)。次日，王钦若就被再用为参政知事。

后来，真宗一想到澶渊之盟，就感到奇耻大辱。王钦若揣摩真宗不再愿意谈论兵事，故意对他说倘若攻取幽、燕，便可雪洗耻辱。真宗说：“河朔生灵，始免兵革，朕安忍为此?可思其次。”王钦若这才托出本意：“只有封禅才能镇抚四海，夸示外国。”并称自古需有天瑞，帝王才可以封禅，但天瑞也可人为。真宗动心了。于是，一系列的闹剧开始了。

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初三，承天门出现了天书。真宗于是改当年为大中祥符元年，并大赦天下。

三月，真宗命朝臣讨论封禅事。封禅是祭天仪式，属于帝王代兴、天下太平以后封祀泰山昭告成功的大礼，秦始皇、汉武帝都举行过这一大典。后世帝王虽然都难免有封禅之心，却都要掂量一下自己的功业能否匹配，不敢贸然行事。宰相王旦等五次率文武百官等两万四千余人上表请求真宗封禅，三司使丁谓又称经费“大计有余”，真宗于是决定封禅。十月初四，封禅队伍以天书为前导，浩浩荡荡向泰山进发，十七天后到泰山脚下，斋戒三日，举行封禅礼，又大赦天下。十一月，还到曲阜拜谒了孔庙，赐钱三百万。封禅大典前后共五十七天。从此，天下争言符瑞，竞献赞颂，举国如痴如醉。

大中祥符四年正月二十三日，真宗又西祀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

汾阴后土祠建于汉武帝时，祭汾阴就是祭地神。此次西祀又持续了六十八天。

大中祥符五年，真宗对大臣说自己做了一个梦，说神仙传达玉皇之命“令先祖赵玄朗授你天书”。于是，真宗马上命天下避圣祖讳，并为他杜撰了名字赵玄朗，为圣祖上尊号“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配了号为“元天大圣后”的圣母。又在京师建造景灵宫，供奉圣祖和太祖太宗像，在京城最大的道教官玉清宫昭应大殿供奉玉皇和圣祖塑像。

大中祥符六年，老子故里亳州(今安徽亳县)的官吏百姓等三千余人进京，请求真宗亲谒亳州太清宫。次年正月，仍以天书前行，真宗率队从开封到亳州太清宫拜谒老子，一个月后才回开封。

天禧元年(1017)正月初一，真宗到玉清官向玉皇大帝献上宝册和龙服，全国各地于同日分设罗天大醮，供军民烧香礼拜，全国人民都被卷入这一活动当中。

为了把以天书为中心的崇道活动搞得场面壮观，从大中祥符元年开始，真宗就在全国大兴土木营建道观。其中最大的是玉清昭应宫，共有二千六百一十座殿宇，动用了全国最好的建筑物资，工人三四万人夜以继日耗时七年方才建成。次年，真宗又命令全国州县必须创建庆观供奉三清玉皇，总数在一千所以上。

与此同时，在大中祥符五年(1012)，真宗命令王钦若等整理新道藏。四年后，新道藏基本修成，命名为《宝文统录》。天禧三年(1019)，经增补抄录了七藏，真宗重命名为《大宋天宫宝藏》，这在道教史上倒是有重要的地位。

干兴元年(1022)，真宗去世，天书也随葬入陵，结束了长达十五年的天书闹剧。

王均兵变是怎么回事王小波、李顺起义虽然失败，宋朝廷对川蜀地区的政策也作了一些调整，减少了一些税赋徭役，但是，川蜀地区的人民依然人心未定，加上该地地方军政官员并未从全师雄兵变及王小波、

李顺起义中吸取教训，还是过着享乐腐化、刻剥军民的生活，终于激起王均兵变，其时距离王小波、李顺起义不过五年。

真宗咸平三年(1000)正月初一，戍守益州(今四川成都)的神卫军指挥使王均所部发动兵变，占领益州，王均称帝，改元化顺，国号大蜀。据《宋史纪事本末》记载，最初，益州的神卫军是由都虞侯王均、董福分领的。董福带兵很有一套，他所带领的军队供给充裕，而王均却喜欢饮酒赌博，军装都被拿去当酒钱赌资了。这个时候。兵马钤辖符昭寿和益州知州牛冕来阅兵，蜀地的人们都争着去观看，却发现两军的衣服新旧程度相差悬殊，王均的兵士又羞又愤，加上符昭寿素来骄恣侵虐，兵士们一直很讨厌他。正月初一，赵延顺等八人杀掉了符昭寿，拥王均为王。

蜀州知州牛冕逃往汉州(今四川广汉)，汉州随即被王均攻陷，他们又逃往东川(今四川三台)。王均率兵攻打绵州、剑门，企图占据川北门户，但均未成功，只得退守益州。二月，王均又想向南发展，遭到蜀州知州杨怀忠部的阻击。不久，杨怀忠部又图谋再次攻入城内，孰料两军势力相当，杨怀忠只得退守鸡鸣原(今四川双流东)，王均也闭门守城。

二月十六日，北巡到德清军(今河南清丰西北)的宋真宗得知王均叛乱，立即从抗辽前线抽调负责督运粮草、曾参与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有功的前益州知州雷有终再任益州知州兼主帅，并抽调石普为副帅，率步骑八千，赶往川蜀镇压，以后又派宦官秦翰率军增援。

王均未能向外发展，困守益州城，没能引发群众参与斗争，兵变没能发展成起义。虽千方百计抗敌，然困守孤城，九月初不得不突围南逃，经广都(今四川双流东南)、荣州(今四川荣县)，到富顺蓝(今四川富顺县)，正准备南渡沱江，进入当时还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戎州(今四川宜宾)图发展，却被杨怀忠追上，仓促间还没来得及应战，王均就被杀了，兵变失败。川蜀地区又趋平静，宋朝对于川蜀的统治终于稳固。

第十章

为什么说宋仁宗“恭俭仁恕”

宋仁宗赵祯(1010～1063)，初名受益，是真宗的第六个儿子。大中祥符三年(1010)四月十四日生。宋仁宗在位时间四十一年，是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仁宗一朝还算是宋朝的治世，除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上都颇有些盛世气象。治世的出现，与仁宗“恭俭仁恕”的个人秉性与治国方针有关。仁宗最大的优点就是宽容仁厚，能容忍各种激烈的批评意见，即便是对他的私生活妄加非议，听了也不会挟愤报复。

有一次，仁宗对近臣说起昨天夜里肚子饿想吃烧羊肉，近臣问他为何不让人索取，他回答说：“我担心从此以后他们为防不备之需，每夜都要宰羊等着，这样不是杀生害物了吗?”

对于一些被判处死刑但是还有疑问的案件，仁宗总是命人重审，每年都要救活上千人。吏部在选人时，如果有谁一旦误判人死罪，一辈子也不能获得升迁。他常常告诫辅臣说：“我从未过分地责备过谁，更何况是滥用死刑呢?”

有一则轶闻尤其能说明仁宗朝言论的宽容度。据说仁宗“犹恶深文”，有一个举子献诗成都知府：“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本来这诗完全可以视为反诗，知府抓了这个人，上报给仁宗，仁宗却说：“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才写的，可让他做个小州郡的司户参军。”可见仁宗的为政风格。

正是仁宗的这种仁恕宽容，才形成了当时“忠厚之政”的风气，并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是什么造成宋仁宗时重大政治经济危机宋仁宗庆历初年，北宋王朝隐伏的危机终于慢慢地暴露出来，主要是被称为“三冗”的“冗官”、“冗兵”、“冗费”。宋初内外官员只有三五千员，由于宋朝实行官职名称与职务分离的制度，且官员不问有没有才能均能按资历升迁，加上科举和其

他途径进入仕途的人数日益增多，到景德年间(1004～1007)已有官员一万余位，而皇祐年间(1049～1054)更是多达两万余人。仁宗时期，出现了“州县不广于读史观天下前，而官五倍于旧”的局面。

宋初有军队二十二万，宋太祖时，由于加强军事集权，禁军数目不断增加，开宝年间(968～976)全国禁军连同厢军也不过三十七万人，太宗至道(995～997)年间为六十六万余人，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1)达到九十一万，到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竟扩充到一百二十五万多。一个国家养了如此多脱离生产的军队，不但影响农业生产，巨额的军费支出更是占国家收入的大部分。

所谓“冗费”是指皇帝举行各种祭祀活动、修建豪华的佛寺宫观以及各种赏赐等等的开支。

冗官、冗兵、冗费导致宋朝廷入不敷出，造成了政府重大的经济危机，而过度膨大的官僚队伍又使宋朝政治陷入濒临瘫痪的境地，仁宗之时，这所有的危机都已经暴露无遗。

北宋皇帝是怎样换取边境安宁的宋景德元年(1004)十二月，宋真宗与辽朝在澶州订立“澶渊之盟”，规定宋朝每年交给辽朝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换取了北方边境的和平，并一直持续到北宋末年。

但是，到了仁宗时期，新兴于西北的夏(西夏)又成了宋朝边境上的另一威胁势力。宋仁宗宝元元年十月十一日(1038年10月31日)，李元昊称帝，国号夏，史称西夏。李元昊的祖父李继迁在宋太宗时起兵反宋，后归附辽朝受封为夏国王、定难军节度使，宋朝曾多次派兵攻打，均以失败告终。真宗即位后李继迁表示愿意归附宋朝，宋朝任命他为定难军节度使，赐名李保吉，但是李继迁还是不断侵扰宋，并攻占了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改为西平府。景德元年李继迁死后，儿子李德明即位，先接受辽封为西平王，景德三年(1006)又与宋议和，被宋封为西平王、定难军节度使。李德明与宋朝保持相对友好的关系，但与此同时，却积极发展势力，在怀远镇(今宁夏银川)建城为兴州，并把它作为新首府准备称帝，可是，在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没来得及称帝就死了。宝元元年李德明的儿子元昊称帝，创建夏。从此，维持了三十年的和平政局被打

破。

从宋康定元年(1040)到庆历二年(1042)，宋朝和夏分别在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北)、定川寨(今固原西北)展开三次大战，宋军三次都被打败，西夏军也死伤过半，双方都损失惨重。宋夏终于谋求妥协，庆历四年(1044)十月双方订立和约，西夏臣附于宋朝，宋朝每年“赐”银、绢、茶等大量财物，并开放边境贸易，宋夏关系又趋于缓和。

而辽朝看到宋朝正与西夏作战，无暇北顾，庆历二年九月，故意说要索取后周世宗所占关南十县，宋仁宗没办法，为了换取和平，只得答应每年增“纳”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北宋皇帝信奉的是拿钱消灾的原则，纳银赐绢来换得边境的所谓“和平”。

庆历新政是怎么回事宋朝经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到仁宗初年刘太后执政时期，立朝已有七十余年，积弊日深。明道二年(1033)三月刘太后死后，仁宗亲政，真正掌握了大权。

庆历三年(1043)，士兵王伦在沂州(今山东临沂)发动起义，陕西商州张海、郭邈山领导饥民起义。此时，正值宋与西夏交战而连战皆败，而就在前一年，宋廷又刚刚被辽胁迫答应每年向其增纳银绢。内忧外患交相侵迫，有识之士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要求变革以挽救统治危机。仁宗也想要改革弊政，三月，吕夷简罢相，仁宗重新起用欧阳修、余靖等人为谏官，议论时政。四月，又任命范仲淹、韩琦为枢密副使。八月，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仁宗想依靠他们改革弊政，更新政局，多次督促他们拿出变革方案。庆历三年九月，范仲淹上《十事疏》作为系统改革的基本方案。十事包括：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见《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传》)这是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建议，全部被仁宗采纳。范仲淹提出的十事，绝大多数以诏令的形式颁行全国，时称“新政”，史称“庆历新政”。

新政从十月起陆续实行，首先实行的是“择官长”，意图改变从前即便是无能、老弱、贪污的官员也能依资格选任的状况。同月末颁布了改

革考绩的诏令(即“明黜陟”)，改变原先文官三年、武官五年，一律升迁等方法。在罢黜了一批贪浊不才的地方官后，整个官僚集团受到很大震动。十一月下旬，先后颁布诏令“抑侥幸”，不许权贵子弟担任馆阁职务，又对“恩荫”进行改革，分别限制及降低以“恩荫”取得官资的人数、等级，并规定担任实际职务的最低年龄等。月末，又下诏“限职田”(即“均公田”)，将各级地方官的职田标准降低，但要限时补足数额，使他们都能得到比较优厚的待遇，促使有才能的官员乐于担任地方官。庆历四年三月，改革科举制度(即“精贡举”)，变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的旧制为重视德行与策论以求取德才兼备人士的新制，力图从根本上改善吏治。

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都认为改善吏治才是根本，尽管改革的措施都尽量照顾到官吏们的既得利益，变革的幅度并不大，但还是限制了豪贵的特权，侵犯了官僚阶层的部分利益，于是遭到权贵们的勐烈抨击。夏竦甚至指使婢女临摹石介的笔迹，伪造了一封石介给富弼的信和一份石介替富弼起草的诏书，说是要废仁宗另立新帝。虽然仁宗并不相信，夏竦的阴谋未能得逞，但此时范仲淹、富弼等人已深感政治形势险恶，不能自安于朝廷。正好这个时候西北地区局势紧张，庆历四年六月，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路宣抚使，离开朝廷。庆历五年(1045)正月，范仲淹被罢参知政事职务，富弼、韩琦亦被罢枢密副使出任地方官。至此，改革派的核心人物全部调离中央朝廷，守旧派代表贾昌朝等掌握了朝政，这场因在庆历年间进行而被称作“庆历新政”的改革最终失败。

为什么说宋英宗是一个明哲的皇帝英宗赵曙的在位时间可算是最短的，从治平元年(1064)到治平四年，只有短短四年，但《宋史·英宗本纪》却称他“以明哲之质，膺继统之命”，对英宗评价颇高。在众多的宗室弟子中，仁宗为什么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赵曙，主要还是英宗自己的品性让仁宗最后把皇位放心地交给了他。事实证明，英宗的确是一位明哲之君。

英宗一直就以孝德闻名。他父亲濮安懿王死了以后，把所有的东西分给几个儿子，英宗却把他所得的那份全部送给了王府一些要离去的老佣人。

有一次，宗室中有人从他这儿借走了金带，最后却拿了铜带来还，

主事的官员告诉他，英宗却说：“这就是我的那条带子呀!”

又有一回，英宗命殿前侍卫去卖一条值钱三十万的犀带，侍卫却把它丢了，英宗也不过问。

当初，仁宗下诏要册封英宗为皇太子，英宗一再推辞，上奏十余次没有得到应允才应召，离家之前告诫家人说：“好好守着咱们的屋子，一旦皇上有子嗣了，我就马上回来。”

即位后，一天，英宗对儿子赵顼(即后来的宋神宗)说：“咱们国家的旧制，士大夫的儿子如果娶了皇帝的女儿，全都提升行辈以避公婆之尊，这样不好。我每每想到这个，就睡不着。怎么能因为富贵的原因就不顾人伦长幼的次序呢?可以让有关部门把这个制度给废了。”没想到碰上生病，这件事没能做成。

为什么说宋神宗是一个大有作为的皇帝宋神宗(1048～1085)，名赵顼，原名仲铖，是英宗赵曙的长子，母亲是英宗高皇后。嘉祐八年(1063)，赵顼授安州观察使，封兴国公。后又加忠武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受封淮阳郡王。治平元年(1064)进封颍王。治平三年十二月立为皇太子，次年正月英宗驾崩，赵顼即位，时年二十岁。

神宗自幼好学，“日晏忘食”，害得英宗总是让内侍加以制止以免他劳累过度。赵顼特别注意衣冠整洁，讲究礼议，大热天也不用扇子。当太子时他就喜欢读《韩非子》，对法家“富国强兵”之术颇感兴趣，还读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王安石的治国理财思想非常赞同。

宋神宗在位十八年，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支持王安石发动熙宁变法，一是实行元丰改制。

熙宁二年(1069)二月，神宗力排众议，果断地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委以重任，揭开了变法的序幕。为了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神宗还特别命令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由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主持，并起用了吕惠卿、蔡确、曾布、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这一年，新法陆续出台、实施，遭到守旧势力的攻击，但神宗不为所动，继续支

持新政。熙宁三年，神宗进一步提升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新法先后颁行天下，变法进入高潮。宋神宗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他对王安石绝对的支持，保证了变法的成功，对改善当时的社会生产条件、增强国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次变法在前一阶段取得了胜利，但随着变法的逐渐深入，触及大商人、大地主的利益，变法中存在的弊端也日渐明显，反对派攻击愈加劻烈。宋神宗开始犹豫，并力图平衡两派关系，勉强维持新政。然而，以太皇太后为首的外戚也反对变法，神宗无奈，于熙宁七年二月罢王安石相。后虽又重新起用，却不太信任，熙宁九年十月，王安石自求罢相，出知江宁府。

元丰年间(1078～1085)，神宗亲自主持改制，希望在保持新法既得成果的基础上，在某些方面使改革有所推进。富国强兵是熙宁变法的主线，并确使国用丰饶，国家财政状况明显好转，但神宗亲自主持下的元丰改革却绕开容易引起争论的理财问题，把重点放在了整顿冗官、强化军兵保甲上。元丰三年(1080)八月，神宗正式起动官制改革，诏令撤消只领空名的官职，原作为虚职的省、部、寺、监各官皆实际任事。元丰五年，又以《唐六典》为蓝本，颁行三省、枢密、六部新官制。虽然这次改革局限性很大，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改变了宋初以来混乱的官僚体制，奠定了北宋后期及南宋中央官制的基本框架。

至于强化军兵保甲的措施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没有任何实际效果。元丰四年及元丰五年的两次对西夏的战争均大败，损失惨重，神宗力图雪耻强边的梦想彻底破灭。

元丰八年三月，神宗病逝，在位十八年。

哲宗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宋哲宗(1077～1100)，名赵煦，是神宗的第六个儿子。赵煦曾被授检校太尉、天平军节度使，封均国公。元丰五年(1082)，迁开府仪同三司、彰武军节度使，进封延安郡王。元丰八年二月，宋神宗病危，三月一日，神宗的母亲英宗高皇后垂帘听政，宣布立神宗第六子赵煦为皇太子。五日，神宗去世，赵煦即位，年仅十岁。

哲宗即位后，政权一直掌握在太皇太后高氏手里。直到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太后去世，十八岁的哲宗才亲政。亲政之初，哲宗就恢复免役法，复行青苗法、市易法等，在教育科举等方面也恢复了神宗时的制度。另外，哲宗还对西夏再次采取强硬政策，不仅在沿边诸路构筑了一道长达千余里的防御工事，又与西夏重开战事，并在元符元年(1098)的平夏城之役中取得了宋夏战争中少有的大胜利，扭转了长期以来被动挨打的局面，迫使西夏求和。

然而哲宗时期改革派重新上台后，却不遗余力地对有不同意见的人士进行打击报复，苏轼、苏辙、吕大防、范祖禹等人先后遭到贬斥。而所谓的改革派主要成员热衷的是自己的权位，不仅主管军事的知枢密院事曾布对保甲等改革措施敷衍了事，执政章惇也与曾布貌合神离，严重影响了改革的进程。

哲宗的身体一直很糟糕，少年时便有咯血等疾病。元祐七年(1092)，在高太后的安排下，哲宗娶了大他三岁的孟氏为妻。而对这桩婚事，哲宗并不乐意。所以，元祐八年高太后一死，孟后便被废黜，出居瑶华宫。

年少的哲宗初即位时，还是颇有一番抱负的，也起用了一些贤臣，使国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到后来却假借绍述的名义，在政治上以牙还牙，务反前政，报复打击了很多无辜的官员，造成了“党籍祸兴，君子尽斥，而宋政亦敝”的局面。

什么叫元祐“更化”

“更化”即改制，改革的意思。

哲宗即位初期，英宗皇后高氏以太皇太后垂帘执政。高太后出身将门，曾祖是宋初大将高琼，外高祖是太祖时的大将曹彬。神宗生前她就对变法改革持否定态度，只是因恪守宋朝家法才没有出面干预。高氏执政后，立即起用守旧派首领司马光，任命其为门下侍郎，吕公着为尚书左丞，参与朝政。

据《宋史纪事本末》载，神宗去世时，司马光从洛阳进京奔丧。卫

士见到他，都致敬行礼。老百姓更是夹道欢迎，高喊着：“无归洛阳，留相天子，活我百姓!”可见当时司马光在民间的呼声很高。

司马光执政后连续上札，有《乞开言路札子》、《乞去新法病民伤中者疏》、《乞罢保甲状》、《乞罢将官状》等，他把新法比作毒药，认为必须全部废止。变法派放出抵制的言论，援引孔子的话说：“三年无改父之道，可谓孝矣。”司马光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太皇太后以母改子(神宗)，非子改父”，并以此作为废除新法的理论依据，新法于是被逐渐废除。七月，首废保甲团教。十月，罢方田均税法。十二月，市易法和保马法也相继被废。

元祐元年(1086)春，司马光、吕公着先后升任左、右相。废除新法的工作雷厉风行地展开，史称“元祐更化”。三月，司马光要求各州县五日内罢免役法。在江宁闲居的王安石听说，不禁惊愕失声道：“连这都要废除吗?”许久，又说：“此法终不可罢!我和先帝讨论了两年才实行的，连细节都考虑到了。”范纯仁(范仲淹之子)、苏轼、苏辙等人也反对仓促废除，认为应进一步考察利弊。然而司马光根本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八月，再罢青苗法。九月，司马光去世，废除新法的活动由右相吕公着继续进行。这时，新法其实已经废除得差不多了。

元祐更化虽然纠正了熙丰变法中的部分弊病，却给北宋后期政治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什么叫绍圣“绍述”

元祐八年(1093)九月，太皇太后高氏病逝，哲宗亲政。

哲宗在高太后生前就对她一味废罢新法、打击变法派不满。亲政后，哲宗一心想继承其父神宗的遗志推行新法，不久就恢复变法主将章惇、吕惠卿的阶官、职名。元祐九年二月，哲宗任命李清臣为中书侍郎，邓润甫为尚书左丞。李清臣在殿试发策时直接否定元祐政治，令绍圣之意呼之欲出。绍述是绍圣年间使用频率最高的政治术语，其原意是继承前人的做法，对哲宗而言，就是继承其父皇的遗志与事业。四月，哲宗改年号为绍圣，明确宣示要继承神宗的改革事业，不同意再行新法的苏辙被贬出任知州，袒护他的首相范纯仁也被贬出任知府。哲宗任命

章惇为首相，曾布入主枢密院，蔡京、许将等先后任执政，林希任同知枢密院事，变法派控制了朝政。各项新法先后恢复，还根据神宗时推行新法的弊病，作了一些改进，并采用了部分元柘时制定的法规。但是，变法派此时也开始打击守旧派，守旧派的重要官员如吕大防、刘挚、苏辙等先后被贬往广南东路(今广东)。守旧派的首领司马光、吕公着不仅被追夺赠官和谥号，连哲宗当年为他们亲笔题写的碑额和奉敕撰写的碑文也被追毁。朔党成员韩维等三十人相继被贬官，蜀党首领苏轼被远贬于惠州(今属广东)，又进而贬到昌化军(今海南儋县西北)。洛党首领程颐也被贬往涪州(今重庆涪陵)。据《宋史·蔡卞传》记载，仅元符元年(1098)重新惩处的元事占旧党就达八百三十家之多。由此可见，在哲宗亲政时期，虽然他想绍述之本意是为了继承乃父的遗志，最终却演变成了激烈的党派之争，主要政事已不是集中精力改革，而是变为以打击守旧派为主，从而使北宋政权进一步地走向衰弱。

徽宗是怎样成为皇帝的宋徽宗赵佶(1082～1135)，是神宗皇帝的第十一子，母为神宗陈皇后。元丰五年(1082)十月生于宫中。第二年正月赐名为佶，十月授镇宁军节度使，封宁国公。哲宗即位后，封遂宁郡王。绍圣三年(1096)，封端王。

元符三年(1100)九月，年仅二十五岁的哲宗病死。哲宗刘皇后本来生过一个儿子，但不久就夭折了。父死子立，哲宗没有儿子，皇室继立储君成了大事。神宗共有十四子，健在的五子依次是申王赵佖、端王赵佶、莘王赵俣、简王赵似、睦王赵偲。

向太后(神宗皇后)哭着对宰相章惇等大臣说：“国家不幸，先帝无子，天下事要早点定下来。”章惇说，依照礼、律，应当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向太后不同意，说：“神宗诸子中，申王虽然年长但是眼睛有残疾，接下来应该立端王。”章惇则对答道：“按年龄则申王居长，依礼律应是立哲宗同母弟简王。”向太后强调，她自己没有儿子，所有的皇子都是神宗的庶子，不应再有区别，简王乃十三子，没有僭越诸兄的道理，还是立端王最合适。章惇提出，赵佶轻佻，不宜君天下。知枢密院曾布乘机进言：“章惇根本就没有和我们商议，皇太后所说极为妥当。”尚书左丞蔡卞、中书门下侍郎许将也跟着表示赞同太后圣旨。于是，向太后在曾布、蔡卞、许将等执政的支持下，召端王赵佶进宫，即皇帝位。

为什么说徽宗是佞道昏君宋徽宗赵佶，是北宋继真宗之后又一位以崇奉道教的皇帝。他在位二十余年间，北宋的统治已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但是以徽宗和蔡京为首的统治集团不是积极改良政治，克服危机，而是变本加厉地排斥忠良，任用亲信，大建园林楼阁，纵情享乐，并狂热地崇奉道教，企图利用宗教迷信活动神化其统治，挽救行将灭亡的北宋王朝。

徽宗即位之初，便开始“兴道”，宠信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龙虎山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等上层道士。到了政和、宣和年间(1111～1125)，他对道教的尊崇达到高潮。他效仿唐玄宗和宋真宗，编造所谓“天神托梦”的神话。政和三年(1113)十一月，徽宗自称梦见太上老君，老君告谕他：“汝当宿命，当兴吾教。”从此，徽宗更加尊崇道教。

政和六年，左道录徐知常推荐道士林灵素来见徽宗。林灵素原名噩，温州人，本在佛门为僧，因不堪师傅的打骂，改作道士。他善幻术，为人机敏而能言，在徽宗面前自吹能“上知天上，中识人间，下知地府”。林灵素利用徽宗急欲神化自己的心理，对他说，上天有九霄，最高者为神霄，神霄府中有一位神霄玉清王，乃上帝之元子，号长生大帝君。徽宗即神霄玉清王转世，下降为人主。林灵素又称自己是神霄府仙卿，降临人世辅佐帝君。蔡京、童贯等大臣也是神霄府仙伯、仙吏，就连徽宗宠爱的贵妃刘氏也是上天“九华玉真安妃”。一番话听得徽宗大喜，立即赐林名为灵素，赏赐无数，命他随意出入宫禁，地位与大臣相似。只因后来林灵素太过恃宠跋扈，竟与太子争道，乃于宣和元年(1119)十一月遭贬斥，还故里后不久病死。

徽宗进行着一系列的扶植道教的活动，他大兴土木，除了为林灵素兴建上清宝箓宫外，又下令天下各州府所建的天宁万寿观也都改为神霄玉清万寿宫，供长生大帝君及青华帝君之神位，耗费甚巨。徽宗还多次下诏在全国寻访有道异人，并规定道士可入州县学校培养，又比照政府官吏品级，设道官二十六等，道职八等。徽宗又下诏全国搜访道书，并敕令编成《政和万寿道藏》，还亲自注解《道德经》、《南华真经》等书。

徽宗迷信道教，原想借助宗教神化自己，然而他溺信虚无，困竭民

力，只能加速北宋的灭亡。当宋朝君臣崇道达到高潮时，金人已兵临城下，而昏庸的宋徽宗到这时犹自相信道教法术能抵御金兵。金兵围困汴京(今河南开封)后，兵部尚书孙缚仍迷信方士郭京能以“六甲法”生擒金兵二帅，结果郭京驱使“神兵”开城不战而溃，金兵却乘势登上城墙，加速了京师的陷落。徽、钦二宗连同北宋宗庙神器，府库蓄积，都被金兵掳去。这位“教主道君”皇帝作了囚徒，犹且身着紫色道袍，头戴逍遥巾，作道流打扮。

什么叫做“瘦金书”

“瘦金书”实为“瘦劲书”的美称，为宋徽宗赵佶所创，指的是北宋末年一种具有瘦细、劲挺特色的楷书。

宋徽宗赵佶在政治上虽然昏庸无能，在艺术上却是才华横溢，颇有建树的。他不但擅文辞，通音律，精鉴别，尤工于书画。清代王文治有诗赞曰：“不徒素练画秋鹰，笔态冲融似永兴(指虞世南)。善鉴工书俱第一，宣和天子太多能。”赵估的花鸟画超妙入神，栩栩如生；书法则正、行、草无所不工，而最有名的、最有特色的是他所独创的“瘦金书”，不但在宋朝独树一帜，也可以说亘古未有。

关于“瘦金书”的渊源，论述颇多。宋代蔡绦《铁围山丛谈》云：“祐陵(赵佶)作黄庭坚书体，后自成一法。”明朝陶宗仪在《书史会要》里则说：“……初学薛稷，变其法度，自号瘦金书。”所以从历代记载和书体本身看，赵佶的正书应是学褚遂良、薛稷一派的早期黄庭坚书体。不过，他善于运用，能糅合众家之长，使“散花天女舞瑶台”的褚派书体，参合薛稷的清新笔法，变得更为多姿。“瘦金书”不仅以瘦细挺劲得名，还有腴润飘逸之美。现存的瘦金书作品有《千字文》、《申霄玉清官碑》、《牡丹诗》等。

宋江起义是怎么回事徽宗君臣的黑暗统治，终于在政和、宣和之际激起了民众起义，其中以北方的宋江和南方的方腊规模最大。

宣和元年(1119)，宋江于河北路起义。同年十二月，已发展成为有一定规模的农民起义军，被称为“河北剧贼”，北宋王朝曾下诏招降。宋江未受招安，继续进行战斗，转战于京东各地，出没于青、济、郓、濮

等州之间，又被称为“京东贼”。宣和二年冬，南方的方腊举行起义，且发展势头迅勐。亳州(今属安徽)侯蒙上疏称：“(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宋)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徽宗于是任命侯蒙为梁山泊附近的东平府(郓州)知府，负责招安宋江，但侯蒙还没到任就死了。南宋时传说宋江起义军在梁山泊活动，可能就是这个时期。

不久，宋江力图向南方发展，途经沂州(今山东临沂)时向知州蒋圆借道，蒋圆乘机袭击，起义军猝不及防，损失不小，只好往北回撤，在龟蒙一带活动。

宣和三年初，宋江起义军在结集力量后，再次移军南下，并进入淮南路的楚州(今江苏淮安)一带，又被称为“淮南盗”。稍后，起义军在转向东北途经沭阳时，遭到县尉王师心军队袭击。二月，在海州(今连云港附近)遇知州张叔夜伏兵攻击，损失惨重，部分起义军向张叔夜投降。据《宋史·张叔夜传》记载，宋江也于此时向张叔夜投降。还有一种说法是，大约在宣和四年夏季，折可存参与镇压方腊起义班师回朝后，又“奉御笔，捕草寇宋江”。

宋江究竟向何人投降，现在已经无从考证。只有李若水在宋江投降后的第二年写的《捕盗偶成》这首诗的前半部分里对这件事有所记述：

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

杀人纷纷翦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

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

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

方腊起义是怎么回事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发生在今安徽、浙江地区。这一带受封建剥削特别严重。北宋的军粮、布帛、茶盐及金银等，都来自东南。崇宁元年(1102)，北宋政府在苏、杭设置造作局，役使大批工匠，制造各种皇家奢侈品。崇宁四年，又设立应奉局。大肆搜刮民间财物。

方腊是两浙路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西)西部山区帮源洞的漆园主，也是“造作局”酷取的对象。宣和二年(1120)十月，他利用包括明教(摩尼教)在内的各种秘密宗教组织准备发动起义，却被帮源里正发觉，遂杀里正，在漆园誓师起义。十一月初一日，方腊自称圣公，建元永乐，署官命将，创建政权。方腊起义军迅速占领青溪县城，并随即攻占睦州(今浙江建德东)、歙州(今安徽歙县)。消息传到开封，宋徽宗立即派亲信宦官、知枢密院事(最高军事长官)童贯统领十万原准备攻辽的大军，迅速南下。与此同时，方腊起义军占领了杭州，但他没有听取太学生吕将关于先进军江宁，抢占长江天险以阻击宋军过江的建议，而是命主力南下，进攻婺州(今浙江金华)、衢州(今浙江衢县)和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这一战略上的失策使宋官军得以乘虚而入，起义军陷入了被动局面。

宣和三年正月，宋官军首先抢占江宁、润州。二月，又攻占杭州。三、四月间，又陆续攻占衢州、婺州等地。四月中旬，方腊被迫退回西部山区帮源洞，但是在宋官军两路夹击下，起义军战败，方腊为当时还是宋军小军官的韩世忠所俘，起义最后失败。方腊被俘后被解送开封，八月下旬被杀害。

什么是“海上之盟”

北宋末年，宋徽宗的腐朽统治已是摇摇欲坠，但是，宋徽宗和蔡京、童贯统治集团还想乘辽朝衰亡之际，联金灭辽，收回五代后晋割让给辽的燕、云十六州。

政和元年(1111)，郑允中、童贯使辽。辽人马植向童贯献策取燕，深受童贯赏识，被童贯改名李良嗣，并带回开封。李良嗣上疏给徽宗，陈说辽天祚帝的荒淫和政治腐败，并说女真(即后来于宋政和五年1115年建国的金朝)对辽恨之人骨，如能派使臣从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今属山东)渡海到辽东与女真结盟，共灭辽朝，就可以谋取燕、云地区。徽宗听了大喜，赐李良嗣姓赵，开始了谋取燕京的一系列活动。

宣和元年(1118)，宋遣马政使金。次年，金遣粘木喝等使宋，商议结盟事务。宣和二年(1120)，宋再遣赵良嗣、马政先后使金，金朝也多

次遣使来宋，最后双方商定，两军夹攻辽国，金取辽的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宁城西)等地，宋取辽的燕京析津府，灭辽后，燕、云地区归宋朝，而宋朝将原来纳给辽朝的岁币转给金朝。宋、金约定，不能与辽讲和。这就是历史上的宋、金“海上之盟”。

宣和三年、宣和四年，宋数十万大军两次攻打辽南京(燕京，今北京)，均被辽守军击败，辽南京由金军攻占。宣和五年四月，金朝将燕京及其所属九州中的西部六州归宋，但是，燕京居民大部已被金掳往东北做奴隶，宋所得的只是“城市邱墟，狐狸穴处”的残破不堪的一座空城。

第十一章

金是什么时候开始大规模南侵的金向宋移交燕京后，升平州(今河北卢龙)为南京，以降金辽将张觉为留守。宣和五年(1123)五月，张觉打出复辽的旗号据平州叛金。昏庸的宋徽宗竟想通过招降张觉获取用武力及金钱都没能从辽、金手上得到的平州地区，以高官厚禄对张觉进行招诱。六月初，张觉暗中降宋。但是，不久平州就为金军所得，张觉兵败逃往燕山府，宋朝给张觉的任命状全为金军所得。招纳叛亡破坏了宋金盟约，虽然宋朝随后就将张觉处死并将其头颅函送金朝，但是，张觉事件还是成了金太宗侵宋的借口。

宣和七年，辽天祚帝为金军所俘，辽的残余势力基本被扫除。十月，金太宗下诏攻宋。兵分两路，西路军以粘罕为主将，由大同府(今云州)南攻太原，东路军以斡离不为主将，自平州西攻燕山。

十一月，东路金军接连占领檀州(今北京密云)、蓟州(今天津蓟县)。十二月，西路金军主帅粘罕派使者到太原见童贯，要宋朝把河东、河北地区割让给金，宋、金以黄河为界。童贯立即逃往开封。粘罕随即挥军南下，攻占朔州(今山西朔州)、代州(今代县)、忻州(今属山西)，进围太原。同月，东路金军也已进至燕山府城下，宋朝守将、原辽将郭药师投降，并成为金军先锋，跟随金军南侵。

徽宗对金之南侵持什么态度金军进围太原，占领燕山的消息传到开封，北宋君臣慌作一团。《宋史纪事本末》载，徽宗立即任命皇太子赵桓为开封牧。又诏宇文虚中来问：“现在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了，该怎么办呢?”宇文虚中回答道：“现在陛下应该先下诏罪己，改革各种弊端，等到人心天意掉头，就可以抵御外敌，任命将帅了。”于是徽宗忙令宇文虚中起草罪己诏书，承认自己任用非人，过听妄议，劳民伤财。并下令罢除了最为东南人民痛恨、成为方腊起义导火线的“花石纲”，同时罢除了内外制造局以及“西城所”的租课，命令把“西城所”掠夺来的土地归还给原来的业主，还把大晟府、行幸局和教坊、待诏额外人及艮岳宫的官吏等等也都罢除和裁减了。

不久，太常少卿李纲和门下侍郎吴敏商议说：“建牧的意思，不就是想让太子担负留守的职责吗?如今敌势猖獗，不把名号给太子就不足以招徕天下豪杰。”吴敏问：“让他作监国行吗?”李纲认为还不行。吴敏把李纲的意见告诉徽宗，徽宗立即召李纲商议。李纲刺破臂膀以血书进谏，认为非常时期不可守常礼，必须把名位给皇太子，使他能够号召天下，收将士心，誓死抗敌，天下才能保全。徽宗急于逃往南方，这才不得已同意退位。宣和七年(1125)十一月二十三日，他假装得病，跌倒在地，昏迷不醒，大臣们急忙灌药后，又装着醒过来，索要纸笔，用左手写道：“传位东宫。”经过几番辞让后，十二月，赵桓即皇帝位，这就是宋钦宗。而宋徽宗则自称道君皇帝，退居龙德宫。

宋钦宗是在什么背景下成为皇帝的宋钦宗赵桓(1100～1161)，初名亶，是徽宗皇帝的长子。曾封韩国公，后又进封京兆郡王。大观二年(1108)正月，进封定王。政和五年(1115)二月，被立为皇太子。

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在金军大肆南侵之际，赵桓被徽宗任命为开封牧。后来，徽宗又企图以太子“监国”名义，把抗金的重任交给他。为了尽快逃跑，在吴敏、李纲的近乎逼迫下，徽宗于十二月下旬被迫把皇位传给太子赵桓，是为宋钦宗。次年，改元靖康。

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东路金军在攻占庆源府(今河北赵县)、信德府(今河北邢台)后，又占领相州、浚州，黄河南岸的守军焚桥溃逃。初三日，消息传到开封，作为太上皇的徽宗立即于当天半夜出逃，百官也有一些偷偷逃走了。在这种情况下，钦宗也想南逃。在李纲的激励下，钦宗暂时安心，并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李纲对大臣们说：“上意已定，敢有异议者斩。”这才制止了钦宗的逃跑。

初七日，东路金军已迅速渡河南下，到达开封城下。开封军民在李纲的率领下，打退金军的多次进攻。金军损伤惨重，斡离不遣使入城，要求宋朝派出大臣与金议和。斡离不提出，只要宋朝同意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并以亲王、宰相为人质，金军就可以退兵。钦宗求之不得，派九弟赵构、少宰张邦昌前往金军中谈判。二月初，各地勤王援兵赶到，钦宗不顾李纲先断金军粮草的建议，指挥宋军夜袭金军，大败。为了显示宋朝求和的诚意，钦宗将李纲罢职，并同意割让三镇。以陈东

为首的太学生及数万居民群起反对，钦宗不得已又恢复了李纲的职务并兼京城防御使，但却继续进行着割地求和的活动。主战的李纲等人的重新被起用，加上“勤王”援兵多达二十余万，这种种情况迫使斡离不考虑退兵，况且宋朝已经答应割地赔款，又以肃王赵枢代替了康王赵构，张邦昌也由少宰(次相)改为太宰(首相)，满足了金军的要求，二月初十日，金军开始退兵。

“靖康之耻”是怎么回事靖康元年(1126)二月十七日，钦宗接到报告说金兵已经渡过黄河北归，亡国的威胁暂时没有了。当初，徽宗逃到镇江以后，以太上皇帝圣旨，将东南地区的“递角(报告)”、“纲运(物资)”和“勤王”的军队扣留，掌握东南地区的军、政、经济大权，企图重新上台当皇帝。钦宗为了维护帝位，贬逐并处死了徽宗的亲信王黼、李彦，随后又把徽宗身边的童贯、蔡攸、蔡京贬官，并下诏太上皇不得干预政事。

钦宗好不容易把内务处理好了，可是这时太原、河间、中山三镇拒不接受割地诏书，李纲等又坚持抗金，二月中旬，钦宗宣布废除割地议和的协议。

八月上旬，金太宗以宋废除割地和议为由，命斡离不、粘罕分率东、西路军第二次侵宋。粘罕率西路军围攻太原，太原军民在王禀的率领下，英勇抗击，坚守太原达八个月之久，然而终因粮尽援绝于九月初被金军攻破，王禀率军巷战兵败后投水自尽。而东路金军也再次越过中山府(今河北定州)，围攻真定(今河北正定)，四十天后真定城破，守将刘翊兵败自杀。

太原、真定失守的消息传到开封，钦宗忙派康王赵构、刑部尚书王云為正、副使，前往金军讲和，再次表示同意割让三镇。此时东路金军已再次渡河南下，金使提出划河为界，这时，赵构、王云刚到磁州(今河北磁县)，王云就被磁州城人民杀死，赵构慌忙退还相州。钦宗同意金军划河为界的条件，立即又派执政耿南仲、聂昌为正、副使前往议和。可是，闰十一月中旬，聂昌刚到达绛州，就被坚决反对割地的绛州人民杀死了，金使也仓惶逃往相州。这样，钦宗两次派出的人都未能完成议和使命。

闰十一月初，两路金军先后到达开封城下，多次攻城，均被开封军民击退。钦宗病急乱投医，竟相信术士郭京撒豆成兵的“六甲法”，说是只须用兵七千七百七十七人，便可生擒敌帅，扫荡金军。二十五日，郭京命守城军民退下城头，驱“神兵”出宣化门迎敌，谁知一触即溃，金军却乘机攻入开封城。

十二月初二日，宋钦宗奉上降表。靖康二年二月六日(1127年3月20日)，金帅命钦宗在青城金军营中跪听金太宗诏书，宣布废除徽宗、钦宗二帝，北宋王朝至此灭亡。

四月，金军押着徽、钦二帝、皇后、妃嫔及其宗族四百七十余人北归，同行的还有外戚、宰执和其他在京大臣，伎艺、工匠、娼优等各色群众，共计十余万人。而金军押走的战利品包括金银绢帛、图书文物等，数目不可胜计。北宋徽、钦二帝，分别于南宋绍兴五年(1135)和三十一年(1161)死于金朝。

宋高宗即位前干过哪些事宋高宗赵构(1107～1187)，字德基，是宋徽宗的第九子。大观元年(1107)五月，生于开封大内。次年，封广平郡王。宣和三年(1121)十二月，进封康王。

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军兵临开封城下，在多次进攻均被击退后，遣使入城，要求宋割让太原(今山西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州)、河间(今河北河间)三镇，并以宰相、亲王为人质，便可退兵。徽宗于是派赵构为使前往，少宰张邦昌同行。金帅斡离不把他留在军中半月余，赵构照样过得悠闲自在。二月，在各地勤王兵到之后，徽宗派姚平仲夜袭金军，金人责怪宋使，张邦昌吓得涕泗横流，赵构却不为所动，斡离不颇以为奇，便要求宋朝更换人质，钦宗遂以肃王赵枢代康王。八月，金军第二次南侵并攻陷太原、真定。十月，赵构又作为使臣前往斡离不营中求和。刚到磁州(今河北磁县)，当地百姓便杀掉了与他同行的刑部尚书王云，而此时斡离不已率兵围攻开封了。赵构在相州(今河南安阳)知州汪伯彦的建议下，退到相州。

闰十一月，在开封被攻危急之际，钦宗命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募兵勤王。十二月，赵构创建大元帅府，就任大元帅。此时金军早已攻

占开封城墙，北宋处于存亡之间，钦宗再次以腊书诏令赵构率兵入援开封。赵构派少量部队南下汤阴(今属河南)作疑兵，自己却带着近万军队出北门，经临潭(今河北临漳西南)，踏河冰渡过黄河，到达大名(今河北大名东)。副元帅宗泽主张迅速南下解开封之围，然而赵构只派宗泽率数千兵马打着他的旗号南下，自己却逃往东平(今山东东平)，继而又逃往济州(今山东巨野)。

宋高宗是怎样成为皇帝的靖康二年(1127)三月，金立张邦昌为伪楚政权皇帝的消息传来，汪伯彦劝赵构南下宿州(今安徽宿州)，准备向江南逃跑，由于将士反对才最终没有逃成。宗泽在向开封进军的途中，得知金军已带着徽、钦二帝北上，便立即传檄四方，欲邀夺二帝，同时率军赶回大名，准备渡过黄河，拦截金兵归路。但是，其他勤王军马都没赶来，宗泽只得放弃组织各路宋军援救二帝的计划，转而上疏赵构，劝他即位，前往作为宋太祖赵匡胤兴王之地的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重建宋王朝。

四月，金兵退后，伪楚皇帝张邦昌遭到开封军民的唾弃，以吕好问为首的一部分旧宋臣僚，也要张邦昌退位。勤王兵马此时也陆续赶来，一并声讨张邦昌。这个时候，宋徽宗的近属多被金军掳走，只有宋哲宗的廢后孟氏和在外的康王赵构幸免。张邦昌不得已，先把孟氏迎进宫内，让其垂帘听政。接着，又以孟太后的名义，布告中外，由赵构嗣位当皇帝。张邦昌不仅赶到南京把玉玺送给赵构，还当面向他认罪。赵构见时机成熟，遂于五月初一日(1127年6月12日)在南京应天府即位，改元建炎，这就是宋高宗，时年二十一岁。后来因建都(行在所)临安(今浙江杭州)，史称南宋。

高宗即位初期政治、军事形势如何宋高宗即位之初，首先将张邦昌贬官赐死。这个时候，南北军民抗金热情高涨，高宗赵构不得不标榜“中兴”，表面上装出一副“抗金”的姿态。他起用主战派李纲为宰相，又任宗泽为东京留守。但与此同时，他又任主和派黄潜善为中书侍郎，参与政务，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执掌兵权。

李纲上任后，积极布署抗金。建炎元年(1127)六月，入朝上“十议”，力主恢复中原。宗泽也提出“条画四事”，并在开封修筑工事，募集

军队，联络河北义兵，积极从事抗金军事部署。然而，高宗害怕抗金可能会招致金把徽、钦二帝送回来，从而影响自己的帝位，于是，听从黄、汪的意见，手诏："京师未可往，当巡幸东南。"决意走避江南。当时，东京留守宗泽请高宗回开封，李纲也提出"车驾不可不一到京师，见宗庙，一慰都人之心"，但高宗根本听不进去。

八月，李纲罢相。太学生陈东、欧阳彻等要求贬黄、汪而留用李纲，也遭到惨杀。十月，高宗逃到扬州(今属江苏)。同年十二月，金军开始第一次大举南侵，兵分东、西两路，分别由粘罕、娄室任主帅。建炎三年(1129)正月末，金军由徐、泗(今盱眙北)二州奔袭扬州，二月初金军临近扬州之际，高宗仓皇渡江逃到镇江，还没立稳脚跟，又逃往临安(今浙江杭州)。三月初，将领苗傅、刘正彦发动兵变，迫使高宗把皇位让给他三岁的儿子赵旉，由孟太后垂帘听政。四月初，同签书枢密院事吕颐浩、礼部侍郎张浚闻讯，联络武将韩世忠、刘光世等起兵勤王，高宗复位，苗、刘二将被处死。

高宗在仓皇逃跑的同时，还不断派出使臣，向金朝求和。建炎三年(1129)高宗逃到江宁(今江苏南京)时，派洪皓为大金通问使，被扣留。同年八月，又派杜时亮到金军求和。然而，使臣还在途中，金军的第二次大规模南侵已经开始。金军仍分东、西二路，西路攻陕入蜀，东路则越过长江追击高宗。十月，高宗从临安逃到越州(今浙江绍兴)，十二月初，又逃到明州(今浙江宁波)，并决定下海避敌。接到金军逼近临安的消息后，高宗又连忙坐船逃往定海(今浙江镇海)，继而渡海到昌国(今浙江定海)。建炎四年(1130)正月，金军攻占明州，高宗逃到台州(今浙江临海)，被金军追击，高宗被迫逃往温州。二月初，金军退回临安。宋将韩世忠、岳飞分别击退两路金军，加上其他战场的胜利，金军被迫北退。高宗这才从温州泛海北上，回到越州，结束了四个月的海上亡命生活。次年，高宗改元为绍兴元年(1131)。绍兴二年(1132)，高宗把小朝廷迁回临安。

由于前方军民的英勇抗击，绍兴二年(1132)，宋军逐步形成了东起淮水，西至秦岭的战线。绍兴八年(1138)，高宗正式在临安建都，维持着半壁江山的统治。

为什么说宋高宗“偷安忍耻，匿怨忘亲”

宋高宗即位之初，就重用主和派黄潜善和汪伯彦，让他们分别参与政务，执掌兵权，一开始就暴露出他放弃中原，偏安一隅的思想。建炎元年(1127)十月，高宗退至扬州，从此开始了十几年辗转流徙，东躲西藏的动荡岁月。他根本就不相信军民抗战的力量，只顾仓皇逃跑，又不断派出使臣，向金朝求和，在给金朝的信中卑躬屈膝地说：“今以守则无人，奔则无地，所以愢愢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又说：“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并尊无二上。”

与逃跑、求和的政策密切相关的是宋高宗在朝内猜忌武将，重用奸佞。高宗猜忌武将一方面是源于宋太祖以来防范武将的家法，还有一个更为现实的原因，就是高宗害怕将领们恢复中原后，迎回徽、钦二帝，钦宗将会夺了他的帝位。个中原委高宗当然不便明言，但他的实际行动却颇能说明问题。早在建炎元年八月时，太学生陈东等就因上疏请求高宗北伐，迎回徽、钦二帝而被斩首。而高宗虽然在口头上说要迎回“二圣”，但实际经过“和议”的反复交涉，最后却只是迎回了徽宗的灵柩和自己的生母韦后，而让钦宗客死异乡。

在抗击金兵的战争中，高宗对将帅们更是严加控制，生怕他们“张皇事势”，“却致引惹”，而甘愿放弃胜利成果，与金议和。绍兴四年(1140)，岳飞等在郾城大败金军，并得到抗金义兵的热烈响应，准备收复河南全境，高宗却接连下令要岳飞退兵回朝，迫使岳飞不得不将十年之功毁于一旦。而高宗为了除去心腹之患，献媚金人，又将岳飞父子杀害。明代文征明为岳飞庙作《满江红》词曰：“岂不惜，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真可谓一针见血。

尽管高宗一心只想偷安于东南半壁江山，总是积极谋求与金议和，并多次与金达成和议，但金却并不满足，一次又一次撕毁和议，挥军南下。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兵又一次南犯失败，金朝发生内乱，南宋朝野纷纷要求北伐，高宗却坚持屈己称臣，维持和议。绍兴三十二年(1162)，在军民的抗战声中，高宗再也难以维持了，只好宣布退位。此后，他以太上皇的名义赋闲二十余年，于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病

死。

伪楚政权、伪齐政权是怎样创建并灭亡的靖康二年(1127)二月，金朝在废宋徽宗、钦宗二帝后，决定另设傀儡政权以统治黄河以南原宋统治区。三月，金太宗下诏册立张邦昌为楚国皇帝，在开封登基为帝，定都金陵(今江苏南京)。张邦昌是宋东光(今属河北)人，从宣和元年(1119)起在宋朝执政，以少宰身份先后陪同赵构、赵枢使金，同为人质。他力主割地求和，后升任太宰。四月初，金军在册封他为伪楚皇帝后，撤军北回。然而，开封的民众并不承认这个金朝册封的皇帝，部分旧宋臣僚甚至胁迫张邦昌退位，加上勤王兵马陆续赶来，迫于形势，张邦昌迎廢后孟氏为宋太后，并主动将玉玺交给赵构，这样，金朝为统治黄河以南地区而设立的伪楚政权，实际上仅历时三十二天便自行消灭了。高宗赵构即位不到一个月，张邦昌就被赐死。

伪齐是金继伪楚政权后在黄河以南重建的又一个傀儡政权。金军进军南宋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消灭南宋。金军在渡江追击高宗没有抓获后，不得不北返，并决定在已经占领了的黄河以南地区创建傀儡政权。建炎四年(1129)九月，金朝立刘豫为皇帝，作为金的子皇帝，国号齐，史称伪齐，建都大名(今河北大名东)，次年迁都汴京(即原北宋首都东京开封)。刘豫，字彦游，阜城(今河北交河)人，原任宋朝济南知府。后降金，先后任金京东、淮南安抚使，知东平府兼诸路马步军总管，子刘麟任济南知府。伪齐实际控制区为原北宋的京东、京西两路及淮南路的大部分地区，绍兴元年(1131)，金又将新占领的陕西诸路划为伪齐辖区。这样，伪齐成为南宋与金的缓冲地区。

伪齐政权创建后，对内镇压抗金活动，并对南宋开展诱降。宋将李成、徐文、孔彦舟等先后投降伪齐。绍兴三年(1133)，刘豫派兵攻陷南宋河南的唐州(今河南唐河)、湖北的襄阳府等地。但第二年又被岳飞收复。同年九月，金、伪齐联合进攻南宋。名将韩世忠大败金军于扬州，金兵被迫撤退。

绍兴六年(1136)，伪齐再次攻宋，在滁州附近的藕塘镇(今安徽定远东南)又被宋将杨沂打得落花流水，伪齐从此一蹶不振。伪齐的表现让金朝大为不满，加之主张建属国的金太宗去世，绍兴七年(金天会十五年，

1137)十一月，伪齐被废，金设行台尚书省于汴州。刘豫降封为王，绍兴十六年(1146)死于金朝。

宋金是如何争夺川陕一带的建炎元年(1127)冬，金军第一次大规模进攻南宋，兵分东、西两路，东路由粘罕为主帅，负责率军追击宋高宗，西路则由大将娄室率军攻陕窥蜀。西路军很快占领同州(今陕西大荔)、华州(今陕西华县)。建炎二年(1128)正月，金军进入长安、凤翔。这年春夏之交，高宗正从扬州渡江南逃，因在苗刘之变中勤王有功而颇受高宗青睐的原礼部侍郎张浚此时已入知枢密院事，他对高宗建议说，关陕地区非常重要，如果金军由陕入蜀，东南也将不保，愿意身任其事。于是，高宗任命他为川陕京湖宣抚处置使，赋予便宜处置之权，全力经略关陕。七月，张浚到任。建炎三年(1129)十月，张浚置司秦州(今甘肃天水)，练兵于兴元府(今陕西汉中)，任用吴玠、吴璘两兄弟为统制。南宋与金在关陕展开的争夺战从此开始，从建炎四年(1130)到绍兴四年(1134)前后五年中，宋金之间的战争主要有三次，分别是富平之战、和尚原之战及仙人关之战。

建炎四年三月，进攻江南的战事一结束，金军就将战略进攻目标转向关陕。七月，金军将领宗弼从建康渡江到六合后，随即引兵往陕与娄室会合。九月，张浚误以为金军主力还滞留江淮，合熙河、秦凤、泾原、永兴、环庆五路军四十万，战马七万多匹，在渭水北富平丘陵地带与金军决战，金军反败为胜，宋军五路皆溃不成军，史称“富平之战”。张浚退守秦州，再退至兴州(今陕西略阳)。

金军乘富平之战的余威，尽夺关陇六路。张浚命吴玠扼守大散关东的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控制由关陕入汉中的要塞。绍兴元年(1130)十月，金军为了夺取关中，进窥川蜀，发兵进攻和尚原。吴玠选派劲弓强弩，发箭如雨，连绵不断，金兵稍退后，吴玠又派军邀击，激战三日，大败金军，宗弼也狼狈逃走，这是南宋在陕西最后一道防线的保卫战，史称“和尚原之战”。

绍兴三年(1133)春，金军和伪齐联合攻陷宋金州(今陕西安康)，吴玠率数千兵马自河池一天一夜賨士三百里，赶到饶风关(今陕西石泉西北)救援，他把黄桔扔给金军，开玩笑说：“大军远来，聊用解渴。”金将

大为吃惊：“来何速也!”然而由于叛徒告密，饶风关失守，吴玠退守河池南的仙人关，筑垒号“杀金坪”，严阵以待。绍兴四年(1134)二月，金将率步骑十万进攻仙人关(今陕西略阳西北)，吴玠兄弟以万人坚守，以长刀大斧砍杀金骑兵得胜，金军被迫退屯凤翔(今陕西凤翔)，史称“仙人关之战”。吴玠乘胜收复了秦州(今甘肃天水)、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凤州镇)和陇州(今陕西陇县)。

这三次战役，对争夺陕西、保卫川蜀安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金军从此“乃不敢窥蜀”。

两河、两淮的主要抗金义军有哪些金军南侵黄河、长江流域的时候，两河、两淮义军纷纷起来抗击金军。两河指河北、河东。两河地区的抗金义军，主要有八字军、红巾军和五马山寨义军。

八字军原是河北招抚使张所派遣王彦率领的七千官军。建炎元年(1127)九月收复新乡(今河南新乡)，被金军打败后退到共城县(今河南辉县)西太行山地区继续抗金，他们以战士面部刺有“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以表示抗金的决心而得名。八字军是太行山义军中最有名的一支，附近各地人民纷纷响应起兵，人数达十万以上，势力扩展到并、汾、相、怀、卫、泽等地区。八字军在王彦的领导下，多次打败金军，并夺回无数被金军掠夺的河南人民。八字军后来归属宋东京留守宗泽，与宋军并肩作战，功勋卓著。

河北路中部还有一支著名的抗金义军，即五马山(今河北赞皇境内)寨义军，是由武翼大夫赵邦杰在北宋末靖康元年(1126)冬组建的。建炎二年(1128)二月，和尚洞(今河北正定西)义军首领马扩被俘后逃出至五马山寨，被推举为首领之一。这支武装一度发展到几十万人，给金兵以致命的打击，后被金军挞懒所率主力攻破。

河东地区的抗金义军也很活跃，活动在泽(今山西晋城)、潞(今山西长治)地区的被称为“红巾军”，以头包红巾为标志。他们在一次袭击金兵大营的战斗中，几乎活捉金兵主帅粘罕(宗翰)，可见力量之大。遇见有从金兵蹂躏下逃亡出来的穷苦人民，红巾军总是设法供给他们口粮，并护送难民安全出境。

两淮地区的抗金组织被统称为两淮山水寨，这是两淮人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武装，他们依山阻水，据险负固，与金军进行着顽强的斗争，时间从建炎三年(1129)金军自江北徐、泗进攻扬州开始，到绍兴四年(1134)金军北还为止。其中著名的山水寨为泰州缩头湖水寨。这支武装的领导人张荣是梁山泊(今山东梁山南)渔人，两宋之际他把好几百人聚集到了梁山泊，攻击金军，人称张敌万。建炎三年金军攻扬州时，张荣率部南下楚州(今淮安)鼍潭湖筑水寨抗金，所部万余人。建炎四年(1130)，张荣率船队南下通州，转入缩头湖作水寨坚守。金将挞懒带兵来犯，张荣弃舟登陆，围攻金军，迫使金兵北退。

这些由人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抗金义军，给金军以沉重的打击，后来他们大部分都主动与抗金名将宗泽联系，接受宗泽的领导，准备合力大举北伐，然而没有得到高宗的首肯。宗泽忧愤成疾病死后，由他招抚的抗金义军也纷纷离去了。

钟相、杨幺起义是怎么回事钟相、杨幺领导的洞庭湖农民起义，发生在建炎四年(1130)二月。当时，正是宋高宗创建政权不久。农民之所以会起来反抗，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南宋一创建，就打着抗金的名号，巧立各种苛捐杂税，军队的馈饷和朝廷的开支，都要由江南农民来承担，老百姓赋税特别重，简直无以聊生。与此同时，两宋之际残酷的战争破坏也使人民无法生存。建炎四年宋王朝招募了一个人数过万的流寇集团，他们在匪首孔彦舟的带领下，窜到洞庭湖区，烧杀掳掠，无所不为，激起人民的强烈反抗。钟相利用这个有利时机，于建炎四年二月十七日，发动起义。

钟相，武陵县人(今湖南常德)人，出身于小商人家庭。早在起义之前的二十多年，他就在武陵一带利用“左道”为农民治病，联络各方群众。他提出“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吸引了很多群众。

二月二十一日，钟相在其故乡创建农民政权，定国号大楚，自称楚王，改元天载，立子钟子昂为太子。鼎(今湖南常德)、澧(今湖南澧县)、荆南(今湖北江陵)的群众首先加入进来，起义军势力很快扩充到洞庭湖

周围的十九个县，军队也发展到四十余万人。

三月，宋朝廷以孔彦舟为荆南湖南北路捉杀使，派他前往鼎州镇压起义军。三月十六日，孔彦舟派兵突袭钟相大营，钟相大败，父子战败被俘后均被杀害。

钟相起义失败后，余部继续战斗，其中以杨幺、杨钦、杨华势力最大。绍兴三年(1133)四月，杨幺自号“天圣大王”，拥立钟相少子钟子仪为太子做领袖。杨幺是一位青年农民，原名杨太，当地农民都称最小的孩子为“幺”，杨幺是一个十分亲热的称呼。十月，宋荆南府制置使王夑总领舟师，率兵到达鼎口，与杨幺起义军展开大战，官军被打得狼狈逃窜，死伤无数，只好奔返鼎州。十一月，王夑所部又在岳州之南的阳武口被起义军用车船打得落花流水。同年十二月，宋朝廷派人招安，杨幺不予理会，杀了使者。

绍兴五年(1135)南宋朝廷派抗金名将岳飞前往洞庭湖地区镇压起义军。几个月时间，就招降了不少起义军，杨钦也率所部三千人投降。岳飞对降兵给予优厚待遇，南宋朝廷又对洞庭湖起义军根据地减免赋税。同时，岳飞加紧对起义军进行围剿，在环湖周围多筑堡垒，堡堡相连，切断了起义军与陆上的联系。又命令士兵砍伐树木，堵塞湖中要道，以腐木乱草垫积湖中，使起义军的车船优势无法发挥。岳飞派牛臯等进攻杨幺水寨，众多起义军将领投降，杨幺投水而死。余部夏诚寨也被岳飞攻破，杨幺起义最后失败。

第十二章

什么叫绍兴和议宋高宗自即位以来，谋求与金议和便是他一直努力的目标。绍兴七年(1137)，金熙宗在挞懒等人的支持下，废伪齐，采纳挞懒的建议，准备把刘豫统治的河南、陕西地区交给南宋，让宋高宗像刘豫那样向金称臣，贡纳岁币。高宗得到被金朝放回的王伦带回的消息，喜出望外，他不顾主战派将领及群臣的反对，任秦桧为右相，于绍兴八年(1138)十二月代他拜接金人诏书，金将原伪齐统治区河南、陕西地区划给南宋，南宋向金朝称臣，每年向金贡银五十万两、绢五十万匹。

然而，绍兴九年(1139)七月，金朝主和的宗磐、宗隽以谋反罪被处死，八月，挞懒也以谋反罪被杀。主战派斡本、兀术等掌权。绍兴十年(1140)五月，金朝撕毁和议，再次挥兵南下，却遭到岳飞等抗金力量的沉重打击。可悲的是，宋高宗并没有让抗金将领继续战斗，反而一心只想与金议和，保住他的半壁江山。为了向金表示他议和的决心，正在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金军即将崩溃的关键时刻，高宗连下十二道金牌，下令岳飞班师回朝。他不仅收回张浚、韩世忠、岳飞三大将领的兵权，还将岳飞逮捕下狱。绍兴十一(1041)年十一月，南宋与金达成新的和约：南宋继续向金称臣，以东自淮水中流，西至大散关为界，割去河南、陕西半数土地，每年向金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这就是史书上所称的“绍兴和议”。从此，宋、金在大体力量相当的情况下，维持了一个较长时期相对稳定的局面。

顺昌保卫战是怎么回事绍兴十年(1040)五月金朝撕毁和议后，决定兵分两路重新占领已划归南宋统治的河南、陕西地区。金朝将领兀术率东路军自黎阳(今河南浚县)南下，河南各地相继投降。

五月中旬，新任东京副留守刘锜率以原“八字军”为主的一万八千人的部队正在前往开封的赴任途中。他们刚由水路到顺昌(今安徽阜阳)，金军占领开封的消息就传来了，并且知道金兵已占领了陈州(今淮阳)，距顺昌还不到三百里。刘铸立即命令凿沉船只，修筑防御工事，决心与

顺昌府年近七旬的知府陈规共守顺昌以抗击金军。五月底，金军围攻顺昌，被宋军击败。六月初，金将兀术亲率十余万金军赶到，他看到顺昌城简陋，笑着对手下说：“这样的城墙，用靴尖踢踢就倒了。明天早上咱们府衙里吃早餐吧!”根本没把刘铸等放在眼里。九日一大早，金军大举攻城，兀术的亲军是重装骑兵，都是铁兜重甲，号称“铁浮图”(铁塔)，又惯用左右翼骑兵迂回侧击，号称“拐子马”，他们常以此取胜，被称为“常胜军”。这时正值盛夏，刘镝巧妙利用天气变化来部署军事行动，早上天气凉爽时就只守不攻，中午过后，当身穿重甲的金军经过烈日暴晒，力疲而气衰时，派精兵突起进攻，不用长枪，只用短兵器，刀砍斧噼，甚至徒手相搏。官兵们殊死奋战，身中刀剑也不退却，终于打败兀术的亲兵，杀敌五千。兀术大败后，退守城西，掘濠自卫，企图坐困宋军。没想到当晚天降大雨，水积一尺多深，刘铸不断派小股部队袭击金军。几天后，兀术再也支撑不住，退往开封。刘镝以不满两万的兵力，击败金军十万人。顺昌之战惊动朝野，这是一场以少胜多，以逸待劳，击败金军精锐的著名战役，不仅大灭金军的嚣张气焰，还阻挡住了金军自两淮南侵的势头。

陕西保卫战是怎么回事在兀术率东路金军南侵的同时，右监军撒离曷也于绍兴十年(1040)五月中旬自河中(今山西永济西)渡黄河进入同州(今陕西大荔)，没几天，就占领了永兴军(今西安)，随即向西直奔凤翔。这样一来，川陕宋军被拦腰截断，半数以上的宋军被隔在了渭河以北。四川宣抚副使胡世将急派吴璘率军两万自河池赶往宝鸡。五月下旬，金军前锋到达凤翔的石壁寨时，为吴璘部将姚仲打败，金军只得退回武功。

六月初，吴璘、杨政主动致书金将撒离曷会战。在这场会战中，金军大败，退守扶风，宋军乘势进攻，占领了扶风。撒离曷大怒，列阵二十余里，还是被姚仲等打败。吴璘、杨政等在渭河两岸严密布防，抑制金军南下攻蜀。撒离曷见宋军已有防备，加上吃了多次败仗，就率领所有驻在凤翔的金军，改攻泾州(今泾川北)，不料又被宋军田晟部打得大败，伤亡惨重，只好再次退回凤翔休整，不再出战。宋军也撤离了河池退保仙人原(今陕西风县西南)，防止金军攻蜀。

宋军经过苦战，使西线金军主力受到沉重打击，被金军隔在渭水以

北的宋军也得以全师而还，保存了川陕宋军的有生力量。但是，陕西已被金军占领。

采石之战是怎么回事南宋绍兴十九年(金皇统九年，1149)，金副相完颜亮刺杀金熙宗后夺取帝位。完颜亮在帝位稳固以后，决定破坏“绍兴和议”，消灭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完颜亮迁都大兴府(今北京)，积极备战。绍兴三十一年(1161)五月，完颜亮遣使到临安，明确提出要南宋派出大臣到开封，商议割让淮南地区给金。战争迫在眉睫，南宋政府被迫作出防御部署，任命吴璘为四川宣抚使，负责川、陕防务，又任命成闵为京西、湖北制置使，率军前往武昌，扼守长江中游。任命名将刘锜为江、淮、浙制置使，负责长江下游防务。

七月，金迁都开封，随即进行侵宋部署，几路大军先后南侵。九月下旬，完颜亮也自开封南下，至此，侵宋战争全面展开。金军南侵的消息传来，抗金名将刘镝扶病从镇江进驻扬州，对部将们发出“取重阳日到京师(开封)”的豪言，仍采取顺昌保卫战时坚壁清野的战略防御措施，并决心在扬州与金军决一死战。然而，负责淮西防务的主将王权却不听从刘锜的指挥，在听到金军已经自涡口(今安徽怀远东)渡淮时，立即率部南逃，由于淮西完全没有防务，金军如入无人之境，迅速占领庐州、滁州。刘铸被迫回军守江。

得知金军马上就要到达长江北岸的消息，文武百官纷纷把家人送走，宋高宗也决定再次入海避难。在宰相陈康伯等人的坚决反对下，高宗表示亲征，任命知枢密院事叶义问任督视江淮军马，中书舍人虞允文任参谋军事，统一指挥江淮战事。此时，王权已弃和州(今安徽和县)，逃到长江南岸的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南)。金军很快占领和州，完颜亮率军抵达长江北岸采石矶附近的杨林渡。另路金军也已占领真州(今江苏六合)，并进攻扬州。已是重病在身的刘镝等退守瓜州(今扬州南)，再奉命渡江退守镇江，扬州被金军占领。

金军主力虽然取得重大进展，进抵长江北岸，其他各路却进展不大，水军甚至还没出发，就被宋将李宝率部消灭于胶西东南海湾中的陈家岛金水军基地。

然而，就在十月金军渡淮大举南侵之后数日，金朝后院起火，反对完颜亮穷兵黩武的将领拥立金东京(今辽宁辽阳)留守完颜雍为帝，这就是金世宗，改元大定。一个月之内，黄河以北地区很快归附新皇帝。十一月初，完颜亮得到消息后，决定立即渡江进攻南宋，占据江南。他们决定初七日在采石矶渡江南侵。

这时，宋督视军马叶义问将王权罢官，改任李显忠为都统制。十一月八日，参谋军事虞允文到采石矶犒军，旧将王权已被罢职，新将李显忠未到，宋军没有统帅，将士们零零散散地坐在路旁，骑兵也丢失了马匹，士气十分低落。遥见江北金军的大量水军船只已出杨林渡口，形势非常危急，虞允文立即召集诸将议事。有人对他说："你只受命犒师，又没有受命督战。别人做坏事，你来承担责任吗?"他叱责道："危及社稷，岂能退避!"于是迅速部署防御，并命当涂县民兵乘海鳅船冲击金水军船队，击败金军。次日，命宋将盛新率军乘船防守长江江心，控制金水军基地杨林渡河口，不放一艘金军船只出河入江。宋军以火攻烧毁金水军的大量船只，完颜亮被迫退往扬州。采石之战宋军大胜。

李显忠到达采石时，战争已经结束，他立即派李捧率军万余人随虞允文前往镇江防守。完颜亮得知水军全部被宋军消灭，利用水军攻占临安的企图已经破灭，加上黄河以北地区已归附新帝金世宗，他已是后退无路，于是孤注一掷，决定占领江南地区，命令金军三天内全部渡江过河，不渡者处死，激起了金军内部的矛盾。十一月二十七日，金都统制完颜元宜率军杀死了完颜亮，并以金世宗名义行牒镇江宋枢密行府，表示要退兵以修旧好。金军随即退兵，十二月中旬渡淮北归。

孝宗是太祖七世孙，他是如何成为皇帝的宋孝宗(1127～1194)，名赵昚，字符永。长大后，命名伯琮。他并非高宗赵构的儿子，而是宋太祖赵匡胤的七世孙、赵匡胤的少子赵德芳的后裔。

貌似强盛的北宋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被金所灭。而新建的南宋王朝，则被金军追赶，颠沛流离，几乎是居无定所。加上早在三十年前，高宗赵构的独子元懿太子赵旉就因受惊吓而三岁夭折，此后，赵构一直别无子嗣。于是，上自孟太后，下至低级官员，都产生了一个共识，认为这些都是因为宋太宗杀太祖夺位所致，只有还位于宋太祖后裔，宋朝

才能保存。

史称，约在绍兴元年(1131)正月，孟太后以做梦的形式秘密建议高宗选立太祖赵匡胤的后代作为继承人，巩固宋朝的统治，高宗“大悟”。此后，宰相范宗尹又向高宗提出相似的建议。高宗大为感慨，说：“太祖以神武之功定天下，子孙后代却屡遭危难，动荡漂泊，没能安享天下，真是可悲可叹。我愿意效仿仁宗虽无子嗣，却能传位于宗室之后的做法，以社稷苍生为念，告慰祖宗在天之灵。”当即颁诏，从太祖后代“伯”字辈中选贤择嗣。绍兴二年(1132)，高宗选中宋太祖的少子赵德芳的六世孙赵伯琮为继承人选，接入宫中。

绍兴三十年(1160)，赵伯琮被立为皇子。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一月，金将杀死完颜亮北归。十二月中旬，金世宗派左监军高忠建为使前往南宋。三十二年(1162)正月，金使将到之际，南宋君臣再次对继续与金作战还是议和这一问题争论不休，高宗仍坚持求和，但是在群臣的建议下，也企图收回河南地区，改变臣属关系。然而，宋高宗料想金朝不会同意，宋金必将大战，于是想退位，把责任推给嗣子赵伯琮。五月末，赵伯琮被立为太子，改名昚。六月十一日，高宗宣布退位，太子赵昚即位，这就是宋孝宗。

隆兴和议是怎么回事宋孝宗还是皇子时就主张抗金，即位后，随即任命指挥过采石之战的兵部尚书虞允文出任川陕宣谕使，任命张浚为江淮宣抚使，统一指挥江淮的军事。随后，又为岳飞平反昭雪，起用由于反对乞和而遭贬的胡铨，这些抗金的名将的起用大大鼓舞了抗金士气。但是，此时孝宗还受制于太上皇宋高宗，朝中大臣也多主和，尤其是参政知事史浩，更是不断散布求和的言论。

隆兴元年(金大定三年，1163)，金帅纥石烈志宁致书南宋枢密使张浚，要求“凡事一依(金)皇统以来旧约(指绍兴和议)”，并索取侵地和贡赋。南宋关于地位平等和重议划分疆界的要求，遭到金世宗的完全拒绝。

宋孝宗决定对金作战以改变宋金臣属关系。隆兴元年四月，孝宗命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张浚督军北伐。然而，自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

月金世宗即位，十一月完颜亮被杀，到次年九月，金军主力一直在北方镇压内部叛乱，而高宗到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才传位给孝宗，这一段攻金最佳时间已被延误。到孝宗北伐时，金军已抢在南宋之前作好了准备。

五月，在张浚的部署下，宋将李显忠等攻占灵璧(今安徽灵璧)、虹县(今安徽泗县)，继而又攻下淮北重镇宿州，使南宋君臣大为振奋。孝宗随即任命李显忠为淮南、京畿、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使，孝宗还下诏亲征。金世宗得到消息，也迅速派中使督战，命金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立即率精兵进攻宿州(今安徽宿州)，与李显忠部连日激战，双方胜负相当。在这关键时刻，副帅邵宏渊不仅按兵不动，还散布谣言蛊惑军心，其中军统制周宏甚至带头逃跑。宋军被迫于夜晚撤军南还，移军守淮，史称"符离之战"。

符离之战后，主和派汤思退重新上台任右相，他竭力主和，而主战的张浚则竭力反对议和并得到孝宗的支持，然而汤思退公然以太上皇宋高宗压制孝宗，使孝宗最后终向主和派屈服。隆兴二年(1164)四月，张浚被罢相，不久就病死了，临死还以不能收复中原为恨。朝政完全为汤思退等主和派把持，他们撤消了张浚生前的所有抗金部署。十月，金军乘机南侵，迅速占领了濠州、滁州，但是，接下来的战役里，宋将却接连击退金军的进攻。孝宗这时遣使到金议和，表明不再向金称臣，改"岁贡"为"岁币"，数目减十万。闰十一月，宋使与金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就上述条件初步达成协议。十二月，宋使以正式国书出使金朝。乾道元年(1165)，宋使到金都面呈金世宗。因和议于隆兴二年(1164)已基本达成，所以史称"隆兴和议"。

为什么说在南渡诸帝中宋孝宗卓然称首在南渡诸帝中，宋孝宗是一个真正想有所作为的皇帝。他锐意恢复，即位之初，就在张浚的支持下北伐。然而，由于已经错过了攻打金朝的最佳时机，加上用人不当，副帅邵宏渊在关键时刻按兵不动，使"符离之战"没有取得胜利。之后，又在太上皇高宗的安排下被迫起用主和派汤思退为相，朝政完全为主和派把持。隆兴二年(1164)，孝宗和金朝议和，这便是"隆兴和议"。隆兴和议虽然是宋金所达成的和议中最接近于平等的和议，但毕竟还是不平等的。隆兴和议绝不是宋孝宗期望的结果，他的目的是收复中原，恢复北

宋边疆。在太上皇宋高宗的迫使下隆兴和议虽然最终达成，却让孝宗心里一直愤愤难平。他决定用武力恢复中原，一雪国耻。

然而，陈康伯、吴璘、张浚等将领相继去世，孝宗只好把恢复的期望都寄托在采石之战的指挥者虞允文身上。乾道三年(1167)，孝宗任命他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替代去世的吴璘出任四川宣抚使。五年(1169)八月，又召虞允文入朝为右相。八年(1172)，升虞允文为左相，再命他出任四川宣抚使，封襄国公。孝宗与虞允文相约，虞允文由四川出兵攻金，他派兵由江淮北上响应，会师河南，一起攻金。为此，孝宗整军练武，积极备战，并几次以接受金朝国书仪式不平等而发难，企图引发军事对抗。但是，虞允文到川后，想准备充分，迟迟没能定下发兵的日期，却于淳熙元年(1174)病死，使得孝宗失去了唯一可以依靠的抗金大将。加上孝宗背后有随时制约他的太上皇高宗，又得不到大臣的支持，终于使他“用兵之意弗遂而终”。

虽然宋孝宗最大的理想——恢复中原没能实现，但是他在发展经济和文化、兴修水利和轻徭薄赋等其他方面还是颇有成效的。

宋孝宗时期的文化学术非常繁荣，他对主流学派王安石新学及新兴起来的程朱理学采取兼容并蓄、共同发展的政策。孝宗朝可说是南宋思想界最活跃的时代，这个时期著名学者辈出，如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等，而著名的文学家陆游、范成大、杨万里、辛弃疾等，也主要活跃在宋孝宗时期的。孝宗时教育也很发达，除了国家办的府、州、县学，还兴加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等著名官修书院，另外，朱熹的武夷精舍、陆九渊的象山书院等私人书院也非常有名。

孝宗还注意发展经济，他多次下诏减轻人民负担。孝宗一改将灾年税赋移到丰年的做法，下诏不准到丰年再补收。孝宗又经常督促地方官兴修水利，不断派官员复查兴修后的水利工程，优奖劣惩，使得“年谷屡登，田野加辟，虽有水旱，民无菜色”，卓有成效。

孝宗十分勤政，以至“事无巨细，概呈御览，情无轻重，均由圣裁”。孝宗在位时期，是南宋政治上最清明、经济文化最繁荣兴盛的时期。可惜的是，孝宗在位二十七年，倒有二十五年受太上皇制约。淳熙

十四年(1187)，太上皇高宗终于去世，而此时孝宗已是年过花甲的垂垂老者了，当年的锐气已不复存在。淳熙十六年(1189)，孝宗传位于儿子宋光宗。然而，光宗的所作所为，令孝宗大失所望。绍熙五年(1194)六月，孝宗悒郁而死，南宋政权从此日趋衰亡。史称宋孝宗“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是很恰当的评价。

光宗是怎样成为皇帝的宋光宗(1147～1200)，名赵惇，是孝宗的第三子。绍兴十七年(1147)九月出生于王府府邸(那时孝宗尚未即位)。绍兴二十年(1150)，赐名惇，授右监门卫率府副率，转荣州刺史。孝宗即位后，拜镇洮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封恭王。庄文太子死后，孝宗觉得赵惇“英武类己”，想把他立为太子，又因为赵惇非次子，所以迟迟未定。乾道六年(1170)，虞允文为相时，劝孝宗早立储(立太子)。孝宗说：“其实我早有此意，心里也早定下了人选。只是担心太子位置一定，他就容易骄纵放逸，不勤于学。之所以一直没定，是想让他练历庶务，通古知今，以免后悔。”乾道七年(1171)二月，赵惇立为皇太子。

淳熙十四年(1187)，高宗去世。此时，孝宗亦年事已高，他已无复当年的锐气，早就失去北伐中原收复失地的信心，对朝政也渐生倦怠之意。同年十一月，孝宗手诏：“皇太子可令参决庶务，以内东门司为议事堂。”开始让太子参与朝政。次年十一月，宰相周必大请求辞职，孝宗对他说：“我一年比一年老了，也深觉疲倦，想把皇位传给太子，你还得稍微留一段时间。”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孝宗正式禅位，皇太子赵惇即位，改元绍熙，这就是宋光宗，时年四十二岁。

绍熙政变是怎么回事绍熙五年(1194)五月，宋孝宗病重，丞相留正等请光宗前去探视，可是拉着他的衣裾一直跟到福宁殿，光宗也不答应。六月，孝宗在南宋日益衰退，子、媳不孝的情况下悲惨过世。李后以光宗有病为由，拒绝主持孝宗丧礼。丞相留正、知枢密院事赵汝愚请八十岁的高宗吴皇后以太皇太后之尊垂帘听政，但吴后不许，只同意代行祭奠礼，并向外宣布“皇帝有疾，可在南内服丧”，以遮掩朝廷体面。

然而这种局面未能长久继续，丞相留正请求立嘉王赵扩为太子，光宗表示同意。但是，当留正第三天要光宗正式立太子时，光宗却御批“历事岁久，念欲退闲”，根本不提立太子之事。而这似意带双关(自己想退

或留正应退)的含煳语，使留正极为害怕。七月，留正假装生病，出城逃回老家。这一消息令朝臣民众惊骇惶恐。工部尚书赵彦逾以山陵使来向赵汝愚辞行，建议他根据“念欲退闲”的御笔，发动宫廷政变，扶持嘉王赵扩上台。于是，赵汝愚一方面争取到殿前都指挥使郭杲的支持(禁军向来是宫廷政变的关键)，又派外戚韩侂胄设法面见太皇太后，决策秘密内禅。他们选定孝宗大除孝服的日子，并秘密制作黄袍作嘉王登基之用。七月初，太皇太后于孝宗灵前下诏，宣布皇子嘉王赵扩即皇帝位，尊光宗为太上皇。嘉王听了，绕着殿柱逃避不止，坚决推辞说：“恐负不孝之名。”在众人的扶持下，嘉王赵扩被穿上黄袍，还未坐稳，赵汝愚等早已率群臣倒头便拜，这样，赵扩即位，就是宋宁宗。这场内禅，史称“绍熙政变”。

“伪学”之禁是怎么回事宋宁宗(1168～1224)，名赵扩，是宋光宗赵惇的第二子，母李氏。乾道四年(1168)十月，生于王府府邸(时光宗尚未即位，封恭王)。乾道五年(1170)，授右千牛卫大将军。后迁安庆军节度使，封平阳郡王，再进封嘉王。绍熙五年(1194)七月，即皇帝位，时年二十六岁。

宁宗即位初，下诏让群臣勇于直言。两个月内，绍熙政变的主要参与者“宗室”赵汝愚由知枢密院事而兼参知政事，升枢密使后再升右相，独掌政权(当时没任左相)。而韩侂胄先受新任右正言黄度弹劾，不久又受由赵汝愚引荐的朱熹奏劾，接着吏部侍郎彭龟年也上疏弹劾他，三人虽然都被逐出朝廷，宁宗还是被迫免除了韩侂胄的具体职务。从此，韩侂胄遂与赵汝愚势不两立，决意排挤。

韩侂胄通过外戚的特殊身份逐渐向宋宁宗荐用亲信，慢慢掌握了实权。而赵汝愚是宋太宗长子汉王赵元佐的后裔，在宁宗即位前为了制造舆论，曾对人说“梦孝宗授以汤鼎，背负白龙升天”，来说明自己扶持宁宗登位是先有梦兆。而李沭等又奏劾赵汝愚以宗室而任丞相，又“唱引伪徒，谋为不规”，引起宁宗猜忌。庆元元年(1195)二月，赵汝愚罢相。而监察御使胡纮又诬陷赵汝愚“自称裔出楚王元佐，乃正统所在”，又称他准备挟持太上皇帝赴绍兴，称绍熙皇帝。于是，赵汝愚被贬往永州(今湖南零陵)，后死于贬所。

赵汝愚及朱熹等人的贬逐引起朝野不满，朝臣、太学生纷纷上疏，其中多为理学人士。同年六月，刘德秀上疏请考道学真伪。庆元二年(1196)，何瞻等要求将道学正式定为“伪学”，禁止传播。庆元三年(1197)十二月，又定以赵汝愚、朱熹为首的朝野文武官员五十九人为“伪学”党籍，重要成员全部遭到贬斥，一般官员则不予升迁。嘉泰二年(1201)初，韩侂胄感到权势已固，才解除了伪学之禁，列入党籍的人士也逐渐恢复官职。

“开禧北伐”是怎么回事庆元伪学之禁全面扫清了韩侂胄的敌对势力，在庆元、嘉泰的十年间，他的官职也一路飙升。开禧元年(1205)七月，韩侂胄出任平章军国事，这是高过丞相的重要官职。为了创建奇功，他决意北伐，开始积极部署攻金。之前，韩佗胄也已对北伐做好了舆论准备。早在嘉泰四年(1204)，南宋朝廷就为韩世忠在镇江建庙祭祀，又追封岳飞为鄂王，为攻金制造了气氛。

开禧元年冬，金使进见宁宗时态度傲慢，引起宁宗和朝臣的不满。开禧二年(1206)三、四月间，南宋全面部署攻金。为了鼓舞士气，追论秦桧投降误国之罪，削夺王爵，改谥谬丑。四月二十六日，东路宋军不宣而战，迅速攻克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虹县(今河南泗县)，中路宋军也占领新息(今河南息县)、内乡(今西峡)，对金战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消息传到临安，韩侂胄认为时机已到，宋宁宗遂于五月七日下诏伐金，对金战争全面展开，史称“开禧北伐”。

金章宗于南宋下诏“伐金”后的第五天，也下诏“征南”攻宋。金朝本以为宋军非常强大，谁知多数宋军一战即溃，五、六月间，已占领宿州(今安徽宿州)、蔡州(今河南汝南)等地的宋军纷纷退回南宋境内。八月，金朝已作好了一切准备，八万金军主力分成几路南下。由于宋军西线的四川宣抚副使吴曦暗中投降，金军西线毫无后顾之忧，集中力量攻打南宋两淮和襄樊地区。十月，金军攻占了淮南、汉水流域及川陕边境的一些州县，然而在围楚州(今江苏淮阴)、襄阳、和州、庐州、六合等城时，被宋将毕再遇、田琳、周虎等击败。

嘉定和议是怎么回事金军到达长江北岸后，宋朝有些害怕了。十一月中旬，两淮宣抚使丘密遣使向金左副元帅仆散揆求和。十二月中旬，

东路金军开始退兵。下旬末，宋军西线主帅吴曦叛宋降金，接受金国封的蜀王称号，割关外的凤(今陕西凤县)、阶(今甘肃武都东)、成(今甘肃成县)、西和(今甘肃西和南)四州给金。开禧三年(1207)正月，吴曦正式在兴州(今陕西略阳)称蜀国王，割据川蜀。然而，吴曦的叛变并不得人心，二月初，兴州将领李好义与杨巨源等七十多人在伪丞相安丙的支持下，冲入“王宫”杀死了吴曦及其死党，宋军随即收复了被割让的四州。安丙窃取了镇压吴曦叛变的功劳，被任命为四川宣抚副使。之后，他和原吴曦部将王喜勾结，在李好义与金军作战连连得胜的情况下，阴谋害死了李好义、杨巨源，摧毁了西线的抗金力量，破坏了整个北伐战争。

在西线战争进行的同时，宋金议和也在不断进行中。十一月初，礼部侍郎史弥远与杨皇后密谋，伙同参知政事李壁，伪称得到宁宗密旨，指使权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在韩侂胄上朝时，秘密将其杀害。宁宗得知后，也已是无可奈何。主和派得势，史弥远升任同知枢密院事，又改宰相，控制朝政。他们倒行逆施，竟又恢复了秦桧的王爵和赠谥。

嘉定元年(1208)三月，史弥远按照金朝的无理要求，刨棺割取韩侂胄首级送到金朝。他们与金达成和议，改金宋叔侄关系为伯侄关系，改岁币每年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为三十万匹(宋金和议中“岁币”最多的一次)，另犒军费三百万贯，宋金维持原来的边界。史称“嘉定和议”。

宋理宗是怎样成为皇帝的宋理宗(1205~1264)，名赵昀，是宋太祖的十世孙。他的父亲赵希瓐是赵匡胤次子燕王赵德昭的后裔，母亲全氏，家住浙江绍兴山阴。

宋宁宗没有儿子，他曾立燕王赵德昭后裔赵询为太子，但赵询于嘉定十三年(1020)病死。八月，他仿效高宗赵构当年的做法，从宋太祖赵匡胤第十世孙中挑选年龄在十五岁以上的加以教育，作为候选人。次年六月，宁宗选中高宗赵构的弟弟、沂王赵抦的嗣子赵竑为皇子。赵捅没有儿子，赵竑是宗室赵希瞿的儿子，过继给赵捅的。

当时朝中大权都掌握在右丞相兼枢密使史弥远手中。赵竑对于史弥远的擅权十分不满，他的言论被史弥远安插在他身边的耳目告发，史弥远于是不断在宁宗面前诽谤赵竑，企图废赵竑，另立他人为继承人，但

宁宗不予理会。据《宋史纪事本末》记载，之前，史弥远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见宁宗没有子嗣，而和宁宗的关系最近的沂王赵捅也无后，就想借为沂王置后为名，密令他府中的童子师余天锡物色宗室中可立之人，以备皇子之选，日后便于驾驭。余天锡在赴临安府主持乡试的时候，天降大雨，进入当地全保长家避雨，意外发现全保长的外甥竟是宋太祖长子燕王赵德昭后裔。于是，将其带到临安孩子的父亲赵希瓐处扶养。赵竑被册立为太子后，史弥远把这个叫赵与莒的孩子补秉义郎，赐名贵诚，过继给沂王赵柄。

嘉定十四年(1224)八月，宋宁宗病重。闰八月，宁宗病死。史弥远乘夜密召赵贵诚进宫，并派杨皇后哥哥的儿子杨谷、杨石对杨皇后说，宁宗遗旨要废皇子赵竑，立赵贵诚为帝。杨氏兄弟一夜往返七次，杨皇后始终不答应，最后两兄弟哭诉道：“如不同意，必生祸变，杨氏一门恐无遗类!”杨皇后知道史弥远的手段，这才不得不屈服，被迫答应。为了说明赵贵诚即位的合法性，史弥远宣称：宋宁宗在世的八月份，即已“诏以贵诚为皇子，改赐名昀”，并授武泰军节度使，封成国公。当夜，废赵竑为济王，令往湖州(今浙江吴兴)居住，命皇子赵昀即位，这就是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正月，湖州人潘壬拥立赵竑为帝，史称“霅川之变”(霅川，即霅溪，今苕溪下游，为湖州别称)。赵竑后虽讨平潘壬，还是被史弥远迫害至死。

宋理宗对宋代理学态度如何宋理宗是史弥远通过夺嗣政变扶立的，他自己也深知不得人心，因而，他仿效史弥远，推崇理学，以期改善形象，赢得士大夫的支持。宝庆三年(1227)，理宗下诏称：“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朕励志讲学，缅怀典刑，可特赠熹太师，追封信国公。”这是最高封建统治者首次褒崇朱熹及其《四书集注》，为确立理学思想的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

绍兴六年(1233)十月，史弥远死，理宗亲政。他信用史弥远的同党、右丞相兼枢密使郑清之。理宗和郑清之都知史弥远擅权时期的所作所为很不得人心，于是，同年十一月，理宗下诏改明年为端平元年，以示“更化”，又将史弥远的帮凶李知孝、梁成大、莫泽等人贬逐。与此同时，理宗对被史弥远陷害而死的朱熹的弟子李燔、陈宓及名士李道传等

都赐谥赠官，并随后重用真德秀、魏了翁等十余位名士。其中真德秀被认为是朱熹以后最大的理学家，声望很高。端平元年(1234)，真德秀被召为户部尚书，后又被任命为参知政事。魏了翁也受到重用，先后任同签书枢密院事、督视京湖军马，又兼任督视江淮军马，负责长江中下游的全部抗蒙军事重任，然终因受郑清之排挤，被迫称病辞职。

淳祐元年(1241)正月，宋理宗下诏将北宋的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和南宋集理学大成的朱熹从祀于孔庙，分别封前四位为汝南伯、郿伯、河南伯、伊阳伯。接着，以王安石为万世罪人，将其赶出孔庙。至此，正式确定了理学为南宋官方的统治思想。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士大夫们纷纷学习理学。理宗因而被修撰《宋史》的元代理学信徒称赞曰："后世以理学复古帝王之治者，考论匡直辅翼之功，实自帝始焉。庙号曰理，其殆庶乎!"

宋理宗享国久长，但治效却不及庆历、嘉祐时宋理宗在位时间共计四十年，在宋代的十八位皇帝中，除了仁宗皇帝(在位时间四十一年)，他在位时间是最长的。但是，他虽然享国久长，却完全没有仁宗皇帝的政绩。

理宗因出身宗室远族，加上史弥远为了遮掩其擅自废立的罪责及对付可能出现的政局动荡，有意将杨皇后推在第一线，所以，理宗即位时虽然已经二十岁，还是由杨皇后垂帘听政。但杨皇后实际上并不干预朝政，并且于次年(即宝庆元年，1225)四月归政。

理宗在史弥远当权期间心甘情愿地充当傀儡。因而，理宗前期，朝政完全被史弥远把持。宝庆元年正月发生的"霅川之变"引起了许多正直之士的愤慨，著名的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等不顾罢官流放，接二连三为济王赵竑鸣冤叫屈。史弥远为了笼络人心，开始大力提倡理学。而真德秀、魏了翁等人因对史弥远的所作所为深为不满，先后以"谤讪"、"诬诋"罪名，被落职闲居。但史弥远为了改善他的形象，继续举着推崇理学的大旗，宝庆三年(1227)正月，追封已故理学大师朱熹为信国公，特赠最高官衔"太师"，又下诏表彰朱熹的《四书集注》。史弥远长期擅权，正常的封建朝典法制，几乎被摧毁殆尽。

绍定六年(1233)十月，史弥远病死，长达二十六年的擅权政局终于结束。理宗亲政。宋和蒙结盟，联合消灭了金国。此后，宋蒙战事不断，直至宋亡。理宗在部署对蒙防御措施的同时，重又举起崇奉理学的大旗，甚至委理学家魏了翁以抗蒙军事大权。淳祐占元年(1241)正月，宋理宗下诏将北宋的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和南宋集理学大成的朱熹从祀于孔庙，理学被确认为南宋官方统治思想，取得了独尊的地位，这可算是理宗最重要的政绩了。而理宗亲政后的一些改革(指端平更化)，如罢黜史党、亲擢台谏、澄清吏治等，亦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

第十三章

宋蒙是如何联合灭金的当开禧二年(1206)韩侂胄发动北伐，宋、金两军在江淮地区进行大战的时候，蒙古的成吉思汗已崛起于漠北。成吉思汗进攻的主要对象金国，金国当时表面上还很强大，于是，他决定先进攻金的盟国西夏。宝庆三年(1227)，蒙古灭掉西夏后，于绍定五年(1232)十二月，派遣王檝使宋，提议与宋联合攻金，南宋也派邹伸之为使者前去，双方达成协议，灭金后蒙古将河南地区归宋。

绍定六年(1233)四月，金将武仙、武天锡等力图把金哀宗迎往四川以负隅顽抗，兴师进攻南宋。南宋将领孟珙先后在光化、吕堰打败进犯的金军，并乘胜进攻金将武仙的据点顺阳，武仙被迫率部逃往马蹬山，再次被宋军击败。孟珙占领了邓州(今属河南)、唐州(今河南唐河)等地，金军逃往四川的计划彻底破灭。

金哀宗逃到蔡州后，八月，蒙将塔察儿使王檝至襄阳，约宋攻蔡。月末，金哀宗派金将完颜阿虎带来宋借粮。临行前，他对完颜阿虎带说："宋人负朕深矣。朕自即位以来，戒饬边将无犯南界。边臣有自请征讨者，未尝不切责之。向得宋一州，随即付与……大元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必及于我。我亡必及予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卿其以此晓之。"但是，宋朝廷不予理会。十月，宋将孟珙应约率军两万余人与蒙将塔察儿合兵围蔡。这时金军全靠民丁防守，民丁不足，就让养老壮健妇女穿上男人的衣服，运送大石木头防御。金哀宗试图突围，没有成功，只得再次退回守城。宋端平元年(金天兴三年，1234)正月，蒙古与宋联军急攻蔡，此时蔡州已断粮三月，守军根本就没有战斗力，形势十分危急。初十日晚，金哀宗召集百官，传位于族人、东面元帅完颜承麟，完颜承麟拜泣不敢受。金哀宗说："我把皇位传给你，也是不得已呀!只因我太胖不便于骑马逃走，你平常就很矫健，也有谋略，万一你能幸免于难，咱们金朝就还有一线希望，这就是我的想法。"完颜承麟不得已，接受了玉玺，是为金末帝。然而，即位仪式刚结束，宋军已攻入南城，金哀宗自缢而死，蒙古与宋联军遂攻占蔡州，末帝为乱兵所杀，金朝灭亡。

元蒙是何时开始大举侵宋的宋端平元年(金天兴三年，1234)，蒙古和宋合力灭金后，蒙将窝阔台可汗撕毁了将河南归还宋朝的协议，只以陈、蔡东南归宋，而以北归蒙古，南宋政府被迫承认了这一改变，各自退兵。在南宋一些官员的提议下，宋理宗决定乘河南空虚，收复三京。然而由于没有经过周密的准备，宋军收复三京的轻率行动终以失败告终。

同年十二月，蒙古遣使责问宋出兵河南破坏盟约事，并以此为侵宋的借口。宋连忙于次年正月派孟珙进驻襄阳(今湖北襄樊江南部分)，分屯樊城(今襄樊江北部分)、新野、唐、邓间，防备蒙古入侵，并以孟珙为襄阳都统制。

端平二年(1235)六月，蒙古兵分三路大举侵宋。之后几年间，中路蒙军侵占了随(今属湖北)、郢(今属湖北)两州及荆门军(今荆门)，东路蒙军则攻入了淮西蕲(今湖北蕲春)、舒(今安徽潜山)、光(今河南潢川)州，而西路蒙军攻陷了成都府、利州及潼川(今三台)府。然而蒙军的入侵遭到了宋军的激烈抵抗，蒙军没得到什么新进展。淳祐元年(1241)十一月，窝阔台病死。蒙古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汗位的斗争。一直到淳祐十一年(1251)初，蒙哥才继承汗位。宝祐五年(1257)春，蒙哥下诏大举侵宋，并于次年十月亲自率领十万大军攻蜀。可是，开庆元年(1259)七月，蒙哥在攻城时受伤最终死于钓鱼山下。此后其弟忽必烈继承汗位，并于宋咸淳七年(1271)改国号为元，迁都大兴府(今北京)。忽必烈继续侵宋，宋祥兴元年(1279)元灭宋。

从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窝阔台汗对宋用兵到宋祥兴元年(1279)南宋灭亡，元蒙侵宋的战争持续了四十余年。

宋度宗是一个怎样的皇帝宋度宗(1211～1274)，名赵禥，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十一世孙。他是理宗的皇侄，宋理宗的同母弟赵与芮的儿子。嘉定四年(1211)出生于绍兴府。据说赵禥七岁才开始说话，理宗深以为奇。理宗没有儿子，所以对赵禥很注意。宝祐元年(1253)正月，理宗立赵禥为皇子。景定元年(1260)正月，立为皇太子。景定五年(1264)，理宗去世，赵禥即皇帝位，是为宋度宗。

度宗即位以后，贾似道继续当宰相。据《宋史纪事本末》载，因为是贾似道向理宗提议立度宗为储的，所以度宗对他特别宠信，“每朝皆答拜，称之曰‘师臣’而不名(不叫名字)，朝臣皆称为‘周公’”。咸淳元年(1265)三月，贾似道假装辞相，回到绍兴私第，同时又让京湖安抚使吕文德谎报蒙古来攻的军情，度宗吓得不知所措，一个月里连下几次诏书，八次派人专程往绍兴请他回朝。咸淳二年(1266)，贾似道再次辞相，度宗急得拜求他留任。执政江万里实在看不下去，说：“自古君臣无此礼，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复言去。”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度宗根本就没有主见，对贾似道也过于依赖。咸淳三年(1267)，度宗升贾似道为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三日上朝一次，上朝后就到都堂(政事堂)处理重大军政事务。咸淳八年(1272)九月，贾似道因胡贵妃的哥哥一点小事没有请示他便要求罢政，度宗固留不得，只得哭着出胡贵妃为尼姑，贾似道才作罢。从此，贾似道开始以平章军国重事的身份独揽朝政。

度宗在位期间，所有的朝政，全委托给贾似道处理。而批答臣僚章奏的事，据说都是他最宠爱的妃嫔王秋儿等十四人所为。史称：“宋至理宗，疆宇日蹙，贾似道执国命。度宗继统，虽无大失德，而拱手权奸，衰弊寖甚。”

宋端宗赵昰结局如何宋端宗赵昰(1269～1278)，是宋恭帝的异母兄。德祐二年(1276)正月中旬，元兵兵临临安前夕，赵昰被封为益王，判福州，而恭帝的异母弟赵昺被封为广王，判泉州。元兵到皋亭山时，驸马都尉杨镇等护着二王历尽艰险由婺州(今浙江金华)亡命温州。礼部侍郎陆秀夫听说二王出朝，也追随而去，终于在到温州前追上了二王。而前朝宰相陈宜中也于此前私自逃到了温州，于是一行人一起前往福州。五月一日，陈宜中等在福州拥立年仅七岁的益王赵昰为帝，这就是宋端宗。端宗母杨太后垂帘听政，改福州为福州府，作首都，重建南宋王朝，改元景炎。封陈宜中为左丞相，李庭芝为右丞相，张世杰任枢密副使，陆秀夫任签书枢密院事，晋封赵爵为卫王。不久，文天祥在被元军押往大都途经镇江时逃脱，这时由淮南来到福州，被任命为右丞相兼知枢密院事，小朝廷初具规模，继续进行抗元斗争。

此时南宋疆域已大部丧失，仅余的闽、广等地也随着守将李庭芝、姜才、张玉等的先后战死而相继失守。七月，元兵分三路侵闽。同年十

一月，元军到达建宁(今福建建瓯)，端宗小朝廷只得再次登舟南逃，刚出海口，就与元军水兵相遇，幸好当时一场弥天大雾帮助小朝廷船队躲过了一劫。元兵迅速占领了福州。十二月，端宗等率舟师到广州港口，被元守兵抗拒没能上岸，舟还大海，只好驻师秀山(今东莞西南海中)。张世杰保护小朝廷船队到井澳(今广东中山南海中)，遇上了飓风，船只倾覆，将士溺死众多，损失达十之四五，端宗也惊悸成疾。次年春天，小朝廷走投无路，只得在硇州(今湛江东南硇州岛)暂时驻泊。景炎三年(1278)四月，端宗病死。

卫王赵昺结局如何卫王赵昺(1272～1279)，恭帝的异母弟，德祐二年(1276)正月中旬元兵兵临临安前夕，被封为广王。之后与益王赵是一起由杨镇等护送到温州，再到福州。赵是被立为皇帝后，赵爵被封为卫王。景炎三年(1278)四月，宋端宗病死后，群臣都打算散伙，陆秀夫拿出他代拟的《景炎皇帝遗诏》，宣布卫王赵昺继承皇位，他正色道：“古人有以一旅成就中兴大业的，如今百官具备，士卒数万，难道还不能立国吗?”众人感奋，于是立时仅六岁的赵昺为帝，是为南宋末帝，改元祥兴。杨太后继续垂帘听政，张世杰任枢密副使，陆秀夫任左相，他还每天亲自书写《大学章句》，为小皇帝赵昺讲课。

雷州(今广东海康)是硐州的陆上屏障，对小朝廷的安全至关重要。五六月间，张世杰率兵与元兵展开了雷州争夺战，但最终失败。小朝廷不得不在张世杰的建议下转移到崖山(今广东新会东南，当时是一个海岛)，崖山与其西的汤瓶山对峙如门，阔仅里许，故又被称为崖门。在张世杰看来，崖山进可乘潮而战，退可据险而守。但是元军已下定斩草除根的决心，对南宋小朝廷紧追不舍。祥兴二年(1279)正月，元将张弘范率军从潮阳(今属广东)由海路到达崖山，包围了张世杰的部队。二月初六日(1279年3月19日)，元军兵分四路，从东、南、北三面向崖山发起总攻。宋军大败，陆秀夫看到大势已去，对赵昺说：“国事至此，陛下应为国死。德祐皇帝(指恭帝赵昺，此为他的年号)受辱已甚，陛下不可再受耻辱!”说完，背起七岁的赵昺投海自尽，杨太后亦投海死，南宋灭亡。

李继迁是怎样附辽侵宋的夏太祖李继迁(963～1004)，是唐朝宥州刺史拓跋思忠的后代。父亲李光俨曾为银州防御使。建隆四年(963)二

月，李继迁生于银州(今陕西米脂西北)无定河侧的山寨中(今名李继迁寨)，母亲罔氏。据说他生下来就有牙齿，自幼喜欢习武，善骑射。十余岁时，他带领十余骑随从出猎，突然一只勐虎从山坡上冲下来。李继迁命从骑躲入柏树林中，自己爬上树梢，一箭射中老虎眼睛，老虎死了，从此，李继迁的名字在部落中妇孺皆知。开宝七年(974)，授定难军管内都知蕃落使。

李继迁是李继捧的族弟，继捧入朝时，他刚刚二十岁。宋朝使者来召族人入京师时，李继迁不愿意去，假称乳母死了，要到郊外葬乳母，和十几个人逃到距夏州三百余里的地斤泽(今内蒙古伊克昭盟托克旗境)。从此，他以地斤泽为根据地，出示祖先拓跋思忠像，联络党项各部族。他还娶了野利部首领的女儿为妻，自此势力日益扩大。

李继迁随后不断侵扰宋朝，然而多次失败，没有得到什么进展。雍熙三年(986)二月，李继迁派张浦到辽朝归附，辽圣宗授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十二月，李继迁又向辽求婚，辽圣宗答应以宗室女义成公主下嫁。淳化元年(辽统和八年，990)，李继迁被辽封为夏国王。

在这种形势下，端拱元年(988)五月，宋太宗采用宰相赵普的建议，重授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赐姓名赵保忠，并令其回夏州，谋召李继迁归宋。李继迁则暗中勾结李继捧，于淳化二年(991)七月攻占银、绥二州，宋太宗被迫授继迁为银州刺史、充洛苑使，赐名赵保吉。同年十二月，李继捧反被李继迁策诱以夏州降辽，封为西平王。淳化四年(993)，李继迁派兵连续进攻宋朝庆、原、环等州。淳化五年(994)，宋朝命李继隆率兵攻打李继迁，继迁再次避居沙漠。至道元年(995)，继迁在上表请求宋朝归还夏州不许后，出兵攻乌白池(今宁夏盐池)、清远军(今银川东)等地，不断劫宋军粮草。至道二年(996)四月，又攻西凉府(今甘肃武威)，五月，围攻灵州(今宁夏灵武)。至道三年(997)四月，辽封李继迁为西平王。这时宋太宗已死，真宗即位。继迁向宋表示臣附并再次索要夏州，真宗遂于同年末授李继迁为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兼夏、银、绥、宥、静五州观察处置押蕃落使，李继迁终于收回了“故土”。

咸平五年(1002)三月，在辽朝的鼓动下，李继迁集兵五万攻陷灵州，改灵州为西平府，之后又迁居西平府。同年十月，李继迁在攻取吐

蕃首领潘罗支统治下的西凉府时，中箭受伤。景德元年(1004)正月，死于西平，其子李德明即位。李继迁一生，联合辽朝抗宋，收回了故土，保住了党项根基，又占据了西平，西夏以后的一统疆域和累世大业，都是他所奠定的，因而西夏建国后，他被迫尊为太祖。

李德明是如何倚辽惠宋的夏太宗李德明(982～1032)，小字阿移，是李继迁的长子，母野利氏。景德元年(1004)其父李继迁去世后，二十三岁的李德明即位。据《西夏书事》卷六记载，李继迁临死前嘱咐儿子说："尔当倾心内属，一表不听则再请，虽累百表，不得，请勿止也。"李德明在位期间，确实听从父亲的遗言，倾心内属，以待时机。对外则采取"依辽和宋"的方针，同时向两国称臣，接受封号。即位当年七月，辽封李德明为西平王。十二月，宋辽订立"澶渊之盟"，关系缓和。为稳定人心，景德二年(1005)，李继迁遣使到宋请和，直到景德三年(1006)双方才正式订立和约，宋也封李德明为西平王、定难军节度使，并赐予大量物资。景德和约，给李德明的西平政权带来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对巩固政权，发展社会经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李德明即位时，为报杀父之仇，当年就派兵攻打西凉，杀死了潘罗支，占据了凉州。之后，吐蕃多部都归附李德明。

而回鹘也依靠宋朝对抗党项。李继迁在世时一直谋攻回鹘，没有成功。李德明即位后，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至次年十二月，四次出击回鹘，都失败了。天圣六年(1028)，李德明派儿子元昊攻占了甘州(今甘肃张掖)。八年(1030)，瓜州回鹘首领贤顺率部归附李德明。明道元年(1032)九月，元昊又从回鹘手中收复了一度被其占领的凉州(今甘肃武陵)，这样，回鹘的威胁解除了。

李德明同时臣服于辽、宋，倚辽之势，得宋实惠。而辽、宋两朝也为了各自的利益竞相拉拢他。大中祥符三年(1010)九月，辽进封李德明为夏国王。天圣九年(1031)，辽兴宗又封宗室女为公主嫁给李德明的儿子李元昊。宋朝也不甘示弱，明道元年(1032)，也加封李德明为夏王。

景德和议后，李德明在位期间，一直与宋保持着和平友好关系。事实上，这只是李德明图谋发展西平政权，摆脱对宋的依附地位的一种手

段。他养精蓄锐，慢慢地征服了吐蕃、回鹘等河西诸族，为西夏国的创建奠定了基础。而辽、宋对他的竟相讨好笼络更是助长了他想称帝的野心。天禧四年(1020)，李德明在灵州怀远镇修建都城，改名兴州，正式建都。但是，他还没来得及登上皇帝宝座，就于明道元年(1032)十月病死了。

西夏与宋的主要战争有哪些元昊建国称帝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摆脱宋朝的控制，实现党项政权的独立。但是，他又希望他的建国称帝能够得到宋朝的承认。于是，元昊在建国后不到两个月，即天授礼法延祚二年(宋宝元二年，1039)正月，就以臣子的身份，遣使到宋给宋仁宗上表，追述、表彰他的祖先同中原的关系及其功劳，说明其建国的合法性，要求宋朝“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宋朝不能容忍藩属成为敌国，当即削去了元昊的赐姓及官爵，断绝互市，并张榜称有能将元昊俘获或斩首的就封为定难军节度使。

外交手段没有取得成功，元昊决定用武力夺取。从天授礼法延祚三年到五年(宋康定元年至庆历二年，1040～1042)，元昊对宋朝发动了三次大战。

天授礼法延祚三年(宋康定元年，1040)正月，元昊率大军突袭保安(今志丹县)军，一举攻克延州外围重镇金明寨，直逼延州(今陕西延安)。宋知延州范雍急召部将刘平、石元孙前来救援，当二将率二万援军到达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时，元昊的伏兵突起进攻，经过激烈战斗，宋军失败，刘、石二将被俘。元昊又乘胜勐攻延州七日，无奈天降大雪，元昊担心后方有失，遂撤军北归。史称这次战役为三川口之战。

四年(宋庆历元年，1041)二月，元昊在宋朝还没布置好战局时，又率十万大军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宋朝新任陕西经略副使韩琦命部将任福为大将迎击。元昊命西夏军诈败，一路丢弃马羊骆驼，宋军紧追不舍，一直到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北)才发现中了元昊的圈套，宋国再次大败，主将任福战死。史称好水川之战。

五年(宋庆历二年，1042)闰九月，元昊兴兵进攻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宋知渭州王沿派部将葛怀敏出击。葛怀敏轻敌冒进，进入定川寨

(今固原西北)，宋军两次陷入元昊的包围圈，全军覆没。史称定川寨之战。

三次大战西夏均大胜，但连年征战，西夏已是民穷财尽，加上宋朝关闭互市，使得西夏境内粮食等日常生活用品奇缺，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因此，当北宋提出议和时，元昊也积极响应。经过多次交涉，双方于天授礼法延祚七年(宋庆历四年，1044)达成和议。宋朝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夏对宋名义上称臣。宋“岁赐”西夏银五万两、绢十三万匹、茶两万斤。宋、夏恢复贸易往来。

何谓“濮议”

“濮议”是牵动英宗朝的大事件。濮指濮安懿王赵允让，乃宋英宗的生父。议，就是讨论。“濮议”指英宗即位后让朝臣讨论其已故生父的名分问题。

赵允让(995～1059)，字益之，是商王赵元份的儿子。他天资浑厚，喜怒不形于色。真宗儿子周王赵祐死后，允让曾被叔叔宋真宗接入宫中扶养，仁宗出生后，允让才被送回自己家。仁宗即位后，因在位久无子，乃以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的第十三子宗实(即后来的英宗)为皇子。嘉祐四年(1059)，濮安懿王赵允让病死，就在英宗为生父守丧时，被仁宗立为皇子。仁宗去世后，英宗即位。位居九五之尊后，血浓于水，英宗总想把生父也升格为皇帝。治平二年(1065)，英宗把已故濮王的名分问题交给礼官和待制以上的朝臣去讨论。按儒家旧制，帝王由旁支人承大统，就应该以先皇为父，而不能以本生父母为考妣。至于秦汉以来那些推尊其生父母为皇帝皇后的做法，都见讥于当时，非议于后世的。

朝臣们很快分成泾渭分明的两大派。一派以台谏官司马光、贾黯、吕诲、范纯仁等为主体，还包括部分礼官、侍从如翰林学士王圭、知制诰韩维、权三司使吕公弼等，他们主张英宗应称濮王为皇伯。另一派则都是一些大权在握的宰执大臣，有韩琦、欧阳修、曾公亮等。他们认为英宗应该称濮王为皇考，因为“出继之子，对所继所生皆称父母”。双方各执一词，引经据典，唇枪舌剑，争论得不亦乐乎。宰执坚持皇考说，

激怒了于礼于理都略占上风的台谏派，他们上疏弹劾说“臣权太盛，邪议干正”。然而英宗却是偏向于宰执一边的。于是，台谏官纷纷被解职，权御使中丞贾黯被解职出京，知谏院司马光也被免去谏职担任侍读。次年三月，侍御使吕诲联合御使范纯仁、吕大防联合上疏，参劾全体宰执。英宗只得下诏书不称濮王为“皇”，而称为“亲”，又把濮王的坟茔称陵园，实际上还是将生父和仁宗并列。

吕诲等见弹奏不被采纳，集体辞职，英宗最终把他们全部贬出京师。而出使契丹回来的同知谏院傅尧俞、侍御使赵瞻等见濮议结局如此，也不再上朝，在家“待罪”。这是台谏官行使其正当言事权的最后一举，可见宋代台谏言事不屈从于君权之一斑，然而英宗又把他们贬为州郡长吏。反对称皇考的台谏官都贬黜出朝，京城传开了“绝市无台官”的谚语。濮议最终在君权和相权的联手下收场，皇考派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为什么说范质是“北宋开国首相”

范质(911～964)，字文素，大名宗城(今河北清河西南)人。他的父亲范守遇，当过郑州防御判官。据说范质出生的时候，他的母亲梦见神人送其一支五色笔。范质九岁时就能作文，十三岁就研究《尚书》，且教授学生。后唐长兴四年(933)举进士。后汉初，范质任户部郎中，干祐三年(950)升任枢密副使。后周广顺元年(951)，范质升为宰相后又兼任知枢密院事，掌握了军政大权。显德六年(959)后周世宗病危时，以范质为顾命大臣，辅佐世宗年仅七岁的儿子柴宗训，被封为萧国公。

显德七年(960)，殿前都检点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不久，范质就被兵士们带到赵匡胤的殿前司公署内，面对如狼似虎的将士，范质进行着挽救后周的最后努力，他质问赵匡胤说：“先帝养太尉如子，今先帝身犹未冷，奈何如此?”赵匡胤呜咽流涕说：“我受世宗厚恩，现在为六军所迫，到了这一步，实在是愧对天地，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范质还没来得及答话，殿前司散指挥都虞侯罗彦瑰立刻举着刀来到范质跟前，恶狠狠地说：“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范质虽有志恢复后周，但此时他自知已是回天乏力了。于是，在赵匡胤答应他提出的“事太后如母，养少主如子，无负先帝旧恩”的条件后，范质“不得已从之”，率百官成礼，赵匡

胤得以顺利地创建宋朝。

赵匡胤深知争取后周有威望的大臣的重要，于是，在为开国元勋及亲信升官晋爵之后，范质的宰相官衔也由同平章事升为侍中，范质于是成了北宋的开国宰相。但是，赵匡胤对范质这种旧臣并不完全信任，在升范质相衔的同时，也免去了他原先兼任的知枢密院事，成为只问政事的行政长官。去掉了重要的军权，这其实是明升暗降。

本来，宰相见皇帝议重大政事，一定是受命坐下当面讨论，从容赐茶退下，唐、五代一直都遵循这一制度。但是，有一天范质去面见赵匡胤的时候，按惯例仍旧还是坐着，赵匡胤却说："我可以自己拿着看。"于是范质就起来把文书呈上，然而退下想坐回原位时，位子却已经让赵匡胤悄悄命人撤了。范质由此知道，已经该辞相位了。干德二年(964)正月，范质请辞相位，赵匡胤丝毫没有挽留，还匆忙地在同一天将同是留用的其他两位宰相王溥、魏仁辅也一并罢免了。同年九月，范质病死，终年五十四岁。

"义社十兄弟"谓谁赵匡胤发动兵变代周建宋的基本力量之一，据李攸《宋朝事实》载，就是以他为首的所谓"太祖义社兄弟"，也称为"义社十兄弟"，他们就是赵匡胤、杨光义、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重赟和王政忠十人。至于他们何时结成"义社兄弟"，最初又是以谁为首，现在都已无从知晓了。十人当中的赵匡胤、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韩重赟及刘廷让，在《宋史》及《东都事略》中都有纪、传，他们都是后汉时投入枢密使郭威部下，当时都是低级军官，地位大体相当。杨光义、刘庆义、刘守忠和王政忠等想必情况也差不多。因此可以断定，他们结成"义社兄弟"的时间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因为到后周世宗初年时，每个人的发展情况已经有很大差异，地位也已相当悬殊。这时"义社十兄弟"中地位最高的，不是赵匡胤，而是时任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并领昭武军节度使的李继勋。赵匡胤主要是在世宗后期得到迅速提拔，成为殿前司的最高长官。赵匡胤和义社兄弟的关系，显然有亲疏远近的差别，石守信、王审琦、韩重赞三人可能与赵匡胤的关系较为密切，他们都参与了兵变，成了开国功臣。而杨光义、刘庆义、刘守忠、王政忠几人，升迁最慢，与赵匡胤的关系可能较为疏远。

石守信、王审琦、韩重赞等参与兵变的义社兄弟，在建国之初得到了很高的礼遇，并且作为赵匡胤的亲信入主禁军，石守信当上了侍卫军副都指挥使，后再升马步军都指挥使，王审琦则提为殿前都指挥使，韩重赞任侍卫军马军都指挥使。然而，赵匡胤对这些故人并不放心，建隆二年(961)七月，在建国仅一年半时，赵匡胤就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解除了兄弟们的兵权，代之以优厚的物质待遇。

石守信父子在宋王朝有何军事权石守信(928～984)，开封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后汉时，隶枢密使郭威帐下。后周广顺初年，累迁禁军亲卫都虞侯。因从世宗出征淮南、南唐，攻辽，官职一路飙升，由亲卫左第一军都指挥使做到了殿前都虞侯、殿前都指挥使。世宗死后，子柴宗训即位，石守信加领义成军节度使。在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时，石守信作为殿前司留京的最高长官，为兵变的内应，使赵匡胤的兵变部队得以顺利进城。

宋朝创建后，石守信位列六位主要开国元勋之首，升任侍卫马步军副指挥使，领归德军节度使。建隆元年(960)四月，昭义军(潞州)节度使李筠反宋，石守信被任为主帅率军进讨，并先后在长平(今属山西)、泽州(今晋城)南击败李筠军。后来赵匡胤御驾亲征，攻下泽州，泽、潞叛乱被荡平，石守信以功加同平章事为使相。同年九月，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在扬州发动叛乱，石守信再次受命出征。十一月，石守信率军攻破扬州城，李重进自焚而死，淮南遂平。

建隆三年(962)九月，石守信自己上表请求免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的军职，专任天平军节度使。开宝六年(973)，石守信升为侍中。太宗即位后，升为中书令并改任西京(洛阳)留守。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亲征北汉，起用宿将石守信督前军，高梁河大战中，宋军大败，宋太宗把责任推给诸将，责授崇信军节度使兼中书令，不久又进封石守信为卫国公。太平天兴九年六月，石守信去世，终年五十九岁。

石保兴，字光裔，本名保正，太祖取兴宗之意而改保兴，是石守信的长子。太祖曾召功臣之子询问他们对时事的看法，当时保兴年纪最小，却应对明白，太祖深以为奇，拜为如京使。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亲征北汉时，任御寨四面都巡检。李继迁侵宋时，保兴转为银、夏、

绥、府都巡检使。有一次保兴巡视罨子寨和黑水河一带，不觉到了山谷之中。西夏人知道后，派出数千骑兵，占据了险要之处，过河想要开战。保兴当时所带之兵不足两千，于是，他让持刀剑的士兵埋伏在岸边，等到敌兵渡河到一半的时候突起进攻，夏军不备，大败而逃，保兴又率军北追数十里。至道二年(996)，任延州(今陕西延安)都巡检兼署州事。真宗时，在与西夏的战争中立功，后历任知州。咸平五年(1002)，保兴病逝，时年五十八岁。

石保吉，字事占之，石守信的次子。他以荫补天平军衙内都指挥使。开宝五年(972)，娶太祖之女延庆公主，历任刺史、观察使、节度使。咸平二年(999)，真宗出巡河北，保吉受命任河北诸路行营都部署，屯定州(今河北正定)。景德元年(1004)十一月，辽军南侵，真宗御驾亲征至澶渊，石保吉和李继隆同为驾前排阵使。辽骑兵数万突然到达城下，保吉马未披甲，就充当前锋，飞驰向前，辽军只好撤退。二年，改镇安军节度使。大中祥符三年(1010)死，年五十八，谥庄武。

为什么说高怀德是“练习戎事”

高怀德(926～982)，字藏用，真定常山(今河北正定西南)人。他出身将门，祖父高思继，在唐末卢龙军(幽州)节度使刘仁恭帐下任中军都指挥使。父亲高行周历仕五朝，十余岁时即补入刘仁恭帐下，后唐时任节度使，后晋时任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后汉时为中书令，封齐王，后周时加守尚书令。

高怀德忠厚倜傥，有武勇。他青年时一直在父亲高行周幕府任牙校，后晋、后汉时皆领刺史衔。广顺二年(952)，高行周死。之后，高怀德被后周世宗召为东西班都指挥使，后又改铁骑都指挥使。显德元年(954)，世宗亲征抗击北汉入侵，高怀德任先锋都虞侯，高平之战后，以功迁铁骑右厢都指挥使，领果州团练使。后从世宗从征淮南，升为龙捷左厢都指挥指挥使。南唐将刘仁赡占据寿春，舒元占据紫金山，并以连珠寨为援，对抗后周部队。世宗派怀德率帐下亲信十几人去侦察敌军的营垒。怀德乘夜渡过淮水，天快亮的时候，敌人才发现并发动攻击，怀德以少击众，抓获他们的副将回来，并且把敌军的形势强弱侦察得一清二楚。世宗大为高兴，赐给他金带、银鞍勒马等以示奖励。有一天世宗

正在淮州城墙上骑马慢行观察敌军情况，突然看见一将奋力追击着很多的敌军，还夺回敌军的长矛，忙派左右问这将是谁，原来就是高怀德。于是把他召过来慰劳他，并许诺将来定要拜怀德为节度使。显德六年(959)六月，世宗死，恭帝即位。七月，高怀德任侍卫军都指挥使，领宁江国节度使，与石守信同时建节。

因陈桥兵变有功，宋朝创建后，高怀德位于“诩戴”功臣第二，仅次于石守信，移领义成军节度使，并升任殿前都副点检。赵匡胤把自己的妹妹燕国长公主嫁给了怀德，是开国功臣中第一个皇亲国戚。扬州李筠叛变时，高怀德任前军副都部署，在泽州大败北汉军，俘获了北汉河阳节度使范守图。李筠叛变平定后，高怀德以功改忠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开宝六年(973)，加同平章事为使相。太宗初年，升为侍中，太平兴国四年(979)从太宗灭北汉，改彰信军(曹州，今山东省定陶西南)节度使，封冀国公。七年(982)，改武胜军(邓州，今属河南)节度使。同年七月病死，终年五十七岁，追封渤海郡王，谥武穆。

高怀德出身将门，从小就练习打仗，不喜欢读书。他性格简单直率，不拘小节。还擅长音律，自作的曲子极其精妙。又喜欢打猎，三五天就要出去露宿打上一回猎，猎获的狐兔有好几百只。

为什么说赵普为相，“上视如左右手”

赵普虽是开国功臣，开国之初也实际承担着宰相的职责，但他直到干德二年(964)才真正做上宰相。此前四年，为了稳定政局，赵匡胤留用了后周的范质、王溥、魏仁浦为宰相。赵普由于原来的身份太低不断得到升迁从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做到了兵部侍郎、枢密副使，最后升到了枢密使，掌握了军事大权。干德二年范质、王溥和魏仁浦被同日罢相赵普取而代之被任命为新宰相。

史载，赵普拜相后，“上视如左右手，事无巨细，悉咨决焉”。赵匡胤经常会到功臣们的家里微服私访，为了防太祖突然到来而来不及接驾，赵普退朝后到家一般不敢换下朝服。平定二李后，十一月的一个雪夜，赵普心想这样的天气皇帝肯定不会外出的。谁知正想着，就听到敲门声，却是赵匡胤立在风雪之中。

不久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也来了。赵匡胤说：“我睡不着。一榻之外，都是他人家。所以来见你。”赵普问：“您有什么打算?”赵匡胤说：“欲收太原。”赵普沉默良久，方说：“太原(指当时的割据政权北汉)挡住了西北三面，我们一旦拿下，北方边患就要由我们一力承当。不如暂且留着它，等到咱们消灭了其他各国，这个弹丸之地，还能逃到哪儿去?”赵匡胤大笑，说：“我也正是此意。刚才不过是试试你罢了。”“雪夜访赵普”的故事表明了赵匡胤对赵普的信任，国家大事经常咨询他的意见。

这个由赵普协助定下的统一方略，被后人总结为“先南后北、先易后难”八个字。

建隆二年(961)的一天，太祖又问赵普为何自唐以来兵戈不息，帝王频换，并问国家长治久安之法。赵普说：“陛下问到这事，真是天地神人之福啊!那些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如今根治的办法，只要削夺兵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然安定。”后来，太祖按照赵普的建议，削弱节度使的特权，集中财权，又把地方的精兵全部抽调为禁军。

太祖对赵普的信任还有一件事可以一说。开宝六年(973)，吴越国主钱俶派人送了海产十瓶给赵普，恰巧太祖来到赵普府上，仓促之间赵普没能把瓶子藏起来。太祖看到瓶子，就问是什么东西。赵普答道：“是海产。”太祖笑着说：“这海产必定极佳。”命人打开一看，却是满满十瓶的瓜子金。赵普吓得惶恐顿首，说自己并不知底细。太祖大笑道：“但受之无防。他还以为国家大事都由你这个书生做主呢!”一笑之间就化解了一件可以问罪的大事。

宋太祖对赵普深为信任，让他独居相位达十年之久。赵普也尽心辅佐太祖扫平各诸侯国，统一天下，稳定了政局。然而，后来赵普颇有点独断专行，加上贪财好货，营邸店，夺民利，把柄不少。开宝六年(973)，太祖任薛居正和吕余庆为参政政事，分割赵普的相权。八月，赵普罢相，出知为河阳(孟州，今河南孟县南)三城节度使。

第十四章

赵匡胤黄袍加身赵匡胤真的是被部下“逼扶上马”的吗？他自己意图黄袍加身的动机到底有多少？

武夫的天下乱世是武人的天下，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当混乱的时期，当时武官当政，战乱频繁、生灵涂炭，百姓流离失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百姓，极度渴望统一，希望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后周世宗柴荣在位之时，锐意改革，着力于统一大业。然而柴荣英年早逝，留下七岁的儿子柴宗训即位，史称周恭帝，军事大权则掌握在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手中，朝廷内政外交大事则交由文官宰相范质和皇太后主持。

上天的启示周世宗驾崩次年，即公元960年元旦，正值后周君臣欢庆新春佳节之际，探马突然从北方送来紧急军事报告大辽联合北汉十余万人马，准备南下入侵。敌兵压境，情况危急，小皇帝幼不知事，皇太后束手无策，惶急之下，只有与文官出身、不谙边务的范质、王溥两位宰相商定。仓促之间，二人匆忙决定派遣赵匡胤率兵前去迎击。后周军队出发后走到开封东北40里的陈桥驿时天就黑了。赵臣胤下令让将士们就地安营扎寨，埋锅造饭。吃饭时，赵匡胤一反以往战前谨慎的常态多喝了几杯酒醉卧床上，似乎已经完全将辽兵大兵压境的事置于脑后了。此时，军中有个叫苗训的人，他精通天文，他与门徒夜观天象，这时天上也出现了奇怪赵匡胤像的景象，发现红日之下又有一日，两日共悬天上，四周黑光隐烁，经久不退。赵匡胤之弟赵光义与归德军掌书记赵普则带领一批将领吃过晚饭就秘密聚集到了赵光义的大帐中，赵普反复几次地说：“小皇帝年幼无知，我们拼死拼活为他打仗，到头来还不知落个什么下场呢!只要我们拥立赵点检作皇帝，大家就都是开国元勋，夺取江山后我们就可以永保富贵了!”此话说得一伙将领群情激昂。但是，赵光义却没表态，只是推诿着说：“我兄长自幼深明大义，万事以义字当先，他和柴荣有八拜之交，怎会忍心去夺小皇帝的宝座?”只听部将高怀德大声说道：“你下决心吧!只要决心下定，我有办法让点检穿上龙袍。”赵光义接着说：“这件事好像很难办，你如何来干这件事呢?”众人一听这话中

包含着赵光义同意拥兄为帝的意思，纷纷表示支持，赵普又与高怀德在旁密谋大事。

黄袍加身次日早，赵臣胤还未醒来，将士们就已围住赵匡胤的大帐，让赵光义进屋告知。赵匡胤惊醒后急忙出帐查看，一些将领上前说：“现在朝中无主，我们要点检做天子。”还不等赵匡胤回答，高怀德从赵普身后转过来，几步来到赵匡胤身后，二话没说就麻利地把一件黄袍披在了赵匡胤身上，众将士一起跪下山呼万岁，并将赵匡胤拉上坐骑。那些不明真相的士兵们一看自己的长官都跪下了，也纷纷放下手中武器跪在地上，口中喊起万岁来。

赵匡胤觉得不妥要取下黄袍，但被高怀德按住，赵匡胤无奈说道：“各位兄弟，你们自己贪图一时富贵，要立我为天子，这不是害我吗?如果你们真心让我当皇帝，需答应我几个条件，否则我宁死不从。”众将高呼：“愿听指挥。”赵匡胤说道：“我本是太后、恭帝的臣下，你们不得侵犯他们。朝中大臣，本都是我的同事，你们不得凌辱。朝廷的府库，百姓的家，你们也不得强扰侵犯。遵令者有重赏，谁若违犯，格杀勿论。”听到满意的答复后，赵匡胤立即整顿兵马掉头京师。

留守京师的大将石守信等人也是赵匡胤的心腹将领，他们早已在城内做好接应的准备，等赵匡胤的军队一到城外，石守信就下令大开城门迎接新皇帝。宰相范质、王溥等官员纷纷逃回各自家中，整个入城过程，果真纪律严明，不像五代时期其他朝代更换时纵城抢掠，丧失民心，赵匡胤的军队受到了人们的拥护。

赵匡胤进城后，登上明德门城楼，命令将士们各回营房，自己仍回原来公署。不一会儿，诸将拥着宰相范质等前来。见面后，赵匡胤流着眼泪说：“我违心从事，实在愧对天地，到了现在这个地步，真不知该如何是好?”范质一看赵匡胤的样子，马上想劝说他，但还来不及答话，将领罗彦环就按剑大叫：“国中无主，点检应做天子。”范质等朝臣相顾无言，迫于无奈，只好跪伏朝拜称臣。周恭帝年幼无知，皇太后一个妇人哪见过这种场面，只知哭泣。朝中百官见大势已去，只得请周恭帝禅位于赵匡胤。赵匡胤封周恭帝为王，尊符太后为周太后，然后请周恭帝与符太后住进西宫。

赵匡胤称帝的千古之谜是年正月，赵匡胤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建隆，国号称“宋”，赵匡胤即为宋太祖。

从上面叙述的“陈桥兵变”的整个过程来看，似乎赵匡胤当这个皇帝是情非得已，但是仔细看来赵匡胤在整个兵变过程中应付自如，适时适地，而且从种种迹象来看，赵匡胤的这次兵变可能是有预谋的，与五代其他几次兵变毫无区别，只是手段更为高明。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一“黄袍加身”的“黄袍”是早已准备好的，私藏皇袍的人在古代是要杀头的，如果不是预谋反叛，黄袍是从哪里来的呢?其二，宋太祖登基后，史书既没有记载关于辽兵入侵的任何结果，也没有记载北宋有否发兵制止辽兵入侵，辽的所谓攻袭一夜之间销声匿迹，岂不可疑?其三，宋太祖之母杜太后得知陈桥驿之夜，赵匡胤黄袍加身后，一点都不惊慌，不但不感到其欺君罔上，大逆不道，将使得全家被诛的悲惨结局，反而还称赞赵匡胤“一向有大志，现在果然如此”。

可见，赵匡胤谋权篡位之心早有，杜太后所说的“大志”，不是指当节度使而是当皇帝。所以赵匡胤真的是被部下“逼扶上马”的吗?他自己意图“黄袍加身”的动机到底有多少，这些问题随着昔人已逝，早已成为历史之谜了，后人只是妄加揣测罢了。

杯酒释兵权宋太祖收回地方将领的兵权以后，创建了新王朝。

朋友也不能分权太祖即位后不出半年，就有两个节度使起兵反对宋朝。宋太祖亲自出征，费了很大劲儿，才把他们平定。为了这件事，宋太祖心里总不大踏实。有一次，他单独找赵普谈话，问他说：“自从唐朝末年以来，换了五个朝代，没完没了地打仗，不知道死了多少老百姓。这到底是什么道理?”

赵普说：“道理很简单。国家混乱，毛病就出在藩镇权力太大。如果把兵权集中到朝廷，天下自然太平无事了。”宋太祖连连点头，赞赏赵普说得好。

后来，赵普又对宋太祖说：“禁军大将石守信、王审琦两人，兵权太大，还是把他们调离禁军为好。”

宋太祖说：“你放心，这两人是我的老朋友，不会反对我。”

赵普说：“我并不担心他们叛变。但是据我看，这两个人没有统帅的才能，管不住下面的将士。如有一日，下面的人闹起事来，只怕他们也身不由己呀!”宋太祖敲敲自己的额角说：“亏得你提醒一下。”

杯酒释兵权宴会背后的危险过了几天，宋太祖在宫里举行宴会，请石守信、王审琦等几位老将喝酒。

酒过几巡，宋太祖命令在旁侍候的太监退出。他拿起一杯酒，先请大家干了杯，说：“我要不是有你们帮助，也不会有现在这个地位。但是你们哪儿知道，做皇帝也有很大难处，还不如做个节度使自在。不瞒各位说，这一年来，我就没有一夜睡过安稳觉。”

石守信等人听了十分惊奇，连忙问这是什么缘故。宋太祖说：“这还不明白?皇帝这个位子，谁不眼红呀?”

石守信等听出话音来了。大家着了慌，跪在地上说：“陛下为什么说这样的话?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谁还敢对陛下三心二意?”

宋太祖摇摇头说：“对你们几位我还信不过?只怕你们的部下将士当中，有人贪图富贵，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想不干，能行吗?”石守信等听到这里，感到大祸临头，连连磕头，含着眼泪说：“我们都是粗人，没想到这一点，请陛下指引一条出路。”

宋太祖说：“我替你们着想，你们不如把兵权交出来，到地方上去做个闲官，买点田产住屋，给子孙留点家业，快快活活度个晚年。我和你们结为亲家，彼此毫无猜疑，不是更好吗?”石守信等齐声说：“陛下给我们想得太周到啦!”

酒席一散，大家各自回家。第二天上朝，每人都递上一份奏章，说自己年老多病，请求辞职。宋太祖马上照准，收回他们的兵权，赏给他们一大笔财物，打发他们到各地去做节度使。

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为“杯酒释兵权”。

收回地方将领的兵权过了一段时期，又有一些节度使到京城来朝见。宋太祖在御花园举行宴会。太祖说：“你们都是国家老臣，现在藩镇的事务那么繁忙，还要你们干这种苦差，我真过意不去!”

有个乖巧的节度使马上接口说：“我本来没什么功劳，留在这个位子上也不合适，希望陛下让我告老回乡。”

也有个节度使不知趣，唠唠叨叨地把自己的经历夸说了一番，说自己立过多少多少功劳。宋太祖听了，直皱眉头，说：“这都是陈年老账了，尽提它干什么?”

第二天，宋太祖把这些节度使的兵权全部解除了。

宋太祖收回地方将领的兵权以后，创建了新的军事制度，从地方军队挑选出精兵，编成禁军，由皇帝直接控制；各地行政长官也由朝廷委派。通过这些措施，新创建的北宋王朝开始稳定下来。宋太祖文武之道天下由马上得到，却不能在马上治国。

禁军身怀绝技公元960年，赵匡胤策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创建宋朝。他为确保宫廷安全，选精锐兵卒近万人组成禁卫军。他颇为重视这些士兵的能力训练，不时进行抽查测试。

一日，赵匡胤巡视水师，对侍卫人员说：“若池内有刺客潜藏，你们如何应付?”侍卫刘浩转身跃入水池，过了好大一会儿，才从水中钻出。高声回禀道：“启奏万岁，刺客已除。”赵匡胤对刘浩的忠诚和潜水能力很是赏识，当即予以厚赏。

随后，赵匡胤又指着五凤楼的楼角铜铃，问身边的禁卫军：“谁能取下那个铜铃?”有位侍卫挺身而出，“陛下稍候，卑职去取来。”说罢如猿攀树，灵巧地登上二楼房顶，摘下铜铃，奔回献给皇帝。整套动作干净利索，赵匡胤心中大喜，重重赏赐这名侍卫。由于他对禁卫军要求甚严，因而禁卫军个个身怀绝技，英勇善战。

重用儒臣宋太祖武人出身，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戎马生涯。然而当皇帝之后，很快又成了一个善于以文治国的政治家。

公元963年3月，太祖欲改年号，让重臣讨论，并指出："须求古来未尝有过的。"于是便改元为"干德"。

公元965年1月，宋灭后蜀，选了一个蜀国的宫女入宫。太祖在观赏其奁具时，忽然发现一个铜镜背面刻有"干德四年铸"五字，不由大惊道："我改元'干德'今刚三年，怎么会有四年铸此镜?"

于是，便召翰林学士陶谷、窦仪询问。窦仪答道："前蜀于公元919年，王衍曾用'干德'年号，故此镜必得自蜀地。"太祖听了疑云顿开，并从中领悟到："天下虽然由马上得之，却不能马上治之。今后武将，亦当使其读书，让他们懂得治国之道啊!"自此，太祖大重儒臣。

一江春水向东流小小让步，怎么能改变宋太祖统一中国的决心呢。

雪夜访赵普太祖稳定了内部，雄心勃勃，准备出兵统一全国。当时，五代时期的"十国"，留下来的北方有北汉，南方还有南唐，吴越、后蜀、南汉、南平等。要统一全国，该先从哪里下手呢?先打北汉，还是先打南方呢?宋太祖想了几天，还是决定不下来。

一天夜里，风雪交加。赵普正在家里烤火取暖，忽然听得门外一阵敲门声。赵普心里奇怪，这么寒冷的夜里，还有谁会来找他?他打开门一看，只见一个人披着斗篷，在雪地里站着。赵普定睛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来的竟是宋太祖。

赵普连忙把宋太祖请进屋里，拨红了炭火，在炭火上炖上肉，叫他老妻拿出酒来招待。

赵普问："雪下得这么大，陛下为什么还要出来?"

宋太祖说："我想起一件事，反正睡不着，就来找你商量一下。"

赵普想了一会，说："如果我们先打下北汉，就会受到辽朝的威胁。还不如先削平南方，回过头来再打北汉。小小北汉，不过像弹丸一样大，晚一点收十也跑不了。"

宋太祖笑着说："我们想到一起去了。"

宋太祖和赵普决定了先南后北的计划以后，约摸花了十年时间，先后出兵消灭了南平、后蜀、南汉。这样，南方的割据政权只留下南唐和吴越两国。

风花雪月的南唐后主南唐是“十国”中最大的一个割据政权，那里土地肥沃，没有像中原那样遭到战争的破坏，所以经济繁荣，国力富裕。但是，南唐的国主都是政治上十分昏庸无能的人，后来弄得国力渐渐衰弱下来。

最后的一个国主李煜，历史上称南唐后主，是一个著名的词人，对诗词、音乐、书画，十分精通，可就是不懂得处理国事。北宋建国后，李煜每年向北宋进贡大量金银财宝，想维持他的地位。

后来，他看到宋太祖接连消灭了周围三个小国，才着慌起来，赶快派使者给宋太祖送去一封信，表示愿意取消南唐国号，自己改称“江南国主”。但是这一点小小让步，怎么能改变宋太祖统一中国的决心呢。

毫不知道危险的后主公元974年9月，宋太祖派大将曹彬、潘美带领10万大军分水陆两路攻打南唐，很快就占领了池州(今安徽贵池)，进驻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潘美带领的步兵到了江北，被辽阔的江面挡住了进军的道路。

有人向宋军献计，如果用竹筏和大船搭成浮桥，步兵就可以全部顺利过江。潘美听了这个计策，马上赶造浮桥。

这个消息传到南唐的国都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南唐君臣正在喝酒。李后主问周围大臣该怎么办?大臣说：“自古以来，没听说搭浮桥过江的，一定办不成!”

后主听了，哈哈大笑说：“我早说他们是小孩子闹着玩罢了。”

过了三天，宋军搭好浮桥，潘美的步兵像在陆地上行军一样跨过长江；南唐的守将败的败，投降的投降。10万大军很快就打到金陵城边。

那时候，李后主还正在宫里跟一批和尚道士诵经讲道，宋军到了城

外，他还蒙在鼓里。有一天，他到城头上巡视，发现城外到处飘扬着宋军旗帜，这才大吃一惊，回宫后，派大臣徐铉到东京去求和。

“我的床上，容不得别人酣睡”

徐铉见了宋太祖说：“李煜待陛下，就像儿子待父亲一样孝顺，为什么还要讨伐他?”

宋太祖反问说：“那么你倒说说，父亲和儿子能分成两家吗?”

徐铉没话说，回到金陵向李后主回报。过了一个月，宋军围城越来越紧，李后主又派徐铉到东京去。

徐铉苦苦哀求宋太祖不要进攻金陵，宋太祖听得不耐烦，一手按住利剑，怒气冲冲地说：“你不要多说了。李煜并没有什么罪，但是现在天下一家，我的床边，怎么能让别人睡着打呼噜呢!”

徐铉眼看再哀求也没用，只好再回到金陵。李后主听了回报，知道求和没有希望，连忙调动驻守上江的15万大军来救。兵到皖口，受到宋军两路夹攻。南唐军放火烧宋军，哪知正碰到起北风，火反烧了自己，南唐军全军覆没。

问君能有几多愁曹彬派人进城告诉李后主，劝他趁早投降，免得城里百姓的生命财产遭到毁灭。后主还想拖下去，曹彬就下令攻城。第二天，城被攻破了。曹彬率领宋军整队进城秩序井然。李后主叫人在宫里堆了柴草，准备放火自杀，但是毕竟没有这个勇气。最后还是带着大臣出宫门，向曹彬投降。

李后主被押到东京，宋太祖对他还比较优待。但是李后主从一个尽情享乐的国君变成一个亡国的俘虏，心里十分辛酸，每天流着眼泪过日子。他本来是写词的能手，在这段时期里，写了一些感情忧伤的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就是他这段时期词作中的名句。

开明的皇帝赵匡胤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对自己所处的地位有如此清醒的认识确是难能可贵。

千里送貂裘公元964年11月，太祖赵匡胤下令兵分两路(凤州、归州)攻蜀。12月，宋将王全斌、崔彦所率一路到达风州，稍事整顿，即向后蜀发动进攻。兵马刚出凤州，便有一个京城使骑马赶来，王全斌以为朝中来了重要命令，急忙上前跪接，但使者递过来一个包袱。王全斌解开一看，原是一领紫貂，是太祖穿的。

王全斌不知其意，便问京使道："是陛下要来吗?"京使笑道："非也。"王全斌道："那为什么把陛下的衣帽送来了?"

京使道："将军有所不知，只因前几日京城下了一场大雪，陛下身穿此衣与众臣议事，忽对众大臣道：'朕着此紫貂，坐在殿上，尚觉寒冷，而攻蜀将士，现今正顶风冒雪，不是更冷吗?'陛下说着，便将此衣脱下，令我急急送来。且让我转告将军，紫貂只此一件，不能为全军将士御寒，只想略表陛下正时刻惦记着大家之心。"众将士听了京使一番言语，无不眼含泪花，感激涕零，面向京都方向，跪拜在地，高呼万岁。后来，宋军将士奋勇杀敌，从出兵到后蜀灭亡，先后只用了66天时间。

郭进治军北宋初年，将军郭进治军严整，奖惩分明，不徇私情，将士都很畏惧他。宋太祖知人善任，命他为洛州防御使。每次有士卒前往洛州戍边，宋太祖都警告他们："遵守军纪，否则，郭将军将严惩不怠。"有一位军校因受郭进的惩罚，心存怨恨，进京诬告郭进，宋太祖查明是诬陷郭进，就派人将那名军校押送回郭进营中，责令郭进严厉惩处他。

恰巧，北汉军队前来攻打郭进，郭进便对那名军校说："你胆敢去皇上那里诬告我，我的确很佩服你的胆量。这次暂不杀你，让你戴罪立功。功成我保举你做官，兵败你就自己投河自杀吧，不必再来见我。"

那名军校因大难不死，上阵后英勇异常，大败北汉军队。郭进立即上报他的功劳，奏请宋太祖恢复了他的官位。从此，郭进营中军纪更为严整。郭进善于治军用人的作法，被世人所称道。

教女崇尚节俭太祖赵匡胤即位灭蜀后，见蜀后主孟昶用的小便器具竟装饰七种珠宝，当即把它打碎，并叹道："他用七种宝石装饰便器，那么应该用什么器皿盛放食物?他这样的所作所为，不亡国才怪呢!"

他汲取后蜀亡国教训，在生活上很注意俭朴。他穿的衣服常常是洗过多次还在穿，乘坐的车子装饰也为素色，宫中帘帷也没有华丽的装饰，只用青布包边。

他有三个女儿，其中魏国公主，却爱穿戴打扮，常常穿着贴绣铺翠的短衣出入宫禁。有一次，公主又衣着华丽出入宫禁，被太祖看见了，立即命人将其叫入宫训道：“你把这件衣服脱下给我。从今以后，不许再穿这种服装。”

公主不以为然道：“只此一件衣服，能用多少翠羽?”

太祖道：“此话不对，这一件，是用不了多少，可你身为公主。你一穿，宫内宫外都会仿效，翠羽的价格就会升高，商贾为了追求利润，也会转价贩卖，伤生害民，这都是由你所造成的。你生于皇室，自当珍惜，岂能开此恶业之端?”

公主听了很受教育，当即将那件贴绣铺翠的衣服脱下交给父皇，表示改过。

又有一天，太祖与皇后、公主一起闲谈。皇后道：“你已做了天子，要长期使用轿子，难道还不能用黄金装饰一下吗?”

太祖笑道：“我身为天子，以四海之富，不用说用黄金装饰一下轿子，就是将整个宫殿用金子装饰，也不难办到。但我为天下之主，就应为天下守财，岂可妄用!古语道，‘以一人冶天下，不可以天下奉一人。’如果以天下奉一人，不仅天下人要背离你，且亡国之日也为期不远了!”皇后、公主听了都点头称是。赵匡胤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对自己所处的地位有如此清醒的认识，确是难能可贵。

赵普的功过是非宋太祖拜赵普为宰相，事无大小，都跟赵普商量。

半部《论语》治天下赵普出身小吏，比起一般文臣来，他的学问差得多。他当上宰相以后，宋太祖劝他多读点书。赵普每次回家，就关起房门，从书箱里取书，认真诵读。第二天上朝处理政事，总是十分敏快。后来，家里人发现，他的书籍里藏的不过是一部《论语》。于是人

们就流传一种说法，说赵普是靠“半部《论语》治天下”的。

赵普的软磨硬泡宋太祖信任赵普，赵普也敢于在宋太祖面前坚持自己意见。有一次，赵普向宋太祖推荐一个人做官，接连两天，宋太祖没有同意。第三天赵普上朝的时候，又送上奏章，坚持要求宋太祖同意他的推荐，这下可触怒了宋太祖。宋太祖把奏章撕成两半，扔在地上。

赵普趴在地上，不慌不忙地把扯碎的奏章十起来，放在袖子里。退朝回家以后，赵普把扯碎的奏章粘接起来，过了几天，又带着它上朝交给宋太祖。宋太祖见赵普态度这样坚决，只好接受了他的意见。再有一次，赵普要提拔一名官员，宋太祖不批准。赵普就像前次一样坚持自己意见。宋太祖说：“我就是不准，你能怎么样?”

赵普说：“提拔人才，都是为国家着想，陛下怎能凭个人的好恶专断!”宋太祖听了，气得脸色变白，一甩袖就往内宫走，赵普紧紧跟在后面。宋太祖进了内宫，赵普站在宫门外不走。

宫门前的卫士见宰相站在门口不走，只好向宋太祖回报。这时候宋太祖气已经平了，就叫太监通知他，说皇上已经同意他的请求，叫他回家。

海产原来是金子赵普做了十年宰相，权力很大。日子久了，就有人想走他的门路，不时有人给他送礼物来。

宋太祖经常到赵普家里去，事先也不派人通知。有一次，吴越王钱叔派个使者送信给赵普，还捎带了十坛“海产”。赵普把十坛。“海产”放在堂前，还没来得及拆信，正好宋太祖到了。

宋太祖在厅堂里坐下，看到这十只坛，就问赵普是什么东西。赵普回答说：“是吴越送来的海产。”

宋太祖笑着说：“既然是吴越送来的海产，一定不错，把它打开来看看吧!”

赵普吩咐仆人，打开坛盖，在场的人一看都傻了眼。原来坛里放的

不是什么海产，竟是一块块金子。

宋太祖向来怕官员接受贿赂，滥用权力，看到这情况，心里窝了一肚子火，脸色也就沉了下来。

赵普满头大汗，惶恐地向宋太祖请罪，说："臣没有看信，实在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请陛下恕罪。"

宋太祖冷冷地说："你就收下吧!他们以为国家大事都是由你们书生决定的呢。"

打这以后，宋太祖对赵普就有点猜疑起来。不久，又有官员告发赵普违反禁令，贩运木料。

原来，当时朝廷禁止私运秦、陇(今陕西、甘肃一带)大木。赵普曾经到那里运木料为自己造住宅。他的部下趁机冒用赵普名义，私运一批大木到东京贩卖。这件事牵连到赵普，宋太祖大怒，要治赵普的罪，尽管其他大臣为他说情，太祖还是撤了赵普的宰相职位。

为贞节而屈死的何芳子在古代，在女人的手臂上点上一颗鲜艳的红痣，用来验证女人们的贞操，这就是"守宫砂"。

"守宫"的缘由及流行"守宫"其实就是大家常见的壁虎。据说，古代人用瓦罐一类的东西把抓到的壁虎养起来，天天喂给它丹砂，吃到七斤丹砂的时候，就把它捣烂，用来点在女人的肢体上，只要没有发生性关系就终身不灭，一有性生活则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方法最早起源于礼教规范渐渐严格的宋代。

这种守宫砂据说非常灵验，但是却只能用在未结婚的女子身上，已婚妇女是不灵验的。在宋代由于这种方法刚刚开始流行，许多人并不了解其中的各种事项，结果闹出了许多笑话，也弄出了许多是非。

妙龄少女何芳子就是受了这"守宫砂"之累，成了这种习俗的受害者。

从千金到小妾何芳子本来是后蜀政权兰台令史何宣的女儿，宋朝灭

了后蜀，何宣因为不愿意投降宋朝。被宋军杀死，年幼的女儿何芳子一下子由一个养尊处优的官家小姐沦落民间，后来成了四川万县的一个土财主林宓的第五房小妾。这时她刚刚18岁。

宋朝的军队进入了四川以后，宋太祖赵匡胤下令选拔地方上的人才出仕为官。这个土财主林宓也用钱买了一个官职。按照规定，他必须到当时的首都汴京去朝见皇上，接受宋太祖的面试，等待任命。

林宓除结发妻子外，还有五位如花似玉的侍妾，最小的侍妾就是何芳子。何芳子是位千金小姐，人既长的秀丽端庄，读的书也很多，很有一股迷人的气质。在她的人生蓝图中是希望找到个如意郎君，比翼双飞，最终想不到却嫁给了一个比她大十几岁的乡间土财主，还要和一群庸脂俗粉天天争宠斗气。她本无意于这种无聊的争斗，但由于她年轻貌美，知书达礼，气质高贵，从来不掺和那些女人的争风吃错，反倒使得林宓天天黏着她，冷落了那些女人。于是那些女人就结成统一战线，处处与她为难。何芳子嫁给林宓以后不但没能过上比较安稳的日子，反而事事不如意，受了不少苦。

为一个“守宫砂”而死林宓这时准备动身前往汴京，家中的所有事物都已经交待妥当了，唯独对自己这些年轻貌美的侍妾放心不下。他的一个道人朋友就给他想了一个馊主意，从江湖术士的手上购买了一些守宫砂，如此这般地把用法交给了林宓。林宓听后如获至宝，回家之后一一亲自点在妻妾们的臂膀上。

轮到何芳子点守宫砂了，她心不甘情不愿地拒绝了这种近似屈辱的作法。她认为从一而终、守贞固节是女人理应遵守的本分，根本不必一定要有任何形式上的约束，倘若由于被迫而守贞实在没有什么意义。尽管何芳子振振有词，但就是秀才遇了兵，有理说不清。林宓怎么也听不进去，而那些不怀好意的妻妾们这时也莫不以怀疑的眼光看着何芳子，露出幸灾乐祸的神情。何芳子实在拗不过，只好在自己的手臂上也点上了那么一点红。

那些女人们自林宓离家之后，一个个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她们手臂上红豆般大小的守宫砂痣，不敢洗涤，不敢擦碰。何芳子却痛恨它，好像

那是涂在她身上的一个污点，她满不在乎，照样的沐浴洗涤，不久，守宫砂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一下，那些俗气十足的女人终于找到了攻击的借口，讽刺她、嘲笑她，甚至公开骂她偷人养汉，更有不辞辛劳的，夜夜躲在何芳子的窗下偷听，随时准备捉住淫妇奸夫，准备看看何芳子勾引的男人到底是谁。

半年以后，林宓已经奉派在汴京任职，就派人前往蜀地把一妻五妾一同接来京城。当天夜晚，林宓就迫不及待地在灯下一一检视妻妾们的守宫砂，当看到何芳子时，那带着得意笑容的脸顿时僵硬下来，一怒之下，当即就给了何芳子两记耳光，问她这是为什么?何芳子把头低着，脸上没有一点表情，牙齿紧紧地咬着嘴唇。

林宓火冒三丈，下令严刑拷打，何芳子自认不仅行动上没有越轨，就是感情上也不曾越轨，抵死不肯承认自己有什么情夫。那一记一记的鞭子，把何芳子希望的心一点一点地敲碎，她彻底绝望了，当晚留下一封血泪交织的遗书，自缢而死。

那个糊涂无情的林宓却以为何芳子是羞愧而死，对何芳子以死告白的遗书根本看也不看就撕成了碎片，草草地就把何芳子埋掉了事。

官府的介入林府死了个小妾的事，第二天便在开封沸沸扬扬地传播开来。以往林宓在万县财大势大，打死一名奴仆或冤死一个侍妾，只要花些银子，摆平家属和各种关系人，便可不了了之，然而现在却是在天子脚下的汴京城，这个人命关天的大事可就非同小可了。主管京城治安的开封府听到消息，立即加以侦察，第一步就是开棺验尸，结果发现何芳子皮开肉绽，全身都是鞭打的伤痕。

接着就是提林宓前来审问，林宓无法隐瞒，只好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经过讲出来。于是，判官用林宓所剩下的朱砂，点染在三名妇人臂上，然后把一条活壁虎放在其中一人的手臂上，瞬间就把那些守宫砂舔得干净净了。事实上，守宫砂点在处女的手臂上，经过数日不加洗涤，就可以深入皮下，再经擦拭或洗涤都不会抹去，而且愈见鲜艳，但一经房事，颜色就自行褪去，但是对于已经成婚的女性来说守宫砂就毫无用处，何芳子是受了莫大的冤枉。开封府尹判何芳子是清白的，林宓则因

为滥用私刑，逼死侍妾，被免去官职，并加以重罚。

后来，这件案子闹得很大，连中央专管刑狱的大理寺也启动了，就在大理寺准备重判的时候，林宓神秘地死去，那个给他提供守宫砂的道人也投湖自杀了。

当时听说了这件事的人们都非常同情何芳子的遭遇，可怜她含冤蒙屈地死在异乡，于是就有人发起建了一座“贞女庙”。这座庙自宋代到现在，历代加以重修，千年以后，至今河南开封城南仍有此庙，人们也叫它“守宫庙”，意思是纪念这个千年以前因为“守宫砂”而冤死的无辜女子。

宋太祖的死亡之谜宋太祖赵匡胤死因蹊跷，宋太宗赵光义又弟继兄位，有悖常理。两者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

多年前认识的道士传说太祖还没有做皇帝的时候，曾经和太宗与一位道士游历关河。这位道士是个奇人，他没有姓名，身世也不太清楚，可是却有一项绝活变金之术。他们三人一同交游，每次没有银两时，就见他从自己随手携带的空袋中掏，一掏准能掏出金子，要多少就有多少，十分神奇。太祖、太宗与这道士都爱饮酒，有一天仨人再次喝得醉醺醺，那个奇怪的道士唱起了《步虚》曲，冥冥之中赵氏兄弟听到了那么奇怪的一两句话，当下两兄弟就觉得奇怪，可旁边的人却说连道士大声唱歌都没有听见。等到赵氏兄弟俩酒醒再问，道士却矢口否认，说什么都没有说。后来等到赵匡胤登基称帝那日，正是猴年正月初四，应验道士所说的那句话，太祖勐然惊觉，遂下诏全国找寻这位道士，然而斯人已去，音信全无，道士隐身不拜。

雪夜的烛光斧影直到宋太祖登基16年后，一日太祖祭祀完毕回宫途中，忽见道士醉卧在道边树荫下，笑着向太祖问安。太祖急忙命人将道士请至皇宫后殿，又担心他逃走，匆匆上朝完毕即从前殿回来见他。两人像以前同游关河一样，畅饮纵谈，太祖盛情款待，令道士住在后花苑。守苑的官吏见他天天住在树梢的鸟巢中，行为也很是怪异，几天之后竟神不知鬼不觉地不见了踪影。太祖牢记道士所说过的话，到十月二十日夜间，登上太清阁观察天气。起先天气晴朗，太祖心中一阵暗喜。可是不久天气陡变，风卷残云，雪雹骤降。太祖叹气，移步下阁，当夜

即召见赵光义。回到寝宫，太祖遣散宦官和宫妾，只留赵光义，两兄弟对饮畅淡。两人谈话内容现已不得而知，只是宦官宫女在远处依稀望见烛光之下，赵光义时而避席，似乎不胜酒力。饮罢酒，已是深夜，殿前的积雪已有数寸，太祖拿着斧子砍殿前的雪，还回头向赵光义说着话，而后便悄无声息。这一夜，后来成为宋太宗的赵光义留宿禁宫之中。而到天明之时，人们发现太祖早已驾崩，赵光义于灵柩前受遗诏继位。

关于太祖之死的种种疑点第二，赵匡胤临终交待后事，赵光义灵柩前即位，这些都是朝廷中的头等大事，本来应当在官修史书《国史》和《实录》中提到，可是太宗朝在修《国史》与实录时为什么却未记载太祖遗嘱，对于太宗即位更是没有提到一个字。另外，据各种文献所载，赵光义在其他场合，对这件事也是闭口不谈。这些都给后人留下了疑惑。

赵光义第二，赵匡胤身患重病，到了生命垂危才急召赵光义入宫受命是有疑惑的。史料记载，赵匡胤患病时间较长，他应当提早处理传位的问题，对于相关问题也一定会早有安排，为何要等到病情危急时才召见晋王受命。还有正史中说既然是临终遗嘱，那必定病得很重了，为何又在召见晋王时能饮酒，举斧戮雪呢?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蹊跷。

第三，对于这样一个病危的皇帝，手下人自然应当寸步不离地守在皇帝身边，可是从十月二十日晚赵光义入宫，直到次日太祖去世，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内，皇帝的身边竟然没有一个人，这实在是太不合情理的事情。就是赵匡胤向赵光义交待后事应当屏退左右，但是难道英明的宋太祖赵匡胤竟会愚蠢到如此地步，让赵光义既充当遗嘱受命的当事人，又充当遗嘱受命的见证人，以至于自毁遗嘱的权威性吗?

第四，赵匡胤曾召赵光义入宫受命，可是正史记载宋皇后却在赵匡胤临终前派宦官王承恩火速召德芳入宫，看到赵光义到来又惊愕地说不出话来，这些都说明赵光义在太祖临终受遗嘱丝毫无根据。更令人怀疑的是，给太祖看病的医官程玄德竟然在太祖驾崩的当天凌晨守在开封府门口，随同赵光义一同入宫。如果不是事先知道，这个医官又怎么会到开封府门口等着赵光义呢?(当时赵光义任开封府知府)而后来程玄德在赵光义手下很是得宠，这又说明什么呢?

种种迹象都表明，赵匡胤不明不白的死亡与赵光义篡位有着直接的联系，很可能赵匡胤就是死于亲兄弟赵光义的谋杀。

第十五章

宋太宗是一介武夫吗宋太祖是武人出身，宋太宗是否也是只知南征北战的一介武夫呢？

弃武尚文的风雅之人宋太宗继位之初，使用政治压力，逼迫吴越王钱俶和割据漳、泉二州的陈洪进纳土归附，又亲征太原，灭掉北汉，可说是有些战功战绩，但是他在与辽朝及党项拓拔部势力这些强敌对抗的过程中，却屡战屡败，战功并不显著，可见宗太祖并不是一名能指挥大军的指挥家、军事家。

其实之所以说太宗不是一个武将，还因为在宋太宗统治期间，实行了弃武尚文的统治政策，大量任用文官主持政务。另外，其本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并非粗俗武夫，还是一个真正的附庸风雅的人呢。

对《太平御览》情有独钟宋太宗从幼年开始，业余爱好与兴趣首先就是读书。他的父亲赵弘殷总兵江南的时候，每当攻破州县，必定到处搜寻古籍供他学习，并且时时激励他，即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读书从未有间断的时候。那时书籍和书袋成为赵光义的随身之宝。太宗即位之后虽然政事繁多，却仍然不改初衷，像以往一样喜爱读书。他曾经对身边近臣说："朕没有别的爱好，只是喜欢读书，想从中知道古今成败的道理，好的加以采纳，不好的引以为戒。"他尤其对《太平御览》情有独钟。《太平御览》这本书多达1000卷，他决心发奋每日读三卷，争取一年内通读一遍，于是命史馆每日进呈三卷，昼夜苦读，到天明时才小睡一会儿就去上朝。到了天寒日短之时，每日读三卷，宰相等考虑到如此读书容易使身体受到伤害，就劝告宋太宗不要把时间抓得太紧，宋太宗却说："朕天性喜好读书，开卷有益啊，这不会损伤我的身体的。好学之士读万卷书都不当回事，这千卷书又何足挂齿呢。大凡读书应该发自内心喜欢。如果不是这样，读也不会真正读进去的，白白浪费时间。"

于是太宗仍旧坚持不懈，终于用一年时间读完了《太平御览》这部巨著。宋太宗读书范围甚广。各门各类的书无不涉略，还常常加以评论，另外将其中有益于治，太宗读书学以致用，并不死读书，不仅将其

心得用于治理国家，还大规模地开科取士，所以得到了很多优秀的人才，像吕蒙正、寇正等名臣都是北宋初期录取的进士，他们后来都成了太宗的得利助手。在读书过程中，他的文才不断增长，常与群臣诗文唱和，有时是消遣之用，有时是歌功颂德，这在宋太祖时是没有的。在平定北汉后，宋太宗就作了《平晋诗》要求随从的大臣们唱和。到了春天万物复苏，冬天大雪初降之时，宋太宗都多次与臣下唱和作诗。宋太宗还曾将自己写的诗文编成《御制诗文》41卷，收藏于宫中书库，其诗作已达到了一定的艺术水平。

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读书写诗之余，宋太宗还苦练书法，精通草、行、飞白、篆、籍、八分书，在书法上具有很高造诣，被列入宋代著名书法家之列。其书法遗迹也被选入供人临摹的碑帖之中。他对近臣说：“朕君临天下，为什么非得喜欢书法?只不过从内心喜欢，不能舍弃。”即位后，他还经常观摩古碑刻，向古人学习，常向吕文仲请教书法历史问题和笔法问题。

王着是当时的书法名家，宋太宗曾派侍臣王仁睿把自己的作品拿给他看，王着看完，淡淡地说：“未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太宗知道后，更加勤奋练习，又过了一段时间，再派侍臣王仁睿给王着看自己的作品，王着回答仍与前次一样，王仁睿责问王着是否藐视宋太宗书法时，王着笑着回答说：“帝王开始练习书法就称赞他写得不错，以后就不留心了。”

太宗还是个围棋高手，他曾自创围棋三势，一叫“独天飞鹅势”，一叫“对面千里势”，一叫“大海取明珠势”，他亲自讲解给内侍裴愈，然后派裴愈讲给众学士，众人无不佩服太宗这三势的高妙。他在围棋小小的黑白世界中，运筹帷幄，纵横捭阖，显示出了作为一代帝王驾驭全局的才干。当时著名的围棋国手，像杨希紫、蒋元吉都无法与太宗对抗。太宗嗜围棋，与人对奕绞尽脑汁，不知疲倦，许多大臣就劝他注意身体，可太宗却说：“朕不是不知道，只不过借此躲避六宫诱惑，众爱卿不必多言。”

宋太宗喜好读书、热爱诗文、挚爱书法、围棋，而又不讲奢靡，不讲淫乐，其中无不包含着一种弃武尚文统治政策的转变，“尚文”正是太

宗不同于一介武夫之处。

杨无敌杨业痛杀辽兵，威名远扬。得了一个外号杨无敌。

杨业奉命扼守雁门关宋太祖花了13年工夫，灭了南方五国，接着，就出兵攻打北汉都城太原。北汉请辽朝出兵援助，宋军吃了败仗。不久，宋太祖也得病死去，他的弟弟赵光义继承皇位。这就是宋太宗。

杨业宋太宗决心完成统一北方的事业，公元979年，他亲自率领四路大军围攻北汉都城太原。辽军又来援助，宋太宗派兵截断援兵要道。太原城在宋军重重包围之中，外无援兵，内无粮草，北汉国主刘继元没法，只好投降。刘继元手下有一名老将杨业，也归降大宋。打那以后，辽军不断袭击宋朝边境。宋太宗十分担心，就派杨业为代州刺史，扼守雁门关。

雁门关大捷公元980年，辽朝派了10万大军攻打雁门关。那时候，杨业手下只有几千人马，兵力相差很大。杨业是个有经验的老将，知道靠硬拼是不行的，就把大部分人马留在代州，自己带领几百名骑兵，悄悄地从小路绕到雁门关北面敌人后方。辽兵向南进军，一路上没遇到抵抗，正在得意。忽然，后面响起一片喊杀声，只见烟尘滚滚，一支骑兵从背后杀来，像勐虎冲进羊群一样，乱砍勐杀。辽兵毫无防备，又弄不清后面来了多少人马，个个心惊胆战，阵容大乱，哪儿还抵挡得了，纷纷向北逃窜。杨业带兵追赶上去，杀伤大批辽兵，还杀死了一名辽朝贵族，活捉了一员辽将。

雁门关大捷以后，杨业威名远扬。辽兵一看到“杨”字旗号，就吓得不敢交锋。人们给杨业起了个外号，叫做“杨无敌”。

宋太祖对杨业充分信任杨业立下大功，也引起一些边防将领的妒嫉。有人给宋太宗上奏章，说了杨业许多坏话。宋太宗正要依靠杨业，不理睬那些诬告，把那些奏章封好了，派人送给杨业。杨业见宋太宗这样信任他，自然十分感动。

知道自己走上了一条死路过了几年，辽景宗耶律贤死去，即位的辽圣宗耶律隆绪才12岁，由他的母亲萧太后执政。有个边将向宋太宗上奏

章，认为辽朝政局变动，正好趁这个机会收复燕云十六州失地。宋太宗接受了这个意见。公元986年，宋太宗派出曹彬、田重进、潘美率领三路大军北伐，并且派杨业做潘美的副将。

三路大军分路进攻，旗开得胜。潘美、杨业的一路人马出了雁门关，很快就收复了四个州。但是曹彬率领的主力因为孤军深入，后来被辽军杀得大败。宋太宗赶快命令各路宋军撤退。

潘美、杨业接到命令，就领兵掩护四个州的百姓撤退到狼牙村。那时候，辽军已经占领寰州(今山西朔县东)，兵势很勐。杨业建议派兵佯攻，吸引住辽军主力，并且派精兵埋伏在退路的要道，掩护军民撤退。

监军王侁反对杨业的意见，说："我们带了几万精兵，还怕他们?我看我们只管沿着雁门大路，大张旗鼓地行军，也好让敌人见了害怕。"

杨业说："现在敌强我弱，这样干一定要失败。"王侁带着嘲笑的口吻说："杨将军不是号称无敌吗?现在在敌人面前畏缩不战，是不是另有打算?"

这一句话把杨业激怒了。他说："我并不是怕死，只是看到现在时机不利，怕让兵士们白白丧命。你们一定要打，我可以打头阵。"

主将潘美也支持王侁的主张。杨业无可奈何，只好带领手下人马出发了。临走的时候，他流着眼泪对潘美说："这个仗肯定要失败。我本来想看准时机，痛击敌人，报答国家。现在大家责备我避敌，我不得不先死。"

接着，他指着前面的陈家峪(今山西朔县南)对潘美说："希望你们在这个谷口两侧，埋伏好步兵和弓弩手。我兵败之后，退到这里，你们带兵接应，两面夹击，也许有转败为胜的希望。"

杨业出兵没有多远，果然遭到辽军的伏击。杨业虽然英勇，但是辽兵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杨业拼杀了一阵，抵挡不住，只好一边打一边后退，把辽军引向陈家峪。到了陈家峪，正是太阳下山的时候。杨业退到谷口，只见两边静悄悄，连宋军的影都没有。潘美带领的主力到哪儿去

了呢?原来杨业走了以后，潘美也曾经把人马带到陈家峪。等了一天，听不到杨业的消息，王侁认为一定是辽兵退了。他怕让杨业抢了头功，催促潘美把伏兵撤去，离开了陈家峪等到他们听到杨业兵败，又往另外一条小道逃跑了。

杨业见约定的地点没人接应，气得直跺脚，只好带领部下转身跟追上来的辽兵展开搏斗，兵士们个个奋勇抵抗。

但是辽军越来越多，到了后来，杨业身边只有一百多个兵士。他含着泪，高声向兵士说：“你们都有自己的父母家小，不要跟我一起死在这里，赶快突围出去，也好让朝廷得知我们的情况。”

兵士们听了这些话，再看看杨业浴血奋战的情景，感动得都流下热泪，没有一个愿意离开杨业。最后，兵士都战死了，杨业的儿子杨延玉和部将王贵也牺牲了。

杨业身上受了十几处伤，浑身是血，还来回冲杀，杀伤了几百名敌人。不料一支箭飞来，正射中他的战马，马倒在地下，把他摔了下来。辽兵乘机围了上来，把他俘虏了。

誓死不降杨业被俘以后，辽将劝他投降。他抬起头叹了口气说：“我杨业本来想消灭敌人，报答国家。没想到被奸臣陷害，落得全军覆没。哪还有脸活在世上呢?”他在辽营里，绝食了三天三夜，就牺牲了。

杨业战死的消息传到东京，朝廷上下都为他哀痛叹息。宋太宗丧失了一名勇将，自然也感到难过，把潘美降职处分，王侁革职查办。

千古流芳杨家将杨业死后，他的后代继承他父亲的事业，儿子杨延昭、孙子杨文广在保卫宋朝边境的战争中都立了功。他们一家的英勇事迹受到人们的传诵和赞美，民间流传的杨家将故事，就是根据他们的事迹发展起来的。

杨门女将在杨家将中，不仅男子英勇善战，而且女子也是巾帼不让须眉。

精通武艺的畲老太君畲老太君，原名畲赛花，是杨业之妻，杨府的老祖宗。后代在戏曲中演她百岁高龄，在面临辽兵入侵宋境，仍能挂帅领兵，赶走辽兵，实在是让人敬佩。但是很多相关史料却不见记载有畲老太君的事迹，这不禁让人们产生疑问：究竟畲老太君有没有挂帅领兵?甚至有人发出疑问：究竟历史上是否真有畲老太君其人?

有学者经过考证，历史上确实存在畲老太君其人，不过畲老太君不姓畲，她本姓折，后人讹传，所以就改成了畲姓。杨业年轻时，在离石、临县一带的七星庙驻防，迎娶了府州折家的女儿。折家屡世居住在陕西府谷，从折氏曾祖以来，世袭军职，多次参加抗辽战争，而杨家也是世居此地，代代习武，两家正所谓是门当户对，天作之合。那么畲老太君的称谓又是怎么来的呢?按照宋制，凡是有功之臣的妻、母都要有所封赠，以示奖励。宋太祖赵匡胤当初建制之时，就下诏制定文武群臣母妻的封号，其中庶子、少卿、刺史等的母亲封为县太君，妻子封为县君。而折氏的儿子如杨延昭等，位居刺史之上，他母亲应受封为某县太君的，所以后来人们就叫她畲老太君了。

折太君精通武艺，善骑射，训练以婢仆为主的家兵，上阵打仗，助夫立功，但是对于杨门这样的习武家庭而言，这本是平常的事情，所以没有为折太君立传也不足为奇。

穆桂英是否存在杨门女将中除畲老太君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受人瞩目的女将，就是穆桂英。戏曲中多次讲穆桂英领兵挂帅，充当大将，频频扭转战局，说的是玄之又玄，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像穆桂英这样一位颇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在正史中也未有记载，既然曾拜大将，又曾力挽狂澜，为何死后却默无声息?对此，后人十分不解。

既然正史没有记载，不少人就对穆桂英本人的存在提出了质疑，认为是戏曲中的虚构人物，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传说穆桂英是杨延昭之子杨宗保的妻子，她敢做敢为，性格开朗，坚持女性独立，婚姻自由，当初杨宗保不同意与她结婚，穆桂英拿出刀来架在杨宗保脖子上逼其成婚，最终二人也是美满幸福。

穆桂英生为巾帼，不让须眉，过门不久就领兵挂帅，年过半百还跨

马领兵，她被塑造成一位内外有度，勇敢有为的巾帼英雄。但由于在史料上找不到记载，人们认为她是虚构的人物，甚至有人提出观点说不仅穆桂英是虚构的，而且杨宗保这人在历史上压根就不存在。也有人说穆桂英这个人是虚构的，但却可以从杨氏的眷属中找到原形。杨延昭的儿子杨文广有位堂兄叫杨琪，此人曾娶慕容氏为妻，而穆桂英的姓也许是“慕容”氏的转音，“桂英”也只是民间通俗的名字，戏曲小说本就允许改编，这样以慕容氏为原形在的穆桂英这一形象就很快流传开来。况且，慕容氏是当时鲜卑大族，也是世代习武，与杨家通婚也是不无可能，不过终归猜测，没有真凭实据。

民间的千古佳话有些人则认为关于杨门女将的真相如何，并没有任何史料加以对证，而民间传说出于褒善抑恶的传统观念，逐渐塑造而创造出了像畲老太君、穆桂英这样内涵丰富的艺术形象。但是艺术与史实并未完全脱节，对于这些艺术形象加以细察，还是可以找出一些史实影子的。就说传统戏曲中穆桂英大破天门阵那回，穆桂英率军大破敌兵，让宋朝子孙扬眉吐气。然而历史上却是南宋将领折可求在天门关与金兵激战，大败后许多人仓皇南逃，兵败如山倒，宋朝河山损失无数，许多人背井离乡，饱受战败的恐惧。为彻底抹掉战争阴影，话本小说的作者将此事巧妙移到穆桂英身上，由大败变为大胜，在心理上寻求了安慰和平衡。

众所周知，传说中的杨家将故事，多是以小说和戏曲演唱等艺术形式流传下来的，中间加上了无数人的艺术加工和改编。不过尽管有些情节与人物史书没有记载，也没有真凭实据，但杨家将的故事主体是事有源流的。杨门九代精彩而又悲壮的故事代代流传，经久不衰，受到了社会各层的广泛喜爱。

吕端大事不煳涂小事煳涂得要命大事却毫不含煳，这就是真正能救国的贤人。

不会处理家事的宰相吕端，字易直，北宋幽州(今北京市)人，他是北宋初年有名的大臣，人们都说他“小事煳涂得要命，大事却毫不含煳”，他的做法为后世很多人效仿。

宋太祖后期，赵普做宰相时，吕端已经做到副宰相，地位显赫，权势很大。吕端虽然身为朝廷一品，但是却从不关心财产积蓄的事情，甚至连家事也不过问。做官十几年里，吕端的家中没有添置任何财产，生活还常常十分窘迫。有时，吕端刚刚领到一些俸禄，路上碰到穷人，马上就施舍给他们了，自己分文不留。一次，吕端的妻子告诉吕端家中的粮食只够吃三天了，要他快点想些办法，他却满不在乎地说；“先过了这三天，再想办法吧?”气得他的妻子直骂他烟涂。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家事烟涂的人，宰相赵普却说他很有才能，赵普在世时就经常对宋太宗说：“吕端为人沉稳有度量，受到陛下的表扬时，不喜形于色，在朝廷上碰了钉子时，也不发愁。有做宰相的才能，臣百年之后，请陛下一定要任用他为宰相。”太宗听到后有些诧异，因为他一向对吕端可没有什么好印象，于是就对吕端暗暗观察。经过全面了解之后，宋太宗就在至道元年四月提出，任命吕端为宰相。

但是，马上有官员极力反对说：“吕端为人烟涂懦弱，家事都处理不好，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

太宗这时已经胸有成竹，再加上老宰相在位时就曾竭力推荐过他，所以还是决定任命他为宰相，太宗说：“吕端小事烟涂，大事不烟涂。”这就是“吕端大事不烟涂”的出处。

效仿曹操收徐庶吕端升任宰相后，果然对于国家大事一点都不含烟，兢兢业业，每一件事都做得无可挑剔，让大家心服口服，成为太宗皇帝的得力助手。

宋太宗时，集中全力意图收回幽云地区，和辽国频繁地发生战争。西夏国首领李继迁总是趁火打劫，经常率兵侵犯宋朝的西北地区，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之后，宋朝的军队俘虏了李继迁的母亲。寇准向太宗建议把她就地斩杀，以儆效尤。当吕端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进宫上奏，反对杀李继迁的母亲。他对太宗说：“西夏并非礼仪之邦，孝顺不孝顺也许看得并不是很重；况且李继迁并非等闲之辈，那些意图要干一番大事业的人，在关键时刻是不会考虑父母安危的。汉刘邦和项羽交战时，刘太公被项羽俘获，项羽威胁说要把刘太公煮了吃，刘邦不是还要向项羽分一杯羹吗!我朝的敌人是辽国，对于西夏我们要有适当的拉拢。杀了李继

迁的母亲只会加重他对我朝的仇恨之心，对我们是没有任何益处的。”

太宗认为言之有理，就问他怎样才能较好地处理这件事。吕端回答说：“最好仿效三国时曹操对徐庶母亲的做法，把李继迁的母亲软禁在延州(今陕西延安)，安排给她舒舒服服的生活，再加以劝慰，让她捎信给李继迁，或许能让他不战而降。即使他不来投降，也可能会惦记他的母亲还活着，不会经常大规模地向内地进攻了。”太宗于是下令按吕端的建议执行。后来李继迁确实收敛了很多，不再经常骚扰宋境了，他死后，他的独生子归顺了宋朝。

辅佐太子登基另外在宋太宗晚年病重时，政局稍微有些混乱，人心也是惶惶不安。吕端作为宰相，主持大局，严谨稳当。那时皇后不喜欢太子，便和宦官王继思谋划，企图采取计策，更换太子，控制朝政。吕端察觉此事后，不加声张，暗自布置了防范措施，以防有变。吕端在太宗病重期间，让太子日夜守护在病床前照顾太宗，寸步不离左右。粉碎了皇后和王继恩等人意图在太宗神志不清时进谗言废太子的诡计，同时，吕端还设计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了太监王继恩，使这些有反叛之心的人群龙无首。

直到太宗死后，真宗即位，吕端还亲自上殿，仔细辨认一番，确信真宗坐在龙椅宝座上后，吕端这才率领文武大臣下拜，确定君臣名分。皇后对此也是毫无办法，因为吕端的措施实在是无懈可击。吕端的“大事不糊涂”使得真宗顺利即位，得以避免了一场大的宫廷政变。为此人们心服口服，纷纷称赞吕端办事谨慎，是国之栋梁。后人有诗赞叹：“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宋初的农民起义宋初发生的大规模农民起义，险些断送了宋朝的几百年基业。

茶叶商的末路川蜀地区在五代时期，曾经先后创建过前蜀、后蜀两个政权，因为远离中原，地处偏僻，反而幸运地避免了各政权之间的争斗，长期没有遭到战争的破坏。因此，到了后蜀时期，国家的粮库积贮得满满的，人民十分富足。但是宋太祖灭了后蜀以后，有一段时间纵容将士在成都四处抢掠，还把后蜀贮积的财富运往东京，激起了当地百姓

们的愤恨。到了宋太宗的时候，朝廷更加变本加厉，又在那里设立衙门，垄断买卖。曾经是当地主要经济来源的蜀地出产的茶叶、丝帛，先后都被官府垄断了。一些地主和大商人也都趁机囤积居奇，贱买贵卖。这样一来，蜀地百姓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当时，四川的青城县(今四川灌县西南)有个农民叫王小波，他和他妻子的弟弟李顺，都是靠贩卖茶叶谋生的。官府禁止私卖茶叶后，王小波被断了生路，实在没有办法讨生活了，于是就决心铤而走险，发动起义。

并不正规的起义军公元993年，王小波聚集了一百多个茶农和贫民，跟他们说：“如今这个世道，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实在太不公平了。现在，我们一起来消灭这种不平均的现象，你们说怎么样?”这些茶农和贫民平时受够了官府、富人的剥削，听了王小波的话，都表示热烈拥护，还推举王小波作了起义军的领袖。消息一传开，临近各地的贫民都纷纷来投奔王小波的起义军，不出十天，就集中了几万人马。这些人平日里饱受欺凌，现在一个个摩拳擦掌，都准备和朝廷大干一场。

王小波有了人马，先打下了青城县。接着，又乘胜攻打彭山(今四川彭山)。彭山的县官齐元振是个刁钻狠毒的贪官。宋太宗为了禁止地方官员贪污，有一次，派钦差到蜀地调查。齐元振提前听说了钦差要来，就把贪污得来的财物分散藏在富商家里。钦差到了彭山县，查不出那里的官员有贪污行为，就煳里煳涂地回去向朝廷回报，朝廷于是下令嘉奖齐元振清白能干。从此以后，齐元振变得更加贪婪无度了，对百姓搜刮得更厉害。王小波知道彭山的百姓对齐元振怨恨最深，就带起义军攻打彭山。在彭山百姓的里应外合之下，起义军很快占领了县城，杀死了大贪官齐元振，把他平日从百姓那里搜刮得来的钱财，全都分给那里的贫苦百姓。然后，王小波又带兵北上，向江原(今四川崇庆东南)进攻。驻守江原的宋将发兵反击，双方在江原城外展开了一场大战。

王小波的起义军虽然不是什么正规的军队，也没有得手的武器，但是大家的士气十分高昂，打得十分英勇顽强。到了最后，宋将实在招架不了，眼看朝廷的军队就要崩溃了。但不幸的是，在一片混战中，王小

波没有防备，被一支冷箭射中了前额。他不顾满脸鲜血，继续进攻，终于打败宋军，把宋将杀了。起义军的队伍胜利地进占了江原，王小波却因为伤势太重死去了。

起义军创建政权王小波一死，起义将士又推举他的妻弟、起义早期的领导人李顺做了首领，继续带领大家反抗官军。

在李顺的指挥下，起义军越聚越多，连续攻下许多城池，杀死了一大批贪官污吏，最后终于攻取了蜀地的中心成都。成都的文武官员抵挡不住，全都逃跑了。

公元994年正月，李顺在军民的拥护下，创建了大蜀政权，李顺当了大蜀王。他一面整顿人马，一面继续派兵攻占州县，四川境内到处都是起义军的势力。

四川农民叛乱的消息传到了东京，宋太宗大吃一惊，赶快召集宰相商量镇压农民起义，下令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里消灭起义军。

宦官出兵宋太宗派了宦官王继恩为剑南四川治安使，前往镇压。王继恩分兵两路，派人从东面堵住巫峡的起义军，自己率领大军向剑门进发。

剑门关正是四川通向关中的要道。李顺占领成都之后，也派将领进攻剑门，但是剑门的地势易守难攻，驻守的官兵也都是精兵强将，李顺派去的军队不幸遭到官军阻击，打了败仗。因为剑门仍然握在朝廷的手里，王继恩就得以顺利地通过了剑门，集合各地宋军，形成了对四川一省的合围之势，并且开始派兵进攻成都。

那时候，驻守成都的起义军还有十几万，但是在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下，经过英勇激战，许多人都战死了，成都城也终于被攻破，李顺也在战斗中牺牲了。宋朝出动了几十万的兵马，终于镇压了这次王小波和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

后来的传说后来，有人传说在成都陷落的时候，李顺其实并没有死，他化装成一个和尚，秘密逃出了成都，继续率领农民军战斗。听说

宋军在进城时，曾经抓到一个胡子很长、外貌很像李顺的人，就把他当李顺杀了。又过了40年，广州的街上出现了一个老翁，有人认出他就是当年的起义领袖李顺。官府听说了，不分青红皂白的把他抓起来，在监狱里秘密杀死了。关于李顺的下落还有很多的说法，人们心里都希望这位勇敢反抗朝廷暴政的民间英雄没有死。

寇准断案轶事他年轻有为、机智灵敏，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几百年来人们都十分尊敬和爱戴他。

各执一词寇准，字平仲，华州下邦人，他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他少年时英俊豪迈，通晓《春秋》三传。十九岁时，就考中进士，做了知县的官职，那时他年轻有为、机智灵敏，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几百年来人们都十分尊敬和爱戴他，他的事迹也广泛流传。其中最有名的故事就是寇准智审铜钱案。

一日，寇准像往常一样正在县衙处理公务。忽然，有两个人拉拉扯扯、争吵不休地来到大堂告状，其中一个的手里还拿着一个袋子，里面盛着铜钱。寇准一拍惊堂木，问大堂上跪着的两个人：“你们谁是原告，谁是被告?状告所为何事?快快与本官讲来。”

寇准话音还未落，两人就大声嚷嚷着说：“青天大老爷，我是原告，他是被告。”

寇准再拍惊堂木，呵斥道：“真是岂有此理，怎么你们两人都会是原告呢?你们不要争，一个一个慢慢地说。”这时，只见其中一个向前走了两步，说：“我是本地一个专卖羊肉的屠夫，他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我们两人都是单身汉，同住在一起。我辛辛苦苦卖了一年多羊肉，攒了两千铜钱，让他替我保管，原准备是用这钱娶个老婆的。这几日，媒婆给我说了户人家，我急等着钱用，就让他把钱给我，不料他竟想吞掉这些钱，说钱是他的，还说是我敲诈他。青天大老爷在上，请您为我评评这个理。”

接着另外一个来告状的人忙不迭地说：“大老爷，别听他胡说。我天天上山砍柴卖掉，好不容易才积攒了这么多钱，今天早晨，他硬是要把这些钱全部拿走，说是他的。小人冤枉啊!这确确实实是我卖柴挣来的

钱。请大老爷为小人作主。”

“你胡说，分明是想吞了我的钱，我实在是看错你这人了。”“什么，这是我的钱，天地良心，我没拿你的钱。”这时，卖羊肉的与砍柴的两人又在大堂上争吵起来。

奇特的断案方法寇准明白事情的原委了，他又拍惊堂木，转向卖肉人问：“你说钱是你的，可有什么证据?”卖肉人一听寇准问这样的话，跪在地上又磕头又是作揖，口里说道：“大老爷，我们两人是亲戚，平时吃住都在一起，我每天卖肉的钱都是他替我保管的，虽然没有什么证据，但这是实情啊!”

砍柴的人大声申辩说：“他是胡说，他挣的钱怎么可能会让我保管呢?他怎么自己不保管呢，大老爷，别听他的，没有这回事。”卖肉的已经气得说不出更多的话，只是喃喃地：“你，你，你昧了良心!……”

寇准看到这里，心中已经有了主意，他沉思了一会，然后对一个衙役说：“去拿个盆来，里面要盛满清水。”又对另一个衙役说：“你去找个火炉子来。”两个衙役马上出去奉命办事。片刻功夫，他们就把火炉和盛满清水的一个盆弄到了大堂上。众衙役和告状的两个人都很奇怪，猜不透寇准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这时只听寇准命令两个衙役：“把钱袋子里的两千铜钱全部放水中，把水盆放到火炉上。”不一会儿，盆里的水冒出了热气。寇准起身离座到水盆边看了看，扭身又回到了座位上。这时他已胸有成竹，用劲一拍惊堂木，厉声说道：“这些钱是卖肉人的钱，大胆刁民，你拿人家的钱，反说是自己的，该当何罪?”

砍柴人不理解，还想狡辩，寇准命令一个衙役把他带到水盆边，让他亲眼观看盆里的铜钱。”堂上所有人都伸长脖子看盆里的钱。只见盆里的水上浮着一层厚厚的油花，一股革膻味也从盆里散发出来。这时真相已经很明白了，砍柴人也不敢说什么了，低下了脑袋，就差没有地缝钻进去了。所有的人都点头称赞寇准聪明，接着寇准斥问砍柴人：“砍柴的刁民，你今天要给本官解释清楚，你卖柴得来的铜钱，上面如何有这么多的羊油?”砍柴人再也不敢狡辩了，跪在地上浑身直打哆嗦，口中叫道：“是小人一时贪财，请大老爷饶命!请大老爷饶命!”

最后，为了严肃县风，砍柴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两千铜钱分文不少地归还卖肉人。从此寇准机智断案的名声也越传越远了。

寇准的结局寇准是宋朝有名的官吏，他在历史上留下美名，深受人们的爱戴与尊敬。

直言犯上的年轻人寇准一生刚直不阿，嫉恶如仇，遭到了反对他的人的仇恨和敌视，但他却能得以善终，这实在是他的优秀品格受到了人们的爱戴之故。寇准从小喜爱读书，聪颖异常。8岁时，就写过一首《华山诗》。十几岁时，把《春秋》三传读得烂熟，且能说出其中异同。19岁时，就考中了进士，当时科举取士，年纪轻的考生往往不被录取，曾经有人让他增报年龄，可是寇准却回答说：“我刚要上仕途，怎能欺骗君主呢?”结果，寇准考中了进士，被授予大理评事，知大名府成安县。31岁时，他做到北宋的参知政事(副宰相)。他年轻有为，才能出众，既不玩弄权术，哗众取宠，也不阿谀奉承权贵，以保全自己的官位，这样年轻有为的副宰相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而且他为官清廉，处处为国为民，在历史上留下了美名。

端拱二年的一天，寇准上朝奏事，不知因为什么原因触犯了宋太宗，太宗大怒，拂衣而起准备退朝。文武大臣早吓得大气都不敢出，惟恐太宗怪罪到自己的头上。年轻气盛的寇准却一点也不害怕，不但没有跪下领罪，而且还拉住太宗的衣服，要他坐下来听自己把话说完。太宗无奈，只好生气地坐下来听寇准详细解释。最后太宗不得不承认寇准说得有理。事后，太宗也觉得寇准和那些阿谀奉承、只讲好话的大臣们不同，国家的富强需要寇准这样刚直无私的人，所以心里还是十分喜欢这个敢于直言犯上的年轻人，并把他比作是唐朝的魏征。

和众人唱反调有一年，中原地区大旱，一连几个月滴雨不下，宋太宗整日愁眉不展。一天，在朝堂上，许多喜欢熘须拍马的大臣引经据典地劝解太宗说：“水旱灾害自古以来就是上天决定的，即使是古代的圣明君主在位时也都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比如，著名的圣王商汤在位时，曾经大旱六年，庄稼颗粒无收。这难道能说是商汤不贤明吗?所以陛下不必为这件事过分自责。”

太宗听完这些话后，心中才略感宽慰。不料正在这时，年轻的寇准出班奏道："陛下，臣以为旱灾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朝廷的刑罚有不公平的地方。古书上说，商汤在位时，六年大旱，圣王商汤为了救民于水火之中，自己甘愿斋戒三日，沐浴更衣，端坐在干草堆上，以自焚来向天地谢罪。上天为商汤的诚意所感动，立即降下大雨，大火被浇灭，圣王不但免于一死，六年的旱灾也一下子得到缓解。"

同样的一件事，经寇准的口中一说出来竟变成了这种味，太宗的脸一下子又变阴了。"寇准!你今天给朕说个明白，朝廷的刑罚有什么不公平的地方。"太宗愤怒地喊了起来。只见寇准不慌不忙地回答道："不知陛下还记得不记得，去年，有两个州府的小吏因犯了贪污罪被处死。可是今年参知政事王沔的弟弟王准，贪污国家的财产达千万两白银以上，给他的刑罚却是在大理寺堂上轻描淡写地打了几十棍就完事了，不久他又官复原职。这样的刑罚难道说是公平的吗?"

文武大臣都知道这件事，王沔也低头不语。太宗觉得寇准说得有理，于是下诏清查全国的冤狱，这样不少被冤枉的人重新获得了自由。寇准假借天命对太宗进行了一次直言劝谏。

"擦须"事件后来，寇准被真宗任命为宰相，丁谓充当他的副手，任职副宰相。丁谓是一个善于熘须拍马、阿谀奉承的小人。有一次，寇准和丁谓一块参加了朝廷的一个公宴。处处想讨好自己顶头上司的丁谓专门和寇准坐到了同一张桌上，不时起身为寇准倒茶水、倒酒、夹菜，卑躬屈膝的小人之样显露无遗。寇准虽然很恼火，但碍于众文武大臣的情面，不好发作。正在恼怒时，寇准一不小心在低头吃菜时，胡子也伸进了菜盘子里，还未等寇准反应过来，一直在紧盯着他的丁谓已经拿了一块干净的手绢走过来，弯腰屈膝准备为寇准擦胡须。当着这么多大臣的面，胡须被菜汤弄脏已经使寇准很是难堪，丁谓的这一举动更是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到这张桌上来了。寇准的怒气再也压不住了，对丁谓说："你官居参知政事，是堂堂的国家大臣，怎能做出这种为自己的长官擦胡须的举动呢?"声音虽然不高，但却是那样的严厉，丁谓好不尴尬，红着脸退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刚直的寇准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和丁谓的合作仍然和从前一样自然、顺利。

但是，丁谓是个小人，后来罗列了寇准的几条罪状，背后暗算曾经提拔自己的寇准。

坟墓边的枯竹长笋寇准一生为官清正，他直无私，疾恶如仇，受到了人们永远的敬仰。寇准去世后，人们将他的尸体运回洛阳安葬。途中经过他曾为官多年的荆南公安县时，县里的人都聚集在路两旁，哭着祭奠他。当地老百姓还为他建了一座庙，每年都按时祭祀他。传说祭奠他的人折下竹子插在地上，在上面挂上纸钱，过了一个月再去看时，那些枯竹已长出竹笋来。在寇准去世11年后，朝廷恢复了他太子太傅的官衔，追赠他为中书令、莱国公，后来又赐谥号“忠愍”。

第十六章

澶渊之盟澶渊之盟，被认为是北宋朝廷软弱无能，退让妥协的标志。

寇准力主抗战真宗继位以后，宋朝也曾攻打过辽国，但都失败了。此后不敢再主动出击，完全采取了守势。公元1004年，辽国又调动了20万大军，南侵直打到靠近黄河的澶州(今河南省濮阳县西南)，这已威胁到宋朝的都城汴京。这下，宋真宗可慌了神，立即召集文武群臣，商议如何对付。当时有不少朝臣主张迁都，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在群臣议论纷纷的时候，宰相寇准义愤填膺地说：“主张迁都逃跑的人，应该杀头!现在最需要的是，上下齐心合力，与敌人决一胜负，力保大宋京都。京都万万不得丢弃，京城一失，人心崩溃，敌人便长驱直入，大宋就危在旦夕了。现在，陛下应当机立断，抓住机会，亲自出征，以鼓舞士气和民心。”

寇准性格刚强果断、为人正直，曾受到宋太宗的信任和器重。到宋真宗即位，由于参知政事毕士安的鼎力举荐，就在辽军大举入侵的前夕，宋真宗任命寇准和毕士安为宰相。

真宗亲征就在这年的十一月(宋真宗景德元年)，在寇准的极力劝说下，宋真宗亲自率领大军，从汴京出发，直达韦城(今河南省滑县东南)。这里距离澶州已不远了，驻守在那里的宋军听说皇上亲自出征，士气高涨，军心鼓舞，一气打退了辽国的进攻，还打死了一位辽国的大将——萧挞览。被打死的这位辽将，有名气，地位也很高。他的死，使辽军的锐气大挫。这一仗，狠狠打击了辽军的嚣张气焰。

软弱的皇帝让寇准心急如焚这时，若能乘胜追击，定能大败辽军，取得决定性胜利。可是，就在此时，宋朝统治集团内的主和派又提议迁都金陵。本来就没有决心抗敌的宋真宗，在吃了远途行军的辛苦后，在主和派的极力怂恿下，又对抗敌发生了动摇，派人找来寇准商量迁都之事。

寇准据理力争，他铿锵有力地对真宗说：“陛下，如今敌军迫近，虎视眈眈，情况十分危急。我们只能前进一尺，不能后退一寸。群臣胆小无知，他们不忧国而为自己，陛下万万不能听信他们之言。”说到这里，寇准见真宗没有话说，又接着说：“如今在河北前线的我军，日夜盼望陛下前去，他们信心百倍。倘若这时撤军后退，百姓失望，军心涣散，敌人乘机杀来，我军势必不打便瓦解溃散，那时，恐怕连金陵也难保啊!还请陛下三思!”

软弱的真宗，听寇准这一番话，觉得有道理。但是，他对抗敌还是信心不足，意志不坚。后来，寇准找来殿前都指挥高琼，他俩一道去再次劝说真宗，以坚定抗敌之信心。这样，宋真宗才答应带领大军到了黄河边上，这是很勉强的。一路上，他胆战心惊。登上黄河大堤，举目一望，北面密密麻麻，全是敌军的营垒。看到这情景，宋真宗又惊慌起来，不敢渡河。回顾中华历史，英气浩然长存，哪有这样软弱无能的皇帝!寇准见状，心急如焚，急忙上前催促说：“陛下速速过河，若再拖延时间，迟迟不过河，人心惶惶，后果将不堪设想啊!”一旁的高琼也上前说道：“请陛下赶快去澶州。全军将士愿意保驾保国，敌军不难破。”

就这样，宋真宗才只好下令进军，渡过黄河，进入澶州城。进城后，在寇准的督促安排下，真宗在澶州北城门楼上，很快召见了众将。

宋军的将士听说皇上来到了澶州城，精神大振。远近将士望见宋真宗的御盖，欢声雷动，士气高涨。真宗见了，多少增加点抗辽的信心。于是，把军事大权交给了寇准。

不多时，数千名辽军骑兵，挥舞大刀、弓箭，飞奔前来攻城。寇准分析了敌情，下令开城出战。宋军个个奋勇冲杀，誓死报国。城门一打开，宋军犹如决堤之洪，迅勐异常，势不可挡。宋军一鼓作气，消灭敌军大半。辽军纷纷溃散四逃，宋军士气更加高涨。

放弃大好形势的议和宋军得胜后，宋真宗回了行宫。寇准命令宋军严密把守，以防辽军再次侵袭。这时的寇准与将士说说笑笑，谈笑自如。真宗回行宫后心里仍不踏实，就派人来看寇准在干什么。真宗听打听消息的人说寇准与别的官员饮酒，还有说有笑，他这才安心上床休

息。

辽军吃了大败仗，暂不敢轻易出兵进攻宋军。寇准主张乘胜收复燕云16州，以除后患。就在寇准考虑如何说服真宗出兵与辽决胜负的时候，在宋真宗出征以前就已被派到辽国去谈判的宋官员，正与辽国进行谈判。

因辽军吃了大败仗，处境很不利，就同意了和宋朝议和。辽国同意与宋议和的消息传来，一些主和派死灰复燃，谣言四起，说寇准想利用军队，夺取权势，有野心等等。

主和派势力强，再加上宋真宗始终就没有抗辽的决心，在这种情况下，寇准无法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只好同意议和。

澶渊之盟议和是有条件的，要每年给辽国一些银子和丝绢等。宋真宗曾对去议和的宋官员说："只要讲和，不得已，即使每年给一百万也答应。"这真是卖国求和啊!但寇准对派去议和的宋朝的官员道："皇上虽许诺百万银绢，可是，你答应的数目不得超过30万，成败在你。超过这个数，我就杀你的头!"这样，宋辽议和谈判各执己见，反复多次，最后终于在公元1005年初，双方订立和约，规定北宋每年要给辽国白银10万两，丝绢20万匹。这已是不小的数目啊!无疑这将加重宋朝人民的负担。因为这次和约是在澶州(即澶渊)订立的，所以史称"澶渊之盟"。和约订立以后，主和派们以为天下无事，自此太平了，他们奔走相告。殊不知，这是屈辱的和约啊!接着宫内又误传为每年给辽国300万银绢。宋真宗听了，开始也大吃一惊，认为太多了。很快，他又说："姑且了事，这也可以。"当他知道确切数字后，竟然非常高兴，认为这是宋朝的谈判的"胜利"，还亲自写诗以示庆祝。这一心妥协无能的宋真宗，真不知天下还有屈辱和可耻之说。

此后，宋朝统治者加紧向人民榨取更多的钱财，以付给辽国。宋朝人民的生活更加痛苦了。而辽国统治者，虽每年得到大量银绢，但仍不满足，经常骚扰宋的边境。后世人们，视"澶渊之盟"为北宋朝廷软弱无能、在外族入侵时只能退让妥协的标志。

宋真宗重用李沆气度不凡的李沆，忠心耿耿辅助皇帝，真是皇帝的

好帮手。

气度不凡的贵人李沆，字太初，北宋年州(治所在今河北广年)肥乡人。李沆幼年时期十分好学，气宇风度超过常人，他的父亲就曾对人说过：“我的这个儿子以后必定会做到宰辅官职的。”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72年)，李沆中进士，踏入官宦之路。淳化二年(公元991年)，李沆升任掌铨判吏部主管。一次，宫中宴会时李沆曾经侍坐在太宗皇帝身边，散席后宋太宗目送他回家，说：“李沆气度不凡，可真是个贵人啊。”淳化三年(公元992年)，便拜他为给事中、参知政事，也就是宰相之位。太宗去世，真宗即位后，他又迁任户部侍郎、参知政事。那么李沆有什么才干呢，为什么能够一直受到朝廷的重用？

皇帝的左膀右臂那年，契丹军队侵犯宋朝的北方边境，兵临开封附近的澶州城下，于是宋真宗御驾亲征，临行前命令由李沆来留守京都。李沆将城内治理得井然有序，受到众人好评，都说他可比贤良有才干的汉初丞相萧何。宋真宗退金兵以后还师开封时，李沆率军队到京城外迎接，下令设座置酒，为皇帝和宋朝军队接风洗尘，对他们的功绩加以慰劳。真宗对李沆的所为十分满意，于是给李沆再加官职一级，让他兼门下侍郎和尚右仆射。

宋真宗一次，宋真宗问他，治理国家应当以什么事为首先的要务。李沆回答说：“以用人为首要之务，而用人最为紧要的是不要用浮薄好事之人。这类人上不足以服务君王，夸夸其谈，不干实事；下不足以体恤百姓，对搜刮百姓不以为然。可是他们很容易迷惑君王，所以皇帝您千万要注意识别。如果用人上皇帝能够做好，那国家就会政事昌明，安然有序了。”皇帝问他当今朝中哪些人是浮薄好事的人，他说：“像梅询、曾致尧等人就是这种人。”后来曾致尧做了温仲舒的副官去巡抚陕西，到任没过多久就向朝廷上书称温仲舒不足以共事。因为温仲舒一向刚直、容易得罪人，所以当时的轻薄之人无不称快，可是宰相李沆却不高兴，他认为温仲舒是个踏实干事的人，于是就罢免了曾致尧，改用其他人来辅助温仲舒办事。

真宗曾经与他谈到唐朝群臣牛李两党树立党羽，在政坛上互相争斗长达40多年，皇上难以控制，终于导致王室衰弱。真宗认为这实在是由

于奸邪难以辨别造成的。李沆同意真宗的见解，说：“奸佞的话语听起来十分忠诚、可信，好像是处处在为皇帝着想，其实是心怀异端，在为自己的私利打主意。像唐朝的卢杞总是蒙蔽唐德宗，后人看来是个小人，而在唐德宗当朝却被视为大忠臣，还有唐德宗朝的李勉勤勤恳恳为皇上办事，反而却被当做奸臣，被唐德宗一再贬官，历史上好像忠奸臣子就是这样的。”宋真宗说：“你分析得十分在理，不过朕相信奸邪的表象虽然难以辨别，但时间长了自然会败露出来。”

一天晚上，皇帝派使者拿着诏书前来告诉李沆，说要立刘氏为贵妃，李沆却让使者用烛火烧了诏书，附上奏书称：“臣李沆认为这个不行。”皇上立贵妃的这个提议也就此罢了。又有一次当时的驸马都尉官石保吉请求做使一级的相官，皇帝又与李沆商议，李沆说：“每次赏典官员的举动，朝廷都应当要有所缘由，石保吉并没有攻战的勋劳，仅仅是个皇帝国戚。如果就这样能够拜位台相，恐怕会引起朝臣非议。”过了几天，皇帝又再三地问李沆该怎样办，李沆还是坚持己见，一点都不松口，后来这件事就没有再议，终于不了了之了。当时朝臣们十分喜欢用密奏，真宗皇帝问李沆：“其他人都有密奏，而独独公卿你却没有，这其中有什么理由吗?”李沆回答说：“臣身为宰相，公事就在公堂直接言说，密奏正是臣常常厌恶的，怎么能够去效仿他们呢?”真宗听了十分高兴，更加器重李沆了。

看人很准李沆很能察人，奸佞的人从不重用。后来官至参知政事的丁谓原来出自寇准门下，是寇准的学生，这个人有才干，但是为人却喜欢谄媚上级，是个小人。当年丁谓还是小官的时候，他侍奉寇准十分谨慎。寇准觉得他是个人才，多次向李沆推荐丁谓，可是李沆却并不重用他。寇准问他，李沆回答说：“看他的为人，能够让他位居人上吗?”寇准说：“像丁谓这样的人，相公又怎么可以永远压制呢?”李沆笑道：“你以后后悔时，一定会想起我的话。”

丁谓后来得势，果然与其他小人相互勾结，将寇准排挤出阁，还向皇帝屡次进谗言，将寇准一贬再贬，最后死于谪地，可是这时寇准后悔都来不及了。

李沆这样的人在朝让奸佞无法存身，他不虚媚献谄皇帝，而是实实

在在地辅助皇帝，实在是皇帝的好帮手，所以真宗一直都很重用他。

宋真宗专为王旦设使职宋朝专门设置使职便是从王旦开始的。王旦有何德何能，为何受到真宗如此器重呢?

皇帝离不开的人王旦，字子明，大名莘(今山东莘县)人，与寇准同朝为相，也是名重一时，他懂得如何做官，人品也好，所以受到人们的爱戴。

王旦考虑事情周全，很受真宗信任。当初真宗想人降天瑞、封禅泰山来宣扬自己的美名，但是却害怕遭到宰相王旦的反对，于是找机会叫来王旦一起饮酒，席间君臣很是高兴。在王旦告退时，真宗还赐给他一坛美酒，说："这是一坛极好的酒，送给你吧!"等到王旦回府打开坛一看，原来里面装的全是珠宝，王旦顿时明白真宗的意思。从那以后，有关天书、封禅这种事，王旦从不反对。从此以后真宗更加信任王旦，凡有大臣请奏，真宗总是说："不知王旦怎么看?"王旦性格沉默寡言，神情严肃，朝廷每次议事时，大家众说纷纭，可是只要王旦慢条斯理地说一句话，就能把事情定下来。封禅泰山前，契丹要求在每年宋朝给的30万岁币之外再借些钱币。真宗和王旦商量该怎么办，王旦说："陛下即将外出封禅，契丹不过是想乘机试探我朝。他们所要的只是些小钱财，不必在意就行了!"于是王旦下令在每年给予的30万以外再借出6万，并通知契丹，这6万将在明年所给的岁币中扣除。又有西夏赵德明向宋朝声称国内遭逢饥荒，求讨粮食万斛，如果不给，即日攻宋。众臣都说："赵德明刚刚与我大宋订立誓约，现在却要违背，希望朝廷发书谴责。"真宗又与王旦商量，王旦却请求真宗批准让有司运各地粮食百万斛到京师，通知赵德明来取。赵德明得到诏令后，十分惭愧地下拜说："宋廷确有能人啊!"真宗处理好了边疆问题，所以得以顺利封禅。

重用贤臣王旦重用贤臣，不以权谋私，这也是真宗看重他的原因之一。寇准虽然常说王旦的短处，可王旦却极力称赞寇准。真宗有时看不惯，把这些和王旦直说了，可是王旦说："从事理上说应该是这样。我长期为相，政事上可能犯了不少的错误而不自知。寇准能对陛下直言相告，说明他忠诚正直，这也正是我所敬重他的主要原因。"真宗因此更加器重王旦了。当时寇准在枢密院，王旦在中书省，某次中书省送到枢密

院的文书格式有误，寇准马上奏给真宗，结果王旦受到了责备，并亲自到寇准府上谢罪，中书省的堂吏也都受到了惩罚。没过几天，枢密院送文书到中书省，文书的书写格式也有错误，众堂吏都非常高兴地拿给王旦看，王旦却让人送回枢密院告知修改。寇准见了王旦很惭愧，问王旦怎么有如此度量，王旦没有回答。尽管寇准屡次和王旦过不去，可是王旦却不计较，他在寇准被贬官后，仍旧向真宗推荐寇准，使他升武胜军(治所在今四川武胜县)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得以为国家效力。寇准有时生活过于铺张，甚至超过皇上，真宗就对寇准有了看法，一次和王旦提到，王旦只慢慢地说："寇准确实贤能，只是有时呆得没有办法。"真宗觉得说得也是，就没有追究寇准。王旦对于贤臣重用，不计个人得失，可是对于那些奸佞小人，王旦却是丝毫不让他们得势。当年真宗想以奸臣王钦若为相，王旦极力反对，使得在王旦生前，王钦若没在朝中得宠。直到王旦逝后，王钦若才被任为宰相，他对人说："因为王公的缘故，我为相晚了十年。"还有真宗朝的另一奸臣丁谓，王旦也不重用他，说："丁谓才气虽好，但人品不行，如果将来能居人上，让他独当大权，定会祸累其身。"后来丁谓的结局，正如王旦所言。

为官清廉王旦为官清廉，他从不置办田宅，还勉励子孙要自立，不可过于依赖祖宗。一次真宗看到他的住所简陋，想要赐给他新居，可是他却以先人遗留的旧舍为由婉言辞谢。旧宅大门坏了，主管的人拆掉重新修复，暂时从侧门出入，王旦到了侧门，俯在马鞍上而过，大门修好后，又从大门走，从不问起这件事。

王旦从泰山封禅复命后，身体多病，每年都要求解职，真宗只是褒奖他，却当面谕告他不准辞职。他后来又向真宗奏请，真宗仍然不允。一天，王旦单独和真宗见面时又提到这事，真宗却命皇太子(仁宗)出来拜见王旦，王旦惶恐要走，太子追着拜见他，王旦说："太子盛德，他日定能承担起陛下交付的重任。"并向太子推荐了十余人作为大臣，后来这十余人只有李及、凌策未至相位，但也是名臣。王旦再次要求解职，真宗这时看他去意已决，就同意了他的请求，仍旧给他一半宰相俸禄。辞去相位之后仍任使职，宋专门设置使职便是从王旦开始的。

临死前的遗言王旦病危时，告诫子弟说："我家一向有清德盛名，今后你们要勤俭朴素，保持门风，千万不要奢侈，我死后不要把珠宝放入

棺柩之中，更不许厚葬。”他还将好友杨亿请到卧室，托他代撰遗表，并说：“我曾任宰辅，不可在临终为宗亲求官；只是叙说我生平受圣上恩遇，希望圣上能够妥善料理朝政，任用贤能之士，但也不要操劳过度。”表呈上后，真宗十分难过，于是亲自到他府中探望，并赐白银五千两。王旦坚决推辞，再次上表，表末亲自写了几句话：“臣一向不喜积藏财货，更何况我也用不着，不如把这些银两散赏别人。”财物送回内宫之后，真宗再次下谕王府，可是内侍刚到王府，王旦就去世了。真宗亲临王府吊唁，十分悲痛，下令废朝三日，追赠王旦太师、尚书令、魏国公。

真宗与民女的爱情宋真宗的皇后刘氏原本出身卑贱，只是京师街头一个摇鼓卖艺的孤儿。

美名传遍京城刘皇后原名刘娥，她的父亲姓刘名通，官拜虎捷都指挥使，蜀地人氏，家里有妻子和一个女儿。一次战役后，他随军班师回京途中，不幸染上了病疾，死在了路上，留下孤妻弱女独自生活。

天有不测风云，在听到丈夫死讯后，刘通的妻子龚氏非常焦虑忧伤，没过多久也撒手人寰，只撇下了她孤苦伶仃的女儿刘娥。就这样，刚刚出生不久的刘娥便成了孤儿，只好由年迈贫穷的外公外婆来抚养。

春去秋来，花开花落，十几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刘娥也不知不觉已经到了豆蔻年龄。这时刘娥的外公、外婆、舅舅、舅妈均已过世，只留下她与表哥龚美相依为命。龚美一直做着锻银的生意，他听说京城汴梁生意好做，便带着刘娥不远万里来到京师，在京城开了一家小小的银坊，算是在京城落了脚，而刘娥则在作坊前面的铺面给表哥看店。

按说龚美的锻银技术本来很一般，可是他的银作坊里却时常有公侯王孙们前来光顾，只因为他有个如花似玉、会播鼓的漂亮表妹刘娥。

其实刘娥播的鼓，只是小孩子无聊时玩的拨浪鼓而已，本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可是由于她人长得实在漂亮，所以那些纨绔子弟还是照来不误。时日一久，刘娥的美名也传遍了京城。

得到王爷的垂青直到有一日，刘娥正静静地坐在一边看表哥干活

时，勐然间抬头竟看到一男子正微笑着盯着她看，她心里颤了一下，细声问道：“客人是要锻造银器吗?”

那个男子说：“不是。”

刘娥接着又问：“那您是要整兑银元吗?”

那男子也说：“不是。”

这时刘娥十分疑惑地问道：“那么您来是为了什么?”

只听这位来客回答说：“孤家是特意来听你播鼓的。”

刘娥一下子惊呆了，一方面是奇怪他那火辣辣的目光，一方面是奇怪为什么他称自己是孤家。刘娥懵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要知道孤家可只有皇帝、王爷才可这样称呼啊!这时只听这位来客身后的侍从发话了：“见了王爷还不下跪，你有几颗脑袋啊?”

刘娥吓得目瞪口呆，侍从接着说：“襄王爷，这是襄王爷，我们是襄王府的人，你总该知道了吧!”在汴梁，谁不知道襄王爷呢?当年太宗皇帝叫了一个道士为几个皇子看相，几个皇子都看过了，道士都没有说话，只有当时襄王还睡着，道士没有看准备要走了。可是这时襄王身边几个随从过来了，道士马上问太宗这几个随从的主人是谁，太宗说是襄王的随从，道士向太宗贺喜说大王的这个儿子有天命。太宗问道士：“你没有看到襄王怎么知道的?”道士回答说：“单看襄王身边的几位随从就知道他们以后都是出将入相的官职，那能让他们全都出将入相的一定是他们的主人了，所以襄王是大富大贵的人。”从此以后，襄王就成为太宗皇帝的几个皇子中最有名的，也是最有希望成为太子的人，他后来果真成为宋朝的第三个皇帝，也就是后来的真宗皇帝。

刘娥听说这位又年轻又英俊的来客竟然就是襄王爷，她立刻感到无限的荣光，陶醉在一股莫名的虚荣心里，襄王是何等人，竟然来听我小小的一个店面艺人来播鼓!她顿时拿定主意，也不再害怕，深深给襄王爷道了个万福，然后打起十二分精神，拿出了看家本领，把平日里本来就很精彩的摇鼓技艺表现得淋漓尽致，让襄王听得如痴如醉。她是用摇鼓

来表达她自己心中的情感，襄王也好像听懂了一样，他快乐得好似找到了老朋友一般，觉得眼前的这看似平凡的女子竟然带给他一种很美好的感觉，这种感觉真的是不同寻常。襄王爷立刻就将刘娥带回了襄王府，两人自是花前月下百般恩爱。

无法阻隔的爱情这男欢女爱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襄王府中有一个人不愿意了，像大多数宫廷里的老婆婆一样，襄王从小的乳母孟婆婆认为襄王这样沉溺于女色会坏大事。于是她就把刘娥进了襄王府并且成日与襄王作乐的事情告诉了太宗皇帝，还添油加醋地说刘娥让襄王不思进取，于是太宗命襄王将刘娥遣送出宫，可是刘娥早已在襄王的心中住下了，所以虽然表面上刘娥离开了襄王府，可是太宗和孟婆婆哪里会料到刘娥被真宗藏在了与他关系较好的臣子家中，真宗随时可以去看望她。没有谁会阻挡他们之间的感情。后来，太宗皇帝驾崩，襄王继位，即为宋真宗。他马上把刘娥接进皇宫封为美人，百般恩宠。由于得到真宗的宠爱，刘娥终于由出身卑贱的社会底层人物一步步爬到了权力的顶峰，做了皇后、皇太后。

刘美人入主后宫刘氏出自寒微，临朝十几年时间，号令严明，恩威分明，受到了后世史家的美誉。

出身寒微的刘皇后刘美人也就是真宗后期的刘皇后，仁宗时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后世史家说她“虽政出宫闱，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对她评价可以说是很高了。宋真宗原配是大美人潘氏，是忠武军节度使潘美的第八个女儿。潘氏是早在真宗封韩王时太宗替真宗聘娶的，封莒国夫人。但自古红颜多薄命，真宗还未即位，潘氏便早早地离真宗而去，真宗即位后追封她为皇贵人。真宗第一任真正的皇后是宣微南院使郭守文的次女。淳化四年，真宗封襄王时，太宗为他聘娶，封鲁国夫人，进封泰国夫人。真宗即位后，即册立为皇后。十年后即景德四年郭皇后病逝，年仅32岁。郭皇后俭约谦恭，深恶奢靡，受到了皇宫上下、朝廷内外的爱戴。

郭皇后病逝，皇后一位空缺。宫中候选人有两人：一是宰相沈伦的孙女沈才人，她父亲是光禄少卿沈继宗。另一个是刘美人，出身寒微。沈才人以将相家子女入选后官，她本人又没有大小姐般的骄纵之气，文

静贤淑，俭约朴素，在宫中历才人、美人、婕妤、充媛，再到德妃，很受真宗宠爱。朝中的大臣、皇亲国戚几乎众口一词要求立沈才人为后。相比之下，刘美人不仅是出身寒微，而且襁褓而孤，立刘氏为后，大臣们激烈反对。翰林学士李迪甚至公开进谏，说刘氏出身寒微，不可以母仪天下。但是历史却和人们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真宗没有立沈才人为后，却立了众人皆不以为然的刘美人为后，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真宗虽喜欢沈才人，沈才人的家世也好，但令真宗更为着迷的却是刘美人。刘美人秀美动人，聪颖灵悟。15岁入襄王府，真宗就对她神魂颠倒，大加宠爱。真宗乳母认为刘氏妖媚，偷着向太宗奏报。太宗即命襄王逐出刘氏。襄王却暗地里把她寄放在王宫指挥使张耆家。太宗死后，真宗即位，这才将刘氏召回后宫，授美人，旋进修仪，再进位为妃，宠冠后宫。再加上刘美人天性敏悟，通晓书史，使得真宗对她敬爱并重，真宗于是不顾朝臣反对把出身低下的刘美人封为皇后。

垂帘听政刘美人加封皇后之后，对朝廷大事小事，都能熟记本末。真宗退朝以后，批阅天下奏章，直到深夜，刘皇后总是陪同，并且一同理政。宫中有什么事，她也能妥帖解决，真宗对她又爱又敬。刘皇后干政受到朝廷官吏的阻挠。天禧四年二月，真宗执政22年以后突染风疾，不能理事，政务多交刘皇后裁决。宰相寇准、李迪认为自古皇后干政是国家的大忌，所以谋划让太子监国。结果太子并未掌权，寇准与李迪二人反被罢去宰相，贬到地方做官。后来又有宦官周怀政以身试法，谋立太子即帝位，奉真宗为太上皇，罢刘皇后干政。其间周怀政联合寇企图杀权臣丁谓而复寇准相职，不幸谋事又泄，寇准再次遭贬。

其实，太子赵祯是刘皇后韵侍女李氏所生，李氏是刘皇后的心腹，为真宗侍寝，生下赵祯后，刘皇后收养于宫中，为自己的儿子。而李氏则进为才人，而后又封为宸妃。太子对刘皇后言听计从，与刘皇后如同亲生母子，所以刘皇后平息两次谋太子监政的事件之后，即诏太子参议朝政，开资善堂，太子裁理政务，皇后则决于内。一年以后，真宗驾崩，太子即位，是为宋仁宗。遗诏刘皇后为皇太后，权职处分军国大事。

仁宗是年只有13岁，亲政后大权自然只会由权臣包揽，而权臣丁谓

又以新皇即位，奏请太后别御殿。刘太后十分不满，遣张景宗、雷允恭宣谕丁谓，质问他别御殿是怎么回事，丁谓不敢言语。自此，刘太后便和仁宗同御大殿，垂帘听政。刘太后恨寇准、李迪搞阴谋，对二人是一贬再贬。随后又杀了不忠的雷允恭，罢丁谓相职，任吕夷简、鲁政道参知政事，王曾同平章事。刘太后完全统揽了朝中、宫中的一切大权。

多年之后，皇帝才知道生母是谁明道元年，仁宗生母李宸妃死去。从刘太后收仁宗为自己的儿子起，李氏一直沉默，至死那日，仁宗仍不知李氏是他的生身母亲，仁宗只知道刘太后是他的母亲。朝廷大臣这时很为难，他们是知道这件事的，可是到底在李宸妃入葬问题上，该持什么态度呢？

刘太后本人并不想声张这件事。她认为李氏身为自己的侍女，能享圣恩，怀龙胎，已是很幸运了，还能企盼些什么呢？李氏由侍女而跻身嫔妃之列，成为宫中的主子之一，还有什么不满足呢?因此，刘太后觉得只按宸妃礼仪下葬李氏就可以了。

可是朝中大臣却不这么想，尤其这帮臣子明白，一旦太后驾崩，皇上亲政，一定会有人告密这件事，到时候皇上问起，身为辅政的宰相该如何交待呢?又该如何去面对皇上呢?所以宰相吕夷简，一再劝说刘太后，要为自己的家人想想，因为一旦刘太后驾崩，仁宗必定会知道真相，那时定会牵怒到太后的家人。刘太后觉得有理，最后以皇后礼下葬了李宸妃。

后来，刘太后去世，仁宗才被告知其生母是李宸妃。感念刘太后的抚育，辅佐之恩，对刘太后家族待之更厚。

刘氏出自寒微，由美人到皇后再到太后，临朝十几年时间，号令严明，恩成分明，受到了后世史家的美誉。

仁宗掩饰太后的过错一个国家有如此贤明的太后，实在是国家之福。

贤明的太后宋仁宗赵溃是真宗的第六子(公元1023年—1063年在位)，他亲政前刘太后垂帘掌政11年，虽然政事决定出自内宫，但是号令

严明，恩威遍于天下。但是，靠近她身边的人，很少有沾光之处。后宫里面的制度，她从不随意改变，内外的赏赐都有所规定，赐给亲族的饭食，一定要换上铜制的盘子，她说："皇帝的器皿不能给家里人用。"三使司奉献一幅武则天临朝掌政的画，太后把它扔到地上，说："我不做这样对不起前辈皇帝的事。"有个运粮大臣叫做刘绰的，从京西回来，说他在粮仓里有剩余粮食千余石，请求献给户部等三司。太后问他："你认识王曾、张知白、吕夷简、鲁宗道四个人吗?这四人难道是因为进贡盈余之物才升为大官的吗?"晚年渐渐有她外祖父母家的人进朝为官，任命宦官罗崇勋、江德明等访查外事。罗崇勋等因此势倾中外，显赫一时。

等到太后去世，仁宗看到身边大臣就边哭边说："太后病到不能说话的地步，还多次拉着我的衣服，好像有什么要嘱咐的，这是为什么呢?"

大臣薛奎说："太后的意思是说她穿的礼服和礼帽不合规矩，穿戴它怎么可以见先帝于地下呢?"

仁宗明白了，于是给她换上皇后的服装入殓。按过去的制度，作为皇后只能有两个字的谥号，可是给太后加上四个字的谥号："章献明肃"。太后留下诏令，尊奉杨太妃为皇太后，与皇帝共同商议军国大事。满朝文武都为此而祝贺。

第十七章

皇帝亲政御史中丞蔡齐，示意负责上朝退朝的官吏，不要退班。他进去对宰相说："皇上已经长大成人，了解天下的情况，懂得治国的道理。现在应该独自掌管朝政，怎么可以让太后继续掌权呢?"殿中侍御史庞籍，立刻关上大门把垂帘听政那一套摆设给烧掉了。从此只尊奉杨太妃为皇太后，删掉了诏书中同议军国大事的话。

从此仁宗才开始亲政，停止修建寺庙，裁减不正当上来的官吏；召回宋绶、范仲淹、罢免宦官罗崇勋等，朝廷内外非常高兴。刘太后爱护仁宗如同亲生，仁宗也尽心孝顺她，所以母子俩始终没有丝毫的隔阂。

等到仁宗亲自管理政务，一些好发议论的人不时诋毁太后掌政时所办的一些事情。范仲淹对仁宗说："太后受先帝托付调护、协助陛下十年，现在应该掩盖她的微小过失，以保全她的大德。"仁宗说："这也是我很不愿听到的事情。"于是发下诏书申诫整饰朝廷内外，不得谈论太后垂帘听政时的事情。

郭皇后被废皇后乃六宫之首，如果轻易被废，必然会掀起轩然大波。

不合帝意的皇后宋仁宗的皇后郭氏是平卢军节度使郭崇的孙女。仁宗在做太子时，特别宠爱的妃子是张美人，即位后，就想立张美人为后，可是刘太后却不同意，并且在天圣二年，为仁宗立郭氏为皇后。虽然郭皇后对仁宗体贴备至，可是仁宗却不喜欢郭皇后，仁宗喜欢的是尚美人、李美人和张美人。所以郭氏虽贵为皇后，但一直得不到仁宗的宠爱，如同住在冷宫。

误打皇上一巴掌受宠的美人知道皇上的心思，所以互相争宠，并且总是逮着机会就损毁郭氏，都想取皇后而代之。尚氏、杨氏等就多次和郭皇后发生争执，双方都忿恨不已。

有一天，尚美人又在仁宗面前说郭皇后的坏话，恰巧被郭皇后听见

了。郭皇后怒不可遏，上前挥手就想抽她一耳光。

不料，在一旁的宋仁宗救美人心切，扑过去就挡住了尚美人。可是郭皇后盛怒之下，这一巴掌实在是又快又狠，等到她见到皇上扑过去，却实在也没有办法停止，就这样巴掌被仁宗挨上了。仁宗只觉得颈上火辣辣的，脑袋昏昏沉沉，一股股怒气直往上蹿，被随侍扶入冬殿。

各怀心思，支持廢后内都知闫文应一向善于迎合宋仁宗，是个熘须拍马的小人。他知道皇上不喜欢郭皇后，可是又没有机会废掉，所以仁宗绝对不会放过这个廢后的绝好机会的。他马上就给仁宗出了主意，建议仁宗把皇后留下的手印给宰相辅政大臣们看，这样仁宗就能立刻废掉皇后。仁宗接受了这个建议，真的召来大臣吕夷简，告诉他事情的经过，还请他看皇后的手印。果然是红痕刺眼。吕夷简以前曾经被废相，他以为是郭皇后向皇帝说了坏话，早就怨恨郭皇后，于是乘机向皇上进奏说："廢后的事情，古代就有先例，所以皇后如果有错，您可以废掉皇后。"侍臣们也纷纷跟着附和说："郭氏身为皇后九年，却没有子嗣，实在是应当废去啊。"宋仁宗听着大臣们没有反对廢后，还站在自己这一边批评郭后，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本来是十分高兴的，可是当真说到废去皇后，宋仁宗又有些犹豫不决了。这时宰相吕夷简就在一边鼓劲说："光武帝是汉代的明主，当时他的郭皇后只是心中有怨言就被废了，何况是打伤了陛下呢?更是罪不可恕。"仁宗于是决心废去郭皇后。廢后的消息不胫而走，宫中、朝中都紧张和热闹起来，御史中丞孔道辅、谏官范仲淹、段少连等十余人力谏，声称："廢后是件大事，郭皇后没有过错，不可废啊!"吕夷简却吩咐有司不得接纳台谏奏章。仁宗也下诏说："皇后没有子嗣，自愿入道，现在经过特许封为净妃、玉京冲妙仙师，赐名清悟，住在长乐宫。"

其他大臣反对也无用廢后诏书已经颁发，台谏的奏章又不能上达，御史中丞孔道辅和谏官范仲淹只好连同知谏院孙祖德，殿中侍御史段少连、侍御史蒋堂、郭劝、杨偕、马绛、右正言宋郊、左正言刘焕等在宫门外等候皇上召见，极力想劝阻仁宗垂听谏官的话，不要废掉郭皇后。孔道辅、范仲淹等要进去见皇上，可是守候殿门的内吏却把宫门关得紧紧的，不去通报给皇上。御史中丞孔道辅一时间十分着急，双手使劲叩着宫门的铜环，还大声疾呼皇上："皇后被废，为什么却不听台谏进言

呢?”孔道辅等人看没有效果，又接着去拜见宰辅吕夷简。孔道辅还质问吕夷简：“我们作为臣子来侍奉皇帝皇后，就像子女侍奉父母一样。父母不和，本来就应当劝和的，怎么能只顺从父意却将母亲扫地出门呢?”一席话说得吕夷简实在没有话说。朝中百官都很生气，纷纷指责吕夷简。吕夷简被逼无奈，只好又搬出先例，争辩着说：“廢后的事，本来就不是本朝首创，古代就有很多。”孔道辅、范仲淹十分气愤地指斥他说：“为人臣子应当用明君来教导君王，怎么能引出汉光武帝那种失德的事情来劝皇上呢?这并非是人臣之道啊!”吕夷简只好拱手说：“我无能为力，你们自己面见皇上吧。”可是没等孔道辅等见到皇上，他们已被贬官，逐出京城去了。

来不及的反悔郭皇后就这样被废入道。不久尚美人也失宠了，废入了洞真宫，也成为道姑。杨美人也被安置在其他的宅子，不能见到皇上。仁宗则赐郭氏金庭教主、冲静元师等法号，来表示安慰。后来宋仁宗很想念他的结发妻子郭氏，于是常常遣使去问候，还赐赏乐府。郭氏为感谢圣恩，常常书信作答，言词凄凉悲伤。仁宗又有些割舍不下郭氏了，于是就派人秘密地召郭氏回宫。郭氏要求仁宗如果要再想见召，那么应当百官立班受册才行。可是仁宗没有答应，不久郭氏竟然染病去世了。死前内侍闫文应曾经奉命带御医前去诊视，可是本来病不重的郭氏没过几天却暴病身亡。宫中和朝廷都怀疑是闫文应下毒，但也只是怀疑，没人敢查证，不过没过多久那个闫文应就被仁宗皇帝流放走了。

曹皇后稳坐后位在关键的时候，文弱的曹皇后却镇定自若，临危不惧。

曹氏加封皇后宋仁宗明道二年，郭后被廢后，枢密使周武惠王曹彬的孙女曹氏便被诏聘入宫。次年，曹氏便被册封为皇后，入主后宫。

曹皇后天性面目慈善，非常节俭，注重稼穑，又知书达礼，文质彬彬，还能写一手漂亮的飞白书。

更值得人们称赞的是在关键的时候，文弱的曹皇后却镇定自若，临危不惧，因此后人认为正是曹皇后这样的人格和修养，才得以在明争暗斗的宫廷生活中得以颐养天年。

临危不乱救皇帝在曹氏被册立为皇后的第二年冬天发生了一次变故。那天曹皇后刚侍奉好仁宗就寝，就突然听到殿外传来呼号声、喊杀声和撞门声。仔细一听原来是很多侍从意图集体越嵴冲进殿，劫掠兵仗，夺取兵权，欲杀死仁宗，抢夺宫中财物。

曹皇后急忙吩咐近侍将门窗关紧并且统统堵死。当时仁宗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吓得全身直发抖，惶惶张张地就想逃出寝殿，曹皇后拦住了仁宗，并且果断地派人告知都知王守忠，带兵攻入寝宫。在王都知还未到时，就听到殿外阵阵惨叫，原来是叛兵杀死一些宫嫔、侍女，气氛一时间恐怖阴森。宦官也担心发生兵变，多次建议殴打宫女发出惨声，以掩盖真相。曹皇后怒声呵斥他们："贼就在眼前，你们瞎说什么啊!"接着，曹皇后下令宫人准备冷水，因为她听到殿外的叛兵没什么动静了，估计是这些人撞不开门放火去了。曹皇后真是料事如神。没过多久，贼兵果然开始放火，火势蔓延，眼看着就要烧毁宫门和挂帘，宫人立即泼水浇火。有叛兵冲进来，曹皇后就鼓励宦官努力杀贼，并承诺一律重赏，这才没有酿成大祸。都知王守忠带领卫兵及时赶到，擒杀了叛兵，平息了这场血腥的兵变。可是令人意外的却是仁宗十分煳涂，而且煳涂至极。这场变故仁宗能转危为安、化险为夷，全靠曹皇后的决断明智，因而曹皇后不可置疑的有护驾、保驾之功。可是，这样贤慧明智的皇后却赶上了一个煳涂皇上，仁宗不仅不念皇后有功，颁给奖赏，他反而说是张美人有功，想颁发诏书，升张美人为贵妃。后宫一时间怨气汹汹，朝臣们也大为气愤。知谏院王贽、御史何郯则上书力谏，直言其不可。翰林学士张方平则婉转劝皇帝，舍皇后而礼尊美人，古来没有此礼。但仁宗不听，还是晋张美人为贵妃。曹皇后大度大量，什么都不计较。

选了一个疯子皇帝在仁宗病危期间，宰相韩琦等鉴于仁宗的三个儿子都过早去世，奏请仁宗早日建继嗣。嘉佑七年八月，仁宗下诏，立异母兄弟孔濮王赵允让的第十三子赵曙为皇子。这年赵曙虽然年已30，身体却很孱弱，于是他托病不受皇子。仁宗命使者往返了多次，可是赵曙却仍然不接受，使者只好用肩膀扛着他进到了皇宫。次年仁宗过世后，曹皇后就紧闭宫门，妥当安排宫中事宜，然后召皇子赵曙入宫，遗诏嗣位。赵曙坚决不肯即位，他转身就逃走了，曹皇后和辅政大臣截住他，为他解散头发、又为他披上御衣，拥立他即皇帝位，这就是昏庸无能、一身是病的宋英宗。宋英宗即位没过多久，就突然得了癫狂病，不认识

任何人，也不吃任何药，话也不说一句。次日，宋英宗病情就加剧了，他狂号着前后奔走，实在无法履行皇帝职责。于是曹太后只好垂帘听政。

到元丰八年时，宋英宗的病情已经很重了，大多数情况下处于不正常的状态。有时他的举动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动不动就骂后宫嫔妃，有时甚至谩骂曹太后，弄得后宫人心惶惶，剑拔弩张。

大臣司马光和吕诲等都曾上疏极力劝解，但是两宫还是不能和解。有一次，韩琦、欧阳修在帘前奏事，却听到帘后曹太后呜咽抽泣起来。大臣们忙问何故，曹太后泣不成声，告诉大臣原来是宋英宗整日行为异常，疯疯癫癫，对自己临政总是耿耿于怀，时常出言不逊。韩琦连忙上言劝慰太后，说是由于皇上病重的缘故，还劝太后要担待一些。欧阳修也进行劝解，说太后侍奉先帝数十年，仁德传遍天下，朝野谁人不知?当年张美人受宠，太后都能处之泰然，今日母子之间反倒不能相容?太后听他们这样一说，果然心里舒服了不少。欧阳修担心太后有废嗣之心，便说道：“先帝在位期间，对天下百姓广施德泽，所以一日驾崩之后，天下人奉从先帝遗言拥护嗣君，不敢相背。现今太后只是一个妇人，臣等五六个人而已。如果不是先帝遗意，天下人谁人能服啊!”太后听了默默无语。韩琦这时接着又说，皇太后深处内宫，臣等作官在外，如果皇帝有何调护不周的情况，太后断不能推究责任!曹太后又惊又气，这无异于说皇上一旦有什么事，惟太后是问!于是便愤愤地说：“这是什么话，儿子有病，我更为关切!”

几天后，韩琦又单独见英宗，英宗见了他就说太后对他少有恩德。韩琦却回答英宗说，父母慈爱而后子孙孝顺，这是天下常理，不值得称道。值得人赞美的是父母虽不慈爱而子孙却很孝顺!自古以来圣明帝王实在很多，但为什么只说舜是大孝?难道其他的帝王不孝吗?实在是由于舜做到了父母不慈而他却一直孝顺父母。更何况现今曹太后仁慈，天下哪有父母不仁慈的呢!英宗也不言语。

宋英宗就这么闹腾了四年，治平四年正月在福宁殿去世，即位的是宋神宗，曹氏被尊为太皇太后。

好水川之役宋军对西夏侵略的抵制不利，给当地人民造成了极大灾难。

西夏国的兴起在北宋西边的党项民族，长久以来就一直雄心勃勃，不甘心臣服于宋朝。公元1038年，党项族首领元昊称帝，创建了西夏王国。随着国势的强盛，元昊不断率军侵扰宋朝边境。使宋朝的西北地区不得安宁。宋仁宗年间，为了抵抗西夏向内地的侵扰，皇上命韩琦、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进军西北，共同负责防御西夏。

范仲淹来到西北以后，对边疆军事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以前，西北边疆的宋军和西夏党项族作战时，不是根据敌人的兵力多少出兵，而是根据统兵的西夏将领的官位高低来相应排兵布阵，这样的结果是宋朝打仗十分机械，很容易陷入对方的计策里。所以在范仲淹以前，宋朝对西夏的战争是胜少负多，以守为主。范仲淹的改革，首先是巩固边防设施，注重团结当地的少数民族。其次，加强宋军的练兵、备战，并且根据来侵扰边界的敌人的兵力情况轮番出战，灵活机动性较强。由于范仲淹所采取的这些措施有力得当，再加上领导指挥有方，所以宋军暂时取得了不少的胜利，宋夏边疆形势也有了明显的好转。在这种情况下，宋仁宗被这些小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以至在西北边疆上意图改变了以往守的方针，想要对西夏大规模进兵，可是又担心宋朝的兵力财力不足，所以一直在战与和的问题上举棋不定。仁宗的犹豫不决让镇守边疆的将领们很为难，他们难以形成一致的抗敌意见。

元昊的“鸽子战术”

元昊正是趁宋朝军队战和思想不统一这个绝佳的机会，开始对宋朝边界地带大规模地用兵。公元1041年，元昊亲自率领大军进攻渭州，直逼宋军驻地怀远城。当时，驻守渭州的是大将韩琦，他一直都主张对西夏用兵，并且他的对敌策略是重在进攻，以攻为守。所以韩琦一见西夏军队又来侵扰，立即就命大将任福统领一万人马迎战。

元昊这次采取了奇特的“鸽子战术”，他首先让10万大军埋伏在渭州北边的好水川(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北)两侧，然后又将一百多只鸽子装在几个大盒子里，外面用泥巴封起来，放在了大路的两边。他将任

福的军队引出来之后，自己带领为数不多的兵马就西向而去了，好像没有丝毫的战斗力，沿途还故意丢弃了不少武器、马匹等物资，装作不胜体力的样子，来引诱任福追击。任福求功心切，没有想到是元昊设计，于是就率领着万余人大意地追了上去，想要活捉元昊。

可是，当任福的军队到达好水川口时，忽然，先行部队发现大路两旁有几个密封的泥盒子，里面不断发出扑愣愣的响声。士兵们十分好奇，但谁也不敢轻易打开看个究竟。等任福飞马赶到时，立刻下令让士兵打开看看是什么东西。结果一百多只鸽子像离弦之箭一样冲出盒子，飞上了天空，在宋军上空盘旋。任福一看不好，中了西夏人的奸计，马上就要命令部队回撤，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原来这些鸣叫的鸽子正是西夏军队的出击信号。西夏军看到进攻的信号后，立即从四面八方合围过来，没过多久，就把宋军团团围住，任福所带领的宋朝军队仓促应战，被元昊打得难以招架。

任福一看形势不好，十分着急，立刻命令全军向山谷的两面进攻，夺取制高点，以扭转战场上的被动局面。没想到当宋军往山坡上冲时，却只看到在西夏军上空勐地飘起了一面长两丈多的大旗，宋军十分诧异，都莫名其妙地望着这面大旗。惊疑之间，只见西夏兵异常得意，将大旗摆向左方，埋伏在左山后的西夏兵就出来，大旗摆向右方，右山后的伏兵也出来。这两边的伏兵好似悬河决堤一般气势汹汹地向宋军冲杀过来，直战得惊天动地。

任福不愿意苟且偷生任福当时已经身中十余箭，仍然在不停地奋力拼杀。旁边保护他的卫士们都劝他不要再管部队了，赶快冲出重围，可是任福却说：“我身为大将，不慎中了敌人的诡计，败军之将还有什么脸面再在世间苟且偷生，如今只有以死报国了!”说完，就奋力冲入敌阵，再次中了毒箭，终于以身殉国。任福手下的几十位将领中也只有一人侥幸生还，其他人全部战死。

西夏人的得意好水川战役，宋军伤亡惨重，兵败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京城，朝野上下都十分生气，仁宗皇帝也将这次战争的统军大将韩琦革去官职以泄民愤。西夏的国主元昊在战争胜利后，特别高兴，他命手下文人作诗为自己歌功颂德，讽刺宋朝军队的惨败，还把这首诗绑在箭上

射到宋军的阵地，诗中说：夏竦(宋朝将领)何曾耸?韩琦(宋朝大将)未足奇，满川龙虎辈(戏指宋军的尸体)，犹自说兵机。

之后，乘着胜利之机，西夏军队又跑到宋朝边境地带大肆抢掠了一番后，才满意而去。宋军对西夏侵略的抵制不利，给当地人民造成了极大灾难。

狄青出身寒门仁宗曾多次对大臣们说，自己为大宋能有狄青这样一位出自寒门的大将军而自豪。

立志变成金凤凰的麻雀狄青，字汉臣，汾州(今山西汾阳)人，是北宋仁宗时期著名的将领。他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从小就苦练武功，年纪轻轻便练就了一身超人的武艺，加入军籍。狄青虽然出身寒门，可是在军营中却老是看不起周围的士兵，引用当年秦末农民起义军首领陈胜的话："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他的言下之意是发誓要凭自己的才能做一名真正的大将军，立志为国效力。在当时一伙地位低下的士兵当中，狄青天天以这样的言谈举止自处，受到周围士兵们的挖苦讽刺："麻雀怎么能成了金凤凰?你别作美梦了。"在古代那种等级森严的社会里，狄青出身寒门，是没有可能走到上层阶层中的。可是尽管狄青受到多次打击，他的信念依然丝毫未变，他对人们的讽刺不以为然，还勉励自己要多多努力，以实际行动让人信服，最终成为一名大将军。建功立业的机会终于来了。

范仲淹送他一本《左氏春秋》

宋仁宗时，宋朝和西夏之间不断地发生战争。在西北战场上，狄青作战勇勐，他常常披头散发，戴着铜面具，冲在最前面和敌人拼杀，多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士兵们被狄青这种顽强战斗的精神所感动，而那些蛮横的西夏兵一听到狄青的名字，总是胆战心惊，退避几分，还没有交战就先在勇气上输了一截。狄青的智谋超人，作战勇敢，在宋军中名声大震，得到了一些名将的赏识。当时，被贬官任陕西经略使的范仲淹就连连赞叹狄青说："狄青真是国家的良将之材，应该受到培养和重用，使他能有一个更好的用武之地。"并专门送给狄青一部《左氏春秋》，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作为一个年长的人，我希望你能成材，所以想劝你把

这本书认真地读一读。因为领兵作战，如果不懂得古今的用兵方法，不过是匹夫之勇罢了，是以担当军事重任的。”狄青听从了范仲淹的劝告，就抓紧一切闲余时间来阅读兵书。但是，由于狄青出生在贫苦农家，从小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文化水平很低，读起书来十分费劲。再加上他十几岁就参军作战，东奔西跑，根本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所以刚开始阅读这部兵书，总是静不下心来。但是狄青并不自暴自弃，而是尽力约束自己坐下来读书，并且不耻下问。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把秦汉以来的将帅兵法通读了几遍，成为一个既满腹韬略，又勇勐善战的一代名将。

狄青请命出兵公元1052年，位于宋朝西南地区的侬智高发动了叛乱，宣布脱离宋朝控制，创建大南国。宋仁宗先后派张忠、蒋偕二将前往讨伐叛军，可是两位大将却由于指挥不当大败而归，损失了不少士兵。仁宗皇帝忧愤交加，几天几夜茶饭不思。就在仁宗皇帝苦苦找寻合适平叛人选时，狄青毛遂自荐，恳请仁宗给自己一次为国效力的机会，他甚至向皇上立下一份军令状：“狄青本来就是行伍出身，我义不容辞担负着保家卫国的职责，我愿意带兵前去平定叛乱，不杀叛贼誓不回，甘愿军营受斩。”

仁宗听了狄青的一番肺腑之言，十分感动，立刻命令狄青挂帅出征。仁宗为自己手下能有狄青这样忠心耿耿的大将而高兴。狄青果然不负仁宗所托，到阵前首先惩治了战斗不力的将领，整顿了军纪，使得宋军士气为之大振。后来又经过和侬智高叛乱军队的一番苦战，终于取得了胜利，收复了失地，侬智高也被迫在大理自杀。

这次平叛战役中，狄青战功卓著，解除了仁宗的顾虑，得到了仁宗的赏识，被仁宗破格提拔为枢密使，成为朝廷中掌握军权的最高长官。

保留脸上的刺字按照宋朝兵制，士卒地位十分低贱，甚至连普通囚犯都不如，要像被处黥刑的罪犯一样在脸上刺字，用来防止士兵逃跑。狄青十几岁就来到军营，脸上自然也有刺字，这说明了他的出身低贱，可就是这样一位士兵，最后却升为枢密使，的确十分不易。在狄青升为枢密使后，宋仁宗觉得将军脸上有刺字可能会被人笑话，有损于狄青的威严，所以就劝狄青用药水把脸上的刺字去掉。可是狄青执意不肯，并

指着自己脸上的刺字对仁宗说：“多亏了陛下不问出身和门第高低，论功行赏，我一个普通士兵才有了今天，我之所以要保留脸的刺字，一是为了表示陛下的英明，二是为了时刻让自己戒骄戒躁，三是为了激励后人建功立业。”仁宗听了十分高兴，就不再提让狄青除去刺字的事。狄青将军直到去世时，脸上的刺字仍然清晰可见。

仁宗曾多次对着大臣们说，自己为大宋能有狄青这样一位出自寒门的大将军而自豪。

先天下之忧而忧一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人，他的思想感情应该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少年苦读，成为奇才由于范仲淹军纪严明，还注意减轻边境上百姓的负担，北宋的防守力量加强了。

西夏和北宋打了几年仗，没得到什么好处。到了公元1043年，西夏国主元昊愿意称臣求和，宋朝答应每年送给西夏一批银绢、茶叶，北宋的边境局势才暂时稳定下来。

范仲淹不但是个军事家，而且是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他是苏州吴县人，从小死了父亲，因为家里贫穷，母亲不得不带着他另嫁到一个姓朱的人家。范仲淹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成长，他住在一个庙宇里读书，穷得连三餐饭都吃不上，天天只得熬点薄粥充饥，但是他仍旧刻苦自学。有时候，读书到深更半夜，实在倦得张不开眼，就用冷水泼在脸上，等倦意消失了，继续攻读。这样苦读了五六年，终于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几起几落范仲淹原来在朝廷当谏官，因为看到宰相吕夷简滥用职权，任用私人，就向仁宗大胆揭发。这件事触犯了吕夷简，吕夷简反咬一口，说范仲淹交结朋党，挑拨君臣关系。宋仁宗听信吕夷简的话，把范仲淹贬谪到南方，直到西夏战争发生以后，才把他调到陕西去。

范仲淹在宋夏战争中立下了大功，宋仁宗觉得他的确是个人才。这时候，宋王朝因为内政腐败，加上在跟辽朝和西夏战争中军费和赔款支出浩大，财政发生恐慌。宋仁宗就把范仲淹从陕西调回京城，派他担任

副宰相。

力主改革范仲淹一回到京城，宋仁宗马上召见，要他提出治国的方案。范仲淹知道朝廷弊病太多，要一下子都改掉不可能，准备一步一步来。但是，禁不住宋仁宗一再催促，就提出了十条改革措施，宋仁宗正在改革的兴头上，看了范仲淹的方案，立刻批准在全国推行这十条改革措施。历史上把这次改革称为“庆历新政”。

范仲淹为了推行新政，先跟韩琦、富弼等大臣审查分派到各路担任监司的人选。有一次，范仲淹在官署里审查一份监司的名单，发现有贪赃枉法行为的人员，就提起笔来把名字勾去，准备撤换。

在他旁边的富弼看了心里不忍，就对范仲淹说：“范公呀，你这笔一勾，可害得一家子哭鼻子呢!”

范仲淹严肃地说：“要不让一家子哭，那就害了一路的百姓都要哭了。”

富弼听了这话，心里顿时亮堂了，佩服范仲淹的见识高明。

范仲淹的新政刚一推行，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一些皇亲国戚，权贵大臣，贪官污吏，纷纷闹了起来，散布谣言，攻击新政。有些原来就对范仲淹不满的大臣，天天在宋仁宗面前说坏话，说范仲淹一些人交结朋党，滥用职权。

宋仁宗看到反对的人多，就动摇起来。范仲淹被逼得在京城待不下去，就自动要求回到陕西防守边境，宋仁宗就把他打发走了。

范仲淹一走，宋仁宗就下命令把新政全部废止。

范仲淹为了改革政治，受了很大打击，但是他并不因为个人的遭遇感到懊恼。隔了一年，他的一位在岳州做官的老朋友滕宗谅，修建当地的名胜岳阳楼，请范仲淹写篇纪念文章。范仲淹挥笔写下了《岳阳楼记》。在那篇著名的文章里，范仲淹提到，一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人，他的思想感情应该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名言

一直被后来的人传诵，而岳阳楼也由于范仲淹的文章而更加出名了。

包拯判案铁面无私开封府来了个新任知府包拯，北宋朝政日渐腐败的情况才有所改变。

巧断牛舌案包拯是庐州合肥人，早年做过天长县(今安徽天长)的县令。有一次，县里发生一个案件，有个农民夜里把耕牛拴在牛棚里，早上起来，发现牛躺倒在地上，嘴里淌着血，掰开牛嘴一看，原来牛的舌头被人割掉了。这个农民又气又心痛，就赶到县衙门告状，要求包拯为他查究割牛舌的人。

这个无头案该往哪里去查呢?包拯想了一下，就跟告状的农民说：“你先别声张，回去把你家的牛宰了再说。”

农民本来舍不得宰耕牛，按当时的法律，耕牛是不能私自屠宰的。但是一来，割掉了舌头的牛也活不了多少天；二来，县官叫他宰牛，也用不到怕犯法。

那农民回家后，果真把耕牛杀掉了。第二天，天长县衙门里就有人来告发那农民私宰耕牛。

包拯问明情况，立刻沉下脸，吆喝一声说：“好大胆的家伙，你把人家的牛割了舌头，反倒来告人私宰耕牛?”那个家伙一听就呆了，伏在地上直磕头，老老实实供认是他干的。原来，割牛舌的人跟那个农民有冤仇，所以先割了牛舌，又去告发牛主人宰牛。

打那以后，包拯审案的名声就传开了。

让百姓击鼓伸冤包拯做了几任地方官，每到一个地方，都取消了一些苛捐杂税，清理了一些冤案。后来，他被调到京城做谏官，也提出不少好的建议。宋仁宗正想整顿一下开封的秩序，才把包拯调任开封府知府。

开封府是皇亲国戚、豪门权贵集中的地方。以前，不管哪个当这差使，免不了跟权贵通关节，接受贿赂。包拯上任以后，决心把这种腐败

的风气整顿一下。

按照宋朝的规矩，谁要到衙门告状，先得托人写状子，还得通过衙门小吏传递给知府。一些讼师恶棍，就趁机敲榨勒索。包拯破了这条规矩，老百姓要诉冤告状，可以到府衙门前击鼓。鼓声一响，府衙门就大开正门，让百姓直接上堂控告。这样一来，衙门的小吏要想做手脚也不敢了。

对权贵毫不手软有一年，开封发大水，那里一条惠民河河道阻塞，水排泄不出去。包拯一调查，河道阻塞的原因是有些宦官、权贵侵占了河道，在河道上修筑花园、亭台。包拯立刻下命令，要这些园主把河道上的建筑全部拆掉。有个权贵不肯拆除，开封府派人去催促，那人还强词夺理，拿出一张地契，硬说那块地是他的产业。包拯详细一检查，发现地契是那个权贵自己伪造的。包拯十分生气，勒令那人拆掉花园，还写了一份奏章向宋仁宗揭发。那人一看事情闹大，要是仁宗真的追究起来，也没有他的好处，只好乖乖地把花园拆了。

一些权贵听到包拯执法严明，都吓得不敢为非作歹。有个权责想通关节，打算送点什么礼物给包拯，旁人提醒他，别白操心了，包拯的廉洁奉公是出了名的。他原来在端州(今广东包公墓肇庆)做过官。端州出产的砚台，是当地的特产。皇宫规定，端州官员每年要进贡一批端砚到内延去。在端州做官的人往往借进贡的机会，向百姓大肆搜刮，私下贪污一批，去讨好那些权贵大臣。搜刮去的端砚比进贡的要多出几十倍。后来，包拯到了端州，向民间征收端砚，除了进贡朝廷的以外，连一块都不增加。直到他离开端州，从没有私自要过一块端砚。

那权贵听了，知道没有空子好钻，也只好罢休。后来开封府的男女老少，没有人不知道包拯是个大清官。民间流传着两句歌谣：“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民间流传的各种传说包拯对亲戚朋友也十分严格。有的亲戚想利用他做靠山，他一点也不照顾。日子一久，亲戚朋友知道他的脾气，也不敢再为私人的事情去找他了。

宋仁宗很器重包拯，提升他为枢密副使。他做了大官，家里的生活

照样十分朴素，跟普通百姓一样。过了五年，他得重病死了，留下了一份遗嘱说：后代子孙做了官，如果犯了贪污罪，不许回老家；死了以后，也不许葬在咱包家的坟地上。

由于包拯一生做官清廉，不但生前得到人们的赞扬，在他死后，人们也把他当作清官的典型，尊称他“包公”，或者叫他“包待制”、“包龙图”。民间流传着许多包公铁面无私、打击权贵的故事，还编成包公办案的戏曲和小说。虽然其中大都是虚构的传说，但是也反映了人们对清官的敬慕心情。

王安石变法三不怕王安石坚持三不怕，但是宋神宗并不像他那么坚决，听到反对的人不少，就动摇起来。

宋神宗寻找得力助手宋仁宗做了40年皇帝，虽然也用过像范仲淹、包拯等一些正直的大臣，但是并没有改革的决心，国家越来越衰弱下去。他没有儿子，死后由一个皇族子弟做他的继承人，这就是宋英宗。英宗即位4年，就害病死了。太子赵顼即位，这就是宋神宗。

宋神宗即位的时候才20岁，是个比较有作为的青年。他看到国家的不景气情况，有心改革一番，可是他周围的人，都是仁宗时期的老臣，就是像富弼这样支持过新政的人，也变得暮气沉沉了。宋神宗想，要改革现状，一定得找个得力的助手。

宋神宗即位前，身边有个官员叫韩维，常常在神宗面前谈一些很好的见解。神宗称赞他，他说：“这些意见都是我朋友王安石说的。”宋神宗虽然没见过王安石，但是对王安石已经有了一个好印象。现在他想找助手，自然想到了王安石，就下了一道命令，把正在江宁做官的王安石调到京城来。

王安石曾经失望万分王安石是宋朝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西)人。他年轻时候，文章写得十分出色，得到欧阳修的赞赏。王安石20岁中进士，就做了几任地方官。他在鄞县(今浙江都县)当县官的时候，正逢那里灾情严重，百姓生活十分困难。王安石兴修水利，改善交通，治理得井井有条。每逢青黄不接的季节，穷人的口粮接不上，他就打开官仓，把粮食借给农民，到秋收以后，要他们加上官定

的利息偿还。这样做，农民可以不再受大地主豪强的重利盘剥，日子比较好过一些。

王安石做了20年地方官，名声越来越大。后来，宋仁宗调他到京城当管理财政的官，他一到京城，就向仁宗上了一份万言书，提出他对改革财政的主张。宋仁宗刚刚废除范仲淹的新政，一听到要改革就头疼，把王安石的奏章搁在一边。王安石知道朝廷没有改革的决心，跟一些大臣又和不来，他就趁母亲去世的时机，辞职回家。

变法需要三不怕这一回，他接到宋神宗召见的命令，又听说神宗正在物色人才，就高高兴兴应召上京。

王安石一到京城，宋神宗就叫他单独进宫谈话。神宗一见面就问他说：“你看要治理国家，该从哪儿着手?”

王安石从容不迫地回答：“先从改革旧的法制，创建新的法制开始。”

宋神宗要他回去写个详细的改革意见。王安石回家以后，当天晚上就写了一份意见书，第二天送给神宗。宋神宗认为王安石提出的意见都合他的心意，愈加信任王安石。

公元1069年，宋神宗把王安石提升为副宰相。那时候，朝廷里名义上有四名宰相，病的病了，老的老了，有的虽然不病不老，但是一听见改革就叫苦连天。王安石知道，跟这批人一起办不了大事，经过宋神宗批准，任用了一批年轻的官员，并且设立了一个专门制定新法的机构，把变法的全抓了来。这样一来，他就放开手脚进行改革了。王安石的变法对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增加国家收入，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触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许多朝臣的反对。

有一次，宋神宗把王安石找去，问他说：“外面人都在议论，说我们不怕天变，不听人们的舆论，不守祖宗的规矩，你看怎么办?”

王安石坦然回答说：“陛下认真处理政事，这就可说是防止天变了。陛下征询下面的意见，这就是照顾到舆论了。再说，人们的话也有错误

的，只要我们做得合法有理，又何必怕人议论。至于祖宗老规矩，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王安石坚持三不怕，但是宋神宗并不像他那么坚决，听到反对的人不少，就动摇起来。

《流民图》逼王安石下台公元1074年，河北闹了一次大旱灾，一连十个月没下雨，农民断了粮食，到处逃荒。宋神宗正为这个发愁，有一个官员趁机画了一幅“流民图”献给宋神宗，说旱灾是王安石变法造成的，要求神宗把王安石撤职。

宋神宗看了这幅流民图，只是长吁短叹，晚上睡不着觉。神宗的祖母曹太皇太后和母亲高太后也在神宗面前哭哭啼啼，诉说天下被王安石搞乱了，逼神宗停止新法。

王安石眼看新法没法实行下去，气愤得上疏辞职。宋神宗也只好让王安石暂时离开东京，到江宁府去休养。

第二年，宋神宗又把王安石召回京城当宰相。刚过了几个月，天空上出现了彗星。这本来是正常的自然现象，但是在当时却被认为是不吉利的预兆。宋神宗又慌了，要大臣对朝政提意见。一些保守派又趁机攻击新法。王安石竭力为新法辩护，要宋神宗不要相信这种迷信说法，但宋神宗还是犹豫不定。

王安石没法继续贯彻自己的主张。到第三年(公元1076年)春天，再一次辞去宰相职位，回江宁府去了。

欧阳修与唐宋八大家文学上的大家，政治上的正人君子。

向先人韩愈学习欧阳修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庐陵(今江西永丰)人。他4岁的时候，父亲病死。母亲带着他到随州(今湖北随县)依靠他叔父生活。欧阳修的母亲一心想让儿子读书，可是家里穷，买不起纸笔。她看到屋前的池塘边长着荻草，就用草杆儿在泥地上画着字，教欧阳修认字。幼小的欧阳修在母亲的教育下，很早就爱上了书本。

欧阳修10岁时候，经常到附近藏书多的人家去借书读，有时候还把借来的书抄录下来。一次，他在一家姓李的人家借书，从那家的一只废

纸篓里发现一本旧书，他翻了一下，知道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文集，就向主人要了来，带回家里细细阅读。

宋朝初年的时候，社会上流行的文风讲求华丽，内容空洞。欧阳修读了韩愈的散文，觉得它文笔流畅，说理透彻，跟流行的文章完全不一样。他就认真琢磨，学习韩愈的文风。长大以后，他到东京参加进士考试，连考三场，都得到第一名。

《醉翁亭记》

欧阳修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在文学上的声誉已经很大了。他官职不高，但是十分关心朝政，正直敢谏。当范仲淹得罪吕夷简、被贬谪到南方去的时候，许多大臣都同情范仲淹，只有谏官高若讷认为范仲淹应该被贬。欧阳修十分气愤，写信责备高若讷不知道人间有羞耻事。为了这件事，他被降职到外地，过了四年，才回到京城。

这一回，欧阳修为了支持范仲淹新政，又出来说话，使朝廷一些权贵大为恼火。他们捕风捉影，罗织欧阳修一些罪名，朝廷又把欧阳修贬谪到滁州(今安徽滁县)。滁州四面环山，风景优美。欧阳修到滁州后，除了处理政事之外，常常游览山水。当地有个和尚在滁州琅琊山上造了一座亭子供游人休息。欧阳修登山游览的时候，常在这座亭上喝酒。他自称“醉翁”，给亭子起个名字叫醉翁亭。他写的散文《醉翁亭记》，成为人们传诵的杰作。

唐宋八大家欧阳修当了十多年地方官，宋仁宗想起他的文才，才把他调回京城，担任翰林学士。欧阳修担任翰林学士以后，积极提倡改革文风。有一年，京城举行进士考试，朝廷派他担任主考官。他认为这正是他选拔人才、改革文风的好机会，在阅卷的时候，发现华而不实的文章，一概不录取。考试结束以后，有一批人落了选，对欧阳修十分不满。一天，欧阳修骑马出门，半路上被一群落选的人拦住，吵吵嚷嚷地辱骂他。后来，巡逻的兵士过来，才把这批人赶跑。

经过这场风波，欧阳修虽然受到了一些压力，但是考场的文风就发生了变化，大家都学着写内容充实和朴素的文章了。

欧阳修不但大力改革文风，还十分注意发现和提拔人才。许多文采并不那么出名的人才，经过他的赏识和提拔推荐，一个个都成了名家。最出名的是曾巩、王安石、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在文学史上，人们把欧阳修等六个人和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合起来，称为“唐宋八大家”。

欧阳修赋诗戏“才子”

欧阳修写农村自然景色的小诗《田家》，多少年来，被世人称颂为精品传诵下来：

绿桑高下映平川，赛罢田神笑语喧。

林外鸣鸠春雨歇，屋头初日杏花繁。

这首小诗，诗人用细致的工笔画，描绘出江南地区的一派浓丽的春光。动、静结合，从动中表现静。人们笑语喧哗，自然界花开鸟叫，这一派热闹风光，更加深了农村自然景色中恬静的诗意。欧阳修的诗写得如此好，被世人称道，很快就成了著名诗人。但某公自以为才高八斗，听说欧阳修擅诗，心里颇不服气，于是就去找欧阳修，欲一比高低。

一天，这人吃完早饭，离家去见欧阳修。他行至半路，见一大枯树，口出两句：“门前一枯树，两股大桠杈。”吟出这两句，想了半天，硬是想不出后两句来。恰巧，欧阳修从此公身后经过，见此状，随即替他续了两句：“春至苔为叶，冬来是雪花。”

此人听了不禁大喜，便说道：“你也会作诗，正好咱俩一同去和欧阳修一比高低。”这样，他俩一同往前赶路。

来到河堤上，一群鸭子正在下水。那人又口出两句：“一群好鸭婆，一同跳下河”。

说出这两句，停了半晌。欧阳修用大诗人骆宾王的名句为他续了下句：“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那人听了后，虽有些尴尬，但仍不自量力说：“好啊，这就成了一首好诗了。”欧阳修听了不语。后来，二人

一同渡河，那人似诗兴不减：“两人同登舟，去访欧阳修。”欧阳修不动声色，一语双关：“修已知道你，你还不知修(羞)。”

王安石教育苏东坡为人第一谦虚好，学问茫茫无尽期。

苏轼的狂傲引起王安石的不满苏轼，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人称苏东坡。他年轻时期就已经出人头地，诗词功夫尤其了得，于是心高气傲，把谁都不放在眼里。

后来苏东坡当了翰林学士，在宰相王安石门下做事，成天都能听到他夸夸其谈，卖弄文才的声音。王安石虽然也十分佩服苏东坡的才华，但是却对他的这种言行轻薄的举动很是不满。王安石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不谦虚的人，不过苏轼是晚辈，他作为长辈还是想找个机会教育一下苏东坡。

王安石上折贬苏轼一次，王安石忽然想起自己在地方做官时碰到的一件事，灵感一来，于是提笔写了两句“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刚写罢第二句，后宫的侍卫就过来请他，原来神宗要召见他。王安石放下笔，马上就进宫面见皇帝去了。平日里，苏东坡经常出入王安石的书房，这天他又来了。一进书房，就看到了桌上未写完的两句诗。苏东坡读了一遍就发现了其中王安石的错误“秋天已至，如何能吹落黄花遍地金呢，岂不荒谬?”他猜想一定是宰相弄错了。于是提笔在后面依原韵写了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王安石和神宗讨论完朝廷大事后，心情特别愉快。他兴致勃勃地赶回书房，准备把自己刚写了两句的诗续完。可是一进书房，他却发现桌上的两句诗变成了四句。等他看完这后续的两句诗，猜想一定是那个才高气傲的苏东坡写的，心里顿时很不高兴，写诗的兴致也一下子没有了。

第二天，他便暗地里向神宗写了一道奏折，意思是让神宗下诏，贬苏东坡到黄州做一个小地方官。王安石有自己的目的，苏东坡学识渊博，但是社会经验却不丰富，在朝廷上，常常给自己新政挑刺，如果让他远离朝廷，静静地反思反思，同时杀杀他的轻薄之气，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没过几日，神宗果然下诏贬苏东坡为黄州团练使。苏东坡纳闷不已，他并无什么过错啊!临行之前，王安石亲自登门好言抚慰，并交待

他三年任满回京时，一定记住从三峡的瞿塘峡(中峡)替自己带一瓮水回来，说想用三峡水泡茶。

终于明白王安石的良苦用心苏东坡天生是个乐天派，他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得失。到黄州后，他认真办好自己的公务，空闲时间就和新结交的朋友陈季常等人一起游山玩水，骑马打猎，饮酒赋诗，心情也好得很。一转眼两年多过去了，到第三年的重阳节时，陈季常邀请苏东坡到自己的后园喝酒赏菊。苏东坡一脚刚踏进后园，顿时目瞪口呆。陈季常急忙问他是怎么了，他还以为苏东坡病了，苏东坡这才道出实情。原来他看到后园满地都是金黄色的菊花，而枝上却没有一朵。陈季常乐得哈哈大笑，说："苏兄，你到黄州三年，怎么到今天才知道这是黄州一景啊!这就是鼎鼎有名的满地铺金啊!"苏东坡这时才为自己给王安石改的那两句诗而脸红。他这才明白原来自己这次被神宗皇帝贬到黄州是王安石的意思，是想让自己专门来看看这黄州的"吹落黄花满地金"，真是用心良苦啊!苏东坡是个知错就改的人，从这天起，他就盼望着早日回到京城，当面向王安石道歉。

学问茫茫无尽期在回京城的前一天，陈季常等朋友专门陪苏东坡游览长江三峡。可是当船快走完三峡全程时，苏东坡才突然想起另外一件事，赶忙命令随从的佣人从峡中打一瓮水带回，陈季常等人不知用意，都以为他是留作纪念，所以谁也没有问他。

第二天，苏东坡动身回京。一到京城，他家也没回，就带上从三峡中打来的水急急忙忙地赶往相府。苏东坡见到王安石后，主动向王安石认错，承认自己眼界不宽，错改了宰相的诗。王安石这时心中也很是高兴，因为见他去黄州三年，比在京城时老练多了，浮夸之气也少了很多。他哈哈大笑说："大诗人啊，这三年可真是委屈你了，不过昨天我已经启奏万岁，让你不但官复原职，而且还推荐你担任更重要的职务呢!"苏东坡这时不好意思地笑了。他忽然想起带来的水还没有交给相爷，赶紧弯腰把水瓮端到桌子上。王安石一见大喜，吩咐家人快去把上好的茶叶拿来，他笑着对苏东坡说："我让你专程从三峡带这水，是专门用它来给你接风的。一会儿，你就明白了。"苏东坡被搞得糊涂了，他不明白王安石的话是什么意思。茶泡好了，王安石刚轻轻抿了一口，就呸的一声，把茶水全吐到了地上，脸色一下也变了。只听王安石厉声

说，“你这瓮水真是从瞿塘峡盛来的?”苏东坡大惑不解地说：“确实是三峡里的啊，不过不是瞿塘峡的水，而是下峡之水。”难道三峡里的水还不一样吗?苏东坡嘴里小声自语着。王安石看到苏东坡窘迫的脸色，又开心地笑了。他细心地向苏东坡解释说：“三峡水是不一样的，中峡水泡出的茶水最好喝，上、下峡的水则不是这样。你以后可以专门到三峡去品尝一下。苏东坡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后来，他还专门找了个机会到三峡品茶，果真如王安石所说。最后，王安石送给苏东坡一句话以为勉励：为人第一谦虚好，学问茫茫无尽期。

苏东坡把王安石的一番教诲一直牢牢记在心间。后来还经常把这件事讲给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教育他们戒骄戒躁，谦虚谨慎。

第十八章

乌台诗案皇帝差点要砍苏轼的脑袋，这是为何呢？

生不逢时的才子苏轼出身于书香门第，学问十分了得，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都在唐宋八大家之列，合称“三苏”。苏轼曾在21岁那年，与弟弟苏辙一起参加殿试，并且都中了进士。当朝皇帝宋仁宗赞叹说朝中得了两个奇才。主考官欧阳修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他也预见说：“30年后，苏轼的文章将会超过我。”苏轼具有多方面的才能，诗、词、散文、书画都有卓越成就。他一生留下四千多首诗，感情充沛、清新流畅、热烈豪放。长久以来，一直为人们传诵。就连当时的许多文人学士都很佩服、景仰他，都以能够同他结交为荣，以能够得到他的指教为幸。

可是，苏轼却是个时运不济的才子。他生前多次受到同僚的排斥打击，还被皇帝几次贬官。

有一次，甚至被抓了起来，押到首都汴京冶他的罪。晚年的苏轼遭到了皇帝的放逐，被皇帝贬官到遥远的两广地区当小吏，直到死前半年才被赦回。还有一次，与他有隔阂的官员为了打击他，竟然告发他的诗中影射了某种特别的意思，皇帝差点为此砍了他的脑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

遭到别人的诬陷北宋神宗皇帝任用王安石实行变法，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坚决反对，总是阻挠新政实施。所以，当时在朝野内外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是势不两立的。可是，苏轼一向是个不会见风使舵的人，他总是实话实说，所以遭到了新旧两党的厌恶。起先苏轼反对变法，受到了新党的排斥，后来，旧党上台，苏轼出于实际情况的考虑又不同意全盘否定新法，遭到了旧党的戒备。再以后，新党又把旧党打了下去，为了争权夺利，又把苏轼归于旧党。

元丰三年，他被调任为湖州太守，当时依照惯例，调职官员要写一份“谢恩表”，然后刊行在“邸报”(当时北宋官方的报纸)上。他在表上写的一些话又让新旧两党产生了愤恨。表中有这样几句话，意思是这样

的："皇上您知道我愚昧，难以追随那些新进的权贵，又不能适应形势；可是您看在我已经年老，却不爱生事，就派我去管管小民……"在他的这份"谢恩表"中的"新进"、"生事"这两个词让人听出了弦外之音。谁是"新进"?谁又爱"生事"?人们对新党一阵嘲笑，当然还有那些自愿"对号入座"的人对苏轼就极为不满了。

当时，一位姓舒的御史大夫趁机向皇上奏了一本，说："苏轼的谢恩表讥讽时事，包藏祸心，怨恨皇上，讥谤皇上，渎职谩骂而没有人臣之节，现在人们已经在争相传诵，他这一举实在是搞得朝野轰动，万死也不足以谢皇上。"

此外，这位舒御史还从苏轼写的诗文中摘出了六十多条词句作为证实苏轼不满朝廷的材料，他诋毁苏轼"讪上骂下"，还举出具体的例子："陛下教群吏学运令，他却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发青苗钱，本来是接济贫民，他却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推行盐法，他却说，'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接着，御史中丞李定也跟着上表，还列举了四点苏轼该杀的理由。一时间，苏轼因为一份"谢恩表"竟然惹祸上身。皇帝将这件案子发到御史台处理。

不久，苏轼就从湖州被抓回京城，过了一个月，又被关进御史台监狱。苏轼获罪的这件案子之所以被称为"乌台诗案"，是因为苏轼因诗获罪是由御史台一手操办的，而御史台常植柏树，柏树上又常常栖着乌鸦，人们常称御史台为"乌台"。

起初，苏轼并不承认自己有怨谤之心，只是说其中的一些诗句的确反映了民间疾苦。可是后来，在御史台官员吩咐手下，手下对苏轼进行了轮番的审讯和折磨，苏轼一个儒生，实在忍受不了这种心理上的屈辱和肉体上的疼痛。所以就承认自己有罪，还写了"供词"。一首描写普通农村人家生活的诗"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苏轼自己说是讥讽了朝廷的青苗立法，他的供词是："此诗意言百姓请香青苗钱立便于城中浮便使却……庄家小子弟多在城市不看次第，但学得城中人语音而已，以讥新法青苗助役不便也。"可是这番话是多么牵强附会!苏轼还说，在《山村绝句》"老翁七十自腰

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中是讥讽了新法实施中的“盐法”太急，使得山中之人饥贫无食，经数月。其实这首诗与盐法哪里有半点瓜葛，苏轼当时已经完全绝望了，就等着御史台把罪状和供词编织就绪，待皇帝批准后杀头了。可是，苏轼竟躲过这场大难，神宗皇帝下令只是对苏轼贬官了事。在这场来势汹汹的“乌台诗案”里，苏轼究竟是怎样解脱出来的呢?

众人纷纷相救据说，当时太皇太后曹氏的一条遗嘱，救了他一命。据说，曹氏病危，神宗皇帝去看她，她说：“当年仁宗皇帝策试制举人回来，见到苏轼两兄弟的文章，很高兴地对我说：‘我为子孙得了两个相才。’如今不但没有重用他，反而要把他下狱论死。苏轼无非是作了几首小诗，发了一点牢骚罢了，这是文人的习性，若是抓到了一点小小的不慎之言，就罗织成罪，何以对得起仁宗皇帝?何以对得起太祖皇帝非叛逆不杀士人的祖训?”于是，神宗决心放了他。

另外，也有人猜测神宗本来就不打算杀他，当时的宰相看到神宗要宽恕苏轼时，就进谗言说：“苏轼讥讽臣下的罪可恕，但藐视皇上的罪不可恕。”还举出了苏轼的一句诗“世间惟有蛰龙知”说，“苏轼不认为陛下是飞龙，竟求知于地下的蛰龙，就是藐视皇上。”神宗却说：“文人的诗句，怎么能这样来推论呢?他咏自己的诗，与我有什么关系?”旁边的一位大臣和苏轼关系要好，就又加了一句：“龙未必专指天子，人臣也可以称龙。”神宗说：“是呀，孔明被称作‘卧龙’，东汉还有‘荀氏八龙’，难道都是人君?”说得那个宰相哑口无言。

后来，神宗又看到苏轼在狱中写的诗，更是动了慈悲之心，所以就赦免了他。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昧自忘身。

百年未了须还债，十口无家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

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另外，苏轼确实是个人才，那些正直的人们都不愿他落难，所以纷纷解救。据说，从苏轼被捕起，救援的奏章、信函就如雪片般飞到京师。王安石的女婿上疏，扬言在皇帝实录上记下神宗不能“容才”；南京张安道在南京上疏，府官不敢接，他派儿子持至登闻鼓院投进；苏轼的弟弟苏辙愿意用自己的官职和薪水为哥哥抵罪。所以，神宗最终决定不杀苏轼。不久，苏轼被贬，“乌台诗案”就这样结束了。

苏东坡官场失意游赤壁才华横溢的苏轼却官场失意，游赤壁时写出千古绝唱。

才华横溢，众人折服司马光执政后，把宋神宗贬谪的许多大臣都召回朝廷，其中有两个是宋朝著名的文学家——苏轼和苏辙。苏轼兄弟俩，是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苏轼20岁刚出头的那年，他的父亲苏洵带着他和苏辙到京城去考进士。主考官欧阳修，正在注意从考生中物色有才华的人。第一场考试下来，他在阅卷的时候，看到一篇文章，高兴得拍案叫好。考卷是密封的，上面没有考生的名字。欧阳修心里想，能写出这样精彩的文章，一定是一个文坛能手。京城里有点名气的文人，欧阳修多少了解一点，这篇文章究竟是谁写的呢?他猜想了半晌，觉得从文章的风格看，很可能是他的门生曾巩。他本来想把这篇文章评为第一名，但是曾巩是他门生，评得高了，怕人们说他偏袒，就把它评为第二。直到发榜的那天，欧阳修才知道，那个写精彩文章的不是曾巩，却是刚到京城的青年考生苏轼。苏轼考取以后，照例要去拜见主考老师欧阳修。欧阳修跟他谈了一阵子，觉得他气度大方，才华出众，打心眼里喜欢。苏轼走了以后，欧阳修跟他的老同事梅尧臣说：“像这样出众的人才的确难得，我真应该让他高出一头呢!”欧阳修这番话一传出去，一些读书人听了都不服气。京城里这样多的人才，难道比不上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后来，大家读到苏轼才气横溢的诗歌和文章，才不得不服输。

“三苏”出名苏轼出了名，他的弟弟(19岁的苏辙)也在同年考取了进士，他们的父亲苏洵的高兴劲儿就不用说了。但是苏洵另外有一番感触。原来苏洵也是个擅长散文的人。他在少年时期，没认真读书，到27岁那年，看到别人一个个都上进了，才发个狠劲读书。过了一年，考进士没考中，回到家里，一气之下把他过去写的文章，一把火烧了，从头

学起，果然进步很大。

这回，他带儿子到了京城，眼看儿子年轻轻的就考中了，怎么不感慨呢。他听说欧阳修是最重视文才的，就把他几年来写的二十多篇文章托人送给欧阳修，请欧阳修指教。欧阳修一看苏洵的文章，文笔老练，别具风格，就向宰相韩琦推荐，韩琦也很赞赏。后来，没经过考试，破格把苏洵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

这样，苏家父子三人在当时京城中都出了名。后来，人们把他们父子三人合起来称做“三苏”。王安石实行新法的时候，苏洵已经死了。苏辙在王安石手下干过事，后来，因为跟王安和合不来，被降了职到外地去了。苏轼主动要求外调，先后当过杭州、湖州(今浙江吴兴)等地方的刺史。他每到一个地方，都兴修水利，减轻赋税，提倡生产，做了一些对人民生活有益的事。

苏轼的牢狱之灾后来，苏轼在湖州看到了地方豪强官吏的横行霸道，很不满意，写了一些诗，讽刺这些事。没想到这些诗传到京城，几个反对苏轼的官僚从苏轼的诗文里摘出几句话，诬陷苏轼诽谤朝廷，大逆不道。他们撤了苏轼的职，把他押解到东京，关在大狱里，想把他处死。

苏轼在监牢里足足被关了100天，受尽折磨。后来，因为实在算不上什么大罪，宋神宗才下令把他释放，贬谪到黄州(今湖北黄冈)。

苏轼到了黄州，挂了个小小的空头官衔，实际上过着流放的生活。他穷得过不了日子，后来靠朋友的帮助，弄到一块地，自己耕种起来。他还亲自整理场地，在东边山坡上盖了一间屋。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别号，叫东坡居士。后来，人们常把苏轼叫做苏东坡。

千古绝唱苏轼在政治上失意的日子里，常常游览山水，写作诗歌，抒发他的心情。有一次，他打听到长江边有个名胜古迹叫做赤壁，就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里，约了几个朋友，乘着小船到赤壁去游览。在那里，他想起三国时期曹操和周瑜大战的情景，触景生情，十分感慨。回来以后，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赤壁赋》。

苏轼不但是写散文和写诗的能手，而且在词的写作上也有很高的成就。他写的词，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豪放风格。在游赤壁之后，他又写了一首《念奴娇》，词的上半首是：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崩云，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苏轼是个博学多才的人，但是他在地理上却出了一个不小的差错。原来黄州的赤壁并不是周瑜火烧曹军的地方。三国的赤壁在现在武汉的上游，而黄州却在武汉下游。不过，黄州的赤壁却因为苏轼这一个差错出了名。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大文学家，就称它为“东坡赤壁”。

沈括画地图沈括是个精通地理,研究兴趣广泛的科学家。

辽国的狼子野心自从宋真宗以后，宋朝一直依靠每年送大量银绢，维持了几十年跟辽朝暂时妥协的局面，但是辽朝欺宋朝软弱，想进一步侵占宋朝土地。公元1075年，辽朝派大臣萧禧到东京，要求划定边界。

宋神宗派大臣跟萧禧谈判，双方争论了几天，没有结果，萧禧硬说黄嵬山(今山西原平西南)一带30里地方应该属于辽朝。宋神宗派去谈判的大臣不了解那里的地形，明知萧禧提出的是无理要求，又没法反驳他。宋神宗就另派沈括去谈判。

沈括的谈判才能沈括，杭州钱塘人，原是支持王安石新法的官员。沈括不但办事认真细致，而且精通地理。他先到枢密院，从档案资料中把过去议定边界的文件都查清楚了，证明那块土地应该是属于宋朝的。他向宋神宗报告，宋神宗听了很高兴，就要沈括画成地图送给萧禧看，萧禧才没话说。

宋神宗又派沈括出使上京(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南)。沈括首先收集了许多地理资料，并且叫随从的官员都背熟。到了上京，辽朝派宰

相杨益戒跟沈括谈判边界。辽方提出的问题，沈括和官员们对答如流，有凭有据。杨益戒一看没有空子好钻，就板起脸来蛮横地说：“你们连这点土地都斤斤计较，难道想跟我们断绝友好关系吗?”

沈括理直气壮地说：“你们背弃过去的盟约，想用武力来胁迫我们。真要闹翻了，我看你们也得不到便宜。”

辽朝官员说不服沈括，又怕闹僵了，对他们没好处，只好放弃了他们的无理要求。

出使的真正原因沈括带着随员从辽朝回来，一路上，每经过一个地方，把那里的大山河流，险要关口，画成地图，还把当地的风俗人情，调查得清清楚楚。回到东京以后，他把这些资料整理起来，献给宋神宗。宋神宗认为沈括立了功，拜他为翰林学士。

沈括为了维护宋朝边境的安全，十分重视地形勘察。有一次，宋神宗派他到定州，(今河北定县)去巡视。他假装在那里打猎，花了二十多天时间，详细考察了定州边境的地形，还用木屑和融化的蜡捏制成一个三維模型。回到定州后，沈括要木工用木板根据他的模型，雕刻出木制的模型，献给宋神宗。这种三維地图模型当然比绘制在纸上的地图更清整了。宋神宗对沈括画的地图和制作的地图模型很感兴趣。

第二年，就叫沈括编制一份全国地图。但是不久，沈括受人诬告，被朝廷贬谪到随州(今湖北随县)去。在那里，环境虽然很困难，但是他坚持绘制没有画完的地图。后来，他换了几个地方的官职，也是一面考察地理，一面修订地图，坚持了12年，终于完成了当时最准确的一本全国地图《天下郡国图》。

《梦溪笔谈》

沈括不但在地理研究上作出了出色的成就，而且是个研究兴趣很广泛的科学家。他在天文、历法、音乐、医药、数学等方面，都十分精通。他很早就研究天文历法。后来，他担任司天监的工作，发现在那里工作的人，不少是不学无术的人，不懂得用仪器观测。他到了司天监以后，添置了天文仪器。为了观察北极星的位置，他一连三个月，每天夜

里用浑天仪观察，终于计算出北极星的正确位置。沈括晚年的时候，闲居在润州(今江苏镇江)的梦溪园。他把一生研究的成果记载下来，写了一本著作《梦溪笔谈》。

活字印刷术在那本书里，除了记载他自己研究的成果以外，还记录了当时劳动人民的许多创造发明，其中特别有名的是毕昇的活字印刷技术。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在北宋之前，已经有了雕版印刷术。但是雕版花费工夫大，而且刻好一块木板，要改动一个字，就要全部重刻。沈括在钱塘老家看到一位老工匠毕昇，用一种很细的黏土，做成许多小块，刻上字后放在窑里烧硬，成为一个个活字。用这种活字排版印刷，比雕版印刷方便多了。沈括看到这件新鲜事，十分感兴趣，就进行详细的观察和了解，还把毕昇的发明记载在他的《梦溪笔谈》里，后代的人读了他的书，才知道活字印刷术的来历。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一书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小就喜欢读史书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他从小聪颖过人，勤奋好学，酷爱史书。五司马光岁时就能熟练背诵《论语》、《孟子》等古文篇章，7岁时，听人讲解《左传》，就能理解它的基本思想，并且还能生动地讲给家里人听。除此之外，年少时，他就读了《史记》、《汉书》等史书，对于这些书籍，稍能了解文章大意，就手不释卷，甚至忘记饥渴寒暑。他热爱读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自幼至老，嗜之不厌”。仁宗宝元初年，也就是司马光刚满20岁那一年，他考中进士甲科，授奉礼郎。司马光的这些早年的经历对他以后治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司马光在长期阅读史书的过程中，他对于中国古代的史书有着深切的感受，他认为中国古代的史书虽然很多，可是由于没有一部书系统地记载从古到今的历史，所以造成了中国古代历史的纲目不清，给研究历史的人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和不便。

所以，他决定要集采众家史书的长处，着手编写一部以年为经，以国为纬，有鲜明时间和空间特色的史书，方便后人读史，也使中国古代

的历史记载不再由于朝代的更迭而被分割得支离破碎。

编写新的史书而当时的皇帝宋英宗为了维护帝王的统治，也很想请那些学识渊博的大学士编写一部有关历代君臣事迹的书，供后世帝王借鉴和仿效。司马光把自己的一些设想和英宗的想法糅合到一起，就承担了这项工作，开始着手编写新的史书。

司马光采用《左传》编年记史的方法，从战国开始写到秦二世时期，起草完成了《周纪》5卷，《秦纪》3卷，总共是8卷的编年史，合称为《通志》。

到公元1066年，就把他作为样书呈送给英宗皇帝。结果，这部《通志》受到了英宗的肯定和支持。英宗鼓励司马光继续编写，并且还下令设置书局(在汴京城的崇文院)，让司马光带领着一批历史学家如范祖禹、刘恕、刘颁等进行编写。这批历史学家根据各自的爱好和特长，进行了不同的分工，与司马光密切配合，正式开始编撰从古至今的一部通史。

宋英宗去世后，继位的宋神宗也十分重视这部史书的编写工作，他建议把书名定为《资治通鉴》，还亲自为书作序，命司马光每日进读。“资治”就是帮助皇帝治理好国家，“鉴”是镜子的意思。“资治通鉴”就是这部书能够使皇帝借助历史这面镜子来分清是非功过和利害得失，以求作为统治阶级巩固封建政权的借鉴。

司马光在编写过程中，态度特别认真，史料记载说他在每次编写一个内容之前，都要先广泛收集史料，包括正史、杂史等，然后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考证史料的真伪，继而拟定总提纲和分目提纲，根据时间先后顺序排比史料，删繁就简，咬文嚼字进行编写。

因为司马光是总纂官，所以他还要呕心沥血地修改稿子，手下的历史学家所写的每部书稿他都要亲自过目，据说当时经他修改过的书稿堆满了两间屋子，里面没有一个草字，写的都是楷书。

司马光为编写《资治通鉴》付出了自己毕生的心血和精力。他从公元1065年开始，到公元1084年成书，前后共享了19年时间。他19年如

一日，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

为了不使自己因过度劳累睡过了头，耽误写书的时间，他曾经专门请人制造了一个圆木枕。睡觉时，只要圆木枕轻轻一动，头就会落枕，把自己从睡梦中惊醒，这样他就可以早点起来继续写书，司马光的那个圆木枕就被人们称为“警枕”。司马光的这种勤奋治学、一丝不苟的精神广为人们称道。

司马光所编写的《资治通鉴》一书中记述了从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59年总共1362年的历史，共294卷。完整地介绍了各个朝代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各种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成就。还记录了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事迹和思想。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主要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可是客观上，《资治通鉴》一书也继承和完善了我国史书中的编年体记史的体例，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

佳丽三千，独选孟娘她一味的好性格却成了后来成为哲宗的新宠刘妃用来赚取后位的工具。

为皇帝选择皇后宋神宗赵顼去世之后，他的第六子赵煦就继承了皇位，也就是宋哲宗。当时，宋哲宗刚满10岁，不怎么懂事，所以只得暂且由他的祖母高太皇太后掌握国家大权。

一晃五年就过去了，宋哲宗也到了该结婚的年龄，其实，中国古代皇帝结婚的年龄也未有任何限制，一般都在16岁左右。但是太皇太后与皇太后认为神宗已满15岁，是应当举行大婚的年龄了，所以高太皇太后就下诏为哲宗选后。因为高太皇太后下令不从宫亲贵戚中选皇后，所以就挑选天下各地的美女进宫，要从中为宋哲宗选出一位母仪天下的皇后。没过几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好几千名美女就进到了皇宫。首先由皇宫里的总领太监进行第一轮挑选，选出一百多名。然后，再由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再亲自从这一百余名美女中为哲宗选出皇后。

百里挑一选后那日，高太皇太后仔细地端详着这一百余名美丽的女子，看过一个又一个，都不太满意。直到后来，高太皇太后突然发现队伍的最后几个女子中，有一个女孩子特别地与众不同，她身着紫红衣

裙，仪态端庄，面如桃花，模样长得实在俊俏，于是高太皇太后禁不住在这女孩子身上细细打量起来，越看越满意，暗自点了点头，只觉得皇后的最佳人选就是这位姑娘了。这时，诏令官察言观色，发现高太皇太后眼睛一直不离开这个女子，于是赶紧走上前说：“启禀太皇太后，她叫孟娘，是马军虞侯孟元的孙女。”高太皇太后听到这里，就招呼孟娘走上前来，她笑着说：“你过来，让我好好看看。”孟娘也十分乖巧，轻盈地走到高太皇太后面前，跪下轻启朱唇：“民女孟娘叩拜太皇太后，皇太后。”高太皇太后叫她起来说话，可是这孟娘却不肯起来，还是跪着对高太后说：“太皇太后德高望重，人所共仰，民女应该跪拜听话。”

高太皇太后当下就更喜欢这个女孩子了，觉得像这样知书达礼、性格温顺的好姑娘就应该贵为皇后，所以马上就停止了这次审验，把孟娘接到了后宫。

第十九章

皇帝大婚宋哲宗这孟娘是什么样的出身和为人呢?孟娘当时18岁，是北宋马军虞侯孟元的孙女。孟娘因为从小长得漂亮，性格温顺，受到了爷爷孟元的特别喜爱。爷爷孟元曾为孟娘请过当地最好的老师来教她诗词歌赋和经文，使她知书达礼，有学问、有知识，并且一点都不俗气。

高太皇太后弄明白这些情况后，十分满意，就和向太后商量，向太后也同意了，于是就准备挑选日子，为哲宗完婚。哲宗本人早已听说孟娘的美貌，却一直没有亲眼所见，本来就已经很向往，现在又听到高太皇太后和向太后对他说这女子贤惠有教，受到她们的喜爱，所以也没有二话，说：“孩儿愿意听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的安排。”高太皇太后于是下令五月初八那日举行册封孟娘为皇后的大典，接着为哲宗举行大婚。她还专门派人教孟娘一些宫里的礼仪，还有皇帝大婚和册封皇后的规矩，直到孟娘一一记在心里，高太皇太后才命人把孟娘先送回了家，到时再来迎娶。

五月初八那日，天还没亮，孟娘就早早起来梳洗打扮，高太皇太后也从宫中专门选了一些宫女为她打扮。

天刚亮，奉迎使、尚书左仆射吕大防就带了奉迎卫队来接孟娘。

那时，礼炮声震耳响彻云霄，鼓乐齐奏欢天喜地，孟娘带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渴望，也带着对爷爷和父母依依不舍的心情，坐在了精美绝伦的乘舆里，由奉迎卫队护送去了皇宫。

皇帝大婚在中国古代是十分重要和庄严的事情，因为它代表着皇帝皇后将合天下之好，上事宗庙，下继后世，为天下夫妇树立仁德典范，所以大婚自然不同寻常，礼仪也就极为复杂。

孟娘接受了宋朝迎立皇后的“诰命”，也就是册宝，册用珉玉50简做成，宝则用纯金制作，方一寸五分，高一寸，上面刻有“皇后之宝”四个

大字，接受册宝也就代表着孟娘愿意做皇后，愿意入主后宫，接着她将册宝交由司言、司宝掌管，再由司仪引导坐上了皇后宝座，坐北面南，接受内官们的叩拜。这样，册立皇后的仪式告一段落。

皇帝大婚的仪式比起册后仪式更是复杂，孟娘哪里经过这样的大场面，经过这样的折腾，她已经有些支撑不住了，不过也只有等这些礼仪全部结束，孟娘才住入了属于皇后的坤宁宫，成为大宋第七位皇帝宋哲宗的皇后。

孟娘嫁入了皇家，仍旧保持着自己的温顺贤惠的性格，对下人十分宽厚，也从来不去压制其他的嫔妃，所以在成为皇后的前几年受到了皇宫上下的尊敬和爱戴，称得上是宋朝典型的好皇后。只是凡事有利就有弊，她一味的好性格却在后来成为哲宗的新宠刘妃用来赚取后位的工具，最终哲宗废掉了孟后，另立心狠手辣的刘妃为皇后，实在是让人觉得世事弄人。

刘婕妤搞孟皇后孟皇后也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就被废掉皇后之位。

贤淑的皇后哲宗的皇后孟娘是高太皇太后与向太后亲自为哲宗挑选的百里挑一的好皇后，她温柔贤淑，知书达礼，又性格极好，宋哲宗在新婚燕尔对孟娘也是一往情深，两人恩爱有加。

司马光孟娘比哲宗年长四岁，她侍奉高太皇太后与向太后周到备至，友好地对待其他妃嫔，对宫女十分关心和照顾，所以孟皇后被公认为是贤良淑德的好皇后，受到了皇宫上下一致的尊敬和爱戴。

刘婕妤争宠后宫然而好景不长，高太皇太后病逝，哲宗亲政后由于政务繁忙，开始只是偶尔冷落孟皇后，这也是在所难免，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后，孟皇后就感到事有蹊跷了，她发现宋哲宗对自己有些爱理不理了，甚至十分冷淡，有时甚至半月不上她的坤宁宫一回。孟皇后纳闷于皇帝的冷淡，急忙打听事情原委，原来哲宗喜欢上了擅于讨好人的刘婕妤，甚至宠爱刘婕妤到说出让刘婕妤为皇后的地步。孟皇后也不便计较，再加上她本身性格就很温顺，也就听天由命去了。不过，这个刘婕妤可不是盏省油的灯，她听到皇帝偶然间说出的立她为后的话，心里便

一下子怦然跳动了起来，她有些蠢蠢欲动了。可是要想当皇后障碍却有很多，首当其冲就是孟皇后。于是刘婕妤打定了主意：一定要将孟皇后扳倒，自己做皇后。

刘婕妤仗着哲宗的喜爱，寻找着契机压倒孟皇后。绍圣三年的一天，孟皇后带着嫔妃们去朝景灵宫谒，在礼仪结束后，孟皇后坐下来休息，其他妃嫔都恭敬地站在皇后周围等待，可是刘婕妤却胆大地一个人站在门边用背对着孟皇后，她这明显是给孟皇后难堪，孟皇后本来应当按宫中的规矩，治刘婕妤的罪，可是孟皇后天生宽宏大量，她没有那样办，而是什么都没说，站起身来当做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回宫去了。这时刘婕妤认定了孟皇后的懦弱，从此欺负孟皇后的气焰更加嚣张了。

还有一次，冬至节将到，孟皇后率领众嫔妃前去隆佑宫朝见向太后，在向太后未出来之时，孟皇后与众嫔妃要坐下来等候。按宫中规矩，孟皇后要坐金饰的椅子，而其他嫔妃则坐木椅子，刘婕妤自然也不例外，可是当宫女为刘婕妤搬来木椅子时，她却不愿就坐，眼睛还总是瞟向孟皇后坐的金饰椅子。众人都心知肚明，也不知该怎样处理这件事。这时一个调皮的宫女搬来了另一把金饰椅子，刘婕妤高兴坏了，心安理得就美滋滋地坐在了上面，嫔妃们虽然很气愤，可是孟皇后不说话，她们也毫无办法。

这时，一个宫女高喊：“太后到。”刘婕妤听到赶忙站起来，生怕得不到讨好向太后的机会，可是太后并未到，孟皇后只好叫大家坐下。刘婕妤只好也随大家灰熘熘地坐了下来，可是哪里料到那个调皮的小宫女早已将金饰椅子撤了去，刘婕妤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嫔妃见状，都哈哈大笑了起来，刘婕妤生气极了，再加上摔得疼痛难忍，她连太后的影子也没见到，就跑去向哲宗诉苦去了。这件事让哲宗对孟皇后起了疑心，当晚上就到坤宁宫向孟皇后问罪，孟皇后一见皇上脸色不对，马上就跪在地上将白天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把责任归到自己的身上，说是自己平时管教宫女不严所致。其实这件事本来就不关她的事，是那个刘婕妤自讨苦吃。可是孟皇后不懂得自我卫护，在与刘婕妤的次次交手中屡屡居于下风，这没有平息刘婕妤已经点燃的嫉妒的火苗，反而更助长了刘婕妤扳倒孟皇后的气焰。

皇后被扳倒了从此刘捷妤寻找一切机会来搞垮孟皇后，她派了亲信耳目监视孟皇后的一举一动，她买通皇帝身边的亲从郝随为她效力。时日长久，果真让她逮住了机会，孟皇后的养母宣夫人燕氏看孟皇后一直没有为皇帝生下皇子，内心十分着急，于是便私下里请了尼姑法瑞设祭坛，祈求观音菩萨赐福给孟皇后，让她早生龙子。却哪里料到福没赐到，却被宫里的人传了出去。刘婕妤的耳目郝随得知这个消息，乐得简直发狂，忙不迭得告诉刘婕妤。刘婕妤高兴地直拍巴掌，马上让郝随写好奏章呈给皇上，说孟皇后指使人暗里诅咒皇帝，哲宗看完郝随的奏折，虽然心里不相信，但还是有些将信将疑，派了梁从政等几位大臣负责审讯这件案子。

刘婕妤听说之后，赶紧叫来梁从政等人，吩咐他们务必要拿到口供，说是孟皇后指使干的。梁从政几人抓来三十多位太监和宫女，严刑拷打，逼问口供。可是孟皇后平日里对这些宫女太监十分照顾关心，这些太监、宫女不忍心诬陷这么好的皇后，没有一个人诬陷皇后，甚至有的太监被打断了肋骨，有的宫女被割掉了舌头，也毫不昧着良心说话。最后，梁从政没着了，只有按着气息奄奄的太监和宫女们的手在早已写好的供词上按下手印，拿给皇上看了。宋哲宗接过供词一看，是孟皇后指使人来诅咒他的，大吃一惊，他不能相信贤惠的孟皇后会害他，于是就让御使董敦逸重审这件案子，务必要查个水落石出。哪里知道这个董御史却辜负了皇帝对他的期望，在郝随的旁敲侧击下，竟又将原判原封不动地退回给哲宗。哲宗这次没辙了，但他也生气孟皇后没生下儿子，所以下旨废掉孟皇后，收回皇后册宝，孟皇后即刻搬出坤宁宫，贬送瑶华宫，赐号华阳教主，玉清妙静仙师，法号冲真。

孟皇后也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就被废掉皇后。直到她进到瑶华宫，才得知是养母宣夫人为她祈求早生皇子，而这件事又被刘婕妤利用才使自己遭受灾难的。孟皇后虽然心里十分难过，但她不怪罪任何人，只怪自己不能给皇帝生下皇子。她为人太善良，直到住进瑶华宫还真诚地希望别的妃子，特别是刘婕妤早日为哲宗生下龙子传宗接代。

宋徽宗的少年时代谁也不会想到，他那及时行乐的生活观点，他那些玩乐的癖好，竟会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无拘无束宋徽宗赵佶是宋神宗的第十一个儿子。赵佶上面有十个哥哥，其生母也只是神宗的一个妃子，按照立嫡、立长的原则，赵佶此生本没有当上皇帝的指望，只能与其他没有取得太子资格的兄弟一样，被封为亲王，他三岁被封为遂宁郡王。

宋徽宗当时正是比他年长5岁的六哥赵煦即位称帝的那年。14岁时他又被封为端王，按习惯从这时他得离开深宫，到专门为他建成的端王府去居住。

后来因为昔日的端王爷赵佶做了皇帝，所以人们说端王府是"潜龙"的地方，因而端王府也被称为潜邸。按照宋朝家法，赵佶虽然是皇子龙种，但是因为只是亲王，所以不得过问政治，更不得与朝中官员交往。并且为了避免有"问鼎"的嫌疑，甚至于不能有自己的抱负与事业，所以他的一举一动无疑都是有无形拘束的。

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赵佶的几个兄弟，精神十分空虚，整日只知道花天酒地，而端王没有用酒精来打发消遣寂寞无聊的时光，而是狂热地热爱上了绘画、书法、诗词等。他经常把当时擅长书画，喜爱诗文、经史的名士邀到自己的府上，摆上酒席，高谈阔论，酒过数巡之后，便各自即兴挥墨，或诗或唱或画。当时的书画家吴元瑜、王先和赵令穰等人，都是他的座上常客。这些文人和端王的相交很好，可以不拘礼节，端王也将他们看做知音，还常常把自己填的曲子让歌妓们演唱。有时干脆自调琴弦，引吭高歌，也会博得满堂喝彩。在这样的环境里，赵佶的艺术造诣达到很高的水准。他现在存世的画有《芙蓉锦鸡》、《池塘秋晚》，两者都是公认的珍品。

他的字体初学黄庭坚，后来受另一大书法家薛稷的影响，逐渐推出新意，形成了别具风格的"瘦金体"，另外徽宗的诗与词，也有很多的名篇佳作。

热爱足球除了诗词书画，平常赵佶还喜欢打球、驯兽之类的娱乐活动。在唐宋时期，球类游戏是分两种的：一种是骑在马上打的称为马球，另一种是用脚踢的也就是"蹴鞠"。端王对于这名叫"蹴鞠"的玩意非常喜爱，"蹴鞠"是用脚踢的球，有双层皮。里面用一种动物尿泡做球胆，

可以用来充气；外面再用霉软而结实的皮子包起来缝合，踢起来十分经久耐用，实际上“蹴鞠”就是当今风靡全球的足球的最初雏形。

这种球可以组织对抗性的集体竞赛，也可以一个人玩，因而在当时的整个上流社会十分流行，不仅皇帝、大臣踢球，连闺中少妇仕女也都以踢球为时髦。赵佶在自己的院中建了一个十分漂亮的球场，平日里与手下人一块踢球，后来又招来一班王孙公子在这里角逐切磋技艺。

端王因为攻门准确，在比赛中常常被推举为某一队的攻门手，也就是“球夫”。当裁判员员宣布比赛开始，副攻门手把球传给他后，他能在很远的地方，起脚将球踢入球门。端王自己爱踢球，也极为看重球艺高超的人。比如那位在《水浒》中有名高俅，原本是苏东坡的一个档童，写着一手好字，球也踢得很漂亮，后来转到王先门下。有一次，高俅奉了王先的命令给端王送东西，正好碰上端王在踢球，端王府的仆役便将高俅引入球场，并且禀报说：“王爷，王先大人派人求见”。端王正一个人踢得入迷，只说了一声“知道了”，就继续去踢球。高俅在一旁垂手而立，毕恭毕敬地等着，也不敢搭话。这时，正巧球滚到了高俅脚下，高俅也是个爱球之人，他看到端王踢球，本来就已经脚痒难熬，这时看到球到了脚下，哪有放过之理，当下起一脚，球便唰得一声冲入了球门。“好球!”端王好长时间没有见过球技这样好的人，于是没有觉察到地喊出声来，他也忘了问来人是干什么的，当下邀高俅进场对踢。

高俅本来就十分爱踢球，于是就痛痛快快地和端王踢起了球，两个行家在场上对阵玩得很是高兴。

尽兴玩过之后，端王才问了高俅姓名和所属，于是命令手下人告诉王先说端王把东西和人一块留下了，于是高俅转到端王门下。

哲宗皇帝英年早逝后，因为没有留下儿子，向太后又十分喜欢文学艺术造诣很深、声名当时已经响誉开封城的端王，所以后来端王当上了皇帝，高俅也随之飞黄腾达，端王手下的另一些人非常眼红高俅，对高俅也流露出不满的情绪，当了皇帝的赵佶便说：“你们谁要有高俅那样的脚下功夫，也让你们高升。”

少年时代的端王赵佶只是按照一个命定的亲王资格生活着，在这个

天地里，他活得无忧无虑，放荡自在，没有谁想用“皇储”的条件要求他，也没有向他灌输儒家的“节欲”、“仁厚”精神和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谁也不会想到，他那及时行乐的生活观点，他那些玩乐的癖好，竟会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宋徽宗鹰击长空展鸿图他挥笔绘成了一幅气势非凡的《鹰击长空图》：一只临空翱翔的巨鹰，背负青天，俯瞰着江山万里。

鹰击长空不少史籍都记载了赵佶做皇帝之前作为皇帝贵族成员的一些琐事。我们从中发现，比起其他皇室成员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来，赵佶显得胸有城府。他很少参与其他那些胸无大志的亲王们组织的宴游活动，成天深居独处，不是练字作画就是习兵舞剑。对朝中大臣，他也总是彬彬有礼，随时保持着一个谦虚的姿态。这使得朝廷上下对他怀有一致好感。有一天，负责观察天象的官员郭天信来到他的居室，悄悄告诉他说：“王星将入宫室(星座)，端王将君临天下。”这是毫无根据的推测，但这种话多说几句也无妨。说对了算是拍准了马屁，说不定有朝一日仅凭这几句话就平步青云，说错了也不会被人知道，因为亲王如果把这话传出去，招来杀身之祸的只能是他自己。所以郭天信这类官员经常玩弄这种投机钻营的把戏，然而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赵佶竟然因此高兴得几天几夜没有睡好觉。他挥笔绘成了一幅气势非凡的《鹰击长空图》：一只临空翱翔的巨鹰，背负青天，俯瞰着江山万里。

高俅赵佶梦想成真万万没有想到赵佶居然几天之后便梦想成真——他病了一年的哥哥宋哲宗赵煦去世了。哲宗无子，该从弟弟中选出一人继承皇位。尽管哲宗的弟弟很多，但赵佶依然充满信心。凭他平日与朝中大臣的良好关系，以及当时掌有国家大权的向太后对他的厚爱，他相信皇冠最终会落在他的头上。终于如愿以偿，但远不是赵佶所想象的那样顺利，要不是向太后的力争，他的愿望终将化为泡影：哲宗刚一驾崩，向太后便召来群臣商议皇位继承人，她哭着对群臣说：“国家不幸，皇帝无嗣，亟应择贤继立，慰安中外。”大臣章惇回答道：“依照律令，应立简王。”向太后反对道：“说起来诸王都是神宗的庶子，谈不上该立谁不该立谁。”章惇又说：“即使如此，也该立庶子的长子申王。”太后又反对道：“本来是该立申王，但他有眼病，不便作君王。所以依次下来，也就只好立端王了。”大臣章惇一听反驳说：“端王自来有些轻佻，怎能

做天下君主呢?”太后说：“这就不对了，先帝在世时就曾经说过，端王有福寿，而且仁孝，与诸王都有所不同。”其他大臣见向太后如此固执己见，都明白了向太后的心思，于是纷纷附和起来。一个叫曾布的大臣吼道：“章惇从未和我们商量过，如今怎能在这里擅作主张呢?依我看还是太后出一道圣谕也就行了。”蔡卞、许将也齐声应道：“合依圣旨。”章惇见自己势处孤立，知道争执下去也没有用，只好缄口不言。这时，赵太后趁机宣读圣谕，将皇位的继承权交给了赵佶。

不过这一切对于后来已经当了皇帝的赵佶来说都并不重要了。他在以后的一生中最记忆犹新的只有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初八那个难忘的日子。哲宗去世的消息是那天早晨从宫中传出来的。

当时，寒风卷着漫天黄沙，呼叫着冲向京城的千家万户，也从紫禁城中那些辉煌巍峨的飞檐斗拱间匆匆掠过。他当时正在离紫禁城不远的端王府内，听到这一消息，他预感到将要发生一场改变他今后命运的大事，于是再也按捺不住了。他时而侧耳倾听，时而翘首张望，焦急地在殿廊下踱来踱去，还一次次望空合掌，默默地祈祷……

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乘风而来，两个小黄门冲进王府，还没有收紧缰绳就叫了起来：“太后圣谕，端王即刻进宫!”赵佶未等到话音落地，便翻身上马，带领一群护从跃出府门来到了皇宫。他刚进皇宫就被带到了宋哲宗灵前。他在灵前做的第一件事并不是举行告别哲宗的仪式，而是举行皇帝登基典礼。

宋徽宗贪玩误国宋徽宗这个“贪玩”皇帝将宋朝变得乌烟瘴气：官吏腐败，政治黑暗，民不聊生。

贪玩的皇帝宋徽宗是历史有名的“贪玩”皇帝，他少年时代喜爱诗词书画，对于蹴鞠、玩乌、赏石一类的技术是无所不能，无所不会。即位后更是置国家大事于一旁，任用阿谀奉承的奸臣蔡京辅政，重用童贯为其搜括玩物。他在杭州设立造作局，挑选东南的能工巧匠，为他制造玉器，雕刻象牙：，又下令设苏杭应奉局，专为皇帝搜集江南的奇异花木，怪石珍玩，用大批船只运往京城，称作“花石纲”。

其实，纲是自唐宋以来，对全国各地运往京城的同一种类的大批货

物所编的组名，以前有“盐纲”、“粮纲”，专为救急使用，而宋徽宗时运往京城的“花石纲”，却为享乐用。“花石纲”船队，日夜行走在淮河、汴水之间，首尾上千里，影响农业生产。有时甚至拦截州县运送粮饷的官船和私人的商船，给东南地区和运河沿岸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不少人甚至为之倾家荡产。宣和二年，江浙等地百姓不堪忍受“花石纲”之苦而爆发了方腊起义。

为皇帝寻找珍玩的朱家父子当时苏杭应奉局的主管叫朱冲，他专为皇帝搜集江南的奇花异木，怪石珍玩。朱冲本是苏州的市井之徒，后来由于与蔡京相识，蒙蔡京的栽培，受宠若惊，办事格外卖力，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官宦之家，只要有些稍可观赏的花石，朱冲和他的儿子朱耐便叫人贴上黄色封条，表示已属于“御用之物”，稍有违抗者，差官立刻借口“对皇帝大不恭”，轻则罚款，重则抓起来投入监牢，任意治罪。他动不动就拆屋毁墙，弄得鸡飞狗跳，比强盗还凶恶。民间搜遍了，就到长江和太湖中去打捞怪石。此外，应奉局还要替皇帝采办荔枝、龙眼，椰子等时令佳果，网罗供皇帝玩赏的珍禽奇兽。在几千里长的京杭大运河上，行驶着运送花石、贡果的船队，这些船十几只编组为一纲浩浩荡荡地向开封进发。有一次，为了运送一块巨大的太湖石，曾用上千人拉纤，悲凉的纤歌响彻运河两岸，在路过城镇桥梁时，大石难以通过，便扒开城墙，拆毁桥梁，总要按时将奇花异石送往京城。

朱家父子如此用心为皇帝办事，自然不愁高官厚禄的报酬，而且还可以出入皇帝的内殿，直接感受到天子的深仁厚泽。一次，朱耐在皇帝这边侍宴，酒兴浓时，皇帝突然起身说：“卿父子为朕日夜操劳，无以为报，朕今为卿斟满这杯酒。”朱耐哪里敢受如此大恩，连忙诚惶诚恐地下跪，把头叩得捣蒜似地咚咚响，口里还不住地称“死罪，死罪”，弄的皇帝也紧张起来，他连忙伸手去拉朱耐的胳膊，并笑着说：“卿是朕喜欢的忠臣，往后内廷不要多礼。”朱耐这才稍稍定神。从此之后，朱耐便用一块黄布把皇帝碰过的地方缠着，名义上是对皇帝摸过的地方不敢冒犯，实则是给自己贴上了“御用”商标，增加个人的身价。东南的地方官对朱家父子更是毕恭毕敬，谁要是不买账，用不了几天就得卷舖盖走人。朱家的奴仆也都衣紫腰金地当上了官，因此人们称朱家父子为“东南小朝廷”，还编了这样的顺口熘：“金腰带，银腰带，赵家世界朱家坏。”

宋朝的动植物园对于“花石纲”所运来的珍奇花木，宋徽宗先后役使上万工匠，修建了举行祭祀活动的“明堂”，举行宴会活动的“延福宫”和为祈求多生儿子而在方圆十里垒土建成的假山艮岳。艮岳是以人造山岳为主体的综合风景区，它巧夺天工，也是当时最大的动植物园。

而为了造成艮岳上的袅袅云雾，徽宗要工匠们制造了一些很大的油布袋，在水里浸湿以后，由宦官们在黎明时设在怪石之间，以捕捉早晨的云雾，然后妥为保藏，一旦皇帝游幸于此，便打开这些口袋，顿时，山间云雾缭绕，使人有置身洞天福地之感。这个花样叫做“贡云”。这里还饲养着天南地北网罗来的各种动物，由专人驯养它们。有一次，赵佶领官僚去游万岁山，山上上万只鸟的声音响彻四野，赵佶大喜，这时，近侍忙说：“万岁山珍禽迎驾”，赵佶立即封了这人高官。宋徽宗常常将价值百万贯的装点有奇花异石的华丽宅第赐给那些吹牛拍马奉承自己的大臣。宋徽宗宠爱的人有六个，被人们称为“六贼”，即蔡京、朱耐、王辅、李彦、梁师成和童贯六人。他们像苍蝇一样守在皇帝身边，奉承着皇帝，而背地却干着贪污受贿，搜刮民财的勾当。

迷信的宋徽宗宋徽宗不仅爱玩，还很迷信。在他统治期间，全国各地都在忙着搜集天神降临的征兆，今天是天神显灵坤宁殿，明天又是什么地方飞龙出现，要么在什么地方又看见了天书、地诰之类的东西，他都一封赏。他喜欢道教，自封为“道君皇帝”，也喜欢别人称呼他“道君”或“道君皇帝”，有时甚至亲率道士数百人，前呼后拥去祀天。赵佶不仅自己信仰道教，还要下令让他的子民全都信奉道教。他每年拨给道士们大量钱财，一个寺院的上千亩田地也可以免税。在他的带领下，宋朝道士人数空前增多，而这些道士领到国家的钱后，就到处招摇撞骗，成为社会的寄生虫，腐化着社会的肌体，侵蚀着宋朝这个国家的活力。

宋徽宗这个“贪玩”皇帝将宋朝变得乌烟瘴气：官吏腐败，政治黑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边境更是毫不稳定，北宋政权摇摇欲坠。到了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四月，徽宗和他的儿子钦宗被金人俘虏，自此，统治中国167年的北宋王朝宣告灭亡。

宋徽宗寻妓徽宗赵佶风流好玩，实实在在是误了国家，败坏了江山。

宋徽宗与李后主的惊人相似宋徽宗赵佶的一生与南唐后主李煜的一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在政治上都重用奸邪，十分地腐朽昏溃；在生活上都是挥霍无度，穷奢极欲；在艺术上，又都是十分有才华的，有着很深的造诣和对书画诗词的独到见解；在宗教上，二者都好道；并且二人最终都作了敌国的俘虏。不过二人也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后主不嗜女色，可是徽宗赵佶却生性轻浮，除了爱好花木竹石、鸟兽虫鱼、钏鼎书画、神仙道教外，还嗜好女色如命，后来更是终日沉湎其中，放浪形骸，不能自拔。

迷恋妓女赵佶是17岁正式大婚的。婚后，他不喜欢相貌平平的皇后，却宠爱太后的侍女郑氏和王氏以及出身寒微的刘贵妃等人。因为这些女人个个袅娜动人、姿色出众。有的是善解人意，温柔多情；有的是能说会道；还有的心灵手巧，温柔体贴。这几个人各领风骚，人人都能够擅古代妓女一时之宠。她们曲意奉承，对徽宗无微不至，直令得徽宗赵佶与这些妃子日夜缠绵，朝夕相拥。不过再美味的佳肴吃多了也会腻烦，再绮丽的景致眼熟了也不再新奇。徽宗是个有着艺术气质的人，他讲求新奇。十几年如一日地享受太平之乐，早已使风流成性的赵佶对宫中那甜得发腻的谄媚和刻意的奉迎，感到索然寡味了。一天，他闲得无聊，在一个团扇上提笔写了“选饭朝来不喜餐，御厨空费八珍盘”十四个字，忽然文思枯竭，让一位大学士续下一句。那人特别会揣摩赵佶的心思，就续了句“人间有味俱尝遍，只许江梅一点酸。”是啊，甜酸爽口的杨梅当然会解御厨八珍之腻。赵佶的人间女色“一点酸”就是名满京师的青楼歌妓李师师。

徽宗虽然贵为皇帝，可是他信奉着中国古代男人中流行的一句话“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他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他不喜欢后宫中的那些嫔妃们的虚伪与争风吃醋，他喜欢狎妓时的轻松、自然，没有丝毫做作，所以徽宗也不管什么皇帝尊严，也不受那些封建礼教的束缚。他好像甚至不把自己当做万人之上的皇帝，他习惯了端王的生活，只是在敷衍着皇帝的责任罢了。他贪恋女色，追求的是色声俱佳的丽人，也追求那种风流才子与绝代佳人互相倾慕的意境，李师师正好圆了他的风流梦。

李师师原本是京城的一位穷染匠的女儿，本姓王，小时候因为父母

双亡，所以为隶属娼籍的李姥收养，从此改姓李，名叫师师。经过李姥多年的悉心调教，李师师成为风姿绰约、技艺卓越的歌妓，芳名远扬开封城。可能由于童年凄凉的生活在李师师心里刻上了深深的烙印，成名之后，她给人的感觉始终总是淡淡的忧伤，她喜欢凄婉清凉的诗词，爱唱哀怨缠绵的曲子，常常穿着乳白色的衣衫，轻描淡妆，这一切都构成了一种“冷美人”的基调，徽宗第一次见面就被她的这种气质迷倒了。

徽宗赵佶第一次去妓院是乔装打扮成商人模样的。他见到李师师不是那种浓妆艳抹、倚门卖笑的荡妇，却反而有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尊严。她没有半点曲意讨好的媚态，言语中更是没有一些庸俗的气味，她有礼貌地接待赵佶，看起来淡雅，闻起来馨香，直令人神清气爽，心情大好。徽宗被李师师的气质所折服了，特别是当李师师知道赵佶真实身份后，依然保持着自我尊严，不卑不亢。当她与赵佶有了感情后，她也没有特别的感恩戴德，更没有过分的需求，而是与他论诗词、评书画、弹琴曲、下围棋，倾听他的烦恼，分享他的喜悦。徽宗赵佶认为李师师不染半点世俗泥尘，心甘情愿地拜在她的石榴裙下。唐代诗人白居易《长恨歌》中“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此时用来形容徽宗十分恰当。可是徽宗赵佶依然我行我素，在李师师那里留连忘返，有时到第二天也不回来，还传旨给百官，说自己有些小风寒，不能上朝了，真是把江山都丢在脑后了。

不愿意进宫的妓女徽宗赵佶与李师师相交越深，越觉得她珍贵，徽宗三番两次想请李师师入宫为妃，都被李师师拒绝了。久而久之，徽宗也不提这件事了，认为她自由惯了，也许不想当那种毫无自由的皇家玩物。于是，赵佶只得仍旧偷偷摸摸熘出宫门，到李师师身边去享受那种若即若离的爱情生活。后来，他怕人家发觉自己狎妓的丑事，干脆打着给禁卫军建造宿舍的名义，从宫苑侧门开通了安全保密的信道。不过，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徽宗赵佶狎李师师的事情，就闹得尽人皆知了。

徽宗赵佶风流好玩，实实在在是误了国家，败坏了江山，辜负了祖宗社稷，最后自取其辱，客死敌国。一代名妓李师师，在国破家亡后，却没有继续沉沦，当了女道士，也不枉徽宗疼爱她一场。后来兵荒马乱中，据说李师师流落南方，实在是令人无限同情。后人曾经写诗感叹：

辇毂繁华事可予，师师垂老过湖湘。

镂金檀板今无色，一曲当年动帝王。

小御街小御街，是妓院聚集的地方，怎么会和皇家有瓜葛呢?

周邦彦倾心李师师传说李师师不仅美貌超人、艺压群芳，而且侠骨柔肠，结交了不少的风流才子、达官费人，风月场上人称“飞将军”，像词人周邦彦、晁冲之等都拜倒在她的罗裙之下。著名词人秦观还专有《赠汴城李师师》的诗作：

远山眉黛长，细柳腰肢袅；

妆罢立春风，一笑千金少。

归去风城时，说与青楼道；

看遍洛阳花，不似师师好。

皇帝嫖妓当时汴京城传遍了李师师的名字，徽宗皇帝很想去会一会这个名冠京师的李师师。可是，皇帝嫖妓这可是祖宗家法中所不允许的，万一走露风声，一定会闹得全天下风言风语，徽宗皇帝的颜面何存?不过徽宗皇帝原本就是个风流公子出身，宫中那些妃子，他早就感到索然寡味了，他才不管什么颜面，什么家法，就给手下人透了信。

那些奸臣如童贯、王黻等人猜透了皇帝的心思，就开导徽宗皇帝说：“陛下您可以稍稍化装一下，遮掩了行人耳目就可以了。并且他们设法不让李师师接待外人，这样就不会走露风声了。”徽宗皇帝十分高兴，于是在一个黄昏的傍晚，打扮成一个生意人模样，乘着一顶轻便的小轿子，童贯等人装作随从，神不知鬼不觉地就进了金钱巷。

到了李师师的门楼前面，只见往日车马云集的李师师住所，今天显得格外清静，原来宰相王黻一伙人早就把一切打点得顺顺利利，他特意关照李师师不要接待外人，说是晚上一个朋友要来一睹芳颜。宰相的话谁敢不听，于是李师师只能静静地恭候宰相的那位“朋友”。

不一会儿，徽宗皇帝就来到了李师师房内，与李师师客套一番，自称姓赵在外地做生意，这次来京因为久慕师师的芳名所以前来讨扰，李师师也向皇帝道了万福，然后请他们在正厅入座，这时徽宗皇帝和李师师各自打量着对方。李师师果真名不虚传，风韵袅娜多姿，又丝毫不娇柔造作，实在是“出淤泥而不染”，言语不俗气。

李师师也觉得面前之人跟一般嫖客相比，有一种说不出的气质。

双方说了些不关痛痒的话后，李师师就照例开宴席款待客人，酒过数巡后，李师师拨弄丝弦，演唱几支小曲，声声柔美之中带着哀婉，更使人生出无限爱怜，徽宗听着又连饮数杯，飘飘欲仙。

到夜阑人静，皇帝并无要走的意思，王黻放心了，他把李师师悄悄叫到身旁低声说：“我这位朋友可是位稀客，你要好好招待，日后会有你好处的。”

临走时冲她诡异地一笑，就与其他人告辞离去，顺便还在李师师的院子外边布置了一些便衣的禁卫人员。

李师师也是聪明的人，她从王宰相的口气与神情中马上就猜出来人是谁，不过不敢肯定。于是这一夜李师师便与皇帝双双入帐同床共枕，自然如鱼得水，只可惜春宵苦短，不知不觉天色已亮，徽宗这才想起要赶回去上早朝，连忙起床穿衣，临走想起身无分文，于是解下随身用的丝帕递给李师师说：“你拿丝帕到童贯那里领取赏钱。”

李师师连忙下跪笑着说：“臣妾谢主龙恩。”徽宗发现自己说露了馅，也笑了起来：“不必多礼，过两天再来看你。”这才动身回宫。

周邦彦吃皇帝的醋两天之后的黄昏，徽宗果真再次来到金钱巷李师师处，这一次还有一段诗词典故。原来李师师与周邦彦十分投缘，周邦彦每隔一两天就来相会李师师，这天周邦彦刚刚在李师师的屋里坐定，就透过竹帘看到了走进院子的皇帝，他不禁全身发抖：“在这种场合碰见皇帝，我还能活命吗?”可是眼看这皇帝就要进来了，周邦彦来不及问情况，马上趴进了床底下。皇帝从外面掀帘而入，也不知房中还有他人。李师师正要下跪，皇帝却说：“你我二人之间，不要有这么多礼数。”

说罢，还拿出一颗鲜美的橙子要李师师吃，说是用快马专门从江南刚送来的，两人在床上缠绵温存，周邦彦在床下又想笑又觉得有些吃醋。

他在床下窝着不敢动，直到皇帝走后周邦彦才从床下钻了出来，他向李师师追问了事情的原委，后来写了《少年游》一词来讽刺皇上：

并刀如剪，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锦帐初温，兽烟不断，相对坐调笙。低声问向谁家宿?严城上已三更，刀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一首词惹出大祸周邦彦是当时有名的文人，他填的新词，酒楼妓馆的歌儿舞女往往争相演唱，所以周邦彦的这首《少年游》很快就唱开了。

后来渐渐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他越想越觉得是在说自己，不禁龙颜大怒，把蔡京叫来说："快把周邦彦给我办案!"蔡京也弄不明白出了什么事，他派人查了吏部的档案，才知道周邦彦在开封府下面的一个县当酒税官，于是马上找来开封知府，要他调查一下周邦彦的政绩，开封府报告呈上说周邦彦勤于职守政绩显著。

蔡京也没招了，就要这个人想点办法，将周邦彦贬官治罪。开封府实在为难，问蔡京怎么回事。

蔡京急了只好说："你别再问了，我不明白，是皇帝一定要治他的罪。"开封府只好找了罪名，将周邦彦发配边疆，并勒令立即出城。周邦彦知道是那首《少年游》惹下的大祸，于是赶来向李师师告别，自然千言万语难诉一腔离愁。

当天，徽宗再次临幸李师师，李师师乘机向皇帝求情并劝说皇帝饶恕周邦彦，皇帝为了讨好李师师，这才让周邦彦官复原职。时间久了，皇帝对李师师越发喜欢，而李师师又不入宫，所以皇帝只好三天两头往这里跑，没过多长时间，皇帝嫖妓的事就成了市民们街谈巷议的谈资了，金钱巷也被人戏称为"小御街"。

方腊落入谁手宣和二年的方腊起义，就是由于江浙等地的百姓不堪忍爱“花石纲”之苦而爆发的。

花石纲与方腊起义宋徽宗赵佶在位25年，他爱玩，爱享受，最后把北宋王朝的基业玩得一干二净，赵佶最爱玩的是搜集天下奇花异石，将其中的珍品送到京城，供自己享受，史称“花石纲”。为制造，搜刮这些奇花异石，并把它们运往京师，耗费了百姓大量的人力物力，“花石纲”船队更是浩浩荡荡、经年累月地行驶于淮水，汴水之间，首尾上千里，给东南地区和运河沿岸人民带来极大灾难。

宣和二年的方腊起义，就是由于江浙等地的百姓，不堪忍受“花石纲”之苦而爆发的。起义的领袖方腊原名方十三，祖居歙州(今属安徽省)，后迁居于睦州青溪县(今浙江淳安县西北)。方腊原来在青溪县某村保正方有常做佣工(一说自为漆园主)，不堪忍受官府的压榨剥削，于是在睦州一带利用明教秘密组织群众，进行起义准备。

宋徽宗宣和二年十月，方腊认为起义的准备工作已经比较充分，于是假托“得天符牒”，聚众杀死保正方有常一家，宣布起义，号召百姓起来反对官吏侵通、赋役繁重。十一月建元永乐，自称“圣公”，设置将师六等，起义军以头戴方巾为标志，分开几路出击，发展十分迅勐。十几日内起义军就扩展为几万人之多，起义军首先攻占青溪县息坑大镇，全歼宋两浙路驻军5000多人，然后又接连攻克睦州(今浙江建德)、寿昌(今浙江建德南)，遂安(今浙江淳安西)，歙州等7州48县。后来，朱言、关邦、师囊、陈十四等著名明教首领也在各地纷纷响应，起义军一下子发展为百万之师，声势震动东南，他们提出了“划江而守”的战略口号，宣称十年之内推翻赵宋王朝。这引起了朝野上下恐慌，宋徽宗这时才意识到“花石纲”的运送已激起了民愤，赶紧撤销那些搜刮奇花异石的机构，还专门颁布“罪己诏”，假惺惺地向臣民们公开检讨，另外立刻任命童贯为江准荆浙宣抚使，率领京师禁军及原拟征辽的秦晋蕃汉兵15万，奔赴睦州征讨方腊。很快就从起义军手中夺回歙州等地，这号称“二十万”大军，以众欺少。宣和三年四月，方腊率军被迫退至青溪邦源洞山区，转入防守状态。宋将刘镇率领精锐部队从小路上山，偷袭方腊起义军，刘镇精锐部队与方腊起义军展开了决战，最后，邦源洞终于失守。起义军有一部分人侥幸突围，有7万多人壮烈牺牲，剩余的起义军力竭被俘，

其中方毫、丞相方肥等三十多位要员也都做了俘虏被解送汴京杀害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以失败告终。

方腊落入谁手方腊被杀之后，宋徽宗大开庆功宴封赏了上自统帅童贯，下到普通士卒千余人。然而，许多人很疑惑方腊是怎样被抓住的?又是被谁抓住的呢?当时的朝廷虽然也作了模煳的封赏。但以后却又出现了各种说法的史料记载和文艺作品，所以方腊到底落何人手仍旧是个谜。方腊被俘，最常见的说法是《水浒传》中第一百十九回"鲁智深浙江坐化，宋公明衣锦还乡"。所说：方腊从邦源洞山顶落路而走……连夜退过五座山头，走到一处山凹边，见一个草庵，嵌在山凹里。方腊肚中饥饿，却待正要去茅庵内寻讨饭吃，只见松树背后转出一个胖大和尚来，一禅杖打翻，便取条绳索绑了。那和尚不是别人，是花和尚鲁智深。宋江见拿得方腊，大喜，便问道：吾师，你却如何正等得这贼首着?鲁智深道：酒家自从在乌龙岭上万松林里厮杀，迷踪失径，迤逦随路寻去，画龙点睛到旷野琳琅山内，忽遇一个老僧，引领酒家到此处茅庵中，嘱咐道：柴米菜蔬都有，只在此间等候。但见个大汉从松林深处来，你便捉住。夜来望见山前火起，小僧看了一夜，又不知此间山径路数是何处。今早一见这贼爬过山来，因此，俺一禅杖打翻，就捉来绑，不想正是方腊。《水浒传》中说宋江归降后率军攻打方腊，可是宋江有无归降，又有无攻打方腊这本身就是一个谜。

有人认为宋江确实攻打过方腊，这在《中兴奸邪姓氏录》中就有所记载，说方腊谋反于睦州，很快就攻陷了温、台、处、杭、秀等数州，朝野上下颇为震动，派童贯做江浙宣抚使，领精锐部队20万前往攻讨，其中宋江也是副将之一。

另外《林泉野记》中也说，宋江与宋朝别的将领一道俘虏了方腊及方腊起义军所立将相，立了头功。然而宋朝人范圭在其所写的《折可存墓志铭》却直接否认了宋江招后率军攻打方腊起义军的事情。他说，折可存作为童贯的亲信，统领大军奉御旨前往征讨农民起义军，首先率领三军将士，奋然用力，歼灭了方腊起义军，俘获了方腊；而后又班师攻打梁山好汉，不几日又将宋江捉拿住了。可见据《折可存墓志铭》记载，方腊与宋江赵义军都是为折可存所破，并且两位起义军首领，也是为折可存所俘获。

虽然墓志铭中通常未免对死者有溢美之辞，但却侧面讲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宋江并未俘获方腊，当时他甚至还在自顾不暇地迎战朝廷的征讨。

另外一种说法是《宋史》中说韩世忠俘获了方腊。宣处二年，方腊谋反，扬言数十年推翻宋朝，江、浙一带的官僚大族人心惶惶，惟恐祸及己身。朝廷则四方调兵赶赴江浙。当时韩世忠只是一个小小的偏将，也随军出讨方腊。

队伍到达杭州，方腊起义军的活动十分频繁，规模也很大，众将都束手无策，独独韩世忠派兵二十多人伏击在北关堰，一等到方腊起义军出现，韩世忠率埋伏的将士冲出，起义军大败而逃。之后，在睦州清溪洞之战中，方腊起义军经不住征讨大军的攻击。很快溃散了，方腊则准备逃路以图东山再起，然而韩世忠对方腊一伙穷追不舍，直追至睦州清溪洞，方腊率残余部将以岩屋为穴，不肯出来。

征讨各将毫无计策，这时韩世忠悄悄走下山向山野百姓寻问到入洞路径，而后挺身而出，从暗路直捣方腊老穴，将方腊从洞中赶出。

恰好此时，忠州防御使辛兴宇带领军队赶到洞口擒住了方腊，于是将擒方腊之功掠为己有，韩世忠本人憨厚率直，职位又仅是偏将，远远低于辛兴宇忠州防御使的官职，所以也就不与人争功，让辛兴宇去领了大赏。

前面关于宋江擒获了方腊是民间小说中的说法，其中为增添艺术感染力有一些虚构的成分，而韩世忠力擒方腊是出自正史记载，可信度较高。

第二十章

宋徽宗宠信蔡京徽宗对蔡京信任有加，将朝中大事都交给他处理，蔡京于是成了朝廷中的权臣。

宋徽宗喜欢蔡京的字徽宗喜欢以字识人，蔡京本来是个无名小卒，可是因为写着一手好字，所以深得徽宗喜爱，官职逐渐越做越大。哲宗前期，蔡京曾任户部尚书，后来担任翰林学士承旨，徽宗即位后，臣僚上书说蔡京专爱钻营，因此被贬官杭州。

一日，蔡京正闷闷不乐地斜躺在太师椅上，忽然一个贴心的侍者兴冲冲地走了进来：“老爷，好事来了!”“什么好事?”蔡京一下子站起来问：“童贯到了杭州。”童贯是徽宗非常宠爱的一个宦官，蔡京原来就想和他拉拉关系，正苦于无法接近，不想侍者如此善解人意，把这个消息搞到了，这真是天赐良机。接着，侍者又告诉蔡京，童贯这次来杭州，是替皇上搜求字画、珍玩的，这更是令蔡京喜出望外，他真想马上见到这位皇帝面前的红人。但一想，白天童贯那儿客人一定很多，自己是个获罪之人，与宦官结交已招惹嫌疑，更不好深谈些什么，于是吩咐侍者：“晚饭以后，准备五千两银子，随我去童贯那儿。”

蔡京为什么听说童贯来杭州搜求宝画便如此高兴?原来，蔡京的书法、绘画也是一流的。当年，他在翰林院供职，手下有两个属员对他极为殷勤，大热天一人一把白团扇，轮流为他扇风纳凉，蔡京一喜之下，在他们俩的扇子上各题杜甫诗一首。几天之后，这两个人忽然穿戴一新。原来，这两把题有蔡京字迹的扇子，不知怎么被当时还是端王的赵佶看见了，用几万贯钱的高价把扇子给买下了。可见徽宗对蔡京的书法是极为欣赏的，这次童贯来东南搜求字画，只要打通他的关节，由他把自己的字画转送给皇帝，最好顺便在皇帝面前为自己美言几句，自己今后不仅能摆脱目前沦落失意的光景，还可能飞黄腾达。

蔡京打通童贯的关节一切都如蔡京想象的那样顺利，天刚黑，蔡京便乘了一顶小轿来到了童贯的住处，递上名刺(名片)，即由童贯手下人引入正厅。因为蔡京是获罪被贬之人，童贯在厅内迎接，拱手落座之

后，蔡京又说了一番旅途劳累之类的套话，接着二人便谈起东南的名草，西湖的山水来。童贯自然知道蔡京的醉翁之意，他也很清楚本朝素有厚待文官的家法，朝臣中几起几落的事是常见的，因此他对蔡京并不敢有所怠慢。更紧的是，像蔡京这种急于重返政治舞台的人，身上更有油水可挤。果然，蔡京起身告辞之前，要他那位侍者捧上了红布包裹的五千两银子，并用一种很不经意的口气说："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望童大人笑纳。"那个时候，官蔡京场中送礼之风极盛，时人称之为"通关节"，因此童贯推辞一番之后，也就心安理得地收了下来，但他知道，往下还会有戏。果然又隔一日，蔡京邀童贯泛舟西湖，面对着一片湖光山色，蔡京大谈其报国爱君之心，并自认与童贯是相见恨晚的同道。童贯也觉得，自己在外朝的官僚中，至今还没有一个可靠的党羽，蔡京倒是个可信的人，于是蔡京如愿以偿，童贯不仅答应把他的字画献给皇上，同时还为他谋划如何牵动更多的人，以影响皇上的视听，到此，蔡京的东山再起只是时间问题了。

童贯从杭州满载而归，把搜来的字画、珍玩呈送御前，并有意把蔡京字画放到最后呈上，皇帝果然睹物思人，说："蔡京的翰墨，朕在端王邸中时即十分喜爱，只是人家都说他品行不正，专务钻营。你这次到杭州，有否听到一些对他的议论?"童贯赶忙回答说："臣所听到的与朝中说法不大相同，人们都说蔡京忘身为国，才可大用。这次贬官是遭了旧党的一些小人算计。"皇帝听了些话，嘴上并没有说什么，但心里却为之一动。正在这时，宰相曾布为了挤去另一个政见合不的宰相韩忠彦，也向皇帝力荐蔡京就其是天下大才，可用以为相。而后宫的一些妃嫔，以及一些专门负责谏议的言臣，因为从蔡京那里得了不少好处，也一致称赞蔡京，八面来风把皇帝吹昏了头，于是徽宗终于起用蔡京为宰相，把治理国家的重担交给了这位在当时颇有些神秘色彩的人物。

成为权臣面圣之日，蔡京向皇帝力陈他的治国方略，要想国家安定，必须继续哲宗的"绍述"之政，推行神宗新法，为此也必须将那些爱发议论，惹是生非的旧党请出朝廷。这正和皇帝当时的心思，于是便放手让蔡京实施这些政策。蔡京对旧党发动接二连三的攻击，最后，凡是与旧党稍有牵连的，都被列入"邪等"，与旧党合为一籍。本人及子孙永远不得为官，并石刻天下，以便对他们的罪恶永志不忘。后来凡是与蔡京政见不和的人，也统统被赶出国门，蔡京爬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的权力高峰。铲除了异己之后，蔡京又开始揣摩皇帝心思，为给皇帝纵情享乐提供依据。他马上就钻营出了一个“丰亨豫大”的理论，宋徽宗更是以此为据心安理得地纵情享乐，将追求享乐做为了国家的头等大事。徽宗对蔡京更是信任有加，将朝中大事都交给他处理，蔡京于是成了朝廷中的权臣。

《清明上河图》的遭遇一幅《清明上河图》为后人展示了当时汴梁京都的繁荣和整个宋朝时期社会的繁荣景象。

惊人的传世之作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是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不朽之作。《清明上河图》以其宏伟壮阔的画面，真实地描绘了北宋宣和年间，汴河及其两岸的风貌。长卷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画晨曦初露，郊外河边道上一支负重驴队，缓缓走来，行过在城道上。寂静村头，略呈寒意，住屋稀落，嫩柳初放，渐见抬轿、骑马行列来到都城边沿。第二部分描写汴河之上交通穿梭往来的繁荣景象。当时汴河乃是全国交通枢纽，各地形形色色的船只来往栖息于其上，而于汴河之中，有一巨大的拱桥连接着两岸的陆上交通，其桥无墩无柱，以木质结构对跨两岸；坚固优美，犹如彩虹飞渡，故称“虹桥”。虹桥上下车过船经，是重要的交通要道。人们前呼后拥，熙熙攘攘，桥上车水马龙，各种姿态神情被描绘得惟妙惟肖，精彩至极。这是一个紧张忙碌的画面，是画卷的高潮部分。最后一部分是描绘市区街景的。进入城门，街道纵横交错，歌楼酒肆，茶坊店铺，脚店门诊，士、农、工、商、僧、道、医、车、船工、妇孺，无所不至，各行各业，应有尽有。街上行人，稠密繁拥，摩肩接踵，来往不绝，一直延至“赵太丞家”，方才结束。全卷所绘人物五百多个，牲畜五十多只，各种车船二十多艘，住屋众多，结构严密，有条不紊。技法娴熟，用笔细致，线条道劲，凝重老练，反映了高度精纯的绘画功力和出色的艺术成就。同时，因为图中所绘为当时社会实景，为后世了解、研究宋朝城市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宋徽宗成了第一个收藏者《清明上河图》问世以后，受到了历代鉴赏家的珍视，成为宫廷皇室、达官贵人、收藏家甚至阴谋家追猎的对象，人们都为能得到其真品而感到荣耀。最早收藏这幅名画的是北宋徽宗皇帝赵佶。赵佶对绘画、书法都很有研究，也深知《清明上河图》的艺术价值，因此，对《清明上河图》格外珍爱，专门用他所特有的瘦金

体为此画题写了“清明上河图”五字，并盖上了他的双龙小印。

金人攻陷汴京之后，徽宗皇帝被金人掳往北国，此画也就流落到民间，在许多人手中辗转流传。元朝创建之后，《清明上河图》再次被收进皇宫，藏入皇家藏珍阁中，后被赵宗室后人，翰林院学士、著名书法家赵孟頫从藏珍阁中秘密抽出，潜送老家湖州，之后以假充真，用摹本替代藏于藏珍阁。二百多年后，《清明上河图》真迹又从赵氏家族手中流落到苏州。

严嵩曾收藏此画明朝嘉靖年间，宰相严嵩得知此图收藏在员外郎王振斋手中，便派蓟门总督王抒去找王振斋购买此画。王振斋惧怕严嵩的权势，又舍不得交出这幅画，于是便找名家临摹了一幅送给了严嵩。严嵩不知道这是一幅假画，公开炫耀，被一位曾经装裱过此画的装裱师看破。装裱师遂告诉了严嵩。严嵩得知受骗，怒不可遏，随即以“欺相”之罪抓捕了王振斋。王振斋受刑不住，招出真迹藏在他的舅舅陆治手中，严嵩又利用权势，从陆治手里获得了真迹，可怜的王振斋最后还是死在狱中。严嵩以权势掠取真迹的内幕王抒是最清楚的。嘉靖三十八年，王抒于雁门战败，严嵩乘机以“治军失机”的罪名将他杀掉，达到了灭口的目的。为了一幅图，两人被杀，明末清初戏剧家李玉根据这一史实，编写了《一捧雪》传奇并被搬上了戏剧舞台。

后来严嵩逐渐失宠势倒，其子被处斩，府邸被封，财产被查抄，《清明上河图》第三次被收入皇宫。

明隆庆年间，因皇宫失火，《清明上河图》被成国公朱希忠得到，后辗转易主，以后又被一内臣窃得，藏于御沟石缝之内。画藏御沟之时，恰逢天降暴雨，沟内水涨，淹及石缝，待到雨停水退，画已被浸泡得不成样子，这幅名画就这样受损失传了。

不过这时在民间还流传有另一幅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真迹。那是北宋灭亡，张择端南渡以后，因思念故园，又重新绘制的一幅《清明上河图》。到了清朝乾隆年间，这幅《清明上河图》真迹被湖广总督毕沅买到。后毕沅因获罪被处死，家产被抄没入宫，这幅《清明上河图》被收入皇宫。

至今在故宫博物馆收藏辛亥革命后，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被逐出紫禁城，溥仪离开皇宫时带出的大批文物珍宝中就有《清明上河图》真迹。

溥仪在伪满州国当了“执政”之后，又将此画带到长春，存在伪皇宫东院图书楼中。1945年日本投降后，此画流落民间。1946年长春解放，解放军的一位干部通过地方干部收集到了这幅《清明上河图》真迹。现这幅张择端南渡后重新绘制的真迹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馆。

以假乱真的赝品由于《清明上河图》是一幅传世名画，历代名画家竞相临摹，出现了不少摹本，其中不乏有临摹水平较高的，赝品达到了乱真的程度，很难辨别其真伪。

关于《清明上河图》的真伪，自明清以来就有传闻。清代的两本小册子《识小录》和《消夏闲记》，都提到一位叫汤勤的裱褙匠识破《清明上河图》赝品的故事。《识小录》写汤勤装裱一幅《清明上河图》时，发现图中有四个人在掷骰子，其中两颗骰子是六点，还有一颗在旋转，这个掷骰子的人张着嘴叫“六”状，希望也出现一个六点。汤勤认为，开封人呼“六”字是用撮口音，而画中人都是张着嘴叫“六”字，这是福建人的口音形状，他由此怀疑这图是伪作。《消夏闲记》中记载，汤勤在装裱该画时，发现画中有只小麻雀的两只小脚爪是踏在两片瓦角上的，他认为原作者绝不会出现这种现象，这肯定是临摹者的败笔。但汤勤这个人，名不见经传，所以也有人怀疑这些说法是否真有道理。其实，真伪与否只是收藏者一种慰藉，无论是真品，还是赝品，后人都能从中领略到当时汴梁京都的繁荣和整个宋朝时期社会的繁荣景象。

李纲燕云十六州，收复质疑金国看到北宋政治如此腐朽，所以在灭辽后，没过多久就对北宋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侵略战争。

决心收回十六州燕云十六州是中国北方的军事重镇，是整个华北平原的中枢。它原本属于汉族人居住的地区，可是在后唐时，却被后晋高祖石敬瑭用来改朝换代送给了辽国，直到宋朝建国，燕云十六州也没有回到汉族人手中。北宋初年，宋太宗曾经对辽发动了高梁河战役和雍熙战役，意图用武力夺回燕云十六州，但由于宋朝刚刚建国，国力不强，

再加上将领指挥的失误，所以大败而回。这两次战役的惨败使宋朝放弃了用武力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打算，而对辽国采取防守的策略，与之相对抗。

到了北宋徽宗皇帝时，辽国统治区边境的女真族逐渐强大起来，女真族早年深受辽国的欺负与压迫，所以强大了的女真族在公元1115年创建了金国，并且开始攻打辽国。辽国这时国力已经衰退，根本招架不住女真族的进攻，眼看就要亡国。在这样的情况下，宋徽宗决定乘虚而入，联合金国攻打辽国，然后收复燕云十六州。

梦想着与金国结盟于是宋徽宗借为辽天子祝寿之机，派奸臣童贯率人前往辽国拜贺，其实是乘机去探听辽国的真实情况。

当时，辽国有个叫马植的人，此人一向不学无术，专爱钻营，以赚些小利为生。这次他听说童贯来到辽国，立刻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拜见了童贯并且献上了一条“锦囊妙计”——“联金灭辽”。童贯一看此人的观点正合徽宗之意，于是欣喜万分，就十分器重这个马植，还为他起了个新名字“李良嗣”。童贯给辽天子拜完寿，马上就领了马植回去面见圣上了。

“李良嗣”面见徽宗时，滔滔不绝，献了一大堆计策，不过说得概括些，就是让徽宗下令官兵从登、莱州渡海至契丹后方，然后联合金兵一定能一举将辽国灭掉，然后乘忙乱之机收复燕云十六州。

徽宗听了“李良嗣”的意见，也不和大臣们商量，马上就派大臣马政出使金国，与金国取得联系。宋金联盟虽然短时间内对辽构成了威胁，但有大臣进谏，极力劝说徽宗不要联金，他们说：“一旦辽灭亡，金兵万一掉过头来攻打宋朝，那么就算后悔也来不及了。”

可是徽宗已经“鬼迷心窍”，他一心想与金国结盟，而后收复燕云十六州，做件光耀史册的事。公元1120年，宋金终于达成协议：宋金联合攻辽，金兵负责攻取辽中京大定府，宋朝攻取燕京折津府；宋金灭辽之后，宋朝将原本进贡辽国的“岁币”转交金国。这项协议本身就创建在不平等的基础之上，所以结局也就注定了是不平等的。

宋军的贪生怕死公元1122年，金兵先后攻陷了辽国的中京、西京、逼迫辽国天祚帝仓惶西逃，辽国一时朝中无人，面临亡国的危险。这时，一些辽国贵族就拥立幽州留守耶律谆为皇帝。宋徽宗匆忙之间，派童贯与蔡攸(蔡京的儿子)做正副统帅，带兵进攻辽军。童贯只是个宦官，虽然对于熘须拍马、搜刮百姓很在行，但是对于打仗却是一窍不通；而蔡攸只是一味听从童贯，根本提不出什么好的建议，所以宋军士气低落。而辽国耶律谆一边则团结一致，誓死将敌人赶出国，士气空前高涨。宋辽两军刚一碰面，宋军就被打得落花流水，童贯与蔡攸立刻率军南逃，辽军紧迫不舍，宋徽宗吓得急命班师回京，宋朝与辽军的第一战就这样以失败告终。不过，这一战之后，耶律谆就病倒了，没多久，竟然去世了。宋徽宗得知耶律谆病死的消息，立刻又让童贯、蔡攸率领数十万大军出兵幽州。宋军仗着人多势众，一路上趾高气扬，以为必胜无疑，十分看不起辽兵。可是，在前往幽州的路上，宋军遇到了辽军大将萧乾的部队，一下子就被打得落花流水。此后，宋军将领收兵，再也不敢出战了。

辽军人将萧乾十分了解宋军贪生怕死的心理，所以就计划用宋军俘虏来“不战而胜”。萧乾命令将宋军的几个俘虏松松地关在军营里，然后半夜时，他故意在辽军大营里大声与其他将领说话：“我们的援军马上就到了，总共有30万人，明天各队人马要准备好，我们点火起兵，一定要将宋军杀个片甲不留。”这几个俘虏心里害怕极了，哪里还能分辨其中真假，赶忙挣脱绳子，偷偷跑回宋营。

宋徽宗所派大将各个贪生怕死，听完几个俘虏的报告，早已吓得两腿发软，即刻就想撤兵。次日早上看到辽营真的点起了一片大火，他们一想：这下子算是完了，快些逃跑吧!于是宋将下令烧毁营帐，往南逃跑，萧乾率领部将一路狂追勐杀，宋兵惶不择路，自相践踏，兵马死伤不计其数，宋军再次大败。

收回城池却也卖了国童贯压住战败的消息不发回朝廷，而是秘密派人到金营请求出兵攻打幽州。金兵出战攻下幽州后，宋徽宗就派人向金国索要燕云十六州。金太祖看到宋朝没有一点战功，国家衰弱，于是打心眼里瞧不起宋徽宗，准备南下攻宋。只是由于攻辽战争耗时日久，金国损伤也很大，所以暂时将燕云数州还给宋朝，但是向宋朝收取燕云每

年的租税100万贯，宋徽宗竟然不顾羞耻地同意了。从此，金国得到宋朝每年进贡的大量钱财，更加强大起来。

宋徽宗就是在每年向金朝大量纳贡交租的情况下，终于“收复”了燕云地区的七座城池，可是这样的“收复”是创建在对金国屈膝让步的基础上的。金国看到北宋政治如此腐朽，所以在灭辽后，没过多久就对北宋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侵略战争。

李纲守京城由于皇帝的软弱无能，苦心孤诣的李纲也没有用武之地了。

大军兵临城下两宋时代的中国虽然号称是统一的国家，实际上却一直处在分裂的状态中，而且几百年间一直战事不断。在宋、辽、金、元、西夏等国家之间常常发生战争。在这种种纷争中，也涌现出了无数的民族英雄、仁人志士，像名扬千古含冤而死的大将岳飞，甘愿拼却一死而青史留名的文天祥。还有一位不经常为人所知的民族英雄李纲，也同样在宋金的征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金太宗灭了辽朝之后，借口宋朝收留了一名辽朝逃亡的将领，分兵两路进攻北宋。西路由宗翰率领，攻打太原；东路由宗望率领，攻打燕京。两路大军约好在北宋的首都东京会师，一起攻打东京城。

北宋的军队简直不堪一击，在金朝大军的进逼下节节败退，前线的告急文书像雪片一样飞向北宋朝廷。金太宗又派使者到东京，明日张胆地胁迫北宋割地称臣，满朝文武大臣都吓得不知该怎么办，许多人主张弃城逃跑。正在这最危急的时候，只有正作太常少卿(掌管礼乐和祭祀的官)的李纲站出来独排众议，坚决主张抵抗金兵。

这时战场上的形势已经越来越不利于宋朝军队了，西路金兵攻下燕京后，宋将郭药师投降。宗望就让郭药师做向导，领兵南下，直取东京。

不当亡国君宋徽宗见形势危险，急得团团转，却又想不出什么退敌的办法，拉住大臣的手连连叹气说：“唉，没想到金人会这样对待我。”话还没说完，一口气就塞住了喉咙，昏厥过去，倒在床上。大臣们

手忙脚乱地把他扶起来，把太医请来急救，总算把他救醒过来。徽宗眼看没什么办法可想，自己又不想承担一个亡国之君的恶名，就把责任推给自己的儿子。他向左右侍从要来纸笔，写下了“传位东宫”的诏书，宣布退位，作了太上皇。不久，他就带着两万亲兵逃出东京，到亳州去(今安徽亳县)避难，而把京城的乱摊子留给了新皇帝。

太子赵桓即位，就是宋钦宗。宋钦宗把主战的李纲提升为兵部侍郎，并且下诏亲自讨伐金兵。其实，宋钦宗虽然如此做，但心里实在没有什么把握，七上八下的也没主意。

这时，宋军在前线接连打了几个败仗，东京的局势日渐危急。一些怕死的大臣开始纷纷劝宋钦宗逃跑，宋钦宗也动摇了。

李纲请命李纲得知这个消息，立刻求见宋钦宗，说：“太上皇(指宋徽宗)传位给皇上，正是希望陛下能留守京城，陛下怎么能走呢?”

宋钦宗还没开口，宰相白时中先搭了腔，说：“敌军声势浩大，眼看就要攻进东京，哪里能守得住?”

李纲驳斥他说：“天下的城池，没有比京城更坚固的。再说，京城是国家的中心，文武百官集中在这里，只要皇上督率抗战，哪有守不住的道理?”

旁边有个宦官也嘟嘟囔囔说东京的城池不牢固，抵挡不住金兵进攻。宋钦宗叫李纲视察城池。李纲回来报告说：“我视察过了，城楼又高又坚固，护城河虽然浅狭一些，只要安下精兵强弩，不愁守不住。”他还提出了许多防守的措施，要求钦宗团结军民，共同坚守京城，一旦等到各地的援军到来，就可以开始组织反攻，到时形势就会大变。

宋钦宗听了还是有点犹豫，说：“那么，谁能担当守城的重任呢?”

李纲把目光向大臣们扫视了一下，说：“国家平时用高官厚禄供养官员，就是为了危急的时候要大家出力。白时中、李邦彦身为宰相，应当担当起守城的责任。”

白时中、李邦彦正是最主张迁都的人，这时在旁边听了李纲让他们防守京城，都急得直翻白眼。白时中气急败坏地嚷道：“李纲你说得好听!你能带兵打仗吗?”

李纲神色从容地说：“如果陛下不嫌我没有能耐，派臣带兵守城，臣甘愿用生命报答国家!”

宋钦宗看李纲态度这样坚决，就派他负责全线防守。

李纲受命督战以后，马上离开皇宫去部署防卫。可是，白时中等人并不死心，等李纲一走，又偷偷地劝钦宗逃跑。

第二天一早，李纲上朝的时候，只见禁军列队在皇宫两边，车马仪仗都已经准备停当，只等钦宗上车出发了。

李纲大为恼火，厉声对禁军将士说：“你们到底愿意守卫京城，还是想逃跑?”

将士们齐声回答说：“愿意保卫京城!”

于是，李纲就和禁军将领一起进宫，对宋钦宗说：“禁军将士的家属都在东京，不愿离开。如果强迫他们走，万一半路上逃散，敌人追来，谁来保护皇上?”宋钦宗一听逃跑也有风险，才不得不留下来。

李纲立刻出宫向大家宣布：“皇上已经决定留守京城，以后谁再提逃跑，一律处斩。”兵士们听了，都高兴地欢呼起来，都说在这种国难当头的时候，愿意为国家誓死一战。

李纲誓死守城白辛苦李纲稳住了宋钦宗后，就积极准备防守，在京城四面都布置了强大兵力，配备好各种防守的武器。还派出一支精兵到城外保护粮仓，防止敌人偷袭。

过了三天，宗望率领的金兵已经到了东京城下。他们用几十条火船，从上游顺流而下，准备火攻宣泽门。李纲招募敢死队兵士2000人，在城下列队防守。金军火船一到，兵士们就用挠钩钩住敌船，使它没法接近城墙。李纲又派兵士从城上用大石块向火船投掷，石块像冰雹一样

泻了下来，把火船打沉了，金兵纷纷落水。

宗望眼看东京城防坚固，一下子攻不下来，也怕自己孤军深入，一旦宋朝的援军到来就会陷入包围之中，就派人通知北宋，答应讲和。宋钦宗和李邦彦一伙人早就想求和，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派出使者到金营谈判议和条件。

宗望一面向北宋提出苛刻条件，一面加紧攻城。李纲亲自登上城楼，指挥作战。因为将士们都齐心协力，坚决抵抗，金兵纷纷应弦倒下。

李纲又派几百名勇士沿着绳索吊到城下，烧毁了金军的云梯，杀死几十名金将。金兵被杀死的、落水淹死的不计其数。战场上的形势一时发生了很大的逆转。李纲本来就打算等援兵到来，一起合围金兵的。现在看到战场形势好转，非常高兴，知道京师可以保住了。但是，正当李纲指挥将士拼死抵抗的时候，宋钦宗的使者却带来了金营的议和条件。

后来，宋朝就和金朝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合约，甘心向金朝称臣纳贡，李纲的一番反攻的苦心计划没有用武之地了。

火箭起源轶事在众多关于火箭起源的说法中，学术界中占主流地位的观点是火箭箭起源于中国。

火箭起源于中国火箭是一种杀伤力很强的武器，这种武器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燃料燃烧时所产生的气体的反作用力将它推向前进，从而产生强大的攻击力。关于火箭的起源，在现在的学术界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火箭是起源于中国的北宋时期，在北宋后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第二种说法是火箭起源于印度，这种说法是英、法学者在18—19世纪所提出来的，他们认为在公元前300年，印度就已经发明出了“火枪”或“火箭”，这要远远早于世界上的其他地区；还有第三种说法是在公元1488年，宋朝人丘璇(也就是道士丘处机)在他自己的著作《大学衍义补》中所提到的，他认为火箭起源于拜占庭，而那些火药、火器则是在公元6世纪时从中亚传入中国的，英国的汉学家梅辉认同这一观点，并且他还认为中世纪的拜占廷帝国和希腊已经可以用火箭发射。

在众多关于火箭起源的说法中，学术界中占主流地位的观点是火箭起源于中国。其实火箭利用反冲力前进的原理，中国在北宋时期就掌握了。在火药发明之前，“火箭”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火箭，而是一种专用于火攻的箭，箭头附着油脂、松香、硫磺一类易燃物，将这些易燃物点燃后，再用弓弩发射出去，这种“火箭”的杀伤力要远远好于一般的弓箭。火药发明之后，箭头上附着的就不是简单的易燃物了，而是环绕箭杆绑附着的一个球形火药包。对于这种附有火药包的“火箭”，人们在使用之前先点着球形火药包的包壳，然后用弓弩发射至敌阵，燃烧着的包壳很快就引燃了火药，可以小面积烧伤敌军人马。

李纲曾经使用过火药箭北宋时，我国出现了一种和现代火箭的发射原理一致的火药箭。这种火药箭不再需要弓弩发射，而是利用火药燃烧喷射气体产生反作用力，将箭头射向敌方，就可以大面积杀伤敌人。北宋靖康元年，金兵南侵攻到汴京城下，尚书右丞李纲在汴梁保卫战中，就使用了这样的火箭，当时这种火药箭已经十分先进，可以大面积杀伤金军，有效地抵挡了金军的勐烈进攻。这样的火箭，是在箭杆上绑着类似爆竹一样的火药筒，上面有引火线。将引火线点燃后，药筒里的火药燃烧，热气流立即冲出药筒，这时由于火药筒的尾部已经封口，所以气流向后喷射，热气流动产生了反作用力，推动火药筒向前运动，火箭就飞入了敌军阵营之中，立刻杀伤无数金兵，十分厉害。

领先世界的武器到了明代，火箭的品种增加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火箭被制作出来了，火箭的装置也大大改进，使用更是十分广泛。在明代的著名军事著作《武备志》中，作者就绘制有各种样式的火箭图：有同时发射10支箭的“火弩流星箭”，有同时发射32支箭的“一窝蜂”，还有同时发射49支箭的“四十九矢飞廉箭”和同时发射100支箭的“百矢弧箭”、“百虎齐奔箭”，这些火箭比宋朝已做了很大的改进。它们把箭装在筒里，把每根箭上绑着火药线，再将每根箭上的火药线连在一根总线上，使用时只需要燃烧总线，就可以燃烧所有的火箭，等到各箭的火药筒一齐射出去，杀伤力是非常大的。

《武备志》这本书中，还记载了一种名叫“火龙出水”的两级火箭，这是尤其值得关注的。当然这种两级火箭只是两级火箭的雏形，但是“火龙出水”却是世界上最早的多级火箭。根据《武备志》的记载，“火龙出

水”这种两级火箭，一般是取一段5尺长的竹筒。把里面打通磨光后，在竹筒的一端安装木制的龙头，在另一端则安装木制的龙尾，竹筒身就是龙身。龙头向上，龙尾向下，龙腹内装有几支火箭，将火箭的药线连在一起，再把火箭的总药线放在龙身外的火箭筒底部。使用时，点燃龙身外前部的两个火箭筒，龙身就按一定的弧线在空中飞行。当前部的两个火箭筒(第一级)燃烧完时，就产生接连效应，引起后部的两个火箭筒(第二级)继续燃烧。等到箭筒里的火药燃烧完，就引出龙腹内的火箭，飞射出去杀伤敌人，这在当时是很先进的。明代火器研制家赵士桢为保证火箭的发射质量，还研制成功了火箭发射装置——“火箭熘”。“火箭熘”是滑槽式的装置，这种滑槽式的装置有效地保证了火箭能沿着目标方向飞行，很像近代火箭导轨的样式，它成为我国古代火箭发射技术的又一重大飞跃。

火箭的发明就是这样一步步由粗糙起步，发展到现代宇航技术中能“一冲入天”的水平。假如我们现在回过头看北宋时那种火箭的雏形，就可以体会到在古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多么的不容易。

徽、钦二帝成为阶下囚刻骨铭心的“靖康之耻”，提醒无数后人，勿忘亡国之痛。

两代皇帝只知道烧香北宋朝廷和金国联合攻辽时让金朝摸透了宋朝的家底，也让北方的金国看到了宋朝的腐败与无能，所以金国要乘着宋朝内乱的时候前来发笔横财。于是灭辽以后，在公元1125年冬，金国就兵分两路南下攻宋，企图消灭北宋政权。

这时北宋已多年没有战争，军队战斗力已经大不如以前，抵抗不住金兵凶猛的进攻。到了第二年初，金兵就渡过了黄河，兵临汴京城下。

可是这时宋徽宗还是整天花天酒地地生活着，自以为天下太平无事，丝毫没有抗金的准备。面临金国的进攻，他并没有立即组织军队进行抗击，而是在宫中让道士作法，堂堂一国皂帝竟然把解围的希望寄托在道士郭京的六甲法上。这些道士的法力虽然能欺骗皇帝，却阻挡不了金兵的勐烈进攻。

徽宗万不得已，为了欺骗百姓争取民心只好连下罪己诏，言辞恳切

地向人民道歉，表示悔恨。另外还下令全国各地的军队增援京师，保卫皇帝，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金兵已经逐渐逼近。徽宗这时已经完全被吓昏了，他不知所措，他所宠幸的“六贼”干尽了坏事，也早已受到人民的唾弃，不能领导抗金。徽宗在万般无奈之下，写下“传位太子”四个矍铄的瘦金体大字，自己躲在深宫中整日烧香。

在国难当头之时，太子赵桓即位，是为宋钦宗。宋钦宗即位的第二天，徽宗就以烧香为名，带着一批宠臣日夜兼程，渡过准河逃到扬州，还把太上皇后丢在扬州，自己带了一帮妃子过长江逃到了江苏镇江。随行的妃嫔们受不了奔波之苦，落在沿途很多人。

宋徽宗南逃后，钦宗起用抗战将领李纲，京城军民在李纲的率领下，奋勇抗敌，多次打退金兵的进攻。但就在这时，宋钦宗却在一伙投降派的鼓动下，罢免了抗战派领袖李纲，原因是根据祖宗家法防止李纲篡权，保全皇位；另外为了防止抗金后再招惹是非，得罪金人。并且这时宋徽宗还以太上皇的名义不准京外军队回师救急，宋钦宗抗金一时陷入了困境，只好放弃抵抗，派人向金屈膝求和，满足金人的一切无理要求。恰好这时孤军深入的金兵在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下，也认识到形势对自己不利，宋钦宗又满足了他们索要的金银、财物、土地等要求，所以金兵就撤兵回师了。

这时，宋钦宗赶紧迎回那位危险的太上皇，宋徽宗这时以为天下太平了，急忙高兴地赶回汴京重新过起了荒淫奢靡的宫廷生活。

靖康之耻这时，一些大臣劝告钦宗要准备抵御金兵的再次南侵，可是钦宗却满不在乎地说：“金兵一退就万事大吉了。”钦宗和徽宗一样，都不思忏悔，也不作任何准备，甚至还认为这些话太危言耸听了。半年后，金兵又卷土重来，再次兵分两路南下灭宋。他们飞速渡过黄河，再次包围汴京。宋钦宗又仿效前计，前往金营求和，却遭到了金人的百般戏弄。随行的吏部侍郎李若水汽愤不过，痛骂金兵，被金人割舌而死，钦宗当即被金人扣押。在金兵的勐烈攻击下，汴京陷落。公元1127年4月，金兵把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二人连同北宋的后妃，亲王、内侍等共三千多人俘虏北去。宫中所藏的金银、绢帛、文物、图籍、宝器等被抢一空，此年，北宋灭亡。此事件史称为靖康之难，又叫靖康之耻。北宋

旧臣和南宋的君臣们为了避讳这一不光彩的史实，又经常自欺欺人地称之为二帝北狩，意思是徽钦二帝去北方打猎去了!

徽钦二帝被金兵押到金国后，金国皇帝立刻下令把二人带到远离南方的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关押到一口地窖中，以防宋人来救。在天寒地冻的北方，宋徽宗痛楚地写下了一首诗：

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

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山南无雁飞。

诗中凄凉悲惨的亡国之情，真是有如那句“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包含了多少辛酸啊。

徽、钦二帝被俘后金人还为两位皇帝起了侮辱性封号，称宋徽宗为“昏德公”，称宋钦宗为“重昏侯”。

“没想到金人会如此对我”

宋徽宗赵佶是位昏庸的皇帝，他崇尚豪华，爱好艺术，这种秉性使他并不适合于应付摆在面前的艰巨挑战。他虽然长于书法、诗词和绘画。诗、书、画被称为“三绝”，但他对于政治感到沮丧，据说金兵直逼东京时，他又气又急，拉住一位大臣的手说：“没想到金人会这样对待我。”话还没说完，便气塞喉咙，昏厥过去。大臣们急忙请来太医，好不容易才把他救醒。醒来之后，他便要来纸笔写下“传位东宫”的诏书，把皇位传给太子。继位的太子就是宋钦宗。宋钦宗和宋徽宗一样，也是苟且偷安、不思自强之辈，钦宗企图通过向女真人支付赎金的方法来防止灾难的发生，但他后来食言，违背了约定，因此女真人重新进行了围困。结果是断送了大宋江山，徽、钦二帝也做了俘虏。

公元1127年，女真人攻下了城池并且兜捕皇室的所有成员，除徽、钦二帝外，还有他们各自的皇后郑后、朱后和几十名妃子，钦宗的哥哥、弟弟及他的32个儿子，22个女儿，除九子赵构为在外勤王、幼女仅一岁外，大约三千多人被金军掳到了北方。为了防止中原军队索要这些被俘人员，女真人把他们聚集在一起，野蛮地用牛车赶往北方。

受尽百般的凌辱钦宗临行时，金兵令他换上青衣，头戴毡笠，乘坐黑马，并派士兵监押。当时正是四月天气，北方还很寒冷，徽宗、钦宗二帝和郑氏、朱氏二皇后衣服都很单薄，晚上经常冻得睡不着觉，只得找些柴禾、茅草燃烧取暖，夜里睡在地上，又湿又潮，破屋四面透风，活像囚徒一样。金兵每天只供给他们一次饭水，饭是发了霉的干饼和豆饼，朱皇后由于吃了变质的食物病了，宋钦宗低声下气地求金兵给她水喝，竟无一人理会。皇帝和他父亲身边的女人被金人掳去，充当了妻子和奴仆，钦宗的朱皇后当时26岁，艳丽多姿，经常受到金军官兵的调戏。

一次，一个叫骨碌都的金兵调戏她，吓得她心腹疼痛，这个骨碌都竟上去用手摸她的肚子说："病好了，病好了。"后来朱后又成为一名女真军官的目标——这名军官为了羞辱皇帝，要求皇帝把朱后交出来。"同别的男人分享皇后，你为何如此吝啬呢?"他问道，"你落得今日下场，真是上天的报应。活该!"

金军官兵饮酒作乐时，还常常强迫两位皇帝像侍从一样侍立一旁，让两位皇后一旁陪饮或唱歌助兴。被掳人员到达金朝京师会宁府时，金人举行了献俘仪式，命令二帝及其后妃、宗室、诸王、驸马、公主都穿上金人百姓穿的服装，头缠帕头，身披羊裘，袒露上体，到金朝的骨打庙去行"牵羊礼"。朱皇后忍受不了如此奇耻大辱，当夜自尽了。她的尸体随便用草苫子一裹便抛弃了事。过了一段时间，徽宗的皇后郑后病得十分严重，再也不能走路。钦宗不肯把她单独留在路边任她慢慢死去，就背着她走路，但她在第二天早上就死去了。

两位悲痛欲绝的皇帝虽然侥幸没有在乘坐牛车的旅途中丧生，却在做俘虏的生活中为各自的余生而憔悴不堪。徽宗不久就双目失明，据说，那都是为他那去世的皇后和自己昔日的荣华富贵不停哭泣所造成的后果。金人还为两位皇帝起了侮辱性封号，称宋微宗为"昏德公"，称宋钦宗为"重昏侯"。

充满耻辱地离开入世二帝被劫持到北方后，先被关押在五国城。一天，二帝遇到一位来自宋朝京师的老者，同忆往事，放声大哭，恰被路过的五国城统领遇到，二帝遂被打了十几鞭子。一日徽宗将衣服剪成

条，结成绳准备悬梁自尽，被钦宗抱下来，父子俩抱头痛哭。后金人又将二帝移往均州，此时徽宗已病得很厉害，公元1135年死在土炕上。钦宗发现时，尸体都僵硬了。徽宗的尸体被架到一个石坑上焚烧，烧到半焦烂时，用水浇灭火，将尸体扔到坑中。据说，这样做可以使坑里的水做灯油。钦宗悲伤至极，也要跳入坑中，但被人拉住，说活人跳入坑中后坑中的水就不能做灯油用了。徽宗死时54岁。徽宗死后，钦宗继续遭受折磨，20年后，钦宗也惨死在北国。

第二十一章

宋钦宗是软骨头吗赵桓到金国后，头戴斗笠，骑着马，由人监管。

墙头草做皇上北宋徽宗宣和七年，金兵大举南下，攻城掠地，嚣张之极。此时宋徽宗却将皇位传给了毫无统治经验的太子赵桓，即钦宗。赵桓本来就生性温和，遇到这种对付凶悍金兵的入侵的难题更是显得方寸大乱，处处优柔寡断。赵桓上台伊始，就惧怕金人，主张讲和，但是议和没有坚持几天，在主战大臣们的力谏下，他又变成了主战，后来又变成主和，整天徘徊在战和二者之间，有时甚至战与和双管齐下，并行不悖，既主战又主和，他作出和还是战的决定不是依靠自己作为一个君主的判断，而是依据不时变换的各种耳边风的强弱，他的命令很多时候都是一天之内变几变。在变来变去、朝令夕改中终于演出了一幕亡国的悲剧。

宋钦宗赵桓在太上皇赵佶南逃之后，首先召集宰相等人议事，他们主张赵桓跟着向南逃，来避金兵锋芒。后来兵部尚书李纲为钦宗出谋划策，希望钦宗坚持守城，等待各地勤王之师共助退金，正好这时燕王、越王赶到，都主张固守京城，赵桓这才稍微安定下来预备迎战，当天白天钦宗还对李纲说："朕今天是为你留下来的，治兵退敌，全由你来操办。"然而夜里，赵桓就告诉宰臣，准备离京。第二天早晨赵桓等人被李纲拦住，六军将士也表示愿意誓死守城，赵桓这才又勉强留下来。但是，他又派人偷偷出城，到金人营中议和去了。宋朝廷提出，愿派亲王、宰相到金营议和，同意每年增加岁币，另外还答应犒劳金军。但不同意割地。而且当时就派人押送去一万两金子及酒果等物，送给金军统帅宗望。宗望喜出望外，收下礼物，还不肯罢休，又提出犒师金银帛绢各以千万计，马驼骡驴等各以万计，宋朝尊金国为伯父，以河为界，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之地，另外让宋朝的亲王、宰相到金国作人质。宋朝君臣商议后不答应，于是第一次议和破裂。金兵开始攻城，宋军顽强抵抗，两军相持半月不下。这时各地勤王之师十余万人陆续到达，金兵恐慌，稍作撤退。李纲等人为钦宗献策说，我方目前已有二十多万人，而金兵只有六万人左右，他们又是孤军深入，现在不能迅速攻

下汴京，必然要撤退。那么宋军就可趁其回撤渡河之际，加以攻击，然后联络河北各地，从背后袭击拦截金兵，这样就可以全歼金军。这个作战方案可谓天衣无缝，只要执行肯定胜券在握。可是赵桓却毫不理会，又错误地采纳了姚平仲夜袭金营的计策，背着李纲出兵，结果劫营失败。朝中主和派乘机抱怨此次劫营使勤王之师及京城部队尽被金兵消灭。赵桓吓得急忙罢免了李纲的职务，并下诏不准再战，去向金人谢罪。太学生陈东等人听闻李纲被罢免，数百人齐上书为李纲喊冤，京城数万军民也闻讯赶来，人们打破了登闻鼓，呼声动天。赵桓只好又恢复了李纲尚书右丞之职，并任京城四壁守御使。此时金兵派人责问赵桓为何派兵袭营，赵桓连忙说这不是朝廷的命令，一定治罪偷袭之人。然后，让人带着同意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的诏书前往金营，并让皇弟赵构到金营作人质。金人拿着割地诏书，押着赵构，慌慌张张地撤军了。宣抚使种师道请示趁金兵半渡河之际，出兵攻击，赵桓竟然不许。而主和派李邦彦等人则宣布军法，谁敢擅自出动攻击，格杀勿论。种师道等人眼睁睁地看着金兵渡河而去十分气愤，但也无可奈何。

相信一个江湖术士金兵退去，北宋朝廷又恢复了以往那样平静的生活，钦宗赵桓更是以为天下太平，丝毫没有加固边防的意思。只有大臣李纲忧心忡忡，多次上书请求加强战备，以防金兵再侵。赵桓不仅不采纳李纲的意见，反而通知门下侍郎耿仲南等人对于李纲上书不得上报，全部扣押。金国派出的刺探回报说宋朝廷没有什么举动，金国认为宋朝软弱可欺，于是仅仅过了半年，又卷土重来，再度南侵。靖康元年，两路金军会师围住汴京城。此时各地勤王兵由于接到不得妄动的命令，因此离京城甚远，不能解燃眉之急，而赵桓身边也只有卫士和弓箭手七万人左右，这下钦宗急坏了。他病急乱投医，听信一个自称能撒豆成兵，生擒敌帅的骗子郭京，赐金帛数万，召来市井无赖7777人，于次日出城决战，结果“神兵”一败涂地，郭京也逃跑了，金兵趁机攻进了汴京城。赵桓悔恨万分，痛哭道：“朕不用种师道之言，以至于此。”可惜后悔已晚。他对前途完全丧失了信心。此时，汴京百姓争欲巷战，吓得金人宣布要议和退兵，赵桓仿佛捞到了一棵救命稻草，亲自出城向金人恳求，奴颜婢膝，低声下气地伏首称臣，乞求宽恕。签字已毕，赵桓又摆下香案，望金国方向拜了几拜，算是尽了臣礼，金人这才同意放他回城。

回城后，赵桓下令搜集金银、骡马、美女送与金使。计有金一千万

锭、银二千万锭、帛一千万匹、牲畜七千余匹、少女一千五百人，甚至连自己的嫔妃也拿来充数。但金人贪得无厌，嫌所得金银数量不足，声称要洗劫城池，并要赵桓再去金营议和。吓破了胆的赵桓只得再次前往，却被金人当做人质扣留下来。赵桓被迫下令城中官吏加紧搜刮金银，百姓各分坊街，互相监督，即使妇女的钗钏之物也在搜刮之列。直弄得汴京城里翻江倒海，民不聊生。

这次“议和”让赵桓在金营内受尽了苦头和屈辱。他整天被困在一间小屋里，忍受着砭骨寒风，缺吃少喝，晚上蜷缩在一铺土坑上，连被褥都没有，真是生不如死。后来，他的父亲太上皇赵佶也被押来了。四月一日，金兵在大肆掳掠后开始撤退。金兵退走时，带走了大量金银财宝、仪仗法物、图书典籍、古董文物，百工技艺、倡优杂技人等，北宋王朝“二百年府库蓄积”为之一空。赵桓及赵佶、皇后、妃嫔宗室、大臣两三千多人也成为俘虏，随金兵北归。

赵桓到金国后，头戴斗笠，骑着马，由人监管。每过一城池，就掩面而泣，然而，泪水再多也洗不掉这亡国之君、阶下之囚的耻辱啊。赵桓到金国后，被封为“重昏侯”，意思是他与其父“昏德公”赵佶加一起是一昏再昏。后来赵桓客死在金国，终年62岁。

宋鼻涕民间给宋朝人起了外号——宋鼻涕，是由于他们有两个爱哭懦弱的皇帝。

生不如死宣和七年，金兵南下，在大宋土地上攻城掠地，其势可谓凶猛。宋徽宗遭此巨变，整日哭哭啼啼地下罪己诏，调兵前去抵抗金兵，可是汴京的军队很久没有训练，骑兵上不去马，使开封市民看得哈哈笑。守卫黄河天险的军队，没看见金兵的影子，就放火烧了桥，向南潮水般败溃下来，金兵用小木船花了几天工夫，没受任何阻击渡过了黄河，直扑汴京城。朝中一些大臣早就不满于徽宗的弊政，他们以李纲为领袖，要求处罚祸国殃民的“六贼”，要求失去臣民信任的徽宗下台，禅位给太子赵桓，于是徽宗下诏逊位，由太子继位，是为钦宗。徽宗自称太上皇，带着童贯等一帮亲信，乘船南行，准备先去镇江。太上皇所以如此痛快地让位，一来是他已失去了臣民的拥护，二是他断定金兵是抵挡不住的，一旦汴京失陷，性命不保，不如先逃到南方去，依靠长江之

险，或许可保安全，至于钦宗的死活，他是不会考虑的。

船到镇江，地方官接驾，迎入早已准备好的太上皇行宫。徽宗退位南来身边只带了童贯这些宦官和一些贴身卫队，慌忙中连妃嫔也丢在汴京，一边静待汴京方面的消息，一面与宦官们玩玩斗鸡、骨牌，以此打发时日了。但没过几天，就有点耐不住寂寞了，童贯便和手下人到处查访镇江的官、私妓院，找了一位叫彩屏的姑娘，虽不及李师师，倒也是此地无双的美人，能够得到徽宗的眷顾，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幸运，太上皇对嫖妓已是轻车熟路，因而很快就打得火热。又过了几天，汴京传来了消息，说金人包围了汴京，朝廷已经乱作一团，主战的李纲已经被贬去。眼看北边的江山就要完了。徽宗身边的人一下子精神振奋起来，他们劝徽宗赶紧控制江南，重新登上皇位，这正中徽宗下怀。

于是他以太上皇的身份，下诏江南州县，说现在汴京正在议和，各地勤王的军队原地待命，原应运往开封的衣粮武器要就地封存。这一手，对于正陷于包围之中，日夜盼望救援的钦宗来说，简直是背后被捅了一刀!于是，钦宗急急忙忙地与金兵订立城下之盟，答应割地赔款，金兵方才退兵，钦宗立刻下诏重新起用李纲，到镇江迎回这位十分危险的太上皇。

李纲到了镇江，向太上皇报告了金兵北退的消息，并告诉他，钦宗希望他回去共享父子天伦之乐，并没有半点责怪的意思。徽宗虽然不愿意，但天下已经无事，钦宗已是社稷之主，怎敢不听命人家!徽宗无奈，只好从镇江回到了开封。谁知钦宗并不来见他，倒是把守门的侍卫都换了，童贯、蔡京等人也先后被下诏处死，还有人在钦宗面前，追究起太上皇在镇江截留军队和给养的事来，太上皇这才明白自己已经被软禁起来了。后来，还是李纲等人劝说钦宗，国难当头，两宫当以和好为急，以安天下之心。于是，钦宗算是勉强到徽宗的宫里去看望父亲，徽宗自然很高兴，忙叫人设筵款待，可是酒斟满了杯后，钦宗看了看忽然脸色大变，起身便走，徽宗马上明白了：这是怕我用酒毒死他啊!一下子失声痛哭起来，从此便不再出宫门。第二年，即公元1127年，金兵再次包围了汴京城，不久攻破城池，废掉二帝，另立汉奸张邦昌为伪楚政权的皇帝。四月初，金人把二帝和宗室、亲王、后妃共三千余人俘掳北退，北宋遂告灭亡。启程那天，宋朝文武百官在南熏门向二帝遥拜告辞，开封

市民夹道送别，哭声震天动地，还有的人哭得昏了过去。二帝早已换下了黄龙袍，一身灰蓝布装束，钦宗泪流满面地向人们狂喊：“救救我吧，救救我吧!”徽宗的表情很木然，他不好意思哭，也没资格哭，因为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他不敢直视任何一个送行的人，只觉得羞惭。

被整得没有人形的皇帝这支庞大而奇特的队伍终于登程了。两位皇帝各乘一辆牛车，妃嫔、亲王们则是几个人挤在一辆车上，像出殡似地嚎啕着北行。钦宗特别爱哭，几乎每过一个城市便要大哭一场，而徽宗仍然是默默无语。然而，他内心里是极不平静的。大概到了燕京(今北京附近)，他看到了园中闹春的红杏时，不禁触动了心事，写下了《燕山亭》一词，在描写了杏花的香艳之后，他这样写道：

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凭寄离恨重重，这只燕何曾会人言语。

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他以易遭风雨摧残的杏花，来比喻命运的悲惨，绝望又凄婉地道出心中无限的愁苦，但又无法割断对往日生活的怀念，只好希望多做些怀旧的梦，但有时连梦也吝啬得不肯降临。这便是他此刻心理的写照。除了心理上饱受折磨，这一对亡国之君一路上尝尽了辛苦凌辱。押运的士兵动辄用鞭子抽打，而且吃不饱饭，喝不上水，渴得急了，只得趴在路边喝泥沟里的污水，晚上投宿时他们父子与后妃的手腕被捆在一起，为的是防止他们逃走。有一次，士兵们甚至向两个皇帝身上撒尿，而那个军官，一路都打钦宗妃子朱氏的主意，有几次当着这父子的面对她动手动脚。没等到燕京，这些人已是蓬头垢面，没有人形了。

二帝到了燕京，由金朝的皇帝举行了受俘仪式，便辗转到了五国城，五国城在今天黑龙江省依兰，松花江的下游，当时是极北边的所谓“沙漠之地”，原来辽国的皇帝曾在这里囚禁过几个少数民族的酋长。为了度过极端寒冷的冬天，二帝也和当地人一样，住进了几尺深的地窖里，睡在金人发明的火炕上。这时父子俩都已欲哭无泪，恶劣的气候、凄惨的遭遇，使徽宗到此不久即头发脱落，耳聋眼花。南宋高宗绍兴五

年，宋徽宗死在五国城，享年54岁。当时出使金国的南宋使臣朱弁，闻讯后朝夕痛哭，并作哀辞一首，其中有“叹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龙髯而莫逮，泪洒冰天”的名句。从此，宋朝人便被金人讥为“宋鼻涕”，以后还流传了开来。

宋高宗骑马脱险宋高宗其实说崔府君显灵也好，说“泥马渡康王”也罢，这些都是为了统治的需要杜撰出来的。

泥马渡康王宋高宗赵构曾经是康王，在靖康年间受宋钦宗差遣，前往河北金兵统帅那里请求援师，路过磁州(今河南省磁县)，那时磁州守臣宗泽劝谏他说：“肃王(徽宗的另外一个儿子)已经一去不返，现在金人又来骗大王。大兵压境，再去有什么用处呢?”磁州的百姓也纷纷请求赵构留下，没有多长时间，金兵攻破汴京，将宋朝徽、钦二帝和宗室后宫三千余人掠出了汴京城。由于赵构不在京城，才逃过此劫，接着登基即位，做起了南宋朝廷的皇帝，偏安于东南一隅，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可是人们是否知道宋高宗也曾在金国为人质，他是如何逃出虎口，又是如何平安回到宋朝境内的呢?人们对此有种种传说，其中最有名的是“泥马渡康王”的说法，说的就是崔府君显灵，让泥马运送后来成为南宋高宗皇帝的康王逃离金兵虎口的事情。

当年康王赵构在金国做人质时，金国皇帝命令康王和金国太子一同射箭比武，康王发箭三支全都中靶，让金国皇帝大开眼界。金国皇帝与朝臣商量后，一致认为宋朝派的来人并非皇子，而是找个擅长武功的人冒名顶替，所以就将康王遣还要求换真皇子过来。于是赵构得以从金营脱身，火速赶往宋朝属地。途中在崔府君庙中打盹，梦见崔府神君出现了，还催赵构赶快骑门口的马走，说金兵马上就追了过来。赵构一下就从梦里惊醒了，看到马就在他的身边，于是翻身一跃上马向南疾驰而去。途中遇到一条很深的河，那马也是一跃而过，毫不费力，可是等过了河再看，这匹马就不动了。赵构十分奇怪，下来一看原来这竟是匹泥马。人们都说是崔府神君救了赵构的命。

崔府神君究竟是何方神圣呢?南宋时比较普遍地认为他是东汉的崔瑗。崔瑗曾经在河内郡汲县做县令。也有人认为崔府君是唐朝贞观年间滏阳令，后来升任蒲州刺史，崔府君在滏阳有爱民如子的美名，死后百

姓立寺安葬供奉为神，以后人们就把他传为崔府神君了。崔府君的传说在唐宋时期的北方地区流传很广。

其实，说崔府神君显灵，助赵构骑泥马过河脱险，这只是民间传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传说，无非是赵构为了给自己继承皇位作的宣传，用来迷惑百姓，让人相信，他有天道神助罢了。

越传越玄的故事靖康元年，金人掠走了徽、钦二帝及皇朝宗室妃嫔三千余人，徽宗皇子中仅剩下康王赵构滞留在河北、山东一带。这期间金人曾扶持宋朝原宰相张邦昌为楚帝，继位汴梁。可是由于张邦昌是个卖国贼，深为中原人民痛恨，这个政权得不到人们的承认，充其量不过是走狗而已，所以这个政权没有几天就瓦解了。这时众人扶持赵构作了皇帝，举兵反金，虽然大部分人同意赵构危难时刻继位，但是赵构的新政权毕竟刚刚创建，还很脆弱，另外徽、钦二帝都在世，继位的合法性也时常受到质疑。高宗登基之时就有人提出，说他登基时不应穿正黄色，因为父皇帝和兄皇帝都在，所以应当穿淡黄色的龙袍称制，并且年号不应变动。建炎三年，大将苗傅和刘正彦发动兵变，胁迫赵构交权，另立三岁的小太子继位，由隆佑太后垂帘听政。赵构被迫无奈，只得暂时让位，到后来才又寻到了机会重新夺权。这些事情令赵构十分头疼，他的继位一天得不到充分承认，他就一天不得安宁。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赵构开始寻求神灵的支持，他的神道设教意识也逐渐凸现出来了。建炎年间，赵构的幕僚曾对其他人讲述高宗在靖康元年一天晚上所作的梦，那日高宗突然对幕僚说昨晚上梦见当今皇上也就是钦宗脱下了御袍送给了高宗，高宗也毫不客气地脱下旧衣服穿上了御袍。另外，靖康之变后，高宗在一次召集四方兵马大元帅的聚会上，就曾指着随身佩戴的方玉带对大臣们说这条玉带是徽宗送给钦宗的，而钦宗又亲自送给了他。宋高宗极力地想告诉大家他就是命定的天子。

宋高宗还听从大臣李纲的建议，用权术来借神灵行人事收买人心。当时崔府神君在民间香火很盛，高宗就将崔府神君请来作他的护身符，还在绍兴年间下令建庙奉祀崔府君。传说建炎二年，孝宗的母亲王夫人(孝宗并非高宗之子，高宗所立的太子死了，只得从宗室中选立太子)在生孝宗前还梦到崔府神君再次显灵，怀抱一只小羊和她说以羊相识，接着孝宗就出生了，属羊。人们将这些故事越传越玄，最后都认为崔府神

君就是宋高宗的保护神，赵构得皇位确实有天命相助。

其实说崔府君显灵也好，说“泥马渡康王”也罢，这些都是为了统治的需要杜撰出来的，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它们成为历代的政治家们手中的有力武器，也确实起到了蒙蔽世人的作用，有时甚至是武力所不能比的。

宗泽死前高呼过河金军将士对宗泽又害怕，又钦佩，提到宗泽，都把他称做宗爷爷。

临死前的悲壮绝唱宗泽是两宋之交的一员名将，就凭他一人在开封坚守不退，金朝的大军就不敢越雷池一步。他始终认为收复河北失地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事，屡次上书要求进攻金朝，但是他的奏章都被朝中的奸臣扣押了。壮志不能伸的苦闷加上年老重病，终于打倒了这位老英雄，但是就是这样，他念念不忘的仍旧是为国收复失地的事情，在临死之前他高呼三声“过河!过河!过河!”才气绝身亡，令在场的将士们无不落下眼泪。这三声“过河!”，也就成了这一代名将的最后绝唱。

不让国家蒙受耻辱北宋灭亡以后，康王赵构一路南逃，到了公元1127年5月，他在南方大臣的拥护下，在南京即位作了皇帝，就是宋高宗。这个偏安的宋王朝，后来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历史上称做南宋。

宋高宗即位以后，在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把守卫东京有功的李纲召回朝廷，担任宰相。李纲提出了许多抗金的主张。他还跟宋高宗说：“要收复东京，非用宗泽不可。”

宗泽是一位坚决抗金的将领，北宋灭亡之前，宋钦宗曾经派他当和议使，到金朝去议和。宗泽这次出使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的，他跟人说：“我这次出使，不打算活着回来。如果金人肯退兵就好，要不然，我就跟他们争到底。宁肯丢脑袋，也不让国家蒙受耻辱。”可是宋钦宗还一心想求和呢，听到宗泽口气那么硬，生怕他妨碍和谈，就撤了他和议使的职务，派他到磁州去当了一个地方官。

金兵第二次攻打东京的时候，朝廷命令各地的守军都去支持东京。

宗泽按照命令，就率兵去打击金兵，一连打了好多次胜仗，形势很好。他写信给当时的康王赵构，要求他召集各路将领，会师东京；又写信给三个将领，要他们联合行动，救援京城。哪知道那些将领不但不愿出兵，反嘲笑宗泽在说疯话。宗泽没办法，只好单独带兵作战。

有一次，他率领的宋军遭到金军的包围，金军的兵力比宋军多十倍。

宗泽对将士说："今天进也是死，退也是死，我们一定要从死路里杀出一条生路来。"将士们受到他的激励，以一当百，英勇作战，果然杀退了金军。

宋高宗早就听说了宗泽的抗击金军的勇敢事迹，这次听了李纲的推荐，就派宗泽为开封府知府。

这时候，金兵虽然已经撤出开封，但是开封城经过两次大战，城墙全部被破坏了。百姓和兵士混杂居住，再加上靠近黄河，金兵经常在北岸活动。开封城里人心惶惶，社会秩序很乱。宗泽一到开封，就马上着手整顿当地的秩序。他下了一道命令："凡是抢劫居民财物的，一律按军法严办。"命令一下去，城里仍旧发生了几起抢劫案件。宗泽就当众杀了几个抢劫犯，开封的社会秩序这才逐渐安定下来。

积极准备抗金当时，金朝的军队在各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河北的人民实在忍受不了金兵的掠夺烧杀，就纷纷自发地组织义军打击金军。李纲知道这些义军正是抵抗金军的急先锋，就在朝中竭力主张依靠义军力量，组织新的抗金队伍。宗泽到了开封之后，秉承了李纲的策略，积极联络义军。河北各地义军听到宗泽的威名，都自愿接受他的指挥。

河东有个义军首领王善，聚集了70万人马，想袭击开封。宗泽得知这个消息，单身骑马去见王善。他流着眼泪对王善说："现在正是国家危急的时候，如果有几个像您这样的英雄，同心协力抗战，金人还敢侵犯我们吗?"王善被他说得流下了感动的眼泪，说："愿听宗公指挥。"

杨进、王再兴、李贵、王大郎其他义军也都有人马几万到几十万。

宗泽也派人去联络，说服他们团结一致，共同抗金。这样一来，开封城的外围防御巩固了，城里人心安定，存粮充足，物价稳定，恢复了大乱前的局面。

但是，就在宗泽准备北上恢复中原的时刻，宋高宗却嫌南京不安全，准备继续南逃。李纲因为反对南逃，被宋高宗撤了职。

这时候，宗泽手中的军队和河北各地义军民兵互相呼应，宋军的防御力量，越来越强了。他一再上奏章，要求高宗回到开封，主持抗金。但是这些奏章根本就没能送到皇帝的手里，在半路上就被那些奸臣扣押住了。

没有多久，金兵又再次分路大举进攻。宗泽下定了决心，要坚守开封。当金朝的军队接近开封的时候，宗泽派出几千精兵，绕到敌人后方，截断敌人退路，然后又和伏兵前后夹击，金军大败而逃。

不允许临阵脱逃宗泽曾经派部将郭振民、李景良带兵袭击宗翰，但是这两个人打了败仗，谁都不敢回去复命。后来，郭振民投降了金军，李景良则是畏罪逃走。宗泽派兵捉拿到李景良，责备他说：“打仗失败，本来可以原谅，现在你私自逃走，就是目中没有主将了。”说完，下令把李景良推出斩首。

郭振民投降金军之后，与一名金将来开封劝宗泽投降。宗泽在开封府大堂接见他们，对郭振民说：你如果在阵地上战死，算得上一个忠义的鬼。现在你投降做了叛徒，居然还有脸来见我!”说着，喝令兵士把郭振民斩了。宗泽又回过头对劝降的金将冷笑一声说：“我守这座城，早准备跟你们拼命。你是金朝将领，没能耐在战场上打仗，却想用花言巧语来诱骗我!”金将吓得面无人色，只听得宗泽吆喝一声，几个兵士上来，把金将也拉下去杀了。

可怕的“宗爷爷”

宗泽一连杀了三人，表示了抗金的坚定决心，大大鼓舞了宋军士气。他号令严明，指挥灵活，接连多次打败金兵，威名越来越大。金军将士对宗泽又害怕，又钦佩，提到宗泽，都把他称做宗爷爷。宗泽依靠

河北义军，聚兵积粮，认为完全有力量收复中原，接连写了二十几道奏章，请高宗回到开封。不用说，那些奏章都被黄潜善他们搁了起来。

这时候，宗泽已经是快七十岁的老人了，他受不了这个气，背上发毒疮病倒了。部下一些将领去问候他，宗泽病已经很重。他张开眼睛激动地说："我因为国仇不能报，心里忧愤，才得了这个病。只要你们努力杀敌，我死了也没有遗憾了。"将领们听了，个个感动得掉下热泪。大伙离开的时候，只听得宗泽念着唐朝诗人杜甫的两句诗："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接着，又用足力气，呼喊："过河!过河!过河!"才闭上眼睛。开封军民听到宗泽去世的消息，没有一个不伤心得痛哭流涕。

宗泽去世后，宋朝派杜充做东京留守。杜充是个昏庸残暴的人，一到开封，把宗泽的一切防守措施都废除了。没多久，中原地区又全都落在金军手里。

宋高宗出海避敌南宋高宗时候，皇帝将朝廷搬到海上，这可是亘古未有的奇事。

只商量往哪里逃跑高宗"出海避政"其实是当时宰相吕颐浩的主意。吕颐浩(公元1071年—公元1139年)字符直，齐州(今山东济南)人，进士出身，宋高宗即位后，知扬州事。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当时的宰相朱胜非在平定苗傅、刘正彦的杭州兵变之后，就自动辞相，同时还推荐吕颐浩、张浚继任。吕颐浩和张浚都是有才之人，高宗特别信任他们。吕颐浩后来迁任户部尚书，高宗因为张浚年少，于是就任命吕颐浩为尚书右仆射(右相)兼御营使。后来张浚主动请缨，前去西北带领军队抗金，这样南宋朝廷内的大小事务就都由吕颐浩一人主持。

就在这一年十二月，金兵突然南侵，当时的东京(今河南开封)留守杜充迎战失败，逃回都城，这时其余各路兵马也都抵抗不力，或者不战而逃，或者全军覆没。金兵快马加鞭，连破数城，直逼南宋都城。高宗面临着生命的危险，他吓坏了，赶紧从扬州逃到了江宁(今江苏南京)。可是还没有在江宁站稳脚跟，金兵又尾随到了江宁。高宗为了虎口求生，接连几次遣使向金军主帅求和，语气卑下，甚至主动提出：只要金军撤回，南宋愿意除去尊号、改用金的年号，并且可以降格为金的藩

臣。对于这样耻辱的求和条件，那些准备渡江南下的金人却不屑一顾，他们只管南下，争夺战功。

形势十分紧急，南宋面临着亡国的危险，高宗这时却不是和吕颐浩等人积极准备怎样抵御敌兵，而是天天商量着向哪里逃跑，才能摆脱金兵。有人提出可以迁都到湖南一带，可是韩世忠等主战派认为，湖南无险可守，金兵很容易攻破。朝廷已经丧失河北、山东，如今再要放弃江、准，根本就没有可逃的地方了，还不如守住江、淮，背水一战呢!就在大家主意不定的时候，吕颐浩站出来说：“事情已经到了如此急迫的时候，大家还是这样，再争论下去也是有弊无利。”高宗看到一直沉默寡言的吕颐浩站出来说话了，慌忙问他有何高见，吕颐浩说：“近年来，金人的行动专门指向皇上，皇上停留之处，必是金人争夺之地。臣认为当今之计，应边战边退，把皇上护送到绝对安全的地方去，臣情愿留在前线对抗金军。”高宗看到有人给自己拿了主意，很是欣慰，忙说：“朕身边没有宰相可不行，吕相应该跟着我一道同行。”然后，高宗让将领杜充布置江、准一带的防务，自己带着吕颐浩等人向南撤退，先到了临安(今浙江杭州)，后来金兵追来，就向越州(今浙江绍兴)方向退走。

在海上度过的春节谁知就在高宗率军撤退的时候，驻守建康(今江苏南京)的杜充开城投降了金兵。此时，金兵已经渡江，直追高宗而来。高宗和吕颐浩商议，又向明州(今浙江宁波)方向逃窜，可是金兵骑兵一向厉害，再走陆路，高宗一行很快就会被追上，吕颐浩没有办法，他只好对高宗说：“宋金战争以来，金人以善于骑马打仗闻名。现在皇室百官家眷太多，队伍庞大，如果继续在陆地上跋山涉水，一旦断了补给，情况难以预测。即使金兵不消灭我们，我们自己也会发生内乱，现今不如将朝廷搬到海上，这样金军的骑兵就没有用武之地。再加上金人不习惯江浙地区温暖湿润的气候，所以一定不会长期停留。我们只要等到金兵走了，然后登陆，就可以安枕无忧了。”可是高宗还没有说话，就立刻有大臣站出来表示反对。高宗心中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让群臣再作讨论，看到底该怎么办。

可是这时，金兵已经占领临安，马上就会追过来。吕颐浩力劝高宗出海躲避，高宗害怕落个钦宗和徽宗的下场，于是就命令侍从迅速准备海船，告知文武百官、皇亲宗族，朝廷要出海避敌。各类官员、皇室人

员都带着自己的箱子细软，争相挤上船，吕颐浩看到这种情况，就告诉高宗如果带这么多人下海，目标太大，容易被金兵发现，如果追赶上来，情况一定不妙。他请求高宗下令只带少量的人，其余的人员解散，高宗当即反驳道："朕为什么要解散朝廷，如果带着几个人出去，那和流寇土匪又有什么两样?"于是，高宗此次出海，郎官以下多半随行。可是吕颐浩认为人数还是太多，便又奏请每一条船上只留60名卫士，每名卫士只能带家小两人。高宗同意了，可是吕颐浩的规定引起了将士们的强烈不满，他们拦住吕颐浩，责问朝廷为什么要逃跑，他们表示愿意与金兵一决胜负，不愿这样东藏西躲。吕颐浩也不顾众将士的反对，他将那些聚众抗议的将士和反对航海避难的人全部捕杀、关押，稳定了局面后就和高宗匆忙出海了。

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春节，本来这是个合家欢乐的高兴日子，可是南宋的君臣们却狼狈地坐船出海，在海上过了一个凄惨的春节。好不容易等金人后撤了，君臣这才上岸到了越州(今浙江绍兴)，高宗这时立即罢免了吕颐浩的右相职务。

杜充降金古语"士为知己者死"，可杜充为何要背叛高宗呢？

好大喜功的庸臣杜充，字公美，相州(今河南安阳)人，是徽宗时的进士，曾任沧州的知府。南宋初年，高宗以为杜充是徽宗朝的老臣，一向富有威望，应当能够担当重任，又加上高宗当时的得力臣子吕颐浩与张浚的推荐，所以十分重视杜充，将他一升再升。可是后来，杜充竟然投降了金人，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这样一位受到重用的将领，为何要背叛高宗呢?

建炎初年，南宋著名将领宗泽死后，原任北京留守的官员杜充接替了宗泽的职位担任东京开封的留守。杜充为人十分歹毒苛刻，靖康年间，他任沧州知州时，从北方来的一些难民流落到沧州地。因为当时金人正在南下，所以杜充怀疑其中有金人的奸细，便将这些人全部杀死。杜充还十分好大喜功，熟悉他的人们都说他是有志而无才，好名而无实。本来此次杜充来东京上任，人们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可是不久之后，杜充的表现就令军民感到很失望。宗泽一手集结起来的抗金部队纷纷离开了东京开封，杜充几乎成为光杆司令，抗金事业受到了严重影

响。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八月，杜充担心金人入侵会危及自己的性命，于是就借口东京城内粮食已经吃完，准备逃回扬州。岳飞当时是他的部将，就劝阻他说：“中原土地不能弃置，现在如果稍一松懈，敌人就可能乘机占领，以后再要夺回，可就不容易了。”杜充听后，不以为然，不加理睬地离开所部，回到了扬州。高宗召见杜充时，以为他是老将，所以不但不加斥责，反而任命他为枢密院长官。后来又多次提升他，甚至最后任命他为宰相。

只知道花天酒地事隔不久，金兵又南下侵扰，这次高宗离开建康城，前往临安逃命。临走时，命杜充为江、淮宣抚使，留守建康，并命令江东宣抚使刘光世和浙西制置使韩世忠接受杜充的指挥。可是刘光世和韩世忠一向对杜充的刚愎自用很不满，就离开原驻地不听他调遣，杜充又成了光杆司令。在这种情况下，杜充根本就没有打算和金人作战，他不但不操练兵马，修固城墙，做好防御准备，反而天天纵酒狂欢，还肆意辱骂部下将领，滥杀无辜，弄得部队人心浮动，有如一盘散沙。原本江、浙一带的百姓对杜充寄予莫大的希望，希望他能担负起打击金兵入侵，保卫江、浙的重任。可是现在看到他全然不顾军国大事，于是百姓们都开始收十家里的金银细软，准备随时逃难。果然没过多长时间，金兵就攻破长江防线，渡江南下了。杜充这时仍旧按兵不动。当时，仍是他的部将岳飞多次请求他出兵增援，可是都没有音信。直到金兵打到建康城附近，杜充这才慌了，急速命令陈淬与岳飞领兵2万抵御金兵，王燮为后应。宋军收到命令，仓促应战，王燮临阵脱逃，陈淬英勇捐躯，岳飞孤军也遭到了惨败。

枉费了皇帝的信任金兵扑向建康城的消息让杜充更是吓破了胆，他急命部下准备战船，就想逃走。可是刚把水门打开，所有的士兵、百姓都涌过来了，大家争着要夺门而出，反倒把杜充的船塞在中间，进退不得。杜充欺骗众人说他要出去迎击金人，谁知没人理会他，还高声喊着说：“我们才是去迎击敌人呢!”杜充没有办法，只好带领亲兵3000人改道从别的城门逃出。杜充不敢与金兵交战，又不知该逃往何处，征询诸将的意见，他的将领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杜充就命令将士们渡江北上，还十分得意地说：“金人是要到建康，我们离建康越远就越平安无事。”于是，杜充领军渡江北上到了真州。高宗派使者送信慰劳杜充，激励他重振雄风。杜充谎称自己正在敌后招集散军，准备联合泗省(安徽泗

县)、徐州(今江苏徐州)守将出兵截断金兵的归路。这时，真州的守臣向子志劝杜充从通、泰进入浙江，与宋军大部队会师，还说愿意与他一道抗金。可是，杜充不答应。其实他是在观望形势，准备伺机降金。不久，杜充的老朋友凌唐佐派人送信，里面写着劝他降金的字句。原来，凌唐佐已投降金人，这次是来做说客。杜充想降金，但是又担心自己身败名裂，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金领军大将兀术派人告诉杜充：如果降金，可以像当年立张邦昌一样，把中原之地交给杜充。杜充看到金人许下如此优厚的条件，就毫不犹豫地投降了金国。他慌忙跑回建康，等到金军一到，他马上打开城门前去迎接。大敌当前，杜充不主动迎战，反而按兵不动，待价而沽，开门投降，真是枉费了高宗对他的信任。

这时，南宋君臣也听说了杜充投降的事情，高宗起先还不肯相信这件事，等到杜充的手下将士陆续逃回，将亲眼所见的杜充打开城门迎接金军的事情禀告高宗时，高宗还是特别不理解，说："朕并不曾亏待过杜充，他为何要这样做呢?"后来高宗下令削掉杜充的官职和爵号，将他的亲属发配边疆。杜充在金营也受到鄙视，金将粘罕曾经故意奚落他是否要重返南朝，杜充慌忙说："就是元帅敢回，充也不敢。"

黄天荡一战黄天荡大捷，确实大大振作了宋军士气，鼓舞了南宋军队抗战的信心。

议和美梦的破碎黄天荡一战之前，南宋面临着极大的危机。宋高宗与奸臣黄潜善、王伯彦为了表明与金议和的决心，不仅遣散了李纲、宗泽好不容易才有规模块织起来的南宋官军，而且还强行遗散了在黄河流域附近的各路起义军，甚至出动官军去攻打起义军，造成了宋朝官民混乱的情况。金军看到这种情况，十分高兴，其实他们并不是要与宋朝议和，只是要找借口削弱宋军实力罢了，因此当宋高宗将各路起义军遣散后，金军并没有履行诺言与宋议和。金兵在公元1129年2月初时，乘宋朝兵力空虚之时再次发动大军，渡过黄河，直向南宋都城攻打过来。宋高宗这时正在做着议和、安守的美梦，一听到金兵突然冲过黄河，攻打了过来，立刻吓得跳上了马，也不与大臣商量，带了一些随身侍卫就径自逃走了，先坐船渡长江到镇江，后来觉得镇江也不安全，再次逃跑直到杭州，后来安顿在建康城。金兵这次只是抢掠了些东西就径自回去了，也没有再南下攻宋。不过没过多长时间，到公元1129年9月，金兵

大将兀术再次率兵南侵，发誓要把宋高宗活捉，灭亡南宋。宋高宗害怕极了，急忙跑到杭州，又跑到越州，金兵在后面紧追不舍，于是高宗又从越州逃到明州，再从明州下海，逃到定海，再到温州。金兵因为兵马众多，从海路上行走不便，这才放过宋高宗，在沿途州县抢掠一番才往北方撤军。

上阵夫妻兵宋朝军民感到十分羞愧，南宋的一些爱国将领尤其为自己没能保护好君王而自责。于是这些将领在金兵撤回北方的途中，处处设阻，拦截金兵，使兀术率领的金兵蒙受了重大的损失。大将韩世忠和他的夫人梁红玉所指挥的黄天荡一战差点使金兵全军覆没。

韩世忠是宋朝一位著名将领。他和他的夫人梁红玉武艺都很高强，打仗也很勇敢。他们和南宋所有的爱国将领一样都十分气愤金国言而无信的小人伎俩，他们夫妻两人决定在镇江和正在北撤的金军打个痛快。

韩世忠首先派一小部分士兵守卫在青龙镇，另一部分士兵驻守在江湾，还在海口安排了一些士兵，都是一副严整以待的样子，看起来好像要伏击金军。其实不然，韩世忠是在施行声东击西的战术，他在青龙镇，江湾和海口设路障，其实都是些小兵小将，只不过为了骗过金兵，不让金军走这条路，而是乖乖地听他的话去走镇江这条路，以便他带领的主力部队在镇江把金军消灭。

金军的将领兀术果然被骗了。他们真的相信宋军是在青龙镇、江湾和海口设路障，所以兀术下令过镇江到建康，然后渡过长江回北方去了。可是他们没有料到，韩世忠和他的夫人正带领大军在镇江等着他们呢!

兀术带领金军来到了镇江附近，这时候才发现镇江城的四周都是南宋的军队，长江口也已经被宋朝军队封锁住了。兀术率领的金兵被包围在一个叫黄天荡的死港湾里面，已经没有办法渡江回北方去，也没有办法后退。兀术十分地着急，他亲自带领了四名将领，悄悄地骑马到长江边上的龙王庙，想偷看南宋军队的情况。兀术没有想到韩世忠早已派了200名精兵埋伏在庙里，又派了200名精兵埋伏在山下，准备一下子把他抓住。后来，因为庙里的伏兵和山下的伏兵没有配合好，才让兀术给跑

了，匆忙之间只抓住了兀术的两员大将。兀术损兵折将，十分生气，再加上兀术的金军已经被围在黄天荡里几天了，可是还是找不到出路，金兵一个个都急得要寻死。兀术只好宣布要和宋军决战，觅得一条出路。决战的时候，韩世忠上阵率领将士和金兵决斗，并且身先士卒，冲在前面，韩世忠的夫人梁红玉也亲自敲响了战鼓。士兵们一看主帅夫妇都参加战斗，所以都竭尽全力，十分英勇，终于把金军打得大败，抢夺了很多武器和马匹。

韩世忠拒绝金兵的求和金军既打不出去，就只好被围在黄天荡又待了四十多天，他们实在没有办法，兀术这回只好派人来向韩世忠求和。他请求韩世忠能放他回北方，交换条件是把掠夺走的财物都留下给韩世忠，还送给韩世忠一匹好马。虽然这些条件很优厚，却被韩世忠拒绝了。

不久，在长江北岸留守的金军听说兀术领军被围困在镇江，就派出了一支军队乘船过江来救他们。

可是韩世忠又把这些北岸的金兵打败了，剩下来的金军只好跑回去，也没救成兀术。兀术又去请求韩世忠放他们回去，这次韩世忠告诉兀术：“我们放你们回去是可以的，但是要有交换条件，首先，金朝先把宋徽宗和宋钦宗还给我们宋朝；其次，金军抢了宋朝的土地全都还给宋朝，如果你不能保证答应这两个条件，就决不放你们回去。”

兀术对这两个条件当然没有办法保证，所以只好到处打听怎样才能逃出去。问来问去，终于有个宋朝的奸细告诉他，说：“办法有一个，只是比较困难。”兀术一听有办法，特别高兴。原来在黄天荡的北面有一个老鹳河古道，现在虽然已经淤塞起来，但是只要派人在这古道上把淤泥挖掉，把黄天荡和秦淮河连接起来，就可以从秦淮河逃走了。兀术一听，立刻派士兵连夜去挖，这些士兵已经被困了很长的时间，原以为没命了，现在一看有了活命的希望，所以一个个挖得特别卖力，一个晚上就把黄天荡和秦淮河连接了起来。兀术的全军慌忙从这地方逃出去。这就是韩世忠和他的妻子梁红玉指挥的黄天荡大捷。

梁红玉为夫击鼓助阵梁红玉协助丈夫保卫国家的壮举以及英勇作战

的精神，留名青史，永垂不朽。

世家出身的奇女子梁红玉原籍池州，也就是现在安徽省贵池县，生于宋徽宗崇宁元年，祖父与父亲都是武将出身，她自小聪明颖慧，善于织蒲，而且还跟父兄练就了一身功夫。后来，宋徽宗宣和二年，睦州居民方腊，啸聚山民起义，迅速发展到几十万人，连陷州郡，官军屡次征讨失败，梁红玉的祖父和父亲都困在平定六腊之乱中贻误战机，战败获罪被杀。梁家由此中落。

沦落为军中艺妓北宋末年，当金兵侵犯到淮河流域时，为避兵祸，梁红玉随着母亲一起来到镇江，在这种战乱纷纷的局势下，梁红玉不幸沦落为妓，做了军中的一个艺妓。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她结识了一位年轻勇武的部卒韩世忠，两个人一见钟情，不久便定为百年之好，她还给韩世忠生了一个儿子，名叫韩亮。后来韩世忠屡建奇功，被升为浙西制置使，驻守秀州。

第二十二章

夫妻平叛乱北宋灭亡以后，康王赵构一路狂逃来到临安，创建南宋王朝，改国号为建炎，史称赵构为宋高宗。高宗是一个意志薄弱的皇帝。邻近的金国利用他优柔寡断的弱点，经常入侵，使宋朝国土遭受到巨大的破坏，民不聊生。

当时南宋朝中有两个大臣御营统制苗傅与威州刺史刘正彦拥众作乱，袭杀了执掌枢密的王渊，分头捕杀了宦官，强迫高宗让出帝位，内禅皇太子，由隆裕太后垂帘听政。以为妇人孺子执政，可以为所欲为。在这次叛乱中，梁红玉和儿子韩亮也被扣押在京城中。不过，因为韩世忠手握重兵，作战勇敢，威名卓著，苗傅等人对他颇为忌惮，所以对梁红玉母子颇为客气。

事变发生之后，宋高宗已是行动毫无自由，宰相朱胜非与隆裕太后密商，派梁红玉出城，驰往秀州，催促韩世忠火速进兵杭州勤王，并由太后封梁红玉为安国夫人，封韩世忠为御营平寇左将军。

这里商量妥当，朱胜非就对苗傅说“韩世忠听到事变后，不立即前来，说明他正在犹豫，举棋不定，如果你能派他的妻子前往迎接，劝韩世忠投奔你，那么你力量大增，别的人就用不着惧怕了。”苗傅听后大喜，认为是一条好计，立即派梁红玉出城，梁红玉回家抱了儿子，跨上马背，疾驰而去，一昼夜赶到秀州。韩世忠了解情况后，当即会同刘俊，带兵平定了苗傅等人的叛乱。宋高宗喜出望外，亲自到宫门口迎接他们夫妇，立即授韩世忠武胜军节度使，不久又拜为江浙制置使。

贤内助献策，助夫杀敌公元1130年，金军又大举南侵，高宗闻风而逃，一直逃到了温州。金军统帅金兀术大破杭州城后，率领10万大军，满载劫得的金银珠宝，经现在的嘉兴、苏州，沿着大运河来到镇江，企图通过镇江北撤，当时43岁的韩世忠和夫人梁红玉率领水军守卫镇江。敌众我寡，他的军队只有8000人，而敌军却超过10万人，这区区的军队，又怎能阻止金兵渡江呢？

就在韩世忠苦思行兵布阵之法时，梁红玉从船后走出来对韩世忠说："我少敌多，倘若与他奋力战斗是难以取胜的。明天交战不如把我军分为前后两队，四面截杀敌人。中军由我暂时管领，专事守备，并发号令，倘若金军杀来，只用枪炮矢石射住他，不让他前进。中军无懈可击，金兀术必定带他的部队向左右冲突，准备脱身。这时你就带前后两队军马，只看中军的旗号行事，我坐在船楼上面，击鼓挥旗，我的旗往东，即往东杀去，我的旗往西，即向西杀去。如果能一举歼灭金兀术，那就是特大的胜利。"

韩世忠听了后，连声喊妙计，说："好，那我前去诱敌!"

"那我就在这山顶上给将军击鼓助威!"

第二天交战，宋朝军队不与金兵正面交战，他们尽量利用埋伏，并用"火箭"攻打敌人。梁红玉亲自挥旗击鼓，指挥士兵作战。宋军人数虽少，在梁红玉的指挥下，却个个士气高昂，奋勇杀敌。

这样的战略果然奏效。后来虽然金兀术用了奸细的计谋，突破了韩世忠的包围圈，但韩世忠用梁红玉的计谋，以少于敌军十倍的兵力包围敌军达48天之久，也足以名震华夏，名震夷狄。黄天荡一战使金军丧胆，再也不敢随便过长江南侵。

杨国夫人金兵败北之后，梁红玉不但不居功请赏，反而因金兵突破江防，上疏称韩世忠"失机纵敌"，请朝廷"加罪"。这一义举，使举国上下，人人感佩，传为美谈。朝廷为此加封她为"杨国夫人"。

不久之后，韩世忠又被任命为武宁安化军节度使，京东准东路宣抚处置使，驻守楚州。梁红玉随韩世忠率领将士以淮水为界，旧城之外又筑新城，以抗击金兵。经过战乱的浩劫，楚州当时已遍地荆榛，军民食无粮，居无屋，梁红玉亲自用芦苇"织蒲为屋"。在寻找野菜充饥时，在文通塔下的勺湖岸畔发现马吃蒲茎，便亲自尝食，并发动军民采蒲茎充饥。准人食用"蒲儿菜"，相传即从梁红玉始。蒲儿菜因此称作"抗金菜"。由于韩世忠、梁红玉与士卒同劳役，共甘苦，士卒都乐于效命。经过苦心经营，楚州恢复了生机，又成为一方重镇。梁红玉韩世忠驻守楚州十多年，"兵仅三万，而金人不敢犯"，楚州人民得到了短时间的休养生

息。

后来，奸相秦桧掌权后，力主和议。宋高宗听信秦桧的谗言，下令前线撤退，更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

韩世忠听说秦桧竟以“莫须有”三字杀岳飞于风波亭，当面责问秦桧：“‘莫须有’三字，怎么能服天下人心?”不久韩世忠也被罢去兵权，韩世忠乘机上表请求解职，夫妻二人从此闭门不出。

梁红玉在公元1135年因病逝世。宋高宗得知梁红玉去世的消息，特地赐给她的家人贵重的礼物，以示哀悼，并对她的贡献，表示赞扬。梁红玉对丈夫的忠心，协助丈夫保卫国家的壮举以及英勇作战的精神，使她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女性，留名青史，永垂不朽。

岳家军大破金兀术收复建康的岳飞，是南宋抗金的名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

深受宗泽的喜爱岳飞岳飞是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人，出生那年，黄河决口，家乡闹了一场水灾，家里生活很困苦。岳飞从小刻苦读书，尤其爱读兵法。他力气大，十几岁的时候就能拉300斤的大弓。后来，他听说同乡老人周同武艺高强，岳飞就拜周同做老师，学得一手好箭，能左右开弓，百发百中。

后来，岳飞从了军。金兵南下的时候，他在东京当小军官。有一次，他带了一百多名骑兵，在黄河边练兵，忽然对面来了大股金兵，兵士们都吓呆了，岳飞却不慌不忙地说：“敌人虽然多，但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兵力多少。我们可以趁他们没准备的时候击败他们。”说着，就带头冲向敌阵，斩了金军一名将领。兵士们受到岳飞的鼓励，也冲上去，果然把金军杀得七零八落。

这一来，岳飞的勇敢出了名。过了几年，他在宗泽部下当将领。宗泽很器重他，对他说：“像你这样智勇双全，即使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但是光靠冲锋陷阵，毕竟不是常胜的办法。”他交给岳飞一份古代的阵图，说：“你拿这个去好好研究一下。”

岳飞接过阵图，向宗泽道谢了，接着说：“按照阵图作战，这是兵法的常规。至于灵活运用，随机应变，还得靠当将领的善于用心。”

宗泽听了，连连点头，赞赏这个青年将领的见解。

誓雪靖康之耻岳飞跟宗泽一样，把抗金作为自己的职责。宋高宗即位以后，他就马上写了一份奏章，希望高宗能亲自率领宋军北伐，激励士气，恢复中原。他还批评了黄潜善、汪伯彦一伙投降派的主张。

奏章一上去，宋高宗不但不听，反而嫌岳飞小小将官，多管闲事，革了他的军职。

宗泽死后，岳飞归东京留守杜充指挥。金兵大举进攻，杜充逃到建康，金将兀术攻打建康，杜充又可耻地向金军投降。杜充手下的将士都散了伙，只有岳飞的队伍仍旧坚持在建康附近战斗。

这回趁兀术北撤的时候，他跟韩世忠配合，把兀术打得大败。

金兵北撤以后，宋高宗从温州回到临安。金朝在中原地区立了一个傀儡皇帝刘豫，国号大齐，充当金朝的帮凶，骚扰南宋地界。岳飞率领将士多次打退了金齐联军，创建战功。到他32岁的时候，已经从一个普通将领提升到节度使的地位，跟当时的名将韩世忠、刘光世并驾齐驱了。

就在这个时期，他写了一首传诵千古的词《满江红》，抒发了他抗金的壮志豪情。词的上半首是：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文官不贪财，武将不怕死岳飞一心恢复中原，他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宋高宗曾经为他造一座住宅，岳飞推辞了，他说：“敌人还没消灭，哪里顾得上家呢?”有人问他说天下什么时候能够太平，岳飞回答说：“文官不贪财，武将不怕死，天下才有太平的希望。”

岳飞平时十分注意练兵。部队休整的时候，他也带将士穿着铁甲冲

山坡，跳壕沟，要求像打仗时一样严格。有一次，他儿子岳云在骑马冲山坡的时候，因为战马失足，摔倒在地。岳飞知道了，狠狠责打了岳云。别的兵士看到主将对自己的儿子也这样严格，就格外认真操练了。

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在岳家军里，军纪特别严。一次，有个兵士擅自用百姓一束麻来缚柴草，被岳飞发现，立刻按军法严办。岳家军行军经过村子，夜里都露宿在路旁。老百姓请他们进屋，没有人肯进去。岳家军中有一个口号，叫做："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

岳飞对待将士要求十分严格，又关心爱护。兵士生病，他常常亲自替他们调药，部下将领出征的时候，他就叫妻子岳夫人慰问他们的家属；将士在战争中阵亡，就抚育他们的子女；上级赏给他的财物，一概分配给将士，自己家里丝毫不留。

经过这样的训练和照顾，岳家军将士士气旺盛，作战勇勐。岳飞在作战之前，总是先召集将领，一起商量作战方案，然后才出战。所以打起仗来，每战必胜，从没有打过败仗。金军将士见到岳家军，没有一个不害怕，他们中间流传着一句话："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南宋有岳飞、韩世忠等一批名将，再加上各地百姓组织的义军的配合，要打退金兵本来是有条件的。但是宋高宗不顾岳飞等人反对，一味向金朝屈辱求和，公元1139年，竟向金朝称臣，每年进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金朝把陕西、河南一带土地"偿还"南宋。

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公元1140年10月，金朝又撕毁和约，发动全国精锐部队，以兀术为统帅，分四路大举进攻。不到一个月，根据和议还给南宋的土地，全被金军夺去。南宋王朝面临覆灭的危险。宋高宗这才不得不下诏书，要各路宋军抵抗。

岳飞得到这个命令，立刻一面派部将王贵、牛皋、杨再兴等分路出兵，一面派兵打起岳家军的旗帜，到处打击金军，截断金军的运粮线。金兵吓得心惊胆战。

岳家军节节胜利，一直打到距离东京只有45里的朱仙镇。

河北的义军听到岳家军打到朱仙镇，都欢欣鼓舞，渡过黄河来同岳家军会合。老百姓用牛车拉着粮食慰劳岳家军，有的还顶着香盆来欢迎，个个兴奋得直流眼泪。

岳飞眼看这个胜利的形势，也止不住心里的兴奋。

他鼓励部下说："大家努力杀敌吧。等我们直捣黄龙府的时候，再跟各路弟兄痛痛快快喝酒庆祝胜利吧!"

岳飞斗智废刘豫宋朝抗金名将岳飞，公元1134年，屡次击败金朝傀儡政权刘豫的军队，收复大片失地。为了瓦解分化金朝与刘豫的关系，岳飞探知刘豫同金朝大太子粘罕交往甚密，而四太子金兀术十分讨厌刘豫，决定用反间计除掉刘豫。一日，岳飞军中捉获一名金兀术的密探，岳飞便故意责问他说："你不是我营中的张斌吗?我派遣你去联络刘豫，让他诱四太子来，你为何去而不返。我已又派人去联系，刘豫已允诺，今年冬在以会合寇江为名，将四太子诱至清河。你这个人太不讲信义，拿了我的书信却不出使，为何要背叛我?"那名金营密探也顺水推舟，请求饶命，愿将功折罪。

于是，岳飞又制蜡书一封，内书和刘豫同谋诛杀金兀术之事，对那名密探说："此次暂且饶恕你。"令人将蜡书藏于密探大腿的皮肉之中，一再告诫他不要泄露机密。那名金人密探返回金军大营后，割肉取书交给金兀术，兀术一看大惊失色，马上派人回禀父皇，刘豫乃为金人废黜。岳飞反间计成功，不费一兵一卒就去掉了刘豫。

岳飞畅谈千里马宋朝名将岳飞入朝拜见高宗皇帝。高宗从容问道："你有良马吗?"

岳飞答道："我曾有过两匹良马，它们每天要吃几斗草料，喝一斛泉水，但如水不干净，草料不精，它们就不吃不喝。披上鞍甲让它们奔跑，起初并不太快，等到跑上百来里才开始奋蹄賓士。从午时到酉时，还可以跑二百多里，卸下鞍后既不喘，又不出汗，像没事一样。这种马要求高，却不随意索取，气力充足，却不好表现，确实是千里马啊。可惜它们相继死去。现在所骑的马，每天不过吃几升草料，且吃草料也不选择，笼头尚未上好，就放开蹄子飞奔，刚开跑百余里就气喘吁吁，大

汗淋漓。这种马要求不高，容易满足，好逞强但易力衰，是低劣迟钝的材料呀。”高宗对这番话颇为赞赏，说：“你今天的这番议论，极为精辟。”

岳飞严于律子南宋著名抗金将领岳飞，共有五个儿子，他们是岳云、岳雷、岳霖、岳震和岳霭(后由宋孝宗改名岳霆)。岳飞不仅治军严谨令出必行，训练出一支使金兵闻风丧胆的岳家军，而且严于律子，对儿子从小要求就十分严格。

岳飞自身朴素，只穿寻常百姓穿的麻布，不穿丝绸，他也不愿让家人沾染奢侈的习气，要求孩子们穿粗布衣服，吃素面蔬菜，不准饮酒。他常告诫几个儿子，要他们知道稼穑的艰难，并要他们从事农业劳动，以便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

岳云是岳飞的长子，12岁就被岳飞带到军队进行严格训练。岳飞把岳云编到部将张宪的队伍中，当一名小军士，让他接受严酷战争环境中的锻炼。

岳飞的母亲姚氏曾在他背上刺下了“精忠报国”四个字，勉励岳飞要一心报效国家。岳云从父亲那里接受精忠报国的教育，加上随军征战，见到百姓受金兵蹂躏的悲惨生活，更激发他要杀敌报国，挽救民族危亡的雄心壮志。他同大人们一样，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岳飞也从不给予他特殊照顾。相反，岳飞对岳云的要求比对一般士兵的要求更为严格。

在一次训练中，岳云违章操练，骑马下坡，本应放慢速度，他却疾驰下坡，由于坡陡路滑，连人带马翻进沟里。岳飞见了怒气冲冲训斥道：“若是同敌人作战，你这样岂不坏了大事!”说完，不顾众将的劝阻，坚持军法从事，打了岳云100军棍。此举使全军上下皆受震动，将士们训练更加刻苦认真了。

岳云在岳飞的严格要求下，武艺精进，16岁便成为一位臂力过人、骁勇善战的战将。他双手各持一杆几十斤重的铁锥枪，冲锋陷阵，威震敌胆。岳飞认为，作为将领，只有严格要求自己，才能去要求别人；作武将的，只有身先士卒，才能率领三军前进。在遇到苦战时，他总是要岳云冲锋在前，给大家作榜样。

公元1134年，岳家军举行第一次北伐，16岁的岳云参加了攻打隋州的战斗。他勇冠三军，手持两杆铁锥枪，第一个冲上城头，立了头功。岳飞因岳云上一年被高宗授以正九品保义郎时，还未立下战功，所以，他把岳云的战功如实上报。随后，在攻打邓州时，岳云又第一个登上城楼，立了头功，这次岳飞却没上报。事隔一年，朝廷查明此事，才将岳云升迁为武翼郎。但从此以后，岳飞怕岳云年少居功自傲，凡岳云立下的军功一律不予上报。

公元1140年，金兵统帅兀术以优势兵力围困岳家军驻地河南郾城。面对强敌，岳飞令岳云先率骑兵冲击破阵，他严令岳云：“不胜先斩汝。”岳云以少击多，奋勇杀敌，出入敌阵如入无人之境，直杀得金兵尸横遍野。郾城之战刚结束，岳飞又令岳云火速去颍昌(许昌)增援部将王贵。岳云连续作战，率800铁骑长途奔袭，冲入数万敌兵之中，负伤一百多处，人、马都被鲜血染红了。这次战斗，岳云斩了兀术的大女婿，又立大功。以后岳云在父亲严格要求下，征战南北，打了无数胜仗，直至他们父子被高宗和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

遗臭万年的卖国贼秦桧秦桧当了宰相之后，就干起卖国求和的勾当来。

有了秦桧，宋兵必败岳飞在朱仙镇大捷，逼近东京。兀术眼看在东京待不下去，决定渡过黄河北撤。当他带着金兵离开东京的时候，有个书生拦住他的马说：“大王别走了。岳少保马上会撤兵。东京一定没事儿。”

兀术很奇怪，问那个书生说：“岳飞用500骑兵打败我们10万大军，百姓日夜盼他们打过来，东京还能守得住?”

秦桧像那个书生说：“朝廷里有权臣，大将要在外面立功，是不可能的。依我看，岳少保自己性命难保，哪儿还谈得上立功?”兀术听了，恍然大悟，马上拨转马头，带兵回到东京。那个书生说的那个“权臣”，就是秦桧。

秦桧当上宰相秦桧本来是北宋时期的大臣。当宋徽宗、钦宗两个皇帝被金兵俘虏到北方去的时候，秦桧和他的妻子王氏也跟随他们一起被

俘到金京。秦桧在金太宗面前，低声下气，百依百顺。金太宗认为他很有才干，就把他派到大将挞懒部下当军事参谋。这时候，金朝发现南宋抗金力量越来越强大，又有岳飞、韩世忠等大将坚决主张抗战，不好对付，就决定把秦桧放回南方充当内奸。公元1130年，挞懒攻打楚州(今江苏准安)的时候，把秦桧和他的妻子放回南宋。

秦桧来到越州宋高宗的行宫求见，天花乱坠地编造了一通谎话，说他在楚州怎样杀死敌人的看守，怎样夺了一条船逃出来。当时就有不少大臣怀疑，楚州到这儿路远迢迢，秦桧越过金兵防线逃回来，难道金兵没有追捕?再说，即使敌人防备不严，让他偷跑了，一定十分匆忙，又怎能带着王氏一起走?

但是，当时的宰相范宗尹跟秦桧是老朋友，竭力在高宗面前帮秦桧说话，并且说秦桧是个既可靠又能干的人才。宋高宗本来日思夜想要跟金朝讲和，听说秦桧从金朝回来，熟悉金朝内情，立刻召见秦桧。

秦桧第一次朝见高宗，就劝高宗跟金人讲和，还送上了代朝廷起草的一份求和信。

宋高宗接见秦桧之后，觉得秦桧的主张很合他口味。他对大臣们说："秦桧比谁都忠。有了他，我高兴得晚上也睡不着觉呢。"他立刻任命秦桧做礼部尚书，过了三个月，又提升他当副宰相。再过半年，秦桧就成为宰相兼枢密使，掌握了南宋军政大权。

劝皇上让岳飞退兵秦桧当了宰相之后，就干起卖国求和的勾当来。因为遭到许多朝臣的激烈反对，曾经被罢免了宰相职位。但是昏庸的宋高宗还是把秦桧当做心腹看待，过了几年，又重新任秦桧为宰相。秦桧利用他的权力和地位，勾结金朝，千方百计破坏抗金将领的活动。这回听到岳飞连战连胜，准备直捣黄龙府，大起恐慌。因为金朝是他的后台，金朝一败，他在南宋也就站不住脚。于是，他就唆使宋高宗发出命令，要岳飞从前线撤兵。

岳飞突然接到宋高宗的撤兵命令，弄得莫名其妙。他派人送奏章给高宗说金兵已经丧尽士气，我军士气高涨，胜利就在眼前，时机不能错过。他请求高宗取消撤兵命令，允许他继续进军。秦桧接到岳飞奏章，

又想了一个恶毒的手段，先命令张俊、刘光世等大将的人马从淮北前线撤兵，然后对高宗说，岳飞的军队在中原已经成为孤军，不能再留，叫宋高宗发出紧急金牌，叫岳飞撤军。

十二道金牌岳飞在前线等待高宗的进军诏令，没想到接到的却是朝廷催促退兵的紧急金牌。岳飞接到第一道金牌，正在犹豫，送金牌的快马又到了。从早到晚，快马一个接一个，一连接到12道金牌。岳飞知道要改变高宗的决定已经没有希望，气愤得泪流满面，说："想不到我十年来的努力，一下子全给毁了。"

岳飞要从朱仙镇退兵的消息一传出去，附近的百姓十分震惊，纷纷聚集在街头。他们拦住岳飞的马，哭泣着说："我们顶着香盆，运着粮草，迎接官军，这是金人都知道的事。现在相公要回去，我们只有死路一条了。"

岳飞看到这个情景，也禁不住流下眼泪，他叫左右兵士拿出高宗的诏书来给大家看，说："朝廷下了紧急金牌，我不能擅自做主留在这里啊!"百姓们见留不住岳飞，都放声痛哭。兵士们也个个心酸，掩着脸哭。整个朱仙镇响起一片哭声。岳飞心里不忍，宣布暂缓5天撤兵，让愿意跟随他们的百姓一起走。过了5天，岳家军开始撤兵的时候，当地百姓成群结队随军南迁。后来，岳飞奏请朝廷，把这些百姓安置在南方安家垦荒。

兀术打听到岳家军已走，马上重整旗鼓，向南进攻。本来被岳飞收复的河南许多州县，一下子又丢失得精光。

秦桧和宋高宗决心向金朝求和，他们恐怕受岳飞、韩世忠等人的阻挠，把他们召回京城，让韩世忠做枢密使，岳飞做枢密副使，名义上是提升，实际上是解除了他们的兵权。

绍兴议和秦桧夺了岳飞的兵权，就派人向金朝求和。公元1141年11月，金朝派使者到临安。谈判议和条件。谈判结果：宋、金之间，东面以淮河为界，西面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南宋向金朝称臣，每年向金朝进贡银绢各25万。历史上把这次屈辱投降的和约叫做"绍兴议和"(绍兴是高宗的年号)。

罪名就叫——莫须有在岳飞墓门对面，还放着用生铁浇铸的秦桧、王氏、万俟禹和张俊四个反剪双手的跪像。

奸臣的陷害绍兴和议之后，兀术派使者送密信给秦桧说：“你天天向我们求和，但是留着岳飞，我们不放心。一定得想法子把他除掉。”秦桧接到主子的密信，就向岳飞下毒手了。秦桧先唆使他的同党、监察御史万俟禹向朝廷上了一道奏章，攻击岳飞骄傲自大，捏造了岳飞在金兵进攻准西的时候，拥兵不救，放弃阵地等许多“罪名”。万俟禹开了第一炮以后，又有一批秦桧同党接二连三上奏章攻击岳飞。

岳飞知道秦桧跟他过不去，就主动要求辞去枢密副使的职务，高宗马上批准。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大将张俊原来是岳飞的上司，后来岳飞立了大功，遭到张俊的妒嫉。秦桧知道张俊对岳飞不满，就勾结张俊，唆使岳家军的部将王贵、王俊，诬告另一个部将张宪想占据襄阳，发动兵变，帮助岳飞夺回兵权，还诬告岳飞的儿子岳云曾经写信给张宪，秘密策划这件事。秦桧根据王贵、王俊两个奸徒的诬告，先把张宪抓起来送进大理寺大狱，严刑拷打，张宪宁死不招。接着，秦桧又奏请高宗下令逮捕岳飞、岳云，到大理寺受审。

天日昭昭秦桧的使者去逮捕岳飞，岳飞笑着对使者说：“上有天，下有地，会证明我是无罪的。”

岳飞、岳云二人被逮捕到大理寺的时候，张宪已被拷打得遍体鳞伤，浑身是血，不像个人样儿。

岳飞见了心里又难过，又气愤。

审问岳飞的就是万俟禹。万俟禹拿出王贵、王俊的诬告状，放在岳飞面前，吆喝着说：“朝廷哪里亏待你们三人，为什么要谋反?”

岳飞说：“我没有什么对不起国家的地方。你们掌管国法的人，可不能诬陷忠良啊!”

旁边一些官员们也七嘴八舌地附和万俟禹，硬说岳飞想谋反。岳飞知道这批家伙都是秦桧的同党，申辩也没有用，就长叹一声说：“我今天

落在奸贼的手里，虽然有一片忠心，也没法申诉了。”

秦桧又派御史中丞何铸审问，岳飞一句话也不回答，他扯开上衣，露出脊梁让何铸看，只见岳飞背上刺着“精忠报国”四个大字，痕迹很深。

何铸一看，大为震动，不敢再审，就把岳飞押回监狱，再看了一些案卷，觉得说岳飞谋反确实没有证据，只好向秦桧照实回报。

秦桧认为何铸同情岳飞，不再让他审问，仍叫万俟禹罗织罪状。万俟禹一口咬定岳飞曾经写信给张宪，布置夺军谋反的计划。他们没有物证，就诬说原信已经被张宪烧毁了。

万俟禹反复拷问岳飞等三人，岳飞受尽酷刑，什么都不承认。

有一天，万俟禹又逼岳飞写供词，岳飞在纸上只写下8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这个案件拖了两个月，审讯毫无结果。朝廷官员都知道岳飞冤枉，有些官员大胆上奏章替岳飞申冤，结果也遭到秦桧陷害。

老将韩世忠忍不住亲自去找秦桧，责问他凭什么说岳飞谋反，到底有什么证据。秦桧蛮横地说：“岳飞给张宪的信，虽然没有证据，但是这件事莫须有。”

韩世忠气愤地说：“莫须有’三个字，怎能叫天下人心服!”

韩世忠反复力争，没有结果，就自己上奏章把枢密使职务辞了。

妻子比丈夫还歹毒有一天，秦桧上朝回家，跟他妻子王氏在东窗下一起喝酒。秦桧手里拿着一只柑子，心神不定地用手指甲在柑子皮上乱划。王氏是个比秦桧还狠毒的人，她看出秦桧对要不要马上杀岳飞，还在犹豫，冷笑着说：“你这老头儿，好没有决断，要知道缚虎容易放虎难啊!”

秦桧听了王氏的话，狠了狠心，马上亲手写了一个纸条，秘密派人送到监狱。

公元1142年1月的一个夜里，这位年仅39岁的民族英雄在牢里被害牺牲。岳云、张宪同时被害。

岳飞被害以后，临安狱卒隗顺偷偷地把他的遗骨埋葬起来。直到宋高宗死后，岳飞的冤狱得到平反昭雪，人们把岳飞的遗骨改葬在西湖边栖霞岭上，后来又在岳墓的东面修建了岳庙。现在，在庄严雄伟的岳庙大殿里，端坐着全身戎装的岳飞塑像，塑像上方悬挂的匾额上，刻着岳飞亲笔写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使人肃然起敬。

在岳飞墓门对面，还放着用生铁浇铸的秦桧、王氏、万俟禹和张俊四个反剪双手的跪像，反映了人民对民族英雄的景仰和对卖国贼的憎恨。

疯僧扫墓自从《疯僧扫墓》剧曲被创作演出以来，就受到人民的喜爱。

千古英雄和万世奸贼千百年来，岳飞被看做是历代忠臣良将的代表，他以“精忠报国”的精神不知感召了多少人。他智勇双全，爱国爱民，治军有方，极力主张“扫尽胡尘，把金瓯重补”。金军的将领十分地畏惧他，都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可见岳飞的盖世神威和凛凛正气在当时就十分受人敬仰。然而，南宋高宗和宰相秦桧却将岳飞视作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卖国求荣，为了向金人求和，连连发出十二道金牌将岳飞逼回，最后又设计将岳飞害死在狱中。不仅如此，秦桧因为手握重权，又积极议和，所以凡是主张抗金的文臣武将都以不同罪名遭到了他的毒手。秦桧的这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做法遭到了世人的仇恨。中国民间创作了许许多多的以痛恨秦栓为主的戏剧，有元代著名剧作家孔文卿所创作的《地藏王证东窗事犯》、明代戏曲家李梅实所创作的《精忠旗》、晚明时所创作的《精忠记》及《岳母刺字》，其中以元代的《地藏王证东窗事犯》的创作最为有名。

疯僧笑骂秦桧《地藏王证东窗事犯》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秦桧准备诬杀岳飞时，曾经事先在东窗下与人密谋过，剧中地藏王来证实了秦检的恶行，所以人们把这次谋杀案称为《地藏王证东窗事犯》。这个戏里有一折叫《疯僧扫墓》，是这部戏曲中十分重要的一节。传说秦

桧杀掉岳飞、岳云和岳飞的部将张宪以后，人们十分气愤，对这个罪大恶极的坏蛋，人人都想得而诛之，义士施全曾经刺杀过秦桧，但是施全刺杀没有成功，反而被秦桧的手下人捉住杀掉了。临刑前，施全面不改色地大骂秦桧："我虽然没能一刀宰了你，死后也要变成厉鬼，捉拿你，油炸刀噼，为冤死的忠魂报仇雪恨。"秦桧经过这次谋杀后，非常恐惧，整日茶饭不安，就到灵隐寺去烧香拜佛，希望老天保佑。

可是秦桧到了庙中，还没有拜神，却看到墙上有一首自己写的诗，他十分吃惊。急忙大问："什么人写了此诗?"庙里的老和尚就把写诗的和尚找了过来，原来写诗的这个人是庙里的烧水和尚。老和尚慌忙介绍说："这个烧水和尚早些时候就已经疯疯癫癫了，万望大人见谅。"秦桧也不答话，只是看着疯和尚说道："我只道是怎样一个疯僧，原来是这样的一个疯僧。"疯和尚也看看秦桧，说："我只道是怎样一个秦桧，原来是这样一个秦桧。"秦桧怒了："什么规矩?你怎能擅自喊我的名字?你可知道我是谁，我是当朝宰相。"疯和尚哈哈大笑："没错，你可是个上瞒天子，下欺群臣的大奸臣啊……"秦桧问："墙上的诗是你写的吗?"疯和尚说："是你做的，是我写的。"

秦桧这时似乎看出了这和尚有些来历，于是便问他："你知道我的来意吗?"疯和尚就说："你的来意很简单，只是因为受了惊恐，所以来到寺里。"

秦桧问他："你手里拿的什么?"疯和尚说："是里通外国的吹火筒。"秦桧又问他平常做什么功课，他却说："没什么功课，有功的都杀了。"秦桧又叫他把功课拿出来，疯和尚就从身边的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给秦桧，上面写着："久闻丞相理乾坤，占断朝纲第一人，都为群臣朝北阙，堂中埋没老元勋，闭门杀死忠良将，塞上欺君虐万民……"秦桧没话可以说了，疯和尚却渐渐十分生气，说："你在路上遇到施全就该死了。"这几句话看着是答非所问，可是把秦桧说得心惊胆战，只好说："这个和尚有些累了，快拿份斋饭给他。"斋饭端出来，疯和尚把它倒了，接连端了两次，疯和尚全都倒了。秦桧十分生气："你不吃就算了，为什么坏了我两份斋饭?"疯和尚更是气愤不已："我只坏了你两份，你就十分恼火，可你怎么不想想你坏了他们三个呢?(指秦桧杀了岳飞父子及部将张宪)"后来疯和尚又给秦桧呼风唤雨，说那雨是秦桧屈杀岳飞

父子老天垂的泪；那风是朱仙镇上黎民的怒气。

原来这疯和尚是地藏王的化身，地藏王在古代社会里是正义的化身，表达了人们对千古忠奸的判断。本来秦桧就心情慌乱不安，想到庙里来求神，可是却反被疯僧搅得十分恐惧，有些不寒而栗了。昆曲《疯僧扫墓》的剧作者常常以独立一折来演出，自从这一剧曲被创作出来，就受到了所有那些热爱正义，痛恨邪恶的人们的喜爱，一直流传到今天。

柔福帝姬柔福帝姬的真伪，成了真正的千古之谜。

公主改名叫帝姬柔福帝姬是宋徽宗34个女儿中的一位，她是南宋高宗的同父异母的姐姐。按照习惯，皇帝的女儿都被称为公主。可是宋朝的这位公主为何却叫做“帝姬”呢?这件事和徽宗时的改制有关。徽宗政和三年，在大臣蔡京的建议下，宋朝廷仿照周代王室中“王姬”的称号，进行改制，宣布“公主”一律被称为“帝姬”。这种制度维持了十多年，直到南宋初才恢复旧制。柔福帝姬本来因为北宋的灭亡，也随之消失在金国的土地上，可是令人感到特别奇怪的是：就是这样一位弱女子，竟然从金兵的爪牙下逃了出来，还历经艰难回到南宋朝廷，南宋的高宗皇帝和文武大臣，对柔福帝姬的虎口逃生本来感到十分高兴，可是这实在太出乎人们意料了，在欣慰的同时，不禁会产生疑问：这个长得酷似公主的人真的是柔福帝姬本人吗?

柔福帝姬活着回来了靖康二年，金兵的铁蹄横扫中原，一直南下攻到北宋都城汴京，然后将宋朝徽钦皇帝、宗室、后宫妃嫔三千余人作为俘虏押送到金国，柔福帝姬作为宫廷的一员自然也不例外，她与徽宗、钦宗及赵氏大部分宗室成员一起，离乡背井地被掳往金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亡国奴，沿途受到了金兵的百般侮辱。柔福帝姬在靖康之难被掠到金国后，很长时间都没有消息传回宋朝，所以人们一直都以为她早已经死了。可是，到了南宋高宗建炎四年时，竟然有一个女子来到宫廷，自称是从北方逃归的柔福帝姬。

宋高宗虽然惊喜万分，但是又担心这是个假冒帝姬身份骗取荣华富贵的人，于是就命令几名老宫女前去察验，这几位老宫女都觉得这女子

相貌确实很像柔福帝姬，并且对宫中旧事也是了如指掌，能够回答得八九不离十，所以就禀告皇上，这确实就是当年被掠往金国的柔福帝姬。老宫女的担保让人们渐渐不再怀疑其中有假。可是众人还有一个疑问，柔福帝姬身为金枝玉叶的公主，从小就是三寸金莲，怎么竟会生了一双大脚呢，这实在是让人太怀疑了。那女子面对一双双怀疑的眼睛，丝毫没有惊慌，不胜悲苦地解释说："金人对宋朝宫室成员不加怜悯，像牛羊一般地驱逐，我们连鞋都不曾穿上，光着脚步行了几万里路，就是三寸金莲又怎么能保持原样呢?"宋高宗觉得言之有理，并且又听到这女子能够直呼他的小字，便认定她就是真的柔福帝姬，不再怀疑。于是马上下诏让她入宫，授予福国长公主的称号，又为她选择永州防御使高世荣为驸马，赐予嫁妆一万八千缗，从此过上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神仙般的生活。这以后，高宗认定这是唯一的姐姐，所以对她恩宠有加，先后赏赐的东西折合达四十七万九千缗。

错把颜子当公主可是在绍兴十二年和议结束后，南宋高宗的生母显仁太后从北方回来了，见到高宗后，没说几句话就急急忙忙地告诉高宗说："金人都在笑话他，因为他错把'颜子'(颜子就是冒牌货的意思，当年京师有颜家巷，制作的各类器物都是假品次品，极不坚实，因此人们用'颜子'来称呼冒牌货)当公主。"

高宗一向信任他的生母显仁太后，刚一听到这番话，非常地吃惊，也十分地愤怒，于是立即下旨捉拿柔福帝姬，但他还是有些疑惑，如果公主不是真的，怎么会对宫中的事情知道得那么详细呢?

第二十三章

真假公主案于是高宗下令将“柔福帝姬”下狱审讯，没过多久就真相大白了：这女子确实是个假公主，她原本是个尼姑，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曾经遇到一个在靖康年间从京城逃难出来的柔福帝姬的贴身宫女。那宫女一见她就惊呆了，告诉这女尼说她的容貌与柔福帝姬十分相像，又告诉她许许多多的宫中琐事。

女尼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无以为生，于是就冒名顶替柔福帝姬，可没想到竟然蒙混过关，居然还享受了十多年的荣华富贵。这个假公主逍遥多年，致使南宋王朝受到金人的耻笑，宋高宗不能忍受这样被人捉弄，他生气极了，在以极大的耐心听完上报的假公主的原委后，立刻怒气大发，派人即刻将假的柔福帝姬处死。轰动一时的真假公主案就这样结束了。只是那驸马高世荣最可怜，人们纷纷嘲笑他说：“向来都尉，恰如弥勒降生时；此去人间，又到如来吃粥处。”意思就是说他福分太浅了。

不过，这个柔福帝姬虽然被诛，可是民间却流言纷纷，很多人都为她抱屈不平。在民间流传的《四朝见闻录》、《随国随笔》等笔记中，都记载了另外一种说法：柔福帝姬其实真的是公主，历经了千辛万苦才到达南宋国土。可是显仁太后回来后，由于她在北方多年，有许多不愿为国人知道的隐事，见柔福逃归，怕她泄露，因而强说她是假的柔福帝姬，令高宗将她杀掉。

高宗为奉母命，也容不得柔福辩解，最终使她死于非命。这一说法虽然流传甚广，可惜没有真凭实据，又死无对证，于是柔福帝姬的真伪，就成了真正的千古之谜。

太后在金国的遭遇韦太后栉风沐雨，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才回到临安，结束了她在金国屈辱的生活。

母子意想不到的重逢“靖康之变”时，宋高宗的生母韦太后作为金人的俘虏，同宋徽宗、郑皇后一起被押解北上，当时她不是徽宗的正宫皇

后，只是一名贤妃。金国把俘虏分作七批送至燕云，她被编在第二批，一共35人。他们自汴京附近的刘家寺皇子塞出发，长途跋涉了两个月之久，才到达金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韦贤妃被分配到洗衣院浆洗衣服。冬去春来，花开花落，一直到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她才有幸被金人释放，来到徽宗被羁押的地方——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原来被俘入金的宋朝女子，差不多都被集中到了上京洗衣院。

这是金朝为惩罚宋朝女俘而专门成立的机构，不论是皇后皇妃，国戚贵族，只要进了洗衣院，统统都是奴隶。金朝的达官显贵经常到这里寻花问柳，稍有姿色的不是弄去当做妾媵，就是买去当做奴婢，不到几年，洗衣院便荒凉败落了。金人干脆关闭了洗衣院，将剩下的妇女分别遣往他处，韦太后就这样才来到了五国城。

但是传说，韦太后到底没有摆脱厄运，后来被盖天大王完颜宗贤索去当了夫人，不过，这些记载不见于正史，只见于稗史野乘，是真是假，已经无从查考了。据说，钦宗在徽宗崩逝于五国城后，被金人拘押到了北京大定府(令辽宁宁城西大名城)，完颜亮迁都燕京之前，金国的首都就设在这里。金人把钦宗关押在安养寺里，并派阿计替严加看守。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四月的一天，阿计替偷偷告诉钦宗，盖天大王与韦夫人将来寺里作斋。钦宗知道盖天大王就是完颜宗贤，但韦夫人是谁却毫不知情。

到了这一天，只听见车轮辚辚，马蹄得得，钦宗从门缝中望见韦夫人同一虬髻长官翩翩而来。旁边有一侍婢抱着一个四岁左右的孩子，不时呼韦夫人为母亲。一行人一律胡服装束。那钦宗与高宗虽然都是徽宗之子，但钦宗之母是王皇后，这时早已去世，高宗之母是韦贤妃，不过韦贤妃与钦宗名分上仍是母子。二人自“靖康之变”分手以来，一直没有见过面，过了十多年，钦宗才第一次看见韦贤妃，但自己身居囚室，不便叫她，而韦贤妃也不曾料到钦宗会在这里饱尝铁窗风味。钦宗想起已故的母亲，不禁潸然泪下。盖天大王与韦夫人作完斋事，略略憩息，便启程而去了。

钦宗被关在斗室之中长达数年之久，寺中人迹罕至，只有些达官显贵偶尔来作作法事。一天，寺里住持僧告诉钦宗：他是东京陈留(今河南

开封东南)人，大观年间为僧，宣和年间因事北走契丹，其后契丹为金所破，他便滞留未归，受盖天大王之命主持此寺，如今已五十多年了。他因与盖天大王熟稔，也常到韦夫人处行走，韦夫人也经常打听钦宗动静。钦宗问他：“前日那个小儿是谁?”回答说：“韦夫人所生，今年五岁了。”又过了几天，住持僧人支开了阿计替，告诉钦宗说：“韦夫人要我向你致意，南北已经通和，以黄河为界，你归期有望了。”钦宗听后沉默不语。住持僧又说：“前日韦夫人得知太上皇(指徽宗)驾崩及朱、郑二皇后死讯，暗暗堕泪了好几天，悄悄交给我金钗一股，让我作佛事追荐。请您宽心，归期不远了，您多保重。韦夫人已同大王生子，决无回去之理。”

此后，钦宗再也没听说过韦夫人的消息，约摸过了一年多，住持僧躲开监守，隔着窗户对钦宗说：“南朝皇帝(指高宗)多次派人索要韦夫人，如今盖天大王已同韦夫人一起去江南了。钦宗想想自己身陷囹圄，回归无期，忧惧交并，不长时间头发便全白了。

迎太后回国高宗即位后，母子情深，无时不挂念自己的生母，便遥尊母亲为宣和皇后，封外祖父韦安道为郡王，恩泽所及，韦家有三十多人被授为官。只要一有使节赴金，便让他们打听母亲消息。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徽宗、郑皇后崩逝的消息传来，高宗号恸不已，对大臣们说：“宣和皇后春秋已高，朕每念及，不遑宁居。忍辱负重，与金讲和，正是为了迎回皇后。”大臣朱震上疏，请遥尊之为皇太后，另一大臣吴表臣请求等为徽宗守丧三年后，再册封为皇太后，高宗准允所请。当即播告天下。

这年春天，高宗派王伦为迎奉梓宫使，迎护徽宗、郑皇后尸骨回国，并为韦后、钦宗各带去黄金二百两。临行，高宗叮嘱王伦说：“金人若能依从朕的请求，归还韦太后，割地赔款也在所不惜。”这年冬天，王伦从金国归来，说金人允许归还徽宗灵柩及韦后，高宗听了非常高兴。第二年，王伦再次出使到金。金熙宗完颜直为他设宴三日，并派遣大臣萧哲、张通右为江南诏谕使，与王伦一起回到南宋复命。两位使节拍胸保证，韦后安然无恙，不久便会送回南宋。高宗欣喜若狂，赶紧筹建慈宁宫，等待太后归来，并派奉迎使等候。但是，金人口惠而实不至，一直到绍兴十年，韦太后仍滞留未归，高宗在慈宁殿册韦太后为皇太后，

以后，每逢她生辰，都遥行贺礼。

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羁留在金的南宋大臣洪皓得到了韦太后的一封书札，派人送回朝廷。高宗大喜过望说：“朕不知太后的情况已近二十年了，虽然遣使百人，不如见到太后一封书信。”金国派遣萧毅、邢具瞻来议和。高宗又告诉金使说：“朕已得天下，而不能赡养双亲，徽宗皇帝已经弃世，太后年逾六十，风烛残年，来日无多，每念及此，痛彻心肺!今天在这里立誓，当明言归我太后。朕不耻讲和，否则朕将用兵到底。”萧毅等辞行归国，高宗又是恳求又是恫吓说：“为太后之故，我朝决定割让唐、邓二州，其余疆土以准水中流为界。若太后今年从金方归还，朕当谨守誓约，如若今年太后不归，誓约便是一纸虚文。”

没有多久，南宋又派遣大臣何铸、曹勋到金朝答谢，高宗又把二人召到内殿叮嘱说：“朕北望庭帏，已逾十五载，几乎无泪可挥，无肠可断了!之所以忍辱负重，奉币求和，都是为了太后的缘故，一片诚心，皇天可鉴。”说着，不觉泪流满面，左右也都掩袖而泣。高宗又说：“你等见了金国皇帝，可以朕言相告：我朝皇亲贵族赖金方安顿，朕心甚为铭感。然而岁月既久，朕为人子，深不自安，何况亡者未葬，存者亦老，兄弟族属，剩余无几，每遇岁时节序，未尝不北向陨涕，若金国使朕父兄母子团聚，此恩此德，当没齿不忘。况且太后在金朝，不过是一个寻常老人，若在本国，则所系甚重。你们要以此天性至诚相告，想来金国皇帝也会受到感动的。”

何铸等到了金朝，第一个请求便是归还韦太后。金熙宗完颜直说：“先朝业已如此安置，现在怎么好更改呢?”何铸说：“先前两国干戈不休，如今已签订了‘绍兴和议’，南北通和，遐迩一家，还请归还太后。”经过再三请求，金熙宗才答应归还太后，并派大臣高居安、完颜贤等扈从以行。宋高宗也派王次翁为奉迎使，迎接韦太后回銮。

韦太后身陷异域，对回归祖国已不抱任何希望，忽然得知回銮有期，不禁欣喜若狂。和她一起入金的乔贵妃听了消息，特地前来探望，又勾起了韦太后的往事。原来韦、乔二入出身寒微，入宫后都在郑皇后处服役。

二人私谊甚笃，便结为姊妹，并相互约好先贵的人不要忘记旧好。不久，徽宗宠幸乔贵妃，贵妃不忘前言，积极荐引韦氏，徽宗对韦氏颇为钟情，封她为贤妃。徽、钦北迁，韦氏与乔贵妃也一路同行，在金国度过了15年囚犯一样的生活。当时金使高居安已在韦太后处，乔贵妃从身上掏出50两黄金递给高居安说：“些许薄礼，不成敬意，请太尉笑纳。此次太后回銮，还望太尉妥为照管。”又斟了一杯酒望着韦太后说“姐姐回去就是皇太后了，一路多多保重。妹妹我永无还期，只能成为异域之鬼了。”太后一阵心酸，泪珠夺眶而出，乔贵妃也泣不成声了。韦太后说：“还有什么话要说?”乔贵妃说：“姐姐到快活处，莫忘了此间的不快活。”韦太后说：“怎敢忘掉今日!”寒暄过后，乔贵妃才依依惜别。

南归前夕，韦太后又见到了钦宗。原来“绍兴和议”后，金人虽不肯归还钦宗，但看管松得多了。钦宗挽着韦太后的车轮说：“倘我能与太后一起南归，没有其他奢望，只要能管理太一宫就心满意足了，请太后转达九哥(南宋宫廷称钦宗为八哥、高宗为九哥)。”

韦太后回答说：“我南归之后，如不派人来迎你，当瞎了我的双眼。”钦宗无语堕泪，伫立良久才蹒跚而去。

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初夏，韦太后自沙漠南归，高宗派遣参知政事王庆曾与韦太后之弟韦渊在国境迎接。金熙宗也派近臣护送。到了燕山，金使惧怕天气炎热，逡巡不前。韦太后从金朝副使那里借得黄金三百两，答应到达南宋国境时加倍偿还。

她笃信佛教，三百两黄金除用少许营办佛事外，其余的全数犒赏了随从。随从们欢声雷动，冒着溽暑护送太后南行。到了宋朝国境，金朝使节要求偿还借款，然后前进。韦太后让韦渊想想办法。

韦渊说自己虽受封为郡王，其实是闲散官职，要筹措金钱，应当与朝廷大臣王庆曾商量，他无能为力。而王庆曾出发之日，事无巨细都听宰相秦桧安排，秦桧没有吩咐的，他不敢越雷池一步，因此坚持不肯付钱。

双方在边境上相持了三天，韦太后急得七窍生烟，愁得五内俱焚。后来还是专门为奉迎而来的王瑛慷慨解囊，其他人也拿出散碎银两，才

勉强凑足六百两黄金交给金使，金使这才高高兴兴地办了交接手续，回朝复命去了。

韦太后一行从燕山迤逦东行，来到东平(今山东省)再由东平经安徽，然后到达楚州(今江苏淮安)高宗亲自到临平镇迎接。为了表示隆重，高宗下诏用半副銮驾迎接韦后，仪卫竟有2483人之多，这是当时的最高礼遇。自北宋灭亡，金国以礼送回人质，这是第一次。

高宗虽然割地赔款，但毕竟争回了面子，因而兴高采烈。宰相秦桧、大将张俊、韩世忠等人自帷幄外拜见太后。太后在北方时就听说韩世忠骁勇善战，特地召到帘前慰问说：“这就是韩将军吗?我在金国就久闻大名了。”

韩世忠也慰问了一番，方才欠身离去。韦太后又问：“为何不见大小眼将军?”岳飞两眼一大一小，所以人称大小眼将军。一位大臣悄悄告诉她：“岳飞已经死在狱中了。”太后责备高宗说：“岳飞是国家栋梁，打得金人望风逃遁，为何置他于死地?”说着，便忿忿然要出家，慌得高宗连忙伏地请罪，韦太后这才消了怒气。据说，她从此之后终身都穿道士服装，表示对忠将岳飞悼念。

韦太后栉风沐雨，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才回到了临安，结束了她在金国的屈辱的生活，太后被掳往金国时只有40多岁，归来时已年逾60，是一个垂垂老妇，太后一直活到80岁才溘然长逝。

红楼女子喜嫁卖油郎在那些红尘女子的归宿中，莘瑶琴恐怕是很幸运的。

自古红颜多薄命许多容貌出众，才识过人的优秀女子都被迫沦落风尘，成了受尽欺凌侮辱的红楼名妓。她们表面上被士人富商环绕着，吹捧着，好像过着优越的生活，实际上却也只不过是这些有钱人的掌中玩物而已。所以，每一个被迫沦落风尘的女子，最渴望的就是能够赎身从良，找个能够知己惜己的一生伴侣了。但是这种愿望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实现的，无数风尘女子在这片罪恶的欲望之海中痛不欲生地挣扎着，最终被强大的黑暗所吞噬了。不过，在无数不幸之中，也有着一些例外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中，弱女子终于遇到一个真心爱护自己的如意郎

君，于是历史上就有了一段段这样的佳话。莘瑶琴就是那些不幸沦落风尘的女子中，最终得到了一个安稳宁静生活的幸运女子。

红楼的花魁南宋年间，杭州妓院有个才艺容貌都很出众的花魁娘子，她的原名叫莘瑶琴。莘瑶琴很小的时候，就在战乱中和父母走散了，几经周折被卖进了杭州的一家妓院。当她长到14岁时，出落的美艳异常，人人都说她的美貌能勾人魂魄。许多有钱的人都争着想作她的第一个入幕之宾，最先摘取这朵名花。但是，莘瑶琴只想做一个青倌人，卖艺不卖身，说什么也不肯接客。后来，贪财的鸨母就找了个机会把她灌醉，把她的初夜卖给了一个姓金的员外。莘瑶琴第二天醒来时知道了真相，痛不欲生，同行的其他姐妹却劝她说，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再抗拒也没用了，接客，才能找到一个如意之人好尽早从良，而且也可积攒一些银两为将来赎身做准备。于是，莘瑶琴只好任命，从此不再反抗，无奈地接受了自己这种悲惨的醉生梦死的生活。因为她才艺双全，不久就被称为红楼“花魁”，成了杭州城内顶尖的名妓。

老实的卖油郎这时，杭州城外有个开油店的朱十老，他收养了一个从汴京逃难来的小厮，名叫秦重。朱十老给他改名叫朱重。如今这个朱重已经长到了17岁，成了一个勤劳朴实的小伙子，他每天都帮朱十老榨油卖油，非常能干，朱十老也很喜欢这个一直跟在自己身边的孩子。但是，朱十老有个使女兰花，却因为曾经向朱重示好被拒绝而对朱重心怀怨恨，她和伙计邢权互相勾搭，用尽方法挑拨离间，终于让朱十老将朱重赶了出去。

朱重从此只好走街串巷以卖油为生，日子过得非常辛苦。有一天，他到钱塘门外的昭庆寺去卖油，恰好寺中要做九昼夜的功德法事，来的人很多，所以他一连九天都挑油到昭庆寺来卖。到了第九天，朱重卖完了油，正坐在寺前的一块大石头上歇息，忽然看到一位美若桃李的女子从寺中走出来，后来他四处打听，才知道那个美貌女子就是杭州城有名的花魁娘子。朱重知道，凭自己的身份是没办法再见到这位绝色美女的，但是他又始终不死心，每天更加辛勤的工作，一分一钱地积攒银子，一年以后，他终于攒到了十来两银子。用这十两银子，他买了一身体面的衣服，又拿着剩余的银两来到莘瑶琴所在的妓院。但是莘瑶琴这样的名妓是相当忙的，每天都有应酬，朱重去了几次都扑了空。后来，

连最无情的鸨母都被他的痴情感动了，就让朱重在莘瑶琴房中等她。

两情相悦莘瑶琴晚上回来时，又喝醉了，一进屋就和衣而卧。朱重就在她身边躺了一夜，除了为她盖被、倒茶之外，就是欣赏她的花容月貌，没有一点侵犯她的意思。第二天莘瑶琴知道了这件事，非常感动，沉浮在妓院中的她从未见如此诚恳老实的男子。于是她芳心暗许，给了朱重二十两银子让他去做生意。

这时，朱十老染病在床，邢权与兰花深夜卷走了柜中的银钱。朱十老这才想到朱重的好处，想找朱重回来。朱重也不计前嫌，又回到了老人的身边，用莘瑶琴给他的银子做本钱，重新做起了生意。后来，朱十老的病越来越重，不久就死了。朱重一个人忙不过来，便招揽了一位从汴京逃难来的中年男子和他的妻子阮氏。这位中年汉子名叫莘善，正巧就是花魁娘子莘瑶琴幼年走失的父母，但是这时朱重还不知道。

美满的结局杭州城中有个吴八公子，人品恶劣，一向对莘瑶琴垂涎。有一天，他强行把莘瑶琴带至湖中船上，想要轻薄。莘瑶琴平时就很反感他，死不从命，吴八公子就脱了她的绣鞋和缠脚布，让她自己走回去，想羞辱她。要知道，那个时候女子的小脚是不能随便给人看见的。莘瑶琴倍感羞辱，痛不欲生之时，正巧碰到了路过此处的朱重，朱重就把她送了回去。莘瑶琴从此对他更是欣赏有加，就连鸨母也觉得他是个难得的忠厚之人。后来，莘瑶琴拿出了自己多年的积蓄，让朱重为她赎了身。他们两人在成婚之时，莘瑶琴又得以和失散多年的父母相认，真是双喜临门。在那些红尘女子的归宿中，莘瑶琴恐怕是很幸运的。

武将南逃书生退敌没想到退兵不是武将，竟然是一个文弱书生。

充分准备与纸醉金迷绍兴和议以后，宋金双方有20年没有发生战争。宋高宗和一批投降派大臣对于这个偏安的局面十分满意，在临安修筑起豪华的宫殿府第，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把收复失地的事忘记得一干二净。在这段时间里，金朝统治集团发生内讧，贵族完颜亮杀死了金熙宗，自立为帝，历史上称为海陵王。完颜亮把金朝的京都从上京迁到燕京，一心想发动战争，消灭南宋。

有一次，他做了个梦，梦里他上了天宫，天帝命令他讨伐宋朝。

他跟大臣谈起这个梦，一些凑趣的大臣都说这是个好兆头，向他祝贺。完颜亮就把发兵南侵的事决定下来了。

完颜亮准备发兵的风声，传到临安。有些官员要朝廷早作准备，反而被宋高宗斥责是造谣生事。

有一回，金朝派使臣施宜生到临安。宋高宗叫大臣张焘接待。

张焘想从施宜生那里探听消息。施宜生原来是宋朝的官员，也想透露点消息给张焘，但是旁边有金朝的随从官员，不好明说，只好暗示说："今天北风可刮得厉害啊!"又拿起几案上的笔说："笔来，笔来!"张焘得到施宜生的暗示，连忙把金兵要大举南下的消息告诉宋高宗，但是宋高宗只当耳边风。

书生统领全军公元1161年9月，完颜亮做好一切准备，发动全国60万兵力，组成32个军，全部出动，进攻南宋。出发之前，完颜亮趾高气扬地跟将领们说："从前梁王(指兀术)进攻宋朝，费了多少时间，没取得胜利。我这次出征，多则一百天，少则一个月，一定能扫平南方。"

完颜亮的大军逼近淮河北岸，防守江北的主帅刘铸旺在生病，派副帅王权到淮西寿春防守。王权是个贪生怕死的家伙，听到金兵南下，吓得丧魂落魄，根本没想抵抗。完颜亮渡过淮河，王权还没见到金兵的人影儿，早已闻风逃奔，一直逃过长江，到采石才停下来。

宋高宗听到王权兵败，才害怕起来。他把王权撤了职，另派李显忠代替王权的职务，并且派宰相叶义问亲自去视察江淮守军。

叶义问也是个胆小鬼，不敢亲自上前线，另派一个中书舍人(文官名)虞允文，慰劳采石的宋军将士。

虞允文到了采石，王权已经走了，接替他职务的李显忠却还没到。对岸的金兵正在准备渡江。宋军没有主将，人心惶惶，秩序混乱。虞允文到了江边，只见宋军兵士三三两两垂头丧气地坐在路旁，把马鞍和盔

甲丢在一边。

虞允文问他们说：“金人都快要渡江了，你们坐在这里等什么?”

兵士们抬头一看，见是一个文官，没好气地说：“将军们都跑了，我们还打什么仗?”虞允文看到队伍这样涣散，十分吃惊，觉得等李显忠来已经来不及了，就立刻召集宋军将士，告诉他们说：“我是奉朝廷的命令到这里来劳军的。你们只要为国家立功，我一定报告朝廷，论功行赏。”

大伙儿见虞允文出来做主，也打起精神来了。他们说：“我们吃尽金人的苦，谁不想抵抗。现在既然有您做主，我们愿意拼命作战。”有个跟随虞允文一起去的官员悄悄地对虞允文说：“朝廷派您来劳军，又不是要您督战。别人把事办得那么糟，您何必背这个包袱呢?”

虞允文气愤地说：“这算什么话!现在国家遭到危急，我怎么能考虑自己的得失，逃避责任。”

书生打了个大胜仗虞允文是个书生，从来没有指挥过战争。但是爱国的责任心使他鼓起勇气。他立刻命令步兵、骑兵都整好队伍，排好阵势，又把江面的宋军船只分为五队，一队在江中，两队停泊在东西两侧岸边，另外两队隐蔽在港汊里作后备队。

宋军布置刚刚结束，金兵已经开始渡江。完颜亮亲自挥动着小红旗指挥。几百艘金军大船迎着江风，满载着金兵向南岸驶来。没有多少时间，金兵已经陆续登岸。

虞允文命令部将时俊率领步兵出击。时俊挥舞着双刀，带头冲向敌阵。兵士们士气高涨，拼命冲杀。金兵进军以来，从没有遭到过抵抗，一下子碰到这样强大的敌手，就都垮下来了。

江面上的宋军战船，也向金军的大船冲去。宋军的战船虽小，但是很坚实，就像尖利的钢刀一样，插进金军的船队，把敌船拦腰截断。敌船纷纷被撞沉。敌军一半落在水里淹死，一半还在顽抗。

太阳下山了，天色暗了下来，江面上的战斗还没有结束。这时候，

正好有一批从光州(今河南潢川)逃回来的宋兵到了采石。虞允文要他们整好队伍，发给他们许多战旗和军鼓，从山后面摇动旗帜，敲着鼓绕到江边来。江上的金兵听到南岸鼓声震天，看到山后无数旗帜在晃动，以为是宋军大批援兵到来，纷纷逃命。

金军遭到意料不到的惨败，气得完颜亮暴跳如雷，一肚子怒气全发泄在兵士身上，把逃回去的兵士全拷打死了。

虞允文料想完颜亮不会甘心失败。当天夜里，就把战船分为两队，一队开到上游，一队留在渡口。到第二天天蒙蒙亮的时候，完颜亮果然又派金军渡江，虞允文指挥两队战船夹击。金兵尝过虞允文的厉害，没心思反抗。300只大船被困在江心和渡口，宋军放起一把火，把敌船全烧了。完颜亮在采石渡江不成功，又把他们的兵士乱杀了一批，才带着留下的人马到扬州去，想到那里去渡江。

让金兵全军覆没宋军在采石大胜之后，主将李显忠才带兵到达。李显忠了解到虞允文指挥作战的情况，十分钦佩。虞允文对李显忠说："敌人在采石失败之后，一定会到扬州去渡江。对岸镇江那边没准备，情况很危险。您在这儿守着，我到那边去看看。"

李显忠马上拨给虞允文一支人马，由虞允文率领前往镇江。

镇江原来是由老将刘锜驻守。那时候，刘锜已经病得不能起床了。虞允文到了镇江，先去探望刘锜。刘锜躺在床上，紧紧拉着虞允文的手，心情沉重地说："国家养兵30年，没有立过一点战功，想不到立大功的还是靠您这位书生，我们当将军的实在太惭愧了。"

虞允文安慰他一阵，就回到军营。他命令水军在江边演习。宋军制造了一批车船，由兵士驾驶，在江边的金山周围巡逻，来回像飞一样。北岸的金兵看了十分吃惊，赶快报告完颜亮。完颜亮大怒，把报告的人打了一顿板子。

金兵内讧，南北议和这时候，金兵打了几次败仗，都害怕作战。有些将士暗地里商量逃走，完颜亮发现后，下了命令：兵士逃亡的杀死将领，将领逃亡的杀死主将；并且宣布第二天全军渡江，畏缩不前的处

死。

全军将士对完颜亮的残酷统治再也忍受不住，还没等完颜亮发出渡江命令，当天夜里拥进完颜亮的大营，把他杀死。完颜亮一死，金兵就撤退了。

完颜亮带兵南侵的时候，金朝内部也出了事。一些不满完颜亮统治的大臣，另外拥戴完颜雍为皇帝，这就是金世宗。采石大战后，金世宗为了稳定内部，派人到南宋议和，宋金战争又暂时停了下来。

宋高宗用处女选太子后人对赵构曾经有所评价，说他一生所行败事很多，可是在选立太子这件事上却很是公允。

无人继承皇位宋高宗赵构虽然后宫妃嫔如云，但是儿子却只有元懿太子一人，这元懿太子又偏偏短命，年仅三岁就夭折了，这件事使得赵构十分悲痛。最不幸的是宋高宗赵构，太子已经死了，他却又在南逃途中受到惊吓，患上了不育的疑难病症，不可能再有皇子。另外靖康一难中，宗室三千余人又全部掠走，这么看来，一时之间，竟然不能选出皇储来继嗣，这可如何是好?南宋刚刚创建，储君是一国安定的根本，如果不立储君，朝野就不能安心，国家的稳定也会随之受到很大的威胁。

宋高宗赵构为了保住赵家江山，只得在太祖的后裔“伯”字行中“访宗求室”。其实从北宋初建到南宋初年，“伯”字行的太祖后裔已达1645人，挑选的余地很宽，可是要从这一千余人中挑选出一人，那可就难了。宋高宗先挑出七岁以下的儿童十人，然后逐一审看，最后只剩一胖一瘦两个小孩。胖的是伯玖，瘦的是伯琮。

用处女选太子高宗赵构在从伯玖和伯琮中挑选合适接班人时很费了一番周折。粗看时决定“留胖去瘦”，留下伯玖，并赐伯琮三百两白银遣回原地。伯琮正要捧银出门，赵构又说没看仔细，让他二人叉手并立，自己站在一旁反复端详比较。正在高宗犹豫不定的时候，忽然间二人脚边窜过一只猫，伯琮立着未动，仍然目不斜视，可是伯玖却飞起一脚向猫踢去，高宗赵构这时很不高兴地说：“如此轻狂，怎能担当社稷重任!”于是决定“留瘦去肥”。这样，伯琮便以候选人的身份被养育在宫中了。

伯琮入宫时年方六岁，走路摇晃还需要人护持，高宗赵构便让张婕妤养育。伯玖也被孤独无依的吴才人抚养。伯琮天资聪颖，博闻强记，与常人不同，受到高宗的钟爱。而伯玖也并非草莽之辈，才能也很出众，长大之后伯琮被加爵普安郡王，伯玖也被封为恩平郡王。二人才能不相上下，在这种情况下，赵构又犹豫起来了，不知道该下诏立谁为嗣才能不愧对列祖列宗。为了检验二人的品质优劣，赵构想出了一个办法，决定采用“处女”选太子。于是给伯琮、伯玖各赐宫女十人，几天之后，赵构将宫女召回，一一检验。结果，赐给伯琮的十人都未破身，赐给伯玖的十人都已被其奸过，不是处女了。宋高宗虽然并未将此事告诉别人，但内心已经分辨出谁更优一筹，当下决定立伯琮为皇储。伯琮本就不是好色之徒，宫闱生活也很值得称道，再加上他的老师史浩提前告诉他要谨慎从事，才能经受住高宗的重重考验，所以伯琮事事谨慎，从而轻而易举地击败了伯玖。

赵构禅位绍兴三十年，宋高宗赵构宣布立伯琮为皇子，更名为玮，封为建王，并诏告天下。之后，确定伯玖为皇侄，这样就确立了皇位继承人，免除了后顾之忧。绍兴三十二年，赵构又正式册立伯琮为太子，并下旨在紫宸殿行内禅之礼。

可是赵玮死活不肯接受，他默默地退到了大殿一侧的旁门，想返回东宫。后来宋高宗不得不再次降谕旨，太子这才勉强答应。可是赵构为什么要在此时禅位呢?难道又是在检验太子的品质吗?其实这时高宗真的已经心生退意了。原来，他自即位起，终日颠沛流离，半生戎马生涯已经使得他神疲身倦，早就想当太上皇享清福了。

而在绍兴年间，金人屡次入侵，他带兵征讨多次失利，后来两准又迅速失守，朝臣们已经被金兵吓破了胆，争相提出退避之计，却没有一人响应抗金。赵构说不敢抗金，可是又万万不能继续推行会招致天怒人怨的投降政策，在进退两难的时候，只好把这副担子扔给太子赵玮。

太子赵玮他却不同于宋高宗，他年轻气盛，讨厌秦桧专权卖国，并且数年随赵构在军中供职，早已熟悉了朝中文武及军中将士，也许会扭转僵局，所以高宗坚持着要退位。太子赵玮只好接受了这一重任，可是他还是心有余悸，在行内禅礼时，文武百官齐聚殿门下，宣读禅位诏书

后，按官阶高低鱼贯进入紫宸殿迎接太子登基。

过了一会儿，太子赵玮身着朝服，由内侍扶掖来到御座前，但却拱手侧立不坐，七八次扶掖之后才稍稍就坐，宰相率领百官祝贺，太子赵玮又忽然从座上跳起来，特别难过地说："我父高宗的命令太过独断了，天子的位子很重，我年纪尚不足以担当此重任啊，还是容我退避吧!"

群臣苦劝一番，太子赵玮又再三推辞几番，看实在拗不过众人，这才只好听从所请，继承了皇位，这就是历史上以孝著称的宋孝宗。即位仪式才刚刚结束，宋孝宗便身着龙袍，佩玉带，亲自送太上皇还宫，直到出了宫门还不肯止步，太上皇赵构再三辞谢，他才停下。赵构特别高兴，直说自己所托得当。

后人对赵构曾经有所评价，说他一生所行败事很多，可是在选立太子这件事上却很是公允。

陆游休唐婉陆母为什么逼着他们离婚呢?实在是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才子配佳人陆游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诗文闻名于世。陆游12岁就能吟诗作文，18岁师从曾几，约在12岁时，与表妹唐婉结为夫妻。陆游才华横溢，风流倜傥，唐婉秉性贤淑，爱好诗文，二人志趣相投，琴瑟相和，可谓是才子佳人，天作之合。

婆婆执意休掉儿媳然而，陆游的母亲却不喜欢这个儿媳，她看重了王家女儿端庄贤淑，要儿子休掉唐婉重新娶妻，陆游不愿意休掉唐婉，但是又不敢违抗母命，只得极不情愿地写了休书，骗过母亲，但暗地里却悄悄地置了一所别宅让唐婉居住，暗中与其幽会。然而纸里终究包不住火，没过多久，这座宅子就被陆母查到，还差点酿成乱子，到了这种地步，陆游只得与唐婉挥泪告别，之后与母亲中意的王氏成亲。

鸳鸯被拆散而唐婉则嫁给了本地一个名叫赵士程的大户子弟。从此两人相隔异地，空余一番思念，直到十年后的一天，陆游因被秦桧罢黜出朝，郁闷之余，回到家乡闲居。在暮春的一天，出游在故乡禹迹寺南

的沈家花园，恰巧遇上唐婉与其后夫也来游玩，陆游看到了唐婉，想起年少时夫妻欢乐地吟诗作对，又想到他们本是一对鸳鸯却被活生生地拆散，还有这别后十年的物是人非，不禁无限怅然，提笔写下了千古爱情名篇《钗头凤》：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唐婉见了陆游的题诗，自是更触动了她的“一怀愁绪”，看看这变化无常的世事人情，想想那物是人非的昨夜之宵，她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又和了一首《钗头凤》：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栏。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

从此唐婉就卧病不起，整日抑郁以泪洗面，不几日，就撒手人寰了。这一幕婚姻悲剧，给诗人陆游带了难以抚平的伤痛，虽然时过境迁，可是陆游总是缠绵悲戚，多次写诗来抒发自己心头之痛。后来，陆、唐二人的这段故事又被人写成《沈园恨》、《题园壁》等古戏曲到处传唱。到了现代，有人又写成地方戏，拍成电视剧上演。陆游与唐婉这一对痴情男女，让多少人为之落泪，为之感叹。人们叹息之余，对陆母让儿子陆游休掉其情投意合的妻子唐婉发出质疑，加以种种猜测，按说儿子儿媳情投意合，为什么逼着他们离婚呢?实在是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辛弃疾活捉叛徒辛弃疾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词人，参加了抗击金军的斗争，曾经活捉叛徒张安国。

参加抗金义军辛弃疾出生在靖康之耻13年后，那时金兵已经将他的

家乡山东历城全部占领。辛弃疾的父母双亡，他从小与年迈的爷爷辛赞相依为命。当时，由于金兵肆虐中原大地，爷爷辛赞从辛弃疾懂事起，就不断地给他讲述岳飞等爱国将领和那些抗金义军的故事。辛弃疾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到战场上奋勇杀敌，保家卫国。年轻时，辛弃疾曾跟随老师蔡伯坚学习知识，但是他更多的是关注金兵在中原地区的一举一动。

在辛弃疾21岁那年，金海陵王完颜亮率领金兵南侵，辛弃疾立刻就组织了老百姓二千余名奋起抗金，没过多久，辛弃疾的这支部队就被整编到农民领袖耿京领导的抗金义军中。耿京十分信任辛弃疾，让他当上了主管大印、信符和处理重要文书的“掌书记”。

追回义端，避免叛变当时，和辛弃疾一同来投奔耿京的，还有辛弃疾的一个叫义端的朋友。义端原本是个和尚，积存有很多的金银财宝，可是被金兵抢走了，所以他就率领一千多人起义抗金，也把队伍带去投奔了耿京。义端不服从别人的领导，总想把起义军的大权骗到自己手里。可是他的阴谋没有得逞，于是义端又想去投降金军。

义端准备以耿京的大印为见面礼去投降金军，于是就趁辛弃疾出去巡逻还没有回来时，偷偷地熘进辛弃疾的营帐里到处乱找，把辛弃疾放在床上的耿京的大印偷走了。然后，义端就骑上快马往金军的营地奔去，辛弃疾回来后发现大印不在，人们告诉他义端来过，可是却到处找不见义端的人影。辛弃疾就断定大印是被义端偷走了。他马上告诉耿京，耿京一听，就气得要杀掉辛弃疾。辛弃疾请求先去追回大印，回来再受刑。耿京同意他的请求。辛弃疾立即骑上快马，顺小路追上义端。辛弃疾很勇勐，终于杀掉义端，夺回大印，避免了义端的叛变和起义军的损失，后来耿京也就原谅了他。

活捉叛徒第二年，金世宗自立为金国皇帝。他让起义军投降他，说如果投降的话，就给起义军好处，否则就要全力攻打，直到消灭他们。辛弃疾和耿京商量：应该马上和南宋军队联合，两面夹击敌人。于是耿京就派他到建康，把这个建议告知宋高宗。宋高宗就让他们把队伍带到南方海州去。辛弃疾高兴地回去复命。可是，就在辛弃疾路经海州，去拜见当地的南宋将领李宝和王世隆时，他们却告诉辛弃疾，耿京队伍中

的叛徒张安国暗中杀害了耿京，带领队伍投降了金军。辛弃疾听了，大骂张安国是个大叛徒。骂完了，就跃上战马，跟王世隆一起，带领了50个士兵，去济州(今山东巨野)捉拿叛徒张安国。这时候，张安国已经当了济州知州了。

辛弃疾到济州城时，张安国正在和金军主帅喝酒。他知道辛弃疾才智在常人之上，所以就想劝降辛弃疾来归顺他，可是没料到辛弃疾见到张安国，二话不说，一手举剑，一手抓住张安国，就提到了马上，而随行王世隆则迅速地拿出绳子把张安国捆绑在马上，他们一行人就飞奔而去了。而此时张安国的部将还愣在那里呢!辛弃疾把张安国带回南宋，朝廷下令把张安国杀了，还给辛弃疾升官。后来，辛弃疾就一直在南方的湖北、湖南和江西等地做官，进行抗金。可是，南宋的抗金斗争立场很不稳定。一会主战，一会又主降，后来辛弃疾因为主张抗金被罢免了官职，他心中非常担心南宋的江山，就常常用诗词来抒发心中的感情。他的词作风格也随着他的抗金情绪而时起时落，有时表现出雄心壮志没法实现的沉重和忧郁的心情，有时却又充满了爱国的热情和抗金必胜的信心。人们看了他写的词，有时会和他一起感到悲哀，有时又会受到很大的鼓舞。辛弃疾是南宋有名的爱国词人，人们常把他和北宋的大词人苏轼合称“苏辛”。

满腔爱国热情的诗人辛弃疾晚年写了非常有名的一首词，抒发他哀叹南宋的北伐都没有成功的失落心情。这首词叫《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首词就是说：千古的江山还在，可是像孙权一样的英雄却没有了。他所有的辉煌业绩也被历史的风雨洗刷去了。遥想当年，刘裕时的北伐是多么壮观宏大。宋文帝刘义隆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北伐，落得大败而还。金军攻打了扬州43年了。可现在，南宋统治者却生活在醉生梦

死之中。是谁问的，廉颇老了，还能带兵打仗吗?这首词是说南宋朝廷非常腐败，辛弃疾感到南宋再也没有希望了，纵有满腔的爱国热情，希望为国效力，可是却没有人能了解他。后来，辛弃疾得重病去世了，弥留之际，他还用尽所有的力气连喊“杀贼!杀贼!”。

弱女申屠希光为夫报仇申屠希光死后，一些好心的人就把她和丈夫董昌葬在了一起。

一段美满的婚姻南宋时候，福建一带虽然还算宁静，但由于金人的不断南侵，整个国家却战事不断，民不聊生。

当时的福建威武军长乐县有一个叫申屠希光的女子，她的父亲申屠虔，以诗礼传家，渔耕为业，不慕荣华富贵，但求苟全性命于乱世。申屠希光有一个哥哥申屠希侃，一家人父慈子孝，兄友妹恭，其乐融融。申屠希光是远近知名的孝女，也是远近知名的美女，更是远近知名的才女。

与此同时，威武军侯官县有一个穷书生董昌，他家里十分贫寒，母亲早亡，14岁的时候，父亲又一病去世。他的后母一向尖酸刻薄，为人凶悍。为了躲避如狼似虎的后母，图一个耳根清净，董昌于是外出游学，一味埋头读书。董昌游学来到了长乐县，申屠希光听说了他的名声，又看了哥哥特意为她找来的董昌的诗词，不禁暗自倾心。于是她的父亲申屠虔就亲自找到董昌，说明来意，董昌也早就听闻了申屠希光的才女之名，立刻欣然应允，就这样成就了一段美满姻缘。

结婚之后，夫妻俩恩爱非凡。董昌决定带着申屠希光回到家乡。于是，申屠希光随丈夫董昌回到了侯官县。在侯官重新举行婚礼的时候，其他的事情都非常顺利，亲友邻居们都很喜欢这个美丽多才而且知书识礼的新娘子，只有董昌的后母十分不满，百般刁难，不肯出来受礼。本来，董昌夫妻应该再去请的，但是董昌为人一向十分不羁，竟没有去理会，徐氏心中更加痛恨，从此，天天寻事聒躁，捉鸡骂狗，一股怒气发在新娘子申屠希光的身上，申屠希光不在意她乱哄，只是和颜悦色，好言劝解，不与她一般见识。

心怀不轨的恶人董昌娶了个如花似玉又贤淑刻苦的妻子，许多人都

羡慕不已。但是也有一些心怀不轨的人，听到申屠希光的才情与美色，不禁垂涎三尺。当地有一个很有权势的好色之徒名叫方六一，本来就是一个纨绔子弟，自从见到申屠希光后，就天天在董昌家的房前屋后乱转，有意无意地想和申屠希光接近，希望能够一亲芳泽。申屠希光发现这个人总是不怀好意，就有意地远远避开他。为此，方六一非常愤恨嫉妒，他曾经愤愤地对别人说："董昌何物小子，怎么能消受这样的绝代佳人!"

方六一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得到申屠希光这个少见的美女。于是，他就在与董昌有仇的长舌妇姚二妈的帮助下，逐步展开一场有计划的阴谋。

他先送了一份重礼给董昌，董昌见送礼的人自己不认识，以为是认错了人，准备把礼物退回去。方六一却说了许多恭维话，一阵推让，硬逼着董昌收下了礼品。没有办法，董昌到第二天也只好备了几样礼物去答拜，送的也不过是些书、文、扇之类，根本不能与方六一送的重礼相提并论，方六一也都收下。就这样一来二去，方六一终于如愿的与董昌套上了交情。董昌为人诚恳率直，见方六一这样小心克己，便认定他是个好人，日亲日近，竟视为莫逆之交。

方六一见董昌上了自己的圈套，不禁心中暗喜，准备下一步行动。方六一买通一批强盗，叫他们诬告董昌策划谋反，又在自己所在县的衙门买通一批衙役，要他们不断地向县老爷吹风，说董昌谋反，让县老爷先入为主。再假捏地方邻里人的口气，做一个证据说董昌常和一些异言异服的外地人来往，行踪诡秘，举动叵测，终于一举告倒董昌，把他抓进了县衙大牢。方六一又通过衙役放出风声，说是衙里还要捕捉董昌的余党，吓得董昌亲族中个个潜踪匿影，就连仆人也走得一个不剩。他则仍然每日出入董家，做出一副为董昌的案子不停奔走的样子。方六一怕事情久了会露出破绽，又花了一大笔钱，买通各路关节，将董昌火速送到泉州害死了。可怜董昌临死之前，还把家里的事托方六一好好照顾。

董昌死后，方六一又假惺惺地装出一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样子，极力为董昌鸣冤。董家的亲族故旧，对于方六一的鼎立相助都感恩不已，申屠希光在这个悲痛万分的时刻，也被方六一蒙蔽住了，还十分感激他

的帮助。

知道真相，为夫报仇幸亏申屠希光的哥哥在家乡听说了一些关于方六一用计害死董昌的流言，赶来把这个消息告诉妹妹。申屠希光本来早就知道方六一的为人，这时经过哥哥一提醒，顿时如梦初醒。

方六一还不知道自己的阴谋已经败露了，派人来向申屠希光求婚。申屠希光为了给丈夫报仇，忍辱负重，答应了他的要求。在新婚之夜，申屠希光见到了几个曾经在自己丈夫的案子中作假证的人来喝喜酒，更加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愈发坚定了她报仇的决心。

当天夜里，正当方六一性急难耐地想占有这个让自己日思夜想的美人时，申屠希光手中暗藏的一柄利刃一下子刺穿了这个阴险狠毒之徒的心脏。接着，为丈夫报仇的怒火在申屠希光的心中燃烧，她觉得单杀一个方六一还不解恨，又连着把方六一的两个保镖兼帮凶一一诱杀，然后又杀死参与害死丈夫的姚二妈，再杀死方六一的儿子。她本想杀尽方家所有的人，但一连杀了五个人后，气力用尽，便把方六一的头割下来，装在事先准备好的皮袋中，提着它，来到董昌的坟前，把方六一的头摆上去，拜了几拜，放声大哭，最后哭累了就睡在丈夫的坟墓上。

第二天一大早，县衙接到方家的报案循着血迹寻到坟上，她站起来，把身上抖了一抖，没有惊慌和恐惧，跟着捕役们安安静静地走了。申屠希光死后，一些好心的人就把她和丈夫董昌葬在了一起。

李皇后独霸后宫飞扬跋扈、工于心计，都在这个女人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多年前的预言成为现实宋光宗赵惇的皇后李氏，是一个飞扬跋扈、工于心计的女人。

她出生于安阳，是庆远节度使李道之女，小名凤娘。

李道驻节湖北时，听说道士皇甫坦擅长相面之术，便请到家中，让几个女儿出面拜见。及至凤娘行礼时，皇甫坦显出惊恐之状，不敢受拜，告诉李道说：“此女相貌不凡，将贵为天下之母。”李道只当他是信

口开河，不以为意。皇甫坦云游京师，在高宗面前极力吹嘘凤娘，说她端庄贤淑，可以母仪天下。高宗深信不疑，即聘凤娘为恭王赵惇之妃。

说来凑巧，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81岁的退位皇帝高宗赵构撒手尘寰。孝宗虽非亲子，但叔侄一向情笃，因而十分悲恸，不免心灰意懒，无意朝政，也想效法高宗，禅位给太子惇。只是大臣苦谏，他又孝服在身，不好马上行禅让之礼，只得作罢。好不容易挨过了两年，63岁的孝宗皇帝自觉心神交瘁，体力不支，而守丧也已满期，便不顾丞相周必大、留正等的劝阻，在紫宸殿举行了受禅大礼，由光宗赵惇承继大统。老皇帝被尊为寿圣皇帝，退居重华宫，孝宗皇后谢氏为寿成皇后，高宗皇后吴氏为寿圣皇太后，并大赦天下，册立凤娘为皇后。那凤娘见皇甫坦的话已经应验，自己真的成了皇后，不由高兴得心花怒放。

分庭抗礼凤娘虽然艳若桃李，但却生性悍妒。为太子妃时，就曾多次在太后、皇后宫中拨弄是非，诉说太子亲信的过错。高宗知道后很不高兴，对吴太后说：“太子之妃本是将种，不堪母仪天下，我被皇甫坦的花言巧语所误了。”孝宗也屡屡训教她：“应当像皇太后那样雍容大度，宽以待人，不然便废掉你。”凤娘听了，不仅毫无悔改之意，反疑心太后饶舌，因而怀恨在心。现在自己既为六宫之主，儿子赵扩也已晋封嘉王，位尊势重，便时时寻找机会，挟嫌报复。

光宗即位以后，看到宦官为非作歹，干预朝政，便想寻机诛杀，以肃朝纲。但他生性优柔寡断，迟迟未能下手。宦官得到消息，大为疑惧，合谋离间三宫(即高宗皇后吴太后、孝宗、光宗)，并退请李后庇护，李后欣然答应。以后每逢光宗对宦官有所举动，李后便从中作梗，光宗郁郁寡欢，渐成心疾。寿皇(即孝宗)听说儿子有病，焦虑不已。一面让御医细心调治，一面遣骑四出，求购良药，打算等光宗来重华宫朝见时授给他。宦官知道了这事，就在李后面前挑拨说：“奴婢们听说太上皇购得药剂，专等皇上过宫朝拜时让他服用，万一出了意外，岂不危及大宋江山!”李后派人察，果然属实，便极力阻止光宗到重华宫去省亲。光宗原本没有重病，调治了几日，也就痊愈了。李后特地摆酒设宴，酒过三巡，李后突然说道：“扩儿已经成人，陛下既封他为嘉王，何不索性册立为太子?扩儿颇有才干，定能助陛下一臂之力。”光宗答道：“皇后所见极是，我也有此意，待禀过父皇，再行册立吧。”李后听说要寿皇批

准，心里好生不快，忿然厉色地说：“陛下贵为天子，难道作不得主?何况册立太子，乃祖宗常例，何须禀告寿皇?”光宗道：“太子重为国本，非比寻常之事。有道是父在子不能专，岂能不禀告寿皇，擅作主张?”李后无话可说，便悻悻而去。光宗自与李后成婚以来，事事让李后三分。久而久之，不管李后出了什么主意，就赶忙言听计从，从来不敢违拗。只是立储关系重大，光宗不敢自专，才没有答应。隔了一日，寿皇听后并没有通知光宗，竟一个人跑到重华宫来。寿皇问她：“皇上不是痊愈了吗?怎么没有同来?”李后叹口气说：“真是天有不测风云，本来已经好了，今天又偶染风寒，故尔臣妾一人前来见驾。”寿皇说：“正在壮年，便如此虚弱，将来又该如何呢?”李后趁机说：“臣妾也为此忧心忡忡，皇上既然多病，不如册立嘉王扩为太子，也好作为皇上的辅弼，不知父皇意下如何?”寿皇沉吟了片刻道：“皇上受禅刚刚一年，就要册立太子，未免过于匆忙，何况嗣君事关社稷，还须从长计议，岂可草草从事?”

李后受了申斥，勃然变色说：“臣妾系六礼所聘，扩儿是妾亲生，册为太子，名正言顺，有何不可?”原来孝宗既非高宗亲子，谢氏也是由贵妃晋升为皇后，李后如此唐突，无异于指着和尚骂秃驴。于是寿皇大怒，拂衣而起。李后也怒气冲冲地登辇回宫去了。

恶人先告状。李后回到宫中，立即携嘉王赵扩向光宗哭诉说：“寿皇将要废逐臣妾，另立中宫，陛下可知道吗?”光宗如堕五里雾中，茫然看着李后说：“你这话是从何说起呢?”李后便添枝加叶地把朝见寿皇的情况叙述了一遍，说完竟抽抽噎噎地大哭起来。光宗不辨真假，竟然相信不疑，并安慰她说：“朕自即位以来，海内承平，没有失德之举。我既身为天子，难道保护不了自己的妻儿?”从此之后，光宗再也不去重华宫省亲了。

斩断宫女的手腕，独揽大权一天，光宗在宫内洗手，一位宫女捧着脸盆在旁边侍候，只见她皮肤细腻，指若春葱，不由得称赞了一声，当下李后也没有说什么。隔了几天，光宗正在便殿批阅奏疏，李后派人送来一个食盒。光宗以为是美馔佳肴，打开看时，却是这位宫女血肉模糊的两只断手。光宗内心惊悸不已，忧惧成疾，多日不能痊愈。转眼到了冬至，照例须由皇帝亲祀宗庙。光宗不得已，带病出宿斋宫。李后竟乘着这个空隙，将光宗所宠爱的黄贵妃杀死。那黄贵妃本是谢皇后宫中的

侍女，温柔贤淑，光宗为太子时，孝宗见他没有别的侍姬，便将她赐给光宗。光宗对她非常宠爱，在即位之后，即封为贵妃。李后早想除掉情敌，但苦于无机可乘。这次趁光宗离开宫中，便将黄贵妃杀死，然后以暴死上奏光宗。祭礼这天，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如注，蜡烛全被吹灭。光宗无法行礼，只得作罢。光宗本在病中，回宫后又听到黄贵妃暴亡的事，又遭了风雨袭击，病情愈加沉重，他终日辗转床褥，不能料理朝政。李后趁机把大权揽在手中，骄横恣肆、擅作威福，朝野上下，人人怨忿。但李后我行我素，毫不收敛。

寿皇闻知光宗染疾，亲自过宫探视。适值光宗睡眠未醒，寿皇告诫左右不要惊动他。直至光宗醒来，小黄门方才奏知。光宗矍然而起，下榻叩头请罪。寿皇安慰数句，忽然想起李后不在宫中，询问之下，才知她越俎代庖，忙着替光宗处理奏章。按照宋朝惯例，后妃不得干预朝政，李后竟然违反祖宗规矩，公然批阅奏疏。寿皇大为恼火，便把她叫来，狠狠地训斥了一顿。李后虽然不敢强辩，但对寿皇已是恨得咬牙切齿了。

毫无原则地惧内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三月，光宗病体稍好，开始听政。宰相率百官恳请他到重华宫朝拜寿皇。光宗推说久病初愈，不能前去。于是文武百官纷纷上疏，流着泪苦谏。光宗无可奈何，才在绍熙四年间前往朝见寿皇一次。此后便一连半年没有再去过重华宫。直到十一月，丞相留正率百官至重华宫朝贺，兵部尚书罗点等上疏请光宗见寿皇，光宗竟拂袖退朝。大臣彭龟年慷慨激昂地说："寿皇当年侍奉高宗，极尽人子之道，陛下亲眼目睹。何况寿皇只有陛下一人，听说陛下有病，亲自探视，圣上爱子拳拳之心，尽人皆知。如今陛下误听小人离间之言，长久不去省亲，有亏于孝道，怎能慰天下之望?"宗室赵汝愚也反复进谏。光宗又同李后商议，方点头答应。原来李后想归谒家庙，怕群臣谏阻，才做个顺水人情，答应过宫定省。寿皇却以为李后幡然悔悟，非常高兴，父子相聚，无话不谈。直到天色将晚，光宗夫妇才返回宫中。接着，李后便归谒家庙。在这以前，李后就把家庙修建得富丽巍峨，几乎与太庙相差无几，而护卫之士，竟然多于太庙。李后父、祖、曾祖三代都已封王，这次归谒家庙，又有亲属26人、故旧172人各授官职，甚至李家的门阁，尽管是鸡鸣狗盗之徒，也都封了官。这种反常现象，在宋朝历史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来。

光阴荏苒，岁月如流，不觉到了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重阳节。百官上寿已毕，请光宗朝见重华宫。光宗未得李后同意，不敢答应。大臣谢深甫上谏说：“父子至亲，天理昭然，太上皇爱陛下，就像陛下之爱嘉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太上皇春秋已高，倘不去朝见，千秋万岁之后，陛下何以见天下之人?”光宗听后怦然心动，当即传旨往朝重华宫。群臣得旨，非常高兴，鹄立静候。不料光宗刚刚走出御屏风，李后突然出现，拉住光宗的衣袖说：“天气寒冷，皇上久病，快回去饮酒御寒吧。”光宗只得转身退回，百官、侍卫见此情景，一个个相顾失色，大臣陈傅良急中生智说：“百官都已齐集，陛下千万不可还宫，暮秋天气，并不严寒，请圣驾还是前往吧。”李后听得真切，一把拽住光宗，转入屏风后去了。陈傅良穷追不舍，也跟到了屏风里边。李后大声呵斥道：“这里是什么去处?酸秀才难道不怕杀头吗?”陈傅良无可奈何，嚎啕大哭着走了出来。从此以后，京城之中，街头巷尾，从百官到庶民百姓，没有不对李后议论纷纷的。

寿皇在宫中望盼欲穿，却不见光宗前来探视。于是他郁郁寡欢，几乎寝食俱废。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68岁的寿皇悒郁成疾，到了四月，疾势越来越重。群臣请光宗过宫问候，光宗却与李后前往玉津园游玩去了。以后不管众大臣怎样上疏力谏，光宗始终不肯前往重华宫探望重病的父亲寿皇。万不得已，只好派遣太子嘉王前去探病。尽管如此寿皇也感动不已。

六月九日，寿皇病逝。群臣奏知光宗，光宗不肯过宫。

到了十三日，寿皇大殓之日，光宗车驾仍未到来，群情汹汹不安，丞相留正等只好奏请吴太后主丧。吴太后是孝宗之母，见光宗不肯出面，只得代行祭奠之礼。朝野上下，见此情景，以为政事要有大变故，乱作一团。有的藏匿金帛，有的不告而辞，有的携眷归乡。

后赵汝愚等大臣同吴太后商议以皇帝有病之由推立太子继位，是为宁宗皇帝。

李凤娘自成为太上皇后，无法干预朝政，只好退居宫掖，颐养天年去了。

赵汝愚扶助宁宗即位宁宗皇帝前去拜见光宗时，光宗才明白自己原来是做了有名无实的太上皇。

母后主持儿子的丧事南宋时期，以宁宗取代光宗，是宰相赵汝愚一手策划的。他看到光宗昏庸不理事，从南宋朝廷的立场出发，置个人荣辱于度外，以和平政变的方式完成了一次艰难的权利过渡。

宋光宗即位时，已经四十多岁了，他的健康状况十分不好，经常称病不上朝，也不亲理朝政，国家的朝政被荒置起来。可是他也不立自己已经成年的儿子赵扩为太子，众臣对此十分忧虑。光宗皇帝做事十分不明事理、不懂人情，再加上李皇后搬弄是非、挑拨离间，他与太上皇孝宗的关系越来越疏远，甚至连起码例行的叩见礼仪都置之不理。所以以留正为首的群臣耳官多次劝谏和敦请光宗，还有大臣愤愤不平地说光宗不顾天理人情，可是光宗还是不予理睬。直到有一天孝宗病重，希望在临死前见见光宗。可是，光宗却推脱说身体不适，直到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六月孝宗去世，光宗也没有去探望父亲。面对这样一位昏庸的君王，众臣苦苦地规劝，期盼着光宗以朝廷大局和国家大事为重。

可是，光宗还是让大家失望了。孝宗去世是在半夜时分，本来得知消息后，宫人马上要报告光宗，当时任知枢密院事的赵汝愚担心光宗知道后，再使出以前所使用的伎俩，于是立刻拦住进宫报告的人。到次日早晨，光宗刚刚坐稳，赵汝愚立即把孝宗驾崩的讣告上奏光宗，请光宗尽快换上孝服为孝宗治丧。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光宗不能再借口推辞，只好答应回宫准备。可是留正、赵汝愚等却一直等不到光宗出来。留正、赵汝愚看当时的情势紧急，只好议请高宗的吴皇后也就是吴太皇太后暂主丧事。母后主持儿子的丧事，这真是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第二十四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留正等大臣看到光宗“病重”得连父皇的葬礼都不能主持，就提议由太子管理国事，可是没有想到光宗竟然下诏给留正说希望退位，留正虽然很有才干，但是十分胆小，看到“念欲退闲”的御旨，怕陷入是非之中，借故年老体衰，辞相不干，离开京城。留正出走的消息很快在朝廷内外传开了。人们不知朝廷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时间胡乱猜测、谣言四起。驻守在外的宋军将领怀疑秘不发丧，定有内乱，纷纷做好了应急准备，局势的发展已经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险境地。危急之中，枢密使赵汝愚责无旁贷地担起了维持朝廷安危的重担。他审时度势，认为不如顺水推舟请光宗禅位嘉王赵扩，由新皇帝出面来平息事态。

于是，赵汝愚先从安抚军队入手，他委托工部尚书赵彦逾前去说服御林军统帅郭杲。虽然赵汝愚知道郭杲与自己一样关心朝政，一向忠心为国，但是在这生死攸关的大事上，不知郭杲是否理解自己要光宗退位的想法。赵彦逾虽然说与郭杲也是至交，但是也没有多大的把握。赵彦逾临走时，与赵汝愚约定，如果说服不成郭杲，就取而代之。终于赵彦逾带回了令人满意的答复，惊喜中的赵汝愚这才发现自己的双手竟冷汗涔涔。赵汝愚部署郭杲立即调集将士保护皇宫和京师。接着，赵汝愚又听从侍从意见，派知阖事韩胄前去说服吴太皇太后出面作主，让光宗传位给赵扩。韩胄果真不负众望，说服吴太皇太后次日上朝垂帘听政。赵汝愚又经过一番周密安排后，就命人悄悄通知嘉王赵扩：第二天务必参加早朝，太皇太后要与群臣一起商讨军国大事。

第二天一早，在赵汝愚的率领下，文武百官都来到宫内，向坐在帘后的太皇太后跪拜。赵汝愚向太皇太后叩拜后，就将事先准备好的一番话告诉太皇太后：“太上皇帝驾崩之时，光宗皇帝自称有病，不能亲自治丧，我等作为臣子，就曾请皇上立嘉王为皇太子，皇上先是批注‘甚好’，后来又写下了‘念欲退闲’的御笔，虽然皇上有所吩咐，但是册立太子此事关系重大，还请太皇太后做些决定。”吴太皇太后当然也是事先有所准备地回答了：“既然皇上已有吩咐，你们奉命行事就行了。”赵汝愚接着对

吴太皇太后说：“这件事关系着江山社稷，责任重大，不但要公布众人，而且还要记录在史册之内，所以臣等不敢乱来，还请太皇太后亲自下诏施行。”说罢，就从衣袖中拿出事先备好的诏谕呈上太皇太后。吴太皇太后自然早已知晓，就传下了“照此办理”的旨令。赵汝愚思虑周全，他又提出在新皇帝即位后要总揽朝政，如果两宫父子发生矛盾，还望太皇太后日后调停。太皇太后都同意了，就命皇太子赵扩即位。赵扩毫无准备，直到这时才明白所谓的商讨军国大事原来是自己的登基仪式，他一下子乱了方寸，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就是不肯即位。赵汝愚十分生气赵扩的懦弱，就说：“天子当以国家和社稷的安定为孝顺，如今朝廷内忧外患，如果有所闪失，太上皇帝也无法担待啊!”接着，不由分说地就命人将黄袍披在了赵扩的身上，让人把赵扩扶上了皇座。还没有等赵扩坐稳当，赵汝愚已经率领着群臣百官三叩九拜地行起了大礼，赵扩就这样做了继位皇帝。

“是我儿吗?”

后来，宁宗皇帝前去拜见光宗时，光宗才明白自己原来是做了有名无实的太上皇，他望着前来拜见的宁宗皇帝，有些目瞪口呆，半晌才说出一句：“是我儿吗?”然后，只能无可奈何地承认既定事实，结束了他昏庸的统治，让位于宁宗。

宋理宗继位史弥远篡改宁宗遗诏，拥立宋理宗登基。

为己私，选皇子宋理宗的继位与宁宗末年的权臣史弥远有关。史弥远在宁宗嘉定末年独揽相位，有十余年之久。史弥远为相之时，作威作福，十分风光，可是他仍旧担心这样的富贵荣华长久不了，总有一天会随着宁宗的去世，新皇帝的上台而消失，为此他十分看重宁宗选嗣这件事情。宁宗曾经选立荣王为皇太子，当然史弥远并不担心荣王的即位，因为荣王曾与史弥远联手定计除掉了韩胄，二人的交往也由此加深，如果荣王能顺利继承皇位，史弥远自然不用担心他的地位问题。可是在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荣王竟然在宁宗之先病逝了，史弥远这才开始关注宁宗的选嗣问题。因为宁宗只有荣王一个皇子，现在荣王英年早逝，宁宗就必须另外挑选皇子来备立储君。嘉定十四年(公元1221年)宁宗选定沂王的儿子贵和为皇嗣，赐名为赵闳，然后宁宗托付史弥远为沂

王另选嗣子。史弥远因为对赵闳的为人不很了解，不敢把自己将来的官场生涯轻率地押在赵闳身上。他密奏宁宗要小心立嗣，想乘机多选出一两个宗室子弟安置在宫中，作为皇子的候选人。宁宗还以为史弥远考虑周到，处处为皇室打算，却不知道史弥远的用心险恶，是在处处为自己打算。于是，宁宗烟里烟涂地将事情全部委托给他。史弥远就堂而皇之地把大宋朝选立后嗣的重大责任揽在了自己的手里。

史弥远想到宋廷南渡时，曾有不少宗室子弟流落到他的家乡浙西，就拜托为人谨厚的老乡余天赐回乡打听。在临行前的酒席宴上，史弥远特地嘱咐余天赐要仔细留意物色。余天赐回乡那天，在途中避雨亭里，就恰好碰到了两位宗室子弟，很快就带到京城给史弥远看。史弥远十分欢喜，急忙相见，见这二人气质不凡，确有富贵之相，认为是奇货可居。于是，就在宁宗面前多次夸赞这两位宗室子弟是天资过人、品行超群。宁宗立嗣心切，也害怕所托非人，所以就急切地想见到这二人。史弥远这时才将二人带进宫里，宁宗见了十分满意，当日就把那个年长的宗室子弟与莒立为沂王的嗣子，赐名贵诚，授秉义郎。

用美女获得情报史弥远暗地里对贵诚和赵闳进行了多次考察。史弥远发现贵诚为人乖巧，每次上朝，衣冠整齐，面容严肃，不苟言笑，并且他对史弥远也总是毕恭毕敬，谦称小侄。史弥远觉得这个贵诚值得托付和合作，所以在众人面前常常夸奖贵诚，称他有大器之材，为贵诚树立威望。可是相比之下，皇子赵闳却对史弥远十分傲慢，有时甚至不理不睬，他对史弥远专权擅政也有不满的表示。在这两者对比十分明显的情况下，史弥远自然更倾向于贵诚。可是赵闳是皇帝所设的皇子，要推翻重来，也很不容易。

赵闳喜欢弹琴，为了监视赵闳的一举一动，史弥远投其所好，为赵闳献上一位擅长抚琴的美女。赵闳知道史弥远的用意，起先对这位美女时时刻刻加以提防，可是时间长了，赵闳竟然放松警惕，还把那美女引为自己的红颜知己，把自己的心里话全告诉了她。当然这些话全都一字不漏地传到了史弥远的耳朵里。史弥远十分吃惊，他知道赵闳对他不满，可是他不知道赵闳竟然十分怨恨他。

原来，赵闳对于史弥远与杨皇后互相勾结、狼狈为奸、诛杀大臣的

事情早已经心存不满，他厌恶史弥远独权擅政的奸臣伎俩，曾经暗自记下了史弥远的数条罪状，并且还在旁边写批语：“(史)弥远当决配八千里。”他还指着地图对那位美女发誓：“我日后要是做了皇上，一定要把史弥远贬到最南边的琼崖(今海南)去。”这一切都被史弥远知道了，他暗自捏了一把汗，幸亏自己明智，不然真的是死无葬身之地，他立刻决定先发制人，将赵闳除去，以绝后患。史弥远于是开始着手对贵诚进行皇储的训练，他为贵诚偷偷地找了老师教授，他准备在宁宗去世前，把废立之事定下来，所以故意在宁宗面前，抑赵闳，扬贵诚。可是宁宗始终没有反应。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八月，宁宗大病不起，史弥远立即派人转告贵诚拥立他为皇帝的事情，贵诚十分谨慎，一言不发，既不明言拒绝，也不明确接受，只是慢条斯理地说道：“我绍兴还有老母，怎么能做决定?”史弥远认为贵诚的确做事稳重，值得共事，于是就趁宁宗病情加剧时，假传圣旨，立贵诚为皇子，赐名赵昀，封成国公。宁宗去世的消息传出之后，赵闳就穿好孝衣，等待宫中振人前来宣召。可是却始终不见人来，他十分着急，也感觉情况不妙，但是始终没有想到皇位从此与他无缘。后来宁宗的拜祭仪式结束，百官人殿恭听宁宗遗诏时，赵闳还没有被授意登位，他十分疑惑，问：“现在怎么还要让我站在这呢?”侍卫按史弥远的授意告诉他：“宣读遗诏后才可登位。”可是片刻之后，内宫中走出一位身着黄袍的少年，从容登上金銮宝座，群臣伏地叩贺，这位少年就是赵昀，即为理宗皇帝。赵闳这时才明白是史弥远私造了遗嘱，可是又没有掌握这个权臣的任何把柄，赵闳只好自认倒霉。

解除后顾之忧其实在朝廷中，人们也对史弥远的做法十分不满，可又都不敢反对。在宁宗去世当晚，史弥远命杨皇后的侄子杨谷石将废立皇储的事情告诉了杨皇后，杨皇后不愿意改变宁宗的意思，可是又担心心狠手辣的史弥远对自己和家人不利，所以忍气吞声，没有反对。朝中一些人也不满史弥远擅自废立皇储，在理宗即位之初就起兵造反。史弥远乘机穷追不舍地残酷镇压，乘这个机会逼死了赵闳，解除了后顾之忧。

史弥远废立储君的阴谋如愿以偿后，因为拥立有功，所以他深受理宗信任，又继续专权达九年之久，直至病死。

南宋理宗信谗误国理宗误用奸相，听信谗言，把国家推向了灭亡的

道路，故称他为“误国之君”也不为过。

三凶公元1224年8月，史弥远用计废掉原皇太子赵闳，拥理宗赵昀即位后，进而又逼死赵闳，追回王爵。对此，满朝文武都觉得赵闳死得冤枉，史弥远心太狠毒，但由于他权大无边，故皆敢怒而不敢言。名士魏了翁、真得秀等人不管这一套，纷纷上书为皇太子赵闳鸣冤。史弥远听说后大怒，指使心腹诬告魏了翁、真得秀与赵闳有私，逼理宗罢了他们的官。史弥远为了对付和他意见不一致的人，任用狂徒梁成大、李知孝、莫泽为心腹官吏。这三人个个凶狠无比，嗜杀成性，当时人们称他们为“三凶”。凡是意见与丞相不一致的人，这三个便使出种种诬告手段。使其不是被杀死，就是被罢官，从而使史弥远牢牢掌握了朝中生杀大权。

接二连三的奸相公元1223年10月，史弥远病死，理宗任用史弥远的侄子史嵩之为相。这史嵩之专会弄虚作假，迎合理宗，致能独揽朝廷大权。太学生黄恺伯等144人曾上书朝廷，指出其心术不正，阴险叵测，其在朝廷一天，国家受害一天，在朝廷一年，国家受害一年。理宗对此不理。后又有武学生、京学生等二百余人先后上书，理宗也不置可否。倒是史嵩之本人知趣，感到众怒难犯，便主动请求回家为父守丧，理宗才勉强忍痛割爱，表示同意。

继奸相史嵩之后，理宗用的第3个奸相便是丁大全。此人专会钻营取巧，揽权后飞扬跋扈。宰相董槐敢于直言，上书理宗，指出丁大全乃奸佞之徒，不可重用。理宗却说：“大全并无大错，你不必疑心。”丁大全知道后，对董槐恨之入骨，上书诬告弹劾，未经理宗指示，便私自派兵围捕家中，送交刑部，后被罢相，丁大全被任为相。公元1258年2月，蒙军南下侵宋，边防危急，丁大全却哄骗理宗，说“边疆有备，不必惊慌。”宋军屡战失利，边境沦陷，群臣不满，上书揭露丁大全罪恶，理宗却置之不理。直到公元1259年9月，蒙军包围了鄂州，丁大全无法再行遮盖，理宗始得知真相，才将其罢相。

继丁大全之后，要算是贾似道败国了。贾似道的姐姐为贵妃。他少时就不务正业，是靠他的姐姐贾贵妃受宠和丁大全的下台才官运亨通，拜为宰相的。公元1259年11月，忽必烈攻鄂州，他以右丞相之职领军援

鄂。此时，蒙古可汗病死，忽必烈为了争可汗的位置，决定北撤。在北撤前，忽必烈虚晃一枪，扬言要攻临安。贾似道听说后，不辨真伪，竟十分害怕，不经请示，便私自派人去蒙古求和，蒙古正要北撤，见宋未败求和，当然同意，规定蒙古和南宋以长江为界，南宋每年向蒙古贡奉银20万两，绢25万匹。忽必烈退兵后，贾似道隐瞒了私自签订卖国和约的真相，反而对理宗谎报军情："我们这次打了个大胜仗，逼着蒙古退了兵。"理宗信以为真，加封贾似道为太师、卫国公。贾似道又设计罢免了敢于直言的吴潜的左丞相职务，从此便总揽了朝政大权。

宋理宗用了这么一帮人做宰相，致使朝政日益衰败，民众怨声载道，国家的灭亡已不可避免了。

忽必烈攻宋势如破竹忽必烈稳定了内部，打败了阿里不哥以后，在公元1271年称帝，改国号为元。这就是元世祖。

战局比王位重要忽必烈像蒙古、南宋联合灭掉金朝以后，南宋乘机出兵，想收复开封、河南一带土地。窝阔台借口南宋破坏协议，进攻南宋。打这以后，蒙宋双方不断发生战争。到窝阔台的侄儿蒙哥即位后，派他弟弟忽必烈和大将兀良合台进军云南，控制了西南地区。

公元1258年，蒙哥分兵三路，进攻南宋。他自己亲率主力进攻合川(今四川合川)，忽必烈攻打鄂州(今湖北武昌)，另一路由兀良合台率领，从云南向北攻打潭州(今湖南长沙)，准备三路会师后，直取临安。蒙哥的军队进攻合州的时候，合州宋将王坚和全城军民奋起反抗，坚守合州东面的钓鱼城。蒙古军把钓鱼城围了五个月还没有攻下来，蒙哥却在攻城的时候被炮石打中，受了重伤，回到大营不久就死了。

忽必烈正向鄂州进兵，还没过江，得到蒙哥的死讯，有人劝他赶快回到北方去争夺汗位。忽必烈说："我奉命来攻打宋朝，哪能空手回去?"忽必烈观察了沿江的形势，就派几百人的敢死队当先锋，强渡长江。宋兵没有防备，果然溃败。蒙古兵就大举渡江，把鄂州围住。警报一个接一个送到临安，把南宋王朝震动了。

宋理宗命令各路宋军援救鄂州，又任命贾似道担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到汉阳督战。

纨绔子弟做丞相新任丞相贾似道，原是个不学无术的浪荡子，靠他的姐姐是宋理宗的宠妃，才得了官位。他当上官后，什么事都不干，经常带着一批歌女在西湖上喝酒作乐。有一天晚上，宋理宗在宫里登高眺望，看到西湖上灯火通明，就对左右侍臣说：“这一定是似道这小子。”

侍臣知道宋理宗宠着贾似道，就凑趣说：“别看他年纪轻轻，喜欢玩乐，他的才能大着呢。”

这回，宋理宗要他上汉阳前线督战，他只好硬着头皮去了。有一次，他听说前面有一队蒙古兵，吓得直打哆嗦，嘴里连声叫着：“怎么办?怎么办?”后来，蒙古兵抢了一些财物走了，贾似道才拍拍胸口，喘了口气。

弥天大谎忽必烈攻城越来越勐。贾似道眼看形势紧张，就瞒着朝廷，偷偷地派个亲信到蒙古营去求和，表示只要蒙古退兵，宋朝就愿意称臣，进贡银绢。忽必烈急着想回去争夺汗位，就答应了贾似道的请求，订下了秘密协定。贾似道答应把江北土地割给蒙古，并且每年向蒙古进贡银、绢各20万。忽必烈得了贾似道的许愿，就急忙撤兵回北方去了。

贾似道回到临安，把私自订立和约的事瞒得严严实实，却抓了一些蒙古兵俘虏，吹嘘各路宋军取得大胜，不但赶跑了鄂州的蒙古兵，还把长江一带敌人势力全部肃清了。

宋理宗听信了贾似道的弥天大谎，认为贾似道立了大功，专门下一道诏书，赞赏他奋不顾身，指挥有方，立刻给他加官进爵。

忽必烈回到北方，得到大多数蒙古贵族的支持，即了大汗位。他想起了在鄂州跟贾似道订下的和议，就派使者郝经到南宋去，要求履行和约议定的条件。郝经到了真州(今江苏仪征)，先派副使带信给贾似道。贾似道一听郝经要到临安来，怕他的骗局露馅，赶快派人到真州把郝经扣了起来。忽必烈听到这个消息，气得要命。那时侯，蒙古内部发生了内讧，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跟忽必烈争夺权力，发生了战争。忽必烈全力对付阿里不哥，只好暂时把南宋一头搁起来。

贾似道靠欺骗过日子，居然做了十几年的宰相。宋理宗死后，太子赵禥即位，就是宋度宗。宋度宗封贾似道为太师，拜魏国公，地位高得没人能跟他比。贾似道一面故意要求告老回家，一面又派亲信散播谣言，说蒙古军又要打过来了。刚即位的宋度宗就苦苦留他，这样一来，他的地位就越来越高了。度宗专门给他在西湖葛岭造了一座豪华的别墅。贾似道每天在葛岭过着享乐的生活，朝政大事都得由官员到别墅去找他决定。

贾似道封锁消息忽必烈稳定了内部，打败了阿里不哥以后，在公元1271年称帝，改国号为元。这就是元世祖。

元世祖借口南宋不执行和约，派大将刘整、阿术出兵进攻襄阳，宋军连战连败，襄阳城被围了5年。贾似道把前线的消息封锁起来，不让宋度宗知道。有个官员上奏章向宋度宗告急，奏章落在贾似道手里，那个官员马上被革职了。

有一天，贾似道上朝的时候，宋度宗问他："听说襄阳城已经被蒙古兵围了几年，怎么办?"贾似道故意装出惊讶的样子说："蒙古兵早就给我们打退。陛下从哪儿听来这种消息?"

宋度宗说："刚才听到一个宫女说起。"

散朝以后，贾似道查明了那个透露消息的宫女，找个借口把她杀死。打那以后，宋度宗再也听不到蒙军进攻的消息了。

襄阳在蒙古兵围攻下，越来越危急。贾似道却每天躲在他的葛岭别墅里。有一次，有个亲信官员去找他，他正趴在地上跟他的几个侍女斗蟋蟀。那个官员拍拍贾似道的肩膀说："这难道也是国家大事吗?"贾似道玩得正起劲，也没当一回事。

襄阳终于被元兵攻破了。南宋王朝大为震动。这个时候，贾似道要再瞒也瞒不住，就把责任推给襄阳守将，把守将革职了事。

南宋无力回天元世祖看到南宋这样腐败，决定一鼓作气消灭南宋。他派左丞相伯颜率领元兵20万，分两路进军，一路从西面攻鄂州，另一

路从东面攻扬州。

这时候，宋度宗病死了，贾似道拥立了一个4岁的幼儿赵昰做皇帝。伯颜攻下鄂州，沿江东下，直取临安。贾似道一面带领7万宋军驻守芜湖，一面派使臣到元营求和。伯颜拒绝议和，命令元军在长江两岸发起进攻，宋军全线崩溃，贾似道逃回扬州。到了这个时候，南宋灭亡的局势已经无法挽回了。

知有似道不知有度宗贾似道不把度宗放在眼里，度宗也以贾似道为虎狼，事事不敢自作主张。

新帝登基宋度宗原名赵孟启，太祖十一世孙，理宗胞弟的儿子。出生于公元1240年，卒于公元1274年。理宗虽然嫔妃众多，然由于淫乐无度，却只有一个儿子，还未成人便死去了。为此，于公元1253年1月，宋理宗只好立他的亲侄子孟启为皇子，赐名为赵禥，封忠王。公元1260年6月，立为太子，成了理宗的合法继承人。公元1264年10月，理宗去世，赵禥即位，是为宋度宗。

不理朝政，只重酒色宋度宗赵禥即位之前，便天生愚钝，奢淫无度。即位后，他想好好地玩玩，然朝廷军政要务，都要他去处理，如何吃得消?结果上了三五次朝，感到头昏脑胀，便不想干了。他见丞相贾似道立他有功，又好专权，便索性把一切军政要务都交贾似道去处理，而自己则一头扎进了酒色二字之中。

贾似道比皇上还大贾似道专权后，对大臣规定，凡有军政要务，不经过他同意，谁也不许报告皇帝；皇帝有什么诏旨，不经他看过，任何人也不许下达。即使如此，贾似道仍嫌不足，常以辞职归乡相胁。度宗全靠贾似道掌政，贾似道一走，谁还理朝?每当上旨，度宗便苦苦相留，将其官职一升再升。每当贾似道入朝，度宗便起座答拜，称之为师，不呼其名。时间一久，贾似道便不把度宗放在眼里，度宗也以贾似道为虎狼，事事不敢自作主张。

公元1272年7月的一天，度宗去景灵宫祭祀。事毕，正遇大雨，度宗无法回宫，当时胡贵嫔的父亲显祖随驾，建议乘逍遥辇，度宗低头不语。显祖已看透了度宗的意思，便哄他道：“此事已禀报过贾太师。”度

宗闻言，方转忧为喜，遂起驾回宫。

然第二天，这事便传到了贾似道的耳中，他大发雷霆，当即罢了显祖的官，把胡贵嫔赶出宫门，而度宗则连气也不敢哼。此后，贾似道几日不上朝，间或入谒度宗，度宗必起身避席及其退朝时，又目送出殿后，方敢就座。故当时在朝廷百官的心目中逐渐形成了只知有贾太师，而不知有度宗的局面。

公元1273年1月至2月，当樊城、襄阳连续为蒙军攻陷的时候，贾似道还在扣压前线危情，不断向度宗报捷呢。公元1274年7月，宋度宗死，时年仅35岁，在位10年。

群臣死守崖山南宋末年那些有骨气的大臣们仍然不愿投降，他们率领着部下做着顽强的抗争。

誓死不降，为国捐躯南宋末年，凶悍的元军铁蹄南下，一路上横冲直撞，很快兵临临安城下，谢太皇太后、全太后与年仅三岁的恭帝孤儿寡母无力抗元，所以拱手投降。全太后与宋恭帝被押解到元大都，软禁了起来；谢太皇太后虽已年迈，体弱多病，但是仍被元军拉来拉去，到各处劝降那些为数不多的还未投降的南宋臣子。在国主投降的情况下，南宋末年那些有骨气的大臣们仍然不愿投降，他们率领着部下做着顽强的抗争。

元军攻打扬州城，攻了很久都没有攻下来，那时镇守扬州的大将是李庭芝、姜才，元军就拿来谢太皇太后的诏书，命令他们向元朝投降。李庭芝回答说：“我只知道奉诏守城，从来没听说过要奉诏投降。”后来，全太后北上经过扬州时，元军又让全太后命令李庭芝和姜才投降。全太后无奈，只得下诏说：“现在我皇帝都已经投降了元军，你还为谁守城呢?”使者要李庭芝和姜才接全太后的谕旨，他们也不答话，命令士兵放箭，当场射死了招降而来的使者，其他人都狼狈逃走了。随后，他们又带4万人出城袭击元军，想夺回全太后和皇帝恭宗。但是敌强我弱，经过激烈的战斗，没有获得成功，只好回到扬州城里。元军主帅阿术亲自派姜才原来的好友前去劝姜才投降，姜才对这个好友说道：“你怎么做我不管你，可是我宁可死掉，也不做投降的将军。”后来，元世祖忽必烈

又派人招降李庭芝，李庭芝大怒，他不仅把使者杀死，而且烧掉了元世祖的招降诏书。元军看到李庭芝和姜才都不肯投降，还对元军如此无礼，就派大军将扬州团团围住，连着几十天攻城。由于扬州被围了很长时间，城里的粮食都吃光了，李庭芝和姜才就跟士兵一起煮牛皮等东西充饥，有的士兵杀死自己的儿子充饥。但是，扬州军民仍然不肯投降，继续抵抗元军的进攻。直到后来，陆秀夫和张世杰拥立端宗在福州即位后，端宗急令李庭芝和姜才带兵前去保卫福州，李庭芝和姜才这才离开扬州，前往福州，却不料走到泰州的时候，被元军包围了，双方经过激烈战斗，李庭芝、姜才被元军俘虏，最后为国捐躯。

宁愿自杀不愿降当时，南宋有一个名叫夏贵的将领投降了元朝。他家从前有个名叫洪福的家童，后来经夏贵提携做了官，守卫镇巢县(今安徽省巢县)。在夏贵投降后，洪福仍然在继续抗元。夏贵就派人去劝洪福投降，洪福拒绝投降，还把来劝的人也杀了。后来元兵攻破镇巢县城，洪福被元军俘虏后，夏贵来看他，他却痛骂夏贵不忠，最后要求面南而死，表明自己没有背叛宋朝。还有将领李芾，在湖南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率领军民坚持抗战三个多月。可是潭州城还是被攻破了。那天，他叫来部下沉忠，对他说：“我已经尽到了最大的努力，今天决心一死，但是我的家人决不能当俘虏。我实在不忍杀他们，你帮忙先杀尽我的家人，再杀死我。”沈忠说什么也不愿意，可是李芾坚决要他照办，沈忠只好哭着答应。于是李芾让家人全部喝醉，让沈忠一一把他们杀死，然后，放火烧掉李芾的住所。沈忠看着熊熊的烈火，悲痛自绝，就回家杀了妻子，然后又自杀而死。潭州城的许多百姓听说后，也都让全家自杀而死，坚决不投降元朝。

南宋王朝的彻底灭亡元朝军队势如破竹般向福州方向逼近，没有多长时间，元军就开始进攻福州。陆秀夫、张世杰见福州守卫不住，就护卫着端宗和他的弟弟，乘上海船沿着海岸往南逃到了广东。宋端宗身体很虚弱，受不了这种艰苦的生活，不久就病死在广东碉州(今广东省雷州湾中的一个小岛)。当时，福建和广东的军民都在坚决抵抗元军的进攻，而那些作了叛徒的人则受到人们的唾弃。当元军打到兴化(今福建省莆田县)时，元朝人劝守卫兴化的宋将陈文龙投降，可是陈文龙却两次杀死元军派来招降的人。部下有人贪生怕死，劝他投降，他说：“人生本来都有一死的，与其屈辱地死，还不如英勇抗敌而死。”人们都很敬佩他。可

是，后来叛徒出卖了陈文龙，他被俘仍然没有投降，后来就在福州绝食死去了。他的母亲当时也被押到福州，她为儿子为国牺牲而自豪，在临死前说："我和我的儿子一块儿死去，又有什么怨恨呢!"

端宗病死后，陆秀夫和张世杰又拥立端宗的弟弟做皇帝，即卫王，他们继续进行抗元斗争。卫王任命陆秀夫为左丞相，专门掌管文事；张世杰为枢密副使，专门掌管军事。可是，元军又跟着打到了广东。当时，张世杰和陆秀夫认为硇州是个小岛，就护卫着卫王来到新会的崖山，他们要在那里创建根据地收复失地，恢复宋朝。他们首先进行了一系列准备长期战斗的工作：征集粮食，修筑工事，建造兵船，还招兵买马，训练军队。可是，元将张弘范很快就率军攻打到了崖山附近。张弘范到达崖山之后，立刻就派兵封锁海口，切断了宋军砍柴、打水的道路，由于崖山是一个小岛，岛上的一切都得靠大陆和海南岛运送，现在元兵切断了大陆的供应线，宋军没有淡水喝，只能吃干粮，实在没有办法，就只有舀海水解渴。海水又咸又苦，根本不能喝，喝了就得病，为此，许多人都病倒了。张世杰又带兵去攻打新会，想夺回海口，但大战几天都没有取胜。

公元1279年2月，张弘范率元军攻打崖山，张世杰的军队由于士兵大都生病了，所以很快就战败了。元军登上了崖山，张世杰只有和陆秀夫等保护着卫王和他的母亲杨太妃，乘上早已准备好的船撤退。元军紧迫不舍，把宋军的船队冲散了。陆秀夫看到元军近在眼前，不愿意被元军活捉，就含泪背起小皇帝，跳进了茫茫的大海。而张世杰和杨太妃坐的船，也由于遇上了飓风翻了船，张世杰和杨太妃都被淹死了。南宋王朝彻底灭亡了。

宋恭帝被杀宋恭帝是位有智慧的人，可是幼年继位，又生不逢时，想必心中自是有许多苦处。

亡国的小皇帝南宋成淳十年(公元1274年)，宋度宗病逝，太子继位，即是宋恭帝，历史上人们又称他为少帝、幼帝、德祐皇帝。宋恭帝即位时，年仅四岁，当时由谢太皇太后垂帘辅政。恭帝年幼即位，从宋度宗手中所承接的江山早已是千疮百孔，命系累卵了。

公元1276年正月，元朝大军南下入侵已经到临安城下。眼看着元兵即日就将攻进城内，南宋朝廷大势已去。

于是，谢太皇太后立刻派大臣杨应奎，前往元军驻扎地献上了传国玉玺，并且以恭帝的名义向元军统帅伯颜献上降表，降表言辞十分卑下可怜：宋朝奸臣误国，天数已尽，元朝国运兴旺，我愿率百官称臣降服于大元；今谨奉太皇太后之命，削去帝号，将两浙、福建、江东、江西、湖南、两广、四川、两淮等宋朝州郡，全部献给大元圣朝，祈求元朝可怜宋朝三百年江山不至断绝，使赵氏子孙以后有靠，使宋朝百姓能够安享天日。如果这样，那么元朝的大恩大德，将永不忘，日日思报。

虽然这篇降表写得很哀婉，充满了一个行将灭亡的王朝的辛酸，可是元朝还是没有放过这位小皇帝。

囚禁的岁月伯颜很快就攻陷了临安城，接着元世祖急速下诏，命令宋朝皇帝前去大都会见。皇太后带着小恭帝在随行一行人的护从下匆匆奔赴大都，谢太皇太后称病未去。

恭帝当时也只有七岁，什么事情都不懂，全太后只是个妇道人家，只是感激元世祖不杀之恩，根本不知什么民族气节，所以这孤儿寡母到了大都，特别被元朝人看不起。他们将恭帝与全太后软禁在深深的宫苑里，横加凌辱，更不许他们与外界有丝毫的接触。当时随全太后到大都的四位宫女都不堪忍受凶悍的元朝人的虐待，到大都后没有十天就全部自缢身亡了。其中一位宫女还留下绝命诗一首：“既不辱国，幸免辱身。世食宋禄，羞为北臣。妾辈之死，守于一贞。忠臣孝子，期以自新。”元世祖十分看不起全太后的忍辱偷生，所以就砍下了那四个宫女的头颅悬在全太后的门口，以示羞辱，全太后顾念年幼的恭帝，不忍自杀。不过，由于这时南宋遗臣已经立赵是为端宗，老奸巨猾的元世祖就将恭帝封为开府仪同三司、检点大司行政、瀛国公，做样子给天下人看，其实就是为了利用恭帝潜在的号召力，对端宗形成制约，顺便招降那些尚未归附的宋将。

全太后提出水土不服，向元世祖请求迁往南方，元世祖的皇后对全太后的遭遇特别同情，就帮全太后求情，但是元世祖担心节外生枝，没

有同意，不过他并没有打算杀害全太后和宋恭帝，传说元世祖已经准备让恭帝与全太后在大都的深院中慢慢了却此生。可是到了公元1282年底，却突然命恭帝迁出大都，并将他安置在上都(今内蒙正蓝旗东边闪电河北岸)。还让全太后到大度正智寺庙削发为尼，不久全太后就悄无声息地死在了那里。原来福建有位僧人向元世祖解说了近日天相方面的事，说他夜观星相，发现土星有侵犯帝祚之势，所以按常例来推算，恐怕不几日将会有人要加害元世祖，希望元世祖多加提防。元世祖本来不相信这位僧人所说的话，可是在这位僧人离开没有多久，就有离大都不远的中山县(今河北省定县)官员禀报说：县内有一个狂人，自称是宋王，扬言要聚集人马，前往京师劫掠宋丞相文天祥，起兵复宋。

元世祖一听，这还了得，也不由得相信那位僧人说的。马上就把恭帝迁到了上都，然后杀害了已关押了四年的南宋宰相文天祥。次年又把降元的宋朝官员全部迁往内地，免除了后顾之忧。

一心向佛，仍然被杀至元二十五年，恭帝已经19岁了，元朝的统治也逐渐巩固了下来。这年冬天，元世祖赐给恭帝大量钱财并将他送到了吐蕃(今西藏地区)学佛。

恭帝到西藏后，入住萨迦大寺，并改名为合尊法宝，还学会了藏族的语言。恭帝聪颖灵慧，性情好合，他钻研佛经，还当上了萨迦大寺的主持。按理说，恭帝此时既已入佛，早已心无杂念，潜心修炼了。可是到元英宗至治三年时，恭帝却突然被赐死在河西(今甘肃省河西走廊)，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他无意间所写的一首诗闯了大祸：

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

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

诗中所说的黄金台指的是战国时燕昭王在大都朝阳门附近筑的土台，燕昭王放黄金在台上，招揽天下贤士尽归己用。林和靖则是北宋著名的钱塘高士，一生孤傲，以梅为友。就是这首诗，恭帝便被元英宗以煽动天下人心的罪名处死了。

元英宗杀恭帝也是历朝历代的惯例。恭帝死了，天下宋人的心也就

死了；恭帝不死，宋朝遗民总会在心中隐隐作想：宋朝江山仍旧还在，因为虽然端宗、卫王死去了，可是恭帝还活着，恭帝还会回来，他只是在某个地方出家而已。

宋恭帝是位有智慧的人，可是幼年继位，又生不逢时，想必心中自是有许多苦处，可是他潜心研究佛经，成了一代佛学翻译大师，曾经翻译了佛教中著名的《因明人正理论》作品，也算没有枉过一生。

第二十五章

陈桥兵变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世宗柴荣（又称郭荣）亲统大军北伐契丹，欲收复燕云十六州，不料身染重病，回师京城后不久病逝，其子柴宗训继立为帝，是为恭帝，年仅7岁。世宗统一北方大业未尽，“主少国疑”①，文武群臣忧虑重重，朝廷内外惶恐不安。职掌禁军大权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因此而成为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赵匡胤像赵匡胤（公元927—976），涿郡（治今河北涿州）人。其父赵弘殷，行伍出身，历任五代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禁军高级将领，家住洛阳（今属河南），赵匡胤即出生于洛阳夹马营。因受家庭和当时社会尚武风气的影响，他自小喜欢武艺。青年时，他曾赋《咏日》诗，以言己志：“欲出未出光辣挞，千山万山如火发。须臾走向天上来，赶却残星赶却月。”表达了自己远大的抱负与豪情壮志。后汉时，赵匡胤应募从军，投奔在枢密使郭威帐下。干祐占四年（951），郭威于澶州（治今河南濮阳）发动兵变，随即统领所部闯入开封（今属河南），后汉隐帝为乱兵所杀，郭威遂取代后汉，创建后周。此次政变，赵匡胤积极参与并拥戴郭威为帝（是为周太祖），功绩卓著。事成之后即被授予东西班行首，典掌禁军。郭威养子柴荣（原为周太祖皇后柴氏之侄）任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府尹后，又改授赵匡胤为开封府马直军使。郭威病故，柴荣继位，不久擢升赵匡胤为归德军节度使，成为禁军高级将领。显德六年，柴荣病危之际，为防范皇族内部争权夺利而导致政变的发生，下诏，将郭威的女婿，殿前都点检张永德免除军职，而以赵匡胤接替，使之掌握禁军大权，以辅佐柴宗训。

显德七年正月元旦，赵匡胤以镇州（治今河北正定）、定州（今属河北）二州名义，谎称契丹与北汉相勾结，大举南下，入侵后周边境，因而请求朝廷急速派兵阻击、增援。宰相范质、王溥等人不辨真伪虚实，立即令赵匡胤率大军北上。待赵匡胤领兵出城之际，开封城内却到处传说“策点检为天子”②之谣。一时间，“士民恐怖，争为逃匿之计”③。然后周朝廷对此却一无所知。初三清晨，赵匡胤率军离开京城，日暮，驻军于距开封城东北40里处的陈桥驿（位今河南封丘东南陈布里奇

城）。他将军中诸事悉交由其弟赵光义和亲信、谋士赵普代为处置，自己则入帐内饮酒，全然不问军中之事，直至醉卧榻上。

不多时，军营之中有都押衙李处耘、殿前都虞候李汉，超、内殿都虞候马仁瑀、散员指挥使王彦升等禁军主要将领鼓噪而起，与赵光义、赵普等人商议，要拥立赵匡胤为帝。赵普对众人说：“兴王易姓，虽云天命，实系人心。前军昨已过河，节度使各据方面，京城若乱，不惟外寇愈深，四方必转生变。若能严敕军士，勿令剽劫，都城人心不摇，则四方自然宁谧，诸将亦可长保富贵矣。”④众人莫不赞同。第二天清晨，赵匡胤尚未起身，诸将领即蜂拥至其寝帐之外，赵光义入帐中请出其兄。赵匡胤出帐，众人纷纷拔刀抽剑，排列于庭院之中，齐声说道：“诸军无主，愿策太尉（时赵匡胤尚有检校太尉之衔）为天子。”⑤不等赵匡胤答话，众人便拿出事先已准备好的用于皇帝登基时穿着的黄袍，披戴在他的身上。赵匡胤无可奈何，便对诸将领说道：“汝等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矣。”众人异口同声道：“唯命是听。”⑥赵匡胤又说：“太后（指符后）、主上（指周恭帝），吾皆北面事之，汝辈不得惊犯；大臣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廷府库、士庶之家。不得侵掠。用令有重赏，违即戮汝。”⑦众将领纷纷拜伏于地，表示遵从圣命。

赵匡胤立即派人赴开封，先与守卫京城的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联络。之后，他便自陈桥驿回师开封。进入城中，将士们遵从赵匡胤之令，秋毫无犯。守城的后周军将，不敢轻举妄动，唯有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闻讯，骑马径自皇宫内廷疾驰而出，欲集结部众负隅顽抗。当其行至街上，被王彦升察觉；遂紧随某后，直追至其家中，将其家人全部杀死。赵匡胤入城，登上明德门，命令兵士各返回所属军营驻地，自己也回到原来的官署。

不多时，诸将领簇拥着范质等后周朝廷要员来到赵匡胤官署。赵匡胤一见他们，顿时痛哭流涕，呜咽道：“违负天地，今至于此!”范质等人还未及对答，军校罗彦环却手按利剑，厉声说道：“我辈无主，今日须得天子!”⑧范质等人面面相觑，无计可施，只好屈身退至阶下，列队朝拜。随即，赵匡胤于官署堂上召集文武百官，依据每人功劳高下确定入朝列班次序。翰林承旨陶其不穀自袖中取出事先写好的禅位制书，当众

宣读，称柴宗训退位，由赵匡胤即皇帝位。随后，宣徽使引导赵匡胤下堂，来到庭院中，面向北方行拜礼。又引他出官署入宫中，进崇元殿，更换朝服，头戴衮冕，正式登基称帝，是为宋太祖。另又将柴宗训及符后等人迁至西宫，去其帝号改称郑王，而尊符后为周太后。后周历史至此结束。

次年正月，赵匡胤下令大赦天下，改元建隆，仍定都于开封。因他曾于宋州（治今河南商丘）出任过归德军节度使，故以“宋”为国号，史称北宋，其后，赵匡胤对有功官吏将士，分别封官授爵，给予赏赐。以石守信为归德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以王审琦为泰宁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其余禁军诸将领亦分授官职，并兼领节度使。朝廷各重要官署机构均重新任命长官，从而创建起宋朝的统治秩序。与此同时，他又遣使向各地郡县、藩镇通报称帝换朝之事，希望他们改弦易辙，归顺宋朝。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很快激起原后周一些藩镇首领的反抗，其中主要有占据上党（今属山西）的李筠，盘据淮南的李重进。

后周昭义军节度使李筠经营上党长达8年之久。他在自己的统辖区域内，擅自征收赋税，召集亡命之徒。颇具一定实力，以至于后周朝廷亦曾感到李筠“倔强难制”⑨。得知赵匡胤称帝代周，他遂积极准备举兵反宋。宋建隆元年（公元960）四月，李筠勾结北汉，发动叛乱。消息传入宫中，赵匡胤果断决定速战速决，以“服天下之心”⑩，巩固刚刚创建的宋朝统治。为此，他一方面令石守信领兵前去上党征讨叛军，一方面又令昭化军节度使慕容延钊、彰德军节度使王全斌率军出东路，以策应石守信。李筠自以为宋军将士多与自己是旧友故交，必会念旧情而临阵倒戈，因此掉以轻心，未作认真设防。宋军与叛军一交锋，即发起勐攻，全然无旧友故交之情。首战于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大败叛军。随后，宋军几路并进，步步紧逼。赵匡胤亲临前线指挥各路人马围歼叛军。石守信会同江宁军节度使高怀德于泽州（治今山西晋城境内），再大破李筠军主力，擒获叛军大将范守图，杀戮北汉降兵数千。李筠率残部逃入泽州城中。宋军团团围困城池，连续攻城数十日，终于破城。李筠知大势已去，投火自尽。其子李守节献上党降宋，李筠的反宋叛乱被平定，北方的局势得到控制。

后周淮南节度使李重进为周太祖郭威的外甥，权势显赫。周世宗柴荣在位时，曾一度与赵匡胤分掌朝廷内外兵权。后领命出镇淮南，坐镇扬州（今属江苏）。陈桥兵变后，赵匡胤即令韩令坤接任其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侯之职，并令其移镇青州（治今山东益都）。李重进十分清楚赵匡胤此举旨在削夺自己的权势，故而拒不从命，反而派遣亲信翟守殉北上，准备与李筠结盟，南北夹击刚刚创建的宋朝。然而翟守殉非但未与李筠联合，反入开封向赵匡胤陈述此事。返回扬州后，他又劝说李重进“养威持重，未可轻发”，致使李重进未敢贸然起兵反宋。李筠兵败身亡后，李重进自感大祸临头，决意孤注一掷。九月，他于扬州发动叛乱，并派人入南唐求援。不料，南唐主李璟恐引火烧身，不肯派兵相助，李重进陷入“内乏资储，外无救援”的窘困境地之中。赵匡胤先遣石守信统军南下征讨。十月，又率兵亲征。宋军浩浩荡荡沿汴河南下，直抵淮河北岸。李重进不甘心束手待毙，严令兵士作殊死抵抗，妄图阻止宋军渡河南下。石守信指挥宋军强渡淮河，发起勐攻，叛军溃败而逃。宋军迅速包围扬州。十一月，扬州城破，李重进举家自焚而亡。宋军入城，尽杀叛军，淮南地区随之得以平定。

在李筠、李重进被平定前后，原后周地方藩镇政权，虽亦不满赵匡胤以兵变取代后周，可又惧怕宋朝的兵威，自感无力与之抗衡，只得听命归顺。赵匡胤对此采取恩威并用的策略，一方面仍名义上保留其藩镇，允许留驻原地，但同时又派监军入其藩镇，行使职权。原后周成德军节度使郭崇时常为后周的覆灭而悲哀流涕，但当监军陈思海到任，他也只好强忍悲痛，表示拥戴宋廷。原后周保义军节度使袁彦得知赵匡胤代周后，日夜整修军械，操练兵士，欲对抗宋廷。然而宋廷派潘美前去监军，并令他入朝时，袁彦也不得不俯首贴耳，单骑赴京城。周太祖郭威妃杨氏之弟、原后周建雄军节度使杨庭璋曾与李筠关系密切，时有往来，当赵匡胤调其改任定难军节度使，令他人居开封时，亦丝毫不敢拒命。至此，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创建的宋朝政权，得到了极大的巩固，中原地区的局势得以安定。

注释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简称《长编》）卷一。

②③④⑥《长编》卷一。

⑤⑦⑧《宋史》卷一《太祖纪》。

⑨《宋史》卷二五九《张美传》。

⑩王僻《东都事略》卷二六《赵普传》。

《东都事略》卷二二《李重进传》。

《东都事略》卷二六《赵普传》。

赵匡胤对皇权的垄断自唐末以后，各地藩镇割据林立，天下分崩离析，战火蔓延，连绵不断。及赵匡胤称帝建宋，欲结束分裂动荡的局面，一则要削平割据，实现一统天下的宏图；二则要铲除割据的根源，防止和避免重蹈分裂的覆辙。为此，他苦思冥想，夜不能寐。宋建隆二年（961），赵匡胤镇压了原后周昭义军节度使李筠、淮南节度使李重进的叛乱之后，更感到消除分裂的隐患已迫在眉睫。

杯酒释兵权一日，赵匡胤召见亲信、谋臣赵普入朝，向他询问道：“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其道如何?”赵普回答道；“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唯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赵普的话还未讲完，赵匡胤就迫不及待地说：“卿勿复言，吾已喻矣。”①欲彻底改变“君弱臣强”的弊政，其首当其冲的便是收缴臣僚及地方兵权，集中控制于中央朝廷。对此，通过“陈桥兵变”称帝建国的宋太祖赵匡胤十分清楚兵权的重要和“节镇太重”的隐患及其严重后果。为此，他即位后，即废去“殿前都点检”一职，由自己直接掌握和控制禁军。然而禁军高级将领多是昔日与赵匡胤出生入死的“义社”兄弟，是为自己“黄袍加身”的有功之臣，如何体面地收缴他们手中的兵权，而不致发生流血之争，更使赵匡胤绞尽脑汁，煞费苦心，甚至一度陷入优柔寡断之中，不忍心冷遇旧友故交。

一次，赵匡胤欲令久负盛名的大将符彦卿典掌禁军。赵普闻讯，数次上奏劝谏，激烈反对委任符彦卿职掌禁军重权，以为“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复委以重柄”。赵匡胤拒不采纳。不料宣敕下达，却被赵普扣留。他

将敕书藏入怀中，入朝请求面见赵匡胤。赵匡胤得知赵普求见，即迎上前，问道："岂非以符彦卿事耶?"赵普担心先提及此事恐宋帝难以接受，便答道："非也。"待到其他事情陈奏完毕，他才从怀中取出敕书。赵匡胤一见，十分惊奇。赵普忙解释说："臣托以处分之语未备，复留之。唯陛下深思利害，勿为后患。"赵匡胤道："卿苦疑彦卿何也?朕等彦卿至厚，彦卿岂能负朕也?"赵普反问道："陛下何经负周世宗?"②赵匡胤无言以对，遂撤回对符彦卿授官的敕书。由此，赵匡胤终于下定决心，收缴兵权。

一日晚上，朝会散后，赵匡胤传令召集几位与自己关系甚为亲近密切的禁军高级将领入宫，且专为他们设摆酒筵。其中包括归德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石守信，义成军节度使、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泰宁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等人。君臣欢坐一堂，开怀畅饮。至酒兴正浓之时，赵匡胤摒退随从和卫士，对石守信他们叹息道："吾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曹之德，无有穷尽。然为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又未尝敢安枕而卧也。"石守信等将领忙询问何故?赵匡胤继续说道："是不难知矣。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众人一听此言，顿时惊慌失色，匆忙跪拜叩头道："陛下何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赵匡胤答道："不然!汝曹虽无异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众人惊恐万状，不知所措，一时痛哭流涕，叩头不止，连声说道："臣等愚不及此，唯担心陛下哀怜，指示以可生之途。"

赵匡胤于是一面宽慰众人，一面劝导说："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众人听到此处，再次拜谢说："陛下念臣及此，所谓生死而骨肉也。"③酒筵到此，众人哪有心思饮酒，纷纷告辞而去。

第二天，参加酒宴的石守信、高怀德等人均声称自己患病，未来上朝，并请求罢免自己所担任的军中要职。赵匡胤随即另授予虚衔：石守信改授为天平军节度使，高怀德改授为归德军节度使，王审琦改授为忠

正军节度使，原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武信军节度使张令铎改授为镇守军节度使。从此，这些禁军主帅“皆罢军职”④，就连禁军“殿前副都点检”一职，亦无职掌，实为武官高级虚衔，秩从二品，但厚其待遇。“皆以散官（为有官称而无固定职守之官）就第，所以慰抚赐之者甚厚。与结婚姻，更度易制，使主亲军”⑤。

宋开宝二年（969），赵匡胤再次设摆酒筵，盛情款待前来入朝的藩镇节度使王彦超、武行德、郭从义、白重赞、杨廷璋等军将统领。席间，赵匡胤语调和缓地对众人说：“卿等皆国家旧臣，久临剧镇，王事鞅掌（指事务繁忙），非朕所以优贤之意。”王彦超立刻听出赵匡胤的弦外之音，即上前奏道：“臣无勋劳，久冒荣宠，今已衰朽，愿乞骸骨归丘园，臣之愿也。”唯有武行德等人却执迷不悟，竭力陈述自己“夙昔战功及履历艰苦”。赵匡胤淡淡地说道：“此异代事，何足论!”⑥第二天，赵匡胤便下令，罢免王彦超、武行德等一批藩镇节度使，削夺其权，亦另授高级虚衔。至此，赵匡胤又一次以赎买的方式，收缴了地方藩镇的兵权，有效地防止和避免地方割据局面的再度形成，使藩镇听命于朝廷。

赵匡胤两次“杯酒释兵权”，极其平静地达到“收其精兵”的目的。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调整军队统帅机构，于禁军设置殿前司和侍卫司，分置长官为殿前都指挥使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合称为“三帅”，均受赵匡胤节制。又另设枢密院，“凡天下兵籍武官选授及军师卒戍之政令，悉归枢密院”⑦。旨在分离三帅统兵之权与枢密院调兵之权，使三帅有统兵而无调兵之权，枢密院虽调兵却不得统兵，以相互牵制。此外，赵匡胤亦大力整顿军队，裁汰老弱病残，补充精壮。甚至亲自制定“兵样”，作为选兵的标准，派遣使臣赴各地依照“兵样”精选兵卒。此举又将原地方藩镇军中骁勇善战者大部选入京城，入补禁军。赵匡胤经常亲临校场训练禁军兵士，严肃军纪。他曾说：“朕今抚养士卒，固不吝惜爵赏。若犯吾法，惟有剑耳。”⑧由此极大地加强了禁军的实力。他积极奉行“守内虚外”⑨的基本国策，而将22万禁军，分一半驻扎于京师及京畿地区，另一半则分戍地方要冲之地，并称之为“内外相制”⑩。赵匡胤的此番举措，有其重要的原因，“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此事，皆可预防。唯担心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⑩。基于此因，他一则选授资历较浅，易于驾驭者充任禁军将领，且频繁调任。二则实行更戍法，即间隔数年便更换

禁军屯驻地点，使将帅经常调换，将兵间无法相结为死党，有效地防止兵变的发生。

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极大地集中了全国的兵权，又加强禁军，形成威慑地方的格局，从根本上消除了分裂割据的隐患，巩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然而，将兵分离又导致作战不相协调，战斗力削弱的后果，致使与辽、西夏交战屡遭失利。

注释①②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一。

③④《长编》卷二。

⑤《涑水纪闻》卷一。

⑥《宋史》卷二五五《王彦超传》。

⑦《宋会要辑稿·职官》。

⑧《长编》卷一二。

⑨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卷一○《屯田》。

⑩朱卉《曲洧旧闻》卷九。

《长编》卷三二。

削平南方割据北宋创建后，即面临统一分裂割据局面的首要问题。时北方有兵势正盛的辽朝和依附辽朝的北汉改权，南方则有各据一方的吴越、南唐、荆南、南汉、后蜀等小朝廷。宋太祖赵匡胤欲一统天下，却对如何削平割据而大伤脑筋，举棋不定。

起初，赵匡胤有意先出兵翦灭北汉，平定北方后再举兵南下，逐一除灭大江南北诸政权，为此他曾询问宰相魏仁浦：“朕欲征太原（今属山西），如何?”魏仁浦认为此举会“欲速不达”①。他又征询武胜军节度使张永德“下并（治今山西太原）、汾（治今山西汾阳）之策”。张永德亦认为“彼兵虽少而悍，加之北虏（指契丹）之援，未可遽也。姑以间谍离

虏心，设游兵以扰其穑事，待其困弊，乃可图耳”②。诸大臣反对赵匡胤先攻北汉之策，是考虑北汉虽距宋朝很近，威胁很大，然其背后有契丹相助，灭此政权并非易事，况且宋朝初建，国势不强，力不从心。宋太祖见众臣反对，遂与心腹谋士赵普商议。

赵普（922—992），字则平，幽州蓟县（今属天津）人，后迁居洛阳（今属河南）。后周时，他曾于赵匡胤帐下供职，初为军事判官。赵匡胤出任同州节度使，他改任推官。其后赵匡胤移镇宋州（治今河南商丘南），他又任掌书记，一直充任赵匡胤的高级幕僚和重要谋士。他积极参与、策划了陈桥兵变，为赵匡胤黄袍加身，而被授予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宋建隆元年（960），他力劝赵匡胤立即发兵平定李筠之乱，并自请随御驾扈从，因功得迁至兵部侍郎、枢密副使。同年，他再请赵匡胤速出兵平定李重进之乱，从而巩固了宋朝的统治。三年，被擢升为枢密使、检校太保。干德二年（964），又替代范质任宰相，充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其间，他为扭转唐末以来节度藩镇飞扬跋扈，君弱臣强的局面，而建议赵匡胤收缴地方权利，深得赏识。正因如此，赵匡胤也常征询他对朝廷大政方针及治国之术的见解。

赵匡胤常爱微服私访大臣，故赵普每次退朝回到家中，不敢更换衣冠，依然身着朝服，以备皇帝突然来访，不致失礼。一天深夜，漫天大雪纷飞，寒气袭人。赵普以为赵匡胤必不会雪夜私访，不料忽听敲门之声，他连忙开门，却见赵匡胤正立于风雪之中。赵普忙行礼，将皇帝迎入屋中。赵匡胤告之赵普：“我已约晋王光义来你家中。”不多时，赵光义到。赵普侍奉他们坐定，便烧炭煮肉，又让妻子为二人斟酒，赵匡胤亲热地以嫂相称③，君臣饮酒谈笑。

席间，赵普试探地问道：“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

赵匡胤道：“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来见卿。”

赵普又故意问道：“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时也，愿闻成算所向。”

赵匡胤答道：“吾欲收太原。”

赵普沉思了许久，说："非臣所知也。"

赵匡胤忙问其缘由，赵普慷慨陈辞道："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边患我独挡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诸国。彼弹丸黑子之地，将何所逃?"

赵匡胤听罢，笑着对赵普说："吾意正尔，姑试卿尔。"④赵匡胤雪夜访赵普，最终奠定"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战略，决定先用兵江南诸小政权，待统一南方后，再北上灭北汉，夺回辽占据的蓟（治今天津蓟县）、幽（治今北京西南）、云（治今山西大同东）等16州之地。此后，宋廷密切注视江南诸政权的动向，设法寻找出兵的借口，捕捉战机。并积极储备粮草，招募精壮，修缮兵甲，操练兵士，随时准备兵进江南。早在建隆三年九月。占据湖南的武平节度使周行逢病危，临终前，嘱咐其子周保权，一旦发生变故，迫不得已时，可"自归朝廷"⑤，即投降宋朝。周行逢死后，盘据衡州（治今湖南衡阳）的张文表起兵，袭取潭州（治今湖南长沙），又欲攻占击保权所在的朗州（治今湖南常德），企图取而代之，独霸湘湖地区。周保权一面派杨师瑶率兵抵抗，一面派人北上向宋廷求援。

赵匡胤即命山南东道节度使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枢密副使李处耘为都监，调集各路人马，会师于襄阳（今属湖北），以讨伐张文表为名，出兵湖南。

宋军进兵湖南，须途经荆南节度使、南平王高继冲控制下的南平政权。此前宋朝使臣卢怀忠已侦知南平虚实，认为"高继冲甲兵虽整，而控弦（即军队）不过三万；年谷虽登，而民困于暴敛。南通长沙（今属湖南），东距建康（今江苏南京），西迫巴蜀（今四川），北奉朝廷（指宋朝），观其形势，盖日不暇给，取之易耳"⑥。于是，赵匡胤又派使臣入南平，向高继冲提出宋军"假道"的要求。南平政权内部为此而争论不休，高继冲更是犹豫不决，束手无策，结果宋军未及南平同意，已兵临江陵（今属湖北）。高继冲见宋军压境，只得出城迎接。宋军不等他反应过来，其前锋已冲入城中，"分据冲要，布列街巷"⑦，就这样，宋军兵不血刃，轻而易举平定荆南，得3州、17县、143500户。

宋军继续南下，进逼朗州。此时杨师瑶已击败张文表，平息了叛乱，因此周保权拒绝宋军入城。慕容延钊毫不理睬，依旧指挥大军攻入城中，生擒周保权。又镇压各处的反抗，迅速占领湖南，得14州、1临、66县、97388户。

宋占有荆湘，为统一南方开创了有利的局面，也直接威胁到盘据四川的后蜀政权。

后蜀皇帝孟昶对宋军南下，一举灭亡南平、楚政权十分恐惧。干德二年（964），他派使臣北上勾结北汉，请求发兵渡黄河南下，自己则出兵自四川北上，占据潼关（今属陕西）以西地区，“使中原表里受敌”，牵制宋军，解除对后蜀的直接威胁。孟昶此举，恰成为宋廷出兵的借口，赵匡胤笑道：“吾西讨有名矣。”⑧十一月。赵匡胤派6万人马，分两路伐蜀：一路由王全斌、崔彦进、王仁赡等统领，自凤州（治今陕西凤县东北）南下，进攻剑门（今四川剑阁北）；一路由刘光义、曹彬等统领，自归州（治今湖北秭归）逆长江西上，直攻夔州（治今四川奉节东）。孟昶即以其子孟元哲为元帅，与知枢密院王昭远指挥后蜀军队抵抗宋军进攻。不料，剑门一战，蜀军一触即溃，王昭远被俘。王全斌攻破蜀军防线，挥师进逼成都。孟昶见大势已去，被迫献城投降。不久，刘光义亦率兵抵达成都。至此，宋军前后仅用66天，即灭后蜀，而得州45、县158、户534039。

宋军平定巴蜀后，却大肆抢掠，屠杀后蜀降兵，激起四川百姓的反抗。三年，四川地区先后爆发上官进、全师进领导的蜀兵和百姓的反宋斗争。历时3年，方被宋军镇压平息。为安抚四川军民，赵匡胤下诏，将王全斌等将帅降职处罚，并肃正军纪，逐步稳定四川局势。

后蜀灭亡前后，占据岭南的南汉政权，正因刑罚严酷，滥杀无辜，加之赋役繁重，民不聊生，统治岌岌可危。大臣邵廷琄认为宋军大举南下：南平、楚及后蜀诸国相继覆灭，宋朝“必将尽有海内，其势非一天下不能已”⑨，建议后主刘鋹与宋通好。刘鋹非但不采纳，反而以谋反罪将其处死。其后，赵匡胤也设法通过后唐劝说刘碹归顺宋朝，亦遭拒绝。宋开宝三年（970）九月，赵匡胤令潘美统行营前军，尹崇珂为副帅，领大军讨伐南汉。宋军自郴州（治今广东韶关），敲开南汉北边的大

门。四年正月，宋军再克英州（治今广东英德），逼近广州。

面对接踵而至的失利，刘鋹竟孤注一掷，调集全国军队救援广州，又于城外编竹木为栅栏，以阻挡宋军的进攻。潘美施以火攻。他下令徵调数千民夫，每人手持两只火炬，待天黑以后，悄悄接近南汉军营。一声令下，万火齐发，刹那间，火光冲天，火借风势，广州城外一片火海，南汉后主抱头鼠窜。宋军趁势勐攻，杀死南汉兵士数万人，随即，破城而入。刘跟下令焚烧府库，正欲出逃海岛，适逢宋军追赶而至，束手就擒。宋军一鼓作气，继续攻占岭南各州县重镇，很快平定了岭南，得州60、县214、户170263。

南方诸割据政权中当属南唐最为强盛?然而五代末期，后周世宗三次亲征南唐，夺得江北、淮南14州、60县之地，与其划江为界，为此南唐君臣惊恐万状。自赵匡胤称帝后，南唐后主李煜便百般讨好宋朝，企图以此维持自己的割据小政权。出于战略上的需要，宋军在统一南方之初，也未与之宣战，但却与地处南唐东南的吴越政权结成军事同盟，以此钳制南唐，构成对它的包围形势。

灭亡南汉后，宋军进行休整。宋开宝七年（974），赵匡胤命曹彬、潘美为大将，统兵10万，自荆南乘战舰顺长江而下，开始了统一南唐的战争。

李煜自以为与宋结好而苟且偷安，军不设防，当宋军进入南唐辖境，沿江屯驻南唐兵士还以牛酒犒赏宋兵。及至发觉宋军翦灭南唐的意图，为时已晚。南唐池州（治今安徽贵池）守将戈彦弃城而逃，兵卒不知所措。宋军沿江推进，只遇到一些小抵抗，便顺利到达位于金陵（今江苏南京）西南的重要渡口——采石矶（位今安徽马鞍山东北）。为使大军渡江作战，宋军采纳江南人樊若冰（一作水）的建议，将大船串联排列，于江上搭建一座浮桥，使江北的宋军得以跨越天堑，进入江南。还在宋军搭建浮桥时，就有消息传入金陵，可南唐君臣却以为长江自古无桥，宋军此举不过是儿戏罢了，丝毫不予理会。待得知浮桥架成，宋军已顺利渡江时，国都金陵已陷入包围之中。此时，宋廷又约吴越出兵夹击。吴越派兵攻克常州（今属江苏），于润州（治今江苏镇江）与宋军会师，合兵围攻金陵。

南唐后主李煜虽身处重兵围困之中，仍梦想保全自己的地位，便委派大臣徐铉前往开封（今属河南），恳求赵匡胤缓兵。赵匡胤按剑厉声呵斥道："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⑩徐铉吓得魂不附体，仓皇退下。李煜见乞求不成，又欲殊死相拼，下令调集十几万军队急速救援，分别驻扎于金陵城内外。又令江西派兵增援，企图切断采石浮桥，阻截宋军后援，但均未奏效。

八年十一月，金陵被围已达一年，李煜再次派遣徐铉入见宋帝，恳请退兵，又遭赵匡胤断然拒绝。宋军在击败南唐援军及地方武装，并于金陵城下多次大败南唐兵后，终于攻陷城池。还在出兵南唐之前，赵匡胤曾专门召见曹彬、潘美等将帅，告诫道："城陷之日，慎无杀戮。设若困斗，则李煜一门，不可加害。"因而宋军入城，秋毫无犯。后主李煜无计可施，只得投降。曹彬等令其写文书致南唐诸州县长官，命他们投降宋朝。诸州县多遵命而行，唯有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军校胡则杀刺史，据城固守，拒不从命。5个月后，被宋将曹翰攻破城防，死者数万人。宋朝彻底平定了南唐，得州19、军3、县180、户655060。

吴越王钱俶因出兵助宋进攻南唐，也曾得到宋帝的赞赏，得以"守太师，尚书令，益食邑"。及南唐灭亡，钱俶于开宝九年（976）偕子钱惟濬等入朝开封，觐见赵匡胤，并进献银绢、乳香、吴绫等物，其值数以亿万计，旨在恳请宋廷允许保留自己的一席之地。朝中自宰相以下官员均向赵匡胤奏请扣留钱俶父子，乘机出兵夺取吴越之地。赵匡胤未作应允，依旧允许他们返回吴越。待钱俶父子等辞行之时，赵匡胤"取群臣留己章疏数十轴，封识遣俶，戒以途中密观。俶届途启视，皆留已不遣之章也"。钱俶读毕奏章，悲喜交加，既对宋帝感恩不尽，又对宋臣的上疏恐惧无比。此后，他时时处处小心谨慎，倾心竭力亲近宋廷，百般殷勤顺从。

与吴越相毗邻还有一处割据政权，即占据漳州（今属福建）、泉州（今属福建）一带的陈洪进。在江南诸政权中，以陈洪进的势力最为弱小。为保全自己，不为其他政权所兼并，陈洪进积极与宋朝交往、靠近，并请求加封，而被赵匡胤任命为节度使。其后，他一直向宋廷称臣纳贡，保持着和睦友好的关系。正因如此，宋廷像对待吴越一样，未派兵进剿陈洪进。不过，陈洪进还是从宋廷对待吴越王钱俶的态度上，觉

察到其中的用心和意图。因此，当赵匡胤去世，赵光义（是为宋太宗）即位后，陈洪进惶恐不安。宋太平兴国三年（978），陈洪进亲自入开封朝贡，并主动向赵光义献出漳、泉二州及所辖14县、151978户和兵士18727。赵光义授予陈洪进为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

陈洪进的“纳土”，亦使先期到达开封城朝贡的吴越王钱俶坐卧不宁。在这种形势逼迫下，钱俶只好向赵光义请求罢免自己的吴越国王称号，解除天下兵马大元帅等官衔，并乞求允许自己返回吴越。但这一请求又遭到宋帝的拒绝。钱俶的谋臣崔仁冀告诉他：“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纳土，祸且至。”钱俶亦感到，仅去王号，免除官衔，而保留原有地位，绝非宋廷所能应允，况且此刻身处宋都，距吴越千里之遥，自己已被握于宋人手中，插翅难逃。他权衡再三，最终决定效仿陈洪进，向赵光义献出吴越所辖13州、1军、86县、户550686和115036兵士。赵光义欣然接纳了钱俶的献地，亦给予优厚的待遇，封他为淮海国王，其子钱惟濬为淮南军节度使、钱惟治为镇国军节度使。

至“陈洪进纳土”、“吴越归土”，最终结束了自唐末以来，江南诸政权并立的分裂割据局面，北宋亦完成其统一南方的战略，版图迅速扩大，国势日渐强盛。

注释①王僻《东都事略》卷一八《魏仁浦传》。

②《东都事略》卷二一《张永德传》。

③《宋史》卷二五六《赵普传》。

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九。

⑦《长编》卷三。

⑥⑦《长编》卷四。

⑧《长编》卷五。

⑨《新五代史》卷六五《南汉世家》。

⑩《东都事略》卷二三《李煜传》。

《宋史》卷三《太祖纪三》。

《长编》卷一九。

第二十六章

征伐北汉宋朝创建后，其西北边尚有割据今山西中部和北部地区的北汉政权。它以太原为中心，尽管是“地狭产薄”①，国势并不强盛，然而由于依附于契丹族，得到了辽朝的扶植和保护，声势壮大，竟得以于五代后期的动荡局面中维持住自身的统治。宋廷在制定消除分裂割据，实现一统天下的战略时，不得不考虑到“太原（指北汉）当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则我独当之”②，而采取“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战略，姑且先搁置北汉，而集中兵力翦除南方诸割据政权，以统一南方，完成第一步战略后，再北上灭亡北汉。

不过，由于北汉毗邻宋朝，威胁很大，因而赵匡胤曾一度设想先用兵太原。即使是统一的战略制定后，其主观愿望仍想寻找战机，一举消灭之。北汉自创建后，始终是“土瘠民贫，内供军国，外奉契丹，赋繁役重，民不聊生”③，国内统治极不稳定。宋开宝元年（968），北汉主刘承钧病亡，由其养子刘继恩继位为帝，此举立刻招致北汉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赵匡胤认为有机可乘，遂部署出兵征伐，令昭义军节度使李继勋等将领率兵北上。九月，宋军一路征战，屡败北汉军，直逼太原城下。北汉更陷入混乱，权臣郭无为谋杀了刚即位的刘继恩④，拥立其弟刘继元为北汉主。且火速派人向契丹求援，以解救太原之危难。辽穆宗迅速派兵入援，宋军腹背受敌，无功而还。

宋与北汉的初次交锋虽未达预期目的，但赵匡胤仍不肯罢休，依旧寻机出兵灭亡北汉。二年二月，他再次决定发兵，又作了周密的部署：令李继勋为河东行营前军都部署，侍卫步军指挥使党进为前军副都部署，宣徽南院使曹彬为都监，棣州防御使何继筠为石岭关部署，建雄军节度使赵赞为汾州路部署，统兵正面进攻北汉。又令彰德军节度使韩仲赟为北面都部署，彰义军节度使郭延义为副都部署，领兵北上防御辽军南下救援。各路人马由赵匡胤亲自统帅，自潞州（治今山西长治）北上。首战，李继勋于太原城下大败北汉军。赵匡胤随后亲临城下，仔细察看城池地形，认为可以引汾河水灌淹太原城，遂下令沿汾河修筑长堤。又于太原城外四周构筑营寨，部署兵力，以李继勋驻军城南，赵赞

驻军城西，曹彬驻军城北，党进驻军城东。宋军将太原城团团围困后，随即北引汾河水灌城。

太原告急，求助辽帝，辽廷遂再次出兵入北汉救援。何继筠指挥宋军奋力截击，于阳曲（今山西太原北）击败辽军，斩首数千级，暂时阻止住辽军的南下。赵匡胤令兵士将所获辽军首级、铠甲陈列于太原城下，以示北汉君臣尽早投降。然而，辽军此次救援北汉，分兵二路：一路人援太原，一路则入侵宋境，以此分散、牵制宋军，达到救援的目的。韩仲赞虽于定州（今属河北）北与辽军交战获胜，但形势依然十分危急。赵匡胤令兵士连续勐攻太原，守城北汉兵拼死抵抗，宋军伤亡惨重，“诸军欲登城以死攻，上愍之，不允”⑤。赵匡胤见太原久攻不下，遂下令决堤，水淹太原城。辽军亦加紧攻势，宋朝边境频频告急。尽管太原城下已激战数十日，终未能攻陷，宋军疲惫不堪，且形势日趋严峻，无奈，赵匡胤只得下令撤军。临撤退时，他又下令将北汉境内数万百姓迁往山东，以削弱北汉实力。宋军撤离太原后，又分兵赴镇州（治今河北正定）、潞州镇守，并于河北广筑城池据点，以防御辽军南下。

此次战役的失利，表明宋朝尚不具备彻底消灭北汉的实力，因而，赵匡胤只得暂时放弃这一意图，按照既定的“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战略，调兵遣将，集中兵力先统一南方。‘宋太平兴国三年（978），经过十余年的征战，宋朝消灭了南方诸割据政权，统一南方的大业已告结束。宋太宗赵光义便继续赵匡胤未竟事业，决定再度征伐北汉，实现统一天下的夙愿。四年，他派遣官员分赴国内各地，徵调粮草、军械，陆续运往太原行营，以备战争之用。随后又任命宣徽南院使潘美为北路都招讨制置使，河阳节度使崔彦进、彰德节度使李汉琼、彰信节度使刘遇、桂州观察使曹翰各配以卫府将帅，领兵四面进讨。又以侍卫马军都虞侯米信、侍卫步军都虞侯田重进并为行营指挥使，率领所辖马军、步军为后续；西上阎门使郭守文、顺州团练使梁迴负责监护。鉴于太祖征伐北汉，失利于辽军救援的教训，赵光义特任命云州观察使郭进为太原石岭关都部署，专事阻击燕州（治今北京西南）、蓟州（治今天津蓟县）人援北汉的辽军。经过一番精心周密的谋划和部署，二月，赵光义离开京城，指挥各路人马，浩浩荡荡进兵北汉。

三月，战争全面展开。首战，郭进率先攻克西龙门砦，俘获北汉将

兵甚众。随后又于石岭关南大败辽军援兵。宋左飞龙使史业亦大败北汉鹰扬军。党项族拓蹬部首领，夏州节度使李继筠也率部东进，助宋进攻北汉，并分兵阻击辽军。北汉军队不敌宋军的勐烈进攻，连失重镇，节节败退。于宋军捷报频传之际，为防止辽军趁宋朝后方空虚入侵骚扰，以尽快消灭北汉，赵光义又以孟玄韶、则廷翰为兵马都钤辖，崔翰为总领马步军，一同驻守镇州，以增强御辽兵力。

四月，赵光义亲临前线，指挥宋军全线出击，对北汉发起强大攻势，先攻占岢岚军（今山西岢岚），俘获军使折令图；又克隆州，俘虏北汉招讨使李询等将；再克岚州（治今山西岚县北），斩杀北汉宪州刺史郭翊，擒获夔州节度使马延忠。很快，宋军便推进到太原城下。赵光义下诏，令北汉主刘继元献城投降，刘继元借城防拒守，不肯束手就擒。赵光义随即下令，命诸将领指挥兵士发射机石攻城，并于太原城外遍筑营寨，相连为城，将太原城团团围困，层层封锁。

五月，宋军首先进攻太原城西南，经过浴血奋战，攻陷羊马城，生擒北汉宣徽使范超。进而，又于城西北发起勐攻。在宋军的勐烈攻势下，北汉政权孤立无援，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太原城危在旦夕。北汉指挥使郭万超见大势已去，遂出城投降。宋帝诏令太原城守军投降，然而诏书传入城中，却未见有何动静。宋军便再度攻城，将士人人奋勇当先，攀援城墙，拼死杀敌，北汉兵士已难以抵挡，攻克太原城指日可待。刘继元深感覆灭将临，已无计可施，连夜派遣使臣出城，面见赵光义，表示愿意归顺宋朝。第二天，刘继元率北汉文武大臣，出城投降。至此北汉灭亡。

北宋削平北汉，又得10州、1军、40县、户35220，亦基本实现削平割据，一统天下的战略，更由此结束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社会局面和历史。此后，赵光义又命祠部郎中刘宝勋知太原府，调整更定原北汉所辖州县。并对投降的原北汉将校官吏给予优厚的赏赐和待遇，原北汉主刘继元授封为右卫上将军、彭城郡公。为庆贺平定北汉大捷，赵光义特作《平晋诗》，令随从大臣和韵。遂又将自己于太原的行营更名为“平晋寺”，令匠人将己所作《平晋诗》刻石立于寺中，以示自己克复天下的志向和豪情，故而史称之“帝沉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⑥。

注释①《长编》卷四。

②《宋史》卷二五六《赵普传》。

③《资治通鉴》卷二九○。

④《宋史·太祖纪》则称，“北汉供奉官侯霸荣弑其主继恩”。

⑤《宋史》卷二《太祖纪》。

⑥《宋史》卷五《太宗纪》。

高梁河之役由契丹人创建的辽朝（亦称契丹国），因援助后唐节度使石敬塘称帝创建后晋，遂得以割占“幽云十六州（又称燕云十六州）”之地，为其染指中原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赵、魏之北，燕、蓟之南，千里之间，地如平坻，步骑之便，较然可知”①，从而对中原构成极大威胁。

后周世宗柴荣（即郭荣）励精图治，亲统大军攻辽，一举收复“幽云十六州”中的瀛州（治今河北河间）、莫州（治今河北任丘）、易州（治今河北易县）3州和瓦桥关（位今河北雄县西南）、益津关（位今河北霸县境）、淤口关（位今霸县东）等“三关”之地，威震契丹国。然而正当其实现统一北方的宏图战略时，不幸染病去世，十六州失地未能尽收。

北宋创建之初，辽朝正值国势强盛之时，且又与北汉结好，雄踞于北方。宋太祖赵匡胤与臣僚商讨削平南北方割据政权，统一天下的战略时，亦想统一幽云，然而又对辽朝存有重重忧虑，深感自身实力难与之相对抗，曾设想用赎买的办法，即用金帛与辽交换这一地区。为此，赵匡胤于宫内专门设置了一个封桩库，贮藏金帛财物。他曾对身边的大臣讲：“石晋（指后晋皇帝石敬塘）苟利于己，割幽蓟以赂契丹，使一方之人独限外境，朕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十万，即遣使与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庶，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直。如日不可，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②此后，宋军出兵南方，翦灭割据政权时，赵匡胤十分留心聚敛财富，以充储封桩库，一则以此赎回幽云之地，二则用

作武力收复时的军饷。然而此事后来未有结果，但赵匡胤却始终惦念着夺回北方这片土地。宋开宝九年（976），灭亡南唐，统一南方已成定局。捷报传入京城开封，群臣激昂，以为可喜可贺，奉表请加赵匡胤尊号为“一统太平”。赵匡胤婉言谢绝，认为：“燕晋未复，遽可谓一统太平乎?”③不过，他终未及实现“一统天下”的夙愿，便在一天深夜，与其弟赵光义密谈时，于“烛影斧声”中突然逝去。

赵光义（后更名为炅，是为宋太宗）继位后，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出兵灭北汉。宋军曾一举击败由辽南院宰相耶律沙率领的援军。夺取太原（今属山西）之后，赵光义以为一统天下已万事俱备，错误地低估了辽军的实力，以一役的胜利而过于相信自己的军事力量，便决定趁灭北汉之大捷，一举收复幽云之地。他不顾群臣的劝谏和反对，在未及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坚持出兵进攻燕京（今北京西南）。六月，赵光义开始部署北伐幽蓟，他先设置北面行营，作为攻辽的据点，“遣发京东、河北诸州军储赴北面行营”④。并决定自己亲统各路人马，任命将帅分兵指挥。宋军自太原出发，一路无阻，顺利抵达北边重镇镇州（治今河北正定）。因不熟北上路线，乃从当地百姓中募得百名向导。宋军的大举北伐，是辽未预料的，因而北上几乎未遇辽兵阻击。宋军进兵东易州（治今河北易县），辽刺史刘宇献城投降。赵光义留下千余名兵士守卫城池，又继续指挥宋军东进。后抵涿州（今属河北）城下，辽涿州判官刘厚德亦开城请降。宋军直至幽州（治今北京西南）城郊，方与辽军正式遭遇。宋军驻扎于城南，辽军则屯兵于城北，两军对峙，剑拔弩张。赵光义见辽军孤立无援，遂亲自率兵出击，经过一番激战，辽军不敌，大败而逃。

幽州城郊失利，燕京辽军随即积极备战，并向辽廷求援。宋辽争夺燕京的大战在即，赵光义亲临阵前部署，令定国节度使宋偓、河阳节度使崔彦进、彰信节度使刘遇、定武节度使孟玄哲分兵从四面进攻燕京城，又以潘美知幽州，职掌府事。部署完毕，赵光义又将自己的行营移到城北，便于直接指挥各路兵马攻城。

在宋军强大的攻势下，燕京周围的诸多辽军据点及重镇纷纷倒戈，辽地方官吏相继率部投降。幽蓟之地本是汉人聚居地区，百姓亦不满契丹人的统治和欺凌，宋军的到来，使当地的汉人百姓欣喜若狂，纷纷“以

牛酒犒师”⑤，支持宋军攻城。宋军将士受此激励，斗志愈发高昂，拼死杀敌，欲攻陷城池。七月，统领顺州（治今北京顺义）的辽建雄军节度使、知顺州刘廷素叛辽降宋。随后，辽知蓟州刘守恩亦开城降宋。至此，燕京城处于宋军重重包围之中，成为一座孤城。城内辽军官兵人人自危，惶恐不安，已无心固守城池，而城中汉人百姓更是“民怀二心”⑥，急切盼望宋军入城。在此有利形势下，赵光义更感胜利在望，他不顾一切，亲自乘坐于战车之上，每天都要到近城之处督军，指挥攻城。

宋军的大举北伐及燕京地区的危急局势，使辽廷大为震，辽景宗耶律贤立刻派大将耶律休哥火速赶往燕京救援。耶律休哥领命，率军直奔燕京，给宋军以措手不及。燕京城下，赵光义正全力指挥宋军攻城不止，不想辽军援兵突然来临，只好于阵前调兵遣将，仓促应敌。两军遂于城外高梁河（位今北京东南）展开激战。初战，宋军阵容齐整，将士顽强杀敌，令辽军兵将望而生畏，勉强抵挡住进攻。再战，耶律休哥于阵前观察到宋帝亦在宋军阵中指挥作战，随即命令辽军主力径直冲入宋军，直扑赵光义的卫队。这一突如其来的冲杀，立刻打乱了宋军的阵脚，赵光义也一时忙于应敌，顿时乱作一团。辽军趁势勐攻，宋军无力抵抗，顷刻溃不成军。辽兵于宋军阵中横冲直撞，刀噼斧砍，万余宋军兵将被杀，伤者无计其数。赵光义在众将士的护卫下，左突右冲，经过一番殊死拼杀，才得以突围脱险，撤退到涿州，“窃乘驴车逃去”⑦。宋军犹惊弓之鸟，沿途丢盔弃甲，损失军械物资“不可胜计”⑧。

宋军全线败退，辽军则乘胜追击，形势急转直下，不仅已占据的蓟、顺等重镇相继失守陷落，宋朝北边更是形势严峻。赵光义唯恐辽军尾随其后，长驱直入，特令孟玄酷屯兵驻守定州（今属河北）、崔彦进领兵屯守关南（指瓦桥关南）、潘美带兵屯驻河东三交口。对于北伐燕京中失职的将领一律贬职，原西京留守石守信贬为崇信军节度使，刘遇贬为宿州观察使。经此番举措方才得以稳定军心；缓解了紧张的形势。

不久，宋镇州都钤辖刘廷翰于遂城（今河北徐水西）大败南下追击的辽军。忻州（今属山西）、关南的朱军亦先后击退辽军的进进巳，杀死辽兵数万。五年，宋宣徽南院使潘美又于雁门（位今山西代县北）再败辽军。并于阵前斩杀辽驸马、侍中萧吐李，俘获辽都指挥使李重海，

从而遏制了辽军南下的势头，稳定了北部边防。

此后，赵光义又对北疆的防御作了周密的安排，派出众多军队分别屯驻于关南、镇州、定州；徵调自京城开封至雄州（治今河北雄县）一线附近民夫，修筑直达北疆的驿道，以作为传递军情及调兵之用；又令禁军统领、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米信负责定州屯兵之事。这一系列安排旨在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北部边防，其后边境局势确实相对安稳。

赵光义既稳定北疆防御，有效阻止辽军的南侵，但仍不忘前师之耻，依旧寻机北上征伐契丹。十一月，赵光义再度指挥宋军北伐。宋辽首战于关南，宋军大破辽军，赵光义遂任命河阳三城节度使崔彦进为关南都部署，继续领兵征讨。再战，两军交锋于莫州（治今河北任丘），宋军虽竭尽全力拼杀，终未获胜。二次北伐再度失利，使赵光义感到宋、辽两国势均力敌，夺取幽云之地绝非易事，不敢再贸然用兵，而改变策略，一面继续加强北部边防，委以保静军节度使刘遇、威塞军节度使曹翰为幽州东、西路部署，为信为定州都部署等；一面则“诏渤海琰府王助讨契丹”⑨，欲夹击辽朝。宋军自此基本处于守势中，除局部地区与辽发生战事，取得一些战绩外，再未有大规模的战争。

注释①《旧五代史》卷八九《桑维翰传》。

②《长编》卷一九。

③《长编》卷一七。

④⑤《宋史》卷四《太宗纪》。

⑥《辽史》卷八三《耶律学古传》。

⑦⑧《辽史》卷九《景宗纪》。

⑨《宋史》卷四《太宗纪》。

雍熙北伐辽干亨四年（982），辽景宗耶律贤病故，由其子耶律隆绪继位，是为辽圣宗，时年12岁，改元统和。因耶律隆绪年幼，故耶律贤临终前遗诏由皇后、耶律隆绪生母萧燕燕（汉名绰）摄政。其后上尊

号为承天皇太后。

耶律隆绪印萧燕燕本为辽北院枢密使兼北府宰相萧思温之女，耶律贤即位后，册封其为皇后。史称她“习知军政”①。耶律隆绪初立，承天皇太后临朝称制，辽廷内部极不稳定，军政大权多握于宗室贵戚手中。且国主年幼，朝臣多怀观望的态度。南邻的宋朝不断窥视幽云之地，随时可能再度出兵北进，形势十分紧张。承天皇太后毅然启用守卫南京幽都府（今北京西南）有功的南院枢密使韩德让（后受赐姓名耶律德昌）总领宿卫事，后又兼政事令；任命于燕京（今北京西南）、瓦桥关（位今河北雄县西南）二度大败宋军的北院大王耶律休哥为南京留守，兼南面行营总管，总领南面军务，许便宜从事；提升南院大王耶律斜轸为枢密副使，继而进为北院枢密使、都统。几位受宠重臣同心戮力，共同辅佐辽帝、太后，使辽朝政局很快得到控制，并迅速趋于稳定，国内各种矛盾亦得缓和。

然而，辽朝易主的消息传入宋朝，群臣却以为是北伐幽云的极好战机。知雄州贺令图等人上奏称：“契丹主少，母后专政，宠幸用事，请乘其衅，以取幽蓟。”②一心想收复幽云诸州的宋太宗赵炅（即赵光义），遂调兵遣将，决定再次发动对辽的大规模征战。宋雍熙三年（986）正月，部署宋军兵分三路北上。东路，以天平军节度使曹彬为幽州道行营前军马步水陆都部署，是为本路主将，河阳三城节度使崔彦进为副将，又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彰化军节度使米信为西北道都部署，沙州观察使杜彦圭为副，统兵10万，出雄州（治今河北雄县），直进燕京；中路，以侍卫步军都指挥、静难军节度使田重进为定州路都部署，是为本路主将，统兵自定州（今属河北）出飞狐（今河北涞源县北），直取蔚州（治今河北蔚县）；西路，以检校太师、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朔等州都部署，是为本路主将，以云州观察使杨业为副将。统兵出雁门关（今山西代县北），进攻山后诸州。待中、西两路宋军攻克各自的既定目标后，再与东路军会师，合围燕京。临发兵前，赵炅叮嘱曹彬：“潘美之师但先趣云（治今山西大同）、应（治今山西应县），卿以十万众声言取幽州（治今北京西南）。且持重缓行，不得贪利。彼闻大兵至，必悉众救范阳（今北京西南），不暇援山后矣。”③即要他统兵牵制辽军主力，掩护西路军进攻，待中、西路军得手后，集中兵力进攻燕幽。

三月，三路大军相继发兵，与辽军交战。战争伊始，宋军势如破竹，捷报频传。东路，曹彬率军与辽军首战于固安（今属河北）南，一举攻占城池，继而，兵进涿州（今属河北），再战又克，且于涿州城南大败辽军援兵。斩杀奚人宰相贺斯。中路，田重进率兵与辽军首战于飞狐北。大败辽军。再战，采用定州路行营马步军都监袁继忠计，伏兵刊飞狐南口，大教全胜，生擒辽骁将、西南面招安使大鹏翼，监军、康州刺史马君贡（一作斌），副将、马军指挥使何万通及渤海军3000余人，斩自数千级，俘虏辽军兵士万余。田重进指挥宋军追击辽逃兵，长驱直入40里，迅速发兵攻飞狐，辽守将吕行德、张继从、刘知进等献城投降，宋廷遂改飞狐县为飞狐军。随后，田重进又挥师进围灵丘。西路，潘美、杨业率大军自西陉进兵辽境后，即与辽军相遇激战，辽军溃败而逃，宋军紧迫至寰州（治今山西朔县东），刺史赵彦辛出城投降。而后，西路军继续北进，包围朔州（治今山西朔县）。杨业之子、杨业军先锋将杨延昭（原名杨延朗）率兵攻战于朔州城下，激战中他臂中流矢，依然顽强厮杀，战斗不止，辽守将、节度副使赵希赞开城请降。宋军占据朔州，又进兵应州，宋将、节度副使艾正、观察判官宋雄慑于宋军兵威，亦献城请降。

四月，潘美、杨业率领西路军继续推进，再攻陷云州。田重进率中路军于飞狐北，两度重创辽军，斩杀两员辽将。进而挥师蔚州，辽守军牙校李存璋、许彦钦诛杀大将萧啜理，擒获监城使、同州节度使耿绍忠，率城中吏民降宋。西、中二路宋军节节胜利，连克辽山后重镇，尽收要害之地，兵势大振。曹彬率东路军亦连下辽境州县，然而因其进兵过速，粮草不济，至涿州10日后，竟无粮供食，只得退兵雄州等待粮草。赵炅闻讯，十分恼怒道：“岂有敌人在前，后退军以援刍粟，失策之甚也。”④立刻派遣使臣前往军中，令曹彬速率兵沿白沟河与米信会师，而后按兵不动，养精蓄锐，以声援西路宋军，等潘美、杨业全部占据山后重镇，与田重进合师东进，三路会合共取幽州。命令虽已下达，然曹彬帐下诸将得知潘美、田重进两路军已累建战功，而自己尽管兵力精壮，却未能有所攻取，战绩平平，遂谋议蜂起，纷纷请求出战。曹彬见众将争功请战，不得已，乃下令携带有限的粮草再度进兵涿州。

时辽援军未至，耶律休哥力寡势单，不敢贸然出战，只于夜间派轻骑深入曹、米两军之间，斩杀流动于营外的零散体弱的宋军兵士，以恐

吓宋兵；白天则布列精锐，虚张声势，使宋军忙于防御，疲惫不堪。时值五月，天气炎暑，宋军人马困乏，军中粮草又将告罄。耶律休哥又派兵设伏于林莽之中，截断宋军粮运。曹彬等宋将见粮草不济，令兵将移至白沟（今河北雄县北）驻守。一月之后，曹彬指挥宋军再度北进涿州。耶律休哥仍不断派遣轻骑沿途骚扰，抢夺宋军食粮，袭击离队落伍者，边战边退。宋军常顾此失彼，自顾不暇，只得收缩阵容，集结方阵而行。酷暑当头，沿途缺井少河，将兵干渴难忍，多就沼泽泥潭饮水，行进迟缓，四日方抵涿州。此时萧太后已亲统援军赶赴城下，兵势倍增。曹彬料难以制胜，便率兵冒雨后撤。萧太后指挥精锐紧追不舍。米信独自率领麾下300龙卫卒断后，被辽军重重包围，宋兵奋力拼杀，辽兵放箭，矢下如雨。米信殊死搏斗，射死辽兵多人，终因寡不敌众，龙卫卒多阵亡。宋军不敌辽军的进攻，便环列于粮草之外，边反击边撤退，等行至岐沟关（今河北涿州西南）时，终被耶律休哥所领辽军团团围困。日近黄昏，米信手执大刀，率随从骑士呼喊着冲向辽军，杀死数十人，辽军稍稍后退。米信随即带领百余骑冲出重围，曹彬亦在众将士护卫下，突围而去，其余兵将皆溃败而逃，死伤无计。突出重围后，曹彬、米信收拢散兵，连夜渡过拒马河，退守易州（治今河北易县）。辽军紧随其后，亦追击至易州东。耶律休哥侦知宋军于沙河边集结有数万之众，急令辽军前往攻击。宋军竟然望尘而逃，未及交战已溃不成军，以至为夺路逃生而相互挤撞坠落岸下或自相践踏而亡者过半，致使沙河水流阻断。

东路宋军的失利，使宋廷北伐战略难以实现，赵炅下令各路人马撤军，并召曹彬、崔彦进、米信等将返朝，令田重进屯守定州，潘美退守代州。进而又令潘美、杨业所部护卫，将云、应、朔、寰四州之民及吐浑部族分别迁入内地河东、京西地区。此时，辽萧太后与大臣耶律斜轸、南北皮室及五押惕隐率领十余万大军，已攻陷寰州，形势危急。杨业认为，辽军兵势正盛，不可与战。朝廷亦只令迁徙4州之民，可先派人密告云、朔州守将，待我军出代州之日，各州民众即出城南下；我军行至应州，辽兵必定会来阻截，再令朔州民出城，直入石碣谷。再派千名强弩手布阵于谷口，派骑兵于中途接应，那么四州之民可安然撤退。不料此议却遭到监军、西上阁门使、蔚州刺史王优的嘲讽，认为杨业领有数万精兵却如此怯懦，而当大张声势，直趋雁门关北。监军、军器库

使、顺州团练使刘文裕亦赞成此议。杨业坚持己见，不同意进兵。王优竟讥讽道："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杨业无奈，说道："业非避死，盖时有未利，徒令杀伤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以不死，当为诸公先。"他负气出征，临行前，哭泣着对潘美说："此行必不利。业，太原降将，分当死。上不杀，宠以连帅。授之兵柄。非纵敌不击，盖伺其便，以立尺寸功以报国恩，今诸君责业避敌，业当先死于死!"⑤他又指着陈家谷口，约潘美在此设伏，待自己引辽兵至此，即发步兵左右夹击。

杨业领兵出击。耶律斜轸闻业且至，即令辽军佯败而退，杨业指挥宋军紧追其后，遂误入伏击。等辽军伏兵出击，耶律斜轸与萧挞凛联兵夹攻，杨业难以抵挡，乃败退后撤，辽军穷追不舍。白杨业领兵出发后，潘美与王优等先是率杨部兵士于陈家谷口布阵设伏。自寅时至巳时，始终未见杨业踪影，王优命人登山颠托罗台嘹望，亦不见动静，竟以为辽军败走，他又欲借机争功，立即带兵离开谷口，追击辽兵。潘美见此情景。亦不能制，只得随同大队人马沿灰河进发。行进约20余里，忽然传闻杨业遇敌战败，宋军顿时紧张异常，潘美与王优等人不顾与杨业有约在先，竟率部迅速后撤。杨业孤军力战，自午时直杀至傍晚，边杀边退，终抵达陈家谷口。杨业于马上眺望谷口，指望得到接应，然而竟未见宋军一兵一卒，不禁捶胸失声大哭。他深知已无路可退，随即调转马头，率领帐下将士，再次冲向辽军。经过一番苦战拼杀，终因寡不敌众，人疲马乏，杨业帐下将士相继阵亡，其子杨延玉亦不幸身殁，他自己身上伤痕累累，只身一人陷入辽兵的团团围困之中。杨业于马上挺刀，依旧奋力杀敌不止，百余名辽兵死于其刀下，直至其马受创倒地，他才为辽军擒获。杨业被押禁于辽军营帐中，他叹息道："上遇我厚，期讨贼捍边以报，而反为奸臣所迫，至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耶!"⑥遂绝食，三日而逝。

宋军北伐全线受挫，辽军乘胜大举进犯宋边，夺回为宋军攻占的缘边州县城池。赵炅无可奈何，只有对北伐失职的将领给予处罚：贬曹彬为右骁卫上将军；崔彦进为右武卫上将军，米信为右屯卫上将军；潘美则降官三级，改授检校太保；监军王优、刘文裕革除名籍，分别发配至金州（治今陕西安康）、登州（治今山东蓬莱）。对北伐之中阵亡的将士则给予赈抚，并赐其家眷三月口粮；特赠杨业太尉、大同军节度使，

赐其家眷布帛千匹，粟千石。同时，赵炅重新调整、部署北边戍守兵将，以阻止辽军南下。定州驻泊兵马都部署田重进率兵入辽境，攻下岐沟关（今河北涿县西南），杀死辽兵千余。缴获一批牛马辎重，暂时稳定了北疆局势。

是冬，萧太后再度统兵南下。以耶律休哥为先锋，首战大败宋军于望都。宋瀛州兵马都部署刘廷让率兵迎敌，于君子馆与辽军交战，他分出精兵交予沧州都部署李继隆为殿后，缓急为援。时值严冬，天寒地冻，宋军弓弩手不能拉满弓弩。无法射杀辽兵，刘廷让所部遂为辽军重重包围。李继隆见状，非但不救援，反而引兵退守乐寿（今河北献县）。刘廷让孤立无援，虽奋力杀突围，终未成功，其先锋将贺令图被俘，高阳关部署杨重进阵亡，全军数万将士战死，刘廷让仅率效骑冒死杀出重围，得以生还。此战失利，致使河朔地区宋军戍兵毫无斗志。

辽军因此长驱直入，先后攻陷深州（治今河北深县南）、祁州（治今河北无极，后移至安国）、德州（治今山东陵县）等州，杀戮宋朝官吏，掳获百姓，抢夺金帛财富，留下几座空城和一片焦土，遂满载而归。

此后，赵炅再不敢用兵北伐，宋廷对辽由攻势转为守势。注释①《辽史》卷七一《景宗睿智皇后萧氏传》。

②③④《宋史》卷二五六《曹彬传》。

⑤⑥《宋史》卷二七二《杨业传》。

青城起义北宋创建后，采取“不抑兼并”的政策，对“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①的土地兼并现象，不加任何限制，致使社会贫富不均，差距悬殊，“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椎之地”②。尽管如此，北宋政权仍将因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而造成的巨额支出转嫁到百姓头上，不断加重赋税的盘剥。故自宋初之后，农民的反抗斗争持续不断，其中尤以四川地区最为突出。

茶马古道四川物产丰饶，自唐朝中叶以来，中原地区屡经战乱，官僚沃尔沃纷纷逃亡四川。他们疯狂搜刮掠夺，侵占田地，甚至将自己承

担的赋税和徭役转交佃户承担。宋灭后蜀，又纵兵掳掠，并将后蜀府库贮存的金、银、铜、币、珠宝等“重货”和绢帛布匹等“轻货”运往京城，为此，强行徵调大量民夫，水陆并运，直延续10余年才运完，此举更加重了四川地区百姓的负担。宋廷又于四川设置“博买务”，垄断布帛贸易，禁止农民和商贩私下交易，豪强地主趁机“释贱贩贵”③，投机倒把，从中渔利，而使更多的农民丧失田地，商贩破产。不仅如此，宋廷还在四川推行茶叶专卖，严禁茶贩贩茶，而由官府以极低的价格从茶农手中收购，使茶农、茶贩无以为生，整个四川地区的社会局势动荡不安。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四川大旱，百姓更是雪上加霜。而官府依旧“赋敛急迫”④，在天灾人祸的沉重压力下，青城（今四川都江堰市南）地区最终爆发了武装起义。

二月，因“贩茶失职”⑤的青城茶农王小波率百余众揭竿而起，他鲜明地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⑥、“均贫富”的主张，深得贫苦农民的热烈拥护和响应，“贫民多来附者”⑦，仅10天之内，起义队伍便发展到万人。

起义军在王小波的带领下，一举攻占青城县。义军又乘胜转战于邛州（治今四川邛崃）、蜀州（治今四川崇庆）、眉州（治今四川眉山）等地，并攻占眉州彭山县，生擒县令齐元振。齐元振曾被宋廷标榜为“清白强于”，受宋帝亲诏嘉奖，然而他勾结豪强，贪婪残暴，勒索无厌，民愤极大。起义军处死齐元振，将他搜刮聚敛之财全部分发给贫苦百姓。这一举动在农民中引起极大的反响，附近各县农民纷纷加入起义军，队伍不断扩大。十二月，王小波率领义军自彭山北上，攻打成都东南战略重镇江原县（今四川崇庆东南）。四川都巡检使张圯正驻守于此，乃亲自督阵，令驻扎江原的四川宋军主力拼死抵挡，两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王小波与义军奋勇杀敌，交战中其额部不幸中箭，仍带箭继续指挥战斗。义军将士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终于攻克江原，打死张圯，夺取川西大战的胜利。然而不久，王小波因箭创甚重而牺牲。

王小波牺牲后，起义军遂推举其妻弟李顺继任义军首领。李顺原亦为青城县茶农，也是起义军中有威望的领导者之一。此后，他继续执行“均贫富”的纲领，利用江原大捷的有利形势，率领义军扩大战果。他下令召集乡里富人大姓，责令他们开具各自家中所藏钱财粟帛清单，呈

报义军，“据其生齿足用之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⑧。与此同时，他于义军内部创建严格纪律，“录用才能，存抚善良，号令严明，所至一无所犯”⑨。李顺的这些举措，深得百姓称颂，起义军因此声势大振，队伍迅速发展到数万人。

江原大捷后，成都周围各州县如临大敌，惊恐万状，轻易不敢与起义军交战。四年四月，李顺再率义军主力攻克蜀州，杀死宋军监军王亮等十余名官僚。随后又攻占邛州，处死知州桑保仲、通判王从式等一批贪官污吏。之后，义军再向成都门户新津（今四川成都西南）江口挺进。据守于此的宋巡检使郭允能率宋军向义军发起勐烈进攻，双方激烈交战。在义军强大的攻势下，宋军惨败而逃，郭允能被击毙，同巡检使毛俨徒步脱逃。起义军兵分两路：一路先后攻占永康军（今四川都江堰市）、双流、新津、温江、郫县等重镇；一路则由李顺统领直逼成都。于成都城西郭门交战中，义军欲焚烧城门，失利，遂转而攻陷汉州（治今四川广汉）、彭州（治今四川彭州市）。起义军取得一系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贫苦农民的反抗斗志，纷纷加入义军，队伍很快壮大到数十万人。

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极大地震惊了宋朝的统治者。东上閤门使、知成都府吴元载滥用刑罚，民众积怨，且未能镇压王小波起义而遭革职。宋太宗改任东上閤门使郭载知成都。镇守成都的西川转运使樊知古与都巡检使郭延溶运?睿等将领更加强了成都府的防御，以抵挡农民起义军的进攻。

李顺率领起义军迅速攻占汉、彭二州之后，又突然回师成都。淳化五年正月，义军再度对成都发起勐攻，守城宋军难以招架。十六日，义军攻陷城池，郭载与樊知古带着万余残兵败将拼死突围，逃往梓州（治今四川三台）。起义军进驻成都后，创建大蜀政权，李顺称“大蜀王”，建年号“应运”，以吴蕴为中书令，计词、吴文赏为枢密使，地方官署设刺史、知州等职。义军脸上刺有“应运雄军”四字。大蜀政权还铸造“应运元宝”铜钱和“应运通玉”铁钱，供辖区内流通。政权创建后，大蜀军派兵四出，“所向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⑩，很快控制了北至剑门（今四川剑阁东北），南至巫峡的川峡大部分地区。其影响更超出了这个范围，秦陇地区由赵包率领的一支数千人的义军和峡路数千名

漕卒均闻讯准备响应。

宋太宗得知农民起义军向剑南（今四川剑阁以南）诸州进兵，遂命昭宣使、河州团练使王继恩为西川招安使，统兵自剑门入川，且委以“便宜决遣”，镇压起义军。二月初，太宗又闻成都失守，大为震惊，执意再增兵入川，又命少府少监雷有终、监察御史裴庄同为峡路随军转运使，工部郎中刘锡、职方员外郎周谓为陕府西至西川随军转运使，另以马步军都军头、勤州刺史王杲领兵趋剑门，崇仪使、带御器械尹元统兵由峡路入川，一切部署及行动均受王继恩节制。与此同时，太宗还多次下诏招抚，却又责令宋军严厉镇压，“尽加杀戮，不得存留”。李顺于成都创建政权后，分遣数千人，由杨广率领北攻剑门，以夺取川北门户。驻守剑门的都监、西京作坊副使上官正指挥兵士出击御敌。正在这时，从成都败逃的监军、供奉官宿翰率部下投奔剑门，两支军队合击大蜀军。杨广所领部众人少力单，非但未能攻陷剑门，反而遭致惨败，伤亡几尽，仅300余人退回成都。李顺恐消息走露，惊扰军心，下令将逃回的将卒全部斩杀于东门外。剑门争夺战失利，使宋军一直担忧的入川栈道被打通，从而长驱直入。北攻剑门的同时。李顺又派遣相里贵率20万主力军前去围攻梓州。梓州战略地位远不及剑门重要，右谏议大夫，知梓州张雍仍做守城准备，训练城中3000余兵，又招募千余强勇，贮藏金帛，熔铜钟铸箭簇，伐木为竿，绞布为绳。都巡检、内殿崇班卢斌援救成都，未果退还，被张雍委以监护之任。大蜀军行至梓州城下，派老弱兵士佯攻，诱宋军出城。卢斌率兵突出城外，与大蜀军击战50余回合，大蜀军不敌，稍稍后退。不久，大蜀军又设云梯、冲东、火车连夜攻城，梓州城中兵民惊恐万状。张雍召集百余名敢死之士，自城上悄悄吊出城外，放火烧毁大蜀军攻城器械。尽管如此，大蜀军攻势更加勐烈，连续攻城长达80余日，城中守军人心涣散。正当梓州告危之时，王继恩派内殿崇班石知颐率数千人前来救援，大蜀军处于前后夹击的不利形势下，被迫撤兵，退回成都。梓州一役，大蜀政权不仅损失了数万兵士，更因战略进攻的失利，致使由攻势转为守势。

四月，王继恩率宋军自小剑门路入研口寨（位今四川剑周北），大蜀守军战败。宋军遂翻越青强岭，攻陷剑州（治今四川剑阁），控制入川要塞。随即，宋军连克广安军（今四川广安北）、绵州（治今四川绵阳）、阆州（治今四川阆中）、巴州（治今四川巴中）、逢州（治今四

川仪陇南）等地，疯狂屠杀大蜀军民，并形成对成都的包围。五月，宋军尾随自梓州撤退的大蜀军，追至成都城下。成都城中十几万大蜀军在李顺等人的指挥下，沉着应战，战斗异常激烈。但终因寡不敌众，六日，宋军自坍塌城墙上突入城中，大蜀将士死者3万余人，城池陷落。太蜀政权的重要首领李顺、卫进、计词、吴文赏、李俊、徐师中、吴利涉等人被俘，后被宋军押往开封（今属河南）途中，于风翔（今属陕西）遭杀害。

成都陷落后，大蜀军民继续在四川各地顽强抗击宋朝官兵。宋将尹元统兵自峡路入川，“捕斩收集，久未得进”。即使是王继恩占据成都后，“郭门十里外犹为贼党所据”。在分布于各地的大蜀军中，有两支队伍声势较大：一支由中书令吴蕴率领。有十余万众，曾一度攻打眉州（治今四川眉山）长达百余日。得知成都失陷后，吴蕴遂放弃围城，仍活动在眉州一带，到处打击宋军，处置官僚沃尔沃。另一支为张余率领，有万余人，活动于川东地区，连续攻陷嘉州（治今四川乐山）、戎州（治今四川宜宾）、泸州（今属四川）、渝州（治今四川重庆）、涪州（治今四川涪陵）、忠州（治今四川忠县）、万州（治今四川万县）、开州（治今四川开县）8州，声势大震，队伍很快发展到数万人。此后，张余乘胜率部进攻夔州（治今四川奉节白帝城），又分兵进攻施州（治今湖北恩施）。五月下旬，张余在围攻夔州中，受到如京使白继斌与巡检使解守颐所率宋军的两面夹击，损失惨重，不得不撤离，退回嘉州。

大蜀军民的反抗斗争，再度引起宋廷的不安。十一月，宋军对农民武装开始了更大规模的镇压和围剿。王继恩派遣宿翰、都头梁继明统兵围攻吴蕴一部，大蜀军战败，吴蕴阵亡。眉、陵（治今四川仁寿）、简（治今四川简阳东）等州农民武装先后遭镇压。十二月，宿翰等又领兵自眉州直扑嘉州。大蜀政权知嘉州王文操献城投降，张余被俘，余部退往邛州（治今四川邛崃），不久亦为宋军所败。至道元年（995）二月，张余于嘉州遇害。此后，散布于各地的农民武装多转入崇山峻岭之中，继续坚持反抗斗争，虽宋朝官府镇压、招抚并举，未能翦除。二年五月，李顺余部王鸬鹚率部众活动于邛蜀山区，且自称“邛南王”，兵进邛、蜀（治今四川崇庆）二州，未几亦遭镇压。其余地区的农民武装也坚持斗争长达数年之久，才陆续被宋军剿灭。

注释①《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

③⑤曾巩《隆平集》卷二○《王小波·李顺》。

④王傅东都事略》卷四二《石普传》。

⑥⑦《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李顺之变》。

⑧⑨⑩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杂志》。

《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李顺之变》。

《东都事略》卷一七《削平僭伪》

关于李顺下落，史载不一，或称城破时遇害，或称撤出成都，30年后于广州遇害。

《续遭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李顺之变》。

第二十七章

澶渊之盟北宋自高梁河之役和雍熙北伐两度失利后，宋廷内部恐辽情绪日渐滋生。继而党项拓跋部首领继行叛宋臣辽，国内又爆发青州地区王小波、李顺的起义。外忧内患，令宋廷不得不重新调整内外策略。端拱二年（989），左十遗田锡在回答宋帝赵炅（宋太宗）询问边备之策时，即提出："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则外自安。"①未几，赵炅亦认为："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②至此，宋廷"守内虚外"的内外策略已是基本定局。至后代，更有"夷狄者，皮肤之患，尚可治；盗贼者，腹心之疾，深可忧"③之说，明确提出预防"内患"乃为关系社稷安危之首要大事，"守内虚外"遂成为宋朝的基本国策。

在此策略下，宋廷一改对辽朝的攻势，而代之以守势。辽帝耶律隆绪（辽圣宗）自大挫宋军攻势后，亦对宋朝采取攻势，先后攻占宋深州（治今河北深县南）、束城、文安等沿边重镇。同时，辽廷又利用继迁的叛宋归附，对他大加册封，授予"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绥、宥等州观察处置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④，并应继迁之请，将契丹宗室耶律襄之女封义成公主嫁之，结成联姻，而使党项拓跋势力与辽朝合成对宋朝的钳形攻势，首尾相应，夹困宋朝。面对此种形势，宋廷却一味消极防御，令宋军西起保州（治今河北保定）西北，东至泥姑海口，沿宋辽边境，利用河渠塘泊，筑堤蓄水，蜿蜒长达900余里，以为屏障。于沿边设置26寨、125军铺。布置兵士3000余人，使"部舟百艘，往来巡警"⑤，企图以此阻止辽军的长驱直入。但对于入侵宋境的辽军，宋廷竟然规定，"但令坚壁清野，不许出兵，继不得已出兵，只许披城布阵，又临阵不许相杀"⑥。宋廷旨在息事宁人，与辽和解。然而辽廷已从中清楚地看到宋朝的虚弱，遂进一步加紧入侵和挑衅，不断派兵深入宋境，掳掠人畜财物，屠杀百姓，毁坏民宅庄稼，宋霸州（治今河北霸县）、雄州（治今河北雄县）、贝州（治今河北南宫东南）、冀州（治今河北冀县）、邢州（治今河北邢台）守名州（治今河北永年东南）等10余州军百姓惨遭涂炭。

宋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辽帝耶律隆绪及其母萧太后亲统辽军，以收复瓦桥关（位今雄县旧南关）一南10县为名，大举南下，采取避实就虚战术，绕开有宋军重兵把守的城池，一路挺进，迅速围攻定州（今属河北）。辽军的迅勐进攻，使宋军措手不及，北方州县纷纷告急，公文一夕数次频传开封（今属河南），宋廷上下为之大震。此时在位的宋帝赵恒（宋真宗）虽曾表示要亲自统兵抵御辽军入侵，但事到临头，又心虚胆怯，犹豫不决。臣僚意见纷纷，参知政事王钦若劝说赵恒迁都升州（治今江苏南京）以避战乱，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则主张迁都益州（治今四川成都），惟有宰相寇准力排众议，主张赵恒亲征北上。经过朝廷中主战派的力争，将王钦若调离，出镇天雄军府兼都部署，赵恒被迫同意北上。

临亲征北上前，宋廷又作了周密的部署，除倚重抗辽前线屡立战功，“勇于战斗，以名称相上下”⑦的杨延朗（杨业子，后更名延昭）、杨嗣外，又以天雄军都部署周莹为驾前贝冀路都部署，侍卫马军都指挥使葛霸为驾前邢洛路都部署。又令兵部尚书张齐贤兼青、淄、潍安抚使，权三司恒丁渭兼郓、齐、濮安抚使。诏令定州路驻泊行营都部署王超等将领率兵赴宋帝临时驻扎之地，大将魏能、张凝、田敏统兵屯驻定州。还以山南东道节度、同平章事李继隆为鸳前东面排阵使，武宁军节度、同平章事石保吉为驾前西面排阵使。为了防止党项拓跋部趁势侵扰宋疆，宋延义委任西凉府六谷吐蕃部落首领厮铎督为朔方军节度、灵州西面巡检、西凉府六谷大首领，以牵扯党项。在完成了一系列的部署和安排后，赵恒才终于踏上北巡的征程。

南侵辽军号称20万，在耶律隆绪和萧太后的统领下，继续南下，又先后攻陷宋德清军（今河南清丰）、通利军（今河南浚县西北）等重镇，直抵黄河北岸的澶州（治今河南濮阳）城北。但辽军此番南侵，目的在于掠夺物资财富，并向宋廷炫耀武力，施加压力，因而在用兵进攻的同时，又不断向宋廷表示和谈的意图，以为试探。辽帝通过降将，原宋定州副都部署王继忠向宋莫州（治今河北任丘）守将石普送去一封书信，表示须由宋廷首先提出议和。此信转到赵恒手中，赵恒亲笔手一书，答应王继忠所提条件，并委派閤阎门祗侯曹利用前往辽军给予明确答复。

辽军兵临重镇澶州城下，对宋都开封构成极大的威胁。宋军守城官兵坚守城池，以阻止辽军的继续南下。澶州前军西线宋军设伏弩射杀辽兵，辽南京统军使萧挞览（一作挞凛）率游骑攻城，中伏弩身亡，辽军士气受挫。宋帝赵恒自开封北上，一路顾望不前，进军迟缓，在寇准的一再催促下，才于十一月到达澶州南城。时澶州城跨黄河而建，故分为南、北二城，河上用船并联架设成一座浮桥，成为联系二城的信道。赵恒抵达南城后，即表示不愿过河，寇准又与禁军将领高琼再三劝说，高琼甚至用鞭子抽赶为宋帝抬轿的兵士，方才将赵恒请到北城。当赵恒登上北城城楼，召见抚慰诸将领时，宋军一片欢腾，“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⑧，士气为之大振。与此同时，宋军已有数十万人马集结于澶州一带，与辽军形成两军对峙的局面。辽军深感孤军深入，难以相持长久，急于和谈。而赵恒北上的真实目的并非武力驱逐辽军，而是指望通过和谈，不惜用金帛换取辽军的北撤，稍后到达澶州的宰相毕士安也力赞赵恒以重金厚赂辽军，以求双方议和。尽管此时澶州前线局势对宋军十分有利，但在宋帝及宋廷主和派的积极倡导下，一味忍辱议和，再度派遣曹利用作为使臣，向辽乞和。

曹利用受命出使，临行前向赵恒询问议和所许银绢之数，赵恒告诉他，如实在不得已，只要能议和，以百万银绢作为交换的条件也是可以的。寇准闻讯则叮嘱曹利用说：“虽有敕旨，汝往，所许毋得过三十万，过则勿见准，准将斩汝。”⑨曹利用到辽军果真以30万银绢达成和议，待他返回澶州行宫入见宋帝时，赵恒正在进食。得知曹利用自辽军归来，赵恒迫不急待地想知道具体情况，便先让内侍询问应允辽帝多少银绢?曹利用推辞道：“此机事，当面奏。”后见推辞不成，他以“三指加颊”为示。内诗人内秉告：“三指加颊，岂非三百万乎?”赵恒听罢，失声说道：“太多。”既而又道：“姑了事，亦可耳。”曹利用正站于门外，先闻宋帝抱怨太多，顿时惊慌失措。之后再听宋帝之语，他又转忧为喜。待他入见赵恒，又故作姿态，再三称罪，直至最后才说明与辽议和是以30万银绢成交。赵恒听罢，竟喜出望外，给予曹利用极丰厚的赏赐⑩。

十二月，宋辽经过几次交涉，商定和议，交换“誓书”，终于订立盟约。双方约定：宋辽维持原定疆界，两国约为兄弟之国，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且称萧太后为叔母；宋朝每年给辽朝银10万两，绢20万匹，称为“岁币”；双方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

双方相互遣送对方的逃亡入境者，沿边城市只能依旧修葺城池，不得新增修筑城堡、开挖或改移河道；辽军北撤时，宋军不得在沿途邀击。澶州又称澶渊，故此盟约又称为“澶渊之盟”。澶渊之盟，订立之后，宋廷委任何成矩、李允则、杨延朗等强帅勇将分驻北疆沿边重镇，谨守边境。又“改威虏军日广信、静戎日安肃、破虏日信安、平戎日保定、宁边日永定、定远日永静、定羌日保德、平虏城日肃宁”，以示对辽的友好。此后，宋、辽之间长期并立，双方再未爆发大的战事，边境相对安宁，经济文化交流频繁，使臣往来不断，“二方既定，中外略安”。

注释①《长编》卷三○。

②《长编》卷三二。

③《长编》卷一六三。

④《辽史》卷一一《圣宗纪二》。

⑤噬宋史》卷二七三《何承矩传》。

⑥《长编》卷一五三。

⑦《长编》卷四八。

⑧《长编》卷五八。

⑨《涑水记闻》卷六。

⑩《长编》卷五八。

《宋史》卷二八一《毕士安传》。

庆历新政宋干兴元年（1022），宋帝赵恒卒，庙号真宗，其子赵祯即位，是为宋仁宗。时朝柄大权操纵于真宗刘皇后手中，她先后任用王曾、王钦若、张知白、张士逊、吕夷简等人为宰相，朝政率循旧章。依旧执行“守内虚外”的国策，致使内外矛盾不断发展，官僚冗滥，办事效率低下；军队将兵元员，作战能力低弱；朝廷费用入不敷出。为解决“积

贫积弱”的问题，宋廷靠增加赋税以充实府库，导致百姓生活贫困，怨声载道，反抗斗争此起彼伏。而辽又与西夏相呼应，严重威胁着宋朝北部赵祯像与西北部的边疆。北宋再度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

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卒，赵祯才实际控制朝政。此时社会矛盾已十分尖锐，士兵暴动与农民起义相互交织，宋南京（今河南商丘）、京东、郑州（今属河南）、许州（治今河南许昌）、滑州（治今河南县东）、解州（治今山西运城西南）、池州（治今安徽贵池）、清平军（今山东章丘）、临江军（今江西清江西）、建昌军（今江西南城）、桂阳监（今湖南桂阳）及夔州（治今四川奉节）、峡州（治今湖北宜昌）等地，先后爆发了各种形式的起义斗争，规模大小不等。其中有影响的反抗斗争包括庆历三年（1043）沂州（治今山东临沂）虎翼军卒王伦率众哗变，杀巡检使朱进，“转斗千余里”，“如履无人之境”①。同年，京西、陕西两路有张海、郭貌山领导的农民起义，于黄河至汉水流域间杀戮贪官污吏，“散钱帛与其党及贫民”②。又有荆湖南路瑶、汉百姓的起义，“平人惊惧，尽起为盗”③。此后，还有河北贝州（治今河北南宫东南）王则领导的起义，等等。这一系列的反抗斗争极大地震动了北宋朝廷，不禁惊呼：“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④宋廷官僚多已看到社会潜伏的诸多危机，不断提出革新的倡议。

此前，地方官僚中的一些有识之士着手进行局部的改革。大理寺丞郭谘与秘书丞孙琳于洺州肥乡县（今属河北）试行“千步方田法”，基本改变了当地“田赋不均，岁久莫能治”⑤的局面。而更多的官吏则指盼宋帝赵祯能革除积弊，消除危机，扭转局面。庆历三年，赵祯令枢密使吕夷简罢议军国大事，旋即擢升范仲淹为参知政事，韩琦为枢密使，富弼为枢密副使，三人同以宰相执政，又以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为“兴致太平”，赵祯期望他们能尽快提出更张朝政的革新方案。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登进士第，始入仕途。他对宋廷的种种弊端耳濡目染，身感不安。天圣三年（1025），他以文林郎充大理寺丞，即向赵祯上书，提出恩荫冗滥之弊。五年，再奏《上执政书》，抨击朝廷粉饰太平，兵久不用，武备不坚，内外奢侈，国用不充，贤才乏匮等诸多弊政。希望能“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⑥。

八年，他改判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再度上疏请求裁并州县，减轻差役，以宽民力；但范仲淹的多次上疏，未引起朝廷的重视，依然因循守旧。不过他的主张与见解，越来越多地得到朝野有识之士的称赞，“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⑦。欧阳修、富弼、余靖等一批有志青年官僚，纷纷支持范仲淹的革新倡议，不满吕夷简等人的墨守陈规。景韦占二年（1035），他升任权知开封府，又一次向宋帝极言更张之措，因反对吕夷简的擅权，而遭谪贬，出知饶州（治今汀西波阳）、润州（治今江西镇江）、越州（治今浙江绍兴）。次年，他与尹洙、欧阳修等人又被吕夷简等权臣斥为“朋党”，宋廷上下官僚因此而咋舌，不敢言事。直至庆历初年，因内外交困，宰相吕夷简难以应付，在日益高涨的更张呼声中，宋帝赵祯乃重用范仲淹为宰相。

是年九月，赵祯诏辅臣于天章阁应对，范仲淹与富弼联名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又称《上十事疏》），提出一套革新的基本方案：一日明黜陟，提倡依官吏政绩决定升迁罢黜。二日抑侥幸，限制官僚子弟依据恩荫充官。三日精贡举，变更学校传习之业及科举取士之法，应“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四日择长官，重视对地方官吏的择选，而使政令下达，杜绝扰民。五日均公田，均定官所占职田的收入。六日厚农桑，主张重视农业生产，修复水利，以利财政收入。七日修武备，建议招募强壮之丁，以充京畿卫士，令其三时务农，一时教战。既可省兵费，又益京师防卫。八日减徭役，提出合并州县，以利减轻户少之州县百姓的赋役负担。九日覃恩信，要求朝廷及地方政府官员恪守职责，严格执行宋帝及朝廷所颁大赦等恩惠，以取信于民。十日重命令，即慎重订立条法，一经颁行，各级官吏必须照章遵守执行。此10项革新主张，大多在庆历三年五月至四年五月间，由赵祯下诏书颁行全国，时称“新政”。其间，富弼还上疏陈当世之务10余条和安边13策，韩琦亦前后上疏陈述15事，是为对“新政”的完善与补充。

范仲淹、富弼等人更张的核心是通过整顿吏治，以达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统治秩序的目的。从三年十月起，宋廷即着手进行吏治的整顿，先是赵恒诏令中书省与枢密院长官共同择选各路转运使。范仲淹在选定转运使人选时，十分慎重，凡属庸碌无能之辈，一律免去，最后确定张昆之赴河北，王素赴淮南，沈邈赴京东，施昌言赴河东，李绚赴京西，实地考察地方官吏的治绩。对此富弼尚存疑虑，担心免除庸才之

职，会生悲泣之感。范仲淹则坚持认为，如若任其贪赃枉法，则本路百姓将受其盘剥。未几，赵恒又诏令中书省与枢密院共同选定各路转运使与提刑按察使。重新恢复设置各路转运使司判官。不久，再诏令中书省与枢密院商议并颁行“新定磨勘式”，以作为考核官员及官吏升迁的条法依据。十一月，宋廷更定“荫补法”，且下令限制职田数额。

庆历年间，以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为首的“新政”派，主要从整顿吏治人手，却因此触及了官僚地主的特权及利益，多数官僚恐仅此已更张过甚，不便于推行。部分守旧派官僚更是横加指责，百般刁难，暗地里甚至公开表示强烈的反对。集贤殿大学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章得象对“新政”极为不满，他支持部分御史台谏官，攻击和诽谤范仲淹等革新派及其新政，诬陷他们结为“朋党”，“欺罔擅权”，“怀奸不忠”。枢密使夏竦则令其女仆伪造石介为富弼撰写废立皇帝草诏，诬蔑富弼要废赵祯，另立他帝。守旧势力的破坏与诋毁，令范仲淹等人难以安身，新政更难以推行。四年六月，范仲淹借“秋防”之名，离开朝廷，宣抚陕西、河东。八月，富弼亦宣抚河北。范、富二人出朝后，守旧派更是肆无忌惮，又编织各种罪名，将支持新政的官僚刘巽、王益柔、苏舜钦等10余人贬出朝廷。宋帝赵祯迫于压力，也向守旧派妥协，十一月，他下诏“戒朋党相讦，及按察恣为苛刻、文人肆言行怪者”⑧。五年正月，范仲淹、富弼被罢相。二月，诏罢“京朝官用保任叙迁法”，又罢“荫补限年法”。三月，韩琦亦遭罢相。五月，欧阳修等人相继被贬朝，又罢各路转运使司判官。至于各路转运按察使，多以“苛刻”之罪名，或罢或贬，曾惩治贪官污吏卓有成效的江南东路转运使杨绂及其判官王绰、提点刑狱王鼎等人，竟被诬为“江东三虎”⑨，遭到贬斥。

在守旧势力的陷害和打击下，新政官僚人人自危，“皆惧谗畏祸，不敢挺然当国家之事”⑩。守旧派官僚控制朝政后，基本废止了新政所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依旧推行“守内虚外”的国策。为解决朝廷庞大的开支，满足统治者的挥霍浪费，拼命盘剥搜刮，全然不顾百姓死活。结果朝廷府库仍旧亏空，社会矛盾继续激化。皇枯四年（1052），范仲淹病逝。此后不久，原参与新政的官僚又多被重新启用，至和二年（1055），富弼受任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嘉祐占元年（1056），韩琦任枢密使。三年，富弼改授昭文馆大学士，韩琦改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三年，富弼改授昭文殿大学士。五

年，欧阳修升任枢密副使。尽管他们再度复官，却失去昔日新政时革新的锐气；并陷入守旧与保守之中，不再有“妄非”之举。不过“庆历新政”虽然失败了，可主张“更张”的思想却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注释①《欧阳文忠公文集·奏议》卷二。

②《长编》卷一四三。

③《欧阳文忠公文集·奏议》卷九。

④《欧阳文忠公文集·奏议》卷四。

⑤《长编》卷一四四。

⑥《范文正公集》卷八。

⑦《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二○。

⑧《宋史》卷十一《仁宗纪三》。

⑨《宋史》卷三五《杨纯传》。

⑩包拯《包孝肃奏议》卷一。

庆历兵变北宋创建后，采取“守内虚外”的基本国策，收缴藩镇节度兵权于中央，“强干弱枝”，极大地加强禁军。又实行“养兵”政策，凡遇饥荒之年，即由官府派人赴灾区，招募大批强壮饥民充军入伍，以此防止饥民作乱。因此宋朝军队庞大，军费支出巨大。然而统治集团的腐败，加之官吏、军将肆意克扣军饷，随意役使兵士，亦引起下层军校和士兵的极度不满，时有反抗，进而发展为士兵暴动。宋真宗在位期间（998—1022），即发生了四川王均的兵变和宜州（治今广西宜山）陈进领导的士兵暴动。这些兵变虽遭到镇压，但将士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到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兵变愈演愈烈，且与农民起义交织一起，他们“陵侮朝廷”，“杀官吏，据州城，尽取官私财物，招募徒众”，甚至，称王称朕，与朝廷抗礼”①，给宋朝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

宋庆历三年（1043），京东安抚使陈执中，大肆搜刮民财，强令农民修筑青州（治今山东益都）城，百姓怨声载道。五月，沂州（治今山东临沂）虎翼军卒王伦趁势纠集四五十名兵士发动兵变，杀巡检使朱进，直入青州境。陈执中遂遣巡检使傅永吉率官军抗击，王伦乃率众转攻淮南地区，先后活动于沂、密（治今山东诸城）、海（治今江苏连云港西南）、泗（治今江苏盱眙北）、真（治今江苏仪征）、扬（今属江苏）诸州，转战千余里，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行至高邮军（今江苏高邮）时，已有部众二三百人，皆为贫苦百姓，他们于脸上刺“天降圣捷指挥”六字，以示必胜。

自宋初以来，淮南地区多年无警报，州县防卫怠懈，及闻王伦来攻，竟不知所措。楚州（治今江苏淮安）、泰州（今属江苏）守臣不敢迎战。知高邮军晁仲约欲保全自家性命，张榜令富民向王伦所部赠送“金帛牛酒，使人迎劳”②。然而王伦率众转辗迁移，虽四处攻击官军，却未招兵买马，扩大队伍，致使势单力薄。

宋廷对王伦率众转战于淮南十分不安，唯恐其阻断汴河漕运，遂令傅永吉率官军追击王伦，于扬州山光寺南击败之。七月，王伦率残部转至和州（治今安徽和县），渡江南下，至江南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东北），为官军所俘，未几即遭杀害。

庆历七年（1047），宋宣毅军小校王则又于思州（治今河北清河西）兵变。王则，涿州（今属河北）人。其家境贫困，后因饥荒逃难至恩州，给人牧羊。之后参加宣毅军，升为小校。恩州、冀州（治今河北冀县）一带多信奉弥勒佛，王则便以宗教的形式，组织当地百姓，以《五龙经》、《滴泪经》及图谶诸书作宣传，声称“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③，以此号召民众反抗宋朝统治。随后，他以州吏张峦、卜吉为谋主，派人赴德州（治今山东陵县）、齐州（治今山东济南）等地发展信徒，约定庆历八年正月初一起兵，阻断澶州（治今河南濮阳）浮桥，于河北地区活动。但因其信徒潘方净向北京留守贾昌朝告密，王则不能再等待，遂仓促于庆历七年冬至日（十一月二十八日）提前兵变。

当日，知州张得一正率官僚祭拜天庆观，王则乘虚率众冲入府库。张得一闻变，逃入骁捷营，欲借军营保全其性命。王则夺得兵器、财物

后，即领众人直扑骁捷营，放火焚烧营门，杀入营中，生擒张得一。兵马都监、内殿承制田斌率所部与王则军激烈巷战，战败出逃。王则攻入城中，令兵士关上城门。提点刑狱田京、任黄裳丢弃家眷，持府印自城上吊出城关。王则军杀通判董元亨，打开军资库，又得大批物资。随后，王则又镇压了民愤极大的司理参军王奖、节度判官李浩、清河令齐开、主簿王湙。且打开囚牢，释放囚徒，深得城中百姓的支持。

王则首战告捷，遂以“东平郡王”为号，建国号“安阳”，年号“得圣”。又以张峦为宰相，卜吉为枢密使，创建政权。称其居所为“中京”，居室等皆立名号。城中则以一楼为一州，上书州名，任命知州。而于城上依四个方向各置一总管。又改历法，以十二月为正月。凡年龄12岁以上，70岁以下的男子，皆刺面日“义军破赵得胜”。而旗帜号令，皆以“佛”为称。

宋廷急令澶、孟（治今河南孟县南）、定（治今河北定县）诸州及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官军严加防守。又调集禁军十万，前往镇压。不久，赵祯以知开封府明镐为河北体量安抚使，督统诸军，进围恩州。恩州城民汪文庆、郭斌等人，自城上以箭系书信，射入明镐军营帐中，约为内应，且定以夜晚自城上垂下绳索，以接应官军入城。官军如约乘黑夜攀绳登城，数百人占据城墙，即焚烧城楼。王则等发现官军已入城，遂率众反击。官军先登城者，急欲争功，故砍断绳索，不令后继者入城。及战，官军无后继援兵，寡不敌众，只得与汪文庆等内应缒城而逃。

恩州地处南北交通要道，辽人入宋常经于此。王则得知辽朝派入宋使臣将途经附近，遂决定出兵劫持，以示抗辽。然而消息走露，明镐派殿侍安素于恩州西门外设伏。深夜，王则派数百人出城袭击辽使，中伏，全部被官军俘虏。

恩州城池坚固，城墙高峻，官军屡攻不破。明镐令兵士于城南暗挖地道，而每天指挥官军佯攻北城，以分散其注意力。不久宋廷见恩州城久攻不下，又以参知政事文彦博为河北宣抚使，明镐为副使，继续攻城。文彦博至恩州城下时，地道已挖，至城内。文彦博与明镐便自官军中挑选了一批精壮兵士，连夜由地道入城，向恩州发起勐攻。

官军入城后，遂占据城墙，王则率部众与官军激烈交战，且在牛身上绑草泼油，点燃后令火牛冲击官军。官军以枪刺牛鼻，迫使火牛掉头，又直冲王则军。王则军顿时大乱，官军趁势勐攻，王则军不敌，开东城门出逃。

阎门祗侯张絪于城外凭借城壕，迎击逃出城外的王则军，但未能奏效，自己亦被斩杀。王则军陷入官军重围之中，经一番殊死搏斗，王则军又败退，王则为总管王信所俘。其残部又退守城郊村舍。官军随即又团团围困村舍，王则残部依旧顽强抵抗，宁死不屈。唁军依仗人多势众，勐烈进攻，放火焚烧村舍。大火熊熊，王则残部仍无人投降，终于全部被烧死。

王则起兵前，曾派人赴河北、京东地区，联络10余州县信徒，起兵反宋。然王则提前起兵后，与10余州县中断联系。而未能得到及时响应。齐州禁军兵士马达、张青、张握等人得知王则起兵后，亦欲率众起事占据州城，以策应王则，然因部众泄密而遭镇压。

宋廷于王则兵变遭镇压后，即令各州“大索妖党”④，残酷镇压百姓，以巨于“被系者不可胜数”⑤。

王则兵变自庆历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庆历八年闰五月失败，历时66天。其后，王则、张峦、卜吉等兵变首领被押解至开封遭杀害。

注释①《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一七《弭盗门》。

②《范文正公集》卷一《年谱》。

③《宋史》卷一二九二《明镐传附王则传》。

④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一。

广西战事北宋时，广南西路多聚居溪峒蛮，其中尤以侬氏、黄氏、周氏、韦氏四大姓氏人多势众，各雄据一方，而广源州（今越南高平广渊）及西原州的蛮族势力最为强大。对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宋承唐制，于其地多设置羁縻州，以其首领为长官。

侬氏世代居住于广源州。广源州地处邕州（治今广西南宁南）之西南，位于宋朝与交趾王朝之问，隶属邕州管辖，但因其距邕州较远，宋廷鞭长莫及。宋初以后，交趾（今越南）日渐强盛，因广源州地产黄金、丹砂，便不断向北蚕食，欲吞并此地。交趾派兵进击广源，俘虏其首领侬全福，且每年于此掠走大批金货，“赋敛无厌，州人愁苦”①。侬全福被俘后，其妻另嫁，生子名智高。及侬智高长大成人，仍被部众推举为首领，遂率领部众反抗交趾的盘剥与奴役，曾一度于傥犹州创建政权，号“大历”。交趾对侬智高此举十分恼怒，便出兵北上，攻陷傥犹州，俘虏了侬智高。然交趾又欲笼络、收买侬智高，以为北上扩张之策，便释其罪，且委他为知广源州。但与交趾有深仇的侬智高，却不为之所动，依然与交趾时有抗争。及后，交趾又胁迫他归顺，又遭其断然拒绝，积怨日重。

宋皇枯事占元年（1049）九月，侬智高率部众攻陷安德州，于此建“南天国”，改元景瑞。他亦不满隶属宋邕州的地位，欲建割据政权，便率部众侵扰宋境，又向北攻击邕州横山寨。对侬智高的割据活动，首先感到不安的仍是交趾，一枚未过许久即发兵攻打侬智高。迫于交趾咄咄逼人的进攻与压力，侬智高不得已乃向宋廷请求内属。然而宋廷恐滋生边事，竟然拒绝侬智高的请求。侬智高既不得内属宋廷，又与交趾为仇，便凭借着广源地区川泽之土利，招募亡命之徒。又与广州进黄玮、黄师宓等人日夜谋划，人攻宋境。一日黄昏，侬智高令人焚毁所藏积储，而对部众声称：“生计穷，当拔邕州，据广州以自王，否则必死。”②遂率部众人侵宋境。

宋皇枯四年（1052）五月，侬智高率部众5000人，沿郁江东下，破横山寨，进而攻陷广南西路重镇邕州，杀知州陈珙及广西都监张立，于此建“大南国”，自称仁惠皇帝，改元启历。自黄师宓以下官吏，皆授官，称宋廷官称。随后，侬智高率兵连克横州（治今广西横县）、贵州（治今广西贵县）、藤州（治今广西藤县）、梧州（今属广西）、封州（治今广东封开）、康州（治今广东德庆）、端州（治今广东肇庆）。其时，广南州县皆无防备，州县官吏畏懦，一旦仓促应战，竟不知所为，守将多弃城而遁，而宋军则一战即溃，死伤甚众。侬智高得以长驱直入，进围广州。

侬智高对广南地区的大举进犯，引起宋廷极大震动。宋帝赵祯下诏，令钤辖陈曙发兵征讨。侬智高率兵围攻广州，长达五六十日，城未能克，他却于城外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此后侬智高又率兵进击贺州（治今广西贺县），又木克；乃转攻昭州（治今广西平乐西南），遂破城而入。昭州数千百姓逃入山谷间避难，侬智高令士卒放火，百姓全部遇难。宋廷又以孙沔为广南安抚使，令他平息侬智高叛乱。然而侬智高丝毫不受节制，继续进兵侵扰，宋帝赵祯深感忧虑。侬智高请求充任邕、桂节度使，赵祯甚至准备接受。参知政事梁适以为不可，若依侬智高之请，则岭南之地不属宋廷所有。适逢枢密副使狄青上表，请求征讨侬智高，赵祯委以狄青为荆湖南、北路宣抚使，提举广南经制盗贼事，率兵进击侬智高。谏官韩绛认为狄青为武将，不宜专任其一人。赵祯为此征询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庞籍，庞籍极力荐举狄青，且言：“号令不专，不如不派。”赵祯方消除疑虑，又下诏，将岭南诸军皆隶届狄青统领。

十月，侬智高兵进宾州（治今广西宾阳），知州弃城而逃。侬智高陷宾州城，又复入邕州。侬智高于广南的叛乱，使交趾感到有机可乘，竟向宋廷请求出兵，协助宋军平定侬智高之乱。宋帝赵祯急欲息事，遂应允交趾之请。经制广南西路、知桂州余靖亦认为交趾可信，乃于邕州、钦州（治今广西灵山西）屯积万人粮草，以备交趾所需。赵祯亦下诏，以缗钱3万赐交趾，作为军费，还许平叛之后再加以厚赏。狄青到达广南后，即传檄余靖不许借助交趾军队，随即又上奏朝廷：“且假兵于外以除内寇，非我利也。以一（侬）智高而横蹂二广，力不能讨，乃假兵蛮夷，蛮夷贪得忘义，因而启乱，何以御之?请罢交趾助兵。”③赵祯罢交趾派兵助攻。狄青知侬智高叛军擅攀高履脸，宋兵不习山地作战；故交哉·必败，遂召当地少数族兵随从作战。

宋皇枯五年（1053）正月，狄青合孙沔、余靖所部自桂州进驻宾州（治今广西宾阳）。此前，军将蒋偕、张忠皆轻敌，结果与侬智高交战，皆兵败战死，军队士气受挫。狄青则严明军纪，统一号令，告诫诸将不得擅自与叛军接战，听候命令。广西钤辖陈曙趁狄青未至，率步卒8000进攻侬智高所部，果于昆仑关（今广西南宁东北）溃败。狄青闻讯，认为：“令之不齐，兵所以败。”④清晨，狄青于堂上召集诸将，将陈曙、殿直袁用等30名将领斩首。孙沔、余靖相顾惊愕，诸将皆两腿颤抖不已。

随后，狄青便按兵不动，且令将士休整10日，众人不知意图何在。侬智高派人侦探，回报称宋军不会马上用兵，侬智高遂怠懈。次日，狄青即集合军队，自己亲统前军，孙沔率军随后，余靖领兵殿后，发兵进击邕州。行至黄昏，即抵达昆仑关下。时值上元节（正月十五日），狄青于军中大设酒宴，款待将士。侬智高探报侦知，叛军亦不为备。是夜，大风雪。次日凌晨，宋军营帐竖大将旗，诸将环列于狄青营帐前，候命进击昆仑关。有军校来报，狄青已连夜率前军攻入昆仑关，令诸将速领所部过关集结。众得方知主帅已破关进击叛军。

狄青既入昆仑关，又率兵出归仁铺（今广西南宁东北），且于此部署军阵。侬智高指挥所部，倾巢出击，迎战宋军。宋军前锋将领孙节与叛军激战于山下，不幸阵亡，叛军由是气焰嚣张，孙沔等将领见叛军猖獗，不禁惊恐失色。狄青则沉着自若，手执白旗指挥蕃部骑兵，自左右两翼夹击叛军。叛军大败而逃。狄青率军追杀50里外，又斩首数千级，俘获500余，侬智高幕僚黄师宓、依建中、侬智中等57名官属被斩。叛军严重受挫，侬智高连夜焚烧邕州城池出逃，自合江口逃入大理国。

次日凌晨，狄青统军进入邕州城，缴获金帛巨万，各种牲畜数千，下令释放被侬智高胁迫、掳掠的百姓。又收敛叛军尸体，堆积于城北，内有一尸着金龙衣，众人皆以为是侬智高，欲上奏朝廷邀功。狄青则反对此举，告之众人："安知非诈邪?宁失（依）智高，不敢诬朝廷以贪功也。"⑤二年后，侬智高死于大理国，在宋朝遣使迫索之下，大理国函其首送交宋知邕州萧注。

交趾欲借侬智高叛事侵蚀宋边的企图未能得逞，侬智高被镇压后，交趾便又寻机向宋境扩张，进行武装入侵，劫掠财富。宋嘉枯四年（1059），交趾兵扰钦州。次年，交趾与甲峒蛮合兵侵扰邕州。赵祯为此下诏，令广南西路诸州发兵征讨。此后，交趾对宋境的侵扰与劫掠始终不断，边境不得安宁。

宋熙宁九年（1075）九月，交趾再次发兵侵入宋广西古万寨（今广西扶绥）。十月，交趾则发兵6万，号称8万，分水陆两路，大举入攻宋广南西路。水军白海上（今北部湾）直进，攻占廉州（治今广西合浦）、钦州；步卒则进兵邕州。宋邕州知州苏缄闻讯，立即调集军队，

共2800人，部署防务，以迎击来犯的交趾军队。

交趾为掩饰其扩张，兵进之处，遍布榜文，“言中国作青苗、助役之法，穷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济”⑥。宋廷君臣对此愤慨已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亲自起草文告《讨交趾榜》，给予驳斥，且调兵赴桂州（治今广西桂林）、潭州（治今湖南长沙），以援应广南西路宋军。

宋熙宁九年（1076）正月，交趾王李乾德率兵围攻邕州。知州苏缄率军队奋力抵抗，城破，苏缄令家人自尽，遂放火自焚，全城军民5800余人亦拒不投降，悉为交趾兵屠杀。

二月，宋廷任命宣徽使郭逵为安南行营经略招讨使，兼荆湖、广南宣抚使；以天章阁待制赵离为招讨副使，统兵号称10万，南下讨伐交趾军队。宋帝赵顼同时下诏，令占城（今越南南部）、占腊（真腊，今柬埔寨）出兵合击交趾。宋廷又支钱5万缗予广南东路转运司，令修筑州军城濠，以防范交趾军入侵。

郭逵、赵离统兵南征至长沙（今属湖南），先遣军将领兵收复邕州、廉州。随后大军入广西，进兵广源州，交趾守将刘应纪献城投降。至九月，宋军收复广南西路全部失地。十一月，宋帝赵顼再次下诏，令宋军继续反击交趾军。在宋军打击下，交趾军节节败退，逃回交趾国。十二月，郭逵、赵率军进入交趾境内。李乾德于决里隘屯聚重兵，以阻截宋军进攻。宋军攻隘，交趾军以象军迎击，宋兵以强弩射象，以刀砍象鼻，击退象军的进攻，遂乘胜反击，大败交趾军，攻占决里隘。

决里隘失守，李乾德又令交趾兵于夹口隘设伏。宋军绕过夹口隘，越兜顶岭向南推进，相继攻陷桄榔、门州等重镇，直抵富良江（今红河）北岸，距交趾国都城交州（治今越南河内）仅90里。然因无船渡河，欲战不得，而与交趾军隔河相峙。郭逵设伏兵于北岸，仅以少量将兵隔河邀战。交趾兵见宋军兵微将寡，发兵数万过江来战。郭逵指挥宋军发起勐烈攻势，伏兵出击，与交趾军激烈交战。此战，交趾军死伤无计，其王子李洪直亦为宋兵所杀，大将阮合被生擒，李乾德损兵折将，走投无路，只得向宋廷奉表乞降。

其时，宋军随军兵夫30万人，负责运送军粮给养。时值酷暑，交趾又多瘴地，兵夫多染病，死者过半。郭逵因此被迫撤兵，而交趾国亦不敢窥测宋境，只得恢复每年入朝贡献方物，广南西路遂得安宁。

注释①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一三。

②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三○③④⑤《宋史》卷二九○《狄青传》。

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一。

第二十八章

熙河之役宋治平四年（西夏拱化五年，1067）正月，宋帝赵曙病故，谥号英宗，太子赵顼（劝旭）继位，是为宋神宗。其时，宋廷内忧外患，辽与西夏交相侵扰，赵顼急欲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朝廷有识之士亦希望富国强兵，革除朝政之弊逐渐成为潮流。

宋熙宁元年（1068），建昌军司理参军王韶入朝，上《平戎策》3篇。王韶（1030—1081），字子纯，江州德安（今属江西）人。早年因试制科未中，客游陕西，访采边事，故对宋夏关系及西夏扰边侵疆颇为熟知。他在《平戎策》中指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治今甘肃临夏东北）、湟（治今青海乐都），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因而建议先招谕吐蕃确氏贵族，使率其部族居于河西，"为汉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无所链接"①。赵顼对其所言颇感惊奇，令召其入官，详细询问治边方略，随即委他为管勾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

蕃部首领俞龙珂的部众于青唐羌（吐蕃族的一支）诸部中势力最为强大，渭源羌（吐蕃族的一支）与西夏都竭力拉拢他，欲使之隶属于自己。宋秦凤路经略司诸将力主发兵先征讨俞龙珂部，王韶正巡视边境，遂亲率数骑人吐蕃境，直抵俞龙，珂帐下，向他申明成败大义，招谕其归顺宋廷。直交谈到深夜，索性留宿其帐中。次日凌晨，王韶将返回，俞龙珂等即遣其首领随王韶赴宋境。以后，俞龙珂又率其部众12万人内附。

宋熙宁二年（1069）十月，王韶主张修筑渭州（治今甘肃平凉）、泾州（治今甘肃泾川西北）上下两城，以屯驻军队，安抚、招纳居住于洮州（治今甘肃临潭）、河州的叶蕃各部落。此议交泰凤路经略使李师中再议，李师中则以为不可，认为："今修筑必广发兵，大张声势，及令蕃部纳土，招弓箭手，恐西蕃及洮河、武胜军部族生疑。"因而他主张："今不若先招抚青唐（今青海西宁）、武胜及洮、河诸族，则西蕃族必乞修城寨，因其所欲，量发兵筑城堡，以示断绝夏人抄略之患，部人必归心。"②李师中之议遭宋帝反对，遂下诏，罢免其经略使职。

王韶又主张“渭源至秦州（治今甘肃天水），良田不耕者万顷，愿置市易司，颇笼商贾之利，取其赢以治田”③，请求官府贷钱为本。赵顼从其所请，下诏令秦风路经略司将益州（治今四川成都）交子务钱交予王韶，且令他提举市易司。李师中又上奏以为不可。宋同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则力主王韶之议，遂削李师中职，贬为知舒州。另以窦舜卿接替，且派李若愚核实王韶募人耕种缘边土地情况。李若愚到边境，向王韶询问耕田所在，王韶无言以对。窦舜卿又查寻文簿，仅得垦田一顷，然而该地主人对此有诉讼，只得将地归还本人。为此，李若愚上奏朝廷，称王韶欺诈。王安石又将窦舜卿罢免，再改任韩缜。韩缜则附会此事，谎报耕田。于是王韶又升任太子中允、秘阁校理。其后鄜延路（治今陕西延安）统帅郭逵亦上奏，称王韶贪污秦凤经略司所贷市易钱。王安石认为是无稽之谈，而将郭逵改任为镇泾原。正是在宰相王安石的全力支持下，王韶方得以排除众议，悉心经略河、湟，扭转了西部的战局。

赵顼决意收复河州、陇州（治今陕西陇县），下令筑古渭城为通远军，委王韶为知军事。宋熙宁四年（1071）八月，宋廷置洮河安抚司，令王韶为长官，开始经营河湟地区。熙宁五年（1072）七月，王韶率军进击河、湟地区吐蕃部，筑城渭源堡及乞神平。吐蕃蒙罗角、抹耳水巴等吐蕃部据守险要，以迎击宋军。宋军诸将欲于平坦之地布阵，与吐蕃军交战。王韶则认为：“贼不舍险来斗，则我师必徙归。今已入险地，当使险为吾有。”④乃指挥宋兵直趋抹邦山，居高临下，压敌军而阵。王韶告诫众将士：“敢言退者斩!”未几，吐蕃部兵向宋军阵营发起勐攻。宋军虽奋力抵抗，仍稍有后退。王韶见状，亲自挽弓，披挂上阵，指挥帐下卫兵迎击敌兵。吐蕃部兵大溃而逃，遂焚毁其庐帐。宋军大捷，洮西地区为之大震。

吐蕃瞎征部闻宋军来攻，即起兵援应蒙罗角、抹耳水巴部。方渡洮水，即遇溃败之兵，瞎征遂聚集溃兵，欲迎击宋军。王韶令其别将大张旗鼓，自竹牛岭进军，而自己则率兵悄悄越过武胜（今甘肃临洮）。王韶领兵进击，与瞎征首领瞎药所部遭遇，宋兵勇猛冲击，再大败之。随后，王韶令兵士于此筑武胜城，建成镇洮军。城成，瞎征集部兵来攻，宋军再击败之，且收降其部众2万，余众溃逃而去。王韶此次出击，屡败吐蕃部兵，拓地1200余里，收降吐蕃部众30余万口。宋廷论王韶之功，进为右正言、集贤殿修撰。不久，赵顼令镇洮军更名为熙州（治今

甘肃临洮），且将熙州、河州、洮州、岷州（治今甘肃岷县）四州以及通远军（今甘肃陇西）合为一路，置熙河路，治所设于熙州，王韶则以龙图阁待制知熙州，又进为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然而其时河、洮、岷三州犹未收复。

宋熙宁六年（1073）二月，王韶统兵进击河州。于击败吐蕃兵后，占领河州。不久，宋军收降的吐蕃部众复又反叛，王韶立刻率兵返熙州平息叛乱。瞎征乘宋军大部撤离之机，重新占据河州。王韶闻讯，又领兵回击，攻克诃诺木藏城，穿越露骨山，南入洮州境。宋军进兵所经之地，山地崎岖，道路狭窄，马不能行。王韶遂令兵士下马步行，因此进军缓慢。瞎征认为有机可乘，遂留下部分兵士戍守河州，自己率兵尾随宋军，寻机进攻。王韶令宋军与之激战，终击退追兵，瞎征再度败逃，宋军又乘胜收复河州。九月，王韶率军又连续攻占岷州、宕州（治今甘肃岷县西南）二州，洮州、迭州（治今青海西宁）的吐蕃首领相继献城宋熙宁通宝降宋。此次王韶出兵连续行军54天，长途跋涉1800里，尽据河、岷、宕、洮、迭五州之地，斩首数千级，缴获牛、羊、马匹以万计。先后“招抚大小蕃族30余万帐”⑤，其所经营的河湟地区，幅员已达2000余里。宋廷为王韶所取得的胜利大为振奋，百官人朝向宋帝祝贺，赵顼甚至解下自己所佩玉带，赠予王安石，同时升任王韶为左谏议大夫、端明端学士。次年，又召王韶入朝，加资政殿学士，且赐第崇仁坊。

宋熙宁七年（1074）二月，宋知河州景思立与吐蕃部将青宜结鬼章战于踏白城，宋军不敌，战败，景思立亦为吐蕃兵所杀。青宜结鬼章遂率兵进围河州。一时间，吐蕃气焰复炽，吐蕃部将木征亦率兵围攻岷州。宋军处境极为危急，宋朝臣甚至主张放弃熙河路，赵顼也感到左右为难，而下诏告诫王韶坚守城池，持重勿出。

王韶返回熙河，行至兴平年（今属陕西），即闻景思立兵败，河州遭围攻，遂日夜兼程，急驰至熙州。熙州守将方部署城防，欲守城御敌。王韶入城，下令撤除城防，乃选精兵2万，与诸将商议进兵去向。诸将认为当进兵河州，夺回城池。王韶向众将分析道：“贼所以围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设伏待我，且新胜气锐，未可与争。当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⑥遂领兵直奔定羌城，拔之。又击败吐蕃结河部，

切断吐蕃与西夏国的信道。继而又兵进宁河，分兵令偏将统领出南山，彻底扫除吐蕃设于河州外围的援兵。瞎征正围攻河州，见援军相继为宋军击败，料河州难以破城，只得拔寨而去。围攻岷州的木征部，亦为宋将高遵裕击败。撤围而走。宋廷得知王韶击退吐蕃军，熙河路安然无恙，极为欣喜。

王韶还师熙州，随即派兵沿西山，绕至踏白城后，袭击集结于此处的瞎征部众，焚毁其8000余帐。瞎征见大势已去，走投无路，只得向宋军乞降，宋兵俘获瞎征，熙河路自此稍得安宁。

熙河之役为北宋建国以来，对外用兵的一次重大胜利，使北宋重新据有河湟之地。王韶亦因此再擢升为观文殿学士、礼部侍郎。未几，复召为枢密副使。然而，其后因与宰相王安石及赵顼有隙，遂罢职遭贬。

注释①《宋史》卷三二八《王韶传》。

②《宋史》卷三三二《李师中传》。

③④《宋史》卷三二八《王韶传》。

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七。

⑥《宋史》卷三二八《王韶传》。

熙宁新法宋帝赵祯庆历年间的“新政”失败后，守旧势力再度控制朝政，在“守内虚外”的基本国策下，宋朝统治集团依旧将“内忧”置于首要的地位，致使自宋初以来百年间的种种弊政不断加剧，尤其是“三冗三费”问题日趋严重。宋廷官僚机构在赵祯在位时已是极为庞大，通过恩荫（任子）、科举、军功、进纳、胥吏出职等多种途径均可入仕。宋真宗时，文武百官约为9700员，至赵祯皇韦占年间（1049　~1054），已增至17000余员，其中尚不包括未被差遣的京官、使臣及选人等。其后竟高达24000余员。宋初，全国总兵力约40余万，分为禁军、厢军、乡军、蕃军，之后为守卫京师之需，不断加强禁军，又以募兵养兵之制，防范饥民的骚乱，于是军队数量巨增，赵祯时，仅禁军即达80万人，总兵力高达140余万。冗官、冗兵，加之挥霍浪费，开支无度，又导致宋

廷年度支出逐年勐增。宋太宗至道三年（997），朝廷岁入2224余万余缗，当年尚有大半节余。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岁入15085余万缗，岁支出12677余万缗，尚余2407万缗。赵祯皇枯元年（1049），岁入12625余万缗，“而所出无余”①。到英宗赵曙治平二年（1065）时，岁入11613余万缗，岁支出12034余万缗，又有非常支出1152余万缗，当年即亏1573余万缗。朝廷收人逐年减少，而支出却有增无已，亏空数额逐年扩大，“累世所藏，几乎扫地”②。

为解决朝廷府库入不敷出的窘困境地，宋廷便采取搜刮盘剥百姓财富的办法，不断增加赋税徭役。赋税中除保留前代的“二税（田税）”外，又有“加耗”、义仓税、身丁税、杂变税、支移折变等诸多名目。徭役之外，尚有差役（职役），城市中则有“科配”。如此繁重的赋役已使社会中下层百姓难以应付，而宋廷又“不抑兼并”。宋太祖赵匡胤认为：“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③。宋初以后，土地兼并亦不断加剧，“地各有主，户或无田产，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④。这不仅使下层百姓丧失土地而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造成社会贫富差距的进一步加剧，又影响到朝廷赋税收入的增加，更使已十分尖锐的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各地农民抗税、杀贪官污吏及豪强地主等反抗斗争连绵不断。宋朝统治危机四伏。

边境局势亦风波不止。虽有“澶渊之盟”，宋辽之间再未发生大的战争，但西夏倚契丹为援，侵边不止，辽亦借西夏之势邀索不已。辽、夏两国自北、西北二方构成“犄角之势”，夹困宋朝，亦加重了宋朝统治者的“外忧”之感。

“外忧内患”与人不敷出更清楚地显现出宋朝的“积贫积弱”国势。为扭转这一局面，继“庆历新政”之后，又有一些官僚对原有的制度进行了某些变更。庆历八年（1048），陕西转运使李参为解决当地驻军粮草不足的困难，于百姓春荒之时，“令自度谷麦之人，予贷以官钱，谷麦熟则偿，谓之‘青苗钱’”⑤，即由官府借贷帮助生产。到皇祐占五年（1053），当地军粮已自给有余。两浙转运使李复圭等曾改差役为募役，个别地区亦实行过令民户代官府养马，以解决军马之需。这些措施的实行，都收到一定的成效。

嘉枯八年（1063）三月，赵祯病逝，庙号仁宗，其继子赵曙即位，是为英宗。皇帝的更替，给“庆历新政”后受沉闷保守的政治气氛压抑的改革派势力带来希望。面对仁宗遗留下的弊政，赵曙也提出“积弊甚众，何以裁救”⑥的看法，流露出“更张”的意图。但仁宗的曹皇后此时以太后身伤垂帘听政，她认为“祖宗法度不易轻改”。对赵曙的言行极为不满，处处加以提防，甚至“权同处分军国事”。曹太后的党羽秉承其意图，亦与赵曙处处为难。一度太后与赵曙间矛盾重重，赵曙为之气恼，口出“太后待我无恩”⑦之语。后经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韩琦、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人的劝解，母子间的关系稍有缓和，曹太后遂还政于赵曙。但在此过程中，枢密使富弼未介入，恐赵曙执政于已不利，又对韩琦耿耿于怀，竟辞官而去。刚刚执政的赵曙原本身体多病，又见辅臣间如此勾心斗角，不禁忧虑重重，终未及有所作为，即于治平四年（1067）正月病故。其子年仅20岁的赵顼即位，是为神宗。

赵顼“性气越紧，尤欲更新之”⑧即位前，即常与侍臣议论天下大事，对真宗、仁宗之时的朝政弊端深感其危害，有意革除。及即位后，更欲有所作为，想效仿唐太宗，也希望自己的身边能有像魏征那样直言敢谏的辅臣，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赵顼选中了王安石。

王安石像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自幼随其父赴任而辗转南北，且百家诸子之书，无所不读。中进士第后充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七年，任鄞县（今浙江宁波）知事。此后历任舒州（治今安徽潜山）通判、开封（今属河南）群牧司判官。嘉枯二年（1057），调任常州（今属江苏）知州。次年，调任江南东路提点刑狱。未几，召为三司度支判官。多年在地方任官的经历，使他更多地接触和了解社会，尤其是对社会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深感忧虑，由此进一步认识到宋朝的统治“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据此，王安石向宋帝赵祯呈《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即《万言书》）⑨，主张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改革，以彻底扭转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在《万言书》中，王安石明确指出宋朝统治的时弊及改革之策。首先是吏治败坏，官吏多为“不才苟简贪鄙之人”、“奸悍无赖”之徒。学校传授仅“讲说章句而已”，实属“无补之学”。科举选士、恩荫任子而步入仕途者，不懂治世之道，“无用于世”，故需革除其弊端，从地方上选拔治世人才。其次，官吏侵渔百姓，尤其是下层官吏俸禄微薄，“委法受

赂，侵牟百姓，往往而是”，故需发展生产增加财税收入，“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因此改弦更加迫在眉睫。王安石以历史为鉴，指出“盖汉之张角，三十六方同日而起，而所在郡国莫能发其谋；唐之黄巢，横行天下，而所至将吏无敢与之抗者。汉唐之所以亡，祸自此始”。他疾呼道：“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王安石的此番改革主张，并来受到赵祯及在朝宰执的重视，奏书上呈，竟石沉大海。六年，王安石充任知制诰，仅负责为宋帝起草文书、诰令。虽然他的改革主张未被采用，却因此受到要求改革的士大夫们的推崇和敬重，引起社会的重视，王安石的声望日渐提高，企盼改革的士大夫将厚望寄托于他的身上，期待他登台执行，推行改革。

赵曙在位时，王安石感到变法尚未成熟，故借母亲病故，居丧金陵（今江苏南京），屡召不起，而于家中收徒讲学，宣传自己的变法思想和主张，这为其后的变法实际培养了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此时尚未继位的太子赵顼却很赞赏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极想与他当面交谈，商议治国之道。及赵顼即位之初，即于熙宁元年（1068），起用王安石充知江宁府，不久，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从此，王安石便同年轻的宋帝赵顼一道议论治国之道，悉述自己改弦更张的主张，深得赵顼赏识，要求他“可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⑩。与此同时，官僚集团中及社会上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独负天下盛名的王安石已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不过，赵顼起初仍不敢重用他，而仍想得到富弼等一批旧僚老臣的支持。但当赵顼即位后召见富弼，商议治世之道时，得到的却是消极悲观的回答，不禁大失所望，遂于熙宁二年（1069），令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为使改革得以推行，宋廷专置制置三司条例司，以吕惠卿主其事，章惇为编修三司条例官，曾布为检正中书五房公事。三年，王安石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其“变风俗，立法度”思想的指导下，终于形成了宋帝赵顼熙宁年间的变法高潮。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旨在“修吾政刑，使将吏称职，财谷富，兵强而已”，即富国强兵，以此扭转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其为富国而推行的新法是以发展生产，充实朝廷府库为先，自理财入手，“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方面，陆续颁行了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均输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免行法、矿税抽

分制等一系列新法。军事制度方面的改革主要有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军器监等新法，以提高兵将的素质和军队的战斗力，改变对辽、西夏在军事上的被动局面。为推进改革，培养人才，王安石对科举制度、中央及州县学校也进行了必要的改革，颁行贡举新制，以经义取士；令太学实行“三舍法”，“取学行卓然尤异者”，“取旨除官”。王安石认为“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故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为统一思想，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以及《诗义》、《书义》，合称《三经新义》，于熙宁八年（1075）颁行学校，作为教材，并以此为科举考试的依据和选官的参考。其间，又重置武学，新建律学，改建太医局，以适应各种专门人才的培养和社会所需。

王安石及其改革派官僚所实行的变法虽是维护和加强宋朝的统治，但所行“新法”也不可避免地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因此，新法一提出，便遭致以两宫太后、皇亲国戚、老臣旧僚等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他们串通一气，共同指责、抨击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及其新法，甚至向宋帝赵顼施加压力，迫使废止新法，因而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自始至终都极为激烈。翰林学士司马光为首的一批朝廷内外官僚，更是不择手段诋毁改革派，造谣生事。判大名府韩琦为反对实行青苗法，上奏宋帝称此法是“官放息钱”，并谎称百姓亦不愿请贷青苗钱。赵顼看后，却认为“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审”。王安石虽据理力争，仍无法解除赵顼的疑虑。且赵顼的动摇，已严重影响到改革的进行，王安石无奈，只好称病，请求辞职。赵顼虽对变法左右摇摆，但最终还是希望能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故只得挽留王安石继续执政。不过与改革之初的态度相比，赵顼对王安石的信任与支持已明显减弱，变法面临着更大的阻力与危险。六年，免行法颁行后，皇亲国戚及宦官因其恣意勒索受到限制，再度掀起反对变法的高潮，赵顼也因此更摇摆不定，甚至亲自出面阻止免行法的实行。在此形势下，改革派官僚中也有人畏缩不前，附和守旧势力，抵制变法，排挤王安石。七年初，天下干旱，反对派利用天灾攻击变法，向赵顼上《流民图》，诬蔑“王安石变乱天下”，赵顼因此“流涕退，命安石议裁损之”。王安石感到新法难行，自己已无法继续执政，遂恳请辞官。四月，王安石被罢去宰相职，出任江宁府。

王安石辞相后，曾推举韩绛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吕惠卿为参知政

事。但吕惠卿却未继续推行变法，而是标新立异，结果“民不胜其困”。更为甚者，他唯恐王安石复相，威胁自己的宰执地位，便于朝中处处争权，从不将韩绛放在眼里。吕惠卿的倒行逆施，引起朝野人士的极大不满，一时间，“天下之人，复思荆公（王安石）”。韩绛借机向赵顼请求召王安石返朝，恢复宰相之职，以继续推行变法。八年（1075）二月，赵顼采纳韩绛的建议，重新起用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接到诏令，立即赴开封就职。

王安石复相后，重又恢复新法，以期尽快富国强兵。可此时变法更是困难重重，改革派内部的分裂愈演愈烈，吕惠卿非但不支持和协助王安石推行新法，反而寻机打击、诽谤。六月，王安石因患疾，赵顼为使其养病，特许他少预政事。然而吕惠卿却上奏称他“屡称病不治事，积事以委臣”，公开与王安石对抗。虽然十月间，吕惠卿遭御史以不法之名弹劾，出知陈州，权三司使章惇也因受牵连遭贬，出知湖州。改革派内部的分裂已严重削弱了自身的力量，变法已难以继续推行下去。王安石对此深感忧虑，尤其是昔日的变法同僚竟釜底抽薪，更使他忧心忡忡，自认“智不足以知人，而险被常出于交游之事”。不仅如此，赵顼亦不再重视王安石的变法主张，经常不采纳他的建议，变法实际上已无法推行。九年初，王安石屡次上书，请求辞官。六月，其爱子王雱病故，使王安石受到精神上的沉重打击，“尤悲伤不堪，力请解机务”。十月，赵顼接受请求，王安石第二次被罢相，出任江宁府。但他并未上任履职。十年六月，王安石又辞去江宁府一职，从此闲居。赵煦元事占元年（1086），以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执政，废除此前推行的新法。王安石闻讯悲愤不已，四月，郁然病逝。

注释①《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上二》。

②《长编》卷一九八。

③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一。

④《长编》卷二七。

⑤《长编》卷一七四。

⑥《长编》卷二一。

⑦《宋史》卷二四二《慈圣光献曹皇后传》。

⑧《朱子语类》卷一三○。

⑨《临川先生文集》卷三九。

⑩《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

《长编》卷二二○。

《长编》卷二二七。

《长编》卷二二○。

《宋会要辑稿·食货》。

《长编纪事本末》卷六八。

《长编》卷二五二。

《宋史》卷四七一《吕惠卿传》。

《长编》卷二六○。

《长编》卷二六五。

《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三。

《长编》卷二七八。

元丰改制赵顼熙宁年间（1068—1077）颁行的由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所倡导的新法，虽经历了与守旧势力的激烈斗争，以及王安石的最终遭罢相，虽受到极大的冲击，但并未完全废止。王安石罢相出朝后，在赵顼的主持下，新法仍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推行。元丰元年（1078），赵顼曾以王安石为尚左仆射、舒国公、集禧观使，仍有延续变法之意。

直到元丰八年（1085），赵顼去世前，熙宁新法的主要措施仍在执行，部分内容又作了变更，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官制的改革。

自宋初以来，为加强君主专制统治，采取分割相权的办法，军、财、民三权分立，使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权，又置副职与长官相互制约，以此削弱各部门长官的权力，使皇帝得以独断专行。但因此造成官僚机构重叠，官署职掌纷繁，又相互交插。而机构既无定员，又无专职，出现众多徒有虚名却无职事的冗闲官署及官员。加之官、职、差遣分离的官僚体制，又造成莅其官位而不履其职的现象，官称与实际职掌往往相悖，互相推诿，办事效率低下。熙宁年间，王安石虽对一些闲散机构进行了调整，并新设一些机构，以利新法的推行，但未彻底改变官职分离、混乱的局面。且王安石主持变法，重在发展生产，提高军队战斗力对官僚机构的弊端也未过多涉及，仅认为各机构能复其职掌即可，故官制固有的问题依旧十分严重。赵顼对此深感不便，遂执意对官制进行改革。

熙宁十年（1077），赵顼诏令校勘《唐六典》，以此作为官制改革的参考和依据。元丰三年（1080），又诏令中书省详定官制。在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硅、参知政事蔡确等人的协助下，赵顼着手改革官制。

宋初于宫城内设置中书门下，是为中枢最高官署，亦为正副宰相集体处理政务的最高权力机构：又称为政事堂，简称中书，又称中书门下内省。与枢密院分掌政、军大权，号称“二府”。中书门下长官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为宰相之分散。其事权，又置参知政事为副宰相。赵顼改制，罢中书门下，其职掌分归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废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但三省不设中书令、侍中、尚书令，而以尚书左、右仆射为正宰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之职，为左相；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之职，为右相。恢复唐朝“中书取旨，门下复奏，尚书施行”之制，实际权归中书，为右相所握。改参知政事为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和尚书左、右丞，同为副宰相。原宰相处理政务之所遂移至尚书省，改称都堂。

枢密院仍为最高军事机构，但废枢密使、副使，长官改为知枢密院事，副长官为同知枢密院事，同为执政。与三省长官合称为宰执，是为

宋廷的最高宰辅官僚。

同年八月，赵顼下诏，令凡省、台、寺、监领空名者一切罢去，而使各机构有固定的职掌，有定编、定员，因而许多机构被裁减或合并。宋初置盐铁、废度、户部三部，合称“三司”，是为宋廷主管财政的最高机构，长官为三司使，号称“计相”。赵顼撤销三司，将其大部职权归入户部与工部，又将审官院并入吏部，审刑院划归刑部。在此基础上，充实和加强了六部的职权。

赵顼改革官制的重要内容是“正名责实”，即改定“寄禄官”制度。宋初虽沿袭唐代三省六部制，然其官名仅为官阶之用，是为虚衔，用以定品秩、俸禄、章服及序迁，因此称为“阶官”，亦称“寄禄官”。元丰改制，将原有的文官散阶由29阶改为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共24阶，作为新的寄禄官阶，定为《元丰寄禄格》，此后官员升迁、领取俸禄，一律依照新定寄禄“以阶易官”。而原寄禄官阶中的三省六部官名，则恢复其实际的职掌，使官、职相符相称。

赵顼对官制所进行的改革，确实裁减、撤并了一些冗闲官员和冗散机构，这使得宋廷每年可节省2万缗的开支，赵顼因此而感到满意。但改革仅对机构设置作了某些调整，官职、差遣，相权分离，相互牵制的基本政策并未得到彻底的改变，官僚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下的局面依然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又使赵顼有些后悔。

在官制改革的同时，赵顼又从强兵入手，以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亦对原有的兵制进行了局部的改革。为加强京城开封地区和西北边疆地的防御和战斗力，元丰二年（1073）十一月，先于开封府界试行“集教法”，即将开封府所属各县2800多名大保长集中于11处教场，每10人组成一个单位，由一名禁军教头负责操练，传习武艺。次年，待大保长们武艺学成后，宋廷又推行“团教法”，即将每一都保的保丁分为五团，每团分别由一名大保长担任教头，训练保丁，教授武艺。此举对维持地方治安，防范盗贼，协助地方官府捕盗，亦有积极作用。

四年，宋廷又改河北东路、河北西路、河东路、永兴路、秦凤路等5路的义勇兵为保甲，随即将“集教法”与“团教法”推行于上述地区，经过

一年多的严格训练，使多达69万余保丁掌握了一定的武艺。

熙宁年间推行的保马法，在元丰年间也作了一些变更。宋廷规定，城镇坊郭户家产及3000缗，乡村户家产及5000缗者，须养马一匹。如家产超过所定标准一倍者，则须增加养马一匹，但最多可养马3匹。这不同于由官府发给监马或给钱令养马户自行购养的保马法，而是将马交由拥有一定家产的物力户承养，故称物力户养马法，简称户马法。此法主要推行于开封府界、京东路、京西路、河北路、河东路、陕西路等地区，并收到一定的成效。元丰七年，宋廷又于京东和京西两地推行另一种养马法，规定每一都保须养马50匹，称为都保养马法。这两种养马法，与熙宁变法中的保马法相比，虽具体的做法有所区别，但基本内容都是交由民间养马，旨在扩大养马的范围，为军队提供更多的马匹。

与此同时，赵顼对宋朝军队的主力军——禁军的数量也作了调整，扩充了这支正规军队的编制，使总人数由熙宁间的56万余人，增加到61万余人。

不过，元丰年间所行新法中也有与熙宁新法相悖之处。为了增加朝廷收入，宋廷又借推行新法之机，随意敲诈勒索，原行免役法中规定，州县官府出钱募人充役，所需募役费用按户资产多募，划等级征收，内又分免役钱和助役钱。元丰年间再行募役法，则采取扩大免役钱、助役钱的征收范围的办法。两浙路即不按原法规定，以降低承担役钱的标准多收役钱。原定“坊郭户”家产不足二百千者，可以不交纳助役钱，此时则将征收助役钱的家产最低征收限额降至五十千，仅此一策，即使众多家资微薄的民户承担纳募役钱的义务，所以尽管“雇役不加多，而岁入比前增广”①。到元丰七年，所征收的募役钱，竟比熙宁年间多收入三分之一。募役法当为便民之法，然而此时所行则又为扰民之举。

赵顼继王安石之后主持的元丰年间的改制与变法，目的仍是为了富国强兵。但他对改革的态度远不及王安石坚决，尤其是不敢触及权贵及大地主的利益。每遇守旧势力的反对，他即犹豫不决，摇摆不定，甚至放弃改革，这使得新法无法贯彻始终，所以收效甚微。赵顼既避免触犯权势的利益，只能千方百计从百姓身上攫取财富。赵顼在位年间，宋廷每年征收二税、青苗、免役、市易等赋税达6000余万贯，比英宗嘉祐年

间的3680余万贯增加了2300余万贯。赵顼还于宫中特设元丰库，储存岁入积剩钱物，仅元丰五年，元丰库即收进坊场各剩钱500万贯，常平钱800万贯。经过熙宁到元丰年间的变法与改革，朝廷收入确有很大的增加。基本扭转了英宗时入不敷出的亏空局面。不过，同时百姓所遭受的盘剥也更加严重了。

注释①《宋史》卷一七七《食货志》。元祐更化王安石主持变法时，由元老重臣和一些士大夫组成的守旧派因反对变法而多被逐出朝廷。赵顼即帝位之初，曾尊其母高氏为皇太后，其祖母曹氏为太皇太后，曹氏为宋开国元勋曹彬的后代，高氏则为太宗时名将高琼的后代，两家均为高门贵族，她们从自身利益出发，也强烈反对“改弦更张”。为了限制皇亲国戚的某些特权，王安石变法时曾制定了一些政策。熙宁二年（1069），颁定《裁宗室授官法》，规定“唯宣祖、太祖、太宗之子孙，择其后各封国公，世世不绝，其余元孙之子，将军以下听出外官；袒免之子，更不赐名授官，许令应举”。三年，“再裁定后、妃、公主及臣僚荫补恩泽”①。这一举措对世代享受特权的皇亲国戚及其子弟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于是“宗子相率马首陈状，诉云：‘均是宗庙子孙，且告相公，看祖宗面’。荆公（即王安石）厉声曰：‘祖宗亲尽，亦须祧迁，何况贤辈尸’”。②太皇太后曹氏与皇太后高氏更是痛哭流涕地劝说赵顼：“祖宗法度，不宜轻改。民间甚苦青苗、助役，宜悉罢之。王安石变乱天下，怨之者甚众，不若暂出之于外。”③在王安石的一再解释和坚持下，赵顼才未采纳守旧派的意见，新法得以继续推行。

元丰八年（1085）三月。赵顼病逝，庙号神宗。皇太子赵煦即位，是为哲宗，逾年改元“元枯”。是年赵煦尚不满10岁，赵顼时的宣仁太后高氏又以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她一主持朝政，立即起用反对熙宁新法的守旧势力，任命了一批守旧派的核心人物，以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公着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两人同为宰相。又以元老重臣文彦博为平章军国重事。在宣仁太后的支持下，司马光又任用刘挚、范纯仁、范祖禹、吕大防等人，结成一个势力强大的守旧派官僚集团。在宣仁太后“以恢复祖宗法度为先务”的旨意下，司马光打着“以母（宣仁太后）改子（宋神宗）”的旗号，攻击熙宁新法。司马光首先将矛头对准王安石，诬蔑“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④。继而否定新法，指责变法是“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

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⑤。为了堵塞言路，进一步排挤和迫害变法派官僚，司马光令刘挚、王岩叟等人充任侍御史、监察御史等要职，从而控制了专事监察纠劾百官的重要机构——御史台，让他们对变法派提出弹劾。由此掀起反对和废止变法的狂潮。

司马光首先废除免役法，而恢复旧有的差役法。元祐元年（1086）正月，他两次上奏阐述自己的主张，然而在对比二法利弊时，却又举不出免役法的弊端，或称免役法使“上户年年出钱，无有休息”⑥，或云“彼免役钱虽于下户困苦，而上户优便”⑦，自相矛盾，漏洞百出。实在无法，司马光又说：“凡法久则难变。此法行之已十五年，下户虽愁苦，上户颇优便，常情议论已是非不一，若不于此时决志改之，恐异日遂为万世膏肓之疾，公家不得民力，贫民常苦，富民优矣。”为达此目的，他竟不惜哀求臣僚赞同此举，“光观欲作一文字奏闻，若降至三省，望诸公同心协力与赞成。如此行之，可以降久弊，苏疲民”⑧。司马光的行径，激起了朝中变法派官僚的不满和抵制。知枢密院事章惇说他“旬日之间，两人札子，而所言上户利害正相反，未审因何违戾乃尔!”司马光称：“民间疾苦，所降出者约数千章，无有不言免役之害者，足知其为天下之公患无疑。”⑨章惇则上疏奏说：“臣着详臣民《封事》降出者，言免役不便者固多，然其间言免役之法为便者亦自不少，但司马光以其所言异己，不为签出，盖非人人皆言免役为害，事理分明。”⑩造谣不成，司成光又称免役法实行后，“驱迫贫民，剥肤椎髓；家产既尽，流移无归，弱者转死沟壑，强者取为资贼”。章惇指出：“自行法以来十五余年，未闻民间因纳免役钱有如此事。”尽管司马光竭尽造谣中伤之能势，可却被章惇“一一捉住病痛，敲点出来”，这就招致守旧派的憎恨与报复，他们利用控制的台谏官对章惇进行攻击，直至将他罢官，贬出朝廷，出任知汝州，最后赋闲家居方才罢休。

在司马光等人的独断专横下，免役法终被废止，重行差役法。知开封府蔡京秉承司马光旨意，令下仅5日，即在辖境内全面恢复差役法，具扰民之害远远胜熙宁之前。此后，司马光又提出其他新法均应废罢，这一论调不仅变法派官僚反对，就连守旧派官员也难以接受，苏轼、苏辙兄弟等人就曾公开表示不赞成司马光的这一做法，其他许多官员也都先后上书，表示对废止新法的异议。至于民间百姓更是不愿恢复旧法，“天下皆思雇役（即免役）而厌差役”。但这一切丝毫没有改变司马

光的作法，继元牛八年明令废罢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甲法等新法后，元韦占元年又继续罢止青苗法，免役法等。

在废止新法的同时，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变本加厉地迫害变法派及支持变法的官僚。除章惇外，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及一批官员先后遭排挤和打击，或贬或逐。守旧派罗织罪名，企图将他们置于死地。元枯四年（1089），守旧派将蔡确所作《东盖亭诗》引申评论，认为是讥讪宣仁太后，在此罪名之下，蔡确终被贬死于新州（治今广东新兴）。不仅如此，守旧派还将近百名变法派官员的名字分列于王安石、吕惠聊、蔡确的名下，冠以“亲党”之称，“榜之朝堂”，使他们永远不许重返仕途。这一系列的打击和迫害，令变法派官僚人心惶惶，被贬至建州（治今福建建瓯）的吕惠卿在谪籍9年之中，竟连一口冷水都不敢喝，唯恐因此患病，而受守旧诬蔑，指责自己悲戚愁叹。

守旧派对待新法和变法派可谓痛恨之极，但面对西夏的讹诈却又俯首贴耳。宋神宗时，宋廷大举发兵，两度征伐西夏，虽战场上失利，但战后，宋廷于宋夏边境要冲之地，建起塞门、安疆、葭芦、浮图、米脂等寨堡，从而加强了对西夏的防御工事，遏制西夏军队的进犯，也对西夏构成一定的威胁。神宗之后，西夏认为有机可乘，遂于元祐元年派使臣入宋，提出归还失地的要求。司马光和文彦博却不顾群臣反对，“只欲卑弱请和”，硬将安疆、葭芦、浮图、米脂4寨拱手送与西夏，以此换取一时的苟安。

元祐元年正月，司马光病重时，新法尚有部分未予废罢，为此他叹息道：“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他一面将废除新法的重任托付给吕公着，一面则抱病上奏，以求尽快悉废新法，“其意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也”。守旧派的倒行逆施，一意孤行，引起朝野人士的普遍不满，希望司马光等人能以社稷为重，悉心辅佐宋帝赵煦，但这均无济于事。司马光虽为相一年后即病逝，但执政的宣仁太后依旧推行废止新法，恢复旧法的举措。直至元祐八年（1093）九月病逝，在整整的8年之中，司马光及其后继者全部废除了熙宁年间颁行的新法，史称“元祐更化”。这些守旧派官僚除依附于宣仁太后，有恃无恐外，几乎无视小皇帝赵煦，引起他极大的不满。待宣仁太后病故，赵煦亲政，遂再度起用变法派。严厉打击守旧派官僚，“元祐更化”终遭罢止。

注释①《皇宋编年备要》卷一八。

②陆游《老学庵笔记》。

③《长编》卷二五二。

④《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七。

⑤《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六。

⑥《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九。

⑦《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

⑧参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

⑨⑩《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九。

《长编》卷三六七。

《朱子语类》卷一三○。

苏辙《栾城集》卷四三。

《朱子语类》卷一三○。

《长编》卷三五五。

《长编》卷三九四。

第二十九章

洛蜀朔党争宋元丰八年（1085）三月，赵顼病故，年仅10岁的幼子赵煦继位，是为哲宗。英宗的皇后、神宗赵顼的母亲宣仁太后高氏又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处理军国大事。她早就对熙宁新法不满，临朝称制后，立刻纠集和起用反对新法的守旧派官僚，在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吕公着、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等元老重臣的主持下，不仅废罢了熙宁新法，又对变法派官员进行打击和迫害，或贬赵煦官出朝，或罢官免职，一时间保守势力气焰嚣张，变法派人人自危。然而，司马光等人的倒行逆施，不仅引起朝野变法派的反对，也激起守旧派内部一些官僚的不满，尤其是司马光“其意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①的一概否定新法的作法，曾招致守旧派官僚的反对。吏部尚书、同知枢密院事范纯仁在熙宁年间因反对并拒不执行新法，而被贬出朝，被司马光重新起用后，却不同意不加区别而一概废罢新法，建议“去其太甚者可矣”②。他认为推行青苗法“利国利民”，当继续实行。对于免役法，他更认为：“此法熟议缓行则不扰，急行则疏略而扰，委非其人，其扰滋甚”③。为此曾劝说司马光谨慎行事。但这一切非但未能引乾酪马光等人的重视，反而招惹不满。中书舍人苏轼也曾是一位新法激烈的反对者，复出后，亦不满司马光悉废新法，主张渐改，尤其反对废免役法，恢复差役法，甚至提出用积存的3000万贯免役宽剩钱买田，实施给田募人充役之法，这与变法派的“给田募役”是一致的。在廷议役法时，他更是明确地表示支持免役法，当面告诉司马光“罢募役而复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④。尽管已惹怒了司马光，但苏轼依然抗争不已，“上疏极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变”⑤。就连吕公着也提出新法不宜全废，对其小的弊端应予以矫正而后复行。其他又如中书舍人范百禄、兵部尚书王存、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等一批为司马光所重用的守旧派官僚也都不同程度地反对司马光的做法，或主张推行部分新法，甚至上疏陈述复行旧法的种种弊端。

不仅在废罢新法问题上，守旧派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对待变法派官僚的态度上也绝非统一。范纯仁曾不满于对变法派的残酷打击与

迫害，认为这样的做法会使“吾辈将不免矣”⑥。

尽管如此，以司马光为首的最顽固的守旧派势力却对此置若罔闻，一意孤行。他们把持着朝廷大权，继续废罢新法，复行旧法，排斥打击变法派官僚。为减少废罢新法的阻力，他们甚至不放过持不同政见的守旧派官僚，秘书省正字刘安世就曾数次上疏，弹劾范纯十二、王存、李常、盛陶等人。事实上，守旧派官僚中只有御史中丞刘挚、御史王岩叟及刘安世等人完全赞同并支持司马光的主张。守旧派内部的分歧随着新法的废罢而愈演愈烈，终于酿成一场朋党之争。

元事占元年（1086）九月，宰相司马光病逝，80余岁的文彦博以“班宰相之上”⑦揽政。又擢升尚书左丞吕大防为中书侍郎，刘挚为尚书左丞，守旧派中的顽固势力继续拽政。但此时由于政见的不同及学术主张的分歧，已导致相互间的倾轧，开始分化为几个小集团，形成以崇政殿说书、河南（今河南洛阳）人程颐及其门徒、左司谏朱光庭，殿中侍御史贾易等人为首的“洛党”；以中书舍人、知制浩、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苏轼，殿中侍御史吕陶等人为首的“蜀党”；以永静东光（今河北东光）人刘挚，右谏议大夫梁焘、起居舍人兼左司谏刘安世，监察御史王岩叟为首的“朔党”。其中以把持朝政的“朔党”势力最为强大，三党之间明争暗斗，一场混战。

“洛党”首领程颐于元祐占元年以“布衣之士”为司马光、吕公着引荐入朝，后以崇政殿说书之职充任幼帝赵煦的老师，他以“师道”自居，向赵煦传授儒家正统思想，且又以“正色”训诫，主张一切复行“古礼”。司马光病故，他甚至反对朝臣于朝贺大赦之时，去吊唁司马光。他的此番言论惹起朝臣的不满，斥之为迂腐之论。苏轼更以他不近人情，所行非孔夫子之礼而屡加讥讽。朱光庭、贾易等人借口苏轼在策问中提出效法“神考之励精”而使官吏偷惰不振，效法“神考之励精”而使官吏们流于苛刻，而攻击苏轼讥讽宋仁宗赵祯不如汉文帝刘恒，宋神宗赵顼不如汉宣帝刘询，认为朝廷应以此追其罪责。苏轼同党吕陶、监察御史上官均遂反唇相讥，上疏论列朱光庭为程颐宣泄私忿，“议者皆谓轼尝戏薄程颐，光庭乃其门人，故为报怨。夫欲加轼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问以为讥谤”⑧。程颐与苏轼自此势不两立，两党间积怨日深。对此，无所偏倚的范纯仁也觉得朱光庭的上疏言辞过于偏激。但身为朔党的王岩叟却公开

偏袒程颐，这更激化了两党间的矛盾。

洛党与蜀党的争斗，其结果两败俱伤。元祐占四年（1089），苏轼辞官出朝，改任知杭州，程颐也被免去崇政殿说书一职，改充权同管勾西京国子监，而刘挚的朔党却“渔翁得利”从此独揽朝政。

是年，受谪贬而居住于安州（治今湖北安陆）的前任宰相蔡确作《东盖亭诗》十章，梁焘、刘安世将诗滥加引申评论，竟指责其讥汕宣仁太后高后，更诬陷道：“方今忠于确（蔡确）者，多于忠朝廷之士；敢为奸言者，多于敢正论之人；以此见确之气焰凶赫，根株牵连，贼化害政，为患滋大。”⑨高太后遂将蔡确自殿文殿学士贬为光禄卿，不久再贬为英州别驾，安置新州（治今广东新兴）。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也因未纠察蔡确而被改官。范纯仁为此而劝谏高太后：“圣朝宜务宽厚，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今举动宜与将来为法，此事甚不可开端也。且以重刑除恶，如以勐药治病，其过也，不能无损也。”⑩继而又与尚书左丞王存一同劝谏赵煦，退出后再度上疏，力陈不应治罪蔡确之由。然而范纯仁的力谏终未奏效，相反司谏吴安诗、正言刘安世却交章攻击他为蔡确之党，范纯仁遂力请免官辞职。次年，即罢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出任知颍昌府。

六年，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大防与尚书右仆射刘挚同为宰相，然二人因争权多有不和。御史中丞郑雍、侍御史杨畏依附于吕大防，交相上奏，以刘挚有“第往以俟休复”之语，意指“他日太皇太后复子明辟”，又奏劾他与蔡确、章惇、梁焘等人交结，“为牢笼之计，以冀后祸”。高太后闻讯，对刘挚多有不满。刘挚上章自辩，其党人官僚也多为他辩解，高太后却认为：“垂帘之初，挚排斥奸邪，实为忠直。但此二事，非所当为也。”刘挚因此而被罢相，出知郓州。郑雍、杨畏并未就此罢休，继续对他进行打击，于是刘挚又改任知大名府，改迁知青州。在刘挚为吕大防党人所弹劾时，王岩叟连续上奏为他辩护，结果被指责为刘挚同党，被罢官，出任知郑州，次年又受排挤，出任河阳府知府，不久，便死于任上。另一位同党，给事中朱光庭驳斥郑雍、杨畏的捕风捉影之论，“挚忠义自奋，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罢，天下不见其过”，也因此被免官，出朝任知亳州。

起止于元祐年间的蜀洛朔党争，实际是守旧派官僚内部的一场争斗，它本身并没有什么积极的作用和意义，相反而造成了政局更大的混乱。

注释①《长编》卷三九四。

②③《范忠宣公集》卷一九。

④苏轼《东坡七集奏议》卷三。

⑤《宋会要辑稿·食货》。

⑥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一。

⑦《宋史》卷一七《哲宗纪一》。

⑧《宋史》卷三四六《吕陶传》。

⑨《宋史》卷三四二《梁焘传》。

⑩《宋史》卷三一四《范纯仁传》。

《宋史》卷三四○（刘挚传）。

绍圣绍述赵顼母高氏以太皇太后（宣仁太后）的身份辅佐朝政。她重新起用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废罢熙宁新法，恢复旧法，残酷打击、迫害变法派。司马光死后，吕大防、刘挚等守旧派官僚继续执政，他们依附于以太皇太后为代表的皇亲国戚，更有恃无恐，根本无视幼帝赵煦，“每赵项大臣奏事，但取决于宣仁后，哲宗有言，或无对者”①。以至于臣僚每有奏事，均面对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而幼帝“只见臀背”②而已。赵煦虽极为不满，但亦无可奈何。

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氏病故，赵煦开始亲政。他有志继述宋神宗赵顼在位时颁行的新法。而在守旧派执掌朝政时，不仅是受排挤的变法派官僚，就连守旧派内部的许多官僚都对刘挚等人的倒行逆施表示反对，心怀恢复新政的强烈要求，然而多是敢怒而不敢言。他们更视皇

帝亲政为扭转政局的契机，这与赵煦的意图完全一致，在共同的愿望下，君臣之间形成了一股“绍述先帝遗业”的潮流。赵煦一亲政，立即着手恢复熙宁新法和元丰改制（合称“熙丰新政”），并于次年四月下诏，改元“绍圣”。宋廷政局自此再度发生急遽的变化，故史称，“绍圣绍述”。

赵煦下令依照《唐六典》重新修订官制。随即又相继罢免原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大防、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范纯仁等守旧派，即所谓“旧党”官僚的官职，门下侍郎苏辙劝说赵煦不可轻易变更元枯之政，不能复用变法派执政，赵煦大怒，罢免其官职。随后再贬吕大防为秘书监，刘挚为光禄卿、苏辙为少府监，对先期已罢贬的苏轼也不放过，又落职知英州，再谪贬惠州（治今广东惠阳东）。数月后，吕大防又“以监修史事贬秩，分司南京（今河南商丘南），安州（治今湖北安陆）居住”③。对于在元祐年让（1086—1093）追随守旧派，肆意诬蔑徘谤变法派及持不同政见官僚的礼部侍郎范祖禹、枢密都承旨刘安世等人也陆续罢官，贬逐出朝。与此同时，对于元枯更化中受到打击和迫害的变法派官僚则给予极高的褒崇礼遇，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对蔡确追复右正议大夫，进而又特追复观文殿大学士，赠太师，赐谥号“忠怀”。重新起用原变法派的主要人物，委以资政殿学士章悖悖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翰林学士承旨曾布为同知枢密院事，原吏部尚书许将为尚书左丞，翰林学士蔡卞为尚书右丞。后又以曾布为知枢密院事，许将为中书侍郎，蔡卞为尚书左丞，吏部尚书黄履为尚书右丞，翰林学士林希为同知枢密院事。经过一系列的任免，基本清除了守旧派势力，组成了以宰相章悖为首的所谓“新党”的官僚集团，为“绍圣绍述”扫清了障碍。

以章悖为首的变法派掌握政权后，继续严厉打击守旧派，甚至连中间派也不放过。绍圣四年（1097），赵煦下诏，追贬吕公着为建武军节度副使，司马光为清远军节度副使，王岩叟为雷州别驾，又夺原同知枢密院事赵瞻、中书侍郎傅尧俞所赠谥号，降文彦博为太子少保。变法派仍感不足，继而又追贬吕大防为舒州团练副使，刘挚为鼎州团练副使，苏辙为化州别驾，梁焘为雷州别驾，范纯仁为武安军节度副使，统统流放岭南，分别安置于循州（治今广东龙川）。新州（治今广东新兴）、雷州（治今广东海康），化州（治今广东化州东北）、永州（今属湖南）等五州。原签书枢密院事刘奉世亦被迫贬为光禄少卿，以太子少傅致仕的韩维不仅被迫夺官爵，还与其他30余人同遭贬官。为使打击守旧

派的这场斗争成为世人之鉴，赵煦下诏："大臣朋党，司马光以下各轻重议罚，布告天下。余悉不问，议者亦勿复言。"④负责为起草贬黜元祐；群臣的中书舍人林希不仅用词"极其丑诋，"甚至"以'老奸擅国'之语阴斥宣仁"⑤，欲以守旧派与太皇太后相互勾结，谋废宋帝的罪名，追废宣仁太后，诛杀守旧派官僚。此举因引起朝臣们的愤慨，加之赵煦的反对，才未扩大株连。

在打击守旧派的同时，宰相章惇等变法派逐步恢复新法。赵煦于改元"绍圣"的当月，即下诏令各路恢复元丰年间的免役法，随后又复行保甲法、青苗法、市易法等新法，恢复设置提举常平官，以及义仓等。

到元符元年（1098），又将常平、免役、农田水利、保甲等法分门别类，编为一书，名为《常平免役敕令》，作为推行新法的依据。在此期间，还重修《神宗实录》、《神宗国史》、《神宗帝纪》等记录神宗一朝政事和变法情况的史书，并将王安右所著《目录》载入《神宗实录》，又于宫中建成显漠阁，用以专门收藏《神宗御集》。以此为神宗赵顼及其熙宁新法正名。针对元韦占年间守旧派修改的科举和学校制度度，进行更改。

首先废罢进士科考习试诗赋，令只专习二经。赵煦还下诏令京师及地方学校官员，凡未经制科、进士和学校上舍生而人仕为官者，一律罢免。并且解除元祐年间习不许进士科考时引川王安石《字说》的禁令。又令蔡卞议定国子监三学及各州州学学制。

对于官吏的选拔升迁与贬黜，亦注重对其政绩的考核，赵煦亲政不久，即令监司每年督察州县地方长官的治绩，将其中有突出成绩者上报朝廷。绍圣三年，又令按照元丰改制所订职事官以行、守、试三等确定俸禄与官级。

历绍圣、元符年间，以章惇为首的变法派基本遵照熙宁新法和元丰改制的内容推行新法，其间亦针对新法过去实施中存在的某些弊端，加以改革和调整，因此"绍圣绍述"仅仅是依章行事，几乎无所创新。

在废罢旧法，恢复新法之时，章惇、曾布等宰执一反守旧派屈服妥协的对外政策，对西夏采取积极防御的措施，以"浇攻挠耕"之策迫使西

夏军队处于被动的境地，而无法集结进犯宋疆。绍圣二年八月，宋廷终止与西夏关于订立两国疆界的谈判，采取进筑寨堡，拓土扩疆的战略，在泾原路、鄜延路、环庆路等西北沿边地区修筑了坚固的防御T事，先后建成寨堡50余处，使千里之地成为阻止西夏军队入侵的防线，元符元年十月，宋夏间爆发平夏城之役，宋军一举击败30万夏军，并且占据河东路西北、陕西路横山至天都山一线的战略要地。这一系列的战绩，不仅扭转了长期以来宋廷对西夏所处的消极被动的局面，也迫使西夏于次年“叩关”⑥求和。二年，变法派控制的朝廷再度发兵攻占吐蕃族占据下的青唐（今青海西宁），改青唐为鄯州，邈川（今青海乐都）为湟州。不久，吐蕃族大举反抗，宋将种朴阵亡，宋廷被迫放弃青唐撤退。

然而绍圣、元符年间的变法并未像王安石变法时那样，为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政局而认真贯彻执行。在赵煦亲政的六年中，变法派更多的精力是投入到打击守旧派及消除影响的斗争中，因此绍述最突出的一点是巩固了变法派的统治地位。

与此同时，变法派内部又不断出现内讧和分裂。握有枢密院大权的曾布虽以变法派自居，但在王安石变法后期，曾上疏反对推行市易法，而与吕惠卿分裂。绍圣初年，他更千方百计阻挠吕惠卿回朝任职。其后又攻击章惇引用小人，专恣弄权，甚至借对守旧派官僚的罢贬，指责他是“报私怨”。

还别有用心地指责章惇和蔡卞于朝中培植党羽。而原来政见一致的章惇与蔡京、蔡卞兄弟。也因权势之争渐生积怨。变法派内部的相互倾轧，极大地削弱了自身的力量，严重影响了新法的深入推行。

元符三年（1100）正月，赵煦病逝，庙号哲宗。皇太后向氏为皇亲国戚中的守旧派势力，当权后即再度起用守旧派官僚，任用韩琦之子韩忠彦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章悼等一批变法派官僚则相继被贬出朝。以继承神宗新法为宗旨的“绍圣绍述”遂告废止。

注释①《宋史》卷三四○《苏颂传》。

②蔡僚《铁围山丛谈》卷一。

③④《宋史》卷尸八《哲宗纪二》。

⑤《宋史》卷三四三《林希传》。

⑥《宋大诏令集》卷六三。

崇宁绍述年仅25岁的赵煦病逝后因无子，在选立帝位继承者的问题上，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严重的分歧。哲宗母向太后提议立神宗第十一子哲宗异母之弟端王赵佶为帝。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章惇则主张立哲宗异母长弟、申王赵佖为帝，或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为帝，反对立赵佶为帝，认为他“轻佻，不可以君天下”①。支持向太后的知枢密院事曾布、尚书左丞蔡卞等人竟于朝廷上呵斥章惇：“听太后处分。”②向太后遂决策，立赵佶为帝，是为宋徽宗。自己则“权同处分军国事”。

赵佶即位之初，朝廷大权实际掌握在向太后手中。她早在当宋神宗赵顼皇后时，就曾公开反对王安石变法；及其当权，即起用守旧派官僚，首先任用神宗时的著名守旧派代表人物韩琦之子、吏部尚书韩忠彦为门下侍郎，又以资政殿大学士黄履为尚书右丞。四月，又擢升韩忠彦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礼部尚书李清臣为门下侍郎，翰林学士蒋之奇为同知枢密院事。十月，又以韩忠彦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其后，再以观文殿学士安焘为知枢密院事，礼部尚书范纯礼为尚书右丞。曾布也因投靠向太后亦被重用，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凡遭变法派罢贬的守旧派官僚，向太后都给予极高的礼遇。她下令对范纯十二等人“复官宫观”，将贬到岭南管制的苏轼等人徙往内地居住，又追复文彦博、王硅、司马光、吕公着、吕大防、刘挚等33人的官爵。

向太后对变法派则采取严厉打击、排斥的政策，罢免章惇的宰相之职，又贬为武昌军节度副使，后又贬为雷州司户参军。蔡京被贬为知永兴军，蔡卞被罢官。

守旧派官僚借向太后的势力得以重操朝政，但这位年事已高的太后，与赵佶“同听政”仅半年多，即力不从心，还政赵佶。赵佶亲政后，面对朝廷中的守旧派势力和残存的变法派势力，遂打出调和对立两派的招牌，“时议以元祐、绍圣均为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下令次年改元为“建中靖国”，以示“邪正杂用”。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

向太后病故，守旧派失去后台，极善投机钻营的曾布随即见风使舵，不断窥试赵佶的意向，且“渐进‘绍述’之说”③，又改以变法派自居。韩忠彦虽与曾布同为宰相，但韩忠彦处理政务优柔寡断，故事务多由曾布决断，赵佶亦多召其问事。在曾布的劝说下，赵韦占决意恢复新法，遂下令又改次年年号为“崇宁”，以示遵崇宋神宗熙宁新法之意，再行新法。

崇宁元年（1102）二月，赵韦占依绍圣故事，以蔡确配享哲宗庙庭。五月，罢免韩忠彦左相之职，又降复太子太保司马光为正议大夫，太师文彦博为太子太保，对其余守旧派官僚亦分别给予罢贬。赵佶甚至下诏，称“元枯诸臣各已削秩，白今无所复词，言者亦勿辄言”④。其后，又仿《唐六典》修定神宗所定官制。为了标榜“崇法熙宁”，赵佶特将供奉哲宗神位的景灵西宫宝庆殿更名为重光殿。在曾布为相期间，守旧派官僚或罢或贬，势力大为削弱。

元符三年曾被向太后罢贬的蔡京，后数次为台谏官以与宦官交相弹劾，直贬为提举洞霄宫，闲居杭州（今属浙江）。在杭州，他结交了在此访求珍奇书画的明金局供奉官、宫中大宦官童贯。此后一连数月，不分白天黑夜，蔡京始终陪伴童贯尽兴游玩，关系甚为密切。蔡京所画屏障、书画等物，均经童贯之手送入宫中，童贯还常附上吹棒蔡京之言论交给宋帝赵佶。赵佶酷爱书画，见蔡京所绘及童贯所奏，不禁好感于蔡京。崇宁元年，遂徙蔡京为知大名府。适逢宰相韩忠彦与曾布积怨日甚，韩忠彦欲借助蔡京之力，壮大自己权势，以排挤曾布，遂引荐蔡京入朝，复用为翰林学士承旨。赵佶为崇法熙宁新法，有意修订神宗熙宁、元丰年间的政事。蔡京党徒、起居舍人邓询武早就向赵佶建议，“必欲继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得知赵佶意图后，他又进言：“陛下方绍述先志，群臣无助者。”于是作《爱莫助之图》，进献赵佶。其图如《史记》年表，旁列七行，分为左右，左日元丰，右日元韦占，自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各为一行。左侧所列为能助绍述者，执政中唯列尚书右丞温益一人，其余官员姓名也不过三四人而已。右侧则列举在朝的辅相、公卿、各职事官，无一遗漏，多达百余人。此图意在显示朝中虽有百官，而能辅佐宋帝继述熙宁新法者却寥寥无几。赵佶将此图交付曾布，却揭去图中左侧所列的一个姓名。曾布见图，向赵佶询问所揭何人?赵佶答道：“蔡京也。询武谓非相比人不可，以与卿不同，故去之。”⑤曾布深知赵佶的用意，尽力迴避，推辞道：“询武既

与臣所见异，臣安敢豫议?”⑥推辞不敢接受。以国朝次日，赵佶又将《爱莫助之图》交给温益，温益欣然接受，遂借图发挥，以国朝宰相非蔡京不可，而对不赞成者，则指责为异论，并请求记录异论者。尽管温益的言行为世人所厌恶，然而早有此意的赵佶仍执意重用蔡京，使之辅佐帝业，复行新法。是年五月，经过一番明争暗斗，韩忠彦最终被曾布排挤出朝廷，以观文殿大学士之衔，任知大名府。蔡京随即被擢升为尚书左丞。邓洵武改充中书舍人。

重返朝廷后，蔡京并不满足于获得的官位，又欲登居宰相之位。他与独居相位的曾布在政见上多相左，遂寻机将他排挤出朝。曾布为巩固和确保自己的相位，发展个人势力，拟定陈佑甫充任户部侍郎。曾布之婿陈迪为陈佑甫之子，故二人是为亲家。蔡京以为时机到手，此议方提出，他立即上奏宋帝，冠以徇私之罪，且称：“爵禄者，陛下之爵禄，奈何使宰相私其亲?”⑦曾布当廷与蔡京争辩。两人争吵不休，曾布恼羞成怒，嗓音不觉提高了许多。在两旁的蔡京党徒温益见状，顿时呵叱道：“曾布，君前安得失礼!”⑧赵佶对曾布亦大为不悦，即废罢了他提出以陈佑甫充任户部侍郎的请求。随后，御史台谏官又对曾布于朝廷上目无君主的无礼举止群起而攻之，以其任用亲信，培植党羽相弹劾。在蔡京及其党徒的攻击和排挤之下，曾布终被罢免宰相之职，贬出朝廷，以观文殿大学士之衔知润州。一月之后，蔡京即被擢升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次年，又改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蔡京凭借手中权柄，大力任用和培植党羽。为其效力的邓询武官至吏部尚书，温益改授中书侍郎。他仿熙宁新法时所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于都省（尚书省）设置讲议司，自己任提举讲议司，主持所谓变法之事。又以其党徒吴居厚、王汉之等10余人为僚属，凡属重大的政务，如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等，每一项设置3人主管，负责本项政务的政策制定及实施等事务。同以前的新旧党人一样，蔡京之流亦不放过对守旧派官僚及政敌的制裁。蔡京人相逾月，赵佶下诏，严令禁止司马光等21人的子弟入京师作官。随后又下诏，令中书省将元符三年向太后执政时，主张维持新法和废罢新法的官僚姓名及各人的奏章，分作正、邪两大类，每类又各分正上、正中、正下和邪上、邪中、邪下三等，分别记录在案。其中只有41人为正等，悉加旌擢，另有500余人为邪等，则降责有差。又定元祐占及元符末宰相文彦博等、侍

从苏轼等；余官秦观等、内臣张士良等、武臣王献可等，总计120人为元枯奸党，由赵佶亲笔抄录姓名，刻石端礼门。为防止奸党串通作乱，规定受责降者不得同一州居住。此后又重定元枯及元符末奸党，与上书邪等者合为一籍，总计达309人，以司马光为首，再刻石文德殿门。蔡京又亲自抄录，令各州郡镌刻成碑，称为“元祐党籍碑”。奸党名籍中，亦包括因反对拥立赵佶为帝，而被指责为“为臣不忠”的章惇，以及门下侍郎李清臣、尚书右丞张商英，尚书左丞陆佃等10名与蔡京政见相左的变法派。凡被列入党籍者，重者被编管、责降到边远地区，轻者则谪贬或闲居，非经特许，不得内徙。经过此番清党，“元韦占群臣贬窜死徙略尽”，可是蔡京“犹未惬意”，又“锢其子孙，不得官京师及近甸”⑨。赵佶也为此下诏：“党人子弟毋得擅到阙下。”⑩甚至对已进士及第者，凡为元韦占上书属正等者，升入甲等；属邪等者，则一律取消进士出身。

为了彻底打击守旧派及政见不一者，清除他们的影响，赵佶下诏毁掉放置于景灵西宫中的吕公着、司马光、吕大防、范纯仁、刘挚、范百禄、梁焘、王岩叟的画像。诏令各地官府收缴并焚毁已刊行的苏轼、苏辙、苏过等人的文集。凡元符末年曾向朝廷上书的进士，虽未入奸党名籍，但所书内容有诋毁、诽谤新法者，由地方州郡将其遣送至州学。依据太学的三舍生规定，让他们自己学习。一年后，能“革心自新”者，准许将来参加科举考试，如仍坚持旧有立场及观点者，则流放到边远地区编管。赵佶还令皇亲宗子不许与元枯奸党成员的子孙结为婚姻。

为了自我标榜，蔡京之流打着变法派“新党”的旗号，为两位推行新法的先帝更改谥号，改神宗谥号为“体元显道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改哲宗谥号为“宪元继道显德定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追封王安石、蔡确为王，以王安石配享孔子庙。在推行所谓的新法上，他们一面参照熙宁、元丰新政，一面肆意滥改，借机安插亲信党羽。更定官制时，蔡京改尚书左仆射为太宰，尚书右仆射为少宰，而他自称“公相”，总治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罢开封权知府，置府牧、府尹、府少尹之职。改定六部，以士、户、仪、兵、刑、工为称，并增加各部定员数额。又仿《唐六典》变更胥吏官称。令各路知州、通判官名中加入“主管学事”四个字。与此同时，其子蔡攸、蔡翛等子孙10人相继入朝，窃据高官要职。他还与童贯、王黼、梁师成、杨戬、朱勔、李彦、高俅等人相勾结，结成死党，左右朝政。宋初，凡皇帝下达诏令，均须交中书门

下审议，而后命翰林学士撰书。至神宗熙宁年间，出现了诏令不交中书门下共议之事，其问即有权臣从中营私舞弊。蔡京执政后，唯恐群臣非议自己。遂在“绍述”的名义下，“故作御笔密进，而丐徽宗亲书以降，谓之御笔手诏，违者以违制坐之。事无巨细，皆托而行，至有不类帝札者，群下皆莫敢言”。又罢科举选士之法，令州县学校均仿太学设置三舍考选之制。于城南另建辟雍外学，广招四方之士。令各地推行方田之法。对江、淮七路实行榷茶，而官自为市。彻底更定盐钞法，规定凡旧钞一律不准使用，商人须向榷货务出钱买盐钞，再凭盐钞去产盐地换盐，只许到指定的地点贩卖。

蔡京之流的所谓“新法”，“名为遵用熙丰之典”，真正的目的已绝非富国强兵，而是为了确保自己的权势，满足穷奢极欲的需求，故“未有一事合熙丰者”。这一违背熙宁法法宗旨的“变法”，也遭到了部分官僚的反对和抵制，但在蔡京之流的迫害和打击下，很快即被压制下去。更定盐钞法后，“富商巨贾尝持数十万缗，一旦化为流丐，甚者至赴水及缢死”。提点淮东刑狱章绰对此情景哀悯不已，遂上奏，称“改法误民”。蔡京见奏章勃然大怒，下令将他革职罢官。但仍余怒未消，又令人铸造“当十”大钱，以此“尽陷（章）綡诸弟”。

宋帝赵佶重用蔡京等人，肆意搜刮民脂民膏，并以此为满足，统治愈发黑暗、腐朽。在“崇宁绍述”的幌子下，赵佶与蔡京之流完全置国家安危于不顾，社会矛盾再度激化，统治进一步陷入危机之中。

注释①《宋史》卷二二《徽宗纪四》。

②《宋史》卷四七一《章惇传》。

③《宋史》卷四七一《曾布传》。

④《宋史》卷一九《徽宗纪一》。

⑤⑥《宋史》卷三二九《邓洵武传》。

⑦⑧《宋史》卷四七一《曾布传》。

⑨《宋史》卷四七二《蔡京传》。

⑩《宋史》卷一九《徽宗纪一》。

《宋史》卷四七二《蔡京传》。

徐梦梓《三朝北盟会编》卷四九。

《宋史》卷四七二《蔡京传》。

第三十章

六贼当道蔡京北宋末年，蔡京身居高位，操纵并控制朝政。这位所谓的变法派，却是一位极善投机钻营，惯用权术的奸佞之臣。他于熙宁三年（1070）登进士第，步入仕途。元丰八年（1085），他投靠当时的变法派、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宋神宗赵顼病故后，守旧派上台，蔡京随即又倒向宰相司马光，为废罢新法，复行旧法而卖力。时任知开封府的蔡京秉承司马光的旨意，仅在5天的期限内，便将畿县已行的募役法改为差役法，司马光称赞道："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哲宗亲政，废止"元祐更化"，蔡京因"挟邪坏法"，遭台谏官弹劾，屡屡罢贬。然而他又很快摇身一变又成了变法派。绍圣元年（1094），蔡京重返朝廷。适逢哲宗"绍述"熙宁新法，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章惇欲废役法，复行募役，为此他专门设置机构评议两法，但久议未决，蔡京则对章惇建议道："取熙宁成法施行之尔，何以讲为?"蔡京乃以变法自居。蔡京反复无常，完全是为了谋取私欲，"十年间（蔡）京再莅其事，成于反掌"①。在绍圣年间，蔡京俨如一位坚定的变法派，对刘挚、梁焘、王岩叟等守旧派一再论诛弹贬，其目的是觊觎执政。但因与曾布有隙而未能如愿。哲宗去逝，向太后垂帘听政，再废新法，尽逐变法派官僚，蔡京于是再度受贬夺职。直至被赵佶再次起用，登上宰相之位。蔡京最后的上台，"起于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为，而京阴托'绍述'之柄，箝制天子"②。他极力发展和培植自己的势力，朝中遍布党羽。他不仅将自己的儿子蔡攸、蔡假、蔡惰、蔡行先后拉入朝中，官至大学士，等同执政，也对联姻亲家宋乔年、胡师文等人委以握兵之重，更与童贯、王黼、梁师成、朱勔、李彦等人相互勾结，牢固地控制并操纵朝迁军政大事，排斥异己，无恶不作，时人称为"六贼"。

赵佶重用"六贼"，六贼则竭力迎合赵佶骄奢淫逸的需求，倡"丰亨豫大"之说，大肆挥霍，甚至进言："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能几何，岂可徒自劳苦。"③一时间，君臣穷奢极侈，视财富如粪土，累朝所储一扫而光。为了粉饰太平，又制订礼乐，铸造九鼎，建造明堂，修筑方泽，广立道观，于城中大兴土木。赵俏、蔡京一伙以皇宫窄狭，又于城北新建延福宫。此后，又于城东北营建"艮岳"，方圆10余里，堆

土成山，高达90尺，峰峦起伏，殿台亭阁遍布其间，山下散布池沼洲渚。赵佶终日于此纵情取乐。蔡京及其予蔡攸府宅不仅宏敞，园内林木参天，装饰精巧华丽。蔡京家中妻妾成群，每逢生日，各地官吏都要向他进献珍奇特产，称之为“生辰纲”。曾出任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后迁武康军节度使的童贯，每得军需，皆充私藏，以至家中宝玉金币堆积如山。防御使朱勋在应奉局供职时，“指取内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数十百万计”④，他在苏州有众多甲第、名园、田产，跨连郡邑，每年仅租税收入多达10万多石。官至宰相的王黼“凡四方水土珍异之物，悉苛取于民，进帝所者不能什一，余皆人其家。”⑤他于家中多蓄子女玉帛供其享乐，侍妾中有官封者即有18人之多。蔡京贪得无厌，已受仆肘俸禄，又提出增加所谓的“司空寄禄钱”。甚至公然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时人称：“三百贯，直通判；五百贯，直秘阁。”一时间，蔡京等人第宅门庭若市，“输货僮佞以得美官者，不可胜数”⑥。

崇宁元年（1102），宋廷寸：杭州设置造作局，交由童贯主持，每天役使数千工匠，为皇室制造珠宝金玉之物，以供赏玩，而所用物料，悉由民间征敛。稍后，又于苏州（今属江苏）设应奉局和造作局，由朱勔主管。赵佶酷爱奇花异石。蔡京便令朱动密取江浙——带的珍异花石进奉。朱动初进黄杨3株，颇受赵佶喜爱。以后，进奉花石的数量和规模逐年增加。为了装点延福宫和艮岳，朱勔“豪夺渔取于民”。凡百姓家中一石一木稍有奇异之处，即率健卒闯入其家，用黄帕封弥，以为标志。一时拿不走的，就令该户人家看护，稍有不慎，就加以“大不恭”之罪，敲诈勒索。待搬运之时，则拆屋扒墙以运出，致使人户顷刻间倾家荡产。时人若有一物稍有特殊，则认为是不祥之兆，唯恐灾难降临。如于陡峻山颠、悬崖峭壁上有奇木异石，应奉局官员则必定督课役夫登攀取摘，不管死活。百姓被征为役夫者，非死即伤，中等人家因此破产，或卖儿女以供其所需。一次朱勔得到一块太湖石，高4丈，装载在一艘大船上，竟动用数千夫装运、拉纤。在运往开封的途中，所经州县为使船只顺利通过，有的只好拆毁水门、桥梁，甚至凿开城墙。待这块太湖石运到开封后，赵佶亲自赐名为“神运昭功石”。运送奇花异石的船只，每10艘编为一纲，称为“花石纲”。经常用数10艘船运送，以至运河中的花石纲船“舳舳由舻相衔”⑦。

花石纲船不足装运时，应奉局官只就截取各路运粮的船和商船。运

送花石的船只竟多得堵塞运河河道，于是又“职道于海，每遇风涛，则人船皆没，枉死无算”⑧。一块石头的运费可达30万贯，一竿竹子所费有高在50万贯者。

置局汝州（治今河南临汝）酌宦官李彦“发物供奉，大抵类朱动”。几根竹子便往往动用一部大车和数十头牛驴拉运。这些都责督百姓负责运送，一年四季，竟无空闲之时，致使“农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垦，殚财靡刍，力竭饿死，或自缢辕轭间”⑨。

花石纲及搜刮到的花石竹木，除装点皇家苑囿外，更被蔡京之流用来装饰自家的庭院园林，垒石为山，疏泉为湖，穷极华侈。造作局、应奉局及地方州县官吏也借机巧取豪夺，侵吞百姓财富，中饱私囊，凡“尺寸之地，人口之味，莫不贡献”。

朝廷开支日益加大。宋神宗元丰年间左藏库月支约36万贯，这时已高达120万贯，府库空虚，财政危机自然转嫁到百姓头上。崇宁元年（1102），恢复榷茶法，于茶叶产地设官场专卖，禁止私相贸易。四年，罢官场后，允许商贩向园户买茶贩卖，但须第官府“抽盘”，发给茶引。仅茶税一项收入就十分可观，政和元年（1111）以后，年茶税额400余万贯，其中每年抽100万贯作为“私奉”，供皇帝使用。蔡京说还更改盐钞法，规定盐商须向榷货务以钱易盐钞，凭盐钞去产地换盐，再到指定的州县贩卖。但钞法多变，商人以钱易钞后，未及换盐，钞法又变，又须贴钱领新钞，以至于数十万贯一夕废弃。宋廷还以卖盐多寡作为考核地方官的依据，州县官员因此便强迫百姓按户等买盐。宣和元年（1119）前后，仅淮南、两浙地区的盐利就达2200万贯左右，成为宋廷一笔重要的财政收入。

除此之处，他们又巧立名目增加赋税剥削。政和六年（1116），令宦官杨戬于京西路设置公田所称“西城所”，制定法律，追查百姓田契，往往辗转复查，直到田契所出无证可凭时，便以此为由增加赋税额。此法自汝州地区开始实行，渐及京东、京西、淮西、淮北等地，凡“废堤、弃堰、荒山、退滩及大河淤流之处”，一律括为“公田”，收归官府所有。而后强制租给百姓耕种，且确定租税额，即使田地被冲毁或淹没，租税却不准减少。横跨济（治今山东巨野）、郓（治今山东东平）数州，方

圆数百里的筑山泺，也被西城所括占，对湖上捕鱼人户定立租税，按船纳值。杨戬还令州县于常赋之外，再增加租钱10余万贯，遇水旱灾害，常赋可减免，而租钱绝不可少。杨戬死后，继任的另一位宦官李彦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凡民间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陈，皆指为‘天荒’，虽执印券皆不省”⑩。更有甚者，李彦竟将鲁山（今属河南）全县括为公田，括田时令官吏焚毁百姓手中的田契，而后令田主承佃自己原来的土地，向官府纳租税。有胆敢上诉者，则施以重刑，因此致死者多达千万，而强占的所谓“公田”共有3、4万余顷，大批农民因此被夺去田产，流离失所。

赵佶、蔡京一伙为保障自己的巨额消费，不惜将地方仓贮钱谷搜罗一空，对各路每年向朝廷上缴的钱谷数额重新制定，较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又增加十几倍。不仅如此，宋廷还借“支移折变”敲诈勒索百姓。宋初因对辽、西夏用兵或有其他变故，官府常以此为由强迫百姓将应交本地官府的赋税送交到他地，是为支移。交纳赋税原有周定之物，官府以种种借口，令百姓折成其他钱物上缴，以代原定赋税，是为折变。这二项正赋以外的附加税十分扰民，支移，路途遥远，往返耽误农时，不支移则交“地里脚钱”。折变，则加重农民负担，利于官吏、商贾从中牟利。故“支移、折变，贫弱者尤以为患”。至赵佶时，又令一向不征收“支移”的地区，加征地里脚钱，1斗粮竟加收56文，相当于元丰年间的正税额。西蜀地区原定税钱300文，折变绢一匹，几经折变后，竟增至23贯，增加七八十倍之多。此外，更巧立名目进行盘剥，如绢帛即有私买、预买、泛买、常平司和买、应副燕山和买等项，米谷又有和籴、均籴、补发上供私籴等各日。名为预买，却不付钱，名为私籴，低价购买。

朝廷如此敲诈勒索，胥吏更是敲骨吸髓，在这种黑暗、腐朽的统治下，社会生产受到极为严重的破坏，众多的百姓倾家荡产，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人们疾呼：“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⑩对赵佶及蔡京等“六贼”深恶痛绝，迫切盼望改变自身悲惨的境地。

注释①②《宋史》卷四七二《蔡京传》。

③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政通鉴》卷一六。

④《宋史》卷四七○《朱动传》。

⑤《宋史》卷四七○《王黼传》。

⑥王偁《东都事略》卷一。

⑦《宋史》卷四七○《朱勋传》。

⑧方勺《青溪寇轨·容斋逸史》。

⑨《宋史》卷四六八《杨戬传》附《李彦传》。

⑩《宋史》卷四六八《杨戬传》。

《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赋税》。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二。

方腊起义方腊赵佶（宋徽宗）在位期间，重用蔡京等“六贼”，统治陷入极度的腐朽和黑暗之小。百姓倾家荡产，无以为生，他们对把持朝政的“六贼”“恨之如骨，欲食其肉”①。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终于爆发。

两浙路一直是北宋社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每年提供数额巨大的财赋。赵信即位后，先后于杭州（今属浙江）、苏州（今属江苏）设置造作局、应奉局，交由童贯、朱动等人主管，在他们大肆的搜刮、掠夺下，百姓的处境更加危难。宣和二年（11加年），睦州青溪县（今浙江淳安西北）农民在方腊的领导下揭竿而起。

方腊（方十三）为青溪万年乡帮源洞地主、里正（保正）方有常家的佣工（一说他有漆园，是为漆园主）。十月初九，他假托“得天符牒”，准备举兵。不料消息走露，被方有常发觉，派人报告官府。方腊得知后，立即率领农民冲入方有常家，杀死其家人40余口。他以帮源洞为据点，聚集附近的贫苦农民，号召举义旗，反抗宋朝的统治。随后，方腊召集百余人于漆园誓师，酒至数巡，他起身历数宋朝统治的罪恶，指

出“天下国家，本同一理，今有子弟耕织，终岁劳苦，少有粟帛，父兄悉取而靡荡之”，“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且声色、狗马、土木、祷祠、甲兵、花石糜费之外，岁略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他告诉众人：“诸君若能仗义而起，四方必闻风响应，旬日之间，万众可集。”②在方腊的号召下，远近农民纷纷响应，加入起义队伍，义军很快发展为上万人。

十一月初一，义军尊方腊为“圣公”，建元永乐，设置机构及官员，以方腊为相，将帅分为六等，以头扎红巾及其他各色头巾作为标志，创建起农民政权。

起义爆发后，两浙路提点刑狱张苑急报朝廷，而宰相王黼不以为然，反而严厉斥责张苑“张皇生事”。义军声势越来越大，两浙路制置使张建派兵马都监蔡遵、颜坦统精兵5000进剿青溪。方腊据险坚守，诱做深入，二十二日，于息坑（今浙江淳安西）斩杀蔡遵、颜坦。青溪县知县陈光弃城而逃，义军勐攻县城，俘虏县尉翁开。占领青溪后，方腊率2万义军转攻睦州（治今浙江建德东）。睦州城防空虚，知州张徽言连夜逃遁。十二月初，方腊相继攻占睦州及所辖寿昌（今浙江建德西南）、分水（今浙江桐庐境内）、桐庐（今属浙江）、遂安（今浙江淳安境内）等县。“起义军以诛朱勔为名，见官吏公使人皆杀之”③，所到之处，杀富济贫，深受百姓拥护。

不久，方腊率义军西进歙州(治今安徽歙县），全歼宋东南第三将、“病关索”郭师中所部，杀郭师中，占领歙州及所辖诸县。歙州战役后，方腊兵分三赂：一路北上攻宁国（今安徽宁国西南）、宣城（今属安徽）、广德（今属安徽），一路南下攻衢州，（治今浙江衢县）、信州（治今江西上饶），一路由方腊率领义军主力，直趋杭州。

杭州为两浙路首府，亦为江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朱勔的造作局即设置于此，更聚集着大批官吏、富商、地主及其财富，因此也屯驻有重兵。赵佶见义军攻势迅勐，声势浩大，欲招安方腊，乃下诏称；“如能束身自归，或告言动息，捕致贼党，并特予免罪，一切不问。内稍有功绩，即优与推赏。”④义军不为所动，兵临杭州城下。攻城开始后，义军将领身先士卒，妇女和儿童也上阵助威。知杭州府赵霆弃城而逃。经过

5天激战，十二月二十九日，攻陷杭州城，杀死两浙路制置使陈建，于城内捕捉官吏，发掘蔡京父坟墓，暴其骸骨。

义军连克重镇，诛杀贪官污吏，深得人心，也得到更多民众的响应。苏州石生，湖州归安县（今浙江吴兴）陆行儿，婺州兰溪县灵山峒（今浙江兰溪西南）朱言、吴邦，温州永嘉俞道安，永康县方岩山（今浙江永康东）陈十四等人，纷纷率领当地农民参加起义。台州仙居县吕师囊，越州剡县（今浙江嵊县西）裘日新（仇道人），衢州郑魔王等人领导当地摩尼教徒起兵响应，湖州（治今浙江吴兴）、常州（今属江苏）、秀州（治今浙江嘉兴）等地农民也聚集众人，准备攻打州县。一时间，反抗宋廷黑暗统治的浪潮迅勐高涨。

面对骤然壮大的农民起义军，赵佶一面下诏“罪己”，令撤销苏、杭造作局，停运花石纲，罢免朱励父子兄弟官职。一面令童贯任江、淮、荆、浙等路宣抚使，谭稹为两浙路制置使，调集京畿禁军和驻淮东、荆湖北路的军队，以及陕西六路汉、蕃精兵，约20余万，南下镇压方腊起义军。宣和三年正月，童贯、谭稹统兵出发。临行前，赵佶亲自为童贯饯行，嘱咐道：“东面事尽付太傅，必有紧急，不得已，可径作御笔行下。”⑤童贯到达江南后，依赵佶事先的部置，派兵进驻金陵（今江苏南京）和镇江（今属江苏）两大重镇，扼守江防。而后分兵两路：东路由谭稹、王禀等统领，欲经苏州、秀州，进攻杭州；一路由刘延庆、刘镇等统领，自宣州（治今安徽宣城）直进歙州。两路宋军约定合师于睦州。赵佶随后又派郭仲荀、姚仲平另统一军南下浙东，以为接应后援。

方腊占据杭州后，未采纳太学生吕将的建议，先进兵江宁（今江苏南京），抢占长江天险，阻止宋军过江增援，而是将主力调集到南面，进攻婺州、衙州。这一战略上的失误，给宋军的大举进剿提供了乘虚而人的有利时机，而义军自举兵以来在战场上的主动权亦由此而丧失。正值童贯统兵南下之时，方腊也正分兵南征北伐。北伐义军兵分两路：东路由方七佛领8万义军，一举攻克崇德县，进围秀州，又派一支队伍进入湖州境内。秀州统军王子武据城顽抗，义军攻城不下。正在激战之时，王禀所率东路军亦进到秀州城下。方七佛腹背受敌，他仍指挥义军于秀州旷野上与数倍于己的宋军拼死厮杀，方七佛身负重伤，所部9000余人阵亡，最后突围退守杭州城。西路由八大王率领，由歙州向江宁进

发。二月初，连克宣州宁国县（今安徽宁国西南）、旌德县，进围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宋西路军总指挥刘延庆令刘镇移军广德救援，令杨可世率兵进驻宣州，以阻止义军北上。八天王率义军阻击杨可世所部，终因寡不敌众，3000义军阵亡，旌德县复为宋军占据。随后义军又遭刘镇所部围击，战败，宁国县城亦为宋军占据。宋军随即缩小对杭州的包围圈。

在此之前，方腊率领义军主力南征，相继攻陷婺州（治今浙江金华）及开化、江山、常山等县。郑魔王统领一支义军进攻衢州，守城将领韩起弃城出逃，知州彭汝方被斩，衢州为义军占领。另一支义军队伍由洪载率领，亦攻占处州（治今浙江丽水西）。正当起义军节节胜利之时，方腊得知宋军大举进攻杭州，急令义军回师救援。义军将领吕将认为南线兵力分散，大部主力未及撤回，建议暂时放弃杭州城，而发兵直进宋军后方的金陵，再寻机攻取杭州。方腊仍未采纳建议，却与方七佛等率领义军坚守城池。

二月，宋军在完成对杭州城酌包围和进攻的布置之后，开始发起勐攻。初七日，义军首先于城北的清河堰阻击宋军的进攻。宋军轮番攻击，双方激战六天六夜，义军伤亡惨重。城中粮尽，难以固守，义军只得突围转移。方七佛领2万义军留于城中掩护方腊及其他义军出城，他与宋军直杀至深夜，又下令焚烧城中的官府、道观、寺庙、学宫等，最后突围出城时，仅存千余人。宋军实际得到的仅是一座空城。

起义军撤出杭州后，仍坚持在杭州以南地区抗击宋军。三月初，义军试图扭转局面，突然回师攻打杭州，但在宋军的反扑下，再度失利，方腊见久战未捷，遂转移睦州。三月中旬，宋军将领杨可世、刘镇各统所部合击由八大王统领的西路义军，义军不敌，被迫放弃歙州。随后，八大王又于歙州潘村指挥万余义军迎击宋军，又派万余义军绕到宋军后方出击，以夹击两支敌军。战斗异常激烈，至半夜，义军力不能支，后撤，1500余名将士阵亡。次日，义军又偷袭宁国县城，再次失利。至此，义军的西路军已无力抗击宋军，步步退守。宋军紧追不舍。

王禀占领杭州后，于三月初十自杭州向西进剿，连续攻占富阳、桐庐、睦州。是月底，宋廷再派刘光世率鄜延兵、张恩正率河东兵、姚平

仲率泾原兵增援。四月初一，刘光世部进攻衢州，郑魔王统万余义军与宋军激战，2300多名义军将士阵亡，郑魔王被俘，衢州城陷落。初七日，刘光世再领兵东进婺州。自衢州退出酌义军乘城中宋军主力东进之机，发动反攻。守城将领叶处厚落水身亡，义军攻入城中。刘光世急速回师，衢州城重新落入宋军手中。十七日，宋军攻陷婺州。十九日，王禀指挥宋军攻占起义军的最后一个据点——青溪县。方腊被迫退守帮源洞。

宋东路军紧随义军之后，追至帮源。四月下旬，童贯又调集西路军，层层包围帮源洞山区，总兵力达20余万。此时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也有20多万人，他们凭借险要的地势，四下设置陷阱和埋伏，准备殊死抵抗。宋军曾向门岭发起过攻击，但未能奏效。刘镇又领精锐自小路偷袭门岭。门岭失守，帮源洞被打开了一个门户。二十四日晨，宋军以“纵火为号”，分别由刘镇、王禀率部从两个方向进攻帮源洞。义军顽强抵抗，从清晨一直激战到深夜，有万余名义军战死，方腊退守到一个石洞中。二十六日，在原里正方有常之子方庚等人的带领下，宋军校韩世忠率一支人马勐攻义军据守的石洞。八大王指挥义军与宋兵殊死搏斗，7万多将士先后牺牲，方腊及其妻邵氏，子方亳、（二太子），丞相方肥，以及八大王等首领先后被俘，被解往杭州，又押解到都城开封。八月二十四日，方腊父子遭杀害。帮源洞攻破后，宋军对俘虏的义军将士及家属进行了残酷的大屠杀，死者无计。

“方腊虽就擒，而友党散走浙东，‘贼’势尚炽”。⑥起义军余部转移浙东后，与在这里坚持抗宋斗争的义军首领吕师囊、裘日新、霍成富等各支义军共同战斗。童贯派遣郭仲荀、刘光世、姚平仲等将领率部分兵进攻义军。郭仲荀进兵三界镇，裘日新组织义军迎击失利。姚平仲兵进义乌（今属浙江）等县，攻占裘日新的石洞，裘日新战死。刘光世一部进剿婺、衢等地的义军余部，致使浙东义军遭受巨大的损失。

闰五月初，宋廷以方腊义军已遭镇压，北方与辽战事正紧，下令将大部分宋军调往北方，仅留2．5万军队继续剿灭剩余的义军。下旬，方腊起义军余部在方五相公，方七佛率领下仍坚持斗争。宋军在姚平仲的统领下攻陷台州仙居境义军据点招贤等40余洞。六月，吕师囊率义军转移黄岩（今属浙江），宋将折可存追击至山区受阻。义军扼守断头山，

凭借山势抵抗，宋军死伤甚众，多日不得前进。宋将杨震指挥兵士自山后包抄，义军战败，吕师囊等30余位首领遇害。七月，义军首领俞道安率义军，号称10万人，自永嘉（今属浙江）转战乐清（今属浙江）等地，并于乐清重创宋军，随即又攻打温州（今属浙江），攻城30多天未破，遂转入处州境内永康山谷中。十月，宋军进山围剿，俞道安战败牺牲。

尽管各支起义军相继被宋军镇压，但余众仍于两浙地区继续坚持斗争，杀官吏，捕官军，直至宣和四年，才基本被镇压下去。

注释①曾敏行《独醒杂志》。

②《青溪寇轨》附《容斋逸史》。

③方勺《泊宅编》卷五。

④《宋会要辑稿·兵十》。

⑤《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五。

⑥《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四一。

黄淮义事政和元年（1111），赵佶任用宦官杨戬设置“西城括田所（西城所）”，京东地区百姓倍受其害，或赋税额巨增，或田产被括为公田，不服上诉则惨遭酷刑，冤死者数以千万计。方圆数百里的梁山泊也被西城所括占，对湖上渔户依保甲法进行编制，并于渔船上刻立标志，禁止其他船只进入梁山泊。凡渔民人泊捕鱼、采摘莲藕等，一律定立赋税，按船只大小交纳税收。更有甚者，杨戬还令州县于常赋之外，再增租钱10余万贯，遇天灾常赋可减免，而租钱不减。百姓无以谋生，“相聚为盗”，奋起反抗宋廷的残酷剥削和压榨。

重和元年（1118年）、河北、京东地区遭受严重水灾，贫苦农民流离失所，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宣和元年（1119），以宋江等36人为首的农民于京东起义。他们活动于青州（治今山东临淄）、齐州（治今山东济南）、单州（治今山东单县）、濮州（治今山东鄄城北）之间，间

或出入于京城开封附近。以灵活机动的战术打击贪官污吏和追剿的宋军，使州县官府一筹莫展。宋廷对宋江义军恨之人骨，称其为“京东贼”、“河北剧贼”。二年十一月，宋廷调歙州知州曾孝蕴为青州知州，令其专事镇压宋江的义军。但因此时两浙路方腊起义迅勐发展，曾孝蕴又改任睦州知州，参与镇压两浙地区农民起义。由于宋廷将大量的兵力投入江南，给宋江在河北、京东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时机。他率领义军，“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①。赵佶见武力镇压宋江义军未能奏效；遂改用诱降、招安之策。中书侍郎侯蒙认为宋江“才必过人”，上书赵佶称：“今青溪盗起，不若赦（宋）江，使讨方腊以自赎。”②随即受任为东平府（郓州）知府，负责招降宋江。他未及赴任，即病亡。

宋廷的武力镇压和招安诱降都未能使宋江就范，相反义军声势愈发壮大，“啸聚亡命，剽掠山东，一路州县大震，吏多避匿”③。郓州（治今山东东平）及梁山泊地区成为宋江起义军的重要根据地。不久，宋江率领义军南下，途经沂州（治今山东临沂）时，向知州蒋圆借道。蒋圆施以缓兵之计，义军过于轻信，未加提防。待蒋圆指挥宋军发起突然袭击时，起义军措手不及，伤亡惨重，只得退回郓州等地。宋江重新集结力量，三年初，他再次统领义军南下，攻陷沂州、淮阳军（今江苏邳县东）。宋廷急令调兵遣将，讨伐宋江。宋江继续挥师南下，进入淮南路楚州（治今江苏淮安）地区，给予当地官府及官吏、富商、地主沉重打击，而被诬为“淮南贼”。宋江义军在夺得大船10余艘后，转而向东北方向进军，驾船渡海，途经沭阳时，遭县尉王师心引兵邀战，义军迎战失利。二月，宋江义军又泛舟至海州（治今江苏连云港）附近。海州知州张叔夜派奸细混入义军，侦得宋江义军动向，遂招募千余名亡命之徒，设伏于城郊。同时复令混入义军队伍的宋军士卒寻机焚烧义军船只，且又以少量宋军前去挑战。宋江等弃船登岸追杀，不幸中伏，宋江副将被俘，大部分义军接受张叔夜的招安，投降了宋廷。余部则撤退回京东地区。四年，武功大夫折可存在镇压方腊起义后，班师回朝，赵佶随即又令他“捕草寇宋江”。在宋军的追剿之下，起义军最终被镇压，宋江等36名义军首领接受朝廷招安，而被封官拜爵④。

宋江起义虽然失败了，京东地区，特别是梁山泊一带农、渔民的反抗斗争依然继续。直至宣和六年（1124），梁山泊起义的渔民受东平府

知府蔡居厚诱骗而惨遭杀害，反抗斗争才稍得平息。

正值宋江起义失败之时，宋廷与金朝开始联合攻辽。灭辽后，赵佶及权臣蔡京一伙将原输辽的“岁币”再每年增加100万贯钱，作为“燕京代税钱”转输给金朝，以此从金朝手中赎回燕京（今北京西南）以及顺（治今北京顺义）、檀（治今北京密云）、涿（今属河北）、易（治今河北易县）、蓟（治今天津蓟县）、景（治今河北遵化）等6州之地。宋朝得到燕京等地后，设官府，置官僚，同时派遣军队驻防，其中所需给养就近摊派到河北、山东、河东等地区百姓的头上，且令交纳时一律“支移”运送到燕京交予官府。这一规定给这些地区的百姓带来极大的灾难，一石粮食从产地运至燕京，沿途盘费所需高达十几至二十几石，且往返路途遥远，费时费力，百姓为此怨声载道。此后，宰相王黼又将灭辽用兵时征发民夫充役的办法，改为征收免夫钱，并推行到全国。一次即搜刮免夫钱6200余万贯，竟相当于宋朝中期一年的税赋收入。宋廷规定，凡抗拒不交纳免夫钱者，一律依军法治罪，甚至连违期交纳者也将处以斩刑。为如数如期交纳免夫钱，州县官府及官吏对百姓逼督甚急，直至渴泽而渔，百姓被逼卖子鬻女，家破人亡。而宣和初年又遇连年灾荒，一时间饿殍遍野，死者相藉，黄淮地区百姓陷入更严酷的水深火热之中。

宣和五年（1123），河北、京东等路农民相继起义，反抗宋朝统治的斗争再度掀起高潮。这些起义，少则数百、数千人，多则数万，乃至数十万人，“白昼横行”所到之处攻打州县，杀官吏，除地主，杀富济贫，或于崇山峻岭之中创建据点，聚众自保，寻机出击，致使“巡、尉不敢抗，县、镇不敢守”⑤。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密州（治今山东诸城）徐靖、沂州临沂武胡、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杨天王、郓州李太（李太子）、何子威、沂州徐进、水鼓山刘大郎、莒县（今属山东）徐大郎等领导当地农民的起义。而规模较大的又有河北路焰州（治今河北永年东）张迪领导的起义。队伍发展多达数十万众，攻陷了一些州县城池，曾围攻濬州（治今河北浚县）长达5日之久，之后又攻打漕州，声势大震。京东路青州张仙（张先、张万仙）领导的起义军号“敢炽”，称10万人。河北高托山于望仙山组织当地农民举行起义，号称30万人，转战于河北和京东路的青（治今山东益都）、徐（今属江苏）、密、沂等州一带。

宣和六年，赵佶以宦官梁方平为河北、京东制置使，督率王渊、刘光世、杨惟忠、辛兴宗、韩世忠、张俊等将领，统兵镇压起义军。与此同时，宋廷又以诱降、招安之策，分化瓦解农民起义军。赵佶下诏，称起义军如能自首，“一切不问”，对于首领自首，还“当议优与补受官资”。次年正月，赵佶又下诏“罪己”：“用非其人，政失厥中，徭役荐兴，使民不能自存。”⑥同时下令，免去部分赋役。以此缓和与农民起义军之间尖锐的矛盾和冲突。

在宋廷武力镇压和诱降之下，部分农民起义军投降。张仙起义军于礌鼓山与宋军作战，战败后，张仙接受招安。贾进起义军曾拒绝宋廷多次劝降，并杀死每一次前来劝降的官吏，宋军将领辛昌宗带兵进剿，被义军打得全军覆没，但不久，也投靠宋廷。不过。更多的起义军坚持斗争。高托山领导的义军先后遭到杨惟忠、辛兴宗、王渊、韩世忠等所领宋军的追击：屡遭挫折，甚至高托山一度接受招安，但义军将士始终末放弃斗争，直到建炎二年（1128），这支义军仍活动在河北、京东地区，转而抗击金军。

注释①②王偁《东都事略》卷一○三《侯蒙传》。

③张守《昆陵集》卷一三《蒋圆墓志铭》。

④关于宋江投降的时间，一说为宣和三年，受张叔夜招安而降；一说为宣和四年，受折可存招安而降。

⑤《三朝北盟会编》卷入七。

⑥《宋会要辑稿·兵一二》。

海上之盟北宋末年，位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族迅速崛起，日渐强盛。宋政和五年（1115），女真完颜部首领阿骨打（完颜旻）正式称帝，创建大金国。长期处于辽朝残暴统治下的女真族，在阿骨打的统领下，奋起反抗。金收国元年（1115），金军在大败前来镇压的辽军后，即向辽朝发起进攻。辽军节节败退，北方局势发生巨大的变化。

金朝的创建和强大，使宋朝统治者感到有一线希望，可以借机收回

后晋敬瑭割让给辽朝的北方之地，以此转移和缓和国内的各种矛盾。

在此之前，宋政和元年（1111），赵佶曾派童贯出使辽朝，以了解辽的国内局势。路经卢沟（今永定河）时，深夜有燕人马植求见。童贯与他交谈后，十分惊喜，便于出使归来时，亦将他带回，并改其姓名为李良嗣。回到京城开封后，童贯即将他荐举入朝。朝上，李良嗣献策称：“女真恨辽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遣使自登（治今山东蓬莱）、莱（治今山东掖县）涉海，结好女真，与之相约攻辽，其国可图也。”待赵佶召见时，他又提出：“万一女真得志，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事不侔矣。”①赵佶十分欣赏他的建议，赐其国姓赵氏。并委以秘书丞。从此宋廷开始策划谋取燕京。

重和元年（1118）二月，宋派遣武义大夫、登州防御使马政等人取海路首次出使金朝，商议夹攻辽朝之事，并提出“若克辽之后，五代时陷入契丹汉地，愿畀下地。”②第二年正月。金遣渤海人李善庆、熟女真人小散多（散靓）、生女真人渤达，持国书随马政至宋朝，书中称：“所请之地，今当与宋夹攻，得者有之。”③待金朝3位使臣返回时，马政及其子马宏（马扩）再度受命出使金朝，再议夹攻辽朝，求归还辽占汉地，应允岁币等事。但小散多因使宋时受宋廷所赠团练使之官，阿骨打对此大为恼怒，下令杖击且夺其官职。故马政返回时，金廷改派李堇辞列、曷鲁等人为使臣，赴宋再议夹攻辽朝事宜。

经过宋、金间互派使臣，反复商议，终于取得一致。宋宣和二年（1120），宋再派赵良嗣为正使、王晖（王环）为副使，仍由登州乘船浮海入金境，与金朝最后商定：宋、辽相约攻辽，金取辽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宋取辽燕京析津府（今北京西南），灭辽以后，宋将原输辽“岁币”转输给金。此即为“海上之盟”。

“海上之盟”订立后，赵佶下令于河北地区集结军队，准备攻辽。然而此时，方腊率领起义军在两浙地区给予宋朝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为了尽快镇压方腊起义军，赵佶遂下令，命童贯统领已集结的军队南下征讨。宋、金订立“海上之盟”的消息也传入辽朝，赵佶担心辽朝会因此用兵以报复自己，不禁“深悔前举，意欲罢结约”④。宋朝攻辽举棋不定，使金朝十分不满。宣和三年，金朝派出使者，催促宋朝按原定盟约如期

发兵，赵佶仍犹豫不定，一拖再拖；半年后，才让金朝使臣返回。是年年底，金帝完颜曼以忽鲁勃极烈完颜杲为内外诸军都统，以吴勃极烈完颜昱、移赍勃极烈完颜宗翰，以宗斡、宗望、宗磐等人为副都统，亲征辽朝。宣和四年正月，金军克陷辽中京大定府，辽帝耶律延禧西逃辽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金军紧追其后，三月再度战败辽军。辽军屡战屡败，节节退缩，留守燕京的辽宗室耶律淳在宰相李处温与皇族耶律大石的拥立下称帝，辽统治集团内部分崩离析。宋廷君臣由此感到进攻燕京的时机已到，加之金朝再一次派遣使臣入宋催促出兵，赵佶唯恐坐失战机，燕京会被金军攻占，这才任命童贯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蔡攸为宣抚副使，屯兵于北部边境，准备北进。但同时又令招谕驻守于幽（治今北京）、燕等地的辽军，妄图以大兵压境辅之以招降之策，即可使燕京辽军拱手献城。甚至提出如遇辽军抵抗，则“按兵巡边，全师而还”⑤。

五月，童贯统领大军到达雄州（治今河北雄县），命令都统制种师道等分路进兵。童贯、种师道等人虽握有重兵，仍无心与辽作战，幻想辽军会自己投降，因此亦下令，宋兵“如敢杀一人一骑，并从军法”⑥。宋军自雄州几路进发，前军统制杨可世于兰沟甸与辽军遭遇，战败。继而又于白沟与辽将萧斡交战，又战败。另一路宋军在统制辛兴宗率领下，与辽军战于范村，亦败绩。六月，宋军各路人马均惨遭失败，种师道只得领兵退守雄州，很快，辽军又追击到城下。赵佶得知前线兵败，惊恐万状，立刻下诏，令各路人马撤回。

宣和四年（1122）四月，金军攻占辽西京大同府，继续西征追击辽帝。六月，金帝完颜旻自上京临璜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出发，亲征辽帝。辽帝耶律延禧兵败，率残部退入沙漠之地。于燕京自立为帝的耶律淳病故。这些形势的变化，又一次使宋廷君臣感到有机可乘，宰相王黼以耶律淳病故为由，又命童贯、蔡攸再度集结兵力，以河阳三城节度使刘延庆为都统制，打算对辽燕京守军宣战。但与此同时，宋廷君臣仍对用兵燕京抱有幻想，甚至惧怕。朝散郎宋昭上书劝谏朝廷出兵北伐，竟招致王黼恼羞成怒，赵佶下诏，对宋昭“除名、勒停，广南，编管”⑦。不久，金朝使臣徒孤且乌歇等入宋又一次商议宋军出兵日期。赵佶、王黼与群臣议而不决，只得再派赵良嗣赴金朝暂时应付。正在这时，辽、宋前线局势发生巨大变化，辽涿州守将郭药师投降宋朝，并献

涿、易二州，燕京周围的防御因此受到极大的削弱。而郭药师所部战斗力很强，其降宋后亦壮大了宋军的声势。这一变化又使宋廷君臣感到兵取燕京大有希望，十月，兵马未动，宋廷先改燕京为燕山府，对涿、易等八州也同时赐名改称。而后，刘延庆、郭药师等将领才统兵出雄州，北上驻扎于涿州。

郭药师见刘延庆所部行军毫无纪律，散不成军，遂劝说，刘延庆应于军中设防，否则辽军设伏出击，宋军首尾不应会溃败于一旦。刘延庆却置若罔闻。宋军行至良乡（今北京西南），遇辽将萧斡率兵阻击，刘延庆指挥宋兵与之交战，战败，遂闭垒不敢出战。郭药师向刘延庆请战，认为萧斡兵力不过万人，如今倾巢出动迎击宋军，燕京城防必然空虚。请求拨给5000名精骑兵卒，偷袭燕京，即可攻取城池。同时希望刘延庆派其子刘光世率兵作为后援接应。刘延庆应允，派大将高世宣与郭药师领兵6000袭击燕京。郭药师统兵绕道而行。待天亮时，部将甄五臣率领5000骑兵夺取迎春门，攻入燕京城中。随即，高世宣、郭药师也率部入城作战，宋军与辽军于城中展开激烈的巷战。辽萧后闻讯，密令萧斡迅速撤回救援。郭药师攻入燕京城后，力战辽军。然刘光世所率援兵却失约未至。大将高世宣阵亡，郭药师亦坠落于马下，险些被擒，只得退出燕京。刘延庆见偷袭燕京不成，遂下令于卢沟（今永定河）安营。萧斡见宋军驻防，便分兵袭扰，阻断粮运，擒获宋护粮将王渊和2名兵士。萧斡令将宋兵留于帐中，深夜他谎称辽军3倍于宋军，将以精兵冲击宋营，另分左右翼为策应。随即将一名宋兵释放，被俘宋兵入归宋营，报告给刘延庆。次日清晨，刘延庆果见北岸火起，真以为辽军前来攻击，慌忙烧毁营帐，狼狈逃窜。慌乱撤退之中，宋军兵士相互践踏，死者抛弃于百余里的道路之上，自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以来储存的军械装备损失殆尽。

宋军两度北上进攻燕京均未得手，反而损兵折将，宋廷君臣只好请求金朝出兵，与宋军夹攻燕京。

金天辅六年（1122）十一月，完颜曼下诏，告诫燕京官吏，金军所到之处，凡投降者一律赦免其罪，官职依旧。十二月，完颜曼亲自统兵讨伐燕京，以宗望率7000兵士为先锋，命迪古乃（完颜忠）率部出得胜口（今北京北），银术哥（银术可）领兵出居庸关（今北京西北），又

以娄室所部为左翼，婆卢火所部为右翼；取居庸关。金军大举进攻，使辽军闻风丧胆，辽统军都监高六等投降。完颜曼自南门进入燕京城，令银术哥、娄室于城上列阵。辽知枢密院左企弓、虞仲文，枢密使曹勇义，副使张彦忠，参加政事康公弼等奉表请降，金军占据燕京城，唯辽萧后与少数官吏逃遁。金朝占有燕京后，于次年派遣李靖入宋，以“海上之盟”有约为由，提出将燕京地区每年的赋役归金朝所有，金则归还燕京及六州之地。宋廷君臣先是以为不可，后经双方多次使臣往来，反复商议，方达成协议：宋廷除将原输辽“岁币”转输给金外，每年再增加100万贯钱，作为“燕京代税钱”，一并交予金朝。金朝则将燕京，以及顺（治今北京顺义）、檀（治今北京密云）、涿（今属河北）、易（治今河北易县）、蓟（治今天津蓟县）、景（治今河北遵化）6州之地归还宋朝。

然而，金朝统治集团内部对交还燕京及其属州之议尚存分歧。辽降臣们亦不愿让宋廷接管燕京，认为既然是金军占领，则不应划归宋朝。作为金军统帅的完颜宗翰亦有同感，随即向完颜曼提出废止已订协议，只将先期由郭药师率部投降宋朝时所献易、涿二州划归宋，而燕京及其他州县，则归金朝所有。完颜曼力排众议，坚持如约履行交割事宜，才得使燕京及所辖州县得以归还宋朝。但金军在撤离燕京之时，尽掠城中金帛财富及官吏、富商、百姓，待童贯、蔡攸等领兵进入燕京城，已是“城市邱墟，狐狸穴处”⑧，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

宋、金“海上之盟”中也涉及到辽西京大同府及所辖武（治今山西神池东北）、应（治今山西应县）、朔（治今山西朔县）、蔚（治今河北蔚县）等州的归属问题。及燕京及所属州县以“代税钱”赎回后，宋廷君臣又提用“加币”的办法再赎买大同府及州县。这一请求遭到金廷百官的反对，只有金帝完颜曼表示为与宋朝“永远交好，特许西京地土并民户”⑨，且只要求宋廷向金朝支付犒军费。但西京未及交割，完颜曼即于天辅七年（1123）八月病逝，其弟吴乞买（完颜晟）继位。金天会二年（1124），宋遣使依协议入金，索取西京大同府及所属州县，金西南、西北两路都统宗翰、宗望请求完颜晟不要割大同府等地给宋朝，完颜晟认为这样做“是违先帝之命也，其速与之”⑩。不过宗翰等人并未遵照金帝的旨意，反而变本加厉地阻挠交割大同府。不久，他又提出宋廷“招纳叛亡”，且辽帝西逃尚未擒获，如依约将西京大同府等地划归宋朝，金军

则将失去“屯居之所”。完颜晟同意这一建议，决定废止原协议，不再归还西京等地。

注释①《宋史》卷四七二《赵良嗣传》。

②③《金史》卷二《太祖纪》。

④⑤《三朝北盟会编》卷五。

⑥《三朝北盟会编》卷七。

⑦《宋史》卷二二《徽宗纪四》。

⑧《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六。

⑨《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四。

⑩《金史》卷三《太宗纪》。

第三十一章

开封保卫战金天辅七年（1123）正月，辽平州节度使时立爱投降金朝，金廷遂升平州（治今河北卢龙）为南京，以辽降臣张觉为留守。不久，张觉等辽旧臣错误地认为已被金军追赶得逃入沙漠的辽帝耶律延禧兵势复振，便积极准备“勤王倡义，奉迎天祚，以图兴复”①。五月，张觉等人打出辽的旗号，反叛金朝。消息传入宋廷，赵佶视此为千载难逢的良机，以为用招降张觉之策，即可得到平州地区，遂以高官厚禄招诱张觉降宋五月，金太傅、中书令左企弓，枢密使、侍中虞仲文。枢密副使曹勇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枢密副使权知院事、签中书省康公弼同赴置于广宁府（治今辽宁北镇）的枢密院，途经平州宿于粟林下。张觉派人将他们全部杀害，遂以金南京投降宋朝，宋廷欣然接纳。张觉的背叛行径及宋廷的招降引起金廷极大的忿慨，尤其是张觉拥兵5万屯驻于润州近郊，威胁到迁、来、润、隰4州，更是不能容忍。金廷立刻派南路军帅阇母统兵征讨，几次交战，阇母军取胜，然再战于兔耳山，阇母军大败，张觉遂向宋廷报捷。宋廷改平州为泰宁军，以张觉为节度使，并赠银绢数万作为犒赏之费。

金帝完颜曼病逝，其弟吴乞买（完颜晟）继位为帝（金太宗），再令宗望统领阇母所部讨伐张觉。张觉于南京城东与宗望军大战，惨败而逃奔宋朝，进入燕京城。宗望随即以招纳叛逆为由，责问宋河北、河东、燕山府路宣抚司，并索要张觉。起初，三路宣抚使王安中将张觉藏匿于甲仗库，而谎称未见张觉。宗望依旧索要，王安中便斩杀一位貌似张觉者，交予金军，但被金人识破。无奈，王安中只得令张觉出来，历效其罪，张觉破口大骂。王安中下令将他斩首，将首级送交宗望。原燕京辽降将及辽常胜军闻讯皆涕泣，人人自危。

金天会三年（1125）二月，金军统帅娄室率所部歼灭辽残余军队，俘获辽帝耶律延禧，辽朝灭亡。金臣阇母、斡鲁相继上奏，陈述宋廷违背“海上之盟”誓约之事，宗翰、宗望则请求朝廷发兵，征伐宋朝。十月，金帝完颜晟下诏，以谙班勃极烈完颜杲兼领都元帅，以赉勃极烈宗翰（粘罕）兼左副元帅先锋，经略使完颜希尹为元帅右监军，左金吾上

将军耶律余睹为元帅右都监，统兵自西京南下太原（今属山西）；以六部路军帅挞懒为六部路都统，斜也为副都统，宗望为南京路都统，阇母为副都统，知枢密院事刘彦宗兼领汉军都统，自南京南下燕山府（今北京西南）。不久，又以阇母为南京路都统，埽喝为副都统，宗望为阇母、刘彦宗两军监战。东、西两路金军相约会师于宋都城开封。

十二月，金军两路南侵。在此之前，宋廷侦知金军集结，遂派童贯赴太原，宣抚河北、燕山。童贯立刻派马扩、辛兴宗出使金朝，以缓和局势，宗翰则指责宋廷纳降张觉，且遣使告之以武力征伐，又劝说童贯速割让河东、河北两地给金朝，以示谢罪。童贯不知所措，却打算一逃了之。太原留守张孝纯责备说："金人渝盟，王当令天下兵悉力枝梧，今委纵而去，是弃河东与敌也。河东入敌手，奈河北乎?"童贯反而怒叱道："贯受命宣抚，非守土也。"张孝纯叹息道："平生童太师作几许威望，及临事乃蓄缩畏慑，奉头鼠窜，何面目复见天子乎?"②童贯全然不顾张孝纯等人的反对，逃回开封。与此同时，宗望也派使臣赴开封，要挟宋廷。大臣李邦彦等人竟面无人色，鄙言探询求和之法，金使厉声答道；"不过割地称臣尔。"宋廷君臣随即遣使人金求和。

东路金军侵入宋境后，连克檀、蓟二州，进围燕山府。宋守将郭药师、张企徽、刘舜仁于白河迎击金军，不敌战败。郭药师遂献城投降，燕山府及所辖州县悉为金军占据。宗望继而指挥金军继续南下；于真定（今河北正定）击溃阻击的宋兵，再克信德府。西路金军则相继攻占朔、武、忻（今属山西）、代（治今山西代县）等州。进而围攻太原。耶律余睹于汾河北击败宋河东、陕西的援军。宋太原守将王禀率领全城军民奋力抵抗金军的进攻，从而牵制了西路金军的继续南下。东路金军在收降郭药师后，又委以他作为先锋，随大军直奔开封。

金军两路南侵的消息传入开封，宋廷君臣慌作一团。赵佶急忙下诏"罪己"，令朝廷内外直言极谏，评论朝政得失。同时下令罢除浙江诸路"花石纲"、"西城所"和内外制造局，停止营建延福宫，撤销册封道官及大晟府、行幸局。归还"西城所"所括土地给原来拥有者。又令各地官民起兵"勤王"。赵佶的一系列举动实际是为遮掩自己躲避战争威胁的目的。为了利于随时撤离开封。南逃金陵（今江苏南京），赵佶委以皇太子赵桓为开封牧，欲令其"监国"，而派户部尚书李税先行出守金陵。权

直学士院兼侍讲吴敏认为："朝廷便为弃京师计，何理也?此命果行，须死不奉诏。"③太常少卿李纲甚至刺臂沾血上疏："皇太子监国，典礼之常也。今大敌人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间，犹守常札可乎?名分不正而当大权，何以号召天下，期成功于万一哉?若假皇太子以位号，使为陛下守宗社，收将士心，以死捍敌，天下可保。"④在其他臣僚的坚持下，赵佶终于同意内禅，让赵桓继位为帝。此时东路金军长驱直入，进至中山府（今河北定县）时，守将詹度指挥军民顽强抗击，斩杀金军大将蒲察、绳果，使金军于城下一再受挫。金军见一时难以破城，遂绕城南下，距开封尚有10天左右的路程。吴敏再次请求赵佶于3日之内传位赵桓，否则时间紧迫，赵桓继位已来不及组织军民抗金。赵佶为了尽快脱身，同意立刻传位。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二十三日，他装作患病，跌倒在地。昏迷不醒，大臣们见状，慌忙灌药。须臾，赵佶假装苏醒。伸臂示意取纸笔，颤抖着用左手写道："皇太子可即皇帝位。"赵桓随即继位，是为宋钦宗，赵佶则以"教主道君太上皇帝"之名，退居内宫。

宋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军南征已接近黄河。宋廷急，速派兵北渡黄河增援滚州（治今河南浚县），可是兵士多年不训练，毫无作战力，而军将只饮酒作乐，风闻金兵临近，竟不战自溃，滚州随即陷落。驻守黄河南岸的宋兵亦慌乱烧毁黄河上的桥梁，夺道而逃，致使黄河防卫顷刻空无一人。金军到达黄河北岸，起初只搜索到十余艘小舟，每舟乘六七人渡河，后来又找到几艘稍大的船，故连渡数日方使金军南渡完毕。然而渡河未遭受宋军的丝毫抵抗，竟使金军将领也感到难以置信。正月初三，金军渡黄河南下的消息传入朝廷，原打算第二天赴亳州（治今安徽亳县）的太上皇赵佶当即决定逃离开封。深夜，他与大臣蔡攸仅偕几位内侍慌忙出通津门东逃。一路上，他嫌船行太慢，改乘小轿，又改乘运砖船，赶到南京（今河南商丘），再改乘骏骡，到符离（今属安徽）才乘上官船，一路折腾，直到泗上方敢稍事休息。稍后，童贯、高俅率"胜捷兵"赶到，赵佶方有扈从侍卫。他随即继续南逃到扬州（今属江苏），竟顾不得太上皇后，自己先逃过长江到达京口（今江苏镇江）。而未能跟上的皇子、皇女们，则只好暂时栖居于沿途州县。赵佶的南逃，亦引起朝廷内极大的恐慌，许多臣僚也悄悄紧随其后，逃离京城，寻找安全之地。

刚刚即位的赵桓对劝说赵佶"内禅"的吴敏、事纲等人给予重用，以

吴敏为门下侍郎，李纲为兵部侍郎。此时朝野人士对蔡京等人的祸国殃民罪行已是深恶痛绝，太学生陈东等人上书，历数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之罪，谓之“六贼”，请求将其诛杀。赵桓出于无奈，只好将“六贼”或贬官流放或赐死，以平息民忿。

面对金军咄咄逼人的攻势，宋廷君臣人心惶惶，众说纷纭，出现抗击与逃避两种截然相左的意见。李纲主张赵桓应像当年宋真宗那样，亲自统兵北上征讨，在其他王战派官僚的要求下，赵桓被迫下诏“亲征”。其时，金兵已逼近开封。口称“亲征”的赵桓心里却想着出逃至襄阳（今湖北襄樊）及邓州（治今河南邓县），遂委以李纲为东京留守。统帅开封城军民抗击金军，便于自己脱身，故当给事中王寓直谏“亲征”之事，竟给予罢官。李纲得知宋帝的真实意图后，立刻劝谏他不要退却，并明确告之臣僚：“上意已定，敢有异议者斩尸⑤于是最终制止了宋帝的出逃。李纲随即被任命为尚书右丞。第二天，又改任他为亲征行营使，以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曹曚为副使，负责开封城的防卫之事。

受命于危难之时的李纲立即组织军民积极备战，修城楼，挂毡幕，安炮坐，架弩床，运砖石，施燎炬，垂檑木，备火油，守战之具无不齐备。又于开封城四面，每面配备正兵1200余人，另有厢军及保甲兵协助作战。同时组织马步军4万人，分作前、后、左、右、中五军，每军8000人，每日操练习武。以前军驻守通津门（东水门外），保卫内储粮40万石的延丰仓；后军驻军于朝阳门（宋门）外，防守城濠；其余三军为总接应。心虚胆怯的赵桓对此仍不放心，一面遣使赴各路，督催地方官府尽快发兵救援开封，一面又派尚书驾部员外郎郑望之，亲卫大夫、康州防御使高世则出使金军，进行谈判。

李纲积极备战才数日，金军已到达开封城下，驻扎于城西北郊牟驼岗。是夜，金军分乘几十艘船，沿汴河而下进攻宣泽门（西水门）。李纲派出2000名敢死队布列于城下，待敌船临近，即用长钩钩住，拖至岸边，投掷石块砸烂船只。又于水中钉入木桩，阻挡敌船。另搬运蔡京宅第内的山石堵住宣泽门。经过一夜的激战，金军在损失百余兵士的情况下，于清晨被迫撤兵。李纲来不及休息，赶入朝中禀报战况。有军士人报，金兵复又进攻酸枣门、封丘门，李纲急忙率一千名射手，赶赴酸刺门、封丘门，指挥抗敌。他们刚到达，金兵已渡过城濠，搭云梯攻城。

正当危急之时，李纲急令兵士射杀金兵，并翠官员登城督战。又派壮士数百人，缒城而下，放火烧毁数十座云梯。城上守军用檑木，弓箭进行还击，多次击退金军的攻城。金军随即又转攻通津门、景阳门等处，李纲仍亲自前往督战，从卯时（今5至7时）直战至酉时（今17至19时），杀死金兵数千人。金军多处强攻均遭挫败，死伤颇多，只得再次退兵。李纲率领城中军民终于胜利地保卫了京城。

金军未能攻入城中，统帅宗望遂改以议和，以迫使宋廷让步，他要求宋帝委派大臣前来金军营帐商议。李纲请求派自己前往，但赵桓既希望李纲领兵抗击金军的围攻，又唯恐他过于刚直强硬，于议和不利，而另派同知枢密院事李悦为谈判使臣。李纲劝阻赵桓说："安危在此一举，臣恐李悦怯懦而误国事也。"⑥赵桓不听，反而授权李悦可以增"岁币"三五百两、犒军费三五百两，另赠宗望黄金一万两及酒果之物。不料宗望却提出以宋纳金犒军费黄金500万两、银5000万两、杂色缎100万匹、绢帛100万匹、牛马骡各1万头匹、驼1000头；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今属河北）3镇；尊金帝为伯父；以宋皇室亲王、宰相作为人质?护送金军北渡黄河，才许议和。李悦不置可否，还回城中禀报。李纲坚决反对以增币、割地、遣亲王为质的做法，主张派遣能言善辩之十与宗望论议所提条件，拖延数日，待宋军增援集结于开封，金军孤军深入，即使得不到犒军费，也会急速撤兵。然而赵桓与大臣却同意宗望的议和条件，李纲抗争不成，遂提出辞职。赵桓不许，令他出宫巡视城防。可待他一出去，赵桓却将应允议和的誓书交予金军，又将康王赵构与宰相张邦昌作为人质派往金军。李纲返回宫中，知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的诏书发出，即令扣留不发。

宋廷发出誓书后，便每天向金军输送币帛，金军邀索不已，并于开封城郊肆意屠杀掳掠。而宋"勤王"援兵纷纷赶到，达20多万兵力。李纲希望由自己统领各路援军，但群臣却主张另置宣抚使臣，以河东、河北路制置使种师道为宣抚使，总领"勤王"援兵及驻于开封城外的亲征行营使司所辖前、后军。李纲又提出切断金军粮道，夹困金军，索回誓书，逼迫其退兵。可都统制姚平仲却提出夜袭金营，生擒宗望，劫回赵构。赵桓同意姚平仲的主张，并订于二月初一实施夜袭行动。姚平仲急于邀功，先期率步骑万人出发，不料消息已泄露，金军早有提防，姚平仲偷袭大败，惧怕治罪竟弃军而逃。半夜，李纲接到赵桓谕旨，称姚平仲已

率兵出发，令他急速增援。李纲火速领兵出击，但刚出封丘门（永太门），即与金军遭遇。李纲指挥兵士射杀，才击败金军的进攻。太宰兼门下侍郎李邦彦将夜袭金营失利的责任推给李纲和种师道，赵桓遂罢免李纲，以示向金军谢罪，又废亲征行营使司，先后派驸马都尉曹晟和资政殿大学士宇文虚中、知东上阁门事王球携割让三镇的诏书、地图赴金营议和。

宋廷的投降举措，于朝廷内外激起极大的忿慨。二月初五，太学生陈东等率诸生数百人到宣德门上书请愿，要求复用李纲、种师道，罢免李邦彦。京城数万民众赶来声援，正遇李邦彦入朝，众人历数其罪行，投掷砖瓦，李邦彦慌忙骑马夺路出逃。众人砸烂登闻鼓，呼声惊天动地，并打死宦官数十人。赵桓不得已，只好宣旨重新起用李纲为尚书右丞、京城四壁防御使。李纲复出，开封军民为之振奋，次日，再次挫败金军进攻。开封城外20万"勤王"援军亦准备出击，李纲下令重赏杀敌者，将士无不为之奋跃，抗金形势再度好转。但执意议和的宋帝赵桓仍旧派遣使臣前去金营，答应金军提出的支付犒军费和割让3镇等项条件，又以肃王赵枢替代康王赵构，又改少宰兼中书侍郎张邦昌为太宰兼门下侍郎，完全满足了金军所提出的各项苛求。金军统帅宗望眼见开封城外陆续集结了20多万宋朝援兵，开封城又固若金汤，自己所统6万金兵是孤军深入，难以长久对峙，况且所提议和条件均已得到满足，所以不等宋廷凑足金银，遂于二月初十下令撤军。开封之围随即解除。

注释①《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七。

②《宋史》卷四六七《童贯传》。

③《宋史》卷三五二《吴敏传》。

④《宋史》卷三五八《李纲传上》。

⑤李纲《靖康传信录》卷一。

⑥《宋史》卷三五八《李纲传上》。

降战之争木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金军兵分东、西两路，大举

南侵，一心想逃离京城开封的赵佶（宋徽宗）下诏内禅，让位给长子赵桓。赵桓即位，是为钦宗，次年改元“靖康”。当金军逼近开封之际，赵佶与蔡京子蔡攸竟连夜出城南逃。蔡京、童贯等人也相继携家眷、财富，慌忙逃跑。童贯竟然拒绝接受赵桓委以其东京留守之职，而与高俅等率“胜捷兵”紧随赵佶之后，妄图下两浙路，再拥戴他为帝。赵佶一伙于大敌当前出逃，引起宋廷的极大恐慌，臣僚纷纷逃离京城，激起朝野有志之士的忿慨，指责“六贼”祸国殃民，卖国求和。太学生陈东先后3次上书，揭露“六贼”的罪行，“误我国家，离我民心，天下困敝”。恳切希望赵桓“擒此六贼，肆诸市朝，传旨四方，以谢天下”①。当初赵佶内禅，赵桓推让之际，王黼等人曾引郓王赵楷上殿，企图拥立他为帝。而此刻，这一伙人相继逃到东南以后，又以“太上皇帝圣旨”之名，截留了这一地区上缴朝廷的物资，甚至扣留“勤王”援兵，实际把持了东南地区的行政、经济、军事大权。“控制大江之险，奄有沃壤之饶，东南于百郡县，必非朝廷有”②。甚至准备在镇江（今属江苏）请赵佶重新登极。这对刚即位的赵桓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赵桓对童贯一伙的行径大为不满，为了维护自己的帝位，他重申了赵佶于退位时所表示“除教门（指道教）事外，余并不管”③的诺言，以此下诏剥夺赵佶、童贯等一伙的权力。继而又将未随赵佶南逃的梁师成、王黼、李彦等人“赐死”。二月初，赵桓准备派知开封府聂昌挂淮浙荆湖制置发运使之职，赴东南秘密处置蔡攸、童贯、朱动等人。尚书右丞李纲恐处置不当节外生枝，建议将他们贬官，并请赵佶返回京城。不过，赵桓与其父赵佶只是在权力的分配上暂时出现了矛盾，而在对待金军入侵的问题上，父子都是主张议和的投降派。赵桓不顾李纲率领开封军民奋力抗击金军和20万“勤王”援兵集结于开封近郊的有利形势，依旧满足了金军统帅宗望提出的赔款、割地等议和的条件，换取到金军的撤退。二月十七日，他听说金军已渡黄河北返，第二天便下诏，贬蔡京、蔡攸、童贯官职。蔡京病死贬所，长子蔡攸、次子蔡倚被诛。赵桓又派御史于南雄州（治今广西南雄）杀死童贯，朱勔亦被赐死。赵桓的做法使赵佶感到不妙，极力为自己开脱、辩解，又给赵桓写密信，表示要“甘心守遭，乐处闲寂”④，无意再当皇帝。

金军虽然北撤，但威胁尚存，赵桓还想依靠李纲等主战派保卫自己的安全，便委任他为知枢密院事，主持军事。此时，金军统帅宗翰率西

路金军继续南下，宋廷再度惊慌失措。赵桓一面任命中太乙宫使种师道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保静军节度使、殿前副都指挥使姚古为二路制置使，分别领兵人河北、河东。一面又派使臣前往泽州（治今山西晋城）向金军述说订立和议之事，请求宗翰退兵。种师道、姚古统兵分赴两地，枢密院令他们进攻金军，宰相府却令他们让金兵出境，竟使他们不知如何行事。宗翰知道宋、金已有和议，遂班师返回太原等待宋使前来交割。

为了表现议和的诚意，以换取一时的太平，投降派官僚竭力讨好金人，赵桓向被割让的三镇之地派出割地专使，与金军办理交割事宜。但投降派丧权辱国的求和行径，遭到力主抗击金军的主战派官僚的坚决反对和抵制。自西路金军南下时就已受围攻的太原城军民，拒绝出城接受宋帝的割地诏书，继续反击金军的进攻。宗翰见太原城一时难以克陷，便让银术可率部分金军继续围攻太原城，自己则统军退回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宗望率东路军自开封北撤到达中山（今河北定县）、河间府（今河北河间）两镇时，守城的军民拼死固守，拒不投降。宗望令随军的宋朝人质、肃王赵枢，太宰兼门下侍郎张邦昌和割地专使到城下劝说守城军民献城投降，但得到的回答是城上射出的利箭和投掷的石块。

金军北撤，宋廷曾令种师中与姚古等统兵将金军“逐出境”。姚古所部遂乘宗翰北上之机，一举收复隆德府和威胜军等失地。种师中统兵尾随北撤的宗望金军之后，到达真定（今河北正定）时，即接宋廷命令，进援太原，与姚古部互为犄角，以解救太原之围。种师中随即挥师西进，出井陉关（今河北井陉北），相继收复寿阳（今属山西）、榆次（今属山西）。五月初，前锋部队进抵置巨太原城仅20里的石桥。种师中一路西进，几乎未遇金军的抵抗，只有零散放牧的金兵。探报以为金军大部已北撤，知枢密院许翰亦信以为真，几次派人到军中督令种师冲出兵攻击。种师中也以为金军无主力在此，未作认真布置。金将翰论活女率主力金军前来攻击，宋军仍认为是小股军。种师中遂令后军出击收捉。于寿阳石坑，宋军遭到金军袭击，宋军仓促应战，五战三胜，又返回榆次。种师中在出击前，曾与姚古、张灏两军约定共同发兵，且均不带辎重。然而种师中孤军进发，姚古、张灏却失期未至。街种师中进至杀熊岭时，因粮草断绝，兵士饥饿难忍。金军侦知，遂集中兵力勐攻，宋军右翼和前军先后溃败。种师中率领部将与金军死战，自卯时（今5

—7时）直激战到巳时（今9-11时），宋军用神臂弓多次击退金军的进攻，终因寡不敌众，种师中身中数枪，力战阵亡，余部退守平定军（今山西平定）。姚古率部增援，被金军阻地盘陀，遂退至隆德府。张灏所部亦遭金军攻击，失利后撤。宋军出战失利，终未能解救被金军围攻的太原城。

宋军战场上的失利，再度引起朝廷中投降派与主战派的争论。门下侍郎耿南仲等人力主割让3镇以求和，李纲等人则坚决反对。为了排挤李纲，耿南仲借太原之围未解之机，向赵桓提出："欲援太原，非纲不可。"⑤赵桓令李纲接替因病归朝的种师道，出任河北、河东路宣抚使。李纲清楚赵桓、耿南仲等人的用意，便以自己是书生，并不懂得用兵，恐会殆误国家大事为由，请求辞去此任，又以身患疾病，请求辞官，都被宋帝拒绝。陈过庭、陈公辅等臣僚也认为这样做是陷害李纲，他不能离开朝廷。不料，赵桓竟为此大怒，下令罢免陈公辅等的官职，依然坚持令李纲出朝任宣抚使。

河北、河东路宣抚使司仅有兵士1200人。且马匹甚少，因此李纲受命后提出要在京城"括马"。赵桓先是应允，继而又出榜称："宣抚司括马，事属骚扰，可更不施行。"⑥李纲请求拨给银绢钱各百万，以解决军需，却只得到20万。李纲考虑出任宣抚使还有许多事尚待办理，请求延缓出发的日期，赵桓指责他是"迁延拒命"。李纲上疏陈述不能如期出发的理由，仍未获准。临行之时，他又告诉赵桓，朝廷若重用奸臣，必将误国。

李纲出任宣抚使后，先处置了谎报军情、搅乱军心的将领，以严肃军纪。又宣布对不月良从军令、抢劫百姓财产者给予正法，以扭转宋军腐败涣散的状况。进驻河阳后，李纲利用10余天的时间训练兵士，修整军械装备，为进击金军，解救太原之围做准备。继而又进驻怀州（治今河南沁阳），准备汇集"防秋之兵"再进兵太原。可就在这时，赵桓下诏。罢减各地调集的防备金军秋季入侵的军队。李纲为此上奏抗论，指出："太原之围未解，河东之势甚危，秋高马肥，敌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对朝廷朝令夕改的作法，他认为已于抗金极为不利，故自己"不足以任此"⑦。赵桓对李纲的上疏毫不理会。反而批复令他马上起兵赴太原解围。李纲无奈，只好于隆德府召集诸将领，定于七月二十七

日各自统领所部进兵太原。然而各路主将均接受朝廷的直接指挥，凡事皆需禀报朝廷，或执行朝廷的指令，李纲的宣抚使司徒有指挥的虚名。为此，李纲再次上书，力陈宣抚使司无实权的弊端，可仍未见赵桓答复。

约定出兵的日期已到，唯有威胜军一路宋兵开拔，而平定军、汾州（治今山西隰县）、辽州（治今山西左权）三路宋军“皆逗留不前”。威胜军行至南北关，与金军遭遇，两军转战4日，互有胜负，伤亡相当。金军增援部队赶到，合力进击，威胜军却无援应，力战不胜，遂败退。李纲准备将各路宋军聚拢，缩短战线，避免为金军各个击破，而后由他亲自统领，赴太原与金军交战。此时，宋廷中投降派与主战派臣僚间的抗争亦愈演愈烈，赵桓为首的投降派已将原定割让3镇的议和条件，改为用代税钱替代，并积极与金朝协商洽谈。投降派已于朝廷中占据主导的地位，主战派官僚随之相继遭排斥，被赶出朝廷。太宰兼门下侍郎徐处仁被罢官，贬为知东平；少宰兼中书侍郎吴敏被罢知扬州；同知枢密院事许翰罢官，贬为知亳州。而投降派官僚则被擢升，以中书侍郎唐恪为少宰兼中书侍郎，以尚书右丞何桌为中书侍郎，礼部尚书陈过庭为尚书右丞，开封府尹聂山为同知枢密院事，御史中丞李回为签书枢密院事。李纲闻讯，叹息道：“事无可为者矣!”八月，赵桓又命种师道重新出任，以同知枢密院事领宣抚使司，而召李纲返回京城，不久便被免职，出任知扬州。九月初，他未及到任，又以他“专主战议，丧师费财”之罪名被贬官。

投降派控制朝政，给抗击金军的斗争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除部分主战派军将领兵与金交战外，朝廷再未组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甚至不再过问被围困的太原城。而局部的抗金斗争，也因孤军作战，无一取胜。河东察访使张灏与金军战于文水县（今属山西），战败。都统制张恩正又夜袭文水县金兵，失利。次日再战，又溃败，阵亡数万人。张思正逃至汾州。都统制折可求于子夏山与金军交战，亦遭惨败。宋军在战场上的失利与宋廷的投降求和，更使河东一带的百姓对抗击金军入侵失去信心。威胜军、隆德府（今山西长治）、汾州、晋州（治今西临汾）、泽州、绛州（治今山西新绛）等百姓恐金军侵掳，纷纷渡过黄河南逃，以至“州县皆空”。

注释①《长编纪事本末》卷一四八。

②《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二。

③《靖康要录》卷一。

④《靖康要录》卷四。

⑤《宋史》卷三五八《李纲传》。

⑥李纲《靖康传信录》卷三。

⑦《宋史》卷三五八《李纲传》。

靖康之难开封保卫战之后，金军北撤，宋廷内的投降派势力再度甚嚣尘上，在赵桓的支持下，先后将主张以武力抗击金军的太宰兼门下侍郎徐处仁、少宰兼中书侍郎吴敏、同知枢密院事许翰罢贬出朝，李纲也被责以“专主战议，丧师费财”，遭贬去职。而以原中书侍郎唐恪、尚书右丞何、礼部尚书陈过庭、开封府尹聂昌、御史中丞李回为代表的一批力主议和的官僚相继被擢升，执掌朝廷要政。

这时，另一位投降派的重要人物、太上皇帝赵佶也自江南返回开封，宋廷随之又恢复了“文恬武嬉”的局面。赵桓一伙极力粉饰太平，对“防边御寇之策，反置而不问”①。他们非但不积极组织兵力防范金军的入侵，反而下令命各路赴开封的“勤王”援军撤回原驻地，而使防务更加空虚。对遭金军连续数月围攻的太原城（今属山西），亦不作认真的救援部署，只是将率领全城军民拼死抗击金军围攻的主将王禀由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镇西军承宣使，改授为建武军节度使，以“录坚守太原之功”②。宋廷的腐败使朝野有识之士为之痛心，百姓亦对抗金失去信心，“威胜、隆德、汾、晋、泽、绛民皆渡河南奔，州县皆空”③。

宋廷的虚弱无能，更助长了金廷的嚣张气焰。宋靖康元年（1126）八月，完颜晟（金太宗）下诏，仍以宗翰、宗望分统西、东路军，自大同府（今山西大同）、保州（治今河北保定）南下，目标仍是开封。

太原城自宋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被金军围攻以来，在王禀的率

领下，城中军民已击退金军无数次的进攻，在外无援兵，内乏粮食军械的情况下，仍抗拒赵桓停止抵抗，献城交割的诏书，坚守城池。金统帅宗翰到达太原城郊后，又指挥金兵加紧围攻，展开更为勐烈的攻势。他令金军于城外修筑保垒，环围城池，彻底阻断太原城内外的联系与交通。城中军民存粮已尽，则以弓弩之筋泫、皮甲、树皮及草根充饥。在数月的激烈战斗中，城中军民伤亡及饥饿身亡者甚众，尚存者亦体力难支。九月初三日，坚守长达近9个月的太原城终被金军攻破。王禀又率领太原军民与金军巷战，身中数十枪，投水自尽，全城军民大多壮烈牺牲。

东路金军在宗望的统领下，再次经中山府（今河北定县），直扑真定府（今河北正定）。真定府于金军第一次南侵时，全城军民在守将刘韐的率领下奋起抗击，未能使金军破城。金军北撤后，城中大部分兵力随刘袷前去救援太原，故金军再次围攻时，城中守军尚不足2000人。真定知府李邈、守将刘翊（䇯、䇯朔）依然率领全城军民顽强抵抗，并上书宋廷求援，但先后30多次的奏请竟被朝廷搁置不理。在坚守了40余天后，真定府陷落。刘翊又率军民与金兵展开巷战，力竭自尽。李邈被俘，押往金燕京府（今北京西南），不屈被害。

太原、真定相继失守，金军东、西两路遂长驱直入。正抱病出任宋同知枢密院事的种师道立即檄召方组建的四道都总管府，令南道都总管和西道都总管府所属陕西制置使，急速率“勤王”兵赴开封。又上奏赵桓指出金兵必会大举再侵，请朝廷及早作好御敌的准备。赵桓见到奏疏，却认为种师道是大惊小怪，遂以议事为名，又将他召回开封。种师道扶病赶回京城，不久病故。

此时，西路金军又克陷汾州（治今山西汾阳），知州张克戬、兵马都监贾直阵亡，又攻占平定军（今山西平定）。宋廷仍欲以三镇代税钱向金朝求和，令王云出使金军。王云返回，称金军坚持要割让太原、中山、河间府（今河北河间）3镇，才接受议和。赵桓召集百官，在尚书省商议，少宰兼中书侍郎唐恪、门下侍郎耿南仲等人坚决请求割让3镇，以求与金军议和。右谏议大夫范宗尹甚至伏地痛哭恳请。赵桓派尚书左丞王寓随从康王赵构前往宗望军中谈判，王寓随即提出辞官，赵桓即将他贬官，又以知枢密院事冯澥替代。而金军继续南攻，西路金军又

相继攻陷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威胜军（今山西沁县南）、隆德府（今山西长治）、泽州（治今山西晋城）。东路金军也已推进到黄河北岸，宋宣抚副使折彦质率领12万兵前去阻击，被金军击溃，知河阳燕瑛、西京留守王襄竟弃城而逃。康王赵构与冯澥未至金军便返回开封，赵桓很生气，将冯澥罢官，再令刑部尚书王云随同赵构出使宗望军中，同意割让3镇，向金帝进献衮冕、车辂，并尊金帝为皇叔，上尊号。金军又渡过黄河，折彦质与提刑按察使许高再相继兵败。金军遣使入开封，要求宋廷尽割让河北之地。赵桓又派资政殿学士冯獬和李若水为割地请和使，赴宗翰军中求和。

十一月中旬，宋东路割地请和使赵构和王云一行到达磁州（治今河北磁县）。知磁州兼河北义兵都总管宗泽率领兵民方击败金军的进攻。城中军民告之赵构；金军已从邻县渡黄河南下，请求他们不要北上求和，而应起兵进援京城。有人发现王云行囊中夹有“番巾”，指责其为奸细，人们气愤已极，将他打死。赵构无人随同，只得暂留磁州。相州知州汪泊彦闻讯，邀请他前来本州，赵构便又退回相州（治今河南安阳）。赵桓为了满足金军不断升级的苛求，尽快议和，以求得金军后撤，在第一批割地请和使分赴东、西路金军之后，又派耿南仲出使宗望军中，聂昌出使宗翰军中，同意与金朝划黄河为界，河北之地悉归金所有。然而宋廷一系列的求和活动，丝毫没有阻止金军向开封的推进。十一月底，东、西两路金军先后到达开封城下。

金军兵临城下。赵桓一伙一面任命京兆府路安抚使范致虚为陕西五路宣抚使，令他督催“勤王”兵人援开封。又派人秘密出关召兵，约康王赵构和河北地方守将领兵赶赴开封。一面又害怕大量的宋军聚集城下，会激怒金人，影响割地求和的谈判，竟下令命已率兵奔赴开封的南道都总管张叔夜和陕西制置使钱盖不得妄动，一律返回原驻地。对金军提出的划黄河为界，赵桓表示：“一一专听从命，不敢依前有违。”④并且派朝廷重臣与金使一同前往河北各地，办理交割事宜。

宋廷投降行径，再度激起河北、河东地区军民的反对和抵制。聂昌与金使在绛州（治今山西新绛）交割时，一齐被当地百姓打死。耿南仲与金使在卫州（治今河北汲县）交割时，也险遭“乡兵”的处置，金使仓皇出逃，耿南仲也连夜逃人相州，且不敢再提割地之事。开封城内军民

对投降派也恨之入骨，宰相唐恪于巡视城防途中，险遭百姓的痛击，赵桓只得将他免职，以平民愤，又以主张抗金的门下侍郎何桌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并派人持蜡书到相州，委康王赵构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知中山府陈亨伯为元帅、汪伯彦、宗泽为副元帅，并令尽发河北兵人援开封，又诏诸路兵马火速赶往京城。但赵桓于金军兵临城下之际才采取的这些措施，都已为时太晚。

十一月二十五日，金军开始对开封城进攻，通津门、善利门、宣化门先后遭到金军勐烈的攻击，守将范琼、姚仲友等率兵士顽强击退金军的进攻，范琼反击出城，焚烧金军营寨，守城将士甚至“缒城”杀敌，焚毁敌炮架、鹅车等军械。宋军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统制官高师旦等众多将士阵亡。赵桓雨雪中披甲登城，以御膳赐十卒，自己则食兵士之食。但进入闰十一月，天气骤寒，雨雪纷纷，滴水成冰，兵士握不住兵器，甚至有冻死者。可“勤王”之师迟迟不到，城中兵力可用者只有3万，亦已失去十之五六。金人攻城愈急范琼率千余兵士出城迎战，渡河时因冰层破裂，淹死500余人，士气大挫。赵桓又听信成忠郎郭京的妖言，令其率“神兵”出击，二十五日，郭京打开宣化门，“神兵”出城，随即大败。郭京又声言下城作法，却领余兵开城逃跑，金军乘机攻上城墙。

金军虽攻占城墙，城中军民抗金斗争并未停止，他们杀死前来“议和”的金使，并自发地组织起来抗击金军，仅到官府请求领取甲胄和武器的民众就多达30万人。金军下令纵火屠城，何桌率领百姓与之巷战，金军急忙于城上修筑对内的防御工事，不敢下城。尽管开封城内军民仍在顽强地与金军战斗，可赵桓已吓得魂不附体，当金军女一次提出议和的要求时，他立刻表示接受。金军要求太上皇赵佶前往金军营帐议降，赵桓以太上皇“惊忧而疾”为由，提出自己亲往。他从金军返回城中不久，又上降表，并派遣聂昌、耿南仲、陈过庭随金朝官员分赴河东、河北两地交割土地。两河地区的百姓坚决反对宋廷的投降割地求和，除石州（治今山西离石）一地降金外，其他地区的民众与军队均坚守城池，拒不执行诏令献城投降。赵桓只得再次下诏，令两河百姓“开门出降”，但收效依然甚微。

宗望、宗翰进一步提出，要求宋廷收缴民间百姓手中的武器，又向宋朝邀索犒师之费：绢1000万匹、金100刀锭、银1000万锭。缎1000万

匹。宋廷竭尽全力于城中收罗搜刮，可除绢凑够要求酌数额外，其他物品“十分未及所需之一”。宗望、宗翰等人对此很不满意，于靖康二年（1127）正月，再次要求赵桓赴金军营地，随即被扣押，声言待交纳足数，方可放还。宋廷于是在全城拼命搜刮金银，凡钗钏在铢两以上皆被强行收走，一时间满城悲戚愁叹，民不聊生。

百姓请求官府发放武器，却遭到拒绝，于是铤而走险，私自打造兵器，乘黑夜捕杀下城剽掠的金兵。宋廷对金兵“为百姓掩杀甚多”，感到十分惊恐，下令严禁“以防护为名，于炉头打造兵器”⑤，还将违反禁令的百姓斩首示众，以此阻止城中百姓的抗金斗争。

二月初六日，宗望、宗翰令宋廷臣僚推举异姓为帝，并废赵佶、赵桓二帝。初七日，金军又要求太上皇赵佶人金营，且根据内侍邓述提供的赵氏宗室名单，将诸王及其子孙尽收人金营，十一日，宗望、宗翰又强迫赵佶召皇后和皇太子赴金营，同时追令张邦昌为傀儡。他们见提出的搜括金银数量仍未凑足，认为宋廷官员搜刮不力，竟然杀死户部尚书梅执礼、户部侍郎陈知质、刑部侍郎程振、给事中安扶。

三月初七日，金人扶植下的张邦昌正式称帝，创建伪楚政权，不久，金军按照名单人城收取赵氏宗室成员，以便全部带到金营之中。开封府尹徐秉哲竟下令，要求百姓相互结保，不得藏匿宗室成员及子弟。三月底，金军带着赵佶先行北上，返回金朝。

四月初一日，宗望、宗翰又带着赵桓及皇后、皇太子，以及赵氏宗室、大臣3000余人，和掠夺的金银财宝，“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车辂、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秘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图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艺，工匠，娼优”⑥等，满载北归。宋廷府库的积储，遂为之一空。北宋亦随之灭亡。

南宋绍兴五年（1135），赵佶死于金朝，三十一年（1161），赵桓亦死于金朝。

注释①李纲《靖康传信录》卷三。

②《宋史》卷二三《钦宗纪》。

③《宋史》卷三五入《李纲传》。

④《大金吊伐录》卷上。

⑤《三朝北盟会编》卷七七。

⑥《宋史》卷二三《钦宗纪》。

赵构重建宗室宋靖康元年（1126），金东、西两路军长驱直入，进逼宋朝都城开封府（今属河南）。宋廷中投降派把持朝政不断派遣使臣赴金军谈判。十月，宋帝赵桓令其弟康王赵构与知枢密院事冯澥前往金军议和。十一月，赵桓再令赵构与刑部尚书王云為割地请和使，赴金东路军统帅宗望军营，且进奉衮冕、车辂，尊金帝为皇叔，上18字尊号。赵构一行自开封经滑州（治今河南滑县东）、濬州（治今河南浚县），到达磁州（治今河北磁县）。此前，金军于磁州遭宋守将宗泽的抵抗，未能破城而径直渡河南下。宗泽因此劝阻赵构，认为肃王赵枢与太宰兼门下侍郎张邦昌作为人质已随第一次金军北撤，至今未归。而此刻金军又再度南侵，还要去北方有什么用?遂请他留居磁州。磁州军民发现王云的行囊中夹有“番巾”，认定他是金朝的奸细，准备挟持赵构去金朝，愤怒的百姓群起将他打死。赵构因此暂时留下，可随从却认为磁州不安全，不可久留。相州知州汪伯彦闻讯，派人持蜡书来请赵构，于是他便又退回相州（治今河南安阳）。

其时，金军在开封城下发起进攻。闰十一月，天气骤冷，开封守城宋军冻饿而亡者甚众，伤亡亦十分惨重，而“勤王”兵却迟迟不至，开封城危在旦夕。赵桓又命赵构为天下（一说河北）兵马大元帅，并写“蜡诏”（密诏），令阀门祗候秦存前往相州，严交赵构。又令知中山府陈亨伯为元帅，汪伯彦、宗泽为副元帅。秦存见赵构，自头发中取出蜡诏，赵构宣读诏令，在场的军民无不悲泣。不久，尚书左丞耿南仲急速赶到相州，向赵构面授赵桓旨意，令他召集河北地区的宋军入城。赵构遂与耿南仲一起招募兵士，准备“勤王”。十二日初一日，赵构于相州创建大元帅府，有兵士5万，分为五军。令武显大夫陈淬为都统制军马。大元帅府方置，圈门祗候侯章又持“蜡诏”自开封赶来，急令大元帅赵构速发

河北军队，由州县守将各自统领所部，入援京城。赵构随即命令各州县长官与将领，迅速领兵南渡黄河。初四日，赵构率军离开相州，自冰上穿过黄河，到达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宗泽率领2000兵士先期抵达这里，随后知信德府梁扬祖也领3000兵到达。其中有张俊、苗傅、杨沂中、田师中等数码将领，赵构的兵力因此得到加强，继续开赴京城。

正在这时，签书枢密院事曹辅又持“蜡诏”赶来，称金军已占据开封城墙，宋廷与金军刚刚议和，令赵构领兵屯。驻于邻近开封地区，不可轻举妄动，以免惹怒金人，议和不成。汪伯彦等人都相信宋廷能与金军和议，只有宗泽不信，建议马上领兵直趋澶州（治今河南濮阳），再步步为营，推进开封，以解金军之围，“万一敌有异谋，则吾兵已在城下”①。宗泽的建议遭到汪伯彦等人的非难，他们授意赵构派遣宗泽率所部先行，而请赵构移军至东平府（今山东东平）。宗泽领万人进屯澶渊，并扬言康王在此军中。汪伯彦等人此举的用意是排挤力主抗金的宗泽，此后宗泽再也不能参预大元帅府的谋议和决策。待宗泽统兵离开大元帅府，赵构随即离开大名府，进驻东平府，于是河北地区的军务要政，全由大元帅府决策。

靖康二年（1127）正月，宗泽领兵进至开德，与金军13次交战，大获全胜。他上书赵构，请他发布檄文，召集各路兵马会合京城。同时他又移书北道都总管赵野，河东、河，北路宣抚使范讷，知兴仁府曾楙，请他们合兵入援开封。然而他们竟认为宗泽狂妄，未予理睬。宗泽孤军奋进，都统陈淬称前方金军兵力太强，认为不可贸然用兵。宗泽听后极为气愤，准备将他处死，诸将领纷纷乞请，让他戴罪杀敌立功，宗泽便令陈淬领兵进军。陈淬指挥兵士奋勇杀敌，击败金军的阻击。此后，宗泽又派部将孔彦威于开德府大败金军的进攻，于濮州（治今山东鄄城北）等地多次打败金军，随即兵至卫州（治今河南汲县）南。宗泽考虑到自己将孤兵寡，不深入敌军则不可能取胜，遂挥师再进。正行之际，先锋军报告前方有金军营帐，宗泽指挥将士直扑金营，迅速歼灭金兵，又移师东进。金军召集大部兵力围歼宗泽部，部将王孝忠阵亡，宋兵陷入金军前后堵截的困境。宗泽告诫兵士：“今日进退等死，不可不从死中求生。”②宋兵无不以一当百，拼死杀敌。金军被斩首数千级，大败，后退数十里。宗泽看到金军十倍于己，如今一战就败退，必会卷土重来，如果出动铁骑夜袭宋军，自己将处境危难。他立刻下令乘天黑转移。入

夜，金军果然出兵袭击，见到一座空营，吃惊不已。从此，金军害怕与宗泽交战，也不敢再出兵追击。

赵构移大元帅府于东平府后，河北地区的宋军纷纷投奔府下，高阳关路安抚使黄潜善、总管杨惟忠率数千兵士到东平。赵构令黄潜善领兵进驻兴仁，留杨惟忠为元帅府都统制。二月，赵构应汪伯彦等人之请。自东平移到济州（治今山东巨野南），大元帅府拥有官军和前来投奔的义兵已号称百万，分兵驻守于济州、濮州等诸州府，可是各路准备人援开封的"勤王"兵却被安置于此，不得发兵。而此时太上皇赵佶、宋帝赵桓均已被金军掳入营中。三月，金军册立张邦昌为帝，国号"大楚"。消息传来，赵构失声痛哭。大元帅府官僚中，有人主张赵构南移至宿州（治今安徽宿县）。再南下江浙，但未成行。依据宋朝官制，赵构以宗泽为徽猷阁待制，又以汪伯彦为显谟阁待制、充元帅，黄潜善为徽猷阁待制、充副元帅。

不久，完颜宗望挟赵佶北撤。四月初，完颜宗翰又挟持遭废黜的赵桓北归。宗泽闻讯，立刻起兵直趋滑州，经黎阳关（今河南浚县东），到大名府准备径直渡河，直插金军北撤必经之路，劫回二帝。可"勤王"兵却按兵不动，没人响应。听说张邦昌僭位称帝，宗泽又准备先出兵诛讨张邦昌。但却得到大元帅府的令书，让他将所部带往靠近开封的地方，按兵不动。宗泽致书赵构："自古奸臣皆外为恭顷而中藏祸心，未有窃据实位、改元肆赦、恶状昭著若邦昌者。"③希望能出兵征讨张邦昌。与此同时，在大元帅府内，耿南仲正率幕僚劝说赵构称帝即位，赵构推辞不肯接受。汪伯彦等人又借天命、人心再请他登极，甚至还说"靖康"纪元年号，即蕴涵有"十二月立康"的预兆，赵构提出仍需考虑后再说。正在这时，张邦昌派遣总閤阎门宣赞舍人蒋师愈等人持文书前来拜见赵构，自称将归还大宋印玺，退让皇帝之位。赵构见张邦昌有"避位"之意，随即向诸将领下令，不许领兵前往开封，已到开封也不许入城。并日派人告谕宗泽等人，称"受伪命之人义当诛讨"，然而出于权宜的考虑，不要轻易出兵。

不久，门下侍郎吕好问派人送来"蜡书"，称赵构若不自立为帝，恐怕就会有不该称帝而自立为帝者。伪楚大臣谢克家也送"大宋受命之宝"到济州，赵构跪受印玺，且命谢克家返回开封，备办各种仪物。济州

的百姓纷纷来到军营门前，请求赵构在此即位称帝。恰在这时，宗泽赶到，认为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南），为当年太祖赵匡胤封王之地，且应天府地处国家中心，漕运极为便利。赵构于是决定再迁至应天府。这天晚上，张邦昌于开封亲笔手书，为已被宋哲宗罢废的皇后孟氏上尊号为元枯皇后，派尚书左丞冯澥为奉迎使；迎孟氏入居皇宫。孟氏随即派其侄、卫尉少卿孟忠厚持手书赴济州，面呈赵构，请他即皇帝位，自己则垂帘听政。在以吕好问为首的部分原宋廷臣僚的反对下，张邦昌被迫宣布退位，改任尚书左仆射。为了缓解宫廷内外对他的非议，他率领在京城的百官，上请赵构即位。孟氏又以手书告之朝廷内外，宣布由赵构承袭帝位。

在大元帅府官员和原宋旧臣的再三请求下，赵构终于同意称帝。他派宗泽统兵分驻于长垣（今属河南）、韦城等县，以应付意外。不久，东道副都总管朱胜非、宣抚司统制官韩世忠、鄜延路副总管刘光世、西道都总管王襄分别统领所部相继投奔赵构，赵构遂以刘光世为五军都提举，这才从济州动身，到达南京应天府。两天后，张邦昌也自开封来到应天府，见到赵构便伏地痛哭，请求一死了之，赵构却极力安抚宽慰他。随后赵构又以汪伯彦为显谟阁直学士，黄潜善为徽猷阁直学士。很快，权吏部尚书王时雍等人给赵构送来车舆、服饰等仪物。官府也于应天府门东侧修筑天地坛，供登极祭祀之用。

五月初一日，赵构登坛受命，即位于应天府官署，下令改元建炎。随后便任命臣僚，以黄潜善为中书侍郎，汪伯彦同知枢密院事，河东、河北宣抚使范讷为京城留守，兵部尚书吕好问为尚书右丞兼门下侍郎。又以黄潜善兼御营使，汪伯彦为副使，真定府路副都总管王渊为都统制，都延路副都总管刘光世提举一行事务。以资政殿学士路允迪为京城抚谕使，龙图阁学士耿延禧为副使。以保静军节度使姚古为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东）知府，以宗泽为龙图阁学士、知襄阳府。对于靖康年间“主和误国”的臣僚李邦彦、吴敏等人一概贬官，发配地方管制。但对张邦昌，赵构却认为“知几达变，勋在社稷”④，仍留于朝中，特许他每月两次赴尚书省议事，不久又进封为太傅。御史中丞颜岐甚至提出：“张邦昌为金人所喜，虽已为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体。”⑤由于新任臣僚威望不高，赵构遂委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令他赶来应天府。可朝廷中的主和派势力却反对和阻挠李纲任右相，颜岐先后五

次上疏，认为：“李纲为金人所恶，虽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罢之。”直到赵构出面干涉，指出“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才不再声张。但颜岐仍不罢休，竟又派人将他的奏章面交正行于途中的李纲，企图阻止他入朝。赵构因朝廷刚立，且金军北撤后威胁仍在，感到“欲使敌国畏服，四方安宁”，非任用李纲不可，故拒绝了李纲辞去宰相职务的请求，而将范宗尹、颜岐等贬出朝廷。

李纲入朝后，立即向赵构上书，提出“国是、巡幸、赦令、僭逆、伪命、战、守、本政、责成、修德”等“十议”之事，指出应罢和议，积极备战，严明军纪，改革朝政弊端，并请求严厉惩处以张邦昌为首的降金官员。第二天，赵构令臣僚商议李纲所奏之事，但却留下僭逆、伪命二事，不交廷议。李纲仍力主处置张邦昌，黄潜善极力主张留用，吕好问则推托交由赵构裁决。在李纲一再坚持下，赵构只好下诏，将张邦昌等一批降金官僚贬谪，又以李纲兼御营使。

注释①②③《宋史》卷三六○《宗泽传》。

④《宋史》卷二四《高宗纪一》。

⑤《宋史》卷三五八《李纲传上》。

第三十二章

宋室南逃宋靖康二年（1127）五月，赵构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南）称帝，是为宋高宗，史称南宋。

此时的宋廷中，以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李纲为首的主战派和以门下侍郎兼权中书侍郎黄潜善为首的主和派并存。由于宋廷重建，百废待兴，且金军威胁依然存在，为“欲使敌国畏服，四方安宁”①，赵构在李纲的主力下，采取了一些防御的措施，令河北、陕西、京师等地卅、军、县、镇募人修筑城防；以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马忠为河北经制使，负责招募设置民兵；各县增置弓手，设武尉统领；置沿黄河、沿淮河、沿长江帅府19处，要郡39处，次要郡38处，由帅守兼都总管，郡守兼钤辖、都监，总兵力，达967500人，另置水军77将。又诏陕西、河北、京东、京西诸路募兵10万人，更派人卫应天府，还命京东、京西两路大造战车。经李纲的荐举，赵构又起用原北宋时的监察御史、“声震河北”的张所，提任河北西路招抚使，以傅亮为河东经制副使。经过主战派官僚的苦心经营，宋朝兵势复振，形势稍得好转，河北、河东两路百姓心系宋廷，不断有抗金杀敌的捷报传入应天府。围攻河北、河东诸州县的金兵，亦纷纷撤兵离去。而自发组织的抗金义兵应招抚司、经制司之招募者甚众，赵构因而召集河北等五路兵马前来应天府，以保卫宋廷。

北宋都城自被金军攻陷，太上皇赵佶、皇帝赵桓被金军北掳后，开封府长官一直空缺，李纲认为要恢复旧都，非老将宗泽不可。在他的极力荐举下，时年69岁的宗泽被委以知开封府。宗泽到开封时，金军的骑兵还屯驻于黄河边，金鼓之声，朝夕相闻。而京城的城墙门楼尽遭毁坏，城内外兵民杂居，盗贼横行霸道，人心惶恐不安。宗泽因此下令，“为盗者，贼无轻重，并从军法”，并处置了几名盗贼，又收降了河东巨寇王善，及往来于京西、淮南、河北、河南等地的强寇杨进、王再兴等人，社会秩序得以稳定。他积极修筑城池，加强城防，开封形势得以好转。

赵构虽重用李纲、宗泽等主战派官僚，积极整饬军备，扩充军队，

修筑城池，但他却害怕金军，想远离河北。建炎元年（1127）五月，赵构下诏令成都（今属四川）、京兆（今陕西西安）、襄阳（今湖北襄樊）、荆南（今湖北江陵）、江宁（今江苏南京）诸府和邓（治今河南邓县）、扬（治今江苏扬州）二州，储备粮草，修筑城堡，以备巡视。宗纲上疏赵构，认为开封经过整治，形势已恢复到承平之时，而且将士、农民、商旅、官吏人心所向，均盼望宗帝返归京城，故请赵构马上回京师主持朝政。赵构对此却无动于衷，除去擢升宗泽为延康殿学士、京城留守兼开封府尹外，依然留居南京应天府。

这时金朝派人以出使“大楚”朝为名，来到开封府。宗泽立刻拘捕来使，上书朝廷请求处置。赵构则下诏，要求将金使安置于馆驿。宗泽上疏抗旨，认为金人借出使之名觇窥虚实，“令迁置别馆，优加待遇，臣愚不敢奉诏，以彰国弱”②。赵构又亲笔写札致宗泽，令他放金使回国。黄潜善以此指责宗泽拘留金使，尚书左丞许景衡抗疏力辩，认为宗泽任开封尹，成绩卓然，无人能比。此事方得以平息。

金朝在真定府（今河北正定）、怀州（治今河南沁阳）、卫州（治今河南汲县）之间屯集了大量的军队，秘密修治军械兵器，准备再度入侵宋境。朝廷将相不以为虑，不布置任何防御措施。宗泽忧心忡忡，亲自北渡黄河，召集各州守军将领商议战备之事，准备收复河北失地。同时又于京城四周分别派使统领招募汇集的抗金义军。他为了加强和巩固开封城的防卫，又根据地势地貌，在城外修筑了24处坚固的壁垒，沿黄河依序排列而相接为“连珠寨”，从而连接了河东、河北山水寨的忠义民兵。这一系列的举措影响颇大，陕西、京东、京西诸路人马都表示愿意听宗泽指挥，抗金形势极为有利。

在这样的形势下，主和派官僚依旧畏金如虎，黄潜善、汪伯彦劝说赵构逃往江南，李纲等人则极论不可，且指出赵构曾“降诏许留中原，人心悦服，奈何诏墨未干，遽失大信于天下?”③在李纲等主战派的坚持下，赵构只得先将孟太后等送过江南，并表示：“朕当与卿等独留中原，训练将士，益聚兵马。虽都城，可守；虽金贼，可战。”④又迁李纲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而黄潜善则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主战派与主和派分操左、右相。在主和派的牵制与破坏下，李纲等人的抗金举措举步艰难。黄潜善、汪伯彦见南逃的企图被李纲等人所阻，便蓄意诋毁

和破坏抗金斗争。张所请求于宋北京燕山府（今北京西南）设置招抚使司，待一切准备就绪，即发兵渡黄河北上。然而黄潜善的党羽、北京留守张益谦却诬陷河北招抚使司扰民，甚至声称自从创建招抚使司后，河北地区的盗贼日益猖獗。李纲反问道："张所尚在京城，招抚使司还未创建，如何知道扰民之事?河北百姓流离失所，相聚为盗，难道是设置招抚使司后才有盗贼吗?"黄潜善一伙仍不甘心，又下令，由宗泽"节制"傅亮立刻渡河北上，傅亮认为，准备尚未就绪就急令渡河，恐要误大事。李纲更是向赵构一针见血地指出，黄潜善、汪伯彦此举的目李纲的是针对自己的抗金主张，然而赵构却以黄潜善等人所称"傅亮兵少，不可渡河"为由，下令撤销河东经制司。李纲知自己处处被排挤，抗金已难以进行，便多次提出辞职请求。赵构遂以"买马招军"之罪，将任宰相仅75天的李纲罢官。太学生陈东、进士欧阳澈上书，认为黄潜善、汪伯彦不可任用，李纲不能罢官，因此而遭杀害。

李纲被罢官后，张所亦被贬，傅亮则以母病为由，辞职归乡。不久，河北招抚使司也被撤销，李纲已制定和实施的抗金措施，全部遭废止。在打击和排挤主战派官僚的同时，赵构与黄潜善一伙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南逃的准备。赵构亲笔书诏，称"京师未可往，当巡幸东南"⑤。先是决定去南阳（今属河南），不久又退到淮甸，同时诏令荆襄、关陕、江淮地区官府，准备迎接"巡幸"，并派徽猷阁待制孟忠厚迎奉太庙列祖列宗的神位到扬州。赵构南逃的意图为世人所知，宗泽多次上书，恳请他返归开封，不要"巡幸"东南，但始终得不到赵构的重视。为此，宗泽抗书疾呼："京师二百年积累之基业，陛下奈何轻弃以遗敌国?"⑥他指责黄潜善、汪伯彦力主南下为误国之举。宗泽一次又一次的上书，经过三省、枢密院后，便落人黄潜善等人的手中。他们每见宗泽的奏书，都讥笑他颠狂。

金军自攻陷开封北撤后，一直整修军械，寻找机会再度南侵。自傀儡皇帝张邦昌被废黜，伪楚政权夭折，金朝即以此为借口，准备发兵征讨南宋。宋、金局势日益紧张，主战派再次力主抗金，原河北招抚使司都统制王彦率7000兵士渡过黄河，北上攻击金军，一举收复新乡县（今届河南）。河东、河北大部分未被金军占据的州县，也积极备战，随时准备迎击来犯的金军。可是以赵构、黄潜善、汪伯彦为首的主和派却加紧了南逃的步伐。九月初，赵构听说金兵入侵河阳，未经证实就已坐卧

不安。为了彻底扫清南逃的障碍，排除各种非议，赵构竟下诏：“有敢妄议惑众沮巡幸者，许告而罪之，不告者斩。”⑦十月底，赵构到达扬州。宋室的南逃，招致金军再度发兵南下。金军此次出兵南下，旨在攻战河东、河北地区尚在宋军控制之下的州县重镇，以巩固其在两河地区的统治。面对金军的进攻，各地百姓与宋军将士奋起反抗金军的残暴掳掠，尤以抗金义军最为活跃。泽州（治今山西晋城）、潞州（治今山西长治）一带的义军与金军多次交战，曾进攻金军大营。几乎俘获金左副元帅完颜宗翰，声势浩大。王彦收复新乡后，遭数万金军围攻，战败后，王彦与所部官兵突围。转移到共城县（今河南辉县）西面的太行山区抗击金军。他们于面部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字，以示决心，而被称为“八字军”。忠义民兵首领傅选、孟德、刘泽、焦文通等率10余万义军投奔到王彦帐下。王彦“缮甲治兵”，多次击败金军，并一度准备北上收复太原（今属山西）。河北庆源府（今河北赵县）五马山（位今河北赞皇）上有宋武翼大夫赵邦杰与原保州路廉访使马扩领导的抗金义军，他们拥立自称信王赵榛的人作为号召，队伍一度发展到10多万人，四出打击金军。

河东、河北地区官军与义军的抗金斗争，给南侵的金军造成很大的威胁，客观上掩护了刚刚创建的南宋政权。但赵构与其父赵佶、其兄赵桓一样，并非真心抗金。赵构下诏“一人一骑不得渡河”⑧，致使黄河以北的抗金义军得不到援应，长期孤军作战，遭受极大的损失，五马山寨等义兵据点相继落入金军手中。河北重镇中山府（今河北定县）军民自靖康元年（1126）十月，被金军围攻以来，在知府陈遘的率领下，顽强抗击金军的进攻。陈遘殉职后，城中军民依然拒不献城投降，直到建炎二年（1128）三月，由于城中早已断炊，军民伤亡及饿死者大半，城池终为金军占据。沼州（治今河北永年东）自建炎元年五月间被金军围攻，守将王麟畏敌投降，城中军民坚决反对而将他杀死，另推举韩一领导抗金。之后，皇族赵士晤自金军逃出，于磁州（治今河北磁县）召集义兵数万人，半夜袭击围攻铭州的金军，乘势进入城中，而使铭州城防得到极大的加强。他们包围金军，俘虏金军将领，迫使金军撤退。不久金军又纠集兵力再次围攻熘州，守城军民浴血奋战270余天，大小57次战斗，给金军以很大的损伤。但也因城中粮尽，军民被迫突围，转移到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沼州遂被金军占据。

守卫开封的宗泽为让赵构重返京城，派人联络河北、河东的抗金义军，南下云集于开封城周围，总兵力达百万，迫使金军不敢贸然进犯。他多次上书，恳请赵构来开封，“陛下及此时还京，则众心翕然，何敌国之足忧乎?”⑨他前后上书20余次，但都被黄潜善等人扣留，宗泽忧愤成疾，于七月病故。临终前一天，他长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又嘱托部将继续抗金。翌日，宗泽依旧不提及家事，临终前连呼三声“过河”，便与世长辞。宗泽死后，赵构又派北京留守杜充改任开封尹，东京留守。杜充上任，一改宗泽的抗金举措，原宗泽招抚的抗金义军，对此极为不满而纷纷离去。

赵构的南逃和消极投降的行动，又一次为金朝所蔑视，南侵宋朝的气焰日趋嚣张。建炎二年七月，金廷再次发兵，大举进攻步步退缩的宋朝，宋廷又陷入大敌压境的困境。

注释①《宋史》卷三五八《李纲传上》。

②《宋史》卷三六○《宗泽传》。

③《宋史》卷三五八《李纲传上》。

④《宋史》《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一一。

⑤《宋史》卷二四《高宗纪一》。

⑥《宋史》卷三六○《宗泽传》。

⑦《宋史》卷二四《高宗纪一》。

⑧《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一五。

⑨《宋史》卷三六○《宗泽传》。

苗刘兵变赵构创建南宋后依然承袭北宋对金朝屈辱投降的政策，不敢还朝开封，自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南）退避到扬州（今属江苏）。南宋政权的腐败无能，助长了金廷力主用兵宋朝的气焰。宋建炎元年（金天会五年，1127）十二月，金廷又一次举兵，分3路大规模南

征。以右副元帅完颜宗辅（讹里朵）统东路军自沧州（治今河北沧州东南）渡黄河，进攻淄州（治今山东淄博西南）、青州（治今山东益都）等山东地区；以左副元帅完颜宗翰（粘罕）统中路辱自河阳渡黄河，进攻河南地区；以完颜娄室统西路军进攻陕西地区。

建炎二年（金天会六年，1128）正月，3路金军连克南宋重镇，青州、潍州（治今山东潍坊）、滑州（治今河南滑县东）、汝州（治今河南临汝）、邓州（治今河南邓县）、襄阳（今湖北襄樊）、均州（治今湖北丹江西北）、房州（治今湖北房县）等相继落入金军手中。金军原以为赵构仍在应天府，兵渡黄河后才得知他已逃到扬州。金军并未作出长驱直入的准备，难以继续向南推进，完颜宗辅便留驻大军于黄河南北屯田，自己则返回北方。完颜宗翰在攻占洛阳（今属河南）、唐州（治今南唐河）、蔡州（治今河南汝阳）、陈州（治今河南淮阳）、颍昌府（今河南许昌）、郑州（今属河南）等地之后，将当地的百姓强行迁徙到河北各地，也留下一部分军队屯田于黄河南北，自己率余部返回山西。完颜娄室统兵入攻陕西，连克同州（治今陕西大荔）、华州（治今陕西华县）、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凤翔（今陕西风翔）等地，但在西进巩州（治今甘肃陇西）后，遭宋军伏击战败，被迫撤兵。

金军此次南征，主要是为了攻占河北地区尚未被宋军驻守及控制的州县重镇，以彻底清除宋朝在北方的势力。不过，出兵虽然遭到一些抵抗和抗金义军的攻击，但宋朝的虚弱本质已暴露在金军的面前。于是，七月，金帝完颜晟又诏令金军讨伐南宋，穷追宋帝赵构，以灭亡南宋王朝。以完颜宗辅与完颜宗翰各统一路人马，分别自河北、河东南下，合击宋朝。同时仍以完颜娄室统所部人马进攻陕西，以牵制四川、陕西的宋军，不得入援中原。完颜宗辅与完颜宗翰出兵后，一路顺利，十月，两军会师于濮州（治今山东鄄城北），随即围攻城池。濮州守将姚端、杨粹中率军民顽强抵抗，且领兵出其不意，夜袭金营，直攻金军中军。完颜宗翰慌忙逃命，竟连鞋袜都未穿上。不久，完颜宗辅部主将完颜宗弼（兀术）进攻开德府（今河南濮阳），遭宋御营统制韩世忠、权同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范琼，以及元帅府马步军都总管马扩所率援军的反击，亦退至濮州。濮州城外金军增兵，攻城更紧。城内军民坚守，击退金军连续不断的进攻，但终因得不到援应，遭围攻一月之后陷落。姚端率军突围而出，杨粹中不幸被俘。

宋帝赵构一面派兵救援遭金军进攻的重镇，一面又将隆枯太后陈氏送往杭州（今属浙江），为自己的继续过江南逃跑做准备。在宋廷的退却战略下，抗金力量受到极大的削弱和影响。进入十一月后，宋于河南、陕西的州县重镇，如延安府（今陕西延安）、开德府、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德州（今属山东）、淄州等相继落入金军手中。面对金军强大的攻势，赵构连忙派魏行可充任金国军前通问使，赴澶州（治今河南濮阳）向金军求和。而东京留守、开封尹杜充竟然决黄河堤，使之自泗水入淮河，企图以此阻止金军继续南下。但这些消极的措施都未能阻止金军的南侵。十二月，金军转攻东平府（今山东东平），京东西路制置使范延世弃城而逃。金军再攻济南府（今山东济南），知府刘豫献城投降。又攻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转运判官裴亿出城投降，提点刑狱郭永被俘后，不屈而死。随后，金军连克袭庆府、虢州（治今河南灵宝）等，步步逼近扬州。

宋建炎三年（金天会七年，1129）正月。金军统帅完颜宗辅、完颜宗翰派管勾太原府路兵马事拔离速与大将马五等率5000骑兵，奔袭扬州。三十日，金军进至泗州（治今江苏泗洪东南）。金军的快速推进，使宋帝束手无策，二月初一，“始听士民从便避兵”，又令御营右军副都统制刘正彦率部兵护送皇子和六宫后妃去杭州。江、淮制置使刘光世率兵在淮河阻击金军，然而还未等到金军临近，宋军却先溃散而去。金军随即攻占楚州（治今江苏淮安），知州朱琳投降，之后又攻陷天长军，距离扬州仅百余里地。初三日，消息传到扬州，赵构竟连宰相黄潜善、汪伯彦都不告诉，即与杭州制置盗贼使王渊等数人身着甲胄，骑马狼狈出逃，于瓜洲乘小舟渡江至镇江（今属江苏）。马五所率5000金军骑兵一路急驰，当天傍晚时分赶到扬州，又闻讯赵构已过江南逃，便立即追到瓜洲渡口。宋太常少卿季陵正带宋军护送太庙列祖列宗牌位准备过江，金军得知马上派兵拦截，季陵夺路而逃，竟丢失了宋太祖赵匡胤的牌位。拔离速部奔袭扬州，未能俘获宋帝，孤军突进，却激起江淮地区百姓及官兵的奋起反抗，宝应县（今属江苏）在李纲的组织下，以五马山寨义军和红巾军的旗号召集百姓抗金，对远离金军主力的拔离速部构成很大的威胁，迫使这支金军不敢于扬州久留，而迅速北撤。

赵构逃到镇江，在王渊的建议下，又决定再逃杭州。他命令中书侍郎朱胜非留下，镇守镇江；以吏部尚书吕颐浩为资政殿大学士，江淮制

置使都巡检使刘光世为殿前都指挥使，充行在五军制置使，驻守镇江，扼守京口；主管马军司杨惟忠节制江东军马，驻守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但随着他的东南逃却，又对东南地区的肪务不断进行调整，除加强沿江的驻防外，又增置“沿海托防”官，募海船守卫海湾江口。为了掩饰自己的怯懦与退怯，赵构下诏罪己，又对犯死罪以下的囚犯一律赦免，对已遭罢贬流放的官吏允许返回家乡。可对李纲却不赦免，也不许离开流放地，仍想用治罪李纲讨好金朝。

黄潜善、汪伯彦一伙的屈膝投降，激起朝野极大的忿慨。赵构迫于舆论，采纳了御史中丞张激的建议，下令罢免黄潜善、汪伯彦的官职。三月初，赵构以朱胜非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而以御营都统制王渊为同签书枢密院事。王渊原与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同伙，因主张护送赵构南逃镇江、杭州而倍受恩宠，得以擢升，扈从统制苗傅对此十分妒嫉，忿忿不平。御营右军副都统制刘正彦也因自己曾镇压淮西丁进等大盗而赏赐甚微，大为不满。二人遂合谋，借官僚对王渊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和对仗势欺人、专横跋扈的宦官康履等人的愤恨，趁刘光世、张俊、杨沂中、韩世忠等大将分守江防要塞之机，于杭州发动政变。三月初五日，苗傅、刘正彦等设伏兵于城北桥下，等王渊退朝行至桥上，伏兵出击，刘正彦指责他勾结宦官阴谋反叛，亲手将他杀死。又包围康履宅第，狂捕滥杀，凡无胡须者全遭杀戮。随后，苗傅、刘正彦提着王渊的首级，拥兵闯入行宫，扬言“苗傅不负国，止为天下除害”①。

杭州知府康允之、殿帅王元得知兵变，立即保护赵构登上阁楼。赵构凭栏询问起兵缘由，苗傅厉声呵道：“陛下信任中官，军士有功者不赏，私内侍者即得美官。”赵构只得宣布授予苗傅为庆远军承宣使、御营使司都统制，刘正彦为渭州观察使、副都统制，并请他们退兵回营。但苗、刘仍不退兵，赵构问左右如何使之退兵，浙西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时希孟、军器监叶宗谔建议除掉康履方可平息兵变。赵构无奈，只好令中军统制吴湛捕捉康履。吴湛于宫中清漏阁的灰尘中抓到躲藏于此的康履，苗傅即于楼下当众将他斩杀。不料，苗傅、刘正彦除掉康履后，仍拥兵不退，却又提出让赵构退位。赵构请朱胜非缒楼，与苗傅、刘正彦等人谈判。苗傅又提出请隆枯太后孟氏一同听政，且派遣使臣与金朝议和。赵构当即应允，下诏请太后垂帘听政。诏下，苗傅竟不拜，进一步提出让赵构3岁的儿子即皇帝位。一时间，阁楼上臣僚各持己见，或赞

同或反对，争论不休，赵构遂表示自己退位，随即下令，请隆祐太后临朝，自己则起身站立于楹柱之侧。

须臾，隆祐太后乘轿来到楼下，苗傅、刘正彦请她临朝称制，并声称立皇子为帝。孟太后则表示："今强敌在外，使吾一妇人帘前抱三岁儿，何以令天下?"刘正彦见孟太后不应允，便以自杀相要挟，苗傅则在一旁催促她答应垂帘听政。直至赵构派人奏告孟太后，自己已决定退位，孟太后仍未应允而返回宫中。朱胜非哭泣着请求赵构下诏治罪苗傅、刘正彦二凶。赵构摒退左右，告诉他："当为后图，事不成，死未晚。"②当天晚上，赵构便搬出行宫，进住显宁寺中。第二天，孟太后垂帘听政，尊赵构为睿圣仁孝皇帝，改显宁寺为睿圣宫，其身边仅留内侍15人。

初八日，赵构退位，孟太后临朝的赦令传到平江府（今江苏苏州），侍御史张浚拒不拜受。初九日，赦令传至江宁府，江淮制置使吕颐浩致书张浚，陈述兵变原委，张浚随即举兵勤王。初十日，御营前军统制张俊到平江府，张浚劝说他起兵救援赵构，张俊欣然领命。此时杭州城内，朱胜非等人则设计麻痹和稳住苗傅、刘正彦等人，孟太后也百般"劳勉"，使之深信不疑。张浚还致书苗傅、刘正彦，褒奖其"忠义"，以示"慰安"。苗、刘自以为得势，又提出改元和迁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孟太后恐全部拒绝，将引起其疑心，遂应允改元。十一日，改元"明受"。次日，百官始朝睿圣宫，赵构命苗傅为武当军节度使，刘正彦为武成军节度使。在稳住苗傅、刘正彦后，张浚便派进士冯幡入杭州，请赵构复帝位，总揽朝政。又致书苗、刘党徒马柔吉、王钧甫，要他们及早反正。随后，他传檄诸路统帅，约吕颐浩和殿前都指挥使、行在五军制置使刘光世领兵会合于平江府，准备入杭州讨伐叛逆。

正在这时，苗傅以堂帖让张俊赴秦州（治今甘肃天水），而令两浙提点刑狱赵哲统领张俊所部，赵哲不从。改令陈思恭领兵，亦不从。苗傅又以其党羽、御营中军统制吴湛主管步军司，而以武功大夫王彦为御营司统制时，王彦则佯装颠狂，当日即致仕而去。一时间，南宋政局极度动荡不安。为了防止金军乘虚而人，张浚一面准备平定兵变，一面令节制司参议官辛道宗以防备海寇为名，征集海船以便应急之用。十六日，苗傅、刘正彦又操纵宋廷，将内侍蓝圭、曾择等6人贬谪至岭南诸

州安置。苗傅对此仍不罢休，竟追杀曾择；又提出以所部替换禁卫军守护赵构所在的睿圣宫，并请赵构离开杭州，前往徽州（治今安徽歙县）或越州（治今浙江绍兴）。御史中丞张澂和朱胜非婉言劝阻，赵构才未被赶出杭州。进士冯辂梧受张浚之命，劝说苗、刘二人反正，苗傅勃然大怒，按剑怒视冯幡，刘正彦则提出，只要张浚亲自前来劝说，即可反正。随后他们派朝官赵休与冯幡同赴张浚营十，招其反叛。

苗傅、刘正彦的反叛，特别是他们兵变后非但不号召抗金，反而认为逼迫赵构，就可以向金朝讨好求和，激起了朝廷内外诸多的抵制和反抗。吕颐浩与张浚、张俊、韩世忠相继发兵“勤王”。苗傅、刘正彦闻讯，又利用朝廷下令，以韩世忠为定国军节度使，张俊为武宁军节度使、知凤翔府，张浚责授黄州团练副使，发配郴州（今属湖南），企图以此解除他们的兵权，但韩世忠等将领对此不屑一顾，吕颐浩兵至丹阳（今属江苏），刘光世率所部赶来与之会师。张惾见韩世忠兵少，便自张俊军中分2000兵力给他。苗傅、刘正彦见朝廷命令竟成一纸空文，便立即调兵遣将，派苗璃、马柔吉率“赤心队”及王渊旧部进驻临平，以阻止各路“勤王”之师进入杭州。

吕颐浩等各路“勤王”兵马相继到达平江府。张浚于进兵途中得到罢贬自己官职的命令，恐部将兵士因此人心浮动，而谎称是朝廷的召见之令，从而稳定了队伍。经各路统帅的合谋，由吕颐浩、张浚传檄四方，号召起兵讨伐叛逆之贼。不久，吕颐浩等率兵到达吴江（今属江苏），上奏朝廷请赵构复位。苗傅、刘正彦听说“勤王”之师大会师，惊恐不已，立即请朱胜非、冯幡至尚书省商议赵构复位之事。朱胜非随即率百官三次上表，请赵构还朝。

四月初一，孟太后下诏还政赵构。赵构遂重返行宫，尊孟太后为隆祐皇太后，以苗傅为淮西制置使，刘正彦为副使。初三日，下诏，恢复建炎年号。同日，吕颐浩、张浚率军到达临平，苗翊、马柔吉派兵于河上阻截。韩世忠亲自率领先锋兵发起冲锋，张俊、刘光世领兵策应，苗翊不敌，败逃，“勤王”之师遂进入北关。苗傅、刘正彦见大势已去，便去尚书省取出孟太后赐予的铁券，带领2000精兵，连夜打开涌金门逃走。初四日，吕颐浩、张浚统兵入杭州，孟太后撤帘，停止听政。苗傅、刘正彦发动的兵变遂告破产。

苗傅、刘正彦出逃后，又率叛军进犯富阳（今属浙江）、新城（今浙江富阳西南）二县，遭统制官王德、乔仲福的追击。此后，他们继续负隅顽抗，屡犯两浙州县重镇。四月十八日，赵构以韩世忠。为江、浙制置使，与御营副使刘光世合兵追讨叛军。二十二日又下诏，除苗傅、刘正彦、苗瑶、苗翊等首犯不赦外，余党免罪。在官军的追剿下，叛军到处被动挨打。五月初三日，叛军统领官张翼斩杀马柔吉、王钧甫投降朝廷。十二日，韩世忠于浦城县（今属福建）俘获刘正彦。苗傅弃军而逃，改换姓名连夜逃入建阳县（今属福建），被当地土豪詹标认出，将他抓获送入韩世忠军中。韩世忠讨平叛军后，返回建康，苗傅、刘正彦等叛军头领遂被处置。

注释①②《宋史》卷四七五《苗傅传》。

洞庭风云在北宋末年，鼎州武陵（今湖南常德）人钟相，即以行医为名，利用巫教作掩护，创建互助团体——乡社。他宣扬“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深得广大民众的拥护。环洞庭湖周围数百里内的贫苦农民，自备钱粮，纷纷投奔钟相，以至络绎不绝，昼夜不息。宋廷闻讯，屡次下令禁止，皆“不能尽法绳之”①。经过20余年的宣传与组织，加入“乡社”者已遍布于以洞庭湖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其后，钟相以抵御盗匪、保卫乡里为名，于武陵县唐封乡水连村的山岗上创建栅寨，组织“乡社”民兵，操练习武，培养一支训练有素的农民武装。

宋靖康二年（金天会五年，1127），金军再度南下，围攻汴京（今河南开封）。钟相招募300民兵，交其长子钟子昂率领，北上“勤王”。然而一心投降求和的宋廷，唯恐“勤王”之师会惹怒金军，求‘和不成，竟下令就地遣散“勤王”武装，令其“归原来去处，各着生业”②。钟子昂率300名民兵返回鼎州（治今湖南常德）。钟相对宋廷的屈辱投降极为愤慨，执意不遣散民兵，而于天子岗筑垒浚濠，制作旗帜器甲。

宋建炎四年（金天会八年，1130）初，完颜宗弼（兀术）所部破江西后，移师湖南，围攻潭州（治今湖南长沙）。宋将、直龙图阁向子湮与宗室赵聿之率军民守城御敌。8天后，潭州城失守，金军屠城而去，洞庭湖一带亦遭洗劫。不久，一支溃兵土匪武装由匪首孔彦舟所领，窜

扰洞庭湖地区。二月，孔彦舟率所部自荆南府（今湖北江陵）南窜，直犯潭州、衡州（治今湖南衡阳），澧州（治今湖南澧县）等地。又在鼎州大肆抢劫财物，强迫百姓当兵，更激起这一带百姓的强烈反抗。钟相于二月十七日，发动农民武装起义。鼎州、澧州、荆南等地民众群起响应，杨幺、杨广、夏诚等人亦相继于当地率众起义。二月二十一日，钟相以武陵为中心，创建政权，被推举为楚王，并以钟仪为太子，建国号“楚”，改元“天载”，又对其他义军将领分授太尉以下官职，各领其责。

随后，钟相派兵进击桃源县（今属湖南），入城斩杀知县钱景诗。又派兵攻克澧州，捕杀澧阳县丞及澧州守臣黄琮等。很快鼎州、澧州、荆南、潭州，峡州（治今湖北宜昌）、岳州（治今湖南岳阳）、辰州（治今湖南沅陵）等州境内19县，陈部分城镇外，悉为义军占领。义军声势日益壮大，号40万。义军所到之处，“焚官府、城市、寺观、神庙及豪右之家，杀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及有仇隙之人。谓‘贼兵’为爷，谓国典为邪法，谓杀人为行法，为劫财为均平”。正因如此，“人皆乐附而行之，以为天理当然”⑧。义军更于占领之地，“无税赋差科，无官司法令”④。大楚政权“均贫富，等贵贱”的政策，使更多的百姓摆脱宋廷苛捐杂税的侵扰。

大楚政权的创建，亦令宋廷大为不安，视之为“腹心之害”、“咽喉之疾”。遂委以匪首孔彦舟为荆湖南、北路捉杀使，领兵镇压义军。又令驻守鄂州（治今湖北武昌）的宣抚访察使李允文派兵进击义军。李允文令步卒进攻益阳、水军进击澧口、战舰游袭洞庭湖，以围击大楚。钟相将义军分作左、右翼迎击。孔彦舟于澧州城遭义军攻击，“弃甲而走，仅以身免”⑤，蜷缩于鼎州城不敢出战。他佯称与义军休战，欲引军东向，同时派手下人以“人法”混入大楚内部，作为内应。钟相麻痹轻敌，三月二十六日，孔彦舟趁义军不备，里应外合，袭击钟相营帐。钟相及太子钟长昂奋力突围，于山谷中被俘。孔彦舟令将钟相父子押往京城，途经湖南攸县时，将他们杀害。

钟相父子遇害后，义军在杨幺率领下，继续与官军作战。杨幺原称杨太，因楚地方言称排行最小者为“么腰）”，故亦称杨幺。杨幺利用洞庭湖区河湖港汊密布，山地丘陵起伏的地形，令义军“农兵相兼”、“陆耕水战”，很快扭转被动局面，于洞庭湖区创建起70余处山水寨。“大段紧

密，水泄不通。日逐离寨二十里，陆路使人巡逻，遇夜伏路；水路日夜使船巡绰，寨门外令群刀手把定，便大虫（老虎）、豹子也则入去不得”⑥。寨内则“茅竹为舍，密比如栉”⑦，且养牛、育蚕，饲养猪、羊、鸡、鸭，“田蚕兴旺，生理丰富”⑧。

六月，宋廷以程昌寓为鼎、澧路镇抚使兼知鼎州。程昌寓自荆南出发赴任，令水军、步兵直趋鼎州。官军一路抢劫，搜刮军费，行至龙阳县鼎口，遭到义军截击，官军船队亦被包围。义军奋勇杀敌，程昌寓只身逃回公安（今湖北公安南），又改由陆路到鼎州。他要报“鼎口之辱”，对俘虏的义军兵士施以酷刑，直至斩杀。到达鼎州后，程昌寓募得1000余名弓弩手，以充实步军。又募匠人打造车船，加强水军。欲水陆并进，夹击义军。他密谋募人潜入水寨，刺杀杨幺，因无人应募而罢。

宋绍兴元年（1131）春，程昌寓合水陆两军，进攻大楚重要据点夏诚寨。夏诚寨扼守沚江，设防坚固。义军大开寨门，诱官军车船驶入社江口。浊江狭窄，车船无法调转，义军发起攻击，大败官军，缴获全部车船。程昌寓再次狼狈而逃。

官军进剿连遭败仗，宋廷又于绍兴二年十月，令湖北安抚使刘洪道与程昌寓合兵招捕义军。十一月，又令湖广宣抚使李纲、荆南镇抚使解潜与刘洪道、程昌寓4路合兵，以李纲为主帅，总领各路官军，围剿义军。不久，李纲遭罢免，又改派湖南安抚使折彦质为主帅。然各路官军既不协调，又无心作战，进抵鼎州附近，即为义军杀伤甚众，遂以粮草不济，纷纷撤兵。此次围剿义军再度受挫。

在击败官军多次进剿之后，大楚政权声势大振，义军“据湖山，扼当路，阻吴蜀之通流”⑨。绍兴三年（1133）四月，杨幺自号“大圣天王”，且以此纪年，又拥立钟相少子钟仪为太子，使政权进一步得到巩固。

义军的壮大与发展，使宋廷惊恐不安。六月，赵构以神武前军统制兼淮南宣抚司都统制王玻为荆南、潭、鼎、澧、鄂制置使，率6万大军镇压大楚政权。十月，王玻率水军方抵鼎口，即被义军车船截住。刚一交战，官军水军便被击败，王玻亦中流矢，急令撤退。他与程昌寓于十一月，再度对义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他将水军主力交由统制官崔增、吴

金统领，据守下游湘江口、洞庭湖口一带。自己则领步军自德山（今湖南常德南）直攻龙阳（今湖南汉寿）的义军大寨。企图自上游发起攻势，迫使义军向下游败退，再用下游水军拦击。此次官军进攻异常勐烈，自月初至十三日，战斗激烈。义军被迫放弃龙阳的部分水寨。王琏为剿灭义军，奔波于上下游官军之间。下游官军得知义军丢失水赛，以为胜利在握。义军识破官军意图，遂自上游放下几艘车船到下游引诱官军。船上不竖旗枪，兵士则藏于船舱中。崔增、吴金领水军于下游停泊日久，终不见动静，便派小船逆流而上，前去打探。小船正行驶间，忽见有空船顺水漂泊而至，探报误以为义军已败，急报崔增、吴金，官军水军随即驾舟船迎车船而上。官军舟船将靠近时，义军车船突然擂鼓发炮，义军踏车回旋，于官军船队中横冲直撞。顷刻间，官军大小数百艘船只悉被击沉。留于沙滩上的官军亦被义军掩杀搶斷，全部歼灭。一日之间，万余官军被消灭，器甲兵械全为义军所缴获，崔增、吴全被击毙。义军于下游全歼官军水军主力后，立即挥师上游。

王玻、程昌寓尚不知下游官军已全军覆灭，直至百余义军携缴获的百余枚官告、印章、器甲牌等物，前来嬉戏取笑，方知败局已定。是夜，月明如昼。义军发车船8艘，相衔而进。船上悉载精锐铁甲之士，各持雁翎长刀，直扑官军船队。官军舟船不敢应战，拼命逃离。义军随即又发大小车船无数，紧迫不舍，又重创官军，迫使官军不敢再派水军进剿。王连败两仗，损失两员大将，无心再与义军交战。十一月底，王玻置程昌寓的再三劝阻于不顾，甚至未经朝廷允许，即率残兵败将退回鄂州。不久，宋廷乃以其“官由货授，政以贿成，军心坐离”⑩等罪名，将王玻连贬三官。

宋军屡战屡败，宋廷乃改以“恩威并济”之策，令官军“且招且捕”。绍兴四年（1134）二月，赵构命王玻与折彦质，共同措置招安。可义军“未有降意”。

在宋廷武装镇压和招抚诱降均未奏效之时，由金廷扶植的刘豫伪齐政权亦欲拉拢义军，借以攻宋。十月，伪齐太尉李成奉金帝及刘豫之命，派间谍进入义军水寨，以金帛文书约义军与李成伪齐军水陆并进，进攻宋廷。且许愿“得州者做知州，得县者做知县”，事成之后，许杨幺“裂地而王”。但义军拒绝了伪齐的协约。一个月后，李成又派出35人

的使团，携官诰、金束带、锦战袍及羊靶干肉）等物，入义军大寨，相约联兵攻宋。义军将士于夜晚将来使用酒灌醉，全部杀戮，沉尸江中。伪齐自此不敢再有此议。

宋廷见招安不成，复行武力征讨。绍兴四年（1134）八月，赵构以岳飞为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将他自淮西抗金前线调往洞庭湖区，取代王。五年三月，张浚赴湖南部署、指挥官军进剿义军。张浚调集大军沿洞庭湖区布防。同时又采取诱降政策，以分化瓦解义军。官军到处张贴诱降黄榜，甚至释放被俘在押的义军兵士，发给文书，以此动摇义军军心。岳飞统军到达洞庭湖区后，即派人不断潜入义军恐吓、利诱，“因敌将，用敌兵，夺其手足之助，离其腹心之托”。不久，义军重要首领之一黄佐叛降，岳飞令他返回湖中伺机行事。四月，黄佐偷袭义军首领周伦大寨，义军损失惨重。继而义军另一首领杨钦亦叛降，向岳飞密报义军于湖区的据点，及设防部署。且向岳飞献计，派人打开义军所修堰闸，泄湖水入大江，使义军大车船不得行驶；又建议将水草捆绑投入港汊之中，以缠绕车船水轮，使之转动不得。

五月，岳飞所部进驻鼎州城外。他令叛降者加紧招降活动，又派兵佯攻，引义军出寨迎战。适逢大楚军马太尉杨钦率3000余兵士，400余艘战船投降，严重削弱了大楚政权的军事实力。杨钦又串通全琮、刘诜等一批首领叛降，且献计诱使杨幺统兵误入官军设伏之地，而使义军数次蒙受重大损失。鉴于杨钦所统寨堡中，尚有不降者，岳飞将杨钦放还，岳飞使其前往劝降，以为内应。杨钦返回义军后，对凡抗拒不降者悉尽杀戮。官军的进攻与招降，义军内部的叛降，使大楚政权处境日趋艰难，局势极为严峻，而以杨幺为首的义军首领，仍欠警觉，未及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黄佐、杨钦等人叛降后，竟能屡次出入义军水寨，进行诱降，甚至带出人马和船只，而给官军造成可乘之隙。

张俊和岳飞在作完周密的军事进剿部署之后，又自义军叛降首领口中探知各水寨的设防虚实，遂于绍兴五年（1135）六月，向义军据守的各个水寨发起全面攻击，此时率领义军坚决抗击官军的尚有楚王杨幺与夏诚。岳飞令兵士以木枝、杂草拥塞河道，迫使义军车船行驶不得。在官军勐烈攻击下，义军水寨相继失守，战船被夺，众多兵士被杀。杨幺所部陷入官军包围之中，杨幺仍率军奋力抵抗。正激烈交战时，部将陈

瑶突然临阵叛逃，且劫走太子钟仪所乘大船。杨幺立即保护钟仪拼死突围，但随即被岳飞水军团团包围。杨幺见突围不成，便先将钟仪推入湖中。自己亦跳入水中，不幸被官军俘获。杨幺于被害前，仍连声高喊“老爷（义军对钟相的称呼）”，以示不屈。在克陷大部义军水寨之后，岳飞指挥官军围攻最后的一处义军据点——夏诚据守的大寨。经过极其紧张、激烈的厮杀。官军攻入寨中，夏诚被杀。

张浚、岳飞镇压了洞庭湖区的大楚政权后，即将起义军的五六万强壮农民收编为官军，而将10余万老弱者解散归农。

注释①《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七。

②岳珂《金佗续编》卷二五。

③《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七。

④李纲《梁溪全集》卷七三。

⑤熊克《中兴小纪》卷入。

⑥《杨幺事迹》卷下。

⑦《金佗续编》卷二七。

⑧《杨幺事迹》卷上。

⑨《金佗续编》卷二五。

⑩胡寅《斐然集》卷一二。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一。

《杨幺事迹》卷下。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入一。

《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六。

宋金江淮之战田、刘兵变被镇压，宋帝赵构复位后，以吕颐浩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张浚为知枢密院事，刘光世为太尉、御营副使，韩世忠为武胜军节度使、御前左军都统制，张俊为镇西军节度使、御前右军都统制。宋建炎三年（金天会七年，1129）四月，赵构又自杭州（今属浙江）返回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并更名为建康。此时，江淮局势刚刚得以稳定，为求苟安享乐，五月，赵构派朝散郎洪皓为大金通问使，赴金朝表示“愿去尊号”，“比于藩臣”①，再次献媚求和。六月，赵构又放弃开封，召东京留守、开封府尹杜充领兵赴建康，先任户部尚书兼侍读，随即又改授兼宣抚处置副使，节制淮南、京东西路。为了掩人耳目，赵构诏谕天下，表示“朕与辅臣宿将备御寇敌，应接中原”②，然而中原地区的防备已是极大地削弱了。

七月，正值秋高马肥之时，金帝完颜晟又令金军分四路侵宋，以六部路都统、元帅左监军挞懒领兵进攻山东、淮北地区；完颜宗弼（兀术）进兵归德（今河南商丘南），再南下渡江，取建康，追击宋帝；管勾太原府路兵马事拔离速与大将马五统兵入河南，再南进过江；完颜娄室继续率军进攻陕西。挞懒一路进犯山东后，连下潍州（治今山东潍坊）、莱州（治今山东掖县）。金军又一次威胁到赵构在江南暂时获得的安定，他感到建康临江，极不安全，遂改杭州为临安府，以为退路。同时，又派崔纵出使金军求和。八月，赵构再派杜时亮、宋汝为前往金军，并于所携求和书中乞求金军统帅、左副元帅完颜翰（粘罕）不要进兵。但宋朝请和使臣未及与金军谈判，南下金军已进入淮北。

面临金军南侵的威胁，赵构连忙调兵遣将，沿长江布防：以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杜充兼江、淮宣抚使，守卫建康；御营使司都统制韩世忠为浙西制置使，戍守镇江（今属江苏）；御营副使刘光世为江东宣抚使，镇守太平州（治今安徽当涂）、池州（治今安徽贵池）。韩世忠、刘光世同受杜充节制，而且赵构下诏，只允许戍江将领在用兵上可随宜行事，其他均受节制。知枢密院事张浚则赴襄阳（今湖北襄樊）招募官军、义兵，分别屯驻于襄阳、郢州（治今湖北钟祥）、唐州（治今河南唐河）、邓州（治今湖南邓县），且交程子秋、李允文指挥。尽管宋军江防已部署停当，赵构依旧放心不下，闰八月，他在先行安排隆祐皇太后孟氏离建康南下洪州（治今江西南昌）后，自己也在二十六日，撤离建康，经镇江，于九月初六日，到达平江府（今江苏苏

州）。此时，完颜宗弼部已连克单州（治今山东单县），兴仁府、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南），迅速向南推进。临时住在平江府的赵构又急忙调整和加强这里的防务，同时又派张邵等人为金国军前通问使，再赴金营求和，可金军毫不理会，依然大举进兵，再克沂州（治今山东临沂）。赵构自感平江府临近长江，仍不安全，便再次撤往临安府。十月初八日，赵构到达临安，十五日，又渡过钱塘江东逃，十七日，到达越州（治今浙江绍兴）。

金拔离速部得知孟太后在洪州，遂径直南下，先克寿春府（今安徽寿县），再陷黄州（治今湖北黄冈北）。二十六日，金军乘木筏和小舟渡江，宋将刘光世率兵逃去，江州（治今江西九江）知州韩梠也弃城而逃。拔离速过江后，指挥金军自大冶县（今属湖北）直扑洪州。十一月初一日，完颜宗弼率兵进攻庐州（治今安徽合肥），知州李会献城投降。再进兵和州（治今安徽和县），知州李俦出城降金。又兵进无为军（今安徽无为），守将李知几弃城而逃，金军随即渡江。孟太后得知金兵直进洪州，立即退往虔州（治今江西赣州），而江西制置使王子献竟轻易丢弃洪州，仓皇撤退。拔离速率军攻占临江军（今江西清江西），又陷洪州，而抚州（治今江西抚州西）、袁州（治今江西宜春）二州知州也先后阵金。

完颜宗弼所部于十一月中旬渡过长江后，下旬即入建康城。赵构闻讯，很快便由越州逃往明州（治今浙江宁波）。完颜宗弼率金军经溧水直逼临安府。赵构胆战心惊，又认为明州不安全，决定“航海避兵”③。十二月十一日，完颜宗弼进攻临安；知府康允之弃城出逃，钱塘县令朱跸遭杀害，临安陷落。赵构闻讯立刻率大臣登楼船驶离明州。十五日，驶抵定海县（今浙江镇海）。赵构——行在登船出海躲避之时，仍不忘留下参知政事范宗尹与司勋员外郎赵鼎，在明州专程迎候金朝使臣，以便面商求和退兵之事。十九日，赵构一行驶抵昌国县（今浙江定海）。完颜宗弼占据临安后，派大将阿里、蒲卢浑领兵4000追击宋帝。二十四日，兵进越州，安抚使李邺献城投降，殿前都指挥使、两浙宣抚副使郭仲荀竟丢弃所统军队，只顾自己逃往温州（今属浙江）。二十六日，赵构的船队南下到达温州、台州（治今浙江临海）沿海，并漂泊于海上，不敢贸然靠岸。

宋建炎四年（金天会八年，1130），金军进攻明州，右军都统制兼浙东制置使张俊与知明州刘洪道先是击退了金军的进攻，但当金军于初七再度进攻时，张俊却领兵撤退，随后浙东副总管张思政及刘洪道也临阵逃脱。10天后，明州陷落。是夜，金军乘胜攻破定海，又乘海船经昌国县追袭宋帝的船队，途中遇狂风暴雨，宋枢密院提领海船张公裕指挥大海船迎击金军船队，交战中，宋船将金军船只冲散，阻止了金军的追赶。金军只得乘船返回明州，阿里派人赴临安府向完颜宗弼报告，称“搜山检海已毕”④，遂放弃追击宋帝。赵构知金军已被击退，方敢令海船停泊于温州港口。

二月初三日，金军自明州撤回临安府。十三日，完颜宗弼率金军自临安北撤，宋帝赵构命刘光世率兵追击。但金军沿途抢掠，宋军却不敢与之交战。十八日，金军攻陷秀州（治今浙江嘉兴）。二十三日，当金军游骑出现在平江府附近时，宋同知枢密院事兼两浙宣抚使周望竟放弃守城，逃入太湖，知府汤东野也随其后逃走。二十六日，金军进入平江府，纵兵焚掠。三月初十日，金军北撤到达常州（今属江苏），知州周杞亦弃城而去。当初完颜宗弼统金军南侵时，韩世忠率兵自镇江退守江阴（今属江苏）、华亭、秀州一带。得知金军北撤，韩世忠即领所部8000余人，募得海船百余艘，重返镇江戍守，以阻断金军退路。待金军到达镇江时，韩世忠已屯守焦山寺，封锁住信道。完颜宗弼见金兵不得进，遂派使入韩世忠军中，约定双方交战日期。三月十五日，宋、金两军各派精锐水师，于长江之上展开激战。韩世忠亲自统兵，于江上“乘风使篷，往来如飞”⑤，如战马驰骋。力战数十回合，不分胜负。韩世忠妻梁红玉亦披挂上阵，亲自擂鼓以助宋军之威。宋军兵士奋力杀敌，金军难以招架，只得败退而未能渡江北去。完颜宗弼知难以突破宋军防线，便向韩世忠请求，以江南所掠财富及人口为条件，求他让路放金军渡江，韩世忠断然拒绝。完颜宗弼又提出以进献良马借道，同样遭到拒绝。在潍州（今山东潍坊）的金将挞览得知金军受阻于江南。即派李董太一率兵火速赶往淮东以作援应。完颜宗弼见镇江渡江不成，又指挥船队溯江西上。韩世忠随即也令宋军船队沿长江北岸与金军并行，且战且行，从而将金军船队围进黄天荡。黄天荡距建康东北70里，系一处死水港。韩世忠令宋军以船只堵住出口，金军多次突围均遭失败，受困于黄天荡达20余天。后有奸细奏报沿老鹳河故道可抵秦淮河，完颜宗弼随即

下令，于一日深夜金军倾巢出动，开挖老鹳河故道30余里。金军方于四月十三日逃出黄天荡，进抵建康府。第二天清晨，宋军发现金军逃遁，旋即起锚追赶，于建康以北的江面上，再次堵住金军退路。

此时江北有太一所领金军援兵，江南则为完颜宗弼所统南侵金军主力，韩世忠的船队则横亘于中间江面上。韩世忠将铁链穿以大钩，交付骁健军卒，以钩曳敌船。次日凌晨，金军船队鼓噪而进。企图突破宋军防线，渡江北撤。韩世忠令宋军船队分左右，自金军船队后面发起进攻，宋军用索钩勾住一艘艘金船，随即将其曳沉。金军船沉人亡，始终不得北渡，只得再返回南岸。完颜宗弼走投无路，再次乞求韩世忠放行。韩世忠义正严辞，提出："还我两宫（指为金军北掳的宋太皇帝赵佶与宋帝赵桓），复我疆土，则可以相全。"⑥完颜宗弼对此无言以对。几天后，完颜宗弼又请求与韩世忠会面。因其出言不逊，韩世忠引弓欲射之，完颜宗弼见状，慌忙令兵士驾回船仓皇逃去。

金军北渡屡遭挫败，完颜宗弼便募求破宋军海舟之策。有闽人王某，进献舟中载士之法，教金军兵士于舟船上铺以平板，又于两侧船板凿洞，插入船桨。此法即使船行平稳，又加快船行速度。王某建议此舟有风勿驶，无风则出，缘因宋军海舟无风则俘驶之故。四月二十五日，适逢江上无风，完颜宗弼令小舟出击。金军小舟靠近宋军海舟，遂射火箭以焚烧宋船，矢下如雨，而宋船却动弹不得，遂大乱，只得顺水而退。金军驾驶小舟紧追不舍，攻击不止，直追击数十里外。长芦（今河北沧州）崇福院僧人普伦等与百姓千余人驻于杨家洲上，得知韩世忠兵败，船队又为金军小舟所追击，便驾无数小船，头裹红巾，船插赤旗，迎头抵挡金兵。

金军小舟不敌，随即退回建康。此役，完颜宗弼统兵号称10万，而韩世忠仅有8000兵士，却将金军堵截于长江南岸近50天。宋军败退，长江防线旋即瓦解，五月十一日，完颜宗弼所领金军在纵火焚毁建康城后，携所俘宋户部尚书李税、知府陈邦光渡江北归。淮南宣抚司统制岳飞于静安镇袭击北撤的金军，继而收复建康府。

拔离速、马五所统一路金军，继攻占洪州后，又连克吉州（治今江西吉安）、筠州（治今江西高安）等重镇，进击至万安军（今广东万

宁），终未能追赶上南逃的隆韦占皇太后孟氏。随即转攻潭州（治今湖南长沙），于建炎四年二月末，渡江北撤。四月二十五日，自荆门军北归的金军行至宝丰（今属河南）境，于宋村遭留守司同统制牛皋所领民兵的攻击。金军大败，狼狈而逃，大将马五则被民兵生擒。

挞揽一路金军南下久攻楚州（治今江苏淮安）不下，知州赵立率领城中军民殊死抵抗，坚守长达10月之久，后因城中粮尽，赵立不幸中炮阵亡，军民部分夺门突围，城中则展开激烈巷战。金军虽最终得以占据城池，然伤亡甚众，且被拖于此城，南进不得。之后，挞揽统军南侵，又于潭湖（今江苏淮安境）、樊梁湖（今江苏高邮境）一带，遭到梁山泊渔民张荣所领义军的截击。挞揽令金军进攻张荣设于缩头湖（今江苏兴化东）的义军水寨，时值水退，金军舰船不得靠岸，义军则乘机奋力杀敌，杀死及俘虏金军数千人，仅有2000余残兵逃奔回楚州，缩头湖因此而更名得胜湖。挞揽见南下屡遭挫败，遂下令金军经宿迁、东平北撤。

金军的大举南侵，既未能擒获宋帝赵构，消灭南宋政权，且又遭到南宋军民的抵抗，故无力创建对江淮地区的统治。南宋政权更无意北进，只贪一时安宁，故金军北撤后，江淮地区的局势重新恢复平静。

注释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三。

②③《宋史》卷二五《高宗纪二》。

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一。

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二。

⑥《宋史》卷三六四《韩世忠传》。

川陕御金南宋创建，金帝完颜晟决定再度发兵南下征宋。宋建炎元年（金天会五年，1127）十二月，金军从东、中两路进攻山东、河南，另以金军统帅完颜宗翰所派完颜娄室统领西路军进攻陕西。

完颜娄室兵入陕西，即败宋将范致虚所部，随后相继攻克同州（治

今陕西大荔）、华州（治今陕西华县）、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凤翔府（今陕西凤翔），俘虏宋河东经制副使傅亮，河东经略使唐重、副总管杨宗闵、提举军马陈迪、转运副使桑景询等众多官吏死于战火之中，川陕军民为之大震。宋军多闻风弃城而逃，致使丹州（治今陕西宜川）、延安府（今陕西延安）、绥德军（今陕西绥德）等16处重要城寨为金军占据。宋陕西安抚使、知府州折可求于金军入攻之时，竟以麟（治今陕西神木北）、府（治今陕西府谷）、丰（治今陕西府谷西北）三州及9处堡寨，降于完颜娄室。唯有晋宁军在守将徐徽言的率领下，奋起反抗，使金军久攻不下。然而晋宁军城中无井，军民每日需取河水饮用，完颜娄室遂令兵士于河东开挖水渠，引河水东泄，城中乏水，处境极其艰难。数日后，李位、石乙等宋将开城郭门投降，金将随即统兵入城。徐徽言率领城中军民退守子城，激战3日，终因寡不敌众，徐徽言为金军所俘，与统制孙昂一同被害。

建炎三年（金天会七年，1129），完颜娄室再度进兵陕西。十一月，宋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奉命出行秦州（治今甘肃天水），部署陕西地区防务。十二月，完颜娄室领兵围攻陕州（治今陕西陕县），知州兼安抚使李彦仙请求张浚派兵援应，又提出自陕州撤军，以避实击虚。张浚不许放弃陕州，而命其死守。金军分作10队，以鹅车、天桥、火车、冲车等军械，轮番攻城。城中军民在李彦仙率领下，顽强抗敌，击退金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使金军伤亡甚众。城中受金军围攻，储粮告罄，将士分粮而食，李彦仙亦只饮豆汁。四年正月，经历大小200余战后，陕州城终遭陷落，李彦仙身负重伤殉难。城中百姓仍旧以巷战抗击金军，妇人则登上屋顶，以瓦块砸击金兵。四月，金军又攻克鄜（治今陕西富县）、坊（治今陕西黄陵东南）及三原（今属陕西）、干（治今陕西乾县）、邠（治今陕西彬县）等州县重镇，且驻军于长安（今陕西西安）。此时，南侵各路金军已陆续北撤，陕西地区则因受战火摧残，生产凋敝，百姓存者无几，且已被金军占据的州县重镇又纷纷叛金。张浚也在积极组织力量反击金军的进攻，陕西局势极不安定。完颜娄室见此情景，只得退兵河东。

完颜宗弼撤回江北后，屯驻于六合（今属江苏）。江淮地区的局势依然严峻。宋建炎四年（金天会八年，1130）夏，宋廷恐金军秋后再度南侵，即令张浚于陕西向金军展开攻势，以分散和牵制金军主力。张浚

领命后，进行精心部置，下令诸路宋军分道进兵关中。宣抚处置司都统制、鄜延经略使、知延安府曲端认为此时用兵仓促，主张应充分备战而后与金军交战。张浚不允，即将他罢官。

完颜宗弼（兀术）得知张浚于陕西起兵，原为金军占据的州县相继叛金归宋，且完颜娄室所统兵力不足抵挡宋军的进攻，已向金廷求援，故于是年七月，奉金帝完颜晟之命，率2万精兵自六合直趋陕西救援，又以右副元帅完颜宗辅（讹里朵）总领陕西军事。张浚令于陕西部署基本完毕后，即指挥宋军夺回被金军所占失地。八月，张浚令统制吴玠领兵一举收复永兴军（今陕西西安），遂以他为权永兴军经略使。随后又用兵鄜延路（治今陕西延安），收复所辖诸州县重镇。九月。张浚调集骑兵六七万，步兵十二三万。号称40万大军，浩浩荡荡向东挺进。张浚亲临邠州督战，指挥大军进兵富平（今属陕西）。宋军大规模的用兵，令金廷紧张万分，完颜宗辅与完颜宗弼、完颜娄室合兵西进，亦至富平。张浚令都统制刘锡统五路兵马与金军大战，宋、金交战后，泾原路军将刘绮亲自率领将士杀入金军阵中，斩杀俘获金兵甚众。完颜宗弼等人陷入宋军重围之中，金将韩常亦被宋军流矢射中眼睛。金军经过拼死厮杀，方突破宋军包围，完颜宗弼得以幸免于难。

正当宋、金两军激烈交战之时，宋环庆路军将赵哲竟擅离所部，适逢完颜娄室领兵来攻，赵哲所部无主帅，将校见前方尘土飞扬，惊慌失措，赵哲临阵弃军自逃，所部也随后奔逃。宋军御敌部置全被打乱，金军趁势勐攻，宋军全线溃败。张浚领兵屯守兴州（治今陕西略阳）。宋军的溃败，使金军得以长驱直入。陕西地区再度失陷，诸多州县官吏投降金军，宋军士气大受挫折。张浚于阵前召来赵哲，当众处斩，以平定士气，又令诸将领各领所部回归本路防守。同时派刘子羽赴秦州招集溃散的宋军，一时间前来会合的宋兵已达10余万人。宋军兵势稍得恢复。金军攻势愈发勐烈，张浚随即命吴玠聚兵扼守凤翔府境内大散关、和尚原（位今陕西宝鸡南），以堵截金军的来路，又令关师古等将领统领熙河路（治今甘肃临洮）宋军，驻守岷州（治今甘肃岷县）大潭；以孙渥、贾世方等将领统领泾原路（治今甘肃平凉）、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宋军屯守阶（治今甘肃武都东）、成（治今甘肃成县）、风（治今陕西凤县）3州，以加强入川之道的防卫。张浚则率兵退至阆州（治今四川阆中），复命陕西节制使、知京兆府王庶为知兴元府、利夔两路制

置使，节制陕西诸军。王庶随即招集到2万余溃散的宋军及抗金民兵。张浚入川 后，募集新兵，操演训练，精心治军，苦心经营，尤注意用人之长。他以刘子羽“慷慨有才略”奉为“上宾”，以赵开善理财而使为都转运使，以吴蚧每战皆胜使为大将，从而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故“西北遗民，归附日众”①。而吴劲亦于大散关东的和尚原创建起山寨，在此训练兵士、屯蓄粮草，作为死守之计。

宋绍兴元年（金天会九年，1131）五月，金将没立自风翔出兵，别将乌鲁折合自阶州、成州出散关，约定合兵于和尚原。乌鲁折合先期到达，布阵于北山，且向宋军挑战。吴蚧令诸将领坚守阵地，以逸代劳，轮番作战。山谷路狭多石，马不能行，金兵舍马步战，吴蚧指挥宋军据险反击，金军大败而逃。没立所部攻打箭筈关，也遭吴玢派兵击退。十月，完颜宗弼会集各路金军10余万人，亲自统领，架浮桥跨过渭水；直扑和尚原。他令金兵自宝鸡向南建“连珠营”，垒石为城，相互衔接，便于援应，且夹山涧与宋军对阵。吴蚧与其弟吴磷率领宋军英勇反击，令诸将选劲弓强弩，轮番射杀金兵，号称“驻队矢”，连发不绝，箭如雨注。金兵死伤无计。金军阵势稍退，吴蚧即派兵侧击，又派兵断其粮道。激战3日，杀俘金兵万余人。吴蚧料敌必将撤兵，又出奇兵设伏于神坌。

未几，金兵果然退兵途经于此。宋军突然攻击，金军顿时大乱。入夜，吴蚧再纵兵袭击金营，金军大败，完颜宗弼亦身中2箭，竟剃去髯须，方未被宋兵识出，得以逃脱。他惊魂未定，即自河东返回燕山府（今北京西南）。复以撒离喝为陕西经略使，屯驻于风翔，与吴玢对阵。战后，张浚以吴玠为镇西军节度使，吴磷为泾原路马步军副总管。

二年，张浚又以吴蚧兼宣抚处置使司都统制，节制兴、文（治今甘肃文县西）、龙（治今四川平武东南）3州。时金军窥视四川已久，只因吴磷驻兵于和尚原，扼守得逞要冲，金军难以得逞，遂欲出奇制胜。撤离喝用宋叛将李彦琪驻守秦州，以牵制吴蚧；令游骑出熙河，以牵制关师古；自己则率兵避开和尚原，迂回自商州（治今陕西商县）直插上津。三年正月，撤离喝率军攻旬阳（今属陕西），击败王彦部宋军后，即沿汉水西进。占据金州（治今陕西安康）。二月，金军长驱直入，进逼洋（治今陕西洋县）、汉（治今陕西汉阴）等地。宋兴元府（今陕西

汉中）知府刘子羽急令宋将田晟统兵扼守饶风关，且以驿书招吴蚧入援。吴蚧于河池接到求援驿书，立即率数千兵将日夜兼程，急驰300里赶到饶风关。他令人送黄柑给金军，称“大军远来，聊用止渴”。撤离喝为之大惊，用杖击地，说道：“尔来何速耶!”宋、金两军随即大战于饶风关。金兵身披重铠甲，登山仰攻，一人在先，二人拥后，前者伤亡，后者继续进攻。吴蚧令兵士弓弩齐射，滚石砸砍，经过六天六夜的激战，金军死者堆积如山，但仍进攻不止。吴玢又招募敢死兵，每人千银，得敢死兵5000人，准备夹击金军。

正在此时，吴玠军中有一小校叛逃，引导金军绕到饶风关后，居高临下攻击据守关口的宋军。宋军不备，且腹背受敌，终于不敌而溃败。吴蚧退往仙人关，王彦退守达州（治今四川达县），刘子羽退保三泉，筑潭毒山寨堡固守。未几，金军因伤亡严重，亦退兵北撤。四月，金军自兴元府北归，吴蚧闻讯，立刻派兵于武休关掩杀其后军，金兵仓皇应战，坠涧身亡者多达千人，丢弃辎重狼狈逃回凤翔府。

饶风关战后，吴玠因和尚原距四川甚远，粮运不便，遂令吴磷放弃据守，另于仙人关右侧修筑堡垒，号“杀金平”，调和尚原守军驻扎于此，准备迎击金军的再次进攻。而金廷亦令完颜宗弼重返陕西，指挥并策划金军入川。十一月，金军占据和尚原。

宋绍兴四年（金天会十二年，1134）二月，完颜宗弼统领金将撒离喝所部和伪齐刘夔所部共10万人马南侵，自铁山凿崖开道，绕山岭东下，进抵仙人关下。吴玠派出1万宋军抵抗，吴磷率轻兵由七方关驰援，经与金军转战7昼夜，才得以和吴蚧合兵。金军首攻吴蚧所部，遭反击败退。随后金军又用云梯进攻堡垒，宋守将杨政指挥兵士用撞竿撞碎云梯，以长矛刺杀金兵。吴磷拔刀画地，对诸将士说：“死则死此，退者斩!”②宋军将士人人奋勇杀敌，击退金军进攻。完颜宗弼又将金军分为两部，自己领一部布阵于东，令大将韩常领一部布阵子西。吴磷则亲自率领一队精兵穿梭往来于东、西两部金军之间，寻找战机，左右攻击金兵。交战已久，吴磷所部兵将已疲惫不堪，迅速退守第二隘。初，吴磷见“杀金子”所处地势开阔，且距仙人关远，不易固守。若前阵失利，须后阵阻击，故于“杀金平”之上又急修第二隘。吴磷方率兵退至第二隘，金军主力即接踵而至。金兵身着重甲，以铁钩相联系，鱼贯而上。

吴磷令以“驻队矢”交替射杀金兵，顿时矢下如雨，金兵中箭而亡者层层这积。然而金军又踏着死尸，强攻不止，金将撒离喝甚至勒马四望道：“吾得之矣。”

翌日，完颜宗弼令金军进攻第二隘西北楼，宋将姚仲领兵登楼与之酣战。激战之中，楼忽然倾斜，姚仲立刻以帛为绳，将楼挽正。金兵攻楼不下，又改以火攻，姚仲率守楼将士用酒坛砸灭烈火。形势极度危难之时，吴玠急遣统制田晟率兵挥舞长刀、大斧冲入金军阵中，左突右击，一时间，火炬照亮四周山岭，喊杀声震天动地。第二天，吴蚧指挥宋军全面反击，令统制王喜、王武率领精锐兵士分作2队，各以紫、白旗为前导，冲人金营，金军阵营顿时大乱。宋军奋力厮杀，交战中又射中金将韩常的左目，金军不敌，连夜溃逃。吴蚧又令统制官张彦于横山寨拦劫金军，王俊伏兵于河池扼守金军退路，再次大败金军。

金军败退后，吴玢又统兵出击，四月，先后收复秦、凤、陇（治今甘肃陇县）等地，金军自此不敢轻举妄动。

注释①《宋史》卷三六一《张浚传》。

②《宋史》卷三六六《吴玠传》。

第三十三章

岳飞抗金岳飞（1103-1142），字鹏举，河北西路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农家出身。少年家境贫寒，仍刻苦学习《左氏春秋》、孙子和吴起兵法，习练武艺。未及成年，即能挽300斤弓及8石力弩。

宋宣和四年（1122），真定宣抚刘招募勇士，岳飞应募，投军抗辽，曾仅率百骑一举歼灭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境内巨盗。宋靖康元年（1126），金军大举南侵，宋帝赵桓令康王赵构置天下兵马大元帅府。赵构至相州，岳飞前往投奔，且受命招降抗金义军，而补承信郎后赴开封府（今河南开封）解围，于滑州（治今河南滑县东）与金军对峙。岳飞率百骑于黄河岸边与金军遭遇，独自闯入敌军阵中，大败金军，而迁秉义郎，后改随东京留守宗泽。宗泽极赏识其才干，亲自授予战阵之法。宋建炎元年（1127），北宋灭亡，赵构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称帝。岳飞上书力请赵构还都开封，亲征金军收复失地，却被宋廷以越职为由，削夺军职。此后，岳飞又投河北招讨使张所麾下，任中军统领，受命从都统制王彦北渡黄河收复新乡（今属河南）。后因与王彦有隙，复归宗泽，为留守司统制，屡立战功。宗泽逝世后，宋廷以杜充为东京留守，岳飞仍以统制隶其麾下。

宋建炎三年（1129），金左副元帅完颜宗翰举军南侵，杜充弃开封南逃建康（今江苏南京）。岳飞力谏不可，亦随之南下，充江、淮宣抚使司右军统制。未几，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率兵直插江南，杜充竟紧闭城门不行御敌之事。直至金军自马家渡渡江，兵抵建康城下时，杜充方令诸将出击，独岳飞顽强抗击，而他将皆溃败而逃。建康陷落，杜充逃奔真州（治今江苏仪征），叛宋降金。所隶部将多溃散劫掠，唯岳飞军秋毫无犯。完颜宗弼兵进杭州，岳飞领兵攻击金军，接连获捷。又招集散兵游勇，整饬所部，转战于广德军（今安徽广德）等地。建炎四年，岳飞率军屯驻宜兴（今属江苏）。完颜宗弼于临安府（今浙江杭州）、越州（治今浙江绍兴）、明州（治今浙江宁波）等地“搜山检海”之后，率军北撤，再攻常州（今属江苏）。岳飞与金军四战皆胜，又尾袭金军于镇江（今属江苏）之东；又战于清水亭，再报捷，使金军横

尸15里。此后，岳飞数次击败金军，收复建康，遂受任通、泰镇抚使兼知泰州，屯兵驻扎于江北泰州（今属江苏）。不久，金军进攻楚州（治今江苏淮安），宋帝赵构令御营前军统制张浚领兵救援，张俊推辞，又改令岳飞出兵，另以殿前都指挥使刘光世领兵援应。岳飞率所部赴援至承州（治今江苏高邮），与金军三战三捷，俘虏金军将校70余人。然而刘光世等却畏敌不敢进兵，致使岳飞所部孤军奋战，与金军鏖战数日后，终因寡不敌众，被迫退兵江南，楚州失守。宋帝又令岳飞回师驻守通州（治今江苏南通）、泰州，且称能守则守，不可则掩护该地百姓渡江。岳飞认为泰州无险可守，便放弃拒守，率领军民渡江。然而宋廷却以泰州失守，令岳飞停职待罪。

宋绍兴元年（1131），岳飞所部隶属于张俊部下，转战于洪州（治今江西南昌）、筠州（治今江西高安），击破盗匪李成军，收降张用。绍兴二年，以岳飞为权知潭州，兼权荆湖东路安抚都总管，且交予金字牌、黄旗，令招降盗匪曹成军。岳飞又转战于荆湖南路和广南东、西路，彻底击溃盗匪，曹成被迫投降。绍兴三年，奉命镇压吉州（治今江西吉安）、虔州（治今江西赣州）等地的农民起义军。宋帝赵构亲笔书写“精忠岳飞”四字，制成旌旗赐之，授镇南军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

绍兴四年，岳飞任江南西路、舒、蕲州兼荆南、鄂、岳、黄、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是时，伪齐军与金军联兵南侵，岳飞受命统兵北上，连破敌军，克复郢州（治今湖北钟祥）、随州（治今湖北随县）、襄阳府（今湖北襄樊）、邓州（治今河南邓县）、唐州（治今河南唐河）、信阳军（今河南信阳），遂授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是年冬，完颜宗弼与伪齐帝刘豫合兵围攻庐州（治今安徽合肥），宋帝亲笔书札令岳飞前往解围。岳飞领兵直趋庐州，于城下击溃伪齐、金联军，解救庐州围困。绍兴五年，岳飞晋升为镇宁、崇信军节度使，又授荆湖南、北两路、襄阳路制置使，神武后军都统制。受命赴洞庭湖诱降，镇压了钟相、杨幺的起义军，又升任荆湖南、北两路、襄阳路招讨使。

绍兴六年，宋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张浚至长江会诸大帅，独称岳飞与韩世忠可倚大事，令岳飞屯

守襄阳府。岳飞移军京西路。又迁宣抚副使，遂于襄阳置宣抚使司。随即再次出师北上，攻占伪齐镇汝军、虢州（治今河南灵宝）、商州（治今河南商县）、伊阳（今河南嵩县）、长水（今河南洛宁西南）。七月，伪齐刘豫派其子刘麟、侄刘猊打着金军的旗号，分路入侵淮西地区。宋军将领刘光世、张浚畏敌，欲放弃各自驻守的庐州和盱眙（今属江苏），宋廷再令岳飞率兵自襄阳东下，迎击伪齐军。岳飞不顾目疾严重，得诏书当日即发兵，一直进至蔡州（治今湖南汝南）。但是宋廷不许，而未攻下蔡州。

绍兴七年，岳飞赴临安府入见宋帝，拜太尉，授宣抚使兼营田大使。岳飞多次与宋帝谈论克复北方失地，力主出兵北上进攻伪齐，收复河北、京畿、陕西失地。宋帝十分赞赏其主张，表示“中兴之事，一以委卿”①。岳飞领命正欲筹划举兵，枢密使秦桧却竭力与金廷求和，破坏抗金部署。岳飞又与张浚商议遣将之事，因遭猜忌而自除兵权，还乡为其母服丧。直至宋帝数次下诏，令岳飞还职，方入朝待罪。仍以出兵北上，收复失地劝谏宋帝，且建议屯兵于淮甸，以伺机进兵。宋帝不许，而令其驻兵于江州（治今江西九江），以实时援应两淮及两浙地区。八年，岳飞所部回驻鄂州（治今湖北武昌）。但因上言请无子嗣的赵构建储，因而再遭宋帝的猜忌。在复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秦桧的倡导下，宋廷又欲与金求和，以换回建炎元年（1127）被金军俘虏北去的太上皇帝赵佶的梓宫，岳飞的北伐计划及部置因此而遭废止。绍兴九年，金帝完颜亶归还宋廷河南、陕西之地。岳飞认为金人不可信，上表不赞同赵构与秦桧等人的投降乞和行径，提出“唾手燕云，复仇报国”的豪言壮语，甚至一度曾拒绝宋帝所赐开府仪同三司之官爵，指出：“今日之事，或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②，仍主张整饬军队，训练兵士，积极备战。但这一切都被秦桧所阻止。

宋绍兴十年（金天眷三年，1140），金廷毁约，都元帅完颜宗弼（兀术）统领大军，分四路攻宋。相继攻陷宋东京开封府、拱州（治今河南睢县）、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南）、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东）等重镇，河南、陕西之地复为金军所据。宋帝急令岳飞出兵救援，岳飞接令，派遣张宪、姚政、王贵、牛皋、董先、杨再兴等部将，分别经略一方，又令梁兴北渡黄河，纠集河北各地的抗金忠义民兵，攻取河东、河北州县。另派兵东援淮西制置使刘绮，西援知永兴军兼节制陕西

诸路军马郭浩。岳飞则亲统大军长驱中原。宋帝又授予他为河南、河北诸路招讨使。不久，岳飞所遣各路将领相继告捷。宋军大举北伐，主力屯聚于颍昌府（今河南许昌），诸将所部分路出击，岳飞亲自率领一支轻骑，驻扎于郾城（今属河南）。数万岳家军屡败金军，又先后自金军手中夺回淮阳府（今河南淮阳）、郑州（今属河南）、西京河南府等河南大片失地。

面对岳家军的大举北伐，完颜宗弼极度恐慌，忙召集部将商议对策。认为岳家军诸将尚可对付，唯有岳飞不可挡，遂议定孤注一掷，合兵与之决战。完颜宗弼侦知岳家军诸将分路进击，兵力分散，而岳飞仅带少量军队驻于偃城，决定亲统精锐骑兵15000人，直扑偃城，企图一举歼灭之。宋廷闻讯，大为担忧，宋帝下诏，要岳飞“审处自固”③。岳飞不以为然，依旧每日出城挑战，于金军营前骂阵。完颜宗弼大怒，遂与金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及韩常等将领合兵，进兵偃城。七月初八日，金军于偃城北与岳家军对阵。岳飞令其子岳云领轻骑直冲敌阵，并告诫：“不胜，先斩汝!”岳云领命，即率军闯入金军阵中。往来冲杀，鏖战数个回合，金军死尸遍野。完颜宗弼令其精锐重甲骑兵“铁浮图”作正向攻击。另以骑兵为左右翼，侧面进攻，号称“拐子马”。岳飞则遣背嵬亲军与游奕军马军迎战金军，又派步兵手持麻扎刀、大斧等兵器，冲入金骑兵军中，上砍敌兵，下砍马足。金军战马纷纷倒地。岳飞指挥余部掩杀坠马金兵，勇将杨再兴单骑突入敌阵，欲生擒完颜宗弼，斩杀金兵数百人。完颜宗弼见“铁浮图”遭如此惨败，伤心已极，随即又命金军增援。岳飞部将王刚正领50名骑兵侦察敌军，忽遇金军援兵，即奋力拼杀，斩杀其将。岳飞亲临前线视察战地，望见远方黄尘蔽天，料金军前来救援，遂率领40骑突入金援军，击败之。完颜宗弼与岳飞两军自下午直激战至天黑，金军大败。

十日，完颜宗弼再度派兵进攻偃城。岳飞率军于城北五里店与之交战，于阵前斩杀金前锋主将李朵孛堇，追杀20余里。完颜宗弼见偃城再度失利，遂调集12万重兵，屯驻于临颍（今属河南），又一次进攻偃城。十三日，岳飞部将杨再兴率300骑兵巡逻至偃城北小商桥时，突然与金军遭遇。杨再兴与300骑兵当即冲入敌阵，杀死2000余金兵及万户撒八孛茧等100多名金将。终因力寡，被金军团团包围，杨再兴和所部将士全部殉难。岳家军将张宪闻讯，即率兵赴小商桥，次日晨，于临颍

城南与金军交战，大败金兵，又径直追杀，将金军逐出临颍县界30余里。金军残部向尉氏（今属河南）溃逃。岳飞料金军攻偃城屡败，必将转攻颍昌府，随即令岳云速援颍昌守将王贵。十四日晨，完颜宗弼果然亲自统领金军主力3万骑，直抵颍昌城西门外。驻守颍昌的岳家军主力倾城出战，迎击金军，血战数十回合，直战至午后，胜负难分。岳家军部将董先、胡清率精兵突入敌阵，打乱金军布阵，扭转战局。岳云率援兵赶至颍昌，王贵率游奕军、岳云率背嵬亲军与金军再战于城西。岳云指挥800骑兵与金军决战，又派步军自左右翼继后掩杀。双方激战，岳家军再次大破金军主力，斩杀完颜宗弼女婿、金将夏金吾、副统军粘罕索孛堇，完颜宗弼率残部逃离。

岳飞统兵北伐，数挫金军精锐主力，令金兵闻风丧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中原及河北民众亦盼望宋军克复失地，恢复宋朝江山。河北抗金义军首领赵俊、乔握坚等，趁金军南下，后方空虚之机，克陷赵州（治今河北赵县）。岳飞部将梁兴、董荣两军赴河北敌后，抗金义兵及百姓纷纷归附。完颜宗弼深感局势严峻，下令“老小渡河”，先以8000人渡河北撤，准备随后再全线撤兵。岳飞因此上奏朝廷，提出要诸路兵马“火速并进”，继续北上进击金军。并激励部下：“直抵黄龙府（今吉林农安），与诸君痛饮耳!”④然而以宋帝赵构、宰相秦桧为首的投降派，当初令岳飞北进，并非想光复宋朝江山，只是指望击退金军南侵，保住半壁江山即可，也想以此作为与金廷议和的条件。因此得到岳飞的奏疏后，宋帝下诏，令他“措置班师”。为了阻止岳飞继续北进，秦桧甚至提出划淮河为界，以北地区全部放弃。他深知岳飞志坚且倔犟，竟先私自命令张俊自亳州（治今安徽亳县）、宿州（治今安徽宿县）退兵至淮南。又令各路大军停止前进，撤回原驻地屯守。而后以岳飞所部孤军深入，请赵构令其撤兵。宋帝为使岳飞尽快退兵，竟一日连下12道金牌，且令东京副留守刘绮放弃顺昌府（今安徽阜阳）。岳飞见朝廷如此举措，愤然泪下。尽管此时其所部一支已兵进朱仙镇，距开封（今属河南）仅四五十里，岳飞迫于宋帝的命令，只得奉诏班师。他愤慨万分，说道：“所得诸郡，一旦都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⑤为了防止金军乘岳家军退兵时再度南侵，岳飞于临班师前，扬言将进兵开封。金军闻讯，不敢出战。中原百姓得知岳飞撤兵，众人拦住岳飞的马，失声恸哭。岳飞也悲泣落泪，只得以宋帝的诏书出示众人，

一时间，哭声震野。为了掩护中原百姓南迁，岳飞下令所部驻留5日。背井离乡的百姓纷纷南下，道路拥塞，人流如潮，岳飞又急奏朝廷，请求于汉水沿岸六郡安置中原南徙百姓。

七月十九日，岳飞下令，岳家军自偃城退兵。此时，陈州（治今河南淮阳）又遭金军围攻，岳飞立即分兵前去解围，之后所部诸将领兵退至鄂州。岳飞则取道顺昌，南渡淮河直往临安府。岳飞北伐征金，收复河南大片失地，且于偃城之战中，以少胜多，令金军闻风丧胆。加之梁兴等将领于河北敌后的抗金活动，岳家军北上克复旧疆故土，形势极为有利。然而宋廷投降派的破坏，致使北伐的胜利成果顷刻间被断送。岳家军数十日浴血奋战夺回的失地，在岳飞撤兵后，复为金军占据。此后，岳飞虽多次主张北上进击金军，但都遭到赵构与秦桧等人的拒绝，而只令他防守，最终解除其兵权，制造冤狱，以求与金廷议和。

注释①②③④《宋史》卷三六五《岳飞传》。

⑤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七。

伪齐覆灭宋建炎三年（金天会七年，1129），金廷分兵四路南下侵宋，完颜宗弼率军渡江追击赵构，迫使他乘楼船漂泊于海上，终得以逃脱。在南宋军民的英勇抗击下，金军北撤。为确保金廷于黄淮地区的统治势力，避免中原百姓与金朝的直接对抗，四年九月，金廷扶植南宋降臣刘豫创建伪齐政权。

建炎通宝刘豫，景州（治今河北东光）阜城人。少年时，曾偷窃同窗好友的白金盂、纱衣等物。宋神宗元符年间（1098-1100），登进士第。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拜殿中侍御史，即遭到朝廷官员的讥讽。不久，刘豫屡次上奏，评议礼制局，又遭徽宗训斥，贬为两浙察访使。宣和六年（1124）改判国子监，除河北提刑。北宋末年，金军大举南侵，刘豫弃官逃到仪真（今江苏仪征）躲避战乱。建炎二年（1128），刘豫通过巴结中书侍郎张慰，被荐举为知济南府。此时山东地区强盗肆行，刘豫不愿前往赴任，请求朝廷改任东南地区一州之长，遭拒绝后愤然北上。是年冬季，金军进攻济南府（今山东济南），刘豫派其子刘麟出城迎战，被金兵包围，州副官张柬带兵前来援助，方得以

解围。刘豫仍念不得改任他州之忿，遂阴谋策划叛宋。他杀死抗金将领关胜后，欲献城降金，但百姓反对投降，刘豫只好缒城投奔金军。三年三月，完颜宗弼得知赵构已渡江南逃，江淮地区宋军实力减弱，便徙刘豫为知东平府，充京东、京西、淮南等路安抚使，节制大名、开德府、濮、滨、博、棣、德、沧等州。又以刘麟充任知济南府。原黄河以南的宋地，均归他统治。

建炎四年（1130），刘豫派刘麟持名贵珍宝贿赂金左监军完颜凸（挞懒），请求册封自己为帝。完颜昌应允，派人赴刘豫所部征询民意，众人尚未及答复，即有刘豫同乡张浃先行请求册立刘豫。完颜昌随即奏请金廷，金帝完颜晟下诏："今立豫为子皇帝，既为邻国之君，又为大朝之子。"①九月，刘豫在金廷扶植下，正式即皇帝位，国号大齐（史称伪齐），建都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仍称北京。委任原宋安抚使张孝纯为丞相，李孝扬为左丞，张柬为右丞，李俦为监察御史，郑亿年为工部侍郎，王琼为汴京留守，其子刘麟为太中大夫、提领诸路兵马兼知济南府，其弟刘益为北京留守。

刘豫为建傀儡政权，千方百计拉拢宋朝地方官员。他多次派人劝降宋东京副留守上官悟，又贿赂其僚佐共同劝说上官悟降金，上官悟不从，将来人及僚佐一并斩杀。又招降知楚州赵立，亦遭断然拒绝。相反，刘豫的倒行逆施更招致众叛亲离，诸多僚届纷纷离去，或逃入山谷间。然而宋廷主和派却十分害怕伪齐政权，于国书中称刘豫为大齐皇帝。伪齐官僚张孝纯、郑亿年、李邺等人家眷均在南宋，宋廷对他们倍加抚慰。金廷虽册立刘豫为帝，亦只视为傀儡，处处加以防范。宋绍兴元年（金天会九年，1131），金廷与伪齐以黄河故道为界，但又恐河东、河北金朝占领地区百姓逃入伪齐，金廷遂下令检括户口，或将百姓转卖他国，或强行押送云中（今山西大同）地区，以此防备刘豫。此后，完颜宗弼（兀术）等出兵陕西，宋军退守四川，金廷又划陕西给伪齐。

五月，宋朝叛将李成遭江淮招讨使张俊进击，大败，遂率数万人马自淮西投奔伪齐势力，伪齐势力渐强。十月，刘豫派伪齐军入侵宋境，令其将王世冲率蕃、汉兵进攻庐州（治今安徽合肥）。知州王亨设计斩杀王世冲，大败伪齐车。十一月，伪齐秦风军帅郭振入寇宋境，遭宋

均、金、房州安抚使王彦和关师古领兵反击，大败而还。宋河南镇抚使翟兴屯守伊阳山，刘豫深感其威胁之大，绍兴二年三月，刘豫派人招降翟兴，且许以王爵。翟兴焚烧伪诏，处死来使。刘豫见招降不成，又暗地收买翟兴部将杨伟以除心腹之患。杨伟杀害翟兴，投降伪齐。四月，刘豫迁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时金军占据黄河、淮河及陕西、山东地区，刘豫的伪齐政权凭借的军事力量只有由10余万乡兵组成的皇子府13军。不仅如此，中原地区自北宋末年以来，屡遭战火摧残，农田荒芜，经济凋敝。刘豫为解决财政收入，分别设置河南、汴京淘沙官，专事搜刮民间财富，两京地区的坟墓都盗掘一空。伪齐统治区域内，赋税征敛烦苛，民不聊生，纷纷奋起反抗。伊阳（今属河南）人翟进兄弟筑山寨对抗伪齐，在伪齐军与金军的联合围攻下，依然坚持斗争。

五月，宋襄阳镇抚使桑仲遇害，刘豫立刻派人前往襄阳（今湖北襄樊）招降桑仲部将，又派人赴随州（今属湖北）、邓州（治今河南邓县），分别招降守将李道、李横，均遭拒绝，所遣使臣皆被杀戮。桑仲死后，宋廷遂委李横为襄阳镇抚使。十二月、李横于扬石大败伪齐军，遂进兵汝州治今河南临汝），守将彭出城投降。绍兴三年正月，李横军又攻破颍顺军，守将兰和投降。又败伪齐军于长葛（今属河南），随即率军进攻颍昌府（今河南许昌），伪齐安抚使赵弼据城固守。宋军发起勐攻，赵弼弃城而逃。二月，宋河南镇抚司统制官李吉也于伊阳台击败伪齐军将梁进所部，且斩杀梁进。南宋对伪齐的攻击，尤其是颍昌府的失守，令刘豫焦虑不安，只得求助于金廷。金左副元帅完颜宗翰（粘罕）令右副元帅完颜宗弼（兀术）统兵赴援。刘豫亦遣部将李成率2万伪齐军会合金军，于颍昌府西北牟驼冈与宋军大战。李横不敌，败退，颍昌府陷落。四月，金与伪齐联军再克虢州（治今河南灵宝），宋镇抚司统制官谢皋剖腹自杀，以示拒降。不久，金元帅府派使臣萧庆至汴京，与刘豫商议联兵征伐南宋。刘豫建议以轻兵直趋长江采石（今安徽马鞍山西南），渡江攻宋。正议而未决之时，宋阎阁门宣赞舍人、明州守：降徐文率所部海舟60余艘、官军600余人自海上驶抵盐城（今属江苏），投降伪齐。徐文告之刘豫，南宋沿海无备，可白海上进兵，袭取昌国（今浙江定海），劫取宋廷屯积于此的粮船，再进抵明州（治今浙江宁波），登陆攻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刘豫将徐文所言上书金元帅府，完颜宗弼与完颜宗翰对用兵南宋意见相左，完颜宗弼因有前次受困

于黄天荡之鉴，便以“江南卑湿，今士马困惫，粮储未丰足”②为由，不愿南下，故金廷仅遣元帅左监军完颜昌（挞揽）率兵南行，然而兵至瓜洲（今江苏扬州西南）即北归。

刘豫见金廷无意白海上南侵，遂派其子刘麟、侄刘猊及宋叛将李成、孔彦舟等率伪齐军与金军联兵攻宋。十月，相继攻陷邓州、襄阳、随州、郢州（治今湖北钟祥）。伪齐将领王彦也自亳州（治今安徽亳县）统兵至寿春（今安徽寿县），欲窥视江南。时宋江东淮西宣抚使刘光世驻军于建康（今江苏南京），扼守马家渡，又令部将郦琼率兵进驻无为军（今安徽无为）。王彦见势，不敢贸然南侵，只得北撤。十二月，金廷派使臣李永寿、王翊入宋，为伪齐要挟宋廷，要求宋廷送还所俘伪齐兵士及逃入宋境的西北地区民众，且提出以长江为界，划江北地区给刘豫。宋廷主战派官僚力主不从金议，赵构派使臣章谊赴云十（今山西大同），与金无帅府再议此事。完颜宗翰提出宋军不得驻军淮南，章谊拒不屈从，返回时，刘豫欲扣留之，章谊巧妙脱身，返回宋境。

宋绍兴四年（金天会十二年，1134）正月，宋熙河路马步军总管关师古于左要岭与伪齐军大战，战败后投降，刘豫遂占有洮州（治今甘肃临潭）、岷州（治今甘肃岷县）等地区。五月。宋舒、蕲等州制置使岳飞率兵北上征伐伪齐，大败李成所部，相继收复襄阳、唐州（治今河南唐河）、随州、邓州等地。刘豫向金廷乞求增援。同时令伪齐军掠夺民船500艘，装载战具，以徐文为前军，扬言进攻定海（今属浙江）。九月，刘豫派刘麟入寇宋境，又诱说金统帅完颜宗辅、完颜宗弼、完颜昌分兵南侵，步军自楚（治今江苏淮安）等地出兵，骑兵自泗州（治今江苏泅洒洪东南）直插滁州（今属安徽）。而后又派遣伪齐知枢密院卢纬赴金廷请求出兵。金帝完颜晟召集诸将廷议，完颜宗翰与完颜希尹认为不可，唯完颜宗辅力主出兵，金帝从其议，委任完颜宗辅权左副元帅，完颜昌权右副元帅，调集渤海军、汉军5万余人马援应伪齐。又以完颜宗弼熟知江南地形，遂命其统领前军。刘豫闻金廷派兵援应，即以刘麟领东南道行台尚书令，率兵与金军分道南渡淮河。守知楚州樊序弃城而逃，淮东宣抚使韩世忠亦自承州退守镇江（今属江苏）。

面对伪齐与金军的联兵进攻，赵构在主战派臣僚劝说之下，决意迎敌。十月，赵构令江淮招讨使张浚率军援助韩世忠，淮西宣抚使刘光世

移军建康。韩世忠随即率兵渡江进驻扬州（今属江苏），不久便于大仪（今江苏仪征北）大败敌军。

十一月，赵构下诏讨伐伪齐。宋军士气大振，准备渡江决战。淮西军将王师晟、张琦合兵攻陷南寿春府，俘虏伪齐知州王靖。十二月，岳飞派牛皋、徐庆于庐州击败金军。在宋军的反击下，金军退兵，刘麟亦慌忙丢弃辎重，连夜北逃。

宋绍兴六年（金天会十四年，1136）正月，刘豫于淮阳（今江苏邳县东）集结伪齐军，准备反攻，韩世忠得知后，迅速出军包围。完颜宗弼与刘猊合兵火速救援，均为韩世忠军击败。刘豫见宋军大举反攻，且闻宋帝将亲征伪齐，忙告急于即位不久的金帝完颜直。金领三省事完颜宗磐认为刘豫无能，不当派兵援应，完颜直因此告之刘豫，许之自行处置，且派完颜宗弼领金军驻扎于黎阳（今河南浚县东），以观察事态变化，实不欲与伪齐联兵南侵。刘豫无奈，又以刘麟复领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李邺为行台右丞，冯长宁为行台户部，许清臣为兵马大总管，李成、孔彦舟、关师古为大将，徵调30万民兵，分三路南侵：刘麟总领中路兵，自寿春（今安徽寿县）进攻庐州；刘猊率东路兵，取紫荆：山出涡口，进攻定远；孔彦舟统西路兵，进兵光州（治今河南潢川）攻六安（今属安徽）。十月，韩世忠所部受刘猊阻击，退回顺昌府（今安徽阜阳）。刘麟统伪齐中路军自淮西（今河南汝南）架三座浮桥南渡淮河，10万伪齐军屯驻于濠州（治今安徽凤阳东）与寿州之间。江东、淮西安抚使张俊前往迎击。宋帝又诏令神武中军统制兼权殿前司杨沂中赴泗州与张俊合兵。正当宋军北上御敌，行至濠州，刘光世却放弃庐州（今安徽合肥）南退。张浚闻讯，派人连夜急驰至采石（今安徽马鞍山东北），拦住刘光世，且告之：“敢渡江南下者斩!”刘光世只好统兵返回庐州，与杨沂中相呼应。宋统制王德、郦琼自安丰（今安徽寿县）出兵。与伪齐军遭遇，宋军一举击败敌人。刘猊率数万兵过定远，欲进兵宣化，再进兵建康。杨沂中所部于越家坊与之遭遇，伪齐军战败后移军，又于藕塘再遇杨沂中部，又大败。刘猊遂撤军北退，刘麟亦拔寨而逃。伪齐攻宋以失败告终。

金廷得知刘豫南侵失利，始有废黜之意，刘豫亦有所觉察，便请求立刘麟为太子，以试探金廷意向。金廷答以派人咨访河南百姓，而后决

定。伪齐攻宋失败，刘豫极为沮丧，中原百姓则日夜盼望宋军北上。三月，宋统制郦琼率3万兵马投降伪齐，令刘豫喜出望外，亲自于文德殿召见他，且授之以静难军节度使，知拱州。郦琼劝说刘豫出兵攻宋，刘豫又以此乞请金军援应，而且声称郦琼将亲自效力。金廷害怕刘豫兵众难制，正欲设计除掉他，便谎称郦琼投降恐怕有诈，命令遣散其兵。

不久，金帝先令完颜昌、完颜宗弼假称南侵，兵至汴京，将刘麟骗出城，派骑兵自两翼夹击，将他生擒，随即金军急驰入城。完颜宗弼仅领3骑突然闯入东华门，下马拉住刘豫手，一起行至宣德门，强令他骑在一匹瘦弱的马背上，两旁金军骑士以刀刃将他夹在中间，驶离宫城。次日，完颜昌、完颜宗弼召集伪齐百官，宣读金帝诏书，废黜刘豫。又以铁骑数千包围宫门，派小校巡逻于街巷之中，以稳定局势。又于汴京置行台尚书省，以张孝纯权行台左丞相。李成、孔彦舟、郦琼、关师古等各领一州。另以女真人胡沙虎为汴京留守，李俦为副留守。原伪齐诸军悉令解甲归田。宫人任其出嫁。被囚禁于汴京金明池的刘豫苦苦哀求，完颜昌则以当年宋帝赵桓赴金营时，忭京百姓哭泣挽留时的情景相比较，告之刘豫：“今汝废，无一人怜汝者，何不自责也。”③刘豫无言以对，遂请求迁居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原韩琦宅第，得以应允。十一月，金废刘豫为蜀，王，伪齐政权被废止。其后刘豫与其子刘麟又被迫迁居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改封曹王。

注释①②③《金史》卷七七《刘豫传》。

顺昌川陕保卫战宋绍兴八年（金天眷元年，1138），把持金廷朝政的尚书令完颜宗磐、东京留守完颜宗隽左副元帅完颜昌（挞懒）等人，力主与宋和议，将陕西、河南之地交还南宋，以诱使宋对金称臣。次年，金帝完颜直在右副元帅完颜宗弼（兀术）、国论左勃极烈完颜宗斡（斡本）、尚书左丞相兼侍中完颜希尹的支持下，先后除掉完颜宗磐、完颜宗隽、完颜昌等人，完颜宗弼升任都元帅，掌握军政大权，遂废止与宋和议，再度出兵南下，欲夺回割让之地。

绍兴十年（1140），宋帝委以梁州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主管侍卫马军司刘锜为东京副留守，节制军马。然而其所部仅有原王彦“八字军”37000人，刘绮率此部及随军家眷沿水路北上，准备军驻汴京

（今河南开封），把家眷安置在顺昌府（今安徽阜阳）。刘铸率军日夜兼程，五月，得悉金军重据汴京。当兵进至顺昌府时，金军又举兵来侵。刘绮决定据守顺昌城。为了表示固守御敌的决心，刘锜下令将所乘舟船凿沉，以示退路断绝。又将自己的家眷安置寺庙中，于寺门堆积大量柴草，万一失守时，则引火自焚，以示必死决心。刘绮所部士气高涨，男子备战守，妇人磨刀剑，争相高呼："平时人欺我八字军，今日当为国家破贼立功!"①顺昌城防薄弱，无险可据，刘绮令兵士将伪齐所造凝车搬上城墙，将轮辕埋入土中，又拆下民户门板，围在车的四周。且在城外靠近城墙之处，修筑一道羊马垣，于垣上挖洞为门。并将数千户百姓迁入城中，而后焚烧其庐舍。经过6天紧张的准备，城防初具规模，金军游骑亦已渡过颍河来到顺昌城下。

赵构下诏抗金，且派三京招抚处置使刘光世，熙河兰廓路副总管、行营左护军都统制王德率军进援顺昌。五月，金军围攻顺昌。刘绮于城下设伏，生擒金千户阿黑等将。得知距城30里有金营，便于深夜派千余兵士袭击，杀俘甚众。不久，金三路都统王衰率3万兵，与金龙虎大王合兵，亦进至城下。刘锜与部将许清隐蔽于羊马垣后，金兵射箭，或射于垣上，或自垣上方飞过，未能伤宋兵一人，而刘锜则令兵士用破敌弓，两翼用神臂弓或强弩，自城上和垣门射杀金兵，箭无虚发，金军稍稍退后。刘绮即令步兵出击。金兵大乱，坠入河中溺死者不可胜计，金军数千铁骑溃败。金军继续增兵围困顺昌，且于距城20里的东村安营扎寨。刘铸派骁将阎充招募500壮士，夜袭金营。当天夜里，大雨将降，电闪雷鸣，宋兵于闪电中，见有发辫者即用刀斧砍之，又迫使金军后退15里。随即，刘镝又令100名兵士连夜再袭金营，每人口衔一哨，闪电时奋力厮杀，闪电熄灭则藏匿不动，金营顿时大乱。宋兵闻哨声则聚拢，神出鬼没，金兵无法辨认，竟自相残杀一夜，至天明时分，已是积尸盈野，只好退兵至老婆湾。

完颜宗弼于汴京得知金军围攻顺昌遭惨败，立刻穿靴上马，与宋叛将孔彦舟、郦琼、赵荣等统领10余万金兵赶赴顺昌。途中仅于淮宁停留一宿，准备战具和粮草。不到7日，金军进抵顷昌城下。刘锜得知完颜宗弼亲统大军来攻城，遂召集诸将于城上商议对策。有将领认为如今应乘屡胜之势，准备舟船，领军南撤。刘绮认为不可，乃激励将士严阵以待。刘绮向金军下战书，完颜宗弼不以为然，认为"顺昌城壁如此，可以

靴尖踢倒，来日府衙会食”②。刘锜部将见他如此嚣张，又告之非但要与金军约战，且谓太子不敢渡河，特献浮桥5座，供金军渡河交战。天亮时，5座浮桥果然架设于颍河之上，金军即自桥上渡河。

刘绮派人于颍河上游及丛草之中投毒，且告诫兵士，即使渴死，亦不准饮用颍河水，有敢饮者，杀无赦。其时正值六月，天气炎热，金军长途跋涉，人疲马惫，夜不敢卸甲，而宋兵轮番休息进食于羊马垣下。金军人马饥渴，但一饮水、食草即中毒。至清晨清爽凉快时，尽管金军叫骂，刘镝始终按兵不动。待至未（今13-15时）、申（今15-17时）时之间，金兵已精疲力尽之时，刘绮突然派数百人出西门与金军交战。随后又派数千兵士出南门，悄悄接近金军。此时完颜宗弼身着白袍，骑佩甲战马，率领3000牙兵于阵后督战。牙兵皆着重铠甲，戴铁兜鍪，号称“铁浮图”。宋兵冲入金军阵中，即用枪挑去金兵头上的兜鍪，用大斧砍断其臂，碎其头颅。金军号称“拐子马”的左右翼铁骑，是为“长胜军”，专用以攻坚，自南侵以来，所向披靡，无坚不克，是役亦为刘绮兵士砍断马足，斩杀兵卒。双方激战至申时，金军不敌。刘绮随即令兵士于城外设置拒马木作为阻挡金军骑兵的障碍，而令所部将士稍事休息。顺昌城上鼓声不绝，宋军将士从容进餐，与平常之时无异，可金军却不敢进兵。待用餐完毕，刘�再派人拆除拒马木，令兵士冲入敌阵厮杀。金军再次大败，弃尸死马，血肉枕借，车旗器甲，堆积如山。完颜宗弼所依仗的主力军，竟十损八九。退至陈州（治今河南淮阳）后，完颜宗弼历数诸将之罪，鞭打大将韩常以下诸将领，以泄心头之恨。

顺昌保卫战，刘绮投入的兵力不足2万，而实际出战进击金军的兵士仅5000人。金军则投入数十万兵，仅营帐长达15里。刘绮以逸待劳，以少胜多，使“金人震恐丧魄，燕之重宝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弃之”③。宋廷主战派臣僚主张乘胜分兵北上追讨，生擒完颜宗弼，收复汴京。然而以赵构、秦桧为首的投降派却令宋军撤退，再次放弃有利的战机。

在完颜宗弼率兵南侵河南的同时，金陕西经略使撒离喝亦自同州（治今陕西大荔）西渡黄河，入侵陕西。数日间，即占据长安（今陕西西安），直扑凤翔府（今陕西风翔），而将驻守川陕的宋军拦腰截断，大部宋军被阻于渭水之北，川陕地区人心震恐。其时宋环庆路经略安抚

使杨政驻巩州（治今甘肃陇西），宋枢密院都统制、节制陕西军马郭浩驻鄜延（今陕西延安），只有吴磷随同四川制置使兼宣抚司事胡世将驻河池（今陕西凤县东）。胡世将急召诸将来河池商议御敌之策，唯有泾原守将田晟与杨政赴会。参谋官孙渥认为河池不可守，欲退守仙人原（今陕西宝鸡南），吴磷厉声反驳，请求胡世将派百人即可破敌。胡世将也指着自己居住的营帐，表示将战死于此，众将因此斗志激昂。胡世将古代弓弩遂令田晟领兵3000迎击金军。吴磷则派部将姚仲戍守凤翔石壁寨。五月，金军前锋进至石壁寨，姚仲领兵抗击，金军败退至武功（今陕西武功西）。

六月，吴磷、杨政致书撒离喝，约定交战日期。会战之日，撒离喝派大将鹘眼郎君率骑兵3000，直冲吴磷军。吴磷指挥部将李师颜领骁骑迎击，双方激战一团，金军终溃败。鹘眼郎君退人扶风（今陕西兴平西北），李师颜又率军追击，夺回扶风，俘虏金军3将及女真兵士百余人。撤离一喝亲自统兵至百通坊（今陕西扶风西南），欲与宋军决战。金军列阵长达20里，气势汹汹。吴磷又派姚仲奋击金军，撤离喝刃；渭北郭浩所部击退金军对耀州（治今陕西耀县）的包围，且派部将郑建充调集滑北各地宋军，合兵攻下醴州，与吴磷相呼应，夹攻金军。

撤离喝屡遭失利，再派部将胡盏、习不祝合兵5万进攻吴磷所部，交战于剡家湾。吴磷以“叠阵法”迎击金军：以长枪居前，兵士持枪坐地；之后为强弓、强弩，射手跪膝而发；最后为神臂弓，射手站立而射。敌军攻至百步内。神臂弓先射杀；进至70步，则强弓弩齐射。凡布阵侧重于阻击金军骑兵，于阵前布置相连的铁钩。先以两翼骑兵遮蔽于阵前，待战阵布置完毕骑兵撤去，即谓之“叠阵”。胡盏与习不祝精通兵法，率军据险固守，所扎营盘前临雄峰峻岭，后控腊家城，认为宋军不敢轻易进攻。吴磷领兵欲与之交战，召集诸部将商议攻击之策。姚仲认为战于山上则胜，战于山下则败。吴磷欣然采纳，便派人入金营请战，胡盏与习不祝见战书，讥笑吴磷不懂兵法。半夜，吴磷派姚仲、王彦二将领兵自山崖攀登上山，令兵士人人口中衔枚，约定待二将登上山岭后，发火为号。姚仲、王彦率兵士上得山岭，金军毫无觉察，宋军于山岭上集结已毕，遂点燃火炬。刹那间，万炬通明，金军顿时惊愕不已，乱作一团。习不祝、胡盏二人主张相左，金兵无所适从。吴磷随即派兵至金营前挑战，胡盏果然出兵迎战。吴磷指挥宋兵以“叠阵法”迎击，自

己着轻裘衣，亲临前线驻马督战。宋兵轮番射杀，轮流下阵休息，金兵于宋军阵前中箭倒仆者无计，终于大败，有万余金兵投降。胡盏下令退守腊家城。吴磷指挥宋军又围攻腊家城，宋兵奋勇进击，强攻不已，克城指日可待。正在这时，赵构、秦桧为与金廷议和，派人诏吴磷“班师”。眼看到手的胜利又白白丧失，胡世将不禁仰天长叹不已。

在胡盏、习不祝进击吴磷所部同时，撒离喝又尽起风翔金军，北攻泾州（治今甘肃泾川西北）。宋将田晟领兵迎击，大败金军。撒离喝在正面与宋军激战之时，另遣一部绕到田晟军后出击。宋军措手不及，有部分兵将惊溃而逃。然而田晟所部主力“右护军”万余将兵临阵不乱，奋力拼杀，金军死伤甚众，撒离喝被迫退守凤翔，不敢再出战。

泾州一战，陕西金军主力遭受重大损失，渭北宋军遂得以全师回到四川。但宋军亦因粮尽而退守仙人原，未能再进击金军残部。宋、金双方军队遂于川陕地区处于对峙之中。然而绍兴十一年（金皇统元年，1141），在以赵构秦桧为首的投降派的策划下，宋廷与金廷订立和议，割让和尚原（今陕西宝鸡南）。又一次葬送川陕抗金的胜利成果。

注释①《宋史》卷三六六《刘倚传》。

②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一。

③《宋史》卷三六六《刘铸传》。

绍兴和议金完亶即位（即金熙宗）后，太宗子、尚书令、宋国王完颜宗磐蒲鲁虎）晋封太师、领三省事。宋绍兴七年（金天会十五年，1137）十一月，金废伪齐。宋派王伦为迎奉梓宫使，入金面见金左副元帅完颜昌（挞懒），乞归还陕西、河南之地。绍兴八年（金天眷元年，1138）八月，金同意将陕西、河南之地归还宋廷，且派左司侍郎张通古为诏谕江南使，赴江南与南宋朝廷议和。在此之前，完颜昌已通过宋使王伦，向宋帝赵构通报金廷欲以归还二地换取宋廷称藩的意图，赵构欣然同意，且擢升秦桧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专主与金求和事宜。秦桧深知议和不得人心，必遭朝臣非议，故在其一再坚持之下，赵构决意仅委托他一人全权操办求和之事，不许其他臣僚插手干预。

尽管如此，朝臣闻讯，依旧纷纷上疏，切谏议和。吏部侍郎魏杠拒绝出任馆伴使，秦桧婉言相劝：“公以智料敌，桧以诚待敌。”魏豇反唇相讥：“第恐敌不以诚待相公尔。”①秦桧只得另选他人。枢密副使王庶，先后7次上疏，抨击主和派的屈膝投降。

枢密院编修官胡铨对秦桧一伙的卖国行径深恶痛绝，表示要斩杀秦桧、王伦“以谢天下”②。一时间，朝廷内外哗然。司勋员外郎朱松、馆职胡理理等6人联名上疏，指出：“金人以和之一字得志于我者十有二年，以覆我王室，以弛我边备，以竭我国力，以懈缓我不共戴天之仇，以绝望我中国讴吟恩汉之赤子。

以诏谕江南为名，要陛下以稽首之礼。自公卿大夫到六军万姓，莫不扼腕愤怒，岂肯听陛下北面为仇敌之臣哉!天下将有仗大义，问相公之罪者。”③面对朝廷中臣僚的激烈反对，秦桧竭力稳定住赵构，诬陷道：“臣僚畏首尾，多持两端，此不足与断大事。”④同时又擢升亲信死党，诸如勾龙如渊之流，充任御史中丞等御史台官，弹劾、排挤，直到迫害主战派官僚，使“中朝贤士，以议论不合，相继而去”⑤。

不久，金遣使臣张通古、萧哲等人入宋，仍以诏谕江南为名。秦桧清楚此名称难以为宋廷臣僚所接受，亦恐因此再遭主战派的攻击，遂与金使商议，乞请更改“诏谕”，为“国信”，改“江南”为“宋”。金使傲慢的态度及嚣张的气焰，更激起宋廷臣僚的不满和愤慨。京淮宣抚处置使韩世忠连续数次上疏，请拒绝与金议和，表示愿捐躯报国，与金军决一死战。然而赵构唯恐惹恼金军，而断然拒绝。

金使入宋，接伴使范同秉承秦桧之意，奴颜卑辞，军民见者，往往流涕。金使要求宋帝依照藩属之礼，跪受金帝诏书，接受金帝册封。秦桧欲使赵构向金使“行屈己之礼”。赵构左右为难，认为“朕嗣守太祖、太宗基业，岂可受金人册封”⑥。在众多臣僚的激烈反对下，秦桧表示代表宋帝跪受金帝诏书与封册。金使提出受诏书须百官备礼，秦桧恐百官不从，遂令省吏着朝服，导从充数。又恐诏书外露，引起朝臣的攻击，待诏书到手，随即藏于襟中。秦桧代宋帝接受金帝诏书。实际全面接受金廷的议和条件，从而将南宋朝廷变成金朝的藩属，宋帝向金帝称臣。金廷将陕西、河南两地归还，宋廷则每年向金纳银25万两，绢25万匹。对

于如此屈辱苛刻的议和条件。以赵构为首的宋廷臣僚竟表示庆贺，极力粉饰太平。

宋绍兴九年（金天眷二年，1139），金正式向宋归还陕西、河南之地。宋令王伦为签书枢密院事，充迎奉梓宫、奉还两宫、交割地界使。同时又派遣其他官员前往接管两地。但赵构仍抱定“守内虚外”的国策，对新得两地无意固守，只欲保全一隅之地，甚至不准动用朝廷财赋。他告诫宰执：“河南新复，宜命守臣专抚遗民，劝农桑，各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移东南之财，虚内以事外。”⑦朝廷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忡忡，于上奏贺表之中多有讽喻，认为“祸福倚伏，情伪多端”。然而群臣的忠告，却遭到秦桧的黜责。

七月，金廷政变，右副元帅完颜宗弼（兀术）杀完颜宗磐、完颜昌（挞懒），且于中山府（今河北定州）拘禁王伦。此前，王伦已先知金廷有变，曾密报宋廷，秦桧却毫不理会，令王伦继续前去交割。韩世忠请求趁金廷内乱，出兵攻金。赵构、秦桧则以“《春秋》不伐丧”为由，不许韩世忠发兵。

十年五月，金廷败盟，由都元帅完颜宗弼统领金军，分4路入攻宋境。刚交割不久的河南诸州县相继失陷。赵构竟不知所措，只知下诏历数完颜宗弼罪状。而秦桧则力排众议，以和议自任。金毁约入侵，再度激起南宋军民的愤慨，在韩世忠、王俊、岳飞等将领的组织和指挥下，宋军英勇反击，全线告捷，岳飞一路进至距开封（今属河南）仅数十里处。完颜宗弼连遭战败，已做好撤逃河北的准备。

死抱议和的秦桧却于此时力主班师收兵，宋帝见反击已确保了半壁江山，遂令岳飞“措置班师”，“不许深入”。抗金斗争再度受挫，“所得诸郡，一旦都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⑧。

赵构、秦桧等主和派既已葬送了宋军将士抗金斗争的胜利成果，仍不罢休。赵构担心主战派抗金，将迫使金廷求和，进而放还赵佶（宋徽宗）、赵桓（宋钦宗）父子，会与自己发生皇位的争夺。秦桧亦唯恐岳飞等将领的抗金斗争会惹怒金廷，于议和不利，更害怕岳飞等功迹卓著，于己不利。因而他们又千方百计地破坏抗金斗争，直至迫害抗金将

领。十一年四月，赵构与秦桧以犒赏拓皋之捷为借口，召韩世忠、张浚、岳飞3大将，论功行赏。授韩世忠、张浚并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又以宣抚司军隶属枢密院，实则解除了他们的兵权。七月，又解除抗金名将、淮北宣抚司判官刘绮兵权，改授知荆南府。八月，再罢夺岳飞的官职。与此同时，赵构、秦桧更加快了议和的进程。完颜宗弼放还宋使莫将、韩恕后，秦桧又派刘光远、曹勋出使金朝，另以魏良臣为通问使，进一步向金乞和。不久，魏良臣偕金使萧毅等入宋，提出以淮河划定宋、金疆界，且要求宋廷割让唐（治今河南唐河）、邓（治今河南邓县）二州。秦桧满口应允。

九月，秦桧与投靠自己的张浚收买岳飞部将、鄂州前军副统制王俊及王贵，诬告岳家军名将、副都统制张宪谋据襄阳（今湖北襄樊）策划兵变，进而据此诬陷岳飞谋反。十月，完颜宗弼再度侵宋，以胁迫宋廷尽快接受且订立和议。金军攻陷泗州（治今江苏泗洪东南）、楚州（治今江苏淮安）。秦桧见金军来势汹汹。唯恐议和不成，竟然不许宋军渡江抗击，同时加紧投降求和的进程。他大兴岳飞之狱，将岳飞投入狱中关押，令其党徒、谏官万俟莫齐谢）断狱论罪。岳飞及其子岳云被送大理寺后，秦桧又令御史中丞何铸、大理卿周三畏审理逼讯。何铸指出岳飞无辜蒙冤，秦桧遂恼羞成怒，又换万俟治理岳飞之狱。

在迫害岳飞之时，秦桧对金廷则百般卑屈。由于宋廷不加抵抗，金军如入无人之境，直渡淮河，进至六合（今属江苏）。金军进兵如此顺利，竟始料不及，以至粮运不济；金军人心惶惶，无心渡江南侵。金军统帅完颜宗弼竭力稳定军心，继续于江北虚张兵威，以施加压力，逼迫宋朝投降求和。赵构、秦桧哀求宗弼“先敛兵，许敝邑拜表阙下”⑨。一月，宋派魏良臣出使金军，他拜见完颜宗弼时再三叩头，哀求甚切。完颜宗弼遂许以淮水为界作为和议条件，且遣审议使萧毅、邢具瞻与魏良臣入宋订立和议。最终达成和约如下：一、宋向金称臣，“世世子孙，谨守臣节”，金册赵构为宋帝。二、双方划定疆界，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以南属宋境，以北归金境。宋将唐、邓2州及商（治今陕西商县）、秦（治今陕西天水）2州之大半割让给金。三、宋每年向金纳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自绍兴十二年始，每年春季运送到泗州交纳。

除正式订立的“绍兴和议”外，完颜宗弼还提出以杀害岳飞作为议和的条件之一。秦桧便将岳飞残害于大理寺中，将岳云、张宪斩杀于市，其家属流放广南。对支持岳飞抗金，为岳飞鸣冤的文武官员，则以诋毁和议之罪，滥施弹劾，给予贬斥。在赵构、秦桧的指使下，坚持抗金，反对投降的主战派遭到严酷的打击，或罢或贬，从而使投降求和的政策得以无阻碍地推行。

绍兴十二年（金皇统二年，1142），赵构以“臣构”的名义向金帝完颜亶上誓表，正式承认了和议中的条款。三月，金帝遣左宣徽使刘筈入宋，对赵构行册封礼。经赵构再三的请求，金廷方送归其母后韦氏及宋徽宗赵佶的灵柩。

绍兴和议的订立，使宋与金处于不平等的关系之中，两国间也自此结束了长达10余年的战争，最终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满足于半壁江山的赵构、秦桧又将每年向金廷的纳贡负担全部转嫁到百姓头上，致使“民力重困，饿死者众”，社会矛盾日趋尖锐。

注释①②③④⑤⑥⑦《宋史》卷四七三《秦桧传》。

⑧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七。

⑨《金史》卷七七《完颜宗弼（兀术）传》。

秦桧祸国秦桧秦桧（1090—1155）字会之，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宋政和五年（1155），登进士第，补密州（治今山东诸城）教授，历太学学正。靖康元年（1126），金军围攻汴京（今河南开封），遣使入城向宋帝提割让太原（今属山西）、中山（今河北定县）、河间（今属河北）三镇。秦桧上书，言军机四事，反对宋廷割地求和，主张抗击金军入侵。又改任职方员外郎，不久命隶属少宰兼中书侍郎张邦昌，为干当公事。秦桧认为此职“是行专为割地”①，与自己的主张相悖，遂辞官不从。后为御史中丞李回、翰林承旨吴拜荐举，开殿中侍御史，迁司谏。未几，金军再度南侵，二次进逼汴京。十一月，宋帝赵桓召集百官于延和殿商议割地求和之事，范宗尹等70名臣僚力主割地，秦桧等36人坚决反对。不久，秦桧升任御史中丞。闰十一月，汴京失守，金军命赵佶、赵桓人金营。二年二月，完颜宗翰命宋廷臣僚推举异性者为帝。东

京留守王时雍等随即召集百官军民共议拥立张邦昌为帝，众人皆失色不敢答话。监察御史马伸主张应仍立赵氏为帝。秦桧亦认为理当如此，上书状反对创建张邦昌的伪楚政权，遂被金兵掳入金营。不久，即随赵佶、赵桓及文武百官同被金军北掳至燕山府（今北京西南），后又迁徙至韩州（治今辽宁昌图北），旋即降金。

不久，赵构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南）即位。金帝完颜晟得知后，致书完颜宗翰，与南宋和议，且交秦桧润色文字。秦桧随即又以重财贿赂完颜宗翰，后完颜晟（吴乞买）将秦桧赐给其弟完颜昌（挞懒）任用。宋建炎四年（金天会八年，1130），完颜昌领兵进攻宋山阳（今江苏淮安）。十月，秦桧与其妻王氏，以及奴婢、仆人取道海上南下，到达杭州（今属浙江）。随即入见赵构，次日便任命为礼部尚书，且赐予银帛等物。

秦桧自金朝归来，宋廷议论纷纷。秦桧自称是杀死监视自己的金兵，才逃出归来的。而大臣们多认为“靖康之难”，独秦桧选回，且燕山府（今北京西南）距北地甚遥，需跨河越海，秦桧如何能杀死监兵，千里迢迢南奔?又如何能携妻一家返还?尽管朝臣多有怀疑，但尚书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范宗尹、同知枢密院李回与秦桧相好，百般为他开脱、辩解，极力荐之其忠。宋帝赵构也认为：“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盖闻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②秦桧入宋后，便提出：“如欲天下无事，南自南，北自北。”③而且又上奏自己起草的与完颜昌的求和书。自此，宋廷开始改变且守且和的对金策略，专与金廷解仇议和。因秦桧被掳至金朝后，曾力主议和，故实为完颜昌有意放他返回宋朝，以促成南宋的投降求和。

绍兴元年（1131）二月，秦桧任参知政事。不久，排挤掉宰相范宗尹，八月，升任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九月，秦桧又将一同执掌朝政的尚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吕颐浩排挤出朝，令他于镇江（今属江苏）建都督府，专理军队事务。秦桧独揽朝政，于朝中培植党羽、亲信，排挤异己，一时间，求和论调甚嚣尘上。二年，吕颐浩不满秦桧的独断专行，自长江江防返回临安府（今浙江杭州），赵构亦对其“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主张深感不安。秦桧不久即遭罢免，且榜示朝廷，不再复用。

绍兴五年（金天会十三年，1135），完颜晟死，完颜亶继位，是为金熙宗。完颜昌等人力主与宋廷议和。宋廷中的投降势力视此为求一和的极好时机而加紧活动，秦桧也因此得以再度起用。七年，金廷在罢废刘豫的伪齐政权后，金帝完颜亶在左副元帅完颜昌，太师、领三省事完颜宗磐，左丞相太保、领三省事完颜隽等权臣的一再坚持下，将原属伪齐统治下的陕西、河北地区划归宋廷，以换取宋朝向金朝称臣。时任枢密使的秦桧唯恐岳飞等将领的抗金会使议和不成，极力破坏抗金斗争。他与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张浚劝说赵构收回由岳飞并统淮西军的成命，致使岳飞气愤已极，一度弃军还家，更导致淮西军大将郦琼率几万兵马哗变投降伪齐。张浚因此引咎辞职，荐举赵鼎为宰相。秦桧随即又离间张浚与赵鼎的关系，以图从中谋利。十二月，宋请和使王伦自金朝返回，带回完颜昌的口信，“和议自此平达”。宋帝与秦桧喜出望外，加快求和的步伐。

绍兴八年（1138）三月，秦桧官复原职，重登右相之位。十月，秦桧借宰相、执政官入见宋帝之机，单独留下，向赵构进言：“若陛下决欲讲和，乞颛（专）与臣议，勿许群臣预。”赵构当即表示：“朕独委卿。”④秦桧仍担心宋帝议和决心不坚；或为群臣所阻，议和难成，便有意拖延了几天。直到摸透宋帝议和之意坚定不移，方向赵构呈递与金求和的文书。且明令禁止群臣干预议和之事。不久，秦桧再借赵构建储之议，排挤赵鼎与参知政事刘大中，二人随即罢官谪贬。从而秦桧得以独揽朝政，专主议和。为实现与金的求和，秦桧变本加厉迫害和排挤朝中的主战派官僚。枢密副使王庶、枢密院编修官朝铨、赵雍、校书郎许忻、礼部侍郎尹焞等一大批官僚均因上疏反对议和，指责秦桧的屈膝卖国的行径，相继被贬逐出朝。秦桧的所作所为激起朝廷内外有识之士的强烈不满与切齿痛恨。胡铨在其上书中即明确表示：“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断三人（秦桧、宋请和使王伦、孙近）头，竿之藁街。”⑤临安府民众得知胡铨上书后，纷纷传抄，全城“暄腾数日不定”。殿中侍御史陈刚中在胡铨遭贬后，为他送行，称赞他：“身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⑥更有人将胡铨的奏疏刻版刊行，广为传布，深得民众的同情。

十二月，金廷使臣张通古、萧哲以诏谕江南为名，入境南宋。秦桧自感此称谓将招致朝廷群臣非议，遂与萧哲商议，乞求改“江南”之称

为“宋”，改“诏谕”之名为“国信”。金使南下，再次激起抗金军民的反对。宋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兼河南、河北诸路招讨使韩世忠先后五次上疏力谏，希望能废止议和，与金军决一死战。但宋廷始终不许。金使入朝，声言金廷册封赵构为帝。秦桧甚至要求赵构“引屈己之礼”，接受金廷的册封。赵构对此难以接受，而朝廷内外更难以容忍。淮西制置使扬沂中、权主马步军司解潜及殿帅韩世良相继告之秦桧，如若军民群起攻之，将如何办?且告秦桧党羽，领兵在外的岳飞、韩世忠等将领若责问此事，又将如何作答?秦桧见此情景，不免心虚，更恐怕宋帝难以接受金廷的要求而改变初衷，便以辞职作为试探。赵构虽不愿屈己受金廷之封，但求和之意甚为急迫，见秦桧欲辞职，竟声色俱厉，依旧要他主持议和之事。秦桧知宋帝仍坚持求和，遂又与御史中丞勾龙如渊、右谏议大夫李谊、给事中楼照等人商定，由秦桧摄家宰接受国书，而后将金廷国书藏于禁中。宋帝赵构同意此议，下令由秦桧赴驿馆面见金使。金使又提出，让宋廷文武百官备礼参拜，秦桧无奈，只好令三省属吏着朝服导从，自己则代表宋帝正式跪拜，接受金帝诏书。根据金帝诏书称，南宋作为金朝的届国，向金称臣，每年贡金银25万，绢25万匹。而交换的条件为，金廷将河南、陕西之地划归宋朝，且允许归还太上皇帝赵佶的梓宫，以及放还原宋宗室成员。此屈辱和议一定，宋廷竟视为喜事，大加庆贺。而张浚、岳飞、徐俯等将领强烈反对投降求和的行径，于上表中讥讽秦桧的投降卖国，表示要誓死抗金，使“秦桧读之大怒”⑦。

宋绍兴九年（金天眷二年，1139），金廷履约归还宋廷陕西、河南之地。宋帝赵构与秦桧立刻派王伦以签书枢密院事，充迎奉梓宫、奉还两宫、交割地界使的身份与副使蓝公佐等人赴金廷办理议和、交割事宜。七月，金帝完颜亶以谋反罪处死操纵朝政的领三省事完颜宗磐、左副元帅完颜昌（挞懒）及完颜隽等人，而以完颜宗斡为太师、领三省事，完颜宗弼（兀术）为都元帅。完颜宗弼等人反对议和，遂拘留王伦等人，且决定再次南侵。十年五月，完颜宗弼等撕毁盟约，率领金军南下攻宋，河南诸州县重镇相继失守，宋帝为之大惊。宋军官兵奋起抗击，淮西宣抚使张俊领兵攻克亳州（治今安徽亳县）；军将王胜占据海州（治今江苏连云港西南）；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攻占郾城（今属河南）。尽管各路捷报频传，执意与金议和的秦桧却怂恿宋帝下诏，令各路宋军“班师”。九月，北上抗金的宋军被迫放弃收复的州县重镇，退回

原驻守地。秦桧的投降政策，招致金军更大规模的进攻。十一年正月，完颜宗弼自两淮南侵，攻占寿春（今安徽寿县），金将韩常所部突入庐州（治今安徽合肥）。赵构急令东京副留守刘绮率军渡江往援淮西；又令淮北宣抚副使杨沂中统兵3万，自临安赶赴前线；再令岳飞军东进江州（治今江西九江），以为策应。刘锜与王德、杨沂中等军合兵，于庐州东南柘皋镇大破金军，局势转危为安。岳飞等主战派官僚再次上奏，请求北伐，收复失地，重建一统江山。可是秦桧等投降派通过宋帝连续下诏，令锜岳飞停止进兵，火速救援淮西。秦桧命令杨沂中及张俊先行撤兵，致使抗金斗争在关键时候再度受挫。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宋廷未能出兵抗金。

为了扫清与金求和道路上的障碍，秦桧又阴谋尽收诸将兵权。四月，他与宋帝赵构以赏赐柘皋之捷为由，密召韩世忠、张俊、岳飞赴临安府，论功行赏，授予韩世忠、张俊同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实际解除了他们的兵权。而其中的张俊早已秉承宋帝、秦桧的旨意，自请解除兵权，枢密使因此控制在投降派手中。六月，秦桧升任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他朝柄在握，不顾岳飞的一再反对，解除抗金将领刘镝的兵权。又派刘光远、曹勋出使金朝，再派魏良臣为通问使，亦赴金朝，以尽早促成议和。不久，魏良臣偕金朝使臣萧毅等人返宋，带来金廷的议和条件；以淮河为宋、金疆界，宋须割让唐（治今河南唐河）、邓（治今河南邓县）二州予金。秦桧立刻派御史中丞何铸入金，表示接受所提议和条件。八月，宋帝罢免岳飞。九月，秦桧伙同张俊收买岳飞部将、鄂州前军副统制王俊及部将王贵，诬告岳飞及其勇将张宪阴谋窃据襄阻府（今湖北襄樊）反叛。十月，金完颜宗弼又发兵南侵，攻占泗州（今江苏盱眙北）、楚州（今江苏淮安）等地，以胁迫宋廷尽快议和。秦桧、张俊等人唯恐惹怒金廷，不敢派兵北上，任凭金军于江北肆虐。相反，却于朝中大兴岳飞之狱派与岳飞有隙的监察御史万俟及御史中丞何铸、大理卿周三畏等亲信党羽审讯论罪。岳飞入狱后，历尽严刑拷打，毫不屈服。

完颜宗弼提出杀害岳的请求，秦桧立刻指使其党羽罗织罪名，百般诬陷。十二月，抗金名将岳飞终被秦桧一伙害死于狱中，时年仅39岁。其子岳云及部将张宪亦遭杀害。亦遭罢官的韩世忠得知岳飞被害，责问秦桧。秦桧搪塞道：“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

斥责道；"'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⑧随后，秦桧一伙又将支持岳飞坚持抗金的官员以破坏议和之罪名，陆续罢贬，凡先前之异己者，亦未能幸免。赵鼎、王庶、胡铨等人更是一贬再贬，且"皆遇赦永不检举"。就连曾与秦桧狼狈为奸，迫害岳飞，鼓吹议和的张俊，之后亦受秦桧的排挤而被罢官。

赵构与秦桧等不惜出卖抗金的战果，以称臣纳币换取与金朝的议和，从而使宋廷偏安东南一隅，厮守半壁江山。"绍兴和议"签订后，秦桧被加太师，进封魏国公，不久再进封秦、魏两国公。成为继北宋奸臣蔡京、童贯之后，又一位受封两国公者，权势益发炽盛。他大肆宣扬祥瑞，粉饰太平，宋帝亦因此苟安杭州（今属浙江），自此不再赴长江巡幸。秦桧自执掌朝政后，一面继续打击、排斥异己，一面竭力培植亲信、党羽。一时间，秦桧党徒遍布朝廷，他们为博得主子欢心，以求加官晋爵，吹捧秦桧为"圣相"、"元圣"，百般歌功颂德。秦桧为牢固控制朝政，命擢升其子秦熺自秘书少监领国史，历翰林学士兼侍读，直至知枢密院事；又竭力堵塞言路，凡臣僚所上奏章中有指责自己者，或由秦吾以职务之便，加以篡改，或烧毁丢弃。甚至连文人著述中有涉及此类之处，皆予禁绝。不仅如此，秦桧又下令禁止私人作史。凡有私作野史者，许人告发。

更为甚者，秦桧目居相位，一手遮天，隐瞒、扣留奏章，擅自行事，连宋帝都深感不满。秦桧的倒行逆施，激起朝野上下的普遍反对，绍兴二十年（1150）正月，殿前司后军小校施全于秦桧上朝途中行刺，未成被捕，临刑前，他怒斥秦桧道："举国与金为仇，尔独欲事金，我所以欲杀尔也尸⑨慷慨就义。此后，秦桧每逢外出，必带50名兵士保卫。

绍兴二十五年（1155），已病入膏肓的秦桧再次大兴文字狱，翦除异己。他甚至于一德格天阁书写赵鼎、李光、胡铨的姓名，"必欲杀之而后已"⑩。他始终忌恨张浚，时张浚贬至永州（治今湖南零陵），秦桧便派死党张柄出任知潭州，与郡丞汪召锡共同监视张浚。又使人诬陷张浚等人谋大逆，株连贤士53人。十月，秦桧病死。

秦桧先后两度为相，长达19年，倡和误国，谋害忠良。"附己者立与擢用，自其独相，至死之日，易执政二十八人，皆世无一誉"，"晚年残

忍尤甚，数兴大狱，而又喜谀佞，不避形迹”。不惜屈膝投降，拱手相让半壁江山，与金求和。他“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南宋统治陷入极度的黑暗之中。秦桧死后，“其党祖述余说，力持和议，以窃据相位者尚数人”。继秦桧之后，万俟又升宰相，依旧遵行投降求和的路线。

注释①②③④⑤《宋史》卷四七三《秦桧传》。

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三。

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五。

⑧《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三。

⑨《续资治通鉴》卷一二八。

⑩《宋史》卷四七三《秦桧传》。

采石之战宋绍兴十九年（金皇统九年，1149年），金海陵王完颜亮刺杀金帝完颜亶（熙宗），自立为帝。二十三年（金天德四年，1152），完颜亮迁都燕京府（今北京西南），下令准备发动侵宋战争。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1159）正月，金朝关闭除泗州（治今江苏泗洪东南）之外，所有与宋交易的榷场，宋金间边境贸易被中止。二月，完颜亮又下令建造战船，徵调诸路勐安谋克军，凡是年25岁至50岁者，全部编入军籍。且遣使赴诸总管府督造兵器，以备战争所需。为了便于和指挥南侵的金军，完颜亮令加紧修建开封（今属河南）宫殿，以尽早迁都至此。三十年（金正隆五年，1160），完颜亮下诏签发诸路汉军，以扩充南侵的金军兵力。三十一年春，完颜亮南下开封，六月，金都南迁至此，更加紧了进攻南宋的准备。九月，完颜亮亲统32总管兵马征伐南宋，以太保、枢密使完颜昂为左领军大都督，尚书右丞李通为副贰；以尚书左丞纥石烈良弼为右领军大都督，判大宗正乌延蒲卢浑为副贰；御史大夫徒单贞为左监军，同判大宗正事徒单永年为右监军，左宣徽使许霖为左都监，河南尹蒲察斡论为右都监，皆随从完颜亮出征。金军兵分四路南下：西路，以河中尹徒单合喜为西蜀道行营兵马都统制，平阳尹张中彦为副都统制，统兵自凤翔府（今陕西风翔）进攻大散关（今陕西

宝鸡西南），而后驻兵待命，以进取四川；中路，以太原尹刘萼为汉南道行营兵马都统制，济南尹仆散乌者为副都制，自蔡州（治今河南汝阳）进攻荆襄；东路，为金军主力，由完颜亮亲统，自寿春（今安徽寿县）南侵；水路，以工部尚书苏保衡为浙东道水军都统制，益都尹完颜郑家为副都统制，率领水军自海上直趋南宋都城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南侵金军以武胜、武平、武捷三军为前锋。另又令徒单贞领军2万人驻淮阴（今属江苏）。金军的如此部署，旨在一举消灭南宋王朝。

金军南侵的准备，宋廷有所风闻，金朝派遣的贺宋正旦使施宜生也向宋廷透露这一消息。宋帝赵构一面告诫宰臣要“自治”，以为安边息民之计；一面又册立宋太祖赵匡胤七世孙、普安郡王赵瑗（原名伯琮）为皇子，更名玮，且进封建王，以便于形势不利之时，退位内禅，一走了之。绍兴三十年（1160）二月，赵构派同知枢密事叶义问为金国报谢使，赴金朝探听动静。其后又遣权同知枢密院事贺允中再度出使金朝。两位使臣皆带回金廷必叛盟约、金军即将南侵的情报。不久，淮东总管许世安上奏朝廷，称完颜亮已南下汴京（今河南开封），统领50余万重兵，屯驻于宿州（治今安徽宿县）、泗州。宋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陈康伯与兵部尚书杨椿随即调兵遣将，部署两淮地区的防务，以便对付金军的大举入侵。以抗金老将刘绮为镇淮都统制，以荆南右军统制李道为都统制。面对金军即将入侵的严峻局势，宋廷中的主战派官僚纷纷指责和攻击主和派的投降退让行径，深感不安的宋帝赵构出于自身安危的考虑，不得不罢免秦桧的党徒、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汤思退官职。

宋绍兴三十一年（金大定二年，1161）三月，宋廷调整御敌部署，且重用主战派官僚。以破敌军统制陈敏统所部屯宋太平州（治今安徽当涂），以利州西路御前诸军都统制吴拱为知襄阳府，率兵3000人戍卫。又以陈康伯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杨椿为参知政事。五月完颜亮到开封后，即遣使借贺天申节入宋，又提出要求宋割让淮河、汉水两地。陈康伯、杨椿等宰执立即召集禁军主帅等人商议举兵退敌事宜。赵构亦下诏，令将金帝的无理要求告谕诸路统制、帅守、监司，令其随机应变，毋失机会。随后又以吴磷为四川宣抚使，制置使王刚中同处置军事，另命主管马军司成闵率兵3万戍守鄂州（今湖北武昌）。命两浙、江、湖、福建诸州征发禁军弓弩手，分部送往明州（治今浙江宁

波）、平江府（今江苏苏州）以及江州（治今江西九江）、池州（治今安徽贵池）、太平州等地和荆南府（今湖北江陵）军前。六月，在刘绮的请求下，赵构同意他渡江进兵，令骑兵屯驻于扬州（今属江苏）。又委刘锜为淮南、江东西、浙西制置使，且遣步军司都统制戚方提总江上诸军策应军马，听刘镝节制。又诫谕吴拱严加守备襄阳，视军情急缓，与鄂州都统制田师中和成闵合兵救援。同时允许淮南诸州迁移治所，坚壁清野。下诏令诸路帅臣教习、检阅士兵、弓手等地方武装，以保卫家园。为了阻击和防备金军水师白海上入侵宋境，宋廷任命早年曾跟随岳飞抗金的将领，带御器械李宝为浙西副总管，负责提督海船，驻扎平江。又命两浙、江东地区临海诸州积极防备，随时准备迎击金军水师。正当宋廷主战派臣僚积极备战之时，主和派势力亦加紧投降活动，甚至主张放弃临安南逃。左相陈康伯怒斥退却之举："今日之事，有进无退。"①方制止了主和派逃却的企图。

八月，淮北忠义兵魏胜领兵收复海州（治今江苏连云港西南）。李宝闻讯，依宋制援魏胜为海州知事，又自请率领120艘战船，3000名弓弩手，乘船北上。不料船队自江阴（今属江苏）出发后，遇大风浪。李宝船队退回，停泊于明州关澳避风，稍事休整后，重新鼓帆北上。刘绮不顾自己年迈，统兵沿江驻守于扬州，且派统制王刚领兵5000，驻守于宝应（今属江苏）。宋廷又以吴拱为鄂州诸军都统制；成闵为湖北、京西制置使，节制两路军马。

九月，西路金军首先南侵大散关，驻于青野原的吴磷立刻派大将高松等领兵救援，迎击金军。同时又派部将彭青率军奔赴宝鸡（今属陕西）渭河，连夜袭击金军桥头寨，大败金军。随后，又派部将刘海收复秦州（治今甘肃天水），金守将萧济投降。吴磷部将曹淋一举收复洮州（治今甘肃临潭），彭青再收复陇州（治今陕西千阳西北）。从而遏制了西路金军的进攻势头。中路金军南下攻入宋通化军，守将张超率所部英勇抗击，杀退金军，夺回城池。金帝完颜亮所统金军主力，亦向两淮进兵。他以尚书右丞李通为大都督，令于淮河上架设浮桥，指挥金军渡淮南下，号称百万大军。

抱病进驻扬州的刘绮很快派兵北上，除宝应外。又于盱眙（今属江苏）、淮阴驻扎军队，以加强了淮东的防务。然而负责淮西防务的建康

府都统王权却始终呆在建康（今江苏南京）。迟迟不进兵江北。经刘锜再三督催，王权方无可奈何地与妻妾凄凄惨惨地挥泪告别，领兵进驻江北的和州（治今安徽和县），却又按兵不动。刘锜再次下令催促，王权才到达庐州（治今安徽合肥），但又不作任何设防，淮西地区的防务依旧十分空虚。十月。刘锜统兵赶赴淮阴，此时金军亦到达淮河北岸，双方立刻剑拔弩张。因刘锜已精心部署，东路金军遂受阻予淮河，不得南进。可中路金军却因王权失职，从容渡淮，推进淮西，犹入无人之境。王权得知金军渡淮，慌忙自庐州南逃和州，随后又自和州逃回建康。金军一路无阻，迅速进兵至滁县（今安徽滁州），兵临长江。由于淮西失陷，宋廷急令刘锜退兵，回守江防。正于前线指挥抗金作战的刘锜，接到朝廷“金字牌”后，知金军已入淮西，王权临阵南逃，江南防务空虚，只得领兵退回扬州。

金军渡淮南下。王权弃庐州，刘锜回防江南的消息，使宋廷内外大为震惊与恐慌。宋帝赵构甚至准备登船逃往海上避难，陈康伯坚决反对退却，力主宋帝亲征。朝廷文武官员纷纷送家眷离开临安，四下躲避，唯有陈康伯与国子司业黄中的家眷未撤离。赵构见状，被迫表示“亲征”，遂任命知枢密院事叶义问督视江淮军马，中书舍人虞允文为参谋军事。时金军已南下攻占真州（治今江苏六合）、扬州，刘锜退守瓜洲（今江苏扬州西南）。为表示抗金的决心，稳定军心，刘锜特将妻、子从镇江（今属江苏）接到瓜洲。然刘锜毕竟年迈且病重，而宋帝令他专守长江，故只得率军退守镇江。自此淮西、淮南相继陷落。

正值金帝完颜亮长驱直入，直逼江南之时，金征南万户完颜富寿、完颜谋衍等将领统所部还师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发动政变，拥立东京留守完颜雍为帝，是为金世宗。完颜雍即位后，改元大定，下诏废黜海陵王完颜亮，很快黄河以北地区相继归附于完颜雍。完颜亮陷于困境，气急败坏，孤注一掷要与宋军决一死战。

十一月，完颜亮统兵直进抵长江北岸，日夜打造战船，准备自采石（今安徽马鞍山东北）渡江。宋廷因王权失职，将他解职罢官，召回临安，另派将领李显忠接替。督视江淮军马府参谋军事虞允文奉命前往芜湖（今属安徽）督促李显忠赴任，且代表宋廷到采石劳军。随王权南逃的所部18000人方退至采石，因主帅已应召而去，新帅尚未到任，军中

无帅，士气低落。虞允文抵达采石时，军士三五成群，散布江岸边，解鞍宽甲坐于道旁，毫无斗志。虞允文以为坐等李显忠到任必将贻误军机，遂召集诸将，激励斗志。众人道："今既有主，请死战。"亦有人认为："公受命犒师，不受命督战，他人坏之，公任其咎乎?"虞允文斥责道："危及社稷，吾将安避?"②虞允文来到江边，遥见江北已筑高台。台上对插2面绛色旗、2面绣旗，中间建有黄屋，完颜亮正踞坐其下。有谍者告之，前一日，金军已宰杀白马、黑马祭天，与众将盟誓，约定今日渡江，先登岸者赏黄金1两。时江北金军达40万，战马80万匹，与宋军兵力悬殊甚大。虞允文乃命诸将布列大阵，不得擅动。又将兵船分作5队，2队沿东西江岸而行，1队停泊于江中，余下2队隐蔽于小港之中，以备援应。布置将毕，江北已鼓噪大作，完颜亮手挥小红旗，指挥数百艘战船绝江而来。瞬间，金军70艘船已驶抵南岸，金兵弃船登岸，直扑宋军，宋兵军阵稍稍后退。虞允文见状，立刻冲入军中，手抚军将时俊之背，说道："汝胆略闻四方，立阵后则儿女子尔。"③时俊听罢，立即挥舞双刀冲入金军阵中，宋军兵士亦争相冲杀，与敌军殊死战斗。停泊于江中的宋军水军于江中阻截金军船只，用霹雳炮向敌船射击，一时间江面上弥漫着烟雾和石灰，金军水军无力抵挡。虞允文又令当涂（今属安徽）民兵驾车船攻击金军船队，船行如飞，船卜踏车民兵精神振奋，喊声震天。在车船的撞击和拍竿的拍砸下，金军船只多沉入江中。渡江金军在宋军的顽强抗击下，伤亡过半，但余下者依旧与宋兵厮杀，直杀至日暮时分仍不退兵。适逢有自光州败退的一支宋军途经采石，虞允文令人将溃军截住，授之以旗鼓，令他们绕至山后出击。金军见后方有宋兵来攻，以为宋军援兵赶至，不敢再战，遂全线退却。虞允文令弓弩手以劲弓尾击追射，大败金军，杀死金兵4000余人，且斩杀金军首领、万户2人，俘虏千户5人，以及金人500余。宋军首战告捷，虞允文激励、犒赏将士，又告之："敌军今日战败，明日必定再来。"深夜，虞允文派军将分乘海舟，逆流而上，停泊于上游江中。又令宋军水军另出一支船队，直逼江北杨林渡口，以拦击金军。

金军渡江大败而还。完颜亮恼羞成怒，处死生还的金兵。次日，完颜亮令金军再次渡江进攻。虞允文指挥江上、岸上宋军全线出兵，夹击金军。由宋将盛新率领的船队直攻杨林渡口，焚毁金军战船300余艘，金军再受重创，退回江北。不久，完颜亮派使臣携诏书渡江，‘企图施以

离间之计，虞充文识破金人的诡计，遂复一书，表示誓与金军决一死战。完颜亮得此书大怒，知难以于采石渡江，便烧毁龙凤车，又斩杀汉人向导及造船工匠，匆匆撤离北岸，直奔瓜洲，企图另择渡江地点。

采石之战，击败金军主力，南宋化险为夷，此时，李显忠亦自芜湖赶至采石。虞允文告之："敌人扬州，必与瓜洲兵合，京口无备，我当往，公能分兵相助乎?"④李显忠遂分兵6000交予虞允文。虞允文赶至京口时，金军已于滁河屯驻重兵，且堵塞了瓜洲渡口。为阻止金军南渡，叶义问亦调集20万宋军据守京口（今江苏镇江东北）。然而宋军水军战船不足，虞允文令兵士砍伐木材，锻造铁件，改修民船为战舰。又令军将张深戍守滁河入口，扼守长江要冲，以军将苗定驻扎于下蜀，以援应张深。未几，完颜亮亦进驻瓜洲。虞允文闻讯，令兵士踏车船于江中试船，且绕金山3周。金军以为宋军来攻，持弓待命，见宋军战船行驶如飞，惊愕不已。完颜亮却不以为然。一军将跪奏：宋军有备，不可轻敌，请求回驻扬州，再寻机进取。完颜亮不从。

此前，苏保衡所统金军水军于密州胶西县陈家岛驻屯，准备按完颜亮部署，于十月十八日驶抵钱塘江，直攻临安城。但因风向不对，正候风待发。宋将李宝率战船北上，先解海州之围，与魏胜会师后，继续北上，驶至陈家岛南。借南风，宋军水军向金军船队发起勐攻，一时间，火箭齐发，600余艘金军战船被焚毁。数十艘幸免于难的金军战船企图顽抗，李宝指挥宋船靠近敌船，宋军将士借机跳上敌船甲板，奋勇杀敌。金军水军在宋军的打击下，全军覆没，除水军都统制苏保衡逃脱外，副统制完颜家奴以下及全部船只，均被歼灭。李宝于陈家岛全歼金军水军后，得知完颜亮率军南下，遂统水军退回江南。

完颜亮知水军覆灭，且完颜雍已称帝即位，自己无路可退，遂拼死欲占据江南地区。他召集诸将，命令3日内金军全部渡江南进，否则将全部处死。完颜亮此令引起军将不满，遂发动兵变，杀死完颜亮，向北撤兵。宋军乘势收复两淮失地。

注释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

②③④《宋史》卷三八三《虞允文传》。

第三十四章

隆兴和议宋绍兴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金大定元年，1161），正当金帝完颜亮南下攻宋之际，金廷发生政变，拥立东京留守完颜雍为帝。完颜亮南侵失败，又为部将所弑。宋军乘势收复淮东淮酐西末地。

自绍兴七年（1137）遭罢免的宰相、著名的抗金将领张俊，于谪居20余年后，直至完颜亮兵临江北之时，方被重新起用，接替因临阵逃脱而被解职的王权，受命出任判建康府兼行宫留守。张浚自潭州（治今湖南长沙）出发，日夜兼程，至岳阳（今属湖南）买小舟冒风雪而行。途中遇东来行人，方知金军正犯采石（今安徽马鞍山东北），路人请他慎行勿轻进。张浚不顾，径直驶入长江。时金军已占据两淮，江北金军骑兵出没无常，长江上无一舟敢行北岸。张浚却乘小舟依旧顺江而下。待他赶至建康府（今江苏南京）时，金军已因完颜亮被杀，相继撤回淮北。张浚复出，为众望所归，“卫士见浚，无不以手加额”，军民皆倚以为重。就连赵构也认为：“卿在此，朕无北顾忧矣。”①随后又委他兼节制建康、镇江府、江州、池州、江阴军军马。张浚受任后悉心经营；招集忠义民兵，招募淮楚地区壮勇之士，任命陈敏为统制。考虑到金军长于骑兵，宋军长于步兵，故须扬长避短，令兵士制弩造车。

完颜雍即位之初，为巩固统治，稳定社会秩序，于宋绍兴三十二年（金大定二年，1162）正月，向宋朝派遣使臣，要求恢复和维持宋、金间原有的关系。宋帝赵构虽于金军大举南侵之时，迫于形势而重用主战派将领，而当威胁解除之后，却依旧苟且偷安，企盼与金求和。主战派臣僚希望朝廷能重用张浚。主持军务，但赵构却任命主和派杨存中为江、淮、荆、襄路宣抚使，全面负责军务，又以虞允文为副使。给事中金安节、中书舍人刘珙上奏指出：“若圣上以为虞允文不能独自担当此重任，宜别择重臣。”赵构为之大怒，认为是指未任用张浚，遂改命杨存中负责淮东、淮西地区防务，虞允文改任兵部尚书、川陕宣谕使，负责招军买马及与四川宣抚使兼陕西、河东招讨使吴磷议事，而拒不任命张浚。此前，抗金名将刘绮因病重免官，故张浚已成为朝野上下企望的主战派首领。

三月，金使臣入宋，到达临安（今浙江杭州）。尽管赵构一再表示仍将奉行对金廷纳贡称臣之策，宋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陈康伯等人却更定金使入境接伴、馆伴旧仪，强制要求金使以对等的态度与南宋君臣相见，遏制了金使以往傲慢无礼的态度。同时，两淮、川陕地区宋军继续与金军作战，捷报频传，又相继收复一些失地，抗金形势再度好转，对南宋王朝极为有利。这使得宋帝难于再硬性推行投降求和政策，不得不重用张浚。五月，赵构命张浚专一措置两淮事务兼节制江淮东西、沿江州郡军马，又命他招募淮南之民，设置御前万弩营。但并未因此而最终改变宋廷的对金政策。在此之前，宋曾遣洪迈等使臣入金，贺完颜雍即位，准备再次与金议和。是战是和，令赵构左右为难。五月底，他册立养子赵玮为太子，更名奋（爸慎）。六月，以自己“倦勤”休养为由，传位太子，自称太上皇帝。实际是将悬而未决的战和之议推卸给继承者，不过他在退位之前，下令撤销为抗金而专设的招讨司，为宋廷与金廷的议和铺平道路。

同年六月，赵昚即位，是为宋孝宗。赵昚入宫为赵构养子时，即主张抗金，及即位，便召张浚入见，说：“久闻公名，今朝廷所恃唯公。”②且授其为少傅、江淮东西路宜抚使，进封魏国公。再次表示：“朕倚魏公如长城，不容浮言播夺。”③金见宋迟迟不议和，遂派兵10万屯驻河南，声言将用兵准东、准西，又移文向宋索取海（治今江苏连云港西南）、泗（治今江苏泗洪东南）、唐（治今河南唐河）、邓（治今河南邓县）、商（治今陕西商县）诸州之地及岁币。张浚向宋帝进言，称金廷诡诈，不当因此而动撼，遂以大兵驻守于肝眙（今属江苏）、濠州《治今安徽凤阳东北）、庐州（治今安徽合肥），迫使金军未敢进犯。

宋隆兴元年（金大定三年，1163）正月。赵昚进张浚为躯密使，都督建康府（今江苏南京）、镇江府（今江苏镇江）、江州（治今江西九江）、池州（治今安徽贵池）、江阴军（今江苏江阴）军马。在重用张浚的同时，赵昚又追复岳飞的官爵，起用主战派胡铨，并下令将秦桧党人逐出朝。

但是太上皇帝赵构安插于赵昚身边的翰林学士史浩，却是主和派臣僚，及他升任参知政事兼权知枢密院事后，极力散布求和言论，阻挠张

浚的抗金部署。在史浩的建议下，抱有无须动武而能求得与金平等地位幻想的赵眘，竟不顾张浚等人的反对，派遣使臣入金通报即位之事。由于金廷坚持要求宋廷履行“绍兴和议”，宋使被迫退回。宋四川宣抚使兼陕西、河东路宣抚、招讨使吴磷自绍兴三十一年（1161）迎击金军对川陕地区的进攻之后，乘胜收复秦风路（治今甘肃天水）、熙河路（治今甘肃临洮）、永兴军路（治今陕西西安），等大片失地。然而赵膏却下诏，要吴磷“审度措置，保全川蜀”④。随后又诏令四川宣抚司退兵，吴磷只得放弃已攻占的德顺军（今甘肃靖宁东北），于撤追途中遭金军邀击，伤亡惨重，3万兵士仅有7000余人侥幸生还，川陕前线将士浴血奋战夺回的失地得而复失。

赵眘对战和之议举棋不定。隆兴元年（1165），他在任命张浚为枢密使时，亦擢升史浩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是为有相，位高于张浚。又起用曾因反对投降求和而遭贬逐的御史中丞辛次膺为同知枢密院事。时金将蒲察徒穆及金知泗州大周仁率军屯驻于虹县，都统萧琦领兵屯驻于灵璧（今属安徽），忙于积储粮草，修缮城池，以作为南侵的准备。张浚欲于金军尚未备战完毕之前，先发制人，进兵北伐，收复中原之地。适逢主管殿前司李显忠、建康都统邵宏渊亦提议发兵，先捣毁虹县、灵璧二城。张浚遂合议上奏赵眘，力陈北伐中原之策。不久，张浚应召赴临安（今浙江杭州），入见赵眘。在张浚的请求下，赵眘终于同意出兵渡淮河，北伐中原，且可以不预先与三省、枢密院通报。

张浚命李显忠统兵出濠州，直进灵璧；邵宏渊率军出泗州，直逼虹县。自己则亲临前线指挥。李显忠所部兵进灵璧，大败萧琦；邵宏渊所部亦于虹县击败金军，收降蒲察；徒穆、大周仁。宋军乘胜攻占宿州（治今安徽宿县），金朝；统治下的中原地区为之大震。捷报传入临安（今浙江杭；州），赵眘亲笔手书慰劳前线将士：“近日边报，中外鼓舞。十年来无此克捷”。⑤虽然捷报频传，鼓舞人心，但北伐金军实际已因史浩等人的阻挠及赵眘的犹豫，贻误了极为有利的战机。此前，金帝完颜雍已2平息内部叛乱，巩固了统治。金大定二年（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十月至十一月间，完颜雍已部署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所部进驻睢阳（今河南商丘）。又令尚书右丞相仆散忠义前往南京（今河南开封），指挥金军南侵。因而宋军的北伐是在金军有备的情况下进行的。

李显忠占领宿州后不久，纥石烈志宁即率兵赶到。宋、金两军激烈交战，宋军击退纥石烈志宁所部。随后又击败金军援兵。正值金军源源不断赴援，李显忠所部奋力抗击之时，邵宏渊却按兵不动，甚至散布流言，动摇军心，致使李显忠所部孤立无援，终不敌而败。而邵宏渊所部中军统制周宏及邵宏渊之子邵世雄、殿前司统制官左士渊竟于大敌当前之际，率军逃遁。李显忠召集余将与金军再战，又反败为胜。但邵宏渊与李显忠的不和，已引起军中的混乱。殿前司统制官张训通等7人及12名统领官借机亦逃遁。宋军内部的不和，最终使宋军于符离县（今安徽宿县）被金军击溃。

宋军北伐失利，张浚立刻遭到主和派的攻击。他一面上疏请罪，一面紧急部置：以魏胜戍守海州，陈敏戍守泗州，戚方戍守濠州，郭振戍守六合（今属江苏）。整修高邮（今属江苏），巢县（今安徽巢湖）两城，作为重要的军事据点，又修筑滁州（治今安徽滁县）关山寨，以扼守金军南下要冲。同时于淮阴（今属江苏）集中水军，于寿春（今安徽寿县）集中马军。以此防备和阻止金军南侵。对张浚的上疏请罪，赵昚起初颇能宽容，他赐书张浚："今日边事倚卿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怀犹豫。前日举事之初，朕与卿任之，今日亦须与卿终之。"而当张浚再次请求致仕时，赵昚又表示："朕待魏公有加，不为浮议所惑。"⑥甚至在称谓上从不呼其名，只称"魏公"。还常遣使了解张浚的饮食和身体状况。之后在主和派官僚接二连三的攻击下，赵音只好将张浚降职，改授枢密使、江淮东西路宣抚使。对李显忠、邵宏渊亦降职。此后，赵昚又任用主和派官僚汤思退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废止江、淮宣抚司"便宜行事"的权力。

隆兴元年八月，金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遣使持书入宋，索求宋廷割让海、泗、唐、邓四州之地及岁币，不然则于秋季发兵入攻。张浚认为金人强则来，弱则止，根本不在于议和与不议和。身为右相的汤思退原为秦桧党人，仍急于与金求和，他借退居于德寿宫的太上皇帝赵构的暗中支持，迫使赵昚应允议和。张浚、虞允文、胡铨等一批主战派臣僚纷纷上疏，坚决反对议和。汤思退却指责他们"大言误国，以邀美名"⑦。在主和派的压力下，赵昚只得遣淮西安抚司干办公事卢仲贤等人持书赴金元帅府，但告诫他不许应允归还四州之地，岁币也当差减。十一月，卢仲贤自宿州返回，带来金都元帅仆散忠义致宋三省、枢密院的文书。

由于卢仲贤于出使金元帅府时，擅自应允归还四州之地，而被夺官，交大理寺治罪。宋廷遂改任王之望、龙大渊为金国通问正、副使。张浚等人再度力争，反对派使议和。张浚借应召入见之机，向赵昚力陈和议之失。赵昚终于同意不向金廷递交和议誓书，令王之望、龙大渊留驻待命，另派通书官胡肪、杨由义前往金元帅府，通报金廷四州之地不可割让。如金廷非求四州之地，则召回使臣，停止和议。十二月，左相陈康伯因病罢相，赵昚以汤思退继任为尚书左仆射、同十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以张浚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仍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

胡昉等使臣至宿州后，金人对他们威逼利诱，以胁迫他们应允割地之议。胡叻等毫不屈服。隆兴二年（1164），在主战派的一再请求之下，宋帝赵音准备自临安府移至建康府（今江苏南京），同时下诏，召回通问使王之望等人，中止与金和议。左相汤思退闻讯，大为惊恐，表面乞求辞职，而暗地却与其党羽密谋，设计陷害张浚。不久，奉赵昚之诏，张浚巡视江、淮。为加强江淮地区的防务，张浚招募山东、淮北地区的忠义民兵，充实建康、镇江两军，人数多达12000余人。又召集淮南壮士及江西地区的起义军万余人，组成万弩营，交陈敏统辖，戍守泗州。凡属要害之地，皆筑城堡，低洼之地则蓄水为阻。还增置江、淮上的战船，使诸军备齐弓矢器械。淮北、山东之民亦纷纷归属投奔张浚，或表示受他节制。汤思退遂令王之望极力诋毁张浚的守备之策。以为张浚的部署不足以抵挡金军的进攻。令其他党羽肆意诽谤、攻击。一时间，主和派气焰甚嚣尘上，张浚见此情景，先请求罢免江、淮都督府，继而请求致仕。四月，张浚被罢相，从此主和派在朝廷更加不可一世。六月，赵昚令湖北、京西制置使虞允文放弃唐、邓二州，虞允文拒不从命，亦被撤职。八月，张浚于“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的遗憾之中病故。朝廷完全为汤思退、王之望之流所控制，很快便废除了张浚生前精心部署的江、淮防务。十月，金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以宋朝国书未按原定格式书写。拒绝接受，提出对商州、秦州两地的割让要求。明确表示岁币为20万。之后不久，金军便大举渡过淮河南侵，宋军节节败退，连失楚州（治今江苏淮安）、濠州、滁州。金军的再度入侵，宋廷主和派毫无作为，赵昚因此罢免汤思退、王之望等人。十一月，大学生张观等72人上书，请求处死汤恩退、王之望等人，贬逐其党羽，起用陈康

伯、胡铨等主战派。赵昚一面派国信所大通事王忭赴金元帅府商议和议条款，一面任命陈康伯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虞允文为同签书枢密院事，希望能阻止金军的南侵。陈康伯领命，即扶病兼程赶至临安，部署抗金。步军司统制崔皋及胡铨等分别击退进犯的金军，但王之望等人却千方百计破坏抗金，拒不执行命令。虽赵昚亦给予撤职贬斥，却又不得不顾忌太上皇帝赵构的求和意图，致使抗金斗争软弱无力，最终只得再遣使臣与金议和。其内容主要为：改宋、金君臣关系为叔侄关系；两国疆界同“绍兴和议”；改“岁贡”为“岁币”，减每年银、绢各25万两、匹为各20万两、匹；宋割让商、秦二州予金；金国人逃宋境人员不再追回。史称此和议为“隆兴和议”。

“隆兴和议”是于宋帝赵昚主张抗金，却为以太上皇帝赵构为首的主和派阻挠与破坏的背景下订立的屈辱条约，多少改变了宋、金间原有的不平等的关系。

注释①②③⑤⑥《宋史》卷三六一《张浚传》。

④《宋史》卷三三《孝宗传一》。

⑦《宋史》卷三八三《虞允文传》。宫闱之乱宋乾道三年（1167）六月，皇后夏氏去世。七月，刚册立2年的皇太子赵愭去世，谥号“庄文”。庄文太子死后，赵昚在选定新太子时，未按排行顺序，由次子庆王赵恺继太子位。而是因三子恭王赵惇“英武类己”①有意册立为太子。遂于七年（1171）二月，正式册封赵惇为皇太子。为避免诸子间的权力之争，赵惇主张：“朕既立太子，即令亲王出镇外藩。”②他进封赵恺为雄武、保宁军节度使，魏王，判宁国府（治今安徽宣城），使之离开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

赵音既宠爱赵惇，便欲使之掌握治国本领，四月，命他判临安府，不久又改领尹事。赵音到任后，“究心民政，周知情伪”③。赵昚得知，更为欣喜。

宋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太上皇赵构病重。赵昚竟罢朝，侍奉太上皇。不久，赵构病故，赵昚悲恸不已，两日未进食，提出要为太上皇服丧三年。文武百官多次上表，请求赵昚还朝听政，却遭拒绝。十一

月，赵昚亲笔下诏："皇太子可令参决庶务，以内东门司为议事堂。"④十五年二月，赵惇开始赴议事堂，与辅臣相见，商议朝廷大事。左谕德尤袤告诉赵惇："大权所在，天下之所争趋，甚可惧也。愿殿下事无大小，一取上旨而后行，情无薄厚，一付众议而后定。"又认为，太子之位，只在侍奉圣上用膳、问安，不与外事交往。因此请赵惇待圣上祭奠完太上皇之后，恳请辞去参预决策的重任。但赵昚自太上皇赵构去世后，即欲效赵构故事，传位给太子赵惇。为此当丞相周必大请求辞官时，赵昚便极力挽留，"朕比年病倦，欲传位太子，卿须少留"⑤。赵昚认为，礼仪最重者，莫过于侍奉宗庙，而其中首要的享祭却因自己患病，不能常去亲自主持。孝敬最重者。莫过于为亲人服丧，而自己则未能每日去德寿宫。因此准备退位休养。

个二月，赵昚将赵构当年传位的手札秘密交给周必大，让他以自己"倦勤"、侍奉太后等原由，事先起草退位诏书，执意内禅。

十六年二月，赵昚身着素服，正式行内禅礼，退位，居住于重华宫。赵惇继位，是为光宗，遂尊赵昚为至尊寿皇圣帝，皇后为寿成皇后。未几，至尊寿皇又下诏，册立赵昚元妃李氏为皇后。

皇后李氏，安阳（今属河南）人，为庆远军节度使、追赠太尉李道之女。高宗赵构时，召她为恭王赵昚妃。宋乾道四年《168》，李妃生子赵扩，是为嘉王。七年，李氏被册立为皇太子妃。

李氏生性好妒嫉、凶悍。曾向赵构、赵昚诬告太子东宫官僚之过。赵构对此极不高兴，认为她是一位操纵权柄者。赵昚亦因此而多次训导她："宜以皇太后为法，不然，行当废汝。"⑥赵昚的规劝反而招致李氏的忌恨，她疑心此话出于太后吴氏之口，遂对吴太后心怀不满。及皇太子赵惇继立为帝，李氏亦册立为皇后，便伺机报复。

宋绍熙二年（1191）十一月，赵惇欲因故诛杀宦官，近侍随从因此惊恐万状，便设计离间寿皇圣帝、赵惇锜与李后三者的关系。赵惇对他们的举动深感怀疑：却又不便橙清事实。不久，赵惇患心疾，寿皇圣帝赵音得知后，便买到良药，欲待赵惇入重华宫时，亲自送给他。宦官随即将此事告诉李皇后。且谎称："太上（指寿圣帝）合药一大丸，俟宫车

过即投药。万一有不虞，其奈宗社何?”⑦李皇后亲自赴重华官窥测，确实见寿皇圣帝手中有药，遂相信宦官之语，对寿皇圣帝赵昚更加愤恨。

继而，赵沓于重华宫设宴，李皇后手席间向赵昚请求册立嘉王赵扩为皇太子。赵昚不许，李皇后随即责问道：“妾‘六礼’（指婚礼的六种礼仪）所聘。嘉王。妾亲生也，何为不可?”⑦赵昚勃然大怒，李皇后只好退下。随后她又领着赵扩向赵悖哭诉，称寿皇圣帝有废赵悖拐立他子为帝之意。赵悖对此十分困惑，便不再入重华宫朝见寿皇圣帝。

李皇后挑拨了赵昚、赵悖父子间的关系，又欲进一步控制赵悖。一日，赵悖锜于宫中洗手，见侍奉的宫女手很白净，十分喜爱。此事为李皇后所知，几天后，李皇后派人送来一副盛饭的盒子，赵悖打开饭盒，里面上盛放着那位宫女的双手。他惊悸成疾。赵悖极宠爱黄贵妃，李皇后万为妒嫉。她趁赵悖锜郊祭，住宿于斋宫之时，竟将黄贵妃杀害，谎称暴病而亡。当天夜里，风雨大作，堆筑的黄土祭坛被冲毁，蜡烛全部浇灭，无法再行祭祀之礼。赵悖既遭风雨惊吓，又闻黄贵妃暴死，病情加剧。以至于不能上朝听政，朝廷大政多由李皇后决断。

李皇后亲操权柄。益发骄奢蛮横，无所顾忌。她凭借手中之权，封李氏三代为王。又重修家庙，其规模超过宋代典章的规定，且派卫兵守卫，其数量远远多于太庙的卫兵。李氏家庙修成，李皇后借返乡拜谒家庙之机，推恩亲属26人，使臣172人。甚至连李氏的门客，亦奏请补官。李氏家族因此而鸡犬升天，不可一世。寿皇圣帝得知赵悖病情加剧，便亲自入宫探视，当面责怪李皇后。李皇后对赵悖锜的怨恨益发刻骨。赵昚见赵悖精神恍惚，不能视朝，故凡遇自己生日、寒暑之季，以及节日之时，皆传旨免去赵惇入重华富拜见、问候的礼节，令他好生休养。

绍熙三年（1192）三月，赵悖病情好转。消息传出，文武百官，下至平民百姓皆请求他拜谒寿皇圣帝，甚至有撩衣叩头。号啕大哭劝谏者。赵倬亦有所醒悟，准备赴重华宫，然而尚未出发，即改变主意。临安城官民对李皇后的干预深表忧虑。同知枢密院事陈骙上书，陈述30余事，其中说：若后妃不能严守本分，则权力会转移；暗地告状之风不加以制止，则无法明断是非；策划台院谏官堵塞言路，则私党膨胀；与近

臣商议将帅的任选，则会使贿赂盛行；不求正直之言，则过失必会暴露；不慎重对待旧的章法，则取舍定有失误；馈赠赏赐不加限制，则财用匮乏。陈骙骥所言，皆切中时弊，却不为赵惇锜所重视。

十一月，兵部尚书罗点、给事中尤袤等人上书，再次恳请赵惇拜谒寿皇圣帝，赵惇锜依旧不同意，吏部尚书赵汝愚入宫对策，又反复规劝，赵惇铸方回心转意。赵汝愚又叮嘱秀王伯圭精心调护赵惇锜，调解和缓和他与寿皇圣帝的关系。在群臣的努力下，赵惇终于入重华宫，拜见其父。李皇后见此情景，无可奈何亦随后入宫，与赵音相见。然而李皇后仍不甘罢休，事后依旧如故，阻止赵眘、赵惇关系的恢复。

绍熙四年（1993）六月，知枢密院事胡晋臣去世。自赵惇染病，不能视朝，胡晋臣即与左丞相留正悉心协力辅佐朝政，使朝廷内外无不顺从，秩序安定。他数次向赵悍陈述子女孝敬父母之理；劝说当亲君子，远小人，抑制侥幸得志者，及消除宗派，广开言路等。但在李皇后的阻挠下，胡晋臣的劝谏全被搁置一侧，赵惇锜亦再未入重华宫。九月，正值重阳节来临，群臣相继上疏，请求赵惇与赵睿共度节日。赵惇照例不从。中书舍人陈傅良上书，恳切劝说，给事中谢深甫亦进言，认为寿皇圣帝宠爱陛下，如同陛下疼爱嘉王一样。如今寿皇圣帝年事已高，一旦故去，陛下又将如何见天下臣民?赵惇下诏，令随从即刻起驾，前往重华宫，向赵眘问安，又令文武百官列班迎候。百官闻讯，即列班于朝廷，迎候赵惇镝出宫。赵惇方步出御屏，却被李皇后阻留，硬将他拉回内宫。百官、侍卫面面相觑，无人敢言，唯有陈傅良疾步上前，扯住宋帝衣裙，恳请他不要回宫，亦随之来到御屏之后。李皇后便厉声呵斥道：“此何地，尔秀才欲斫头邪?”⑨陈傅良只得退下，失声痛哭。李皇后大发雷霆，派人责问，陈傅良有何理号泣?陈傅良答道：“子谏父不听，则号泣而随之。”⑩李皇后益发怒不可遏。赵惇令人传旨。罢止拜谒寿皇圣帝，退回宫中。陈傅良见此事已无法挽回，遂径直出宫。赵惇随即下诏，改任他为秘阁修撰，陈傅良拒不受命，著作郎沈有开、秘书郎彭龟年等人亦相继上书，恳请赵惇拜谒寿皇圣帝，均遭拒绝。

十月，工部尚书赵彦逾等入上书重华宫，请求寿皇圣帝赵眘不要传旨撤销会庆节（赵眘生日）朝会。不料到会庆节时，宋帝赵惇却声称身体有病，停止朝会。于是自丞相以下文武百官皆上书自责，请求罢黜官

职。嘉王府翊善大夫黄裳上疏，请求诛杀内侍，彭龟年上疏请求驱逐内绍熙元宝侍押班，以向天下臣民请罪。太学生汪安仁等118人，联名上书，请光宗赴重华宫。但这些请求，均遭拒绝。只是在赵彦逾等人的再三劝说下，赵惇才于是年十一月，开始恢复视朝。

绍熙五年（1194）正月，赵昚染病。此后，群臣纷纷上书，请求赵惇前往重华宫探视、慰问。赵惇非但拒绝，反而与李皇后前往玉津园游玩。兵部尚书罗点劝说宋帝先去重华宫，且认为，如陛下深居简出，长久不履行做儿子的义务，待众人抱怨、诽谤之时，即生祸患，切不可掉以轻心。而赵霅仍犹豫不决。罗点又偕侍读、侍讲等官，再向赵昚进言。赵音敷衍表示：朕心中何尝不思念父皇?罗点直言指出：陛下虽有此心，却久居宫中，将作何解释?

起居舍人彭龟年连续三次上书，欲求与宋帝面谈，均未获许。待赵惇上朝听政时，彭龟年于列班之内，伏地叩头不止，鲜血染红阶石。赵惇询问原由，彭龟年遂上奏说：如今再没有比探望寿皇圣帝更重要的事情了!同知枢密院事余端礼亦诚恳地表示：自己额头叩于陛下台阶上，是何等忠诚恳切。臣下已做到这一步，难道还不够吗?但赵惇虽表示明白臣下之意，却仍不赴重华宫。一时间，群臣接二连三地为此事上书，而赵惇仍无转变之意，臣僚遂又纷纷请求辞官罢职，竟多达500余人。赵惇既不从群臣之请，又拒绝辞官之求。群臣无计可施，遂谋他议。起居郎兼中书舍人陈傅良建议自亲王及宰执中择一人充重华宫使，代赵惇向赵昚问候、探视。御史台、谏院亦上奏表章，以离间陛下与寿皇圣帝之罪，弹劾内侍官员。此议亦不获准。

五月，赵霅病情加剧。陈傅良以宋帝不去重华宫探问而呈交告敕，出临安城待罪。左丞相留正等进宫劝谏，赵惇拂衣而起。留正忙拉住其衣襟，哭泣着好言相劝。罗点亦以寿皇圣帝危在旦夕，如今日不见，恐后悔莫及相劝。赵惇听得极不耐烦，起身而去。群臣又尾随其后，待赵惇入福宁殿寝宫，内侍宦官竟将殿门关闭，群臣被阻于殿门之外。众人实出无奈，悲泣着离开内宫。

次日，赵惇召罗点入宫。罗点引三国时，辛毗扯曹丕衣襟之典，以喻众人之意。彭龟年见劝谏赵惇无效，便改而请隶让嘉王赵扩赴重华

宫，向寿皇圣帝慰问、请安。赵惇应允，令赵扩前往探视。卧于病榻的赵昚见孙子前来问候，不禁感慨万分。

六月，68岁的赵昚病逝，遣谥孝宗。其子赵惇不肯出来主持丧礼，留正等人只好率文武百官前往重华宫发丧。将行丧礼之仪时，仍不见赵惇到来，留正遂与知枢密院事赵汝愚商议，派少傅吴琚请赵嵴之母、寿圣皇太后暂且垂帘，主持丧葬之事，方使赵昚丧礼得以进行。

七月，留王以赵惇患病，礼当册立皇太子，协助治理朝政，而后再请赵惇退位，太子即可以亲政。赵汝愚却主张请求太皇太后降旨，令赵惇退位，由太子直接继位。留正以皇太子尚未册立，令他即位，恐日后会有人因此发难，认为此议不妥。他遂率宰执入宫上奏，以为皇子、嘉王赵扩已具备仁义忠孝之德，当尽早册立为太子，以安定人心。赵惇毫不理睬群臣的上奏。六天后，留正等人再次请求此事。赵惇竟下书称“历事岁久，念欲退闲”。留正得书，惊恐跌倒，随即托病不辞而别。

留正突然出宫而去，朝廷上下顿时人心惶惶。恰于此时，赵惇又突然于上朝之时，倒仆于地。赵汝愚唯恐宋廷因此而生变故，遂决意令赵惇退位内禅。乃令工部尚书赵彦逾联合殿帅郭杲，又与左选郎官叶适、左司郎中商议，请太皇太后降旨内禅。随即遣知阀门事韩侂胄设法告诉太皇太后。韩侂胄通过内侍省宦官，终得太皇太后应允。此时已近日暮，赵汝愚即部署内禅，急令郭杲等将领连夜派兵守卫南北宫城。

次日，群臣入重华宫祭奠孝宗，太皇太后垂帘听政。赵汝愚率群臣向太皇太后请立嘉王赵扩为太子，且言赵惇有御笔“历事岁久，念欲退闲”。太皇太后随即应允，赵汝愚自袖中取出已草拟好的太后谕旨，以“皇帝有疾，至今未能执表，曾有御笔，欲自退闲”。而册立嘉王赵扩为帝。尊赵惇为太上皇帝，李氏为太上皇后。太皇太后以为谕旨甚妥，令赵汝愚依谕旨向朝廷内外宣布：皇子赵扩继皇帝位。

嘉王随即于寿皇圣帝帷帐中即位称帝，是为宁宗。

注释①《宋史》卷三六《理宗记》。

②③④⑤《宋史》卷三六《光宗纪》。

⑥《宋史》卷二四三《后妃传下》。

⑦⑧《宋史》卷二四三《光宗慈懿李皇后》。

⑨⑩《宋史》卷二四三《后妃传下》。

《宋史》卷三六《光宗纪》。

第三十五章

大宋的案件岳飞被害的事实一些史书和许多文艺作品，都把它描绘成基本由奸臣秦桧一手制造的一件千古冤狱。通过学术界的深入研究，元凶应是宋高宗的观点已日益为人们所接受。然而，赵构为什么要杀害岳飞呢?这其中还是疑团重重。

岳飞宋代不署撰写人名字的《朝野遗记》这样记叙岳飞被害前的一幕：

绍兴十一年(1141)腊月二十九日，南宋临安的丞相府内，秦桧在苦苦思索着如何了结已被关在大理寺狱中两个多月的岳飞父子一案。此时，夫人王氏走了进来，她料定丈夫正在考虑如何处置岳飞案的问题，便趋前阴狠地说道：“相公竟这般缺乏果断吗?要知道捉虎容易放虎难呀!”秦桧这才恍然大悟，拿过纸笔写了几个字，派人送往狱中。御史中丞万俟卨遵命再次提审岳飞，逼迫岳飞在一张事先杜撰好的供状上画押。岳飞无限悲痛地仰视了一阵天空，便提笔在供状上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过了不大一会功夫，岳飞就被毒死，张宪和岳云被斩首。这就是所谓“秦桧矫诏害岳飞”，其中宋高宗赵构只是一个听奸臣摆布的糊涂皇帝而已。

然而，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二《岳少保诬证断案》中，保存有此案完整的判决书。前面都为狱司的造谣诬蔑之词和罗织的罪名，其判决是：“岳飞私罪斩，张宪私罪绞。”“岳云私罪徒”，当然“今奉圣旨根勘，合取旨裁断”。后载：“有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 中监斩，仍多差兵将防护。余并依断。”从中可见，此案是奉圣旨办案，最后也由宋高宗最终裁决，这样赵构应为此案的主谋。

岳飞平反昭雪后，其子岳霖开始搜集资料，整理父亲的历史，临死又将重任托付给儿子岳珂。岳珂靠人们的帮助，先后编成《金佗粹编》二十八卷和《续编》三十卷，取得了相当的成就，部分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但是，祖父既然还是在赵宋政权之下恢复名誉，作者自然只能

竭力回避赵构与岳飞之间的矛盾，而客观上为高宗开脱罪责，以至不得不歪曲某些历史真相。尤其是岳珂应该看过上述案卷的有关材料，却宁肯引用野史的描述，说秦桧写出纸条交付狱官，而杀害了岳飞。其中的苦衷，自然可悯，但这样苦心掩饰的结果，给后世有关此事的记载，尤其是小说、戏剧的演绎，产生极大影响。所以宋、元以来，史家文人对此案的说法仍各执一词，众说纷纭。

明朝中叶，苏州名士文征明曾为杭州的岳飞庙题写了一首《满江红》：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依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怜，风波狱!

岂不惜，中原蹙，岂不念，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彼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作者清楚表明了写此词的用意，那就是指出杀害岳飞的主谋和元凶，应是宋高宗赵构，而不是奸臣秦桧。词意从高宗极不愿意岳家军恢复中原，迎回徽、钦二帝的内心出发，判断赵构最怕的就是“徽钦既返，此身何属!”所以为了保住皇位，赵构宁肯把岳飞和他的军队先消除掉，免得再有此类后患。所以，赵构杀害岳飞，是这一矛盾的必然结果。而秦桧在这一冤狱中的作用，只是迎合或依照宋高宗的旨意而加以执行罢了。

此后，赞同文征明观点者不时在提出更为确凿证据的基础上进一步予以论证。如有学者指出，此案在当时是被称为“诏狱”的，也就是皇帝交办的大狱，哪里有高宗不知情的道理。有学者认为，绍兴七年(1137)，岳飞在奏请立储问题上，以武将干预朝廷立储大事，引起高宗的极大不满。还有学者指出，秦桧死后，赵构曾不止一次地告诫臣僚，对金媾和乃出于他本人的决策，不允许任何人因秦桧死而对此提出异议，以动摇既定国策。而岳飞案也应从属于此“与金媾和”的既定国策，所以元凶应是宋高宗赵构。

然而秦桧为主凶的说法在社会上仍然占有优势。如清代钱彩的《说岳全传》，把秦桧描写成是金国派来的一个奸细。岳飞在朱仙镇大破金

兀术的大军，兀术写信令秦桧想办法将岳飞害死。于是秦桧说动高宗，发十二道金牌将岳家军招回，又传下一道假圣旨，将岳飞逮入大理寺狱问罪。在万俟卨、张浚、罗汝楫诸爪牙狼狈为奸之下，给岳飞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并诱捕了岳云、张宪诸将，终日用酷刑拷打逼供，但三人宁死不屈，决无口供。一拖已两月有余。秦桧担心事情传到高宗耳中，一旦放了岳氏父子，如何向金兀术交待，便与其妻王氏商量。王氏提议在黄柑中下一道密令，命大理寺今夜三更就将其父子三人结果了。秦桧听了大喜，立刻照办。岳飞以为圣旨下来，并亲自捆绑了企图造反的岳云和张宪，最后引颈受戮。

这类故事在民间已传得家喻户晓，人人都知道杀害民族英雄岳飞的罪魁祸首是奸臣秦桧，所以在如今杭州的岳坟前跪着秦桧、王氏、万俟卨、张浚等奸贼，受万人的唾骂。其实近代以来，也有许多学者在史事考证方面也给予大力的佐证，如宋史权威邓广铭先生的《岳飞传》。该书第十九章以“秦桧、张浚肆意罗织诬陷，岳飞、岳云和张宪惨遭杀害”为题，着力论证了“岳飞被劾罢官”、“王雕儿诬告张宪，意在牵连岳飞”、“岳飞的入狱、受审和惨遭杀害”，都是以秦桧为首的一群奸臣所故意陷害。并论证了“当最初制造这一冤案的谋划时，赵构并未与闻其事，但在他闻知之后，也不过只是表示了一下‘惊骇’而已，也并无要加以制止之意；再以后，则更是听任秦桧放手去干，并不稍持异议。”

邓广铭《岳飞传》再用一个章节的篇幅来论证“秦桧是杀害岳飞的元凶”。认为秦桧、万俟卨们在加害岳飞父子的过程中，对有关罪状和刑名，“匆遽间无法炮制出来。因此，是在对岳飞父子下了毒手之后，才用倒填月日的办法把判决书炮制出笼，也借此对其事实上的先斩后奏的行径痕迹稍作遮掩”。并反驳了文征明“区区一桧亦何能”的观点，确认秦桧是金国派遣到南宋王朝秦桧的一个奸细，以为秦桧已逐步获得擅权朝中的地位，完全可能矫诏杀人，所以岳飞的狱案“名曰诏狱，实非诏旨”。

而宋史专家王曾瑜《岳飞新传》经过较为全面地论述，在努力阐明这个观点：宋高宗是杀害岳飞的元凶。指出赵构绝非无能之辈，他文能博学强记，读书“日诵千余言”；武能“挽弓至一石五斗”，即能拉开一百六十多斤重的劲弓，其能力在当时应算上乘。在经历了南宋初期这段艰难险恶的历程之后，至绍兴十一年(1141)，赵构已当了十五年的皇帝，由

一个深宫的花花太岁而变为深通机谋权术、极其狡猾阴险的最高统治者。这年的十月，即杀害岳飞的一个多月前，赵构还在儆戒众臣说：“人主之权，在乎独断!”

秦桧虽为宰相，但没有这么大的权势，能够不经过皇帝而谋害像岳飞这样一个武功赫赫、威名远震的勋臣。绍兴初年，秦桧为赵构看中而拜相当政，但由于秦桧急于植党专权，很快就被罢免，高宗还亲自写其罪迹，榜告朝野，以示不能容忍之意。绍兴八年(1138)，赵构应迫不及待地想与金求和，才再次起用秦桧为相。这次，秦桧不得不吸取前次的教训，惟高宗的马首是瞻，小心翼翼做事，以求稳步发展。这年冬天，秦桧为展开议和活动，又心存当年罢相的余悸，害怕高宗反复，便单独对高宗说：“若陛下决欲讲和，乞陛下英断，独与臣议其事，不许群臣干预，则事乃可成；不然，无益也。”高宗首肯后，他要皇帝“精加思虑三日”。三天之后，他还要高宗“更思虑三日”。再过三天，当秦桧“知上意坚确不移”时，才奏上和议方案。由于其能仔细揣摩高宗的内心世界，然后再审时度事，去迎合赵构的需要，才开始深得皇帝的宠信。

一般以为高宗与岳飞的矛盾主要在军队北伐及迎回“二圣”方面，因为如果钦宗回朝，高宗就保不住帝位了。这其实是后人想当然的猜想，并不太可信。宋金之间谈判，几次谈到“迎还二圣”之事，绍兴八年还差点成功，高宗曾下诏：“渊圣皇帝(即钦宗)宫殿令临安府计度修建”，准备让钦宗回来优养天年。因为高宗心里清楚，经过如此惨痛的俘虏生涯，钦宗定已心力交瘁，回来也不会威胁到自己的宝座。可见，赵构无须在“迎还二圣”问题上深忌岳飞。高宗对岳飞产生嫌隙，继而到后来“始有诛飞意”，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间有一个发展积累的过程，其与岳飞的个人脾性也大有关系。

如绍兴七年(1137)，高宗一时冲动，委岳飞以北伐重任，又立即取消成命。岳飞一怒之下擅离职守，上庐山给母亲守孝去了。此举使高宗震怒，儆戒岳飞“犯吾法者，唯有剑耳”等等，内中已隐含杀机。最使高宗恼火的，莫过于岳飞坚决抗金的态度及其一系列行动。如第二年，岳飞又提出增兵要求，再一次触犯赵构的嫌忌而遭拒绝。事后，岳飞再上奏折，力申“不可与和”之志，并乞整兵“复取旧疆”。高宗完全不予理睬。绍兴九年(1139)，宋金讲和初定，岳飞沉痛地提出辞呈。翌年，金兀术

毁约大举南犯，岳家军鏖战初胜，却又被迫班师，“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又愤而辞职。高宗虽对岳飞的屡次辞呈照例不准，但对岳飞刚直不阿行为的嫉恨在不断加深。

绍兴十一年(1141)正月，金兵又以十万人马直侵淮西。朝廷派张浚、杨存中、刘锜率军迎敌，并命岳飞领兵东援。等岳飞率军赶到，金兵已渡淮北撤。岳飞此次增援慢了半拍，其理由一是本人“寒嗽”(感冒)，一是军队“乏粮”，是否夹杂有对高宗阻挠北伐的不满，不得而知。但这次援淮的无功很快成为岳飞受迫害的口实。据秦桧党羽所撰笔记《王次翁叙记》透露，约在绍兴十一年的二、三月间，“上始有诛飞意”，并将此旨意秘密传下。秦桧就是在此旨意之下，开始组织部署对岳飞进行迫害的冤狱。

其实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时秦桧的权势达到什么程度?是否已经能够“挟虏势以要君”，玩高宗于股掌之上?有学者指出，秦桧虽极受高宗宠信，但也只是宠信而已，决不能任意摆布高宗，不能用矫诏的手段铲除异己。如绍兴九年(1139)，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疏反对与金和议，并要求“斩秦桧之头挂诸街衢”，以谢天下。该声讨雄文很快广为流传，高宗下令将胡铨“送昭州编管”。秦桧虽对胡铨恨之入骨，“必欲杀之而后已”，然而在以后的许多年中，却始终对这位职位低微的编修官无法动用屠刀。对胡铨这样的小官尚且如此，对有赫赫战功而曾任枢密副使的岳飞就更不能擅自处置了。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审理大案和诏狱，在表面上依然有一套较为严格的司法程序，尤其是大理寺治狱，其审讯、详断、判刑、评议、定判、复核等都有详细规定，秦桧诸奸臣虽然能于其中起一定作用，但最终裁决权在皇帝手上，秦桧的权势再大，也是无法公开“矫诏”杀害大臣的。秦桧死后，高宗曾为一些人平反，不少大臣上疏要求为岳飞恢复名誉，但高宗始终不予理会，从中亦可见赵构对此案的肯定态度。

也有学者认为，在杀岳飞问题上，高宗与秦桧是各怀鬼胎、互相利用的关系。在秦桧看来，岳飞是他向金投降的最大障碍，不杀岳飞，难成和议；而在高宗看来，更重要的是所谓“示逗留之罚与跋扈之诛”，是杀鸡儆猴，以便他更自如地驾驭诸将，控制朝政与军权。所以，高宗与秦桧玩弄的是“交相用而曲相成”之把戏，所以，岳飞非死不可。

目前或可说，史学界许多人已倾向于元凶是宋高宗的观点。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赵构为什么要杀害自己倚为军事支柱的大将岳飞?其原因还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岳飞在“迎还二圣”问题上，触犯了高宗的心病。有人以为，防范武将兵权过大，一直是赵宋王朝恪守的家法，功高权重的岳飞，就被看成是对皇权的潜在威胁。有人认为岳飞个性耿直倔强，往往锋芒毕露，不搞韬晦之计，不知明哲保身而我行我素，便使高宗觉得岳飞自恃掌有兵权，难以驾驭，以致在收缴兵权之后，仍不想放过岳飞，要杀一儆百。也有人以为是岳飞在立储问题上，越职言事，犯了大忌。还有学者认为，据说金兀术在绍兴和议前有“必杀岳飞而后可和”之条件，为了表明求和的诚意，赵构只有除掉岳飞这一障碍。甚至台湾有学者提出，高宗特别思念被金人掳去的生母韦太后，曾向金人表示，只要放回太后，什么条件均可答应。金人利用了高宗这一心理，以释母必杀岳飞为交换条件，迫使他下此毒手。或者说，其各类矛盾的综合，遂使高宗做出这一决定。

杀害岳飞的元凶之争，似乎日趋明朗；然而高宗杀害岳飞的原因之争，依然是扑朔迷离。这也可算是中国传统专制政治统治的一大特色吧。

岳飞案中“莫须有”含义岳飞一案中“莫须有”罪名之典故，几乎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老小皆知。但是人们清楚其准确含义吗?人们怀疑过它的真实性吗?现在告诉你，这故事中有几个关键问题存在不解之谜，你会感到惊讶吗?不信的话，请读下文。

《宋史·岳飞传》载，当岳飞一案以谋反罪判定上报之际，大将韩世忠听说岳飞父子入狱蒙冤，且被判死罪，心中很是不平，鼓起勇气来到相府质问秦桧。秦桧回答：“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愤愤地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上述故事对于关心这段历史的人们来说也早已耳熟能详，其“莫须有”三字也逐渐成为冤狱的代名词，如世称岳飞冤狱为“三字狱”。然而仔细推敲，秦桧的这句话实在有些不合逻辑。“莫须有”历来被解释为“恐怕有”、“或许有”之类的“两可之词”，那么，秦桧的话应这样翻译：“岳飞儿子岳云给张宪的那封书信(指奸臣所诬岳云有封要求张宪帮助岳飞夺回兵

权的信)虽不确实，但这事情或许有。”秦桧这样回答质问，给人的印象就是说岳飞的罪名“也许有”，也许没有，他不清楚。从秦桧要杀害岳飞的立场出发，他可能说出这种模陵两可的话吗?不管秦桧是此案的元凶，还是帮凶，其要害死岳飞的目的是一样的，那就至少应该以肯定的语气回答韩世忠的质问。所以这段话，令人颇生疑问。

清代学者俞正燮《癸巳存稿·岳武穆狱论》中认为，秦桧的那句话应如此断句：“其事体莫，须有。”这里的“莫”相当予后世流行的语末助词“嘛”，从语音上看，莫、嘛也是同音，它是考虑问题时的一种语句拖音，似乎含询问之意，实际上只是没有含义的语气词。而“须”字的用法，宋人常用作转折连词，相当于“却”，如朱敦儒《水调歌头》中“中秋一轮月，只和旧青冥，都缘人意，须道今夕别般明。”所以，此句的翻译应该是：“这件事情嘛，却是有的。”是一个完全的肯定句式。同时，宋代也颇流行这种句式的使用，如王明清《挥麈后录》中，就有“当时议法论罪莫，须是宰相否”和“此事莫，皆不虚否”等句。总之，上至《左传》、《论语》，下到宋人的说话习惯，都有这种结构的句子。俞正燮还指出，当韩世忠质问秦桧时，秦桧的态度依然非常骄横，反诘世忠道：“其事体莫……”略加迟疑而审度之，然后自决言：“须有”。在拿不出证据的情况下，依然判定有罪。韩世忠不服，故横截其语，牵连为一句，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以诋秦桧之妄。

俞氏在断秦桧后面那句话时，在通释其“莫”字为语末助词“嘛”时，可谓不无道理。但在解释韩世忠那句反问时，就显得不太令人信服了。因为如果将“莫”作为前一句末的语气助词的话，它只是一个拖音，并无含义，如何能将其横截到后句中来呢?

现代有学者认为，宋人口语中多用“莫”字作“当”字解，如宋徽宗曾说：“北事之起，他人皆误我，独太师(指蔡京)首尾道不是，今至此莫须问他否?”(《铁围山丛谈》卷二)苏轼给文同的信中，也载“惟谨择医药，痛加调练，莫须燃艾否”的话。可见“莫须”二字连用。是宋人的习惯，意即“当须”如何。这样的话，“莫须有”三字应理解为“当须有”。“其事体当须有”是一个肯定句式，意为“这事情应当是有的”。此句话从秦桧口出吐出，其中也包含一定的强词夺理的味道在内，所以韩世忠才有后面的反驳。

也有学者以为，宋时“莫须”两字常连用，如《金佗粹编》卷二载高宗手诏：“据事势，莫须重兵持守，轻兵择利”。其“莫”有“岂不”之意。再如《永乐大典》卷一九七三五载宋哲宗主张恢复保甲军训，说“府界莫可先行”。《宋史·兵志》载同一语，作“府界岂不可先行”。所以，“莫须有”即“岂不须有”，意为“难道不应该有吗”，是一种以反问为形式的肯定语句。

然而，“莫须”在宋人口语或文章中确有“或许”、“大抵”的解释。如《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载：“兼前番临时曾言夏税秋赋。如碎杂豆油之类。如何搬运?设若本朝委曲从之，莫须折当，元帅与郎君皆言甚好。”《朱子语类》卷七三载：“占法则莫须是见豚鱼则吉，如鸟占之意象。”此外，“莫须”也有解释“莫非”、“可”的，表疑问语气。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五有云：“馆使、侍读莫须与他商量了?”《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六二记：“不知本朝所须底事，莫须应副得么?”这样，“莫须有”可作“当须有”、“岂不须有”、“或许有”、“莫非有”等多种解释，哪一种才是秦桧的本意呢?

有学者通过有关的史料考证分析，认为“莫须有”之说不是历史事实，而是无名氏《野史》编造出来的，后人失于考证，以假为真，辗转抄录，才使之成为“历史典故”。首先，一些重要宋代史籍中不载有这件事情，如史学家李焘，他与岳飞、秦桧、韩世忠是同时代人，经历过靖康之难、绍兴和议等重大事件，一生著述弘富，其《续资治通鉴长编》取材广博，考订精核，但在他所有著述中却只字不提有关“莫须有”之事。其子李也有文名，他的史着中同样不取此事。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和王明清的《挥麈录》也都没有相关记录，后者所记秦桧之事不下二三十条，却没有一处涉及“莫须有”。

其次，宋人记载此事的史籍有十余种，其中绝大多数在行文上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是互相辗转抄录的，有的稍作增删，有的干脆一字不动，也有脱字或讹字的。如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了此事。正文下自注，曾查阅过《王俊首状大理寺案款》、《刑部大理寺状》等资料，惟有吕中的《大事记》载有此事。在众多有关史籍中，只有熊克的《中兴小记》明确注明其材料出自《野史》，至于《野史》的作者是谁?其故事从哪里得来?就没人知晓了。所以其他记载此事的史籍，如

《名臣琬琰集》、《宋宰辅编年录》、《皇宋中兴纪事本末》及《宋史·岳飞传》等，可以说都几乎辗转抄袭于《中兴小记》，难怪后来引用这条史料时，竟是这样惊人地雷同。

岳飞被害后，高宗、秦桧力主议和，抗战派官员遭到打压，许多人同情抗战派，又不能公开宣传，只能私下通过著述立说，抒发对朝中政治斗争的看法。估计《野史》的作者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得之于传闻，撰写出这一段有关“莫须有”的对答。岳珂《金佗粹编》中也有几处记载了这一故事，他在岳飞死后七十余年才编此书，为了给祖父增添光彩，寻访有关的遗轶之文，看到“莫须有”一事，能增加对秦桧之流的斥责力度，自然收容入书，而无须考辨真伪，这是很正常的事。

综上所述，秦桧所说的“莫须有”三字到底是什么含义，乃至历史上秦桧说没说过“莫须有”这句话，都需要重新探索一下了。

“九曲丛祠”埋忠骨岳飞是被迫害致死的，肯定不会有像样而确凿的墓地。二十余年之后才平反昭雪，当时要以一品官位的礼仪重新进行墓葬。那么，岳飞的遗体是从哪里找来的呢?它初葬时候的情形到底是怎样的?改葬地就是如今的栖霞岭吗?

南宋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7日)，这是个阴霾沉沉、天色晦暗的日子，三十九岁的抗金名将岳飞冤死在临安(今杭州)的大理寺狱中。消息传出，平民百姓无不凄怆落泪，文人志士又都扼腕叹息，这千古奇冤令多少人悲痛万分而又忿忿不平。时至今日，杭州栖霞岭的岳飞墓前，观瞻游览者仍络绎不绝，人们为岳飞一生的高风亮节和浩然正气所感动，怀着对英雄的崇敬仰慕之情，来凭吊这位曾以爱国壮举惊天地却换来悲惨结局泣鬼神的历史人物。当人们向这位民族英雄深深鞠躬之时，有没有想过这个墓中是否真有岳飞的遗骨呢?

岳飞是作为罪犯被处死刑的，当局肯定不会允许进行什么像样的墓葬。那么，当时岳飞先被草葬在何处?什么时候再改葬栖霞岭的呢?

据宋无名氏《朝野遗记》诸书载，当天，狱官将岳飞在风波亭拉胁而死，按照规定，在狱中处死的犯人尸体应该埋在监狱的墙角下，好心的狱卒隗顺冒险背负岳飞的遗体，躲过奸党们的监视，偷偷走出监狱，

翻越过高高的城墙，于临安城西北的钱塘门外，将遗体偷偷地埋葬在九曲丛祠中王显庙旁的北山之水边。岳飞身上一直怀有一玉环，也许是对妻子深切感情的一种标记，即将它殉葬在遗体的腰旁，然后在坟前种两棵橘树，作为标记。周必大《龙飞录》还说，钱塘门外的岳飞初葬之墓假称“贾宜人之墓”。“宜人”原系宋代命妇的封号，为了不让秦桧党徒们发现，只能以此作为掩饰。那么，哪里是“九曲丛祠中王显庙旁的北山之水边”呢?《咸淳临安志》载，钱塘门以北，有九曲昭庆桥、九曲法济院、九曲宝严院。此地多湖泊，故城垣曲折，九曲城、九曲丛祠也因此得名。王显庙就在此九曲城下，绍兴年间所建。明嘉靖《西湖游览志》也说：“钱塘门沿城而北，旧有九曲城。”可见九曲丛祠与王显庙应在钱塘门外，估计即今昭庆寺以北一带，所谓“北山”，即今之宝石山。而南宋大理寺是在钱塘门内，所以隗顺负尸出钱塘门，到九曲城下的北山水边葬尸，较合情理。

我们知道《朝野遗记》曾编造出“秦桧矫诏害岳飞”之故事。而上述隗顺的故事似乎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明万历十年刊本《汤阴精忠庙志》、嘉靖年间刻本《西湖游览志》、清康熙时编的《钱塘县志》等，均采用此说。有的学者还猜测，如上述故事可信的话，从上述整个墓葬活动来分析，要将岳飞尸体偷偷运出监狱，并翻越城墙，然后入棺葬在宝石山之水边，似非只身单人所易做到。也许同“隗顺”一起机智勇敢地保护岳飞遗体的，还有其他人，《朝野遗记》所载之“隗顺”，只是他们中的一个代表，或许是他们一伙人的代称。可以说，这也可算岳飞初葬时的一谜。

然而，《宝庆四明志》载，岳飞“死于棘寺，藁葬墙角”。是说岳飞死后，用草垫之类包裹，葬于大理寺的墙角。《三朝北盟会编》却说：“侯中毒而死，葬于临安菜园内。”民间还有另一个传说，以为岳飞曾被葬于杭州的众安桥下。李汉魂《宋岳武穆公飞年谱·遗迹考》中记：“今杭州市众安桥河下十七号忠显庙，其地南宋为北郭丛葬之所，传即岳王初瘗处。”清朝许多学者如胡兴仁、沈祖懋、杨昌浚等，都同意此说。到道光十三年(1833)，杭州府司狱吴廷康正式确认此地为岳飞初葬地，并筹集资金，营建岳飞墓、岳飞庙，刊刻《岳忠武王初瘗志》，一时影响颇大。一些现代学者认为，南宋时临安的众安桥，位于钱塘门内，也就是在城内，是临安城中的商业繁华地段，如桥南还有“北瓦

子”等娱乐场所，又紧靠御街的必经之地，怎么会成为北郭丛葬之所呢?

绍兴三十二年(1162)，宋孝宗继位。他十五岁时目睹了岳飞案的处置过程，知晓岳飞之深冤和民心之不平，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表明自己的抗金态度，即位不久，便接受了太学生程宏图“昭雪岳飞之罪”的上奏。七月，迅速颁布了“追复指挥”，即追复岳飞官位之命令，为其平反，恢复名誉。此时赵构刚刚禅位给孝宗，称“太上皇”，而为岳飞昭雪，决非赵构所愿，所以孝宗这样做是需要勇气的。当然在《追复指挥》中，不但只字未及“冤案”，还要装着是仰承“太上皇”的圣意，以给足赵构以面子。

皇帝《追复指挥》决定，要对岳飞“以礼改葬”，就是要以一品官位的礼仪改葬，所以朝廷贴出悬赏寻找岳飞遗体的告示。据《朝野遗记》载，隗顺临死时将葬地详细情况告诉儿子，并嘱咐说：“朝廷日后必会悬赏求找岳飞的遗体，可以这样告诉官府，该棺木旁系一铅筒，上有大理寺的勒字，便是岳飞埋殡之符。”隗顺的后代便将九曲丛祠旁的岳飞初瘗地报告了官府，当官府找到岳飞的葬地，打开棺木时，发现“尸色如生，尚可更敛礼服”。于是，以少保之礼重新安葬。岳飞之子岳霖等人在淳熙六年(1179)所上的《赐谥谢表》中有：“葬以孤仪，起枯骨于九泉之下”的话。中国古代称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所以称“葬以孤仪”，可见以少保之礼改葬应没问题。但《朝野遗记》中“尸色如生”的记载肯定有问题，一是岳飞遇害已二十一年，当时草草下葬，且葬在“北山之水边”，应相当潮湿之地，怎么可能还“尸色如生”呢?二是岳飞的后代们都说是“起枯骨于九泉之下”，如当时“尸色如生”，后辈们决不会如此用语。可见《朝野遗记》中的描述，有多少是确凿可信的?多少是夸大其词的?多少又是杜撰编造的?也让人摸不着头脑。

最后，岳飞的改葬地是否即在今天栖霞岭的岳墓所在地?大多数学者持同意的观点。《梦粱录》卷十五载：“忠武岳鄂王墓，在栖霞岭下。”《武林旧事》卷五也载：“栖霞岭口，古剑关，岳王墓。岳武穆王飞所葬，其子云亦附焉。”栖霞岭岳墓改葬时的确颇为隆重，其墓道两边立有石人、石马，并将边上的智果观音院改为“褒忠衍福院”，以充岳鄂王香火，还存列着岳云所用铁枪。后屡经修建、改建，如明朝重建岳王庙，变动较大。最近一次修复，发现墓道两侧埋有石人、石马，估计是

两宋改葬时的遗物。

可见，岳飞遗体的初葬地还有颇多疑点，改葬地在栖霞岭应该问题不大，不过也还是有人提出一些怀疑，致使有关岳飞墓的真伪，目前仍有争议。大宋的艺术《雪景寒林图》的真伪北宋前期画家范宽的名作《雪景寒林图》再现，令人兴奋。不过画上有“臣范宽制”四字的题款，又令人迷惑，甚至有学者怀疑此画是否为范宽的真迹。引起书画鉴赏家们的一些争论，其中疑难处在哪里?为何令人费解呢?

在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有一幅宋代画家范宽的《雪景寒林图》，这件古代绘画珍品原系民间私人收藏，“文化大革命”中作为抄家物资转入博物馆。“文革”结束，北京举行“各省市征集文物汇报展览”，此画最引人瞩目。因为范宽传世之作有《溪山行旅图》《秋山萧寺图》和《雪山楼观图》等，此画却久已湮没，突然面世，令人惊异，这画是真迹吗?

雪景寒林图范宽生于五代末，耀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据有关画史类书籍所记，其仪状峭古，举止疏野，嗜酒好道。至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2)犹在，一生失意潦倒而不得志，“落魄不拘世故”，常来往于汴京与雍洛之间。工山水画，曾师从荆浩、李成，后悟“师人不如师物，师物不如师心”。卜居终南山、太华山，终日危坐，纵目四顾，饱览岩壑云烟，随后雄健落笔，独辟蹊径地塑造着峰峦浑厚、气势雄伟的关陕山川形象，最终自成一家。北宋前期，与李成、关仝为北方三大山水画派的代表，后人评其“得山之骨”，尤长雪山之景，使人见之凛凛，只感寒气逼人。米芾《画史》评之为“本朝自无人出其右”。

《雪景寒林图》是绢本水墨山水大立轴，长一百九十五厘米，宽一百六十厘米。以老辣沉稳的笔墨表现了大雪覆盖下的北方山水奇观：主峰高耸，群峰屏立，山势嵯峨，岩壑幽深，有河朔气象。山头遍作寒柯，通幅一无杂树。山腰萧寺，危径长桥，皆得自然。瑞雪满坡，寒林孤秀，物态冰凝，俨然三冬在目。山下岩体棱角分明，岸边有大树数重，后有村居，一人张门而望。空间虚实相应，笔法苍润雄伟，加上其淡墨烘染出的阴霾气候，都显示出作者确为写生妙手，体现出高深的艺术造诣。

从《雪景寒林图》的近景看，树干上隐约有“臣范宽制”四字。按上述范宽生平和脾性，也未闻其曾被召入宫廷，那为什么称“臣”呢?同时，范宽是否名“宽”也存在疑问。据《圣朝名画评》载：“范宽，名中正，字中立，华原人，性温厚有大度，故时人目为范宽。”《图画见闻志》“范宽”条有注：“或云名中立，以其性宽，故人呼为范宽。”《宣和画谱》也说：“范宽，一名中正，字中立。”“蔡卞尝题其画云，关中人谓性缓为宽，中立不以名著，以俚语行，故世传范宽山水。”似乎都表明这“宽”不是他的本名，是时人以他的脾性而称他为“宽”，因而使他的真名反而被淹没了。《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也载：范宽“原名中正，字仲立(一作中立)。性豁达大度，人呼之为范宽，本名反不显。”

由是，著名书画鉴赏家启功先生写了《鉴定书画二三例》一文，认为《雪景寒林图》确是范宽的画法，三拼绢幅也是宋画的特点。但从此画的题款来看，此图应是宋代范派的作品，而不是范宽的真迹。宋画多半无款，这是文物鉴赏方面的常识，但此画中的一株大树干上却有“臣范宽制”四字，纯属画蛇添足。同时，范宽只是时人称他的一个诨号，他会将诨号题为画款吗?就如包拯会自称“包黑”这个诨号吗?此外，这个“臣”字也大有疑问，以范宽生平和举止而言，他就是题画款，也不会称“臣”。

陈传席《〈雪景寒林图〉应是范宽作品》一文提出商榷，认为宋人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四范宽条是写：“范宽，字中立，华原人，工画山水。”“宽”为其名，“中立”其字。记载并不含烟。而且古人的名和字是相配的，名“宽”配字“中立”也颇相合，倒是所谓“名中正，字中立”有点不配。而“或云名中立，以其性宽，故人呼为范宽。”只是其条后的一个小注。其不作正文，表明只是出于传说。而后人不辨真伪，以此传说为真，有关记载大抵皆根据《图画见闻志》那一条小注的传闻，这种说法应属误传。如米芾是北宋人，不可能不知道范宽的名字，然而他的《画史》所记，皆用“范宽”，显然并不以此为诨号。

其实，范宽在自己画上题款并非只此一件。如米芾曾在丹徒(今江苏镇江)僧房里见到一幅如荆浩风格的山水画，“于瀑水边题‘华原范宽’，乃少年时所作。”米芾是当时的书画大鉴赏家，他岂有搞错之理，可见范宽少年作画就已有题款的习惯，且自题“范宽”，“宽”必是其名，而非诨号。最有力的证明是，台湾学者也在肯定是范宽真迹的《溪山行旅图》上发

现了“范宽”的款字，该画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艺苑掇英》第十五辑有文载，其图右下树阴处有“范宽”二字。这就更说明问题了：范宽性宽厚，只能说是人如其名，而并非因性格而得名。一些专家从作品的用笔风格上也认定，《雪景寒林图》和诸画史记载的范宽作品风格尚没有不符合之处，所以应看作是范宽真迹。

唯独这“臣”字还是令人费解，这是其他画上所没有的，从逻辑上分析，范宽不应以“臣”自称，此画也非献给皇帝之作品，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否会由后人添加的呢?另外，范宽的名字问题，上面的解释也并不是已毫无疑问。毕竟《图画见闻志》没有明确“宽”就为其名，后注只是传说，其他诸书也未必尽抄《图画见闻志》。当然在没有更充分的证据之前，仅凭这些怀疑是不能轻易否定此画的作者是范宽的，只是此题款确实存在一定的疑问。目前书画界有持肯定论者，也有不置可否者。

第三十六章

柳永人品与作品柳永是北宋前期著名的词作家，是第一个大量创作长调慢词的专业词人，其毕生精力都献给了词的创作。他的词吸收了许多民间俚言口语，通俗易懂，一扫晚唐五代词人的雕琢风气。且精通音律，善于铺叙，曲尽委婉，对宋词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流传至今的《乐章集》，保存有近二百首词作，是一位有着较大社会影响力的作家。然而人们对其作品和人品的评价，却褒贬不一，甚至差之千里，也可谓一历史之谜。

柳永原名三变，字景庄，建州崇安(今属福建)人。其生年不详，或说雍熙四年(987)，或说景德元年(1004)，莫判孰是。因为在家排行老七，世人或称柳七。出身于一个重儒世宦家庭，少年生活在京都开封。时代和环境给他安排的出路，无非只是熟读圣贤书，然后于科场追逐名利。但是，柳永有“善为歌辞”的天才，于是他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走向社会，融入民间，成为乐工的朋友，“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柳永为此结识了许多青楼歌妓，为她们填词作曲，尽心尽才，有求必应。其词作在内容上颇有特色，艺术上的造诣更是不俗，传播很广，有谓“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一时蜚声朝野。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柳永又不得不走科举应试之路，但此路走得十分辛苦和坎坷。吴曾的《能改斋漫录》载：“(宋)仁宗留意儒雅，务本理道，深斥浮艳虚薄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撰《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我们来欣赏一下他所写的《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的确很有个性。怀才不遇，科场失意使他激愤填膺，转而对功名富贵采取冷淡和狂傲的态度，常常以“自衣卿相”自居，把功名官位看成“浮名”，还不如“浅斟低唱”、“偎红倚翠”畅快。怪不得宋仁宗看了非常反感，特意排斥他。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艺苑雌黄》也有一段相似的记载：“当时有荐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词柳三变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词!’由是不得志，日与猖薄子纵游娼诸酒楼间，无复检约。自称云：奉圣旨填词柳三变。”

由于最高当局的不满与打压，柳永屡试不第，流浪于开封、苏州、杭州等大都市，在秦楼楚馆中讨生活，依然以填词作曲为娱，与歌妓们流连忘返，使柳永有感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同遭遇，从而替她们唱出对所受凌辱和践踏的控诉，同时寻求生活的安慰。其中，乐工借柳永传其新制乐曲，妓者藉柳永增其缠头声价，柳永也凭她们远扬才名，可谓相得益彰，风流倜傥。

据说，直到景祐元年(1034)，柳永方才及第，遂改名永，字耆卿。以后，只做过睦州团练推官、余杭县令、昌国晓峰盐场监官、泗州判官和屯田员外郎等小官，故亦柳屯田。然而其仕途仍很渺茫，游宦生活飘泊不定，充满辛酸。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载，皇祐年间，柳永已近人生晚年，天上出现老人星，时以为是“祥瑞”。一位姓史的宦官，爱惜柳永之才而怜其潦倒，再次向仁宗推荐，拿着柳永甚为得意之作《醉蓬莱》词给仁宗看，以期获取欢心，以助其仕途升迁。哪料词中有“此际宸游，风辇何处”一句，刚巧同仁宗悼念其父真宗的挽词相合；又有“太液波翻”一语，仁宗过于敏感，以为“翻”字不祥，看后竟气愤地将词稿扔在了地上。

有学者认为，上述事件应发生在柳永“久困选调”的庆历三年(1043)。张舜民《画墁录》说：“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由是其仕途不顺，一再受到阻碍，长期沉沦下僚。柳永大约病死于皇祐五至六年(1053或者1054)，卒于润州(今江苏镇江)。

从北宋开始，人们对其词作就褒贬不一。王灼《碧鸡漫志》载，当

时对柳词评价相当高的文人，有“《离骚》寂寞千年后，《戚氏》凄凉一曲终”的说法；对柳词诟骂最甚的宋代文人，则有“遭柳永野狐涎之毒”的说法。那么，其词作本身是否存在如此的复杂性呢？

当时的上层社会，包括仁宗皇帝、宰臣晏殊在内，众口执词，大都攻击柳永“好为淫冶讴歌之曲”。封建正统派的理学家们都指责他在科场失意后，便沉沦于都市繁华的诱惑中，只追求灯红酒绿的放荡生活，创作一些淫歌艳曲。此后，一些自命高雅的文人，也往往贬斥“柳耆卿曲俗”。总之，历来自命高雅的士人们对于柳词“颇以俗为病”，对其内容和格调大多持否定态度。最多说柳词在艺术上有所独创，促进了慢词的发展，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如此而已。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云：“其词格固不高，而音律谐婉，语意妥帖，承平气象，形容曲尽，尤工于羁旅行役。”

近现代以来，许多人仍认为，柳永是一个没落士大夫阶级的浪子，其主要精力都耗费在“偎红倚翠”放荡不羁的生活中，同时创作了大量的“猥词”，思想颓废，趣味低级。他也与其他士大夫一样，以玩弄的态度对待妓女，描写中充满了色情的东西。如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如此指责柳永，说他“沉醉于妓寮歌院之中，以作词给他们唱为喜乐”，“他的一生生活，真可以说是在‘浅斟低唱’中度过的。他的词大都在‘浅斟低唱’之时写成的，他的灵魂大都发之于‘倚红偎翠’的妓院中的，他的题材大都是恋情别绪，他的词作大都是对妓女少妇而发的，或代少妇妓女而写的。”

然而，也有学者对柳永的作品与人品，持相当肯定的正面评价。指出封建社会根本不把妓女当人看待，宋代更是妓馆林立，士大夫狎妓成风，只把妓女当作玩物、货品，任意买卖、转赠乃至处罚。就像苏东坡这样温文尔雅的官员加文豪，也没有什么例外。而柳永的词却不鄙视她们，写出对她们的同情，给她们以人的应有地位。他置身于妓女、乐工间，同她(他)们创建了深厚的友谊，为她们作歌，付出辛勤劳动，实际上成为她们谋取生活的得力助手，这与一般纨绔子弟青楼买笑、寻欢作乐完全不同。

柳永叙写妓女的理想与要求，表达她们的苦闷心情，其中对妓女的

苦难遭遇深表同情，如《燕归来》词中描写被侮辱的妓女的处境时，“肠成结，泪盈襟”。在描写妓女的技艺时，也是采用欣赏与歌颂的笔法，如在《木兰花》中对其歌舞技艺的赞美。在谈到自己与妓女的关系时，大都感情真挚，没有虚饰的玩弄态度，如《雨霖铃》中“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在大量的怀妓作品中，同样表现出把妓女当作知己的心情，如《洞仙歌》中“共有海约山盟”；《十二时·秋夜》中“祝告天发愿，从今永无抛弃”；《蝶恋花》中“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视妓女为知己，因而也受到她们的爱戴。相传柳永“死之日，家无余财，群妓合金葬之”；“每寿日上冢，谓之吊柳七”。(《方舆胜览》卷十一)

柳永以妓女为题材的词作中，毋庸讳言，也有一些风流韵事的描写，甚至有些语句写得近乎色情。但是，一则这类作品在柳词中所占比重不大；二则其描写时仍将妓女置于与自己同等的地位，与其他士大夫玩弄妓女的态度相异。所以，他的词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尤其在下层民众间得到广泛传播。其实在士大夫中，也有人相当赏识柳永，如叶梦得《避暑录话》中载，苏东坡常戏云:“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将柳永与秦少游等同看待。前面提到时人还有把柳词比作“离骚”，也有人把柳词与杜诗相提并论的。

尤其是他的《鬻海歌》，柳永作为晓峰盐场的监官，却能够站在制盐民户的立场上，描写其艰苦的劳作和穷困的生活及其悲惨命运，抨击官府对他们的残酷剥削，大声疾呼：“鬻海之民何苦辛!”要求改变有关的榷盐制度，表现了一位正直的地方官吏对民瘼的深切关注和真挚同情，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它在我国古代诗歌中，是一篇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具有鲜明的人民性。

一般以为，柳永由于怀才不遇，科场失意，转而对追求功名富贵不以为然地进行嘲弄。他的词中不止一次地流露出对功名利禄的非议，吐出“图利禄，殆非长策”诸语，以为“才子词人，真是白衣卿相”，从而对“蝇头利禄、蜗角功名”颇为冷漠鄙夷，逐渐看破红尘，绝意仕进，专以填词作曲为业。如他在《西江月》中依然如此自嘲：

腹内胎生异锦，笔端舌喷长江。纵教片绢字难偿，不屑与人称量。

我不求人富贵，人须求我文章。风流才子占词场，真是白衣卿相。

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上述自嘲只是其仕途失意时的几句牢骚，谈不上是对科举功名的一种反抗。前引《鹤冲天》一词，也同样表现了落第后自嘲自解的一种心情，在故作旷达的背后，不难看出其深深的遗憾和日后为榜上“龙头”的潜在企望。柳永并不像他自己表白的那样清高超脱，相反常常为谋个一官半职，会费尽心机地拉关系、走后门，甚至求助于和他结交的那些歌妓。《青泥莲花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早年和柳永有过交往的孙何，官任杭州太守，柳永很想求见，以图推荐，但官府“门禁甚严”，一直无缘求见。于是作《望海潮》一词，盛赞杭州的繁华与美景，其中隐约透露出当地官员的儒雅风度和前程无限。写好后，就拿着去见名妓楚楚，恳求道：“想见孙太守，恨无门路，愿借朱唇歌于孙前，若问谁作此词，但说柳永。”果然，孙太守听了楚楚的歌，非常高兴，终于接见了柳永。此后，柳永的放荡生活开始收敛，狂胆怪情也逐步消减，经过认真准备和故友帮助，考取进士，在浙江诸地做了几任小官。

持折中态度的学者也不少。认为柳永词的主要内容是反映了封建社会中部分知识分子在怀才不遇、仕途潦倒后的悲愤和不满的情绪，表达了他们对功名利禄的某种淡漠，但还未具有陶渊明那种不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的高洁理想，或像李白那种蔑视权贵的叛逆精神。同时，柳永从一个失意文人的角度描写了社会中被压迫的妓女及有关下层民众的生活，对她们表示了一定的同情，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对词作的传统题捌也有一定的突破。但其词也表现了封建知识分子的庸俗颓废的一面，写过一些对最高统治者歌功颂德、阿谀逢迎的作品，其思想倾向是相当复杂的。总之，不论是恋情词还是羁旅行役词，都深深烙印着柳永的人生遭际。它们以其特有的直率和真切，唱出了生命的欢乐和悲愁、追求和厌倦。

看来，柳永的作品和人品本来就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要做出简明的评价是不可能的。问题是学者们的看法如此众说纷纭，甚至鲜明对立，这倒更增添了此谜的魅力。

范仲淹创作《岳阳楼记》

北宋名臣范仲淹的人品行止犹如一块丰碑，耸立在中国历史的长廊中，后人在仰慕他的风采时，往往要咏诵他的千古绝唱《岳阳楼记》，其浩渺雄浑的自然景观，光风霁月的人格境界，让人心旷神怡，思绪万千。然而，一些学者在经过详尽考证后，居然提出范仲淹一生从没到过洞庭湖，更没登过岳阳楼的观点。那么，《岳阳楼记》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呢?这些学者的这一观点能成立吗?

庆历六年(1046)九月十五日，范仲淹五十八岁，在知邓州(治今河南邓县)任上，完成了这篇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岳阳楼记》：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呼!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这座岳阳楼，乃江南古代三大名楼之一，位于今湖南岳阳市西边的洞庭湖畔。据说，早年是岳阳城的西门楼，三国时吴国名将鲁肃曾将它作为阅兵台，在其上检阅了浩浩荡荡的东吴水师。唐宋以来，久负盛名，成为历代文人墨客登临赋咏之所。经历了数十次的重建与修葺，还有三次迁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迥然有别的风景与外貌。然而在读过此篇《岳阳楼记》的人们的心目中，它却始终是范仲淹笔下的那座能俯瞰八百里洞庭，景色气象万千，使人心旷神怡的千古名楼。

楼以文显，文以楼传，千百年来，岳阳楼因范仲淹的名篇而声誉益着。该文对岳阳楼景物描写得如此生动逼真，人们不由被那风云变幻的洞庭山水所深深吸引。文章的抒情也独具匠心，表现出作者非凡的抱负，演绎出一种光风霁月的人格精神，令人高山仰止。凡是读过此名篇的人，谁不向往到岳阳楼一睹其卓绝景观和精神风姿呢?

然而，在对《岳阳楼记》的研究中，许多学者查阅了《范文正公文集》、《范文正公年谱》等有关史籍，却发现范仲淹“少长北地”，成年后考中进士，就一直在其他各地做官，一生从未到过洞庭湖，更未登过岳阳楼。我国四大淡水湖区域，范仲淹曾守苏州、饶州，在两地留下过有关诗文，所以到过太湖、鄱阳湖；他任京官和外放之间，也多次经过洪泽湖；唯独没有资料表明他去过洞庭湖。有学者对范仲淹在成年后的行踪和宦历作了详尽排察，绘成往返路线图，最后的结论仍是：范公无法到达洞庭湖区域。

既然许多学者认为范仲淹没有到过洞庭湖，也没登过岳阳楼，那么这篇如此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是如何写出来的呢?范仲淹是怎样把有关景物描绘得栩栩如生的呢?

一种说法是，范仲淹的祖籍是苏州，所以说他是生在苏州，长在苏州，甚至断言范仲淹“诞生在苏州郊区的香山镇”，曾经在苏州的天平山下发愤苦读。所以他从小在太湖的岸边长大，对湖泊那种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气象万千的景观十分熟悉。

其实，范仲淹的出生地及其少年成长之地都存在不同说法。据富弼所撰《文正范公墓志铭》记载，唐代后期，范氏从长安举家南迁，有一支定居苏州吴县。五代时，范氏数代在吴越做官。范仲淹的父亲范墉于太平兴国初归宋，先后任一些地方的幕僚官。端拱二年(989)八月，范墉官任武宁军(徐州)节度掌书记，其继室谢氏生下小儿子范仲淹。楼钥《范文正公年谱》明确记载：“太宗皇帝端拱二年已丑秋八月丁丑，公生于徐州节度掌书记官舍。”就是说，范仲淹生于山东徐州，而不是苏州。

也有学者认为，范仲淹出生地应是当时的北道重镇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县)，而不是徐州。范仲淹对自己的出生地有非常明确、极为清晰的表

述，就是在庆历八年(1048)致挚友韩琦的一封信中这样说：“真定名藩，生身在彼，自识别以来，却未得一到，谅多胜赏也。”对自记事以来，未能对出生地重游，怀着无限的惆怅。问题是出在范墉原为真定府节度掌书记，应在范仲淹出生后，才调任武宁军，后人误以为范公出生在武宁军(徐州)。上述二说不知孰是?然而“苏州说”肯定不对，它大多是地方史话的产物。

当然，范仲淹即使不是生长在苏州，也在苏州做过官，对太湖的风光还是了解的。但是说其《岳阳楼记》是仿真太湖来写洞庭湖，还是颇为牵强。因为两湖的气势其实还是有较大差别的，如据有关姑苏人士所说，太湖基本没有惊涛裂岸、浊浪排空的景观。范仲淹也有《苏州十咏》，其描述太湖的“万顷湖光里”，大多是“无风还练静”的胜景。

另一种说法是，巴陵郡守滕子京在请范仲淹作记时，曾写来《求记书》，并附送来一本《洞庭晚秋图》，供其“涉毫之时或有所助”。范仲淹形象思维能力很强，虽未亲临洞庭，但以来信和图中描述为依据，再参考前人的有关诗赋，便写出了《岳阳楼记》中洞庭湖的浩瀚场景。此说也难以令人信服，我们知道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所谓“神游物外，心与景接”。认为仅凭一幅画，加以想像，就能将洞庭景色描写得如此出神入化，恐怕勉为其难吧。且古人写游记，未亲历而着笔墨者极为少见。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岳阳楼记》是范仲淹根据鄱阳湖的风光加以联想而描绘完成的。范仲淹知饶州一年半，未留下关于鄱阳湖的片言只字，说明其对鄱阳湖的景观印象不深。既然对鄱阳湖都没有多少印象，何谈以此来描绘洞庭湖呢?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范仲淹不但到过洞庭湖，甚至在湖边生活过一些岁月，对八百里洞庭之景观曾有过细致入微的观察与体验，否则写不出如此脍炙人口的神来之笔。范仲淹两岁时，父亲就因病去世，母亲谢氏贫无所依，只得带着襁褓中的儿子改嫁，其青少年时代的生平行实在史籍中几乎是空白，其实就应从这里寻找范仲淹与洞庭湖的关系。其时，范仲淹随继父朱文翰宦游四方，曾经到过澧州安乡(治今湖南安乡西南)，还有池州(今安徽贵池)、淄州(今山东淄博南)诸地，度过了他少年

苦读的岁月。

学者方健经详尽考证后指出，约在至道、咸平年间(995～1003)，少年范仲淹约在七至十五岁的时候，其继父朱文翰任安乡知县，仲淹就从母随朱氏生活于今湖南的安乡县，这里正位于水势浩渺的洞庭湖畔。在此“县三面皆大湖”的安乡度过了其难忘的少年生涯，数年中，洞庭壮丽秀媚的湖光山色。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使他久久不能忘怀，范仲淹就是在这时与洞庭湖结下了不解之缘。

宋末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和祝穆的《方舆胜览》都载：“范文正公读书堂，在安乡县。仲淹幼孤，从其母归朱氏，朱宰安乡，与俱来读书此地。”《范文正公文集·褒贤集》卷三有南宋宝庆三年(1227)时所记的《澧州范文正公读书堂记》，其详细记载了安乡县范氏读书堂的情况，南宋初曾毁于兵火，庆元中再重修。康熙《安乡县志》中保存了最早记录范仲淹在安乡遗事的文献，为庆元二年(1196)时澧州州学教授王仁撰写的《重修范文正公书台记》，其更为翔实地叙述了安乡范氏读书台的来龙去脉，尤其是相当精确地描绘了读书台的地理位置，在澧阳县南八十里处，正位于洞庭湖畔。而“书台夜雨”已成为安乡著名的八景之一。此外，从县志中一块残碑上考证出范仲淹在安乡读书的启蒙老师为太平兴国观中的司马道士，所以范仲淹对道家学说有较为精湛的研究，实源于此。其他有关佐证不胜枚举。

其后，朱文翰调任淄州长山县令，仲淹与母亲也自然随之来到山东，曾苦读于长白山礼泉寺僧舍，此时仲淹约十六岁上下。此山位于山东中部，即今邹平县以南的白云山，因山中云气长自而得名。范仲淹在这里发愤苦读，博览群书，山中溪水清澈，读倦了就“以水沃面”，从而“慨然有志于天下”。所以，今天这里也有范仲淹的读书纪念堂，它与安乡的范氏读书台并没有矛盾，而两处读书堂之遗迹，正好填补了范仲淹青少年时行迹记载的空缺。

在离开洞庭的四十余年之后，当他应巴陵郡守滕子京之请，写《岳阳楼记》之时，少年时候的一碧万顷、浮光耀金的洞庭风光再次浮现脑海，真是文思如泉涌，笔锋在八百里湖面上纵横驰骋，将浩渺壮观的湖光山色尽收笔底，写出这一千古绝唱的名篇，也就不奇怪了。不过，人

们还是比较一致地认为，范仲淹没有时间去登临写此名篇的前一年滕子京重修的岳阳楼，所以在行文至此之际，只能采用“避实就虚”的手法，仅记“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也轻巧简雅。

总之，流传千古的《岳阳楼记》，是晚年的范仲淹根据四十余年前少年时的洞庭印象而写就的。你相信吗?

“苏老泉”的称呼《三字经》中把苏洵称作“苏老泉”，有一定证据，且已广为流传。然而许多学者指出，其实它应是苏轼晚年的别号，证据也更为确凿。后人为其父子俩争一个别号，而大打笔墨官司，也颇为稀奇。

南宋末年出现的《三字经》载：“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激。彼既老，犹悔迟，尔小生，宜早思。”此书相传为南宋学者王应麟编撰，或说是宋末广东人区适子所作，后由广东人黎贞续编加注。其注曰：“苏洵，字明允，号老泉，轼之父。”《三字经》作为孩童的启蒙读物，流传很广，“苏洵号老泉”的说法也被普遍接受，“苏老泉”几乎成为了一个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

苏洵是北宋著名的学者，苏轼和苏辙的父亲，眉州(今四川眉山)人，生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卒于治平三年(1066)，享年五十八岁。据说，他年轻时“游荡不学”，有谓“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马间”，其父亦不强之，甚至“纵而不问”，乡党亲族都觉奇怪，或问其故，其父笑答：“非尔所知也”。果然，从二十七岁开始发愤为学，闭门苦读。欧阳修《苏明允墓志铭》记：苏洵“君少独不喜学，年已壮犹不知书……年二十七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而这时，苏洵也颇自信：“吾自视，今犹可学。”此后熟读儒家经典，还通晓百家之说，“专志于学，卒成大儒”。

然而，其科举之路还是走得十分坎坷，几次应试不中，于是“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在益州知州张方平的推荐下，嘉祐元年(1056)，苏洵送二子入京应试，拜访了欧阳修、韩琦等诸位名臣大家，呈上自己的文章。欧阳修大加称赏，并立即将其文章呈献朝廷，一时士大夫争相传

阅，名动京师。后朝廷任命他为试秘书省校书郎，又以文安县主簿的身份参与《太常因革礼》的编纂。晚年主要从事政论与学术著述，笔力雄健，议论畅明，世人将他与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后人又将他们一同列入“唐宋八大家”之中。苏洵大器晚成的故事，通过《三字经》，数百年来一直激励着少年学子们。

不过，自明清以来。不断有学者指出，“老泉”应是苏轼的别号，《三字经》张冠李戴地将它误加到苏洵的头上，是作者的疏忽。最早提出质疑的是明代学者郎瑛，他在嘉靖年间所著的《七修类稿》中指出，叶梦得《石林燕语》记载，苏轼谪黄州，号东坡居士，以其所居之地也。晚又号老泉山人，以眉山老茔有老翁泉，故用此号。又，梅圣俞有老人泉诗，东坡自注说：家有老人泉，公作此诗。并称曾在卷册间见“东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之印。而其友有东坡画竹，下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据此，“老泉”实为苏轼的别号。叶、苏同时，当不会有错。如果说苏洵号老泉，难道有子犯父号之理吗?欧阳修与张方平为苏洵所作墓志，也都言人称“老苏”，而没有“老泉”之号。由此，郎瑛断定，是后人误将“老苏”改成了“老泉”。

古人讲究避讳，不但避名，也要避号，父子决不会同号。既然苏轼有“老泉”之号的明证，那么其父苏洵决不会有此号。郎瑛拿出的史料颇为可信，推断也较为有理，明清时不少学者赞同此说。如明万历间学者张燧所编《千百年眼》一书，赞同郎瑛的观点，断定“老泉”是苏轼的别号。清袁枚《随园诗话》，考证后认为“老泉”是苏东坡的别号。戚牧《牧牛庵笔记·东坡别号》说，原版《晚香堂帖》尾有“东坡、老泉”二印，钤苏轼名下，此其明证。吴景旭《历代诗话》引苏东坡《老翁泉》、《老人泉》诸诗后指出，如果父亲号“老泉”，东坡是不会如此作诗讽喻的，“老翁泉”或“老人泉”是苏淘之墓茔地，东坡晚年为纪念先人而自号“老泉山人”。到清末民初，章太炎在增修《三字经》时，就把其中的“苏老泉，二十七”改为“苏明允，二十七”，似乎已成定论。

其实，坚持旧说的仍大有人在。如明末的通俗文学家冯梦龙，所编著的《醒世恒言》第十一卷《苏小妹三难新郎》中，仍说苏洵别号“老泉”。有关故事改编成评话、戏曲，在民间广为传播，所以“老苏即老泉”之说久盛不衰。再如王文诰在《苏诗总案注》中，还是把“老泉”之号

加在苏洵的头上。近数十年来，许多出版的论着和工具书在介绍苏洵生平的时候，还是袭用“号老泉”的说法。如《历代文选》、《三字经》等，曾枣庄《苏轼评传》也取此说。甚至有人旧话重提，学术界又为此打了几场笔墨官司。

持“老泉”为苏洵别号的学者，也能拿出宋人笔记《瑞桂堂暇录》为依据，此书称：“老泉携东坡、颖滨谒张文定公(张方平)……文定语老泉，皆天才，长者尤明敏可爱，然少者谨重，成就或过之。”这样看来，宋人也有称苏洵为“老泉”的了。似乎两说旗鼓相当，都有宋代文献为证，真让人有点越搞越煳涂了。

不过，目前倾向于“苏轼为老泉”的人较多一些。他们又提出进一步的辩论理由：《瑞桂堂暇录》的作者不详，应该是南宋时人。而与苏洵同时代人的文章中，人们从未见过有称苏洵为“老泉”者，如果苏洵确有此号，同时代人不会不知，也不会不用，因称人字号为古人的习惯。苏洵夫妇葬于老人泉，苏氏子孙就以“老泉”称其墓地，而南宋文人不察，遂出现以墓地名称苏洵的情况，甚至又讹为其别号。这一点又可从苏轼行文从不避讳“老泉”二字为证，如其诗《六月七日泊金陵阻风，得钟山泉公书寄诗为谢》中有“却有老泉来唤人”之句，其“老泉”纯属戏呼。在避讳之制颇严的宋代，儿子行文不避父亲之号，是难以说得过去的。所以，“老泉”是苏轼晚年因思念故里先茔所给自己取的别号，这时他作画毕或书“老泉”之号，或钤以“老泉山人”、“老翁泉”等印章，由于这时已是东坡晚年，所以知之者甚少，以至造成后世的谬误。

看来是“苏轼说”占上风，但真相的显现，仍有待更为清晰的证据。

第三十七章

苏东坡《洞仙歌》创作苏东坡的名词《洞仙歌》，有人以为是改编自孟昶的词或诗，也有人不同意这一说法，遂引起文学史上一番争论。那么，东坡的《洞仙歌》到底是原创，还是改编他人作品，这一问题确实颇为复杂。

苏东坡苏东坡在《洞仙歌》前序中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我七岁的时候，遇见一位峨眉山老尼，姓朱，名字已经忘了，年纪约有九十岁。她自己说年轻时曾随其师傅进入五代时后蜀国主孟昶的宫中。一个大热天，蜀主孟昶与其贵妃花蕊夫人，夜里在宫中的摩诃池上纳凉，雅兴上来作了一首词。朱尼也在边上侍奉，便记下了此词。到今天又过了四十年，朱尼也早就过世了，再没有人知道这首词。我也只记住了最前面两句，有空仔细想想倒也颇有味道，它难道不就是《洞仙歌令》吗?于是便将它填写补足。全词如下：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枕钗横鬓乱。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何如?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这首词画出一幅优美静谧的宫中夏夜纳凉图：贵妃天生丽质，所谓“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摩诃池上宫殿中吹来的风，含有阵阵香气。拉开绣帘，只见一轮明月照着人间。美人还没有睡。靠在枕边，头钗和鬓发已有些乱了。天气炎热睡不着，拉起美人的手出来散步，宫廷中已鸦雀无声，只见天上的星星在暗渡天河。试问美人：夜已至几时?夜已至三更。月光恬淡，星移斗转。屈指算算西风几时再来，时光如流年，在不知不觉中逝去。

按照苏东坡的前序，他是七岁的时候听得眉州老尼念过那首《洞仙歌令》词，四十年过去了，也就是在东坡年近五十岁之时，只记得前两句“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由于感觉颇有味道，便提笔为其补足。也就是说这首词除前两句外，基本上是苏东坡的作品。那么眉州老尼那首

《洞仙歌令》又是怎样的一首词呢?这就引起后世研究者的兴趣，一些人还对此作了详尽的探索和考证，不过其结论却大相径庭。

南宋赵闻礼所编的《阳春白雪》中这样记载：“宜春潘明叔云：蜀主与花蕊夫人避暑摩诃池上，赋《洞仙歌》，词不见于世。东坡得老尼口诵两句，遂足之。蜀帅谢元明因开摩诃池，得古石刻，遂见全篇。”全词如下：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贝阙琳宫恨初远，玉阑干倚遍，怯尽朝寒。回首处，何必留连穆满。芙蓉开过也，楼阁香融，千片红英泛波面，洞房深深锁。莫放轻舟，瑶台去，甘与尘寰路断。更莫遣流红到人间，怕一似当时，误他刘阮。

赵闻礼，字立之，号钓月，南宋人，祖籍濮州临濮(今山东鄄城县西南)，曾官胥口监征。工词，有《钓月轩词》。所编《阳春白雪》保存了不少宋词作家的资料。如上述资料可靠的话，就是说眉州老尼所传的那首《洞仙歌》，在南宋蜀将谢元明整理成都摩诃池时所得的石刻上发现了。这样今传前面的这首《洞仙歌》，确系苏轼所创作。

然而，南宋王明清在《挥麈余话》中却说：“‘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孟蜀主诗，东坡先生度以为词。”王明清，字仲言，汝阴(今安徽阜阳)人，少承家学，习知各朝史实与典章制度。历孝、光、宁三朝，官来安县令、泰州通判、浙西参议等。鉴于南渡后史料散佚，因采逸闻遗献，成《挥麈录》二十卷，所记颇为详尽，为当代国史所采，说明其可信度及其价值。那么按他所言，东坡的这首《洞仙歌》并非为原作，而是将孟昶的有关诗句再扩度为词。那么孟昶的全首诗是如何的呢?

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载，《漫叟诗话》云，钱塘有老尼能诵后主诗首章两句，后人为足其意，以填其词。予尝见一士人诵全篇云：

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暖。帘开明月独窥人，攲枕钗横云鬓乱。起来琼户悄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

南宋张邦基的《墨庄漫录》也载："近有李公彦《季成诗话》乃云：杨元素作《本事曲》，记《洞仙歌》'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钱塘有老尼能诵后主诗首章两句，后人为足其意，以填此词。其说不同，予友陈兴祖德昭云：'顷见一诗话，亦题云李季成作，乃全载孟蜀主一诗'。"所录诗与《苕溪渔隐丛话》基本相同，只有"起来琼户悄无声"一句改为"三更庭院悄无声"，而"暗香暖"为"暗香满"。明代田艺蘅的《留青日札》也载有这首诗，不过说它是花蕊夫人所作。

这样，南宋的《漫叟诗话》与《季成诗话》都是说"钱塘有老尼能诵后主诗首章两句"，且都录下了孟昶的这首诗。就是说苏东坡的这首《洞仙歌》，完全是根据孟昶这首诗进行的再改编，而与苏东坡《洞仙歌》前序所说全然不同。《墨庄漫录》载其友陈兴祖的话："东坡少年遇老人，喜《洞仙歌》，又邂逅处景色暗相似，故隐括稍协律以赠之。"其评论是："予谓此说近之。""隐括稍协律"，即是说苏东坡根据原作内容只稍加改动。《墨庄漫录》还说："《洞仙歌》腔出近世，五代及国初皆未之有也。"就是说五代时还没有《洞仙歌》词牌，孟昶如何会作《洞仙歌》一词呢?所以后人把孟昶这首诗题为《玉楼春》。

清代著名词学家朱彝尊在《词综》一书中这样说："蜀主孟昶，避暑摩诃池上，作《玉楼春》云云，按苏子瞻《洞仙歌》本隐括此词，未免反有点金之憾。"清代陈栩、陈小喋在《考正白香词谱》中说得更是不客气，认为孟蜀主诗《玉楼春》"且人相传诵固未佚失"，"东坡此词实全用其本句而成，乃必托之眉山老尼。岂欲避抄袭之诮也"?这就干脆在说苏轼的《洞仙歌》是在抄袭孟昶的诗，托眉山老尼云云，只是遁词而已。今人胡云翼《宋词选》这样说："苏轼喜欢隐括、改动前人所作以为词，如《哨偏》隐括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水调歌头》隐括韩愈的《听颖师弹琴》诗。这首词是隐括孟昶的作品。"

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如文学家俞平伯在《唐宋词选释》中认为，《洞仙歌》一词系东坡根据有关材料写成："若有原作，则东坡既抄袭了又讳言其所出，这当然是不会有的。"沈雄《古今词话》认为是："东京人士隐括东坡《洞仙歌》为《玉楼春》，以记摩诃池上之事。"(见张仲素《本事记》)就是说完全有可能是宋人隐括了苏轼的《洞仙歌》为《玉楼春》，然后托名孟蜀主以记成都摩诃池上之事，后人不

查，却以为是《洞仙歌》隐括《玉楼春》。

那么，到底是苏轼的《洞仙歌》创作在先，还是所谓孟昶的《玉楼春》创作在先呢?要搞清这个问题，看来还真不容易。

《宣和书画谱》是谁做的《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分别著录了当时宫廷中所收藏的数千幅作品，并为其数百名作家写传和精作有关的艺术评论，可谓中国最早的皇家艺术品收藏录。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其作者为谁，却无人知晓。

《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各有二十卷，分别记载了宣和时期宫廷内府收藏的历代书法和绘画的名作，叙述了上古至北宋的书画史概要，作品前还附有书画家的简传。《宣和画谱》所录画家共二百三十一人，绘画作品计六千三百九十六幅。《宣和书谱》是北宋最为浩繁的法书著录，所录书法作品也有数千幅之多。这两部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较为完整和系统地收录当时宫廷中所收藏的书画作品，并作了有关的人物介绍和书画评论的艺术史类的著述，它给后人了解和研究中国书画史，提供了较为珍贵的资料，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其书中都没有作者姓名，宋代几部重要的目录书也未予著录其撰写人。因此，谁是这两部书的作者，曾引起人们的多种猜测。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书中所录作品，如“宋人之书，终以蔡京、蔡卞、米芾，疑即三人所定欤。芾、京、卞书法皆工，芾尤善于辨别，均为用其所长。故宣和之政无一可观，而赏鉴则为独绝”。书中对“元韦占党人”的司马光、文彦博、苏轼、黄庭坚等人的书法作品皆排斥不录，从其政治立场分析，作者有可能是二蔡。《铁围山丛谈》载：“自崇宁始命宋乔年掌御前书画所，乔年后罢去，而继以米芾辈。殆至末年，上方所藏率举千计，实熙朝之盛事也。”认为书画二谱大抵都由米芾所鉴别。从其艺术鉴赏力及曾掌管御前书画所的条件而言，则其作者很可能是米芾。

但有学者指出，据书中所载的事实及有关语气分析，不像出自蔡京、蔡卞和米芾的手笔。如《蔡卞传》云：“自少喜学书，初为颜行，笔势飘逸，但圆熟未知，故圭角稍露。”若出自蔡氏自己的手笔，岂肯在本

传中自贬如此?此外，这两部著作写成于宣和年间(1119～1125)，而米芾则于大观元年(1107)去世，是在成书的十几年前。且书中《米芾传》谓："异议者谓其字神峰太峻，有如强弩射三十里，又如仲由未见孔子时风气，其为论或如此。"其对米芾书法颇有微词，这与米芾在自着《海岳名言》中批评古人，自以为是的语气迥然不同，因而作者也不可能是米芾。

有人以为是宋徽宗御撰，书中有些篇目很明显就是徽宗的语气，如称"朕"，称宋仁宗为"我仁祖"，称宋神宗为"我神考"等。《宣和书谱》的《蔡京传》称："其所以辅予一人而国事大定者，京其力焉。"完全是徽宗"予一人"的口气，书前还有徽宗的《御制序》，可见有徽宗是作者的可能。

有学者指出，宋徽宗也可算书画大家，其瘦金体与花鸟图在当时的艺术世界中都可算得上乘之作。他不但自己喜爱书画，还曾令臣下整理、鉴定和著录宫中的书画精品，《宣和书画谱》就是在他的亲自关心和督促下完成的。如果说书中有几篇文字为徽宗心血来潮时的御撰，则尚称可信；如果说全书都出于御撰，这就无异于梦话了。自来称帝王御撰之书，大抵出自臣下的集体编撰，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其《御制序》中有称今天子云云，完全是臣子之颂词，可见所谓徽宗亲笔的序文都如此做假，何论其他部分。

有人根据元代郑构《衍极·造书篇》注："大德壬寅，延陵吴文贵和之裒集宋宣和间书法文字，始晋终宋，名《宣和谱》，二十卷。"以为作者是元代的吴文贵，这更是捕风捉影了。书中于宋朝皆称"本朝"、"我宋"，绝非元人口吻。另据明王世贞《古今法书苑》所载吴文贵的书跋云："《宣和书画谱》当时未尝行世，传写讹舛，余窃病之，博求众本参校，遂锓诸梓。"可见是吴文贵据旧传抄本校刊印行了这两部著作，而非撰写人。

仔细品味二书，显见其忠实地反映了官方在艺术方面的理论见解和审美态度，叙史系统周到，持论亦较平实，就是缺乏创见。观点时有前后自相矛盾之处，看来执笔并非一人。约为宣和年间由善书画、精鉴赏的内臣奉敕命编撰而成。徽宗本人可能也参与了二书的编撰，并亲自还

撰写了其中几篇文字。其他如蔡京诸宠臣对其编撰过程的影响也应是很大的，如在对作品的选录与评论方面。甚至有学者认为，蔡京诸子也很可能参加了其书的编撰。如近代学者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认为，当时蔡京长子蔡条正提举秘书省，二书必出自蔡条之手。此说也不无几分道理，但并没有直接的证据。

宋徽宗画迹的真笔宋徽宗赵佶虽然是个昏君，却是个大艺术家，尤其是他的花鸟画，可谓一代宗师。然而有许多被题为“宣和殿御制御画”作品，其实却不是赵佶的亲笔，往往由当时皇家画院的画师代笔。所以现存传为赵佶所亲制的二十余幅图画，要分清哪些是赵佶真迹?哪些是赝品?还真是个难题。

宋徽宗赵佶(1082～1135)，宋神宗子，哲宗弟，曾封端王。元符三年(1100)哲宗无嗣而即位，到宣和七年(1125)传位钦宗，做了二十六年的皇帝。作为君主，他在政治上昏庸腐败，对内贪暴荒唐，对外懦弱无能，十足一个蠹国害民的统治者。然而他却是一个杰出的艺术家，能诗词，着有《宣和宫词》已佚，近人辑有《宋徽宗诗、词》；工书法，自成一家，称“瘦金体”，有《千字文卷》等墨迹传世；擅丹青，花鸟山水，精巧深微。天机盎然，艺术上都有所建树，许多作品流传下来，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历史文献中著录有宋徽宗赵佶的大量绘画作品，他曾对臣下说：“朕万机余暇，惟好画耳。”可见他在绘画上确实下了不少功夫，仅以流传到今天的作品而论，其质量之高，人或称他为划时代开派之宗师；其数量之多，在宋代画家中也是非常突出的。据初步统计，赵佶的重要作品如今还流传在国内外的，共有二十余件。问题是这些传世作品中，到底有多少是赵佶亲制的手笔?对于这个问题，历来艺术界就有不同看法。

宋蔡绦《铁围山丛谈》说：“独丹青以上皇(赵佶)自擅其神逸，故凡名手，多人内供奉，代御染写，是以无闻焉尔。”这是说当时的名笔画手，大多被招入御画院，都曾为皇帝代笔作画，有的甚至连自己的姓名都被湮没了。徽宗在位二十余年，其间对画院特别有兴趣，也特别重视，大量吸纳人才，佳作自然喷涌，所以北宋画院是我国历史上皇家画院最鼎盛的时期。可悲的是，许多画家都需为风流皇帝代笔，成为御用

画家。而赵佶作为皇帝，在侵占别人成果为已有的过程中也绝无羞耻之感，反而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元汤垕《画鉴》说：“《宣和睿览集》累至数百及千余册，度其万机之余，安得暇至于此?要是当时画院诸人，仿效其作，特题印之耳。然徽宗亲作者，自可望而识之。”史载，赵佶曾将从各地掠夺来的花石禽兽视为“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而陆续加以图绘，以十五幅为一册，累至千册，名曰《宣和睿览集》。这样庞大的画册，其中万余幅画，怎么可能是赵佶一人所绘呢?显然，其大部分是画院中画家的代笔，这些人有时需专门“供御画”。其中许多画上虽有赵佶手书“御制御画并书”的字样，却也不一定是他的亲笔。《画鉴》说，赵佶的真迹，他“可望而识之”，但没有说明赵佶的亲笔有些什么特征，也没有举什么例子，所以不免是在自我吹嘘。

元王恽题《宋徽宗石榴图》诗：“写生若论丹青妙，金马门前待诏才。”也是说赵佶绘画，大有捉刀之人，许多作品，赵佶只是在画上加以自己的题印而已。南宋《秘阁画目》、《中兴馆阁录·储藏》对赵佶亲笔的“御画”和赵佶在别人画上题字的“御题画”，进行了分别记载，但后人仍有各种怀疑。

今人对传世的赵佶画也作了大量的分析考订，以下略作介绍。

如《听琴图》诸画，谢稚柳先生从画的题字方面推论其画的真伪。《听琴图》旧为清内府所藏，胡敬的《西清札记》说是赵佶自画像，画中弹琴者为赵佶，下右首低头静听者是大臣蔡京。图右上角有赵佶所书“听琴图”三字，左下角签署着“天下一人”款押，钤“御书”朱文一印。正中有蔡京题诗，传世的赵佶画，有蔡题的不止一幅，如《文会图》、《雪江归棹图》、《御鹰图》都有蔡题，可见当时在皇帝画笔上题字似乎还较随便。问题是所题诗的内容，差别很大。《听琴图》蔡所题诗为：“吟徵调商灶下桐，松问疑有入松风。仰窥低审含情客。似听无弦一弄中。”这诗中，蔡没有一字对皇帝画笔加以颂扬。而《雪江归棹图》却题着“皇帝陛下，丹青妙笔”，还说：“盖神智与造化等也。”《御鹰图》蔡也题“皇帝陛下，德动天地”与“神笔之妙，无以复加”等等肉麻的颂扬之词。可见后两画应出于赵佶真笔，如为代笔御画，蔡京就不可能加以如

此的颂扬，因为对于一个善画的皇帝来说，给予代笔御画加以过分的恭维，这就会有讽刺皇帝的嫌疑了。

此外，《文会图》有赵佶的亲笔题诗：“题《文会图》：儒林华国古今同，吟咏飞毫醒醉中。吐司作新知人彀，画图犹喜见文雄。”蔡京的和诗为：“明时不与有唐同，八表人归大道中。可笑当年十八士，经纶谁是出群雄。”谢稚柳先生认为，如果此图为赵佶亲笔，怎么会用“画图犹喜见文雄”这样的语气呢?这明明是在观赏他人作品时所用的语气，包括开首所写“题《文会图》”，也不像在题自己的画。蔡京的和诗在画的左上角，与右上角和赵佶题诗遥遥相对，而蔡京的诗也只是依韵和皇上的诗，引申赵佶的诗意，标榜当时要胜过唐代，却没有一字涉及皇帝画笔。这与《听琴图》的题诗风格一致。所以，《听琴图》与《文会图》都不是赵佶的真笔，或也不是代笔，而是画院画家的作品为皇帝所满意，便加以御笔题诗，蔡京也只是奉命题诗，故没有对画本身加以赞扬。

而赵佶的《竹禽图》、《柳鸦芦雁图》、《枇杷山鸟图》、《金英秋禽图》、《四禽图》、《祥龙石图》、《杏花鹦鹉图》诸画，其大体的艺术主旨，在追求一种雍容高雅、无微不至的写生，笔致秀挺温婉，形象俊俏生动，或也有雄健的格调，其笔势纯然一体，散发出一种静穆的墨气。所以上述作品应大都出于赵佶亲笔，当然有的仍存争议。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芙蓉锦鸡图》与《腊梅山禽图》，画上虽有赵佶题诗和签押，谓“宣和殿御制并书”，都为赵佶传世名作。但从画笔风格方面看，似乎与上述真品有异，没有赵佶骨子里那种笔情墨意。同样，《听琴图》与《文会图》中的那些人物与山水竹木，也与上述亲笔有别，实为“御题画”。

《画鉴》还说，宣和时画院画家周怡专“承应摹仿唐画”。就是说画家周怡专门为皇帝描摹唐画，可见一些传为赵佶临摹唐人的作品也是靠不住的。如赵佶的《摹张萱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都不是赵佶真迹。前者笔势冗弱，殊不流畅；后者所画马的四蹄呆滞无神，与赵佶的艺术手法很不相类。

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鉴定概论》中说：“最奇怪的是宋徽宗赵佶的绘画，几乎百分之八九十出自当时画院高手的代笔。他既不是年老力衰，也非疲于应酬他人，因为所有的画幅大都存于宫内为自己欣赏——著名的所谓‘积至千册’的《宣和睿览集》，尽管题上‘御制’、‘御画’、‘御书’，但实际上那些‘御画’没有一幅是亲笔的，自己欺骗自己，真不明白他是一种什么心理，可能是要托以传名后世吧!”

而谢稚柳先生为之辩解道：“有一个推想，这些画绝非‘代御染写’，事实上赵佶的画并没有‘代御染写’之作。那么，这些不提作者名氏的御题画，看来都是‘三舍’学生的创作，或者是每月考试的作品，被赵佶入选了，才在画上为之题字，这已经是显示了皇帝的恩宠。然而，被人说成是‘代御染写’，这是这位善画的皇帝尊严始料所不及的吧!”(《宋徽宗赵佶全集》序)

总之，如今要在所有题有赵佶“御画”的作品中，分别出哪些是赵佶的亲笔画，哪些不是，已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同时，宋徽宗如此自欺欺人的原因，恐怕也很难完全猜透。

《满江红》是岳飞写的吗人们都知道，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词作《满江红》，是南宋民族英雄岳飞的作品。然而近代以来，不断遭到学者的质疑，也有不少学者为之辩解，展开了几轮激烈的争论。由于双方都拿不出过硬的证据，问题依然无法解决。

岳飞这首慷慨激昂、气壮山河的《满江红》，曾激起古今多少能人志士的英雄豪情。认真读来，确令人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十旧山河，朝天阙。

岳飞写此词时，中原人民正遭受着北方少数民族铁骑的践踏和蹂躏。其雄壮激昂的词文，抒发着岳飞对外族侵略者和朝廷投降派的满腔悲愤，表达了岳飞决心驱逐敌寇、收复国土的豪情壮志，更反映出岳飞

忧国忧民、不屈不挠的爱国思绪。这首千古绝唱似乎也浓缩了岳飞一生征战的业绩，其所铸就的文化精神，一直在神州大地上为人们所传颂。

然而从近代开始，此词作者是否为岳飞的问题引发了学术界不断的争议，看来问题确实还颇为棘手。首先提出质疑的是学者余嘉锡，他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指出：这首词最早见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徐阶编的《岳武穆遗文》，它是根据弘治十五年(1502)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岳坟词碑而收入的，赵宽对这首弥足珍贵的词作之源流出处，却无一言提及。在此前也从未见有宋、元时人的记载或题咏跋尾，更不见于岳飞孙子岳珂所编的《金佗粹编·岳王家集》。要知道，岳珂在收集岳飞的遗文时，曾是如此的不遗余力，此集从编定到重刊，经历了三十一年，为何如此长时间内仍没收到此词?为什么此词突然出现在明朝中叶?而且赵宽碑记中提及的岳飞另一首诗《送紫岩张先生北伐》，经明朝人的考证是伪作。所以该词的来历同样可疑，可能是明朝人的伪托之作。

持不同意见的学者指出，岳飞被害时，家存文稿被查封，家人无法妥为保管。此后，秦桧及其余党把持朝政数十年，岳飞的文稿进一步散佚。宋孝宗时，岳飞冤狱虽得平反，但已历数十年的劫难，经岳霖、岳珂两代人的努力，仍然不能收集到岳飞全部的遗文，也是很自然的事。据现有的史料来看，岳霖父子的收集确有遗漏的实证，如《宾退录》中载有岳飞的《题新干萧寺壁》一诗：“雄气堂堂贯斗牛，暂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就不见于《岳王家集》中。后又历经元朝异族的统治，岳飞的声名还是受到压抑，直到明朝才逐渐改观，这一历史事实，造成《满江红》不见于宋、元人著录，而到明代中叶才出现和流传。同时，历史上一些作品湮没多年，历久始彰的情况也不乏其例，如唐末韦庄的《秦妇吟》就被湮没了九百年，但人们并不因此而怀疑其真实性。古代私人一些孤本藏书，往往视为珍宝，不肯轻易宣泄外人，因而某些作品手稿在经历了一段年月后方才出现的情况，也并不稀奇。

著名词学家夏承焘对余氏持赞同意见，并进一步提出，词中的“贺兰山”位于今河套之西的宁夏境内，南宋时属西夏，不属于宋金交战的境域之内。而岳飞伐金是要“直捣黄龙府”。该金国的大本营位于今吉林省境内，与贺兰山几乎是南辕北辙。如果此词真出之岳飞之手，不应方向乖

背如此。此外，“贺兰山”不同于泛称边塞的“玉门”、“天山”之类。其入于史记诗文，唐宋人一般都是实指，明朝中叶也同样如此，不应该只在岳飞此词中是泛指。在明代，北方鞑靼人常取道贺兰山入犯甘州、凉州一带，弘治十一年(1498)，明将王越率军就在此与鞑靼打了个胜仗。因此，“踏破贺兰山缺”在明代中叶实是一句抗战口号，在南宋是决不会有此说法的。这首词出现在明代中叶，正是作者对当时的地理形势和时代意识的反映，所以推测作伪者可能是进士出身的王越或其幕僚。

持不同意见的学者认为，贺兰山应是泛指而非实指，就如词中写“胡虏肉、匈奴血”，而不用“女真肉、金人血”一样，都是文学上惯用的比喻手法。当时，辛弃疾曾将长安比作汴京，陆游也将天山比作中原前线，不能说他们都犯了地理常识方面的错误。而且西夏与北宋向来就有战事，用贺兰山实指敌境也未尝不可。有学者还指出，根据河南浚县的有关县志，查明在王越总督军务，专办西事而率军宁夏之时(1471)的十四年前，即在天顺二年(1458)，就有汤阴庠生王熙书写了《满江红》，并刻石立于岳庙。王越后亲去祭拜岳庙并赋写了《谒岳王祠》七言诗，更是在弘治元年(1488)之后。所以认为王越或其幕僚作伪的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

持支持意见的学者还从词的风格上进行探究，认为《满江红》是如此慷慨激昂，英雄气概横溢，而岳飞的另一首词《小重山》，却是那样的低徊婉转，惆怅失望，两词的格调和风格大相径庭，似非出自一人之手。同时，《满江红》所云“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都是尽人皆知的典故和材料，这是一首有事迹、有心志，但没有阅历的词，一个作伪者还是比较容易写就的。

持不同意见的学者指出，文学史上兼擅两种风格的作家很多，豪放派大师苏轼、辛弃疾诸人，也不乏婉约清丽之作。苏东坡既写过“大江东去”这样雄浑激昂的名篇，也写了一些情调幽怨缠绵的小曲。因此不能断定写了《小重山》的岳飞，就写不出《满江红》。其实《满江红》的一些思想与笔法，在岳飞其他作品中也有反映。如岳飞《五岳祠盟记》中有“蹀血虏廷，尽屠夷种”，与“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如出一辙。上引诗句“不问登坛万户侯”，可说是“三十功名尘与土”的注脚。“雄气堂堂贯斗牛”也与“怒发冲冠”、“壮怀激烈”异词同工。再如岳飞《永州祁阳县大

营驿题记》说“他日扫清胡虏，复归故国，迎两宫还朝，宽天子宵旰之忧”及上引诗句“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都与“待从头，收十旧山河，朝天阙”的内容基本一致。所以《满江红》是岳飞内心真实思想情感的反映，后人不必纠缠于一些琐碎问题。

还有学者对岳飞的履历和词的内容作了详尽考证后，得出该词是岳飞三十足岁时的作品。“三十功名尘与土”是真实的写照，此时，岳飞战功卓著，正成为朝廷新擢升的名将，被任命为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成为朝廷执掌方面大权的大臣。时岳飞置司江州，九月气候适逢秋季，当地多雨。所以词中有“潇潇雨歇”之句。又从九江奉旨入朝谨见，“计其行程，足逾八千里”，又与“八千里路云和月”相合。将要被皇帝召见，“因责任重大，身被殊荣，感动深切，乃作成此壮怀述志的《满江红》词。”从而断定此词作于绍兴三年(1133)秋季九月的九江，是当时岳飞所处境遇的真实感受。

在人们一致肯定这首词的思想价值和历史作用的同时，人们也同时希望这首词的作者还是民族英雄岳飞，但到底其历史事实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和争论。

流放中的《好事近》作者胡铨与高登，同为南宋朝臣，俱怀抗金之志，抗忤奸臣秦桧，都被贬黜流放，放逐中一阕《好事近》，愤慨“豺狼当路”。然而此词究系何人所填?各种说法不一。

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十，记载了这首词创作的背景故事：绍兴八年(1138)，秦桧再相，怂恿高宗与金议和，且不顾主战派官员的反对，遣王正道为计议使，去金修订和盟。十一月，枢密院编修官胡铨舍身抗旨，上书请斩秦桧等主和官员。“疏人，责为昭州盐仓，而改送吏部，与合入差遣，注福州签判”。绍兴十二年，秦桧又喻台臣加论其罪，胡铨再次被除名勒停，编管新州(今广东新兴)。词人张仲宗正寓居三山(今福州)，以一阕《贺新郎·梦绕神州路》为胡壮行，胡到新兴，亦赋词《好事近》：

富贵本无心，何事故乡轻别?空使猿惊鹤怨，误薜萝风月。

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

第三十八章

胡铨(1102～1180)字邦衡，号澹庵，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宣和末金兵南侵，他于江西赣州招募丁壮，保卫乡里。后至临安，建炎间进士及第，为枢密院编修官。这首词抒发了胡铨当时的心绪：他离别故乡，是为了帮助朝廷抵抗金兵，并非为富贵而来。总算进士及第，刚想为国家做点事情，哪知奸臣权贵当道而时机不对，所以“空使猿惊鹤怨”，自己还被流放。很想驾车归去，归故乡或归朝廷，但有豺狼当路，哪里回得去呢?

绍兴十八年(1148)，秦桧的表兄王鈇接任广东经略使，问新州郡守张棣：“赵鼎、李光都远贬海南，胡铨为什么还不过海?”张棣正好得到此词，连忙向朝廷检举，加以“讪谤”、“怨望”诸罪名，胡铨被再移送吉阳军(今海南崖城镇)编管。三年后，秦桧又读到张仲宗那首词，便以他事将其投入大理寺狱，因找不到更多的“罪证”，只将张除去官籍了事。而胡铨一直坚持到秦桧死后，才由海南移往衡州，也就是说他被放逐到海南这样荒僻的地方有八年之久，那是需要怎样坚忍不拔的意志，才能支撑下来。到绍兴三十二年(1162)，孝宗即位，胡铨才又被重新起用，时已入古稀之年，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诸职。

应该说，对照胡铨的政治生活里程，尤其是那二十余年颠沛放逐的经历，他在词中引东汉张纲斥责外戚梁冀“豺狼当路”的典故，痛诋当朝奸臣秦桧，是在情理之中的事。记载此故事的还有《宋名臣言行录·别集》和元人韦居安《梅大硐诗话》等。

然而也有不同的记载，就是这首词还被刊刻在与胡铨同时代人高登的《东溪集》中。这样，就有学者对王明清《挥麈录·后录》的记载表示怀疑：这个记载后面注有“此一段皆邦衡之子澥手为删定”，为什么这件事要由胡铨之子亲为删定呢?尤其是在亲为删定之后，仍是存在错误。如对照《宋史》本传，胡铨上疏后，秦桧是以“狂妄凶悖、鼓众劫持”的罪名，判胡铨编管昭州(今广西乐平)，而并非“责为昭州盐仓”。由于营救者不少，迫于公论，朝廷将其处分改为监广州盐仓。次年，才改签书威

远军(治今福州)签判。这个错误似乎是胡铨之子所不该犯的。

此外，《独醒杂志》载："邦衡在新州，偶有'万古嗟无尽，千生笑有穷'之句，新州守评其诗曰："'无尽"指宰相。'盖张天觉自号无尽居士。'有穷'则古所谓有穷后羿也。于是迁儋耳(海南)。"就是说郡守张棣向朝廷检举胡铨的并不是那首《好事近》，而是另外一首含有"万古嗟无尽，千生笑有穷"之句的词。

事隔几百年之后，清代王鹏运刊刻《东溪词》时，在跋语中提出自己的看法：《宋名臣言行录》说，胡铨贬新州，偶为此词。郡守张棣迎合秦桧之意，奏劾胡铨"怨望"，于是送南海编管，被贬黜流放二十年。"按此词乃《好事近》歇拍，载《东溪集》，盖彦先亦发策忤桧被谪，事衅略同，棣遂牵合为澹庵作。"就是说，高登亦曾上书触犯秦桧，而被贬谪，五十多岁时，死于贬所。其政治生涯与胡铨略同，却要早于胡铨许多年，张棣就将高登这首词牵强为胡铨所作，以作为其奏劾胡铨的依据。

高登(?～1148)字彦先，号东溪，漳州漳浦(今属福建)人。北宋末为太学生，宣和七年(1125)，金军南侵，国家危亡，徽宗禅位于钦宗，他与陈东等太学生上书请诛蔡京等六贼。靖康元年(1126)，京城开封被困，为反对议和及李纲罢相，又与陈东率太学生与军民伏阙上书，后被斥还乡。绍兴二年(1132)廷对，极言时政缺失，无所避忌，授富川县主簿。后诏赴都堂审察，遂上万言疏及《时议》六篇，秦桧恶其讥己。知静江府古县时，拒绝为秦桧的父亲建祠，终得罪秦桧，编管容州(今广西容县)。

有学者认为，同是这首《好事近》，《东溪词》与《澹庵词》略有差异，如《东溪词》中是"空惹猿惊鹤怨"，"囊锥刚强出头来"，"欲命巾车归去，恐豺狼当辙"。这些不同可能是告发胡铨者所加工。此外，该词风格与高登其他词作如《渔家傲》、《多丽》的格调情韵较为相似，尤其是高登崇尚陶诗，"欲命巾车归去"全系从陶渊明《归去来兮》"或命巾车"中脱出。所以王鹏运的推测应该是合乎情理的。

但日前尚无充分的证据说明此词是高登所作，抑或胡铨所作，甚至

张棣奏劾胡铨是否用这首词?也并不十分清楚。

青史不留名《新修南唐书》作者《新修南唐书》在宋元时期的传本往往不署名，《宋史·艺文志》就干脆说“不知作者”。从而使人们产生疑问：此书的作者究竟是谁?学者们经过激烈的辩论，似乎可以肯定作者为陆游，但陆游为什么不署名呢?

南唐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的一个政权，公元937年，李升代吴称帝，建都金陵(今江苏南京)，国号“唐”，史称“南唐”。一度计划北伐，但时机尚不成熟。943年，其子李景继位，是为中主，虽非残暴昏君，却也志大才疏，好大喜功，任用群小，渐趋腐朽。曾灭闽楚，极盛期有今江苏、安徽淮河以南及福建、江西、湖南、湖北部分地区。周世宗南征，战败而割江北地，并奉表称臣。961年，其子李煜继位，是为后主。李煜擅长诗文、音乐、书画，却不懂政治，国力日衰。975年，为北宋所灭。共历三主，凡三十九年。

南唐中主与后主都很有文采，尤其是李后主的词，在文学史上有着特别的地位。人们对于其人的生平及其政治统治的历史还是颇感兴趣，宋代写南唐史事的人不少，如龙衮的《江南野史》十卷，郑文宝的《江表志》三卷、《南唐近事》一卷、陈彭年的《江南别录》一卷等，单着《南唐书》者就有三人。明人毛晋在《汲古阁书跋》中说：“是书乃马令、胡恢、陆游三本。先辈云：马、胡诠次，识力相似，而陆游独遒迈，得史迁家法。今马本盛行，胡本不传，放翁书一十八卷，仅见于盐官胡孝辕秘册函中。”可见胡本早已失传，《南唐书》还剩马令、陆游二种。

陆游所著又称《新修南唐书》，是根据马令《南唐书》及其他相关南唐史书的内容重加修订，删繁补遗，编撰而成的纪传体史书，共十八卷。此书章法严谨，文字简洁，可称南唐史事著述中的佳作。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说：“《新修南唐书》十五卷，宝谟阁待制山阴陆游务观撰，采获诸书，颇有史法。”评价不低。后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二十七》也沿袭此说。

不过，《宋史·艺文志·霸史类》却载：“《南唐书》十五卷，不知作

者。”元人戚光在天历初年作《南唐书音释》，他所看到的《南唐书》也没有署作者之名，他在作了一些考索后说：“惟陆游编取折衷成此书也，游也不署名。”就是说陆游认为此书是“编取折衷”前人的著述而成，所以不署自己的名字。此后，一些学者也时有疑问，但多数人还是信从了南宋陈振孙的说法：陆游为其作者。

近期，又有学者提出《新修南唐书》非陆游所撰。理由约为四方面：一《宋史·艺文志》收录之书甚全，既录了不署名之《南唐书》，也录了各种陆游著作，为何单不录陆游的《南唐书》?宋元间的《新修南唐书》传本多不署作者之名，因此，不能断定该书为陆游所撰。二陆游本人及同时之人，无一提及陆游撰过《新修南唐书》，而且后世作陆游年谱者多家，也无一提到此书，显然是无法将此书与陆游生平联系起来。三《新修南唐书》之叙事、观点及文字多处与陆游著作不符。如与《入蜀记》相比，两书记事详略不同，语言轻重悬殊。所记李家明献诗事，两书措辞各异，一为七言之四句，一为五言之二句。两书对韩熙载等人的评价也不一致。因此，两书为二人所写无疑。四据《新修南唐书》所提及的人名和时代风尚考察，该书应出现在北宋中期，不晚于神宗朝。当时南唐名人之风流逸事为朝野广为传播，与南唐有关之作品也纷纷问世。最后推测可能是胡恢之作，当然这还没有充分理由和直接证据，但非陆游所作是可以肯定的。

此后，有学者进行了反驳，坚持此书的作者是陆游。理由有三：一陈振孙与陆游同为浙江人，生活的年代也前后相接，陈长期游宦于浙东、浙西地区，对陆游的生平非常熟悉，对陆游的著述也相当了解，并十分推崇，说明对其作过深入的研究，所以他说《新修南唐书》为陆游所作，必定有其可靠的依据。二《新修南唐书》卷十三《刘仁赡传论》中，有一段陆游的自叙，其中有南宋孝宗“乾道”、“淳熙”年号，提到本书作者的“先君会稽公”说明是绍兴人，并曾寄寓寿春，提到作者曾于乾道、淳熙年间曾游于蜀，这些都与陆游的籍贯生平相合。这篇文字，可谓此书为陆游所著的铁证。三《新修南唐书》与《入蜀记》，只因体裁不同，而使得行文有详略。至于有关诗句的长短，其实改写后并不失原意。还有个别人物的褒贬，因牵涉人物的不同方面，有褒有贬都是很自然的事。总之，两书无论在叙事、观点和文字方面，不但都不矛盾，甚至还可以互相印证，就是说《入蜀记》可作陆游撰写《新修南唐书》的

旁证。最后，考定陆游自淳熙八年(1181)到十二年，在家赋闲的五年正是撰写《新修南唐书》的时间。

通过上述辩论，应该说肯定《新修南唐书》为陆游所著的观点占有优势。从历代学者对此书的评价中也可窥见一斑，除上述陈振孙、毛晋外，再如元赵世延在《南唐书序》中说："陆游着成此书，最号有法。"《四库总目提要》谓："游书尤简核有法。"清周在浚《南唐书注·凡例》云："陆书发凡起例，简略详略可观，足继迁固。三主名纪，俨然以正统归之，其识较马令超越，可与欧阳公《五代史》相匹，非诸伪史可比也。"

不过这"不署名"而使人"不知作者"的情况，还是让人们有些疑惑：陆游为什么不署名呢?是因为这南唐在历史上不过一偏霸之小国，历年又不太久，由是其《南唐书》多被人视同"伪史"，所以陆游羞于署名。还是元人戚光考索后说的有道理，陆游认为此书是"编取折衷"前人的著述而成，所以不署自己的名字。如《新修南唐书·浮屠传》所载止四十六字，其文盖据马令《南唐书》删润而成，马书所载共四十四字，陆文止增两字。因此，是否可以认为《新修南唐书》是陆游编撰而成的，其中多少成分是取自别人的成果，多少成分是自己的撰写，由于修此书时所参考的书籍大多已佚失，所以这个问题永远是个谜。

《清明上河图》的真迹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为宋代画匠张择端的杰作，是中国绘画史上的瑰宝。然而，自此画问世以来，描摹仿绘者就代不乏人，到底有多少个不同版本，也没人说得清，致使今日存世的《清明上河图》鱼龙混杂，真伪难辨，究竟哪一本是张择端的真迹呢？

画家张择端，字正道，密州诸城(今属山东)人，幼年时在家乡读书，长成游学于京城开封，后学绘画，本工界画，喜欢画"舟车市桥郭径"，传说北宋徽宗时曾供职于翰林图画院。他的《清明上河图》以长卷的形式，生动细腻地描绘了汴京东南城区河道两岸街市的繁华图景，展现了北宋都城的面貌特色及各类市民生活的现实场景。图系绢本，淡墨着色，画幅高约二十五厘米，长约五百二十八厘米，绘人物千余，动物百余，船二十余艘，车轿二十余乘，此外"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

竞驻，珍奇市易”，“八方争凑，水陆成通”，一派繁荣太平景象。图卷真实、全面、细致地描绘了北宋都市生活的各个方面，时代气息浓厚，刻画生动入微，提供了许多文字无法描述的形象资料，对了解和研究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为第一手的重要材料。此图的艺术手法也十分高超，横向的全景式构图，将极其繁复的场景处理得有条不紊，统一和谐，笔法精细谨严，设色清淡典雅，人物生动传神，器物细致逼真。作为举世闻名的风俗画佳作，此图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难以估量，代表着宋代社会风俗画的最高成就。

张择端将这幅歌颂太平盛世的画卷呈现给了皇帝，酷爱书画且擅长丹青的徽宗见画甚喜，他用瘦金体亲笔在画上题写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并钤上了皇帝专门用以鉴赏和收藏艺术品的双龙小印，然后珍藏秘府。

然而靖康之难很快发生，繁华的汴京城转瞬毁于战火，宋代皇家秘府中的名画与全部财宝也一起被金兵掠夺一空，《清明上河图》也沦落到金兵手中。这幅画是否引起金国上层统治者的注意，现已很难说，如《清明易简图》上据说有“金太祖题字”和“金章宗题签”。不过它很快就以普通字画的身价在民间辗转变卖，北宋遗民张着、张公药、郦权、王磵、张世积等人先后得到过此画，赏画思故国，他们分别于画后题咏，留下感人诗篇，张着等还写了记事题跋。

同时有人认为，张择端随着难民的队伍流亡到南方，目睹了国家和民众所遭受的灾难，他的爱国情怀和艺术造诣，经过这段生活的磨炼有了新的升华。来到南宋临安(今杭州)后，决定重新再作此图。当时国破家亡的痛苦，震撼着广大人民的心灵，一切爱国爱乡的人们都对故都难以忘怀。张择端也同样怀念着汴京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缅怀往日的繁盛景象，常觉怆然欲涕。他早年熟悉且描绘过的汴河、街市、宫观、楼阁，再次信笔绘来，一架架桥梁，一艘艘航船，一家家店铺，一群群人物，绮妮的景色更加动人，都市的生活更加繁华。张择端重绘此图，不仅仅它是自己的得意之笔，更由于能在其中寄托深沉的感情。明代画家董其昌《容台文集》中评论道：“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皆南宋时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但也有学者以为，根本不存在张择端南渡后再绘一说。

不过，思念故国，收复失地，是南宋时期爱国主义的主题，《清明上河图》成为了表现这一主题的重要艺术作品。随着人们怀念汴京之情的日益强烈，这幅画的社会意义和精神价值也不断提高，于是有摹本开始出现，摹本所绘，人物愈多，事物愈繁，笔路愈细，价格也不断攀升。总之，南宋以后，描摹仿绘者就代不乏人。

据说，元代时《清明上河图》的真迹曾被重新收入皇宫，但不久就被翰林学士赵孟頫用赝品调包而盗了出来。也有人说，元宫真迹是被一装裱匠用临摹本换了出来，并随即卖给了一位酷爱书画的显官。至正十一年(1351)，江苏泰和人杨准购到此画，曾将此画的流落经过录于图后。明代弘治年间，画落到大理寺卿朱文征手中，常与文人雅士共赏，李祁、吴宽等人落有题跋。正德年间，画为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所得，他在图后二次书写长篇跋文，对画推崇备至，评价极高。到嘉靖年间，画转至兵部尚书陆完的手中，他亦作跋留念。此后为奸臣严嵩搞到，隆庆时，严家被抄。此画再度收入皇宫。传说，一小太监打开内府藏阁的箱子，盗画后正欲逃走，却撞见来人，只好将画藏在御花园的石罅中，不料当晚天降暴雨，接连二日三夜不停，石罅被水淹没。等到雨停水退，小太监再来取时，一代名画已糜烂不可复理。此画真迹遭此灭顶之灾而失传，钱谦益《牧斋初学记》诸书对此事有较详的记载。

也有人认为，此画真迹遭毁是个谎言，实为一个叫冯保的太监从宫中偷走，为掩人耳目便捏造了这个故事。万历六年(1578)，冯保在图后题跋，称自己为“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兼掌御用干事司礼监太监”。以后，此画又被变卖，清乾隆年间，为学者型官员毕沅购得，其弟毕泷也极赞赏，画上钤有兄弟二人的印记。毕沅死后，毕家被抄，此画遂入清宫，收在迎春阁内，乾隆加以题跋，嘉庆也对其珍爱有加。1911年后，末代皇帝溥仪以赏弟弟溥杰为名，盗出宫外。1932年，创建伪满洲国，此画又来到长春的伪皇宫东院图书楼中。1945年，日本战败，伪满皇宫失火遭劫，大批文物失散，包括此画。第二年，解放军攻下长春，收集到伪满失散的珍贵字画十余幅，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此画最后调入北京故宫博物院。可惜，相传徽宗所题五个字画名的御书题签，及皇帝专门用以收藏艺术品的双龙小印，到明朝中叶就已亡佚，今日不复可见。也有学者认为，本来就没有宋徽宗的题签。

上述有关《清明上河图》真迹的流传历史，其实只是许多种说法中的一种。由于摹本与真迹时或难分真伪，所以其流传过程扑朔迷离，众说纷纭，还有许多流传国外者。据有关资料统计，仅清代皇宫所藏摹本就有十二幅，溥仪曾将其中四幅赠给胞弟溥杰。目前国内外公私所藏的《清明上河图》有三十多幅，大陆藏十余幅，台湾藏有九幅，美国藏有五幅，法国藏有四幅，英国和日本各藏有一幅。至于流传到社会上还有多少幅，没有人能弄清楚。究竟哪一本是张择端的真迹?书画界与学术界经过长期探讨，目标已集中在分别收藏于台湾、北京和美国纽约的三本《清明上河图》。

台湾学者刘渊临认为，收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的《清明易简图》，图上有张择端的亲笔题款“翰林画史臣张择端进呈”，因而是“道地的真本”。学者郑振铎、徐邦达认为，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石渠宝笈三编》注录本《清明上河图》，从宋至今的流传经过头绪清楚，有关题跋、印鉴也都历历在目，此画具有浓郁的北宋画风，应是张择端的真迹。而学者董作宾则认为，美国孟义君得自于抗战胜利后之北平的《清明上河图》，有北宋宣和年间的特殊证迹，认为该图是张择端献给皇帝的真迹，定为“元秘府本”，现藏纽约的博物馆。

有学者指出，要鉴别真伪，关键在于搞清《清明上河图》别本产生初始的情况，及其历史流传的脉络，方能还各本以历史本来面目。据有关文献资料分析，《清明上河图》别本最初发现于元代，当时有“秘府本”与“似本”两幅。当时，杨准跋文中称：“图初留秘府，后为官匠装池者以‘似本’易去。”就是上面说到的元代时，装裱匠以临摹本偷换了真迹，这临摹本后称“似本”，实为元代作品，显然是赝品。到了明代，又出现张英公收藏的“稿本”。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续稿》卷一六八《清明上河图别本跋》说到，张择端的“稿本”，“于禁烟光景亦不似”。清明寒食，民俗禁烟，“不似禁烟光景”就是说画得不是清明时节，或许是张择端此画的早期手笔。

先来看台湾的《清明易简图》。沈德潜《清明易简图疏解》记：“张择端清明画图，本有二幅，一在张英公家者，名《上河图》，有张着跋；一留汴京者，无跋，意即《易简图》也。”沈氏明确告之，《清明易简图》是张公英所收藏的“稿本”之外的另一本《清明上河图》。而“秘府

本”真迹如果在明末的灭顶之灾中失传，那么《清明易简图》最多是元代的“似本”，元人苏舜举在元贞元年(1295)首跋《易简图》时，就开宗明义道：“清明易简新图成。”说明它是新近画就的，图中还可见一些元代事物：如元代独有的官方文化机构“奎章阁”，棉纺技术经黄道婆改良后才传到北方的“吴淞细密花布”等。所谓张择端的亲笔题款一事，实是不可信的，主要是“翰林画史”之称，宋画院并无此官称；刘渊临把张择端称为金人，而金朝也无此官称。尤其是其画上还有“金太祖题字”，从时间上就可看出这在作假，所以清乾隆题跋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盖出于庸手妄作。”尤其是整部画的风格，经仔细比较，与宋代画院风格截然不同。所以判断台湾的《清明易简图》基本是赝品，至于是元代作品，还是明代作品，学术界还有争论。

再看北京故宫的《清明上河图》，除了上述题跋、印鉴、画风诸证据外，其画面上却出现了扇子、西瓜、新酒、光身儿童、遮阳草帽等显然是秋天的景色，恰如上述“于禁烟光景亦不似”的特点，那就有可能是“稿本”。此画还不见有宋徽宗瘦金体的签题和他的双龙小印之印记，那么是因为此“稿本”没有呈现给皇帝，还是年代久远，赏玩时时磨坏而在装裱时被裁割了呢?然而也有学者不同意它描绘的是秋景(详后谜)，并认为它就是真迹。指出判断真伪几个关键是：一看城墙画得如何?宋代东京的内城与外城均为土墙，只有北京《宝笈三编》本画的是土墙，其他各本均为砖墙。二看虹桥画得如何?据《东京梦华录》载，此桥是木结构的单孔桥，“其桥无柱，皆以巨木虚架……宛如飞虹”。也只有北京《宝笈三编》本属于这一桥式，其他图本均为大型单孔石拱桥。三看城楼画得如何?北京《宝笈三编》本仅画城楼，并无瓮门，类似东京内城之制；其他图本均有瓮城，不符合东京外城之制。四从绘画风格上看，只有北京《宝笈三编》本符合宋代画院的笔法。以上诸点，可以证明北京《宝笈三编》本就是张择端的真迹，不过这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普遍承认。

关于美国纽约收藏的“元秘府本”，董作宾进行了详尽考释，根据徽宗瘦金体题跋，认定该图是张择端“宣和二年七月”之前进献皇帝的真迹。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它是《清明上河图》的晚期赝品，其题跋与别本往往有些许不同，但也难辨真伪。学者那志良1977年出版的《清明上河图》研究成果，对台湾、北京、美国纽约三个版本进行了认真的比较研

究，最后还是不敢肯定哪个是张择端的真迹。

这件享誉古今中外的传世杰作，可称我国绘画史上的无价之宝。在它问世后的八百多年中，曾被无数收藏家和鉴赏家所赞叹欣赏，也时为艺术家和商人所描摹仿制，更是帝王权贵们搜罗豪夺的对象，它辗转飘零，历经劫难，最后人们却不识庐山真面目。除了其真伪难以辨认考订以外，再如据图后明人李东阳的题跋考证，《清明上河图》的最前面还应有一段远郊山水，但在现存画卷中却阙如。专家们还认为，此画后半部不应该在刚一进入开封城便戛然而止，而应画到金明池才结束。那么，《清明上河图》有没有被后人裁去最前一段，或佚去后半部呢？

《清明上河图》名称的由来《清明上河图》为什么以“清明”命名?历来有不同的解说。一说是描绘汴京开封城清明时节的景象；一说“清明”是汴京的街坊名，图绘汴京清明坊到虹桥汴河西岸的景象；一说“清明”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常用的作为“太平盛世”的称颂之辞。那么，到底作何解呢？

《清明上河图》全图可分三个段落，首先是汴京郊外的景物，薄雾疏林，杨柳新绿，菜园阡陌，茅檐低伏，商队旅人，穿梭往来。中段描绘汴河两岸的繁忙景象，大河上下，货船往返，拱桥飞虹，行人如织，道路之中，商贩云集。后段是市区街景的写真，城楼高耸，酒肆茶坊，店铺稠密，车水马龙，各行各业，生意兴隆。仔细品味，图中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各个神形兼备，极富情趣。整部作品长而不冗，繁而不乱，严密紧凑，一气呵成。尤其是画中“虹桥”一段，那街头市景的热闹气氛扑面而来，观画人恍如身临其境，体验着宋代社会的文化风俗。其技艺备受世人赞赏，令人叹为观止。

北京故宫的《清明上河图》并不见徽宗瘦金体“清明上河图”的题签，所以“清明”一词最早见于金代大定二十六年(1186)张着的题跋，张着引《向氏评论图画记》称，张择端作有《清明上河图》和《西湖争标图》，于是其图名便确定下来。有关“清明”的解释，经过这些年来学者们的争论，大致有三种不同意见。

一说该图描绘的是汴京开封城清明时节的景象，即清明节时汴京的

春天景色。明代李日华《味水轩日记》称，此图宋徽宗曾题诗，诗中有“如在上河春”一句，可见描绘的是初春的汴京。近代郑振铎等人更大张“清明节”说：“时节是清明的时候，也就是春天三月三日。”把具体日子都定了下来。据宋代文献记载，人们在清明时节前后，家家禁断烟火，门上轿上插柳条，然后蜂拥出城扫墓踏青，在郊外亲友相聚，歌舞宴饮，尽情游玩，直至日暮才回城等等。那么，《清明上河图》中有这些内容吗?

有学者指出，该图画面景物的物候表现及有关人物的生活状况，显然与“清明”时节明显不符。画面许多地方显示出中原地区余热未退的初秋时景，而不是春寒料峭的清明时节。如画中某一角绘有摊贩的桌上陈放着切开的西瓜，如是清明时节，河南一带哪来的西瓜?再如图中手执扇子的人物多达十余人，与北国清明时节的春寒气温也明显不符。尤其是画中有一些孩子在大路两旁嬉戏，由于热不可耐而光着身子，非常活泼和自然，如在清明时节，孩子们裸着身子是会冻着的。图某一角的农家短篱内，长着果实像茄子一类的作物，似有秋熟的迹象。赵太丞家门口的垂柳，已经枝叶茂盛，也非初春的杨柳。图中商店林立，各种店铺门前差不多都顾客盈门，颇为热闹；唯独纸马店前门庭冷落，没有什么顾客光顾，看不到清明时分当地上坟祭祖风俗的影子。而临河的一家酒店，在条子旗上写着“新酒”二字，这是告诉人们当时是“中秋”时节。总之，作者如要立意表现“清明节”这个主题，是不会如此处理画面的。

也有学者进行了反驳，指出关于用扇子的节令，开封在清明前后用不着，而中秋时分也基本上不用了。从社会风俗上考察，当时有“博扇子者最多，以夏之迩近也”的情况，就是在清明时节，人们以扇子为赌博之利物，用以推销扇子。再看西瓜，图中的块状物并非西瓜，北宋以前，中原人不熟悉西瓜，也不曾种植西瓜。新酒问题，《东京梦华录》说：“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而画中的几处酒店，只有一处旗子上写“新酒”。况且一年四季均可造酒，所以酒店随时可卖新酒，也可卖陈酒。最明显的是，图中一百七十多棵树木，其中柳树都是细叶嫩芽，其他树木则是光秃秃的，正是清明前后的情景。如中秋前后，所有树木都枝叶繁茂，决不会是光秃秃的样子。图中郊外的路上，两位老者骑着毛驴，头戴风帽，与少数赤膊小孩恰成对比，说明老人尚觉春寒未尽，正是清明时节。总之，从画面景物看，该图所绘并非中秋时节，应是清明

时节，当然不一定非在三月三日。“上河”之“上”，按宋人的习惯。指到或去的意思，“上河”就是到汴河去。清明时节，东京人上河去观赏汴河及两岸风光，“汴渠春望漕舟数十里”，形势非常壮观，是有一定特别意义的。张择端的风俗画选择这个时节，画的题款用这个命名，应该也是独具匠心的。

一说“清明”是汴京的街坊名，即以地名为画名。当时汴京内、外城及郊区，共划分一百三十余坊，而外城东郊区共分三坊，其第一坊就是清明坊。图中所绘是汴京清明坊到虹桥汴河西岸的这一段“上河”的景色，所以就以此街坊名为画名。

持不同意见者认为，现存该画的起点是汴京郊外小道，并非是什么街坊。据《清明上河图记》有关题跋所载，原先那幅有徽宗御笔题签且加盖御玺的真迹，所绘内容幅度很大，系从汴河东水门外十余里的荒郊开始，一直画到城中宫苑，而不止是清明坊到虹桥汴河西岸这点距离。清明坊不过是一个极小的地名，画家此作品是呈献给皇帝的重要礼品，不应选此小地名作为一幅画面如此宏大的作品的名字。还有学者指出，从《东京梦华录》诸书上反映，人们习惯上已多用街巷名来称呼某个地区或某建筑物所在地，而不是用街坊名。这一点张择端应该清楚，所以如用“清明坊”来命名此画，不说东京以外的人不明白其含义，就是东京城内的人也未必都能知晓。更何况此画所绘东京市容究竟属于哪个部位，争论分歧也很大。如有人认为是位于东京新城东水门内外到旧城里东南部，有人认为全是东水门外的虹桥上下一带，也有认为应位于旧城东角子门内外，或笼统认为是汴京城郊的汴河到城内街市。其实不管它反映的东京市容有多逼真，既然是艺术品，就必然有虚实，有夸张。所以称此画面如此恢宏的作品，主要在画某一街坊的说法本身就难以成立。

一说“清明”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常用的作为“太平盛世”的称颂之辞。《诗·大雅·大明》曰：“肆伐大商，会朝清明。”毛传：“不崇朝而天下清明。”《后汉书·班固传》有谓：“固幸得生于清明之世。”可见“清明”本义在于指统治的平顺，往往称颂盛世。张择端初绘此画，于北宋徽宗宣和年间，当时社会虽然危机四伏，处于动乱前夕，但表面上依然歌舞升平，京城繁华，宫廷内外，成颂“清明”。金代鉴赏家所写的跋文中

说："通衢车马正喧阗，柢是宣和第几年，当日翰林呈画本，承平风物正堪传。"其中已点明此画的主题在于表现宋朝的"承平风物"，而"清明"就是"承平"、"太平"的同义词。此画龙点睛之名称，自然也获得徽宗的赞赏。《式古堂书画汇考》记有"图成进入绢熙殿，御笔题签标卷面"。靖康之难后，画家流亡南宋杭州，回首北望，勾起国恨家仇，追慕故都风物，再画《清明上河图》，以寄托自己的爱国之情。

持不同观点者指出，一方面在说张择端此画在歌颂北宋末年的为"太平盛世"、"清明政治"，一方面又说张择端在开封画的那幅《清明上河图》已不复存在，现存北京故宫的那幅图是张氏在遭遇靖康之难后南渡杭州时再画的，两者似乎已不大协调。张择端在宋代留下来的画着中默默无闻，在函院中凭其如此高超之技艺却并无多高的官位，大概是一位不肯苟合封建统治集团上层的人物。尤其在南宋初年，正当抗金派批判蔡京等"六贼"把北宋政治搞得一塌煳涂、从而招致国破家亡之时，一位有爱国心的画家会再把那时的状况当成太平盛世去歌颂吗?当然，张择端是否到杭州，也还无法定论。主要是此画实为北宋东京的社会风俗画或景物画，不是一幅宣扬统治清明的政治宣传画。

《清明上河图》的命名，似乎和它的真迹一样，令人难以琢磨。期待专家们再作深入的研究，以期有新的突破。

第三十九章

“宋四家”中“蔡”氏中国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宋四家“苏、黄、米、蔡”的说法，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发展水平的典型代表。其中前三位苏轼、黄庭坚、米芾自然不存在问题，问题是最后之“蔡”，其指蔡襄还是蔡京，人说不同，历来就有争议。

中国书法发展到宋代，一反唐代的平整森严，而标举优美抒情的书风，讲求书家的散怀舒意，强调书法的风神天姿。书法成为文人寄情达意的形态艺术，书家的精神风韵与文化情趣在其中得到绝好的抒发。宋四家“苏、黄、米、蔡”的书法风格，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诞生，他们也成为宋代文化精神某方面的代表。

苏东坡的书法风格，用笔丰腴跌宕，常能自创新意，得天真烂漫之趣，时凝练端庄，或豪放不羁，或风神萧散。黄庭坚的书法风格，用笔纵横拗崛，努力自成一家，尽奇藏郁拔之能，时气势磅礴，或意趣自然，也姿态多变。米芾的书法风格，用笔俊迈豪放，提倡天真率意，走沉着痛快之路，时癫狂不俗，或风流倜傥，也清旷恬淡。各人书风自成一格，时人后人都推崇备至，列于宋四家之中，向无异议。

惟独列于四家之末的“蔡”，时有争议。一般认为应指蔡襄(1012～1067)，字君谟，兴化军仙游(今属福建)人，天圣进士，历知福州、开封、杭州等地，入为翰林学士，迁三司使，为官有能名，卒谥忠惠。他在书法上可称五代之后卓然为宋朝领先的大家，他力挽狂澜改变了宋初书坛的靡弱风气，可以说是他打开了宋朝书派的主潮。他用笔委婉秀劲，讲究晋唐古意，得法度精神之气，时锋利流畅，或简约含蓄，也清灵拔俗。楷、行、草诸体都可在书法史中占一席之地，如其正楷端庄沉着，行书淳淡婉美，草帖富于变化。总之，功底深厚，技巧全面，精妙得体，自成一格。

欧阳修对其书法曾称赞不已，说：“蔡君谟之书，八分、散隶、正楷、行狎、大小草，众体皆精。”“蔡君谟博学君子也，于书尤称精鉴。”“君谟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欧阳文忠公文集》)。苏轼也

认为，“独蔡君谟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东坡题跋》)。邓肃曾评论道，“观蔡襄之书，如读欧阳修之文，端严而不刻，温厚而不犯，太平之气，郁然见于毫楮间”(《跋蔡忠惠书》)。黄庭坚也说，“苏子美、蔡君谟皆翰墨之豪杰”(《山谷文集》)。《宋史·蔡襄传》曰：“襄工于书，为当时第一，仁宗尤爱之。”曾诏命制诸贵族碑文。可见其书法得到社会的重视及文豪们的赞赏，甚至“为当时第一”，那么，将蔡襄列于“宋四家”之中，应是当之无愧的。

然而，明清以来有学者提出：四家之末的“蔡”原本应指蔡京。如明代孙犷在《书画跋》中说：“宋四大家其蔡是蔡京，今易以君谟，则前后辈倒置。”清代书画鉴赏家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也说：“宋人书例称苏、黄、米、蔡者，谓京也。后人恶其为人，乃斥去之而进君谟书耳。君谟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京笔法姿媚，非君谟可比也。”确实存在先后辈份的问题，苏轼比蔡襄小二十五岁，黄庭坚比蔡襄小三十三岁，米芾比蔡襄小三十九岁，将蔡襄排于其后，真是辈分倒置了，更何况蔡襄又可称是宋朝书法开派之大家。而蔡京比苏轼小十岁，比黄庭坚小两岁，只比米芾大四岁，将蔡京排在最后，这方面问题应不大。清杭世骏《订讹类编续编》就将“苏黄米蔡非蔡襄”，作为人们讹误的一个事例。可见，明清时“蔡京说”颇有市场。

蔡京(1047～1126)，字符长，与蔡襄同乡，熙宁进士，徽宗朝曾四度为相，长达十七年之久，坏事做绝，为“六贼”之首。然而平心而论，蔡京的书法还是有一定成就的，据说徽宗之所以看中蔡京，主要是其书法的魅力。其用笔简捷飘灵，显得自然流畅，无犹豫雕琢之痕，时秀劲潇落，或婉约柔美，也带几分矜持。一般以为书法是人生的艺术，由书而论人，或由人而论书，人品与书品往往相辅相成。然而在蔡京身上，我们却看到人品与书品极不和谐的一幕：其人品是如此阴暗龌龊、狡诈可恶，其书品却常常清秀明快，境界颇妙。可见书法作品有其一定的独立性，不能和人品混为一谈，但中国历史传统却常常因人废书，或以人评书。由此，史料中评述蔡京书法活动的有关资料很少，其留给后人的作品也不多。

不过，我们还是能看到一些有关蔡京书法较为客观的评论。如《宣和书谱·蔡京》评其《十八学士图跋》“深得羲之笔意，自名一家”。元代

陶宗仪《书史会要》曾引当时评论者的话说："其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正书如冠剑大人，议于庙堂之上；行书如贵胄公子，意气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绝古今，鲜有俦匹。"姿媚豪健的蔡京书法，与较含古法的蔡襄书法相比，似乎也更富有新意，更能体现宋代"尚意"的时代情趣。所以安世凤《墨林快事》就认为：蔡京胜过蔡襄，"今知有襄而不知有他蔡，名之有幸不幸若此"。近人《中国书法大观·蔡京的书法艺术》也评价道："蔡京《跋唐玄宗鹡鸰颂》在纵笔方面做得非常成功。平心而论，此幅作品已可追蔡襄了。此跋较其他作品显得圆活，清劲姿媚……可谓已入唐人行书的风范，结字也迫近唐代柳公权，内紧外松，评论员舒展清健，灵运独到，浑然天成。通篇作品能在经意之中表达出一种随意的风流藉蕴，确为不易。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情驰神纵，超逸优游，甚得晋唐人神韵。"

另外，蔡襄书法虽在前期被推为"当时第一"，但自北宋中期书法新貌形成之后，人们对蔡襄的字渐有微词。苏轼在《东坡题跋》中就提到"近岁论君谟书者，颇有异论"，"仆以君谟这当世第一，而论者或不然"。主要是蔡襄的作品有时过于纤弱柔媚，如米芾曰："蔡襄如少年女子，体态妖娆，行步缓慢多饰名花。"(《宝晋英光集·补遗》)黄庭坚也说："君谟书如蔡琰胡笳十八拍，虽清壮顿挫，时有闺房态度。"(《豫章先生遗文》卷十)主要是蔡襄在追求风流韵趣的同时，没有把握好阴柔与阳刚二者之间的尺度，过于阴柔而缺阳刚之气。可见，到北宋中后期，人们对蔡襄书法的评价已不那么一致了。

对此，坚持"蔡襄说"者提出反驳，认为"宋四家"之说，虽然迄今未见于宋人文献，但南宋遗民、元初王存在《跋蔡襄洮河石砚铭》墨迹中称蔡襄书法"笔力疏纵，自为一体，当时位置为四家。窃尝评之，东坡(苏轼)浑灏流转神色最壮，涪翁(黄庭坚)瘦硬通神，襄阳(米芾)纵横变化，然皆须从放笔为佳。若君谟(蔡襄)作，以视拘牵绳尺者，虽亦自纵，而以视三家，则中正不倚矣"。其中已明确提出"四家"之说，且"蔡"是为蔡襄。至于排列次序，近人张伯驹曾在《宋四家书》一文中指出："按次序应是蔡、苏、黄、米，普遍读为苏、黄、米、蔡，以阴阳平上去顺口，遂成习惯。"说明这一排列是因读音上的顺口而形成的，与四大家的年龄辈分高下并无关系。

另外，在书法史上，蔡襄的书法作品以全面著称，楷、行、草诸体都能有所成就，而其许多非行非草的作品，随意纵逸，更具魅力。同时，他还是宋代尚意书风的奠基人，重振了宋初靡弱的书坛。因此，从总体上看，其书法成就显然是要超过蔡京的。而蔡京的作品，与其他诸家比较起来，不免有单薄的感觉，用笔不太周到厚重，尤其是笔法的不丰富，显得不够熟练和老辣，所以米芾说“蔡京不得笔”(《海岳名言》)。蔡京以复古为新，没有强烈的创新意识，艺术品味的局限很大，他所继承的晋唐风范实质上已是被“歪曲”了的晋唐，没有了神韵的洒落，其作品仅是优雅的“桌面小品”罢了。所以蔡京比蔡襄略逊一筹，难以与苏轼、黄庭坚、米芾三人相提并论，在宋四大家排列中，应是蔡襄的地位更牢固。

看来，“蔡襄说”颇有道理，“蔡京说”也非无稽之谈。而从蔡京是个大奸臣，且做了如此多的祸国殃民之事的历史来说，人们从感情上自然要倾向于蔡襄说。不过，如从纯粹艺术上讲，二蔡之争看来很难会有最后的定论。薄命的红颜争妓李师师传说李师师北宋名妓李师师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她不但与亡国君主宋徽宗有过一段浪漫恋情，并且与当时的许多文人墨客、风流雅士关系密切，据说太词人周邦彦还在皇帝与名妓之间插上一脚，使恋情故事演绎得更为有滋有味。历麓史上的李师师真有如此魅力吗?

宋人张端义的笔记《贵耳集》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天，宋徽宗道君皇帝微行到歌妓李师师的家中。刚巧，大词人周邦彦已先到那里，听说皇上驾到，慌忙躲到床底下。徽宗不知情，拿着一只新橙进到房中，得意洋洋地说，此是江南才进贡来的，很是新鲜，便和李师师亲昵地说起私房话。不料其中隐私全被床下的听去，周邦彦后来写了一首词《少年游》影射此事：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

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此后，李师师非常喜欢此词，并在徽宗面前唱起了这首曲子。徽宗听得若有所悟，便问是谁所作?师师答云：“周邦彦词。”徽宗勃然大怒，一拂袖而去。第二天上朝，徽宗对宰相蔡京说：“开封府有个监税官叫周邦彦，听说他负责的税额没有完成，你们怎么不抓他来审办。”蔡京听得莫名其妙，也只得唯唯诺诺地回答：“容臣退朝后招呼开封府尹审办。然后再禀报惩处结果。”蔡京把开封府尹喊来，将皇帝谕旨告之，开封府尹说：“本府周邦彦超额完成了征税定额。”蔡京说：“皇帝要惩办他，只得照办。”于是，以渎职罪名罢黜了周邦彦的官位，并派人押送出京城。

过了几天，徽宗又来李师师家，不见师师，问其家人，知道是去送周邦彦了。徽宗暗暗高兴，总算将此人送走了，但等了很久，李师师才愁眉苦脸地回来。徽宗看着师师那憔悴的样子，生气道：“你刚才到哪里去了?”师师回答：“臣妾万死，知周邦彦得罪，被押出京城，所以去和他道别，不知皇上驾到。”徽宗赶忙问：“有没有作词赠别?”师师说：“有一首《兰陵王》词。”徽宗道：“唱一遍听听。”师师强作笑脸，奉上一杯酒说：“臣妾歌此词为皇上贺寿。”曲终，徽宗听得入迷，赞赏不已，便高兴地下了诏书：复召周邦彦回京，并委任以大晟乐正的官职。

此外，南宋周密的《浩然斋雅谈》、张邦基的《墨庄漫录》及陈鹄的《耆旧续闻》诸书，也都有些相似的记载。只是周密说周邦彦作《少年游》一词得徽宗赏识而得官，自此出名并跻身仕途。上述都属于南宋较有影响的文人笔记，作者熟谙宋代的掌故，因此长期以来该故事总为人们津津乐道，并添油加醋地述说着徽宗与李师师的风流韵事，以及大词人周邦彦也加入其间的这段三角恋情。

据说，李师师是京城一位穷染匠的女儿，本姓王，自幼父母早亡，后为隶属娼籍的李姥收养，才改姓李，艺名师师。经过拜师学艺和悉心调教，师师成长为一名风姿绰约、文才出众、色艺双绝的歌妓。其气质优雅，通晓音律书画，招来许多文人雅士的追捧，遂与汴京名士来往频繁，如她和当时著名文人周邦彦、晁冲之等人都有诗词相赠。宋代是词的全盛时期，词属于音乐文学，它必须通过歌唱才能充分为人们所欣赏，才能广泛传播。唱词，宋代叫做“小唱”，歌妓便是主要从事这种特殊伎艺的。最后，徽宗这位风流皇帝也慕名上门，与之吟诗唱曲，并演绎了一段浪漫恋情。

宋代宫廷有较为严格的制度，言官们对皇帝的私生活也时有规谏，而宋徽宗居然能够经常微服私访歌妓之家，有时甚至彻夜不归。《宋史·曹辅传》说："自政和后，帝多微行，乘小轿子，数内臣导从。置行幸局，局中以帝出日谓之有排当，次日未还，则传旨称疮痍不坐朝。"据说，宋徽宗怕别人发现自己狎妓之事，于是以给禁卫军建造宿舍之名，从宫苑侧门到李家的镇安坊修起一道三里多长的夹墙，使之成为一个皇帝嫖娼的安全保密的信道。这就更让人感到惊讶了，宋代皇帝能做出如此出格的事吗?况且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皇帝嫖妓在当年的东京开封城中早已为一大新闻，徽宗有必要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到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对这段皇帝、词人与名妓的三角风流恋情提出异议。他在《清真先生遗事》一文中指出有三个疑点：一是"徽宗微行始于政和而极于宣和。政和元年先生(周邦彦)已五十六岁"，应该不会再有章台游冶之事了，说他与李师师有私情，并能够在床下呆一晚，这是不合情理的。二是周邦彦当时官至卫尉宗正少卿，品位颇高，不可能兼任开封府监税这样的小官，也不可能发生以"课额不登"为由被罢官并驱逐出京城的事情。三是历史上根本没有大晟乐正这一官职。因此，王国维先生断定《贵耳集》中的故事纯属杜撰，著名词人周邦彦与李师师之间不可能发生什么风流韵事。

周邦彦生于仁宗嘉祐元年(1056)，卒于徽宗宣和三年(1121)，徽宗即位时，他四十五岁。其实，唐宋时官员五十岁以上狎妓者，大有人在，并不稀奇。《贵耳集》也没说他在床下呆了一晚，当然"遂匿床下"之描写本来就有些夸张，不必这么认真。开封府监税的官职，周邦彦是没有担任过，被罢官驱逐出京城也是杜撰，他担任的是国子主簿、秘书监、徽猷阁待制诸职。然而徽宗时，周邦彦确实做过"提举大晟乐府"之职。这和"大晟乐正正"一职应没有什么大的差异。而这个故事的关键问题是：当时周邦彦和宋徽宗能否喜欢同一名妓。宋徽宗比周邦彦小二十六岁，即位时十九岁。这样如在崇宁大观年间一位二十几岁的皇帝与一位五十岁上下的官员，同时喜欢上一位名妓，我们觉得也并不是不可能的。当然，周密的《浩然斋雅谈》说："宣和中，李师师以能歌舞称。时周邦彦为太学生，每游其家。"这种说法失于考证而几近荒唐，宣和初，周邦彦已六十四岁，怎么可能是太学生。此时，他正出知真定府，改顺昌府，次年归居睦州，宣和三年经扬州西上，卒于商丘鸿庆

宫。就是说，宣和中，周邦彦不但年纪老迈，也根本不在京都，不会再与皇帝去为一位名妓争风吃醋。

后又有香港大学罗忼烈先生发表文章《谈李师师》，对其生平作了考证。认为北宋词人张先(字子野)熙宁末年(1077)最早在《师师令》中提及李师师，称当时李师师只有十五六岁。这样算起来，她约比周邦彦小六岁，而比宋徽宗就要大二十岁，所以李师师与周邦彦产生私情是完全可能的，而与宋徽宗之间应该是不会产生什么风流韵事的，或者说这位风流皇帝是不会去“幸”这位“妈妈级”美女的。同时指出，周邦彦的《少年游》为元丰年间初入太学时的少年艳词，和作《兰陵王》一词相隔大约有四十年，而《贵耳集》却把它们凑在一起，可见其牵强附会。

有人注意到，张先的《师师令》中只提到“师师”之名，而未提及此人之姓。这样，或许北宋曾有两个“师师”，一个与周邦彦有私情，另一个与宋徽宗交欢，因为都叫师师，所以后来的文人骚客将两人混为一谈，由是杜撰了一出“忘年”的三角恋情。

不同意张子野《师师令》与徽宗时的李师师有关联的看法，早在清代就已有人提出。吴衡照在《莲子居词话》中说：“张子野《师师令》相传为赠李师师作，按子野熙宁十年，年八十九卒。自子野之卒，距政和、重和、宣和年间又三十余年，是子野不及见师师，何由而为是乎？调名《师师令》，非因李师师也。”就是说《师师令》为流行曲调名，而非为李师师而作，直接否定了张子野《师师令》是赠徽宗时李师师的说法。丁绍仪在《听秋声馆词话》中也说：“子野系仁宗时人，少游(秦观)于哲宗初贬死滕州，均去徽宗时甚远，岂宋有两个师师耶？”秦观、晏几道等人的词咏中也有赠“师师”的作品，秦观卒于哲宗末年(1100)，晏几道虽晚几年去世，但微宗即位时已有七十高龄，其所咏赠的都不应是徽宗时的李师师。其实，由于宋代民俗，歌妓名“师师”者甚多。从上述情况看，可以说在北宋中期至少有一个出名的歌妓“师师”，有别于北宋末徽宗时的李师师。

而徽宗时的李师师，《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记：“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小唱李师师……诚其角者。”《墨庄漫录》卷八说：“政和间，李师师与崔念月二妓，名著一时。”《浩然斋雅谈》又

说：“宣和中，李师师以能歌舞称。”有学者估计，自崇宁迄宣和的二十余年间是李师师活跃歌坛的出名时期，如以崇宁元年师师为十六岁计，到宣和六年她便是三十八岁。而周邦彦从哲宗绍圣四年(1097)至徽宗政和元年(1111)都在京城为官，尤其是政和六年至七年(1116～1117)，正是他提举大晟府之时，李师师既是汴京角妓，其所居镇安坊又和大晟府互为邻近，所以两人的交游完全可能，且由于业务上的需要，周邦彦、晁冲之等官员都可召师师来官府，以了解民间新曲和小唱艺术，或将新词以之试歌，当然也不排除周、晁之辈可径至师师家采风。宋人记述师师与周邦彦的关系虽有传讹的可能，但确有根据，只是在流传过程中给人们添油加醋，则是免不了的。

《宋史》载，“自政和后，帝多微行”，其实政和以前，徽宗也已偶有微服出幸之事。《李师师外传》记徽宗初幸师师家是在大观三年(1109)，这年师师约二十三岁，二幸、三幸在大观四年，四幸于宣和二年(1120)，五幸于宣和四年。这与正史中徽宗“多微行”的描述基本上是吻合的，当然其幸师师家的次数当不止于此。徽宗本是个昏庸荒淫的皇帝，李师师“色艺绝伦”之民间歌妓的特殊风韵，引起徽宗的强烈兴趣，从各方面条件分析，《贵耳集》中描写的皇帝、官员与名妓的三角恋情，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至于它是否是历史事实，则就难说了。今人所作的《宋词通论》，就相信这三角恋情是历史真实的故事，说：“堂堂之尊的宋徽宗，竟不惜迂尊降贵，常微服夜幸其(师师)家，后来因感不便，竟从内宫通了一个潜道到她家里……我们若读了周邦彦的《少年游》……一首清清小调，我们可以想见一个风流自赏的天子和一个浪漫少检的词人，演出一段三角恋爱喜剧的韵事。”

那么，你如何看待这一段浪漫的恋情故事呢?由于徽宗的穷奢极欲，败坏了江山社稷，北宋为金兵所灭，宋徽宗被俘后，北迁至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据说，徽宗这时犹提笔为李师师立传，恐佳人事迹湮没，其痴情若此，你相信吗?

李师师的凄凉归宿李师师是北宋末年冠盖满京华的名妓，她的事迹虽不见于正史纪传，但在笔记野史里却也够热闹的，成为徽宗时期的一个风流人物。那么，北宋亡国后，这位风尘女子的下落如何呢?笔记野史中也众说纷纭，其遭际悲凉透心。

一位名妓与天子搞上关系，其地位之腾起就不言而喻了。《瓮天脞语》载有："山东巨寇宋江，将图归顺，潜入东京访李师师"等语。连水泊梁山的好汉们，为了招安都要找李师师帮忙，可见她当时在东京的风光程度了。加上其风姿绰约、慷慨大度，琴棋书画无一不通，人称"飞将军"。甚至有人说，后来宋徽宗干脆把她召进后宫，册封为瀛国夫人或李明妃。查风流天子徽宗的嫔妃，确要比其他皇帝多，在政和年间就"册妃至六七人"，如政和六年(1116)仅贵妃就有四名，为两名王氏和乔氏、崔氏，其中并不见有"李明妃"。不知是史载有漏，还是后人故意锦上乱添花。不过这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李师师深受宫廷宠信，社会地位日隆，生活条件优裕，且积累有相当私有财产，这在歌妓中是少有的。

然而好景不长。徽宗慑于金兵的淫威，禅位给太子钦宗，自己慌忙南逃，后又躲进太乙宫，号称道君教主，不理天下政务，李师师失去靠山。据《三朝北盟会编》载，靖康初(1126)钦宗为搜括金银财宝以向金人乞和，居然下旨籍没了李师师等"娼优之家"的家产。也有记载说她自知难逃抄家之灾，时值金兵侵扰河北，"乃集前后所赐之钱，呈牒开封府，愿入官，助河北饷"，并自乞为女道士。(《李师师外传》)无论是抄家籍没家产，还是自愿缴纳入官，经过这次浩劫，李师师几乎一贫如洗，地位自然也一落千丈，真所谓从天上落到人间。而随着北宋王朝的灭亡，她更为凄惨的命运还在后面。

《李师师外传》这样描写：金兵攻破北宋都城，烧杀掳掠，无恶不作。金兵主帅还点名索要李师师，声称金国君主也听说了她的名声，一定要得到活人，以进献金主。然而追查了几天，都还没有线索。奸臣张邦昌为讨好金兵，帮助搜寻李师师的踪迹，终于将她献到金营。金营摆出宴席为师师接风，而师师对张邦昌骂道："你们得到高官厚禄，朝廷哪点对不起你们，为什么事事帮敌人来危害国家?我蒙皇帝眷宠，宁愿一死，别无他图。"乃脱下金簪刺喉自杀，没有马上咽气，又折断金簪吞下，才气绝身亡。此结局，李师师不甘凌辱，颇有侠士风度，得到后世通俗小说和一些文人的称道。一些史学家却持有异议，如邓广铭《东京梦华录注》称"一望而知为明季人妄作"。但其描写的历史背景却是真实的。如《靖康纪闻》载：那些被官府搜捕到，并送往金营的各色妇女，对着这些卖国的官吏斥骂道："尔等任朝廷大臣官吏，作坏国家至此，今日却令我辈塞金人意，尔等果何面目!"当然，李师师的这个结局是否真

实，已不可考，但写作这篇传奇小说的作者，至少是在借李师师之死来鞭挞奸臣之罪恶，抒发亡国之感慨。

有人或说，她被金兵俘获后，押解北上，一路上受尽折磨，苦不堪言，容颜憔悴，求死不得，只能嫁给一个病残的老军士为妻，最后凄凉悲惨地死去。清人的《续金瓶梅》等书皆宗其说，这一说法有没有根据呢?汴京失陷后，金人除大肆掳掠外，还乘机要挟，大量索取金银、宫女、乐工，乃至妓女。而开封府官员竟也可耻地追捕宫女、妓女，捕至教坊选择后押送往金营，络绎不绝，哭声遍野，惨不忍闻。《靖康要录》卷十五记：金人“胁帝传旨取……教坊乐工四百人……”又取内人、街巷子弟、女童及权贵戚里家细人……凡千余人，选端丽者。府尹悉捕诸娼于教坊中，以俟采择，里巷为之一空……粉黛盛饰毕，满车送军中。父母夫妻相抱持而哭，观者莫不嘘欷陨涕。”最后，金兵在汴京掠走成千上万名各色俘虏。在这种情况下，金人或会指名追索李师师，官府也会帮助搜索，然而她是否被官府捕着，却很难下结论。许多人认为她应该没有被官府捕着，也未被押往金营。按照一般的逻辑推理，师师在被抄家后，其自身的地位与国家的势态均已非常不妙，这时李师师惟一的出路只有藏匿于民间，大多会随着难民离开京城，从而开始了她历尽艰辛的南方流浪生涯。

中州词人朱敦儒也是逃难到了南方，他曾在一次宴会上听到师师的歌声，激动而感慨地写下了这首《鹧鸪天》：

唱得梨园绝代声，前朝惟有李夫人。

自从惊破霓裳后，楚奏吴歌扇底新。

秦嶂雁，越溪砧，西风北客两飘零。

尊前忽听当时曲，侧帽伫杯泪满巾。

其“李夫人”就是对师师的尊称，同在异乡为异客，“忽听当时曲”，怎不令人“泪满巾”呢。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称，靖康间，李师师与同辈赵元奴诸人，流落到浙江，“士大夫犹邀之以听其歌，然憔悴无复向来之态矣”。宋人评话《宣和遗事》是说，师师南下流落到湖湘，嫁作商人

妇，过起寂寞无闻的日子。宋刘子翚《汴京纪事诗》也有“辇毂繁华事可纷，师师垂老过湖湘。镂金檀板今无色，一曲当年动帝王”的诗句。所以明代梅鼎祚《青泥莲花记》说，“靖康之乱，师师南徙，有人遇之湖湘间，衰老憔悴，无复向时风态。”清人陈忱《水浒后传》记述了师师来到临安(今杭州)，仍操旧业的故事。都沿袭上述说法而来，应该说师师晚年在南方的说法较为合乎情理。

当然，富于传奇色彩的李师师，由于其身世不记于正统史籍之中，而笔记小说中的有关传闻难免有讹传和臆测之处，因此她的晚境究竟是如何度过的，恐怕永远是一个谜了。

李清照改嫁李清照才气横溢、文笔秀婉的女词人李清照，在国土沦丧和丈夫去世的悲痛中，晚年颠沛流离，飘泊于越州(今浙江绍兴)、杭州、台州及金华一带，屡遭打击，“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谢世后还给人们留下一个不可轻易而解的谜：她晚年改嫁张汝舟没有?

第四十章

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十四中存有李清照的一封信《上内翰綦公(崇礼)启》，此信约写于绍兴三年(1133)之后，其述说中断断续续、隐隐约约地讲了这样一段自身的经历：绍兴二年(1132)，这时离丈夫赵明诚去世已有三年，四十九岁的李清照重病在身，孤身一人，境遇颇难。官员张汝舟对她频频致意，以甜言蜜语殷勤通问，清照“信彼如簧之说，惑兹似锦之言”，被骗得分不出东西南北。“既尔苍皇，因成造次”，便与张汝舟结婚。婚后，清照发现两人“视听才分，实难共处”，丈夫时时暴露出的市侩嘴脸，让清照日益觉得此次婚姻是个错误，“忍以桑榆之晚节，配兹驵侩之下才?”尤其是张汝舟开始以暴力虐待，“遂肆侵凌，日加殴击”。在实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正好张汝舟以不正当手段得官的事情有所暴露，清照便甘愿冒坐牢之险而去官府揭发其丈夫。后张汝舟被撤职除名，编管柳州，其婚约也得以解除，但是宋代刑法规定：妻告夫，虽属实，仍需服徒刑二年。当清照被关入监狱，“被桎梏而置对，同凶丑以陈词”之时，翰林学士綦崇礼伸出援助之手，使李清照在被关九天之后得以释放，免受牢狱徒刑之苦。于是，清照以无比感激的心情写下了这封书信，对綦崇礼“感戴鸿恩”，深表谢意。

关于李清照此次改嫁之事，除清照自己在这封书信中有详细告白外，还有七八种当时的宋人著述提及，如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说清照“再适张汝舟，未几反目”，王灼的《碧鸡漫志》也说清照“再嫁某氏，讼而离之”，还有洪适的《隶释》、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等。尤其是著名史学家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都记载了此事，其书在绍兴二年九月戊午朔载：“右承奉郎、监诸军审计司张汝舟属吏，以汝舟妻李氏讼其妄增举数人官也。其后有司当汝舟私罪徒，诏除名，柳州编管。”其继夫张汝舟，字飞卿，早在赵明诚任建康知府之时，就曾携一玉壶来访，此时正以右承奉郎衔在池州为监诸军审计司之职。有学者以为，他娶李清照是看上她还有一些古物宝器诸财产，一旦财产到手，便露出庐山真面目，且对清照加以虐待，以致清照只能以控告手段谋求离异。所谓“妄增举数人官”的罪名，是指犯人因谎报参加科举的次数而得官的不正当手段。宋代对屡试不举的士人给予一种“特奏名”的优待，就

是只要到一定次数和年龄，都可直接参加殿试而授予官职。张汝舟显然在这方面欺骗了朝廷而谋得官位，这一情况正好让李清照掌握。张汝舟在事实面前无言以驳，最后受到编管柳州的重惩，李清照也因此得以与其离异。

然而到明代，有一位叫徐的学者对李清照改嫁一事提出质疑。理由主要是两点：一是绍兴二年，清照已年近五十，似无改嫁的可能。当时国破家亡，作为南逃的官员家属，清照还会有多少财产?说如此市侩之张汝舟会追求如此年纪之李清照，令人不可思议。二是宋代官宦出身的妇女，一般是不允许改嫁的。清照父李格非，工词章，有笔力，熙宁进士，历官太学博士、著作佐郎、礼部员外郎、提点京东刑狱。其夫赵明诚，出身宰相之家，由太学生入仕，历守莱州、淄州，终知江宁府，着有《金石录》。这样官宦家庭出身的李清照不可能改嫁，所以改嫁之事不可信。

清代更有许多学者为李清照改嫁“辩诬”。学者卢见曾根据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真挚坚贞、生死不渝的感情生活，夫妇志趣相投、同研金石的人生佳话，及清照对《金石录》卷轴百般爱护，明诚过世后，她又为《金石录》的出版耿耿于怀、尽心尽力，约在绍兴二十一年(1151)，清照以六七十岁高龄，还表上《金石录》一书于朝廷诸有关事迹，推断改嫁之事不可能发生。清照曾言：“虽处忧患而志不屈”，其他一些词文作品，也都可作相关佐证。卢氏在《雅雨堂本金石录》中这样感叹道：清照曾经丧乱，犹复爱惜丈夫留下的一二不全卷轴，如见故人一般。其眷恋明诚若是，安有一旦相忍背负之理?

学者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辑》从几个方面论述了清照改嫁的不可信。他先采用史家编年的方法排比岁月，从中指责有关著作记载的不可靠，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作者李心传，其所居之地与李清照远隔万里，很可能是误传误听而误载的结果。然后考证了李清照的生平经历，也认为没有改嫁的可能。最后是指出上面清照那封信的可疑之处，如信中记载了改嫁、不和及矛盾加剧的整个过程，由是清照告发张汝舟的罪行，涉讼要求离异，应该是正当的行为，为什么信中后面又称此事为“无根之谤”?且以为“已难逃万世之讥”，更“何以见中朝之士”?以至“清照敢不省过知惭”，把问题说得如此严重呢?再如男婚女嫁为世间常事，朝

廷不需过问，但信中怎么会有“持官文书来辄信”诸语呢?此信前后矛盾，文笔劣下，却又杂有佳语，定是经后人篡改过的本子，信中有关改嫁方面的内容，定是后人恶意添加上去的。居此信的内容分析，应是李清照感谢綦崇礼解救“颁金通敌”一案的信函。这是清照在建炎三年(1129)遭遇的冤案，有人诬蔑她曾把玉壶献给金人，为了洗清罪名，清照追随御舟作了辨明，此案拖续了二年多时间。

近代学者况周颐写文考证了李清照与张汝舟在赵明诚死后的行踪，结论是两人的踪迹各在一方，判然有别，不可能有婚配之事。学者黄墨谷还补充道，綦崇礼与赵明诚有亲戚关系，清照如果真的改嫁，且还因改嫁而涉讼，会好意思向前夫的亲戚求援吗?赵明诚的表甥，綦崇礼的亲家谢圾在《四六谈麈》中引用李清照对赵明诚表示坚贞的祭文，仍称清照为“赵令人李”，难道他对清照改嫁之事会一无所知?清照自传性文章《金石录后序》约作于绍兴五年(1135)，却只字未提自己改嫁之事。清照晚年曾自称“嫠妇”，意即寡妇，若改嫁后又离婚的话，她能这样自称吗?所以清照前面那封书信只有为了感谢綦崇礼解救“颁金通敌”一案而作，那才说得通。写信感激朋友数年前的帮助，也是常有之事。

尽管上述学者提出这么多有价值的理由，现代学者王仲闻、王延悌、黄盛璋等人，还是坚持李清照改嫁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如黄盛璋《李清照事迹考辨》一文中指出，胡仔、洪迈、王灼、晁公武诸人都是李清照同时代人，其著述的性质又都是史书、金石、目录等严肃的东西，胡仔一书写成于湖州，洪迈一书写成于越州，离清照生活之地并非遥远，不至于讹传如此。况且这些著作成书时，清照尚健在，难道这些学者敢于在清照面前明目张胆地造谣中伤，或者伪造那封书信，这是不合情理的。何况，南渡后赵明诚的哥哥存诚、思诚都曾做到不小的官，赵家那时并不是没有权势。而“颁金通敌”案发生于建炎三年，清照那封信写于绍兴三年之后，之间相隔好几年，二事应并不相关。谢伋之所以仍称清照为“赵令人李”，是在看到清照改嫁后仍眷眷于明诚，为完成前夫遗志而不辞辛苦的事实之后，存心避开有关旧事的做法。中国古代妇女守节之风要到明清两代才趋严格，而改嫁在宋代是极为平常之事，有关官员家中妇女改嫁之事史书中时有记载，甚至对皇室宗女都有诏准许改嫁，所以，宋人对李清照改嫁一事是不会大惊小怪的。至于明、清时期有关学者的那些“辩诬”，主要是卫道士们不能接受一代才女没有从一

而终的这段历史“污点”，从而拼命加以掩饰，力图否认她改嫁的事实，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近年又有学者提出“强迫同居”说，认为是张汝舟利用官府司法的力量，强迫李清照同居。过去人们对清照那封书信中“弟既可欺，持官文书来辄信”一句中的“官文书”，错误理解为“告身”、“委任状”之类的证明文件，张汝舟以此来骗取清照的信任。其实，“官文书”在这里应指司法判决书之类文件，清照因“颁金通敌”之谤而被官府问罪，从而成为“犯妇”，按照当时的规定，其出路之一就是沦为官婢而被强卖。张汝舟对李清照这位才女仰慕已久，便用手段搞到有关的官文书批条，并骗取清照的信任，将她据为己有，所以书信中接着说“呻吟未定，强以同归”，终被强迫来到张家。这样，一个孀妇因冤狱被官府错判而为人强占，这类强迫同居的性质与自愿“改嫁嚣的婚姻是两回事。由此，前面反对“改嫁”和肯定“改嫁”二说的观点都不能成立。

此说虽有新意，但能成立吗?有学者以为也不足信。张汝舟作为一名有特权、有地位的官员，有必要用司法判决书之类文件去强迫一个近五十岁的女词人为自己的妻室吗?再者，既然将“犯妇”李清照断给张汝舟有“官文书”，且只是强迫“同居”，就无所谓婚姻关系，那为何后来李清照要涉讼去谋求官府批准离异呢?同时，赵明诚的两个哥哥都为朝廷命官，权势不小，怎能对弟媳如此受辱之事袖手旁观?尤其是官任“内翰承旨”的綦崇礼，也早该在清照被逼为人妇之际出手营救，何必等到清照涉讼要坐牢之时再费力气呢?总之，“同居”一说也经不起推敲。

上述诸说，都能说出一定的理由，然而也有臆测的成分，孰是孰非，谁能判断呢?

陆游与唐琬的爱情悲剧陆游，字务观，号放翁。这位南宋著名文学家和学者，一生创作了近万首诗篇，被誉为南宋诗坛四大家之一，还有散文、史书等作品，其成就卓著。然而，仕途坎坷，屡遭贬黜。其婚姻生活更是不幸，与唐琬的爱情悲剧几乎家喻户晓。其原因何在呢?

陆游约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与温柔多情、能诗会词的唐琬结成夫妻，婚后感情融洽，两人相亲相爱，堪称伉俪相得，生活非常美满。可

是，陆游的母亲却对唐琬百般挑剔，十分不满，没到数月，就逼着陆游与唐琬离婚。据说陆游不忍和唐琬分离，又不敢违背母命，就在外边搞了一所住宅，让唐琬搬去居住，且时时前去幽会。老太太听到风声，前往别宅查究，陆游事先得知，带着唐琬避开了。但这样掩饰下去，总非长久之计，最后陆游只得忍痛与唐琬诀别，自此两人天各一方。不久之后，陆游娶了一位姓王的女子，唐琬也改嫁给一个叫赵士程的士人，日子在淡淡的愁云中荏苒。

几年之后的一天，春光明媚，陆游到沈园游览。沈园在山阴城(今浙江绍兴)东南四里，禹迹寺的南边，是当地的名胜古园。凑巧的是，赵士程、唐琬夫妇也来这里踏春。这对被迫分离的有情人又见面了，可是千言万语从何说起呢?陆游只能陷入痛苦的沉思，在百感交集之后，怅然写下了这首令人心酸的《钗头凤》：

陆游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据说唐琬见词；悲愤不已，回家也和了一首：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倚栏。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妆欢，瞒!瞒!瞒!

唐琬从此郁郁成病，不久便含恨离世了。此和词实为后人伪托，不过也写得情真意切。而陆游在余生之年，始终不能忘却昔日的深情和沈园的最后一面，曾多次赋诗缅怀，直到八十多岁的晚年。陆、唐的悲欢离合，唱出一曲千古流传的爱情悲歌，也给后人留下疑问：一般以为唐琬是陆游舅舅的女儿，或者说唐琬是陆母的侄女，陆游和唐琬是表兄妹关系，那么陆母为什么对自己的侄女如此狠心，要将这对恩爱夫妻活活拆散，竟毁了两个至亲骨肉的幸福呢?这点确实让人难以理喻，这其中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陆游与唐琬的亲戚关系。周密《齐东野语》记载:“陆务观初娶唐氏，闳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侄。”就是说唐琬是唐闳的女儿，和陆母是姑母与侄女的关系，那么唐闳与陆母应是兄妹。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和陈鹄《耆旧续闻》，也都有类似的说法。后世的论着也大多沿袭这一说法，如朱东润的《陆游传》。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对这一传统说法提出质疑，他们查考了《宝庆续会稽志》，发现唐琬的父亲唐闳是山阴(今浙江绍兴)人鸿胪少卿唐翊之子，而陆母则是江陵(今属湖北)人唐介的孙女。两家虽同姓，但两地相隔遥远，并无宗族血亲关系。再查陆游舅舅辈中，有唐仲俊、唐居正诸人，却没有一个叫唐闳的。既然唐闳与陆母没有血亲关系，那陆游与唐琬也不可能是表兄妹了。

不过，宋人有关记载言之凿凿，而且有多人记述此事，虽说野史笔记有采录传闻而不暇考证的毛病，但周密、刘克庄等人毕竟与陆游的生活年代相接，所言总应该有些根据。于是，又有一些学者详细考证了唐琬的家世，排列出唐琬家族的世系表，认为唐琬与陆母之间确有宗族关系，只不过是一种远房的疏族亲戚，或者说两人可称“同谱姑侄”，而非“嫡亲姑侄”。所以，唐琬终究不是陆母的至亲骨肉。

那么，陆母决意逼迫这对恩爱夫妻离异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呢?刘克庄《后村诗话》以为，陆游的父母亲对陆游的管教甚严，期望很高，希望他早日科举及第，入仕为官。而陆游结婚后对学业有所荒废，对政治没有多大兴趣，只是写诗抒情。早几年的科场不利，仍让二老记忆犹新，很是担忧，于是决定拆散他们，由陆母出面，迁怒于唐琬，让陆游屈服，从此一心苦读，以求取功名。总之，是一番苦心，想让儿子成材。

有人不同意上述说法，指出陆游第一次应考失败时是十八岁，如果陆游父母真为儿子的科举仕途着想，为什么在他二十岁时，落第不到二年就急急忙忙给儿子成婚?其实，古人成家与立业一般并不矛盾，结婚后再举科第之事也很平常。绍兴二十四年(1154)，陆游应礼部试，名列前茅，因论恢复，激怒奸臣，被黜落下榜，时年二十九岁，已早与唐琬

离异。所以，陆游的科场失利，和唐琬、婚姻是毫不相干的。

细读陆游的《夏夜舟中闻水鸟声甚哀，若曰“姑恶”，感而作诗》，或可找到此事原委的蛛丝马迹。诗有曰：“所冀妾生男，庶几姑弄孙。此意竟蹉跎，薄命来谗言。”古代称婆婆为“姑”，“姑恶”即影射婆婆可恶，蛮不讲理。诗意谓：婆婆“弄孙”心切，希望儿媳快点“生男”，不意唐琬婚后不育，婆婆“此意竟蹉跎”，又听信谗言，才威逼儿子休了这个不能传宗接代的儿媳。估计，这才是陆游爱情悲剧的主要原因。

也有人不同意上述观点，指出一般要数年才知其能否生育，唐琬进门才数月，就被强迫离异，不应和生育有关。应是唐琬不通世故而礼节不周，惹得陆母心生不满，或者说就是婆媳不和，婆婆看不惯媳妇的为人，强逼儿子休妻。南宋陈鹄《耆旧续闻》卷十直言：放翁先妻内琴瑟甚和，然不当母夫人意，因出之。夫妻之情，实不忍离。这是最早记录这一悲剧的一则史料，那么为什么唐琬不得婆婆欢心呢?人们一般也只能泛泛而说陆家封建礼教严格，容不得豁达开朗的唐琬，所以后改娶端庄婉顺的王氏。其实，清官难断家务事，该悲剧的具体原因恐怕是不会找到确切答案的。

朱淑真的生活时代朱淑真是宋代著名女诗人兼词家，通书画音律，自号幽栖居士，后人辑其诗词三百余首，题名《断肠集》。她和李清照并列为宋代最有影响的才女，可称我国古代女作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但女诗人到底生活在北宋?还是南宋?仰或两宋之交?人们提出各种史料根据进行论证，结论却大相径庭，至今都是悬案。

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平江府通判魏仲恭在路经都城临安(今杭州)时，常听到人们惋惜地谈起一位赍恨以殁的女郎，并交口传诵着她生前的许多诗词作品。魏仲恭觉得这些诗词“清新婉丽，蓄思含情”，并不比花蕊夫人、李清照等前辈女词人的作品逊色，便和一些士人们留意搜访采集，最后竟辑得其遗作三百余首。这位女郎的名字叫朱淑真，其诗词中充溢着一种特有的怨怅之情，表明其人生遭遇的悲剧色彩，魏仲恭就为其作品集起名《断肠集》。其作品集不仅在数量上居于历代女诗人的前列，且以其清空婉约、恬新流丽的风格、温柔真挚、幽怨悱恻的深情打动了无数读者的心。然而，这位才女的生平事迹却湮没不彰，各

种信息语焉不详，显得扑朔迷离，人们众说纷纭。

明代田汝成《西湖志余》说：“与淑真同时有魏夫人，亦能诗。尝置酒邀淑真，令小环队舞，因索诗，以飞雪满群山为韵，淑真醉中援笔赋五绝。”而朱淑真诗作中确有题为《会魏夫人席上命小环妙舞曲终求诗于予，以飞雪满群山为韵作五绝》的五首七绝，把小环队舞描绘得生动可人，栩栩如生。后人称赞道：“不惟词旨艳丽，而舞姿之妙，亦可想见也。”许多人认为，向朱淑真索诗的魏夫人是曾布之妻，一位颇有诗名的妇人。曾布即“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弟弟，生于仁宗景祐三年(1036)，神宗时官翰林学士、兼三司使，助王安石变法，死于大观元年(1107)。考魏夫人约生于仁宗康定元年(1040)，卒于徽宗崇宁二年(1103)。朱淑真如与曾布的妻子为诗友，则应是北宋时人。再如明、清时的沈际飞、况周颐等学者都断定朱淑真为北宋人，其生卒年要略早于李清照。

然而有学者指出，朱淑真在《夜留依绿亭》诗中写道：“水鸟栖烟夜不喧，风传宫漏到湖边。”这皇宫边上的“湖”，应指临安(今杭州)的西湖。诗中描写的生活环境，多处出现南宋临安的影子，如“坠翠遗珠满帝城”、“沉沉春雨暗皇州”、“天街平贴净无尘”之类的句子。杭州自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起，成为南宋政权的行都。上述诗句或可证明：朱淑真是生活在南宋的都城临安，而不是北宋的杭州。如果说朱淑真与魏夫人是忘年诗友，以两人悬隔三十岁推算，朱也当生于神宗熙宁年间，到南宋定都临安，已是七八十岁的老妪了。这显然不符合《夜留依绿亭》诸诗作者的年龄。这段时间，朱淑真还有《元夜三首》诸作品，描写元夜与情人相会，在歌声和鼓乐中，两情无猜的情形。可见是一位妙龄少女。所以上述“魏夫人”不应是曾布之妻，而是另一位魏姓的贵妇而已。除此之外，并不存在任何能表明朱淑真曾在北宋时代生活过的证据。

明人田艺蘅的《纪略》则说朱淑真是朱熹的侄女，朱熹生于建炎四年(1130)，卒于庆元六年(1200)，那么朱淑真应是南宋中叶人。然而朱熹是江西婺源人，晚年迁居福建建阳考亭；而朱淑真一说是海宁人，一说是钱塘下里人，家居杭州涌金门内如意桥北的宝康巷，朱淑真就出生在这里。总之，朱熹是江西人，朱淑真是浙江人，虽说都姓朱，但两地相隔遥远，又如何会是叔侄关系呢？朱熹《晦庵说诗》言：“本朝妇人能

词者，唯李易安、魏夫人二人而已。”说明谙熟浙中掌故的朱熹，并不知道作了如此多诗词的“朱淑真”其人，何谈是其侄女。也说明朱淑真的出名，远在李清照之后，到南宋中叶仍没有多少诗名。有学者还指出，朱淑真的一些作品中，有明显受李清照影响的痕迹。如她的《得家嫂书》咏；“添得情怀无是处，非干病酒与悲愁。”与李清照的《凤凰台上忆吹箫》中“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变”的名句如出一辙。

清代文学家王士祯，自述曾亲睹朱淑真所作《璇玑图记》，其文末有“绍定三年春二月望后三日，钱唐幽栖居士朱氏淑真书”的落款。绍定三年为公元1230年，果如其言，那么朱淑真就该是南宋晚期时人了。有学者还指出，朱淑真的名句“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是化用南宋爱国诗人郑思肖的诗句“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而来，郑思肖是宋末元初人，那朱淑真也应是宋末元初时人了。然而现存最早的有关朱淑真的文献资料，是魏仲恭在淳熙九年(1182)所作的《断肠集序》，其中明确指出：诗词集的作者朱淑真已经过世。所以，有学者指出，《璇玑图记》遗墨问题，很有可能是发现者在年代上产生误记的结果。而“宁可抱香枝上老”的诗句，实是被郑思肖化用在自己的诗中。然而王渔洋《池北偶谈》却又认为“绍定三年”或是“绍圣三年”之误，两个年号相差一百三十多年，这样又把朱淑真硬拉回到北宋，真让人有点不知所属。

上述各执一词的说法，其时间跨度前后竟相差有二三百年之多，实际都经不起仔细推敲。现代研究者往往取调和的办法，将这位女诗人的生卒年系于北、南两宋之交。不过，下述南宋中叶说，逐渐取得多数人的共识。

有学者指出，魏仲恭的《断肠集序》，作为最早的相关文献，所包含的信息应最有可信度。其中说到：“比往武林(即杭州)，见旅邸中好事者往往诵朱淑真词……其死也，不能葬骨于地下，如青冢之可吊，并其诗为父母一火焚之，今所传者百不一存……予是以叹息之不足，援笔而书之，聊以慰其芳魂于九泉寂寞之滨，未为不遇也。如其叙述始末，自有临安王唐佐为之传。姑书其大概为别引云。”所说王唐佐的传记早已不存，但这篇序文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淳熙九年时，朱淑真已经离开人间。其中所谓“芳魂”，应表明她死时还年轻。她死后，父母尚在，且将

那些断肠诗稿都付之一炬，也说明朱的享年不长。而从《断肠集》来看，其中也确实没有一首作品涉及中年生活的内容。

同时，从宋人为逝者作传、编诗文集的惯例来看，一般距离死者下世的时间不会太远。再从“旅邸中好事者往往诵朱淑真词”而言，也说明此人过世时间不长，其悲悯的一生必有牵动人心的地方，以致人们在来往中还记得她，将她作为一个话题，诵读她的作品。如果去世时间已很长的话，恐怕人们会将她淡忘。此外，同里的文人还愿意为她作传，而王唐佐的传记由魏仲恭在《断肠集序》中“书其大概为别引”，也说明其流播的时间还不长。加上搜集其遗作本身需费一定的时日，估计魏序作于朱淑真卒后的三四年至十年之间，也就是说朱淑真约卒于乾道八年(1172)至淳熙五年(1178)。

接着的问题是，朱淑真大约在多大年纪时辞世的?明代周源清考证说，朱淑真死时才二十二岁芳龄。然而从人们搜集到她三百余首诗词，且还是“百不一存”的情况而言，恐怕如此年轻是难以完成的。她皈依佛门后自号幽栖居士，如才二十出头一点的年龄恐怕还不会有如此心境。尤其是她还写过关注民生疾苦的诗篇《苦热闻田夫语有感》：

日轮推火烧长空，正是六月三伏中。

旱云万迭赤不雨，地裂河枯尘起风。

农忧田亩死禾黍，车水救田无暂处。

日长饥渴喉咙焦，汗血勤劳谁与语?

播插耕耘功已足，尚愁秋晚无成熟。

云霓不至空自忙，恨不抬头向天哭。

寄语豪家轻薄儿，纶巾羽扇将何为!

田中青稻半黄藁，安坐高堂知不知?

诗中对在三伏苦热天用水车抗旱的农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对安坐

堂上摇扇消闲的豪家纨绔发出了不平的斥责，可以想象，如没有一定的生活经历和社会认知，一个大家闺秀绝对写不出如此有深度的诗作。可以肯定，朱淑真不可能在二十岁刚出头的年纪完成这首诗。有学者提出，朱淑真可能在人间度过大约三十个春秋。如此说较为合情理的话，那么，她应生于绍兴十三年至十九年(1143～1149)。

那么，这最后的南宋中期说能经得起岁月的推敲吗?应还需更为确凿的证据。

朱淑真婚姻生活朱淑真凭着她灵秀的才情在文学史上脱颖而出，留下清丽的芳名。遗憾的是，她在二三十岁的青春年华就香消玉殒。从其诗词作品中或可看出，她是在极度神伤肠断中郁郁而终的，出身大家闺秀的朱淑真到底是何原因导致精神崩溃的呢？

朱淑真的诗词中充溢着一种幽愤怨怅：如“逢春触处须萦恨，对景无时不断肠”；“梨花细雨黄昏后，不是愁人也断肠”；“肌骨大都无一把，何堪更驾许多愁”；“哭损双眸断尽肠，怕黄昏后到昏黄”；“自是断肠听不得，非干吹出断肠声”。沈雄《古今词话》引《女红志余》描写朱淑真“每到春时，下帏趺坐，人询之，则云‘我不忍见春光也’。”也怕听秋雨，因为“点点声声总断肠”!……为什么女诗人如此神伤肠断呢？

南宋淳熙九年(1182)，魏仲恭在《断肠集序》中这样述说：朱淑真“早岁不幸，父母失审，不能择伉俪，乃嫁为市井民家妻，一生抑郁不得志，故诗中多有忧愁怨恨之语”。这一解释给予后来的小说家发挥极度想像力的创作空间。

明代周清源在他的《西湖二集》中如此彩描这段故事：朱淑真出身于一个杭州的小户人家，然而她却从小“聪明伶俐、生性警敏，十岁以外自喜读书写字”，才气横溢，无师自通，加上天生丽质，很快就成为当地有名的才女，成为公子哥慕名追求的对象。悲剧就发生在朱淑真的婚姻问题上，其舅父吴少江好赌博输了钱，借了金三老官的二十两银子，却又无力偿还。为了顶债，就劝妹妹把朱淑真嫁给金三老官的儿子，吹嘘金家富贵，过门后就不愁吃穿了。朱淑真父母没有认真考虑和调查，就同意了这门婚事。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摆布下，朱淑真只有顺从地

嫁到金家。哪知金家儿子外号“金罕货”，又叫“金怪物”，长得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从此，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朱淑真只有暗自啼哭，默默流泪了。其父母亲就是这样断送了如花似玉的女儿的终身。

周清源的描述虽说有声有色，但终不过是小说家之言罢了，应该说是缺乏根据的。

王渔洋《池北偶谈》指出，朱淑真出身于官宦门第，家大业大。况周颐《蕙风词话》也认为，朱淑真是大家闺秀。据称，她父亲在浙西做过地方官，还特别喜欢收藏字画古玩。而从她诗词作品中的描述中，可见其家中建有“东园”、“西园”、“西楼”、“水阁”、“桂堂”、“绿亭”等供休憩娱乐的场所，俨然是个大户人家。家境也颇为殷实，她所喜欢的东西，往往能不惜重金以购置。从她的作品中，也可以窥见其婚前天真闲适的情态，对生活充满了极大的乐趣。请看她当时游家中“东园”的诗：

红点苔痕绿满枝，举杯和泪送春归。仓庚有意留残景，杜宇无情亦晚晖。

蝶趁落花盘地舞，燕随柳絮入帘飞。醉中曾记题诗处，临水人家半掩扉。

其游“西园”时，更为欢愉：

闲步西园里，春风明媚天。蝶疑庄叟梦，絮忆谢娘联。

踏草翠茵软，看花红锦鲜。徘徊林影下，欲去又依然。

还有《夏日游水阁》、《纳凉桂堂》、《夜留依绿亭》等诗，都反映出这一时期她所过的优哉游哉的家园生活。她在《春园小宴》中说得最为青春爽朗：“穷日追欢欢不足，恨无为计锁斜晖。”在这样的家境条件下，朱淑真的学习环境自然也较为优越，自小聪明伶俐的她，就在这书香门第中接受了文学的熏陶，如在她的作品中，会发现其所吸取的苏东坡诗词中的一些营养，加上她天生的诗人悟性，她很早就开始作诗填词。在与家族的聚会盛宴中，在与朋友的游山玩水中，都能一逞才思。从心中流出一首首笔触细腻的小诗，这甚至成了她的一种生活习惯，所

以青少年时期就已写下了大量的诗篇。此外，她还工书法，擅丹青，识琴谱，解音律，俨然是闺秀淑媛的典范。

问题还是出在结婚之后，关于其丈夫，留下的记载实在寥寥，连姓名都无从查考。不过决非上述描绘的长相丑八怪的市井平民，而是一位读书士人。可能是南宋州学的“外舍生”，曾数次科举落第，后来便留在朱家东轩书房中借读。她作有《送人赴礼部试》一诗，鼓励丈夫发愤图强，不要由于应试失败而气馁，要学东汉马援六十二岁仍能率师出征，老当益壮，力争再试成功。可以想见，她此时对丈夫寄予的一片深情和厚望。

可能她丈夫始终没能在科场上取得佳绩，不过通过某种办法，也终于获得了一官半职。由于官职卑微，所以《断肠集序》有“嫁为市井民家妻”的误说。此后，朱淑真一度随丈夫游宦吴、越、楚、荆诸地。其间所作诗词，不见有对各地名胜古迹的游览吟咏，常有度日如年之感觉，表达出异乎寻常的思家之情，最终出现“巧妻常伴拙夫眠”的哀叹，说明两人已产生感情裂痕。雪上加霜的是，丈夫在此时竟然寻花问柳，公然讨起了小妾，甚至明显冷落了原配之妻。朱淑真再也抑制不住满腔的怨愤，其《愁怀》道：

鸥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

东君不与花为主，何以休生连理枝!

另一首说得也同样清晰：

荷叶与荷花，红绿两相配。鸳鸯自有群，鸥鹭莫入队。

对于这位在青少年时期如此热爱生活，且又“才容冠一时”“罕有比者”的大家闺秀来说，追求幸福的未来已不止是理想，而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信念。然而，婚后的生活发展到这样的结局，不啻是当头一棒。旧日美妙的梦想已成泡影，过去曾有的感情也荡然无存，婚姻如此快的走向死亡，让朱淑真猝不及防。问题是：朱淑真在这一家庭情变中是如何应对的?

有学者认为，朱淑真赌气回到娘家，和丈夫断了音信而独守空房。其《菩萨蛮》叹道：“山亭水榭秋方半，凤帏寂寞无人伴。”对丈夫还是时时在苦苦思念，如《恨春》中说：“春光正好多风雨，恩爱方深奈别离”也很想写几封书信去表白和规劝，其《初夏》这样说：“待封一掬伤心泪，寄与南楼薄幸人。”但其丈夫就是不回心转意，甚至连一点慰藉之语都没有，就是说受到丈夫的遗弃，终令朱淑真愁断肝肠，恨断肝肠!一病不起，含恨而逝。

也有学者认为，按朱淑真的性格，要爱就爱得轰轰烈烈，不爱就干脆毅然决绝。是她主动提出夫妇离异，并断定她回到临安娘家之日，便是夫妻断绝往来的起始，从此两人分道扬镳。朱淑真虽主动摆脱了婚姻的桎梏，但她的身份毕竟是一名“弃妇”，在封建礼教和传统偏见的双重压迫下，其处境是不难想像的。这一时期的哀音怨歌，在《断肠集》中俯十皆是。为了解脱苦闷，朱淑真尝试皈依佛门，以“幽栖居士”为别号。

如果朱淑真仅是在以泪洗面或斋房拜佛中度过余生，那她只是一名可怜可悯的弱女子，她的作品也不会引起我们太大的震动。难能可贵的是，她不甘心屈服，她还年轻，爱情的火焰还没有熄灭，她不惜用生命的力量，向礼教作了勇敢的抗争。具体来说，就是又发起一段“牵情于才子”的恋爱故事。

一次西湖春日的诗会中，朱淑真邂逅了一位风流倜傥的青年诗人，顿时萌生了好感，两人作诗唱酬，创建了友情，此后常常互送诗笺，孤灯相思。第二年的元宵节灯会，他们又相会在一起，互相倾吐了情愫。朱淑真的诗作《元夜》，记录了这销魂的时刻：

火树银花触目红，揭天鼓吹闹春风。

新欢入手愁忙里，旧事惊心忆梦中。

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常任月朦胧。

赏灯那得工夫醉，未必明年此会同。

此诗记载了朱淑真当时复杂的感受：有意外的欣喜，也有沉痛的经验，有真情的陶醉，也有清醒的展望。自此以后，两人的约会和吟笺渐少，从春至秋，现实越来越明显告之：这段恋情是不会有收获了。到下一年的元宵夜，没有灯火，没有笙歌，在黑夜中只有女诗人在流泪抽泣。朱淑真可能就死在此后不久，从《断肠集序》所谓“不能葬骨于地下”及“九泉寂寞之滨”诸语的暗示来看，她可能是投水自尽的，她用生命向黑暗的现实提出了最后的控诉。父母将她的诗作付之一炬，看来是遵从她遗嘱的要求所为。这一悲剧，与《红楼梦》黛玉焚稿相似，是这位薄命才女对人世间的彻底绝望和彻底决裂。大宋的礼仪与习俗书画家米芾行为特异北宋大书画家米芾，行为举止相当特异，有许多与众不同的怪癖和嗜好。人们因此猜测他可能是西域少数民族的后裔，有学者还进行了详尽的论证。然而其中还是推测成分为主，没有多少确凿的证据。那么米芾为什么如此怪异?实在让人费解。

第四十一章

米芾书法米芾(1051～1107)，初名黻，字符章。以母亲曾侍奉宣仁后旧恩而补官，历知诸县、军。宋徽宗时被召为书画学博士，官至礼部员外郎。诗文奇险，不蹈袭前人轨迹，王安石尝摘其诗句书扇上，苏轼亦喜誉之。尤擅长书法、绘画，是北宋著名书法家、画家及鉴赏家。他的行、草书用笔俊迈豪放，“沉着飞翥，得王献之笔意”，为书法史上“宋四家”之一。画山水人物，虽师法董源，然别出新着，多以水墨点染，重意趣不求工细，天真发露，开创横点积叠的写意画法，人称“米点山水”或“米氏云山”。又精于赏评鉴别，好收藏金石古器与名家书画，尤嗜奇石，撰著有《山林集》一百卷已散佚，另有《书史》、《画史》、《砚史》、《宝晋英光集》、《宝章侍访录》等。

米芾杰出的艺术成就及其在文化史上的地位，无须赘论。然而此人举止怪异，与常人往往不同，世称“米颠”。如《宋史》本传谓他：“冠服效唐人，风神米芾萧散，音吐清畅，所至人聚观之。而好洁成癖，至不与人同巾器。所为谲异，时有可传笑者。无为州治有巨石，状奇丑，芾见大喜曰：‘此足以当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为兄。”别号也多：鹿门居士、襄阳漫士、海岳外史、淮阳外史、火正后人、鬻熊后人，人还称“米南宫”、“米襄阳”、“米海岳”等，可见与一般的中原人有别，那是什么原因呢?

查蔡肇《故宋礼部员外郎米海岳先生墓志铭》及邓椿《画继》等宋代文献，米芾家族世居太原(今属山西)，后迁往襄阳(今属湖北)，最后定居润州丹徒(今江苏镇江)。宋初勋臣米信是他的五世祖。元初所修《宋史》本传，因米芾长期生活在润州，故称他为“吴人”。那么，米芾是中原汉族人吗?有人根据种种迹象，提出米芾可能是西域少数民族，但终因缺乏其祖籍的有关资料而证据不足，从而未得大多数人的认可。

1988年，罗绍文《米芾为西域人后裔考》一文，重新详尽考证了这一问题，提出十方面的理由：

一是唐中叶以前中原没有米姓。以后偶有米姓者，如米嘉荣、米

和、米都知、米遂等，皆西域胡人，不入姓谱。自汉至唐的各种姓氏书中都没有米姓。直到宋代郑樵的《通志·姓氏略》和邓名世父子的《古今姓氏书辨正》中才出现米姓，其云：“西域有米国，后人以国为姓。”所以中原地区的米姓人都系西域米国胡人的后裔。《姓氏略》以为楚国之后有米姓，其他辞书也加以引用，这是由于对米芾印记的误解所造成的错误。米芾有“楚国米芾元章”印记，及号“鬻熊后人”，鬻熊为楚国先祖，故《姓氏略》说：“宋米芾，以米为楚国后。”其实，这不过是米芾在楚国旧都襄阳等地居留过而已。

二是“众香国”问题。明毛子晋辑《海岳志林》载，米芾临死前遍请郡僚，举佛示众说：“众香国中来，众香国中去。”掷佛，合掌而逝。所谓众香国，就是西域崇佛之国名。

三是“火正后人”之印。米芾有图章百余枚，其中有一方为“火正后人芾印”。这是米芾对其本人及先人所信宗教——火祆教的揭示，包括米国在内的昭武九姓，在唐初皆信奉火祆教，米芾借汉民族的火官名“火正”来比喻他是信祀火神的后人。宋代时期，西域的火祆教早已被伊斯兰教所取代，米芾此举是对故乡及其宗教的怀念。

四是米芾非同寻常的洁癖。任太常博士时，朝靴偶被他人所持，屡洗以致损坏；祭服上的藻火章饰因经常洗涤而磨损，为此还遭到贬黜。常戴高檐帽，坐轿为顶盖所碍，他宁愿撤去轿顶，也不愿将帽交给从人持拿，以致其轿撤去顶盖，米芾露帽而坐。米芾洗手，以银为斗，置有长柄，仆人执以泻水于手，已而两手相拍至干，不用巾拭。有关事例不胜枚举，应是火祆教徒和米国的传统习惯。

五是重复书写《天马赋》。米芾的小楷，贵重而不肯多写，然而却多次书写《天马赋》，至少重复四本以上。原因就是天马出自西域大宛，米国与大宛毗邻，米芾见物思乡。

六是葬亲礼俗的迥异。《海岳志林》载，米芾葬其亲属于润州山间，不聚土为坟，也不立墓碑。据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旅行记》中谈到，火祆教徒的墓地也是“平坦的墓穴”。《通典》引《西番记》说：“收骸骨埋殡，无棺廓。”与米芾葬亲礼俗相类。

七是米芾“冠服效唐人”。唐人衣冠的特点就是仿效胡服，或者说宋时的米芾仍着胡服，以致“人聚观之”，以为稀奇。其实，唐服对宋初的人们并不生疏，而人们稀奇的可能是米芾的相貌。《魏书》、《北史》曾记西域人的特点是“深目、高鼻、多髯”。而明王圻辑《三才图会》中的米芾画像确也是深目、高鼻、多髯。

八是米国人“诡诈不情”的精神，在米芾身上的体现。米芾酷嗜书画，凡见名书古画，总要以多种招数巧取，攫为已有。如《清波杂志》载，米芾曾以投江坠船相要挟，从蔡攸手中换得王羲之字帖。或借人古画临拓，完毕之后，同时以真、赝本归之，使其自择而莫辨，米芾就以这种办法巧取了许多古画。据说这与米国善商贾的传统教育精神有关。

九是米芾的图章与名号。汉人往往以祖籍地望为号，而米芾以他所有居留过的地方为名号，数量又多，实际上否认了他是中原任何一个地方之人。

十是米芾先人迁入中原的大致轮廓。《文献通考·经籍考》载，米芾“其上世皆武官，盖国初勋臣米信之后也。”据米芾三世孙米宪曾录《米氏谱》，似乎只有从米信起的八代谱系，米信之前已不清楚。可以推断，米国人东迁定居中原地区，一部分是随沙陀突厥东来，一部分就是唐王朝请来的沙陀勤王军的“武官”。这是公元883年至947年的事，米芾的祖上就是在这时迁往中原。

上述分析确实颇为周详，但许多地方仍不免只是猜测，且得之于文人道听途说的笔记。尤其是一些艺术家的怪癖性格，也把它与数百年前的西域国风俗联系起来，恐怕有些牵强。其中第一条理由最为重要，中国姓氏往往来源多头，而米姓是否在中唐以前完全不见，此后只来自西域的米国移民。看来，要下这个结论，还得做更深入的考证。

布衣能手毕昇沈括毕昇是中国古代活字印刷术的创始人。由于有关的历史记载太少，所以毕昇的身份始终没有搞清。他到底是刻字工人，还是锻工，或者是读书人，乃至书商，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对其活字是何物制成，学者也有争论。

沈括《梦溪笔谈》中有两处分别提到毕昇和毕昇，其一是卷十八

载："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是说毕昇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用胶泥刻成一个个"薄如钱唇"的活单字，用火烧硬，然后用一块铁板，上面敷上松脂、腊和纸灰，再放一个铁框，把活单字按要求一个个排进去，密布满铁框后，放在火上加热，使松脂和腊熔化，同时用一板压平活字，冷却后，铁框中的活字变得坚固而平整，即可上油墨印刷了。印刷完毕，也可再用火使脂腊熔化，活字便从铁板上脱落，按音韵装在专用木格中，以备下次使用。

其二是卷二十载："祥符中，方士王捷本黥卒，尝以罪配沙门岛，能作黄金，有老锻工毕昇曾在禁中为捷锻金。"是说毕昇是个熟练的冶金能手，曾在宫廷中为方士锻金，其方法是先造好炉灶，使人隔着墙鼓风，因为不想让人看到炉子的启闭和锻造运作。炼好的金，初从炉子中出来时，颜色尚黑，凡百余两为一饼，每饼可辐解为八片，称作"鸦嘴金"者即是，当时人就有收藏此金者。

上述一人是印刷高手，一人是冶金能手。两人生活的年代略有差距，一个在庆历年间(1041～1048)，一个在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两人的名字也有一些微小的差别，一个升字有日字头，一个升字没有。那么两人有什么关系吗?

有学者认为他们俩是一人，身份是布衣，职业是锻工。如王国维、胡适等。冯汉庸在《毕昇活字胶泥为六一泥考》中还提出更为详尽的考证，他否定了毕昇用粘土制活字的流行说法，认为用粘土制成的活字，再经火烧加硬，便成了陶活字或瓷活字，瓷的吸水率近于零，陶的吸水率仅百分之二十，都是不能着油墨印刷的。而炼丹时封炉鼎用的"六一泥"，是由七种矿物研细活合后再入醋搅拌而成的泥状物，此种泥用火烧硬后，可以着油墨印刷。而作为锻工的毕昇，曾和方士一起炼丹和冶金，掌握了"六一泥"的制作方法及其特性，才将它采用到活字印刷方面。所以，印刷高手的毕昇，也曾经是个锻工和冶金能手。

有学者不同意上述观点，运用多种旁证材料证明以泥土铸成的字是能够印书的。《梦溪笔谈》记毕昇在印书过程中，遇到"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其泥字瞬息即可烧成，用的又是温度很低的草火，估计并未将胶泥字烧成陶字或瓷字，只烧成瓦字，其吸

水率较高，可以着油墨印刷。叶德辉《书林清话》中介绍自己藏有毕昇活字版印成的《韦苏州集》十卷，书中“字厕时若啮缺”，说明应是瓦字印成的，因为瓦字不够坚固，造成笔画时有断缺。元朝农学家王祯自着自印的《农书》，就是用了工匠制造的三万余个陶活字(《造活字印书法》)。就是在朝鲜、日本，用陶活字印书之记载也不乏其例。此外，历史上学毕昇造活字印书的事迹中，我们还时可见有瓷活字的记载，其印刷质量也非常清晰。如清代印《周易说略》和《蒿庵闲话》两书，所用磁字称“泰山磁版”。因此，泥活字无论烧成瓦字、陶字、瓷字，都能印刷，且印得很好。所以，毕昇不是锻工，也没有为道家方士做助手炼丹，自然不知道什么“六一泥”的制作。

也有学者从其他有关方面推断，他们完全是两个人。首先，古代“升”和“升”是同音异字，而古代人名用字，一般不会通假。治学严谨的沈括，不可能将一人的名字写成两个字。其次，从时间上看，大中祥符和庆历相差二三十年，在大中祥符年间已经“老”了的锻工，说他在二三十年后居然发明了活字印刷，似乎也可能性不大。再次，从地域上看，锻工毕昇在宫禁中和方士冶金，那是在汴京开封；而造活字的毕昇是在沈括的家乡，印刷业发达的杭州。一南一北，相隔几千里，也很难是一个人。所以刘国钧、胡道静、徐仲涛等学者，都认为毕昇就是一位刻字工人，这种说法还颇为流行。

也有学者认为，活字印刷术从铸造单字、铁板排检到加固印刷，有一套完整的方法。尤其是先要铸造出数以万计的单字，其中哪些字应各造多少，然后采用当时较为先进的“音韵分类排检法”按规律编排起来，其中的工作操作起来是非常复杂的，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是不能胜任的。同时，其工作量不小，需要雇用工匠，甚至花费数年的时间进行试验和改进，如从木活字到泥活字的改进过程定有不少困难，它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也是难以办到的。如元代王祯为印《农书》，单用工匠制活字就花费了两年时间。清代瞿金生使用了十五个人力，经三十年才造出十几万泥活字。宋朝的工匠地位低贱，一般很少读书识字，不具备相当的文化素质；同时收入微薄，生活艰难，不拥有一定的经济财力，所以一般刻字工人是难以完成这项艰巨工作的。

那么，是否可以假定刻字工人毕昇是在出版商人的支持下创造了这

项技术的呢?可能性也不大，因为如果真是如此，其发明成果必然会冠以出版商的名字，有关印刷器材也必然归主人所有。而《梦溪笔谈》最后说：“升死，其印为余群从所得，至今保藏。”由此，从发明、试验和使用活字印刷术所必须具备的文化素质、资金财力及技术助手等方面的条件分析，毕昇决非是一般工匠，而应该是有殷实家底和热心图书出版事业，并有一帮“群从”的实力人物，可能就是书商。《梦溪笔谈》说毕昇是“布衣”，泛指平民，有可能是颇具文化素养的读书人，有可能是未入仕途的乡绅，有可能是民间的文化出版商人。

总之，种种说法其实都拿不出确切可靠的证据，而只能作一些猜想罢了。

最早的石刻地图《禹迹图》

现存中国最早的石刻地图之一——宋代的《禹迹图》，现存有相同的两方，分别收藏于陕西省博物馆和镇江博物馆。李约瑟称此图为“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是宋代制图学家的一项最大成就”。然而它的创制者却已湮没，学者有所推测，但拿不出过硬的证据。

宋代绘制的《禹迹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地图之一。现存两方基本相同的石刻《禹迹图》，一在古城长安，即今陕西西安，保存在陕西博物馆的碑林中，此图约制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至哲宗绍圣元年(1094)之间，刻石于南宋时伪齐阜昌七年(1136)，其背面还刻有《华夷图》。一在古城润州，即今江苏镇江，藏于镇江博物馆内，此图制于北宋元符三年(1100)，“依长安本刊”，刻石于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华夷图》相传为宋辽人根据唐代贾耽《海内华夷图》缩小十倍的制图，而《禹迹图》内容是根据《海内华夷图》中心《禹贡》九州部分缩制，因而称《禹迹图》。其比较着重水系的表示，海岸线、黄河、长江及其主要支流画得较为准确，也最为醒目，颇接近今天的地图。

此石刻地图长宽各一米左右，图中采用计里画方的绘制方法，就是将石面地图分成等份的方格，横方七十，竖方七十三，总共五千一百一十方，是目前看到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画有方格的地图。上面再画以水系、海岸，标上山川、州郡的名称。标名的州郡区划有三百八十多个，

标名的河流近八十条，标名的山脉有七十多座，还有湖泊五个。其图布满方格，是带有一定数学基础的全国性地图，表示中国古代的地理绘图已达相当水准。英国的中国科技史权威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一书中，称此图为“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是宋代制图学家的一项最大成就。”

以镇江的图碑为实例，其高约九十五厘米，宽约九十厘米，厚有十一厘米，上方写有：“禹迹图，每方折地百里，禹贡山川名，古今州郡名，古今山水地名，元符三年正月依长安本刊。”左下角记：“绍兴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左迪功郎充镇江府府学教授俞篪重校立石，冯遂镌。”原立文庙墙上，作为府学教学用图。元、明、清数百年中历尽劫难，曾被掩埋，曾遭兵火，总算得以保存了下来，此图为研究中国地图学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然而其行政区划的体例存在较大弊病，就是图中古今地名交错，保留有部分的唐代地名，甚至有更早时期的地名，如夜郎、珍州、儋州等，但主要为宋代或者说当代地名，混乱的是当代地名下不注古地名，古地名下也不注当代地名，没有一处是互相对照的，使人们颇费猜测：它到底算古代地图，还是宋时的当代地图?

其图中没有标明作者为谁，宋代有关的史籍中也没有明确记载，使得后世学术界对该图的绘制者产生多种推测。有学者推测其制图者可能是北宋初年的乐史，他是当时宋代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的作者，该书有二百卷，取材广博，考寻精密，内容丰富，足见乐史在地理知识方面的学涵功底。不过他只绘制过《掌上华夷图》，疑为唐代贾耽《海内华夷图》之简缩本，这可能与西安《禹迹图》同一石刻背面的《华夷图》有一定关系，而与《禹迹图》是否有直接的关系?由于制作时间要相差百年左右，还是提不出多少有力的证据。

有学者认为，绘制者是北宋名著《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沈括曾长期从事地理学和地图绘制的工作，熙宁九年(1076)，他在三司使任内曾奉敕编绘《天下州县图》，或称《守令图》，于元祐二年(1087)完成，进献朝廷。此图共包括“大图一轴，高一丈二尺，广一丈；小图一轴，诸路图一十八轴。”(《长兴集》卷十八)而《禹迹图》很可能就是其

中的“小图一轴”。另外，元丰三年(1080)时，沈括在陕西任延州知州，也很可能就是这时他在长安绘制了《禹迹图》。晚年，沈括回镇江定居时，又将长安《禹迹图》的副本交给府学保存。于是，镇江府学根据此“长安本”再次绘制刻石，这就是《禹迹图》在长安和镇江有相同的两方石刻的由来。似乎其证据非常有道理。

但很快就有学者提出反驳，理由有六条。一是图的名称不同，沈括奉敕绘制的是《天下州县图》，或称《守令图》，其他还画过《熙宁使虏图抄》及相关的地形模型图，从没有与《禹迹图》相关的记载。二是图的比例不同，沈括的《守令图》其比例是“二寸折百里”，而《禹迹图》则“每方折百里”，缩小了一倍。三是图的内容不同，《守令图》标录“天下州、府、军、监、县、镇”的所有名称，内容详实；而《禹迹图》只标州、郡名称，没有县、镇名称，其实连州郡名称也遗漏不少。四是图的体例不同，《守令图》是以熙宁五年(1072)之前全国分为一十八路时的政区体例和地名为准；上已指出《禹迹图》体例混乱，如将其少量的古地名略去不计，看成宋时的当代地图，其依然没有一定的标准，地名的取舍在时间尺度上还是相当混乱。五是图的绘制水平不同，《守令图》十分精细，图分二十四至，以天干地支命名；而《禹迹图》则仅有分格，并未用干支卦名标明行格次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四川荣县发现的绘制于北宋末年的《九域守令图》，几乎全部包括了北宋末年所辖的府、州、军、监和县，应比较接近沈括所绘制的《守令图》，其州县的相对位置，山东半岛、杭州湾、雷州半岛的海岸线，都要比《禹迹图》准确得多。六是沈括知延州时，忙于官府公务与西夏战事，几乎无暇制图立石，也并未到过长安，后来战事失利，沈括被罢官而编管随州。晚年虽在镇江，但镇江《禹迹图》并非“依沈括原本刊”，而是“依长安本刊”。总之，找不到沈括绘制《禹迹图》的直接证据。

那么，这幅《禹迹图》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呢?还是无法回答。

最早的纸币北宋钞版北宋钞版作为中国最早纸币的印板，当然也是世界最早纸币的印板，有人将其看作中国货币文化宝库中的镇国之宝。但是由于版面图案文字与宋代有关记载不符，学者们猜不出它到底是宋代的何种纸币。更令人疑惑的是，现只存拓片，而实物已不知去向。那么它果真是宋代纸币的印板吗?

宋代出现了纸币，它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人们往往颇感自豪，以为宋代的商品经济和相关文化已经发展到如何的高度。其实不必太过于沾沾自喜，因为宋代的纸币发行实在处于一种相当混乱的低级阶段，不但种类繁多，有交子(官交子、私交子)、钱引、会子、关子、小钞、关外银会子等，而且各地有别，如分四川交子、陕西交子、四川钱引、陕西钱引、淮南交子、湖北会子、四川会子等，让人眼花缭乱，难以理清。发行时，虽说有“界”，有限额，然而一旦国事需要，官府便会滥印而导致市价大跌，国家常以这种令钱币大幅度贬值的手段对人民进行疯狂掠夺。

有关中国货币史的著作，大都会存有一张宋代纸币印板的拓片照片，此印板俗称钞版，或被看作中国货币文化宝库中的镇国之宝。钞版拓片呈长方形，长约十七厘米，宽约十厘米。上半部顶端是两排圆形的钱币图形，每排五枚，一共十枚。下面竖立七行文字：“除四川外，许于诸路州县公私从便主管，并同见钱七百七十陌流转行使。”下半部为木屋人物图画，好像在一个仓库中，有三个人在搬运一大袋一大袋的货物。钞版无纸币的名称，且只有一个版面，不知是否还应有另一版面?所以它在宋代究竟属于哪种纸币的印板?长期以来，中外历史学家、钱币学家，尤其是货币史学家都一直在试图寻找正确的答案。

宋代钞版约出现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可能很快流入日本。1937年，日本人奥平昌宏在《东亚钱志》上撰文，认为钞版是南宋的“会子”。1942年，中国钱币学家王荫嘉在《泉币》第九期上发表文章，认为钞版是北宋的“交子”。然而“交子”主要在四川行使，而此钞版上却有“除四川外”的文字，可见一般不应是四川交子。不过学者们大都开始认定它应是北宋时的纸币。1950年代，彭信威《中国货币史》认为它是“官交子或钱引”。1960年代再版时，又改为“钱引”，“可能是崇观年间四川以外各路所行的钱引”。到1980年代，千家驹、郭彦岗的《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解》把它称为“北宋的官交子或钱引”。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认为是“北宋的钱引”。其实，北宋末的钱引主要是替代四川交子的新纸币，虽然发行范围有所扩展，但四川依然为其行使地区。

1983年，刘成仁《略论两宋商业的高涨繁荣》和叶世昌《钱引乎?小钞乎?》两文，分别提出此钞版应是北宋崇宁五年(1106)朝廷为收回当

时钱而发行的“小钞”的印板。叶世昌详尽论证了有关理由：小钞是北宋末年发行的四川以外地区流通的全国性纸币。所谓“同见钱七百七十陌流转行使”，按宋代以七十七文为百的省陌制度，这是一张面值一贯的小钞。发行小钞是官府临时性的措施，没有正式的纸币名称，所以印版上没有名称。文章引举了宋人《浮沚集》、《续资治通鉴长编十补》诸史籍的有关史料加以论证，似乎颇有说服力，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吴筹中、吴中亚《两宋钞版新探》也认为是北宋小钞，指出朝廷发行小钞收回铜钱，而四川不用铜钱，所以有“除四川外”字样。并对钞版的名称、面值、图案、文字等作了辨析，认定是真品，是中国货币文化宝库中的明珠。

南宋后期人谢采伯《密斋笔记》载：“崇宁五年敕节文：小钞，知通监造，书押、印造、样号、年限、条禁，并依川钱(引)法……大观二年第一料，其样与今会子略同：上段印‘准伪造钞已成流三千里，已行用者处斩。至庚寅九月更不用’；中段印泉山；下段平写‘一贯省文’，守悴姓押子(字)……而大观小钞民以为便者，造之有限而换之有信也。”这段史料记载的小钞版面与上述钞版文字图案完全不同。问题是这“大观二年第一料”是首次发行小钞，还是此前崇宁五年已发行了一界?如果有二界小钞，那么其文字图式是否一样?这些问题，没有史籍资料可以做出满意的解说。不过我们以为，即使承认有二界小钞，只相隔二年所发行的同一种纸币，其版面文字图案不应差别如此之大。

次年，乔晓金、卫月望撰文《宋代钞币“官交子”、“会子”质疑》认为，北宋版钞应与私交子或私钱引接近，而不应是官府发行的官交子或官钱引。因为它缺少封建官府典章文物的严肃性，丝毫没有官造文书的气息，更不是小钞。并指出北宋版钞发表时，未谈出土地点与流传经过，皆属来历不明之物。所以它是否为真品，是值得讨论的。质疑发表后，引起美国、加拿大，以及台湾等地学者的响应，纷纷对其真实性提出怀疑。其中，怀疑它是私交子的说法也是基本不能成立的，私交子主要流行于四川地区，且钞版上“许于诸路州县公私从便主管”之语，也应是官府的口吻，私交子不可能有这样的权能。

不过，对这块钞版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确是很有道理的。此钞版今已失踪不见，或说其流往日本，或说其不知去向。那么，制造这块钞版

的材料是否为宋代之物?这块钞版到底是如何流传下来的?这块钞版如今又在哪里?这些问题难以解决，又何谈其他呢?

汪圣铎《两宋货币史》指出：此印板肯定不是四川交子或钱引的印板，因为拓片文字标明它不在四川行使。如果假定它是宋代纸币印板，它只能是四川以外的钱引或小钞的印板。但疑点重重：一、来历不明，它不是出土文物，究竟是怎样流传下来的不见记载。二、它的图形文字过于粗糙，文字歪歪扭扭，特别是将它与同时期的印刷品比较，更感到它不像官方纸币印板。三、拓片文字也有可疑之处，如“公私从便主管”、“流转行使”这样的话，不但不通，也似不见于同时期的其他文献。四、无法见到原物，无法考察其质地、外观等。所以，尽管比较而言，讲它是小钞印板更近于合理，但是要证明这一点，还缺乏有力的证据。

传世哥窑瓷器窑址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哥窑”，其传世的数十件作品可说价值连城，为北京、上海、台湾的博物馆所收藏，它在中国陶瓷史上可说是辉煌过一时。然而，其产地在哪里，如今却无人知晓。

在我国数千年的陶瓷发展史上，宋代陶瓷兴盛繁华，占有光辉灿烂的一页。宋代陶瓷，历来有“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之称。其中除定窑外，其他四座均属官窑。所谓“官窑”，即为适应宫廷皇家贵族的特殊需要而进行生产，由朝廷直接控制的官办瓷窑。其瓷器的造型、釉色、装饰，主要根据朝廷有关专家设计的样式进行生产，在工艺上要求精益求精，不惜工本，工匠也是挑选民间最为优秀者。其产品完美典雅，质地优良，制作精细，专供宫廷享用，只准收藏于宫中，严禁流散民间。其工艺技术也对民间绝对保密，甚或其产地也是秘密的，决不允许民间模仿和推广，同时宫廷需要时就兴盛，不需要时就废弃，生产范围很小，延续烧造的时间一般也较短，于是更增添了其皇家器物的高贵神秘性。

哥窑瓷器是宋代官窑也是中国古代瓷器中一种很有特色的品种，它以器身满布大小开片为主要特征。其作品胎厚釉润，制作规整，造型素雅古朴，庄重不俗，具有高超的艺术魅力，颇合宋代崇尚典雅的时风。釉色主要有灰青、浅青、米黄等。大小开片，大呈深褐色，小呈米黄色，两种纹片纵横交织，颇有奇趣，被人冠之以“金丝铁钱”和“文武片”等

美称。是传供宫禁内苑、帝王之家鉴赏把玩的高级艺术品，深受上层社会的喜爱，于是获得极好的声誉。后世竭力加以仿制，所仿者确也难辨真赝。近世为古陶瓷爱好者所追捧，古董商常常不惜高价收购这种格调高雅的精美瓷器，研究者也对它倍加关注。

哥窑瓷器的真品，主要就靠在皇宫中世代相传而保存下来。宫中历代御用的官窑瓷器，流散民间者极少，如有关考古和墓葬发掘中还从来没有发现过，即使在外边见到一二，也是由宫中偷偷流传出去的。然而到近世动乱之时，开始有所流失。现今留传于世的哥窑瓷器并不多，按照粗略的估计，大约有数十件，分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和台湾故宫博物院，少部分流落至国外。

然而，宋代哥窑的烧窑遗址诸问题，迄今还尚未完全搞清楚，专家们对于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成为中国陶瓷史上引人注目的悬案。

先从文献记载上进行一些分析。关于哥窑，宋代的有关史籍中只字未提，可见这类官窑在当时对社会上是保密的，一般文人基本不知道。记载最早的恐怕是元末至正二十三年(1363)刊刻的《至正直记》，其在“窑器不足珍”一节里说：“乙未冬在杭州市哥哥洞窑者一香鼎，质细虽新，其色莹润如旧造，识者犹疑之。会荆溪王德翁亦云：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不可不细辨也。”就是作者于至正十五年(1355)，在杭州买了一件“哥哥窑”烧制的鼎，瓷质虽然很新，但其釉色莹润很像旧货。说明“哥哥窑”于元末仍在烧制瓷器，有的制作精良，“绝类古官窑”。不知此“哥哥窑”是否即宋代“哥窑”。

明初宣德年间，《宣德鼎彝谱》有云：“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这是说明代国家内库收藏有“哥窑”之瓷器。同时，曹昭在《格古要论》中考证古瓷器时说：“旧哥哥窑出……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今亦少有。成群队者，是元末新烧，土脉粗躁，色亦不好。”此段文字说明哥窑有新旧之分，元来所烧成群成队的批量瓷器称新哥窑，质地不太好。《至正直记》所载亦为元末之器。可见“哥哥窑”延烧年月还相当长，从宋代一直到元末或明初。

百余年后编撰的《浙江通志》中讲述了这样一个传说：在处州(今浙

江龙泉)县南七十里的琉华山，山下有个叫琉田的地方，居民多以陶为业。“相传旧有章生一、二兄弟，二人未详何时人，至琉田窑烧青器，粹美冠绝当世，兄日哥窑，弟日生二窑”。书中注明此事得自传闻，不知其兄弟为何时人。到了明代后期嘉靖末年刊刻的《七修类稿续编》进一步说：“哥窑与龙泉窑皆出处州龙泉县，南宋时有章生一、章生二各主一窑，生一所陶者为哥窑，以兄故也。生二所陶者为龙泉，以地名也。其色皆青。浓淡不一。其足皆铁色，亦浓淡不一。旧闻紫足，今少见焉。惟土脉细薄，釉色纯粹者最贵。”这样就把章氏兄弟肯定为南宋时人，有关哥窑、龙泉窑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此后人们对哥窑、弟窑故事的进一步演绎，大都来源于此。那么，这哥窑是否在宋代著名产青瓷的龙泉窑附近呢?

值得注意的是，《格古要论》中，哥窑与龙泉窑是分为两条来描述的，文中没有提到两窑有什么关系，只是说哥窑有新旧之分。刊刻于明嘉靖年间的陆蓉《菽园杂记》，对龙泉窑记录得比较详尽，诸如其地理分布、原料出处、制作工艺、装窑方法，直到烧窑工序，都有相当细致的描绘，是研究龙泉窑的重要参考书，然而它对于“哥窑”却只字未提及。由是，人们对于南宋时章氏兄弟于处州各主一窑的故事，产生了一定的疑问。

1956年至1961年，浙江省文管会对龙泉窑和哥窑诸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和大规模的发掘。除大批烧制白胎青瓷的龙泉窑遗址外，人们还发掘了烧制黑胎青瓷的大窑、溪口等五处窑址，这些黑胎青瓷窑烧制的器物，与文献记载“章生一”哥窑主烧的瓷器所具备的特征较相吻合，证明这就是文献所记载的“哥窑”。然而问题是现今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所收藏的传世哥窑瓷器，如三足鼎、鱼耳炉、胆式瓶等一批典型的南宋器物，却在所有窑址中均未发现。而它与上述龙泉“哥窑”的黑胎青瓷有较大区别：传世哥窑瓷器胎厚釉薄，胎色不一，有沉香色、浅白色、杏黄色、深灰色等；龙泉哥窑瓷器却胎薄釉厚，以墨胎为主。前者釉不透明，润泽如酥；后者釉为透明，有玻璃光泽感……不同处很多，不赘列举。

这样，问题又紧随其后来了，到底是哪一种瓷器为正统的哥窑作品?对于龙泉的黑胎青瓷，目前有两种看法：一种意见认为黑胎青瓷就

是古代文献中所说的正统的哥窑产品，它与文献记载的特点相吻合，科研工作者在化验了诸种瓷器的标本后，结论是：“龙泉黑胎青瓷可能就是正统的哥窑这种说法是有相当根据的”；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龙泉的黑胎青瓷不是正统哥窑，而是仿官窑的作品，由于哥窑、弟窑故事本身值得怀疑，所以其文献材料也是不可靠的。《格古要论》在谈官窑时提到：“有黑土者谓之乌泥窑，伪者皆龙泉所烧者，无纹路。”另外，其器物造型与杭州官窑有不少共有的式样，所以，龙泉的黑胎青瓷是仿官窑的作品。部分科研工作者在化验了黑胎青瓷标本后，也同意其仿官窑的说法。这样，有关文献记载的“哥窑”其实不是真正的哥窑，而只是龙泉窑。

科研工作者在化验了诸种瓷器的标本后认为，“传世宋哥窑不在龙泉烧造之说是可以接受的”。那么这些传世哥窑瓷器的产地在哪里呢?许多人认为它在江西，有人指出传世宋哥窑在好多方面和景德镇的同类作品比较接近，所以很可能是宋以后景德镇所烧制的。有人指出景德镇明代仿官、仿哥成风，这类仿制品流传下来的很多，且许多都仿制得相当成功，可以假乱真，所以传世哥窑作品很可能是景德镇仿烧的伪品。也有人以为，景德镇能够仿制哥窑，说明哥窑不在景德镇。还有人认为在江西的吉安永和窑，也就是宋代的吉州窑，《格古要论》中提到，此地还有一个碎器窑。两窑明代都仿烧过哥窑，也仿制的相当逼真，而碎器窑的可能性更大。

此外，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成书于万历十九年(1591)，在谈到“官窑”时说：“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窑在凤凰山下……哥窑烧于私家，取土俱在此地。”从后两句分析，似乎哥窑的烧制地点在杭州。高濂此说不知何本?

也有学者指出，这数十件传世哥窑作品，有各式瓶、炉、洗、盘、罐等，论胎有薄厚，胎色也不一，胎质又有瓷胎和砂胎之分。釉色也有粉青、月白、油灰、青黄等。从时间上讲，也应有出产早晚之别，如上述所谓旧哥窑、新哥窑。那么其产地也恐并非只有一个地方的瓷窑。总之，情况是相当复杂的，人们的各种猜测也只能是猜测而已。

宋代“不举子”风俗“不举子”即生子不育现象，古代社会一般发生在极少数极端贫困的家庭之中，或发生在自然灾害和战争动乱的民不聊生时

期。而宋代却演变成一种社会风俗，并盛行于社会秩序相对安定、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地区。它与中国历来多子多福的思想文化传统完全相悖，那么宋代东南地区出现这一风俗的原因何在呢？

苏轼在《与朱鄂州书一首》中说：荆湖北路(今湖北一带)，“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东坡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县)，见“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东坡志林》)。朱熹父亲朱松《韦斋集·戒杀子文》说，在江西婺源，民“多止育两子，过是不问男女，生辄投水盆中杀之。”福建一带杀溺幼婴的风俗最盛，朱松在福建为官，“闻闽人不喜多子。以杀为常……虽有法而不能胜。”陈渊《默堂先生文集·策问》也说：“不举子之习，惟闽中为甚。”王得臣《麈史·风俗》谓，在一般情况下，“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以器贮水，才产即溺之，谓之洗儿。”据《道山清话》载，宋神宗、哲宗时的宰执大臣章惇，家在建州浦城(今属福建)，“初生时，父母欲不举，已纳水盆中，为人救止。”《宋会要辑稿·刑法二》载，江南东路(今江苏、安徽、江西一带)，“东南数州之地……男多则杀其男，女多则杀其女，习俗相传，谓之薅子，即其土风。宣、歙(今安徽)为基，江宁(今南京)次之，饶、信(今江西)又次之。”而两浙路(今上海浙江一带)是宋代社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其一些地方杀婴弃婴之风也很严重，“衢、严(今浙江建德)之间，田野之民，每忧口众为累，及生其子，率多不举。”

从上述史料归纳，宋代东南地区，主要包括今天的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等地，溺杀婴儿的现象与风俗已相当普遍。“不举子”之风严重败坏了社会的伦理道德，当时一些士大夫曾加以严厉斥责，“东南不举子之俗，伤绝人理”(《宋史·范如圭传》)，要求政府严刑禁止。官府确也采取多种措施，企图加以制止，如从刑法上严杀婴之禁，甚至对地方官吏也予一定处分；颁布胎养法，在徭役诸方面予孕妇之家以宽免；设立举子仓和置举子田，以资助贫困之家养子；立养子法，准许民户领养被遗弃的幼儿等。尽管政府做了很大努力，申严劝诱，纤悉备至，但不举子风俗并不见好转，禁而不止，甚至一些地方还愈演愈烈，它与中国千余年来多子多福的文化传统完全相悖，其原因何在呢？

学者陈广胜撰文进行了一系列分析，指出首先是人多地少的生产关

系矛盾在起主导作用。在我国人口发展史上，宋代首先突破一亿大关。比汉唐人口最高额几乎增加了一倍多。人口增加最快的东南地区，其耕地开垦得也最彻底，以至于很少再有荒地旷土，尤其是福建路，“土地迫狭，生籍繁多，虽硗确之地，耕耨殆尽，亩直寖贵”(《宋史·地理志》)。随之而来的是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锐，所以《宋史·食货志》分析说：“福建地狭人稠，无以赡养，生子多不举。”范致明《岳阳风土记》也说，荆湖北路“鄂州之民生子，计产授口，有余则杀之，大抵类闽俗”。说明人多地少，不能维持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供给，是宋代不举子风俗盛行的重要原因。

其次是沉重的人头税。宋代官府不但承继了以往各朝的苛捐杂税，而且还增加了许多敛民新法，其中丁赋(人头税)成为广大民众的沉重负担。其丁赋承继五代，以东南地区最重。蔡襄《端明集》卷二六谈到，福建“泉州、漳州、兴化军，人户每年输纳身丁米七斗五升”。《淳熙三山志》卷十载，三山地区(今福州)“咸平初，夏税及身丁钱总二万九千七百有余，大中祥符四年，诏放身丁钱，独夏税七千六十九贯有奇”。身丁钱高达夏税的三倍之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四说，南宋初期，荆湖南路(今湖南一带)“道州丁米，一丁有出四斗者”。朱熹《朱子语类》中也说到，两浙地区“丁钱至有三千五百者”。可见宋代的各色人头税花样百出，沉重不堪。蔡襄接着说：“南方地狭人贫，终年佣作，仅能了得身丁，其间不能输纳者，父子流移，逃避他所，又有甚者，往往生子不举。”范成大也说：“处州(今浙江丽水)丁钱太重，遂有不举子之风。”《宋会要辑稿·食货》也载：“湖州丁绢最重，至生子不举。”赵善臻《自警篇·济人》云：“浙民岁输身丁钱绢纳，民生子即弃之，稍长即杀之。”江南东路的太平州(今安徽当涂)，“民生子必纳添丁钱，岁额百万，民贫无以输官，故生子皆溺死”(《生生四谛》)。可以说统治者残酷的人头税压榨，是民众生子不育的重要原因。统治者一方面立法想制止这一风俗，一方面又以超强剥削法推动这一风俗。连皇帝都承认，“民为身丁钱，至生子不举”(《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二)，但统治者根本不会有改变这一赋税结构，来“救救孩子”的念头。

还有诸子均分的财产继承问题。不举子之风不只盛行于贫困之家，而且也蔓延到衣冠富户和士大夫之家。杨时《龟山集》卷三谈到，福建的建州、剑州、汀州和邵武诸地，民众多计划生育，习以成风。虽士人

间亦如此。富民之家，不过二男一女；中下之家，大率一男而已。所以许多地区，衣冠之家，往往唯有一独子继嗣。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父兄惧怕继生子弟分割家产，常常溺杀婴儿。如《宋会要辑稿·刑法二》在述及福建民风时称，衣冠之家，家产一旦分割之后，继生嗣续，不及襁褓，一切杀溺。主要是担心其更分家产，建州一带此风尤甚。宋代财产私有制得到进一步发展，土地兼并激烈，衣冠之家如果不加限制地生儿育女，家产被分割过散，不但不能维持其原有的社会地位，而且很可能被人兼并而沦为贫民，为避免家道中衰，只有出此下策。朱松《韦斋集》就谈到，即使"父母容有不忍者，兄弟惧其分己赀，辄从旁取杀之"。这似乎是衣冠之家防止自己的社会地位遽然下降的一种手段，令人不寒而栗。

当然，宋代生子不育，尤其以溺杀女婴为严重。其中除中国文化的重男轻女思想传统之外，还有厚嫁之风普遍的原因。当时无论地主还是一般平民，嫁女之费，常常多于娶妇之用。如《宋史·礼志》载。皇家宗室的公主下嫁，朝廷赐给驸马的嫁娶费用"倍于亲王聘礼"。吕祖谦所订《宗法条目》规定，嫁女费用一百贯，娶妇五十贯。嫁资倍于娶费，使富裕之家不愿分赀，而贫困之家又力所不及，故进一步加剧了溺杀女婴的风俗。

有学者以为上述诸条都非根本方面的原因，其终极根源乃在于生产力的不充分发达。指出宋代社会生产力比前代无疑是有很大提高。但人口也比前代倍增，由于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消极制约，其生产力不可能得到长足的充分发展。我们以为，单靠生产力的发展，其实也并不见得能解决问题。它需要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尤其是对"人"的认识的提高。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大的缺陷，恐怕就是不重视"人"，不懂得"人"到底是什么，而主要围绕着"皇帝"生活，依靠"皇帝"生存，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生产力再发展，也不能摆脱不把人当"人"的悲剧的重演，近现代的中国史其实一直在重复着类似的悲剧。当然，其中还有许多深层次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整个民族去认真思索。

北宋宫廷女子马球队打马球在我国古代体育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北宋的宫廷女子马球队之风采就更是令人赞叹。下面有关记载，读者可细细品味。但遗憾的是，女子马球运动的游戏规则是怎样的?女子马

球队为什么在南宋时突然消失了?这些问题恐怕人们已经很难找到相关的答案了。

中国古代就有踢球的游戏，最初为军中练武之用。而唐代从西藏方面又传进来骑马击球的马球运动，使得人们的体能得到更强劲的锻炼，在帝王中也时有出色的马球手。据说唐玄宗年轻时就球艺不凡，《封氏闻见录》说他在球场中“东西驰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后来女子球队也开始出现，《旧唐书》载，剑南节度使曾“聚女骑驴击球”，这是女子驴球队。五代后蜀花蕊夫人费氏，有一首专门歌咏蜀国王宫中女子马球队的《宫词》：

自教宫娥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

上棚知是官家认，遍遍长赢第一筹。

北宋宫廷中也有一支女子马球队，技艺超群。王圭的《华阳集》卷六中有几首《宫词》，就是描绘宋仁宗时期，一年一度的春季金明池百戏汇演的热闹场面，其中有这支宫廷女子马球队的精彩表演：

内苑宫人学打球，青丝飞控紫花骝。

朝朝结束防宣唤，一样真珠络控头。

银盆着水洒球场，马嚼衔声立两行。

齐上玉鞍随仗列，粟金腰带小牌方。

到宋徽宗时期，在这位风流皇帝的倡导下，宫廷中各项文化艺术活动都得到了惊人的发展，不但书法绘画、苑林建筑，而且踢球、百戏之类，这位“浪子陛下”都为其中“圣手”。当然女子马球队也是重要项目，甚至连女子击剑手都出现了，让人讶异不浅。我们来欣赏徽宗有关的几首《宫词》：

宫人击剑斗乘骑，宝带幞头烂锦衣。

凤尾杖交团月令，球门球过一星飞。

金鞍宝辔簇骅骝，乐奏相从共击球。

花帽两边成锦阵，谢恩长喜上头筹。

控马攀鞍事打球，花袍束带竞风流。

盈盈巧学男儿拜，惟喜先赢第一筹。

可以看到这支宫廷女子马球队豪华的服饰“花袍束带竞风流”，和出色的技艺“球门球过一星飞”。而女子击剑手居然也是在坐骑上争奇斗艳，其场景真让人大开眼界。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中有关宫廷女子马球竞赛活动的描写是最生动形象的，一年一度的金明池宝津楼下的“百戏”活动正在上演，我们先看女子马球队上场之前的情景：“宫监马骑百余，谓之‘妙法院’，女童皆妙龄翘楚，结束如男子，短顶头巾，各着杂色锦绣，燃金丝番段窄袍，红绿吊敦束带，莫非玉羁金勒，宝轻花鞯，艳色耀日，香气袭人。驰骤至楼前，团转数遭，轻帘鼓声，马上亦有呈骁艺者。”可见马球队由百余名妙龄少女组成，其头饰如男子，身着锦绣紧身缎袍，跨在马上，确实“艳色耀日，香气袭人”，有人还提前在马上作秀，以“呈骁艺”。

接着是在宦官的指挥下，作赛前马上武术表演：“中贵人许畋押队，招呼成列，鼓声一齐，掷身下马，一手执弓箭，揽缰子，就地如男子仪，拜舞山呼讫，复听鼓声，蹁马而上。大抵禁庭如男子装者，便随男子礼起居。复驰骤团旋分合阵子讫，分两阵，两两出阵，左右使马直背射弓，使番枪或草棒，交马野战，呈骁骑讫，引退。”这些妙龄少女骑在马上，一手执弓箭，一手揽缰绳，就像俊男般英武。其后随着鼓声操演，双双出阵，或左右开弓，或枪棒交战。马上武艺绝不亚于男子。表演结束，暂退于一旁。

下面是男子驴球队的赛程，谓之“小打”。最后的压轴大戏，就是女子马球队的“大打”。孟元老如此描绘：“有黄院子引出官监百余，亦如‘小打’者，但加之珠翠装饰，玉带红靴，各跨小马，谓之‘大打’。人人乘骑精熟，驰骤如神，雅态轻盈，妍姿绰约，人间但见其图画矣。”这是数十

年之后的追忆，萦绕在老人脑海中的印象虽然深刻，但毕竟已不怎么具体，只有一些总体上的感觉："乘骑精熟，驰骤如神，雅态轻盈，妍姿绰约"之类，所以最后感慨道："人间但见其图画矣!"由于描写过于简洁，便留下一个悬念：这宫廷女子马球队的"大打"是如何进行比赛的?或者说其游戏规则是如何的?

孔宪易先生参照当时男子马球队的一些记载进行了猜测，认为其球场、球门、马球、球杖诸设施应与男子相同，这从上述男子驴球队"小打"与女子马球队"大打"使用同一球场，便可推知一二。这女子马球队"百余人"在球场中如何分配和操作，今天我们已无从得知。再据《文献通考》卷一四六及其他有关男子马球队比赛方面的资料推测，女子马球队也应分为两朋(队)，每朋约十六人，两朋为三十二人，进行对抗。而其他人约为递补队员、鼓乐队员、唱筹队员等。比赛时，就如上述男子驴球队，"分为两队，各有朋头一名，各执采画球杖，谓之小打。一朋头用杖击弄球子，如缀球子方坠地，两朋争占，供与朋头。左朋击球子过门，入孟为胜。右朋向前争占，不令入孟"。

其实，男子驴球队的比赛是"小打"，而女子马球队的比赛算"大打"，这两者应该有所不同。据《宋史·礼志》对这项运动的介绍，"有司除地，竖木东西为球门，高丈余"，参加者分左右两队，"以承旨二人守门，卫士二人持小红旗唱筹(报告胜球数)"。而上述"小打"只有一个小球门，两队一队攻一队守。这里"大打"是有"高丈余"的双球门，两队互相攻门。那么，女子马球队的"大打"应该与哪种规则相近呢?

上述完全根据男子马球队的规则而进行的推测，到底有多少可信度?当时如此激烈的体育项目，男子女子会没有多少区别吗?我们不得而知。还有一个令人颇感困惑的疑问是：南宋之后，女子马球运动在历史中突然消失了，其原因何在呢?孔宪易认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用费浩大，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我们觉得这一理由很难成立，请问：当奢侈的统治者竭力提倡或欣赏某种活动之际，什么时候会因费用问题而永远搁置起来呢?

美国的汉裔学者刘子健先生撰文《南宋中叶马球衰落和文化的变迁》认为，南宋马球的衰落，主要是儒臣们阻止宋孝宗以及太子(宋光

宗)击球为戏，它是个关键因素。从北宋起，一直到南宋高宗，君主对于武艺球戏，还是相当重视的，有关史例不少。不过从宋孝宗开始，谏官开始批评朝廷宠臣以击球为戏，给孝宗的上谏也不少。一次，孝宗骑马击鞠，坐骑有点疲乏，跑到矮檐的走廊里，眼看要碰到横梁，两边的人惊呼失色，赶快跑过去救护，这时马已驰过，孝宗两手扳住横梁，悬空垂立，大家扶他下来，孝宗神色不动，而大臣们已经一身冷汗。尤其是乾道五年(1169)，孝宗射箭伤目，谏官们又旧事重提，恳劝皇帝不要冒险戏球。孝宗受了臣下的影响，终于放弃马球。不过有时还爱看别人打马球，大臣也劝阻太子击球，尤其是光宗即位几年后，因精神病而逊位。从此，史籍不再有宫廷击马球的记载。以此推论，当然更不会存在宫廷女子马球队了。

也有学者认为，南宋马球衰退落的主要原因是马匹数量的减少，质量的降低。南宋丧失西北产马地，马源主要来自贸易和监牧饲养，马匹的缺乏，致使骑兵战斗力都减弱，所以使马球运动客观上受到限制。同时，南宋文弱之风日盛，儒臣力谏击球之戏。在社会上，仕宦之家子弟不为，主要是沃尔沃风流子弟与闲人所习，故马球也从贵族风尚降为贱人恶习，从肯定的体育降为被否定的玩耍，马球在中国社会逐渐消失。

而陈高华教授又提出不同看法，其在《宋元和明初的马球》一文中，举出了大量的史例，论证了南宋打马球风尚并没有因儒臣劝驾而衰落，也并没有降为“恶习”。因为儒臣们主要是怕皇帝出危险，而并不是反对打马球运动本身，所以当时马球运动还是非常时尚的，在军队中最为流行。辽、金、元代也有许多相同的记载，贵族、将领们每遇节日日就会举行马球比赛，宫廷中也如此。直到明初，宫廷中和贵族们依然乐此不疲，有关方面的记载同样丰厚，说明当时这项运动之普遍。问题是明代中叶以后这项运动的情况如何?人们还不得而知，至少是有关材料愈来愈少，或者可以说在逐渐消亡。

综上所述，明代中叶以后这项运动为什么消亡?确也是一大疑问，不过这是大明王朝之谜了。我们在这里想问的是：既然南宋、金、元时期，马球运动还颇为时尚，那为什么南宋之后有关宫廷女子马球队会突然消失呢?笔者以为可能应与当时理学的发展有关，那么，这理学是如何具体的在这方面压抑妇女的呢?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第四十二章

中国最早的火箭弹宋代在军事上开始采用火药兵器，且在一些重大战役中发挥了令人瞩目的功效。但这些火药兵器的构造与性能，往往在史籍记载中含煳其辞，令人不得要领，须颇费心思去猜测。这里所谓的“霹雳炮”就是如此，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学者甚至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火箭弹，你以为有可能吗?

绍兴三十一年(1161)九月，金主完颜亮率军南侵，由于宋军在淮河没有设防，金兵从容渡淮南下，直抵长江边。十一月，完颜亮决定从采石(今安徽当涂县西北)渡江，再取宋重镇建康(今南京)。这时南岸的宋军不但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且主将不战而退已被罢官，刚好中书舍人参谋军事虞允文赶到犒军，遂毅然担负起军事指挥的重任，立即组织军队沿江布防，亲临前线鼓舞士气。

十一月八日，完颜亮指挥十余艘战船渡江，向宋军阵地凶神恶煞地迎风冲来。宋水军采用两种战术双管齐下：一是以轻快而结实的战舰海鳅船冲撞和拦截敌船；一是密集施放火器霹雳炮，敌船或被撞沉，或中霹雳炮而起火燃烧，不少金兵掉落江中，被宋水军击杀。个别到达南岸的敌舰，约有数百名金兵在强行登陆中，也被宋军悉数包围歼灭。战事持续到日暮，金军损失惨重，难以抵挡宋军的反攻阵势，只得退回江北。次日，敌船企图再度强行渡江，遭到宋水军战舰的夹击，同时在霹雳炮强大火力的攻击中，金军船只大量起火燃烧，金军大溃，完颜亮率残部败退，未几为部属所杀，金军南侵失败。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南宋采石之战，它不但在军队数量上以少胜多，而且在水战中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火器霹雳炮，使采石水战的威名远扬。不过，据说首次在世界海战史上使用火药兵器的战役，应是在此一个月前，宋将李宝率水师三千，战舰百余艘，在海州的东海县(今江苏连云港南)击退金朝水军的进攻。此战金朝水军同样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李宝指挥有方，他不是以战舰去硬拼，而是准备了大量的火器，命令火箭环射，中火器的敌舰燃烧起火，烟焰连天，延毁数百艘敌船。这次

海战也摧毁了金军准备从海路直取临安的战略计划，这两次水战中，宋军的火药兵器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威力，创建了不朽的功勋。或者说，南宋的半壁江山这次能得以转危为安，其火药兵器的作用不可忽视。

那么，南宋军队用的是什么样的火药兵器?或者说霹雳炮是一种怎样的武器呢?南宋文人杨万里的《海鳅赋后序》中对霹雳炮如此描绘："舟中忽发一霹雳炮，盖以纸为之，而实以石灰、硫黄。炮自空而下，落水中，硫黄得水而火作，自水跳出，其声如雷，纸裂而石灰撒为烟雾，眯其人马之目，人物不相见。吾舟驰之压贼，人马皆溺，遂大败云。"此后，明人方以智的《物理小识》，清人赵翼的《陔余丛考》，陈元龙的《格致镜原》，基本都按照杨万里的记载来描述霹雳炮。

这段文字经翻译，更引起许多外国汉学家的兴趣。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认为，霹雳炮未必是火炮，但无疑是一种爆炸物。而梅辉立则认为，霹雳炮属于火药武器的爆炸物。美国汉学家富录特及中国作者冯家升合写的论文，把霹雳炮理解为炸弹。而普鲁塞克从原着中没有提到药料内含有硝石这一点出发，判断霹雳炮不含火药，所以不是火药武器。帕廷顿把霹雳炮解释成西方早已掌握的"自动火"，就是与古代"希腊火"类似的引燃物，且主张它经由阿拉伯传入中国。其实，"自动火"不是火药混合物，它应该与霹雳炮没有关系。

日本学者有马成甫的研究较为细致，觉得杨万里所述"硫黄得水而火作，自水跳出"之句，让人看了莫名其妙。他说，当石灰遇水时可产生一定温度，但只有达到硫的燃点才会发火，而硫在空气中的燃点是二百六十一度，石灰遇水不可能产生这样的高温。同时，"纸裂而石灰撒为烟雾"也无法使石灰与水产生反应。所以史料虽然可靠，但是难以理解。原因在于杨万里战后虽亲临现场采访，他也是战役指挥者虞允文的朋友，但他对于兵器制造肯定不甚了解，对火药武器更是没有多少知识，因而对霹雳炮的构造、性能的描述就不确切，以致使读者不得要领或迷惑不解，使研究者对霹雳炮的认识产生众多歧义。

中国学者张子高认为，霹雳炮"是利用火炮的爆炸力量，把石灰粉末喷射成为烟雾，使敌人失去战斗力"。但不清楚其结构究竟是如何的。冯家升后来猜测说，霹雳炮可能"上节装火药，下节装石灰"，"纸制的炮始

于此，它是日后花炮的原始形式。”其实，相关的烟火炮仗应早于此数十年，所以霹雳炮应是纸制“花炮”的发展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前苏联学者沙皮罗认为，霹雳炮及宋代烟火中的地老鼠应属于火箭装置。中国学者董师彦等人也同意这一观点，问题是他们只提出结论而没有具体论证和说明。

中国学者潘吉星指出霹雳炮确应是火箭武器，并进行了详细论证。他认为根据杨万里的描述，霹雳炮升空后发生爆炸，用一般纵火剂是难以产生如此作用的，只有火药的爆炸才有这种效果，所以断定其纸筒内的药料除硫磺、石灰外，还应有硝石和木炭，后两种成分为杨万里漏记。中国古代非军事性质的一般作品，在谈到火药成分时往往只举其一二，而略其余，有关例子不少。这样，纸筒中火药点燃后，腾空而起，接着便在空中或从空中下降到水面的过程中爆炸。在水面爆炸时，纸筒“自水跳出，其声如雷”，就很自然了。北宋末、南宋初盛行的娱乐烟火中的“起火”就是这样的，因此料想这霹雳炮就是大型“起火”，也就是将娱乐用的起火纸筒再制造得粗大一些，内可装更多的发射药和炸药即可，这是宋代将民间娱乐品转用为军事武器的一个实例。也就是说霹雳炮是一种能散出烟雾、借火箭原理推进的炸弹，或者说是散发烟雾的原始火箭弹。

这一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一有如此威力且大有发展潜力的火箭弹，为什么宋代军民没有进一步发展其在军事方面的应用力度，以增强国防军力呢?可以肯定的是，宋代的火药武器基本只停留在用人力或机械力投掷的炸药包、燃烧器阶段，最多有一种竹竿火药喷射器，所以对于这火箭弹的说法，还是令人颇感怀疑的。动荡的社会王小波、李顺起义原因北宋初期，天府之国的四川，爆发了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发展迅勐，摧枯拉朽，所向披靡，在攻打下一些县城的基础上，第二年就在成都创建了大蜀政权。朝廷派出远征大军，好不容易才把起义镇压下去。北宋政权才创建三十多年，为什么在四川会爆发如此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呢?

北宋淳化四年(993)二月，西川大旱，官府追迫赋敛，民众生活窘困。青城县民王小波率领百余农民点燃了斗争的烈火，提出“均贫富”口号鼓动民众，周围农民群起响应，起义军很快发展到万余人，一举攻占

了青城县(今都江堰市西)城。起义军像霹雷闪电般地震动着四川，转战于川西诸州。不久，起义军又攻下眉州彭山县城。十二月，王小波率军在成都西南的江原县(今崇庆县东南)，与西川宋军主力展开大战，他不顾个人安危，英勇指挥战斗，一鼓作气打垮了敌人，取得川西江原大捷，自己却不幸中箭，伤重牺牲。

起义军随即推举王小波的妻弟李顺为首领，继续英勇战斗，乘胜攻克蜀州、邛州，宋军节节败退。起义军在各地惩办贪官污吏，其气势席卷着山西平原最富庶的几个县。第二年初，攻下成都，并遣兵四出，扩大战果。其势力范围“北抵剑阁，南距巫峡”，都在农民军控制之下。很快创建“大蜀”政权，建元“应运”，起义军在脸上刺字“应运雄军”，任命了有关官职，录用才能，创建了一套行政机构，还铸造了“应运元宝”铜钱和“应运通宝”铁钱，活跃经济。由于号令严明，深得民心，起义军声势不断壮大。

那么，为什么这时四川会爆发如此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呢?

一般认为，四川地区富饶，以出产丝麻、茶叶等闻名全国，许多农民、手工业者、商贩都赖以为生。宋初，中央政府将原后蜀府库中的财货，以四十兵为一纲，水陆兼运，十余年间悉归中央内库，使当地财政陷入拮据，民间怨愤积聚。到淳化年间，政府又在那里设置“博买务”，垄断各类主要商品的贸易，布帛、茶叶等都被官府控制，致使许多专业农户与手工业者、商贩生境窘迫。王小波的家乡永康军青城县是著名的茶叶产区，茶农以采茶、制茶为生，茶商以运茶、贩茶为业。而“博买务”强行收购茶叶，垄断茶叶买卖，大肆勒索民众，使茶农、茶商面临破产和失业的困境。王小波、李顺就是茶户或茶贩，陆游《老学庵笔记》载，王小波自称“我土锅村民也”，“土锅”或为制茶所用之锅具，由于失业最后被逼上揭竿而起之路。苏辙在后来的《论蜀茶五害状》中这样说：“臣闻五代之际，孟氏窃据蜀土，国用褊狭，始有榷茶之法。及艺祖(即宋太祖)平蜀之后，放罢一切横敛，茶遂无禁，民间便之。其后淳化之间，牟利之臣始议掊取，大盗王小波、李顺等因贩茶失职，穷为剽劫……”此外，《隆平集》、《渑水燕谈录》、《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宋朝事实》、《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宋史纪事本末》诸书在谈到此次起义原因时，都提到蜀库归内府和“博买务”设置之害，激起民怨。

可见，这次农民起义的原因主要是“博买务”垄断专利，导致当地民众“贩茶失职”等后果。此说由来已久，诸书重复提及，渐成定论。

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对此说法提出质疑。认为苏辙之说只是孤证，当时熟悉四川情况的沈括、曾巩、李心传等人都没有类似的记载，官史实录中也未见相关的佐证。当时对蜀地茶叶贩运，官方也并无禁榷，王小波、李顺也不是茶户或茶贩，许多史书上只说他们是“青城县民”，没有种茶贩茶之记载，“贩茶失职”之说难以成立。据《全蜀艺文志》载，起义前就不时有人预言“蜀将有变”。《宋史·程戡传》也载：“人言：岁在甲午，蜀且有变。孟知祥之割据，李顺之起而为盗，皆此时也。”说明起义是经过长期酝酿，并非“博买务”垄断茶叶买卖后导致的。总之，王小波、李顺起义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比如起义也应与当地的土地兼并和宗教崇拜等因素有关，不能局限于“贩茶失职”一事。

针对上述意见，有学者指出：如果说“贩茶失职”不是这次起义的主因，但作为起义的导因是能够成立的。苏辙本是四川人，十分了解川峡的社会，对蜀茶也一向关心，所记看似孤证，其实有不少相关材料可以佐证。蜀茶在川峡境内是无禁榷，却禁其出境。“贩茶失职”可以理解为：茶农王小波、李顺等人“因不能交足应贩售的茶叶而破产失业”。茶农因破产失业以致穷困，起而造反，还是比较贴近历史事实的。起义者肯定会利用民间宗教作为组织民众的手段，但民间信仰并非是起义的直接缘由。总之，“贩茶失职”是这次起义的真正导因，苏辙的总结是非常有道理的。

一些学者认为这次起义主要是因为川峡地区土地高度集中，豪强地主残酷剥削雇农佃农，不但贫富差距很大，而且佃户所占人口比例甚至高达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其所受到的人身束缚也相当严重，造成社会运作与人们心理的不平衡所致。如《隆平集》在分析此次农民起义的原因时，不但提到“博买务，禁私市物帛”，更提到“而兼并者籴贱贩贵，小民者，失家田业”。《宋史纪事本末》诸史书也谈到：“蜀地狭民稠，耕稼不足以给，由是小民贫困，兼并者益籴贱贩贵以规利，小波因聚众为乱。”尤其是所谓“李顺之乱，皆旁户鸠集”(《宋史·刘师道传》)，“蜀川兆乱，职豪民啸聚旁户之由也”(《太宗实录》卷七八)。“旁户”是“旁下客户”的省称，是一种地位近似奴隶或农奴的佃户，就是说他们比一般佃户

的身份地位还要低，对地主豪强有着强烈的世袭依附性。这种旁户的大量存在，说明社会不公已到了什么程度，其中也包括了青城一带的佃耕茶农。针对这一情况，王小波才大声疾呼："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这是一句完全针对当时社会实际状况的口号，所以能得到广大民众尤其是旁户的呼应，起义队伍一下子能云集数万之众。

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只强调川峡土地高度集中，还不足以概括宋初川峡地区纷繁复杂的社会形势，也不能准确说明川峡反宋武装起义在北宋初期爆发的主要原因。指出当时川峡地区社会的主要矛盾应是川峡人民同北宋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而川峡地主阶级同当地人民的土地占有矛盾只是第二位的。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在谈到此次农民起义原因时说：当地官员"颇尚苛察，民有犯法者，虽细罪不能容，又禁民游宴行乐，人用胥怨，王小波起为盗"。太宗曾考核川峡州县长吏，不法者多达百余人，只有彭山县令齐振元以所谓"清白强干"受到表彰，而其实际上是个专暴的贪官，百姓恨之入骨。其吏治之污浊，可以想见。淳化五年二月，正当农民起义掀起惊涛骇浪之时，朝廷把分封在四川的益王(太宗之子赵元杰，任成都府尹、西川节度使诸职)迁徙到东南改封吴王，原因显然是为了平息以益王为首的四川官府激起的民众怨愤，缓解官民矛盾，而不得已采取的应急措施。平定起义后，太宗下的罪己诏中也如此阐述："朕委任不当，烛理不明，致彼亲民之官，不以惠和为政，管榷之吏，唯用刻削为功，挠我蒸民，起为狂寇。"同时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是政府的赋役苛重，不但二税的征收比其他地区繁重，还有各种苛捐杂税，官府敲骨吸髓，无所不用其极。参加镇压此次起义的宋军"行营先锋"石普，见宋太宗时说："蜀乱由赋敛苛急，农民失业。"(《宋史·石普传》)所以王小波、李顺的起义主要是由于赋役沉重所引起的，而不是土地兼并的结果。宋代农民其实对土地问题还没有深刻的认识，其"均贫富"口号主要是针对赋役负担不均的不满。

还有学者认为，这次起义的爆发与当地的民间宗教信仰有关。如与青城县一带的水神崇拜有密切关联，起义领袖之一的李顺曾主持了灌口二郎神的祠祀活动，《皇朝事实类苑》卷二三《官政治绩·程文简》条载，程琳知益州时，曾取缔此类迷信活动，谓"李顺由此而起，今锄其根本，且使蜀中数十年无恙"。《老学庵笔记》载，王小波曾在起义前宣传：李顺是蜀王孟昶的遗孤，蜀国为宋军灭亡时，摩诃池边有一锦箱，

里面锦衾中裹一婴儿，有纸片书“国中义士为我养之”。知道其出于宫中，遂将李顺养育成人。王小波之所以选择李顺来冒称蜀王之遗孤，很可能因为李顺是灌口神祠祭祀活动的领袖之一，宣传其起义也有恢复大蜀政权的合法背景。《老学庵笔记》卷五说，“成都江渎庙北壁外，画美髯一丈夫，据银胡床坐，从者甚众。邦人云：蜀贼李顺也。”陆游在成都为官，离此次起义已隔一百八十多年，而这堵壁画还保留着，说明李顺在四川民间信仰中仍有相当威望。总之，民间宗教信仰也是这次农民起义的原因之一。

农民“均贫富”的口号1949年之后，史学界对农民起义的研究不断升温，不少论着在评述宋初王小波、李顺起义时，对其提出的“均贫富”口号给予极大的关注，往往将其作为中国农民起义史的一个里程碑来加以肯定和宣扬，认为这个带有农民革命纲领性的口号，在我国农民战争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对推动历史发展有着巨大的功绩。然而，近年来有学者对这个口号表示怀疑。

起义初始，王小波就对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大声疾呼：“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这话真说到农民心里去了，表达了广大农民要求平均土地财富的强烈愿望，得到贫苦福斯的广泛响应，以致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壮大。不久，起义军又攻下眉州彭山县，把曾受皇帝亲诏嘉奖的“清白强干”的县令齐元振抓了起来，处以死刑，剖开他的肚子，塞进他家的钱财，表达了农民对这类贪官污吏的蔑视，主要是将其所搜括的大批财物散发给贫民，剥下了贪官“清白”的画皮，也进行了一次“均贫富”的实践。

王小波牺牲后，李顺为王，也努力贯彻此“均贫富”口号，对此实行了一些具体措施。如据《梦溪笔谈》诸书记载，起义军每占领一地，李顺就悉召当地乡里的富人大姓，令其如实报上家里的所有财产和粮食，扣除其家人所用之外，其余全部调发，大赈贫乏民众。对不肯听命的官僚地主，就发动百姓揭发，指引豪家老财的收藏地窖，将其中隐藏的财物挖出来。经过激烈斗争，地主家的“屋宇”、“车马”、“财货”、“粮食”之类，大都分配给群众。查考起义军的事迹，似乎此口号曾为这次农民起义的革命纲领。

1985年，顾吉辰先生对此口号的存在表示怀疑，提出一系列论据。

首先，宋人对此口号的有关记载，最早是北宋神宗时期曾巩的《隆平集》、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和徽宗政和间李攸的《宋朝事实》，然后是南宋杨仲良的《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彭百川的《太賓士迹统类》、陈均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最后是元末脱脱的《宋史·樊知古传》和明代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北宋曾巩、王辟之主要活动于神宗时期，相去此次起义至少也有六七十年。其他诸人在南宋及之后，离起义相远二三百年以上。然而从记载的文字和内容上看，几乎相同，毫无新见，显然是互相转抄的结果。

其次，查检北宋太宗时人们修撰的载有与此次起义有关内容的官私书册，均不见此口号。如《宋会要辑稿·兵，刑法》、《宋太宗实录》卷七七、《宋大诏令集》卷二，还有太宗淳化五年知成都府事张咏的《乖崖先生文集》、《乖崖集存卷》，及其他有关淳化五年前后的实录、诏书、文集、碑铭……都找不到王小波的这个口号。乃至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诸朝人在记载此次起义时，也同样不载这口号。如宋祁《景文集》卷六二，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一一，韩琦《安阳集》卷五，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二，苏舜钦《苏学士文集》卷一四，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一二，吕陶《净德集》卷二四，王安石《王临川全集》卷八九，苏辙《栾城集》卷三六，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二，曾巩《元丰类稿》卷四七，王素《文正王公遗事》，还有《玉壶清话》、《湘山野录》、《东轩笔录》等，都不见有此口号的记载。另外，两宋之交和南宋时期一些人的著述中，在提到此次起义及相关人物时，同样没有这口号的记载。

再看上述记载此口号诸书籍的渊源关系。南宋杨仲良的《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彭百川的《太賓士迹统类》、陈均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三书文字主要录自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然而查阅李焘《长编》的有关章节，却根本找不到此口号的记载，这不能不使人怀疑三书有擅增之嫌了。《长编》记录史事恪守“宁失之繁，无失于略”的原则，其取材之广博无须赘言，它不载此口号，说明当时应该没有此事，因为李焘不会疏忽到这个程度。可见是由于杨氏的擅增，而彭、陈二书照抄，而出现三书之记载。

李攸的《宋朝事实》和《宋史·樊知古传》，视其文字内容，大致依

据《隆平集》所载，且相袭了有关讹误。查《宋史》有关纪、传，如《太宗纪》、《真宗纪》及《吴元载传》、《赵昌言传》等，一些直接镇压此次起义的官吏、将领和宦官的传记中，都不载此口号。而樊知古这位与此次起义关系不太密切的人物中，却出现了这口号，令人颇感不解。

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书中所记大都是当时士大夫的“谈议”，为道听途说之间接材料，其真实性就令人怀疑。在王安石变法时，他的政治态度是站在司马光一边，因此很有可能利用太宗在蜀设置博买务一事，借古讽今，来反对王安石的市易法，同时用“燕谈”的形式编造了这个口号。

曾巩的《隆平集》，恐怕是宋人最早记录此事的书籍。而《隆平集》记事多误，早有人提出过批评，还怀疑《隆平集》并非曾巩所撰。《隆平集》中《王小波李顺传》的记载中，确实是错误百出，如时间、人名不对，事实细节有误，不一而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曾巩反对王安石变法，其所撰史事有为政治斗争服务的倾向。这里主要是借太宗在川峡设置博买务和垄断商品贸易等事件，来反对王安石的市易法，即认为在成都设立市易务，也就会爆发王小波、李顺起义之类的事件。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九有一段记载说，熙宁七年正月，朝廷派三司官员李杞考察成都府设置市易务的利弊。其后，神宗与诸臣论及市易法，御史中丞冯京说：“过去西川因榷买物，导致王小波之乱，故今许多人以此论说市易法。臣查阅《太宗实录》，实无此说。”宰臣王安石也说：“王小波之乱是饥民太多，官府又不管，遂相聚为盗。而史官乃归咎于朝廷搬取蜀物上供太多而导致的，不知中央取后蜀府库之物上供，与饥民有什么利害关系?”冯京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他都认为博买务导致王小波起义之说不能成立，也没有根据，说明此事的有关记载应有问题。王小波起义的主要原因，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是川峡旱灾严重，政府赋敛急迫，物价涌贵，农民失业，饥民众多所引发的。而《隆平集》、《渑水燕谈录》所记搬物上供、博买务等是别有用心地捏造，其中“均贫富”口号也是捏造出来反对王安石变法有关内容的，所以有关此口号的记载是不可信的。

几年后，张其凡先生提出反驳，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其一，称“均贫富”口号为曾巩炮制，这是无稽之谈。《隆平集》自宋以来就有人怀疑其作者，疑非曾巩之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得出结论：“其出于依托，殆无疑义”。既然不能确定曾巩是否是《隆平集》的作者，就说曾巩在《隆平集》中炮制此口号以反对王安石变法，这是不足为据的。

其二，称《宋朝事实》和《宋史·樊知古传》的记载抄自《隆平集》，是不明史籍渊源所致。李攸撰作《宋朝事实》严谨可信。内容多取材于《国史》、《实录》、《会要》，其成书时间应与《隆平集》大致相近，说其有关口号记载抄自《隆平集》，是没有根据的。《宋史》一书所据主要为宋代国史，说其抄自《隆平集》，同样不知何据?元代史臣袁桷《清容集》卷四一称，元翰林院中不备《长编》、《长编纪事本末》、《隆平集》等书，可以推知元代修《宋史》时，未曾见到《隆平集》。再说，此次起义发生在樊知古任西川转运使时，因不能弭盗而逃，被贬官，终以惭死，不能说他与起义关系不大。

其三，称《长编》未记载“均贫富”口号，而杨仲良《长编纪事本末》“擅增”，是作者仅凭转抄材料而不细检原书之过。广雅书局本《长编纪事本末》该条下，光绪时廖廷相加：“案《长编》脱此条。”廖廷相在复校此书后指出：“以见存李氏《长编》校之，此书有而《长编》脱者一百四十余条。”故不能断言是杨仲良“擅增”。

其四，说王辟之《渑水燕谈录》的记载也是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编造的，这本是揣测之语，并无确凿根据。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九记载，冯京所说应为：“臣检实录，实有此事。”这段记载恰恰证明，冯京与王安石都承认，实录记载王小波起义是因搬取蜀物、置榷买场所致，与《渑水燕谈录》及《隆平集》记载相同。实录当指《太宗实录》，成书于真宗咸平元年(998)。其时王安石尚未出生，史官如何反对王安石变法呢?元祐党人范镇，反对王安石变法比曾巩更力，他所著《东斋记事》中赞赏知成都府事“张咏在蜀……均贫富矣”。可见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元祐党人并不反对“均贫富”，也不专用其语攻讦政敌。

总之，王小波起义发生在西川严重贫富不均之时，其提出“均贫富”口号是顺理成章之事。最早当见于《太宗实录》，李焘据以写入《长编》，李攸据以写入《宋朝事实》，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反驳是纠正了一些问题，但还是有许多疑问的确是很难解决的。如说此口号最早当见于《太宗实录》，那为什么现存《实录》及上述相关的一系列史籍中都不见其记载?李焘《长编》到底是后来“脱此条”，还是根本就没有记载此条?记载此口号的上述诸史籍的文字和内容，为什么如此相同，几乎谈不上有什么差异?显然是互相转抄的结果，那就是说其有关口号内容的记载其出处的确非常狭窄。而《隆平集》记事多误，《渑水燕谈录》又大都为当时士大夫们道听途说之“谈议”，作为最早记载此次起义口号的两本北宋史料，确也很让人不放心。这后面几部书中的相关内容到底是根据何书?是如何转抄的?还是谜团丛生，不易解决。

第四十三章

起义首领李顺王小波、李顺起义在坚持了一年多时间后，被残酷镇压，三万多名起义军战士英勇战死，八名首领被俘遇害。惟独李顺的下落不明，其结局到底如何?究竟死于何时，这一问题自成都被官军占领时起就不得而知，此后歧义丛生，一直没有弄清楚。

四川农民起义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宋廷，淳化五年(994)正月，宋太宗任命亲信宦官王继恩为西川招安使，率军入川，镇压起义。二月初，起义军攻占成都创建政权的消息再次传到京城，朝廷为之震动，太宗又命诸路军马受王继恩节制，浩浩荡荡开进四川。由于起义军在战略调整上出现错误，使宋军入川后进军顺利，且一路上屠杀起义军与民众。起义军在川北的州县不断丢失而全线撤退，宋军尾追至成都。

当时成都驻有起义军十几万人，在李顺的指挥下奋起抵抗，战斗异常激烈。但起义军毕竟缺乏大规模作战的训练和经验，五月七日，宋军突破坍塌的城墙，冲进城内，起义军经过街市内的浴血奋战，终不敌官兵，殉难者有三万多人，重要领导者八人被捕，后被宋军解往开封途中杀害。惟独李顺的下落，各种传说扑朔迷离。

首先，官军向朝廷报告“斩获贼首李顺首级”。据《宋会要辑稿·兵》载，淳化五年四月，王继恩派使者奏报：乱贼已平息，斩获李顺首级，并俘获其他首领。《宋朝事实》卷一七载，淳化五年五月，宋军破贼兵十余万，斩首三万级，俘获李顺及伪官甚众。《宋史·太宗纪》也说宋军在成都镇压起义后，俘获李顺，后杀李顺党八人于凤翔市。时人对其不验明正身，也不押送京都就处死的做法就已产生疑惑。王明清《挥尘后录》载，李顺之乱平定后，有军官张舜卿密奏说：“臣闻李顺已逃走，诸将所俘获的不是李顺。”太宗说：“讨平乱贼才几天，你怎么知道的?是妒忌众将之功，而想害他们吗?”太宗怒叱之，甚至想杀了他，最后免其官职。说明统治者不愿正视李顺逃脱的事实，宋太宗确认李顺已被捕杀，并定下调子，不允许有其他说法。但也正反映了当时的确可能存在这一事实：李顺并没有被官军俘获和被杀。所以如《东都事略》的记载就已

比较模糊，其卷三云：淳化五年五月，“破贼十万，遂克成都，李顺之党并伏诛”。

其次，说李顺在成都陷落时，被乱兵杀害的可能性较大。杨升庵《全蜀艺文志》卷四五，有淳化五年时任西川随军转运使的工部郎中刘锡的一篇歌颂太宗的文字《至道圣德颂》，其中在述及宋军攻陷成都及李顺的最后下落时说：“李顺力屈势穷，藏于群寇，乱兵所害，横尸莫知，既免载于槛车，亦幸逃于袅首。”刘锡是亲身参加了这场镇压起义军活动的官员，深悉内幕情况，所以他说李顺并没有为官军所俘获，应是有确凿根据的；然而说李顺在战乱中被杀，由于没有找到尸体和首级，也只能是一种猜测。

再有，说李顺在破城之时就已失踪，后去向不明。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九云：在宋军进攻成都，即将破城之际，李顺忽然召来数千僧人，以菜饭招待，以念经祈福。又招儿童数千，皆就府第削发剃度，穿好僧衣。早晨天微亮之际，这些僧人分东西两门出去，一直到走完，李顺也不知去向，估计是剃度后混在僧人队伍中逃遁了。第二天，宋军入城，逮捕得一位有美髯之壮士，相貌颇似李顺，遂杀之，其实不是李顺。当时川人的确有传言，说李顺逃至荆渚一带，入一僧寺。

那么，李顺逃脱后的结局如何呢?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天禧元年(1017)，判决广州居民李延志黥面发配安州。咸平年间，四川王均兵变，延志时居益州(今四川成都)，与王均裨将崔麻胡较熟，兵变平定后，延志回广州。与当地怀勇许秀等饮酒，常谈及王小波故事，许秀怀疑他就是李顺，便到当地官府告发，又叫其他营卒来作证。官府把李延志逮捕并扭送到京都开封。御史审讯此案后认定，此李顺是假的。所以判李延志发配，许秀等杖嵴而遣回。开始，枢密院以为俘获真李顺，而向朝廷称贺。然而御中台审问的结果却不是，枢密院大臣还是趋向于以假当真，结案上报。知杂御史吕夷简反诘道：“可以这样欺骗朝廷吗?”最后以事实上奏，而忤大臣之意。

上述故事在《宋史·吕夷简传》中也有相同记载，就是说元禧年官府所抓捕的李延志，御史台审讯的结论是假李顺，为这事御史吕夷简与枢密使王钦若之间还产生过争执和矛盾。然而陆游《老学庵笔记》却

说：“及真庙天禧初，(李)顺竟获于岭南，初欲诛之于市，且令百官贺。吕文靖为知杂御史，以为不可，但即狱中杀之。人始知舜卿所奏非妄也。”陆游的文中并没有捕捉到的是“假李顺”之含意，吕夷简的“以为不可”应是不可公开杀害之意，因为早在淳化五年朝廷就宣布李顺已处极刑，此时若再“诛之于市”，无疑是不妥的，但可以秘密杀害，所以“即狱中杀之”。那么，《长编》与陆游哪个正确呢?不过它至少证实了李顺的确没有在淳化五年成都攻破后被官军俘杀。

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说：仁宗景祐年间，有人报告李顺尚在广州，后被巡检使臣陈文琏捕得，年已七十多岁，推验正身，乃真李顺。于是用囚车押送京城，复审此案，皆得实情。朝廷因平蜀将士功赏已行，李顺也早已宣布斩首，所以不欲再公布此事，只在狱中暗中处死李顺，赏陈文琏升官二级。还说：文琏是泉州人，与自己认识，文琏家有李顺案卷，本末甚详。李顺虽失败了，人们还颇怀念，所以李顺得逃脱三十余年。

沈括治学较为严谨，有人还说他富有科学研究精神。他所处时代也较南宋诸书作者离李顺生平为近，且又称认识逮捕李顺的巡检使臣，估计沈括还可能看见过文琏家的有关案卷，否则不会说得如此凿凿有据。20世纪30年代，张荫麟先生就明白肯定沈括之说，指出：“盖沈识案中主要人物，而陆游但凭二百余年后父老之传说耳。”因此近几十年来，许多学者都倾向于沈括之说，就是主张李顺死于北宋景祐年间(1034～1038)。

近年，也有学者认为陆游的“天禧说”更可靠。一者，沈括说李顺得逃脱三十余年，而从景祐元年上溯到淳化五年，足有四十年。二者，二人所记都从广州捕得嫌疑犯，押送京城后在狱中秘密处死，远离四川数千里外的广州，是不会在二十年时间里出现两桩李顺案的，估计是一件事记成两个时间。此假设如能成立，那天禧说较为可靠，当时吕夷简任知杂御史，王钦若为枢密使。如到景祐年间，吕夷简已为宰相，而王钦若早已作古。三者，《长编》所记是朝廷所玩弄的欺骗手段，意在以伪乱真，障蔽人们的眼睛，好把真相隐瞒过去。真实的情况应该是：宋真宗采纳了吕夷简的建议，一面否认捕获真李顺，判此案不过为诬告，故布疑阵；一面阴险地将这位农民领袖秘密杀害，所以李顺应死于天禧元

年(1017)。

上述“天禧说”中，三十余年与四十年之差，并不是什么大疑问，关键是其一事二记之推测是否有理?为什么在二十年时间内，广州就不能发生一真一假两桩李顺案呢?总之，天禧说抑或景祐说，哪个更可信?似乎仍然难以下结论。

方腊身份及相关事迹方腊起义是北宋末年东南地区一次颇有规模的农民起义，数十万之众，坚持了半年多时间，然而它的余波一直延续了二十余年。由于史籍记载的歧义，有关起义首领方腊的一些事迹，至今没有完全搞清。

北宋徽宗时期，蔡京、童贯等“六贼”把持朝政，穷奢极欲，赋役沉重。徽宗在六贼的怂恿下，更竭天下以自奉，大肆搜括民间奇花异石，以纲船运入都城开封，建筑宫殿苑圃，时称“花石纲”。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一带出产各种花石竹木，民众受害尤深，百姓忍无可忍，终于在宣和二年(1120)十月，爆发了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两浙苦花石纲已久，人民争起响应，聚众至数十万，攻破睦、歙、杭、处、衢、婺等州，声震东南。方腊自称“圣公”，建元“永乐”，设官分职。第二年，朝廷发兵十五万南下镇压。四月，方腊退守青溪帮源洞，因腹背受敌，战败被俘。八月，在京城被杀。这次起义，有一些细节问题，由于载籍歧异，存在不少疑点，这些疑点实为方腊起义中的关键问题。

一是方腊的出身与籍贯。南宋陈均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刘时举的《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还有方勺的《青溪寇轨》及所附洪迈《容斋逸史》等史籍，都记载“方腊家有漆园”。曾敏行《独醒杂志》说得最为详细：“方腊家有漆林之饶…”腊又为里胥，县令不许其雇募。腊数被困辱，因不胜其愤，聚众作乱。”其中方腊还自言：“吾家本中产”。如此看来，方腊至少属中小地主阶层。方勺《青溪寇轨》还明确说方腊是“睦州青溪县竭村居人”。《宋史·方腊传》也清楚载：“方腊者，睦州青溪人也，世居县堨村。”

保存在《桂林方氏宗谱》中的元人徐直之、刘彭寿的两篇传记，即徐直之的《忠义彦通方公传》(即《方庚传》)和刘彭寿的《宋故承信郎

彦通公墓亭记》，载方腊为睦州青溪县万年乡地主方庚的“佣人”。还有，清人方象瑛《重修桂林方氏宗谱序》中称，方腊为方世熊家佣，方世熊为方庚的兄长。此外，歙县、淳安的方氏谱牒，也一般称方腊是“佣工”，是“桶匠”，如南宋的《甲戌谱》到近代的《歙淳方氏会宗统谱》等。诸谱都载方腊为“歙人”，《山郭方氏宗谱》详细考察了方氏宗族的源流，认为方腊出于歙县柘源方氏。也就是说，方腊是徽州歙县人，而来睦州青溪县佣工。

有学者指出，家谱的记载一般是不太可信的，如上述《桂林方氏宗谱》中关于宋代事迹的记载矛盾百出，是不能作基本史料来用的。尤其是写《方庚传》的徐直之，他是方庚一个五世孙女的孙子，他记述方腊为方庚家的“佣人”，只是来源于他祖母在他幼年时的口述，并没有任何宋代的文献史料作依据。元人刘彭寿是当时的淳安县令，他是应方庚的六世孙、七世孙的要求而写《墓亭记》，既然要称道方庚之“忠烈”，自然主要根据家谱中原有的材料略加拔高而已，所述方腊事迹无非抄之家谱。

也有学者指出，方腊家有漆园的说法，以《独醒杂志》记载最为详尽，而此书“下至谑浪之语，细琐之汇……是皆近世贤士大夫之言或州里故老之所传”。《四库全书总目》评论该书：“盖以记录为主，不以考证为主。”所以对旧说错误之处“皆不辨而述之”。所以其有关方腊成分的记载，也是难以深信的。《宋史》方腊“世居县碣村”之言来自《青溪寇轨》，而后者说方腊是“睦州青溪县碣村居人”，其“居人”顾名思义并非指其籍贯。

两说势均力敌，谁也说服不了谁。不过从史籍的作者方面来看，北宋末至南宋初的方勺、洪迈、陈均都异口同声地肯定方腊“家有漆园”，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对方徐直之、刘彭寿诸人都在离方腊起义已有二百余年之后的元代，虽然也有学者认为，徐直之是以一些与方庚生前活动直接相关的原始材料作依据的，但我们毕竟没有看到这些原始材料。由此是否可以说，方腊为中产阶层的说法要略占上风呢？

二是方腊是否为摩尼教的首领。众多史籍都把方腊起义与妖魔鬼怪、旁门左道牵扯在一起，如《皇朝编年纲目备要》诸史籍说：“腊以妖

术诱之，数日之间，啃聚响应者至数万人。”《宋史·方腊传》其言“托左道以惑众”。“无弓矢介胄，唯以鬼神诡秘事相扇诛”。《宋会要辑稿》也说：“方寇者，本狂愚无知之民，传习妖教，假神奇以惑众，遂谋僭道。”所载江东转运副使奏曰：“访闻贼徒虽多，全少器械，惟以人众为援……童子妇人在前，饰以丹黛，假为妖怪，以惊我师……又为长人服大衣，作机关以动，上执矛戟，旗帜饰以丹黛，为鬼神之貌，以惑官兵，皆不足畏。”此类记载，不一而足。

那么，方腊起义军的上述情况，到底是一般的鬼神迷信活动，还是用当时流行的摩尼教在组织起义呢?《宋会要辑稿·禁约》载，宣和年间，江浙一带诸州村民多学妖法，自称明教，又号吃菜事魔，各村建有斋堂或道场，其经文与道、佛诸教不同，人们夜聚晓散，时而结集社会，习以成风。这就是摩尼教，其敬摩尼为光明之神，或尊张角为教祖，提倡素食、戒酒、禁欲、裸葬等教规。如起义与此教有关，方腊就应该是摩尼教的首领。然而此点，宋代史籍记载相当含混，致使近代学者的看法也完全不同。

不少史学著作认为，方腊起义时盛传的“妖术”、“左道”应与当时的摩尼教有关。首先，起义队伍中不少将领都是摩尼教徒或首领，如教徒兰溪朱言、剡县仇道人袭日新、仙居吕师囊，还有郑魔王、方七佛、八大王、俞道安等人。其次，史籍中关于摩尼教的“妖法”记载，常与方腊起义有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绍兴四年五月，起居舍人王居正说：“伏见两浙州县有吃菜事魔之俗。方腊以前，法禁尚宽，而事魔之俗犹未至于甚炽。方腊之后，法禁愈严，而事魔之俗愈不可胜禁。”陆游在《条对状》中这样说：“淮南谓之二桧之，两浙谓之牟尼教，江东谓之四果，江西谓之金刚禅，福建谓之明教、揭谛斋之类，名号不一，明教尤甚……汉之张角、晋之孙恩、近岁之方腊，皆是类也。”《容斋逸史》说得最清楚：“睦州方腊之乱，其徒处处相煽而起。闻其法断荤酒，不事神佛、祖先，不会宾客，死则袒葬。”庄绰《鸡肋篇》中也有完全相同的记载。当时，睦州一带确是吃菜事魔教秘密活动的重要地区，信教的人很多，所以方腊以宗教为掩护，组织起义队伍，是完全可能的。因此有人认为方腊是青溪摩尼教首领，或称其为睦州一带的魔头，或称其是食菜事魔教的首领。

宋史专家朱瑞熙《论方腊起义与摩尼教的关系》一文提出异议，认为方腊不可能是摩尼教的首领，甚至不可能是教徒。首先，许多史籍只是含烟其辞地说方腊“托左道以惑众”，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素以治学严谨出名，也只说方腊“善妖术”。如果方腊果真是摩尼教首领，史籍不载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其次，方腊的身份职业也不允许他当摩尼教首领。按照教义，摩尼教徒不能积聚财产，且禁止结婚。如方腊为中产之家的漆园主，就不能为摩尼教首领。如方腊为一贫如洗的佣工，为了维持生活，须终岁勤劳，他也不可能有什么闲暇时间去进行传教活动。方腊有妻室、儿子，起义失败时一同为宋军俘获。再次，摩尼教主张断荤戒酒，而方腊起义伊始，就召集百余名骨干“椎牛釃酒”、“饮酒数行”，以发表著名的誓师演说，这些做法显然与摩尼教教规格格不入。由此，方腊起义所采用的“妖术”、“左道”之类，应是当时农村中流行的一些“星云神怪”、“役使鬼神”、“指挥阴兵”等迷信活动，或也利用了有关道教、佛教的一些活动。

当然如吕师囊、裘日新、郑魔王、俞道安等人，根据史料分析应是摩尼教的僧侣或首领，他们率领部分摩尼教徒参加了方腊起义，接受方腊的领导，作为起义军的几个方面军与官军进行着殊死的战斗。但他们不是方腊起义军的主力，因此在整个战场上不起决定性作用。而且这几支队伍参加起义军都较晚而先后不一，也使他们没能在对付官军的镇压方面，发挥出更大的威力。所以，方腊起义只存在部分摩尼教徒参加的情况。

三是有无政治纲领及其口号的读法。有学者认为，方腊起义没有政治纲领，理由是在史料上没有发现其起义过程中提出过什么简明口号类的纲领。而史学界一般认为，方腊起义是利用了佛教《金刚经》的经文“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作为口号，表达了农民要求平等的愿望，所以其政治纲领是“法平等”。

然而，史籍却如此记载起义者对这句口号的读法：《鸡肋篇》载，食菜事魔教“亦诵《金刚经》，取‘以色见我’为‘邪道’，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为真佛，其说经如：‘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则以‘无’字连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释。”就是说《金刚经》中的经文，教徒们读作“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读法一改，意思就相反了，即认为佛法所谓的“平

等”是不存在的。《容斋逸史》中也有同样的记载，只是“其说经”，改为“其说不经”。而叶梦得《避暑录话》还谈到了如此读经的原因：“近世江浙有事魔吃菜者，云其原出于五斗米，而诵《金刚经》，其说皆与今佛者之言异，故或谓之《金刚禅》。”就是说，吃菜事魔教徒不是照本诵读佛经，而是往往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变动原意地诵读。所以，这只能说起义者在用佛经解释现实世界，而谈不上是什么政治口号。

有学者如此进行辩解：教徒们这样解释佛经，正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佛经上所谓的“平等”，不过是欺骗，从现实社会中他们深深感受到等级的森严，人世的极不平等。所以将《金刚经》的改读，是对当时社会本质的揭露，也是对佛经的一种批判。起义农民在批判佛经的过程中，反映出他们向往一个真正“法平等”的社会，而这个社会正是他们奋斗的目标。所以，尽管起义首领方腊没有直接宣布“法平等”主张，但这一主张就从批判佛经的经文中折射出来，并指导着这次农民起义的实践。

也有学者提出，食菜事魔教的信仰者并不会误读佛经，《鸡肋篇》等史籍这样描述起义农民对佛经的错读，实是对方腊起义的诬蔑。

四是方腊起义失败被谁擒获。许多学者根据苏州灵岩山《韩忠武王世忠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认为方腊就擒于韩世忠。碑文详细记载了方腊在青溪帮源洞被俘的经过：韩世忠时为王渊裨将，率军潜行溪谷间，询问村妇路径，终于到达洞口。即挺身仗戈而前，越险数里，直捣巢穴，先抓缚八大王，格杀数人后，遂擒获方腊，并缚俘以出。这段碑文收入《名臣碑传琬琰集》，与《容斋逸史》的记载也可相印证。后来，《宋史·韩世忠传》、《宋史纪事本末·方腊之乱》以及《续资治通鉴》诸书都采用这一说法。

然而许多史籍却说方腊为陕西名将辛兴宗等捕获。《东都事略·徽宗纪》载，宣和“三年……夏四月，庚寅，童贯以其将辛兴宗与方腊战于青溪，擒之”。《宋史·徽宗纪》亦载：“忠州防御史辛兴宗擒方腊于青溪。”《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一载，官军合围击败方腊起义军，在“翌日搜山”中“王禀、辛兴宗、杨惟忠生擒方腊于帮源山东北隅石涧中”。《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徽宗皇帝》也说：王“禀寻及辛嗣宗、杨惟忠生擒方腊于帮源山东北隅石涧中”。此“辛嗣宗”应是“辛兴宗”之误。应

该说，载“辛兴宗擒方腊”的史籍并不少于载“韩世忠擒方腊”者，是否因为韩世忠以后成为中兴名将，后人便将此功往名将身上揽呢?然而《宋史纪事本末·方腊之乱》又这样讲述：韩世忠率兵入洞“擒腊以出，辛兴宗领兵截洞口，掠为己功”。《续资治通鉴》也采此说法。当时辛兴宗为剿方腊官军的主将之一，而韩世忠只是裨将，那么是否主将在掠取裨将之功呢？

有学者根据《桂林方氏宗谱》所载徐直之的《方庚传》，认为方腊是为方庚所诱捕。其如是说：宣和三年四月，起义已大部被官军镇压，就是没有捕得方腊。不离方腊左右的方京，一次出洞寻食品，被方庚抓住，方庚以利诱之，使方京回去骗方腊，说：“刚出洞，就看到两个太阳在相斗，天象如此，不是在说圣公要东山再起嘛!”并请方腊出洞观看，方腊以为是真的，便走出帮源洞以观日影，方庚正埋伏了打手，将方腊生擒，献给官军。这简直就是一篇传奇小说的片断，你觉得可信吗?而清人方象璜的《重修桂林方氏宗谱叙》是说，方庚奔命江淮，迎领官军，为韩世忠军向导，乃诱擒方腊，并其党羽。方庚本人在《上郑寺丞札子》中也说：“投身军前，为之乡导，大破贼徒，安复州县，立功非一。”这好像有一些可能，然也只是韩世忠军的向导，其作用有多大呢？

有学者根据范圭《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可存)墓志铭》，认为也可能是折可存捕获了方腊。铭文说：折可存率三将兵，奋然先登，将士用命，方腊被擒，迁官武节大夫。有学者指出，据《宋史·杨震传》，杨震虽“从折可存讨方腊”，但折可存当时率军是在浙东一带镇压吕师囊等部，没有参加围剿帮源洞的战斗，所以铭文不可信，不如理解为：方腊起义被镇压后，折可存官升武节大夫。另外，《舆地纪胜》卷八说：“宣和初，腊陷睦州，命刘光世、姚步仲擒之，斩于都下。”似乎方腊是被刘光世、姚平仲二将擒获的。其实，查有关史籍可知，刘光世当时正率部攻打衢、信等州，俘获郑魔王，后又攻下龙游、兰溪、婺州等地。姚平仲也正率部征讨浙东一带，四月下旬才攻下浦江县。两将都不可能参加四月下旬围剿帮源洞的战斗。

此外，据《严州府志》等书记载，擒获方腊者，还有王马、余木杓、余宗德诸将，但也均没有多少确凿的证据。另有方腊就擒于宋江说，由于宋江是否投降官军都还存在疑问，所以此说更悬，且看另一专

节的分析。

《容斋逸史》究竟是谁做的“容斋”是南宋著名学者洪迈的号，所著《容斋随笔》，史料价值颇高，历来为史家所重。《容斋逸史》记载了方腊起义过程中的两件重要史事，多年以来，人们一直以为《容斋逸史》也是洪迈的作品。20世纪70年代开始，史学界有人怀疑它的可靠性，认为它可能是一部伪作。

《容斋逸史》是宋方勺《青溪寇轨》附载的两则文字。一则是记载方腊起义的始缘及其被官军镇压的经过，其中对方腊“漆园誓师”的演说与经过，描述得非常生动而具体。另一则是记载宋代摩尼教的有关情况及其与方腊起义的关系，其中对该教的一些教规和习俗进行了颇为详尽的介绍。如谈到其教“又谓人生为苦，若杀之是救其苦也，谓之度人，度人多者，则可成佛。故结集既众，乘乱而起，日嗜杀人，最为大害”。令人毛骨悚然。

怀疑论者认为，从未见洪迈使用过“容斋逸史”这个名称，他本人更没有提到过有这本著作，在他的《容斋随笔》和《夷坚志》中也找不到相关文字的记载。洪迈作为洪皓的儿子，又累官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学识博洽，论述弘富，历宋徽、钦、高、孝、光宗五朝，享年八十，在南宋时名声已很大，其议论、记事常为史家所采摘引用。然而，南宋以来许多历史著作记述方腊起义事迹，多引用方勺《泊宅编》的材料，《容斋逸史》中这些极其重要的记载却从未被转引过，或者说此书在南宋时竟无人知晓。再者，《容斋逸史》中方腊在“漆园誓师”的演说词，不像是一个普通佣工的口吻，倒像是士大夫的一篇政论。其后面谈到方腊起义与摩尼教的密切关系，但在其鼓动起义的演说词中却毫无相关的宗教内容。誓师时还“椎牛酾酒”、“饮酒数行”，与其信奉的食菜事魔教的教规不符。此外，其中对某些基本史实也有说错，如写到方勺着《泊宅编》时，韩世忠“犹未知名”。实际上当时已是南宋绍兴年间，韩世忠已为战功显赫的中兴名将了。总之，从种种迹象看，《容斋逸史》不是洪迈的作品，既然作者是伪托的，其前一则史料的可靠性就要大打折扣了，而其后一则史料其实主要是节录自南宋庄绰的《鸡肋篇》。

肯定论者指出，洪迈对方腊起义的有关史料是非常熟悉的，他不仅

可以看到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还可从他兄长洪适那里得到此次起义的第一手材料，所以《容斋逸史》历来被认为是研究方腊起义的珍贵史料，它是洪迈主要依据宋朝《国史·童贯传》所附《方腊传》等材料撰写的，有一定的史实根据，无须去怀疑它的真实性。如其中关于摩尼教的一则记载，与庄绰《鸡肋篇》中的记载几乎完全一样。洪迈的著述是经常被人采摘引用，但不能由此就认为未被引用的著述就是伪作。其中说方腊“家有漆园”，也就是漆园主，而并非是一个普通佣工，所以有一定的文化，能说出一些颇有逻辑的政论性言词。当然并不排除其中参有士大夫作者的一些思想在内。如果方腊是佣工，他也不可能有余力去长期从事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他秘密组织“贫乏农民”，“赈恤结纳之”，最后鼓动武装起义，这是当时东南地区各种社会矛盾激化，主要是社会各阶层与宋朝统治者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方勺《泊宅编》有三卷本、十卷本之分，主要是方勺遇事的随时记录，其中有些条目肯定作于北宋末年。当时韩世忠确实“犹未知名”，不能以此以为作者搞错了基本史实。总之，怀疑《容斋逸史》作者及其史料价值的证据是不充分的，不足以判定此书的真伪。

还有学者指出，《容斋逸史》既有可能是洪迈所撰，又有可能是其他以“容斋”为号的士大夫所撰，尚不能最后定论。从《容斋逸史》的有关内容分析，其作者必定是生活在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到南宋末年，其间凡是以“容斋”为号的士大夫，都有可能为其作者，所以它不是后人编造的伪作。当时以“容斋”为号的士大夫，除洪迈外，还有刘元刚、唐廷瑞、庄圭复三人，其中刘元刚、唐廷瑞都曾撰《容斋杂着》一书。尤其是唐廷端，博洽多闻，还为徽州歙县人，和方腊同乡，又曾在建德府遂安县任主簿，这里也曾经是方腊起义军浴血奋战的地点之一，所以《容斋逸史》很可能是他的《容斋杂着》的部分内容。当然，洪迈一生著述极为丰富，今存的作品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大都散佚，所以也已无法确凿考证。其实，《容斋逸史》究竟是一部独立的著作，还是附于某一著作中的几卷或单篇文章?《容斋逸史》究竟是原作者自定的名称，还是《青溪寇轨》的编纂者擅自命名，或是在原名《逸史》上冠以原作者之号“容斋”?这些问题现在都难以一一搞清。

《容斋逸史》是研究宋代方腊起义的最重要史料之一，如果其真伪难定，作者不知，那么想破译上述方腊起义诸谜，自然就更难了。

官逼民反与宋江受招安《水浒传》以宋江为核心人物，演绎了一个个生动的官逼民反的故事，然而最后还是受了朝廷的招安，结局颇为悲哀。那么，历史上宋江是如何被招安的?招安后，他们是否跟从官军去征讨方腊起义?这些问题由于史料记载的错综复杂，矛盾百出，所以史学界也分歧很大，看法不一。

北宋徽宗时期，在方腊起义之前，北方山东、河北地区就爆发了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相传曾驻水泊梁山。后来声势发展壮大，他们采用流动战术，“转略十郡，官军不敢婴其锋”，对大宋王朝构成一定威胁。《宋史·侯蒙传》载，宋江寇京东，知亳州侯蒙上奏说：“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诸地，官军数万都打不过他，宋江必有过人之才。今青溪方腊盗起，不如赦免其罪而加以招安，让他率军去讨伐方腊以自赎，或可平东南之乱。”《宋史·张叔夜传》载，张叔夜知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海州镇)时，派出间谍侦察起义军动向，宋江率军向海州进发，夺得十余条装载货物的官府大船，遂将其作为大本营。张叔夜招募了千名敢死队员，预先设下埋伏，然后派轻兵引诱起义军上岸作战，藏匿海边的壮卒乘机举火焚其船，起义军一看大本营起火，皆无斗志。此时敢死队伏兵再包围突袭其大本营，多名副将被官军擒获，损失惨重，宋江于是投降。上述相关历史资料，王称《东都事略》也有类似记载，应是主张宋江投降官军观点的主要根据。

主张宋江没有投降的学者认为，在北宋一代的官私案牍记载当中，全都没有说过宋江战败而投降宋王朝，也没有宋江这支起义军到过海州境内的说法，更没有宋江受招安后从征方腊的事迹。这些故事都是进入南宋后，人们才编造出来的，《东都事略》是南宋人写的，《宋史》是元朝人写的，皆不足信。

有学者指出，宋江起义已在北宋末年，所以南宋人写的有关史料应有可信度，同时也可找到北宋末的相关记载以作佐证。如《三朝北盟会编》卷八十八引《张叔夜家传·以病乞致仕宫观札子》说到他“出守海壖，会剧贼猝至，偶遣兵斩捕，贼势挫创，相与出降”。据说离海州城南十五里的沿海古战场，其附近还有一大冢，相传埋着当年战死的梁山好汉们，如今民众还称它为梁山好汉墓。还有《丹阳集·王登墓志铭》说：王师心任海州沭阳县尉时，“遇京东剧贼数千人浮海来寇，公适就养在

邑，命引兵邀击境上，馘渠酋数十人，降其余众”。其“剧贼”虽都没有指名道姓，但在《文定集·王师心墓志铭》中，便明确写出是“河北剧贼宋江者”。所以，宋江战败投降官军的说法似乎是有确凿的史料根据的。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张守《毗陵集》卷十三《左中奉大夫充秘阁修撰蒋公(圆)墓志铭》。其载：“宋江啸聚亡命，剽掠山东一路，州县大震，吏多避匿。公独修战守之备，以兵扼其冲，贼不得逞，祈哀假道。公吪然阳应，偵食尽，督兵鏖击，大破之。余众北走龟、蒙间，卒投戈请降……陛见赐对，上问宋江事，公敷奏始末，益多其才。”这段文字表明，宋江起义军曾在沂州(今山东临沂)一带被蒋圆所率官军所打败，而后撤退转移，终“投戈请降”，受招安后，徽宗还在大殿接见了宋江。蒋圆死于建炎四年(1130)，张守在绍兴五年(1135)为他写此墓志，其资料价值也颇引人注目。其中，说宋江投降与蒋圆在沂州大破其起义军有着直接关系，由于沂州之战离宋江受招安的时间可能较为接近，所以也不能说作者在捕风捉影，重要的是它为宋江受招安的又一个有力证据。

当时任元城县尉，后官至吏部侍郎的李若水所作《捕盗偶成》一诗，却如此描述宋江接受朝廷招安的经过，它也是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相关史料，特全引如下：

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

杀人纷纷剪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

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

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

今年杨江起河北，战阵规绳视前作。

嗷嗷赤子阴有言，又愿官家早招却。

我闻官职要与贤，辄啖此曹无乃错!

招降况亦非上策，政诱潜凶嗣为虐。

不如下诏省科徭，彼自归来守条约。

小臣无路扪高天，安得狂词裨庙略。

其中，朝廷是在宋江诸人“横行”齐魏大地而官军难于征服之时，才飞敕招安的。宋江等三十六人接受招安后，授官拜爵，骑马入城，意气骄昂的样子跃然纸上，连民众看了都惊愕不已。就是说，宋江并不是在战败而迫不得已投降的情况下，再接受朝廷招安的。反过来说，如果宋江起义军已战败投降，也就不用朝廷“飞敕”招安了。所以，尽管宋江接受招安已无需怀疑，但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宋江才接受招安的?还是让人颇费猜测。有学者以为，如果说一定要将宋江招安与海州战役联系起来的话，那么张叔夜也只能是担任了官府的说客，在与宋江谈判后，才取得上述结果。《皇宋十朝纲要》卷十八载：“宣和三年二月庚辰，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路，入楚州界，知州张叔夜招抚之，江出降。”《宋史·徽宗纪》也载：“淮南盗宋江等犯……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那么，《宋史·张叔夜传》中有关宋江战败投降的描写就与此有明显的矛盾。

然而还有问题，有史料显示，宋江在宣和三年的五月，就是官军在镇压方腊起义军之后，又出兵镇压宋江，这时宋江被擒获。如《东都事略·徽宗纪》载，宣和“三年二月，方腊陷楚州。淮南盗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夏四月，庚寅，童贯以其将辛兴宗与方腊战于青溪，擒之。五月丙串，宋江就擒”。范圭《折公(可存)墓志铭》中也说：折可存在平定方腊后，“班师过国门，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继获”。所以有学者提出，宋江等人在接受招安一段时间之后。再度反叛，所以官军在镇压方腊后，朝廷又颁布“捕草寇宋江”的命令，一个月后将宋江捕获。那么，这样的假设能成立吗?

下面再考察一下，宋江受招安后是否参加了征讨方腊的战斗。相关史料有四条：

一是《三朝北盟会编》引《中兴奸邪姓氏录》：“方腊反睦州，陷温、台、婺、处、杭、秀等州，东南震动。以(童)贯为江浙宣抚使，领刘延庆、刘光世、辛企宗、宋江等军二十余万往讨之。”据《宋会要辑

稿》、《宋史·童贯传》等史料的记载，童贯是宣和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被任命为江浙诸路宣抚使，所统之兵为“陕西六路汉蕃精兵”，所派将官为“辛兴宗、杨惟忠统熙河兵。刘镇统泾原兵，杨可世、赵明统环庆兵，黄迪统脚延兵，马公直统秦风兵，翼景统河东兵，刘延庆都统制诸路军马”。其中并无刘光世和宋江，据方勺《泊宅编》诸书所载，此时“京东贼宋江等出青、齐、单、濮闻”。直到第二年二月“淮南盗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因此，宋江绝对不可能在童贯出兵镇压方腊时，便挤入诸将行列。此外，方腊并没有攻“陷温、台、秀州”，“辛企宗”这个名字也搞错了，都证明这条史料是不可信的。

二是《三朝北盟会编》引《林泉野记》：“方腊反于睦州，光世别将一军，自饶趋衢、婺，出贼不意，战多捷。腊败走，入青溪洞。光世遣察知其要险，与杨可世遣宋江并进，擒其伪将相，送阙下。”这条材料的前半段没有异议，刘光世确于宣和三年二三月间率军从江西向东进攻，一路攻下衢州、龙游、兰溪、婺州，是与王禀、辛兴宗、杨惟忠从镇江、秀州、杭州而来的东路军，与刘延庆、刘镇、杨可世从金陵、广德、宣州、歙州而来的西路军，都不同的“别将一军”。问题是后半段材料出现异议：有学者认为，宋江于二月在海州招安后，便随刘光世南下，有可能赶上参加围攻方腊帮源洞的战役。有学者持不同看法，认为刘光世这支部队没有绕道淮海，宋江如何随军南下呢?刘光世部后一直在衢、婺一带活动，没有参加围攻方腊帮源洞的战役，如果宋江真在刘的军中，也无法参加擒获方腊的战斗。而且“光世......与杨可世遣宋江并进”一语文理不通，如是“刘光世与杨可世并进”，那么“遣宋江”三字是后来硬加进去的。如是“刘光世与杨可世派遣的宋江并进”，那么，杨可世早就随童贯率军南下，宋江是什么时候加入这支军队的呢?疑问不少。

有学者提出，从海州宋江投降到方腊起义失败，前后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即使朝廷调宋江及其部下去增援江浙战场，要求他们在镇压方腊的战斗中发挥作用，而事实上在时间方面是非常难以做到的。这首先要由地方上报和朝廷批准，往返手续需要时间。批准以后，宋江部队必须整编，这也需要一段时间，再加上从海州行军到江浙，起码十天以上。这其中没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根本无法完成。更何况皇朝对起义军的投降者历来十分猜忌，怎么会这么快就保留其原来统属和实力而让其行军出征呢?

三是《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一在描述官军组织帮源洞围攻时的部署时说：“刘镇将中军，杨可世将后军，王涣统领马公直并裨将赵明、赵许、宋江既次洞后……”与《宋会要辑稿·兵》中的有关文字相比，《宋会要》为“刘镇、杨可世、王涣、马公直率劲兵从间道夺贼门岭”。可见《纪事本末》是经过了修改，修改后产生了明显的毛病：原来王涣与马公直的地位差不多，现在却成了上下级“统领”关系；原来赵明与杨可世的职位也约相等，现在杨可世为后军主将，赵明却成了“裨将”；原来没有“宋江”的名字。现在却硬挤了进来。如何解释这些问题呢?也有学者引用《宋会要辑稿·讨叛四》中的有关文字，来与该《纪事本末》的记载相互印证，而认为宋江在从征方腊军中是可能的。

四是《皇宋十朝纲要·徽宗》载：“宣和三年六月辛丑，辛兴宗与宋江破贼上苑洞。”我们知道，辛兴宗是陕西名将，官任忠州防御史，为熙河兵主将，随童贯南下。而宋江刚受招安，怎么会有资格与他相提并论呢?尤其是前面我们已看到“五月丙申，宋江就擒”的记载，这又如何解释呢?如果说宋江四月份还在为官军出生入死地与方腊拼命，也不至于五月份官军就要“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了吧。再说，称宋江为“草寇”而不是“叛贼”，也说明此人没有投降过，也就是没有跟从官军征讨过方腊。而这里，又说六月份，宋江还出现在与官军共同剿灭方腊余部的战场上，真让人如入迷雾之中。当然，也有学者解释，这“六月”应是“三月”之误，四月宋江从征方腊后，朝廷仍对他不信任，所以最后杀了宋江。或说，宋江从征方腊后再度反叛，而折可存军是在宣和四年三月才把方腊余部完全讨平，然后才奉命“捕草寇宋江”，所以“宋江就擒”应在一年之后的“五月丙申”。

也有学者提出，范圭《折公(可存)墓志铭》的记载也是有很大问题的。如两宋时期任何历史记载中都没有人说过方腊是折可存擒获的，而铭文含义中却有此意。然后又说“不逾月继获”宋江，就是铭文把“俘腊取江”两件大功都加在折可存头上。折可存死于靖康元年(1126)，享年三十一岁，那么在宣和三年，他仅二十六岁，无论以他的资历或地位，恐怕都不足以担得起“俘腊取江”之大任的，更不会受到“奉御笔”的特殊“荣宠”。由于范圭是折可存的女婿，所以其溢美之词也是不可信的。

问题的错纵复杂，真让人无所适从。于是有人便提出一个令人瞠目

的假设：当时有两个“宋江”。一个“剧贼”宋江于宣和三年二月在海州接受朝廷招安，随官军从征方腊；一个“草寇”宋江没有投降官府，所以在剿灭方腊后，官军又与之交战一月，方得平定而擒获。这一降一战两个宋江，决非一人所能为的。当然，也许是有些农民军为了更好地鼓动群众，利用“宋江”的声望，打着他的旗号，在河北、山东一带继续活动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此宋江”是“彼宋江”投降朝廷又镇压方腊之后，继续活动在北方的另一支农民军首领。这样的解释，你会认同吗?

梁山宋江三十六好汉《水浒传》故事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人们对其中一百零八将的名字也都能叫出一些。然而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其实只有三十六好汉，宋江及其结拜兄弟聚义造反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起义军是否以梁山泊为根据地?他们又是哪些英雄?

《皇宋十朝纲要》卷十八载：“宣和元年十二月，诏招抚山东盗宋江。”说明宋江起义至少爆发于宣和元年(1119)之前，要使朝廷发诏招抚，说明起义已达一定规模，且呈现出有相当的力量，使官军围剿感到非常吃力。但是此时的具体情况，史载阙如，人们不得而知，现在只有小说家的传奇故事。不过，既称“山东盗”，说明这次起义的中心地区应在山东，而相传梁山泊聚义，应就在此起义初期。《所安遗集补遗·江南曲序》中谈到，作者曾路过梁山泊，坐舟遥见一峰，篙师介绍，此山就是当年宋江三十六好汉聚义之处，宋之为人，勇悍狂侠，至今山下分赃台置有石座三十六所。山东《寿张县志》载，梁山在县治东南七十里，山上有宋江寨，即山冈上一小垣，周围村邑中风气强悍，圩寨甚多。

宣和二年十二月，“京东贼宋江等出青、齐、单、濮闻”。此处称“京东贼”，而北宋京东路其实就是以山东地区为主，只在其西面包括今河南、江苏与山东交界的很少一些区域。其中，青州治今山东益都，齐州治今山东济南，单州治今山东单县，濮州治今山东鄄城，所以其基本活动范围还是在山东。可以说，起义军横扫青、齐、单、濮一带，势如破竹。但是在沂州(今山东临沂)，为蒋圆的伏兵所败。蒋圆虽然战胜宋江，却也“益其多才”，就是承认宋江确有不俗的才能。

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盗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此时称“淮南盗”，北宋的淮南路包括今江苏、安徽及河南南部的一

些地区，淮阳军治今江苏邳县东，楚州治今江苏淮安，海州治今江苏连云港西南海州镇，说明起义军在运动战中有向南方发展的趋向，或者说是其战略方向有所转变。南下的一路上，也把官军打得晕头转向，所谓“转略十郡，官军不敢婴其锋”。但在海州沭阳战败，后又中张叔夜的埋伏，起义军估计损失不小，于是在张叔夜的说降下，宋江接受朝廷招安。

上述也只是一个大概的猜测。从短短几年时间中，宋江一伙横行河北、山东、淮南等一大片地区，说明其应以流动作战为主，没有以梁山泊为“大本营”。然而从在海州曾夺取官府大船作为大本营，说明其有水战的习惯，似乎完全可能在梁山泊一带活动过，上述有关地方志和口传史料也留下一定痕迹，但究竟规模如何?待了多长时间?恐怕也只能是历史之谜了。起义军受招安后，其前景就更说不清楚了。

那么，后人为什么对宋江起义以梁山泊为“大本营”如此感兴趣呢?梁山泊或称梁山泺，古称钜野泽，绵亘数百里，确为当时京东巨泽。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和《宋史》“蒲宗孟传”、“许几传”、“任谅传”等载，梁山泊在北宋就是著名的“盗薮”。整个北宋时期，梁山泊这一带的农民起义几乎史不绝书，如天禧中“盗寇所伏”，庆历中“京东贼大者五七十人，小者三二十人”，皇祐中“寇盗群起”，元祐中“梁山泺多盗，皆渔者窟穴也”。尤其是北宋末年，这里农民起义更是层出不穷，“梁山泺渔者，习艺为盗”，官府的镇压也极为残酷。《夷坚志·蔡侍郎》说，蔡居厚知郓州时，有“梁山泊贼”五百人投降，都被他杀了。蔡居厚是政和八年(1118)由郓州卸任的，杀降应还要早于此年，有人以为他杀的就是宋江一伙之人，不知根据何在?可见人们把梁山泊作为农民起义的根据地是有道理的。

最早记载宋江起义三十六好汉有关情况的，大概是南宋末年的那部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其描述宋江是从九天玄女庙中所得“天书”上看到这三十六人的姓名，他们是；智多星吴加亮、玉麒麟李进义、青面兽杨志、混江龙李海、九纹龙史进、入云龙公孙胜、浪里白条张顺、霹雳火秦明、活阎罗阮小七、立地太岁阮小五、短命二郎阮进、大刀关必胜、豹子头林冲、黑旋风李逵、小旋风柴进、金枪手徐宁、扑天雕李应、赤发鬼刘唐、一直撞董平、插翅虎雷横、美髯公朱同、神行太保戴

宗、赛关索王雄、病尉迟孙立、小李广花荣、没羽箭张清、没遮拦穆横、浪子燕青、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铁鞭呼延绰、急先锋索超、拼命三郎石秀、火船工张岑、摸着云杜千、铁天王晁盖。最末一行还有："天书付天罡院三十六员勐将，使呼保义宋江为帅。"这可说是世人最早有关宋江三十六好汉的整体记载，可能也应算较为接近历史真实的一个档案材料。

与其差不多时间的另一个资料，是宋末元初学者周密的《癸辛杂识》，其续集上收有宋末元初画家龚圣与所作《宋江三十六人赞》。其序谓：宋江事迹见于街谈巷语，然不足采着。自己年少时钦佩其为人，想作一些画赞之类，但未见有关事实的记载，不敢轻易下笔。后看到《东都事略》中的《侯蒙传》，他曾奏肓"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诸语，才知宋江之辈真有非凡事迹存于当时。由是，龚圣与开始搜集有关资料，终于完成此三十六人画赞，人为一赞，估计参考过《宣和遗事》的记载。

所赞三十六好汉是：呼保义宋江、智多星吴学究、玉麒麟卢俊义、大刀关胜、活阎罗阮小七、尺八腿刘唐、没羽箭张清、浪子燕青、病尉迟孙立、浪里白条张顺、船火儿张横、短命二郎阮小二、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铁鞭呼延绰、混江龙李俊、九文龙史进、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黑旋风李逵、小旋风柴进、插翅虎雷横、神行太保戴宗、急先锋索超、立地太岁阮小五、青面兽杨志、赛关索杨雄、一直撞董平、两头蛇解珍、美髯公朱仝、没遮拦穆横、拼命三郎石秀、双尾蝎解宝、铁天王晁盖、金枪班徐宁、扑天雕李应。

周密在此赞后评论道：上述都是相关群盗的记录，龚圣与既为各人作赞，又写序论之。这是为什么呢?就如太史公司马迁序游侠列传，而又为其中的奸雄立传，此虽免不了后世之讥，但司马迁还是有勇气首次为陈胜、吴广立传，且为项羽作本纪，其中的意义是相当深远的，读者当自能体察。说明这"宋江三十六人赞"，是有一定史料价值的。然而，毕竟时间已过了百数十年，又经过了民间文学的加工，所以其中定会有经修饰而改动的地方。就以上述两张名单作一比较，也已有不少区别，如李进义与卢俊义，李海与李俊，关必胜与关胜，阮进与阮小二，朱同与朱仝，王雄与杨雄，张岑与张横。此外，《宣和遗事》中的公孙胜、

林冲、杜千，《宋江三十六人赞》中的解珍、解宝，都只此一家，就是说此时在民间的传说中至少已有近四十位英雄的名字。由此我们想到，这三十六人中除宋江外，哪些人的名字还能基本保持原貌呢?

我们在《三朝北盟会编》卷六中看到宣和四年五、六月间，将军赵明与"招安巨寇"杨志"将先锋军"，随大将辛兴宗等北上抗辽的记载。《宋会要辑稿·兵》载，此时由童贯、蔡攸所统领的征辽大军中，杨志为东路军将军之一。后杨志还随种师道解救太原之围，均立有战功，受到过皇帝的嘉奖，皇帝御批："当优与推恩"。说明"青面兽杨志"确有其人，他在招安后已成为宋王朝官军的大将。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建炎元年(1127)七月，"贼史斌据兴州，僭号称帝。斌本宋江之党，至是作乱"。第二年十一月"泾原兵马都监兼知怀德军吴玠袭叛贼史斌，斩之"。有人猜测此"史"姓好汉应是"九纹龙史进"，由于年月的荏苒，"史斌"已被民间修改为"史进"。这里称"叛贼"，可见史斌曾随宋江接受招安，已为宋将，建炎初乘国事动乱，再次起事，然而第二年就被镇压了。

此外，最出名的大概要算景阳冈打虎的武松了，两张名单上都有"行者武松"的名字，但在宋代有关史籍中却并不见其大名，更不用说其打虎事迹了。大约在元人的杂剧中，开始出现武松故事。如在《义侠记传奇》中写到，武松自幼与贾氏订婚，因逼上梁山而与之失散，后来宋江受了招安，诸英雄都得了官职，武松也找到了贾氏，由宋江等作主，两人结了婚。明朝中叶流行的水浒故事《菽园杂记》有一个情节，说官府曾经悬赏一千万贯捉拿武松，这个数目仅次于宋江，据称此说源自张叔夜招安时的梁山泺榜文。《宣和遗事》载，武松征方腊回来，因战伤残废。遂于杭州六和塔出家为僧。清朝时，有人说在杭州铁岭关附近掘地得石碣，上题"武松之墓"。有人认为此恐杭人附会为之，不然为何南宋无一人言之，历四百余年却有此异闻?反正武松在杭州的各种传说不少，以致抗战前夕，杜月笙、虞洽卿等人还在西湖秋瑾墓附近搞了个"宋义士武松之墓"。然而，武松是否确有其人，还很难说。

晁盖其人也同时见于上述两张名单，以"铁天王"为号，然而排名却颇后。前者排在最后，后者排在倒数第三，可能这比较接近历史上的真

实情况。《宣和遗事》中记载了晁盖、吴加亮等八人智取生辰纲的故事，接着是官府追捕，郓城押司宋江星夜报信，叫晁盖逃走，八条好汉上梁山落草为寇。然后宋江杀阎婆惜，也上梁山入伙，后为众好汉之首领。可以说后来《水浒传》故事开张的骨架已经在这里具备，但是这一基本事迹是否历史真实，我们不得而知。还有晁盖是什么时候死的?当宋江三十六好汉横行齐魏时，他是否还在其中?我们还是不清楚。民间故事与《水浒传》中的晁盖，也有很多差别，但人们一般都认为晁盖是实有其人。如清朝初年，山东寿张县知县曹玉珂写的《过梁山记》就说："晁(盖)、宋(江)皆有后于郓(城)。"至今山东郓城县西北晁庄村的晁姓人，都自称是晁盖后裔。然而翻开那里的《晁氏宗谱》，其记有九世祖"晁盍"，人们说他就是晁盖，因为造反，砍头入谱，所以把繁体字上的"艹"头去掉，就成为"盍"字了。这种说法能成立吗?

还有人以为，与西门庆共同害死武大郎的淫妇潘金莲，历史上也可能真有其人。她是山东阳谷人，阳谷潘氏自认是潘金莲的母系后裔。清初王世祯《香祖笔记》说："阳谷西北有冢，俗称西门冢。有大族潘、吴二氏，自言是西门嫡室吴氏、妾潘氏之族。一日社会，登台演剧。吴之族使演《水浒记》，潘之族谓辱其姑，聚众大哄，互控于县令。"这样的记载，你相信吗?《水浒传》中，武松不是把潘金莲给杀了吗?怎么还会有潘的母系后裔呢?

当然，《水浒传》只是历史小说，那么其中包含有多少历史真实的成分呢?

辛弃疾诱杀赖文政这个故事说，南宋茶贩起义首领赖文政居然能用替身来避祸，最终逃脱官军的镇压。八百多年前的古人，且是一个茶贩，竟会采用如此诡秘的手段护身，不知是真是假。

第四十四章

辛弃疾宋代随着种茶、制茶经济的发展，饮茶文化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然而，官府通过茶叶专卖制度对茶农与茶商的剥削也日益加强，同时州县的“额外科扰”，巡捕的“邀求无厌”，胥吏的敲诈勒索，茶农茶贩们被压榨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因而时有群起反抗之举。南宋孝宗时期，江西、湖南、湖北等地的茶贩，经常聚集起几百上千人的队伍。其中一人担茶，两人“横刀揭斧”为保卫，进行武装贩茶，以对抗政府对茶叶的垄断。官府诬指为“茶寇”、“茶盗”，常派军队进行镇压，斗争异常激烈。

淳熙二年(1175)四月，湖北路茶农、茶贩在赖文政领导下，正式举起义旗，公开与官府进行殊死的战斗。这支约几百人队伍由湖北突入湖南，多次打败官军，六月转攻江西，在吉州永新县山区与官军进行游击战，依靠山谷丛林和民众的支持与官军周旋。不久又进入广东，岭南地区为之大震，朝廷接连派官兵堵截追杀，都遭失败。起义军又回兵江西永新山区，因这里已有民众基础，起义军如鱼得水，活动“诡秘莫测”。

七月，朝廷任用辛弃疾为江西提点刑狱，节制诸军进行镇压。辛弃疾派出敢死劲旅，深入山区搜捕，起义军在军事上陷于被动，伤亡较大，军心动摇。辛弃疾乘机派人到义军中进行劝降，很快把赖文政诱骗到江州，加以杀害，平定了这次起义。

不过，罗大经的《鹤林玉露》却有与众不同的说法，他讲：“自古盗贼如黄巢、侬智高，败绩之后，皆能脱身。”赖文政起兵时已六十多岁，足智多谋，他早就估计成事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暗中寻访相貌类己的替身，后得一个靠卖煎油饼为生的刘四，长相酷似自己，便一直带在身边执役。辛弃疾率精锐官军与义军角斗，义军力量不支而退败，赖文政率几个首领被迫到官军营垒请降，约定不日束兵投诚。回来后，赖文政对部下说：“看辛提刑的眼色，他必将杀我。”于是想趁夜逃遁，部下不同意。赖文政则说：“难道想割我首级?去投降也是死，不过先后数日罢了。”部下也不忍心下手，于是赖文政斩了刘四的首级，冒充是自己的

头，派人献给官军，自己却乘乱逃走了。最后约有七百余人向官府投降，而被官军改编。辛弃疾始终不知其首级是赖文政替身的，以全胜向朝廷报捷。

如果罗大经所说属实，那么辛弃疾诱杀的竟是煎油饼的刘四，赖文政最终得以逃脱。古代农民起义军的首领居然会采用如此诡秘的手段：用替身来避祸，真让人惊叹不已。不过，此说也只此孤证，很可能是当地民众出于对起义军的怀念而编造出来的，罗大经取于道听途说而已。历史的真相到底如何，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了。大宋王朝的全面解读赵廷美、卢多逊谋篡案此狱案是继宋初金匮之盟、斧声烛影两大疑案后的延续，到底是赵廷美、卢多逊阴谋篡位，还是宋太宗、赵普刻意谋害，以完成太宗皇位的一脉单传，从史书上我们已很难找到历史原本的答案，不过读者可以自己进行理性的判断。在这些疑案中，令人深感震撼的是：在皇位权力前面，即使是父子兄弟，人性也已完全泯灭。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有关传记等史书记载。太平兴国七年(982)三月的一天，风和日丽，宫中金明池、水心殿落成，宋太宗正准备召宗室成员泛舟游览。突然，有官员密告：秦王赵廷美欲于此时行刺皇上；若不得手，再诈称病于府第，候太宗车驾临省，再作乱以篡位。太宗听罢大怒道："朕尚强壮，秦王何性急乃尔!"冷静一想，又不忍暴露其事，以败坏皇家宗室的名声。遂下诏罢去廷美的开封府尹官职，出为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守。为掩人耳目，还赐给御弟袭衣、犀带、银钱、绢彩诸物，差枢密使曹彬代皇上给廷美饯行。同时，褒奖两位同告秦王阴谋的官员，如京使柴禹锡迁枢密副使，翰林副使杨守一迁枢密都承旨，也贬降了一批与廷美友善的官员。

此事一发，宰相赵普很快上密疏，告宰相卢多逊与秦王暗中交通诸事。太宗览奏章后，立即下诏将卢多逊及有关属官、秦王府小吏等统统逮捕入狱，命翰林学士承旨李防等官员组成特别法庭，严加审理。案犯很快招供伏罪，卢多逊承认曾多次遣官以中书机要密告秦王府，去年还令属下传话给秦王说："愿宫车(指太宗)早晏驾，尽心事大王(指秦王)。"廷美也回告之："卿言正合我意。"并私赠卢多逊弓箭等物。还有秦王府小吏恣横不法诸事，法官们一一结案具状奏上。太宗再召文武大臣集议朝堂，太子太师王溥等74位官员联名奏议，要求对此大逆不道之案

严惩不贷，宜行诛灭之刑以正朝章。最后，朝廷定案判决：削夺卢多逊官爵，并同其家属流放崖州(今海南岛)。有关属官、秦王府小吏数人并斩首于都门之外，籍没家产，其亲属也流配海岛。赵廷美则被勒令归私第，他的儿女不再称皇子皇女。朝中凡与廷美、多逊有关系的皇亲国戚、各级官员，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刑罚和贬黜，相关的势力被彻底扫尽。

其后，赵普又唆使知开封府李符上奏，谓廷美虽已谪居西京，但仍不思悔过，怨恨不已，应徙流远郡，以防他变。太宗见疏，遂降诏贬廷美为涪陵县公，房州安置。房州位于今湖北房县，地处大巴山区，不但远离东京开封，且偏僻荒凉人烟稀少。雍熙元年(984)，廷美至房州，太宗还派出亲信为房州地方官以日夜监视，廷美被软禁而没有行动自由，忧悸成疾而死，时年三十八岁。太宗听说，呜咽流涕着说："廷美自少刚愎，长益凶恶。朕以同胞至亲，不忍置之于法，使居房陵，冀其思过。方欲推恩复旧，遽然殒逝，伤痛奈何!"其悲泣之情，感动左右。次年，卢多逊也病卒于海南岛，终年五十二岁。

此案从表面上看，有好些个官员一起告密，还有那么多官员共同审讯和朝堂集议，赵廷美与卢多逊欲政变谋篡似乎已属实无疑。其实该案有相当复杂的背景故事，绝非上述史书记载的如此简要和单纯。

宋太祖赵匡胤共有五兄弟，太祖是老二。老大光济和老五光赞早夭。老三光义，即宋太宗，比太祖小十二岁。老四廷美，比太祖小二十岁。三人是一胞同母之兄弟，若按其母杜太后的遗嘱，太祖应将其皇位传给弟弟光义，太宗也应将皇位传给弟弟廷美，再由廷美传给太祖之子，如此一直保持年长之君在位，赵家江山便能得以永固。

赵廷美在太祖时，历任诸地防御使、节度使，加检校太保、侍中、京兆尹诸职。太宗即位后，也让廷美任开封尹兼中书令，封齐王。从征北汉，改秦王，表明沿用太祖时皇弟尹京的旧制，廷美也基本获得准皇储的地位。这一情况其实是太宗最为忧虑的心病。

宋太宗即位才四五年，太祖的两个正值青春年华的儿子就双双离世。秦王廷美见此情景，心中很不是滋味，便忿忿而言太宗"有负兄

恩”。此话传入太宗耳中，加上一班小人在旁又添油加酱，说秦王骄恣跋扈，将有篡位阴谋，不可不防。太宗本有心病和疑惑，如此一来，兄弟间的猜忌日益加深。

卢多逊，博学多谋，太祖时颇得信任，屡迁官爵，至拜参知政事(副相)。多逊与宰相赵普不和，每在朝中揭发其短，赵普自然记恨在心。多逊老父亲也曾在官场沉浮，深知其中三昧，时已退休在家，听说儿子与宰相赵普为仇，不禁长叹道：“赵普是开国元勋，小子无知，轻诋先辈，将来恐不能免祸。反正我已不久于人世，能不亲历此难，还算是侥幸的。”然而，赵普不久因不法事被贬官出京。

太宗即位之初，卢多逊得拜相执政。赵普回京改任太子太保虚职，多逊仍多方阻毁，将赵普妹夫奏调广西边陲，战殁边事，令赵普恨得咬牙切齿。赵普之子承宗官知潭州(今湖南长沙)，娶京城官员之女，来开封完婚，未满月，多逊又奏遣承宗归任，赵普敢怒不敢言。两人至此积怨成仇，彼此恨之入骨，不共戴天。

太平兴国六年(981)，赵普密奏“金匮之盟”故事，重获太宗信任，再度拜相，且官爵地位在秦王廷美之上。赵普仰仗太宗的有所依托，权势一时更胜太祖当年。赵多次讽言要卢多逊引退，多逊虽觉不安，然终不肯就范。接着，就发生了上述大案。

“斧声烛影”的传说已令太宗有弑兄夺位之嫌疑，太宗即位后，太祖之二子又死得不明不白。此案中廷美被贬死房州，其实也始终未见显罪确情；都说是几个官员的密告，而拿不出什么像样的证据。有关属官、小吏和证人也都被斩首，来个死无对证。尤其是连太宗的长子楚王元佐都看不下去，为营救四叔而直接向父王申辩，因为他平时与四叔的关系不错，廷美的死讯传来，他受刺激而发疯，后竟纵火焚烧宫廷。太宗在廷美死后，还对他进行一系列的人身攻击：如《宋史·杜太后传》明载杜氏生五子，廷美位序老四。太宗却对宰相们说，廷美是乳母耿氏所生，以贬低廷美的出身，故意编派出谎言来掩饰自己逼死廷美之行径，甚至不惜向自己父亲的脸上泼脏水。这也让人怀疑太宗说“廷美自小刚愎，长益凶恶”，诸评价的真实性到底如何?这一连串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因已告诉了人们有关的隐情。

可以说，宋太宗亲自导演了这桩栽赃诬陷亲弟弟的冤狱的可能性非常大，《宋史·赵廷美传》将这一冤狱的主要责任归咎于赵普，实际上赵普不过是帮凶而已，他乘机除掉了对手卢多逊，终于出了一口恶气。然而赵廷美是这一狱案的关键，廷美不死，太宗就难以传位给自己的嫡系子孙，元凶应是太宗。然而，史书上依然是赵廷美想抢班夺位，最后自取灭亡的记载，几乎没有留下多少冤情的痕迹。在中国历史上，一些当权者这方面的手段都是相当高明的，使后人根本找不到什么确凿的不利于他们的史证，因为其中的关键史实早已被篡改，许多事实真相都已随着历史的波涛而永远逝去。

名相寇准冤狱寇准寇准乃北宋名相，为人豪放而洒脱不拘，为官正直而气度不俗，敢于犯颜直谏，不畏强权，为世人敬仰。大家知道，北宋澶渊之盟前后，幸亏这位名相处变不惊，力挽狂澜，坚持真宗亲征，宋军得以略挫辽军锐气，最后签订城下之盟。百年后就有宋人说："当年若无寇准，天下已分南北矣!"如此一位功臣，最终却落得贬死岭南的下场。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悲惨结局?寇准自己的行为应承担多少责任?宋真宗、刘皇后及王钦若、丁谓诸人又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太宗朝，寇准已为参知政事(副相)。一天，上朝奏事，寇准所言与太宗之意不合，太宗一怒而起，准备退朝回宫，寇准却上前牵住御衣，要皇帝冷静坐下，继续议事。过后，太宗细细回味其过程，不觉大加赞赏："朕得寇准，犹李世民(唐太宗)之得魏征啊!"

真宗即位后的第七年，即景德元年(1004)，寇准拜相执政。适逢辽国二十万大军南下侵边，来势汹汹，直逼澶州(今河南濮阳)城下，举朝惊恐，主守主战，纷纷不决。寇准力排众议，坚决主战。某天早朝，参知政事王钦若提出请皇上驾幸金陵(今江苏南京)暂避，签署枢密院事陈尧叟建议皇上避难成都。真宗征询寇准意见，寇准厉声回道："若采用此二策，则人心崩溃，敌骑深入，天下还能保吗?何人为陛下画此策，臣请先斩此人祭旗，然后挥师北伐。"王钦若在一边听得面红耳赤，低头不敢作声。寇准又提名王钦若出判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去守前线重镇，王钦若没法推辞，只得上路，心中却记下这笔账。

在寇准的要求下，真宗同意御驾亲征，率军直抵澶州。皇帝亲临前

线，士气大振，加上号令严明，将士用命，开仗之初就射杀辽军大将，略挫敌军锐气。但在真宗厌兵求和的懦弱态度促使下，没能按寇准的强硬主张坚持下去，终与辽国签订屈辱的澶渊之盟，以三十万岁币，换来北方边境的暂时平静。

正当真宗为此战“亲征”有所成果而感到庆幸，对寇准也敬重有加之时，王钦若经过深思熟虑，开始挑拨离间。一天，真宗目送寇准退朝，王钦若在一旁问道：“陛下如此敬重寇准，是否以为他对社稷有功呢?”真宗点头称是。钦若又道：“澶州一役，陛下不以为耻，反以寇准为有功，臣实不解。”真宗愕然，顿问何故。钦若答：“陛下贵为天子，却与外夷作城下之盟，此《春秋》所耻。寇准逼陛下亲征，犹如赌博，输钱将尽而孤注一掷，陛下乃寇准之孤注，逼陛下为如此危险之事，寇准何功之有!”几句话就把真宗说得面颊发青，闷郁不快，自尊心被扫尽，对寇准的敬意和眷宠也随之降格。

同时，寇准在战后有意无意居功自得的架势，也令真宗老大不快。自此，真宗待寇准日渐疏远。不久便罢去其相位，出知陕州。而王钦若却靠此类手段，再次被用为执政。此人貌状矮小，且颈项中有瘤，一幅怪样，时人称“瘿相”。

天禧元年(1017)，全国正沉浸在“天书”、封禅等的迷信闹剧之中，寇准在判永兴军的任上，其属下军官巡检朱能，伙同朝中宦官周怀政，伪造“天书”，想通过寇准上呈，以得皇上恩宠。寇准喜其附己，不辨真伪与忠奸，便忘乎所以地以地方长官的身份上奏朝廷，称有“天书”降干祐山中。一些大臣以为此乃奸臣妄诞，以蛊惑天聪，却不解原来并不相信“天书”的寇准何以会一改初衷。然而真宗已入迷狂状态，宰相王旦也觉得应该让寇准奏上来，所以朝廷下诏令寇准马上回京奉上“天书”。

入朝临行前，有门生劝寇准说：“你若称病，推托不去，实为上策。若人京见驾，便揭发此天书乃奸人伪妄之作，尚可保全平生正直的名声，其为中策。若由此再人中书拜相，自堕志节，恐怕最为下策。”寇准听了不以为然，依旧我行我素，入京奉上“天书”。真宗大喜，正遇王旦离世，王钦若坐事罢职，天禧三年(1019)，寇准再入中书为相。

寇准二度入相，丁谓也再任参知政事，寇准与丁谓原先关系不错，所以曾向宰执推荐过丁谓的才能。丁谓虽博学多才，然狡诈过人，善于揣摩奉迎，智谋而奸邪。某夕，中书用餐，寇准饮羹污须，丁谓殷勤至极，起身为他拂拭干净，哪料寇准并不领情，略带酒意地戏语道："参政乃国家大臣，难道是为长官拂须的吗?"一句话将丁谓说得无地自容，面颊青一阵，红一阵，心中好不懊恼，由是暗怀敌意，伺机报复。

天禧四年(1020)，真宗忽患风疾，病情时好时坏，不能上朝视政，事多决诸刘皇后，丁谓和知制诰钱惟演等人联合起来迎奉刘皇后。寇准和参知政事李迪等人却有后宫擅权的担忧，正好宦官周怀政此时向寇准传达了真宗要让太子监国的想法。一天入宫请安，寇准便向真宗说："皇太子不负众望，愿陛下传以神器。"真宗点头称是。寇准既得皇上允准，便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草表，请太子监国。此时寇准已觉丁谓奸佞，有意让杨亿代丁谓之职。然而，寇准一时酒后漏言，传入丁谓耳中，丁谓当即入诉刘皇后："皇上稍有不适，即当痊愈，奈何令太子监国?寇准谏立太子，当有异图。"

此前，发生过刘氏宗人在蜀地不法事，真宗以皇后亲属之敌，便赦其罪。而寇准却偏提出要依法处置，所以与刘皇后早有芥蒂。此时寇准又站在太子立场上，想限制刘后之权，所以刘后早就想整一下这个寇老儿，便向真宗诬告，说寇准要太子监国将有异图，丁谓也在真宗面前极力诋毁寇准。而真宗不知是病体晕晕，还是出尔反尔，竟记不起自己曾允准过寇准的有关建议，便下诏罢去寇准的相位，以丁谓代之。

宦官周怀政在内廷颇有权势，前因伪造"天书"事，更恩宠有加。此次寇准欲令太子监国，怀政亦预谋其事。寇准因此被罢相，怀政亦遭斥责，并渐被疏离。怀政在忧恐略定之后，想挽回败局，便阴谋杀丁谓，废刘皇后，奉真宗为太上皇，立刻传位太子，并恢复寇准的相位。怀政与其弟怀信，潜召大臣杨崇勋、杨怀吉等人密谋，约以共同举事。不料，有人向丁谓告密，丁谓与枢密使曹利用计议后，入奏宫中。真宗立即下令逮捕有关诸犯，组成众大臣审理法庭，周怀政很快招供伏罪，被斩首示众。此案被牵连的有关官员、亲属有数十人，都被发配边远，寇准也因此被远贬，出知相州。

丁谓又揭发永兴军巡检朱能也是周怀政伪造“天书”的同党，朝廷接着便派使者去永兴军捉拿朱能等人，朱能自度不能免罪，竟然武装反抗，杀死使者，率军造反。最后在数路大军的围剿下，很快溃败，朱能自缢而亡。而寇准曾是朱能上司，且联手进奉“天书”，所以再坐朱能反叛之事，贬为道州司马。

不久，真宗驾崩，仁宗即位，才十三岁，由刘太后垂帘听政。丁谓更是飞扬跋扈，与太后再次将寇准贬为雷州司户参军。雷州半岛为广南最边远地区之一，与海南岛遥遥相望，自然环境相当恶劣，生活条件更是艰苦，将寇准这位六十余岁的老人谪放此地，无疑是要将其置诸死地。越年，寇准便病殁于雷州。

此冤狱中，奸臣王钦若的贬损、丁谓的诬害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寇准自己的行为也存在相当的阙失。在判永兴军的任上，寇准居然与军官朱能、宦官周怀政联手，附和当时全国痴愚病狂的迷信闹剧，用“天书”下降当地的谎言和伪作来博取皇帝的宠信。这样，原来并不相信“天书”的寇准为什么会一改初衷，最终也扮演了一个小丑的角色，而采用这种低级手段来博取相位呢?据说名臣张咏认为寇准有奇才，可惜学识不足。这一行为仅仅是学识不足的原因吗?或者说寇准为了再次入相掌权，而不择手段，哪怕利用奸人和做荒唐事。这就不是学识不足的问题，而是政治品质的问题了。有人说这是中国大多数政治家的一种习惯性思路，它是中国皇权政治的必然产物，所以毁坏自己的名誉或走向冤狱的结局，这都是宿命。那么，寇准到底属于哪一类性质的官员呢?

这案中宋真宗扮演的角色，最令人迷惑。明明是自己先有让太子监国的想法，也亲自同意了寇准的提议，最后居然出尔反尔，不但将寇准罢去相位，贬其出知小州，甚至还要差点追究太子的责任，幸亏参知政事李迪提醒道：“陛下有几个儿子，竟要这么做。”真宗这才觉悟，自己仅此一个继承人。不过也有迹象表明，真宗晚年已病重而糊涂，许多诏旨实为刘皇后一人擅行，就是说寇准冤狱主要是刘皇后矫诏制造的。所以，在寇准早已被贬出京城，真宗还时或会问：“眼前为何久不见寇准?”左右不敢据实回答。总之，此案约在天禧四年之后所下的诏令，已很难分别哪些是真宗清醒时的旨意，哪些是刘皇后矫诏擅行的。在君主专制的中国，每到皇帝晚年，这样的宫中之谜，其实是经常性的节目。

包公断割牛舌案包拯立朝峭直刚毅，为官刚正不阿，似乎一生为民审冤，办了许多大案要案，被誉为中国古代屈指可数的大清官。但其有史可查的审案断案的故事极少，这个割牛舌案恐怕是其正史记载中惟一的断案文字，而就是这惟一的断案文字，也存在真伪的复杂问题。其中的蹊跷，真有点让人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宋史·包拯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案子：包公在知扬州天长县的任上，一天，有个农民哭丧着脸到县衙来告状，说是有人割掉了他家耕牛的舌头，请求缉拿凶手绳之以法。这种小案，一般官员往往是不屑一顾的，更何况此案很难查、出凶手，因为割牛舌不会留下太多的痕迹，要查清可能非常麻烦。此案凶手也没有什么经济利益可图，无非是原告的仇家采用报复性手段，欲其倒霉罢了。所以包公考虑了一下，对原告说："还是回家把牛杀了，然后卖牛肉赚回几个钱吧。"因为牛被割了舌头，吃食困难，估计也活不长了，不如杀了卖肉。农民以为包公不肯受理此案，也只有照此办了。

而当时宋朝法令有"禁杀耕牛"一条，所以很快有人来县衙控告该农民私杀耕牛。包公升堂，勐然喝问道："大胆歹徒，为什么割了人家的牛舌，又来告人家私杀耕牛!"那人一听，十分惊恐，以为事泄，只好一五一十地招供了。包公就是这样采用心理分析方法，把握作案人的下一步行为方式，不用任何侦察手段，就把疑案给轻松告破了。

无独有偶，《宋史·穆衍传》中也记载了一个基本相同的案子。是说穆衍在任华池县令时，也审断了一桩牛舌案，内容几乎与包公所断之案如出一辙，且审理过程与采用方法、断案结果也都一模一样。这就使人不得不产生怀疑：有这样巧的事吗?两案都见于《宋史》，会不会其中一案是抄袭另一案呢?那么哪个是原创者，哪个是抄袭者呢?

有人推断，包公断案的故事不胜枚举，民间流传甚广，然而基本都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后人杜撰的戏曲、文艺作品。查遍宋代所有可靠史料，真正属于断案的故事，且被记入正史的只此一个。既然包公断案的故事都是人们为了神化包公而杜撰的，那么，这个审牛舌案的故事会不会也是为了神化包公而抄来的呢?反之，如果说是《穆衍传》抄袭的话，就缺乏明确的动机，穆衍至哲宗时，累官以直秘阁为陕西转运使，

后加直龙图阁、知庆州，谈不上有什么大政绩、大名声，其历史地位与包拯根本无法相比，后人应该不会为他去抄袭添彩。

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包拯年长穆衍三十四岁，后者就算大器早成，少年及第进士，而任华池县令，这时包拯恐怕至少也已是监察御史了，多年前的神断牛舌案早已传为民间美谈，穆衍很有可能效仿包公断案。据包拯门人张田所编《包拯集》中附录的《国史本传》，其中也早已有此案的记载，可见元朝所修《宋史·包拯传》必有所本。此外，天长县在今安徽，而华池县在今甘肃华池县东南，两地相隔遥远，将一事二载或二事混为一谈的可能性都较小。两事虽然大同，却也存在小异，如包公是嘱原告农民“杀而鬻之”，而穆衍却只“命杀之”。据此，包公审牛舌案是可信的。

如果说两案都是历史事实，只是相隔在两地，相差了二三十年。那么说后案中罪犯是模仿作案，而穆衍想模仿包公的破案方法再次侥幸巧断此案，这都还说得过去。而最后罪犯模仿众人皆知的故事去县衙告发，实为自行投案，使得穆衍有机会再演一遍包公的角色，似乎让人不敢相信：世界上真有如此愚蠢的罪犯吗?

总之，两案毕竟过于惊人地相似，历史会这样重新演绎吗?牛舌案在北宋是发生了一起还是两起?如果只有一起，那么谁是真正的断案者呢?又是谁在故意抄袭呢?

欧阳修“艳词”案欧阳修为北宋大文豪，得唐韩愈真传，发动古文运动，一改当时的浮靡文风。撰有《新五代史》、《新唐书》、《集古录》，有文集百余卷，著作等身，文辞严谨，正气凛然。然而，其词集中“艳词”、“情曲”不少，写得非常柔媚和女性化。这难道也是大文豪的作品吗?为什么如此不谐调?是否有人作伪呢?欧公还因此被牵连进一桩艳情案中，差点陷于牢狱之灾。

庆历五年(1045)，以范仲淹为首的新政改革失败。作为言官的欧阳修，曾首论范仲淹之才能大用，一直站在新政大臣一边，积极支持其有关改革，此时又上疏范仲淹、韩琦等执政大臣不应被罢职，得罪了反对派大臣。加上此前论劾有关权贵的一系列奏章，早就引起政敌的嫉恨，

也被很快罢去言官，以龙图阁直学士出为河北都转运使。不久便陷入一桩“盗甥”罪案之中。

当初，欧阳修有个妹妹嫁给张龟正，没有子女。而张龟正病死时前妻生有一女张氏，七岁时无所依靠，便由其后母带回外婆家欧阳氏扶养。等到张氏十五岁成年，由欧阳修为媒，嫁给了族兄之子欧阳晟。欧阳晟自虔州司户任上罢官回家，发现其妻张氏与奴仆管家通奸，遂扭送张氏到开封府。知府杨日严在前知益州任上，欧阳修曾弹劾他贪赃枉法之事，此次接到案状，一看与欧阳修有关系，便暗下指使狱吏，想办法将案子牵连到欧阳修。

谏官钱明逸得到此消息，更是使出浑身解数，奏劾欧阳修与张氏之间早有私通之情，且贪图其家财。证据之一是欧阳修写的“艳词”《望江南》：

江南柳，叶小未成阴，人为丝轻那忍折，莺怜枝嫩不胜吟，留取待春深。

十四五，间抱琵琶寻，堂上簸钱堂下走，恁时相见早留心，何况到如今。

在狱吏的刑讯下，张氏只得诬认还未结婚时，就与欧阳修通过情，此“艳词”就是当时欧阳修所作，还说了许多不堪入耳的“内情”。一位朝廷大臣居然如此腐败，案情似乎相当重大，朝廷遂派户部判官苏安世和宦官王昭明进行复审。二位复审官还算正直，不敢胡来，最后查明许多事情纯系诬陷和捏造。此审理结果使得朝中掌权的反对派大臣大为恼火，又无可奈何，最后仍以欧阳修用张氏嫁妆中的财产购置田地，而以欧阳氏的名义立田契的罪名，将欧阳修贬谪，降知滁州。苏安世等官员也受到贬降的处分。

上述是一般学者从史籍中读出的狱案故事，也有学者认为此案中欧阳修与张氏确有暧昧关系。如胡适就在《欧阳修的两次狱事》一文中说：“大概张氏一案不会出于无因。狱起时，欧公正三十九岁，他谪滁州后，即自号醉翁，外谪数年而头发皆白，此可见当日外界攻击之多了。”还有谭正壁的《恋张女欧阳修受劾》也持同样的看法，当然他们都

拿不出确凿的证据，只是一种猜疑而已。

那么，这首差点害欧阳修坐牢的《望江南》是其本人所作的吗?有人估计此“艳词”或出自谏官钱氏，其乃吴越国钱氏之后，因欧公《五代史·吴越世家》和《归田录》中多有贬毁吴越钱氏之词，揭露其烦苛淫侈之政，所以故意作此伪词诬诋欧阳修。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欧阳永叔所集歌词，自作者三之一耳，其间他人数章，群小因指为永叔，起暖昧之谤。”所谓“暖昧之谤”，即上述欧阳修的政敌以《望江南》一词诬蔑他有“盗甥(张氏)”之疑的狱案。王灼以为，许多“艳词”都并非欧阳修所作，其词集中只有三分之一是欧阳修自己的作品，其他都是好事者或群小的恶作剧。不过也有学者考证此艳词系欧公所作，储皖峰《欧阳修<忆江南>词的考证及其演变》以为：“他(欧阳修)受了‘情’的支配，便投身于情网中了。他认定着‘人生自是有情痴’，他认定着‘办得黄金须买笑’，便在人群里面肆弄他的轻狂，结下了不少风流情债。”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累官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诸要职。正直敢言，力求改革，是北宋文坛上的领袖人物，儒学大师。为文以韩愈为宗，反对浮靡的文风，倡导有内容的古文，以文章负一代盛名，其文笔对宋代文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人们从他的诗文中，看到的是一位严谨古朴的学者，正气凛然的贤臣。然而他文集中的一些词曲，却又让人们看到的是几个风流倜傥、柔媚动人的少男少女的影子。比如《南歌子》：

凤髻金泥带，龙纹玉掌梳，走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

弄笔偎人久，描花试手初，等闲妨了绣功夫，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

完全是在描绘温柔多情、活泼可爱的少妇对情郎的挑逗和欢爱。再如《鹧鸪天》：

学画宫眉细细长，芙蓉出水斗新妆。

只知一笑能倾国，不信相看有断肠。

双黄鹄，两鸳鸯，迢迢云水恨难忘。

早知今日长相忆，不及从初莫作双。

也在描写少女倾城倾国之美貌，及男女情人们的相思之苦。这类男欢女爱、轻柔妩媚的小词，数量还不少，有的写得浅薄庸俗，情趣低下，有的写得大胆直率，有伤大雅，与上述道貌岸然的欧阳文忠公形象简直判若两人。于是，自南宋时候起，就有人出来为之辩解，认为这些“艳词”绝非出自欧阳修的手笔，而是一些小人别有用心的托名伪作。如南宋绍兴年间，曾慥编选《乐府雅词》在其“序”中说：“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当时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今悉删除。”《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五载，江少虞也说：“公(欧阳修)不幸，晚为险人撰淫艳数曲附之，以成其毁。”

那么，这些“艳词”是什么人所伪作的呢?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认为：“欧阳公词多有与《花间》、《阳春》相混，亦有鄙亵之语厕其中，当是仇人无名子所为也。”蔡条的《西清诗话》则直接指出，其作伪的“仇人”、“小人”是刘辉。《名臣言行录》载：欧阳修“复知贡举，为下第刘辉等所忌，以《醉蓬莱》、《望江南》诬之。”南宋末年，罗泌在整理欧阳修的词作，校订《近体乐府》时，也说：“元丰中，崔公度跋冯延巳《阳春录》，谓其问有误人《六一词》者。今柳三变词亦有杂之《平山集》中。则其浮艳者，殆亦非皆公少作也。”“公尝致意于诗，为之本义，温柔宽厚，所得深矣。今词之浅近者，前辈多谓是刘辉伪作。”

这“刘辉”又是怎样的人呢?刘辉原名几，字子道，后改字之道，信州铅山(今属江西)人。宋仁宗后期，他写文章“好为险怪之语，学者翕然效之，遂成风气”，人称“太学体”。欧阳修正倡导文风改革，对此深恶之。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进士考试，刘几前来应试，其文写得奇奇怪怪，似通非通，欧阳修在他的试卷上批上斗大一个“谬”字，毫不客气地将他刷下榜来。欧阳修排抑险怪奇涩的“太学体”，文风为之一变。嘉祐四年(1059)，欧阳修再度主考，刘辉易名再试，并一改险怪文风，写得务实通畅，欧阳修读其文，大加赞赏，擢为状元。放榜后欧阳修才知，刘辉原来就是刘几。因为刘辉与欧阳修有这段瓜葛，好事者便把这作伪的“仇人”、“小人”附会为刘辉。

应该说这一附会并没有什么确凿的根据，相反从刘辉的为人来看，似乎并不会做这样鄙劣之事。据有关记载，刘辉是一位诚实磊落、宽厚仁道之人士。进士及第后，授官大理评事，曾乞归侍养祖母。在签书建康军节度判官任上，祖母没，辞官归行丧礼。回家乡后，曾置田数百亩，作为救济族人中贫困人家之义田。又建住屋设义学，接待远方前来求学的士人。由于这些善行，官府改称其乡里曰义荣社，名其学馆曰义荣斋。如此善良之辈，会因一次考试落第而嫌恨，而写些“猥亵之词”嫁祸于欧公吗?所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虽说欧公艳词是“仇人无名子所为”，但并不同意这“仇人”便是刘烊。更何况据考证，欧阳修的词集《近体乐府》编定时，欧阳修仍健在。这时刘辉如何作伪呢?

不过，欧公艳词即使不是刘辉伪作，也不排除有其他人伪作的可能。据叶梦得《石林诗话》载，欧阳修嘉祐知贡举时，为力革其浮文之弊，“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平日一些小有名气辈“皆不预选，士论颇汹汹”，不满之情向欧公报复，“因造为丑语”。可见当时落第的一些士人都有作伪的可能。南宋末年罗泌校订的欧阳修《近体乐府》就已相当混杂，估计混有冯延巳、柳永等人的作品，由于无法断定。罗泌不敢将有疑问的作品悉行删去。据后人考订，其中其实杂有白居易、吴融、韦庄、冯延巳、柳永、张先、晏殊、黄庭坚等人的作品，达二十七首之多。欧阳修的另一本词集《醉翁琴趣外编》凡六卷，不知何人所辑，收词二○二首，比《近体乐府》多八十三首。这八十三首词作中，有数首见于词总集《花间集》、《尊前集》和《乐府雅词》，有数首分别见于冯延巳的《阳春集》和张先的《张子野词》等词集中。可见欧公词集的确有点混乱。

有学者认为，《醉翁琴趣外编》是欧阳修手辑，其中包括北宋民间流行的歌词，及冯延巳、晏殊、柳永、张先等词人的作品，当然也有自己的作品。编这样的集子是宋代士大夫的一种风尚，用来让相识的官妓和家里的家妓们习唱，以便花问尊前遣兴娱宾。其中许多作品收入之时并未标出作者姓名，许多本为无名氏之作，但经南宋书商的数次编纂，又伪制苏轼之序，便署撰人为“文忠公欧阳修永叔”，刊印以广为流传。致使许多原为北宋无名氏的作品，后人都认作是欧公所作，如《望江南》、《醉蓬莱》诸艳词都是当时民间流行的俚俗之词，而别有用心者甚至将其与欧公的“盗甥”案联系起来，进行诽谤。总之，《醉翁琴趣外

编》中的七十余首艳词，均非欧阳修所作，他不过搜集编辑而已。

也有学者认为，欧公词集中可能有少数伪作，但说“庸俗”、“浮艳”者全属伪作，未免太过。其实，宋代许多文人都是既写雅诗，又作艳词，非独欧阳修为然。这也反映出他们的生活存在公、私两个部分，“志”和“情”的两个侧面。史料记载有欧阳修玩妓、赏妓，及为妓女作词等日常琐事，作为其真实生活的反映，欧阳修作些艳词也毫不为怪。其实写艳词，倒往往是词人真性情的流露，真生活的享受，何必讳言其事。此外，如确有人作艳词相诬，欧阳修的儿子、门生，岂有不辩之理?而恰恰是他们并未提出过这一问题。到南宋时有人提出怀疑，主要原因是理学逐渐盛行，士人们开始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尤其是道学家将这些“艳词”视为有害儒学文明之作，而百般贬责之。当然，欧阳修这一代儒宗的形象，怎么能和这些“柔媚娇艳”的词作联系在一起呢?由此为之诡辩，实乃一厢情愿。

总之，欧公艳词间或有他人伪作，不必疑其皆伪。当然哪些应为欧公真性情的反映，哪几篇又是他人伪托，哪些是南宋书商搞错，确实已难以断定。

第四十五章

苏轼与王安石乌台诗案苏轼和王安石都是大宋王朝的风云人物、文学大家。在政坛上他们是相互对立的政敌，在文坛上却又有些惺惺相惜。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苏东坡遭际了变法派官员的残酷迫害，乌台诗案后被贬谪黄州。然而就是在遭贬谪的日子里，东坡却道经金陵去谒见了安石，据说两人握手言欢，同游唱和。两人关系到底如何?确令后人颇为难解。

元丰二年(1079)六月十八日，御史皇甫遵奉令到湖州缉拿知州苏轼。苏轼这时刚由徐州改任湖州，上任还不到两个月，就遭到一场凶狠的暴风雨袭击。堂堂一位太守，正坐公堂办事，就被两个狱卒像驱逐鸡犬一样，逮到城外的船上，押送汴京。

苏东坡这次受到四个变法派官员的弹劾：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何正臣、舒亶、国子博士李宜之等人先后四次上书，罪证是别人为苏东坡所刻的一部诗集，诸御史择其要害部分汇编成册，在神宗面前大进谗言，而导火线还在于苏轼到湖州上任后所上的《谢表》。罪名便是在“谢表”和“诗文”中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对新法肆意诋毁，无所忌惮。此案牵涉到东坡的许多作品，也牵涉到一些朋友，其后都受到不同的惩处。

在苏东坡的作品中，确有一些是攻击和嘲讽王安石变法的。然而反对王安石变法，早在熙宁变法开始之初，苏轼就已表明了态度。写出《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先后两次，极论新法之不便，对新法进行了比较激烈而又全面的攻击。如要求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反对青苗法、均输法、免役法和农田水利法等，以为“王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借口批评商鞅，指责王安石“怀诈挟术，以欺其君”，诋毁新党中“新进小生”是“小人招权”，并把新法比作毒药。实行后“四海骚然，行路怨咨”，所以“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就是说新法将会招致国家的败亡。因此，他劝神宗不要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提出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徐徐求进，积十年之功，何事不立。

苏东坡与反对变法的官员司马光、欧阳修、张方平、曾巩、刘挚、刘恕、孙觉等人交往日深，成为反对派阵营中敢于从正面出击而直面敌人的一员勇将。如在送官员刘恕的诗中，东坡就直接攻击王安石，把他比作曹操、张汤，而把与王安石绝交的刘恕比作孔融、汲黯，褒贬反差强烈。在王安石提出科举新法，神宗下诏讨论时，东坡又独持异论，公开加以反对。开封府考试进士，苏轼主考，又发策问影射王安石变法独断专行，将败坏国事。后来司马光曾回忆说，与新党作战，苏轼最为勇敢。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与其父苏洵写《辨奸论》，对他有一定影响。

王安石在这种情况下，也给苏轼以牙还牙般的回击。范缜曾推荐东坡担任谏官，如果推荐成功，那将对变法派十分不利。王安石就通过他担任御史的姻家谢景温，弹劾苏东坡在回四川奔父丧之时，多占船位，贩卖私盐和苏木。王安石下令淮南、江南、湖北、成都诸路转运司，严加调查，搜集证据，并逮捕篙工水卒，进行刑讯穷治。但由于这是个莫须有的罪名，所以调查很久，结果一无所获。苏轼对这种诬陷没有进行任何辩解，但已感到在京压力的沉重，处境的困难，就坚决请求外补，朝廷批准他通判杭州。

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苏轼抵达杭州上任。三年后移知密州(治今山东诸城)，再过三年，改知徐州。其间，王安石曾于熙宁七年罢相，次年复相，由于变法派内部倾轧，年余又再次罢相，判江宁府(今江苏南京)，退居半山园。总之，在乌台诗案发生的时候，王安石已不在中枢执政。然而当政的变法派还是对东坡的讥嘲心存宿怨，决心要除掉苏轼，便上书攻击苏东坡包藏祸心，讪上骂下，嘲讽新法，“无尊君之义，亏大忠之节”，甚至要求将苏东坡正法，以正风俗民心。

苏东坡确有一些嘲讽新法的作品，表达了对某些问题的个人感慨和内心牢骚，其中往往夹杂着对人民的某些同情，及忧国忧民之情怀。而有些加在东坡身上的罪名，纯属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诬陷。如东坡《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中有“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一句，诸御史指斥为反对农田水利法。东坡《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中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宰相王珪居然在神宗面前挑拨道：“陛下飞龙在天，苏轼以为不知己，反欲求地下的蛰龙，非造反而

何?”可以说纯粹在捕风捉影，枉加罪名。

苏东坡从七月十八号入狱，到十二月二十八日，五个多月的时间里，不断受到审问和各种重刑折磨，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变法派也只是为了加给苏轼一个“讥讽朝政”的罪名。最后，苏轼写了长达两万多字的“供状”，承认了有关罪名，表示“甘服朝典”。由于写作而惹出这样的大祸，这是东坡所始料不及的。期间，诗人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屡次想自杀以结束生命。那么为什么神宗这时要惩治苏轼呢?当然对苏轼这样有影响的官员以文字攻击新法，他不无恼怒，但问题是苏轼反对新法的态度早已表明，嘲讽王安石的诗作也早已有过，为什么过了八九年，神宗才严惩苏轼?

同时，又是什么原因最后使神宗宽恕了苏东坡?据说此案也惊动了内宫，由于文才与名声，宫中上下也早知苏轼之名。尤其是仁宗曹皇后在病重之际还想到此事，神宗原想为了祖母病情的好转而进行一次大赦，曹太后却说：“当初仁宗主持科举，回宫曾高兴地说：‘吾今又为子孙得到太平宰相两人。’就指苏轼兄弟。现在你难道要把他杀掉吗?不需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足矣。”神宗只得听命。

或说众臣的救助与说情，也起了相当的作用。大臣张方平、范镇曾上书援救。弟弟苏辙为恳求神宗免哥哥一死，上书乞纳在身官职，以赎兄之罪。变法派官员中也有不同态度者，如宰相吴充就对神宗说：“曹操尚能容忍祢衡，陛下为什么不能容一苏轼呢?”王安石的弟弟、中书舍人王安礼也劝神宗不要杀苏轼。据说，连王安石也说了句“岂有盛世而杀才士乎”的话，传到神宗的耳中，才最后决定宽恕苏轼。

或说还是太祖誓碑起了一定作用，神宗不敢开本朝杀士大夫的先例，怕被后人指责。此外，神宗也颇赏识东坡的才华。据说苏轼在狱中自感凶多吉少，便作《寄子由》二首以嘱托后事，其第二首写道：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其兄弟诀别之深情，使人读了凄然泪下，神宗读后也大动恻隐之心，加上本来并无杀意，所以最后的处分是：责受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这场冤狱虽然结束了，但苏轼于其中所受的迫害与侮辱应是无法忘怀的。甚或后世士大夫提起这件诗案，都会谈虎色变。由于它是王安石变法所引发的，那么苏轼与王安石是否进一步势不两立了呢?历史的回答却是否定的。

元丰三年(1080)二月，苏东坡抵达黄州，过起谪居生活。这个富有理想、富有才华、更富事业心的知识分子，在困厄中艰难度日，其文学创作还走出了一个小高潮。四年后，神宗下诏：“苏轼量移汝州(今河南临汝)。”苏轼只得别离黄州，坐船上路。经过江州、高安诸地，道过金陵，通过几个朋友的斡旋与安排，在那里会见了王安石。

这是元丰七年(1084)的七月，艳阳高照，气候颇热。苏东坡在朋友的陪同下，上蒋山谒见王安石，已经六十四岁的王安石也热情接待了这位比他小十六岁的后辈。有的说是王安石野服乘驴到船上与苏轼相见，然后相游蒋山。十四年来，两人各处异地，未曾一晤。朝廷政坛也已今非昔比，主要是两人在政坛中的地位都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两位过去曾经相互对立的政敌，如今抛却了从前的不愉快，开始握手言欢。东坡与安石同游数日，共览江山之胜，尽论文章学术，互作诗词唱和，甚或谈佛说禅，气氛相当融洽。

王安石对苏轼当然不无成见，不过也看好东坡的文学天才，爱读苏轼的诗文。如对东坡所作《钱氏表忠观碑》一文，认为“绝似西汉”，“直须与子长驰骋上下”。在读到东坡的诗句“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时，抚几而叹：“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一句。”读完苏轼在黄州所作《胜相院藏经记》后，称赞道：“子瞻，人中龙也!”所以在文坛上，王安石也是当时最了解苏轼的天份，并能给予高度评价的人物之一。

苏轼反对新法，对王安石的一些诗文也时有揶揄，如安石《字说》谓：“坡者，土之皮也。”苏轼以“滑者，水之骨也”相讥。但通过十几年来

的观察，对王安石的个人人品，尤其是安石在文章学术方面的成就，还是能实事求是地给予肯定，曾说："王氏之文未必不佳。"当他读到王安石的词《桂枝香·金陵怀古》，也赞叹道："此老乃野狐精也。"所以两人在文章学术方面应是同路人，仍有相当多的共同语言。当时王安石大病初愈，就舍宅作寺，又约苏轼卜居秦淮河边，东坡也不无感激地在和安石的《北山》诗中说：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看来此次会见，两人在感情上有所沟通。王安石曾叹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东坡在离开金陵后，曾写给王安石两封信。王安石也给东坡回了信，劝他"跋涉自爱"。但两人是否已尽释前嫌了呢?似乎也未必。王安石谢世后，由苏轼替朝廷撰写"制词"《王安石赠太傅》，南宋还是有人以为："此虽褒词，然其言皆有微意。"尤其是制词中对王安石变法诸事避而不谈，说明苏轼对此问题采取了保留的态度。苏轼又作"制词"《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对吕惠卿是持谴责和否定的态度，有人以为也"都是把王安石包括在内加以指斥的。"不过，元祐更化时，司马光欲全废新法，而苏东坡却又主张对新法"较量利害，参用所长"，如对免役法如何存利去害，与司马光争得面红耳赤。

总之，苏、王两人的关系，确实极为微妙，迷雾不少，令人无法看透。

史官为何以曹彬为"宋良将第一"

曹彬(931～999)，字国华，真定灵寿(今河北正定)人。曹彬曾在后汉、后周为将，赵匡胤掌握禁军时，见曹彬为人中立不倚，不是公事，曹彬决不会登门造访，至于社交宴游，更是很少参与，因此对他很器重。宋太祖即位后，曾对曹彬说："我过去总想和你亲近，你为何却老是疏远我呢?"曹彬说："我为前朝旧臣，又是前朝近亲，忠于职守，常恐自己一不小心就获罪，哪里还敢随便结交呢?"随即，太祖升迁他为官省使，与王全斌、郭进率领骑兵进攻河东乐平县，招降了敌方将领王超、侯霸荣等一千八百多人，并且俘虏了敌方一千多人。不久敌方又派遣考

进等率兵接战，曹彬率部连续三次击败了对方。干德初(963)，辽州刚刚平定，河东召请契丹六万骑兵前来攻取平晋，曹彬与李继勋等率领将士严阵以待，大获全胜。

曹彬干德二年(964)冬天，讨伐蜀国，曹彬为都监。当地郡县被攻克后，将领们都打算用屠城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私愤，只有曹彬下令部下不得滥杀无辜，因此曹彬所到之处，民众都心悦诚服。太祖得知后，下诏褒奖了他。两川平定后，其他将领昼夜宴饮，纪律松散，部下士卒到处抢夺，蜀人为此特别苦恼。于是顷刻之间，蜀人在全师雄的率领下，拥兵十万，与宋王朝的军队对峙。曹彬与刘光毅率部在新繁击败了对方，蜀地最终才平定下来。战争结束后，许多将领大都夺取美女及金银珠宝，只有曹彬的车厢中全是书籍。等到返回京师，太祖认为曹彬廉洁谨慎，于是封他为宣徽南院使、义成军节度使。曹彬入见太祖，辞让说：“征伐蜀地的将士都违法犯纪了，唯独我受到奖赏，恐怕不能服众。”太祖说：“你有大功，而不夸功，应当受到奖赏，不应该辞让。”

开宝八年(975)，太祖派曹彬与南唐后主李煜作战。曹彬每每延缓进军的速度，希望李煜归服。十一月，曹彬又派人告谕李煜说：“形势发展到今天，所该珍惜的应该是全城人的生命安全，如果您能归顺宋王朝，这才是上策。”等到城快要被攻克时，曹彬忽然称病，所有的将领前来问候。曹彬说：“我的病并不是药物可以治好的，只要你们诚心诚意地发誓，等到攻克城池的那天，不要滥杀一人，我的病自然就好了。”将领们都焚香为誓，许下了诺言。城池攻陷后，李煜率领他的臣属一百多人请罪，曹彬用宾客之礼加以款待，然后请李煜人宫改换衣装。左右的人悄悄对曹彬说：“李煜入宫后倘若有什么不测，怎么办?”曹彬答道：“李煜素来优柔寡断，既然已经投降了，肯定不会自杀。”李煜及其群臣，也因此得到保全。等到凯旋归来，入见太祖时，只称自己是“奉敕江南干事回”。当初，曹彬统兵攻伐李煜时，太祖许下诺言说等到攻克了李煜，定当封他为使相。副帅潘美庆贺，曹彬说：“不会如此，行军打仗，依靠的是天子的威望，遵循的是祖先的功德，才能成事，我有什么功劳呢?更何况使相是官位的极品!”潘美说：“这怎么说呢?”曹彬说：“太原还没有平定。”及平定李煜还朝后，太祖果然说：“本来应该封你为使相，但太原尚未平定，你稍微等待一下。”

太宗即位后，升曹彬为同平章事。太宗决议要征伐太原，召见曹彬问道：“后周世宗与太祖都亲往前线征战，为什么不能攻克?”曹彬回答道：“世宗时，史彦超在石岭关吃了败仗，军情动摇，因此只能班师回朝；太祖把军队驻扎在草原，刚好碰上多雨，士兵大多生病，所以只好中止。”太宗又说：“我打算征讨太原，您的意见如何?”曹彬答道：“以国家现在的实力，攻打太原这样一座孤城，就像摧枯拉朽一样，有什么不可以的。”太宗于是拿定了主意。太平兴国三年(978)，曹彬随从太宗征伐太原，因有功又加封了侍中的职务。太平兴国八年曹彬，被弥德超诬陷，罢为太平军节度使。十多天后，太宗发觉这是诬陷，所以进封曹彬为鲁国公，对待他更加信用。

咸平二年(999)，曹彬病重，太宗亲往探询，赏赐白金一万两。并问曹彬打算怎样安排后事，曹彬说：“我没有什么事可说，我的两个儿子颇有将才，如果我能举荐的话，他们两人都堪当将领。”太宗又问谁更有才干，他回答说：“曹璨不如曹玮。”这年六月，曹彬逝世。八月，太宗下诏让曹彬与赵普配享太祖庙，以示殊荣。

所以史官评价道：“君子谓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唯彬为宋良将第一，岂无意哉?”

“平岭表、定江南、征太原、镇北门”，潘美有何功绩潘美(921～987)，字仲询，大名(今河北大名)人。潘美年轻时曾对同乡人王密说：“后汉将亡，天下有改朝换代的征兆。大丈夫不在这个时候取得功名，获得富贵，碌碌无为与普通人同生死，是一件羞耻的事情。”

开宝三年(970)，太祖征伐岭南，任潘美为行营诸军都部署、朗州团练使，进攻富州，刘鋹长派遣将领率兵一万多人前来支持，与潘美相战，潘美大获全胜，乘胜攻克了贺州。这年十月，潘美率部又连续攻克昭、桂、连三州，而西江的各州也先后投降了宋王朝。于是接着进攻韶州。韶州是广州的北门，敌方在此聚集了十多万兵马。潘美挥兵进军，攻占韶州，消灭了敌人几万人。刘钱迫于形势，只好派遣他的大臣王圭前来请求和好，又派遣他的左仆射萧漼、中书舍人卓惟休上表求降。潘美把太祖的旨意告诉了敌人：如果敌方能战，就和他们战到最后；如果不能战，就让他们把守；不能把守，就劝他们投降；不愿投降，就让他

们死；他们不死，就让他们逃亡，如果不符合这五个条件，就不要接受敌人其他的请求。

刘鋹只得派遣他的弟弟刘保兴率领士卒抵抗宋王朝的军队，潘美当即率部前往，来到距离广州城一百二十里的地方驻扎下来。刘鋹拥兵十五万，环绕山谷，坚壁以待。潘美视察军情后，对其他将领说："敌方使用竹木为栅栏，如果用火攻，对方必然溃乱，然后用精兵左右夹击，肯定会大获全胜。"因此潘美分别派兵几千人，每人手持两把火炬，秘密潜伏在栅栏旁边。等到天黑，一齐点火，火借风势，燃烧得特别旺盛，潘美挥兵急攻，刘鋹长大败，被斩几万人。于是潘美乘胜追击，长驱直入广州，并擒获刘鋹，随即送往京师。

开宝七年(974)，太祖商议征讨江南。九月，太祖派遣潘美与刘遇等率兵先赴江陵。十月，又令潘美与曹彬同行，向秦淮方向进军。当时舟楫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潘美就下令说："我接受诏令，率领几万强将精兵，旗开必胜，怎能被秦淮河水隔而停滞不前呢?"于是挥兵渡河，大败了南唐的军队。接着进逼金陵，李煜在金陵城中布防水、陆兵共计十万，潘美率兵袭击，大败对方。国主李煜感到非常危急，只好派遣徐铉前来请求不要急于攻城，太祖不答应，仍然诏令各方将领进攻，以促使李煜归附朝廷。李煜优柔寡断，潘美和大将曹彬日夜攻城并进，最终平定了南定。

太平兴国四年(979)，太宗派遣将领征讨太原，潘美为北路都招讨，判太原行府事。平定并州后，接着征伐范阳，任命潘美为幽州行府事。等到班师回朝，太宗又任他兼领三交都部署，留守捍卫北部边境。三交在西北三百里之外，地名叫固军，这里地势险阻，是北部边境的咽喉。潘美派兵偷袭，因此据为宋有。又积粮屯兵于此，从此北部边境得以安宁。

为什么说李沆是"圣相"

李沆(hǎng)(947～1004)，字太初，洺州肥乡(今河北肥乡)人。李沆年少好学，器度宏远，他的父亲李炳曾对人说："我的这个儿子他日必定能够当上宰相。"太平兴国五年(980)，李沆考中进士甲科，由此走上仕

途。

淳化二年(991)，李沆判吏部铨，某日陪侍太宗游宴，太宗对其熟视许久，说："李沆风度端庄高雅，真有贵人之相!"第二年，便拜给事中、参知政事，后因事被罢。真宗即位，又迁其为户部侍郎，参知政事。并于咸平初年(998)，升任宰相。当时契丹侵犯边境，真宗赴边督战，命李沆留守京都，京都被治理得井井有条。真宗曾询问治理国家的关键，李沆回答说："不要任用浮薄新进、喜欢生事邀功的人，这是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真宗又问具体指的是那些人，他说："像梅询、曾致尧等就是。"

一个傍晚，真宗派使节持手诏告谕李沆，打算立刘氏为贵妃，李沆当使者的面把手诏烧掉，并让使者附带上奏说："就说微臣李沆以为这件事行不通。"真宗最终取消了立刘氏为贵妃的念头。时间长了，真宗对李沆从来就没有密奏感到特别奇怪，便问李沆："朝中大臣人人都有密奏，唯独你没有，这是为什么?"李沆回答："我是宰相，公家的事就以公开讲，哪里用得上密奏?况且作为臣子而有密奏，不是谗臣就是佞臣，我特别憎恶这些人，怎么还能效法他们呢?"

当时，李继迁叛逆已久，实力日渐强大，企图谋取朔方。朝廷内外都认为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是必争的战略要地，如果丧失，则周围的郡县都不能保全。真宗很疑惑，于是垂询李沆。李沆说："李继迁一天不死，则灵州一天不能回归朝廷。倒不如给当地州将发密诏，让军民迁入内地，这样，李继迁得到的只不过是一座空城罢了。"由于议论各异，真宗没有采纳其策，没过多久灵州就陷没了，真宗于是对李沆更加信重。

李沆为宰相时，王旦为参知政事，西北边境战事非常频繁，王旦感叹道："我们如何才能等到太平，享受优游无事的快乐呢?"李沆说："稍微有点忧患，可以引起警戒。以后如果四方太平，朝廷未必就没有事了。"后来契丹主动请求和亲，王旦问他怎么样?李沆说："好是好，然而边患没有了，恐怕皇上的奢侈之心就会产生了。"王旦以为不会如此。李沆又以境内四方的水旱盗贼之事上奏，王旦认为琐细小事不应当烦劳皇上。李沆正色说："皇上年少，应当知道四方的艰难。要不然，血气方刚，不是留意于声色犬马，就是沉溺于土木、甲兵、祷祠之事。我老

了，已看不到这个结局了，但这正是您日后之忧啊。”等到李沆死后，真宗以为契丹已和，西夏献纳款项，于是日渐骄奢，大搞封禅，大营宫殿，而且还起用佞臣王钦若、丁渭等。王旦方才大悟李沆的先见之明，于是叹道：“李沆真是贤圣之人啊!”当时的人也称李沆为“圣相”。

为什么说沈伦为官“清介醇谨”

沈伦(909～987)，字顺宜，开封太康(今河南开封)人。太祖即位，沈伦自宋州观察推官召为户部郎中，奉旨出使吴越，上奏了十多件与民有利的事情，太祖均听纳了。归朝，道经扬、泗两州，恰逢饥荒，郡中长吏对沈伦说：“郡中的军用储粮尚有百多万斛，如果借贷给农民，到秋收后回收新粮，这样，公私都受利，不过，这件事只有由您上奏才行。”入朝，沈伦便把这件事悉数奏上。朝廷官员反对说：“现在以军粮赈济饥民，如果到时候回收不了，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呢?”沈伦回答道：“朝廷以军粮济民，必当招来祥瑞之气，导致五谷丰收，哪里还有什么水灾旱灾呢?这件事应当取决于皇上。”太祖当即命令发放军粮，以赈济百姓。

建隆四年(963)，宋王朝征伐蜀国，沈伦被任为随军水陆转运使。蜀平后，大将王全斌、崔彦远进入成都，巧取强夺民家的玉帛子女，沈伦却独居佛寺，只吃素食，有人把珍异奇巧的宝物进献给他，都被他严词拒绝了。还朝，沈伦囊中所有，仅仅是几卷图书而已。太祖知道后，于是贬斥了王全斌等，以沈伦为户部侍郎，枢密副使。

起初，沈伦居第简陋，但他淡然处之。当时的权贵大多违犯禁市，买来秦、陇间采伐的高大树木，营造自己的私人住宅，筹事情败露后，才向太祖启奏。沈伦因为母亲的缘故，也曾买了这样的木材营建佛寺，于是也向太祖上奏。太祖笑着说：“你哪儿犯禁令了?”又知道沈伦没有营造私第，便派遣中使按照指示，给沈伦营建私宅。沈伦又私下对使者说，但愿规模狭小一点，使者告诉太祖，太祖也就依从了沈伦的意见。

沈伦为官“清介醇谨”，还表现在他担任宰相的时候，如果遇到饥荒岁月，乡闾邻居向他借粮的，都会借给他们，累计超过了千斛，一年后，沈伦却把所有的借券都给焚烧了。

宋太宗为什么说“蒙正气量，我不如”

吕蒙正，字圣功，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太平兴国二年(977)，吕蒙正以进士第一名的成绩登第。不久，即升迁为都官郎中，人为翰林学士，又升为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着他讥讽说：“这就是参知政事吗?”蒙正假装没有听到，便走了过去。同僚为蒙正抱不平，于是诘问那位朝士的姓名，蒙正急忙阻止他们说：“假如一旦知道他的姓名，那么终身都不能忘怀，倒不如不知道更好。”当时的人由此都非常佩服他的度量。

李昉罢相，吕蒙正得拜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蒙正为人平和宽简，名望很高，以正道为己任，遇事敢言，讨论时政时，他认为有不妥处，会坚决地宣称不可以，太宗于是赞赏他没有隐讳。赵普作为开国元勋，而蒙正只是后进，二人共同担任相位，赵普也对蒙正颇为推许。

太宗曾经设宴，蒙正侍候左右，太宗对他说：“五代以来，生灵涂炭，当时都说再也不会有什么太平日子了。而我鞠躬尽瘁，日理万机，达到今天这样的繁盛，于是知道兴衰治乱乃在于人事。”蒙正从席位上站起来说：“皇上所在的地方，各色人马都聚集在这里，因此特别繁盛。但我曾看到都城外不出几里的地方，因为饥寒交迫而死亡的人，实在不少，所以，并不是全国都这么繁盛。还望皇上更多地体察民情，这才是苍生的大幸。”太宗神色忽变，沉默了下来。蒙正却若无其事地回到自己的席位，同僚都赞叹他直率。

有一次，太宗打算派遣使节出使契丹，诏谕中书挑选人才，吕蒙正推荐了一人，太宗不许。过了几天，太宗连续问了蒙正三次，蒙正三次都以这个人作答。太宗说：“您为什么这样偏执呢?”蒙正回答说：“我并不是偏执，大概是皇上您没有理解我。”接下来吕蒙正又说：“这个人可以出使，其他的人都不及他。我不想用谄媚之道，随便依从皇上您的意愿而耽误国家大事。”同僚都为他捏了一把冷汗。太宗退朝后对左右说：“蒙正气量，我不如。”于是用蒙正所推荐的那个人出使契丹，果然十分称职。

为什么说温仲舒与寇准并称“温寇”

温仲舒(944～1010)，字秉阳，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太平兴国二年(977)，温仲舒进士及第。端拱三年(989)，被拜工部郎中、枢密直学士，知三班院。这年秋天，出现彗星，太宗以为不详，于是在别殿召见群臣商议。温仲舒上言，认为这是因为朝廷平定太原以来，战祸连年，黄河以北农桑废弃，而赋税却不断增加，因此民生凋敝，户口锐减。所以温仲舒劝谏太宗推恩保民。太宗深为赞赏，下令罢免了黄河以北的所有赋税。

淳化四年(993)，温仲舒出知秦州。秦州人口杂居，有羌、戎等少数民族，聚居在渭河以南。当时的大洛、小洛门寨出产木质优良的木材，都被这些少数民族所占据。朝廷每年派兵卒到此采伐树木供给京师，都必须先向这些少数民族献纳钱财，即便如此，还是经常遭到抢夺，甚至杀掠，因此成了大患。温仲舒到任后，马上在这些少数民族的关键部位部署兵力，并以恩威诚信告谕当地少数民族的首领，因此许多部落纷纷献地，归附朝廷。不久，温仲舒又把他们的部落迁移到了渭河以北，并且创建军事基地，以限制他们的扩展。当地的民众很感激他的恩惠，把他绘成画像加以祭祀。

温仲舒为人敏于应酬。少年时与吕蒙正相交很厚，又是同年登第。温仲舒开始时仕途不畅，废弃多年，吕蒙正位居中书，极力引荐他。等到温仲舒被任用后，反而攻击吕蒙正，因此被人鄙薄。又因为温仲舒自从被拜右正言开始，到两度出任枢密使止，都与寇准同进，所以被当时的人并称为“温寇”。

为什么说陈恕是“宋人能吏之首”

陈恕，字仲言，洪州南昌(今江西南昌)人。太平兴国二年(977)进士，被任为大理评事，通判洪州。陈恕以洪州为自己家乡推辞。改任澧州。澧州自从唐末以来，都为节度藩镇共同管辖，当地官吏因为这种管理体制上的混乱，而大多作奸犯科，违法乱纪。陈恕到任后，除掉了这积淀已久的种种弊端，郡中的人都称他英明果决，因此以吏才闻于当时。后被召为河北东路营田制置使，太宗问他有关农战的情况，陈恕回

答道："古代的士兵都出自农民，没有敌人就耕田，有敌人来了就作战。现在的士兵都来自于招募，衣食供给都来自官府，如果让他们既要抵抗敌人，又要耕种田地，万一有什么变化，那就后悔莫及了。"太宗于是打消了让士兵耕作的念头。不久，陈恕知代州，入判吏部选事，拜盐铁使。陈恕很有计谋，将以前的弊病统统去掉，太宗非常器重他，在宫殿的柱壁亲笔题词"真盐铁陈恕"。随即被迁升为给事中、参知政事。

几个月以后，太宗与陈恕谈论，提到了户部使樊知古玩忽职守，不能完成本职工作。陈恕与樊知古交好，因此在聊天的时候，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樊知古，想让其严格履行他的职责。樊知古却向太宗陈诉，太宗知道是陈恕泄露了机密，盛怒之下，罢免了陈恕的官职，并出贬江陵府。在江陵府，陈恕大力揭发当地贪官污吏，而且流放、罢免了气节相当恶劣者，江陵府因此得到大治。

淳化四年(933)，太宗听从魏羽、段惟一的请求，把三司分为十道，召陈恕为工部侍郎，充总计使，判左右计事，所有事务都令陈恕参预。陈恕认为这些部门过于庞杂，政令不能统一，肯定坚持不了多久，因此极力上言太宗。实践一年多后，果然证明陈恕的看法是正确的，太宗只好停罢了把三司分为十道的做法。真宗即位，加封陈恕户部侍郎，命他尽快把府库中有关钱物的数目呈交上去，陈恕却久不进献，真宗多次催促他，陈恕才加以进献，并对真宗解释说："皇上年纪还轻，如果知道府库充实，担心会让您产生奢侈之心，我因此不敢进献。"真宗听后，对陈恕颇为嘉赏。

陈恕精通历史，颇识典故，精于吏治，并且为政深刻，别人不敢私下求他帮忙。他前后掌管国家的经济权柄十多年，忠于职守，强力干事，同僚畏服，有称职的美誉，因此被前史官人评为"宋人能吏之首"。

"杨无敌"说的是谁杨业，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年少时倜傥任侠，善于骑射，喜欢打猎，所获猎物常常是同伴的数倍。他曾经对同伴说："我将来为将用兵，也会像老鹰、猎犬追击兔子、野鸡一样。"二十岁时事奉刘崇，被任为保卫指挥使，以骁勇闻于当时。被升迁为建雄军节度使，又屡立战功，所向披靡，因此被称为"无敌"。

宋太宗征伐太原，很早就听说他的威名，打算用高价聘求他。不久，太原陷入危险境地，杨业劝谏他的主帅继元投降，以免生灵涂炭。继元投降后，太宗立即派人召见杨业。入见后，太宗特别高兴，任命他为右领军卫大将军。太宗以杨业素来熟悉边境事务，因此又迁升他为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有一次，契丹派兵侵入雁门关，杨业带领几千骑兵从西陉出发，沿着小路来到雁门关北边的关口，从背后勐击契丹兵卒，契丹军队几乎全军覆没。杨业因为战功又被升为云州观察使，仍判郑州、代州。从此以后，契丹只要望见杨业的旌旗，就会主动引退。戍边的主要将领大多忌妒他，有的甚至暗地里向太宗上疏指斥杨业的不是，太宗看后都不予理睬，把它们封好后一同交付给杨业本人。

雍熙三年(986)，宋王朝大举北征，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路行营都部署，杨业为潘美的副将，又以王侁、刘文裕率兵加以接济。各路军马相继攻下了云、应、寰、朔四州。不久，太宗下诏让四州的民众内迁，并令潘美等用军队护送。当时，契丹的国母萧氏，与大臣耶律汉宁等率兵十多万，再次攻陷了寰州。杨业于是对主帅潘美等说：“现在辽军气势很盛，应该避其锋锐。朝廷只是命令争取这几个州郡的民众，只要领兵从大石路出来，先派人秘密地告诉云州、朔州的守将，等到大军离开代州的时候，让云州的民众先出来。然后我们的军队进驻应州，契丹肯定会来阻挡，这样便可让朔州的民众出城。之后我们的军队直奔石碣谷，并派遣一千多名弓箭手守住谷口，用骑兵从中路支持，这样，三州的民众，便可万无一失了。”王优当即反对说：“率领几万精兵而如此惧怕敌人，肯定会遭人笑话，倒不如从雁门关的北川直接向敌方发动进攻。”刘文裕对王侁的意见表示赞同。杨业坚持认为这样不可以。王优便挑衅地说：“您向来被称为无敌，现在看见敌人气势嚣张，您却逗留不战，是不是有反叛之心呢?”杨业迫不得已，只好违背自己的意愿，主动请缨，担任前锋。将要出征的时候，流着眼泪对潘美说：“这次出战肯定会不利，不过既然各位将领都以为我是贪生怕死而避让敌人，那么我就请求担任先锋，以表达我对朝廷的忠心。”接着又指着陈家谷口说：“您和各位将领应当在那个地方部署步兵和弓箭手，作为支持，等到我转战到这个地方，您就下令夹击敌人而营救我们，否则，我方将会全军覆没。”

潘美和王优于是率领士兵部署在陈家谷口。过了几个时辰，王倪派

人登上托逻台了望，契丹佯装败走，王优想争战功，随即率领部下离开谷口。潘美不能制止，于是也令部队沿着灰河的西南方向行进了二十里。顷刻，王倪听说杨业战败，马上又挥兵逃遁。杨业孤军奋战，从中午战到傍晚，果然来到陈家谷口。杨业一看谷口空荡无人，抚膺大哭。只好率领部下再次全力出击，在自己身上有几十处伤口，士卒将尽的情况下，杨业还亲手杀了百来个敌人。后来，因为战马遭受重伤，不能前进而被敌人俘获，杨业的儿子延玉也英勇战死。杨业于是叹息说：“我为奸臣所迫，以致战败，还有什么脸面活着呢?”因此绝食三天而死。杨业死后，太宗深为痛惜，并下诏褒奖。王优、刘文裕则受到了严厉的处罚。

杨业为将忠烈武勇，颇有智谋，又能和士卒同甘苦，所以深受部下的爱戴。朔州战败后，他的部下还残存一百多人，杨业对他们说：“你们都有父母妻子，和我一同战死也于事无补，倒不如各自逃命去吧。”部下泪流沾襟，却没有一个肯离去，因此没有一个生还的人。

第四十六章

宋太宗为什么说“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征也”

寇准(961～1023)，字平准，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寇准年少英迈，通晓《春秋》三传，十九岁中进士第。太宗取士有一个习惯，中进士者必须当面考核，年纪太小的人往往会被斥退。寇准进士及第前，有人便教寇准增加年龄，寇准愤怒地说：“我正处进取之际，怎么能够欺君罔上呢?”中第后，被太宗授为大理评事，知归州巴东、大名府成安县。不久，擢为尚书虞部郎中、枢密院直学士。寇准曾在宫殿中上奏陈事，言语不合太宗的旨意，太宗愤怒地站了起来，寇准拉住太宗的龙袍，让太宗重新坐了下来，事情解决了，才让太宗离去。太宗事后非常嘉赏他，曾对左右说：“我得寇准，就像唐太宗得到魏征一样。”

淳化二年(991)春天，大闹旱灾，太宗召见近臣谈论时政得失，其他大臣都认为这是天命，唯独寇准认为这是刑罚不公平导致的。太宗极为生气，拂袖进入禁宫。顷刻，又召见寇准问其不平具体表现在哪里?寇准说：“陛下如果把二府之官召来，我便把这件事说出来。”太宗即令二府官员王沔入殿，寇准于是说：“不久前祖吉、王淮都违法受贿，祖吉受贿少而被诛，王淮因为是参知政事王沔的弟弟，受贿至千万，只是杖打一顿，仍然恢复了他的官职，这难道还公平吗?”太宗责问王沔，王沔叩头谢罪，因此太宗知道寇准可以大用。随即便拜寇准为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改同知院事。

寇准与张逊一向不和。有一天，寇准与温仲舒同行，在路上碰到一位狂夫高呼寇准万岁，判左金吾王宾与张逊相友善，所以把这件事告诉了张逊，张逊立即向太宗禀奏。寇准让温仲舒作证，张逊则让王宾启奏，争执特别激烈，互揭短处，太宗发怒，贬谪了张逊，寇准也罢知青州。太宗素来器重寇准，寇准外任后，太宗颇为想念，常常郁郁不乐，曾对左右说：“寇准在青州还好吗?”左右回答道：“青州是一个好地方，应该不会很苦。”过了几天，又问这个同样的问题。左右揣知太宗想召还寇准，于是对太宗说：“陛下时刻不忘寇准，听说寇准每天纵酒，不知是

否也在想念陛下?”太宗不语。第二年，仍拜寇准为参知政事。

至道元年(995)，太宗又加封寇准给事中。当时太宗在位已经很久，冯拯等上疏乞立储君，太宗颇为恼火，把冯拯贬斥到岭南，朝廷内外再也没有谁敢议论这事。寇准刚从青州召还，入见太宗，太宗便迫不及待地询问寇准：“我的诸多儿子中到底哪一位可以继承皇位?”寇准回答道：“陛下为天下选择未来的君主，与妇人、宦官谋议，这不可以；与亲信的大臣谋议，也不可以；这件事只有陛下您自己单独决定。”太宗沉思了许久，屏退左右，对寇准说：“襄王可以吗?”寇准说：“知子莫如父，陛下既然认为可以，愿立即决定。”太宗于是立襄王为皇太子。庙祭回来的路上，京师的人们夹道欢庆，说：“真是少年天子。”太宗听后不高兴，召见寇准说：“人心忽然之间全都归属太子，我将处于怎样的位置?”寇准称贺道：“这才是国家的福祉。”太宗才高兴起来。

至道二年(996)，太宗在南郊祭天，朝廷内外的官员都得加官晋爵。寇准平时看中的官员，大多得到了请要的官职。冯拯愤怒，上奏太宗寇准擅权专任，又上陈岭南官吏升迁不平的事实。广东转运使康戬也上言说吕端、张洎、李昌龄都是寇准引荐，因此寇准得以胡作非为，败乱朝政。太宗于是引见寇准，并说到冯拯的上奏，寇准自我辩解。太宗说：“如果是廷辩，那么你便有失执政的大体。”寇准仍然力争不已，又拿了中书省的判决来到太宗面前，太宗更加不高兴，因而叹道：“鼠雀都能知道人的意思，何况是人呢?”因此谪寇准知邓州。

为什么说丁谓“几败国家”

丁谓(966～1037)，字谓之，苏州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丁谓年少时与孙何友善一同拿着文章去拜谒当时的文坛盟主王禹偁，王禹偁大为惊赏，认为自唐韩愈、柳宗元后，二百年间始有此作。所以当时人将他与孙何并称“孙丁”。淳化三年(992)，丁谓登进士甲科，被任为大理评事、通判饶州。景德五年(1008)，丁谓因防河有功，被封为权三司使，掌管财政大权。

大中祥符初(1008)，真宗商议封禅泰山，未作出决定，真宗问丁谓经费是否够用，丁谓回答说有余，因此封禅之事得以最终确定。接着，

真宗又准备修建玉清昭应宫，以存放“天书”。对此，许多官员上谏反对。真宗召见丁谓询问，丁谓说：“陛下拥有天下之富，建筑一宫侍奉上帝，用来祈祷陛下的后代。如果群臣中还有谁反对，就这样回答他。”宰相王旦秘密上疏劝谏，真宗如法回答，王旦再也不敢议论了。后来，祭祀汾阴，修建会灵观，再建景灵宫等，丁谓都担任了主要的角色，浪费了不少朝廷的财政开支。

真宗天禧三年(1019)六月，王钦若因事罢相，寇准再次入相。丁渭本来是寇准的门生，这时已当上参知政事，并且事奉寇准非常谨慎。有一次，同僚会餐，羹汤沾到了寇准的胡须上，丁谓立刻起身，来到寇准跟前仔细地把它擦干净。寇准很厌恶他的为人，便讥笑他说：“参知政事是朝廷的重臣，怎么能够为上司擦胡须呢?”丁谓因此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天禧四年(1120)，寇准欲以太子监国，由于计划不太周密，被丁谓等告发寇准试图谋反，寇准因此被贬到岭南，丁谓最终爬上宰相的位置。

仁宗即位，丁谓又进封司徒兼侍中，为山陵使，寇准被再贬，并且凡与寇准友善的官僚，丁谓把他们全都逐出。由于仁宗年幼，政事大多取决于刘太后。丁谓于是私下勾结内侍雷允恭。这样，翰林学士拟订的制诰，雷允恭都先让丁谓过目，然后才进见。因此，二人狼狈为奸，肆无忌惮。随后，雷允恭为山陵都监，负责真宗陵殿修建，但因择地不当而受罪。丁谓极力庇护雷允恭，为刘太后所知，刘太后便与仁宗在承明殿召见大臣冯拯、曹利用等，并对他们说：“丁谓身为宰相，却与宦官交结。况且，丁谓以前依附雷允恭奏事，都说他与你们议定，因此奏章都得以批准。更为罪不可赦的是，负责营建真宗的陵殿，却擅自迁移地方，差点误了大事。”冯拯等上奏说幸亏太后与陛下发觉了丁谓等的奸邪之状，这真是国家的福祉，于是贬降丁谓为太子少保，分司西京。不久，丁谓作奸犯科的旧事一一败露，因此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因为丁谓而受牵连的官僚自参知政事任中正以下有十多人。

不过，丁谓为人机敏，有智谋，记忆力超人，几千字的文章，均能过目不忘。而且喜欢做诗为文，至于绘画、下棋、博戏、音乐等，无不精通。但是他的才智不用于正道，而是勾结小人，残害忠良，贪财贪权，贻误国家，所以史官评价他说：“党恶丑正，几败国家，(丁)谓其尤

者哉。”

“鱼头参政”谓谁鲁宗道鲁宗道(966～1029)，字贯之，亳州谯(今安徽亳县)人。年少丧父，寄养于外公家，他的几个舅舅都是习武之人，因此对鲁宗道颇为轻视。鲁宗道更加发奋读书，进士及第后，被任为濠州定远尉，调为海盐县令。海盐县的东南原来有港口，引导海水到城邑之下，年久岁深，港口被泥沙堵塞，失去了功效，鲁宗道因此征发县里的壮丁疏理，不久就完工了，人们得到了极大便利，而这个港口则被改名为“鲁公浦”。天禧元年(1017)，擢为右正言。鲁宗道利用职务之便，对朝廷大事多有议论，真宗对他颇为厌烦。一天，真宗召见他，他乘机上言道：“陛下用我，难道只是想猎取纳谏的虚名吗?我自己对尸位素餐感到羞耻，还是请您罢免了我吧。”真宗对他安抚了许久。过了一段日子，在宫殿的墙壁上写下了“鲁直”的字样。随即授鲁宗道为户部员外郎兼右谕德。

仁宗即位后，迁鲁宗道为户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判吏部流内铨。他在任内精简办公程序，严厉惩罚为非作歹的官吏。当时，章献太后临朝执政，问鲁宗道说：“你认为唐代武后与高宗相比，谁更有能耐?”鲁宗道回答道：“武后是唐代的罪人，差不多断送了国家社稷。”章献太后沉默了许久。这时又有官员请为刘太后家立七庙，章献太后向辅臣征询意见，没有谁敢回答。鲁宗道站了出来，说：“如果为刘太后家立七庙，那么皇上又该如何处置呢?”章献太后觉得有道理，于是接纳了鲁宗道的意见。

仁宗在朝时，朝廷的高级官员多让自己的孩子在馆阁读书，鲁宗道不平地说：“馆阁应该培育天下英才，岂能只是纨袴子弟独受恩泽的地方。”枢密使曹利用此时恃权骄横，鲁宗道在仁宗面前屡屡指摘他。因此，皇帝国戚及朝廷高级官僚都很害怕他，把他视为“鱼头参政”，这是从他的姓中取得，而且还包含了他为官言事就像鱼头一样鲠直的含义。

鲁宗道为人刚正，嫉恶少容，遇事敢言，不拘小节。这还表现在他担任谕德时，有一次曾微服在外边的酒店饮酒，真宗有急事召见他，使者到他家等了许久，鲁宗道才从酒店回来。使者把情况告诉他后，又对他说：“如果真宗怪罪下来，我将如何回答?”鲁宗道对使者说：“你就实

话实说。”使者又疑惑地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您又当获罪。”鲁宗道又说：“饮酒是人之常情，而欺君却是滔天大罪。”真宗果然责问使者，使者就原原本本按照鲁宗道所说的做了回答。真宗又诘问鲁宗道，鲁宗道谢罪道：“有朋友从乡下赶来，我家贫困，没有酒食款待他，因此就请他去酒店了。”真宗因此认为他忠实，可以大用，曾把这件事告诉太后。后来，太后临朝执政，鲁宗道因此被委以重任。

为什么说蔡齐“从容一言绝女后相踵称制之患”

蔡齐(988～1039)，字子思，祖籍洛阳(今河南洛阳)。蔡齐以状元及第，真宗见他风神俊伟，举止端庄，于是对宰相寇准说状元得人。仁宗朝，蔡齐被召为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章献太后死后，留下遗嘱让杨太妃为皇太后，与仁宗共同裁定军国大事。朝廷百官都前往祝贺，唯独蔡齐让御史台的官员不要跟随而去，并且亲自去见宰相说：“陛下正值年富力强，周知天下情伪，如今刚刚亲自执掌政事，怎能让后妃们又相继称制执政呢?”于是否决了让杨太妃参预执政的遗嘱。这就是史官所说的蔡齐“从容一言绝女后相踵称制之患”。

“神将”说的是谁高继勋(958～1035)，字绍先，祖籍燕(今北京)。高琼不仅晓达军政，而且善于教子，他的儿子高继勋、高继宣、高继忠等在当时都很有名气，以高继勋最为有名。咸平三年(1000)，王均在益州叛乱，高继勋以崇仪副使为益州兵马都监，提举西川诸州军巡检公事。招安使雷有终给高继勋分兵五百，让他进攻城东的二处大门，适逢叛贼进攻弥牟寨，高继勋引兵出战，在嘉州大败了敌方。雷有终又给继勋增派精兵再次进攻这二处大门，顷刻攻破，在城上飘扬起官兵的旗帜。雷有终于是领兵向天长门进发，王均派兵抵抗。战斗到傍晚时分，雷有终打算让军队稍为修整一下，高继勋进言道：“敌方气势窘迫，应该火速进攻，才不会丧失战机。”便亲自率领骑兵与敌方激战，高继勋身上多处负伤，鲜血流满了铠甲，战马也战死了，但他更换战马后又继续驰入敌阵，奋勇杀敌。这时，人内都知秦翰前来支持，敌军只好退保子城。当天夜间，敌军想趁机逃遁，被高继勋探知，设计全歼了在逃的敌军。

后来，高继勋徙屯岢岚军。契丹聚兵五万驻屯草城川，高继勋登高探望后，对军使贾宗说：“对方军队数量虽然众多，但战阵混乱，缺乏战

斗力。我方士兵虽少，但可以以奇取胜。依据我的意见，先在山下埋伏士兵，敌方见我方势单力薄，必会急速进攻。我引诱他们向南行进，等到时机成熟，你们乘势前后夹击，敌军肯定大溃。”契丹军队果如高继勋所料，当被引诱到寒光岭的时候，宋军全力出击，契丹军队首尾不顾，死伤人数达一万多，余众只得狼狈逃窜。

高继勋性格谦让，胸有谋略，善于抚恤和驾驭部下，每战必胜。他在蜀地之时颇有威名，被当地人号为“神将”。

为什么尹洙说狄青是“良将才”

狄青(1008～1057)，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阳)人。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初，赵元昊反叛朝廷，仁宋下诏挑选士卒守边，并任狄青为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使。当时的边将多次为叛军所败，所以守边士卒都很畏怯。狄青到任后，在四年之内，经过大小战役二十五次，攻破了金汤城、宥州等地，剿灭了咙咩、岁香、毛奴、尚罗、庆七、家口等少数民族。又在桥子谷修筑招安、丰林、新寨、大郎等城堡，于是控扼了边境的要害。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战役中，狄青每次出战，都是披头散发，带上铜面具，在敌阵当中来往穿梭，所向披靡，敌军没有能够抵挡的。

尹洙为经略判官时，狄青曾与他会面，二人在谈到军事战略时，尹洙连连称善，于是把狄青推荐给韩琦、范仲淹，并对他们说：“狄青是一名难得的良将”。韩琦、范仲淹见到狄青后，都颇为惊奇，对狄青特别照顾。范仲淹把《左氏春秋》赠送给他，并告诫他说：“为将不知古今，只是匹夫之勇罢了”。狄青因此折节读书，对秦、汉以来的将帅兵法都很精熟，他的名气也就更加显著了。

宋代的军队有个规矩，士兵入伍之前都要在脸上刺字，以防他们逃跑，狄青出身行伍，当然也不例外，十多年后，狄青脸上的刺字仍然清晰可辨。这时，由于战功显赫，宋仁宗亲自赐药要狄青除去脸上的刺字，狄青指着自己的脸说：“陛下以功提拔我，不注重门第，我之所以有今天，也是因为这脸上的刺字，我愿意保留下来，以激励士卒”。宋仁宗因此升他为枢密副使。皇祐四年(1052)，广源州少数民族发动起义，在侬智高的率领下，攻陷邕州，又攻破沿江的九个州郡，进而包围广州，

岭外一片战乱，狄青于是上表请战。起初，大将蒋偕、张忠都冒险轻进，为义军所杀，因此士气不振。狄青便告诫各路将领听自己指挥，不要轻易与义军发动正面战斗。广西钤辖陈曙趁狄青没有赶到，就率领八千步兵先行讨伐，在昆关惨败；殿直袁用等都落荒而逃。事后，狄青把陈曙、袁用等三十人按军法问斩，所以军中的纪律得以整肃。然后命令部下休整十天，得到侦探的消息后，狄青率领骑兵，出其不意，大败义军，追奔五十里，斩首几千人，生擒五百多人，招降七千二百个曾为侬智高所胁迫的士兵，对他们进行了安抚。当时，义军的死尸中有个穿着金龙衣的，大家都认为侬智高已死，打算上奏朝廷，狄青说：“怎么知道这其中不是有诈呢?宁可相信侬智高逃掉，也不能欺骗朝廷以贪功受赏”。仁宗称赏他的功勋，因此拜他为枢密使。

狄青为人谨慎寡言，带兵打仗，赏罚分明，又能身先士卒，与士兵们同甘共苦，所以士卒争相为他效劳。而且，狄青喜欢把军功推给别人。开始，与孙沔讨伐侬智高，谋略都出自狄青，等到义军平定后，他却把这些功劳归结给孙沔。孙沔原先只赞叹他勇敢，这时才佩服他的为人，认为自己远远不如狄青。尹洙因事被贬死后，狄青便全力救济他的家人，以报答尹洙的知遇之恩。

宋天子为什么说“咏在蜀，吾无西顾之忧”

张咏(946～1015)，字复之，濮州鄄城(今山东鄄城)人。太平兴国五年(980)，张咏进士及第，被授为大理评事，知鄂州崇阳县。后出知益州，适逢李顺在西蜀发动农民起义，王继恩、上官正领兵征讨，故意拖延不进。张咏便激将上官正，劝勉他亲自率兵出击，又设盛宴为他饯行。喝酒喝到正浓的时候，张谅突然举起酒杯对军校们说：“你们蒙受朝廷厚恩，绝对不能推卸责任，这次出行，你们必须直捣义军的城堡，平定叛乱。如果久无战功，这便是你们死的地方。”上官正听了张谅这番指桑骂槐的话后，才决定深入叛军阵地，最后果然取得了胜利。王继恩由于驭下无方，他的部下经常有出城逃跑的，巡逻的官吏抓获这些逃跑的士兵，把他们交给张谅，为了免除与主帅王继恩产生矛盾，尽快地平息农民的起义，张咏当即把这些逃跑的士兵投入一口枯井，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这时，李顺的起义得到了许多农民的响应，张咏又令人四处发放文书，告谕老百姓归田耕作，不要为害作乱。而且，由于战

乱频繁，谣言随之四起，当时就有人讹传，有一个白头老翁在中午过后，就会出来吃人家的小孩，因此益州一郡都处在紧张害怕当中，一到傍晚，路上就再也不见人影。不久，张谅把制造谣言的人缉拿归案，严刑处置后，民众的生活才逐渐平息下来。张咏为政，恩威并用，所以蜀民都很敬畏和爱戴他。

真宗即位，张谅被加封为左谏议大夫。咸平二年(999)，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杭州头年粮食欠收，老百姓大多私自贩卖食盐来获取口粮，这些违反朝廷政令的人，被当地官府抓获了几百人，张咏放宽了对他们的处罚，把他们全放走了。下官疑惑地对他说，如果不严厉地处罚他们，恐怕无法禁止这类事件的再发生。张谅说：“钱塘郡十多万户人家，处于饥饿状态的人占据了十分之八、九，如果不用卖盐所获的利润养活他们，一旦发动起义，那么祸患就更大了。等到秋天粮食收获后，再加以禁止。”随后，有一农民家的儿子与他的姐夫因为家财的分配问题而分别上诉。姐夫说岳父临终的时候，妻子的弟弟才三岁，因此让自己来掌管他家的财产，并且写了遗书，今后把财产的十分之三分给弟弟，十分之七留给自己。张咏看了遗书之后，说：“你妻子的父亲，是一位聪明人，因为儿子还小，所以托你抚养。如果把十分之七的财产留给儿子，那么他的儿子肯定已经死在你的手下了。”于是命令把财产的十分之七判决给儿子，把余下的十分之三判决给女婿，当时的人们都佩服他的明断。

咸平五年(1002)，马知节从益州迁往延州，朝廷选择可以取代马知节的官吏。真宗认为张谅以前在西蜀政绩颇佳，因此又命他担任益州知州，还加封刑部侍郎、枢密直学士。碰巧转运使黄观上言褒美张谅的政绩，又派谢涛巡抚西蜀，真宗于是让他告谕张谅说：“得卿在蜀，吾无西顾之忧矣。”

“东州逸党”是怎么来的“东州逸党”指的是北宋初期活动于京东路诸州、军、监(今河南商丘、江苏徐州、宿迁等地区)的一个文人团体和文学流派。这些文人旷达豪放、任情不羁、经常交游，时称“东州逸党”。代表人物有范讽、张炎、石介、李冠、徐追等。“东州逸党”之名，最早见于宋代颜太初的一首长篇五言诗《东州逸党》，诗中对这个文学团体进行了讽刺和鞭挞。

这些文人之所以被称为“逸党人物”，是因为人们认为他们整日交游、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另外，认为这些人目无礼法、妄自尊大、行为放浪、创作粗俗、言不由衷，非但无益于世，而且有违道统。实际上，这些看法是极为偏颇的，这个诗人群体在当时应该是一个进步的诗人群体，他们大多官位不高(除范讽之外)，但关心国计民生。他们性情大都旷达奔放、不拘细节、“喜豪放剧饮”不顾流俗。据说，有一次石延年、刘潜在京城酒楼对饮，京师王氏正好路过，上酒楼见二位豪饮，甚为诧异，而石、刘二人旁无他人，依旧谈笑风生，第二日便传出了酒楼二酒仙的佳话。这些诗人大多是山东省人，并且彼此关系密切。范讽是这个文人团体的代表人物，范讽年轻有为，做官很有政绩，不仅体恤百姓，还敢于谏言，不畏权要。在他知青州时，青州发生灾荒，他大胆发放前帝相王曾家中数千斛粮食以济灾民。他曾弹劾皇亲贵族、朝廷重臣钱惟演，认为他有不法之事，应当降官。仁宗不听，范讽于是恳请皇帝说：“如果皇帝您不听劝谏，我自己宁可辞官。”仁宗最终降职钱惟演。

逸党人物在当时豪放不羁、不顾流俗，极不合时宜，因此受到了一些保守派、卫道者的嘲讽和鞭挞，他们用“东州逸党”的称谓来贬低这些文人。“东州逸党”也就由此而来。

杨亿“首以词章擅天下，为时所宗”

大宋统一王朝创建之初，在诗坛上影响很大的是称之为西昆体的一个诗歌流派，杨亿就是这个诗派的领袖人物。

杨亿(974～1020)，字大年，建宁州浦城(今福建浦城)人。传说杨亿快要出生的时候，他身为县令的祖父，做梦梦见一个道士，道士告诉杨亿的祖父他是来谒拜的。没过几日，杨亿就出生了，奇怪的是婴儿的身上长满了毛，并且很长。过了几个月，就自然脱落了。小时候，杨亿就能说会道，母亲教他经诗，立刻便能诵背如流。十一岁的时候，杨亿的才识已被皇帝所闻，皇帝派江南转运使张去华去考查杨亿的学识，张去华将杨亿送到都城，出诗赋五篇，杨亿下笔即成。宋太宗对杨亿的才华赞叹不已，杨亿也由此步入仕途。

景德年间，杨亿和一大批馆阁文人奉旨编修《册府元龟》，他们经

常利用空闲时间吟诗酬唱。三年之后，修书完成，这些空暇时的诗作也由杨亿汇聚成集，并取名《西昆酬唱集》。此集一出，轰动了当时诗坛，这种含蓄、绵缈富丽的诗风令时人耳目一新。于是，西昆诗大为盛行，诗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杨亿作为西昆体的领袖诗人，他的诗作在这些文人雅士中是首屈一指的。虽然多数作品描写的是他们优越的生活和日常琐事，缺少真情实感、内容空洞，但西昆诗的艺术成就却是相当大的。杨亿主要师法李商隐，得其形而未得其神。如语言含蓄婉约、好用典故、诗词充满了香艳之感；笔法非常细腻，特别在描写物品上，在形式上达到了纯美之境。杨亿也写过一些咏史诗，借古喻今，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如他的《汉武》诗，就是借汉武帝用尽方法寻求长生术，终究徒劳无益，难免一死的事情，实际上是对真宗求仙活动进行了讽喻。

杨亿在宋初的文坛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所作的诗、词、文章被当时人纷纷传诵，竞相摹仿，而且西昆体对后来的宋代诗、词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什么说李迪是“贤相”

李迪(971～1047)，字复古，濮州(今山东鄄州)人。真宗、仁宗时期两度出任宰相，两度被罢。李迪为相正直敢言，不为利害祸福所动，与丁谓之徒势不两立，是宋初被人称颂的贤相之一。

当初，李迪步入仕途不久，真宗常常听说亳州盗贼猖獗，就命令李迪知亳州。到任之后，李迪明察暗访，摸清了敌情，又派遣骁勇善战的士兵擒贼，抓住盗贼之后，并斩首示众。不久，就平息了盗贼，亳州又是一片祥和、安宁之地了。李迪也曾多次劝谏真宗，有一次，真宗要在蝗旱的大灾之年大兴土木，李迪当面力谏，陈述利弊，真宗深深地信服了。还有一次，驻守陕西的边帅曹玮上疏，请求朝廷增兵固防，朝廷不同意增兵，他就辞了官职。真宗认为曹玮很懦怯，就问李迪：“有没有人可以代替曹玮?”李迪对陕西的驻兵和储粮情况十分熟悉，他给皇帝分析了当时的战势，又力陈曹玮谋略有余，非胆小之辈，并预言曹玮日后定能在边关大捷。皇帝觉得李迪言之有理，就向陕西增兵。后来，果如其

言，曹玮打了胜仗。

李迪因与丁谓素来结怨而遭受排挤、迫害。虽然如此，他在皇帝面前仍旧据理力争，鞭挞丁谓擅权弄术，但皇帝听信谗言只将其贬至郓州。仁宗即位后，太后垂帘听政，丁谓得势，派人暗地里迫害李迪，几近致死。后来，王曾为相，丁谓垮台，李迪再次被起用。后又被吕夷简排挤陷害，再次罢相，贬官亳州。

元昊攻打延州时，宋军损失极为惨重，李迪请战，但仁宗不同意。李迪报国无门，积郁成疾，辞官告退，庆历七年(1047)，他病逝家中。皇帝亲自为他篆碑："遗直之碑"。

为什么说杜衍有"大臣之概"

宋真宗、仁宗时期，贤相辈出，李迪、王曾、张知白、杜衍四人皆为当时贤相。

杜衍(928～1057)，字世昌，山阴(浙江绍兴)人。祥符元年进士，初任平遥、干州的地方官，很有政绩。离任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依依不舍地送他到边境，无奈地感慨道："为什么要夺走我们的好太守啊?"后来，他以太常博士的身份提点河东路刑狱，依据事实平复了许多冤案。有一次，章献太后派遣使者安抚淮南，使者返回宫中后，章献太后先问杜衍的情况，使者把他的政绩报告给太后，太后听到后感叹地说道："我知道这些已很久了。"

契丹与元昊在黄河之外交战，范仲淹安抚河东，欲要带兵跟从。杜衍认为不必带兵，他说："契丹和元昊两国交战，肯定不会来侵扰我们的，我们的军队还是不要轻举妄动为妥。"范仲淹在皇帝面前，坚持己见，诋毁杜衍，而有大臣之概的杜衍并未因此与范仲淹结怨。

契丹人刘三嘏潜逃到朝廷避罪。很多大臣建议留下他并厚待他，以追问契丹的事情，连当时的谏官欧阳修也请求留下刘三嘏。皇帝征求杜衍的意见，杜衍缓缓地说："中国历来以信守誓约而闻名天下，如果自己违背誓约，接纳叛国逃亡的人，这样不但毁了我们的名誉，并且这对朝廷是很不利的啊!何况刘三嘏还是契丹的近亲，他在此安身，定会招惹麻

烦，并没有什么好处，不如早早遣送回契丹吧。”皇帝听从了杜衍的建议，将刘三嘏遣送回契丹。

杜衍为相，十分清廉，私产极少。他辞官后在南都居住了十几年，屋子十分简陋，出入随从仅仅有十几个人，他穿着也非常简朴，过着普通人一样的生活。

为什么说晏殊为相“喜荐拔人物，乐善不倦”

大宋景德年间，江西临川出现了一位才识非凡的“神童”晏殊。

晏殊(991～1055)，字同叔，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谥号“元献”，人们称他“晏元献”。仁宗时期，他曾数度出任宰相，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位少年得志的宰相之一。

晏殊小时候聪慧过人，七岁便能写得一手好文章。真宗景德元年(1004)，当时任宰相的张知白安抚江南，发现了少年博学的晏殊，并且以神童的身份推荐给了朝廷。第二年，真宗殿取进士，小晏殊气度不凡、文章高妙、品性淳直，颇得真宗赏识，赐进士出身，伴在真宗身边。晏殊日益受到真宗的眷注，小小年纪便身居高位，担任要职。据说，真宗每当有头痛之事，就写在一块小纸上请教于他，足以看出真宗对他的器重。

晏殊不但自己做官，而且极喜荐拔人物，他所举者之人大多成就非凡，也证明了晏殊独具慧眼、善识贤才。

仁宗天圣五年，晏殊因用笏板击落随从牙齿，被贬官知宣州(今河南商丘)。到位之后，他大力兴办学校，还请了范仲淹教授学生。过了没多久，朝廷又将他召回做官，由于他很看重范仲淹的才识，就向朝廷举荐了范仲淹，范仲淹的仕途也由此开始，最终成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北宋名相、一世之师。

晏殊一生喜荐拔人物，特别是他任宰相时期，更是利用朝廷重臣和文坛名士的有利身份，广揽天下有识之士，热情举荐、提携天下贤士，乐善不倦。因而“一时名士，多出其门”(欧阳修《归田录》卷一)。当时知

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辅、富弼、欧阳修、韩琦……都得到了晏殊的大力提携。这些人有的是他的学生，有的还成了他的女婿。他们人人都成就非凡，范仲淹、富弼、韩琦都是当时被皇帝所倚重的贤相、名臣，欧阳修成为北宋文坛的一代文宗。仁宗对晏殊广揽贤士也十分高兴，认为人才会聚，国家才会治理得更好。而一些小人却妒忌晏殊，攻击他“胶固乱党”、“布满要路”。有一次，晏殊想提拔欧阳修做河北都转运，刚刚上奏皇帝，就遭到了谏官的反驳，他们要求将欧阳修留在朝廷，其实是害怕欧阳修担任要职，对他们不利。结果由于他们人多势众，欧阳修出任之事未被皇帝允许。

尽管在举荐、提拔人物时，屡遭挫败，但晏殊并不因此受到影响。仁宗庆历初年的改革，他是关键人物，因为新政重要人物的任用、提拔都与晏殊有很大的关系。一时间，天下名士会聚，聚合成了一股强劲的进步的政治势力，在新政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晏殊一生好贤，提携贤良众多，遍布台阁。欧阳修在为他写挽辞时道：“谋猷存二府，台阁遍诸生。”(欧阳修《晏元献公挽辞》)。

宋仁宗时，韩琦为什么能“名重一时”

韩琦(1007～1075)，字稚圭，相州南阳(今属河南)人。天圣年间进士。仁宗时，任枢密副使、按抚使、枢密使等职，封仪国公。英宗即位后，封魏国公。神宗时，又官拜司空兼侍中。韩琦执政三世，两朝顾命，在立英宗、神宗两代皇帝的问题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韩琦以学士身份亲临边疆处理事务，年纪刚刚三十，天下之人都尊称他为“韩公”。他曾经与范仲淹共事，商讨防御西夏入侵的计策，时称“韩范”。在仁宗朝，为朝廷做了许多事，因而“名重一时”。

韩琦在任右司谏期间，敢于说话，前后上疏七十多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当时的宰相王曾说韩琦的谏言“切而不迂”，是说韩琦的话恳切而不迂腐。韩琦听到王曾的话后，更加自信。当时益、利两地闹饥荒，韩琦以体量安抚使的身份前去慰问，驱除贪官污吏，淘汰多余官员几百人，使一百九十万的饥民存活下来。

此后不久，韩琦升任枢密直学士，夏竦为副手。元昊谋反，占领了

镇戍。韩琦在自己比较了解西北边境情况的基础上制定了攻守两个方案，并上奏朝廷。仁宗看过之后准备启用进攻策略，而许多大臣都不赞同。这时韩琦说：“元昊即使倾尽西夏一国之力，也只不过四五万人。如果我们让宋军分路进攻，说不定会碰上强敌，到时会因兵力不支而败。倘若所有的军队一起行进，趁着敌人攻城胜利之后存在的骄傲轻敌的心理，一鼓作气，一定能够大败西夏军。”于是朝廷就下诏令驻扎在鄜延、泾原的宋军一同出征。过了不久，元昊请求和解。细心的韩琦说：“没有盟约就来求和，这其中一定有诈。”就下令所有将士戒严，不可掉以轻心，西夏军果然在山外进犯。韩琦将军队交给大将任福，并命令他从怀远城出发到德胜寨，从敌军后方攻击敌人。如果不能战胜，就占据险要的地理位置，埋伏下来，切断敌军退路。任福临出发时，韩琦告诫再三，后来又传送檄文重申约定，说如有违背，即使打了胜仗，也要杀头。但是在两兵交战的过程中，任福还是被西夏军引诱，宋军在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东)全军覆没。虽然这次战争宋军失败，但责任不在韩琦，相反，韩琦在这次战役中表现了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只是由于用人不当才造成失败。

韩琦与范仲淹呆在兵营，时间长了，声名大振，人心归顺。二人合力夺取横山，谋取河南。这时元昊向大宋称臣，韩琦也被召为枢密副使。后来元昊又凭借着契丹的支持，强行向宋朝索要钱财物品，贪得无厌。宰相晏殊怕战事再起，处处迁就元昊。韩琦认为宋朝廷不应该这么做，还罗列了朝廷中应该先采取的七项措施，如实行清政、招揽人才、收拢民心等，仁宗对此全部采纳。后来韩琦又扫平群盗，淘汰军营之中年老体弱者，讨回敌方所侵占的土地。接着又提出了对付西北边防的四项政策，主张“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韩琦的这些策略对于西北防御事务起了指导作用。

欧阳修曾称赞韩琦说：“临大事，决大议，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韩琦去世时六十八岁，谥号“忠献”，赠尚书令之职。

宋神宗时韩琦有何建言韩琦为官敢于直言，前后上疏七十多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仁宗说韩琦“性直”，王曾也曾说韩琦的话恳切但不迂腐。韩琦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在神宗朝时也有许多建言。

契丹请求宋朝割代以北的土地，这时韩琦上疏给神宗，奏疏中说：据我观察，这几年来朝廷办事，很少考虑边境敌方。而敌国看到这种情况，心生疑虑，认为我宋朝在计划怎样收复燕南土地，所以他们就持先发制人的想法，挑起事端。他们之所以产生这种疑惑，原因有七个：高丽在北方向我北宋称臣，已经很久不来朝贡了，我们用商船引诱让高丽前来朝贡，契丹知道了这件事，一定会认为北宋有什么计谋；强行夺取吐蕃的土地创建熙河，也会让契丹以为宋朝另有图谋；在西山上栽种大片榆树和柳树，希望树长的高大茂密以阻止骑兵；创立保甲制；建城池，筑高墙；发明弓和刀的新式样，大造战车；在河北设三十七个将领。契丹向来是北宋的敌国，因此起疑心，他们是不得不这样的。

接着，韩琦又指出要对外平定四方，首先必须治国安邦。而当时由于实行新政，主张新政的一派认为要从根本上治国，首先就是要聚敛财物，在百姓中大量征兵。这一错误的认识导致新政派采取的措施不当，实行青苗法、募役法，并且经常更改具体施行办法，让农民无心耕种，商人无法经商，连官吏都茫然不知所措，举国上下怨声载道。韩琦指出造成这种结果的最直接原因是新政派的错误主张。

这样韩琦从两个方面指出了契丹求割地的两个原因：一是朝廷做事使契丹产生疑虑；二是新政使宋朝人心动摇，怨声载道，以致不能齐心对外。

同时，韩琦在奏疏最后提出了应对契丹的策略。他认为应当派使者到契丹，详细说明朝廷所做的事都属于治理国家的正常举措，并没有别的意图；边界仍按以前的约定不变；劝说契丹不要再生事端，别破坏了两国的友好关系。

当然，以上只是韩琦提出的权宜之计。他认为从长远来看，应该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爱惜民力，任用贤能之人，远离奸邪小人，这样定会使百姓顺服，边地军备充足。如果敌国毁约，宋朝也可凭借强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收复失地。这也是韩琦在边境防御问题上“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思想的集中体现。

在处理宋与契丹关系上，富弼有何重要贡献富弼(1004～1083)，字

彦国，河南(今河南洛阳)人，是晏殊的女婿。仁宗时制科出身，任将作临丞，逐渐升直集贤院、开封府推官，知谏院。庆历二年(1042)，升为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曾与范仲淹一起推行“庆历新政”，但因怕流言中伤，主动请求安抚河北。后来，富弼与文彦博同时拜相。英宗时，富弼为枢密使，封祁国公，又进封郑国公，因与王安石不和，出知河南，辞职后仍关心朝廷大事。

富弼曾奉使几次出使契丹，在处理宋与契丹的关系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彦博仁宗时，契丹在宋朝边境上驻扎军队，并派使臣萧英、刘六符到宋朝，请求割关南十县土地给契丹。宋朝廷中无人愿意接见契丹使臣，这时吕夷简就举荐说富弼可以担当此任。在接见中，富弼与契丹使臣萧英开怀畅谈，萧英很高兴，就偷偷地将契丹主想要什么告诉了富弼，并对富弼说：“如果宋朝廷认为可以，就答应，如果认为不行，就可以另用别的办法搪塞过去”。富弼把这些话详细上报仁宗，仁宗只允许增加给契丹的岁币，并与契丹联姻。

后来，富弼奉旨出使契丹。在面见契丹主时，他询问契丹要求割关南土地的原因。契丹主说是因为宋朝违反两国约定，堵塞雁门关，增加堤防的蓄水量，修治护城壕，增加军队人数。契丹还狂妄地说，“如果契丹请求割地不成功，就要举兵南下，攻打宋朝。”富弼也毫不示弱地回应说：“当初的澶渊之役，如果不是宋朝放过契丹军，那么契丹士兵就不会有活着回去的。现在宋朝有广阔的土地，数百万人的军队，并且朝廷法令严明，万众一心。如果契丹再要攻打宋朝，胜算的可能性很小，即便侥幸取胜，也会伤亡惨重。还不如两国继续保持友好关系，宋朝每年送岁币给契丹。”契丹主听后，点头称是。富弼还向契丹主解释了宋朝堵塞雁门关，是为了防御元昊；修治护城壕，补充军队缺员等都属于国家的正常建设，没有违背两国约定。

第二天，契丹主邀请富弼一同打猎，又提及割地的事。富弼反复陈述说这样不行，又说：“契丹如果以得到关南土地为荣，那么宋朝一定会认为割让关南土地给契丹是一种耻辱，两国既然是友好国家，哪能让一国光荣，另一国受侮辱呢?”契丹主听后很受感动。

等到富弼再一次出使契丹时，契丹主答应宋朝增加给契丹的岁币，不再提割地的事。但宋朝向契丹送岁币必须说“献”或“纳”，富弼听后非常气愤，据理力争，坚决反对。尽管最终宋朝还是用了“纳”字，但富弼当时的做法还是维护了国家的尊严，不辱使命。

富弼几次出使契丹劝和，避免了战争的爆发，在维持宋与契丹友好关系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什么说文彦博历事四朝，任将相五十年，名闻四夷文彦博(1000～1092)，字宽夫，汾州介休(今山西介休)人。天圣年间进士，始任翼城知县，后来升为殿中侍御史。因为镇压贝州王则起义，当上宰相。任相期间，与庞籍商议裁减冗兵之事，卓有成效。又先后出制河南、大名、太原等州府，封潞国公。英宗时，任枢密使。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判河阳。文彦博在职有五十年，历任四朝，很有威望。

宋夏战争爆发后，文彦博向皇帝指出当时将权不专，军法不严的弊病，并得到仁宗的称赞和采纳。后来宋将刘平在与西夏作战中，被西夏军俘虏。黄德和趁机用金带买通了刘平的奴仆，诬陷说刘平向西夏投降了。刘平一家二百多人也因此全部被关押大牢，等候处置。朝廷命文彦博处理此案。文彦博经过仔细审查，终于查出了案情的真相。这时，黄德和的同党就声援黄德和，并请朝廷另派官员审理此案。文彦博坚决反对黄德和同党的做法，在朝廷派遣的官员到来之前，就将黄德和和被买通的刘平的奴仆一同处死。由此可见文彦博执法从严、行事果断的处事风格。

至和三年(1056)，仁宗皇帝上朝时突然发病，被扶入寝宫休息。文彦博非常担心皇上的身体，就召来服侍皇上的宦官史志聪，询问皇上的病情，但史志聪说这是宫中的秘密，不可随便乱说。文彦博听后大怒，呵叱道：“你们这些人出入宫中禁地，却不让宰相知道天子的起居状况，这是什么意思?从现在开始，皇上的病情一定要如实禀告，如有不从，就军法处置。”还与大臣刘沆、富弼等人在大殿内留宿守候。史志聪对文彦博说：“以前没有大臣在大殿留宿的例子”，文彦博质问道：“这是议论有无先例的时候吗?”史志聪无言以对。开封府知府王素半夜来敲宫门，文彦博没让他进。等到第二天早上，王素说有禁卫兵告发都虞侯要谋

反。听后刘沆就要逮捕都虞侯，而文彦博却召见都指挥使许怀德，仔细询问了都虞侯的情况。许怀德将都虞侯的情况告诉了文彦博，并自愿担保说都虞侯不会叛乱。文彦博当机立断，说：“这样看来，一定是这个士兵与都虞侯有仇，所以就诬陷都虞侯。既然这样就应当将这个士兵斩首，以此稳定众人之心”。于是就把后面的事交给刘沆处理，刘沆将诬陷都虞侯的士兵斩首，全国上下，人心大定。等到仁宗病好之后，文彦博等人才搬回各自的府第就寝。在仁宗生病期间，国家的安定很让人担忧，多亏了文彦博、富弼二人主持朝政，才维护了社稷的安宁。

文彦博继承父亲文洎的遗志，修理整治了唐朝时期的运输河道，增加了麟州的军饷储备。为相期间，文彦博曾与枢密使庞籍商议裁减冗兵八万人。朝中议论纷纷，担心这些人聚众谋反，皇上也有相同的疑虑。文彦博说采取这一措施是因为国家财政非常紧张，入不敷出，并说如果有什么不测，愿意以死谢罪。但在这项政策实施以后，被裁减的士兵都平静地回到家中，没有什么事发生。文彦博的这个措施节省了朝廷军费开支，意义重大。

作为一代名臣，文彦博声名远播，契丹使臣远远地看见文彦博，脸立刻都变了颜色，说文彦博是“天下异人”，羌族的首领温溪心也将心爱的名马赠送给文彦博，可见他们对文彦博的敬重程度之深。文彦博去世时九十二岁，追赠太师之职，谥号“忠烈”。

第四十七章

范仲淹诗、词、文成就如何范仲淹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他的诗、词、文都写得很出色，有《范文正公集》。虽然流传下来的篇数不多，但思想性强，感情深厚，富于感染力。

范仲淹的诗《江上渔者》，只有短短的四句，但作者巧妙运用对比，突出反映了渔民的疾苦。他的诗句“身甘一枝巢”，“富贵非我望”，反映出范仲淹对生活要求极为简单，能解决温饱就足够了，富贵对他来说乃是身外之物。

在范仲淹的词作中，《苏幕遮》十分引人注目。首句“碧云天，黄叶地”被元代王实甫化用在《西厢记》中，结句“酒人愁肠，化作相思泪”更是被广泛传颂。作者用哀婉缠绵的笔触，采用秋天凄美景色作映衬，深刻地描绘出羁旅行人的相思之情。另一首词《御街行》充满柔情，也是此类作品。宝元三年(1040)，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抗击西夏。四年的军旅生活，大大拓展了他的视野，增加了他的人生感受，这集中体现在《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中。上阙写广漠萧瑟的边地风光，下阙客观地反映战士戍边生活的艰苦和久戍边关的思乡之情，抒写报国立功之志。词风悲凉苍劲，独树一帜，开拓了宋词新的审美境界，也打开了宋词贴近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创作方向。

范仲淹最为人称道的是散文《岳阳楼记》。这篇脍炙人口的作品是为劝勉好友滕宗谅而作的，也是范仲淹的远大抱负和高尚情操的集中体现。全篇先叙写创作缘由，点出“谪”这一关键字。而后写景，极写登楼之所见，既有细笔勾勒，又有浓墨渲染，对景致的刻画栩栩如生，接着写面对如此美好景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劝勉滕宗谅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摆脱个人得失，处处以国家前途为重，从而抒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感慨，这既是范仲淹伟大人格的写照，也成为后代仁人志士用以自勉的格言。全文结构精巧，骈散结合，藻饰华美，颇具诗的韵味，被当时的古文家尹洙评为古文的“传奇体”。

“阎罗包老”说的是谁所谓“阎罗包老”是指北宋的包拯。

包拯(999~1062)，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天圣(1023)进士。他早年因父母老迈坚决不做官，等父母去世后才出任地方官。先后做过三司户部副使、天章阁待制、知谏院、龙图阁直学士，又知江宁(今江苏南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等职。特别是在开封府任职时，他执法严峻、平冤狱、抑豪强，当时的贵戚宦官对他无不惮惧，把他比作“阎罗”，在京城内传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老百姓也称赞他的清廉，连妇女和小孩子都知道他的名字，称他为“包待制”。

包拯是封建社会中有名的清官，他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史书也多有记载。他在做天长县(今安徽天长)知县时，有一个人前来告状，说自己家养的牛被人偷割了舌头。包拯说：“你只管回去，把牛杀了吃。”时隔不久，又有一人前来告状，说牛的主人在家私自杀牛，包拯说：“为什么割断了牛的舌头又来告牛主人的状呢?”这个盗贼听了这话非常惊讶又十分叹服。

包拯虽做了大官，但衣服、日用、饮食和平民时一样简朴，为官也清廉。他在端州(今广东高要)为官，端砚非常有名，以前的官员往往借向朝廷贡奉之机向民间搜刮十倍于进贡所需的砚台，以便拿去巴结权贵，然而包拯除了完成进贡数目外，再无所取。他在临死前交待后人说：“后世子孙当官者，如果贪赃犯罪，不能让他回本家来；他死后也不允许把他埋进祖宗的坟地。如果有人不按我的意愿做，那么他就不是我的子孙。”从这里可见其为人，“阎罗包老”的称呼还是较为恰当的。

唐介因何被士大夫赞为“真御史”

唐介(1010~1069)，字子方，江陵(今湖北江陵)人。他小时候家里很穷，有人借钱给他赌博，他没要。擢第以后，历任平江令、殿中侍御史、天章阁待制、知谏院、龙图阁直学士、枢密直学士、参知政事等职。他为人正直敢言，许多人都很怕他，每当他论及官吏缺失的时候，其他官员都安静地望着他，看他的风彩。在他任殿中侍御史一职的时候，启圣院制造了一辆龙凤车，皇宫大内拿出珠宝玉石给车子做修饰之物。唐介知道后说：“这是太宗神御所在之处，不可喧闹亵渎它；后宫里这些奇珍异宝浮靡的东西，不应该超过规定限制。”因此，给龙凤车加修饰的诏书立即被废除，官员张尧佐一下子被授予宣徽、节度、景灵、群

牧四使，唐介与包拯、吴奎等据理力争，又请中丞王举正留文武百官在朝廷上论争，张尧佐终于被罢去二使。不久，张尧佐再次被授予宣徽使、知河阳县。唐介知道这个消息后，对其他官员说：“这是要给张尧佐宣徽使一职，却假以河阳令作为名目罢了。”在其他官员都不出来反对的情况下，唐介挺身而出，一人抗议。宋仁宗不听，并告诉他说：“这是中书省的任命。”于是，唐介转而弹劾宰相文彦博，说文彦博未做宰相之前每天拿金银珠宝，通过太监送到后宫嫔妃手中，以求执政；现在他这么重用张尧佐，更是为了加强自己的势力，请皇上罢免文彦博而重用富弼为宰相。同时，谏官吴奎也弹劾文彦博，话语非常恳切率直。仁宗听了大怒，将唐介的奏折未看退回，并说打算将唐介贬往远地。唐介不但不惧反而说道：“臣忠心耿耿，义愤所激，就是被鼎镬煮了也不怕，难道还会对被贬有所推辞吗?”仁宗急忙召集人告诉唐介说：“你直言论事是你的职责，但你说文彦博是借助嫔妃的关系做了宰相，这从何说起呢?宰相的任用是有司决定的，你怎么能干预?”当时文彦博也在眼前，唐介责问他说：“文彦博应该自己反省，如果有这样的事，不可隐瞒。”结果文彦博磕头谢罪不已，仁宗怒气更盛，贬唐介为春州(今广东阳春)别驾，王举正为他说情，仁宗第二天命改置英州(今广东英德)，并罢去文彦博相位，吴奎也得到重用。仁宗又担心唐介在路上死去，自己会担上杀直臣的罪名，就命中使护从唐介去英州。因为这件事，朝野都称赞唐介的直名，梅尧臣、李师中还专门做诗来赞美他，由此唐介“直声动天下”，士大夫说到真御史，一定说“唐子方”，而不敢称“唐介”这一名字。

欧阳修在史学、文学等方面有何贡献欧阳修在从政方面有很多建树，但他在史学、文学两方面做出的贡献更大。

宋朝自创建以来，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然而文章体式仍旧延续着五代时的风气。这种五代余习的显著特点就是：精雕细刻，讲究对仗、对偶，文风绮靡不振。受这种风气影响，士子们做出来的文章都词气卑弱。苏舜元、苏舜钦、柳开、穆修等人都有心改变这种风气来振作士气，但是成就都不大。嘉佑二年(1057)，欧阳修以翰林学士奉召知贡举，当时的士子们依旧崇尚五代这种险怪奇涩的文章，并把这种文章风格称为“太学体”，欧阳修对这种文风坚决予以痛斥和压制，凡是做“太学体”这种文章的士子，都被罢黜。事后，先前那些气焰嚣张的轻薄之徒在欧阳修出来的时候，围住欧阳修的马头聚众闹事，结果就连街上巡逻的

吏卒也无法平息这种骚乱。尽管如此，“太学体”还是被抵制下去了，五代以来的文风由此发生了改变。

欧阳修在随(今湖北随县)游览的时候，曾经得到一本唐韩愈的遗稿，读了之后对韩愈十分仰慕。他精心钻研韩愈的文章，以至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并下定决心一定要赶上韩愈，取得和韩愈古文运动一样伟大的成就。欧阳修写出来的文章具有自然天成、繁简合度的风格。他使用的语言简练明朗，平实而又畅达，在援引事物进行比较的时候，常常能传达出人生的至理，所以能够打动人心。这种成就是别人难以达到的，所以天下的读书人都尊他为师，向他学习。

欧阳修还对史学有浓厚兴趣。史书载，凡是周代、汉代以来的金石遗文、断编残简，他都有所收集。他经常钻研它们，把成果和心得写在《集古录》一书中。此外，在做翰林学士时，欧阳修还奉诏撰写《唐书》，他执笔《唐书》的纪、志表等部分，并且还写了《五代史记》一书。他写的史书具有“法严词约”，与《春秋》的写作风格一脉相承。

苏轼对欧阳修很是敬重，他在文章里谈到了欧阳修在史学、文学两方面的成就，他说道：“欧阳修在谈论大道这方面就像韩愈，在论事方面就像陆贽，记事方面如同汉代司马迁，而他做的诗赋成就如同李白。”

作《四贤一不肖诗》的蔡襄有何政绩与才能蔡襄(1012～1067)，字君谟，是兴化仙游(今福建仙游)人。举进士后，任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守推官、馆阁校勘等职。范仲淹被贬后，余靖上疏营救，尹洙请求有司将他与范仲淹一同贬往外地，欧阳修也写信责怪当时的司谏高若讷，说高若讷不知羞耻，这三人因此都被贬。蔡襄有感此事，作《四贤一不肖诗》，京都的人士都争相传写，卖书的人把这首诗拿到集市上去卖，还得到了丰厚的利润。当时恰好契丹的使者也在此地，这个使者也买了这首诗并带回了契丹，把诗陈列在幽州(今北京市城区西南)馆里。

蔡襄博学多才，他的书法是当时第一，宋仁宗特别喜欢他的字，曾经让蔡襄写过他自己作的《元舅陇西王碑》一文。后来，仁宗还诏令蔡襄写《温成后父碑》，蔡襄认为这是越职，没有奉诏。

蔡襄书法第一，人品也为人称道。《四贤一不肖诗》已表现出他正

直敢言的一面，他对朋友也是讲究信义的，他的朋友如果死了，他就会不吃酒肉表示哀悼。蔡襄曾与朋友们在会灵东园饮酒，有一个人不小心射出箭来并误伤了人，这个人慌乱中指出是蔡襄所射。过几天，皇帝问蔡襄是否有这件事，蔡襄再三表示愧意和道歉，始终不曾为自己辩解一句。

蔡襄为政期间表现出不凡的才能。庆历三年(1043)，仁宗更用辅相，亲自提拔了余靖、欧阳修及王素等人为谏官，这三人同时荐举蔡襄，仁宗命蔡襄知谏院。当时国内正有旱蝗、日食和地震等灾异现象出现，蔡襄上疏说：“灾害的到来，都是因为人事方面做得不好。数年以来，这种天戒屡屡到来。推究这种灾害形成的原因，是由于君臣上下都有缺失。陛下的缺失之处在于号令不被百姓信服，恩泽没有施及百姓身上，而大臣们的缺失之处却在于没有想出好的办法和谋略来矫正时弊，也未能尽到自己作为臣子的忠诚和职责。朝廷有不好的政策却不能矫正，百姓有疾苦而不能帮助他们解决，陛下处理事情宽仁而不能决断，大臣们明哲保身而不能斥离佞臣，这些都是臣子们的罪过。”这个奏疏一出，所有的人都心生畏惧，蔡襄因而被召进直史馆，兼修起居注一职。

在此期间，蔡襄在政治方面又有建树，保州(今河北保定)一带兵卒发生动乱，事后这些兵卒推出十几个懦弱胆小的人出来算作首恶，并把这十几个人杀了来求朝廷招抚。蔡襄提议道：“天下有兵百万，如果没有诛杀决断这样的命令，一定会成为兵卒们骄傲轻慢以至形成暴乱的祸源。今天保州的兵卒杀官吏，关闭了城门，不去讨伐他们，反而还要招安他们，不是要被所有人嘲笑吗?我恳求朝廷把这些兵卒召进城中，全部杀掉。”朝廷听从了蔡襄的建议。

蔡襄任知制诰一职的时候，三御史提议梁适应当罢官，蔡襄不同意。此后，每当有司部门在授予官职时有不恰当的地方，蔡襄都不写诏书。因此，皇帝对他更加礼遇，赐他母亲凤冠霞帔，又亲笔写下“君谟”二字派人给他送去表示恩宠，迁蔡襄为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蔡襄精于吏事，谈笑之间就能明断是非，揭发奸邪隐秘之事，所以官吏们都不敢对他有任何欺瞒。以枢密直学士再知福州，后召为翰林学士、三司使，英宗时拜为端明殿学士。卒后朝廷赠吏部侍郎一职。因为有这些功绩，所以史臣评价说，蔡襄、王素、余靖都是昭陵贤御史。

仁宗、英宗时王安石有何建言与事迹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是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他从小就酷爱读书，写的文章，读过的人都说精妙。曾巩把他的文章拿给欧阳修看，欧阳修也对他十分称赞。

王安石文章写得好，思想也常能出新，有志于矫世变俗，为此他曾上万言书，内容大致为：如今天下财力日益匮乏，民风民俗也日趋败坏，原因就在于朝廷没有创建法度，没有实行王安石先王的政策。实行先王的政策，就是实行先王政策的思想，那么我们实行变法改革就不至于惊世骇俗了。我恳请陛下能废除那些因循守旧的弊政，实行新法以跟上时代的变化。以后王安石登上相位实行的新法，思想依据都源于此书。

不久，王安石入直集贤院，在此以前，他一直拒绝做官，士大夫们以为他无意仕途，都想结识他，朝廷每次想要给他官做，也都担心他不接受。入直集贤院的第二年，朝廷任他做同修起居注，王安石又推辞了许多天才肯接受。不久，朝廷命王安石掌知制诰一职，负责纠察在京城中的所有刑狱，这以后他才不再辞官了。在此期间，他接手一个案子，一个少年得到一只斗鹑，被他同伴抢去，这个少年情急之下杀死了这个同伴。开封府判处这个少年死刑，王安石不同意，他说：“按照法律，这个被杀的人因为少年不给他斗鹑就动手抢去，属于强盗行为，少年追上去把他杀死，属于捕盗行为，因此即使死了人也不应判少年的罪。”王安石据此纠劾府司失职，府官不服，提出上诉，结果审刑、大理都认为府官判断的对，朝廷让王安石道歉，王安石认为自己无罪，坚决不肯。当时又有诏令说舍人院不能申请涂改文字，王安石争辩说：“如果像这样审理的话，那么舍人就不能再实行他的职权了，一切都得听从大臣的意思去做，立法不应该这样。如今懦弱的大臣不敢坚守陛下的法度，有权势的大臣则拿陛下的旨意任意下达命令，谏官、御史都不敢违逆这些大臣的意思，这种状况，实在令臣忧虑恐惧。”这番话语都是针对执政大臣而言的，王安石由此得罪了权贵，正赶上为母守丧，王安石辞官，整个英宗朝，王安石虽几次被召用，但屡辞不就。

什么叫新学新学，也称荆公新学。王安石于庆历二年(1042)进士及第后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的三年时间里，着有《淮南杂说》一书

史称“自先王泽竭，士习卑陋，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奋乎百世之下”，“着《杂说》数万言，其言与孟轲相上下”(《郡斋读书志》卷四下《王介甫临川集》)。这句评价已把王安石的《淮南杂说》与一代大儒孟子相提并论了。这是王安石创立“新学”的开始。嘉祐八年冬至治平四年秋(1063～1067)间，王安石居丧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在那里聚徒讲学。后来推行新政时，王安石与吕惠卿、王雱等人重新训释《诗》、《书》、《周礼》，先儒们所做的传注一概废而不用，终于在熙宁八年(1075)完成了《三经新义》，这部《三经新义》在学官中颁行，学官和士子们为了登科都不敢不用。《三经新义》的颁行标志着王安石学派的完成，当时称为新学，从此新学大行，不久即成为宋学中的最大学派。王安石后来被封荆国公，史称王荆公，因此他的新学也称荆公新学。

沈遘、沈辽、沈括各有什么特长沈遘、沈辽与沈括被合称为“沈氏三先生”。

沈遘(1028～1067)，字文通，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为人博学通达，善于吏治，所到之处，令行禁止。百姓有因为贫穷而不能给亲人下葬的，沈遘给他们公钱办理丧事。他还帮几百个孤苦零丁的女子找了婆家，如果有人逼良家子弟作了倡优，沈遘就会派人把这些良家子弟夺回来，再还给他们的父母。沈遘待手下人十分仁慈，这些手下都愿意竭尽全力为他做事，闾巷里的是是非非，无论事情大小都能被沈遘的人了解到，所以一旦有案子出现，沈遘往往能当机立断。

沈辽(1032～1085)，是沈遘的弟弟。沈辽在年幼时就挺拔不群，长大后爱好读书，并广泛结交朋友，为人不喜进取傲睨一世。他的文章自成一家，志趣高远，不同流俗。王安石过去很赏识他，曾给他写过一首诗，其中有“风流谢安石，潇洒陶渊明”两句，表达了对沈辽诗风的赞赏。后来，王安石执政推行新法，沈辽与王安石意见相左，友情就日益生疏了。

沈辽在做地方官时，留连山水，更加傲睨人世，曾在齐山上建了房子。并起名“云巢”，许多好事的人都去游玩过。到了晚年，沈辽对自己不羁的生平很是后悔，改去了年轻时的所有陋习，杜门谢客，就连笔砚也终日染上灰尘。偶尔，沈辽还会作篇文章，雄奇峭丽，人们评价很

高，但更善于写诗，当时曾巩、苏轼、黄庭坚都与他唱酬往来。

沈括(1031～1095)，是沈遘的堂弟。多年辗转四方，担任地方低级官吏。虽然职位低微，沈括还是取得了令人称赞的政绩。在沭阳主簿任上，沈括整治了该县年久失修的水利工程，使危害多年的沭水得到治理，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

嘉祐八年(1063)，沈括进士及第，除扬州司理参军。熙宁五年(1072)，任太子中允、检正刑房公事的沈括又被任命为兼提举司天监，主持司天监的工作。在此期间，他任用卫朴编修了新历《奉元历》；在对天文仪器作了系统的研究后，又写出了《浑仪》、《浮漏》、《景表》等三篇论文，建议制造更精确的浑仪、浮漏和圭表，并于熙宁七年完成这些仪器的制造。

沈括还参与了王安石新法的系列活动，汴河水利就是沈括负责的项目之一，他通过实地考察，从治汴的历史和现状出发，说明了治汴工程的必要性，从而有力地支持了变法。此外，他还在任河北西路察访使、兼提举该路保甲时，就兴修防御设施、推行保甲法等问题提出过三十一项建议。沈括在熙宁七年九月受命兼管军器监，在近两年时间里，军器监生产的兵器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提高，还重订了《九军阵法》，编成《修城法式条约》等。

沈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政治活动，但他博闻强识，对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等方面无所不通。他的著作很多，今存《梦溪笔谈》、《补笔谈》、《续笔谈》、《苏沈良方》以及综合性文集《长兴集》(原有四十一卷，仅存十九卷)等。其中《梦溪笔谈》是沈括晚年将一生所见所闻和研究心得以笔记文学形式写下的不朽著作，现存《梦溪笔谈》共分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权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十七门，分类系事，考辨精邃，共有六百零九条。它不仅是一部史料价值很高的历史典籍，而且是一部科技史资料汇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司马光在史学、文学方面有何重要贡献司马光不仅是一位政治家，

还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他在史学上的突出贡献，是编写了历史巨著《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一部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全书三百多万字，共分二百九十四卷，考异目录各三十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至后代五周世宗显德六年(959)，跨越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它网罗了众家之长，包括正史、别史、杂史三百多种，取材的广泛性是任何一部史书都无法比拟的；它不但记载了政治史，还涉及到了经济、文化、天文等等，史料翔实，叙事客观准确，文字朴实生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部书的编纂从英宗治平三年(1066)开始到神宗元丰七年(1084)结束，历时十九年，可以说凝聚了司马光毕生的心血。

司马光《资治通鉴》是在司马光领导下集体编写而成的。早在熙宁三年(1070)他还在京城时，就举荐了范祖禹同修；后来他退居洛阳，又聘请了刘恕、刘攽参预此事。他们分工合作，草拟初稿，最后由司马光定夺成篇。在编纂之前，他们还制定了一个共同遵循的方法和原则，就是先作从目，然后修长编，最后由司马光勒定成书。这样的修史方法，既保证了全书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也保证了它在政治观点上的一致性。

修撰这样一部巨著，作为主编，工作量本来就大，加上司马光为人又谨慎细致，精益求精，因此工作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他每天工作到深夜，到了五更初，挑灯再干。相传，为了提醒自己不要贪睡，他专门用圆木做了一个枕头，取名“警枕”，入睡后只要稍稍一动，“警枕”就会翻滚，人也马上就醒了。他用这种方法提醒自己要珍惜每一寸时光，经过十几年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勤奋工作，他们终于在元丰七年十一月完成了这部巨著，这时的司马光已经累得发白齿落，完全是一副老态龙钟的模样了。

司马光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造诣，他的散文不事华藻、朴素通畅却能够寓情于辞、言之有物；诗歌则平实流畅，通俗易懂，也能够反映出一定的社会现实。

为什么说吕公着是“守成之良相”

吕公着(1018～1089)，字晦叔，寿州(今安徽凤台)人。他出身官宦世家，曾祖父吕蒙正、父亲吕夷简都官至宰相。吕公着从小酷爱读书，以至废寝忘食，所以父亲吕夷简大胆预言公着“他日必为公辅”。他通判颍州(今安徽富阳)时，得到了欧阳修的器重，不仅与他结为讲学之友，还向朝廷推荐他和王安石一起担任了谏官。后来欧阳修出使契丹，契丹主问他中国有哪些有学行的士人，他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吕公着。仁宗也对吕公着的恬退精神非常赞赏，任命他为天章阁待制兼侍读。英宗即位后，又加龙图阁直学士。后来英宗要追崇自己的亲生父亲濮王，有人就建议称“皇伯考”，吕公着进言表示反对，但是英宗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又贬斥了与他持相同观点的吕诲等人。吕公着一气之下，坚决请求外放，英宗没有办法，只好让他出知蔡州(今河南汝南)。

神宗熙宁初年，吕公着知开封府。夏秋时节，大雨成灾，京城又发生了地震。他借机上疏，提醒神宗要提高警惕，认为只有君臣上下一心，才可以消除灾害；作为君主不能偏信独断、不能以先人之语为主，这样才能远离小人。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推行青苗法，他极力反对；后来神宗要任用吕惠卿为御史，他又对神宗说：“吕惠卿确实有才，可是他是一个奸邪小人，这样的人怎么可以重用呢?”王安石本就生他的气，这次火上浇油，于是很快就把他贬到颍州。元丰八年(1085)三月，年幼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派使臣迎接吕公着回朝。他立即上十事疏，认为人君即位，要注意修德以安定百姓，而修德最重要的也是首先要办的是“学”，有十件事最为重要，即畏天、爱民、修身、讲学、任贤、纳谏、薄敛、省刑、去奢、无逸，又请求增加谏官，广开言路。终于在元祐元年(1068)，他升任宰相，与司马光一起辅政，废除新法。司马光去世后，他继续推行司马光的政策，在科举上要求经义参用古今诸儒之说，不可专用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取士，出题也不准涉及佛学内容，并恢复了贤良方正科。

元祐三年，吕公着拜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在整个宋代历史上，只有四个人享受过这一殊荣，吕公着和他父亲吕夷简都位列其中。次年二月，吕公着去世，终年七十二岁，太皇太后哭着对大臣们说：“国家真是不幸啊，司马相公已经过世了，现在连吕相公也去了!”非常悲伤。哲宗亲临赐奠，追赠他为太师、申国公，定谥号为“正献”。与司马光一样，吕公着身后也受到了党争风波的影响，哲宗绍圣初，他被削谥、毁碑，

徽宗时也被列入了“元祐奸党碑”，直到南宋初年才得以平反。

在文学方面，苏轼有什么重要成就和贡献苏轼是北宋杰出的文学大家，他才气横溢，在散文、诗、词等文体的创作上都有着极高的成就，是人们公认的天才、全才。一代文坛盟主欧阳修在他刚刚崭露头角时就断言苏轼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宋神宗也曾称赞他是“天下奇才”。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一生在散文上用功最勤，成就最大。他现存各种体裁的散文四千多篇，大致可以分为议论文、记叙文、杂着几类。议论文中最重要的是史论和政论，如《思治论》、《六国论》、《教战守策》等。这种评史议政性质的文章，大都语言明快，气势雄浑，说理透彻，他尤其善于运用一些生动形象的比喻，来阐明深刻的哲理。记叙文包括碑传文、山水记等。他的碑传文善于运用描写对象在日常生活中的素材和细节刻画其个性，以《方山子传》为代表；山水游记除了描写景物和叙事抒情外，还特别喜欢议论，阐发哲理，名作如《喜雨亭记》、《石钟山记》等都是如此，而其中最著名的是《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两篇赋不仅抒发了作者的人生哲学，而且语言优美，富于诗情画意，不愧是宋代文赋中最出色的作品。除了议论文和记叙文外，书札、序跋和杂文，在苏轼的散文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类作品或记友情，或写抱负，都能夹叙夹议，挥洒自如，充分表现出了作者的个性和风趣。

在艺术上，苏轼的散文在前辈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推进和开拓。他的散文豪放自然、气势纵横，艺术手法多变，往往突破固定格局，使情景事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不仅以议论见长，而且常常向思辨化的最高层次升华，尤其善于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可以这样说，苏轼的散文，代表了北宋散文创作的最高成就。

除了以散文著称，苏轼也是一位博采众长、别开生面的大诗人。他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敢于用诗歌来揭露时弊，在现存的二千七百多首诗中，社会政治诗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乌台诗案”以后，他对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诗歌创作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充分吸取了前代陶渊明、李白、杜甫等伟大诗人的不同风格，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貌，融豪放、雄浑、清新、典雅、婉约、朴实、幽默于一炉。他用诗歌

来抒发对国家前途、民生疾苦的关心，用诗来表现山水风光的优美，用诗来表达对亲朋好友的深情厚谊。丰富的想象和生动的比喻是苏诗非常突出的艺术特色，在《百步洪》一诗中，他连用了七个比喻来形容水势的磅礴，奇思妙想，生动形象。在诗歌史上，苏轼是继李白、杜甫后的又一个高峰。

在词的创作上，苏轼以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来填词，在柳永发展长调慢词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了词的意境，把歌者之词变成了诗人之词，打破了“词言情”传统，开创了豪放的词风。苏轼用词来说爱言情、怀古、咏史、说理、谈禅，真正做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

什么叫蜀学宋代儒学在发展中形成了不少派别，除了理学外，王安石创立的“新学”，以苏轼、苏辙兄弟为代表的蜀学都对当时或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蜀学不仅与新学对峙，也曾经与司马光的朔学，二程的洛学鼎足而立，在宋代儒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蜀学的创立者是苏洵，完成者则是苏轼、苏辙兄弟。因为苏氏父子是蜀眉山人，因此这个学派被称为“蜀学”。嘉事占元年(1056)，苏氏父子三人到东京参加进士考试；次年，苏轼、苏辙中进士，蜀学才开始逐渐形成，苏洵着《六经论》阐述了他的观点。治平三年(1066)苏洵病逝，临终前嘱咐苏辙继续完成《易传》。元丰三年(1080)，苏轼被贬到黄州，以后的几年中，苏辙也把所著的部分《易解》寄给兄长，可以说这部《易传》是苏氏父子三人的合作，也标志着蜀学学派的基本完成。除了《易传》外，苏轼还着有《论语说》，苏辙还有《老子解》、《孟子解》、《诗集传》、《春秋集解》等儒学著作。

三苏虽然都是著名的文学家，但他们却都认为为学最深处在于性命之学、经世之学，而“杂”是蜀学最突出的特点。他们公开接受佛学的影响，也讲求道教方术，三教合一的宗旨在他们的学说中体现得很明显，他们的理论中甚至还包括了纵横家的思想，思想成分十分驳杂。

高宗初即位时，李纲对军民大政有何建言及规划宋高宗即位后，任命了黄潜善为中书侍郎，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但是他认为这两个人声望不高，于是又拜李纲为右相。这个任命遭到了御史中丞颜岐和右谏

议大夫范宗尹的反对。颜岐连续五次上奏章，他认为金人非常厌恶李纲，应该趁他还未到任把他罢免，高宗冷冷地反驳他：“恐怕朕做皇帝，也不是金人愿意看到的吧!”一句话使颜岐哑口无言，只得悻悻而退。建炎元年(1127)六月，李纲刚刚到任就向高宗上了十议书，提出了一系列抗金立国的建议：整顿朝政，维护朝廷纲纪；严惩叛徒，表彰忠臣烈士，以整顿士风；在对待金人入侵的问题上，一定要首先使自己强大起来，坚决抵抗金人的进攻，不能只想着乞和，投降卖国；要加强河北、河东地区的防务；要积极组织民间的武装力量，参加抗金斗争；要重视人才；修城池，整军器，造战船，加强军纪；严惩张邦昌等叛贼；反对迁都到建康等。他积极支持两河地区人民的抗金活动，筹划设置了河北招抚司和河东经制司，向高宗推荐了张所、傅亮，于是高宗封张所为河北招抚使、傅亮为河北经制副使，又任命老将宗泽为开封府知府。他认为只要上下一心，就一定能够报仇雪耻。经过李纲的苦心经营，南宋政局逐渐稳定下来。

张浚为何使“天下占其出处为安危”

张浚在平定苗刘之乱中居首功，高宗任命他为知枢密院事。张浚认为川陕地区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国家应该从川陕开始加强治理，于是高宗又任命他为川陕宣抚制置使，并给予他先斩后奏的权力。建炎三年(1129)十一月，张浚在秦州(今甘肃天水)设立川陕宣抚处置使司，开始经营川陕。他体察民情，罢斥奸吏，整顿军政，很快改变了当地各路军队彼此排斥、不肯相互援助的混乱状态，使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局面也为之一新，但是后来由于他指挥失误，导致在与金兵的作战中大败，陕西的大部分地区都被金军占领。张浚痛定思痛，重用善于理财的刘子羽、长于作战的吴玠等贤才，又接受了刘子羽的建议，决定确保四川。他深入部队，自我检讨，逐渐安定了军心，使宋军的战斗力得以迅速恢复。金军统帅粘罕病危时，曾嘱咐部下，自从我进入中国，还从没有人敢阻挡，只有张浚能够与我对抗，我活着的时候，都无法攻取四川，我死了以后，你们更应该放弃攻打四川的念头。但兀术却不服气，在绍兴元年(1130)十月大举进攻和尚原，被吴玠痛击，大败而逃。川陕战局终于稳定下来，有力地支持了淮南军民的抗金斗争。

绍兴三年五月，张浚被召回临安，随后遭到宰相朱胜非、御史中丞

辛炳等人的攻击，被逐出朝廷。次年春天，吴玠指挥守军在仙人关大破金军。张浚断定金军进攻四川失败后，一定会进攻江淮地区，就上疏高宗要求积极备战。不久，金伪齐联军果然向江淮发起进攻，于是高宗罢免了朱胜非，又下诏为张浚平反，重新任命他为知枢密院事，派他前往江淮前线督战。韩世忠、张浚部下将士见到张浚到来，勇气大增。兀术接到消息，大惊失色："张浚已经被贬到岭南去了，怎么能在这个地方?"立刻撤兵。绍兴五年，张浚被任命为右丞相，他先是都督岳飞等将领镇压了洞庭湖杨公的起义军。次年，又督战江淮前线，再次挫败金齐联军，由此深得高宗信任，大小事情，都征求他的意见，下达给诸将的诏书，也往往让他草拟，而张浚也不断提醒高宗要报仇雪耻，鼓励高宗到前线督战以激将士。

秦桧当权后，张浚因为坚决反对议和，遭到了秦桧的迫害，诬蔑张浚为国贼，想除掉他。但是高宗毕竟念着张浚立下大功，所以他虽然谪居十多年，秦桧也始终没能得逞。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张浚始终没有忘记抗金救国大业，不断上疏抨击秦桧的卖国投降政策。绍兴三十一年，金主完颜亮再次南侵，高宗又重新起用了张浚。他的复出使军队十分振奋，他不负众望，指挥军队连续击败金军。孝宗隆兴元年(1163)正月，张浚被任命为枢密使，主持北伐。他派李显忠、邵宏渊于五月初率军渡过淮河，先后攻占了虹县(今安徽泗县)、灵璧宿州(今安徽宿县)等军事重镇。但由于李、邵两人失和，加上犒赏不公，宋军很快出现了大溃败，所幸金军不知底细，不敢贸然追击，宋军才在淮河一代稳住了阵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符离之溃"。这场败仗使朝廷内主和派又占据了上风，七月，主和的汤思退被任命为右相，开始主持议和。因为金国的条件太苛刻，所以年底孝宗又改汤思退为左相，任张浚为右相，准备与金人再次开战。张浚赶到两淮积极备战，他招募山东、淮北忠义之士一万多补充建康、镇江的正规军，增修两淮城堡工事，添置战船，随时准备与金人一决雌雄。但最终孝宗还是屈从了主和派的压力，隆兴二年四月，孝宗召张浚回朝，罢去了他的相位。四个月后，张浚在离京途中病死，遗嘱说："我曾担任宰相，却不能恢复中原，洗雪祖宗的耻辱，死后不配葬在祖宗的墓旁，葬在衡山下也就可以了。"

在抗金事业中，韩世忠有何战绩

第四十八章

韩世忠(1089～1151)，字良臣，延安(今陕西延安)人。他出身贫寒，勇武过人。十八岁时，韩世忠应募从国，参加了抵御西夏、镇压方腊起义、征辽等一系列战役。靖康年间，又多次与金人交战。高宗即位后，任命他为御营左军流制。建炎二年(1128)，他护送高宗到扬州后，又率部北上，在宗泽的指挥下与金军在河南一带作战。建炎三年春天，苗傅之变发生，韩世忠赶到平口与张浚等人商议勤王，他慷慨激昂地对张浚说：“今日之事，世忠愿与张浚以身担当，您就不要担心了!”这时他的妻子和儿子都被扣留在临安作人质，幸而被宰相朱胜非设计救出，于是韩世忠正式打出勤王平叛的旗帜，联合张浚、刘光世等人，大败苗、刘叛军，高宗得以复辟。接着，韩世忠率军一路追到福建，直到把苗傅、刘正彦全部擒获。同年十月，金兀术率十万大军再次大举南侵，在江南大肆掠夺了一番，率兵北返，韩世忠奏高宗，请求在长江上进行截击。当时正是一年一度的上元节，到处张灯结彩，他带领八千水军，集中了一百多艘战船沿长江布防。三月，金兵先头部队退到镇江，遭到宋军的伏击，金将李选被迫投降，于是兀术下战书要与韩世忠决战。双方在江面上摆开阵势，守军战船如离弦的利箭，迅速冲向敌阵；梁夫人亲自擂鼓以激励宋军将士，杀得金兵丢盔弃甲，沿江溃退；韩世忠指挥宋军堵截，把金兵驱入了黄天荡，金兵成了瓮中之鳖，进不能战，退不能出；兀术只好向韩世忠求情，表示愿意归还所掠夺的珍宝并献上宝马，换取一条生路，被韩世忠严词拒绝：“还我两宫，复我疆土，则可以相全。”韩世忠以八千兵马将金军十万人堵在黄天荡长达四十八天，这就是著名的“黄天荡之战”。可惜后来金军开掘了一条连接江口的水渠逃入长江，又乘风纵火宋军船队，才得以退回江北。绍兴四年(1134)，韩世忠被任命为建福建康、镇江、淮东宣抚使，驻扎镇江，金与伪齐联军分路入侵。他驻兵大仪(今江苏扬州西北)正逢朝廷派魏良臣使金经过此地，于是他佯装后撤，魏刚一出境，他马上集合部队，沿路设下十多处埋伏。金兵一进入伏击圈，就听战鼓轰鸣，伏兵四起，金兵猝不及防陷入一片沼泽地，人马践踏，生擒二百多人，死伤不计其数。随后，他又派部将董叹、解元、成闵等人在天长县、高邮军打败金军，最后迫使金齐联军退兵。绍兴六年，他被任命为武宁安仕军节度使、京东淮东路宣抚

处置使，置司楚州(治所在今江苏淮安)。楚州在经过长年战乱后，早已是残破不堪。他亲自参加劳动，夫人梁氏也参加纺织，还积极招募流亡的百姓，发展工商业，很快楚州就成为一方重镇。在此期间，刘豫伪齐军队几次入侵，都被他击退，使淮东成为了保卫东南的重要屏障。史称他“在楚州十余年，兵仅三万，而金人不敢犯。”

宗泽为什么说岳飞“勇智才艺，古良将不能过”

岳飞(1103～1142)，字鹏举，是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人，家里世代为农。据说岳飞出生时，有一只长得像鹄的大鸟在他家屋子上空飞旋鸣叫，家人就为他取了“飞”这个名字。岳飞还没有满月的时候，黄河决口，家乡突发大水，他的母亲姚氏抱着岳飞坐在大瓮中，竟然没有被淹死，人们都感到很惊奇。

岳飞从小就志向远大，性格内向，不爱说话。家里尽管贫穷，岳飞却努力读书，对《左氏春秋》和孙膑、吴起的兵法特别感兴趣。他天生具有神力，拜周同为师学习射箭，左右手都能够射箭。他的父亲教导他说：“你如果能为国家出力，一定要誓死报国。”

宣和四年(1122)，岳飞应募被征。当时相州(今河南安阳)有陶俊、贾进和两个贼人作乱，岳飞请求主将给他百名骑兵来消灭贼人。岳飞先派兵丁伪装成商人混进贼人队伍，又派一百名士兵在山下设下埋伏，他自己率领几十人去诱敌，他假败逃走，贼人前来追赶，结果中了岳飞设下的埋伏，陶俊、贾进和这两个贼人头目都被抓获。

康王到相州，靠刘浩的引见，岳飞得到了康王的召见，康王命他去招安吉倩等贼人，结果吉倩等三百八十个贼人全部归降。康王命岳飞补承信郎一职。此后，岳飞先是以三百骑兵获得李固渡(今河北大名)战役的胜利，后又跟随刘浩解了东京(今河南开封)被围的局面，朝廷升任他做秉义郎，属于留守宗泽的下属。岳飞在此期间又取得了开德、曹州(今山东曹县)两个战役的胜利，宗泽为此大感惊奇，说：“你在勇智才艺方面，就连古代那些良将也不能超过啊。”

为什么说岳飞之死是千古奇冤宋金议和的事情决定下来后，秦桧担心岳飞不与自己同心，就开始设计陷害岳飞。

岳飞是各个将领中年纪最小的，但是创建的战功却超过了其他人，尤其是超过了韩世忠和张浚。金人攻打淮西的时候，张浚不敢发兵迎敌，岳飞却在接到命令后立即发兵，从而解除了庐州(今安徽合肥)被围的困境，获得了皇帝的嘉奖，张浚认为这是自己的耻辱。后来岳飞又平息了杨幺的叛乱，分别给张浚、韩世忠一艘楼船，上面兵械齐备，韩世忠十分高兴，张浚却更加嫉恨岳飞。

秦桧使用参政王次翁的计策，利用岳飞、韩世忠与张浚之间的矛盾来陷害岳飞和韩世忠。绍兴十一年(1141)五月，秦桧矫诏命张浚、岳飞前往楚州(今江苏淮安)视察韩世忠的部队，搜查韩世忠的错误和缺点，目的是让三大部将之间彼此离异反目。当岳飞看到韩世忠的部队阵容整齐时，不禁暗自称赞，而妒功嫉贤的张浚却认为高宗有意让他与岳飞分掌韩世忠的军队。岳飞当面斥责了张浚的不良用心，张浚因此对岳飞更加怀恨在心。回到杭州后，张浚反咬一口，诬告岳飞，这给想谋害岳飞的秦桧等人留下了口实，他们开始了谋害岳飞的阴谋。万俟卨首先发难，他捏造了岳飞的两大罪状：一是增援淮西时，违背圣旨；二是楚州之行，有意沮丧士气。要求朝廷将岳飞解职。与此同时，秦桧又指使中丞何铸、侍御史罗汝楫上章弹劾岳飞，岳飞有口难辩，只好向朝廷请求罢去自己枢密一职。但是秦桧余恨未消，又找到了王贵、王俊二人。这两人先前都在岳家军效力，后因怯战或行为不轨，受到岳飞责罚，因而心中不满。其中，王俊是岳家军中的副统制，是一个最惯于反复变诈、喜欢出卖同僚的人，外号“王雕儿”。他一意取得秦桧欢心，在张浚的威胁利诱下，他搞了一份《告首状》，诬告岳飞最倚重的部将张宪要到襄阳去造反。而王贵是岳家军的都统制，他与张宪本就不和，因此，对此诬告自然也是十分赞成。这年年底，秦桧亲自下令提审岳飞，先是派万俟卨抄了岳飞的家，搜走了高宗给岳飞的全部诏书，让岳飞无以自辩，后又令大理寺评事官元龟年将岳家军西征日期进行窜改，因此“临军征讨，误期三日，律当斩”这一罪名就成立了。岳飞被罢免了枢密副使后，韩世忠也罢去了枢密使之职，自此他杜门谢客，绝口不提论兵之事。然而，对于岳飞的冤祸，他是十分了然的，为此他特意去会见秦桧，质问他说：“王俊在《告首状》里告发的一些事体，究竟哪些是可靠的?”秦桧含煳地说：“飞子云与张宪书的内容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当即愤然地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岳飞虽受尽各种酷刑，但一直不肯承认自己有谋反的念头和计划，并绝食以示反抗。万俟卨为此一筹莫展，这时有人提议再让王雕儿提供一些别的罪证，王俊因此又被拉来告发岳飞多次说过“反话”，在威逼利诱下，王俊、孙革等几个人又做假证，于是岳飞又蒙上大逆不道之罪。

这年十一月，秦桧等人判定岳飞两大罪状：一、据旁证称，岳飞曾说自己与宋太祖一样三十岁就封节度使，为大逆不道罪，当斩；二、金兵犯淮西时，高宗曾给岳飞十三道诏命，岳飞却没立即行动，犯“拥兵逗留”罪，当斩。绍兴十二年(1142)一月二十七日，时为除夕，岳飞父子及张宪遇害风波亭，岳飞临死前写有“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他相信自己的冤屈总有一天会得以昭雪，他死时年仅三十九岁。

岳飞的冤狱纯系秦桧等人凭空捏造而成，所以史臣说，岳飞的死是千古奇冤。

为什么说刘锜“神机武略”威震敌国刘锜(1098～1162)，字信叔，德顺军(今宁夏德隆)人，他的父亲曾为泸川军节度使。刘锜外表俊美，善于射箭，声如洪钟，在高俅的荐举下，朝廷特意授予他閤门祗侯一职，后历任陇右都护、宣抚司统制、江东路副总管、提举宿卫亲军、果州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东京副留守、武泰军节度使、侍卫马军都虞侯等职。

绍兴十年(1140)，金人撕毁盟约攻打南宋。金人攻陈(今河南淮阳)时，刘锜与知府事陈规商议对策，当时各个将领都说：“金兵是打不败的，我们还是让精兵杀出血路，保护老人小孩子回到江南去吧。”刘锜说：“东京(今河南开封)虽然失守了，但主要军队还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守城，怎么能弃而不顾呢?我心意已决，如果有人再说逃跑的话就把他斩首示众!”这时，将领中有一个外号叫“夜叉”的许清站起来慷慨地说道：“太尉刘锖奉命辅助守卫汴京(今河南开封)，军卒家人也都跟随而来，如果现在躲避逃走，是很容易的事。然而逃跑时如果不管父母妻儿，我们心中不忍；如果我们带上他们一起逃跑，敌人要是进攻，我们又怎么能逃得了呢?还不如大家奋力一战，死中求生。”这个提议与刘锜的想法完全一致，刘镝非常高兴，命人把船击沉，表示义无反顾的决心，于是将士们都士气高涨，就连妇女们也帮着磨砺刀剑，人们呼喊着

说："平时人们都看不起我们八字军，今天我们将要为国家杀敌立功!"

当时，军队守备方面没有可凭借的地方，刘锜亲自指挥布防，六天以后才粗略布置完毕，这时金人已到城下。这一天，金人围攻顺昌(今安徽阜阳)，因为刘锜预先在城外设下了埋伏，金军千户阿黑等两人被擒获，刘锜从他们嘴里知道了金人的情况，于是派一千多名士兵夜袭金军，杀死、俘虏金军无数人。金人不甘心，又派三路都统葛王率领三万士兵与龙虎大王的士兵汇合向顺昌城迫近，刘锜令士兵大开城门，金人反而怀疑有埋伏不敢进入。当时顺昌已被围四天，这天晚上，刘锜派勐将阎充招募士兵五百人夜袭金军大营，正赶上天要下雨，不时有闪电出现，刘锜的士兵见到有辫子的人就杀死，结果金人退兵十五里。刘锜又招募一百人去攻打金营，有闪电时士兵就出来杀金兵，没有闪电士兵就藏起来不动，金兵为此乱了阵脚，被杀得尸横遍野，只得再次退兵。

金兀术听到兵败的消息立即赶来，亲自指挥战斗。双方约好战斗时间，刘锜命人在颍河(今安徽颍上)下毒，用激将法让金兀术来渡颍河，又赶上暑热天气，金兵远道而来，疲惫不堪，纷纷下马喝颍河的水，因此金兵及马匹都中了毒，金兵人困马乏。刘锜的士兵在早晨凉爽时休息，在午后金兵无精打采时，突然杀出，奋不顾身，统制官赵撙、韩直身中数箭仍不肯停止战斗，金人大败，死了近一万人，金兀术的"铁浮图"、"拐子马"、"长胜军"等厉害阵式，都被刘锜破除。

这场战役，刘镝只有不超过二万的兵力，用于作战的只有五千人，而金兵却有几十万人，但刘镝屡出奇谋，终于以少胜多，打败了自恃无敌的金兀术。以后，金人对刘锜闻名丧胆，刘锜大名威震全国。

为什么说陈俊卿"居中书，知无不为，言无不尽"

陈俊卿(1113～1186)，字应求，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进士。宋枕孝宗时官至宰相，史称他"斥奸党，明公道"、"洎居中书，知无不为，言无不尽"，为一朝名相。

高宗时，陈俊卿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弹劾了曾经依附秦桧、陷害忠良的韩仲通和不服从朝廷调遣的刘宝；汤思退专权，陈俊卿对高宗说："宰相上不当天心，下不厌人望。"汤思退终于被罢免。

为了抵御金人的入侵，陈俊卿上疏高宗，极力推荐深得人心的张浚，最后高宗采纳了他的建议，派张浚守建康；接着陈俊卿又请求以军法惩处主张逃跑的内侍张去为，高宗称赞他有“仁者之勇”，升任他为权兵部侍郎。

孝宗即位以后，陈俊卿对孝宗说：“治国之要有三，用人、赏功、罚罪。”希望孝宗能够做到这三点。隆兴元年(1163)，张浚北伐失败，被汤思退、尹穑等人排挤出朝廷，陈俊卿也被迫辞官。乾道元年(1165)，他又被任命为吏部侍郎。外戚钱端礼私下派人对他说，如果陈俊卿帮他做了宰相，他一定会引荐陈俊卿共同执政。陈俊卿不仅当场拒绝了他，而且第二天就告诫孝宗应该谨守外戚不得干政的家法。孝宗在潜邸时的旧臣曾觌、龙大渊，倚仗皇宠，横行不法，陈俊卿向孝宗揭露了他们的恶行，于是孝宗把两人贬出朝廷，当时人人拍手称快。龙大渊死后，孝宗想把曾觌召回，被陈俊卿阻止了，他对孝宗说：“如果把曾觌召回，一定会大失人心。”曾觌任职期满以后，陈俊卿又建议孝宗任命他为浙东总管，始终让他远离朝廷。直到后来陈俊卿离开朝廷，曾觌才被召回。

隆兴四年十月，陈俊卿被任命为宰相。任相期间，他兢兢业业，为国家选拔人才。他向孝宗举荐了虞允文，认为他具有宰相之才。于是两人一同担任宰相。但后来他们政见不合，陈俊卿又自请离开朝廷到地方任职。临行前，他还劝告孝宗要亲贤臣，远小人，修明政治以振兴国家。

淳熙十三年(1186)一月，陈俊卿去世，终年七十四岁。

为什么说南渡直言之臣，辛次膺“宜为首称”

辛次膺(1092～1170)，字起季，莱州(今山东莱州)人，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进士。后人推他为宋室南渡以后第一敢于直言的大臣，对他评价很高。

辛次膺的大胆直言，是不分对象的。抗金名将韩世忠的儿子在秘阁任职，辛次膺认为不妥，就上奏宋高宗：“带兵打仗，是韩世忠的功劳，与他的儿子有什么关系?石渠、东观，是国家藏书的地方，与武功又有什么关系?这个先例一开，恐怕会一发而不可收十。”并不因为韩世忠曾

为国家立下大功，就有所迁就。秦桧帮他的妻兄王仲薿升官，他弹劾王仲薿曾经对金人卑躬屈膝，罪在不赦；又弹劾秦桧另一个妻兄王蝻；最后干脆将矛头指向了秦桧和高宗本人：“秦桧以权谋私，陛下纵容他这样做，国家的纲纪、大臣的责任何在?”甚至毫不客气地指出：“就算是外戚、皇室成员，只要陛下过分任用、宠信，我都一样能够弹劾他们。外戚、皇族尚且如此，难道大臣的亲戚，我反而不能弹劾了吗?”

在国家政治、军事等大事上，辛次膺同样不遗余力地向皇帝进言。他反对屈辱地向金国求和，和议成功之后，他上疏高宗说：“臣以前常说金人狡诈，不讲信义，希望陛下能够为国家好好地考虑一下。朝廷屈辱地与金国议和，臣认为是不对的。一些大臣不为国家着想，只想着奴颜婢膝地向金人求和，还荒唐地认为这很合适，不知道天下人都认为合适吗?忘记了国家的仇恨和耻辱，放弃自己的尊严来取悦敌人，难道天下人都能像陛下想的那样真的没有怨恨了吗?”

后来辛次膺被罢官，因为他名气太大，所以秦桧想把他收为己用，对此辛次膺只是笑了笑，却没有理睬他。孝宗即位后，他就用人、军事、财政等问题向皇帝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直到辞官回家之前，他还劝孝宗不要重用汤思退，他认为：“今天的局面，不是汤思退所能够解决的；汤思退这个人，恐怕会误了国家大事。”孝宗乾道六年(1170)闰五月，辛次膺去世，终年七十九岁。

陆游才气超逸，尤长于诗，为何“君子惜之”

陆游(1125～1201)，字务观，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陆游才气纵横，在文学创作上成就突出。他的诗、词、散文都有自己的特色，尤以诗歌的艺术成就最高。现存陆诗有九千三百多首，反映的社会生活极其丰富，可以说陆游是南宋诗坛上首屈一指的大诗人。陆游也很有政治才干。孝宗即位时曾亲自召见过他，并称赞他“言论剀切”，特赐他进士出身。在朝期间，陆游向孝宗陈述了有关定都、备战以及革新政治等方面的许多建议。然而好景不长，很快陆游就因为反对权臣龙大渊、曾觌，被贬出了朝廷。此后虽然他先后得到过张浚、王炎、范成大等人的赏识，但是仕途却一直坎坷，屡贬屡起，屡起屡贬，而且

调动非常频繁，杀敌报国、收复中原的夙愿始终没有实现，但是他一直没有忘记恢复故土。当韩侂胄于宁宗嘉泰二年(1202)主张北伐时，七十八岁高龄的陆游毅然出山，主持修撰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和三朝历史。也就在这个时候，他为韩侂胄撰写了《南国记》、《阅古泉记》等文章，遭到了舆论的非议，朱熹也批评他“不能全其晚节”，这就是“君子惜之”的原因。清朝历史学家赵翼曾经为陆游辩诬。其实这件事也确实无损陆游的光辉形象，他为韩侂胄撰写的两篇文章，主要是勉励他为国建功立业，表现出了一片拳拳爱国之心。然而韩侂胄的北伐却最终失败。嘉定二年(1210)，一生以抗金复国为己任的陆游在凄凉中含恨离开了人世，他的绝笔诗《示儿》是这样写的：“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辛弃疾在文学方面有什么杰出贡献辛弃疾不仅具有卓越的军事、政治才干，在文学创作上，他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辛弃疾诗文词俱佳，他在词的创作上用力最勤，现存词作约有六百二十多首，在两宋词人中首屈一指，成就也最高，对当时和后世词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辛弃疾一生以杀敌报国为己任，却始终不能施展抱负，他的一腔爱国之情，满怀悲愤之气，往往通过词的创作表达出来。在大量的词作中，他以炽热的情感、激昂的音调，抒写了渴望恢复故国的强烈愿望和提戈跃马、立功沙场的壮志豪情。“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是这种心情的突出体现。直到晚年，他还发出“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壮语，充分表现出强烈的战斗精神和爱国情怀。然而长期的得不到重用，又使他内心郁结着无穷的苦闷，在《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这首词中，他抒写了自己报国无路的悲愤。他痛恨主政者的昏庸懦弱，在一些词作中或辛辣、或婉转地加以讽刺，有时甚至进行尖锐的抨击。总之，辛弃疾的词，饱含着浓烈的爱国热情。

辛词的艺术成就也独步当时。辛词题材丰富，反映现实生活深广，举凡登山临水、怀古伤今、写景咏物、谈禅说理，乃至嬉笑怒骂，无不一一入词，大大开拓了词体的表现范围。前人论词，常以“苏辛”并称，苏轼是“以诗为词”，而辛弃疾则是“以文为词”，不仅将古文辞赋中常用的章法和议论、对话等手法运用到词的创作中，而且创造性的运用散文中

的词汇入词，从而扩大和丰富了词的语汇。

辛弃疾在词体创作上所取得的高度成就，使他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词人之一。他彻底打破了“词为艳科”传统，使词境变得更为雄奇阔大。其苍凉悲壮沉郁雄浑的词风，对当时以及后世词坛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带动了一大批词人，如刘过、陈亮、刘克庄、文天祥等人，形成了所谓的“辛派词人”。他们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为国家兴亡高声呐喊，直至南宋灭亡。

为什么说孟珙“忠君体国”

孟珙(1195～1246)，字璞玉，随州枣阳(今湖北枣阳)一人，南宋中后期的著名将领。

孟珙家世代为将，他从小受先人影响，很快在军中脱颖而出，屡立战功。理宗时宋蒙合力攻打金国，绍定六年(1233)蒙古将领那颜倴(bèn)盏追击金主完颜守绪，逼近蔡州(今河南汝南)时让孟珙戍守鄂州配合作战，征讨金将武仙。孟珙先一举打败了与武仙形成犄角之势的武天锡部队，又率仅有八千人的部队在吕堰(今湖北襄阳北)与金军展开激战。金人大败，邓州守将移刺瑗投降。这样一来武仙就失去了左膀右臂。孟珙热心安抚归附的军士和官员，向归顺的武仙爱将刘仪打听虚实。他按照刘仪的建议，先攻破了离金寨和王子山寨，使马蹬、沙窝两寨陷于孤立，然后将其各个击破，又派部将攻占了小总帅寨和默候里寨招降了板桥寨。这时，武仙所据的九寨中只剩下了石穴山寨和岵(hù)山寨。孟珙料想武仙遭此大败，一定会上岵山顶上观察地势，就预先派兵在天亮时夺取了岵山，埋伏在山脚下。不久，武仙果然率众到来，宋军在他们登到半山时发动了突然袭击，金兵惊慌失措，丢兵弃甲，死伤无数。武仙不肯投降，孟珙又率领宋军冒雨夜夺石穴山寨，武仙改变行装逃走，他的部下七万人全部投降。至此，金主想经河南入蜀的计划落空。

孟珙率军与蒙古将领那颜倴盏一起攻打蔡州。当地有一口潭叫柴潭，潭水深不见底，潭水上方有金字号楼，楼中埋伏着弓箭，金兵凭恃柴潭，以为蔡州不可破。孟珙攻到这里时，见将士们畏惧不前，就让他们开怀畅饮，然后说：“柴潭不是天险，楼上的弓箭只能射到远处而不能

顾及远处。我们只要把潭凿开，把薪草塞进去，潭水干涸以后就可以攻城了。”将士们依计而行，一举攻下了金字号楼。

蔡州孤城一座，到端平元年(1234)正月时城中已经断粮三个月了，每天都有人吃人的现象发生。孟珙知道时机已到，于是派兵从南门登云梯攻入城中，又打开西门，把蒙古军放进来，宋蒙联合，终于攻下了蔡州。金主完颜守绪在城快攻破时自杀，金国灭亡。

端平三年(1236)，蒙军攻克了襄阳(今湖北襄樊)，湖北九郡相继陷落。南宋听说蒙军直逼江陵(今湖北沙市)，急忙派孟珙前往救援。孟珙下令封锁了江面，采用疑兵之计，在江上遍布火把，照亮了数十里的江面。他还让部队改变旌旗服色，循环往来，虚张声势，迷惑敌人。然后他和表弟赵武等人共同作战，亲自指挥，焚毁了蒙军准备渡江的二千多只船，攻破了二十四座寨。蒙军被迫退走，长江防线得以保全。从此，理宗把京湖战场的防备交给了孟珙。在他去世之前，蒙军始终不敢贸然渡江。

孟珙一心为国，四川制置使陈隆之与副使彭大雅不和，孟珙知道后叹道：“国事如此，齐心协力还来不及，他们俩却为一己之私互相争斗，岂不愧对廉颇和蔺相如?”他写信给陈隆之和彭大雅，他们读后惭愧不已。孟珙在军中和众将讨论事情时，大家往往意见不同，他用只言词组把他们的意见折衷后，众人皆欢。他名位虽重，但只是在指挥作战、巡查军队时神色凛然，平日里则安抚兵卒，招贤纳士，和蔼可亲。

蒙古河南行省的范用吉暗中投降，孟珙一面做好了受降的准备，一面向朝廷请示。得知朝廷没有批准后，他悲愤地叹息道：“我三十年来一心想收复中原，现在却有志难伸了!”淳熙六年(1246)自春至秋他先后五次因病请求辞官未被获准，在知道这个消息后，他的病情很快恶化，不久就逝世了，享年五十二岁。

为什么说宋朝廷重赵葵“如长城之势”

赵葵(1186～1266)，字南仲，潭州衡山(今湖南衡山)人，南宋著名将领赵方之子。他和哥哥赵范从小就立有大志，父亲很器重他们，就请郑清之、全子才、李燔等名士指点他们的学业。

赵葵从小在军中长大，少年时代就经常随父亲抗击金兵。每次金兵袭来，他都和诸将一起出去，深入敌军中间作战。诸将怕长官的儿子有闪失，总是拼死救他，所以打仗屡屡取胜。一天，赵方犒赏将士，大家嫌赏赐太少，愤愤不平，眼看就要激起兵变，赵葵觉察到以后急忙高呼："这是朝廷的赏赐，本司另有厚赏!"听了他的话，军心马上安定了。当时，赵葵才十二三岁，事后大家都夸他机警过人。

嘉定十年(1217)，金将高琪、乌古论庆寿包围了枣阳(今湖北枣阳)。赵葵和哥哥一起在父亲的带领下前去救援，击退了金人。嘉定十三年，赵葵受父亲的派遣和都统扈再兴一起领兵出战，连败金兵。嘉定十四年，金人进犯蕲州(今湖北蕲春)，赵方命令赵葵兄弟二人前往救援。在久长(今湖北新洲东)，宋军与回撤的金兵相遇，赵葵见敌方只有几十名骑兵，就率领杨大成等十四人追上前去，没想到后来金兵逐渐增加到了数百骑，赵葵奋力拼杀，等到赵范、扈再兴前来救援才脱围。第二天晚上金兵发动了夜袭，宋军早有准备，大败金兵。

李全之乱发生后，赵葵多次上疏指出不能姑息养奸，要及早歼灭，但朝廷却对这件事一放再放。理宗绍定三年(1230)，李全进兵扬州(今江苏扬州)，朝廷派赵葵率领一万四千人马赶去增援驻守扬州的赵范。十二月十日，李全开始攻城，多次被赵葵兄弟击退。绍定四年正月十五日，赵葵、赵范利用李全狂妄自大的弱点，让数千名精兵换上经常被李全击败的宋军部队的旗帜和服装，引诱李全出战。李全果然中计，大败而逃，结果陷进了数尺深的泥淖里，被赶来的宋军杀死。宋军又乘胜反攻，收复了淮东的失地，很快平定了叛乱。后来理宗召见赵葵时说："你们父子三人为朝廷出力甚多，你打仗时又能身先士卒、舍身报国，这对一个儒臣来说是很难做到的。"

端平元年(1234)金国灭亡后，理宗和宰相郑清之都想乘机收复河南，于是赵葵上疏请求出战，被任命为权兵部尚书、京河制置使兼淮东制置使。赵葵出兵时正值盛夏，河水泛滥，粮食缺乏，不久就大败而归了。由于这次军事行动的失败，赵葵被降官一级。嘉熙元年(1237)，赵葵知扬州。他前后在扬州任职八年，开垦农田，加强战备，成功地抵御了蒙古的入侵。淳祐九年(1249)，赵葵出任右丞相，但很快就罢相了。咸淳二年(1266)，赵葵病逝，终年八十一岁。

文天祥文学成就如何文天祥在文学创作上的成绩非常突出，他的诗、文、词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他的爱国之作中最感人的是那首《过零丁洋》诗：“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特别是最后一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更是千古传颂的名句，激励了后代无数忠臣志士为国尽忠而自死不悔。他在大都监狱中所写的“正气歌”也是一首名作。这时诗人已经被关押两年，身体的创伤，精神上的折磨，自不待言，“时劣节乃现，一一垂丹青”，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支撑着文天祥继续斗争的，在他看来，就是“正气”，即临危之大节，这首诗前半部分以古代英雄人物鼓励自己，是抒情，后半部分描写自己在狱中的艰苦生活，是记实，最后又以抒情结尾，激励自己要舍身取义，确实是一首声振千古的正气之歌。

文天祥的词虽然数量不多，但在表现爱国精神方面却毫不逊色，他继承了辛弃疾打开的风格，词作慷慨悲凉，直抒胸臆，代表作是和友人邓剡《驿中方别》的《念奴娇》，全词以悲壮激越的语言，明确表示了自己虽历尽磨难都依然决心坚持民族气节的爱国精神，并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文天祥的散文中，最著名的是《指南录后叙》。这篇文章真实地再现了他从德祐二年出使元营被扣留一直到逃脱后辗转到达永嘉这段时间同敌人、叛徒的激烈斗争，以及途中九死一生，颠沛流离的辛酸历程，充分反映了这位民族英雄百折不挠的意志。

什么叫理学“理学”，兴起于在宋代，也称为道学，是儒家的学术思想。宋儒在诠释儒家经典的过程中，抛弃了汉儒偏重章句、训诂的学风，他们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把一切合乎愿望的事物、意念和行为都说成是“理之自然”，把一切违背自己意志的事物、意念和行为都贬为与“理”相对立的“人欲”，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与此同时，他们中的不少人把“理”定为宇宙的本原，所以这一学派称为“理学”，又因为宋儒常常“理”、“道”并称，因此《宋史》专门设立了《道学传》，记载的都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及其门徒的事迹，所以这个学派又称为道学。

理学之理，除了有些地方保留了规律、法则的意义外，更多的时候是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使用的。理学不仅认为理是自然界的最高原则，也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与以往的哲学相比，它的思想成分是较为复杂的，它以儒家传统的伦理思想为核心，还融合了佛家和道家的一些思想作为补充，因此它的理论思想要比传统儒学要深刻、精致，容量也大得多，它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理学体系的形成、发展和完备，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它开创于北宋初期，孙复、胡瑗、石介这“宋初三先生”大力提倡“以仁义礼乐”为学，宣扬儒家道统说，对后来理学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是理学的先驱。理学的开山祖师是周敦颐，他在代表作《太极图·易说》和《易通》中，开始使用“理”这个概念。他的理论体系已经初具理学雏形，他在理学史上的地位，到南宋时为人所承认，朱熹、张栻等人称他为“先觉”、“道学宗主”。北宋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对理学也有重要贡献，他提出的“理一分殊”命题，开程、朱等人以“理”为宇宙本体之理论的先河。理学的真正奠基者是程颢、程颐兄弟。“理”成为哲学最高范畴，是从他们开始的。二程完成了儒学向哲学化、抽象化的理学过渡。理学的集大成者是朱熹，他用毕生的精力，对理学的所有基本范畴和概念，都作了详细论证和发挥，他在理学史上的地位，是无人能及的。与朱熹同时，在理学内部还产生了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陆九渊提出了“宇宙便是吾心”的命题，以“发明本心”为宗旨，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

为什么说周敦颐“得圣贤不传之学”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号濂溪，道州营州(今湖南道县)人。他为官尽职尽责，断案公正清明。早在分宁(今江西修水)任主簿时，就因为清理积案果断准确赢得了百姓的称赞。后来他调任南安军司理参军，当时转运使王逵断案失实，因为他为人暴躁凶悍，所以没人敢提出异议，周敦颐却据理力争，最后甚至还要辞官：“靠滥杀无辜取悦别人，我不做这样的官。”王逵终于被他的正气折服了，冤案得以纠正。在担任提点广南东路刑狱时，为了了解案情，他不顾当地地形复杂、瘟疫流行的险恶环境，到处查访，为百姓洗雪冤情，最终因此得病，不得已移居庐山莲花峰。神宗熙宁六年(1073)六月，周敦颐去世，终年五十七岁。

周敦颐的人品很受时人的称赞，黄庭坚就称他“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作为一个哲学家，他被后人奉为理学的开山祖师。南宋朱熹、张轼称他为“先觉”、“道学宗主”，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太极图说》和《通书》，其中《太极图说》是他学说体系的基础。《太极图说》一文虽然只有二百五十多字，但周敦颐通过对《太极图》的解说，以太极为本体，提出了他的宇宙和世界观，由阴阳刚柔的变化，说明了万事万物与人类的产生，进而提出了形、神以及性、欲、善、恶、仁、义、道等范畴、概念。朱熹称赞这部著作“粹然孔孟渊源”，“得千圣以来不传之秘”。可见它在理学史上的重要影响。

司马光为什么认为程颐“力学好古”

第四十九章

程颐(1033～1107)，字正叔，他是程颢的弟弟，世称伊川先生。十四五岁时，与哥哥一起在周敦颐门下学习。十八岁那年，他进入太学读书。当时胡瑗在太学任教，有一次他用“颜子所好何学论”为题考试，当他看到程颐的试卷后，大加赞赏，立即召见他，并且给他安排了一个学职，不久程颐就名声大振。嘉祐四年(1059)，程颐参加科举考试，在殿试时落榜，从此致力于钻研学问，兴办教育，不再应考。英宗治平、神宗熙宁年间，吕公着等大臣多次向朝廷举荐他，他都以学问不够为由，不愿出来做官。神宗熙宁五年(1072)，哥哥程颐罢官回到洛阳，兄弟二人就在家乡讲学，“士之从学者不绝于馆，有不远千里而至者。”程颐讲学庄重有体，非常严谨，特别讲究师道尊严，著名的“程门立雪”的典故，就发生在这时。由于他们教育得法，培养了大批门人，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学术流派——洛学。哲宗即位后，司马光等人再次推荐程颐，称赞他“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尊礼法”，年过五十，不求仕进，请求皇帝加以重用；元祐元年(1086)三月他被召进京后，王岩叟又上奏称赞他是学者中的“完人”。召对之后，他被任命为崇政殿说书，成为皇帝的老师。他每次进讲，都要反复推明儒家经义，又常常对哲宗进行劝谏，议论时政，无所顾忌回避。后来他与翰林学士苏轼产生了矛盾，他们各自为首的两派互相攻击，苏轼一派的孔文仲极力诋毁程颐，把他贬得一无是处，说他是“五鬼”之首。于是在元祐二年八月，他回到洛阳继续从事教育。绍圣四年(1097)新派得势后，把他贬到涪州(今四川涪陵)，在那里他完成了重要著作《易传》。徽宗即位后，程颐被赦免，于大观元年(1107)在家去世，他一生从事教育活动长达五十年之久。

程颐和程颢的哲学观点虽然小有差异，但他们哲学思想的基本倾向还是一致的，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程颐在哲宗元符二年(1099)完成的著作《伊川易传》代表了他的基本观点，这部书也是宋代理学的经典作品。他强调理是万事万物的本原，“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但是世界上各个事物各有其特殊情形，各有其理，这就是“理一分殊”的思想。后人研究宋代理学，通常“二程”并称，实际上，程颢的主要贡献，一是为洛

学的创建作了发端工作，二是培养了一批学生。而程颐比程颢晚去世二十多年，在程颢之后，他完成了对理学体系的改造，从而奠定了理学的基础。

横渠先生为什么成为“关中士人宗师”

横渠先生是士人对北宋著名理学家张载的尊称。张载(1020～1078)，字子厚，今陕西眉县人。

横渠张载少年时代喜欢谈论军事，二十一岁那年他去拜见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提出要邀集豪士，夺回西夏侵占的国土。范仲淹看他很有才华，就劝他说：“儒士还是应该从名教中寻找乐趣，怎么能只谈军事呢?”张载受到启发，开始读范仲淹向他推荐的《中庸》，读完之后并不满足，又研读道家佛教的书，但没有收获，于是他又反过来从“六经”中探求学理。

张载在京师时曾经坐在虎皮垫上讲《易》，听讲的士人特别多。一天傍晚，程颢、程颐兄弟来和他讨论《易》，第二天他就对人说：“见到二程之后我才知道自己在《易》上的造诣不及他们。”于是就停止讲学了。但在和二程深入地探讨道学的精义之后，他又不无自信地说：“我的学问能自成一体，还用得着到别人那里去求道吗?”

熙宁二年(1070)，御史中丞吕公着向神宗推荐张载，神宗召见他，向他询问治国之道，张载认为应该效法三代，神宗听后很满意，让他任崇文院校书。后来张载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调到明州(今浙江宁波)处理苗振一案。案件处理完毕后，他就称病辞官了。在此后六年多的时间里，他一天到晚坐在房间里，把书和笔放在身边，一会儿低头读书，一会儿抬头思索，有心得就提笔记下来，有时半夜还要起来点着蜡烛写书，到熙宁九年他终于完成了学术著作《正蒙》。

熙宁十年张载被召入朝，朝中有些官员与他议礼的见解不合，他又身患重病，于是再次辞官，死在回乡的路上。他一生清贫，棺木还是门徒们凑钱买的。

张载以为世界的本体是“气”，万事万物的变化是气的变化，每个人

都有“天地之性”，但“气质之性”的不同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为了成为圣人和君子，人们应该通过学习改变自己的“气质之性”。张载的学术又称为横渠之学，他创立了关学，是“关中士人宗师”。

“鹅湖之会”是怎么回事孝宗朝是南宋思想最活跃的时代，南宋的著名学派几乎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朱熹就是在孝宗时期逐渐创建起了系统的理学体系，形成了集理学大成的学派。由于他出生于尤溪，主要活动于建阳(今福建建阳)、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地区，因此他这一派也被称为闽学派。这一时期理学的另外一个重要学派，是陆九渊创立的心学学派。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号存斋，世称象山先生。因为他是抚州金溪(今江西金溪)人，所以心学学派又称为江西学派。两派在宇宙观、心性论、方法论上都有严重的分歧。在宇宙观上，陆九渊认为“宇宙一理”，主张唯理一元论；朱熹则认为“理先气后”，有理气二元论的倾向。在心性论方面，朱熹把人心分为天理、物欲两部分；陆九渊则认为心理是完全合一的。在方法论上，朱熹主张“格物致知”；陆九渊则提倡顿悟式的内省道德修养。为了调和朱、陆两家的分歧，淳熙二年(1175)，吕祖谦邀请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和朱熹在信州鹅湖寺(今江西铅山鹅湖寺)进行了一场哲学辩论会，与会的还有临川太守赵景明以及刘子澄、赵景昭等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在会上，朱、陆双方各持己见，并赋诗明志。陆氏兄弟主张先发明本心，然后加以博览，认为本心之性千古不变，明心功夫终究久大，讥讽朱熹的格物功夫支离，免不了要浮沉。朱熹对此非常不满，主张先博览而后归之约。双方辩论了三天，到最后观点也没有得到统一。

为什么说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之所以能够成为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首先在于他具备广博的学问和探究事理的“穷理”精神。他不仅总结了北宋以来各派学说并融会贯通，同时也吸取改造了某些唯物主义思想，将之纳入了自己的理学体系；对佛、道思想也是剔除其有悖于封建伦理的观念，吸取其哲理的部分；对自然科学知识也表示了一定的尊重，认为它虽是“小道”，却不是“异端”。朱熹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在理学家中是无人能及的。

朱熹理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天理论，以理气说为中心内容。“理”是朱熹思想的最高范畴，以“理”作为宇宙的根本，“气”是第二性的，强调理

本气末。在政治上，他的“理一分殊”学说是为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做论证，而万物各自的分殊的理，只是最高的“理”的体现。另外，他肯定了张载“一物两体”的说法，指出“凡事无不相反相成”，认为质变是在渐变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种观点是对古代辩证法思想的一个新贡献。

关于知行学说，朱熹强调知先行后，但又认为“知行相须”，注意行在认识中的作用。性命之说也是朱熹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他认为性是一切有生命的生物所具有的天理，人类禀受天理的因素，因而有仁义礼智的道德。但是人也是物质的形体，禀受的气有清浊的不同，所以有智愚善恶之分。朱熹从先天气禀的不同来论证人的贤愚善恶，从而说明了封建社会善恶是非的先天根据。对于“理”和“欲”的问题，他提出“人欲中自有天理”，“然天理人欲，同情异行”，认为道德意识与物质欲望是不可分的。他认为，凡是超越了封建道德原则规定的人欲，就是与“天理”对立的，所以说“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在历史观上，他认为尧、舜、禹的时代“天理”流行，体现为“王道”政治；三代后就“人欲横行”，体现为“霸道”政治。

总之，朱熹的学说可以说集理学之大成。他一生著作丰富，对理学的基本问题几乎都有论述，他是理学的最后完成者，也是孔子以后对儒学贡献最大的思想家，他创立了一整套完整、精密、独特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了元、明、清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通志》是谁所著《通志》是一部重要的通史著作，和《通典》、《文献通考》合称为“三通”。它是由南宋的郑樵编著的。

郑樵(1104～1162)，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自号溪西遗民，人们称他为夹漈(jì)先生。他家境贫寒，在家乡夹漈山建筑住屋，谢绝亲友，专心苦读。学成之后，他开始游览名山大川，增长见识，碰到藏书丰富的人家，就千方百计地请求人家把书借给他读。他的兴趣十分广泛，对经史之学、礼乐、文学、天文、地理、虫鱼、草木等各门各类的学问都有研究。

由于得到侍讲王纶、贺允中的推荐，郑樵得到高宗的召见。后来他

监潭州南岳庙，高宗下令给笔札资助他抄写《通志》。绍兴三十二年(1162)高宗命令郑樵进献《通志》，三月郑樵病逝，终年五十九岁。

郑樵编著的《通志》共二百卷，是我国现存继《史记》之后的又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体例分为本纪、列传、年谱(即年表)、略(即志)、世家、载记，上起三皇，大部分内容下限到五代。《通志》的精华主要在二十略上，这二十略依次是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仇(chóu)、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二十略可以被视为一部广义的文化史，受到了后人的重视。

真德秀为何被“内外交颂”

真德秀(1178～1235)，字景元，后改希元，号西山，世称西山先生，建州浦城(今福建浦城)人。他四岁开始读书，过目不忘，十五岁父亲去世，同郡的杨圭见他器宇不凡，就让他和自己的儿子一起学习，还把女儿嫁了给他。

真德秀于庆元五年(1199)中进士，开禧元年(1205)中博学宏词科，嘉定元年(1208)升太学博士。他对奸臣史弥远的降金政策十分不满，指出对金唯唯诺诺，每年献上“岁币”，只会使金国日益富强而宋朝日益衰败。

嘉定六年(1213)十月，真德秀任金国贺登位使，行至盱眙(xúyí，今江苏盱眙)边城时金国发生了内乱，不能过界。他一直等到第二年年初，但还是无法到中都(今北京)庆贺金宣宗即位，只好返回京师。他一再上奏陈述宋金形势，但宋朝偏安江南，根本没有收复中原的打算。同时，史弥远专权擅国，笼络天下名士，真德秀悲愤地说：“我一定要离开朝廷，让权臣知道这世上还有不阿附权贵的人!”于是极力要求外调。

真德秀出任江东路转运副使时，江东地区正在闹旱灾蝗害，他到任后奏罢贪官，并在自己分管的灾区广德(今安徽广德)、太平(今安徽当涂)两地开仓赈灾，政绩卓著。赈灾结束后，数千百姓自发地为他送行，并指着路旁的荒坟说：“这里埋的都是往年饿死的人。要是没有您，我们也早就进坟墓了。”以前都司胡榘(guī)、薛拯常常讥诮真德秀过于迂腐，没

有实际才干，从江东赈灾以后真德秀的政誉才逐渐显著起来。

真德秀又被调任知泉州(今福建泉州)。泉州是重要的外贸港口，但外商苦于苛税繁重，一年只有三四艘商船进港。真德秀上任后，宽待外商，并组织民兵剿灭海盗，进港的外国商船一下子就增加到了三十六艘。

嘉定十七年(1224)宁宗去世，史弥远扶植理宗即位。理宗下诏已经成为著名理学家的真德秀入朝，并在真德秀还未到位以前连续为他升官。真德秀对史弥远废立国君非常不满，坚持不任直学士院，只任礼部侍郎，并多次为济王赵竑(hóng)辩白。赵竑原本是皇位继承人，被史弥远害死，当时朝廷内外没人敢公开为他申冤，真德秀的这一行为大大触怒了史弥远。正好王塈(jì)、盛章、莫泽、朱端常先后弹劾真德秀，真德秀被罢。监察御史梁成大又弹劾真德秀，请求把他加以贬窜，但理宗没有这样做。史弥远被诛后，真德秀重新得到了重用，但他已经疾病缠身，不久就逝世了。

真德秀是朱熹的再传弟子，是当时名望非常高的理学家，虽然遭到奸相嫉恨而不被任用，但他的名声反而因此更加显著。他在朝内任官不到十年，却写了数十万字的奏疏，直指朝政，任地方官时政绩卓著，深得民心，因此被“内外交颂”。

魏了翁去世，理宗为何“有用才不尽之恨”

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邛(qióng)州蒲江(今四川蒲江)人。他年龄很小时就和哥哥们一起读书，悟性极高，过目不忘，被乡里人视为神童。十五岁的时候，他写了一篇《韩愈论》，抑扬顿挫，已经和成熟的文风相去不远了。庆元五年(1199)他以第三名中了进士。

开禧元年(1205)，魏了翁被召试学士院。当时韩侂胄积极准备北伐，想以此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朝中很多大臣都认为时机还不成熟，担心北伐失败，损耗国力，但没有人敢公开反对韩侂胄。于是，魏了翁在策论中指出“国家纪纲不立，国是不定”，而“金地广势强”，如果不顾宋金之间的力量对比，贸然出兵，那就只会孤注一掷，后果不堪设想。魏了翁的策论一出，朝内一片哗然。

开禧北伐失败，史弥远秘密害死了韩侂胄。他为了改善形象，开始起用名士，崇奉理学，理学家魏了翁也在收召之列。但魏了翁一开始就觉察到史弥远专断国事，于是极力推辞。不久父亲去世，魏了翁辞官守丧，在白鹤山(在今四川蒲江县北)下建成了鹤山书院，著书立说，开门授徒，积极宣扬理学，士子们争着从各地赶来求学。

后来魏了翁知眉州(今四川眉山)。他礼遇老者，提拔才士，每月初一、十五亲自去学宫讲学，推行礼仪教化，做了很多对百姓有利的事情，使当地习俗为之一变。

嘉定十五年(1222)，魏了翁被召入朝。史弥远想把他收为己用，不断升迁他的官职。嘉定十七年，宁宗逝世，理宗不太光彩地登上了皇位。国事的突然变易使魏了翁积忧成疾，三次请求担任闲职，但没有得到批准。宝庆元年(1225)正月，原来的皇位继承人济王赵竑(hóng)被史弥远害死，魏了翁对此极为不满，多次请求为济王平反。史弥远见他始终不向自己低头，终于露出了本来面目，以欺世盗名、结党诽谤国事的罪名降了他的官职，贬往靖州(今湖南靖州)居住。

史弥远被诛后，魏了翁表面上得到了重用，但他在各方力量的牵制下根本不能有所作为。他一再请求辞官，但直到去世朝廷也没有下达诏书。死后他累赠至秦国公，谥文靖。

魏了翁是著名的理学家，和真德秀齐名。他为理学的创始人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请谥，并创建书院讲学，为理学的传播和发展起过重要作用。他去世的消息传到朝内后，理宗十分悲伤，“叹息有用才不尽之恨”。

为什么说刘克庄是南宋末年文坛宗主刘克庄(1187～1269)，字潜夫，号后村居士，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他曾经拜理学大师真德秀为师，一生经历了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五朝，虽然没有太多值得称道的政治业绩，但在文坛上，他是南宋后期的“江湖诗人”中官位最高、年寿最长、阅历也最为丰富的作家，在当时就被看作是文坛的宗主，是继陆游、辛弃疾之后最著名的爱国诗人、词人。

刘克庄学问渊博，在诗、词、骈文、散文上都有很高的造诣，诗词

的成就尤其突出。他早年的诗就很受大儒叶适的赏识。刘克庄今存诗约有四千五百首左右，数量之多在南宋仅次于陆游，刘克庄生活的年代，南宋王朝正在死亡线上苟延残喘，苦苦挣扎。他感时伤怀，写了许多慷慨悲壮、笔力雄健的佳作；有对中原未复、时无英雄的悲愤(如《有感》)；有对当权者昏庸、苟安的强烈抨击(如《戊辰即事》)；还有对忠勇之士的赞颂和悼念(如《梦豊宅之》)，都表现出诗人关心时政、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刘克庄也是南宋后期最有成就的豪放派词人，现有词二百四十六首。他对辛弃疾非常仰慕，因此在创作中有意识的继承辛弃疾的词风，表现出豪迈奔放、雄健疏宕的主导风格，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和忧国伤时的情怀。他虽然没有辛弃疾在金占领区生活二十多年的切肤之痛，但是悲愤中原的沦陷、渴望国家的统一却是与辛弃疾相通的。在《贺新郎》《九日》中他写道："湛湛长空黑，更那堪斜风细雨，乱愁如织。"表现了对中原未复的凄凉、萧瑟之情。在反映抗战的另一首《贺新郎》《实之三和，有忧边之语，走笔答之》中，他忧心国势危急，"国脉微如缕，"激励朋友投笔从戎，挽救国难，"闻说北面吹风急，边上冲梯屡舞"，"快投笔，莫超柱"。感情激越，语重心长。充分显示出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之际的满腔报国热情。

除了诗词创作成就突出外，刘克庄还是南宋时期一位著名的诗论家，着有兼论诗词的《后村诗话》，在书中他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观点，特别是对陆游、辛弃疾的爱国词给予了很高评价，对推广辛词起了一定的作用。后人认为《后村诗话》"论诗则具有条理"，"迥在南宋诸家诗话上，"这个评价是很高的。李穆为什么赞叹徐铉、徐锴之文"二陆不能及也"?

徐铉(917～992)，字鼎臣，徐锴(901～974)，字楚金，扬州广陵(今江苏扬州)人。他们是兄弟俩，都以文才扬名于当时。

徐铉十岁就会写文章，与韩熙载齐名，江南的士人把他们合称为"韩徐"。他刚开始在南唐做官，宋军包围金陵(今江苏南京)后，李后主想派他出使宋营，正好都将朱令赟(yūn)带领十余万士兵从长江上游赶来救援，后主为了确保徐铉的安全，想下令朱令赟暂时不要东下，徐铉却

说："现在要先为社稷考虑，不要担心我。"南唐投降后，徐铉入宋，曾经从征太原，他起草的书檄诏令辞理精当，受到了大家的赞扬。

徐铉恬淡寡欲，坦率正直，不喜欢佛教而爱好神怪故事，写有《稽神录》。他做诗学习李白和白居易，风格平淡自然。同时，他还精通小学，受诏校对过《说文解字》。由于他曾在北宋担任散骑常侍，世称徐骑省，现存作品有《骑省集》三十卷。

徐锴小的时候，母亲忙着教哥哥读书识字，顾不着管他，他就自己主动去学习。后来李璟(南唐中主)见到了他的文章，称赏不已，就让他做了秘书省正字。徐铉奉命出使宋营时，他忧虑而死。徐锴也精于小学，作有《说文解字韵谱》。除诗文以外，他还写过《方舆记》、《古今国典》、《赋苑》、《岁时广记》。

徐铉兄弟在宋初享有很高的声誉，李穆出使江南读了他们的文章后，感慨地说："二陆不能及也!"意思是说，连西晋的著名作家陆机和陆云兄弟也比不上他们，可见他们的确才华横溢。

为什么"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柳永(约980～1053)，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受家庭影响，从小就勤奋学习，致力于举业。柳永兄弟三人都以擅长文学著称，号称"柳氏三绝"。青壮年时期，柳永主要生活在汴京，因为他长得舒朗俊逸、仙风道骨又风流多情、善于作词，所以深得歌妓舞女的青睐，终日流连于秦楼楚馆，为歌儿舞女填词，过着纨绔子弟、风流才子式的浪荡生活。虽然他文才出众，然而却屡试不中，失望之余，他作了一首《鹤冲天》词，表达了自己的失望之情，其中有"才子佳人，自是白衣卿相"和"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两句。这首词盛传一时，仁宗知道后非常不高兴，因此柳永当再次应举并通过考试时，仁宗在放榜前把他黜落，理由是"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在皇帝眼中，他就是一个有才无德的文人。尽管后来又有爱才的人向皇帝推荐他，但是仁宗还是一句："且去填词!"科举功名上的失意，使他更加放浪形骸，自嘲"奉旨填词柳三变"，混迹于秦楼楚馆之中，还多次外出漫游。在经历多年坎坷之后，他终于在景祐元年

(1034)考中进士，但是长年沉沦下僚，无法升迁。皇祐中，他好不容易升为屯田员外郎，但不久就因为《醉蓬莱》一词再次触怒了仁宗，从此“不复进用”。皇祐五年(1053)前后客死于润州(今江苏镇江)。他的一生是非常不幸的。

柳永以词成名，也以词受累，他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专业词人。他在词史上的突出贡献是发展了慢词的形式，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

在柳永之前，词坛上占优势的是小令，慢词的数量很少。柳永开始大量创作慢词，使词这种文体反映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更加丰富。于是在他的词中，出现了繁华富庶的都市(如《望海潮》)，飘泊四方的羁旅行役情怀(如《八声甘州》)，以及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情(如《雨霖铃》)。因为他长年生活在市井之中，与下层市民有着较多的接触，所以他能够从平民的真实感受出发，客观真实地描写繁华的都市、发达的经济以及丰富多彩的市民生活，这些都适应了都市生活和市民娱乐的需要。在丰富词作的艺术手法和表现力方面，柳永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词铺叙委婉、描述精细，尤其善于以曲折委婉的白描手法写景、叙事和抒情，给人以结构细密、布局严整、层次分明、意赅情深的感受。柳词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俗”。这不仅表现在它的内容多是反映世俗生活，也表现在它的语言多采用民间的俚俗之语，通俗易懂，形象鲜明，有的词(如《爪茉莉》)几乎全篇都是用口语写成的。这种浅显生动的语言能够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了在此前文学作品中较少出现的市民情调，这也是柳永的词能够风靡一时，广泛流传，深受下层市民喜爱，以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重要原因。

梅尧臣诗歌成就如何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安徽宣州)人，是宋初著名的诗人。

梅尧臣出身于农家，所以虽然他的诗写得很好，却一直没有引起别人的重视。后来他凭借叔父梅询的门荫担任了河南主簿，才在西京洛阳得到西京留守钱惟演的赏识。钱惟演和他结为忘年之交，并和他互相酬唱，以帮助他提高声誉。不久，欧阳修也到了洛阳，他和梅尧臣一见如故，二人开始共同倡导诗文革新。

梅尧臣屡试不中，仕途很不得意，于是他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了诗歌创作上，成了宋初为数不多的著名诗人之一。他关心百姓疾苦，写了许多反映百姓生活的诗歌。仁宗康定元年(1040)，他知襄城县事，当时朝廷正在和西夏作战，人力、物力缺乏，因此加重了对人民的赋税和徭役，梅尧臣目睹百姓的惨状，愤懑之下写了《田家语》等诗。

梅尧臣不但擅长写《田家语》之类的古体诗，而且近体律诗也写得得心应手。《鲁山山行》描写山行经过之处的景物，出语平淡而情趣盎然："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他的名句有"野凫(fú)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东溪》)，"庭花昏自敛，野蝶昼还来"(《闲居》)等。

梅尧臣的诗简古平淡，"平淡"是他一向的艺术追求。所谓平淡，不是平庸浅俗。他曾经对别人说："好诗要写得有新意，要写出前人没有写过的东西。能把难写的景物写得跟它就在眼前一样，能让人读完以后觉得诗中还有话外之音，这样的诗才是最好的诗。"梅尧臣有明确的艺术追求，并不断地向这个方向努力，最终达到了平淡有味的境界。欧阳修是当时文坛的领袖，却声称自己的诗不如梅尧臣写得好。有人得到一件西南少数民族的衣服，上面竟然绣有梅尧臣的诗。从这两件事上就可以看出梅尧臣的诗名是很高的。

"贺梅子"谓谁"贺梅子"指的是北宋著名词人贺铸。他的《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一词广为流传，其中"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几句特别著名，于是人们称他为"贺梅子"。

贺铸(1052～1125)，字方回，卫州(今河南汲县)人。他身长七尺，面黑如铁，眉目耸拔，长相十分奇伟。他喜欢谈论时事，即使是权贵显要，只要稍有不合他心意的地方，也会被骂得体无完肤。他曾和一个权贵子弟同事，那人骄傲不倨，贺铸看不惯他，就拿来盗贼偷东西时用的工具，屏退左右后把他关进了密室里，然后拿棍子指着他说："你过来!你曾经在某年某月某日偷了某件东西作为某用，你又在某年某月某日偷了某件东西带回家，是不是?"那人一听，吓得连忙说："是是是"。贺铸又一下子把他的衣服撕开，拿棍子狠狠地打了他好几下，那人疼得呼爹

喊娘，连连叩头求饶。贺铸见他已经被制服了，就哈哈大笑，把他放了。当时，江淮一带有米芾以魁伟傲岸出名，贺铸和他不相上下，两人每次碰见都怒目相视，互相辩驳，谁也说服不了对方。

人们都说贺铸有侠士之风，但他却擅长写缠绵悱恻的词作，前面提到的《青玉案》就属于这类作品。又如他在妻子死后写的《鹧鸪天》：“重过阊门万事非，同来何事不同归?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原上草，露初曦，旧栖新垄两依依。空床卧听南窗雨，准复挑灯夜补衣。”这首悼亡词和苏轼写的同一主题的《江城子》一样，打动过无数痛失爱侣的人。贺铸善于化用别人的句子填词，他曾经说过：“李商隐、温庭筠的诗句常常为我所用。”他的《石州引》“芭蕉不展丁香结”一句就是李商隐《代赠》中的名句。

贺铸是个个性奇特的人，他曾把自己的词作编为《东山乐府》，请好友程俱作序。程俱在序文中生动地描绘了他既有豪侠之气又具儿女之情的形象。这种个性反映在他的作品里，就是风格有时柔婉缠绵，有时豪放激越。但是，从总体来看，“贺梅子”的词作仍以婉约为主。

为什么说苏洵文章成就最高苏洵(1009～1066)，字明允，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人们把他的儿子苏轼、苏辙称为二苏，把他称为老苏，也以他的号称他为苏老泉。

苏洵名列“唐宋八大家”，是北宋中期重要的散文家。他早年也读过书、学过诗，但都没有下过苦功，直到二十七岁时才在妻子程氏的支持下谢绝交游，发愤苦读，是历史上有名的大器晚成的文学家。

苏洵不擅长声律对偶，因此多次在科举中落榜，这使他在古文上用力最勤，取得的成就也最高。苏洵的文章主要是议论，书翰和杂文，其中《几策》、《衡论》论政，《权书》论兵，《六经论》谈经，都是自成系统的专着。

苏洵的文章往往针对现实展开议论，能抓住问题的症结所在。如《六国论》批评六国贿赂秦国，就一针见血地直指宋朝怯敌退让的政策。又如研究敌情的《几策·审敌》对敌我态势作出了具体分析，也能鞭辟入里，切中实际。

苏洵的文章以议论见长，文笔老辣，析理精微，常常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例如管仲历来被认为是一代贤相，苏洵却在《管仲论》中批评他临死前没能识拔和举荐人才，导致了后来的权臣乱国，因此应该对齐国大乱负责。这是一篇翻案文章，却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无懈可击，充分体现了苏文笔锋犀利的特点。

苏洵作为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不是以诗词而是以散文见长的。

第五十章

李格非父女有何文学成就李格非(生卒不详)，字文叔，济南(今山东济南)人。他在熙宁九年(1076)中进士，曾经受到过苏轼的称赏，哲宗时官至礼部员外郎，和廖正一、李禧、董荣并称为“苏门后四学士”。徽宗时，蔡京专政，打击元祐党人，他被列入旧党遭到了罢免。他有《洛阳名园记》流传至今。

李清照(1084～11557)，自号易安居士，是李格非的女儿，她的母亲是名臣王拱辰的孙女，也能诗会文。建炎南渡(1127)以前，李清照的生活幸福美满，她十八岁时嫁给了赵挺之的儿子赵明诚，夫妻二人情投意合，虽然因为赵明诚做官他们有过离别，但时间都很短暂。靖康元年(1126)的战乱彻底改变了李清照的生活。先是建炎元年(1127)金兵南下，李清照被迫漂泊江南，紧接着建炎三年赵明诚在金陵病逝，李清照悲痛之下得了一场大病，但形势危急，她不得不继续南奔避难。一路上，她历经艰险，几经辗转，直到绍兴五年(1135)才在临安定居下来，直到去世。

李清照是一位才华横溢、抱负非凡的女作家，她的诗风意境宏阔，笔锋犀利，像“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夏日绝句》)这样豪气逼人的诗句丝毫不让须眉。但是，真正奠定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的是她的词作。

李清照有《漱玉词》，她的词以靖康之乱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词作主要表现了一位少女、少妇悠闲适意的生活情趣，如《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人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在人争渡、鸟齐飞的动态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词人天真活泼、热情洋溢的性格特征。作为一位女词人，李清照也有多愁善感的时候，流传千载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作于她和丈夫短暂的离别之后，其中“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在轻缓的叹息中包含着无限的柔情，是妇孺皆知的名句。

南渡以后，李清照词中的离愁别恨加重了分量，常常在哀叹之余流露出家国之恨，《永遇乐》“落日熔金”、《声声慢》“寻寻觅觅”，都是这时的代表作。其中《声声慢》的开头几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以十四个叠字组成，真实地传达出当时词人凄清悲苦的心境，在感情深度上明显超过了前期作品。

李清照作词善于运用浅近、清新的语句，采用白描手法，在一个动作、一个细节中准确地传达出微妙曲折的心理活动。她清新自然的语言风格被称为“易安体”，受到了后人的赞扬。

为什么说文同诗、文、书、画皆工文同(1018～1079)，字与可，自号笑笑居士，梓州梓潼(今四川梓潼)人。他长得方口秀眉，气格高洁，司马光、苏轼都很器重他，文彦博守成都时也写信给他说：“您襟怀洒落，就如同晴日里的白云、秋夜里的明月。”

文同诗、文、书、画无不精通。他在诗里描写自然风景常和绘画结合起来，如《晚雪湖上寄景孺》中的“独坐水轩人不到，满林如挂《暝禽图》”二句直接把山水比作名画，又如《长举》中“峰峦李成似，涧谷范宽能”二句以李成、范宽这两位画家的作画风格来比喻山水。钱钟书先生认为从文同开始，“这就成为中国写景诗文里的惯技”(《宋诗选注》)。文同篆、隶、行、草、飞白皆工，在书法上有一定造诣。他还是最早作文人画的文人之一，善画墨竹。刚开始他只是自娱自乐，但渐渐名声在外，有很多人拿着缣(jiān)，一种质地细薄的丝织品，古代常用来书写文字)帛来登门求画。文同很讨厌他们，把缣帛都扔到了地上。元丰初年(1078)他被任命知湖州，第二年在上任的路上休息，端坐而卒，后人称文同为“文湖州”，称他的墨竹画风为“湖州竹派”。

为什么说米芾“妙于翰墨”

米芾(1051～1107)，字符章，吴(今江苏吴县)人。曾任书画学博士，礼部员外郎，人称“米南宫”。米芾擅长诗文，精于鉴别书画古玩，作画不求工细，多用水墨点染山水，画史上有“米家云山”之称。但米芾最著名的不是诗文，也不是绘画，而是他的书法。

米芾(fú)是“宋四家”之一。他的书风与他的为人有很大关系。米芾穿

戴仿效唐人，风神萧散，吐音清畅，有洁癖，经常有惊世骇俗之举。无为州的治所(今安徽无为)内有一块巨石，奇丑无比，米芾见到后大喜，说：“这块石头当得起我一拜!”于是整整衣冠就拜了下去，口中还称石头为“兄”。米芾的气质风神与魏晋六朝时期的士大夫如出一辙，而他的书法也多借鉴六朝，传世的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据说不少是他摹制的。他在临摹六朝书法的过程中仔细揣摩，又加上天姿聪颖，转益多师，逐渐形成了姿致俊美而不失豪爽雄强的书风。米芾的行书与苏轼的天趣、黄庭坚的古朴、蔡襄的隽远不同，他以潇洒取胜，却又不失於单薄。他在某种程度上发扬了晋人洒脱的风度，但又能以清癯沉静为根基，虽然墨迹淋漓却又不失检点。米芾的书法作品传世较多，著名的有《千字文》、《方圆庵记》、《苕溪诗》、《多景楼诗》、《蜀素帖》、《鲁公仙迹记》等，而《兰亭序》更是一件书法佳品。

李公麟、周邦彦各有何长李公麟(1049～1106)，字伯时，号龙眠居士，舒州(今安徽潜山)人。熙宁三年(1070)进士及第，历任南康、长垣尉，泗州录事参军，中书门下后省删定官，御史检法，元符三年(1100)因病辞官，归老于龙眠山。李公麟一生官运不佳，艺术成就却很高。他的文章、书法都有可取之处，在古代器物的鉴赏上也有很高的造诣，但他主要还是一位画家。

李公麟最擅长于人物和鞍马画。他的人物画能表现出不同人物的个性和情态，而且特别注重构思立意，往往能引起人们的联想。据文献记载，他画西汉名将李广夺得匈奴马匹回到汉营的故事时，李广在马上引弓瞄准了匈奴骑兵，箭在弦上而人马已经倒地了。这种构思不合常理，但却充分展示了李广箭术的准确神奇，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李公麟的鞍马画有《五马图》传世，画的是西域进献给北宋王朝的五匹骏马，技巧娴熟，线条洗炼，流畅含蓄。他的好友黄庭坚在画的后跋中说到，当李公麟画完其中一匹名叫“满川花”的马以后，这匹马不久就死了，因为它的精气魂魄已经被李公麟的画笔取走了。这件事可能是一种巧合，但却反映出黄庭坚对李公麟的高度评价。

周邦彦(1056～1121)，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青年时期就博涉书史，但生活放浪，没有引起州里的重视。元丰六年(1083)他到京师向神宗进献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汴都赋》称颂新

政，受到赏识，由太学生升成了太学学正。元祐二年(1087)起在各地任地方官。元符元年(1098)哲宗召见他，再次进献《汴都赋》，授秘书郎省正字。徽宗时官至提举大晟(shèng)府。

周邦彦虽然以赋受到两位皇帝的称赏，但他主要是以词出名。周邦彦的词大多写爱情和身世之感，写爱情的词作有些寄寓了真情，但多数是酒筵歌席上的赠妓应酬之作。他写身世之感的词作则多以羁旅、思归、惜别为题材。周邦彦词在内容上没有什么创新，仍以婉约派的传统题材为主，他在词史上能占有很高的地位，主要是由于他在艺术技巧上取得了很大成就。

周邦彦擅长写长调，他的长调在严整的章法结构中富有变化，往往能把人情物态写得生动传神。他还善于借用、化用前人的诗意词句入词，并使之浑然天成，比如名篇《西河》《金陵怀古》全篇借用了唐代刘禹锡的《金陵五题》，《蔚迟杯》(隋堤路)中“阴阴淡月笼沙”一句化用杜牧《泊秦淮》的“烟笼寒水月笼沙”。周邦彦精通乐律，所以他的词作音律优美，抑扬有致，这也是他的艺术成就之一。

周邦彦在词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后代的许多词论家都认为他是两宋词坛上一位承先启后的大家。

为什么说陈与义“尤长于诗”

陈与义(1090～1138)，字去非，其祖先世居京兆(今陕西西安)，从他的曾祖父希亮开始迁到洛阳(今河南洛阳)。他天资聪明，又勤奋好学，于宋徽宗政和三年(113)年中进士，曾官至参知政事。史称他“尤长于诗”，是两宋之交的著名诗人。

陈与义现存诗六百二十六首。他一生经历了北宋末期、南宋初年两个阶段，以靖康之变为界，他的诗歌创作自然分成了前后两个时期。靖康以前，他虽然一度以诗名为朝廷所用，但很快就遭到贬黜，大部分时间郁郁不得志。诗歌创作受黄庭坚、陈师道的影响很大，咏物、抒怀、唱和、酬赠等是他这一时期诗歌的主要内容。通过这些题材，他或抒发壮志难酬，或嘲讽庸俗世风，或感叹地位卑下，无论是内容和情趣都与黄庭坚、陈师道相近，一表现出他对自身遭遇的不满和对庸俗世态的厌

恶。但是突如其来的靖康之变使陈与义的生活和思想都发生了变化。从靖康元年(1126)到绍兴元年(1131)，这五六年的时光陈与义是在不断逃亡中渡过的，后来虽然在朝廷中做官，但是国家却时刻面临着强敌的严重威胁。他对此忧心忡忡，因此感叹流亡、忧愤时政、歌颂报国以及怀念故土等就成了他后期诗歌创作的主流。如那首著名的《伤春》“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初怪上都闻战马，岂知穷海看飞龙!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峰”。这首诗做于建炎四年(1130)，当时金兵把宋高宗一直追到了海上。这首诗全篇雄浑沉郁、忧愤深广，以精美的语言、洪亮的音调，抒发了作者的爱国之情，而伴随着这种爱国精神的发扬，他的诗歌在艺术上也有了重要的发展，由黄庭坚的奇巧和陈师道的朴拙发展为雄浑沉郁，从而突破了江西诗派的范围，成为两宋之间最为杰出的诗人。

“希夷先生”是谁的赐号陈抟(?～989)，字图南，亳(bó)州真源(今河南鹿邑)人。他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在河边玩耍，有个身穿青衣的老妇叫他过来喂奶给他吃，从此他就变得越来越聪明了。长大后他读经史书籍，总是过目不忘。后唐长兴年间，他没有考中进士，后来就不愿做官了。陈抟自己说他曾经遇见孙君仿和獐皮处士，他们告诉他武当山九室岩可以隐居。他在那里修炼了二十多年后又到华山隐居。陈抟在当时很有名气，周世宗、宋太宗都曾亲自召见他，还赐给他很多东西。他能看透别人的心事。有个叫贾休复的道士想要挂在陈抟房子里的大瓢，被他看了出来，就叫手下人取下大瓢送给了贾休复。贾休复非常吃惊，认为陈抟简直就是神仙。有个叫郭沆(hàng)的人，小时候有一次住在陈抟所居的云台观中，睡到半夜突然被陈抟叫醒，让他赶快回家，陈沆还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陈抟又说：“可以不回去了。”第二天，陈沆回到家里，才知道半夜母亲突然心疼得几乎死过去，不过过了一会儿又好了。

太平兴国九年(984)，陈抟去京城朝见太宗，太宗派人好好招待他，并叫宰相宋琪等人接见他。当时陈抟已经在华山居住了四十多年，快一百岁了。他被送去见宋琪，宋琪等人问：“先生您修炼的方法可以教给外人吗?”陈抟回答道：“我只是个山野里的小人物，对国家没有用处，也不知道什么修炼的方法。当今皇上英明贤能，博通古今，确实是个有道明君。你们同心协力辅助皇上治理国家，这就是最好的修炼之术了。”宋琪等人把他的话告诉了太宗，太宗龙心大悦，好好赏赐了他一番，还下诏

为他赐号“希夷先生”。

端拱元年(988)的一天，陈抟忽然对一名弟子说：“你帮我在张超谷中筑一间石室，我要去那里静养。”端拱二年秋天的七月，石室建成了，陈抟给朝廷写了一篇几百字的文章，大致是说自己将在这个月的二十二日死在莲花峰下的张超谷中。后来果然是这样。他死后的七天尸体还有余温，有五色云彩弥漫在洞口，几个月都没有散去。

“梅妻鹤子”者是谁“梅妻鹤子”指的是北宋的林逋(bǔ)，他是著名的隐士，也是一位诗人。

林逋(957～1028)字君复，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从小是个孤儿，苦学成才，性格恬淡，家里穷得缺衣少吃，他却一点儿都不发愁。他游览了在江淮间很多地方，后来回到了杭州，在西湖的孤山定居下来，此后二十年中再也没有进过城市。林逋擅长行书，喜欢做诗，每次写完一首后就随手扔掉了，有人对他说：“你为什么不把这些诗保存下来流芳后世呢?”林逋说：“我隐居在山林里，并不想靠做诗成名当世，何况留名后世呢?”但是还是有人暗暗把他的诗记下来了。林逋的诗和他的为人一样，风格恬淡清幽，人们所熟知的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就出自他的诗作《山园小梅》。

林逋曾经在房子旁边为自己立墓，临终前写的诗中有“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两句。他死后仁宗赐谥和靖先生。

由于林逋一生没有娶妻生子，却以观鹤赏梅为乐，所以人们送他了一个“梅妻鹤子”的雅号。

秦九韶对数学有何贡献秦九韶(1202～约1261)，字道古，普州安岳(今四川安岳)人。就个人品行而言，秦九韶可以说相当恶劣，他是一个自私、专横和唯利是图的人。他出任琼州(今海南琼山)太守时，不到一百天，就因为贪暴被免职。但后人都不得不承认，他有着杰出的数学才能，美国科学史家萨顿甚至称赞他是“他那个民族，他那个时代，并且确实也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他对数学的贡献，体现在他的数学著作《数书九章》中。

《数书九章》的成就可以与名著《九章算术》相媲美。这部著作，南宋时称为《数学大略》或《数术大略》，明代的《永乐大典》和清代的《四库全书》都称为《数书九章》。全书共十八卷，八十一题，分为九类，每类九题，每个题答案的后面都有“术”，说明解题方法；“术”后面有“草”；说明演算步骤，有的题目还有图画。这本书最重要的成就是正负开方术(高次方程数值解法)和大衍求一术(一次同余组解法)。秦九韶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把以增乘开方法为主体的高次方程数值解法发展到了十分完备的地步，比意大利数学家鲁菲尼和英国数学家霍纳早了五六百年。一次同余式问题的解法是适应天文学家推算上元积年的需要产生的。三世纪以后，中国各家历法都有一个特定的上元积年，但各个时期的天文学家们尽管掌握了上元积年的推算方法，却没有人明确提出系统和完整的一次同余理论。秦九韶经过深入研究，在《数书九章》中明确给出了一次同余组的一般解法，提出了著名的“大衍求一术”。

除了上述两方面外，《数书九章》还在代数学、几何学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此外，它的内容非常丰富，不仅有数学、天文历法乃至雨雪量等方面的珍贵资料，还可以从中了解到南宋时期户口增长、耕地增长、赋税货币流通等社会经济领域的真实情况。可以这样说，《数书九章》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的顶峰，它所包含的高次方程解法以及一次同余组解法，代表了中世纪世界数学发展的主流和最高水平。

为什么天下人认为蔡京是“六贼之首”

徽宗宣和六年(1125)十二月，太学生陈东等伏阙上疏，请求诛杀“六贼”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动，以平众怒。从此，蔡京就被认为是“六贼之首”，成了历史上妇孺皆知的大奸臣。

蔡京(1047～1126)，字符长，兴化仙游(今福建仙游)人，神宗熙宁三年(1070)登进士第。司马光秉政时恢复旧法中的差役法，限期五日内完成。大家都因为时间太紧没有完成，只有蔡京一个人把辖区内的雇役(王安石的“免役法”)全部改过来了。司马光知道后，高兴地说：“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呢?”蔡京后来因为奸邪乱法被贬职。绍圣初，蔡京代理户部尚书。章惇想恢复雇役，但职能部门久久不能决定。蔡京为了取悦章惇，就对章惇说：“按照熙宁年间的旧例施行就

行了，有什么可商量的?”章惇听了他的话以后，就决定恢复雇役。差役和雇役是两种不同的役法，司马光和章惇分别属于旧党和新党，蔡京竟然取得了两个人的欢心，从他在这件事上的反复无常中就可以看出他的奸邪本性。

徽宗即位后，曾把蔡京贬到太原，蔡京不愿意离开朝廷，迟迟不去上任，御史又上奏他的恶行，他因此被夺职，住到了杭州。正巧宦官童贯到江浙一带为徽宗寻访书画奇巧，蔡京就极力巴结他，天天陪着他游山玩水。童贯每天都派人把蔡京匭的屏障之类进献给徽宗，徽宗逐渐对蔡京有了好感。有个叫徐知常的道士经常出入元符皇后宫中，也常推荐蔡京，以至于宫妾、宦官众口一词，都对蔡京称赞不已。于是，徽宗又起用了他。

崇宁元年(1102)，韩忠彦、曾布相继罢相，蔡京取代曾布任右仆射，在徽宗面前表示愿意尽心竭力辅佐皇上继续推行新法。随后，他又被升为左仆射。

蔡京通过卑劣的手段当上宰相后，就假借推行新法的名义，培植亲信，铲除异己。他勾结宦官童贯、梁师成、杨戬(jiǎn)，凡是重要事务如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监泽、赋调、尹牧等，他都派自己的亲信每三个人主管一事。蔡京家中喂马的人都是大官，媵妾都被封为夫人，他的权势可见一斑。他动不动就以推行新法为借口改换官制，以满足自己的私欲，甚至为了怕有人弹劾自己而作假圣旨，即使有些作得不像，群臣也都不敢直说。他不遗余力地扫除政敌，把“奸党”司马光、文彦博等一百二十人的名字刻在了端礼门上，并把五百四十余人列为“邪等”。除打击旧党之外，还以“为臣不忠”的罪名打击章惇、曾布等新党，为的是铲除可能威胁到自己相位的人。

蔡京经常在徽宗面前进言，说当今天下和平富足，应该及时享乐。有一次徽宗大宴群臣，拿出玉盏、玉卮(zhī)对辅臣说：“朕想用这些东西，只是担心别人说朕太奢华了。”蔡京说：“臣过去出使契丹时，他们拿石敬瑭时代的玉盘玉盏向臣夸耀，说大宋没这些东西。现在皇上用它们，没有什么行不通的。”徽宗不放心地说：“先帝造了一座几尺的小台，就有很多人上奏劝谏，朕十分担心又有人来劝朕。”蔡京说：“如果

事情做得合理，有人说也没什么大碍。陛下应当享受全天下的进奉之物，区区一些玉器，有什么大不了的呢?”蔡京不但在徽宗面前大肆宣扬“丰亨豫大”之说，教唆他尽情享乐，自己家的生活也卜分奢侈豪华。他在开封有两座庄园，杭州还建有大宅院。他喜欢吃鹌鹑，一顿羹汤往往杀数百只鹌鹑，家库中储存的黄雀肫就装了满满三大屋。

蔡京拜相有四起四落，由于他的关系网牢不可破，每次下台后总有人帮助他东山再起。他执政期间搞得民怨沸腾，民谣“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反映了百姓对他的憎恶和不满。后来他死在前往贬所的路上，天下人还都认为太便宜他了。

为什么贾似道被称为“蟋蟀宰相”

贾似道(1213～1275)，字师宪，台州(今浙江临海)人。他凭借姐姐贾贵妃的裙带关系当上了官，并且屡屡升迁。

景定元年(1260)贾似道乘蒙古兵撤退的机会杀死了一百多人，然后隐瞒自己与忽必烈议和的真相，向朝廷谎称大捷。理宗大喜，把他召到了临安。贾似道入朝后，排挤掉左丞相吴潜，并把吴潜的亲信全部逐出了朝廷。从此，贾似道就开始专断朝政，直至去世，达十七年之久，尤其在度宗在位期间，贾似道的实际权力远远大于皇权。

咸淳元年(1265)三月，贾似道上章辞职，暗地里却让京湖安抚制置使吕文德谎报蒙古兵已经攻来，把智力低下的度宗吓得魂飞天外，一个月里八次派人专程去迎他回朝。度宗一直称贾似道为“师臣”，并特许他人朝不用拜见礼，甚至退朝时度宗还要站起来目送他走出金殿。度宗的无能更滋长了贾似道的气焰。

贾似道身为宰相，却置国家社稷于不顾，每天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每天的朝政大事，都由书吏把文书抱到他的葛岭私第，他自己放在一边不管，整日与姬妾花天酒地，却让门客廖莹中和翁应龙去处理政事，自己只是在最后画个押了事。有个亲戚来到他家，怕打扰贾似道的玩兴，就先站在府门前向里面看了看，正好贾似道看见了，马上就把他捆起来扔进了火里。有人来看到贾似道正和群妾趴在地上斗蟋蟀，就开玩笑地说：“这也是军国大事吗?”此后，人们就常用“蟋蟀宰相”来指代贾

似道。

贾似道虽然不认真处理政事，但事无巨细都要经过他批准才能实行。李芾、文天祥、陈文龙、陆达、杜渊等人都因为触犯贾似道而受到了责罚。于是，官员们都争着贿赂他以谋求高官，有个叫陈奕的竟然把他的玉匠当成哥哥一样对待，想以此来接近贾似道。贾似道也怕自己的行为受到人们的谴责，就用尽手段拉拢名士，对太学生施以小惠，企图从舆论上恢复声誉。

咸淳四年(1268)襄阳被围后，贾似道每次上疏都假惺惺地请求派自己去前线，背后却指使台谏上奏章让皇上把自己留在朝中。吕文焕告急，贾似道又请求行边，朝中大臣认为这样不合适。监察御史李旺等人认为高达可以去救援襄阳，贾似道却说："如果用高达，怎么安置吕文焕呢?"李旺等人出来以后叹息道："吕文焕有地方安置了，朝廷却要面临危难了!"由于贾似道对襄阳的战事掉以轻心，久久不去救援，吕文焕终于被迫投降，贾似道竟然还厚颜无耻地说："我好几次都想去前线，先帝总是不答应，如果早点儿让我去，事情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襄阳失守后，长江中游防线迅速崩溃，元兵马上就会攻到临安。这时，朝廷已经陷入混乱，贾似道也乱了方寸，勉强凑了一支军队出师应战，但已经于事无补了。元军南下激起了朝中大臣长久以来对贾似道的不满，王爚面见太后说："本朝有很多权臣祸国殃民，但都没有严重到贾似道这种程度!"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贾似道被贬为高州团练副史，路上被押解他的会稽尉郑虎臣杀死。